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上）



Edward P. Thompson

[英国]E.P.汤普森 著 钱乘旦等 译

人文与社会译丛

刘东 黄平 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下）



Edward P. Thompson

[英国]E.P.汤普森 著 钱乘旦等 译

人文与社会译丛

刘东 黄平 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

[英国]E.P.汤普森 著　钱乘旦等 译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下）

[英国]E.P.汤普森 著 钱乘旦等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英）汤普森（Thompson，E.P.）著；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ISBN 7-80657-169-8

Ⅰ.英… Ⅱ.①汤… ②钱… Ⅲ.工人阶级-研究-英国
Ⅳ.D756.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75614号

书　　名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作　　者 [英国]E.P.汤普森
译　　者 钱乘旦 杨豫 潘兴明 何高藻
责任编辑 周丽华
原文出版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6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扬州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32.75
插　　页 4
字　　数 750千
版　　次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80657-169-8/I·147
定　　价 (上下两册)54.5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编的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唯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前　言

这本书的书名长一点，但能够很好地表达本书的宗旨。我使用“形成”，因为这是一个在动态过程中进行的研究，其中既有主观的因素，又有客观的条件。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阶级”一词使用了单数，而不用复数，其理由正是本书探讨的一个问题。单数和复数自然不同，复数可以进行描述，其含义既清楚又不清楚，它把一些不连续的现象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是裁缝，那里是织工，堆积在一起而形成工人阶级的复数。

但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

不仅如此，对阶级的看法还有赖于对历史关系的看法。如其他关系一样，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并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最精密的社会学之网也织不出一幅纯正的阶级图形，正如它织不出“恭敬”与“爱慕”这些概念一样。关系总要体现在真人身上，而且还要有真实的背景。我们不能有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其存在各自独立，然后再把它们拉进彼此的关系中去。我们不能有爱而没有恋爱的人，不能有恭敬而没有地主与长工。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

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人。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如果说经历是可以预先确定的,阶级意识却不然。我们可以说具有相似经历的相似职业集团对问题会作出合乎逻辑的相似反应,但决不能说这里面有"规律"。阶级觉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但决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方式。

有一种说法很有诱惑力,即假定阶级是一个"东西",但在马克思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这并不是他的本意。然而这个错误却使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受到损害。有些人说:"它",即工人阶级,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几乎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精确测定,例如有多少人对生产资料是处于某种关系之中等等。一旦这种假定确立起来,阶级觉悟也就推导出来了:如果"它"适时地了解到自己的地位和真实的利益,那么"它"就应该有阶级觉悟(但实际上却很少有)。这里有一个文化上的上层建筑,通过它,人们极缓慢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文化上的"落后"与走形使人不能容忍,所以就很容易产生某种替代的理论,即党团派系、理论家等等,由他们揭示阶级觉悟。但这种觉悟并非现实中的觉悟,而是理论上应该如何如何的觉悟。

在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上,另一边也每天都在犯同样的错误,其中一种说法是完全否定阶级的。由于把肤浅的阶级概念强加给马克思,而这种概念又很容易被击破,于是就有人说:关于阶级的任何概念都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是强加于证据之上,而阶级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另一种说法则靠一个奇妙的转换把阶级的动态观点变成了静态观点:"它",即工人阶级,是存在的,而且可

以多少准确地界定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但阶级觉悟却不是个好东西,它是精神不正常的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因为,在发挥着不同"社会功能"的集团间破坏其和谐共存(由此而延缓经济成长)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失调现象"。[①] 问题应当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处理和疏导"它的抱怨。

如果能记住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那就不会这样来思考问题了。"它"之存在,既没有典型化的利益与觉悟,也不像病人躺在整形医生的手术台上那样让人随意塑造。我们不会像某位作者那样本末倒置地来看问题,他在研究阶级问题时,一头栽进了方法论的牛角尖,而不去考察真实历史背景下的真实阶级地位,于是我们听说:

> 阶级的基础是与地位有关的权力差异,即与其权力预期值有关的社会功能结构。……个人由于发挥了与权力有关的社会功能而成为一个阶级的成员,……他属于某个阶级是因为他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占有某种地位,也就是说,阶级的身份来自对社会功能所承担的责任。[②]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人如何才能进入某种"社会功能"?还有,那个特别的社会组织(连同其财产权和权力结构),是如何出现的?而这些,就是历史问题了。如果让历史停留在某一点上,那就不会有阶级,而只会有一堆人加上一堆经历;但如果在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适当的时间段上来观察这些人,就能看到其相互关系及思想与建制的模式。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

---

① 持这种观点而又与本书所述时期相关的一个例子,可在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的一位同事的著作里找到,即 N.J.斯梅尔策的《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变化》(1959)。

② R.达伦多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冲突》(1959),第 148—149 页。

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

我对某些社会学家在方法论上的见解也许理解不深，但我希望，我这本书至少对理解阶级有所贡献。我相信，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这本书可以看做是英国工人阶级从步入青春到早期成熟的一本传记，1780 至 1832 年间，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统治阶级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这些年中之所以还能抱成一团，是因为面对反叛的工人阶级，他们间的某些对立化解了（或降到相对次要的地位上）。因此，在 1832 年，工人阶级的存在是英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本书的写作如下：第一部考察 18 世纪留传下来的人民传统，这些传统在 18 世纪 90 年代严酷的雅各宾骚动中发挥了作用。第二部从主观因素转向客观因素，即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而在我看来，这些经历的意义特别深远。这个部分还企图对工业中新产生的劳动纪律的特点作出评价，以及卫斯理宗与劳动纪律有什么关系。第三部谈人民激进主义的历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后，还对 19 世纪 20 和 30 年代的政治理论和阶级觉悟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

因此，本书不如说就是一组论题彼此相关的论文集，而不是首尾相连的叙述文。在选择这些论题时，我常常意识到我正在向流行的正统观点挑战，比如说，这里有费边社的正统观点，它把工人群众看成是自由放任政策的被动的牺牲品，只有少数一些卓有远见的组织工作者不在其例（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朗西斯·

普雷斯)。经济史学家以经验为基础,他们也有他们的正统观点,他们把工人看成劳动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原始资料。此外,还有所谓的"天路历程"正统观点,它在这一整段历史时期中上下搜索,要找出各种各样的先行者——诸如福利国家的先驱、社会共和国的前辈、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业关系的早期实例等等。当然,所有这些正统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它们都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但对第一、第二种观点我要说:它们很容易忽视工人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自觉作出的贡献;对第三种观点我要说:它用后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而不顾及历史本来的面目。只有成功者(即他们的愿望预示了后来的发展的人)才被记住了;走不通的路,迷失的事业,还有那些失败了的人则统统都被忘记。

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这看起来很落后,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自身的经历。如果说他们是历史的牺牲品,那么他们现在还是牺牲品,他们在世时就一直受人诅咒。

我们在作判断时,就不能把这一点作为惟一的标准,即人的活动是否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不管怎么说,我们自己也不是在社会进步的最终点上,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失败了的某些事业,也许能让我们看清至今仍须整治的某些社会弊病。此外,还有两个特别的原因使这个时期尤其引人注目,就是:第一,在这个时期,人民运动特别注重平等与民主的原则,我们虽然时常

夸耀我们的民主生活方式，但在那些关键的岁月里发生的事，却又常常被人们忘记或忽视；第二，今天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存在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存在着为建立民主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在工业革命中的经历相比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非洲取得胜利。

最后，我要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读者说几句道歉的话。我没有涉及他们的历史，这不是出于沙文主义，而是出于衷心的敬意。因为阶级既形成在经济中，也形成在文化中，所以我十分当心，不把英国的经验普遍化（我确实谈到了爱尔兰人，但不是在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而是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移民）。苏格兰的经历尤其和我们一样，它既激动人心，又充满痛苦，雅各宾派在苏格兰的宣传鼓动甚至更加激烈，更加英勇。但苏格兰的事毕竟不同，加尔文教不是卫斯理宗，虽然在 19 世纪初很难判断哪一个教派更不好。英格兰没有像高地移民那样的农民，群众文化也相当不同。很可能，直至 19 世纪 20 年代，都可以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经历分得一清二楚，因为到这时为止，双方的工会和政治联系都是时断时续的，而且很不成熟。

本书写于约克郡，因此常常使用约克西区的史料。我要感谢利兹大学，感谢 S.G. 雷布尔德教授，是他们使我在几年以前开始研究这个项目，而最后就写成了这本书；我感谢利维霍姆基金会，是它给了我高级研究员的身份，使我能最终完成这本书。我在给学生上课时，也从学生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这本书中提出的那些问题，有许多就曾和他们讨论过。我还要感谢各部门主管，是他们准许我引用了手写的资料和有版权的资料，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将特别写在全书的最后。

我还应该感谢其他许多人，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先生、阿萨·

布里格斯教授和约翰·萨维尔先生,他们对本书的部分书稿作出过指正,虽说他们并不对我的观点负责。R.J.哈里斯先生在编辑本书时极有耐心,因为本书突破了一套丛书的限制,而最初这本书是写给那套丛书的。佩里·安德森先生、丹尼斯·巴特先生、理查德·科布先生、亨利·科林斯先生、德里克·克罗斯利先生、蒂姆·恩赖特先生、E.P.亨诺克博士、雷克斯·拉塞尔先生、约翰·雷克斯博士、E.西格斯沃思博士和H.O.E.斯威夫特先生都曾在不同方面给予帮助。此外,我还要感谢多萝西·汤普森夫人,她也是历史学家,而她又是我的妻子,本书的每一章都曾和她讨论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使我能够借用她的观点,也能借用她笔记本上的资料。她的贡献不表现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而表现在看问题的整体方法上。

1963年8月,于哈里法克斯

目　录

（上册）

目　　录

（下册）

第三部　工人阶级的存在

第一部　自由之树

“你们正在和人类的敌人作拼死的斗争，不仅为你们自己——因为你们可能看不到那完美的自由之日；你们斗争，也是为正在吃奶的孩子。”

——1796年伦敦通讯会对派往各地巡回代表的指示

“恶人婊子正在统治，不受限制。”

——威廉·布莱克，1798年



第一章 成员无数

17

“让我们的成员无数!”这是伦敦通讯会“指导原则”中的第一条。1792年3月,当通讯会书记开始与设菲尔德的一个类似组织建立通信联系时,就引用了这一条原则。[①] 伦敦通讯会第一次会议是两个月前在河滨马路附近一家酒馆(埃克塞特大街的“钟声酒吧”)里召开的,9名“心地善良、勤劳清醒的人”参加了会议。伦敦通讯会的创建者、第一任书记是托马斯·哈迪,他后来回忆这次会议时说:

> 吃过面包和奶酪、喝完黑啤酒、如平时一样吃完晚饭、吸过一袋烟后,我们就谈起了时局是如何艰辛、生活必需品是如何昂贵……这样,就提出了把我们聚到一起来的那件事——**议会改革**,对这个阶级的人来说,这是件需要慎重考虑和认真对待的大事。

那天晚上,在场的9个人中有8个成了创始会员,交纳第一个星期的一便士会费(第9个人考虑了一番,在第二个星期也参加进来)。哈迪(他也是司库)口袋里装着协会的全部资产8个便士,回到他在皮卡迪利大街9号的家里,他将用这些钱去买信纸,以便和国内那些思想相同的组织建立联系。

两个星期后,有25个会员参加进来,司库手里也有了4先令1便士的经费(6个月后据称已有2000多名会员)。入会手续很简单,只要对三个问题作肯定的答复就算通过了考察,其中

① 《托马斯·哈迪自传》(1832),第16页。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 你是否完全相信：国家的福祉需要每一个成年人——只要他头脑清醒、又没有犯罪的前科，就有权参加议会的选举？

18 协会成立的第一个月中，曾接连五个晚上辩论同一个问题："我们，作为手艺人、小店主和机匠，有没有权利去争取议会改革？"他们考虑再三，"在心中斟酌有可能想到的每一种观点"，最后认为有权利这样做。

两年后，1794 年 5 月 12 日，皇家执行吏和弓街两名巡捕加上内政大臣邓达斯的私人秘书，还有其他一些大人物光临皮卡迪利大街 9 号，将鞋匠托马斯·哈迪以叛国罪逮捕。当官员们搜查房屋、砸开一个衣橱、在哈迪夫人(她正怀着孕，因此始终躺在床上)的衣物里乱翻、包走了四大方巾的信件和一米袋的传单、书籍和手稿时，哈迪一家人默默地在一旁看。就在这同一天，国王向下院发出一份特别信件，专门谈各地通讯会的煽动活动；两天之后，下院任命了一个秘密委员会，专门审查哈迪的文件。

枢密院亲自把哈迪提审了好几回，哈迪对这几次提审很少记叙。但哈迪的一个同监难友把他自己受这举国最高机构审理的情况用戏剧形式重现出来，以飨读者。约翰·塞尔沃尔这样记叙道："我被叫进去，看见全班人马都守在那里，下巴深陷在讲稿和手稿中……它们都乱糟糟地堆在一起。"大法官、内政大臣和首相(皮特)都在那里：

> 检查总长(钢琴伴奏)：塞尔沃尔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
> 塞(略显悲哀地)：约翰。
>
> 检(钢琴伴奏继续)：……姓名以两个"l"还是以一个"l"结尾？
>
> 塞：两个，不过也无所谓。(谨慎而又阴郁地)你别自找

麻烦了，我不会回答问题的。

皮特：他说什么？（从房间另一边飞快地环视一眼，目光敏锐，然后坐到大法官身边。）

大法官（声调温柔，几乎是耳语）：他说不想回答问题。

皮特：什么？——什么？——什么？（尖锐地）……[2]

约翰·塞尔沃尔于是把背对着那些达官贵人，"欣赏起一幅水彩画来"。首相叫他走开，然后把一个14岁的男孩亨利·伊顿叫进来提审，伊顿曾和塞尔沃尔家住在一起。这孩子立场十分坚定，竟"发表起政治演说来，他言词尖锐，谴责皮特先生，说他向人民征收太高的捐税……"[3]

19

用后来100年的标准来判断，冲突双方在这时都没有经验，都不清楚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他们把后来那种大规模的非个人冲突预演成稀奇古怪的个人冲突了，[4] 礼貌与敌视并存，在阶级仇恨的怨怒中，仍留有表现个人善意的余地。塞尔沃尔、哈迪和其他10名犯人被关在伦敦塔，后来又转到新门监狱。在新门监狱，塞尔沃尔有一段时间关在陈尸所里；哈迪太太在"教会与国王派"暴徒围攻她的家时受了惊吓，结果难产而死。枢密院决心把叛国罪的诉讼进行到底，而对叛国犯的最高定罪是先上绞刑，乘他还没死的时候砍断绳子，剖腹掏肠（当着他的面焚烧内脏），然后再砍头、分尸。一个由体面的伦敦市民组成的大陪审团对此没有兴趣，经过9天的审判，哈迪被开释（那天刚好是

② 《民友报》，1795年4月4日。可对照枢密院关于提审塞尔沃尔的记录："本院书记官问他姓名如何拼，答：随便怎么拼都行，他是不会回答的……"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09号，第83帧。

③ 《晨报》，1794年5月16日。

④ 后来，当雅各宾派约翰·宾斯未经判决就关进格拉斯特城堡时，内政大臣夫妇还携带二女去探望他。

1794年的火药阴谋纪念日)。[5]陪审团长在宣布过“无罪”之后就晕了过去,而伦敦民众则情绪激昂,把哈迪拉到街上去凯旋游行。霍恩·图克和塞尔沃尔也随后获释(其他人的案子也就此了结了)。但民众的庆贺却稍嫌早了一点,第二年,对改革派——或“雅各宾分子”的高压政策反而加倍了。到90年代末,整个运动似乎都已被打散,伦敦通讯会被取缔,潘恩的《人权论》被查封,群众集会也被禁止了。哈迪在大莱市附近开了一家鞋店,请以前的老改革派来照顾他的生意,以示不忘他过去的功苦。约翰·塞尔沃尔隐退到南威尔士一座孤独的农场上去。初看之下,
20 “手艺人、小店主和机工”终究是没有权利争取议会改革的。

一般认为,伦敦通讯会是英国第一个确定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为了不故弄玄虚(因为设菲尔德、德比和曼彻斯特的协会都成立在伦敦通讯会之前),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有些人说,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就时常出现一些有工人阶级参加的讨论团体;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把伦敦通讯会看成是“群众激进”团体,也许比“工人阶级”团体要准确得多。

从哈迪的情况来说,他肯定是个工匠。他1752年生,曾在斯特林郡学鞋匠手艺;他也在卡隆铁工厂做过瓦匠(在给制铁商罗巴克盖住房时,脚手架倒下来,差一点被砸死),因此也见识过一点新工业的东西。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不久到伦敦,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他选择了一个职业,那是众多职业中的一个,在这些职业中,帮工们都指望能自开门面,幸运者还可以自己成为开业师傅——如哈迪最终做到的那样。他娶一个木匠兼建筑

⑤ 1605年10月5日,天主教徒企图炸死英王詹姆斯一世,是为火药阴谋案。——译注

工的女儿为妻；他的同事、担任过伦敦通讯会主席的弗朗西斯·普莱斯后来则成为裁缝铺老板。当时，帮工与小业主的分界线模糊不清，1795 年，鞋匠帮工协会曾罢工反对哈迪，那时他已经是小老板了；弗朗西斯·普莱斯在成为裁缝业主之前，则帮助组织过 1793 年缝裤业帮工的罢工。具有独立身份的工匠(其工场也就是"店铺")和小店主、小生意人之间的分界线就更加模糊；从这些人那里再跨一步，就是个体经营的雕刻师如威廉·夏普和威廉·布莱克，以及印刷工、药剂师、教师、办报人、外科医生和非国教的牧师等等。

因此伦敦通讯会的一端深入到皮卡迪利大街、舰队街和河滨大街四周的咖啡店、酒馆和非国教教堂里去，在那里，自学起家的帮工有可能和印刷工、小店主、雕刻师及青年讼师们并肩而坐；它的另一端，特别是在泰晤士河东岸和南岸，就一直插到比较老的工人集团中去，比如说外滨的码头工、斯皮特菲尔兹的丝织工、索斯沃克的非国教古老据点等等。200 年来，"激进的伦敦"与只有两三个基本行业的北中部中心区相比，社会与职业方面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也显示出更大的流动特色。伦敦的人民运动时常缺乏一致性和持久性，而这些特点只有在整个地区都卷人共同的社会与职业冲突时才会有。但另一方面，伦敦人又比较容易接受思想的或"理想的"动机，理论宣传在这儿比在北方更容易找到听众。伦敦激进主义很早就变得城府很深，因为它需要把许多宣传运动组织成一个共同的运动。新理论新观点一般总是在伦敦先找到与民众运动结合的交接点，然后再从伦敦转到外省的中心地区去。 21

伦敦通讯会就是这样一个交接点，应该记得，最初的创始人住在皮卡迪利，不是外滨也不是索斯沃克。就连它最初几次会议所留下的简短记录中，都保留着一些显著的特色，表明一种新

的组织形式已经出现，而正是这些特色，能帮助我们（在 1790 至 1850 年的时代背景下）给工人阶级团体下一个定义。这些团体往往由一个工人担任书记，每周收取很低的会费，它把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混杂在一起，也就是"时局之艰辛"和议会改革混为一谈。它举行的集会既能起社会交往的作用，也能起政治活动中心的作用；出于实际需要，它特别注重会议程序；更重要的是，这些团体都决意要宣传自己的观点，把那些倒向他们的人组织起来，而这就体现在如下指导原则中，即"让我们的成员无数"。

时至今日，我们也许会对这个原则习以为常，但它却是历史的转折点之一，它体现了孤家寡人主义的结束，也体现了政治作为世袭集团或有产者独占权利的结束。接受这个原则，就表明伦敦通讯会扬弃了政治与财产权划一的古老做法——同时还扬弃了"威尔克斯和自由"时代的激进主义，在那个时代，"阿斗"尚未自我组织起来去争取自己的目标，而是受一个派别——哪怕是激进派别的召唤而卷入临时行动，结果是加强了这个派别的力量，威胁到政府当局的存在。伦敦通讯会用一种"无限"的方法去打开宣传鼓动之门，这表明一个新的民主概念已经产生，它把古老的禁区置之不顾，而寄希望于平民百姓的自发行动和自我组织过程。这样一种富有革命气息的挑战，当然会受到叛国罪的指控。

22

不过，这个挑战在以前也曾有人提出过——那就是 17 世纪的平等派。当时，争论在克伦威尔的军官和军队鼓动员之间展开，其措词用语预示了 18 世纪 90 年代的冲突。就在普特尼辩论[6] 进入高潮时，士兵代表争辩说：是他们打赢了战争，因此应该得益，应该把选举权扩大，把他们也吸收进去。平等派雷恩巴

⑥ A.S.P. 伍德豪斯：《清教与自由》(1938)，第 53 页起。

勒上校的说法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说：

> 我确实认为：最穷的人也和最高贵的人一样生活，因此，先生，我认为事情再明白不过了：每一个在某个政府之下生活的人都应该首先同意把自己放在那个政府之下……我要怀疑，任何一个怀疑这种情况的人还是不是一个英国人。

对此，“大人物”的代表、克伦威尔的女婿埃尔顿将军回答说：“在本国，一个人若不具备永久不变的利益，则他就无权关心或参与国事的处理……”雷恩巴勒逼他说明白一点，埃尔顿于是就激动地答道：

> 我所坚持的主要之点，是我重视财产。我希望我们不要为胜利果实而争斗不休——但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他不应该走上取消财产的路，这关系到王国宪政的基础，你取消它，也就取消了一切。

他接着说：“如果一个人仅因为有一口气就能当选议员”，那么下院就有可能产生一个多数，他们在地方上没有利益可言，也没有永久的利害关系，“这些人为什么不会投票反对一切财产？……告诉我你们还要走多远，你们是否可以凭这条规定去保护一个有财产的人？”

剥夺别人的政治与财产权身份，这当场就引起愤怒的反响。塞克斯比[7]说：

> 我们成千上万的士兵出生入死，当然，就地产而言，我们在这个国家里财产很少，但我们却有天生的权利。现在看来，好像是没有固定的地产就要没有权利了……我觉得我们上当了！

23

⑦ 塞克斯比是士兵代表，平等派。——译注

雷恩巴勒讥讽地插话道：

> 先生，若不把一切财产都取消，我以为是不会有自由的。假如这是一个规定……，那也就只好如此了。但我却不得不知道，长久以来士兵们为什么而战？他之所以战斗，是要让自己沦为奴隶，是要把权力给予富家，给予地主，是要让自己永世为奴！

对此，埃尔顿和克伦威尔的辩解仿佛预见了1688年的妥协。他们说，普通士兵为三件事而战：一是限制国王侵犯个人权利与信仰自由的特权，二是争取由民意代表实行统治，即使他自己不能参与这些选举也罢，三是"做买卖挣钱买地的自由"，由此进而取得政治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争取自由而不摧毁财产"。

1688年以后的100年，这样一个妥协就不再受挑战了；出现一个土地与商业财产联合的寡头统治。从本质上说，它更腐败，而卖官鬻爵、官官相护的现象也更严重，其中的奥妙，又正是刘易斯·纳米尔爵士及其一派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平等派的挑战彻底失败了，但平等派复活的幽灵却时常在人们脑海中出现，它好像是海峡旁的一块巨岩，旁边有天主教徒和詹姆斯党的大漩涡，"宪法"这艘船就要在这两者之间穿过。直到18世纪最后二三十年，"18世纪共和分子"的温和的共和、自由主义立场似乎就限制在埃尔顿所设立的范围之内。[⑧] 看一看18世纪90年代改革派与政府之间、以及各改革力量之间的分歧，就似乎看到了普特尼辩论的重演，只不过那英国"最穷的人"、"有天生权利"的人变成了《人权论》，而成员"无数"者的鼓动在伯克眼中就恰似那"猪狗的一群"正在威胁一般。对改革派实行恫吓威胁的半官方组织取名叫"保卫自由与财产、反对共和派和平等派"协会，

⑧ 见卡罗琳·罗宾斯：《18世纪共和派》（哈佛大学，1959）。

连约克郡温和的改革派克里斯托弗·威维尔牧师也深信：若改革 24
以普选作为原则，“就不可能实现，除非再打一场内战”，尽管他对改革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

在政治争端激烈时，把选举权交给残暴无知的民众，会导致动荡和混乱。……如果选举因最无耻的舞弊而丧失信誉，因最狂暴的骚乱而受到损害，那么在一系列这样的选举之后，就可以预期民众的动乱和贪婪最后会使民族变得十分可憎，乃至为克服民主放纵所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祸害，人们就必须到专制权力的保护下去……寻求庇护。[9]

他在1792年又写道：“如果潘恩先生能把下层阶级唤醒，他们的参与就可能是很粗野的，而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无论是私人的财产还是公众的自由，就都要受那帮无法无天凶野狂暴的乱民去摆布了。”[10]

这就是过去那场辩论的继续，人们表现出同样的抱负、同样的恐惧和同样的紧张冲突；但现在它是在新的背景中，使用新的语言和新的论点，力量平衡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设法理解双方——既理解持续的传统，也理解变化的背景。写历史总要有开头，人们于是就常常只看见新的东西。我们可以在1789年开头，于是就把英国的雅各宾主义看成是法国大革命的副产品；我们也可以在1819年开头，以彼得卢为标志，于是，英国激进主义就仿佛是工业革命的自发后果了。法国大革命当然有助于新的宣传运动，运动在工人群众中也很有基础，它形成在新的经历

⑨ C.威维尔1797年12月16日致约翰·卡特赖特信，载威维尔：《政治文件》(约克，1804)，第5卷，第381—382页。

⑩ 同上，第5卷，第23页。

里，出现在成长中的工业制造业地区。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到底有哪些因素是由这些事迅速引发出来的？可以很快看到的是城市工匠和小生意人的悠久传统，这些人和法国的“小人物”非常相似；乔治·鲁德博士曾经证明：“小人物”正是巴黎民众中最 25 变化无常的革命因素。[11]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复杂的连续传统实际上可以一分为三，一是非国教传统，以及卫斯理的宗教复兴使它发生的变化；二是人民中各种模糊观念形成的一种传统，它们结合成英国人“关于天生权利”的思想；三是 18 世纪的“下层民众”中有一种若有若无的传统，对这种传统，威维尔曾经恐惧不安，而哈迪则想把它组织到委员会、分会和严肃认真的游行示威中去。

---

⑪ G. 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1959)。

第二章　基督徒与地狱魔王

26

“非国教”这个词很容易使人感到迷惑，它容纳了太多的派别，太多的对立思想和神学倾向，在变化的社会背景中，竟可以形成那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最古老的非国教是独立派、长老派、公理会、教友会和浸礼会；它们在光荣革命后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趋势，随着迫害日益减轻、宽容日益加大，教徒们的热情日渐减少，财富逐渐增加。1670 年，斯彭河谷的织布工和农民曾在夜晚秘密聚会，聚会地点是一个叫“秘宅”的农庄，或“教堂山附近的那所谷仓”。一百年后，人们看到在同一个地方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教堂，一个富裕的教堂执事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出现在那里，他在日记中虔诚地记道：

> 世界是美好的，我在这个位置上做了一些好事。去利兹时，我向上帝奉献了语言；我打算送给穷苦的基督徒四五石小麦，今天，应该好好地责备我没有让上帝指引我的所有思想，事情太急促了，来不及这样做。……

下一周他又这样写：

> 今天上午我……和几个军官一起吃饭，他们都对灵魂拯救不感兴趣。我读“以赛亚书”第 45 章，甚喜，让奥巴代亚兄弟把一石小麦分给穷苦的基督徒。[①]

这位普里斯特利牧师仍算是一名加尔文教徒，不过已经有了一点获罪感（“奥巴代亚兄弟”当然也是加尔文派）。他的堂弟，也

① 弗兰克·皮尔：《斯彭河谷的非国教徒》（海克蒙德威克，1891），第 136 页。

叫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这时正在达尔特里学院读书，他在理性启蒙精神启发下，已经对自己的亲戚和教会感到严重不满了；27 他后来成为一神派教徒，又是科学家和政治改革派。1791年，伯明翰的"教会与国王"派暴徒捣毁的就是这位普里斯特利博士的书房和实验室。

这些是非国教传统中一个很小的侧面。非国教徒虽然得到了信仰上的自由，但他们在公共生活里却仍受到宣誓法和市镇团法的限制，在整个18世纪，他们继续为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而努力。18世纪中期，许多年轻而有文化的牧师为自己宽宏大量的理性神学感到骄傲，过去受迫害时那种加尔文主义的孤芳自赏气质没有了，相反，他们通过阿里乌斯派和索西奴斯派的"异端邪说"而逐渐滑向一神教；从一神教，再走一步就是自然神论了，但在18世纪9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走出过这一步，而且，在18世纪下半叶，更少有人愿意或敢于公开承认自己对基督教有怀疑——迟至1763年，70岁的小学校长彼得·安内特还被上枷收监，理由是他翻译了伏尔泰的著作，把宣扬"思想自由"的论著用通俗形式出版。不久之后，怀疑论的"罗宾汉辩论会"又被当局封闭。自由主义的思想原则正是站在索西奴斯教和一神教的立场上来加以论证的，在这方面著名的人物有普赖斯法师，他在美国革命时期写《论公民自由》(1776)，几个月内就达到销售6万册的可观数量；他在有生之年还做过一个欢呼法国大革命的传教演说，由此而使伯克大受刺激。除此以外，著名人物中还有普里斯特利博士本人，以及十几二十个名气稍小的人，其中一些如博尔顿的托马斯·库珀和剑桥的威廉·弗伦德等等，都曾积极地参加过18世纪90年代的改革宣传运动。

到这里，问题似乎很清楚了，但它却是虚假现象。自由主义思想在非国教的教士、教师和受过教育的城市人口中十分流行，

但很多牧师比他们的信徒走得远。与其他非国教派别相比，力量上衰落最明显的是长老派，而长老派又恰恰是最有一神教倾向的一派。18世纪中叶，长老派和独立派（合在一起）的力量，在西南部（如德文郡、多塞特郡、格洛斯特郡、汉普郡、萨默塞特郡和威尔特郡等）、北方工业区（主要是兰开郡、诺森伯兰郡和约克郡）、以及伦敦和东盎格利亚地区（主要是埃塞克斯和萨福克郡）势力最大，浸礼派虽说也在争夺其中的某些据点，但同时又在贝德福郡、白金汉郡、肯特郡、莱斯特郡和北安普顿郡根基深厚。因此，长老派和独立派似乎在商业中心和毛织业中心最强大，而浸礼派占领的地盘中，小生意人、小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则占很大一个比例。[②]正是在规模最大的老毛纺中心即西部地区，那种开明"理性"的宗教——趋向于否定基督的神性并且有一神教倾向的宗教——发展得最快，但又最容易向一神教丢失其信徒的忠诚。到18世纪末，德文郡有20多所长老派聚会厅关闭了，研究非国教徒历史的学者在1809年曾这样说：

28

> 德文郡曾是阿里乌斯教的摇篮，后来则成了阿里乌斯派非国教徒的坟墓。那个人口众多的郡、现在留下来的长老派信徒还不到她出生时可以见到的1/20。[③]

但在其他地方，情况就有所不同，非国教组织常把自我管理和地方自治的原则贯彻到近乎无政府的状态，任何中央权威——哪怕是教堂间的协商和联合，都会被看成是由"违背基督教的行为造成的"：

> 这种背叛行为对人的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十分有害，

② D.博格和J.贝内特：《非国教徒史》（1809），其中第3卷第333页的估计是：1760年非国教各派的"主要力量"是生意人，而在某些郡是农场主，"各业机匠构成其城市教团的一大部分，农业工人构成其乡村教团的一大部分。"

③ D.博格和J.贝内特：《非国教徒史》（1809），第4卷，第319页。

尤其是对古老而勇敢的清教徒和非国教人士十分有害，因此，诸如宗教会议、大会、理事会、教规这一类的词，都会使一个真正的新教徒感到震耸发聩。[4]

在加尔文教传统较深厚的地方，如兰开郡和约克郡的部分地区，教团组织奋力反抗，抵制向一神教发展的趋势。顽固的教会执事、理事会成员和奥巴代亚们折磨他们的牧师，调查他们的异端言行，开除他们出教，或者与他们决裂，另组比较正宗的教派。29 (托马斯·哈迪最早的组织能力，就是在罗素街王冠巷长老派教团的派别斗争中取得的。)但"穷苦的基督徒"、即普赖斯法师曾予以启蒙而普里斯特利执事曾赠予小麦的那些人，他们又如何呢？斯彭河谷是人口稠密、工业正迅速发展的一个中心地区，人们本以为，非国教教派会因为它们在迫害时期坚持斗争而最终获益的。但"穷苦的基督徒"似乎既不受官方教会的影响，也不受以前的非国教影响。1757年，约翰·卫斯理骑马途经邻近的赫德斯菲尔德，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英格兰，我从未见过这么野的人，我们骑马走过时，满街都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似乎要把我们吞吃掉一般。"

一神派的理性基督教崇尚"直率"、怀疑"热情"，对伦敦小生意人、小店主及其他大城市的同类集团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它太冷漠、太孤僻、太文质彬彬，和小康阶层的舒适价值观联系太紧，对城乡穷苦人的吸引力就不大。它的语言和腔调都构成障碍，约翰·纳尔逊曾对卫斯理说："在约克郡，只有一种布道中用，就是以前那种像打雷一样轰击人们的良知的布道。在这个郡，和风细雨的布道比不布道还要坏。"以前加尔文禁止福音主义的热情，从而给自己设立了屏障。受迫害的派别很容易孤芳自赏，

---

④ J.艾维米：《英吉利浸礼会派史》(1830)，第4卷，第40页。

这就更加强了加尔文教义中最僵硬的条文。但“萨伏依信纲”(1658)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帝的选择对糜烂的群氓并非不可及”,而“穷苦的基督徒”和“糜烂的群氓”当然就是指同一些人。从另一个角度看,穷人的“野”是他们生活在天恩之外的表现,而加尔文教义中上帝的选民又有萎缩为亲族集团的危险。

还有其他原因促成了这一过程,有些人直接到共和时代平等派的失败中去寻找原因。当初,千年至福派主张由圣人进行统治,他们的希望破灭后,穷苦人清教思想中的现实理想和宗教理想就断然分开了。还在复辟之前的1654年,浸礼派教徒总会就(针对他们中的第五王国派)发表了一个宣言,称自己不“知道圣人凭什么指望”在最后的审判到来之前,就“把现世的统治权放入他们之手”,在那之前,他们应该“耐心地忍受现世之苦……而不是攫取它的政府统治权”。[⑤] 共和国末期,反教律论的叛逆传统“从它所有的要求上退了下来”,激烈的新教派别以前曾经是热情的(甚至是无情的)社会整治者,而现在他们却乐意说:“就让稗子(如果是稗子)和小麦混在一起吧……”[⑥] 掘土派杰勒德·温斯坦莱的话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感情的变化,即如何从“外在的王国”转变成“内在的王国”:

> 灵魂和创造精神并非一体,它们相分相离,一个管外在的王国,另一个引导他搜索并守候内在的王国,这内在的王国,锈腐不可蚀,窃贼不能偷,它广延无边,而身外的王国则必定会从你那里消失。[⑦]

理解这种后撤——以及在后撤之后还剩下什么,对于理解

30

---

⑤ A.C.安德伍德:《英国浸礼教派史》(1947年),第84—85页。

⑥ G.休恩斯:《英国历史上的反教律主义》(1951年),第146页。

⑦ 《丛林之火——温斯坦莱……文集》,L.汉密尔顿主编(1944),第30—31页。

18世纪的情况以及后来工人阶级政治活动中一个持久的因素非常关键。在某种意义上，变化表现在新型的组织机构中，这些组织可以归结为两个词，即"清教"的生存活力和非国教的保护性退却。但也应该看到，这些教派在决意耐心地忍受"现世之苦"、放弃其取得"政府统治权"的希望时，却也能够把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与一种蛰伏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那激进主义就保存在布道演说和宗教论文中，同时也保存在民主的组织形式中，一旦遇到比较合适的环境，它就会再次燃烧成燎原之火。这种情况在教友派和浸礼派那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到18世纪90年代，教友派在英国境内总数还不到两万人，竟不像是个教派的样子了，而这个教派，以前居然出现过像李尔本、福克斯和潘恩这样的人。这一派曾经是昌盛得过分了，他们持续不断地向美洲移民，结果失去了一些精力最旺盛的人。他们以前曾反对国家、反31 对权威，现在却萎缩成徒有形式，如不肯宣誓、不戴帽子等等。它的传统充其量也只对中等阶级的社会责任心比较有用，对民众运动则没有什么用处。虽说在18世纪中期，仍有些教团相当谦恭，比如在塞特福德的凯奇巷会议厅聚会的那一个（就在监狱旁边，里面还有脚手枷），汤姆·潘恩年轻时就在那里（据他自己说）接受了"极好的道德教育"；但是，当潘恩在1791年把他们自己关于为人类造福的某些说法糅合进《人权论》的毫不妥协的论调中去时，教友派却很少有几个人愿意站出来表态的。1792年，约克郡教友派季度大会要求会友们在"我国现在出现的不安定形势下，保持真正的心灵平静"，他们不应该组织政治协会，也不该滋生"对国王和政府的不满，我们在他们领导下生活，享受特权，深感厚爱，这就很值得我们感激和顺从了。"[8]

---

⑧ 鲁弗斯·M.琼斯：《晚期的教友派》(1921)，第1卷，第315页。

但他们的先辈却很不“顺从”，也不使用“感激”这个词。“外在王国”和“内在王国”的冲突意味着他们否定统治权，只有在两者的共存不可避免时才有例外；这样，人们就拼命讨论哪些做法“对得起”良心，哪些做法是“昧”良心。浸礼派的言行可能是最始终如一的，他们的理论最符合加尔文教义，他们的信徒中普通老百姓也最多。在班扬[⑨]那里，我们尤其能看到潜伏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在整个18世纪保存下来，而到19世纪则一次又一次爆发出来。《天路历程》和《人权论》一样，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基本教材；班扬和潘恩，加上科贝特和欧文，为1790至1850年的运动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素材。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最早是在《天路历程》里读到有趣的故事的，他们会同意后来宪章派托马斯·库珀的说法：那是他们的“书中之书”。[⑩]

《天路历程》说：“我寻找那纯洁无瑕、永不磨灭的遗产……它存放在天国，平安无虞……它将在天定之时授之于人，那些人，是一直在孜孜以求寻找它的。假如你想知道它是什么，那就先来读一读我的书！”书中有温斯坦莱“锈腐不可蚀”的王国；有圣人们在彼岸世界的千年国度——不过圣人们却必须先“耐心地忍受现世之苦”。书中有那些在普特尼败下阵来、对1688年的解决方案毫无发言权的人，他们发出了“悲叹之声”——“我奈其何？”书中有教皇老头，基督徒们认为他的先辈已经俯首帖耳，而他自己现在也已经“神经失常、关节僵直”，只能坐在山洞口对朝圣者说：“你们中会有更多的人被烧死，否则你们就无可救药”——“当朝圣者们经过时……他独自狞笑，啃着指甲，因为他

⑨ 约翰·班扬(1628—1688)：英国小说家，所著《天路历程》用寓言故事表达清教徒的理想与挫折。——译注

⑩ 见Q.D.利维斯：《小说与读者》(1932)，第2章。

已经不能扑过去抓住他们了。”书中有穷苦的非国教徒内心的精神世界，那些身为“裁缝、皮贩子、肥皂匠、酿酒商、织工和补锅匠”，同时又是浸礼派传教士[11]的内心精神世界，这个世界阴暗苍白，饱受感情奔放与冲突之苦，这些冲突是由外部世界的障碍引起的，比如说有魔堡、噬血巨人、大槌、杀人妖精、万难山、疑心寨、名利场、迷魂地等等，整条路上“到处都是陷阱、圈套、机关和坑道”。书中有基督徒的死敌贵族，有“淫乐老爷、奢侈老爷、虚荣老爷、荒淫老爷、贪婪爵士，和贵族中所有那些其他的人”。书中还有耻辱山谷，班扬的读者们就置身在这山谷中：“这道谷无人涉足，只有那些喜欢朝圣生活的人才会走进去”。怜悯翁在这里说：

> 我就喜欢这种地方，这里没有车马的喧哗，没有轮轴的滚动，我觉得，人在这种地方，障碍就少，他可以潜心思索，思其所是，究其所源，省其所行……人在这种地方，可以思考，可以开发心灵，净化灵魂，直至他的两眼如“希实本[12]的鱼池”一样清澈。

伟心公于是带着虽受迫害、遭挫折却仍旧自豪的心情答道：“此话不假，我曾好几次穿行谷中，每次到这里，都特别爽快。”

但精神世界——正义与精神自由的世界，却始终受到另一个世界的胁迫。首先，它受到国家权力的威胁，地狱魔王在书中出现时，我们就似乎看到一个童话的世界：

> 他身披鳞甲，如鱼一般（这是它最感到自豪的）；它有翅膀，像飞龙一样；他的足如熊，腹部出烟火。……

---

[11] R.M.琼斯：《神秘宗教研究》(1923)，第418页。另见J.林赛，《约翰·班扬传》(1937)。

[12] 圣经中古以色列的一个地名，在死海东北。——译注

当这魔王遇到基督徒("面带讥讽之色")时,他却又像是一个形容窘迫的乡村法官了。他不断变换自己的论点和威胁之词,想要叫班扬答应不再在野外进行传教活动:魔王张开嘴——那嘴"像狮口一般",声嘶力竭地喊道:"我愿让一切人生还,但你们必须转过身去,返回原处"。只是在劝说无效之后,他才张开两腿,"跨在路上",口称"我以魔穴发誓:你们不可越此线一步。"魔王阴险狡诈,竟可在基督徒的朝圣伙伴中找到盟友,这些人数量很多,也很有欺骗性,他们是基督徒抗拒腐蚀的另一个威胁。班扬一点点地抛出种种骗人的借口,让魔王与非国教徒找到妥协的余地。这里于是出现算盘精先生、手遮天先生、金钱迷先生、普救世先生,他们都师出一门,"为师者居图利城,那是北方贪心郡的一个市镇"。算盘精先生责备那些"道德感太强"的人说: 33

> 算盘精先生:咳,他们这些人……无论风雨只管赶路,我却愿坐等顺风之时;他们主张孤注一掷为上帝不惜赌本,我却愿抓住时机保我性命,保我财产;他们主张坚守信念,置他人之全体反对于不顾,我却愿多存疑窦,窥察时机,不可让它影响我的安全;他们喜好宗教,尤在其卑微低贱之时,我之喜欢它,则非得待它足踩金履、身披霞光、欢呼之声不绝之时。
>
> 手遮天先生:算盘精先生,暂说到此罢。……我们应圆滑如蛇,审时度势者为上。……
>
> 普救世先生:对此我们都无异议,故不必再多说了。
>
> 金钱迷先生:确实不必多说,君不见,凡既不信圣经又不讲理智者(而我们是二者皆有的),就一定不懂他自身之自由,亦不谋他自身之安全。

这一段非常精彩,竟把18世纪非国教派别的发展情况预示了许

多。班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算盘精先生的朋友确是圣经、理
34 智二者皆有的，他们以安全、舒适、启蒙与自由为辩解的理由，所丢掉的是完美的道德与热情；看来，一旦斗争的传统被遗忘，拒腐蚀的精神似乎也就难以维持了。

《天路历程》还不只这些，如韦伯所说，这本书的"基调"是"来世不仅更重要，而且在许多方面比现世生活中的所有利害关系更确定"。[13] 这就提醒我们，相信来世生活对穷人来说不仅是一种安慰，而且是对现实苦痛的一种感情补偿。卑贱者不仅可以想象得到"报偿"，而且可以想象压迫他们的人将遭受拷打，从而享受对压迫者实施报复的欢乐。此外，在强调班扬寓言中的积极方面时，我们对它明显的消极方面言之不多，那就是宗教盲从、逆来顺受、自私地追逐个人灵魂得救等等——消极面与积极面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这种冲突的情况一直到19世纪还表现在非国教徒谦恭的言词中。在班福德看来，《天路历程》似乎是一种"悲伤的抚慰，好像是从坍塌的太阳上发出的光芒"。当形势好转、群众运动高涨时，传统就表现出明显的活力，基督徒在真实的世界上与魔王作战；当失败来临，群众态度冷漠时，消沉的意气就上升，助长穷人的宿命论思想。这时，基督徒在耻辱山谷中受难，他逃出毁灭城，远离车马的喧哗，寻找通往精神天国之路。

还有，由于害怕妥协会腐蚀传统，班扬在清教徒严禁享乐的情绪之外，又加上他自己对"羊肠小道"的形象描述，从而突出了加尔文派"上帝选民"所抱有的那种宗派嫉妒心理。到1750年，那些声称最关心"穷苦的基督徒"的派别，却最不欢迎新信徒参

---

⑬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1930)，第109—110、227页。亦见A. 凯特尔：《英国小说导言》(1951)，第44—45页。

加，也最缺乏福音主义气质。非国教夹在两种对立的倾向之间，两种倾向都得不到广泛的群众支持。其中一种倾向宣扬理性人道思想，主张细腻的讲道，这对穷人来说是太深奥太文质彬彬了；在另一种倾向中，又有严格的上帝选民，他们不与不同教派的人结婚，排斥违反教规的人，排斥一切异端邪说，他们对那些注定要受上帝惩罚的“糜烂的群氓”避而远之，对此，哈勒维指出：“前一种加尔文教正在解体，后一种加尔文教正在僵化。”[14]

35

就连班扬的浸礼派教会也同样深刻地分裂着，“阿明尼乌派”的浸礼总会让位给热情洋溢的“加尔文派独立浸礼会”（其据点在北安普顿郡、贝德福郡和林肯郡），但其标准的加尔文教义又阻碍了它的宣传活动。[15] 直到 1770 年，独立浸礼派才摆脱他们自己的教条限制，发表了一份传阅信件（从北安普顿郡发出），为的是使福音主义与“上帝选民”的概念能彼此调和找到一条可行之路。信件说：“到基督那里寻求解救的每一个灵魂……都应该受到鼓励。……来投奔基督的灵魂不必担心它不被上帝挑选，因为只有当选的灵魂才会到基督这里来。”恢复的过程很慢，后来它重新面向穷人，是因为它要与卫斯理宗竞争，而不是出于内在的动机。事情发生在 18 世纪 60 年代。约克郡的矿工丹·泰勒 5 岁起就在煤窟里干活，后来又皈依卫斯理宗。他想找一个带福音主义色彩的浸礼会团体，但到处都找不到。他于是自己修建聚会堂，把石头从赫布登桥旁的野地里挖出来，亲自背到

---

[14] 哈勒维出色的总结，见《1815 年的英国人民史》（企鹅版），第 3 卷，第 28—32、40—48 页。

[15] 博格和贝内特前引书，第 3 卷，第 332—333 页；艾维米前引书，第 3 卷，第 160 页以下。

工地上。[16]然后，他从纺织城镇赫普顿斯托尔（内战时的清教据点）出发，南下林肯郡、北安普顿郡，与桀骜不驯的浸礼派团体取得联系，最终（在1770年）组建了浸礼派新教团。此后若干年，他巡行25000英里，布道20000场，与卫斯理、怀特菲尔德一样不应为人忘怀；但究其所源，他既非总会派也非独立派，他在精神方面也许继承了班扬的传统，但实际上是白手起家。

当我们谈论普赖斯法师和丹·泰勒时，不应该忘记他们确曾享有信仰自由。他们不受宗教裁判所的威胁，也没有“巴比伦红衣妓女”[17] 的地牢恐吓。老的非国教教派内部纷乱，教会自治与分离的倾向清楚地表明：最出人意料、最旁门左道的思想也许会在林肯郡的一座村庄、中部地区的一个集市、或约克郡的一个矿井里突然出现。卫斯理在1768年的《日记》中写道：在萨莫塞特的毛织业城镇弗罗姆，“各种观点的人混杂在一起，有再洗礼派、教友派、长老派、阿里乌派、反教律派、摩拉维亚派等等”。苏格兰的商贩和工匠还把其他一些派别带到英格兰，18世纪最后几十年格拉斯派（即桑德曼派）取得一些进展，他们热衷于教会纪律，相信“普通生活中的那些差别不应在教堂中出现”，主张成员可以共同享有某些财产。批评他们的人说：他们清高孤傲，“不管贫苦无知的悲惨大众”。[18] 到18世纪末，在伦敦、诺丁汉、利物浦、怀特黑文和纽卡斯尔都出现了桑德曼派小团体。

---

[16] 约翰·卫斯理在其《日记》（1766年7月31日）中写道：“一批叛教的卫斯理宗信徒，先投靠加尔文派，又投靠再洗礼派，在赫普顿斯托尔造成混乱。”

[17] 非国教徒对埃拉斯都主义的称呼——首先是指教皇和罗马天主教会，但时常用来指英国国教及所有向国家及世俗权力出卖信仰贞操的教会。科贝特回忆说：“小时候我深信：教皇是个大块头女人，穿一件可怕的长袍，因沾了新教徒的血而染得通红。”《政治纪事报》，1821年1月13日。

[18] 博格和贝内特前引书，第4卷，第107—124页。尽管他们很严厉，但比起其他非国教徒来，桑德曼派对某些社会风俗却比较容忍，而且还允许信徒看戏。

非国教派别的思想史上，充满了改组、分化和冲突，这种情况使人感到，政治激进主义的种子正潜藏其中，一旦撒播于合适的社会土壤上，立刻就会生根发芽。托马斯·斯彭斯是桑德曼派家庭出身，1755 年曾对纽卡斯尔哲学会发表过一个演讲，其中概括了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全部思想；但直到 18 世纪 90 年代，他才开始认真地进行公开的宣传活动。汤姆·潘恩是教友派，但他在刘易斯镇当税收员过着无聊的生活时，却几乎完全表现不出他那强烈反正统的政治观点，那时，时局不允许这样做，政治似乎只是“骗子手的把戏”；但在到美洲（1774 年 11 月）后的一年内，他就发表了《常识》和《危机》杂志上的那些论文，其中含有《人权论》里的所有论断。他写道：“我对君主制深恶痛绝，因为它降低了人格。但直到最近我都未曾以我的想法困扰过别人，也未曾在英国发表过只言片语。”发生变化的不是潘恩，而是他从事写作的社会环境。《人权论》的种子是英国的，但只有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带来的希望才能使它扎下根来。 37

如果说某些老的非国教派别带头复活了福音主义——而不把它归功于约翰·卫斯理的话，那么到 19 世纪，非国教就应该具备更理智更民主的形式了。但首先深入“穷苦的基督徒”，用一道简单的启示“你们只须拯救灵魂”就打破加尔文教的禁忌的，却仍旧是约翰·卫斯理——那个在政治上是强硬托利派、在组织手段上采用祭司方法的人。

> 妓女、酒鬼、窃贼们，
>   听我呼唤，你们这些被放逐的人！
> 他张开双臂，拥抱你们，
>   他的慈悲专门接纳有罪的人；
> 正人君子不需要他，
>   他搜寻迷途者，拯救所有这些人。

来吧，我有罪的兄弟，来呀，

　　尽管你们在负罪的重荷下呻吟！

他流血的心脏为你们洞开，

　　他展开的躯体将你们收进；

他在呼唤，招呼你们同行：

　　来吧，我有罪的兄弟，来呀。

福音主义在国教内部复苏，这本来就有它的道理。清教强调"神召天命"，按照韦伯和托尼的说法，它特别能说明兴隆勤勉的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历。比较接近路德教的英国圣公会清教传统与排他性的"神选"理论却不大相符，作为"国立"的教会，它对穷人的灵魂负有特别的使命，即培植他们服从和勤勉的美德。18世纪，国教内部死气沉沉，物欲横流，结果竟违背卫斯理的初衷，使福音主义在独特的卫斯理派教会中复苏。但卫斯理宗的来源又给它留下深刻的印记：班扬、丹·泰勒以及后来的原教旨卫斯理宗等穷人的非国教都是穷人的宗教；而正统的卫斯理主义却始终保持着原来的面目，它是一个为穷人的宗教。

38　怀特菲尔德和其他那些早期的露天传教士既是传教士，也是福音主义者，他们在当时比卫斯理本人还要著名。但在组织、管理和制定规章制度方面，卫斯理却最有活力，也最有能力。他把民主与法纪、把信条与热情结合得恰到好处，他的成就主要不表现在狂热的宗教复兴大会（这种大会在泰伯恩刑场[19]为主要特征的那个世纪并非罕见），他的成就，主要是组织了一批能独立维持的卫斯理宗派团体，分布于贸易集市中心，及采矿、纺织

[19] 原文 Tyburn。它是旧时英国伦敦的刑场，位于泰晤士河支流泰伯恩河岸边。——译注

和劳作人口中，其成员民主地参与教会生活，既受到教会的鼓励，又处在严格的管理和纪律下。他取消一切带有小团体派性色彩的教义规章，为人们加入他的团体扫清了障碍。他写道：申请入会时，卫斯理派——

> 不强加……任何观点于人，他们可以实行特别的赎罪方法，也可以实行普遍的赎罪方法；可以执行绝对的天意，也可以执行有条件的天意；可以是国教徒，也可以是非国教徒；可以是长老派，也可以是独立派，这些都不是问题。……独立派和再浸礼派（可以）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教友派也可以这样做，没有人会在这些方面和他们过不去。……我们只有一个条件，惟一的条件，就是真正追求灵魂的拯救。[20]

但一旦进入卫斯理宗团体，皈依者就要严守纪律，其章法之严可以与狂热程度更高的加尔文教派相媲美。卫斯理要求本派教徒做“特殊的人”，不与教外人结婚，衣着要有别，言行要庄重，不与那些仍留在“撒旦王国”里的人交往，哪怕他们是亲戚也罢。教徒举止轻浮、亵渎神圣、赌咒发誓、不参加小组会议等都是被驱逐出教的理由。它的团体组织连同忏悔会议、班组结构、除夕礼拜及家访活动等等，使之成为一个世俗的修道会，其中如骚塞所注意到的那样，有一支“精神警察”在随时警惕着堕落的迹象。[21]领导职务由商贩和劳动人民担任，但这种“基层”的民主完全不适用于有关教义和教会管理的事，卫斯理背离非国教传统最远之处，就是他反对地方自治，以便他和他的教士对教会实行集权统治。

---

[20] R.骚塞：《卫斯理生平及其宗派的兴起》(1890)，第545页。

[21] 同上，第382、545页。

39 然而恰恰是在非国教传统最深厚之处——布里斯托尔、约克郡西区、曼彻斯特、纽卡斯尔等地，卫斯理宗在穷人中的进展最迅速。18世纪60年代，普里斯特利执事和奥巴代亚还在海克蒙德威克支持一个加尔文独立派教会，离此地两英里远，伯斯托尔的石匠约翰·纳尔逊却已经把大批纺织工、矿工吸引过来，听他讲关于个人获救的新的神启了。纳尔逊在前往石矿干活的途中，要路过非国教牧师的住所，他与他们交换图书，争论有关罪恶、神恩获救和宿命论的教理。（这类争论到后来就逐渐稀少了，那时正统的卫斯理宗神学理论变得比较随波逐流、不讲理智而懒散无益。）纳尔逊在伦敦时听卫斯理在荒草地讲过道，然后便皈依了，他的《日记》和普里斯特利执事的就完全不同：

> 一天夜里，……我梦见我在约克郡，穿着工作服往家走，路过保尔·钱皮恩家时，听见里面哭声震天，仿佛许多人在悲伤地哭。……突然，他们尖叫起来，一个个滚来滚去。我问出了什么事，他们说，撒旦跑到他们当中来了。……于是，我想我见到它了，形状像一头红色的牛，在人群中冲撞，好像一头野兽在谷子地里冲撞一样。但它不去觝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径直向我跑来，仿佛要把角戳进我的胸膛。这样，我就大叫："主啊，救救我！"立时，当着千百个人的面，我就抓住它的角，扭过它的背，右脚抵在他的脖子上了。……

从梦中醒来，他浑身出汗，疲惫不堪。另一天夜里，"我的灵魂充分感觉到上帝的爱，这使我在他面前哭泣"：

> 我梦见我在约克郡，从戈默索尔山顶去克莱克希顿，走到半路，我觉得看见撒旦正向我走来，形状像一个高大的黑人，头发就像蛇一样，……但我还是往前走，扯开衣服，露出胸脯对他说："瞧吧，这就是基督的血。"然

后，他就像兔子那样飞快地逃走了。

约翰·纳尔逊是个诚实的人，他被强征军役，但不肯服役，于是他和他的妻子在干活时就受到暴徒袭击，挨石子块。但看起来，纳尔逊的撒旦比班扬的魔王更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尽管后者腹中冒火，身披鱼鳞。这种幻想带有宗教狂热和受压抑性欲的潜在因素，而这——和宗教的皈依所经常带来的感情喷发——就是卫斯理宗复兴运动的显著特征。[②] 班扬在一个治安法官、堕落分子和为尘世原因丧失原则的真实世界里，揭露魔王的挑战。而卫斯理教徒那里的撒旦，则是寄居于灵魂之中、从躯体脱离出来的一种力量，它通过内省被人们发现，或者呢，它像是一个与阴性的基督之爱相对立的阳性形象，浮现在群众的歇斯底里中，这种歇斯底里就形成了复兴运动的高潮。

从一方面看，这个撒旦似乎是18世纪穷人凄凉悲苦的化身；从另一方面看，又可以把它看成是堵塞在社会生活的宣泄口上，同时又被清教否定现世生活的教义紧紧压缩着的那种力量，在对人类精神实施邪恶的报复。可以认为：卫斯理宗是脱胎于这样一种传统，它往上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喧嚣派”，这一派的近亲摩拉维亚派曾经相当深刻地影响过卫斯理。对“爱”的崇拜现在达到一个平衡，平衡点的一边是某种所谓的“社会宗教”，另一边则是受阻碍的社会冲动与性冲动的病态表现。在这里，一方面有对“妓女、酒鬼和窃贼”的真实同情，另一方面则是对罪恶与忏悔的病态偏见；一方面是对真实恶行的真诚悔恨，另一方面则是对内心反省的过分追逐；一方面是早期卫斯理派团体中的真诚的友爱，另一方面则是在公众生活中找不到宣泄的那种

② 见W.E.H.莱基：《18世纪英国人民史》(1891)，第3卷，第582—588页。尽管本世纪出现许多关于卫斯理宗的著述，但莱基和骚塞的记叙仍是基本读物。

力量被释放在伪装为神圣的手淫冲动中；一方面，这种宗教为地位卑下的人找到了用武之地，让他们做地方上的传教士或小组负责人，教他们读书写字，给他们自尊心，使他们取得演说与组织工作的经验；另一方面，这种宗教又反对追求智识、敌视艺术价值，辜负了他们在知识追求上的信托。它有对“爱”的崇拜，但又害怕爱的实际表现形式，无论是在性爱，还是在具有社会内容的爱方面都是这样，而后面这种爱，是有可能影响到与当局的关系的。这种崇拜的标准祈祷语言是带有性虐待狂色彩的性升华，如“流血的爱”、受伤的身体、羔羊的血等等：

41

你指导我绕开迷人的陷阱，

让我的心永远血淋淋。

你是我的爱、我的欢乐、我的担忧！

你是我永恒的命运。

你是我忠诚的挚友，

爱我吧，爱我直至永久。

在伦敦，一个雅各宾激进主义的雕刻工曾去过“爱的花园”，发现“一座小教堂……建在其中，那曾是我在绿茵上玩耍的地方”：

教堂的门紧紧关闭，

门上写着“不可为”这几个字……

园中“那鲜花应开放之处却立着墓碑”：

教士们身穿黑袍正四处走动，

在我的欢乐与愿望上放置荆棘丛。

近年来，人们对卫斯理宗带给工人运动的正面影响说得很多，因此有必要提醒大家：像布莱克、科贝特、利·亨特和黑兹利特这些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从一些流行的说法中人们可以设想：卫斯理宗对激进主义和工会运动的组织者来说，无异于是一个

养育所，而这种说法又都是从"托帕德尔烈士"乔治·洛夫莱斯的形象中得来的：他有"一小批神学藏书"，具有直率的独立精神等等。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在某个层次上，很容易证明正统卫斯理宗的反动性——甚至可以说是奴颜卑膝——卫斯理本人对政治极少干预，但就在那少数的几次干预中，他就曾写文章反对普赖斯法师，反对美洲殖民地。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劝说信徒屈从顺上的机会，而劝说的方法是靠迷信而不是说理。[23] 他去世时(1791)，刚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初期热情高涨的时候，但以后历届卫斯理宗大会却都继承其创始人的传统，重申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和对宪法的爱慕"(利兹大会，1793)。卫斯理去世一年后制定的章程说得很明白："任何人不得书写或发表对政府不敬的言论。"[24] 42

在这个层面上，卫斯理宗表现为一种倒退的、或"稳定的"力量，在此可以看出哈勒维关于卫斯理宗在18世纪90年代阻止了英国发生革命的著名论文是有道理的。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下面这种说法又是人们熟悉的，即卫斯理宗间接地助长了劳动人民的自信心理和组织能力，这个观点早在1820年就由骚塞提出来了：

> 也许，卫斯理宗使下层阶级了解到如何组织协会、如何管理自己、如何筹款、如何开展国内各地的联络工作等

---

[23] 有关卫斯理在政治上的见解，马尔德温·爱德华兹在《约翰·卫斯理及18世纪》(1933)中有简要论述。

[24] 转引自哈勒维前引书，第3卷，第49页。哈勒维还有如下评论："这一举动保证……不受欢迎的雅各宾原则不致损害卫斯理宗的宣传工作。"但雅各宾的原则在1792年实际上是颇受欢迎的(见下文第102—113页)，因此比较真实的说法是，卫斯理宗的宣传旨在使这些原则不受欢迎，而这对英国人民的自由是不利的。亦见E.霍布斯鲍姆对哈勒维的批评文章《卫斯理宗与革命的威胁》，载《今日历史》，1957年2月号。

等，这些都可以算是它在无意中带来的种种弊病。……

晚近一点，这种观点也表达在韦尔默思博士那几本有趣的书籍中，当然读过这几本书的人应该清楚地记得骚塞那句名言："在这方面，它只是助长了这个过程，而其他原因则使它产生"。[25] 卫斯理宗对工人运动的"贡献"，多数不是由卫斯理宗大会做出，而是在它之外做出的。

事实上，在卫斯理宗的早期历史上，我们始终可以看到一种民主的精神正在形成，它与卫斯理所规定的教义与组织形式相对抗。在诸如是否让俗人充当传教士、是否脱离国教、是否实行团体内部的自治等等问题上，卫斯理不是反对，就是随大流，或是在事后才加以承认。卫斯理不能回避他自己的宗教福音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假如穷苦的基督徒开始相信他们的灵魂和贵族、资产阶级的一样好，那么这种想法就会把他们引向《人权论》所宣扬的观点。白金汉公爵夫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她对卫斯理宗的亨廷顿伯爵夫人说：

43 感谢夫人为我提供了卫斯理宗传教士的消息。他们的教义令人生厌，充满对上司无礼傲慢的情调，它始终想把一切等级都拉平并消灭所有的差别。若说你的心就像匍匐在地上的那帮坏东西一样充满罪恶，那真叫人恶心。[26]

斯莫利特在他出色的喜剧中有一个马车夫汉弗莱·克林克尔的形象，他身上就体现着类似的情形，因为他在对伦敦的乌合之众宣教讲道。成百上千名步约翰·纳尔逊之后尘的俗人教士都在

---

[25] 骚塞前引书，第 571 页。

[26] 转引自 J.H.怀特利：《卫斯理英国》(1938)，第 328 页。

以不同的方式学习此道，国教方面的人对此不断发出担忧之声。1800年，一个反雅各宾的小册子作家斥责那些“嘴上没毛的小家伙、机工或小工”在矿泉地、哈克尼、伊斯林顿草地等等地方布道，各教派的布道者中有一个是卖旧布的、一个是磨刀的、一个卖羊头的、一个漆马车的、一个造轧布机的、一个脚夫、一个拔牙的、一个造假发和针刺放血的、一个制作马裤和一个挑煤的。林肯主教从这里看出了严重的威胁，他说：“同样的手段可以用同样的效率既推翻教会，又推翻国家。”㉗

从传教发展到形成组织，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非国教传统中的某些自治因素对卫斯理宗有短期的渗透作用，二是卫斯理宗独特的组织形式如何向工人阶级结社团体过渡。关于第一点，卫斯理不仅（如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把他的神谕带给现有各教派之外的“邪教徒”，他还为老的非国教徒被禁锢的感情冲动提供了一个出气孔。非国教徒中，有牧师甚至整个教团都加入卫斯理教会的现象，其中有一些人在经历了宗教复兴后，由于不满卫斯理的集权管理而返回原来的教派，到18世纪90年代，非国教也就开始它自己的福音主义复兴了。不过仍有一些人勉为其难地留在卫斯理宗教会内部，其原有的传统就在僭权至上的卫斯理派组织形式下争斗下去。关于第二点，卫斯理宗不仅提供了小组聚会、有组织地征收一便士会费以及发放“证件”等形式，因此时常被激进组织和工会组织所借用；它还提供了有效的集中组织的经验，包括地区一级的组织和全国一级的组织，而这些正是非国教派别所缺乏的。（卫斯理宗年度大会制定“纲领”，成立安排日程的组织委员会，会议进程经过精心的安排，所有这些，看来不得不算是它对后来劳工运动的另一些 44

㉗ W.H.里德：《首都异教团体的兴盛与解体》(1800)，第45—48页。

“贡献”。)

因此,18世纪晚期的卫斯理宗,一方面为它内部的外来民主倾向所困扰,但同时,它又身不由己地成为其他组织形式的楷模。卫斯理在世的最后十年中,来自内部的民主压力仅仅因为他德高望重而受到束缚——同时也因为大家都相信这位年长的独裁者离他的“好报应”不会太遥远。持不同意见的团体提出过几十个要求,比如大会应由选举产生、地方要有更大的自治权、和国教教会彻底决裂、地区会议和季度会议可以有俗人参加等等。卫斯理死时,恰好是激进浪潮高涨之时,于是他的死就像是一支“信号枪”,各种组织方案都拿出来热火朝天地进行讨论,而这种气氛本身竟如所争论的问题一样重要。亚历山大·基勒姆在他写的一本小册子《自由进程》中说:“我们反对迫害成性的暴君行径,也反对巴比伦大妓女的血腥行为,然而在我们的措施中,我们却步其后尘。”[28] 他制定了影响深远的自治方案,在教派内部全力宣传,他散发小册子,在小组会、地方传教士会议上进行讨论,而这种讨论本身也就成了进行民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29]

1797年,基勒姆领导卫斯理宗的第一次分裂活动,成立了卫斯理宗新教团,其中采用的就是他那种比较民主的组织方案。这个教派的主要力量在工业中心,而且(很可能)在带有雅各宾

---

[28] 《卫斯理教徒中的自由进程》(阿尼克,1795)。

[29] 见《致卫斯理派教徒书》(曼彻斯特,1796);E. R. 泰勒:《卫斯理宗与政治,1791—1851年》(剑桥,1935),第2章;W. J. 沃纳:《工业革命中的卫斯理运动》(1930),第128—131页。

色彩的手工工匠和织工中力量最大。[30] 基勒姆本人同情改革，尽管他把自己的政治信仰隐藏起来，但他在正统卫斯理教派里的对手们却竭力要把它抖出来，宗派大会在谈到他的分裂时，曾对爱尔兰教徒这样说："我们失去的是基督教世界的所有捣乱分子，所有那些拥护潘恩思想的人……。"哈德斯菲尔德的新教团被人叫成"汤姆·潘恩卫斯理派"；在利兹有一个基勒姆派的主要教堂，关于它的一项记录使我们可以猜到基勒姆派的组成情况，其中说："在埃比尼泽街头，中等阶级陌生人别指望会涉足的地方，在密集、贫穷而难以驾驭的人口中"，该教堂有 500 名会众。有些地方，新教团和真正的雅各宾派组织有关，这绝不仅仅是人们的一种猜测，比如，在哈里法克斯的纺织村庄布雷德有个礼拜堂，其中有一个读书俱乐部，定期举行讨论会，居民们在小组会上不仅讨论基勒姆的《自由进程》，而且讨论潘恩的《人权论》。40 年后，为哈里法克斯卫斯理派写历史的人仍掩饰不住他对"那帮讨厌的黑心肠人"的厌恶，因为他们最终竟夺过了礼拜堂，赶走了正统派的巡行牧师，买下了地产，把它变成了他们自己的"雅各宾派礼拜堂"。[31]

新教团进展得并不顺利，基勒姆 1798 年去世，他的门徒受 18 世纪 90 年代后期政治上总体反动的影响而受到削弱。到 1811 年，新教团只能说它有 8000 名会众了。不过，它的存在使

---

[30] 基勒姆在设菲尔德、诺丁汉、曼彻斯特、利兹、哈德斯菲尔德、普利茅斯码头、利物浦、布里斯托尔、伯明翰、伯斯莱姆、麦克尔斯菲尔德、博尔顿、威根、布莱克本、奥德姆、达林顿、纽卡斯尔、阿尼克、桑德兰、里彭、奥特利、埃普沃思、切斯特、班伯里等地最受支持，见 E. R. 泰勒前引书，第 81 页；J. 布莱克韦尔：《亚历山大·基勒姆传》(1838)，第 290、343 页。

[31] J. 布莱克韦尔：前引书，第 339 页；E. R. 泰勒前引书，第 85 页；J. 雷：《有关利兹卫斯理宗的一些情况》(约 1853 年)，手稿，藏利兹资料馆；J. U. 沃克：《哈里法克斯的卫斯理派教会》(哈里法克斯，1836)，第 216—223 页。

人们怀疑哈勒维的论点。卫斯理去世时,卫斯理宗各派团体估计总共有80000人,即便假定其中每一个人都和其师祖一样持托利党观点,那也不足以抵挡革命的潮流。事实上,无论卫斯理宗年度大会做出过什么决议,都有迹象表明:1792和1793年的激进浪潮浸透了非国教,而且渗进了大多数卫斯理派团体。1792年利物浦市长在给内政部写报告时,大概就分析得很透彻:

> 这些地方只有卫斯理派和其他派别的聚会堂……所以,乡下的年轻人就在这帮人的指导下长大,这帮指导者不仅无知,而且我认为,我们近来有很多理由可以相信:他们对我们的美好的宪政是怀有恶意的。[32]

只是在179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卫斯理宗才在工人群众中迅速发展,最明显地表现出它是一支稳定与倒退的力量。这些年中,它被基勒姆派的分裂掏去了民主与理智的内涵,又承受着更严格的纪律约束,所以看起来就像是改换了头面,它既成为政治反动的结果,同时也是这种反动的原因。[33]

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卫斯理宗从未消除专制与民主这两种倾向间的紧张关系。在分裂出去的教派——如新教团和(1806年以后的)原教旨卫斯理宗那里,可以最强烈地感觉到它的第二次震动。此外,如霍布斯鲍姆博士指出的那样:卫斯理宗在与官方教会决裂这一点上,执行着19世纪法国反教权主义的职能。[34] 农村矿山中,礼拜堂和教堂的区分可能会促成政治和产业的分化。紧张关系在很长时间中似乎是掩盖着的,但一旦

---

[32] 转引自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1925),第270页。

[33] 见本书,第11章。

[34] E.J.霍布斯鲍姆:《绿林好汉》(1956),第146页。

它当真爆发，它有时就掺进了道德感情的因素——古老的清教战神在这儿再次举起战旗，而世俗领袖在这方面就很难插手。只要撒旦是个不确定的东西，而且不含固定的阶级色彩，卫斯理宗就会把工人群众推进一场道德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教堂与酒馆间，发生在邪恶者与悔过者间，发生在迷途的人和获救的人之间。塞缪尔·班福德在其《早年记事》中，记叙过他和他的伙伴们那种传教士的热情，带着这种热情，他们步行去参加附近村庄中的祈祷会，"在那些地方魔鬼还有许多根据地"，"而祈祷者多一个就多一份对'魔鬼的权力'进行的攻击"。(在奔宁山脉的另一边，同样的热情引人创作出这样的圣歌："俯身下视布雷德福，魔鬼潜伏在巢穴中。")仅仅几年之后，科贝特就开导高地兰开郡的织工说：撒旦并不在对立村庄的酒馆中，他在"那东西"和腐败的旧制度中。他把地狱魔王和利物浦勋爵、和奸细奥利弗迅速地等同为一体，如此才把织工们引向彼得卢。 47

非国教传统中还有两点值得一提，虽说这两点在 18 世纪影响都不大，但 1790 年以后却重要起来。首先，公有制思想和尝试始终存在，并和教友派、卡米撒派、尤其是摩拉维亚派关系密切。博尔顿和曼彻斯特一小批教友派因和本派意见不合，最后乘坐"安妈妈"号在 1774 年离开英国，到美国建立了第一批震颤派公社；40 年后，罗伯特·欧文从震颤派的成功中受到鼓舞，把他们的理想用世俗的形式加以推广。[5]卫斯理因为接触了摩拉维亚派才改变信仰，但摩拉维亚派在 18 世纪的英国却从来没有完全扎根。许多英国人加入了他们在富尔内克(帕德西)和达金菲尔德、费尔菲尔德(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公社，还有些人参加在伦敦的摩拉维亚派教团，但这些社团却一直依赖从德国来的传

[5] 见 W.H.G.阿米塔奇：《人间天国》(1961)，第 1 卷，第 3、5 章。

教士和行政人员。当第一批卫斯理宗团体形成并与摩拉维亚兄弟会发生联系时，后者与前者的区别仅在于：它们是“安静的”，它们不主张“热情”，它们实行公有制的理想；“[富尔内克]仪式中的那种安静平和、甜蜜沉稳的特点给人印象深刻，就好像是在指责[卫斯理宗]宗教复兴聚会上那种热烈、嘈杂和喧嚣的做法似的。”摩拉维亚派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他们的教育活动表现出来，像理查德·奥斯特勒和詹姆斯·蒙哥马利（激进派诗人、设菲尔德《虹报》主编）这些人，就是在富尔内克接受教育的；二是展示他们公社的明显成功，这些公社——加上那些震颤派的公社，时常被19世纪的欧文主义者所模仿；第三，他们在卫斯理宗团体内部永久地造成一种公有的理想——表达在诸如“兄弟会”、“姐妹会”等等词语中，这种理想在卫斯理公开否认他和摩拉维亚派有任何联系之后很久，还一直存在。[35]

48 公有制传统有时还和另一个潜伏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即千年王国论的传统。英国革命中狂热的新教徒——如喧嚣派、第五王国派等，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他们对革命圣经作严格的解释，预言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将从天而降。马格尔顿派（即卢多维克·马格尔顿的追随者）到18世纪末仍在伦敦的田园上讲道；震颤派由之而发源的那个博尔顿小团体，主持人是女修道院长简·沃德利，她传教时“全身震颤”，走过聚会厅，口称：

> 忏悔吧，上帝的天国就在眼前！古老预言中的新天地即将到来，……当基督重新出现，真正的教会在光辉荣耀中建立起来时，所有那些反基督的东西——牧师、教

---

[35] 见C.W.托尔森：《摩拉维亚派和卫斯理宗》（1957）；阿米塔奇前引书，第1卷，第6章；J.劳森：《就帕德西的进展情况致青年书》（斯坦宁利，1887），第15章；C.德赖弗：《托利激进派》（牛津，1946），第15—17页。

会、教皇等等，都将一扫而空。[37]

一切突发事件，如里斯本1755年地震，都会引起如启示录一般的期待。在卫斯理宗的核心内部，也存在千年王国派的不稳定因素。卫斯理在相当程度上相信巫术、相信地狱的存在和圣经卦(即任意翻开圣经，从经文中寻求启示的做法)。有时，他还会预言最后的审判迫在眉睫。卫斯理兄弟在早期创作的一首圣诗里使用了千年王国的一个现成的比喻：

你在这里立起帐篷，
　　送来了新的耶路撒冷，
你显现自己和你的圣人，
　　把我们放上你光辉的座轮。

伟大的千年时代由此开始，
　　救世主啊，你在欢呼声中降临；
你的旗帜在天国中飘扬，
　　带来了欢乐，永无止尽。

尽管正式的千年王国论并不受提倡，但卫斯理宗那种启示录式的宗教复活大会却刺激了人们的想像力，为1790年以后流行的千年至福论预言铺平道路。在伦敦、布里斯托尔和伯明翰，有斯韦登伯格的新耶路撒冷派小教团，它们吸收了一批工匠，为后来发展出更加注重智识同时又更加神秘的千年王国论信仰作好了 49

[37] E.D.安德鲁斯：《震教派的人们》(纽约，1953)，第6页。

准备。[38]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近年来对千年王国运动及其空想成分比较注意了，但他们喜欢谈论这派人如何不切实际、如何“思想偏执”，因而也就多少掩盖了他们的重要性。科恩教授在《追求千年的王国》这本有趣的研究著作里，通过多少带有感情色彩而选择出来的证据，说明关于“上帝选民”的狂妄想法，及“向往千年至福的运动”在现实中定期受到挫折的感觉其实是普遍存在的，当救世运动得到群众支持时——

> 原先分散在民众中的偏执狂团体似乎就突然集合起来，合为一个新的实体，变成集体的偏执盲信。[39]

人们不禁要问：这个“集合”的过程是不是真有？即便有，历史的问题仍未解决：为什么种种抱怨、种种期待乃至精神上的失常会“集合”成有力的运动，它只形成于某个特定的时间、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出现？

我们决不可把纯粹的“想入非非”及盲信与虚构想象混为一谈，比如对巴比伦的想象，对走出埃及的想象，对天国和与撒旦进行斗争的想象等等。几百年来，少数派团体就是在这些想象中形成他们的经历，注入他们的期待的。此外，某些团体采用的夸张的臆想，其实并不是反映他们的客观动机，也不反映他们实际的意向。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所说的“想象”，绝不仅仅是

---

[38] 卫斯理的学说见骚塞前引书，第 367 页；约瑟夫·南丁格尔：《卫斯理宗述描》(1807)，第 443 页以下；J. E. 拉顿伯里：《卫斯理兄弟的圣餐颂歌》(1948)，第 249 页。关于斯韦登伯格教，见博格和贝内特前引书，第 4 卷，第 126—134 页；R. 骚塞：《英国通信》(1808)，第 3 卷，第 113 页以下。关于 17 世纪千年王国派的终结，见克里斯托弗·希尔：《约翰·马森及世界末日》，载《清教与革命》(1958)。有关 18 世纪传统的某些迹象，见 W. H. G. 阿米塔奇前引书，第 1 卷，第 4 章。

[39] N. 科恩：《追求千年的王国》(1957)，第 312 页。

一些包藏着真实目标的语言形象,想象本身就证明它有强大的主观动机,它在历史的能动性方面和客观一样"真实",一样有效,就如我们在清教历史上一再看到的那样。它表明人们是如何感受、如何希望的,他们如何爱、如何恨,又如何在自己的语言结构中保存了某些价值观念。但因为这些美好的想象有时明显地指向虚幻的目标,因此就不能轻率地下结论,说它暗示了"在现实中定期受到挫折的感觉"。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到,对苦难及贫穷的"逆来顺受"有时也意味着现实中的受挫感,正如千年至福派的那种感觉一样。一旦出现这些现象,无论何时我们都应该尽力区分哪些是贮藏及释放于语言中的精神能量,即使它再癫狂也罢;哪些则是真正的精神失常。 50

整个工业革命时期,在穷人的非国教那里,都能看见这种"外在王国"与"内在王国"的冲突。其一端是千年至福论,另一端是寂静教。若干世代的穷人,只能在教堂和主日学校受到一点教育,还有就是旧约和《天路历程》。他们的想象与社会经历不断发生互换,那是主观意念与客观现实正在对话。这种对话,有时富有成果,有时一无所获,有时在顺从中表现出受虐待的快感,但很少是表现为"思想偏执"的。卫斯理宗的历史表明:对病态的缺陷进行"美化",是社会反动时期穷人中最常见的一种变态,而偏狭的狂热则在革命热情高涨时最容易发生。法国革命刚爆发时,潜伏已久的千年王国派暗流露出了地面,表现了出人意料的力量:

对真正的千年至福派来说,现在正是一个机会,过去隐藏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控制了外部世界并正在改造

它。[40]

想象与现实再次混淆，千年至福论触动了布莱克，它四处飘荡，不仅在伦敦工匠雅各宾激进分子和非国教徒之间漫游，而且飘游到中北部的纺织村庄和西南部的乡村中去。

但在多数人那里，外在的经历与内心的王国却保持着平衡，那内心的王国，尘世的权力无法触及，旧约的召唤正储藏其间。托马斯·哈迪是个严肃甚至刻板的人，他最关心的就是组织工作中的细小问题。但当他回忆起自己以叛国罪受审的情况时，他 51 却自然而然地去引用“列王纪”中的说法，那是大多数普通英国人所能理解的语言：

> 人民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罢。……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

非国教传统是引发英国雅各宾派宣传鼓动的诸因素之一，对它很难作出适当的总结。它的多样性否定了它的普遍性，而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是它最大的特点。相互竞争的宗教派别和不断分裂的小教堂形成纷纭复杂的局面，这就是 19 世纪种种工人阶级文化的温床。这里有一神论派或独立派，其工匠追随者人数少但影响大，在不屈不挠的思想传统下培育成长；这里有桑德曼派，威廉·戈德温的父亲就是这一派的牧师；有摩拉维亚派，以及它关于公有制的传统；有英厄姆派、马格尔顿派、斯韦登伯格派，这后一派的发祥地是冷浴泉地附近的一家理发店，它出版一份杂志叫《天国与地狱》。黑兹利特曾注意到，有两位非国教牧师在烟斗里装满覆盆子叶，想靠抵制一切征税品来消灭“腐败的

---

[40]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60)，第 193 页。见本书第 116—119、382—388 页。

旧制度”。这里有从威尔士迁居过来的加尔文教卫斯理宗，有在国民誓约派环境下长大的苏格兰移民，比如亚历山大·萨默维尔是反谷物法运动的著名政论家，他就是在贝里克郡一个农业工人家里长大的，受家庭教育成为严格的苏格兰分离派。印刷工扎卡赖亚·科尔曼是《鞣匠街革命》这本书所着力塑造的主人公，他在墙上挂着他画的伯德特、卡特莱特和萨德勒笔下的班扬像："他并非喧嚣派或宗教复兴分子，而是所谓的温和加尔文派，也就是说，他把加尔文教视为无可置疑的信条，但在实行中每有为难之处，他就把它缓和下来。”还有一些奇特的小团体，如霍克斯顿的古代自然神派，他们谈论梦境，谈论(像布莱克一样)脱离肉体的灵魂与天使对话，而且(也像布莱克一样)，“几乎马上就折服于法国大革命的更有力冲击之下”，变成一群“政客”。[41]

信仰自由是老百姓从共和国那里保留下来的最宝贵财产。当时，统治农村的是乡绅，统治城市的是腐败的市政团，统治国家的是腐败之中最腐败的团体，但教堂、酒店和家庭却是自己的，在“没有尖塔”的宗教崇拜地，有思想生活的自由空间，也有作“成员无数”民主试验的自由空间。在伦敦的非国教背景上，加上皮毛的自然神论和真诚的神秘主义作陪衬，布莱克就不再是没有受过教育、整日胡思乱想的天才人物了，而那些只知道当时的高雅文化的人却以为，他正是这样一种人。[42] 实际上，是他独创而且权威性地表达了民众中悠久的传统呼声。如果说伦敦 52

---

[41] W.H.里德前引书，第90页。

[42] 戴维·V.欧德曼在《反帝国的先知布莱克》(普林斯顿，1954)一书中，帮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待布莱克，为做到这一点，他对伦敦雅各宾的思想生活作了许多阐述。(有关布莱克的“喧嚣”派前辈和马格尔顿派前辈)可见A.C.莫尔顿《永恒的福音》(1958)。

某些雅各宾激进派对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43]被处死表现得出奇地镇静,那是因为,他们记得自己的祖先也曾处死过一个国王。骨子里带有班扬精神的人,都不会对布莱克的许多箴言大惊小怪,比如说:

最毒的毒药,
在恺撒的桂冠上。

许多人也像布莱克那样,发觉自己在理性的自然神论与百年来哺育于"内在王国"中的精神价值间左右为难。潘恩的《理性时代》在大镇压时期出版后,许多人一定与布莱克同感,他当时在兰达夫主教(为答复潘恩)而写的《圣经辩词》一书的最后一页上加注道:

我现在觉得,汤姆·潘恩是比主教更好的基督徒。

如果这样来看待非国教,那它就是一种思想传统了,从这种传统中,出现许多创新的思想和创新的人。但决不可以为,"老的非国教徒"作为一个整体愿意与人民站在一起。托马斯·沃克是曼彻斯特一个改革派,他自己虽是国教徒,却为废除宣誓法和市政团法而努力。他对"老的非国教徒"的胆小怕事嗤之以鼻:

非国教徒……作为一个整体常常丧失原则。出于害怕或者其他一些原因,他们时常是温和过度,乃至对那些冒险最大、为人民权利做事最多的人来说,他们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敌人。[44]

53

这似乎表现了伦敦与工业中心的冲突。曼彻斯特的非国教徒、伯明翰的"古老会议"和莱斯特的"大会议"成员中,有一些是地方上最大的老板。他们之支持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不下于他

---

[43] 即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译注

[44] T.沃克:《关于曼彻斯特的一些政治事件》(1794),第125页。

们对自由贸易信条的支持。他们对院外宣传和压力集团这类政治活动形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尤其如此，而这些又预示了19世纪中等阶级政治活动的模式。但他们对公民自由的热情随着《人权论》的出版而消退；而18世纪90年代初的那些审判与迫害过去后，能保持这种热情的人就凤毛麟角了。但在伦敦，在大城市的个别区域，非国教的许多工匠在这一时期却由非国教通过自然神论而转向世俗理论，霍布斯鲍姆博士曾写道：

> 世俗主义是把伦敦劳工史串连在一起的一条意识形态之线，它从伦敦雅各宾派和普莱斯开始，发展到反宗教的欧文派和合作运动者、反宗教的新闻工作者和书商，再发展到追随霍利约克成群结队去参加布雷德洛创办的科学宫活动的自由思想激进分子，最终成为对教堂那一套公开表示厌恶的社会民主同盟和伦敦费边派。[45]

在工人运动中，几乎所有理论家都是从伦敦传统中出来的——如若不然，比如像利兹的印刷工布雷那样的人，那他就一定是伦敦技术工人的雷同品。

不过，这份花名册却揭示了事情被遗忘的一面，即存在于卢德派、存在于布兰德雷思和年轻的班福德、存在于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参加者、存在于北方宪章派及独立工党等等身上的道德力量。传统差别有一些可以追溯到18世纪宗教形成的过程之中。18世纪最后几年民主思想复苏时，古老的非国教已经失去了多数民众追随者，那些仍旧依附于它们的工匠，也已经感染了利己的启蒙思想价值观，以致像弗朗西斯·普莱斯这样的人接受了有

---

[45] 霍布斯鲍姆前引书，第128页。

54 限度的功利主义哲学。但在没有非国教因而卫斯理宗得以取胜的外省广大地区，它却几乎完全摧毁了古老传统中民主、反专制的因素，而在人民与革命传统之间插进了幼稚的感情冲动，以作为对官方宗教的一种补充。但卫斯理宗的反叛又确实是诚心诚意而且出于强烈道德感的，南与北之间，理智与热情之间，世俗主义与敬神的言论之间充满了冲突，这些冲突将长期延续于 19 世纪，而其中的每一种传统，若无另一种作为补充，就都不会强盛下去。

第三章 “魔鬼之窟”

然而,“妓女、酒鬼和窃贼”这些“魔鬼之窟”中的居民,他们的情形又如何呢? 福音主义者为他们的灵魂费尽心机。如果我们对历史的变革感兴趣,那么我们必须考查这清晰的少数。但这个少数是从不那么清晰的多数中浮现的,这些多数的意识在此时可说是“亚政治的”,即由迷信或不自主的非宗教状态、偏见和爱国主义所构成。

就清晰度而言,这群不那么清晰的一帮人的思想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载。但我们在像戈登暴乱这样的危机时刻仍可见其一斑。不过,危机不是典型的情况,从犯罪档案中觅其踪迹是一种有诱惑力的做法。但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必须提醒诸位不能作以下的假设,即 18 世纪后期“穷苦的基督徒”可分为悔过的失足者以及杀人犯、盗贼及酗酒者等两种类型。

人们很容易不切实际地把工业革命时期的人分为有组织的即上教堂的好人和放荡的坏人,因为资料档案至少从四个方面促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可查到的事实通常出于贬损的目的而以耸人听闻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相信最卖力的调查者之一——帕特里克·科克洪的话,那么在世纪之交时仅伦敦就有 5 万名妓女、5000 多名酒馆主和 1 万名窃贼。他对范围更大的犯罪阶层总数的估计为 11.5 万人(连前面那几类人在内),而当时伦敦的人口还不到 100 万人。那些人中包括收赃者、伪造货币者、赌徒、奖券商、奸商、河边行骗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人,如拾荒者、寻衅滋事者、携棒胁迫者、摩洛哥人、宰客的车夫、苦

力、逗熊者和流浪艺人等。他还估计全国该阶层的总数达1320716人(含100万领取教区救济者),但是,这些估计不加区分地将吉普赛人、流浪者、失业者、流动商贩和梅休笔下街头小贩的祖辈们都混同在内。据深一步的考察,科克洪所说的妓女是指那些"淫荡和不道德的女人",包括"下层社会中数目巨大的未婚同居者"(这种现象出现在穷人要离婚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个时候)。[①]

56

因此,上述数据仅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估计,它既反映了有产阶级的心理状况(他们以为任何没有固定工作或财产的人必然要靠不正当的手段来维持生计——这当然也不是毫无道理),同时也反映了无产者实际的犯罪行为。科克洪作调查的时间与他得出的结论一样重要,因为这些调查是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恐慌气氛中进行的。在此之前的20年中,上层阶级对人道主义的关注有了重大发展,我们可以从霍华德、汉韦、克拉克森和弗雷德里克·艾登爵士的著作中,从小乡绅及非国教的商人对教俗自由越来越强烈的关心中,看到这一点。但是,"在法国革命引起的首次震撼之后,工人阶级的觉醒使上层阶级发抖了",雪莱夫人弗朗西丝在她的《日记》中这样说,"每个人都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好……"[②]

更确切地说,大多数有产者感到有必要把穷人的房子收拾好。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也许不同,但他们的这些方法背后的动机是基本相同的:科克洪主张加强治安,汉娜·莫尔提倡印制半便士小册子和建立主日学校,卫斯理宗再次强调秩序和服从,

---

① 帕特里克·科克洪:《论伦敦治安》(1797),第vii—xi页;《关于酒馆的调查与状况》(1796),附录部分;《论贫困》(1806),第38—43页。

② R.埃奇库姆编:《弗朗西丝·雪莱夫人日记,1787—1817》(1912),第8—9页。

巴林顿主教倡导建立较人道的“改善穷人状况协会”,威廉·威尔伯福斯和约翰·鲍德勒博士则主持建立“除恶倡教协会”。在这里,要传递给劳苦大众的信息很简单。伯克在发生饥荒的1795年归纳道:“应当告诫他们要忍耐、苦干、自制、节俭和信教,其余都是无稽之谈。”农业宣传家阿瑟·扬写道:“据我所知,要使一个国家充斥准备闹事的暴民之最妙的方法莫过于保留广阔的公地和每月只做一次礼拜……。难道法国的原则进展还不够快,以至于你们还要再助一臂之力吗?”③ 维多利亚时代中等阶级的敏感是在18世纪90年代由那些看到矿工、陶工和刀匠们在阅读《人权论》时被吓坏的乡绅培育而成的,其鼻祖就是威廉·威尔伯福斯和汉娜·莫尔。正是在这些反革命的年代里,人道主义传统被歪曲得不成样子。霍华德在18世纪70和80年代揭露的存在于监狱中的虐待行为又在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第一个10年再度出现。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在19世纪的最初10年发现他改革刑法的努力遇到敌意和恐吓,(他回忆道:)法国革命造成“上等阶层……对所有革新的恐惧”。科克伯恩勋爵在回忆(他在苏格兰的青年时代)时说:“每件事听起来都与法国革命有关。每件事,不是这件或那件事,而是千真万确地每件事都沉浸在这个事件中。”英国在这些年里笼罩在这幅精神紊乱的大幕之下,这使布莱克怒火中烧: 57

皆因英格兰的压迫者
　　遍布城镇村头……
他们玩弄伎俩
　　逼得穷人缺盐少油,
他们在举行游行和典礼之前

③ 《林肯郡农业概览》(1799),第439页。

先将人们剥夺得一无所有，
对耶和华的赞颂
来自饥寒交迫者之口。[④]

有产阶级这样的倾向不能使他们准确地观察社会(如我们在科克洪的例子中所见的那样)，这增强了当局那种自然的倾向，即把酒馆、集市和大群人的聚集视为令人厌恶之物——是闲散、争吵、诽谤和恶习之源。18 世纪末这种"捏造"事实的倾向还源于其他三个方面：第一，我们可举出新生的工厂主阶级所持的功利主义态度，这个阶级因需要在工业城镇实行劳动纪律而对许多传统的娱乐活动和轻浮态度怀有敌意。第二，卫斯理宗本身的压力以及大量痛心疾首的罪人存在使得报刊发表了许多悔过的自传。一个悔过自新的水手在这样的一篇悔过自传中问道："全能的上帝啊，您为何容忍这样一个不肖之子?"在他放荡不羁的青年时代，他——

58

> 曾去赛马、通宵玩乐、跳舞、逛集市、上剧院，而且他是如此不顾他的创造者的忧虑和他母亲的劝告，以至于数次酗酒。他惯于唱渎神的歌曲、说笑话、发表荒唐可笑的讲话……

而对于普通水手而言

> 他的歌、他的酒杯和他的情人(也许是一个街头妓女)构成了他的快乐三部曲。他很少思考，难得阅读，从不祈祷……。如果给他讲上帝的召唤，他会告诉你，他已听够了水手长的召唤……。如果你谈论天堂，他希望

---

④ 关于抨击穷人娱乐活动和传统的进一步讨论，见本书第 401 页以下的部分。另见 V. 基兰：《福音派教义与法国革命》，载《过去与现在》，第 1 期，1952 年 2 月号。

他能在桅杆顶上搭一张舒适的床铺;提到地狱么? 他
会开玩笑地说起被置于舱板之下的情景。

"啊,我的孩子,这样的一个罪恶缠身的人竟会成为一个宣讲拯救的人,这真是一个奇迹啊!"⑤

如果我们要弄清楚"快活的水手"或学徒或桑盖特的女佣对于当局或卫斯理宗传教士的看法,那就必须把这样的文献当作是中了邪,因此必须倒过来看。要是不这样做的话,历史学家也许会据此认为18世纪的某些方面苛严无比,而这些方面却使得普通百姓的日子能过得下去。而且,当我们考查早期工人阶级运动时,这种证据还得到第三个方面的补充。这个运动的第一批领导人和编史者是自学成才的工人,他们通过自我训练的努力来提高自身素质,这要求他们不去涉足那逍遥自在的酒馆世界。弗朗西斯·普莱斯写道:"我不会像许多其他人那样上酒馆。我仇视酒馆和开酒馆的商号。我不饮酒,也不同意花任何时间去与傻瓜谈天说地。"⑥ 这种自尊的品性经常使他们形成相应狭隘的观点。以普莱斯为例,他便接受了功利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的学说。由于普莱斯是早期运动最卓著的记录者,因此他本人对穷人们短视、无知和放荡的憎恶必然给那些记录打上烙 59 印。而且,改革家是在他们自己的队伍中发动启蒙、秩序和自制的斗争。这样,温德姆就能够在1802年不无理由地宣称卫斯理宗教徒与雅各宾激进派结成联盟来废止人民的娱乐活动:

依前者之见,所有乐事都要禁止,以使人们作好准备,
接受其狂热的学说。而依雅各宾激进派之见,至关重

---

⑤ 乔舒亚·马斯登:《一个水手的早年生活素描……》(赫尔,无出版日期,约1812年?)。至于对18世纪水手的不同看法,见R.B.罗斯:《18世纪的一次利物浦水手罢工》,载《兰开郡和柴郡文物协会》,第68期,1958年。

⑥ 格雷厄姆·华莱士:《弗朗西斯·普莱斯的一生》(1918),第195页。

要的是赋予下等阶层的气质以一种更为严肃和认真的性格。他们将此视为帮助人们接受其信条的手段。[7]

有些人愿意强调工人运动的前辈是有理智而守法的，他们有时就会缩小其较粗鲁、较狂野的特征。我们要警惕这一点，我们要对罪犯、士兵、水手们的社会态度和酒馆生活作更多的研究；我们在考查事实时，不应带有道德化的目光（“穷苦的基督徒”并不总是美丽的），而是应该用布莱希特那套价值观，即宿命论、对国教说教的冷嘲热讽和不屈不挠的自我保护等等那样的眼光，来加以看待。我们还必须记住民谣歌手的“地下场所”和集市场所，它们将各种传统传到了19世纪（传给了音乐厅，或狄更斯笔下的马戏团，或哈代笔下的小贩和娱乐主持人），因为尽管存在着来自官员、工厂主和卫斯理宗教徒要求查禁的压力，“非清晰者”以这些方式保存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即自发地追求欢乐和互相忠诚的能力。

“亚政治”传统以两种形式影响早期工人阶级运动，对此我们可以加以区分：一种是骚乱及暴民现象，另一种是深入人心的关于英国人“与生俱有的权利”观念。关于第一种形式，我们必须意识到人民对于犯罪的态度持久不变，这种态度有时会相当于不见诸文字的法典，与国家的法典截然不同。两种法典都认定某些行为是犯罪：一名杀害妻子或孩子的罪犯在去泰伯恩刑场的路上将受到打骂；拦路的强盗和海盗会在流行民谣中出现，60 半是英雄神话，半是对年轻人的劝戒。但是，其他犯罪得到了所有人的主动宽恕，如私铸钱币、偷猎、逃税（窗户税和什一税）或

---

⑦ 温德姆是在一次关于纵狗咬牛之娱乐的辩论中说这番话的。毫无疑问，卫斯理宗教徒和雅各宾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联合起来。见L：拉齐诺维奇：《英国刑法史》（1948—1956），第3卷，第205—206页。

逃避兵役、劳役等。走私者经常与当局发生冲突,双方都知道不成文的规矩。当局或许会扣押一艘船或袭击一个村庄,走私者们也许会拒捕,“但是,走私者的战术不会超出防卫,或有时进行一些救援,否则的话对方必然采取报复手段……。”[8] 在另一方面,其他一些犯罪行为却激起了普遍的谴责。这些犯罪容易进行,但对某些人的生活造成损害,如偷羊或偷窃野外帐篷中宿营者的衣物等。[9]

成文法典与不见诸文字的民众法典之间存在着差别,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常事。但是,两种法典之间的差别从未像在18世纪下半叶那么泾渭分明。人们甚至能够看到这些年头的阶级冲突是以泰伯恩刑场的方式进行的:一方是囚船和监狱,另一方是犯罪、骚乱和暴民行为。戈德史密斯曾描绘了一幅很久以前就为人熟知的图画:

> 每位反复无常的法官都引用新法令,
> 法令压迫穷人,富人左右法令。

而拉奇诺维奇教授在他的《英国刑法史》中所作的研究为这幅图画增添了令人心碎的证据。把越来越多的侵害财产罪定为死罪的是议员而不是法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保留),从王朝复辟到乔治三世去世的这些年中,死罪增加了约190项。换句话说,每年增加一项以上的死罪。其中不少于63项死罪是在1760至1810年之间增加的。不仅小偷小摸,而且连最原始形式的工业反抗——砸毁丝织机、拔除圈占公地的篱笆、放火焚烧柴垛等都要处以死罪。确实,治安力量完全不足,“司法”机关不健全,而

⑧ 保罗·斯旺斯顿警官:《一名士兵生平的……回忆录》(年代不详)。

⑨ 关于不见诸文字的流放者传说之研究,见拉塞尔·沃德:《澳大利亚传说》(墨尔本,1958),第2章。

且，在18世纪后期死罪增加的同时，一些陪审团不愿定罪，实际61 被处死的罪犯的比例也在下降。[10] 但是如果死刑是缓期执行的话，一般都改为在囚船中活受罪或流放。前往泰伯恩刑场(后来是新门监狱外的断头台)的队列是18世纪伦敦的主要典仪。"泰伯恩市集"的所有象征：立在囚车上的罪犯——男犯身着华丽服装，女犯身着白色素衣；他们洒向人群(民谣歌手和叫卖的小贩)的数篮鲜花和橘子、他们的"临终讲演"(甚至在受刑者抛下手帕以示意刽子手开始行刑之前就已售出)等都是伦敦大众文化的核心仪典。

商业扩张、圈地运动和早期工业革命都是在绞刑架的阴影下进行的。白奴离开英国海岸赴美洲种植园，后来又赴范迪门兰。与此同时，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由于黑奴贸易的利润而发迹起来，来自西印度种植园的奴隶主在巴思的婚姻市场上用他们的财富打入名门望族之列。这并不是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画卷。在底层，警官和狱吏在发犯人财——血腥钱、关押费及向犯人出售烧酒而赚钱。鼓励捉贼的比例奖赏制使人们夸大被告的罪行。穷人失去了土地权，因贫困和缺少防范犯罪的手段而走上犯罪道路；小商人或小业主因害怕入债务监狱而造伪证或作非法交易。当无法认定有罪时，治安法官拥有广泛的权力将流浪汉、强壮的无业者或未婚母亲移交给监狱(或"教养院")。这

---

⑩ 见拉齐诺维奇前引书，第1卷，第1、2部分。拉齐诺维奇博士指出，1749年至1758年间，527名在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中有365人被处死，而在1790至1799年间被判处死刑的745人中只有220人被处死。因而被判死刑者与被处死者之间的比率大约从三比二降为三比一，而且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继续下降。另一方面，被处死者大部分是犯了侵害财产罪，如1785年在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被处死的97人中，只有1人犯谋杀罪，43人犯盗窃罪，其他人均犯了侵害财产罪(作伪证、窃马等)。他归纳道，这些数字反映了全国的情况，而且"在1785年，死刑几乎专门用来惩治经济罪"。

种监狱是由腐败官员管理的、邪恶与疾病横行的地方，它的条件比其他最恶劣的监狱都更使约翰·霍华德感到震惊。对财产的最大侵害，其实就是一无所有。

法律受到仇视，但也受到忽视。只有最死硬的罪犯才会引起公愤，或引起那些将人送上绞架的告密者的注意。对抗有产者法律的运动不仅以个别的犯罪形式，而且以零星分散的暴动方式进行，其中许多参与者得到某种赦免。当威维尔提醒卡特赖特少校注意那些“无法无天的狂暴之徒”的“野蛮行为”时，他并不是在作不着边际的警告，英国人以他们的动乱不羁而著称整个欧洲，伦敦人桀骜不驯的举止使外国旅游者感到吃惊。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由面包价格、路税、通行税、间接税、“救济费”、罢工、新机器、圈地、强征兵役劳役和许多其他令人不快的事引起的骚乱不断发生。对特定的弊端采取的直接行动在一方面形成“暴民”伟大的政治起义：18世纪60和70年代的威尔克斯激进运动、1780年的戈登暴乱、1795和1820年伦敦街头骚扰国王事件、1831年的布里斯托尔暴乱和1839年的伯明翰斗牛场暴乱都是这样，另一方面又汇合成有组织的、持久的非法行动或准暴动：比如1811至1813年的卢德运动、1816年的东盎格利亚暴乱、1830年的“最后劳工暴动”、1839和1842年的丽贝卡暴乱和1842年的“活塞暴乱”等。

62

当我们考查卢德运动时，我们应当更加注意第二种即准暴动的形式。这是由特定条件引起的一种直接行动，它通常有良好的组织，得到当地居民的保护，而且我们应当特别小心不要把它看成一种普遍形式。第一种形式直到现在才开始受到历史学家的注意。吕德博士在他的《法国革命中的群众》一书中认为：“当‘暴民’这个术语是指受雇于人、为他人利益服务的群伙时……应当对它三思而后用，而且只有在特定场合下才有道理

使用”。历史学家经常随意使用这个术语，不肯作进一步的分析，或者是显示对它的反感(用来影射因抢劫的欲望造成的犯罪因素)。吕德博士提出在探讨18世纪后期英国和革命时期法国的暴乱时，“革命大众”也许是个更有用的术语。

加以区分是必要的。18世纪英国的暴乱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某种程度上大众自发的直接行动；二是群众之“上”或之外的人故意利用群众作为一种压力工具。第一种形式还没有得到本应得到的注意，它以更显而易见的大众支持为基础，并由更悠久的传统验证其合法性，这不是“暴乱”一词可表达的。最常见的例子是面包或食品暴乱，这种不断重复发生的暴乱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几乎在城乡各处都可以看到[11]。它很少只是以打开谷仓或抢劫商店为高潮的暴乱，它得到更古老的道德经济学的支持而合法化，这种准则告诫人们：任何哄抬食品价格、靠人们日常必需品来牟取暴利的不公正手段都是不道德的。

在城乡社会中，消费者的意识高于政治或工业对抗。最敏感地反映公众不满的指示器是面包价格，而不是工资。手工业者、个体工匠或像康沃尔锡矿工这样的团体(在那里，“自主”矿工的传统直到19世纪仍左右着工人的反响)能确保他们的工资受习惯法的控制或依靠他们自己讨价还价来确定。[12] 他们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口粮，因此，甚至在食品短缺时期，他们也期望价格要受习惯法的控制。(供求关系的天然“法则”认定短缺必然引起价格上涨，但这个法则完全没有得到普遍接受，更古老的面

[11] 至于暴乱事件，见 R. F. W. 韦尔茅斯：《卫斯理宗与18世纪的人民》(1946)。

[12] 康沃尔的“份子工”或“计件工”是一种直接契约工，其中少数人在18世纪后期还伴以捕沙丁鱼、租种小块土地等不同工作(如一些约克郡铅矿工人所做的那样)，见 J. 洛：《工业革命时代的康沃尔》(利物浦，1953)，第26—27页。

对面讨价还价的概念依然存在。)任何大幅度的价格上涨都会突然引起骚乱,一整套繁琐的法律和习惯制约着"面包法定标准",即面包的大小和质量;[13] 在惯用的计量单位存在的情况下,就连试图在销售小麦时推行标准的温切斯特计量单位也会引起骚乱。北德文郡农业协会于 1812 年在比迪福德市场推行标准的温切斯特蒲式耳制,协会一位领导人就收到一封恐吓信:

> ……冬夜还没有过去,所以你这个家伙不会活着回家的。如果你碰巧逃脱了握着这支笔的手,那么一根划燃的火柴同样能叫你送命。我不认识你家里的人,但他们统统都会丧身火海的。倘若你的尸体还能找得到,而且还含有水分,畜生还能吞得下的话,它就会被扔给狗吃……[14]

64

食品骚乱有时是相当厉害的,如 1764 年发生在诺丁汉郡古斯市集的"奶酪大骚乱",当时所有奶酪都被扔到街上碾踏;或像 1788 年发生在同一座城市的那场骚乱,其起因是肉类价格高居不下,当时肉店的门窗都被拆下,与肉店主的帐簿一起堆在市场上焚烧。[15] 但是,就连这种暴力也带有远比饥饿复杂的动机:零售商由于肉制品价高质劣而受到处罚。在更多的情况下,"暴民们"表现了自我约束的精神,控制在传统的行为方式范围内行事。约翰·卫斯理一生中也许只对骚乱行动作过一次评论,当时他在日记上记下了爱尔兰詹姆斯镇暴民的行动,他说,暴民们——

---

[13] 关于这个复杂问题,见 C.R. 费伊的《谷物法和英国社会》(剑桥,1932),第 4 章。

[14] 引自"某个托马斯"的信件,载 1812 年 3 月 25 日斯克瑞致内政部函,内政部档案,第 42.121 号。

[15] J. 布莱克纳:《诺丁汉史》(诺丁汉,1815),第 383—384 页。

整天都在行动，但他们只与市场上的投机商打交道。投机商们收购了远近各地所有的谷物，打算装上一艘停泊在码头上的荷兰船，而使穷人挨饿。但是，暴民们把所有谷物都运到市场上，按平时的价格替货主出售。他们在做这些事显示出可想象的镇定和沉着，没有殴打或伤害任何人。

1766年，霍尼顿的饰带工人从农场主的房屋里夺取谷物，运到市场上出售，然后将售粮款、甚至连口袋一起还给农场主。[16] 同年在泰晤士河谷地区的村庄和城镇（埃宾顿、纽布里、梅德斯通等），大批自称为"监察员"的工人来到这里对所有食品实行平价。（这个行动是由在收税路上工作的工人发起的，他们呼吁"以一个声音行动，一起到纽布里去降低面包的价格"。）[17] 1783年发生在哈利法克斯的事再现了民众威胁与自我约束相结合的模式，镇外从事编织业的村民集合起来，由退伍士兵、铸币匠托马斯·斯潘塞率领，颇有秩序地（列成两人一排的队伍）前往市场。谷物商们受到围困，被迫将燕麦以30先令一车、小麦以21先令一车的价格出售。当斯潘塞和一个同伙后来被处决时，一支强大的武装队伍开出来，以防备有人营救他们。葬礼车来到位于卡尔德河谷的斯潘塞家所在村庄时，参加葬礼的人挤满了数英里的道路。[18]

65

这样的"骚乱"被普遍视为正义之举，其领导者被看做英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最激烈的行动是强迫按平价或低价（与法

---

[16] 见R.B.罗斯：《18世纪价格暴乱、法国革命与雅各宾高潮》，载《国际社会史评论》，1959年第4期，第435页。

[17] 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707号。

[18] H.林·罗思：《约克郡铸币匠》（哈利法克斯，1906），第108页。

国的"低税"相类似)出售食品[19],销售的收入归还货主。而且,他们需要的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多。有时,"暴民们"控制市场达数日之久,等待价格跌落。有时在采取行动前先散发手写的(18世纪90年代则用印刷的)传单。有时妇女控制市场,一群群的男子则在路上、码头和河边拦截粮食。采取行动的号令通常是由一位用竿高举面包的男子或妇女发出的,上面饰有写着标语的黑色缎带。1812年9月发生在诺丁汉的一次行动就由几位妇女发起,

> 她们将一只半便士面包固定在渔竿顶上,面包上有用红赭石绘成的条纹,系着一块黑纱,象征着……"披着丧服的悲惨饥荒"。[20]

1795年是这种"骚乱"频发的危机年头。这一年欧洲发生饥荒,食品极度短缺。广为接受的古老传统因少数人推崇的雅各宾意识而变得更坚强了。随着价格猛涨,直接行动遍及全国。在诺丁汉,妇女们"走进每一家面包店,对店里的面包自定价格,然后放下钱,拿起面包扬长而去"。格洛斯特市长担忧地写道:

> 我有充足的理由担心迪恩森林矿工们的到来。他们这些天里在他们相邻的城镇活动,削价出售属于磨坊主和面包坊主的面粉、小麦和面包。

在纽卡斯尔,大众在市镇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强行出售食品:黄油8便士一磅、小麦12先令一布尔、土豆5先令一车,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在威斯贝奇,从事修渠、筑堤的乡村"挖土工们"("最蛮横的一种人,他们人多势众令人生畏")在市场发动骚乱,领头者用草叉叉着一个6便士面包。在卡莱尔,藏在一座仓库里的粮 66

---

⑲ 见R.B.罗斯前引书。

⑳ J.F.萨顿:《诺丁汉志》(诺丁汉,1880),第286页。

食被发现,库里的粮食连同一艘船上的粮食一起被运到市政厅,以18先令一担的价格出售。在康沃尔,“锡矿工们”涌向乡村,强制推行他们的“最高限价法”。[21]

这样规模的行动(以及许多其他行动)表明一种极为根深蒂固的行为和信仰模式,它们开展得如此广泛,以至于枢密院(它从1795年的5月至10月间十分关注粮食供应问题)几乎无法保证粮食能安全地从一个郡运到另一个郡。城乡之间的某些冲突因素在增强,乡村地区的人们相信他们的谷物将会被运进城市,而他们自己将会挨饿。农民们拒绝将粮食运往市场,害怕粮食会被低价售出。在港口,人们扣下粮船,因为他们担心粮商要把粮食运往国外。官员们默许发生在本地区的扣押粮食的行动,在威特尼,“居民们扣押了将运往国外的粮食,将它运回来,按低价售出”。许多小麦在剑桥被扣,并在市场上售出。在约克郡西区,卡尔河和艾尔河上的驳船被暴民阻截、扣押。在伯福德,人们阻止一船粮食运往镇外,并按8先令一蒲式耳的价格售出,有官员担心伯明翰的居民也许会前来攻击伯福德。在韦尔斯,“大批妇女”阻止粮船驶往伦敦。[22]

67 旧的家长制道德经济学使这些大众行动具有合法性。尽管以前有关打击投机商和囤积居奇者的法律到18世纪末时已大部分废除或取消,但它在人民的传统中,在一些主张家长式统治的托利党人心中却活力不减,这些托利党人至少包括一名高等

---

[21] 关于诺丁汉,见J.F.萨顿前引书,第207页;关于格洛斯特、威斯贝奇和卡莱尔,见内政部档案,第42.35号;关于纽卡斯尔,见E.麦肯齐:《纽卡斯尔史记》(纽卡斯尔,1827),第72页;关于康沃尔,见洛前引书,第104—105页,至于后来的行动,见第142、158—162、181—184页。另见W.P.霍尔:《英国激进主义,1791—1797》(纽约,1912),第202—215页。

[22] 枢密院档案,第A56/8号;内政部档案,第42.35/7号。

法院法官(凯尼恩),他在1795年公开表达他的观点,认为投机和囤积行为仍然是违反习惯法的。[23] 在大众心目中,这些触犯习惯法的行为包括所有蓄意提高食品价格的剥削行为,尤其是代理商、磨坊主、面包坊主和所有中间商的所作所为。1795年来自雷特福德的一份传单这样写道:"那些残忍的磨坊主、面包坊主等,还有面粉商都联合起来随心所欲地提高面粉价格。他们的目的是在一个充裕的国家里制造人为的饥荒。"一份由利兹某些农业工人提交的请愿书这样写道:"谷物商和我们称之为贩子的那种人和磨坊主们把谷物吃进,囤积起来,然后再按他们自定的价格卖给穷人。"[24] 人们相信大磨坊主们在囤积粮食,抬高价格。伯明翰市斯诺山有一座以蒸汽为动力的大面粉厂,它在1795年受到袭击。而伦敦著名的阿尔宾面粉厂则两度失火,化成一片废墟,有谣传说第一次由纵火引起,因为据信厂主使用多种手法掺假;旁观的人"幸灾乐祸","欢庆的歌谣印制出来,人们当场吟唱"。第二次火灾时(1811年),"群众在火焰前欢呼雀跃"。[25]

这样,人们在18世纪末的几年里,最后一次竭尽全力恢复旧的道德经济,以对抗自由市场经济。在这里,他们得到了旧式治安法官的一些支持。治安法官们威胁要对投机商们提出起

---

[23] 古老的法令于1772和1791年废除。关于18世纪90年代的复杂形势,见费伊前引书,第4章,D.G.巴恩斯:《英国谷物法史》(1930),第5章。

[24] 费伊前引书,第44页;1795年7月20日利兹致波特兰公爵的请愿书,载内政部档案,第42.35号。

[25] C.吉尔:《伯明翰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第1章,第128页;R.骚塞:《英国通信》(1808,第2版),第3卷,第179—181页;《阿尔弗雷德报》,1811年10月25日。

诉,加紧对市场的控制,或者发布惩治购买青苗的投机商的公告。[26] 1795年斯品汉姆兰决议主张根据面包价格而在工资以外发放补贴,就应该放在这个背景上来看。在习惯正在消失的那些市场地区,家长主义者们试图在救济方面将其恢复。但是,古老的习惯势力挣扎不了多久了,在1795年与1800年之间,只有为数不多的投机行为受到起诉。1800年,大量私立起诉协会成立,它们给主持定罪者发放奖酬。对投机行为的一次影响重大的定罪是由高等法院裁定的,这显然是为了使凯尼恩勋爵感到满意。[27] 然而,这是实行旧的家长主义式保护消费者措施的最后一次尝试了,此后,习惯法的控制就完全崩溃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大众对由奉行保护主义的地主和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商业巨头组成的议会所怀有的不满情绪。

仅在考察这一种形式的"暴民"行动时,我们便会遇到无法预料的复杂性。这是因为在每次这种形式的大众直接行动的背后,我们都能发现某些具有合法性的权利概念。在另一方面,以更接近吕德博士所下定义的含义利用"暴民"(即"受雇于人的、为他人利益服务的群伙")的做法在18世纪就已司空见惯,而且,人们不大注意到的是,当局本身早已这样做了。1688年的

[26] 参见内政部文件第42.35号中格洛斯特一个头面居民的委员会决议(1795年6月26日),其中威胁要对霸市、囤积行为起诉;以及《布莱克本邮报》1795年7月—9月的引文,载G.C.米勒:《布莱克本——一个产棉镇的演变》(布莱克本,1951),第23、60—63页。

[27] 费伊前引书,第55页;巴恩斯前引书,第81—83页;J.阿什顿:《19世纪英国的曙光》(1906),第240—241页;W.斯马特:《19世纪经济年鉴》(1910),第1卷,第5—6页;米勒前引书,第94、103页;J.A.兰福德:《伯明翰世事100年》(伯明翰,1868),第2卷,第101—102页;尤其要见J.S.格德勒:《关于霸市、囤积和投机之恶果的考察》(1800),第209—215页。沃里克伯爵曾在上院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授予治安法官以确定谷物价格的权力,但未获通过。他宣称,在上个月里,"霸市、囤积和垄断的案发次数不少于400次"。《议会史》,第35卷(1800),第839页。

解决方法毕竟是一种妥协。受益者们为了巩固其地位，能轻易地激起大众一方面对天主教徒（潜在的詹姆斯党人）产生厌恶，另一方面对非国教徒（潜在的平等派分子）表示反感。在一个治安力量十分薄弱的国家里，暴民是对地方官员的一种相当有用的补充。约翰·卫斯理早年时经常遇到一些在地方官员特许下行事的暴民，他的第一批野外布道者们也是这样。他们所遇到的最具暴力性的行动，有一次发生在1743年，地点是在文斯布里和沃尔索尔。据卫斯理叙述，暴民们反复无常，连他们自己打算做什么也搞不清楚。暴民的头目们"是镇上的好汉"，但只能辨认出其中一人是"本分的屠夫"，另一人是"闹市上的职业拳击手"，这两个人都突然改变立场，站到卫斯理一边来。当我们得知暴民们得到当地官员和教区牧师的支持时，事情变得更清楚了。这些官员和牧师因卫斯理在当地的布道者（"一个砌砖工和一个管子工兼釉工"）"离间"矿工对国教会的"感情"而表示愤怒，称这些布道者为"呆狗"。事实上，按照卫斯理的说法，"一些先生……威胁要把那些不来参加的矿工赶出他们主持的宗教仪式"。[28] 约翰·纳尔逊在他的《日记》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生在格里姆斯比的例子，那个小镇的一名国教会牧师——

69

> 命一个人敲打铁鼓招摇过市，自己则在鼓前行走，聚集尽可能多的暴民，给他们酒喝，要他们跟他一起去为国教战斗。

在纳尔逊正在布道的那所房子门口，教区牧师对暴民们大声喊道："推倒这所房子！推倒这所房子！"

但是，与地方上反映出的民众对个别问题的想法相比，伦敦

[28] 卫斯理：《日记》（人人版），第1卷，第438—444、455页；《关于卫斯理宗在文斯布里兴起和发展的报告》（1744），第8页。

的暴民就更重要。伦敦暴民始终存在于18世纪的政治史中，而威尔克斯在18世纪60年代竟能完全消除政府代理人对他们的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处于演变中的暴民，正在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激进群体，非国教和政治教育的酵母已在产生作用，使得人民倾向于维护大众自由，对抗当局和参加"社会抗议运动，而运动中潜在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冲突……已昭然若揭了……"[29] 斯皮特菲尔兹的丝织工和他们的学徒长期以来一直以其反政府骚动而著称。吕德博士在他的《威尔克斯与自由》一书中注意到工业冲突曾多次转变为威尔克斯信徒的示威，示威者的口号也转变为共和或者革命口号，比如"让国王见鬼去吧！让政府见鬼去吧！让法官见鬼去吧！"，"史无前例的、最光荣的发动革命的时机到来了！"等等。在将近十个年头里，伦敦和南方似乎（按一个评论家之语）是"一个无人管辖的疯人院，一

70 伙赤贫的、闲散的和发狂的暴民成了它的主宰，而激励他们的仅仅是**威尔克斯**这个字眼……"。[30] 这些人是威尔克斯的支持者，他们

> 在圣乔治草坪、海德公园角、伦敦市长官邸、议会广场和圣詹姆斯宫示威；他们在伦敦城、威斯敏斯特和索思沃克的街道上高呼或书写"威尔克斯与自由"的口号；他们在伦敦交易所殴打行政司法官哈利和一名普通行刑队员，当时他们正试图焚烧《苏格兰人报》第45期；他们打碎布特勋爵和埃格勒蒙特勋爵家的窗玻璃，污损奥地利大使的靴子；他们男男女女在伦敦城内街道上招摇过市，在伦敦塔外焚烧勒特雷尔上校、桑威克勋

---

[29] G.吕德前引书，第237页。

[30] G.吕德：《威尔克斯与自由》（伦敦，1962），第50、173页。

> 爵和巴林顿勋爵的模拟像。这些人就是当时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所称的那种"暴民"——如此称呼他们，不是出于懈怠或偏见，就是由于缺乏更确切的知识。……[31]

他们只是普通人——商人、仆人、挑煤工、水手、工匠和各种各样的工资劳动者。他们在议员竞选场所举行示威支持威尔克斯，而每当威尔克斯在选举中获胜时，他们就拥着他到街上去庆祝胜利。

吕德博士洗刷了伦敦百姓只是流氓和"犯罪分子"的恶名，这是正确的。他还将被雇来支持反威尔克斯的候选人普罗克特的流氓和具有自发性激情的拥护威尔克斯的多数人区分开来，而两者间的差异是巨大的。但是，在对历史学家的"偏见"提出抗议时，吕德的抗议显得过头，因为18世纪60和70年代的伦敦百姓还几乎没有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或拥立自己的领袖，几乎还没有和他们的"老板"不同的理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威尔克斯操纵和指令他们"为他人利益服务"，这些利益是指那些富有的伦敦商人和制造业主的利益，他们是威尔克斯最有影响的支持者。威尔克斯本人对来自下层的追随者发出的欢呼声也讥讽地表示蔑视，据说，当他注视着竞选台下欢呼的人群时，就曾问他的对手勒特雷尔上校："难道你认为除这群人之外还有别的笨蛋或无赖吗？"当我们想到支持威尔克斯的商人们占据了伦敦城政府中的关键职位时，百姓的自由意志倾向与老板们利用暴民的手段之间的反常关系就显得更加突出。因此，那些袭击大人物的座车、打碎他们住宅窗户玻璃的伦敦人知道，他们是在得到特许的情况下行动的——正如沃尔索尔的矿工一样。事实

[31] G.吕德：《威尔克斯与自由》，第181页。

上，追随威尔克斯的百姓们处于大众政治意识产生的半道上，当他们最流行的口号是"自由！"时，许多人还十分动摇不定，他们也同样会转过身去袭击"异己"分子，或打碎那些在"爱国"的时刻未能好好表现的公民家的窗户玻璃。[32]

71

这在 1780 年的戈登暴乱中表现得最清楚，我们在此看到群众的宣传鼓动迅速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革命群众"被广得人心的新教协会很好地组织起来，秩序井然地跟随在巨幅旗帜后面行进，向议会两院递交一份反对天主教信仰自由的请愿书。走在示威队伍前排的是"地位较高的商人……衣着考究的体面人……极为安静有序、举止文雅"。这是个非国教的伦敦，吉本描绘了其中一些狂热的"清教徒"，"好像他们是生活在克伦威尔时代……从他们的坟墓中爬了出来"。由于下院拒绝就请愿书进行辩论，加上乔治·戈登勋爵的长篇演说，人们于是感到愤怒，由此进入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可称为得到特许的自发行动阶段，其发展方向是暴民的暴力行动。参与者们满怀"一种朦胧的愿望——要向富人进行清算，仅此而已"。一些"地位

[32] 关于普罗克特其人，见吕德：《威尔克斯与自由》，第 59—60 页。吕德博士是这一重要领域的最早先驱者，指出他在分析中的缺陷也许是忘恩负义之举。但应当注意的是他对伦敦工匠的非国教传统不感兴趣，对辩论俱乐部和酒馆结社也几乎不感兴趣，而这些却正是群众的思想和组织中心。而且他对民谣歌本零售商和"叫卖者"的地下政治也兴致索然。要想进一步了解伦敦平民的政治，可见 G. 吕德：《18 世纪伦敦"暴民"》，载《历史杂志》，1959 年，第 2 期；露西·S. 桑德兰：《城市及反政府行动，1768—1774》(1959)和《18 世纪政治中的城市》，载《献给刘易斯·纳米尔爵士论文集》(1956)，R. 佩尔斯和 A. J. P. 泰勒编；至于酒馆生活，见 M. D. 乔治：《18 世纪的伦敦生活》(1928)，第 6 章。

较高的商人"退出了，而工匠、学徒、仆人及一些罪犯充斥街头。[33] 自从共和政体和1688年以来，"禁止天主教"的呼声一直在民众意识中引起共鸣，而且无疑也把这许多人卷了进去，对这些人的亚政治反响，笛福在多年前就曾这样描绘过："一群不屈不挠的家伙，他们愿为反天主教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而不知道天主教是一个人还是一匹马。"暴乱所攻击的第一批目标是天主教教堂和富裕天主教徒的住宅，然后是当局的显要人物——包括高等法院法官曼斯菲尔德和约克大主教，暴民们相信他们同情天主教解放事业。接下来是袭击监狱，释放囚犯，最后以袭击银行而达到高潮。在整个第二阶段，"得到特许的"暴民意识继续存在，支持威尔克斯的伦敦市官员们因采取了消极或不介入的态度而引人注目。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害怕引起公愤；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无秩序状况的实际默认会加强他们对抗国王及政府的力量。只是当第三阶段开始时，"特许状"才予收回。当时暴民们既袭击银行，又行为放荡：酗酒、纵火、摸钱包等无所不为。持消极态度的伦敦市长最终向总司令发出一封急信，要求"骑兵和步兵援助地方政权"。威尔克斯议员本人也出来驱散银行门前台阶上的暴民。暴乱得以迅速平息，这个事实表明：市府官员原先持有的态度是消极的。

72

这样，我们在此看到了受人操纵的暴民和革命群众的混合体。乔治·戈登勋爵试图仿效威尔克斯，但他根本不具备威尔克斯那种判断准确的冒险精神和对群众情绪的精确认识。他触发

---

[33] 见G.吕德：《戈登暴乱》，载《皇家历史学会会刊》，1956年，第5辑，第6卷，及克里斯托弗·希伯特：《暴民之王》(1958)。吕德博士不像希伯特先生那样强调罪犯和妓女在暴乱的最后阶段卷入的程度，吕德博士分析了一些受审囚犯(其中大多数是工资收入者)的案例，希伯特先生则更依赖于暴乱目击者的陈述。另见J.P.德·卡斯特罗：《戈登暴乱》(牛津，1926)。

了一场自发性的暴乱，而支持威尔克斯的市府官员对此给予特许。一群群暴民推举自己的临时领袖，这让人回想起哈利法克斯的铸币匠托马斯·斯潘塞。这些临时领袖有詹姆斯·杰克逊和伊诺克·福斯特等人。杰克逊是一个钟表齿轮工，他骑在一匹拉车的马上，手舞一面红黑二色旗。福斯特则是马戏团的大力士，他将怀特查珀尔区一所房屋的地板掷出窗户来逗乐暴民。不过，这种混合体再也没有在伦敦出现。1780 年，尽管伦敦人举止过激，但他们处于自由派的辉格党人保护之下，辉格党人将他们视为对抗国王特权的一支力量。伯克对使用军队平息暴乱表示遗憾，福克斯则宣称他"更情愿受暴民、而不是受常备军的统治"。但在法国革命之后，所有辉格党人不再敢冒险接受危险性如此之大的破坏行为，市府官员们也不再宽恕这种行为。改革派自己则致力于创立一种有组织的舆论，放弃了发动暴民的策略。19 世纪的激进主义者和宪章派自豪地用"动员"这个术语来描述他们非暴力的、品行端正的示威。

73

18 世纪暴民的最后一次重大行动发生于 1791 年的伯明翰，这次行动的方式使得我们在归纳"革命群众"的概念时须特别小心谨慎。[39] 伯明翰也许是中等阶级非国教教派的最大中心，其新老一神论派大会包括了该地区最大的一些雇主。非国教徒在这座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社团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致"教会与国王"派长期以来吃尽了苦头。这并不是由于该派力量不足，而是由于它的权力和威望不够。暴乱的表面原因是中等阶级改革派(其中许多人是非国教徒)于 1791 年 7 月 14 日举行的庆祝攻陷巴士底狱的晚宴，那天夜里和后来的三

[39] 以下我所作的描述主要引自 R.B.罗斯所作的权威性研究《1791 年的普里斯特利暴乱》，载《过去与现在》，1960 年 11 月号，第 68—88 页。

天中，“横冲直撞、形似乞丐、厚颜无耻、庸俗低级、喧闹不宁、愚蠢笨拙的伯明翰暴民”在城里和周围地区横行霸道，攻占了两座一神论派教会和一座天主教会的会所，焚烧或洗劫了富有的非国教徒（或假定的同情者）的多座住宅和商店，还释放了市监狱中的囚犯。非国教徒是主要的受害者（尤其是那些与改革事业有联系的人），但（罗斯先生评论道）“富有的非国教徒遭受攻击的原因究竟是由于他们是非国教徒，还是由于他们有钱？这并不总是能搞清楚的”。攻击者的口号，从“教会和国王！”到“禁止天主教！”都有。

毋庸置疑，大众确实对一些富有的非国教徒心怀不满，（比如，其中一名受害者威廉·赫顿由于担任伯明翰小额债权法院的专员职务而特别不得人心，这个法院负责执行小额债务的偿付。）但伯明翰暴乱中有许多情况尤其令人疑惑，这使人想起近50年前约翰·卫斯理在沃尔索尔暴民手中所受的待遇。首先，几个地位显要的托利党市府官员和教士之间存有确凿的共谋关系，他们鼓动暴民举事，将他们引向会所，只是半心半意地加以干预，拒绝起诉肇事者，还可能替暴民指出“合法”的攻击目标。74 其次，重大行动中破坏力强的暴民人数不多，除了参加周末抢劫的矿工及其他来自周围村庄的暴民之外，进行抢劫的暴民人数很少被估计在250人以上。而许多重复的描述都谈到一个约30名纵火犯构成的强硬核心，这些暴民造成了大部分严重损失。再次，有证据表明，这个强硬核心（也许还不是由本地人组成的）按照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行事，并十分了解伯明翰显要人物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情况。暴民们也许受到“宗教偏执思想”的激励（如普里斯特利所指责的那样），巴士底日庆祝活动肯定成了他们的借口。但是，这是一场在当地部分国教会特许下出现的歧视性发作，它应当被视为“这样一个事件：乡村‘绅士’

动员城市暴民去拔除咄咄逼人和功成名就的伯明翰资产阶级口中的非国教利齿”。与此同时，它是“由旧的宗教敌意与新的社会政治不满偶然相汇聚而引起的一场潜在阶级仇恨和个人违法行为的爆发”，[35] 暴民的行动超出了原先所预期和允许的界限。

但是，如果根据伯明翰的暴乱就说这是城市贫民对法国革命或“雅各宾”思想的普遍敌对情绪，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对法国革命最初阶段的欢迎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等阶级和非国教团体，直到1792年，这些思想才通过潘恩所著《人权论》这个媒介，赢得了广泛、众多的追随者。因此，普里斯特利暴乱是在潘恩的宣传真正开始造就新民主意识之前的一次处于演变中的暴民行动，具有迟发的、倒退的性质。当然，暴乱在1792年之后的许多年里继续发生，其原因要么是具体问题，如班福德在他的《一个激进派的一生》的开头就列举了一系列发生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暴乱：布里德波特暴乱、比迪福德暴乱、布里暴乱、纽卡斯尔暴乱、格拉斯哥暴乱、伊利暴乱、普雷斯顿暴乱、诺丁汉暴乱、梅瑟暴乱、伯明翰暴乱、沃尔索尔暴乱等；要么是激进派宣传鼓动引起的造反高潮（尤其是1831年发生在布里斯托尔、梅瑟、诺丁汉和德比的暴乱和1839年发生在伯明翰的暴乱）。在布里斯托尔暴乱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戈登暴乱和普里斯特利暴乱的一些特点：劫掠主教邸宅和市长官邸、释放狱中囚犯、抢劫和焚烧不得人心的居民的住宅和商店。但是，当局没有在暴民背后发现任何阴谋，至多不过是发现了一个冲动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商人查尔斯·戴维斯，他到处奔走，挥舞雨伞顶上的帽子，高呼“打倒教会！让它们见鬼去吧！”，

75

㉟ R.B.罗斯前引书，第84页。

他尽管费尽心机还是被处以绞刑。[36] 这些暴乱不是在“教会和国王”，而是在“国王和改革”的口号下发生的，国王被并列于后面这句口号之中的原因是据信他偏爱主张改革的内阁。受到攻击的主要目标并不是非国教徒，而是地位显赫的国教徒(其中许多人是西印度奴隶主)。同时，我们不应根据民主倾向对暴民有影响就错误地认为布里斯托尔暴乱是一次有政治意识的革命行动，正如1819年的曼彻斯特是自我约束的新型工人阶级运动出现的标志一样，1831年的布里斯托尔是旧的、向后看的行为模式长期存在的典型。无知和迷信已从保王党分子那里传到激进派事业中，但是，我们能从布里斯托尔暴民的口号中对戈登暴乱和普里斯特利暴乱有所了解，布里斯托尔暴民在把一大抱取自教堂图书馆的文稿书籍投入火中时高呼“不烧书就没有改革”。[37]

按照暴民是“受雇于人、为他人利益服务的群伙”这个概念，真正的暴民是那些自1792年以来用于恐吓英国雅各宾分子的“教会与国王”派[38]。当这些暴民有时被指令攻击富有和杰出的改革派时(如攻击曼彻斯特的托马斯·沃克)，他们保持了沃尔索尔矿主和格里姆斯比牧师的传统，而且他们被“他人利益”十分严密地组织起来(有时还从“他人利益”那里得到报酬)，因而很难说他们代表了真正独立的群众情绪。而且，尽管许多地方的教士和治安法官们授予反雅各宾暴民以完全的特许权，但是参加者大多是一小撮经过挑选的街头流氓，他们从未发动像1791 76

㊱ 另一个相似的特点是：群众的特许意识来自“被吓垮”并拒绝随军行动的官员，也来自人道指挥官布里尔顿中校，他骑马行进于高呼“国王和改革”的人群中。见某“公民”(约翰·伊格尔斯)《布里斯托尔暴乱》(布里斯托尔，1832)。

㊲ 关于目击者的叙述，载《布里斯托尔时报》，1931年10月30日。

㊳ 见本书第112页以下。

年伯明翰暴乱那么大规模的广泛暴力行动。在中心城市(突出的有设菲尔德和诺里奇),“教会与国王”派暴民只取得了十分有限的成功,而且在伦敦以任何规模雇用这些暴民都是不可能的。1794年,被囚的雅各宾分子被宣告无罪释放,这是像威尔克斯时那样大规模群众胜利的信号。1795年,伦敦百姓已怀有革命情绪,并(通过伦敦通讯会)正寻求新的组织和领导者。也许,具有决定意义的冲突发生在1797年10月镇压雅各宾派的高潮时,当时托马斯·哈迪拒绝在一次海军大捷时张灯庆祝,有人试图摧毁他的住宅,但被100名担任守卫的伦敦通讯会会员击退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爱尔兰人,而且装备精良”。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正如一名“守卫者”回忆的那样:“那天夜里保卫哈迪住宅的战斗是我参加过的历时最长、打得最漂亮的一次战斗。”当哈迪回顾这个事件时,他自己的观点是坚定的:“我不喜欢暴民统治。”[39] 我们还可以看看四年后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相关事件:1801年,伦敦又一次张灯结彩,不过这一次是庆祝英法和约的草签。这回,暴民们以砸碎一位好斗的反雅各宾派办报人家的每扇窗户来发泄他们的感情,因为他拒绝张灯庆祝和平。民众守卫者没有出现,甚至连市政府在派人保护时也行动迟缓,而这位办报人就是威廉·科贝特。[40]

---

[39] 约翰·宾斯:《回忆录》(费城,1854);哈迪前引书,第85—86页。

[40] G.D.H.科尔:《威廉·科贝特生平》(1924),第76页。战争于1803年5月再度爆发,得到科贝特的全力支持。

第四章　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1797年，保卫哈迪住宅的人是在作最后的战斗了。此后若干年中，法国人侵成为现实可能，群众的爱国主义感情无疑对残存的雅各宾分子构成了暴民恐怖的威胁。仰仗其广泛的选举权，威斯敏斯特在1806年仍有可能通过广为行贿收买人心来击败激进派。弗朗西斯·普雷斯看到诺森伯兰公爵的仆人们"身着华丽的制服，向密集的流浪汉抛撒一块块面包和奶酪"：

> 这些游民——都是来自圣贾尔斯和威斯敏斯特的陋街背巷、来自波里季群岛和其他龌龊地区的可怜虫，他们不择手段地抢面包和奶酪块，喊叫、赌咒、殴斗和谩骂，女人和男人都这样，据说这些人就代表着威斯敏斯特的选民，我看这真是导致堕落的最卑劣一步。

群众还能得到啤酒，人们将酒桶的顶盖敲进去，"运煤工们用他们长尾宽边的帽子将啤酒从桶里舀出来……但人群向前挤，挤翻了酒桶，啤酒顺着街沟流淌，一些人便想法从沟中捞点出来。"普雷斯在一旁观看，对这种"可耻的场面"感到震惊。但在第二年(1807)，普雷斯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激进选举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人民中工作得卓有成效，使威斯敏斯特选出两名激进派议员——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和科克伦勋爵。[①] 从那时起，"激进伦敦"的传统就几乎没有中断过。伯德特能够在1810年

---

① 附加手稿，第27850号第19—20帧、第27838号第19—20帧，G. D. H. 科尔、A. W. 菲尔森：《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第79—80页。见本书第13章。

按照威尔克斯的模式来制定策略，并借助大众的支持来与政府抗争。在各主要地方中心城镇，1812年时的情形亦大致相当（一位设菲尔德人在日记中注意到）："暴民们讨厌所有的人，只把一名彻底的改革派除外。"[②] 1815年战争结束时，无论在伦敦或在北方及中部的工业地区，都不可能再动用"教会与国王"派暴民去恐吓激进派了。

在1815和1850年之间，激进派、欧文主义者和宪章派不时抱怨人民冷漠。但是，如果我们将常见的选举骚动略而不计，改革派一般还是能得到工人群众的支持，在大城镇举行选举时，正式投票前在"投票站"用举手表决方式进行的公开选举中，一般都使最激进的候选人取得压倒性多数。改革派不再惧怕"暴民"，而当局则被迫建造简易棚房，小心防范"革命群众"。这一类历史事实太清楚了，以致很容易被视而不见，或者是见多不怪，然而，它却表明群众的不清晰的"亚政治"态度之着重点发生了重大变化。

着重点的变化与流行的关于"独立"、爱国主义及英国人的"天生权利"等观念有关。1780年戈登暴乱和1791年伯明翰"教会与国王"派暴乱的参与者在这个问题上是相同的，即他们以朦胧的方式感到自己在维护"宪法"，使之免遭那些威胁其"天生权利"的外来因素的损害。他们长期以来受到这样的灌输：1688年革命的解决方法是英国独立和自由的保障，这个方法就体现在由国王、上院和下院构成的宪政制度上；宪政即自由，这个定式已被确立，而无耻之徒则可能玩弄这种说法。但摧毁普里斯特利博士宝贵的图书馆和实验室的那伙暴民，也可以沾沾自喜地把自己看做是"生来自由的英国人"，爱国主义，民族主

② T.A.沃德：《回顾过去》(1909)，A.B.贝尔编，第192页。

义、甚至连偏执的行为和高压手段都披上了自由的外衣。即便是腐败的旧制度,都在称颂英国的自由;贵族、蛊惑家和激进派都交口称赞自由这个词,而不是民族荣誉或者权力。以自由的名义,伯克谴责法国革命,潘恩则支持法国革命。随着英法战争(1793)的开始,爱国主义和自由充斥所有诗人的诗作:

79

不列颠人维护其遍布海外的帝国,
　　维护其古老的名誉。
向妒忌的世界宣称,
　　这个民族依然勇敢和自由。

决心征服否则宁可死亡,
　　忠于其法律、自由和国王。[3]

由于担心入侵,就产生了大量以此为主题的传单和民谣,这为华滋华斯那自豪而响亮的爱国主义十四行诗提供了适当的背景: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
不列颠的自由洪流,
从那黑暗的蛮荒时代,
伴随一片赞誉,
流向浩瀚的世界之海,
"涛声铿锵,不可阻挡",……

的确"不可思议",但在这个时期,新闻自由、公众集会自由、工会组织自由、政治组织自由和选举自由要么受到严格限制,要么已被搁置。那么,普通英国人的"天生权利"包含哪些内容呢?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回答是:"财产安全!关注……英国自

③ 《反雅各宾报》,1798年1月1日。

由的明确性"。[4] 然而，自由这个词的内容要丰富得多：首先，当然是不受外国支配，在这片弥漫着爱国主义的自我陶醉的迷雾之中，还包含一些不那么明确的概念，而腐朽的旧制度对此感到有必要加以奉承，但事实却表明这些概念在长时期中对它是危险的。这些概念有：摆脱专制主义（立宪君主制）；不被任意逮捕，由陪审团进行审判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准任意进入和搜查住宅；某种限度的思想、言论和信仰自由；由议会反对派的权利及选举、竞选骚动等等提供的让别人代理参加的自由（或某种自由的假相）——在当时，尽管人民没有选举权，但他们有权示威和在竞选场所欢呼、嘲笑；以及旅行、经商和出卖本人劳动力的自由。其中的任何自由都不是无意义的，它们加在一起就包含和反映了一种共识。当局不时地也具有这种共识，而且它始终要重视这种共识。[5]

如同"道德共识"这个不确定的概念一样，限度问题对理解80 这一时期是至关重要的，限度是指英国人不准备被"推出"、当局又不敢逾越的那种界限。从任何肯定的意义上说，普通英国人的态度并不像反专制主义者那么民主。他感到自己是个人主义者，虽没有多少确定的权利，但受到反专制侵扰的法律保护。更加不明确的是，他感到光荣革命提供了一个有权发动暴乱来反对压迫的宪法先例。这确实是18世纪的一个矛盾现象，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立宪主义都是"这个时代的幻像"。传统主义分子和改革派的政治理论都处于由1688年解决方法、由洛克或布莱克斯通等人确定的辉格党限度之内，在洛克看来，政府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国内和平和保护个人及财产安全。这样的理论若

④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为人权辩护》(1790)，第23页。

⑤ 见E.哈勒维前引书，第1卷，第193—212页。

掺入自私和偏见，也许会被有产阶级用来认可惩治侵害财产的最血腥的法律，但决不能用来认可侵犯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受法治制约的专制权力。因此，血腥的刑法与自由的、有时是谨慎的行政管理和法律条文解释并行不悖，这使许多外国观察者颇为吃惊。18 世纪对于宪政理论家、法官和律师来说的确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世纪。穷人在陷入法律纠纷时常有不受保护之感，但是，正如哈迪、霍恩·图克、瑟尔沃尔和宾斯所发现的那样，陪审制度的确提供了某种保护。威尔克斯能够轮流运用法庭和暴民来与国王、议会和政府进行公然对抗，创立了新的重要先例。行政没收权和任意逮捕或搜查权并不存在，甚至在 18 世纪 90 年代，每次引进“大陆”特务制度的企图、每个中止人身保护法的行动、每次收买陪审团的企图都在改革派自身队伍之外引起强烈的抗议。在看到泰伯恩刑场和镇压行动的记录时，如果有人开始怀疑这种限度的价值，那么，他应当把哈迪及其同伴的审判案与 1793 至 1794 年间米尔、杰拉尔德、斯克文和帕尔默等在苏格兰法庭上所受的待遇作一对比才是。[6]

这种立宪主义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那种不怎么明确的反响染上了色彩，英国人除了自由自在的权利之外几乎不要求其他权利。在 18 世纪，没有一种制度像征兵制那样受到痛恨，常备军极不受人信任，皮特的镇压措施中也很少像在工业城镇附近修建兵营那样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改革派提出个人在自卫的情况下有携带武器的权利，从军被视为一种有失体面的职业。“在专制君主制下，”一位小册子撰写者写道： 81

在那种行使统治权的暴君叫他不幸的臣民“吃草”，他

⑥ 见本书第 124 页以下。有关证据在科伯恩勋爵那本有学术价值的、生动的《苏格兰叛乱审判之考察》中得到全面的探讨。

的臣民就吃草的地方，暴君们当然能征召一支杀人的屠夫队伍，去毁掉他的同类；但是，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它至少**自封是自由的**，若有如此众多的人为了每天区区6便士的微薄收入而主动放弃自由人享有的特权和赐福，自愿卖身沦为最丢人的、最低下的**奴隶**，这会成为一件令人大为吃惊的事……⑦

在1794年8月的三天暴乱中，霍尔本、伦敦城、克拉肯韦尔和肖迪奇用于征召士兵的"征兵房"被袭击和捣毁。⑧ 在1812年，编织工为争取保护性立法而发动的宣传活动达到高潮时，曼斯菲尔德支部的书记得知工人代表正拟出一个条款，授权对涉嫌破坏所拟规章的厂主住宅进行检查和搜查，他惊慌地写道："要是保[堡]垒被弄塌了也就是每一个英国人的房子是他的保垒那么强大的提[堤]坝也永远弄塌了，我们那么多的人们都为它流了血也白流了"。⑨ 直到19世纪，人们仍在反对建立一支有效的警察力量，改革派打算承认：一支较有效力的**预防性**警察力量是必要的，他们赞同增加更夫和保护财产的守夜人，而任何由中央指挥的、拥有更大权力的警察力量则是：

82

一种暴政制度；一支有组织的密探和告密者的队伍，其目的是毁掉一切公众自由，破坏一切个人幸福。所有其他警察制度都是专制主义的诅咒……⑩

---

⑦ 无名氏：《关于和平时期常备军的失策和关于兵营的违宪和非法措施的信件》(1793)。约翰·特伦查德的《英国常备军史》(1698)在1731年、1739年和1780年再版，并载入雅各宾派的《慈善家》杂志(1795)。

⑧ 见吕德：《威尔克斯与自由》，第14页。S.麦科比：《英国激进主义，1786—1832》(1955)，第91页。据说有"该死的母狗"之称的妓女引诱男子进入房内，强征"入伍"，见H.M.桑德斯：《诱骗者》(1794)。

⑨ 《诺丁汉选邑档案》，第8卷(1952)，第152页。

⑩ J.P.史密斯：《记成功的试验》(1812)。

1818 年议会委员会认为边沁提出的设置警察部的建议是“一个将使每座房屋中的每个仆人都成为监视其主人的密探，使社会上所有阶级相互监视的计划”。托利党人担心教区权利、特许权利和地方治安法官的权力会遭到压制；辉格党人害怕国王或政府权力的增加；像伯德特和卡特莱特这样的激进派成员则更喜欢公民的自愿建立组织或住户们轮流值勤的做法，激进的民众直到宪章运动时期仍将所有警察力量都视作压迫机器。一次十分突然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人们反对建立“一个不可抗拒的最高法庭，如其他国家所谓的‘高等警察署’那样，那是由专制主义创造的……一部机器……”。[11]

对增加中央权力所持的敌意中，我们看到教区防卫、辉格党理论和民众抵抗奇妙的大杂烩。乡绅和普通百姓都珍视地方权力和习俗，对抗国家的侵犯。对“那玩意”和“大官”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托利党与激进派之间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状态从科贝特一直持续到奥斯特勒，并在 1834 年反对《济贫法》时达到了顶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着力宣传国家的政治与行政权的，主要是中等阶级功利主义者，而在他们国家主义旗帜的另一面却书写着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甚至在 18 世纪 90 年代中期镇压雅各宾派登峰造极之时，说恐吓行动系“个别”公民的“自愿”组织所为的神话（如里夫斯的反雅各宾协会或威尔伯福斯的除弊协会等），依然可以招摇过市，同样的神话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被用来迫害理查德·卡莱尔。战争期间，国家向“官方”报刊提供补助金的做法做起来全然不能理直气壮，遇到的麻烦也很多，而且外交上也连连碰壁。战后派遣密探和从事煽动的奸

---

[11] 《泰晤士报》，1823 年 1 月 31 日，见拉齐诺维奇前引书，第 3 章，第 354—364 页。

83 细的做法表明人们真正地忍无可忍，连许多坚决反对男子普选权的人都滋长了这种愤怒之情。

此外，除不受国家干预之外，真正使人民感到庆幸的还有富人和穷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信念。颇具感情色彩的读物，如《新编新门日志——或作恶者喋血记》，就记载着足以证明这一信念的有关贵族和显要人物被押到泰伯恩受刑的案例。地方志编纂者们颇为得意地记下这样的案例：利兹"飞扬跋扈的庄园恶霸"因一怒之下杀死他手下的一个佃农而于 1748 年被处死。激进派对此也许大可讽刺挖苦一番。霍恩·图克就说过：如果法律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那么伦敦的酒馆也一样，"但是它会以一种抱歉的方式来欢迎，除非你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寻欢作乐。"[12] 不过，就连雅各宾激进分子也深信法治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独特的遗产，那使他们免遭专制权力的侵害。伦敦通讯会在 1793 年的一份"演说辞"中试图确定英国平民和革命前法国平民的地位差别："我们的人受法律保护，而他们的生命掌握在所有拥有官爵头衔的个人手中。……我们是人，而他们是奴。"

诚然，这种防卫的思想滋生出更大的权利要求，威尔克斯完全知道怎样弹奏这首曲子——这位维护他个人权利的斗士在不知不觉中变成向国王和大臣提出挑战，要求得到那些没有先例的权利的生而自由的公民。1776 年，威尔克斯已经走得很远了，他在下院为"最下贱的修理工、最贫穷的农民和日班工人"的政治权利进行请愿，这些人——

> 拥有重要的权利，关系到他个人的自由、他妻子儿女的自由，他微不足道的财产和他的工资……而在许多商

---

[12] T.沃克：《关于曼彻斯特的一些政治事件》(1794)，第 87 页。

> 业和制造业中，工资是由议会权力加以调节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制定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这种权力就连地位低下但很有用处的人都应该有。

这当然还是艾尔顿（或伯克）的观点，不过财产权已被赋予更自由的含义。威尔克斯依照习惯诉诸于传统和先例，将这个观点完善了： 84

> 若下院没有真正的代表性，我们的政体在本质上就始终有缺陷……其他一切想恢复由我们祖先创立的纯朴自然的政府的药方都是不会奏效的。

"纯朴自然"、"我们的祖先"都是些至关重要的词，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改革派内部就在争论如何完美地解释这些词。哪种模式是纯朴自然的？改革派应提及哪些祖先？对于美国的缔造者来说，打破先例的束缚就似乎足以发现某些"不言自明"的真理，然而对约翰·卡特莱特少校（1740—1824）、即在《独立宣言》问世的同一年出版《抉择》的那个人来说，却有必要拿出撒克逊人的先例来，支持他关于每年召开议会、平均划分选区、支付议员薪金以及给予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论点。这位"善良、头发花白的少校"（因为他在几乎半个世纪后才出名）很早就将这些要求确定为先进的政治改革派的主要目标，从1776年直至宪章运动及至更后，[13] 他从未背离过这些要求。少校不知妥协、行为坚定又勇敢无畏，始终致力于他全心投入的事业，从他在波士顿和林克斯的邸宅发出信件、呼吁书和小册子，经受住了审讯、骚动、内讧和镇压。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前，他就在北部地区着手

---

[13] 卡特莱特少校还进而提倡秘密投票（但并不是宪章派人士的第六点要求），以及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

创建新时代第一批改革组织——汉普登俱乐部。他那当牧师的哥哥也正是在这一地区发明了动力织布机，从而加速了另一个变革的过程。但是，尽管少校的原则和建议比他长寿的生命活得更长，但他的论点却没有这样。

等一会儿，我们将看到原因所在（答案可以用两个词表达：汤姆·潘恩）。但首先我们应说明在法国革命前的20年中，一个新因素实际上已加入到公认的立宪进程中去。报刊已确立了尚不明确的权利，它独立于国王、上院和下院之外。围绕威尔克斯的《苏格兰人》所发生的骚动既反映了这些权利是不稳定的，又 85 表明了大批公众维护这些权利的感情。“论坛”[14] 这种院外压力集团也在18世纪下半期兴起，它用发行出版物、召开大规模集会和提交请愿书的方法来发动“院外的”舆论，争取实现有限的目标。用不同的方式使用论坛和请愿的团体多种多样：有威尔克斯的支持者、怀威尔的郡联合会、新教协会（它在戈登暴乱之初出现）、“经济”改革派、废奴派人士和要求取消加在非国教徒身上的限制的宣传组织等。威尔伯福斯或怀威尔可能只期望将他们的鼓动范围限于绅士或自由持有农，但他们树立了先例，榜样具有感召力。立宪政体的复杂机器中又增加了一个新齿轮，厄斯金和怀威尔运用人们所熟悉的关于控制和平衡的机械形象，[15] 倡导“人民运动中的时钟规则”。约翰·卡特莱特少校走得更远，他主张为了最终目标，在各阶级中制造的混乱越大越好。（他在给怀威尔的信中写道：）

旧的训练年轻弓弩手的方法是要求他向月亮放箭，其

[14] 在这里，我使用了亨利·杰夫森的术语，他撰写的两卷本《论坛》(1892)，至今仍是惟一对该机构所作的全面研究。

[15] 见阿萨·布里格斯：《改良时代》(1959)，第88页起。

目的是使他获得足以把箭射到足够距离的力量，由此，
我始终认为，对于普选权原则的自由讨论最有可能实
现所有值得为之奋斗的改革。

尽管少校用先例和传统这样的术语来表达他的观点，但他相信在"成员无数"中作鼓动的方法。在1797至1799的镇压年代，这位波士顿的士绅给北约克郡改革派怀威尔发出一封信，指责他谨小慎微。他对怀威尔写道："我并不怎么害怕你的自耕农，却对你的绅士感到恐惧。……使我感到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绅士都站在另一边，只有一人除外。因此，我的努力并未受到他们的地方会议的损害，我还随时可以畅所欲言。"

我感到好像唯有高效兴奋剂和最强烈的刺激才能唤起
人的旺盛的力量。……除非我们的呼吁能使所有人理
解、我们讲述的真理能不受阻挡地征服人们的心，否则
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你只为了过得去就提出没
有号召力的权宜之计，我真希望某些与你共同谋事的
意志坚强者能将你从这种境地中拯救出来……[16]

86

所以，宪政争论中的相似观点也许会掩盖宣传口径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是，所有在潘恩之前主张改革的人都是从"宪政的腐败"着手的，我们一般可以从他们写作中引用的历史先例上看出他们激进的程度。威尔克斯派的（其实主要是贵族派的）"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及其后继者"革命协会"〈1788年〉和"人民之友会"〈1792年〉）满足于引用1688年解决方法的先例；1780年创立的、进步的宪法知识会则广泛引用《大宪章》以及更

[16] C.威维尔：《政治文札》，第5卷，第389—390、399—400页。

早的先例，将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美国人的范例都囊括在内。[17]杰布博士、卡特莱特和卡佩尔·洛夫特为该协会撰写的小册子使托马斯·哈迪能够提出改革理论。在法国革命之后，群众结社的理论家们主要关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十户区"组织、贤人会议和有关阿尔弗雷德统治的传说。对于许多雅各宾派成员来说，"纯朴自然"和"我们的祖先"成为几乎任何形式的宪法革新，为此可以随便拼出一个撒克逊人的先例。约翰·巴克斯特是肖迪奇的一名银匠、伦敦通讯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接受叛国罪审判时曾与哈迪是同牢房的难友。他在1796年抓住时机出版了长达830页的《新编公正英国史》，在书中将撒克逊人的先例几乎等同于自然状态、高尚的蛮荒时代和原始社会契约。巴克斯特推测"最初的政体肯定是自由的"，历史就是这种政体的堕落史，"不列颠人最初被罗马人征服，然后被撒克逊人征服，而后他们又被丹麦人征服，最后全被诺曼人征服……"。至于1688年革命，其"作用仅在于驱逐了一个暴君和确认了撒克逊人的法律而已"，但是，还有许多这样的法律有待于恢复：除男子选举权之外，巴克斯特最热衷的就是不设常备军，以及每个公民拥有携带武器的权利。他努力提出一系列宪法方面的论点，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民有权对抗宪法。

然而，正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先生在研究"诺曼枷锁"论时所表明的那样，这些详尽而往往华而不实的关于宪法的争论其实有真正重要的意义。[18] 就连老古董似的争论也包藏着政治着眼点上的区别。从匿名作者的《英国宪法史论》(1771)到18世纪

---

[17] 宪法协会在18世纪80年代后期沉寂下来，但有霍恩·图克作为该协会的杰出会员，它在1790年后最为活跃。

[18] 载P.萨维尔编：《民主与工人运动》(1954)，第42—54页。

90年代初,较先进的改革派都喜欢引用撒克逊人的先例,而在这之前很久,汤姆·潘恩就已经出版了他的《常识》(1776年),他的论点却并不助长引用先例的风气:

> 一个法国杂种率一帮武装匪徒登陆,自立为英国国王,违背当地人的意愿。显然,这是十分卑鄙下流的开端,肯定不具有任何神性。……事实是,古代的英国君主制不堪入目。

但是,《常识》是在美洲土地上出版的,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直到法国革命和《人权论》出版之后,此类对传统观念的嘲弄才传到英国,"如果说王位的继承是在征服者的后代中进行,那么民族就是在被征服者的后代中延续,应当将自身从这种耻辱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诺曼枷锁"理论显示出惊人的活力,甚至在1793年之后,当潘恩逃往国外,《人权论》也以煽动性诽谤的罪名遭到查禁时,它还在英国雅各宾派的圈子中得到复兴。

这在某种程序上是出于需要。对潘恩的迫害反映出立宪主义传统所能允许的自由限度,在当时,完全不去求助于"我们的祖先"是危险的。当设菲尔德的改革派亨利·约克在1795年受审时,他的辩护集中到这一点:"在几乎每一次演说中,我都竭尽全力反驳托马斯·潘恩的信条,他否认我们宪政的存在。……我始终反其道而行之,我认为我们有完美的宪政","即从我们的撒克逊祖先和不朽的阿尔弗雷德那非凡的心灵中孕育而出的高尚政府"。甚至连约翰·巴克斯特也感到最好与大不敬的潘恩脱离干系,而巴克斯特所说的"撒克逊人"就是指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

> 正如我们十分尊重托马斯·潘恩先生的观点一样,我们也同样不能同意他关于我们没有宪政制度的说法。他的错误似乎是因为他的目光仍停留在诺曼征服上而造

成的。

但这又不仅仅是出于需要。按照传说，撒克逊人的先例为88 君主立宪制、为以男子普选权为基础的自由议会和法治提供了合法依据，而像卡特莱特少校和巴克斯特这些以“爱国者”和立宪主义者面目出现的人，就要接过时代流行的口号。[19] 如果事情都像潘恩在《常识》中那样直筒筒地提出，那改革派就不得不完全停止关于宪法的辩论了，而将其要求放到理智、良心、自身利益和“不言而喻的”真理上去。对于许多18世纪的英国人来说，由于他们是从立宪主义文化中汲取思想养料，所以这种想法令他们感到震惊和不安，而且其含义也是危险的。

然而，我们有必要彻底了解这种流行的口号，因为，就连巴克斯特用不适当的撒克逊言词将它打扮一番的时候，它仍含有某些传统的绝对神圣性，比如尊重君主制度、尊重世袭原则、尊重大地主和现存教会的传统权利以及基于财产权而非人权的代表制度等。一旦陷入有关宪法的辩论，甚至当这些辩论是用来推进男子普选权的主张时，改革派便纠缠于振兴宪政的零星琐事之中。要发动一场民众运动，就有必要完全跳出这些框框，提出更为广泛的民主要求。我们可以看到在1770至1790年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反论，正是通过这种反论，立宪主义的流行词句把自己引向毁灭或变为超然之物。那些在18世纪时读过洛克或布莱克斯通评论的人发现他们二位对未作改革的下院中派

⑲ 这种流行口号还在不相称的场合出现，18世纪后期一则广告说：“最古老、忠诚、民族的、宪政的、合法的消遣：逗熊”。外省雅各宾协会在1792至1796年间，通常把自己叫作宪政会或爱国会。约翰·瑟尔沃尔的遗孀在编写她丈夫的传记时，痛苦地说他是“一个撒克逊家族的后裔”，而约瑟夫·杰拉尔德在作出危险的应急提议即召开国民公会时，将“我们撒克逊祖先”的“人民大会”引做先例。

别和利益的运作进行了尖锐的批判。[20] 因此，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用18世纪自身的理论去批判其实践，稍后一点就有第二个反应，就是使这些理论站不住脚。潘恩正是在这个时候，以他的《人权论》参加进来的。 89

法国革命树立了一个内容更为广泛的先例：它按照理性和事物的本源拟就了一部新宪法，而将"贫乏、陈腐和可畏的习俗、法律和法令"撇在一边。最先剧烈动摇宪政论基础的不是潘恩，而是伯克。一方面是法国的榜样，另一方面是孜孜不倦的改革派在寻找1688年之前或诺曼征服之前先例，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使旧的基础崩溃了。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伯克在先例的权威之外又增添了智慧和经验的权威，在尊重宪政之外又增添了尊重传统，即"那些活着的、死去的和将要出世的人们之间的伙伴关系"。制衡行使某种特定权力的理论转化为制衡人的不完善本性的概念：

> 建立国家的技能是不能先天传授的。……人的本质是复杂的，社会目标就更为复杂。因此，任何简单地控制或支配权力都不能适应人的本质和人的事务的特性。人们在统治方面的权利……通常是在善的差异上取得平衡，并且有时在善与恶之间、有时在恶与恶之间达成妥协。

激进改革派"过分关注人权理论，以致完全遗忘了人的本质"。"由于他们过于匆忙，蔑视自然进程，他们就糊里糊涂地跟着每

[20] 在对潘恩的缺席审判中，厄斯金用布莱克斯通著作中的段落为潘恩作辩护。而设菲尔德改革派约克在公众示威中宣读洛克的文摘。坦普尔法学会学人：《托马斯·哈迪审判案》(1794)，第108页。

一个设计师、每一个冒险家、每一个炼丹士和每一个庸医走。”[21]

这个论点是从人的一般道德本质中推断出来的。但我们反复地观察到这个事实:腐朽贵族的道德本质倒不如民众(即“猪猡的一群”)的本质那么令伯克感到惊恐。伯克强烈的历史感使他指出:“自然进程”是十分复杂和迟缓的,所以任何革新都充满了看不见的危险,普通人也许与这个进程毫不相干。”如果说潘恩对伯克的警告不屑一顾是错误的(因为他撰写《人权论》是为了回击伯克),那么他在揭示构成他独特论辩基础的阶级利益惯性时却是正确的。学术界对他们两人的评价很奇怪,伯克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名望被抬高了,近年来更是如此;潘恩则被贬低为一名大众宣传家。事实上,这两位作者的理论体系都不足以使他们跻身于大政治理论家的行列。他们两人都有宣传家的天才,他们的言论都不如所用的腔调那么出色。潘恩缺乏阅读深度和文化可靠性,而且由于他傲慢而急躁,于是就撰写平庸之作,令学术界人士摇头叹息、不屑一读。而普通人对伯克洞察力的印象倒不如对那句划时代的轻率之言——“猪猡的一群”的印象那么深刻,然而这个无意中说出的短语却反映了潘恩所不会有的感情上的迟钝。伯克的这个失误打破了18世纪政治文化的沉寂状态。此后出现了义愤填膺的大众小册子,其争论点几乎可以用五个词来概括,即伯克的两词短语和潘恩的三词旗帜。大众小册子的撰写者靠乏味的创造力以不同的讥讽词汇来对待伯克的主题,他们把自己的小册子和期刊的名称叫作《猪食》、《猪肉》、《橡树子和山毛榉子——由老休伯特采集的》、《大众政治——猪猡的大杂烩》(撰写者则是“猪呼噜兄弟”、“猪猡”和“作呕物”等等)。再接下来就是猪圈、猪倌和咸猪肉等词,不一而

[21] 《法国革命感想录》(人人版),第58—59、62、166页。

足。《猪猡的一群致尊贵的埃德蒙·伯克》(1793)这样写道:“你这家伙在最脏的猪食槽边狼吞虎咽的时候,咱们这帮数不尽的猪猡从日出到日落忙着拣几粒橡树子填肚皮。”从来没有任何词汇使得“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感到这么愤怒的——他们也从来没有作出过如此冗长的答辩。 91

由于《人权论》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奠基之作,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考察其论点和口气。[22] 潘恩是在英国写这本书的,但作为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人,他在美国那令人振奋的实验和反传统的宪政气氛中生活了近15年。潘恩在第二部的序言中写道:“我想知道一部以不同于为英国所熟悉的思维和表达风格写成的著作是否会被人们接受。”从一开始,他就不赞同立宪主义论点的体系:“我为活人的权利而斗争,反对由文字假定的死者的权威去支配、控制和限制这些权利。”伯克期望“根据发霉的羊皮纸的权威,永久性地托付后代的权利”,而潘恩却断言每一代人都有资格确定其权利和新的统治形式。

至于说英国宪政,这类东西并不存在。至多,它只是“先例的堆砌物”,是一种“政治教义”和“按照先例、却不参照先例原则的统治,是所能建立的最恶劣的制度之一”。除了法国和美国的统治制度之外,所有统治制度均从征服和迷信那里获取权威,其基础建立在“专制权力”之上。而且,潘恩专门抨击使这种权力得以延续的方式,即世袭原则,因为它是迷信的表现。“一帮匪徒在一个国家中横行霸道,强征特别税。他们的权力由此得以

---

[22] 潘恩在1787年返回英国,仍十分注意桥梁建筑方面的试验。《人权论》第1部于1791年出版,第2部于1792年出版。最近出版的潘恩传记是A.O.奥尔德里奇的《理性的人》(1960),内容详尽但无奇,几乎未增添任何使我们更多地了解潘恩对英国的影响及他与英国的关系的内容。此外还应阅读蒙丘尔·D.康韦那本生动但有偏见的《生平》或H.N.布雷斯福德在《雪莱、戈德温和他们的圈子》中的简述。

确立，匪徒头目设法改头换面，用君主的名称替换强盗的恶名，这就是君主制和国王的起源。"至于继承权，"继承政府就是继承人民，就像继承畜群似的"。"国王一个继承一个，不是作为有理性的人，而是作为动物……做一名普通的机匠还需要有某些技能，但当一个国王只要具备人的动物本能——一种自动呼吸的能力就行"：

> 英国将派人去荷兰、汉诺威、策尔或布伦瑞克以每年100万的代价请人来，这些被请来的人既不懂英国法律和语言，也不知它的利益所在，他们的能力甚至难以胜任教区巡捕，而英国将因此嘲弄自己，这一天，竟不会太远了。

他问道："这些人还留着做什么用？"

> 官吏、养老金领取者、大内侍从、御厨总管、库物总管和其他名份的老爷们能够找到许多理由来表明君主就等于是他们的俸禄，这笔开支来自国家。但是，如果我去问农民、制造业者、商人、生意人……普通劳动者：君主为他做了些什么，他无法给我任何回答。如果我问他君主是什么，他相信那是一种类似于某种挂名闲职的东西。

一般而言的世袭制也遭到同样的漠视："世袭的统治者像世袭的作家一样不合逻辑。"

所有这些都是亵渎（还具有某些胆大包天的意味）。潘恩甚至将神圣的《权利法案》说成是"一部错误和侮辱性的法案"。潘恩并不是持有这种想法的第一人，许多18世纪的英国人在私下里也一定持有同样的想法。他是第一个敢于以这样的大不敬的精神表达自己想法的人，他用一本书打破了持续百年之久的禁忌。但是潘恩的作为远不止这些。首先，他倾向于一种国家理

论和阶级权力的理论，尽管其方式显得混乱而模糊。在《常识》中，潘恩跟着洛克将政府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罪恶"。在18世纪90年代，洛克那模棱两可的学说似乎分为两半，一半是伯克，另一半是潘恩。伯克以经验和传统来看待政府、考察其运作；潘恩则为被统治者说话，认为政府的权威来自征服，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加以继承。阶级大致可定义为："这个国家的人属于两个明确的阶级，即缴税者阶级和收锐者及吃税者阶级。"至于宪政，从中得到好处的有：

> 廷臣、官吏、养老金领取者、选邑持有人和政党领袖……，但它对于这个国家99%的人来说只有坏处。

这还引起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冲突，"当富人掠夺穷人的权利时，这就为穷人树立了去抢夺富人财产的榜样"。[2] 按照这一论点，政府成为宫廷的寄生物，税收是一种掠夺形式，其目的是为年金领取者和征服性战争服务，而"整个世俗政府就由每个市镇和乡村的人民通过教区官员、市镇官员、每季开审的地方法庭、陪审团和巡回法庭等方法，毫不费事地转让给了所谓政府的那个东西"。因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近似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所需要的与其说是改革，倒不如说是取消政府，"正式的政府一经取消，社会立即开始起作用"。

93

在另一方面，代表制度成为政府，"社会"就通过它起作用，从而展示出新的前景，当潘恩撰写《人权论》第2部中至关重要的第5章时，这些前景突然在他的心中燃起火焰。在赞美了工商业、抨击了殖民统治(后来还建议用国际仲裁来取代战争)、谴责了刑法("司法残暴")、痛斥了封闭性的特许状、特许公司和专

---

[2] 以上这三段文字引自潘恩：《致演说者的信》(1792)，第19、29、69页。其余的均引自《人权论》。

卖权并宣称反对税收重赋之后，他停下来专门声讨土地贵族的罪恶：

为什么……伯克先生把上院说成是土地利益集团的支柱？如果这根支柱陷入地下，原来的土地财产将继续存在，相同的耕作、播种和收割将继续进行。贵族并不是在土地上劳动的农民，而只是地租的消费者……

这使他提出意义深远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建议：削减政府、陆军和海军的费用；减免税金和济贫税；开征累进所得税（年收入2.3万镑时每镑的税收额提高到20先令[㉙]）以增加税收；将征收和节省的资金用于改善穷人的状况。他提议设立家庭补助金：为所有儿童提供普及教育的公共基金，设立养老金——“不是作为恩赐和恩惠，而是作为权利”，（因为领取者只是领回他所交纳税金的一部分）、产妇津贴、新婚夫妇津贴、贫困者丧葬津贴以及在伦敦建造工场和宿舍以帮助移民和失业者：

通过实施这个计划，济贫法那种折磨人民的工具就会被废弃。……垂死的穷人将不再沦为各教区的牺牲品，在离开人世前被从一个地方拖到另一地方。寡妇将会得到抚养孩子的生活费……孩子将不再被视作增加父母亲痛苦的负担。……由苦难和贫困造成的轻罪数目将会下降。穷人和富人将会乐于支持政府。暴乱和骚动的原因及其所造成的恐惧将会消失。你们这些悠闲度日、吃穿不愁的人……你们想过这些事情吗？

这是潘恩的最杰出之处。《人权论》第1部的成功是巨大的，而第2部的成功却是非凡的。正是在第2部里，尤其是在这些段落里，潘恩在辉格党共和派的旧传统与设菲尔德刃具匠、诺

㉙ 20先令即1镑。——译注

里季织工和伦敦手工工匠的激进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这些建议,改革与他们日常经济上的困境联系起来。无论潘恩在财政方面的计算是多么的脱离现实,但这些建议给整个改革宣传注入了创见性的新动力。如果说卡特莱特少校所提出的关于男子普选权的具体要求为后来100年的鼓动打下了基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论》为女性开创了更长久的斗争纪元),那么潘恩在这一章里就为20世纪的社会立法提供了源泉。

也许除了有关“社会”的这一章外,其余的思想观点几乎都不是他最早提出的。威廉·布莱克作出了这样的评论:“像潘恩那样沉湎于精力旺盛的才华之中的人决不是观察家”。潘恩给予英国人的是激进平等主义的新口号,它触及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最深层的反应,渗进了城市劳动人民的亚政治态度。科贝特不是一个真正的潘恩派,欧文和早期社会主义者也提出了新的思想,但潘恩的传统强烈地贯穿于19世纪的大众报刊中,其撰搞人包括伍勒、卡莱尔、赫瑟林顿、沃森、洛维特、霍利约克、雷诺兹和布拉德洛。潘恩思想在19世纪80年代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但他的传统和口号仍在布莱奇福德身上、在劳合—乔治对大众的呼吁中具有活力。我们几乎可以断言潘恩创立了一个新的体系,激进主义在近100年中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它之清晰与明确的程度,与它所取而代之的立宪主义不差丝毫。

这个体系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对君主制和世袭原则的蔑视:

> 我不赞同君主的和贵族的政府,而不管它们如何改头换面。世袭的差别和等级的特权集团……必然会阻碍人类的进步。因而,我不是一个英国宪法的赞赏者。

95

这些文字恰恰出于华滋华斯的笔下,时间为1793年。此外,华

滋华斯那追溯过去的诗句最充分地重现了革命年代的乐观主义。在与博普伊一起散步时，他遇到了一个“被饿坏了的”乡村女孩——

……看见这情景我的朋友
激动地说道：“这与我们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
相背离，”我和他都相信
宽容精神还在国外
它也许无法抵御，贫穷
和诸如此类的悲惨现象会很快
不复存在，我们会看到大地
实现其愿望，给那些
终日辛劳的温顺、卑微和坚忍的孩子以补偿，
所有机构永远废除
法律上的歧视，铲除
愚蠢的虚饰、淫荡的奢侈
和残忍的权力，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少数人的统治；
最后，最为重要的是
将会看到人民拥有强大的力量
制订自己的法律，全人类更美好的日子
就会到来。

这种乐观主义（是华滋华斯很快就失去的）然而正是激进主义所固执追逐的，其基础就是潘恩未能停下来加以考察的那个前提，即毫无保留地相信代议制度、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普通大众中“大量处于休眠状态的意识”（潘恩语）和“人要不是被政府腐蚀的话，那么人与人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朋友，其本质自身并不具有邪恶的性质”的信条。所有这些都是以一种不妥协的、鲁莽的甚至是过于自信的腔调来表达的，还加上自学成才者对传统和教

育机构的不信任(潘恩的一个熟人评论说:“他把他自己的所有著作都熟记在心,其余的著作一概不知。”)以及靠一点经验并唤起“常识”来回避复杂的理论问题的倾向。

这种乐观主义的力量和弱点在 19 世纪工人激进主义中多次重复出现。但是,潘恩的著述并非特意以工人为对象,未将他们与农民、商人和专业人员区别开来。他的学说适于在“成员无数”中进行宣传,但没有对富人的财产权和自由放任学说提出挑战。很显然,他本人隶属于没有代表权的制造业和商业阶级,属于像托马斯·沃克和霍尔克罗夫特这样一些人的阵营,属于宪法知识会而不是伦敦通讯会。他的累进所得税主张预示了更深远的关于财产再分配的概念,但这是针对土地贵族的,在这一点上,长子继承权习俗中包含的世袭原则使潘恩很反感。在政治民主方面,他希望消除所有世袭的差别和特权,但是他并不支持经济上的平均化。在政治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拥有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在经济社会中,每个人必须保留雇主或雇员的身份,国家不应对一个人的资本或另一个人的工资加以干涉。《人权论》和《国富论》应互为补充,从对方汲取养料。在这个问题上,19 世纪工人激进主义的主要传统还是取自潘恩。有些时候,如当欧文主义和宪章运动达到高潮时,其他传统占据了支配地位。但每当潘恩的思想恢复元气后,其基础依然完好无损。贵族是主要的打击对象,他们的财产会受到威胁,甚至连土地国有化或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及他们的地租都被视作始自“一个法国杂种”和他的“武装匪徒”的一种封建勒索。但是,无论工会成员如何艰苦地与其雇主进行斗争,工业资本仍被认为是事业的成果,不受政治干预。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工人阶级激进主义仍基本上局限于这个体系之内。

96

潘恩对 19 世纪传统的另一个贡献是造就了真正的潘恩派,

如卡莱尔、詹姆士·沃森或霍利约克，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潘恩在《人权论》中写道："我的宗教是行善"，就此打住，未作解释。但是他将自己视为权利的斗士，对抗"这个捏造和政治迷信、神秘和勾心斗角的时代"，因此他以《理性时代》作为他最后一部著作就顺理成章了，这本书是对国家的宗教和种种形式的教士权
97 术进行的连续抨击，他不是作为无神论者，而是作为自然神论者进行写作。1793 年，他在法国断头台的阴影下写下了《理性时代》第 1 部，其中从创世行动和自然本身中看到了上帝存在的证据，号召用理性去反对神秘、奇迹和预言。该书于 1795 年在英国出版，出版人丹尼尔·艾萨克·伊顿因他的出版活动至少受到 7 次起诉，到 1812 年已被关押过 15 个月并宣布 3 年内不受法律保护。《理性时代》尽管笔调尖刻，但书中几乎不包含任何使 18 世纪自然神论者和先进的惟一神论者感到吃惊的内容。只有潘恩所求助的广大读者及他名字的巨大权威性是该书的新颖之处。第 2 部于 1796 年出版(出版者仍是勇敢无畏的伊顿)[26]，它抨击了《旧约》的伦理道德观和《新约》的真实性。这篇批判《圣经》的檄文写得杂乱无章。

我曾通读……《圣经》，就像一个肩扛斧头的人穿越树林去伐树。树倒了，假如教士们做得到，他们可以去重新种起来。他们也许可以把树插在地上，但决不能使它再生长。

必须言明的是：木头还有其他用处。布莱克承认潘恩所持论点的力量和攻击性，用他那独到的简洁语言复述说：

他认为《圣经》只是国家的花招，人民从那里只能看到

---

[26] 伊顿于 1811 年出版了"第 3 部"，1812 年当他年届花甲时又被处以监禁 18 个月加枷刑。T. S. 豪厄尔：《国家审判集》(1823)，第 31 卷，第 927 页起。

> 他的始终处于无力挣脱的地位。另一个论点认为所有对《圣经》作评论的人都是不诚实、诡计多端的无赖，他们为获取优裕的生活而接受国家的宗教……我可以列出 100 个这种人的名字。

但是，潘恩却不能将《圣经》的任何一部分当作"一首也许不会发生的诗"（布莱克语）来读。在镇压年代里，《理性时代》对于潘恩在英国的许多信徒来说是"一柄制造分裂的剑"。一些身为非国教徒或卫斯理宗教徒的雅各宾分子抱怨潘恩的这本书，认为它给他们的敌人提供了重新攻击"无神论者"和"共和主义者"的机会。当局认为潘恩这一次冒犯比以往几次更恶劣：他找来生活舒适的惟一神派教士和吉本怀疑论的矫饰言词，将它们译成通俗易懂、富有挑衅性的英语，再将它们扔给那些辨别能力不高的 98 人。他对《圣经》的权威性大加嘲讽，所用论点连矿工或乡村女孩都听得懂：

> 他们称之为耶稣基督的那个人，据说是由一个幽灵通过一个已订婚、后又结婚的女子之身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幽灵叫作圣灵。在这个愚蠢的故事讲了 700 年之后，他们又说这个女子是处女。……难道说现在有哪一个怀了孩子的女子会说……她的孩子是幽灵给的，而且是一个天使告诉她这回事的，她会相信吗？

当我们考察教会和主日学校在这一时期反复灌输的不开化的和罪恶的迷信时，[35] 我们可以看到潘恩的著作对许多人的心灵具有深刻的解放作用。它帮助人们从宗教顺从的泥潭中挣脱出来，这种宗教顺从会加强对市政官员和雇主的顺从。它还促使许多 19 世纪手工工匠坚定不移地走上思想的自立和探索之路。

---

[35] 见本书，第 11 章。

但是,潘恩的“理性”所存在的局限性也必须记住,它能言善辩又缺乏丰富的想象,这使我们想起布莱克关于“眼光片面”的指责。潘恩在《圣经》中只能看到“一个潦倒的纵欲者的孤独影像……他回首凝视再也无法享受的场面,大喊道:**万物皆空**! 大量的比喻和感情都含糊不清……”。

《理性时代》并不是惟一一本有关19世纪理性思想的原始资料集。18世纪90年代,许多其他论文和译作(伏尔泰、霍尔巴赫和卢梭等人著作的节译)在英国雅各宾派圈子中流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沃尔内的《帝国之墟》,这是比较宗教学的开创性著作,比潘恩的著作更深刻、更有想像力。而且,沃尔内对教士权术演变的讥讽与对政治专制主义发展的讥讽结合起来,在该书的结论中,沃尔内提出了更普遍的宽容概念和国际主义概念,这也是潘恩所不如的。与威廉·戈德温的《政治正义论》(1793)不同,那本书的影响仅限于狭小的高层知识圈;[②] 而沃尔内的《帝国之墟》出版了便宜的袖珍本,许多19世纪手工工匠的藏书中都有这本书。《帝国之墟》的第15章是对“新时代”的展望,时常以单行本的形式流传。在这一章里,叙事者看到一个文明的民族决意将自身分为两个群体:一边是那些“用有价值的劳动为社会的维持和延续作出贡献”的人,另一边是他们的敌人。绝大多数人在第一个群体之中,他们中有“农业工人、手工工匠、小生意人和所有从事有益于社会的职业者”,第二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一个没有价值的派别”,“只有教士、廷臣、政府会计、军队指挥官,总之是政府在行政、军事和宗教方面的代理人”。两个

99

② 戈德温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只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才传到工人阶级那里,当时的主要传播渠道是对理查德·卡莱尔的海盗版雪莱作品《麦布女王》所作的注释。

群体进行了一场对话：

人民：……你们为社会付出了哪些劳动？

特权阶级：没有。我们不是为劳动而来到人世的。

人民：那么你们是如何获取财富的？

特权阶级：通过劳神去统治你们。

人民：统治我们！……我们辛劳，你们享受；我们生产，你们挥霍；财富从我们这里流出，落入你们的手中。特权者们，你们这个有别于人民的阶级，另建一个国家，统治你们自己去吧。

特权阶级中有几个人站到了人民的一边(作者这样想象)，其余的人试图动用军队恐吓人民，但士兵放下武器说道："我们是人民的一部分。"特权阶级又试图用教士来欺骗人民，遭到人民断然回击："廷臣和教士们，你们的服务过于昂贵，因而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由于翻译的奇异影响，沃尔内的观点在英文中比法文原文显得更为激进；寄生的贵族阶层或等级的概念变为更带普遍性的富有闲散的"阶级"。战后，激进主义的社会学说就要由此而产生，它将社会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有用的"或"生产的阶级"，另一部分是廷臣、闲职官员、证券持有人、投机商和寄生的中间人。[28]

然而，沃尔内的影响产生较迟。在18世纪90年代初，潘恩左右了大众激进主义。事实上，他那善辩又缺乏想像力的思想造成了这场运动的狭隘性，当革命的法国国民公会经由恐怖变为波拿巴专政时，理想幻灭的改革派对此(以及戈德温更不切实 100 际的幻想)大加嘲讽。这种批判和嘲讽来自伯克、华滋华斯、柯勒律治等人联合的天才能力，结果就支配了许多当代学者的判

---

[28] 尤其要参见韦德和《女怪》的讨论，本书第770页起。

断力，而他们本身在过去的25年中，也经历了类似的革命理想幻灭的过程。

肯定无疑的是，戈德温和潘恩的一些信徒持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救世主般的心态，这使他们能够接受容易得出的（最终是使人幻灭的）关于人类可臻完善的概念：

> 啊，潘恩！只有上帝高于你，千千万万的人为了他们仅存的一点自由而多么无限感激你……。亚历山大们、恺撒们、斐迪南们、卡佩们、腓特烈们、约瑟夫们和叶卡特琳娜们……拼命地奴役人类。但是，留给你做的是……在欧洲摇摇欲坠的巴士底狱之上挥舞人权的神圣旗帜，砸碎千千万万的人脚上的专制主义镣铐，摧毁为千千万万的尚未出世的人准备的……压迫之枷锁。㉒

这样的心态总是在革命激情时期存在。但是，如果说雅各宾"极权主义"的神话适用于英国土壤的话，我们有必要用最浅显的事实来加以戳穿。潘恩和他在英国的追随者们并没有鼓吹杀绝他们的反对派，而是号召人们反对泰伯恩刑场和血腥的刑法。英国雅各宾派赞同国际主义，要求用仲裁代替战争，希望宽容非国教徒、天主教徒和理性思想者；主张在"异教徒、土耳其人和犹太人"身上发现人类的美德。他们寻求通过教育和宣传将"暴民"（潘恩语）由"派别的追随者"改造为"普遍自由的追随者"。

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英国某些雅各宾派的教条理论和肤浅道德实验论的谴责，其思想在华滋华斯《远足》第3部中得到最显著的反映。这些时常是"左派"的缺陷。潘恩几乎没有历史感，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并不深刻，而他的乐观主义（"我不相信君

㉒ 奥斯坦德的公民兰道尔：《政治问答手册》(1795)，第8页。

主制和贵族制会在任何一个欧洲启蒙国家中存在7年之上")使20世纪的人感到厌烦。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对辉格党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解释所作的反应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一些学者在令人可笑地鼓吹要把历史的角色颠倒过来：受迫害者被视作压迫的先驱，而压迫者却成了迫害的牺牲品。因此，我们迫不得已才一一列举这些基本事实：是潘恩将"开放社会"的思想自由表达作为其信念："人类现在不应再被告知他们不应思考、不应阅读"；也是潘恩在18世纪关于宪政的辩论中看到"民族总是被置于问题之外"，由于要把"民族"列入问题之内，他注定要启动那些他既无法控制又无法预见的力量，而这就是民主之所在。

101

第五章　栽培自由之树

现在,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打量一下托马斯·哈迪和他的同伴们。1792年1月,他们在埃克斯特街的“钟声酒吧”碰头。我们绕了这么大的圈子,是为了打破存在于18世纪与19世纪之间,存在于工人阶级骚动史与这个国家其他阶级文化思想史之间的那道万里长城。18世纪90年代发生在英国的事过多地被视作仅仅是巴士底狱风暴的反射。[1] 但是,由法国的样板作用而加速发展的那些因素——非国教的和自由主义的传统,早在英国历史中存在。18世纪90年代的骚动尽管只持续了五年(1792—1796年),但它的意义却尤为广泛深远。这场骚动改变了人民的亚政治态度,影响了阶级组合,并首创了延续到这个世纪的传统。虽然法国的事件激发和煽起了这次骚动,但它并不是一场与法国有关的骚动,而是一场争取英国民主的英国骚动,其范围之广给人以深刻的印象。[2]

法国样板击破的那道闸门是立宪主义,但时间是在1792年而不是1789年,而且流人的洪水是汤姆·潘恩。要了解这一点,

---

① 至于人民结社,见G.S.维奇:《议会改革的起源》(1913);W.P.霍尔:《英国激进主义,1791—1797》(纽约,1912);和P.A.布朗:《法国革命在英国历史上》(1918)。另见J.德尚:《不列颠岛与法国大革命》(布鲁塞尔,1949);H.柯林斯:《伦敦通讯会》,载《民主与工人运动》(1954),J.萨维尔编;W.A.L.西曼:《法国大革命中的英国民主协会》(未发表的博士论文,伦敦,1954)。

② 当然,争取爱尔兰独立和苏格兰民主的骚动以更激烈的形式进行。见H.W.米克尔:《苏格兰与法国大革命》(格拉斯哥,1912);R.B.马登:《联合爱尔兰人》(1842—1846)。

可以看一下1792年下半年英格兰北部的形势。夏季，陆军大臣已认为形势十分严峻，有必要派副官前去巡视，以摸清军队的部署情况以及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军队的可靠程度。在设菲尔德，他“发现潘恩的煽动性学说和那些竭力扰乱国家安宁的派别分子所施展的影响已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他看到设菲尔德有一个“他们策划所有煽动性阴谋的中心”，2500名“最下层的机匠”加入了主要的改革协会(宪法会)。 103

> 在这里，他们阅读言辞最激烈的出版物，对这些出版物及协会的信件进行讨论，他们的信件不仅发给分布在附近城镇乡村的下属协会，也发给分布在王国其他地区的协会……③

1792年秋冬时分，威尔伯福斯(约克郡议员)从不同渠道收到令人惊愕的报告，怀威尔写给他的信中谈了“达勒姆郡下层人民的状况”：

> 伯纳德城堡中有大量的人对宪法表示不满，诸如“不要国王”、“自由”和“平等”这样的口号写在市场十字路口。不久前希尔兹和桑德兰的船工骚乱时，他们向兰布顿将军问道：“你读过汤姆·潘恩的小书吗？”“没读过。”“那么就读读它，我们很喜欢它。将军，你拥有大量财产，我们很快就会把它瓜分掉。”④

11月份，有一个人从北希尔兹直接写信给皮特，用近乎惊慌失措的笔调描述了海员的罢工和暴乱(“又及：令人震惊的是，暴民抓获了一些不大情愿与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海员和高级职员，正强迫他们一丝不挂地走在队伍前面游街示众”)：

---

③ 引自A.阿斯皮诺尔：《早期英国工会》(1949)，第4—5页。

④ R.I.与S.威尔伯福斯：《威廉·威尔伯福斯传》(1838)，第2卷，第2页。

我环顾四周，看到这个国家充斥着成千上万的矿工、船工、车夫和其他工人。这些蛮家伙满脑子装满平等的新学说，国家到处布满了干柴，一点火星就能引起熊熊大火。我不得不认为地方官员的懈怠是应受到严厉指责的。⑤

一位有声望的人从利兹写给威尔伯福斯的信中谈到"潘恩的那本毒书……被缩写成6便士小册子，大量售出和散发。……你可以在屋内我的雇工的衣柜中看到这些书。士兵们都受到了影响。"威尔伯福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国家的状况看来十分危急"，他还告诉利兹那位信友："我想向坎特伯雷大主教提议……确定某一天为斋日和蒙耻日。"但从利兹传来了好消息：一群效忠国王的人在街上举行示威。

举着戳在棍尖上的汤姆·潘恩的模拟像，后面有一个人握着套在模拟像脖子上的绳索，并用赶车用的鞭子不停地抽打它。最后，模拟像在市场焚烧，市场的大钟缓慢地敲响。……每个人的脸上露出了微笑……街道上回响着"上帝拯救国王"的口号声……⑥

但是，设菲尔德的街道上却出现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场面。人们在11月底举行游行庆祝法国军队的瓦尔密大捷，当地一份支持改革派的周报《设菲尔德纪事报》对此作了报道(1792年11月30日)：在枪炮的轰鸣中，一支由五六千人组成的游行队伍拖着一头被切开的烤牛走过街道。队伍中有——

一幅漫画，画的是不列颠女神——伯克骑在一头猪身

⑤ 1792年11月3日鲍迪奇致皮特信，内政部档案，第42.22号。

⑥ 威尔伯福斯前引书，第2卷，第1—5页。

上——还有一个人上身酷似某位苏格兰来的大臣，[7]
下身是驴……自由之柱倒在地上，断成数块，上面刻有
"真理是诽谤"的字样——阳光从云缝中投射出来，和
平天使的一只手抛下《人权论》，伸出另一只手举起不
列颠女神。

"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冥顽不化的一群恶棍"，一位持有敌意的旁观者这样说道。

这里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即矿工、船工、整布工和刀匠。不仅外滨和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和杂工（他们那五彩斑斓、喧嚣尘上的示威经常用来支持威尔克斯），而且全国城乡的所有工人都在为自己要求普遍的权利。正是这——而不是法国的恐怖，使有产者阶级惊慌失措。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人权论》出版前后的事，就可以看清这一点。第一个大众团体直到攻陷巴士底狱两年多以后才组成。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中的一般倾向是对法国革命最初发生的事表示欢迎，甚至连传统主义者也宣称法国终于迟缓地向英国的"混合政体"概念看齐。非国教徒，尤其是普赖斯法师是最早利用法国样板的人，他们的做法是：援引英国的类似事件、援引从光荣革命取得的权利，对本国的"首席执政官"进行清算。要求停止剥夺非国教徒的权利（"宣誓法"及"市镇团法"）的宣传在1789至1790年的冬季达到高潮，在这场斗争（以及相反的斗争）造成的情绪激昂的氛围中，改革派的第一批外省"宪法会"和敌对贵族的第一批"教会与国王"俱乐部成立了。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斥责普赖斯法师的一本书）是即将出现全面反应的第一个重要迹象，该书的问世先于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和针

105

⑦ 内政大臣亨利·邓达斯。

对反革命分子的第一次恐怖行动。确实，伯克激昂的论点使许多立场不坚定的改革派（皮特和伯克本人也曾是这种人）感到突然，甚至连传统主义者也是如此。如前所述，1791 年夏发生在伯明翰的"教会与国王"派暴乱几乎不属于"法国革命"时代。尽管发动暴乱的借口是巴士底狱纪念日的庆祝晚宴，但是雅各宾派和反雅各宾派的宣传都未能深入民众。从 1792 年 5 月起，威尔伯福斯所描述的那种利兹式的反雅各宾示威组织得更好了，示威者中掺进了更多的生活不得意者和无自立能力者，而且更公开地具有恐吓下层改革派的倾向。

然而，伯明翰暴乱标志着一个过渡阶段。[8] 当局明显地参与在内而且感到满足，这使改革派非常愤怒，使他们态度更加坚定，改革派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庆祝巴士底狱的陷落，但没有发生恶性事件。暴乱还以一种讨厌的方式为改革派的活动作宣传，而这时，又恰是《人权论》的第 1 部正在赢得民众的心。兰开郡的官员发觉了由伯明翰事件造成的"普遍敌意"，并将它与"各种工人和工匠中的联合意向相联系，他们对一切法律控制都表示不满。[9] 在伦敦，也许是为了对伯明翰事件作出反应，曾是威尔克斯副手的霍恩·图克在 8 月主持了"普遍和平与自由之友特别会议"，会议在茅屋酒馆举行，以传单形式发表了《致词与宣言》，直截了当地指出英国与法国榜样间的关联。

106

事态在 1791 至 1792 年的冬季加快了，当时伦敦和外省成立了好几个改革派协会。1792 年 2 月，含有重要"社会"一章的

⑧ 暴乱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扼制了此后伯明翰激进运动的发展，假如不是因为暴乱，拥有大量小业主和工匠的伯明翰也许会与诺里季和设菲尔德一起成为主要的雅各宾中心。

⑨ 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 1 页。

《人权论》第2部出版。3月，宪法知识会重组，[10] 霍恩·图克是主要人物，他将在改革各派之间充当积极的联络人。4月，辉格党的一批贵族和议员创立了排他性的"人民之友会"，该会目标之一是抵消潘恩极端的非宪政主义，而它最大的贡献就是发表一个委员会报告，其中以费边主义式的彻底性调查了议会的代表制情况、腐败情况和受人摆布的情况。1792年5月，一项禁止煽动性出版物的国王公告颁布实施，它尤其是针对潘恩而来的。那一年的夏天，奥俄军队开进法国；法国国王和王后被捕，第一场打击旧政权支持者的恐怖行动开始了。(法国)国民公会于9月开会，宣布当年为共和元年。11月，约翰·里夫斯创建了他的反雅各宾协会。12月，潘恩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本人缺席)，《人权论》被定为煽动诽谤之书。1793年1月，法王路易被处决，2月，英国和法国开战。

像这样把事情平平地串在一起会使人误解，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1792年2月到1793年2月这12个月中的戏剧性变化。这一年初，皮特很有信心地期望和平会持续"15年"；6个多月之后，他仍然希望英国在保持中立的情况下从法国动乱中渔利。 107
1792年5月的公告表明政府方面对潘恩派的宣传首次真正感到惊慌，但这仍被视作一个纯内政问题。三个因素改变了局势：第一是9月大屠杀后法国革命的迅速激进化。第二是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扩张主义狂热对英国利益和欧洲外交均势构成直接威胁。第三则是法国的革命激情与英国日益增强的雅各宾激进运动之间出现合流的危险迹象。1792年11月，法国国民公会向

[10] 这里指伦敦(或全国性的)宪法知识会，该会在各郡设有分会。外省(如设菲尔德、曼彻斯特和德比)的宪法会与伦敦保持通信联系，通常既与伦敦通讯会也与宪法知识会通信，但它们是独立创建独立运作的。

各国人民颁布了著名的"博爱与援助"法令。在同一个月的稍后时刻，来自伦敦和苏格兰的友好代表团出席(法国)国民公会，国民公会的一位委员(格雷瓜尔)预祝新的共和国将很快会在泰晤士河畔崛起，而正在法国流亡的潘恩则被加莱市选为国民公会代表。犹豫不决的吉伦特派的扩张主义政策到12月时在萨瓦、莱茵兰、尼斯和比利时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响彻四方的口号是："向宫廷开战，给茅舍以和平"。真正开战的时机(处决法王路易和控制斯凯尔特河)在这12个月结束时出现了，而这段时间里，皮特已由一个主张经济紧缩、和平和微小改革的首相变成欧洲反革命力量的外交设计师。[1] 这种变化并不只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是遍及一个阶级；贵族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变了，后者曾在皮特身上看到了实现经济合理化和谨慎的政治改革的希望。

这些因素中的第三个因素——英国民主骚动的深刻性和激烈性，一直受到普遍的轻视。英国有产者的惊恐和反革命攻势在法王被捕和法国9月屠杀的数月之前就已开始，而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当局的每个部门都在运用一切手段大肆宣扬断头台的受难者和法国流亡者的苦难，这不仅是出于震惊和怜悯，而且也许主要的是用来对抗英国雅各宾派的宣传。

应该说，《人权论》第2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一般都承认(1793年一本小册子)的估计是：到那一年为止，售出总数

---

[1] 见G.莱弗布赫：《法国革命》(1962)，第274—283页。

达20万册，而当时的人口是1000万。[12] 在宪法知识会和地方协会的资助下，第2部很快出版了6便士版本。汉娜·莫尔抱怨道："造反、不忠和邪恶的支持者们费尽全力把那些有害的小册子驮上驴背，然后不仅在茅舍和路边卸下来，并且运进矿山煤窑"。[13] 据说在设菲尔德，"所有刀匠"人手一册。在纽卡斯尔（斯塔福德郡），据说潘恩的书"几乎每人手握一本"，陶工帮工们更是如此。"这个人口稠密的地区中有2/3以上的人做好闹事的准备，下层居民尤为突出"。[14] 潘恩的书流传到康沃尔的锡矿，门迪普的村庄和苏格兰高地，不久以后又流传到爱尔兰大部分地区。一封信的作者抱怨道："威尔士的北部地区

> 到处都是卫斯理宗巡回传教士，他们详细宣讲《人权论》，攻击国王政府。[15]

一位英格兰的作者在信中写道："这本书现在与《鲁滨逊漂流记》和《天路历程》一样，变成了这个国家的必读之书。"[16]

在对潘恩作缺席审判时，总检查官抱怨道：《人权论》被"塞

108

---

⑫ 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售价3先令，前两年售出3万册。《人权论》第1部售价也是3先令，1791年售出5万册，到1802年，潘恩自称两部的发行数为40至50万册，到1809年据称为150万册，但这个数字包括爱尔兰的巨额售出数和欧洲的译本数。尽管R.D.奥尔蒂克告诫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本非文学书籍……曾达到如此一个发行量"，但我倾向于接受在1791至1793年间，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共售出20万册这个数字（两卷总数，并包括地方俱乐部发行的节选本）。见《英国普通读者》(1957年)，第69—73页。

⑬ W.罗伯茨：《汉娜·莫尔女士回忆录》(1834)，第2卷，第424—425页。

⑭ 1792年11月22日J.马西信，内政部档案，第42.22号；F.奈特：《托马斯·沃克怪案》(1957)，第117页。

⑮ "俱乐部备忘录"，1792年11月22日，内政部档案，第42.22号。至于威尔士的雅各宾主义，见D.戴维斯：《法国革命对于威尔士生活和文学的影响》（卡马森，1926）和M.P.琼斯：《格兰高斯的约翰·琼斯》，载《威尔士协会会报》(1909—1910)。

⑯ 1792年11月30日本杰明·沃恩信，内政部档案，第42.22号。

到各式臣民手中，甚至用来包装孩子们的糖果”。邓达斯解释道：“当大工业城镇中有大量的人倾向于接受和传播有害的学说时”，1792 年 5 月国王公告的颁布是有道理的，他明确宣称，廉价的节选本加剧了危害性。全国各地都召开了精心筹划的会议支持这个公告，地方官员和教士发表效忠演讲谴责潘恩，乡绅们组成协会以“维护古老英格兰的光荣宪法不受侵害”。一本肆意谩骂攻击潘恩的小册子在特许经费的资助下印行 22000 本。[17]潘恩写了言语犀利的《复函》来回击越来越强烈的攻击，其中与贵族的“人民之友会”论辩，嘲弄将请愿作为改革途径的做法。

> 我认为通过向议会请愿来改革议会是一种陈腐不堪的老生常谈，这个国家已对此感到厌恶。……权利以及对于这种权利的行使只属于民族，合适的途径是召开一个由全体人民选举的国民公会。[18]

由于海峡另一侧的国王因国民公会的缘故而被投入大狱，所以这是具有革命性的言论。但在这封《复函》出版之前，潘恩本人就为逃避逮捕跑到海峡另一边去了。他的临行赠言是“共和国元年 11 月 11 日从巴黎”发出致总检查官的信，以便在他的审判上宣读。（他说）对他的裁决意味着对“虚构之人”的裁决，将表明这实际上是对英国人民权利的裁决。

> 先生，在这个时候玩弄司法起诉是极为严峻之事。……这里已出现的可怕先例应引起你这样人的重视，不到一年前，那些人还感到他们是平安无恙的，当时他们的想法和现在在英国起诉别人的法官、陪审团

[17] 1792—1793 年冬季印行，见 A. 阿斯皮诺尔：《政治与出版》(1949)，第 152—153 页。

[18] 潘恩前引书，第 56 页。出版《复函》的伊顿受到起诉，但被一个友善的陪审团（在这一次）宣告无罪。

> 和总检查官完全一样。自政府问世以来，英国政府在欺诈和腐败方面如果说还未登峰造极，那么也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了，你对此不可能不知道。……你（或者是我）是否会相信像教皇党先生或他那些不肖之子所具有的才能对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呢？[19]

但是，甚至在潘恩采用如此激烈的腔调之前，他的著作就已成为区分改革派中不同侧重点的试金石了。贵族的“人民之友”竭力 110 想证明他们对1688年解决的忠诚，切断他们与任何有关国民公会方案的联系以及与潘恩的“飘忽不定的妄言”的联系，因为这些妄言“企图激起标新立异的精神，对这种精神，任何智慧都无法预见其结果，任何技能都无法指引其方向”（1792年5月）。[20] 克里斯托弗·怀威尔是约克郡一位绅士改革派，他发表《为普赖斯法师辩护》（1791）一书驳斥伯克，但他在书中还是对潘恩的著作感到惋惜，因为它试图“挑动最下等阶级的人民以暴力和非公正的方式行事”，由此造成“有害的影响”。[21] 在《人权论》第2部出版之后，怀威尔的语调强硬起来。在他和全国范围内的温和改革派进行通信时，他运用他的巨大影响敦促他们进行一次反宣传，以减弱“潘恩先生那不合时宜和有害主张”的影响。1792年4月，他还敦促伦敦宪法知识会断绝与“大众派”的联系。

> 由于潘恩先生……主张用富人的余财作为穷人的年金，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反对他那无法无天学说的极端危险倾向……

潘恩将政治要求与经济要求相联系，造成更尖锐的阶级对抗精

---

⑲ 全文发表在约瑟夫·格尼的《托马斯·潘恩审判案》（1793）中。

⑳ 怀威尔：《政治文件》，第3卷，附录，第154—155页。

㉑ 同上书，第3卷，附录，第67—68页。怀威尔反对对潘恩作任何起诉，这是值得称赞的。

神，这无疑使怀威尔最为震惊。“对公众事业不幸的是，”他在1792年5月给设菲尔德一位绅士的信中写道，“潘恩先生采取如此违宪的立场，在下等阶级人民中建立了以共和国为目的的政党，其手法是向他们描述抢劫富人的前景”。[22]

怀威尔在伦敦宪法知识会内（潘恩本人也是会员）的支持者不如潘恩派人多，该会曾正式欢迎《人权论》第1部的出版，与此同时又通过一项决议确定对混合宪政表示支持（1791年3月和5月）。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里，温和派败下阵来，让位于毫不妥协的卡特莱特少校、具有机会主义观点同时又有冒险精神的霍恩·图克、雅各宾派律师约翰·弗罗斯特和潘恩的最亲密小圈子。戏剧家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在给戈德温的信中欣喜地写道：“赞美你啊，新耶路撒冷，千年盛世，将和平和永恒之福赋予潘恩精神吧。”该会于1792年初春进行改组，潘恩的追随者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人权论》第2部，尤其是有关“社会的主张”受到正式的欢迎，协会提出更有生气的鼓动政策。图克和弗罗斯特协助哈迪筹组伦敦通讯会，它自己的通信范围也扩大到各郡的协会和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5月）；传单、小册子和潘恩著作的廉价版本得到出版，协会还为潘恩出庭辩护征集民众筹款。约翰·弗罗斯特以该会代表的身份于1792年11月和12月前往巴黎，出席了对法王的审判。伦敦通讯会以及曼彻斯特、诺里季和设菲尔德通讯会均表达了对潘恩的支持；博尔顿年轻的商人、一神教信徒托马斯·库珀是颇有才华的宣传家，他对《人权论》第2部的问世欣喜若狂：“它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迷恋于政治。这本书满篇皆是真知灼见……尖刻抨击之处屡屡出现，更使该书增色不少。我认为该书真是一部精品……伯

111

---

[22] 怀威尔：《政治文件》，第5卷，第1、23—24、51页。

克再无还手之力,已被该书击垮了。"[23]

1792年是汤姆·潘恩极为风光的一年,在这12个月中,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书流传到不列颠岛的各个角落,那是一块试金石,将绅士改革派和辉格党贵族与那人数少但寻求同工人和工匠结成同盟、欢迎潘恩有关社会和经济的主张、希望建立共和国的激进制造商和专业人员区分开来。皮特经过长期的拖延终于作出起诉潘恩的决定,这标志着镇压时代的开始。在宣布潘恩不受法律保护(和查禁《人权论》)之前和同时,当局以执著的努力与改革派交锋。潘恩在1792年夏写给沃克的信中说:"既然我们已开始动手,那就不能停下来,要继续出版廉价出版物,这将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会使宫廷老爷们晕头转向,因为这是他们所不熟悉的东西。"[24] 但是,"宫廷老爷"也使他们的出版物具有进攻性,在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中开动"发条"。里夫斯的"保护财产反对共和主义者及平等派协会"的出现,正好巩固加强了为对付大众团体而建立的大量地方官员和绅士的协会,这些协会在1792至1793年冬季企图重新使用暴民的暴力手段,而一年前,这种手段在伯明翰很有效。1792年12月,一群醉醺醺的暴民在有人指使下袭击托马斯·沃克在曼彻斯特的住宅,沃克和他的支持者朝天开枪,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相同的伎俩也在一次竞选中使用",沃克写道,"他们从各个酒馆中网罗酒徒,然后上街游行,由一个横冲直撞的家伙领头,手举一块写着'教会与国王'的标语牌。"[25] 112

"火药阴谋节"式的反潘恩游行在全国各地发动,这种游行

---

[23] 引自奈特前引书,第63—64页。

[24] 布兰查德·杰罗尔德:《原文录》(1874),第41页。

[25] 沃克前引书,第55页。另见奈特前引书中的绝妙叙述,以及A.普伦蒂斯:《曼彻斯特简史》(1851),第419页起。

与威尔伯福斯从利兹得到报告的那种情形相同。彭宁山区一个名叫里本登的纺织小镇上有一位富裕律师，他在1793年1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道：他付给"举着潘恩模拟像并向它射击的人10先令6便士。"[26] 赫克蒙德怀克的一个磨坊主扮作潘恩，他让自己在煤窑里阅读《人权论》时被"发现"，然后他的面具被套在一个用稻草扎的模拟像上，拖着绕村庄示众和"处决"。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人们费了很大力气用大锤将潘恩的木模拟像砸成碎块，抡锤人的双手都震出了血。[27] 1792年12月，

> 在十分庄严的气氛中，托马斯·潘恩的模拟像被用雪橇从林肯城堡运到绞架下，然后在众多的旁观者面前吊了起来。按常规吊了一段时间后，模拟像被运到城堡山上，吊在事先专门设置的示众架上。到了晚上，模拟像下燃起大火，在成百上千人的欢呼声中，在一个庞大的乐队演奏《上帝拯救国王》的乐曲声里，模拟像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

里夫斯协会的分会甚至在像布里格和凯斯特这种小市镇上也有113 建立，其目标（以凯斯特分会为例）包括提高"警惕，采取行动，揪出那些家伙绳之以法，这些家伙出版和散布煽动性的传单和著作，参加非法协会活动或策划阴谋，企图破坏公众的安宁……"[28]

如果说《人权论》的散发是全国性的话，那么反雅各宾协会

㉖ J.H.普里斯特利：《约翰·豪沃恩律师》，载《哈利法克斯古物协会会报》，1949年。

㉗ 弗兰克·皮尔：《斯彭谷地——过去与现在》（赫克蒙德怀克，1839），第307—308页。

㉘ 《斯坦福信使报》，1792年12月8日，1793年1月11日。我对雷克斯·拉塞尔先生提供的资料来源表示感谢。

的发展也是这样。因而,英国的革命势头在几乎还没有开始积聚力量之前,就暴露在反革命进攻面前,而且这种进攻得到当局财力物力的支持。乔治·勒费弗尔写道:

> 因此,每当人们闹事时,整个欧洲的领导人都认为必须使这些闹事者按照传统所教导的那样清醒过来。法国革命的成功,使得其边界以外的事态沿着与确保法国成功的事件刚好相反的方向发展。[29]

但是,这些精心组织的效忠游行,不论暂时的贿赂和放纵使它们如何显得深入人心,却越来越显示出人为的迹象。每一堆焚烧潘恩模拟像的大火都以不自觉的方式指明了乡绅的宪法和人民的权利之间的分歧。"教会与国王"派的行动,反映偏见对异己集团的乱砍乱伐,而较多地表现出这是一场政治内战中的前哨战。托马斯·沃克驱散了攻击他的暴民,这些暴民是"最无原则性派别的可怜工具",如果让人们自己管自己的事,"所有人……都将会守本份,或者依我之见,这些作为人民一分子的暴民会与我们站在一起。"[30]

沃克说的对不对? 在所有问题中,这是最难回答的。我们必须再简要地叙述一下此后两年的事。

在民众情绪的每次大变化之后,冷凝和收缩的现象总会发生。这种现象在 1793 年开头几个月中有所加强,其原因有三,即处决法王、战争开始和着手起诉改革者。在改革者中,有非国教牧师威廉·温特博特姆,他仅仅由于一次布道而入狱四年,而布道的内容几乎没有超出由普赖斯法师广为传播的有关君主责任的观点;还有约翰·弗罗斯特律师,他被处以枷刑和监禁一年 114

㉙ 勒费弗尔前引书,第 187 页。

㉚ 奈特前引书,第 101、105 页。

半，其表面上的罪名是在玛丽莱本一家咖啡馆发表的言论："我主张平等。……嗨，不要国王！"而真正的原因是他以英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法国国民公会。纽沃克一个名叫霍尔特的印刷工由于重印了宪法知识会早先的一份宣言而坐了四年牢。莱斯特的书商理查德·菲利普斯因出版同情改革的《莱斯特先驱报》而被囚禁一年半，他表面上的罪名是出售《人权论》。许多不知名的人也遭到各种不同的骚扰。当局还想尽办法十分成功地在人民团体中安插了奸细。早在1792年秋，186名曼彻斯特酒馆业主就签署了一项宣言，拒绝将他们的房间用作"任何形式的俱乐部或协会……有一种倾向是企图采取那些该死的家伙所极为渴望采取的行动，即毁灭这个国家"。有人登门警告那些没有签署这项宣言的酒馆主说，他们的执照将不予延期。柜台上的行会招牌上写着："本店概不接待雅各宾分子"。曼彻斯特改革协会的书记在写给伦敦通讯会的信中说："这个城市中的改革之敌竭尽全力遏制崇高的自由精神……。"[31]

同样的半非法形式的恐吓也在伦敦运用，伦敦通讯会的各个分会被从一家家的酒馆中逐出。"刹时间，从朴次茅斯到纽卡斯尔、从斯旺西到切姆斯福德的几乎每一个城镇中，政府都采取了清查异端邪说的行动。"[32] 伊普斯维奇的官员驱散了一个啤酒馆中"由特别下贱的人组成的""辩论俱乐部"；威尔特郡的一

---

[31] 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0A(3)号。A. 普伦蒂斯：《曼彻斯特简史》(1851)，第7—8页。关于类似的对付莱斯特酒馆主的行动，见A. 坦普尔·帕特森：《激进的莱斯特》(莱斯特，1954)，第71页。关于各郡起诉的情况，见R. 菲利普斯：《〈莱斯特先驱报〉等登载的原始文件》(莱斯特高尔，1793)；《面包师亚历山大·怀特审判录》(纽卡斯尔，1793)；丹尼尔·霍尔特：《〈纽沃克先驱报〉印刷商的行为与原则的辩白》(纽沃克，1794)。

[32] P.A. 布朗前引书，第85页。

名小学校长因"发表反叛言论"而被解雇；在北安普顿郡的乡村中挨家挨户的效忠游说广泛进行。各个地区都派驻了密探，巡视各书店，对任何出售《人权论》的人提出起诉。至少有一名不识字的广告张贴工因张贴了拥护改革的传单而被监禁。

国外事态的发展也未能使英国雅各宾派的日子好过一点。毫无疑问，从一开始就不得人心的对法战争重新唤起了人民中间长期存在的反法传统。每一次新的处决都作了大量详尽的报道：9 月屠杀、处决法王、处决玛丽·安托瓦妮特，这些都加强了这种反法情感。在 1793 年 9 月，潘恩的朋友吉伦特派也被逐出国民公会，该派领袖被送上断头台。而在 1793 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潘恩本人也在卢森堡被投入监狱。这些经历在有思想的一代人中引起最初的深刻幻灭感，华滋华斯就是其典型代表，他们曾以热烈和乌托邦的方式将其信仰与法国的事业视为一体，1792 年出现的那种知识分子与下层改革派之间的团结再未出现过。 115

在 1794 年，战争狂热进一步升温。人们组成志愿军团，向公众募捐，传统集市变成了阅兵的好时机。政府对报刊的津贴增加，影响也增加，通俗的反雅各宾传单成倍增长，在埃克斯特流传的一份传单写道：

> ……至于那些不喜欢……现存**宪法**的人，让他们罪有应得：上**绞架**和**暴尸**，再架火焚烧。但不是对**潘恩**那样只烧他的模拟像，而是烧他们的身体。对此，每一颗效忠的心灵都会说"阿门"。

在伯明翰，一个名叫"乔布·诺特"的庸俗下流的小册子撰写者对改革派说道：

> 给我滚开——去想想新断头机——你也许会被记在《新门监狱日志》上——流刑也许能将你变变样子——

应当好好抬举你——你见过新断头机吗?

里夫斯的协会在伦敦各教区中影响最大,于是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调查。在圣安妮,一本教区记录簿上记载了"居民和外来人的肤色、年龄和行业等"。在圣詹姆士,居民被召集起来谴责所有"不负责任"、不愿责成其仆人、雇工和学徒在效忠宪法的宣言上签字的家长。未经里夫斯的人鉴定的手工工人不得被雇佣,酒馆主若不举报"可疑者"就拿不到执照。里夫斯委员会的成员强制为军队征集法兰绒马甲,并将此作为检验是否效忠的辅助方式。后来又从征集马甲扩大到征集"连指手套、内裤、帽子、衬衫、威尔士平纹棉布、袜子、鞋子、长裤、靴子、床单、大衣、睡衣、裙子、毯子……"③

116

战争期间如此规模的清除异端邪说的行动并不能证明异端邪说的广泛存在。"效忠主义"在这样的时刻总是认定"反叛"的存在,即便只把它作为一种陪衬也好。但是,大量涌现的文章、布道以及对偏僻区域的雅各宾派成员的攻击却表明:其中不仅仅是"战争狂热",或有产阶级的一种负罪或不安感,其中必另有所含。1794 年 4 月,一伙手持短棒的粗汉在去罗伊登的途中路过米德尔顿时恐吓年轻的塞缪尔·班福德——用谩骂、砸碎玻璃窗来对待"潘恩派"。他们捣毁"轻骑手"酒馆,改革派当时正在这里开会,在场的人均遭殴打。与此同时,家住在离现场仅几十码之外的地方官拒绝走出家门干预,教区牧师则站在小土坡上为这伙暴徒指认逃跑者:"那边有一个。……那是个雅各宾分

---

③ 这一段中的某些例子引自一本匿名小册子《和平与改革——反对战争和腐败》(1794)。关于反雅各宾派的出版物(包括乔布·诺特的小册子),另见 R.K.韦布:《英国工人读者》(1955),第 41—51 页;M.J.琼斯:《汉娜·莫尔》(剑桥,1952),第 6 章。

子,还有一个!"[34] 看起来,当局似乎感受到了群众观点上的某些变化,那是一种情绪上的隐蔽变化——虽不会把英吉利民族变为潘恩派或雅各宾派,但会使它倾向于容纳和容忍煽动分子。某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足以使所有"易燃物"大火冲天,所以,必须对改革者加以监视和恐吓,必须用怀疑的目光将那些协会孤立和包围起来,必须激起无知者的偏见并赋予其合法性,尤其是对那些与下层改革派有联系、又能够接触印刷业、书店、讲坛或演讲台的专业人员更要加以恐吓。

不清晰者的态度或穷人情感结构中这种显著变化可以在人们不曾预料之处得到证实。在 1793 和 1794 年,突然出现了对千年王国的幻想,其规模是 17 世纪以来最大的。霍尔克罗夫特的"新耶路撒冷"是一个理性的奇想,布莱克的"耶路撒冷"是一种幻像(尽管千年王国派对他的影响比评论家们所注意到的要更大些),穷人和老实巴交之辈却发现理查德·布拉泽斯是一个更直率的预言家,布拉泽斯是一名领取半薪的退役海军上校。他的《预言所揭露的知识与时代》于 1794 年初出版。他的预言综合了对上帝意图的精深了解和启示录的一般内容,所用语言也是将穷人非国教中的"易燃物"和革命时代的"易燃物"合二为一:

> 所有民族都沉浸在对巴比伦妓女的愤怒之中,地球上的国王与她私通,而地球上的商人因她的倾城美貌而发财……

他的幻像之一是"一条流经伦敦的、宽阔的河沾满人血",他预测伦敦将于某一天毁灭,是日恰逢极其猛烈的雷暴雨。约翰·宾斯在去伦敦通讯会参加会议的途中到一家啤酒馆避雨,他在那里

---

[34] 班福德:《早年岁月》(1893),第 55—56 页。

(饶有兴致而又惊奇地)发现人们正在等待毁灭的到来。[35] 一会儿之后，布拉泽斯宣布只是由于他本人在最后一分钟干预的结果，伦敦才免去此劫难。由于他十分明显地施展了对上帝的影响，他的信徒瞬间便翻了一番。

有一本8页篇幅的小册子，它是否得到布拉泽斯的授权尚不清楚，小册子名为《布拉泽斯对于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的预测……：预言教皇的倒台；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德意志发生的革命；本国和他国某些重要人物的去世，以及令人可畏的饥荒、瘟疫和地震……》。书中说：英国将出现“巨大的悲哀和痛苦，并与难以言状的欢乐交汇在一起”，“骄横者和显贵们将会一落千丈，甚至会蒙受奇耻大辱。正义者和穷人们将在恶人的废墟上兴盛起来，宫殿将会是……，茅舍将会是……。”至于饥荒、瘟疫和地震，显然它们都是隐喻：

> 饥荒将要毁灭的只是西班牙毛虫，瘟疫将要扫除吞噬工业成果的蝗虫，而地震将要埋葬魔鬼般的海中怪兽。在这一切发生时，贫穷者、诚实者、善良者和爱国者将会欣喜欢呼。

118 “法国必将再次流血，但流出的只是肮脏之血。”“意大利将把反基督者从宝座上掀下来……。”土耳其与俄国将陷入战争，最后以土耳其政府、伊斯兰教信仰、俄罗斯帝国和希腊教会的毁灭而告终。在这些显示仁慈的征兆之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时代将到来。“所有人就像是一个民族，都是一条心。……基督教徒、土耳其人以及异教徒将不再是区别人的界线”：

> 时候到了，巴比伦妓女正在倒下，将不会再爬起来。永恒光明的子孙们，向前进，启迪愚昧和黑暗的子孙

---

[35] 宾斯前引书，第47—48页。

们。……

这样，不会再有战争，不会再有短缺，不会再有邪恶。一切都将安宁、富足和美好。

布拉泽斯的影响也许比人们所认为的要大得多。[36] 他的一些含义不明确的预言好像都兑现了。每当法国军队获胜时，人们便会想起这些预言。伦敦通讯会的会员时常拜访他，他们也许甚至会鼓励他。一位议员已准备好为布拉泽斯预测力的真实性作证(这已屡见不鲜)。著名的雕刻家、政治改革家威廉·夏普成了他的信徒。枢密院视布拉泽斯若芒刺在背，于1795年3月将他逮捕，在此后几年里将他囚禁在一个精神病院中。像利兹的乔治·特纳这样的追随者们直到世纪之交时仍在努力要求释放他(威胁道：如果预言家依然被囚禁的话，他们就要毁掉伦敦)，这样，他们就为更狂热的乔安娜·索思科特崇拜铺平了道路。[37] 对立的预言流派壮大起来，许多人在《启示录》中一遍遍搜索，而卫斯理宗和浸礼会的牧师们则努力消除这种新的异端。1798年，一个"真正浸礼会"的传教士与他在诺里季、威斯贝克和利物浦等地穷人中的教徒进行比试，从《启示录》中寻找根据反驳其证据，要他们不要与魔鬼靠得太近，而要回到精神的朝圣路途上来：

119

当人类处在尘世和政治交往的状态中时，基督的信条并不能使他们亲如兄弟。它召唤个人脱离尘世，只将他们视为地上的陌路人和进香客。一个基督徒，如果去干涉宪法的事，那就……像一个旅行者，正忙着去见

[36] 见塞西尔·罗思：《上帝之侄》(1933)；G. R. 巴莱恩：《过去揭秘》(1956)，第4章；R. 骚塞：《唐·曼纽尔·阿尔瓦雷斯发自英国的信》(1808)，第3章，第223页起。

[37] G. 特纳：《发给全世界的号召》(利兹，1800)。关于乔安娜·索思科特，见下文第382—387页。

他在远方的妻子和家人，那里应当是他的全部幸福所依托之处，而他竟在他所经过的每一个城镇、村庄干涉别人的内部规则……

千年王国被肯定放在死后出现，到那时：

高贵者和下贱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将处于同一个完善的水平上。放纵的暴君和贫穷的百姓、身缠万贯的贵族和一文不名的乞丐都接受平等而公正的审判……⑧

出现在威斯贝克和利物浦的千年王国精神反映了一种反抗的情绪，当局将这种情绪诋毁为“标新立异的精神”，它还反映了轻信者不甚明确的社会乐观主义，它与更复杂的革命理想是同一类东西。彭斯写道：“为了那个世界，它正在降临；如果兄弟们为那个世界而奋斗，到那时全世界将坦诚相处。”“人惟有亲如兄弟才能生存，”布莱克也附和道。同样的精神是他自己写的“预言书”和关于耶路撒冷的美好憧憬的着重点：

在心灵交流之中，
我在每块土地上行走，
共同建设耶路撒冷，
大家心连心手拉手。

无论这种精神是以梦幻的或是迷信的形式出现，它都是“理性时代”到来时的一种离奇的矛盾现象。但是，在观点的变动和新理想的孕育方面，它也许和潘恩的论述一样具有持久的影响。

那些经受住了1793年开头几个月的打击和政治迫害的群

---

⑧ S.费希尔：《上帝之国的一致与平等》（诺里季，1798）；《基督徒的告诫》（威斯贝克，1798）。

众团体也许是对1792年乐观精神的证明。1792年就牢固建立的团体守住了它们的大部分阵地，甚至改进了其组织。伦敦、设菲尔德、诺里季，也许还有德比和诺丁汉的情况就是如此。大部分协会的会员有所减少，许多有影响的中等阶级支持者也撤回了他们的支持。曼彻斯特协会因托马斯·沃克抗击暴民保卫住宅正在等待涉嫌反叛罪的审判而大大削弱了；莱斯特的菲利普斯被投入监狱，当地宪法知识会也就解散了。但在这两个中心城镇，更平民化的协会在其受人尊敬的母协会失势之后继续存在。（曼彻斯特的地盘由沃克的宪法会和改革爱国会分享，后者据称由"最下等阶级的技工"组成。）[39] 120

设菲尔德协会是最强大的协会，1792年时在册会员接近2000名，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4月，该会通过了一系列言辞直率的、谴责战争的决议；5月，该会宣称它为一项全国性的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请愿书征集到了近1万个签名。诺里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非国教徒堡垒，拥有大量的小雇主和手工工人，这些人有强烈的独立传统。也许，诺里季在地位上还超过设菲尔德，是雅各宾主义最重要的地方中心，尽管有关当地运动的档案资料还不够完备。1792年8月，当诺里季革命会资助《人权论》出一个廉价本时，它宣布拥有48个附属俱乐部。该会到10月又宣布它的"合伙兄弟"已不少于2000人。[40] 在1793年3月，诺里季仍是小规模俱乐部环绕的中心，市内有"30至40个独立的协会"，"此外乡村中还有许多协会"。[41] 但是，6月寄给伦敦通

---

[39] 备忘录载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035号。沃克的同案犯包括来自这些协会的手工工匠：染纸匠威廉·保尔、制帽匠詹姆士·奇塔姆、织工奥立弗·皮尔索尔。见J.格尼：《T.沃克等人审判案》(1794)，附录，第122—126页。

[40] 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0A(3)号。

[41] 《秘密委员会报告》(1794)，第140页。

讯会信函的语调却表明他们遇到了困难：

……当我们考虑到用了多少汗水、辛劳和多么忍饥挨饿来支持它时，我们怎能被说服？但地主和商人们策划了一个奴役人民的诡计，因为他们就像吃面包似的吞噬人民。贵族和统治集团的影响变得十分令人惊恐，因为他们榨干和吞噬了人民。然而一个传说正从南方传来，这使暴君们感到胆颤心惊。[42]

伦敦的情况较难确定。战争开始后，宪法知识会大大衰落了，直到1793年秋季，其活动基本上限于通过正式决议的范围。伦敦通讯会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在1792年的最后几个月，该会曾宣称拥有数千名会员，1793年1月（据一名密探在哈迪受审时的证词），该会采取措施，拨经费给斯皮特费尔兹分会和莫尔费尔兹分会，以支付会议室的租金。这两个分会尽管财政拮据，“但其会员数目相当于其他分会的总和”。不过在9月，事态表明有必要对莫尔费尔兹分会和另一个“位于瘸子拐林地……十分暴烈的”分会进行改组。在全国请愿方面，尽管委员会很努力（约瑟夫·杰拉尔德在高等（债务）监狱中征集到200名犯人的签名画押），但伦敦通讯会仅征集到6000个签名。[43] 1793年5月30日，（据密探说）“哈迪先生提议中止活动3个月，该提议被否决。”7月，哈迪在给利兹新成立的宪法会写信时颇为自信地说：“我们已在对抗有地位、有年金者方面站稳了脚跟”：

我们在议会中受到辱骂，在公共场合受到中伤，在私下里受到迫害，在酒馆中受到骚扰，但是我们继续频繁地

---

[42] 同上，第150页。“南方”可读作“法国”。

[43] 一份奸细报告〔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0A(3)号〕列出了在1793年4月的29个分会，其中至少有16个分会积极征集签名。

开会，完好无损……而且我们的信条使众多的人改变信仰……[44]

这种信心并不是盲目的，因为在夏季，明显地恢复了与外省的通信，旧的协会恢复活动，新的协会建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是伦敦通讯会而不是宪法知识会占据了核心地位。伯明翰一个于1792年最后几个月中成立的协会在初夏时谨慎地扩展其活动，受到不同寻常的欢迎，"贵会会员人数的增加将很快洗刷掉由'教会与国王派'暴民非正义的行动所强加在贵城头上的耻辱"。利兹一个由"一伙贫穷的技工"组成的新协会要求与伦敦宪法知识会建立"兄弟般的关系"，

贵族暴正[政]和对民主的忽视好像要吞没利兹城，达到了使人害怕的地步。总地来说，我们被看成更像魔鬼，而不像人民的朋友。我相信在过去的6个月中，人民中那个无知的部分(由于贵族和教士的暗示)以为我们会扑向他们，把他们毁掉。……我们的会员数达到近200名，而且还在不断增多……

122

7月，赫德福德郡和图克斯伯里的新组织写信给伦敦通讯会。图克斯伯里的书记本人签字时用了这样的词语："你们的同胞、光荣的自由事业的合作者"，他描述了何以——

焚烧托马斯·潘恩的模拟像和现在这场战争的幸运影响会比大部分有力的论点对事业的好处更大。自由的朋友人数增加，探索的精神四处传播，令人惊叹不已，连老妇人都在谈论政治。

8月，伦敦通讯会恢复与德比、斯托克波特、曼彻斯特、诺丁汉和

---

[44] 《秘密委员会报告》(1794)，第152、154页。坦普尔法学会学人：《托马斯·哈迪审判案》(1794)，第142、144页。F.奈特前引书，第134页。

考文垂等地协会的通信联系，要求它们“指出比邮局更安全的传递我们信件的方式”，而且还提出要求，希望它们采用通讯会的名称，组建一个“统一协会”（暂不实行）。该会的会议记录表明它的会议到会人多、安排有序，成立了新的分会并接纳了新的会员。[45]

群众团体经受了第一场风暴，但它们重新出现时，侧重点和调子都有了明显的变化。潘恩的名字放到了后面，他那率直的共和主义的调子也变成了重新强调恢复宪政的“纯洁性”。（1793 年 6 月，伦敦通讯会走得是如此之远，以致用 1688 年的解决方法来看待宪政。）但是，在当局显然已打算对任何超越此范围的言论予以起诉之时，这种改变就必不可少了，而另一方面，镇压行动又导致这些协会更加激进。首先，步伐正在予以调整，但不是在伦敦，而是在苏格兰、设菲尔德和诺里季。其次，当几个坚定的专业人士如约瑟夫·杰拉尔德、莫里斯·马格罗特和约翰·瑟尔沃尔等与诸如哈迪和巴克斯特这样的手工工人在伦敦发挥领导作用时，1793 年参加协会的多数改革派却是些手工工匠、挣工资者、小业主和小商贩。他们现在反复强调两个新的主题，一是经济上的苦难及纠正它的社会方法，二是模仿法国的组织形式和发表宣言的形式。

123

如果我们可以从哈迪保留的会议记录中加以判断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位卓有能力、态度认真的组织者，是那些数十名跟随他的志愿工作人员所推崇的光辉榜样。根据宾斯所述，哈迪“衣着朴素，谈吐直率，从不摆架子，也不装腔作势”。伦敦通讯会的一位主席莫里斯·马格罗特是酒商的儿子，他的很多童年时光是

---

[45] 《秘密委员会报告》(1794)，第 148—157 页。伦敦通讯会会议记录，附加手稿，第 27812 号。

在葡萄牙和瑞士度过的,(在瑞士时,曾就学于日内瓦大学)有时被称为"法国人"。他精力充沛、胆识过人,但深深染上了英国雅各宾派的特有恶习——自吹自擂。[46] 约瑟夫·杰拉尔德和约翰·瑟尔沃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具有全国领袖和理论家的气质,杰拉尔德是塞缪尔·帕尔博士的高足(帕尔素有"辉格党的约翰逊"和西部学术前辈之称),是他最有力地宣传了潘恩的危险主张,即召集英国改革派的国民公会。[47] 正是这种改革者大联合的威胁和一种甚至更为严重的、日益加强的威胁(英格兰、苏格兰的改革派和联合爱尔兰人的结盟)促使政府下决心采取行动。

当局的困境是立宪主义的自身矛盾造成的。当法律足以使地方官员作出即刻定罪的时候,国王的司法官员们却迟迟不愿作出重要起诉。有关煽动的法律不明确,总检查官面临的选择是可按叛国罪起诉,也可以提出较轻的煽动诽谤罪指控。福克斯的《诽谤法》于 1792 年开头几个月的温和时期生效,使陪审团既是案件也是案情的裁决人。这也许是福克斯为普通人民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上述法案是在镇压浪潮到来之前的最后时刻通过的。[48] 因此,英国政府面临着重重障碍:法律不明确;陪审团制度(它两次裁定丹尼尔·伊顿无罪,1794 年裁定托马斯·沃克无罪,使当局丢了面子)的存在;有一个人数不多但十分出色的福克斯反对派,其中包括大律师托马斯·厄斯金(他在几次 124

[46] 见《英国人物传记》中的记载;宾斯前引书,第 42 页;M. 罗:《莫里斯·马格罗特——两个半球上的激进分子》,载《历史研究院院刊》,第 31 期,(1958),第 68 页。

[47] 见约瑟夫·杰拉尔德,《国民公会——惟一能使我们避免毁灭的途径》(1793),第 111 页起;亨利·柯林斯:《伦敦通讯会》,载萨维尔:《民主与工人运动》(1954),第 117—118 页。关于瑟尔沃尔,见后文第 157—160 页。

[48] 该法案于 1792 年 5 月 21 日在上院三读通过,打击煽动性著说的公告在同一天颁布。大法官瑟洛勋爵说它预示了"英格兰法律的混乱和毁灭"。

审判中指导辩护工作)；以及公众舆论中填满了立宪主义的口号，它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抗击任何侵犯个人自由的行为。

但苏格兰法律并不相同。这里的法官很温顺或有党派偏见，陪审员也可以从容地加以挑选。而且，这里的苏格兰“人民之友会”在1792年12月召开了国民公会。1793至1794年苏格兰的审判不仅针对很有活力的苏格兰雅各宾派协会，而且也针对英格兰的协会。第一次打击发生在1793年8月，最有才华的苏格兰领导人托马斯·米尔在一次恶意中伤的虚假审判之后被判处14年流刑。法官布拉克斯菲尔德的举止比起诉本身更为恶毒，他对一位从法官席后面走过的陪审员小声说道：“喂，霍纳少爷，帮我们绞死这些该死的恶棍。”在向陪审团提交的指控中，他提到米尔的能力，和“在无知的乡下佬和下等阶级中”进行宣传挑拨，“使他们扔下活计不干”：

> 米尔先生也许本来就知道根本不用把这些乌合之众放在眼里。他们有什么权利要求得到代表权？……政府……应当像一个社团。而在这个国家里，它是由土地利益集团组成的，只有这个利益集团才拥有代表权。

他告诉陪审团一个“不须予以证实的”事实：“英国宪政是自创世以来最好的宪政，要使它更好是不可能的”。他的那些有学问的法官同事们颇有同感，其中一位(斯温顿勋爵)认为煽动罪包括“谋杀、抢劫、抢夺、纵火等各种罪行。……如果要寻找与罪行相当的惩罚的话，这不可能在我们的法律中找到，因为严刑已被幸运地废除了。”[49] 第二次打击在9月份，当时在邓迪任牧师的帕尔默在珀斯受审。帕尔默是一名英格兰惟一神教派牧师、剑桥

---

[49] 科伯恩勋爵前引书，第1卷，第175页起。另见米克尔前引书，第6卷；《托马斯·米尔的生平和审判》(鲁瑟格伦，1919)。

大学女王学院成员。他的“罪行”是鼓励人们阅读潘恩的著作，参加邓迪自由之友会(被说成是“下等织工和技工的”协会)而成为会员。法官席上假慈悲的人“以最轻的量刑”判处帕尔默去波塔尼湾服7年流刑时流下了大把的鳄鱼泪。 125

这就是两个有才华的专业人员的例子，他们都愿意无保留地与平民改革派合作。这两人都极为顽强地经受住审判，保持了尊严。苏格兰改革派在这些审判的威胁下也没有被吓倒，看起来他们有可能通过与英格兰的协会保持更紧密的团结而使自己得到某种保护，因而敦促尽早召开国民公会。哈迪、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都表示同意，会议通知提前两个多星期发出，定于在爱丁堡开会。伦敦通讯会指定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为代表，于1793年10月24日在哈克内举行其首次露天集会，确认这项指定。数千名支持者参加了这次集会，到场的还有一些好奇者，他们由于听到了法国雅各宾派已经登陆或“汤姆·潘恩就要来种植自由之树”这样的谣言而被吸引到会场来。大会记录忠实地记载了投票决定的代表开支标准(来回旅费10镑、旅途费4镑，在爱丁堡每日生活费9先令)。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协会在严厉催促下筹集这笔“经费”。然而，这笔经费最后竟足够把他们的代表送到澳大利亚去。

会议通知发得过于急促，地方上的协会来不及筹集款项派出代表。设菲尔德的协会是个例外。11月1日，该会发了一封带有嘲讽语气的信给伦敦宪法知识会，对其按兵不动提出批评：

> 这个国家中名列前茅的协会，诸如“伦敦宪法知识会”和“人民之友会”，他们以爱国自诩，但到目前为止只是以某种程度的冷漠去看待兄弟国家中最近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是与……自由的宪法完全对立的，正如水火一样不相容……。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乡下人将它

们视为楷模,……我们几乎就要动这个念头:是掐下那些自由花蕾的时候了,……以免它们面临在严霜下枯萎的危险。……

设菲尔德的协会指定布朗为其代表赴爱丁堡,他是一名"演艺人",后来改行当律师,他还受托代表利兹协会。诺里季各协会授权马格罗特作为其代表,并提供"费用"。苏格兰的审判、法国在瓦朗西安的胜利、价格和失业率的上升以及召开一次国民公会的现实威胁造成一种新的沮丧气氛。伯明翰协会对无力派出一名代表感到抱歉:

> 皮特先生的屈辱战争几乎完全毁掉了这座城市的生计,迫使大批本城最优秀的居民和技工横渡大西洋。……然而,总的来说,这已沉重地打击了骄狂,消除了怨恨,挫败了改革的敌人的许多伎俩……并使许多人改变信仰,投身于自由事业。

设菲尔德协会也感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影响:

> 我们拥有数千名会员,但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这场战争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失业,而且几乎每个人的收入也下降了**一半**。在这个王国中,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跌得更惨。[50]

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完全明白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他们在把精神团结的"援助"抢送给他们的苏格兰同志们。要是当时不这么做的话,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运动就会一蹶不振。布莱克斯菲尔德主持的法院像对待米尔和帕尔默那样来对待英格兰人,而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就是在对此提出挑战。援助到得正是时候,爱丁堡的国民公会于10月底简短地召开,然后便在英格兰

---

[50] 《秘密委员会报告》(1794),第160—165页。

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休会。当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抵达之后，国民公会急忙重新召开，会议力量比以前增强。马格罗特、杰拉尔德和苏格兰干事斯克文左右了会议进程，这次会议在 1793 年 11 月最后两个星期一直开会，直到 12 月第一个星期被冲散，其领导人旋即被捕。（在此之前，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向哈迪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提供更多的经费以便能够去造访苏格兰各主要协会。“所有召回我们的借口都是站不住脚的，除非是出于恐惧。我们必须提醒你只有我们才应该害怕而不是你”。）国民公会的进程是温和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仿佛是在做戏。但有一些情况使之更具革命色彩：国民公会毕竟得以召开了，联合爱尔 127 兰人派观察员出席会议，法国式的程序和演讲被使用（尽管“公民”这个术语已在设菲尔德使用了很长时间），它在爱丁堡的亲法气氛中出现。会议记录所用的年号是“英国国民公会元年”，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其条款在后来的审判上引起争论），同意在人身保护法中止实行或动用法律手段对付改革派的情况下，立即在一个秘密地点召开紧急国民公会。[51]

随后进行的审判按照对米尔和帕尔默审判的方式进行。斯克文和马格罗特为他们自己所作的无罪辩护十分出色，但他们被判处 14 年流刑。斯克文在离开法庭时说道：“大人们，我知道这两天所做的事将被重新评价，这是我的宽慰，也是所有的希望”。马格罗特出庭时有一队人陪伴着他，他们举着一棵成“M”形的“自由之树”罩在他头上，他做得很夸张，急欲得到殉难者之冠。但是，他大胆地向布莱克斯菲尔德挑战，在受审前的一次晚

[51] 根据起诉书，该决议在其他情况下也适用，其中包括法军在英国登陆。另见“一个与会者”：《英国国民公会……记述》（1794），第 24、34、45 页；米克尔前引书，第 7 章。

宴上，马格罗特夸耀地说他情愿让改革派在服流刑前先受鞭笞，“暴民们流一点血有好处”。科伯恩勋爵(他在马格罗特年幼时见过他)回忆道：“一个个头不高、肤色黝黑的小家伙，身着缀有银白色金属纽扣的黑色服装、长丝袜，有些像人们头脑中弱小法国人的样子，一个最冒失和最会出乱子的孩子”。[32]

约瑟夫·杰拉尔德获保释，返回伦敦向伦敦通讯会作汇报，再处理一些自己的事，然后折回爱丁堡，在1794年3月接受审判。他没有必要这样做——同事朋友们都恳求他利用保释逃走。杰拉尔德在18世纪80年代在西印度群岛留下了病根，所以体质虚弱，流刑可能意味着死刑，后来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争辩说，他的“名誉不是托付”给苏格兰法院，而是托付给那些“由于受我的观点影响而陷入相似危险境地的”社会上地位低下的人们。他只惹了一个麻烦，拒绝用粉把他的头发做成“保王派”的发型，出庭时“头发上没有扑粉，松散地披在脑后，他的颈部几乎完全裸露出来，身穿大翻领衬衫，这是当时的法式服装。”至于其余情况，科伯恩勋爵这样记述道：“从来没有一个犯人的言谈举止与法官们的言谈举止形成如此鲜明的对照”。[33] 当杰拉尔德坚持认为耶稣基督自己是改革派时，布莱克斯菲尔德抿着嘴向当庭的其他法官笑道：“看他在胡诌些什么，他早该绞死。”杰拉尔德曾受过法律方面的训练，他依其他改革派的样子

128

---

[32] 科伯恩前引书，第2卷，第25页。马格罗特擅长做戏的性格在他后来的生平中也得到表现。他在斯比特赫德的囚船上等候流放时，向诺里季发了一封最恳寨的信：“谣言……说海面上有70艘法国船，如果这样的话……其后果也许是一次袭击。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尊贵的朋友，可别放松啾。……”(1794年3月10日，《秘密委员会报告》，第81页)。在途中，他与同船的犯人吵架，其他犯人对他不信任。他是惟一返回英国的流放犯人(于1810年)，然他继续投身于激进政治之中，直到1815年去世。见M.罗：《莫里斯·马格罗特》，同前引书。

[33] 科伯恩前引书，第2卷，第41—43页。

为自己作辩护，在改革派的要求上丝毫未作让步，广泛引用胡克、洛克和布莱克斯通的学说为宣传改革的权利作辩解。这是一个展示立宪主义言论的立宪主义案例：

> **宪法！宪法！**这个词在我们的耳际经久不衰地回响。这是改革的敌人加在轻信和单纯的人们头上的符咒。他们像巫士一样，先将人们镇住，用巫术使人们处于昏沉状态，再见机行事。但是，当官吏和领取年金者的一生都在破坏宪法原则时，我们听他们谈论宪法，就如同听和尚宣传集中居住一样……[54]

布莱克斯菲尔德在向陪审团提出其"指控"时说道："当诸位目睹杰拉尔德先生……像你们今天所听到的这样发表演说时，我认为他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社会成员。因为我敢说他的口才足以教唆人们拿起武器闹事。"杰拉尔德插说道："啾，大人！大人！用这样的口吻跟陪审团说话真是很不适宜呀。……"

杰拉尔德被判刑14年，他和斯克文在到达新南威尔士之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55] 布莱克斯菲尔德和"苏格兰法"的神秘由于这些判决而得到英格兰历史学家的大力称赞，这既是苏格兰司法体系作出的判决，也是英国政府作出的判决。皮特、邓达 129 斯、拉夫伯勒和瑟洛在随后进行的议会辩论中全力为审判过程的所有细节作辩护，邓达斯认为法官们在作出判决时运用了"出色的判断力"；皮特努力挡开福克斯那最具破坏力的进攻，认为法官们假如没有运用其判断力来惩处"如此胆大妄为的违法行

---

[54] 《约瑟夫·杰拉尔德审判案》(爱丁堡，1794)，第197—198、241页。杰拉尔德于18世纪80年代也许在宾夕法尼亚的法院中工作过。见《杰拉尔德审判案》(格拉斯哥，1835)，第4页。

[55] 杰拉尔德在新门和其他伦敦监狱中被囚禁了一年多，我们有理由推断他曾被给于赦免，条件是放弃他的原则。

径”和压制“对这个国家如此危险的学说”的话，他们就“铸下了大错”。（改革派则竭力指出这些学说显然与皮特本人在18世纪80年代所宣扬的学说几乎毫无二致。）而威尔伯福斯“尽管没有看过帕尔默先生的审判记录，但他却嘲讽那种对帕尔默施以人道待遇的主张”，“凭良心说，他不认为应该延缓宣判”。[5]

我们知道，镇压是一把两刃刀。以后10年，人们并不回顾“布莱克斯菲尔德时代”，而是像德昆西那样——回顾“杰拉尔德时代”。汤姆·潘恩在海峡彼岸与国王之敌密谋的形象，也许会引起恐惧或仇恨；但是，一个疾病缠身的人自愿回来接受“审判”，这种形象就不会造成同样的反应。此外，民族偏见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有助于改革派的事业。持温和立场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由于认为这种事可以在苏格兰发生，却不可以在“这里”发生从而减轻了自己的负罪感。“体面的、可尊敬的”英格兰人这种感情上的突变可以通过伊顿被第三次认定无罪（1794年2月）和托马斯·沃克于4月被认定无罪得到反映。它在强度上足以抵消由罗伯斯庇尔恐怖所引起的另一种恐惧感。杰拉尔德和他的同伴们，通过自身的榜样，为拯救哈迪、图克和瑟尔沃尔的生命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他们牺牲了自己，却为英国免受白色恐怖的灾难出了力。

苏格兰受害者们的榜样并没有吓倒英格兰的协会，而是使它们坚强起来。当约翰·弗罗斯特（这一年一直在狱中）于1793年12月19日拖着病体从新门监狱获释出狱时，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被簇拥着穿过伦敦的街道，人群在威尔士亲王的府邸前停下来欢呼雀跃。约翰·瑟尔沃尔此时已取代杰拉尔德成为伦敦通讯会最有才能的理论家，他开设了一系列讲座，为被捕者提供

[5] 有关辩论的出色总结仍载科伯恩前引书，第2卷，第133—149页。

辩护基金。1794 年 1 月 17 日，杰拉尔德（他是两个协会的会员，此时正在保释中）出席了宪法知识会的一个会议（该会已恢复活动），在欢呼声中被选为会议主席，会议通过了一项“以暴政的手段来反对暴政”的决议。杰拉尔德已提醒英格兰改革派：“反对暴君就是服从上帝。”3 天之后，环球酒馆中挤满了参加伦敦通讯会大会的会员，连地板都压塌了。大会提议在英格兰土地上举行新的全英国民公会，约翰·马丁公民以主席身份发表了一篇挑战性的演说： 130

> 我们还在举棋未定。现在我们必须立即为自己和后代选择自由或选择奴役。你们是否要等到兵营遍布每个村庄，等到拿津贴的黑森人或汉诺威人扑向我们之时才采取行动呢？

4 天之后，宪法知识会认定“伦敦通讯会有功于他们的国家”，指令印刷 4 万份该会的宣言予以散发。这份宣言的结果是恢复地方协会的活动，布里斯托尔协会干事在收到宣言后写道：“那天晚上，我尽我力所能地召集到一批朋友，我们阅读，我们兴奋，我们鼓起勇气……。你们的第二封信加强了我们的勇气，振奋了我们的爱国主义……而且，我们现在的会员数已增加了许多。”[57]

信件从其他停止活动的协会寄来。来自纽卡斯尔（很长时间没有音讯）的消息说：当地仍有许多“协会”存在，它们“每星期聚会一次，只接纳熟知的朋友为会员，并只采用报纸名称为其会

---

[57] 《秘密委员会报告》（1794），第 185 页起。约瑟夫·杰拉尔德：《国民公会——使我们免遭毁灭的惟一途径》，第 59 页。《伦敦通讯会宣言……1794 年 1 月 20 日》。约翰·马丁在爱丁堡的托尔布斯写信给马格罗特（1794 年 1 月 22 日）：“协会在士气和数量上都迅速增长，富人们现在开始来到我们中间，高兴地与腰扎皮制围裙的本分人坐在一起。”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 11.3510（B）号。

名"。显然,还有许多其他协会存在或恢复活动,它们与伦敦没有正式的通信联系,比如罗伊斯顿协会和哈里法克斯协会于1794年4月首次来信,对它们的行为中"一直采取的极端谨小慎微"表示歉意:

> 我们希望一般公众知道在这座城镇中、在这个教区里有许多激烈反对……一切自由讨论的人。……目睹这座城镇中一个宣传自由的人被罚款、戴枷或入狱,将使他们感到说不出的愤怒……

131

在同一个月,哈里法克斯举行了一次露天集会,"来自利兹、韦克菲尔德、哈德斯菲尔德、布拉德福德和附近地区的许多朋友"参加了集会。到场者赞同(在布里斯托尔)举行一次代表大会和国民公会的计划。在莱斯特,酒馆里开办了几家俱乐部,并举办"民主讲座"。在伦敦,伦敦通讯会和宪法知识会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以召开国民公会,尽管宪法知识会要求使用其他会议名称。4月,一次成功的露天集会在白垩农场举行,瑟尔沃尔和其他人发表了演说,所通过的决议认为任何进一步试图"破坏那些尚存法律的行为……应被视作是彻底废除英吉利民族与其统治者之间社会契约之举"。[53]

这不仅是镇压、而且也是价格上涨和经济困难所造成的后果。某些证据表明,鼓动活动深入到伦敦东区的贫困地段。10月份,哈克尼的集会还是一件新鲜事,而弗朗西斯·普雷斯已经回顾说:乔克农场集会的参加者"人数众多……,各行各业的男女都有……,这是我所见到的秩序最为井然的一次……,尽管他

---

[53] 《秘密委员会报告》(1794),第185—189页;《哈里法克斯宪法会一次集会的记述》(哈里法克斯,1794);P.A.布朗前引书,第111—117页;A.坦普尔·帕特森前引书,第74页。

们受到弓街巡捕和各种警官、政府密探和记者的侮辱和寻衅，他们是有思想有理智的人”。[59] 也是在4月，设菲尔德举行了一次有六七千人（改革派声称有12000人）参加的集会，抗议苏格兰法院的判决。来自德比的亨利·约克主持集会。约克是一位十分年轻、口才出众但反复无常的绅士，他期望有一天“全体人民的威严声音将指使圣斯蒂芬教堂的558位绅士如何去干他们的事”。“醉汉们在夜里”袭击了设菲尔德改革派人士的住宅，协会干事戴维森于是提出一项计划，打算发“长矛给爱国者，数量要足以使他们令人可畏”。在后来对哈迪和约克的审判中，这一点被大肆渲染。起诉书将它作为打算谋反的证据，辩方证人否认这一点，或指出这充其量也不过是针对“教会与国王”派暴徒的自卫意图。事实上，以上这两种意图在各协会中也许均存在。在爱丁堡，由英国国民公会残存下来的一个委员会仍在举行秘密会议，它在一个原政府密探罗伯特·瓦特的控制下度过了险关。他们制造了几把矛头和战斧，瓦特在临终忏悔中宣称他已改变立场投身改革事业，计划在爱丁堡、都柏林和伦敦同时举行起义。无论瓦特的动机如何，数十名苏格兰织工和手工工人深深卷入他的密谋之中。[60]

132

在皮特于1794年5月对各协会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的局势就是如此。袭击后，伦敦宪法知识会和伦敦通讯会的领导人被捕入狱，他们的书信文件被查缴，议会任命了一个秘密委员会对

---

[59] 附加手稿，第27814号。这些集会有助于确立重要的先例，因为在未经当局同意、不是为向议会请愿的情况下由普通人民召集公共集会的合法性还不够确定。见杰夫森前引书，第1卷，第277页。

[60] 《哈迪审判案》，各处；《亨利·约克审判案》（1795），第26、80—81页；《罗伯特·瓦特审判案》（爱丁堡，1795），第353页；米克尔前引书，第150—153页；《罗伯特·瓦特的生平与性格》（爱丁堡，1795），第76页。

他们进行调查,[61]《人身保护法》中止实施。在诺里季,艾萨克·圣特和其他委员会成员被捕。在设菲尔德(其参加爱丁堡国民公会的代表M.C.布朗已在候审之中),亨利·约克和委员会的成员均被抓了起来,该会书记理查德·戴维森躲了起来,《设菲尔德纪事报》编辑约瑟夫·盖尔斯也被指控谋反(6月),他逃到美国去了。紧接着这些逮捕行动之后,随着这些阴谋在议会中耸人听闻地"曝光",加上有关造反的密谋和各协会与法国人勾结的谣传,公众舆论转而敌视协会。出售民谣和传单的小贩走街窜巷,他们手中传单的标题是"叛国案!叛国案!叛国案!"。传单在伦敦城各处张贴。在"光荣的6月1日"海战胜利庆祝活动中,一群暴民袭击了哈迪夫人的住宅。一家伦敦报纸以嘲弄的笔调报道了"一个女人被她亲爱的汤米身受绞刑和车裂的幻像折磨至死"。一些俱乐部在惊慌之中解体了,而那些处于困境中133的俱乐部忙于为被捕者的家属筹集款项。(伦敦通讯会会员在寻求为被捕者家属筹集款项时受到起诉。)《泰晤士报》登载了一篇虚构的有关英国革命的记叙报道,将被捕者刻画为嗜好血腥权力的人。[62] 在林肯郡,"有人收买民谣吟唱者,让他们站在街头巷尾,歌颂雅各宾派的倒台……"在有教养者的圈子中,甚至连对审判一事保持缄默也会引起怀疑。[63] "教会与国王派"在诺丁汉使用异常的暴力手段搜寻雅各宾派。就像上一年的情形一样,改革派的住宅被"破门而入,里面的人被拖出来,脖子上被套上绞索,然后被扔到城边泥泞的小河沟里"。一个效忠派委员会给那些受雇开凿一条新运河以进攻雅各宾派的"民工们"支付工

---

[61] 关于伦敦改革派被捕的情形,见前文,第18—19页。

[62] [詹姆士·帕金森]:《为伦敦通讯会辩护》(1795),第1—6页;《泰晤士报》,1794年9月5日。

[63] W.加德纳:《音乐与朋友》(1838),第1卷,第222页。

资，市长拒绝为雅各宾派提供保护。[64] 大约在这个时候，费尔斯沃斯的一名雅各宾派领导人被“绑在一名龙骑兵坐骑的马鞍上，一伙疯狂、偏执的人将针扎进他的双腿”。[65]

然而，伦敦通讯会远未达到解体的程度。该会建立了一个9人秘密执行委员会，其中最活跃的委员是制帽工理查德·霍奇森、书贩约翰·博恩和“公民格罗夫斯”。根据一份官方备忘录，伦敦通讯会在整个春季都在大力吸收新会员，这份备忘录也许对皮特采取行动产生了影响。到1794年5月，该会分会数目不仅达到48个，而且除了小商贩和手工工匠之外，“近来在他们中还出现了一类新的人物，即一些泰晤士河码头工人、伦敦城货栈的店员和一些贵族的仆人。”50名爱尔兰人集体加入一个分部，伍尔威奇和德普特福德的分会也建立起来。[66] 在哈迪、瑟尔沃尔和其他领导人被捕之后，霍奇森、博恩和“公民格罗夫斯”能够将大多数新会员团结起来。据报道，7月份“18个分会惊慌失措没有开会”，协会派出代表使它们恢复活动，但其余30个分会继续正常运作。事实上，迫害的后果迫使该会内部进一步激进化，如果说，某些分会在8月份“进入休眠状态”，有一些会员又退出了其他的分会，那么，(按一名告密者的说法)“该会此时主要是由胆大妄为和不顾死活的人组成了”。会议上的正式话题集中到议会改革上：“现在，推翻这个国家政府的意图得到公开承认。”在秋季，随着逮捕所造成的震撼的消失，公众情绪发生了另

134

[64] F.D.卡特莱特：《卡特莱特的生平和信件》(1826)，第1卷，第312页；布莱克纳前引书，第396—401页；萨顿前引书，第193—199页。

[65] B.布赖尔利：《费尔斯沃斯——我的故乡》(奥德姆，1895)，第14页。

[66] 1794年5月6日关于通讯会，尤其是“伦敦东区和城区”通讯会的备忘录，载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0A(3)号。根据这份备忘录，设菲尔德、布里斯托尔和诺里季的协会同期也出现相似的增长。

一个变化。被捕者的待遇有了改善，哈迪注意到新门监狱中普通犯人开始对改革派们表示尊敬。普雷斯回忆道："政府的强硬措施吓退了许多人，"

> 但是，许多人(我是其中之一)认为这是件好事，参加协会成为会员现在成了义务。……它改善了本会的品质，因为大多数参加者都具有坚定的品质和清醒的头脑，不会被轻易地驱离其目标。[67]

与此同时，该会的秘密执行委员会却遇到了麻烦。它在寻找"安全传递"与地方俱乐部之间信件往来的"合适方式"方面有困难。8月，若不是弓街巡警"抓错人"，该委员会中能力最强的委员公民霍奇森就会以叛国罪被捕，这件事(向秘密执行委员会其他未被捕委员作汇报时)"使人倍感欣慰"。此后，他只能以"流浪者"的落款与秘密执行委员会委员们通信。9月3日，弓街巡捕们粗暴地冲击秘密执行委员会，逮捕了执行书记。"公民格罗夫斯"抗议他们无权这样做，然后率领其他人到一个酒馆为被捕者的家属募捐。但在次日，一件更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了。哈迪的陪审长指控格罗夫斯是一名政府密探，格罗夫斯于是在伦敦通讯会委员会全体会议举行的一次正式审问上为自己辩护。他的陈述真挚动人，虽稍嫌做作。他提供了许多表明他忠心耿耿的证据，也提供了许多能证明他具有雅各宾党人品质的证人。结果他成功地被宣布无罪。

135

---

[67] G.沃拉斯:《普雷斯生平》，第21页。对普雷斯手稿中的"历史"必须以某种保留的眼光去看待，他是在事件发生多年之后动手修史的，当时他是个不够热心的边沁改革派。这部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本人的辩解，书中对"头脑清醒者"(即弗朗西斯·普雷斯之流)加以拔高，对不够温和的人加以贬斥，瑟尔沃尔的演讲被说成是"迎合当时所有下贱偏见"的"欠考虑的演讲"。只要稍微研读一下《论坛报》，其判断中的偏见便清晰可见了。

但是"公民格罗夫斯"事实上是一名密探，是从奥利弗到宪章运动乃至以后这一漫长时期中能力最强的密探之一。在秘密执行委员会每次开会之后，他的详尽报告便递交上来，供皮特或邓达斯或财政部司法官阅读。正是多亏了他那少有的技能，我们才能够完整地叙述这几个月发生的事件。[⑧]

1794 年 10 月 25 日，对哈迪的审判在中央刑事法院开庭，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叛国罪，而且似乎是为了渲染这一指控的恐怖气氛，10 天之前罗伯特·瓦特在爱丁堡被斩首，瓦特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阴谋者，也许还是"双料特务"。公众和陪审团都知道受审的被捕者生死未卜。（在法庭中惟一拒绝承认诉讼严峻性的人是约翰·霍恩·图克，他佯装厌烦又不乏大不敬的机智，完全是真正威尔克斯派的派头。当被问到他是否接受"上帝和国家"的审判时，他"以很少有人能摆出的如此大度的一种架势，盯着法庭上的人看了数秒钟后摇了摇头，断然答道：'我可以接受上帝和我的国家的审判，但是——！'"）庭审延续了 8 天之久，能够证明危险"阴谋"的证据看起来越来越不使人信服，而厄斯金对原告证人那口气强硬的、甚至野蛮的交叉提问，使庭审显得更加站不住脚。公众从哈迪身上又一次发现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所喜爱的那个独立自主的形象：一个坚强而具有尊严的平民，对国家权力表示藐视。哈迪夫人的去世引起了更深的同情，人们越来越躁动不安，在各郡道路上，人们拦住旅游者和邮政人员询问情况。在作出判决的前一天夜里，人们盛传哈迪已被宣判无罪，

---

⑧ "秘密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格罗夫斯的报告均收录在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 11.3510A(3)号之内。格罗夫斯报告的日期是从 1794 年 5 月至 10 月中旬。我无法指出报告为何终止，也许虽然他被正式宣布无罪，但他在"受审"后不再得到信任。关于他所作的观察报告，其实例可见后文，第 156 页。至于有关密探的更一般性的问题，见下文第 488 页起。

人们将厄斯金马车上的马匹卸下来，拖着他在街道上欢呼雀跃。在最后一天，当陪审团退庭达3个小时之久时，刑事法院附近街道上挤满了激动的人群。毫无疑问的是，法庭若宣判"有罪"，将会触发一场暴乱。来自诺里季爱国会的代表名叫戴维，他正在伦敦观看审判。在宣判无罪的消息传来后，他立即坐邮车回诺里季，连夜赶路，在星期天上午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刻回到诺里季。他径直前往圣保罗教堂的浸礼会聚会室，该教堂的主持牧师马克·威尔克斯是一位热心的改革派，他是旧式浸礼会牧师，既有自己的职业(农场主)又兼任不领薪俸的牧师职务。当戴维进来时威尔克斯正在布道坛上，他立即打住话头问道："有什么消息，兄弟？""无罪！""那么让我们高唱'赞颂万福之源的上帝'。"

136

政府坚持审理霍恩·图克的案子。但是诉讼过程本身甚至更使政府丢尽了面子。皮特首相被传到庭为被告作辩护，并被迫承认他参加过由怀威尔召集的支持改革的郡会议。图克被宣判无罪。紧接着，政府在12月作最后一次努力以给瑟尔沃尔定罪。但是，结局是在人们意料之中，但也不完全如此。瑟尔沃尔具有喜好炫耀的性格，在新门监狱中忙着写以汉普登、西德尼和暴政为主题的诗篇：

在牢狱的晦暝阴沉之中，
　　爱国者依然挺起无畏的胸膛
面带微笑，心里明白
　　神圣的德行会带来欢畅。[83]

在对瑟尔沃尔的审判快结束时，他想到要亲自向陪审团发表一

[83] J.瑟尔沃尔：《在伦敦塔和新门监狱羁押中写下的诗作……》(1795)，第9页。

通激昂的演说。他对厄斯金说:"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将被绞死"。厄斯金回答说:"如果你这样做,你将被绞死"。在宣布瑟尔沃尔无罪之后,对其他被捕者的指控也就被取消了。

也许有人希望找到直接了解各协会会员情况的途径。但是,要理清下一年的事件的头绪是困难的。首先,大多数外省协会在1794年夏季自行解体,或转入地下,踪迹难觅。(秘密委员会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通信的危险性,而审判则暴露了政府密探无处不在的真相。)由于约克仍在狱中,设菲尔德协会处于瘫痪状态。对约克的审判直到1795年7月才举行,他被以密谋罪 137 的罪名处以两年监禁。这种审判只是走走过场,在各郡中,官员们具有相当大的即决审判权,而且名声不高的改革派根本不能指望像厄斯金这样的人来为他们作辩护。[70]

而且,还必须支付辩护费。(在诺里季,有影响的公民仍然支持爱国会,马克·威尔克斯于1795年4月在圣保罗教堂举行了两次声势浩大的雅各宾派募捐布道,以支付辩护费用。)如果说这些无罪释放避免了一次普遍的恐怖浪潮的话,那么审判也反映出政府打算要走多远——哈迪从十分权威的渠道获悉:当局已草拟了不少于800份缉拿改革派的逮捕令(实有300份正式签发),打算在对他定罪之后立即使用。无罪释放使官方的宣传家不再顾及立场的持续性,伯克曾参与草拟秘密委员会报告,又每年领取4000镑年金,1794年后,他就与詹姆士·里夫斯成了思想上的同路人。现在,伯克将1/5的选民和大部分无选举

[70] 比如,利兹的詹姆士·欣德利因出售煽动作品而于1794年被判处两年监禁。乔治·鲍恩于1794年在莱斯特被捕,数月后未受审被释放。在设菲尔德,詹姆士·蒙哥马利力图通过发行更为谨慎的《彩虹报》来继续约瑟夫·盖尔斯的事业,于1795年两度入狱(分别为3个月和6个月时间)。关于地方上此类迫害事件的范围及程度问题,迄今尚未作系统的研究。

权者视为“纯粹的雅各宾派，根本不可救药，始终是需要加以防范的对象”。他认为这些无罪释放的人是“凶手”，而国家的病疾则需要“以动用烙铁和刀剑的严厉恐怖手段”去医治。[7]

其次，改革派领袖中一些人已不再能坚持。宪法知识会从未恢复元气，而霍恩·图克直到1796年选举为止再未涉足于公共事务。哈迪在妻子去世后私事缠身，未能在伦敦通讯会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伦敦通讯会此时纷争不已，仅为是否需要制定一个新章程的问题就争论了好几个星期。一部分会员争辩道：任何章程都是直接民主制的障碍，另一部分会员则指出应当实行更严格的内部纪律以对付迫害。（甚至一封信中偶然使用了我们的“领袖们”一词也引起会内一片民主的鼓噪声。）在一场人身攻击的混战中，这两部分会员退出伦敦通讯会组成新的协会。约翰·博恩出任伦敦改革会书记，该会与伦敦通讯会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约翰·巴克斯特似乎策划了另一部分会员退会，组成自由之友会。该会专门做出一种夸张的自由主义姿态。一名密探形容巴克斯特：“是一个长相平庸的人，……脸庞削瘦，一头黑发梳成发辫，身着深棕色外套和棕黑色马甲，年龄约40岁”。巴克斯特显然主张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他作过《抵抗压迫》的系列演讲：“当国家的所有权力都把持在土地财产所有者手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也就把持了生杀大权。”托马斯·斯彭斯原来是纽卡斯尔的小学校长，由于他写了“另一部《人权论》……比潘恩的著作走得更远”，因此争取到一批追随者。他认为，贵族的土地必须没收，新的合作生产者将接管这些土地，

[7] 哈迪：《回忆录》，第42—43页；马克·威尔克斯：《阿撒利阿——或警钟鸣响》（诺里季，1795）；瑟尔沃尔：《自然权利》（1796），书信，第1卷，第40、56—57页；萨拉·威尔克斯：《马克·威尔克斯回忆录》（1821），第78—79页；E.伯克：《致当今议会一位议员的两封信》（1796）。

"如果地主依然存在，你能想象人类可以靠改革议会来享受任何可怜的自由和幸福吗？……一个人民的公会或议会将永远与贵族处于战争状态。"[72]

冲突是意料之中的事。早在1793年10月，伦敦通讯会的会议记录就记载了由其中一个派别提出的一项动议，号召驱逐那些宣传平等派原则的人。随着生活费用的提高和该会向伦敦东区和南区发展，"社会"问题愈来愈占有更突出的地位。1794年一本富有特色的小册子坚持认为改革的结果将是减税、改革济贫法和狩猎法、停止限制工会、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停止抓丁和在客栈中驻军。[73] 这样的要求也许会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而斯彭斯和巴克斯特更极端的观点则不会。然而，该会显然还在策略问题上存有分歧。我们可以举两位伦敦通讯会领导层中的新人为例来表明不同的倾向。普雷斯头脑清醒，他的巨大组织能力、善于应用的思维能力和在工会组织方面的经验都与哈迪的传统一脉相承。1795年夏，他经常担任每周举行的总委员会主席之职。根据他本人说，他认为该会的主要职能是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

139

> 我相信大臣们在使政府停止运转之前是不会罢手的，也就是说在他们无法将它维持下去之前是不会罢手的。在我看来，人民能够拥有或可能会拥有健全和节俭政府的惟一机会就在于接受有关代表制度优越性的

---

[72] 《伦敦通讯会通信集》(1795)，第4、20—21、26、42—43页；哈迪：《回忆录》，见各处；P.A.布朗前引书，第142、151页；J.巴克斯特：《抵抗压迫》(1795)；无名氏[T.斯彭斯]：《压迫的终结》(1795)。关于斯彭斯，见下文第161—163页。

[73] 无名氏[詹姆士·帕金森]：《不流血的革命》(1794)。这个表达得很有力、反映温和雅各宾派要求的优秀例子，载于科尔和菲尔森编：《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第48—52页。

教育……这样，每当大臣们的行为造成危机之时，人民便能够给那些最有可能创立廉俭和简朴政府的人提供支持。因此，我建议本会的活动尽可能沉静、非正式。

这段话很值得玩味，“廉俭和简朴的政府”是普雷斯后来的一个边沁主义术语，而伦敦通讯会在1795年的要求是：在自由平等的立场上停止压迫和授予成年男子选举权。也许，普雷斯早在1795年就很准确地说：他认为工人改革派充当的角色是议会中等阶级或贵族改革派的附属物。工人们不能指望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为自己带来改革，但应当为其他“最有可能”赢得让步的人提供支持。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目光长远的战术妥协，它准备参与危机——比方说，等待财政混乱、食品暴动和大众动乱的出现，但不采取宣传群众的方法去加速危机。这是那些具有自尊心的小商贩或手工工匠的政策，他们宁愿架设通向中等阶级的桥梁，而不是试图填平他们自己与骚动不安的穷人之间的鸿沟。正因为如此，它反映了退出在“成员无数”中进行宣传鼓动的立场，同时代表着自我教育和艰苦组织的力量。[24]

另一种倾向的代表人物是约翰·宾斯。他是出生于都柏林一个手工工匠家庭的年轻人，此时在伦敦干管子工。他也在1794年加入伦敦通讯会，很快晋升为委员会的主席和集会的主持人。他与大部分会员的观点相同，认为在无罪宣判之后，协会应当更广泛地宣传其主张，召集大规模的公众集会，这样，政府也许会“被迫同意进行改革”。事实上，宾斯所致力的改革是一种通过革命进行的变革，因此尽管改革是他们公开承认的目标，但是（宾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伦敦通讯会]许多有影响的

140

[24] G.沃拉斯前引书，第24—25页。

会员们希望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75]

由于一些会员退会，到 1795 年 3 月时，伦敦通讯会的分会减少到 17 个。[76] 更为严重的是，来自外省的信件也减少了，因而运动失去了全国中心。约翰·瑟尔沃尔也宣布退出，其表面原因是（他本人声称）他充当一名无党派演说家、政论家更能起作用，但真实原因可能是他对内部纷争感到厌烦。然而，在退会事件之后，该会显得更加团结，其活动也得到恢复。普雷斯认为公众集会将招来新一轮的镇压和人身保护法的中止实行，但盖尔·琼斯和宾斯提出的最广泛进行宣传鼓动的政策在伦敦通讯会所有分会举行的公决上占了上风。结果，一次大规模的集会于 6 月底在圣乔治草地举行，以支持成年男子普选权和每年召开议会的主张。即使我们把伦敦通讯会声称的 10 万人与会这个数字缩减下来，这次大会仍然是有史以来在伦敦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支持改革的集会。公民约翰·盖尔·琼斯主持了集会，并发表了演说。他那充满激情的语言与普雷斯所作的边沁主义式的回忆相去甚远：

> 难道我们不是英国人，自由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权利吗？……你们这些想报复的大臣们，拿出你们的鞭子和刑具，安好绞架。……在每条街上修筑兵营、在每个角落建造牢房！镇压和放逐所有无辜的人。但是，你们是不会得逞的。……从屠刀下流出的爱国主义圣血将滋润自由的种子……

141

[75] 宾斯前引书，第 45 页。

[76] 1794 至 1795 年冬又出现一次“叛国”恐慌，伦敦通讯会的 3 名会员——史密斯、希金斯和勒梅特被指控密谋用气枪射出毒镖的方法行刺国王。指控者是一个居心不良的告密者，被告在未受审讯的情况下获释。见 J. 史密斯：《揭露密谋者》(1795)；P. T. 勒梅特：《被捕记事》(1795)；枢密院档案，第 A35/6 号。

与会者被这些血腥的比喻所打动，但他们保持平静和良好的秩序，直至散会。[77]

从这时起到年底，伦敦通讯会迅速发展。它冲破了具有较大局限性的手工工匠和小商小贩的圈子，越来越多地获得雇佣劳动者的支持。该会声称它在6月吸收了400名新会员，在7月又吸收了700至800名新会员。它在3月拥有17个分会，到7月底增加到41个，到10月份又增加到70或80个。与此同时，那两个由退会会员组成的协会也兴盛起来；附属研讨会和阅读俱乐部纷纷建立。自然神论和理性思潮也赢得一席之地，因而，盖尔·琼斯在第二年毫不奇怪地写下了"尽管我自称不是一个基督徒……"这样的词句。伦敦通讯会制作纪念币和纪念章来庆祝1794年的无罪判决和其他事件。瑟尔沃尔两周一次的讲座每次都能吸引数百名听众，他禁不住要在给妻子的信中炫耀一番：

> 连着两个夜晚都有近600人来。……有两个讲座尤其……震撼着腐败制度的支柱，使它每块石头都在颤动。每句话都如电流一般迅速传入人们的胸膛。那些蜂拥而来听我演讲的贵族们……不断被迫……一起欢呼喝彩。

而且，另外一些团体和酒馆俱乐部在这些协会周围产生，它们发出新的响亮的共和主义之声。一位叫"公民李"(有时又叫"卫斯理派")的人从"梭和区贝里克街98号，英国自由之树"发出一系列煽动性挑衅性的小册子，其标题包括《国王杀人》、《英国罗伯斯庇尔的统治》和《乔治上一世的愉快统治》。(像斯彭斯一样)

---

[77] 《伦敦通讯会通信集》(1795)，第4—5页及散见；1795年6月20日《论坛报》，附加手稿，第27808号；无名氏：《两项法案史》，第91页起。

他的重点放在“教区和村庄的联合”，他也是以热烈的赞同口吻谈论断头台的几个英国雅各宾分子之一。虽然D.I.伊顿和其 142 他几个地方上的协会也在编写廉价小册子，但“公民李”的那些流行小说、雅各宾记事和传单也许是促使汉娜·莫尔用“廉价文库”进行反击的原因。[78]

在1795年6月之后，外省的信件也重新增多。设菲尔德在8月举行了一次露天集会，伦敦特地派出一位主席去主持这个集会。据称，与会者有10000人之多。[79] 但在另一方面，诺里季是外省最有影响的中心，9月份，爱国会有19个分会在运作之中，其会员除织工、鞋匠、手工工人和小店主外，它还得到较富有的商人家族——格尼家族和泰勒家族谨慎的支持。此外，诺里季还有一批才华出众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在1795年间出版了一本叫做《内阁》的期刊，该刊也许是这个时期准雅各宾知识分子刊物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内阁》所登载的一些文章用充满诗意的手法对欧洲事务和战事作细致的分析，另一些文章则对马基雅维里、卢梭、妇女权利和戈德温社会主义作学术的探讨。尽管各派重点不同，但整个诺里季在反政府情绪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从浸礼派教堂到《内阁》派有抱负的学者、从“织工之徽”酒馆（即爱国会总部所在地）到格尼家的宅邸、从霍尔克汉姆的福克斯派成员科克到城郊村庄中的体力劳动者都是这样。[80] 组织团体从诺里季扩展到雅茅斯、林恩、威斯贝克和洛斯托夫特。一些相似的运动也在梅德威地区城镇如查塔姆、罗切斯特和梅德

---

[78] 《伦敦通讯会通信集》(1795)，第4—5、29、35页；J.G.琼斯：《政治旅行概述……》(1796)，第33页；瑟尔沃尔夫人：《约翰·瑟尔沃尔传》(1837)，第367页。

[79] 《设菲尔德克鲁克荒野公众集会进程》(设菲尔德，1795)。

[80] 前引《通信集》，第27—28、63—64页；《内阁》，第3卷(诺里季，1795)；萨拉·威尔克斯：《马克·威尔克斯回忆录》(1821)。

斯通等地兴起,参加者包括外科医生等专业人员及码头工人等等。诺丁汉的协会也有了恢复,工厂主和织袜工之间(再次)建立起某种联盟。已公诸于众的伦敦通讯会《通信集》还刊载了其他一些地区的活动,如:利兹、布拉德福德、伯明翰、莱明斯特、萨洛普郡的怀特彻奇、德比附近的墨尔本、米德尔塞克斯的桑布雷、海威克姆、特鲁罗和朴次茅斯等。

曼彻斯特历史学家普伦蒂斯说:"在群众中奔忙的是一位新的指导者——匮乏"。1795 年是个危机的年头,在法国在英国都是这样。1794 至 1795 年罕见的寒冬、战争造成的混乱和谷物歉收,这些都使食品价格飞涨。著名的斯品汉姆兰决议于 1795 年 5 月出台,按面包的价格调节工资补贴。小麦价格之高令人难以置信:伦敦每 1/4 英担[等于 28 磅]为 108 先令,莱斯特则为 160 先令,而其他许多地方还不止这些。在夏秋季节席卷全国的、史无前例的食品暴乱风潮中,民兵数次成为暴民。[83] 军队中也出现不满的迹象,爱尔兰正走向叛乱;诺里季、曼彻斯特和约克西区的工厂主请愿要求停战。约翰·瑟尔沃尔就匮乏的问题作了几次最有说服力的演讲,(他声称)在雅各宾的诺里季,有不少于 25000 名工人正在要求救济;济贫税已高达每英镑征收 12 至 13 先令;斯皮特菲尔兹著名的丝织业已被挤垮:

> 甚至在我不久前的记忆中,赤着双脚、衣衫褴褛的孩子……在镇上的那个地方还很难见到。……我还记得在那时,一个吃苦耐劳的农业劳动者除了拥有一套度

---

[83] 关于 1795 年暴乱,见前文第 63—65 页。另见 1795 年 5 月 20 日《晨报》的报道:在德文郡奥克汉普顿的"暴乱"中,斯塔福德郡的民兵"全都……像一个人似的与人民站在一起";财政部司法处档案工人,第 11.3431 号;哈孟德夫妇:《城市工人》(1920),第 85—86 页;麦科比前引书,第 90 页;J. H. 罗斯:《威廉·皮特与大战》(1911),第 282—288 页。

> 假用的公寓外，一般在镇子的近郊还拥有一座面积不大的避暑房屋和菜园，他在这里过星期一，放鸽子或种萝卜。但是这些庭园现在都衰败了。小小的避暑房屋和星期一的闲暇活动已渺无踪影。你将看到的是贫穷的织工和他的家人挤在丑陋、肮脏和有害身心的房间里，这里毫无舒适感，甚至连必要的生活设施都没有。

这就是古老的英格兰消逝的景象，这甚至比"遭遗弃的村庄"(瑟尔沃尔也关注的)更能使雅各宾派办报人和工匠们的记忆深处受到震撼。[52]

1795年10月26日，伦敦通讯会又在伊斯林顿的哥本哈根旷野召开一次大会，由公民约翰·宾斯(22岁)担任大会主席。普雷斯认为这是"不明智之举"，他拒绝正式参加大会。伦敦这时真的出现饥荒，群众情绪很高。瑟尔沃尔是主要发言者之一，他以相当出色的口才使人群保持平静。此时他怀有一种希望："从奥克尼群岛到泰晤士河河口，从多佛峭壁到地角，全国……联合成一个巨大的政治协会或通讯会"。集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向全国各主要城镇派出代表。(瑟尔沃尔本人于11月重新加入协会。)那种关于到会者达10至15万人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53] 尽管动用了三座讲台或"讲坛"，"但是一半以上的与会者还是离得很远，连只言片语都听不到"。这次集会向国王提出了"抗议"："为什么在显而易见的富足世间，我们却被迫忍饥挨饿？为什么我们不停地出力苦干却不得不遭受匮乏之苦难？……议会的腐败……像一个冒泡的漩涡，吞噬了我们所有的劳动成

144

[52] 1795年9月23日《论坛报》，第29期。

[53] 普雷斯通常主张压低所声称的人数，而且他(在1824年)根据丰富的有关政治骚动的经验写作时，只是说15万人这个数字"也许是一种夸大"。

果。”为两项法案作史的匿名历史学家宣称:“集会的气氛极为和谐,人们遵纪守法,秩序井然。这是一个神圣的自由之日。”[84]

三天之后的那个日子如果不是神圣的自由之日,那也毫无疑问是使政府感到恐惧的日子。国王在堂而皇之地去议会主持开幕式时,他的御车在途中受到袭击,人群中发出嘘声和口号声:“打倒皮特!”“不要战争!”“不要国王!”“不要皮特!”“和平!”大约20万伦敦人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一些人将小块面包插在棍子上,再饰上黑纱,来回挥舞。一个小贩在人群中出售“每本定价1便士的《人权论》”,他被抓了起来,又被人们救出,坐在人们高举的椅子上欢呼胜利。也许是受到一块鹅卵石的打击,国王御车的车窗被击破。据说国王到达上院被人架出御车时说道:“我的上帝!我、我、我被人射了一枪!”[85] 第二天,当国王坚持去戏院时,街道上的人都被赶走,执行护架任务的有200名步兵、200名骑兵和500名警察。

伦敦通讯会否认对此事负有责任,但是该会完全有可能试图举行类似于此的示威活动,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指望它能控制其追随者的激愤之情。(在那场暴乱发生后的晚上,该会的一名145 会员在一家小酒馆中对约翰·宾斯吹嘘道:他曾爬上了御车,并试图袭击国王。)不过,政府立即作出反应,颁布文告,查禁一切煽动性集会。皮特即刻提出《两项法案》。根据第一项法案,通过演讲或文字煽动人们仇恨、蔑视国王、宪法或政府的行为被定为叛国罪。根据第二项法案,所有50人以上的集会均须报告当地官员后才能举行,而当地官员完全有权阻止讲演、逮捕演讲者

[84] 伦敦通讯会:《1795年10月26日……集会过程记述》;附加手稿,第27808号;J.瑟尔沃尔:《向舆论呼吁:反对绑架和谋杀》(1796),第8页;瑟尔沃尔:《传记》,第379页起;《两项法案史》,第97页起。

[85] 无名氏:《实情与叛国!——国王圣驾纪实》(1795)。

和驱散集会。而且,法典上又增添了一项死罪:拒绝服从当地官员命令者均处以死刑。一项条款对瑟尔沃尔特别有效,它使改革派的演讲室可以作为"妨害治安之屋"被关闭。

在该法案的提出(1795 年 11 月 10 日)和获国王批准(12 月 18 日)之间,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群众宣传时期。规模不大的福克斯反对派在法案通过的每一个阶段上进行战斗,它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全国与群众团体并肩作战。伦敦通讯会于 11 月 12 日在哥本哈根旷野召集了一次紧急集会(据称,这一次的到会者为 20 万人)[66],根据普雷斯的回忆,"这次集会与这种场合的通常情形一样,参加集会的有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会议的时机和带孩子到会的做法都不属"通常情形"。其中带孩子到会的做法表明了集会的非暴力性质,它成为此后工人阶级运动的传统。12 月,该会在玛丽莱本旷野举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集会,约瑟夫·法林顿在他的日记中对此作了记述。在好几个"讲坛"上发表讲话的演讲者包括威廉·弗伦德、瑟尔沃尔和约翰·盖尔·琼斯。琼斯是一位"衣着随便、举止斯文"的外科医生,他患有某种"麻痹症","头、肩和双臂不时地抽搐扭动"。但是,他的"嗓音很美,声音尖锐,吐字清楚……"。琼斯在讲话中发出了一个威胁:皮特将被"当众处死"。

> 没有任何骚乱发生,人们也没有作出任何越轨行为,他们只是举起双手或喝彩欢呼而已。[67]

大规模的集会在国内其他地方举行,几乎所有集会都对那两部法案表示反对。皮特说:"假如我辞职的话,我的脑袋不出半年就会搬家"。约克郡发生了一个重大挫折,郡议员之一威尔 146

---

[66] 事实上,伦敦通讯会出版的一份"记录"称有"30 万"不列颠人与会。

[67] 《法林顿日记》(1922),J.格雷格编,第 1 卷,第 118—119 页。

伯福斯秘密地与皮特合作,"修改《煽动法令》,使之扩大适用范围"。(他在议会对其中一项条款表示反对,以此来精心地维护其"具有主见"的名声。)同时,忠于温和原则的克里斯托弗·怀威尔打算召集一次约克郡抗议集会,他提前4天于星期五发出通知,号召西区的所有自由持有农参加下周二在约克市举行的集会:"从你们的织机那里来吧,诚实而勤劳的织工们;丢下你们在田里的活计,停工一天,健壮而有主见的自耕农们;让你们祖先的精神伴你们同来……"。威尔伯福斯在伦敦去教堂的路上收到一封发自约克郡的快信。(几天前,威尔伯福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要牢记基督徒的独特性格,在下院保持庄重,要开朗、仁慈和宽厚,同时暗中提防,保持含而不露的严肃"。)他对于在安息日旅行心存顾忌,但他轻易地克服了顾忌,驾车去见皮特。皮特说威尔伯福斯必须出席该郡的集会。但威尔伯福斯的马车并未准备妥当,皮特说:"我的车已准备妥当,乘我的车走吧。"(一位同行者说道:"如果他们发现你乘的马车是属于谁的,你将冒丢掉性命的风险。")威尔伯福斯乘着皮特借给他的马车,向北"急行军"。全郡的人好像都在涌向约克,织工们(或"伙计们")骑着他们的驮马前往会场。集会刚一开场便显示出强烈的反政府倾向,当时威尔伯福斯正驱车进入约克。威尔伯福斯以"无与伦比的"口才向"约克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绅士和自由持有农集会"发表演讲,"将力量和活力注入那些胆怯的效忠分子的沮丧心灵中"。他的独立立场和热心于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巨大声誉征服了西区非国教的自由持有农和织工,集会出现分裂,4000名自由持有农的大部分支持威尔伯福斯拥护国王和宪政的宣言,而"那个疯子桑顿上校却身着军服站起来",向"约克的贱民们"说话,"……拥护雅各宾派。……他告诉他们有许多军人已做好准备,无论他们何时举事,这些军人就加入他们。"桑顿在结

147

束讲话时“把军服脱下来扔向贱民”，贱民们欢呼雀跃着用椅子将他抬到市政厅。[88]

这似乎是揭示两个时代交错之时危机的历史时刻之一。除了选举集会之外，下一次在约克郡西区举行的大规模集会将是奥斯特勒于1832年举行的工厂奴隶的“朝圣”。由于约克集会分裂为忠于国王的自由持有农和无选举权的煽动闹事者，因此直到1850年为止，19世纪的社会将在竞选场所出现分裂，选民和工人各居一方。而且，它还代表了另一种分裂。福克斯说过：“整个英格兰就在约克郡和米德尔塞克斯之间形成。”事实表明，约克郡的非国教意识相当脆弱，“教会与国王”派在那里也许会受挫，但威尔伯福斯和卫斯理宗却能取得成功。在米德尔塞克斯，手工工匠和小商小贩的非国教传统正在更明显地向理性思想倾斜，而这也是“两项法案”和国教及非国教教会领袖的宣誓“效忠”造成的结果。

人们一直在论证这一点：两项法案是雷声大雨点小，有关死刑的条款从未得到强制执行，尽管人身保护法中止实行达8年之久，但未经审判被拘押者似乎在任何时候只有几十人。[89] 当然，这些雷声正是皮特所需要的，如恐吓、密探、拥有无限权力负责监视的官员以及偶尔的儆戒等。但是，在两项法案的雷声和雨点之间存有一道由英格兰陪审团组成的障碍。普雷斯在1842年作出的判断很成问题，他说：“众多的小店主和体力劳动

---

[88] 威尔伯福斯前引书，第2卷，第112—113页；怀威尔：《政治文件集》，第5卷。

[89] 在普雷斯手稿中，有一篇《约翰·奥克斯雷德自述》。奥克斯雷德是伦敦通讯会会员，1798年5月被捕。按这篇手稿的估计，在镇压高潮时期（1798—1800），约40名伦敦通讯会会员及35名联合英格兰人未经审判被囚禁。另见枢密院档案第A158号“嫌疑犯名单”。

者可以说是在不理解它们[两项法案]的情况下赞同了它们。”[90]

不过,两项法案获得了成功。起初,伦敦通讯会推行一项颇有风险的对抗政策。该会派出代表前往各郡,希望重建全国性组织。约翰·宾斯被派往重要的海军基地朴次茅斯,但又被召回,因为伦敦的委员会得知宾斯被人跟踪并有可能被捕。约翰·盖尔·琼斯奔波于肯特郡的各个城镇:罗切斯特、查塔姆、梅德斯通、吉林厄姆和格富夫森德。他在罗切斯特创建了一个多达9个或10个分会的协会;在查塔姆,当听众中有人提问到会人数是否超过法案所允许的50人时,“另一人愤怒地要提问者离开房间,以他的离席达到减少人数的目的”。琼斯了解到,查塔姆的码头工人拒绝在支持两项法案的致国王信上签名,相反在一份抗议请愿书上签了名。普雷斯(多年以后)坚决否认任何会员赞成“在法国的支持下建立共和国”,但该会对这些海军基地的关注却使普雷斯的否认产生了疑点。伦敦通讯会会员对这些海军码头的造访也许是表明雅各宾派与1797年斯皮特黑德和诺尔海军哗变分子之间联系的线索。[91]

琼斯和宾斯以代表的身份前往伯明翰,在1796年3月11日的会议上发表演说时被捕。他们分别受审,琼斯在1797年被判入狱,但宾斯则无罪释放。(杰拉尔德原先的雇主塞缪尔·帕尔博士对这一裁决做了很大贡献。他在整个审理过程中面对面地坐在陪审团面前。当有人提出起诉的证据时,他便摆出一副强烈的、不相信的怒容,而对被告方所作的每一点辩护都面色温和,点头赞同。)与此同时,瑟尔沃尔在打着“罗马史”的招牌继续

---

[90] 沃拉斯前引书,第25页。

[91] 约翰·宾斯前引书,第63—64页;J.G.琼斯:《赴罗切斯特、查塔姆、梅德斯通、格雷夫森德的政治旅行……》(1796),第27、87页;沃拉斯前引书,第27—28页。

举办其讲座之后，失去了演讲室，并被迫停止出版《论坛报》。他周游东盎格里亚，在诺里季举办一个系列讲座，共22次。但在雅茅斯，他和听众受到90名携带短剑和短棒的水手的野蛮袭击，这伙水手是专门从港口一艘军舰上调来进行袭扰的。伦敦通讯会其领导人或外出或被捕，又仅与各地保持不稳定的通信关系，它陷入内部的争斗，进入一个内部纷争和分化的阶段。[92]

这场纷争并非不具有创造性。它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宗教问题——或反宗教问题。这些人过去曾与国家作斗争，此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急欲用他们的思想与国教相对抗。普雷斯参与出版廉价的《理性时代》，该会大多数委员对此表示支持，导致教徒退会。[93] 一名雅各宾"叛徒"威廉·汉密尔顿·里德发表了有关该会在这些年中的一些情况，颇具权威性，书中说：分会选拔参加总委员会的代表时，常见的做法是把被推荐的人说成是"优秀的民主分子和自然神论者"，或者说"他不是基督徒"。俱乐部和阅读小组流动于小酒馆之间，飘泊不定。一个辩论会于1795年产生于跛脚门的"绿龙酒馆"，此后先后迁到芬斯伯里广场、铸子巷、小不列颠的"苏格兰改章"酒馆和荒草地的两家酒馆，最后于1798年迁到霍克斯顿，"处于城市官员的控制范围之外。直到存在的末期，它每次会议次次爆满。雄心更大的一件事是1796年春，设在白十字街尼克尔销售厅的"理性神殿"开放，会员们自 149

---

[92] 宾斯前引书，见各处；瑟尔沃尔：《雅茅斯暴行记》(1796)；C.塞斯特：《约翰·瑟尔沃尔》(1906)，第127—129页。

[93] 詹姆斯·鲍威尔是另一名在1795至1796年间被选入总委员会(还曾当选为执委)的密探。他在1795年9月24日报告说："该会卫斯理宗教徒召开一次大会，递交一封信件，宣读了这封信，信中要求将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开除出会"。当他们的决议被拒绝后，他们退会并组成了"教俗自由之友会"。鲍威尔认为6个整分会和其他数百名单独会员会随他们一起退会。枢密院档案，第A38号。

行装修，并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它未能兴盛起来，但为一代人之后的欧文主义奠定了基础。[94]

在我们结束描述之前，我们可以停下来考查一下这些协会，看看它们是哪类团体。我们可以举设菲尔德和伦敦的协会为例，因为它们力量最为强大，而且人们对它们的了解也最多。

设菲尔德协会与伦敦通讯会一样，源自"五六名机工……谈论食品惊人高价"的聚会。它发展得很快，到1792年1月，已拥有8个分会，"它们在不同的房屋里各自开会，开会时间则定在同一个晚上"。"所有人凭票入场……，秩序极为井然。"各分会每两星期开会一次，大会每月举行一次，"有数百人出席"。1400人订购了简装本(每本定价6便士)的《人权论》第1卷，人们"在设菲尔德的许多工场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在该会问世4个月后的1792年3月，它宣称拥有近2000名会员。5月，该会采取了一种新的组织方法：

150

> 即把它们分解为10人一组的小团体或会议，每10人任命1名代表；10名这种代表组成另一个会议，以此类推……直到最后减为合适数目以形成委员会或最高理事会。

这些小团体用撒克逊的方式叫作"十人团"。从一开始，当地乡绅就对这个由"最低等级的人"组成的协会感到惊恐不安，但对温和的改革有好感的局外人报告中总是强调在开头的几个月里该会会员行为理智而有秩序。1792年5月怀威尔收到一封信，写信者再次向他保证该会会员都是"品质优良者……具有出色的理解力，渴望接受知识"。会员中有一些教友派教徒(但协会

---

[94] W.H.里德:《首都异端协会的兴起与解体》(1800)，第5、9—12、22—23页。

并不承认)和"许多卫斯理宗教徒":

> 出于偶然的原因,有一个人列席了其中一次会议,会议按部就班地、有秩序地进行。开头由主席宣读会议记录……然后几名会员轮流选读其中某些段落,……以指导会议进程,全都拥护自由,赞成进行和平的改革……"[55]

在1792至1794年间的所有协会中,设菲尔德协会在处理通信事务方面最下力气,也最为迅捷。(由于从技术上讲,建立全国性协会是违法的,因而通信以及各协会间相互正式接纳各自会员为荣誉会员是维持全国性协会的途径。)尽管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会员们欣赏演讲中的表演才能,但协会领导人像M.C.布朗和亨利·约克却都是设菲尔德本地的帮工或技工。设菲尔德是一个由小工场师傅和技术高超的、收入相当优厚的技工构成的城镇,"不存在市镇权力机构"(如高等代理副官长所抱怨的那样)。1792年,两名地方官都住在城外,其中一名的宅邸离城14英里,另一名"去年对圈地暴乱采取了一些措施,人群焚毁了他的部分财产。自那时起,他就很少住在这一地区"。[56] 因此,该地的贵族影响甚少,它有大量熟练的、有文化的工人,有民主独立的传统,是雅各宾分子进行宣传鼓动的理想中心。在为数不多的专业人员中,有好几位怀有善意,"一个教友派医生"是首批会员之一,两位非国教牧师在约克受审时为被告提供证词,

151

---

[55] 菲茨威廉文件(藏设菲尔德档案馆),第F44(a)号;怀威尔:《政治文件集》,第5卷,第43—50页;H.麦克拉克伦:《西奥菲勒斯·林赛书信集》(1920),第132页;《对于设菲尔德及周围地区改革之友所受恶毒指责的彻底反驳》(设菲尔德,1793);《秘密委员会报告》(1794),第85、116、119页;W.A.L.西曼:《设菲尔德的改革派政治》,载《亨特档案学会会刊》,第7卷,第215页起。

[56] 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4—5页。

而一些家境殷实的刀具师傅本人就是改革派。尽管组织出色，但设菲尔德刀匠们似乎没有在他们之中找到一位突出的雄辩家。然而，从他们的委员会中派出的证人，在审理哈迪和约克案件时，以其团结一致、不怕威吓、不落人盘问圈套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证人在审讯哈迪的法庭上阐述了协会的目标是：

> 当一个人每天启迪人民，向人民展示理性，告诉他们所受一切苦难的原因时；当工作、每天苦干十三四个小时，却无力养家糊口时；这就是我对此的理解，去向人民说明这种状况的原因和他们无力养家糊口的原因。

另一位证人在审讯约克时受到盘问，他说："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接受教训，而是要说出真相"。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可能在1793至1794年的萧条（和衰退）中策划武装起义，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义无反顾地反对战争，而且最早站出来支持帕尔默和米尔。

设菲尔德拥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有利条件：这里有一位能干的出版商和编辑约瑟夫·盖尔斯，以及一份支持协会的周报《设菲尔德纪事报》。（设菲尔德一度还发行过更合知识界口味的刊物《爱国者》。）《纪事报》于1787年创办，在1794年的发行量（一度）高达每周2000份。"民主"精神对政治和举止装束都产生了影响。"民主派"也是服装改革家，他们在乡间徒步行走，不乘马车，取消包括"先生"、"阁下"在内的一切正式头衔，而且如果他们是雅各宾分子的话，就把头发剃得很短。外省的民主刊物，如《设菲尔德纪事报》、《曼彻斯特先驱报》、《剑桥通信》（由一神派改革人士本杰明·弗劳尔编辑出版）和《莱斯特先驱报》为地方报刊编辑工作确立了新的标准，不再用剪刀浆糊式的裁剪转载伦敦的报刊文章，而是登载有独到见解的评论文章。盖尔斯首倡

的方针还在《曼彻斯特先驱报》创刊号(1792年3月31日)中作了表述:

我们将不给有关**上流社会**生活的文章留什么版面,也不给谈论宫廷服装或宫廷密谋,谈论狩猎宴会、酒会或交往宴会的文章留什么版面,因为只有上流社会追求享乐的人才对这类文章感兴趣。…… 152

盖尔斯的报纸、书店和小册子印刷所是设菲尔德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57]

设菲尔德协会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是刀具业的"下层业者和工人"。[58](尽管有人提及周围乡村中的宣传活动,但各委员会似乎都没有矿工或农业劳动者参加。)当然,伦敦协会的会员种类要多得多,该会从数十个团体中吸收会员,沿袭了马车制造工会所和"自由辩论会"(瑟尔沃尔就是在这里学成出家的)及被里德称为"异端协会"的后来那些会社的做法。伦敦通讯会到那时为止是这些团体中最强大的,而许多团体则始终继续在其自己的圈子中活动。

伦敦通讯会由"分会"组成,每个分会拥有30名会员,拥有45或60名会员就另组分会。每个分会派一名代表出席每周一次的总委员会会议(也派出没有投票权的副代表),分会可以召回其代表,并有权在原则问题上要求请示。保存完好的会议记录表明总委员会与各分会之间意见交流很活跃,不断地作出决议,他们对委员会的权力十分警惕。在另一方面,1794年后,出于对密探的害怕,有相当大权力的代表会议让位于一个执行委

---

[57] 见唐纳德·里德:《报刊与人民》(1961),第67—73页;F.奈特前引书,第72页;和J.泰勒:《设菲尔德宪法会》,载《亨特档案学会会刊》,第5卷,1939年。

[58] 菲茨威廉文件,第F44(a)号。

员会，或总委员会所属的通信委员会，该委员会大约有 5 名成员。[19]

要精确地估计该会会员人数是十分困难的，其中以 1792 年秋、1794 年春和 1795 年的后 6 个月会员人数较多(也许在 1795 年后 6 个月最多)。协会自己多次宣称会员多达数万名，而历史学家提出的数字又过于谨慎。(经常有人认为，会员人数从未超过 2000 名，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设菲尔德和诺里季的会员都超过了这个数字。)1795 至 1796 年任委员会领导人的两名会员在他们各自的回忆录中作了相互矛盾的记述，无助于弄清这个问题。弗朗西斯·普雷斯曾担任总委员会临时主席，他说 1795 年夏该会拥有 70 个分会，有 2000 人实际上出席每周的例会。约翰·宾斯谈得比较详细。(据他的陈述)协会收入有时超过每星期 50 英镑，如果每星期收取 1 便士，这意味着有 12000 名会员定期出席会议。由于许多会员难得缴费，或只是偶而到会，他认为出席周会的会员平均数为 18000 至 20000 名，“大多数是……小店主、工匠、机工和劳工”。当他担任总委员会临时主席时(1795—1796 年间)，到博福特大楼瑟尔沃尔的演讲室出席会议的分会代表和副代表的人数平均为 160 至 180 名。

两人的记述都是事后几十年才写成的。普雷斯的记述更可信，但由于他旨在淡化协会内“鼓动者”的作用，因此就存有偏见；宾斯的偏见在于将他的青年雅各宾分子涂上浪漫的色彩。一个问题是对每个分会人数的估计，在开头几年里，分会应在 45 人时一分为二的规定没有得到遵守，保存下来的各分会

---

⑲ 更充分的描述，见 H. 柯林斯前引书，第 110 页。全部调查过程，见西曼博士未出版的论文。规章本身作过数次变更，以上描述主要基于从起初两三年会议记录中得到的印象。

1792—1794 年档案表明,人数最少的有 17 人,最多的有 170 人,而哈迪在枢密院所作的中肯和有保留的答复(1794)中称,他所在的分会有 600 名会员,但是,其中仅有 50 至 60 人参加每周的会议,这样的缺席率在群众运动中并非罕见。马格罗特在英国国民公会(1793 年 12 月)上宣称协会拥有 12000 至 13000 名会员,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夸张之辞。1794 年 5 月,一个消息灵通的密探(也许是"公民格罗夫斯")报告说:"他们自称的数字高于 18000 人……但这显然完全不可信。"在这期间(他报告说)协会每季度的收入是 280 英镑(每个会员每季度缴纳 13 便士),这表明缴纳会费的会员数约 5500 人。1795 年秋季,另一名密探(鲍威尔)定期报告各分会每星期发布的新会员和到会会员人数,这些报告表明普雷斯关于每周定期到会者人数不足 2000 人的估计是精确的,它一定有好几次记在协会的记事录上。1795 154 年底,(鲍威尔报告说)"协会的概况已从各分会记事录上总结出来,确实有 10000 人以上登记在册。"但是,由于这个数字包括了许多自 1794 年起离会的人和"许多报了名,缴纳了 13 便士会费,却再未在协会中露面的人",因此他认为这是个"不实的记述",这样,普雷斯和宾斯之间的差距被缩小了一点。皮特决不是个傻瓜,不会因害怕一个从未超过 2000 人的团体而批准两项法案并支持不受欢迎的叛国案审判。就 1794 年初和 1795 年末而言,以下数字是可信的:积极的会员至少有 2000 名,缴纳会费者为 5000 名,登记在册的会员为 10000 人以上。[⑱]

---

⑱ 分会档案和鲍威尔的报告,载枢密院档案,第 A38 号;"枢密院审案卷宗",载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 11.3509 号;格罗夫斯,见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 11.3510(A)号;普雷斯记述,见附加手稿,第 27808 号;宾斯:《回忆录》,第 45—46 页;一名会员:《英国国民公会记述》,第 40 页;《伦敦通讯会通信集》(1795),第 29、35 页。1795 年 6 月至 11 月间,入会的新会员为 2600 人。

协会非常谨慎地处理日常事务和财政问题,极为关注民主原则。10月会议曾提名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出席1793年的英国国民公会,在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上,有一位代表自愿“不取报酬(即自费)去出席国民公会,他的提议以“违背本会原则”为由被否决。在协会缺乏经费的时候这样做,目的是强调按劳付酬的原则,从而避免协会的事务被那些有钱有空的人所控制。另一方面,宾斯回忆道:“在我任代表期间,每当因公出差,他们都慷慨地支付我的费用”。[100]

有关分会工作的记述也各不相同。普雷斯最感兴趣的是追溯不走极端、符合法律的那条路线,最强调的是教育活动。他的伦敦通讯会绝不是皮特眼中的那种,而是一个尚未成熟的工人教育协会。他所在的分会在一所私人房宅中开会:“我和许多好提问、聪明而正直的人见面,……我们订阅图书。……我们举行星期日晚会……阅读、交谈和讨论。”

> 周会的程序通常是这样安排的:主席(每个人轮流担任主席)朗读某一本书……到会者应邀对这本书发表自己的见解,发言人数由主席决定,但发言者不用起立。然后,主席读那本书的下一部分,再请到会者发言。接着,主席读该书的其余部分,第三次请人发言,那些在此之前尚未发过言的人就要说些什么了。随后,便进行全体讨论。

“协会的教育作用确实很大,它促使人们读书,而不是在酒馆里消磨时光。它教他们进行思考,尊重自己,愿意教育子女,并提

[100] 伦敦通讯会会议记录,附加手稿,第27812号;宾斯前引书,第36页。

高了他们自己的判断水平。”[48]

所有这些记叙都很出色，它对一个阶级作政治自我教育的第一个阶段作了绝妙的记载，并且包含着一些很重要的真实情况，它部分是确切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普雷斯也是在摆好姿势让詹姆斯·穆勒给他自己画像，如同白人笔下的汤姆大叔一样。当时的密探报告中却有一种生动的笔触，而这恰恰是普雷斯所缺乏的。一个伦敦搬运工人说：“几乎每个人都在说话，总是吵吵嚷嚷的，直到代表站起来大伙才安静下来。大伙越来越吵闹，不愿等待，然后代表站起来努力让大伙平静下来。”而且，我们知道各分会并非总是于星期日在私人住宅中开会，许多位于贫困区的分会开会时从一个酒馆赶到另一个酒馆。W.H.里德是这样对18世纪90年代后期的俱乐部会议进行描述的与会者：“唱着歌，教士总是歌词辱骂的对象”，人们“抽烟斗吸烟卷”，“桌上放满了定价1便士、2便士和3便士的出版物”。这似乎与普雷斯的记述同样可信(但内容并不一致)。[49]

在协会的社会组成问题上，我们不必有任何疑问。它首先是一个手工工匠的协会。保存下来的分会登记册上有丝织工、钟表匠、鞋匠、细木工、木匠、裁缝等。一个分会的登记册上有98名会员，其中包括9名钟表匠、8名织工、8名裁缝、6名细木工、5名制鞋工、4名鞋匠，木匠、洗染工、理发匠各3名，商人、丝带整饰工、屠宰工、袜商、雕刻工、砌砖工、袜片剪裁工、制裤工、床架工、烧瓷工各2名，文具工、制帽工、面包匠、家具工、锁匠、 156 金属丝工、乐师、外科医生、铸工、釉工、锡盘工、漆工、书贩、镌版

---

[48] 附加手稿，第27808号；G.沃拉斯前引书，第22页；R.伯利：《英国雅各宾派》(1924)，附录Ⅱ，第5页。

[49] P.A.布朗前引书，第73页；里德前引书，第8页。普莱斯的记叙也许描述伦敦中心地区的手工工匠和小生意人，其他记叙则描述伦敦东区和南区的各分会。

工、绸布商、仓库工及农业工人各1名，余者未作分类。[14] 如果说协会最活泼的几位宣传家，如盖尔·琼斯和瑟尔沃尔是医生或记者的话，那么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是手工工匠或小生意人：阿什利是制鞋工、巴克斯特是帮工银匠、宾斯是管道工、约翰·博恩是霍尔本的书商、亚历山大·加洛韦是精密机器工（后来成为伦敦机械业大雇主之一）、托马斯·伊万斯是印刷所调色工，（后来是）拥有专利的背带商、理查德·霍奇森是制帽业师傅、约翰·洛维特是理发匠、勒夫曼是金匠、奥克斯莱德是书籍装订师傅，而其他委员则可确认为制鞋工、面包商、车工、书贩和裁缝等。1794年6月，"公民格罗夫斯"向他的主子揭露了协会的社会组成情况：

> 有一些人看外表是体面的工匠，他们能力强但仍待提高，虽然勇敢却又谨慎，这一类代表人数极少。另外一些人显然身份低得多——无疑是帮工。尽管他们似乎没有能耐也不发言，但他们看上去很坚定……对所有的提议只要带有一定程度的大胆，就一概投票支持。最后一类人……人数最多，是由社会最低层人物构成的——连看起来顺眼的都很少，其中有一些穿得又脏又破，另一些简直就是邋遢的贱货，任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哪怕是只坐在他们身边，都需要很好地控制住自己必然会有的自尊心；我还在中央刑事法庭的巡回法庭上看到有些体面得多的人在庭审结束时因无人愿意充当起诉人竟被宣布释放。这些人似乎都很暴躁，拥护任何会导致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事。[15]

[14] 枢密院档案，第A38号。

[15] 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0(A)3号。

英国雅各宾派的人数比人们所公认的要多，而且与在法国发动革命的“小人物”更为接近。事实上，与其说他们近似于雅各宾派，倒不如说他们更近似于巴黎“各区”的无套裤汉。无套裤汉狂热的平等主义构成了 1793 至 1794 年间罗伯斯庇尔革命战争专政的基础。[16] 英国雅各宾派的堡垒此时还不是新兴的纺织城镇，而是老工业城镇中具有较悠久思想传统的城市手工工匠；这样的老工业城镇有诺里季，该城的毛织业的优势地位还没有被 157 约克西区所取代；有斯皮特菲尔兹，该城喜好闹事的学徒恶名远扬，其丝织业因受到兰开郡棉织业的竞争而蒙受损失；还有设菲尔德，该城许多刀具业帮工正处于向小师傅的过渡之中。正像共和二年的巴黎一样，制鞋匠始终充当引人注目的角色。这些手工工匠把潘恩的学说推向了极端，主张实行绝对的政治民主，彻底反对君主制和贵族，反对国家和税收。在热情高涨之时，他们是运动的坚强核心，这场运动一方面获得了数千名小店主、印刷商、书商、医生、教师、雕刻师、小师傅和非国教派教士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赢得了搬运工、拉煤工、劳工、士兵和水手的拥护。

该运动只造就出两位颇具影响的理论家，而他们又反映了运动核心的冲突。绸缎商的儿子约翰·瑟尔沃尔最为重要，他连接着华滋华斯、柯勒律治的世界和斯皮特菲尔兹织工们的世界。在这场运动衰落之后，毁谤“可怜的瑟尔沃尔”成了一种习惯，在 19 世纪早期，他被打扮成一个令人怜悯的人物，头脑空空，总是害怕受到起诉，而这种害怕又并非空穴来风，靠讲授演说术谋生。此外他还有平庸诗人的名声，这是他的另一个不幸——尽

[16] 参见 A.索布尔：《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巴黎，1958），第 2 卷。关于法国革命时“区”的社会基础的有益探讨，见 R.科布：《法国革命中的人民》，载《过去与现在》，第 15 期，1959 年 4 月。

管这个罪名在我们周围日日发生，但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却不能宽恕这一点。德昆西是"在极端厌恶雅各宾主义……和尊崇皮特的英名"的年代中长大的，他说过，"像瑟尔沃尔那样可怜而空洞的皮鼓"这样的话，这句话就表达着下一代有知识的激进派所持的流行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一直伴随他，直至今日。

然而，在杰拉尔德和马格罗特受审之后，运动需要有人站出来充当雅各宾派的杰出领袖，空洞的皮鼓是不行的。这个领袖要面对叛国罪审判，坚持到两项法案颁布之时乃至以后(图克和哈迪没有这样做)。要做到这些，领袖也许需要具备一点演员的气质。像演员那样装腔作势是英国雅各宾派(哈迪除外)的恶习，而且有时他们的做作看上去显得滑稽可笑。但是，那是一个花言巧语盛行的时代，一个"暴发户"的花言巧语还不如一个伯克的花言巧语编织得好。自由论坛(的确是真正自由的论坛)的华美词藻如果用来给雅各宾派鼓劲的话，那肯定能够得到谅解。而且，在1793至1795年之间发表的政治性文字中，瑟尔沃尔既有勇气也很谨慎。他在1793年这个年头里一直与伦敦当局进行公开的斗争，以维护发表演讲和进行辩论的权利。在被从一个个演讲厅驱逐之后，瑟尔沃尔最终得到了在博福特大厦的一处房屋(受到一个赞助人委员会的帮助)，将这处房屋用作他发表演讲和1794至1795年间协会一般性活动的中心。[47] 哈迪被捕后，他立即重振协会。当密探来旁听他的演讲时，他就把话题转到密探制度上；当有人试图挑起暴乱时，他带领听众平静地离开演讲厅。他修改过激的决议，提防挑唆活动。他对人群的支配能力很强，据说在最后一次反对两项法案的示威中与会者高喊"士兵们、士兵们！"的口号时，他宣讲协会愿与军队保持亲善

158

[47] 见C.塞斯特，前引书第74页起。

关系的意向，使人们打消恐惧，转而与之团结起来。

瑟尔沃尔在1795和1796年发表的演讲和撰写的著作无论在深度和观点的一致性上都领先于其他活跃的雅各宾派成员，他清楚地表达了英国对法国事件的一种估价：

> 我为法国革命感到自豪的是这场革命所坚持和宣传的原则，即：古代的流弊并不会因其产生于古代而转化为美德……，人拥有法令和惯例都不能剥夺的权利……，思想应有自由……知识分子有权运用其知识……，社会的一个等级无权掠夺和压迫社会的其他方面，无论它犯这种掠夺罪的时间有多长……这些都是我所钦慕的原则，尽管这些原则有过激之处，但它们使我对法国革命欢欣不已。

瑟尔沃尔在罗伯斯庇尔恐怖时期站出来宣称："法国发生的过激和暴力不是革命新学说的产物，而是由旧专制主义有组织的残酷行为所导致的复仇、腐败和猜疑等旧时陋习所引起的后果"。他认为自己对法国革命的支持既与无能的吉伦特派又和山岳派不同，他既批判"哲学家的愚蠢"，也批判"精力旺盛的党派的暴行"。但在罗伯斯庇尔死后，他立即就"皮特和罗伯斯庇尔性格的相似性"发表演讲： 159

> **罗伯斯庇尔**不公正地压迫富人，以维护他在穷人中的声望；**皮特**则忽视由于战争及随之而来的税收而压迫穷人，以维护他在富人中的威望。……**罗伯斯庇尔**制订出一部自由宪法，并建立暴政来直接反对它；**皮特**称颂另一部**自由**宪法，但践踏它的所有条款。[100]

这样做也需要勇气。

---

[100] 《论坛报》，1795年4月25日，5月23日；C. 塞斯特前引书，第173页起。

瑟尔沃尔一周两次的演讲稿发表在《论坛报》上，他运用了后来科贝特所采用的方法，将政治教育与对时事的评论相结合。他阐述了国际主义的恢宏精神，通过描述科希秋什科领导下的波兰民族独立斗争遭到镇压的情形来唤起读者。瑟尔沃尔的激进主义大体上局限于潘恩所确定的范围之内，但与潘恩相比，他更强调经济和社会问题。他道出了手工工人依靠适度劳动而获得独立生计的要求，谴责这种法律：它责备“贫穷的帮工联合起来”，“……而富裕的厂主、包工头和垄断者……却可以随心所欲地相互联合”。[⑯] 他放弃了“平均财富”的主张，指责遥远的土地国有化计划或乌托邦大同世界是“纯理论的货色”。瑟尔沃尔称赞独立开业的企业主，因为他们可以靠“自己的汗水”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如果不同时实行公正的分配，生产就是一件可鄙的事。……如果财产能够妥善地进行分配，那么少量的劳动就足以得到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与妥善的分配为敌的是“土地垄断”、圈地运动和“资本积累”，他从《人权论》发展到《自然权论》：

> 我坚持认为每个男子、每个女子、每个儿童应当从劳动果实的总分配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得到食物、破衣和烂床破被。而且，也不需要从6岁工作到60岁……每天工作12到14小时。他们有权——一种神圣和不受侵犯的权利——得到舒适的条件和娱乐生活……有权得到一些闲暇时间以进行这样的讨论，有权得到使他们的**权利**获得理解的途径或信息。……

160 这些“权利”包括“与雇主利润成比例的……分享产品的权利”和

---

⑯ 尽管结社法直到1799年才通过，但此举的作用只是加强了现存立法打击工会的力量。

受教育权利,根据后面这项权利,劳工的孩子可以跻身于"社会最高层"。此外,瑟尔沃尔还提出了很多汇入19世纪工人阶级政治洪流的思想和建议(《论坛报》和《自然权论》到19世纪还为激进派人士们所阅读),他努力为劳工们去寻找八小时工作制作为传统"准则"的出处。

我们可以说瑟尔沃尔为**手工工匠**提供了始终如一的思想体系,他在《自然权论》中作的进一步考察包括对于"财产的起源与分配"和"封建制度"的分析。像潘恩一样,当他在批判私人资本积累本身时望而却步的时候,他又寻求限制实行"垄断"和"商业"剥削,着力描绘小业主、小商人、手工工匠和劳工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们的劳动条件和时数、他们的健康状况和老年生活都受到保护。[111]

瑟尔沃尔将雅各宾主义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和革命主义的边缘。他的矛盾并不存在于他的思想里,而是存在于他周围的环境中,这是所有直到宪章运动时期及以后时期的激进主义改革家所处的两难境地。无代表权者的组织面临着迫害和压迫,他们如何实现其目标呢?像宪章派所称的,是成为"道义的"还是"实力的"力量呢?瑟尔沃尔不赞成普雷斯的教育渐进主义政策,认为它从属于中等阶级。他同意进行无限制的鼓动,但反对地下革命组织的极端行为。这就是他(和此后的改革派)所面临的困难境地,他们要在发表反抗言论和不战而退之间作出选择。在1792和1848年间,这样的两难境地不时重现。雅各宾派和宪章派是广大民众威胁的化身,但他们不愿进行任何实际的革命准备工作,在某些重要关头,他们总是在自己的支持者中失去

---

[111] 《论坛报》,第3卷;塞斯特前引书,第175页起;J.瑟尔沃尔:《自然权论》(1796),第1、2篇。

信心，要么就是受到其对手的嘲弄。

当然，伦敦通讯会的一些会员准备走得更远，不用说，从事非法行动的团体总有许多方面是不为人知的，因为它们都很小心，几乎不留下文字记录。但是，伦敦通讯会中的革命派始终以某种形式与托马斯·斯彭斯的名字相联系，斯彭斯是纽卡斯尔的一名穷教员（他早在1775年就在那个城市提出了他的土地国有化理论），于1792年12月来到伦敦。他因出售《人权论》当即被捕，但被无罪释放。他出版和销售小册子，起初是在法官巷的一家店铺，而后搬到小栅门街8号，再后来转移到牛津街9号，最后用手推小车叫卖，顺便还销售热汤（热黄樟汤）。普雷斯回忆道：他“身高不到5英尺，十分诚实、朴实和真诚可靠。他热爱全人类，相信人变得善良、聪明和幸福的时代将会到来。他对待人世的方式很不现实，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他制作传单，大幅印刷品，发行《猪肉》期刊（1793—1796年），还用粉笔书写标语。1794年5月至12月，他在人身保护法中止实行期间入狱。在1795至1797年间，他除了出售传单、小册子之外还铸造雅各宾的纪念币。1801年他再度入狱，获释后，规模不大的斯彭斯协会仍是一个鼓动中心，并一直坚持到他于1814年去世及以后一段时间。

从斯彭斯使用的社会改造良方和拼音书写方法（他用这些书法出版了他在1801年受审的记述）来看，人们会轻易地将他视为怪人。但在1794年的叛国罪审理过程中，有人提出证据说他的店铺与武装操练有关；而在伦敦通讯会的后期，好几名领导人是地道的斯彭斯派，包括托马斯·埃文斯和亚历山大·盖洛韦。斯彭斯用潘恩的观点抨击世袭贵族，并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必须不仅剥夺个人的和世袭的贵族权力，而且要毁灭它的基础，即私有地产”：

通过阅读我的小册子，公众在精神上做好了准备……几个先遣教区只要宣布土地归它们所有并召集一个各教区代表大会，其他邻近教区将……照它们的样子去做，并派遣代表出席会议，由此，一个美好、强大的新共和国将生机勃勃地在瞬间诞生。战争的力量和资源立刻以这样的方式转到人民的手中……，暴君将变得软弱无害……岁入和地产是产生暴君的来源，将这些剥夺，他们的权力就永不能再增长，永不能颠覆我们自由的圣殿。

162

至于斯彭斯本人是否直接参与暴动密谋（与一般的煽动行为不同），人们还不清楚。但是，他对那些地下活动方式深信不疑，诸如秘密印刷品、匿名传单、炭画的路标和酒馆俱乐部，也许还有食品暴乱等等。在受审时，斯彭斯称他自己为“亚当的被剥夺继承权的子孙们的义务辩护者”。他的宣传几乎不可能在城市赢得大量追随者，也从未深入到任何乡村地区。然而，斯彭斯的一个追随者托马斯·埃文斯最早使斯彭斯的农业社会主义有了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埃文斯所著《拯救帝国的基督教制度》在对法战争结束时出版，他在书中要求：

所有土地、水源、矿山、房屋和所有永久性封建财产都必须归还给人民……并像教会那样，以伙伴关系来进行管理。

其强调的重点仍放在“封建”财产上，与商业或工业的财富相对。但是，关于阶级的定义比潘恩所下的任何定义都更加清楚：

首先，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解决人民的财产，即国有资产问题，这个解决方式将使所有人受益……并在各个方面引起真正激进的改革。所有不包含这项解决方式的改革努力**只能会导致实际上的毁灭**……，将不会

触动社会上相关的阶级。

埃文斯的著作确实属于战后时代,但他是伦敦通讯会的最后几位书记之一,这使我们意识到斯彭斯派作为在战争期间惟一成功地保持不变的英国雅各宾团体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且,另一个传统尤其与这个团体有关。为《女权》和性别解放奋斗的人主要限于一个知识分子小圈子里,包括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温、布莱克(后来还包括雪莱)等人。斯彭斯是向劳动妇女宣讲自己著作的雅各宾派宣传家之一,他写的一篇评论潘163 恩的《农业正义论》的文章的标题是《婴儿之权利,或不可剥夺的母亲分享自然物之权,该权为哺育和抚养后代的必不可少之条件》,该文以一位妇女和一位贵族间的对话形式发表。由于妇女发现她们的丈夫"令人遗憾地忽视和不重视他们自己的权利",因此妇女不得不声称:"我们妇女要自己争取自己的权利"。在后来的一本小册子中,斯彭斯为平民百姓争取自由离婚的权利:

> 这个问题在这个国家得到人们衷心的理解。人们认为婚姻之神的锁链应……在发生革命时首先予以砸碎,家庭生活事务应交由爱神掌管。尽管爱神有些异想天开,但他不像狱吏般的上帝那么严厉。

"如果人们不能使他们家庭中的弊端得以消除,那么政府的改革和公共弊端的消除又有何意义?"[11]

---

[11] 普雷斯文件中关于斯彭斯生平的资料,附加手稿,第27808号;O.D.拉德金:《托马斯·斯彭斯和他的团体》(1927);A.W.沃特斯:《1801年对斯彭斯的审判》(利明顿温泉,1917);A.达文波特:《托马斯·斯彭斯的生平、著作和原则》(1836);托马斯·斯彭斯:《猪肉:婴儿的权利》(1797)、《将社会复归至其自然状态者》(1801);科尔和菲尔森前引书,第124—128页;T.埃文斯:《拯救帝国的基督教制度》(1816),第14、33页;和《斯彭斯传》(曼彻斯特,1821)。

普雷斯在两项法案颁布后写道:“一些会员认为再开会是危险的,另一些会员认为这样做是徒劳的。整个局势迅速走向衰落。……在会员减少之后,协会的事务反而增多了。”总委员会派出代表巡视那些停止活动的或懒散的分会:“我记得我不得不在一个晚上如此巡视三个分会之多,并对其玩忽的状态予以训斥。……与地方上的通信数量也十分庞大。”[112]

协会感到它被密探所包围。(宾斯说过:)如果瑟尔沃尔走进一家牡蛎餐馆或红烧牛肉馆,“他可以想象屋内半数以上的厢座里坐着政府密探”。乔治·坎伯兰是布莱克的朋友和做雕刻活的同事,他写道:“人们听到的消息只是英国在绞杀爱尔兰人、猎捕黑奴、食旺代人的肉,并做起了人肉买卖。”他只要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一份早餐,立即就会有“某个陌生人穿戴讲究地坐到我的厢座对面的座位上”。[113] 瑟尔沃尔在雅茅斯遭到水手的袭击之后,继续巡回演讲。他又在林恩、威斯贝克、德比、斯托克波特和阿什比德拉朱什等地的会议上遭到“水手、武装团伙和龙骑兵”的袭击(地方官员还拒绝提供保护)。瑟尔沃尔被聘为《德比信使报》编辑,但两个星期之后被迫辞去该职。

164

瑟尔沃尔最终弄到崩溃的边缘。那些在他奔波于东盎格里亚和北部地区时接待他的“手工工匠、小店主、非国教教士、教师”受到各方的恐吓。1797年,法国入侵的担忧日益增强,武装

---

[112] 附加手稿,第27808号。普雷斯于1796年夏退出执行委员会、1797年3月退出总委员会并于1797年6月退出该会。鲍威尔的密报(枢密院档案,第A38号)表明两项法案通过之后协会吸收新会员的工作几乎停顿了。16个分会在1796年1月没有开会,2月份定期参加各分会会议者仍有1094人,3月份为826人,5月份为626人,6月份为459人,而11月份只有209人。普雷斯在1796年12月仍被任命为助理书记。

[113] 宾斯前引书,第44页;D.V.厄尔德曼前引书,第272页。

忠诚协会和自愿军团纷纷组建，它们像反对法国人那样反对国内的密谋团体。[11] 瑟尔沃尔在1796年已开始与年轻的柯勒律治通信，柯勒律治在布里斯托尔宣讲万民平等理论，他很喜欢瑟尔沃尔的《自然权论》。他在1797年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他无所畏惧、口才出众、诚实可靠。如果黑暗和风暴降临的话，瑟尔沃尔最有可能对下层阶级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在1797年夏，瑟尔沃尔的情绪低落，7月他在斯多威造访柯勒律治，与柯勒律治和华滋华斯一起在乡间徒步远足，对他们的平静生活羡慕不已：

……这是多么美好啊，
我们友善地相互帮助，
边翻松小园中的土地，
边亲切交谈，放松双肩，
时而把锹插在土中，有人热切地提议，
有人倾听，掂量着每句富有想象的话语，
思考着适宜的回答……

这是抒情歌谣兴起的年代，诗人们是政府密探监视的对象，他密报了他们与"一个黑发平头、戴着白色帽子的矮小壮实的人"热烈交谈，这个人是雅各宾分子。瑟尔沃尔决心放弃公共生活：

噢！让我远离公共生活的厮杀，
(在这里理性的警记不再听到，
他吹起真理的号角，
却唤醒争权的暴徒，
制造最疯狂的混乱和流血。)

165

[11] 1797年2月，法国人确在彭布罗克郡菲什加德附近的海岸进行了小规模登陆。见E.H.S.琼斯：《对英国的最后一次入侵》(加的夫，1950)。

啊！让我远在与世隔绝的山谷中，
垒筑我的小屋。塞缪尔，我最挚爱的朋友，
能与你在一起与你经常亲切交谈，
也许是人间最大乐事。

然而，柯勒律治已对“真理的号角”感到厌倦，正打算砸烂他自己的“煽动号角”。他以友好但坚定的口气回答瑟尔沃尔说：“在目前，我认为你住在这里是弊远大于利。”[15]

与此同时，宾斯和琼斯正在候审，伦敦通讯会拒绝退让。在1796年大选中，威斯敏斯特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辉格党——激进派联盟，福克斯在竞选场地宣称：“英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比这个(政府)更令人憎恶的政府。……这个政府在对外战争中比路易十四断送了更多的生命，又想在国内比亨利八世加害于更多的无辜者。”在此后的10年中，福克斯反对派(纳米尔派历史学家对它竟无法理解)与陪审团制度一起是英国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福克斯本人毫无困难地进入威斯敏斯特的议会，而伯克的“杀人犯”之一霍恩·图克也获得了近3000张选票。[16] 在诺里季，教友派上层人士巴特利特·格尼在爱国会的支持下与陆军大臣温德姆展开竞选。与在威斯敏斯特一样，这里的选举权范围很广。格尼赢得了当地自由民的大部分选票，但被从伦敦输入的外来选民击败。在瑟尔沃尔看来，如果格尼不是一个软弱无力、不住在当地的候选人，“劳动自由民们”本来是会赢得选举的——格尼本人甚至连竞选场所都不去。在诺丁汉，克朗普顿

---

[15] J.瑟尔沃尔：《主要作于隐居期间的诗歌》(赫里福德，1801)，第30、129页；塞斯特前引书，第142页起；内政部档案，第42.41号；E.布伦顿(编)：《柯勒律治研究》(1934)。

[16] C.J.福克斯获5160票、A.加德纳爵士4814票(均当选)，约翰·霍恩·图克2819票(未当选)。

在雅各宾派的支持下获得了数目可观的选票。[41]

166 协会在1796年底开始瓦解。它在那一年的秋天仍有力量出版一份颇有分量的《道德与政治杂志》，虽然普雷斯明智地警告说，此举将耗尽协会的财源。该刊在很大程度上靠汲取瑟尔沃尔的思想源泉维持出版。尽管协会的新书记约翰·博恩（从改革协会重新返回）在1797年1月印制一份通知发给所有会员，谴责他们不参加协会活动，但是在这个月仍有18个分会缴付会费。这年夏季，协会开创了露天政治宣传的悠久传统，它以非国教和卫斯理宗的户外传教士为榜样，每个星期天都在伦敦城路附近，在伊斯林顿、霍克斯顿、海克内、霍恩塞、贝斯诺尔草地等处发表演说，其内容将雅各宾派的宣传与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糅合在一起。（里德说）他们还开始有计划地渗入互济会，这一发展对非法时期的工会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1797年7月，他们在圣潘克拉斯召集公众集会，公然反对两项法案，与会者人数可观，但集会被市政官员驱散，讲坛上的6名会员（包括宾斯）被捕。与外省的通信渠道继续保持畅通，诺里季爱国会在7月写道："我们仍然坚守岗位……还是准备公开活动，而不准备放弃它……"。然而，通信更加困难了，该会启用了5个新地址，这些都是不被怀疑的店主的地址，而且"我们有时将还会像上面做的那样变更地址"。在7月逮捕行动之后，斯彭斯派的托马斯·埃文斯出任书记。11月，总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发表一项声明谴责"意志薄弱者"，这些人散布群众结社一事无成的观点。声明还

[41] 瑟尔沃尔：《自然权论》，第1篇，第25—29页。诺里季：H.霍巴特获1622票、W.温德姆1159票（均当选），巴特利特·格尼1076票（未当选）。诺丁汉：卡林顿勋爵1211票、D.P.科克1070票（均当选），克朗普顿医生560票（未当选）。

保证要使伦敦通讯会坚持到底，但在声明上签字的仅有7人。[18]

然而，有证据表明，伦敦通讯会此时至少分为两派：一派坚持以准合法的形式存在下去（仍公开发表其会议记录），另一派则建立非法组织。有些人也许两派都参加了，比如约翰·宾斯，他的兄弟本杰明，还有约翰·博恩等。历史学家对地下活动的证据嗤之以鼻，但是在1796至1801年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地下活动，人们反而会感到惊奇。其实，工人们对这类活动并不陌生，通信员定期来往于英国各地，从事违法的工会活动。尽管当局窜改文件，再加以挑选，造成耸人听闻的样子，但是，没有证据表明1799年由《秘密委员会报告》提交的文件是伪造品。

167

雅各宾派的“地下活动”使我们联想到英国流亡者在巴黎的聚居地和苏格兰织工的暴动（特拉仑特，1797年），但更重要的是想到英格兰雅各宾派与联合爱尔兰人之间的关系，后者所进行的愤怒的暴动于1798年剧变为一场公开的战争。但对英国来说，最具意义的革命征兆是1797年4月和5月发生在斯皮特里德和诺尔的海军哗变。毫无疑问，哗变前那里的食品、工资和纪律状况令人震惊，但是也有一些证据表明雅各宾派直接进行了煽动。有些哗变者本身就是通讯会会员。理查德·帕克勉强地出任诺尔“海上共和国”的“司令长官”，他本身就代表着受过教育的“吃份子粮的人”，他们将《人权论》的声音和组织委员会的经验带入了舰队。11500名爱尔兰水兵和4000名爱尔兰陆战队是革命的又一个因素。一个参加哗变的人在写给“海军部高级专员”的信中说：“要是我理解你们的套话和漫长的公告，我

---

[18] 《伦敦通讯会道德与政治杂志》，1796年11月号；枢密院档案，第A.38号；内政部档案，第65.1号；伦敦通讯会通信集，附加手稿，第27815号；里德前引书，第17—20页。

就瞎了眼”，

一句话，马上把那些我们应得到的东西发给我们，其他的等我们去抓我们国家的流氓和敌[敌]人时再发。

这也许曾是大多数哗变者的语言。但在那个事态紧张的星期中，泰晤士河被封锁，哗变者中有人谈论将舰队开往法国(确有几艘舰只在绝望中最终去了法国)。水兵们行动的突出之处并不是他们的“绝对忠诚”或雅各宾主义，而是他们情绪发生变化时的“野蛮和放肆的本质”。理查德·帕克在其遗言中正是就这种易变性忠告朋友们：

要记住：永远不要为下层阶级去奔忙，因为他们无知、自私、忘恩负义，针尖大点小事都会把他们吓住，他们会在某个时刻把一个人捧为领袖，而后他们又会尽情欢呼雀跃地看着他走上绞台。我在对你们说这些话时心里感到疼痛，但……我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我很快就要成为其例证。

但在同一时刻，他宣称他将作为“一名人类事业的烈士”而死去。[11]

这些重大的哗变和第二年发生的爱尔兰暴乱的确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表明英国古老政权的控制是多么靠不住。对英国舰队来说，宣称“理性时代最终到来”，就是威胁要颠覆整个世界的权力大厦，因为这支舰队是欧洲扩张的最主要工具，是横亘在革命法国和它的头号对手之间的盾牌。有些人认为，由于大多数水兵几乎不具有明确的政治观念，所以这只是舰上饼干供

[11] G.E.曼纳林和B.多布雷：《海上共和国》(企鹅版)，尤其见第200、246、265—268页。该书的叙述低估了雅各宾派在舰队中影响的证据，C.吉尔在《1797年海军哗变》(1913)一书中对此作了更加详尽的探讨。

给和拖延发饷之类的小事，并不是一场革命运动。这种观点是糊涂的，它弄错了人民革命危机的性质，这种危机恰恰是大多数人的不满与具有政治意识的少数人所表达的愿望相结合的产物。但在同时，伦敦通讯会对待这些哗变的态度并不清楚。有证据显示水兵们参加了查塔姆和朴次茅斯的雅各宾派会议，而且伦敦通讯会的个别会员也与军舰上的代表联系，甚至向一群群哗变者发表演说。据说，一位身份不明“着黑色服装的绅士”曾与帕克和他的伙伴联系，这个人也许就是沃森医生，他此时确在为法国入侵做准备工作。但(根据后来的一次作证)，伦敦通讯会方面否认沃森为该会会员。[19]

哗变以一种最剧烈的形式使得伦敦通讯会会员中对共和国的同情和对民族的忠诚二者之间的冲突有可能产生。正是在这段时间前后，亲法国的革命派(内有许多爱尔兰移民)已经能够 169 同比较坚定的立宪改革派区分开来了，而后者中的许多人(像普雷斯)此时正在渐渐抽身。在哗变发生之后不久的 1797 年 6 月，一个名叫亨利·费洛斯的人因在梅德斯通向军队散发传单而被捕，他是伦敦通讯会的一个密使，他在一封写给身在伦敦的约翰·博恩的信中报告说：“梅德斯通协会的两个分会仍在活动(有 60 人参加会议)，要求送更多的传单来(尤其是散发给爱尔兰士兵的传单)以及“波拿巴的演讲”和潘恩的《农业正义论》。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又有两项法案获通过，规定对犯有非法起誓和

---

⑲ C.吉尔前引书，第 301、319、327 及 339 页起，附录 A；关于沃森，见枢密院档案第 A152 号亨利·黑斯廷斯的作证。《英国人物传记》富于激情地叙述的有关整个欧洲范围内先觉派和雅各宾共济会的密谋显然与英国毫无关系，尽管这些密谋也许对爱尔兰发生的事件具有某些影响。见阿贝·巴鲁埃尔：《有关雅各宾历史的回忆录》，Hon. R. 克利福德翻译并加注(1798)，第 4 卷，第 529 页起。

企图诱使武装部队放弃忠诚的人处以死刑。[121] 紧接着，一个名叫理查德·富勒的人因向寒溪卫队的一名队员散布煽动性讲话而被逮捕、处死。

伦敦通讯会已采用新的会章，它经过修改更适合地下组织的需要，防止密探的渗人。与此同时，一个秘密委员会在霍尔本的弗尼瓦尔旅店地下室开会，这很可能是联合英格兰人的一个大本营。联合英格兰人基本上是联合爱尔兰人的附属组织，实际上，这两个组织在英格兰几乎难分彼此。该组织用切语或暗号进行联络，密使们都使用口令和手势：

> ……你伸出你的左手与他的左手相握，然后用你的拇指揿压他食指的第一关节，他也同样做，这就是可靠的讯号——其中一个人说“团结”，另一人答“真理”——或一个人说“自由”，另一人说“死亡”……

在伦敦，新加人这个组织的人中包括约翰·宾斯、本杰明·宾斯和德斯帕德上校。有一个分部在威尔克洛斯广场的“公鸡与海神”酒馆开会，密探由此报告说“参加会议的人以挑煤脚夫为主”。如果说该组织在伦敦的成员主要是泰晤士河畔的爱尔兰劳工的话，那么据称它还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拥有不少于50个分部，此外还在兰开郡东南部的纺织村庄中拥有一些分部。[122] 该组织在曼彻斯特还成功地打入了军队，组织一些轻龙骑兵举行宣誓：

> 面对上帝，我某某，发誓不服从上校，只服从……人民，不服从长官，只服从联合英格兰人委员会……，尽我最

---

[121] 这部惩治非法宣誓的法案就是后来打击卢德派和“托帕德尔烈士”的那一部。

[122] 一个受审的囚犯于1798年5月作证说曼彻斯特协会“由于该协会内的绅士和机工之间的争吵”而在1796年“大为衰弱”。机工们好像进而组建了联合英格兰人的分部，内政部档案，第42.45号的另一份证词上列出了29个分部。

大的努力用武器去帮助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建立共和政府，帮助法国人登陆以解放这个国家。

(这段誓言在发音上都表现出爱尔兰风格。)但是，当秘密组织显然已扩大到爱尔兰人的圈子之外时，密谋者们的观点似乎在1798年春发生分歧。一方面，本地雅各宾派似乎在利用各种伪装继续活动，1797年夏季，罗奇代尔和罗依顿的"自由之友会"大概与曼彻斯特的一个自称为"向曼彻斯特和附近地区工人传播知识会"的中心有来往；1798年2月，在博尔顿，一个密探(通过宣誓)成功地加入了联合英格兰人，当地领导人"推荐一个对改变政治信仰大有作用的图书俱乐部"。在索恩利，一位爱尔兰牧师于1798年2月接待一个同胞，他是共济会成员(一位"奈特·坦普勒")，夸口说曼彻斯特的联合英格兰人拥有两万名成员。(这位教士写信给当局说)"由于我是神父"，所以这个人感到可以信任他，并把秘密告诉他。博尔顿的一位牧师同一个月里在写给波特兰公爵的信中说："他们似乎并不完全赞同法国干涉——一些人说他们能够管好自己……"[13]

1797至1798年冬季，爱尔兰教士奥科依格里神父使用"琼斯上尉"的名字往返于兰开郡、爱尔兰和法国之间。1798年初他来到伦敦，当时约翰·宾斯正设法在肯特的几个港口寻找一个愿意将奥科依格里和阿瑟·奥康诺带到法国去的走私者，他们3人均被捕。在奥科依格里身上查出一份文件，讨论在入侵发生时如何在英国迎接法国人。尽管英国人怀有许多不满，但是他们也担心法国人会把英国削弱为一个省，因而，法国人被告知，他们在登陆之后应发布一项公告：1. 不列颠诸岛将建成"几个 171

[13] 《秘密委员会报告》(1799)；各种史料载于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33号和4406号；枢密院档案，第A152、A158、A161号；内政部档案，第42、43/6号。

独立的共和国";2. 每个共和国将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3. 所有投靠入侵一方的人将发给武器;4. 除征收必要的入侵开销费用之外,不得再征收其他捐税;5. 法国应索取的仅限于那些被反法同盟夺走的船舰和海外属地。被捕后,奥科依格里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拒绝供出同谋者,终遭处决。宾斯受神灵庇护,被认定不犯有叛国罪,在被指控犯有较轻的罪行之前,他就化名藏匿于"德比郡和诺丁汉郡,我在那里有许多朋友"。[13]

同情爱尔兰暴动的不仅限于像宾斯这样的爱尔兰人,伦敦通讯会于1798年1月30日发布《告爱尔兰民族书》,该文件由伦敦通讯会主席R.T.克罗斯菲尔德和该会书记托马斯·埃文斯签署:

> 致慷慨和英勇的民族
>
> 希望本《告爱尔兰民族书》能使你们相信我们是多么真诚地同情你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希望各民族……懂得"现存状况"始终是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专制主义所推崇的格言。而当一个民族允许政府违背真正的自由原则时,侵犯行为将愈演愈烈,罪恶将滋生出罪恶,亵渎之举将接踵而至,权力将产生出权力,直至所有民族的自由操纵在专制寡头的手中……

这是一篇激动人心的檄文,洗刷了英格兰人全体参与镇压爱尔兰人的罪名,该文还呼吁驻爱英军士兵拒绝充当"奴役爱尔兰的代理人"。它使协会能够体面地"当众下台"。1798年4月,埃文斯和其他幸存的委员们被捕,当时他们还在激烈争论法国入侵时应采取什么行动。托马斯·埃文斯认为法国政府背叛了革

---

[13] 《秘密委员会报告》(1799)各处;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33号;枢密院档案,第A152号;宾斯前引书,第4—6章。

命事业，似乎“更想建立一个广泛的军事专制政权，而不是宣传共和原则”。因而，他提议会员们应加入志愿军。克罗斯菲尔德医生赞同埃文斯的指责，但宣称伦敦通讯会不应以虎制狼，这时，弓街巡警结束了这场争论。[15]

前一天，德斯帕德上校和联合英格兰人的3名成员被捕。172 我们对1799年秘密委员会关于该组织的力量的言过其实的报告完全可以不予理会：

> 英格兰各地曾与伦敦通讯会保持通信联系的协会中，大部分……采纳了建立联合英格兰人协会的同样计划……，它们所赖以行动的有害原则，由于在社会最下层阶级中建立俱乐部而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在俱乐部中人们唱的歌曲、发表的祝酒辞和使用的语言都具有极端的煽动性质。

但在同时，历史学家们没有理由毫不犹豫地接受普雷斯的说法。按照他的说法，联合英格兰人是一个死胎，其成员人数从未超过一打。[16] 普雷斯长期以来不仅反对非法组织，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群众鼓动活动，他赞成安安静静地进行教育工作。他在1797年退会，肯定不会再取得密谋者的信任。表明该组织在兰开郡存在的证据很充足，财政部司法处文件和枢密院文件中密探的报告也谈到几个伦敦分部的活动。有两名密探声称他们曾参加一个总委员会，其中有来自肖迪奇、霍克斯顿、伯思诺尔草

[15] 见H.柯林斯前引书，第132页；R.霍奇森：《伦敦通讯会总委员会的活动》（新门，1798）；《秘密委员会报告》（1799），附录，第70—73页；H.C.戴维斯前引书，第92—93页。

[16] 附加手稿，第35142号，第42—46页起。也许，普雷斯的说法已被接受，因为该组织在性质上是一个地下组织，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件，因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并无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可言。

地各分部的代表，代表们在艾平森林接受军训(1798 年 9 月)。还有一个名叫“自由之子”的组织与之相竞争。[17] 据奥科依格里随身所带的“英格兰秘密委员会致法国督政府函”中宣称：“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领袖”：

> 一些人数不多的富人的确通过言论表白他们是民主的朋友，但他们没有行动。他们认为自己与人民不同，而人民也认为他们对人民有利的话是不公正的和没有意义的。……
>
> 我们现在只是在不耐烦地等待那位在意大利的英雄和那些伟大民族的勇敢战士。数不尽的人将在他们到来时高兴地大声欢呼……[18]

173 真实情况是复杂的。一方面，“数不尽的人”远未采纳“英格兰秘密委员会”所声称的立场，他们到 1798 年时卷入因预计法国会发动入侵而引起的爱国热潮。事实上，这些年头的志愿军运动也许并没有使法国人感到惊恐，但它是教会和国家镇压国内雅各宾派的一支辅助力量。[19] 普雷斯的下述看法也许是正确的：他认为在当时伦敦的极端主义者圈子中存在一些天生的密谋分子。他们生活在一个偏执妄想的酒馆世界中，与现实的交往不多，其宣言(如果法国人相信这些东西的话)将使人误入歧途。理查德·沃森医生(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原是伦敦通讯会会员，我们已注意到他与海军哗变有某种形式的联系。1797 年，沃森因取道汉堡向法国传递情报而被捕。“公民沃森”于 1799 年获释时写给法国督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称自己为“伦敦

---

[17] 约翰·滕布里奇和金特的报告，枢密院档案第 A144 号。

[18] 《秘密委员会报告》(1799)，第 74 页。

[19] 见 J.R. 韦斯顿：《作为反革命势力的自愿军运动，1793—1801》，载《英国历史评论》，1956 年，第 603 页；至于自愿军的不足之处，见《城市工人》，第 87—89 页。

通讯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不列颠联盟成员和巴思、布里斯托尔等地协会的代表”。逃到法国后，他又以同样夸张的口吻向英国发表演说。[130]

但其他的密谋分子就比较严肃，就像德斯帕德上校于1803年在刑场上所表现的那样。[131] 到1797年时，一些极端的雅各宾分子显然开始对合法的煽动活动感到失望，从这时起的20多年中，伦敦的一小群民主派（斯彭斯派和共和派）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政变，也许还由法国军队提供援助，通过某种程度的暴力行动能刺激伦敦“暴民”行动起来支援他们。阿瑟·西斯尔伍德和另一个沃森医生于1816年所继承的正是这一传统。该团体中的几个人，包括理查德·霍奇森和约翰·阿什利（鞋匠，前伦敦通讯会书记）在18世纪90年代后期去法国避难。到1817年时，他们仍留在那里。事实上，该团体的两名成员在同年返回伦敦这件事本身就是向西德默思勋爵本人提出大惊小怪的报告。[132] 174

因此，雅各宾的密谋者确实存在，而且他们的执着态度足以使他们甘冒生命危险、不怕坐牢和流放。但是，他们的那种密谋具有某种偏激性质和抽象的共和主义狂热，与时代格格不入。而且，随着奥科依格里被处决、爱尔兰暴动被挫败以及伦敦和曼彻斯特的领袖们被逮捕，密谋活动已不再是全国性的活动了。在地下组织依然存在的地方，这些组织要么陷入孤立境地，要么开始重新植根于其所在的工业背景中。1799年制定的特殊法规点名对伦敦通讯会和联合英格兰人进行“严厉镇压、彻底查禁”，甚至连不屈不挠的密谋者约翰·宾斯也认为全国性的组织

---

[130] 枢密院档案，第A152号中的多份文件；米克尔前引书，第171、第191—192页；《督政府秘档》，共和七年霜月2日；《英国人物传记》。

[131] 关于德斯帕德，见下文，第478—484页。

[132] 1817年4月13日G.桑斯特致西德默思函，内政部档案，第42.163号。

无望进一步得到发展，并试图与枢密院达成一项互不侵犯协定，尽管这一努力的结果是他成为格洛斯特监狱的客人，在狱中服刑。宾斯在被捕时，随身携带着一张“口才学校季票”，这也许是为伦敦通讯会“打掩护”的最后一批票证之一了。[13]

到1799年时，几乎所有当初的领袖们都被关入监狱或在流亡。其中埃文斯、霍奇森、博恩、宾斯、加洛韦、德斯帕德和约翰·巴克斯特都在坐牢。与30年前的威尔克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监狱的境遇不尽如人意，根据托马斯·埃文斯本人的叙述，他

> 被押解到监狱，关在一个单人牢房中达许多月份之久。
> 牢房中只有麦草铺、一条毯子和一堆破布，没有书籍、
> 钢笔、墨水、纸和蜡烛，许多时间还不准生火。

他的住宅被弓街官员查封，妻子和孩子被软禁。埃文斯被囚两年零十一个月。冷泉地监狱的阿里斯狱长给予囚犯的待遇是一件丑闻，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带头对此予以揭露。伦敦民众的自由倾向在以下事实中得到反映，即伯德特为囚犯而进行的斗争使他赢得了只有先前威尔克斯能与其相比的声誉。在许多年里，伦敦最流行的口号是“要伯德特不要巴士底！”埃德蒙·德斯帕德上校就是在伯德特的帮助下获释的囚犯之一。19世纪激进主义的历史就是从这两个人开始的。[14]

175

> 经验值钱几何？人们用一首歌能买到它吗？
> 或用一个街头舞蹈能买到智慧吗？
> 不，一个人只有用他拥有的一切

---

[13] 枢密院档案，第A152号；宾斯前引书，第140—141页。

[14] T.埃文斯：《基督教制度》，第4页；《理性人》，1808年3月26日；《约翰·奥克斯雷德之口述》，附加手稿，第27809号；枢密院档案，第A161号。

他的房屋、他的妻子和孩子才能买得到。
智慧在荒芜的市场上出售，没有人前来购买，
智慧在地力耗尽的田地里，农夫徒劳地耕种
收获。

威廉·布莱克在1796至1797年完成的《瓦拉——四种生物体》一书中这样写道。随着雅各宾分子转入更为隐秘的地下渠道，布莱克本人的预言也变得更加神秘晦涩、秘而不宣。许多人在不少年里仍被监禁：基德·韦克是戈斯波特的一个图书装钉工，由于说了“不要乔治、不要战争”的话，而在1796年底被判处5年苦役和枷刑。（布莱克本人在1803年也差点受到同样的指控）；书商约翰森被囚禁，他是戈德温的朋友；兰开郡和林肯郡对犯有煽动罪者起诉；萨默塞特的一个编篮匠因说了“我祝愿法国人取得成功”而下狱。[135] 内政部的波特兰公爵亲自发出指令，查封以酒馆为活动场所的协会，并将出售价格半便士的斯彭斯传单的小孩子关入教养院。[136] 在哈克内，行为古怪的古典学者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从他的藏书中寻找根据，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劳工阶级在法国入侵中不会遭受什么损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住宅周围方圆三英里之内，忍饥挨饿处境悲惨的人……其数字比地球上任何可居住地区同样面积内的这种人都要多。”[137] 他与福克斯的友谊和他本人的学术地位都未能使他幸免入狱。布莱克在沃森主教写的《为圣经辩护》一书的书名页上注道：“恶棍与妓女无限制地统治，在1798年这一年，为《圣经》辩护将使人送命。”基德·韦克确实死于狱中，而威克菲尔德只是

[135] 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5390号。
[136] 内政部档案，第119.1号第65.1号。
[137] G.威克菲尔德：《答兰达夫主教》(1798)，第36页。

在临死前才获释。

镇压行动使最后一批雅各宾知识分子脱离了手工工匠和劳工。法国的情况在华滋华斯看来：

176

> ……一切都被军事强权的镣铐
> 所窒息，文明行动中那
> 变换的目标、不同的作用
> 和高尚的品质都屈从于那
> 刻板、可憎和卑鄙的强权。
> 害怕变革的乌云笼罩不列颠；
> 怯懦者受到称赞、奖赏和擢升，
> 从一个正当的蔑视冲动
> 中，我又一次退入自我。

革命幻想破灭的模式就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开始产生，它预示着我们这个世纪中那种更低劣的模式。由于受挫于万民平等的幻想，悔过者们对雅各宾派思想上的谬误予以抨击。1797 年夏，诗人们在昆托克斯与瑟尔沃尔一起散步时，来到一处美丽的、群山环抱的小山谷中。“公民约翰，”柯勒律治说道：“这是谈论反叛的一个好去处。”“不，公民塞缪尔”，瑟尔沃尔答道：“这倒是个让人忘却有任何必要发动反叛的地方。”这段轶事预示着第一代浪漫派诗人在政治上的“变节”，其中骚塞最卑鄙，柯勒律治最复杂，华滋华斯最痛苦最自疑。1799 年，柯勒律治在写给华滋华斯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写一首无韵诗，给那些因法国革命彻底失败而失去人类进步的希望、而沉湎于自私自利地追求享乐、并以一心持家、不屑于哲学幻想为借口的人……”。在此时，瑟尔沃尔早已隐居于南威尔士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场中。(到达那里时，瑟尔沃尔吃惊地发现他被一个密探盯梢，这就是迫害狂吗?)正是在这个地方，华滋华斯最后一次拜访了他；也正

是在这样的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他在《远足》中描述了独居者的生活，构思那些千年王国的幻想。[138]

在另一端，我们看到缺乏组织的、遭受迫害的工人们，他们没有全国性领袖，竭力维持某种非法组织的延续。他们的困境 177 在利兹一个协会致伦敦通讯会的一封信中得到充分的展示，这封信是在1797年10月以约100名会员的名义写成的：

> 我们大多是干活的机工由于此地的小生意人我们事业的朋友没有什么人敢公开站出来因为贵族势力很大所以能够把所有行业控制在他们手中因此有力量胁迫揭露腐败制度的罪恶的人。大约3年前这里有一个很不错的协会但我们这里治安法官很专断可怕地施加于我们的朋友们身上所以他们的士气已低落到一般以下他们心间的圣火也差不多熄灭了……。

所有酒馆老板都不敢接待他们，而且他们的会员证也"十分紧缺"，"因为城里没有一个印刷商敢承接我们的业务"。[139]

把这看做是结束是错误的，因为它也是开端。在18世纪90年代，某种像是"英国革命"的东西发生了，它在造就战后工人阶级意识方面具有深远意义。的确，革命冲击在其初期就被扼杀，所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痛苦和失望。统治阶级的反革命恐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出来，反映在对待工会的态度上、对待人民教育问题的态度上、对待他们的体育活动和言谈

---

[138] 瑟尔沃尔并不像一个独居者，他继续从事激进主义政治活动。战争期间他靠教授演说术维持生计；1818年11月重新出现在威斯敏斯特的激进讲坛上，《女怪》说："人们大吃一惊，如同见到一个人死而复生似的"（1818年11月21日）。此后，他编辑《斗士报》，受到检查部门的干扰；参加1831至1832年的《改革法》宣传。但他无法与新运动相协调，其著作也缺乏早年的独创性和战斗性。

[139] 伦敦通讯会通信集，附加手稿，第27815号。

举止、对待他们的出版物和结社以及他们的政治权利的态度上；而战争期间老百姓的失望则在南方小农的颠倒的千年至福主义和卫斯理宗的新的复兴里得到解脱。1795年后的数十年中，英国各阶级深刻地离异，工人们被抛进隔离状态，其影响（在社会歧视和教育歧视等各方面）直到今天仍能感觉到。英国在这方面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反革命情感和纪律的潮流恰与工业革命的潮流同时发生，随着新工艺和新工业组织的发展，政治和社会权利则被削弱。没有耐心而具有激进思想的工业资产阶级与178 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天然"联盟刚刚建立就崩溃了。伯明翰和北方工业城镇中工业家和富裕的非国教小生意人的骚动基本上发生在1791和1792年，伦敦、诺里季和设菲尔德手工工人和雇佣劳动者"不满"的高峰（不论是由雅各宾派的煽动还是由饥饿引起的）则发生在1795年。只有在1792年的几个月中，这两者才交汇在一起。9月大屠杀之后，工厂主除了极少数之外都被吓得背弃了改革事业。如果说18世纪90年代英国没有发生革命，那么其原因就不是由于卫斯理宗存在，而是由于惟一强大到足以发动它的联盟已经崩溃了。1792年后，已经没有吉伦特派可以为雅各宾派打开大门，如果像韦奇伍德、博尔顿和威尔金森[14]这样的人与像哈迪、普雷斯和宾斯这样的人一起行动，而且怀威尔的小乡绅也与他们一起行动的话，那么皮特（或福克斯）就会被迫承允一揽子的改革计划。但是，法国革命使地主和工厂主在共同的恐慌中团结起来，巩固了腐败的旧制度，而群众团体则过于弱小、过于缺乏经验而无力靠自己的力量发动革命

[14] 这三人都是当时的工业家。——译注

或改革。[140]

甚至连瑟尔沃尔在1796年出访设菲尔德时也隐约感到了这一点。他对当地"无套裤汉"的聪明才智和政治觉醒感到欢欣鼓舞,"但这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体,很不幸他们没有领袖。"尽管有几位"具有相当财产和较大影响的人……想他们所想",但都没有勇气站到他们一边来。

> 如果在设菲尔德那个地方能有三四名有权有势者妥善而公开地领导这些诚实、聪颖的制造者和他们的事业(如同这类人……在诺里季所做的那样),那么地方上实施镇压的暴政将很快寿终正寝……[141]

这也并不表明瑟尔沃尔背叛了雅各宾派。他在1796年面临着一个真正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不喜欢在实践中所遇到的改革家们的那种家长作风(诺里季的格尼便是一例),另一方面,他也不喜欢民众改革派将自己暴露于巨大的牺牲下以至于摧毁了运动或使之转入地下。

179

而且,运动急需受过教育的中等阶级的思想资源,但中等阶级中的一些人因对革命失去幻想而十分苦恼。通过强迫的或自愿的移民,运动在早期就失去了两位最有才能的宣传家和组织家——杰拉尔德和库珀。[142] 它也不可能永远依靠《人权论》、依

---

[140] 有关改革派与制造业界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的联系,见E.鲁滨逊:《詹姆士·瓦特——一个英国雅各宾派》,载《剑桥历史杂志》,第11期(1953—1955),第351页;W.H.查洛纳:《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博士、约翰·威尔金森与法国革命》,载《皇家历史学会会刊》,第5辑,第8期(1958),第25页。

[141] 瑟尔沃尔:《自然权论》,第1部,第20页。

[142] 他们所著的两本最有说服力小册子是杰拉尔德的《国民公会——惟一能使我们免遭毁灭之途径》(1793)和T.库珀的《对伯克先生抨击库珀先生和瓦特先生的回答》(曼彻斯特,1792)。至于库珀移民美国一事,见D.马隆:《托马斯·库珀的公共生活》(纽黑文,1926)。

靠对法国的模仿、或穿着罗马人的宽外袍和撒克逊人的长罩衫生存下去。1795年运动达到高潮时，它只经历了4年发展过程，它的注意力必须放在迫切的组织问题上，而当时的气氛则充满了对叛国罪的恐惧与指控，支持者们拖延塞责，罗伯斯庇尔则用那沉默的断头机打断他们宣言中的精彩段落。瑟尔沃尔的演讲是即兴式的，听众中总有一名国王陛下的密探。直到1796年的相对平静时期，他才做出最了不起的工作（非常出色），而此时运动却开始崩溃了。英国雅各宾派不成熟，吃了缺乏经验的苦头，许多演讲者故作夸张的姿态，让人看上去显得愚蠢可笑，这些都不使人感到吃惊。

如此看来，这是一部挫折和失败的记录。但是，这段经历具有更为积极的一面。许多传统而不是某一传统源自这些年头，这里有戈德温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传统，雪莱后来对此重新确认；有自然神论和理性思想的传统，战争还未结束，理查德·卡莱尔就开始重新出版潘恩的所有著作；有经过发展的惟一神教派和“思想自由的基督徒”传统，它由本杰明·弗劳尔和威廉·弗伦德等人的发扬光大，载入W.J.福克斯的《每月积蓄》；[10]有普雷斯和那些头脑清醒、具有立宪思想的手工工匠和小商小贩的传统（其中一些人，像哈迪、盖洛韦和普雷斯本人后来发迹起来，成为小雇主或大雇主），他们在1807年威斯敏斯特大选中重新露面，支持图克的信徒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并从那时起一直保持积极的合作。

180

这些传统不仅从思想中而且从人物身上得到反映。虽然一些雅各宾派成员隐退了，另一些人像约翰·盖尔斯、托马斯·库珀、“公民李”、约翰·宾斯、丹尼尔·艾萨克、伊顿和别的许多人移

---

[10] 见F.E.米内卡：《非国教徒的非国教》(1944)。

居美国,[105] 但其他人却等待每一个机会以重新进行宣传。约翰·盖尔·琼斯和约翰·弗罗斯特是战争期间伦敦辩论俱乐部的成员。在俱乐部中,他们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激进派。琼斯直到19世纪20年代一直在伦敦激进派圈子中很突出,[106] 同样的延续性在许多地方中心城镇也能看得到。很少有几个中心城镇留下了能与莱斯特的乔治·鲍恩相比的漫长记录,鲍恩于1792年任莱斯特宪政会书记,1794年被捕入狱,迟至1848年,他仍是宪章主义"实力派"的鼓吹者,奋笔疾书不已。[107] 在许多城镇里,具有相似思想的手工工匠、小生意人和反战分子继续在一起开会,杰出的雕刻家托马斯·比尤伊克回忆道:"那些坚定的人类自由的鼓吹者"在纽卡斯尔的"蓝铃"、"独角兽"和读报室聚会,他们是"有见识和推断力的人"、"有教养的小生意人"、"银行业者、职员、手工工匠和代理人"。与比尤伊克联系密切的人中包括一名制鞋工、一名建筑工人、一名铸工、一名锡匠、一名编辑、一名击剑师、一名激进的绅士和几名演员。他们都团结起来谴责战争及其社会后果:

> 航运业者沉迷于富裕生活之中,乡绅们摆出贵族的架子四处招摇。他们忘记了他们过去对生活在下层的人

---

[105] 伊顿是这些人中惟一返回故国者,见下文,第605页。巴黎也有一个英国雅各宾移民的侨居地,移民中有桑普森·佩里、阿什利、戈德史密斯、马克斯韦尔医生和约翰·斯通斯等人。他们出版了反皮特的《警世者》,其中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对波拿巴主义的幻想。见S.佩里:《警世者》(1796),第257页;J.G.阿尔杰:《法国革命中的英国人》(1889)。

[106] 受到盖尔·琼斯和约翰·弗罗斯特影响的人中有一位与弗罗斯特同名同姓者,他是新港市前市长,于1839年领导了威尔士的宪章派暴动。见D.威廉斯:《约翰·弗罗斯特》(加的夫,1939),第13—14页。

[107] A.T.帕特森前引书,第70、74页;J.F.C.哈里森:《莱斯特的宪章运动》,载A.布里格斯(编):《宪章运动研究》(1959),第132页;G.鲍恩:《实力派》(莱斯特,1848)。

们的态度和善意、和蔼的举止，现在却无时不将他们视为垃圾。农场主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笨拙地模仿绅士的样子行事，现在除葡萄酒之外不饮其他任何酒。……当这些暴发的绅士们离开市场时，他们打算把……路上遇到的所有人踩在脚下；但是，这些与他们身着红色服装……被称为"义勇骑兵"时在空虚暴躁的头脑里装满的自负和愚蠢相比，那就算不上什么了……勤勉的劳工不是这样，他们的贫穷无与伦比……。[18]

181

虽然小业主师傅、职员和小生意人中的许多人对乡绅、资本家和大农场主持有敌意并对"勤勉的劳动者"表示同情（这是1795年之后50年中激进意识形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但是，他们像利兹的小商小贩一样被"贵族权势"吓倒了。就连具有清教般热情的贝里克，在战争期间也只与那些能够"为倾心于暴力的人树立得体的榜样"，而且把对"时政之黑暗"的愤怒保持在"一定限度"内的人打交道。因此，平民雅各宾派受到孤立，退入自己的圈子中去，并被迫去寻找独立的半合法或地下组织的形式。（在贝里克所在的纽卡斯尔，数十个酒馆中的互助会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其中许多无疑是工会活动的掩蔽所，而以前那些雅各宾分子，就在会议上"进行热烈的辩论、使用激烈的言辞"。）[19] 由于与其他阶级相脱离，所以激进的机工、手工工匠和劳工们便埋头充实他们自己组织的传统和形式，因此，尽管1791至1795年这几个年头出现了民主的波动，但明确的"工人阶级意识"应该是在镇压年头才走向成熟的。

---

[18] T.贝里克：《回忆录》，M.威克利编（克莱塞特，1961），第146—148、153页。

[19] 见下文，第419—422页。

甚至在最黑暗的战争年月，仍能感觉到民主的波动在暗中起作用。它的贡献是它确认“权利”，这是平民千年王国的倏忽闪光，它从来就没有完全消逝过。结社法所起的作用只是将非法的雅各宾派和工会更紧地拧在一起，[⑲] 甚至在“入侵”的狂热下，新思想和新组织形式仍在不断涌现。数万名非自愿从军的士兵的经历使人们的亚政治态度向激进方向转变，我们可以看到在 1811 年，新的人民激进主义和新的具有战斗性的工联主义同时出现，这一方面是新经历的产物，一方面是对反动时期的必然反响。“**我没有忘记英国的恐怖时期**。在那里，你能发现我的政治倾向的源头”，埃比尼泽·埃利奥特曾这样写，埃利奥特是一位“谷物法诗人”，他父亲是设菲尔德一家铁厂的职员，是个雅各宾派，“义勇骑兵们时常骑马倒退着挤进他的窗户来取乐”。[⑳] 182

（总的来看），1792 至 1796 年间的改革骚动史是一部中等阶级改革派集体退却和下层激进派急速“左转”的历史。这些经历给群众的意识形态打上了长达 50 年的印记，在这个时期，激进主义的活力不来自中等阶级而来自手工工匠和劳工。人们把群众团体的成员叫作雅各宾派，这是对的，包括瑟尔沃尔在内的一些领袖也乐意接受这个称号：

> 我毫不迟疑地采纳**雅各宾主义**这个称号，第一，因为这是我们的敌人强打在我们身上的印记。……第二，尽管我憎恶法国雅各宾派在后期犯下的血腥暴行，然而他们的原则……却与我关于理性的思想最为一致，也与人的本质——我所遇到的任何人的本质最一

---

⑲ 见下文，第 500—502 页。

⑳ 引自 1832 年 11 月 17 日《贫民卫报》，该报（回忆恐怖时期时）还说：“除了埃利奥特先生的例子之外，这种情况还在数千个例子中出现”。

致……。我用雅各宾主义这个术语来指一个宏大广泛的改革体系,并不认为它建立在传统习俗的权威和原则上。[13]

他们的雅各宾主义的特殊之点表现在他们对平等的强调上。"平等"这个词(按其在英语中的一般含义)对于那明确而肯定的学说、即主张消除一切身份差别并反映其过程的学说而言,就含有过多的否定意味。工人阶级运动在此后一些年代里将继续充实自由和博爱的传统,但是,工人阶级组织的存在,工人阶级资金的保管,都需要一支有经验的干部队伍,并形成对领导阶层的尊敬和大肆宣扬的忠诚,这就是产生官僚制度和官僚控制的根源。英国雅各宾派在18世纪90年代却首创了很不相同的传统,当雅各宾派的戴尔勋爵和手工工匠及织工们坐在一起,违反18世纪的定式,以"公民戴尔"相称时,平等中就有了一种淋漓尽致之感。但"人总是人,不是东西",这种想法以其他种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方式在我们今天批评当今世界的许多做法时,还会不时地回忆起来。委员会中每一位公民都指望发挥一些作用,主席通常是轮流充当,以领袖自居会受到注视,委员会运作的基础是坚信每个人都有理性,都能增长自己的才干,崇拜和身份高低有悖于人的尊严,雅各宾派的这些长处,对宪章运动有很大贡献,但在19世纪后期的运动中却衰落下去,那个时候,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将侧重点从政治权利转移到经济权利上。20世纪英国在阶级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别之所以很大,部分是由于20世纪工人运动缺乏雅各宾派的优秀品质。

183

我们没有必要强调雅各宾传统中其他具有明显重要性的方面:自我教育和理智地批评政治和宗教体制的传统;自觉的共和

---

[13] J.塞尔沃尔:《自然权论》,(1796),第2卷,第32页。

主义传统;以及最重要的国际主义传统。一段短短时间的鼓动,竟能将其思想传播到英国的许多角落,这的确是非同寻常。[18]英国雅各宾主义的后果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也许就是打破了不在"成员无数"中进行鼓动的禁忌。在任何地方,只要雅各宾思想还存在,只要那里还珍藏着《人权论》,那里的人就不再等待威尔克斯或怀威尔出来做榜样、开始进行民主鼓动后才付诸行动。在整个战争期间,英格兰的每个城镇和许多村庄都有托马斯·哈迪式的人物,他们的书箱里或书架上放满了激进主义的书籍,他们等待时机,在酒馆、教堂、作坊和鞋匠铺偶尔说一两句话,等候运动的复兴。他们所等候的运动并不属于绅士、工厂主或纳税人,而是属于**他们自己**。

1849年,约克郡一位言词尖刻的讽刺家为所谓的"乡村政治家"画像,画得还相当形象。那是一个皮匠,这很典型,是他所在的工业村庄中一位德高望重的人:

184

> 他有一间藏书室,这使他十分自豪,藏书书目非同一般,……其中包括《伟大的普雷斯佳作》、《科贝特的两便士劣作》,还有《天路历程》……和《前进杂志》、《劳动的错误》、《人权论》、《法国革命史》、班扬的《圣战》……以及《理性时代》和一本十分陈旧的《圣经》。

他"当然是波拿巴的狂热崇拜者"。"当他听说革命取得成功——王室倾覆、国王逃跑、王子们四散于国外时,就像喝了一夸脱香甜的热啤酒,温暖了他那衰老的心。他认为他年轻时的梦想很快就能实现了。"他沉迷于使用一些雄伟壮观的比喻,像"自由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等等,并声称对俄国事务了如

[18] W.A.L.西曼前引书,第20页,他注意到协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100多个地方存在的证据。

指掌。

> 他回顾那些简直不敢上街的日子。他会告诉你人们是如何嘲骂他、向他扔东西和唾弃他……，有人对他说如果他没有在哪个夜晚被活活烧死（连同汤姆·潘恩的模拟像一起），那就谢天谢地了。他告诉年轻人那时候已没有什么人身保护法……总检查长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在全国各地上窜下跳……年轻人被这些话弄得目瞪口呆。他还对别人说有一个人因说了国王生下来时没穿衬衫，而被以煽动罪处以流刑……。[152]

他所梦寐以求的革命从未爆发，但有一种革命仍然发生了。小詹姆斯·瓦特在1793年抱怨道：正是效忠派通过唆使暴民反对改革派而“弄坏”了“较低等级的人”：

> 他们几乎没有想到让人民了解他们自己的力量是多么危险，人民咒骂教会与国王派那些毫无意义的口号、调转枪口来对付他们自己的日子一定会到来。[153]

在1795年这个近乎发生饥荒的年头之后，许多地方都能感到变化。诺丁汉的雅各宾派在1794年沉默下去，但在1796年大选中已拥有足够的力量去公开对抗和击败对手。一个愤愤不平的保皇效忠派分子1798年曾写道：[154]“在进入这个城镇的大多数人口处，都立有一块告示牌，上书‘所有游民都将被依法拘捕和惩处’”，而现在，“游民”这个词被人用“暴君”这个词覆盖了，没有人愿意出来把它撕下来。[155] 1797年参加海军哗变的人宣称：

185

---

[152] E.斯隆：《随笔、传说和小品文》(1849)，第61页起。

[153] 见E.鲁滨逊前引书，第335页。

[154] J.F.萨顿：《诺丁汉日志》(1880)，第212页。

[155] J.W.卡特莱特1798年6月19日致波特兰公爵书，载内政部档案，第42.43号。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努力把自己看做人,现在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应得到人的待遇。"[138]

1812 年,司各脱环顾四周,沮丧地看着苏格兰工联主义和英格兰卢德运动的势力,写信给骚塞:"这个国家的地雷就埋在我们脚下,"而皮特把"埋雷者"赶入了地下。现在的"乡村政治家"在 1789 年的村庄中就很难找到。雅各宾思想被赶进纺织村庄,每当价格上涨和生计艰难时,就有人在诺丁汉织袜工和约克郡剪绒工的工场以及兰开郡的棉纺织厂里进行宣传。瑟尔沃尔(而不是皮特)作出了总结:"在人口大量集中的地区苏格拉底精神一定会兴盛":

> ……垄断,及少数几个人手中积累骇人听闻的资本……使这些罪恶内部孕育出消除罪恶的种子……不管什么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虽然有可能滋生堕落,但它却有助于传播知识,并最终能促进人类的自由。因此,每一个大工场和制造厂都是一个政治协会,议会的法案不能使它沉默,地方的官员不能将它解散。[139]

---

[138] C. 吉尔:《1797 年的海军哗变》,第 300 页。

[139] 瑟尔沃尔:《自然权论》,第 1 卷,第 21、24 页。



第二部　受诅咒的亚当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圣经·创世纪》，第 3 章，第 19 节



第六章　剥　　削

约翰·瑟尔沃尔把每家“制造厂”都看成是政治反叛的潜在中心，然而，并不只是瑟尔沃尔看到了这一点。一位贵族在1792年游历约克郡河谷时就惊讶地发现，在埃斯加思那“田园般的河谷”里新建起一座棉纺厂。他说：“哎呀，现在这里有了一座火光闪闪的大工厂，它后面的那条小河夺去了桥的上流瀑布的一半水源”：

随着钟声的鸣响，厂房的喧闹声震动了整个河谷；人们的话题是叛逆和平均制度，反叛随时可能发生。

工厂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象征而诞生，这种社会力量摧毁的正是“自然进程”。它对现存秩序构成了双重威胁，第一种威胁来自工业财产的所有者。这些暴发户拥有不公平的优势，他们依赖这种优势超过了仅靠收取地租为收入的地主：

如果人们都这样开始致富，或者说，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极其容易成为富人，那么，我们这些固定收入平平的人是多么可悲呵！所有起毛工和田里的农夫们又是多么不幸呵！

第二种威胁来自产业工人大众。我们的这位访问者以不可名状的仇视态度对待他们，这种态度与今天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待有色人种的态度相去不远：

确实，这些人得到了工作；但是，他们全都被抛进因人多而形成的罪恶之中……这些人只要不在工厂里劳

动，就必定出去偷窃、挥霍和抢劫……[1]

在1790至1850年之间，观察家们通常都把棉纺厂和新型的工业社会等同起来，他们还把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关系对应起来。然而，只有卡尔·马克思才以非凡的勇气表达了这一点。他宣称："手工工场给予你们一个有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工厂却给予你们一个有产业资本家的社会。"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新"不仅新在产生了工厂主，而且还在工厂和工厂的周围诞生了劳动群众。1808年，一位地方官员写道："我们一靠近兰开郡工厂区的边缘，就遇见了一种新的人类，他们在行为方式、就业和从属关系上，全是新的。"同样，罗伯特·欧文也在1815年指出："工厂在全国的普及使全国居民有了新的特征……产生了民众基本特征的根本转变。"

190

到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观察家们仍然把"工厂制"看做新事物。1833年，彼得·加斯克尔在提及工厂劳动群众时说，他们"不过是摇篮里的赫克勒斯"，"自从开始使用蒸汽动力以来，他们才变得极端重要，'蒸汽机'把人们高度集中地聚集起来。"加斯克尔已经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中看到了最令人憎恶的"权力中的权力。"[2] 十年以后，库克·泰勒用同样的口气写道：

蒸汽机的出现没有先例，珍妮纺纱机也没有先例可循，

畜力的和动力的织机之出现更是追溯不到任何渊源，

就像朱庇特脑子中的密涅瓦一样，它们突然诞生了。

然而，引起这位观察家深切不安的却是这些"新事物"给人类带来的后果：

---

① C.B.安德鲁斯编：《托林顿日记》(1936)，第3卷，第81—82页。

② P.加斯克尔：《英国工人群众》(1833)，第6页；布里格斯：《英国19世纪的'阶级'语言》，载布里格斯和萨维尔编：《劳工史论文集》(1966)，第63页。

“当外地人穿过聚集在棉纺厂和印染厂周围的人群时，……他不能不以近乎绝望的忧虑和担心的情感去看待这些‘芸芸众生’。这些人和他们所从属的制度一样，都是**新的**，但他们的力量在一小时一小时地增长。这是一个人群的聚集，包含着他们自身在内的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某种不祥的令人害怕的东西……就像海水慢慢地上升，逐渐地上涨，它包含了从社会下层升起的一切因素，在未来某个不远的时候，将浮起到上帝才知道的地方。这些人群蕴藏着可怕的能量……工厂的劳动群众，仅仅从他们的形成来看，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却是崭新的，是在它的条件环境下形成的，它不接受来自外部的指导和引导。[③]

1844 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做了这样的描述：在他看来，“第一批无产阶级是与工厂相联系，由工厂而产生的。工厂工人是工业革命的长子，他们从开始到今天，一直是构成劳工运动的核心。”

不论保守的、激进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观察家在价值判断上存在无论多么大的分歧，都不妨碍他们提出一个相同的等式：蒸汽动力 + 棉纺织厂 = 新工人阶级。他们认为生产的物质手段以直接的、多少带有强制性的方式诞生了新型的社会关系、社会建制和文化方式，而 1811 至 1850 年的群众骚动与运动的历史显然证实了这个情景。18 世纪 90 年代，英国民族似乎被投入了一座大熔炉，而在战争以后以完全不同的面貌重新出现。1811 至 1813 年间发生了卢德运动的危机，1817 年爆发彭特里奇起义，1819 年发生彼得卢事件。在此后 10 年中，工会的活动大量

③ W. 库克·泰勒：《兰开夏工厂区游记》(1842)，第 4—6 页。

和全面地展开，欧文主义者的宣传，激进的报刊运动，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运动，1831 至 1832 年的革命危机，以及此后的一系列运动最终导致宪章派的诞生。（在当时的观察家和现在的历史学家看来）也许正是这种统一的群众骚动与运动的规模和强大力量，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有力地使人感到发生了某种突变。

人们可以看到，18 世纪 90 年代发生的每一种激进现象都以成 10 倍的规模在 1815 年以后再次发生。一小批雅各宾派的传单导致了极端激进派和欧文主义者的期刊大批地诞生。过去，丹尼尔·伊顿曾因出版潘恩的著作而被判处监禁。现在，理查德·卡莱尔及其店铺伙计们也因同样的罪名被判刑，刑期总量竟达 200 年以上。过去，通讯会只能勉强地在约 20 个城镇里生存下来，战后，汉普登俱乐部和其他政治联盟却在许多小工业村192 庄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既然人们想起这种民众的骚动与棉纺织业中急剧的变化同时出现，它自然就使人认为其中有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看来，棉纺织工厂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不仅生产了更多的产品，而且生产了“劳工运动”。工业革命最初只要求人们去描述，现在却要求人们来解释。

从阿克莱特时代到“活塞骚动”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在重现它的时候主要把它想象为“黑暗的、巨大的厂房”，这就是人们想象中的工业革命。这里的部分原因也许是急剧的变化作用于视觉而产生的想象——军营似的厂房，高大的烟囱，工厂里的童工，工人的木底鞋和妇女的披巾，分散在工厂周围的一簇簇居民点，就像工厂生出的鱼卵一样。（这些印象当然使人们首先想到工业，然后才会想到与工业有关的并为工业服务的人们。）另一个原因是棉纺织工厂和新兴的工业市镇——它成长之迅速，技术之精巧，纪律之奇或严格——这些在当时的人们看来，

是那么的明显和奇特。比起那些默然不知名却不断蔓延的工业区来(它们常出现在内政部的“动乱登记簿”上),这些现象为有关“英格兰状况”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更令人满意的表征。文学传统和历史传统都是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当时的人们对工业革命的状况所做的经典描述,例如欧文、加斯克尔、尤尔、菲尔登、库克·泰勒和恩格斯等人的描述,几乎全部以棉纺织工业为基础,其中又主要以兰开郡的棉纺织工业为基础,这里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玛丽·巴顿》和《艰难时世》等一些文学作品则使这种传统永世流传,人们在后来的经济史和社会史著作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的侧重。

不过,这里面依然有不少问题。棉纺织工业是工业革命的前哨工业,[④] 棉纺织工厂是工厂制的突出雏型,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社会或文化生活的动力之间存在着某种自动的或过分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棉纺织工厂“崭露头角”(约 1780 年)的半个世纪以后,棉纺厂工人人数依然只是棉纺织业成年劳动力中的少数。19 世纪 30 年代初,单是使用手工织机的棉织工人,在数量上仍超过棉织业、毛织业和丝织业纺纱和织造工厂中男女工人数量的总和。[⑤] 此外,在 1830 年,成年的男性棉纺工人并非所谓的“一般工人”这种难以捉摸的工人形象中的典型,正如 20 世纪 60 年代考文垂的汽车工人也不是这种“一般工人”的典型一样。

193

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过份地强调棉纺织工厂是一种新的事物必然会导致过低地估计政治和文化传统在工人阶级整

---

④ 关于棉纺织业在工业革命中占优势的原因,E.J.霍布斯鲍姆作了令人信服的重新评述。见他所著的《革命时代》(1962),第 2 章。

⑤ 根据 1833 年英国的估计数据,各类纺织业中,工厂成年工人为 191,671 人,手工织机棉织工人为 213000 人。参见下文,第 311 页。

体形成过程中所保持的连续性。工厂工人远非“工业革命的长子”，他们出现得比较晚。他们的许多思想和组织形式早已存在于家庭手工业工人当中，例如在诺里季和中西部地区的呢绒工人和曼彻斯特的窄幅衣料织工当中。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以及在北方和中部地区某些市镇，1832至1834年直至工厂大歇业之前)，除了棉纺织业地区以外，工厂工人是否“构成了劳工运动的核心”是值得怀疑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雅各宾主义在手工工匠当中有最深厚的根基。卢德运动的主体是小作坊的技术工人。从1817年到宪章运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每一次激进骚动，家庭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一样极有声势。在许多市镇，为劳工运动提供思想、组织和领导的真正核心是由鞋匠、织工、制鞍匠、马具匠、书贩、印刷工、建筑工人和小商贩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在1815至1850年之间，伦敦广大地区激进运动的中坚不是来自于大型重工业(当时的造船业正趋于衰退，机械工人到19世纪末才发挥作用)，而是来自于一批较小的行业与职业。⑥

事物经历的多样性，引起了一些作者对“工业革命”和“工人阶级”(单数)等术语产生怀疑。不过，我们的讨论没有必要停留在前一个提法上。⑦ 这个提法从其一般含义上来说有足够的使用价值。至于后一个提法，有许多作者倾向于使用复数来指称“工人阶级”，强调复数的“工人阶级”含有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和生活状况等各方面的重大差异。这样做实际上是响应了弗朗西斯·普雷斯的抱怨：

---

⑥ 霍布斯鲍姆前引书，第11章。

⑦ 有关这方面争论的综述，参见E.F.兰帕德：《工业革命》(美国历史协会，1957)。又见霍布斯鲍姆前引书，第2章。

如果工人的特征和行为是从期刊、杂志、宣传小册子、报纸以及议会两院和工厂委员会的报告中去认识，我们将会发现他们都被杂乱无章地凑在一起叫作下等人，技术最熟练、最谨慎的工人与最无知而最鲁莽的工人和穷人混同在一起了，尽管他们之间的差异很大，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比较。[⑧]

普雷斯显然是正确的。从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人"看来，森德兰的水手、爱尔兰的挖土工、犹太人水果贩子、东盎格利亚村庄作坊里的工友和《泰晤士报》的排字工人，都属于"下等阶级"(复数)，而他们自己却可能相互听不懂各自说的话的意思。

尽管如此，在各种小心求证之后，我们仍可以发现，在 1790 至 1830 年之间这段时期内最明显的事实仍然是"工人阶级"(单数)的形成。它首先表现为阶级意识的成长，即各个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利益认同以及它与其他阶级利益对立的意识。其次，它表现为相应形式的政治和工业组织的成长。到 1832 年，已经成立了基础雄厚的、自觉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事业机构(工会、互助会、教育和宗教运动、政治组织、期刊等等)，形成了工人阶级的知识传统、各种工人阶级群体社交的形式和工人阶级的感情。

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它不是工厂制的自发产物，也不应当想象有某种外部力量(即"工业革命")作用于某种难以形容的、混沌的人类原料，从而在另一端生产出一种"新人类"。工业革命过程中变动着的生产关系和劳动条件并非施加在这种原料上，而是施加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身上。这些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是由潘恩传下

---

⑧ 摘自 M.D.乔治:《18 世纪伦敦的生活》(1930)，第 210 页。

或由卫斯理宗铸成的。工厂工人或织袜工人也继承着班扬的传统，继承着人们记忆中的村庄的权利，继承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继承着行业的传统。他们是民众宗教信仰灌输的对象，又是新政治传统的创造者。工人阶级被别人形成，同时也在形成自己。

195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在反对目前流行的经济史和社会学各流派观点，而为当时的一个"经典"看法作辩护。由马克思、阿诺德·汤因比、韦伯夫妇和哈蒙德夫妇首先提出并加以考察的工业革命研究，现在仿佛已是学术性争论的领域。现在，人们所熟悉的"灾变论"已经一点一点地受到争议。这一论调习惯于把这个时期看做是一个经济上失去平衡、大量发生悲惨的生活和剥削、政治上受压迫和英勇的民众骚动时期；现在，学者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向经济增长率（以及从经济"起飞"过渡到自我持续不断地技术再生产阶段的种种困难）。对圈地运动的研究现在受到了重视，但原因并非因圈地而驱赶穷苦农民所显示的残酷性，而是此举成功地为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了粮食。在他们看来，那个时期的苦难并不是由于剥削和你死我活的竞争造成的，而是由于战争、交通不便、银行和交易所的不成熟、市场不稳定和贸易周期打乱了正常秩序所造成的。群众骚动是由于小麦价格上升而同时又出现商业萧条这样一种难以避免的巧合而造成的，这可以用有关数据所揭示的"社会紧张"图表来表达。[9] 总之，他们提出，从许多方面来衡量，1840 年产业工人的状况比 1790 年家庭工人的状况更好。工业革命不是一个灾难性的、激烈的阶级冲突或阶级压迫的时代，而是一个

---

⑨ W.W.罗斯托：《19 世纪英国经济》(1948)，第 122—125 页。

不断改善的进步时代。[10]

现在，经典灾变论的正统观点，已经被一种反灾变论的新正统观点所取代。这种新观点以根据经验谨慎地对待证据而著称。它的著名倡导者（约翰·克拉潘爵士、多拉西·乔治博士和艾什顿教授）严格地批评了过去的学派中某些作者不够严谨的态度。新正统观点的著作丰富了历史学的学术性，修正了经典学派的一些重要论述。但是，新正统观点如今也变得陈旧了，并且在大多数学术中心扎下营盘，所以现在就轮到它们来面临挑战了。这些实证主义大师的继承者们表现得意满志得、孤陋寡闻，对当时工人运动的实际状况缺乏了解。他们对正统的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比较了解，但对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方式的变化了解甚少。他们失去了对整体过程的认识，其中包括对那个时代整个政治和社会背景的认识。作为有价值的验证，他们绕过察觉不到的阶段到达新的普遍化（不过很难用事实来加以支持），并从普遍化而取得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看法。 196

实证主义正统观点的发展往往是在批判哈蒙德夫妇的著作中实现的。确实，哈蒙德夫妇显然是想把历史道德化，从而过多地以"激愤的情感"来排列材料。[11] 后来的研究揭示了他们的著作有不少观点是错误的，或者需要验证，而且我们打算提出其他的见解。不过，为哈蒙德夫妇作辩护也就说明了他们关于劳工研究的著作及其所广征博引的史实，仍不失为有关那个时代的不朽的最重要的史料著作。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说，他们的透

---

[10] 以下著作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到了这些观点：T. S. 艾什顿：《工业革命》(1948)和 A. 拉德福德：《英国经济史》(1960，第2版)。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见 N. J. 斯梅尔泽：《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化》(1959)，比较通俗的小册子有约翰·瓦泽：《成功的故事》(W. E. A. 版，无出版年月)，第12页。

[11] 兰帕德前引书，第7页。

彻叙述表现出他们对工业革命发生时的政治背景有充分的认识。在对某个棉纺织厂的帐簿进行过考察的学者看来，拿破仑战争只不过对国外市场及其起伏多变的需求发生了异常的影响而已。哈蒙德夫妇却从未忘记那也是一场反对雅各宾主义的战争。他们在《技术工人》的导言中一开始就指出："书中所讨论的那个时期的英国历史读起来就像是一部内战史。"在《城市工人》的结论中，他们在评价其他无关紧要的价值观念的同时，表现了深邃的洞察力，从而使这整个时期的历史豁然开朗：

> 正当半个欧洲为"公民"这个词的新魅力变得如痴如狂，而另半个欧洲为此而感到无限恐慌的时候，英国却被那些认为农民的思想是对他们的宗教和文明的挑战的人们所掌握；他们有意识地试图把生活的不平等作为国家的基础，强调工人作为从属阶级的地位，并使之永远固定下来。因此，事情就是这样：法国革命在法国人民之间所造成的分裂还不如工业革命在英国人民之间造成的分裂。……

197

"事情就是这样：……"这个判断可能会引起怀疑。然而，正是这样的洞察力——即在英国事实上并没有发生的革命却比法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的那场革命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在某些方面显得更为分裂——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使我们可以看清那个时期真正的灾变性质。在那整个时期，同时发生的巨大影响不只是这两个，而是三个，那就是人口的巨大增长（英国人口从1801年的1050万上升到1841年的1810万。其中，1811至1821年间的增长率最大），工业革命在技术方面的巨大影响，而且，1792至1832年是政治上的反革命。

总之，同蒸汽机一起，政治环境对工人阶级意识和组织形式的形成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18世纪末争取进行政治改革的

各种力量(如威尔克斯,城市商人,米德尔塞克斯的小乡绅,乡绅和"暴民"亦或是怀威尔的小乡绅和自耕农、小布商、刀具匠和其他小商贩)在18世纪90年代正处于取得部分胜利的前夜:皮特已被人冠以改革派首相的角色。如果事情按这种"自然的"道路发展下去,我们或许可以预料,不必等到1832年就会有一个结果,以大地主、大商业集团为一方,以工业家和小乡绅,以及紧跟在中等阶级宣传鼓动运动后面的工人为另一方,最后一决雌雄。实际上,即使当1792年,工业家和自由职业者在改革运动中占主导地位之时,各种力量之间依然是平衡的。但是,在《人权论》[12]取得了成功,法国革命日益激进并造成了恐怖,皮特开始镇压以后,只有下层的通讯会挺身而出,与反革命战争对峙。这些下层团体尽管在1796年还很弱小,却构成了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的"地下活动"传统。贵族与工厂主因法国的榜样而感到惊恐,又处在好战的爱国主义狂热中,他们因此结成同盟。英国的"旧制度"不仅在国家事务方面,而且在使古老的市政团能够永久存在下去方面都取得新的生命,而这些市政团则在对膨胀的工业市镇进行错误的统治。工业家则由此获得了重要的让步: 198 特别是废除即取消了关于学徒制、工资调节和工业劳动条件方面的"家长式"法令。贵族所关心的是镇压人民当中雅各宾派的"密谋",而工厂主所关心的却是去挫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的"密谋";反结社法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双重目标。

在战争期间,劳动人民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处于被冷落的地位(有时,他们还不得不加入战争)。这的确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这种状况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出现;与自觉性的增强和希望的

---

[12] 此处所指的人权不知是1789年8月由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还是1791年托马斯·潘恩出版的《人的权利》?——译注

扩大(例如"自由之树"已从泰晤士河播种到泰伯恩河)发生重迭;与人口的增长发生重迭——在伦敦和其他工业地区,对人口增长的感觉一年比一年趋于明显(随着人口数字的增长,他们对主人、地方行政长官和牧师的依从趋于减弱);而且和更深刻更明显的剥削方式发生重迭。在农业和旧式的家庭工业中,剥削加重了;在新型工厂也许还有矿山里,剥削更明显了。在农业中,1760至1820年之间出现了全面的圈地,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地丧失公共权利,无地的农民以及——南方的——赤贫劳动者沦为农场主和地主的劳工,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在家庭工业中,1800年以后出现了小业主让位于大雇主(无论是工厂主或中间商)的趋势,大多数纺织工、织袜工、制钉工不得不外出去寻找工作,成为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工人。就业往往得不到保证。在棉纺厂和许多矿区,这是雇佣童工(以及女工下矿井)的时代。大规模的工矿企业、工厂制及其新的劳动纪律、工厂社区——其中工厂主不仅依靠工人的劳动致富,而且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可以眼看着致富——所有这些都使得剥削的过程明显可见,也造成了被剥削者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汇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工业革命真正的灾变性了;同时也可以明白英国工人阶级在这些年代形成的一些原因了。人民要同时199 从属于两种关系的加强:这两种关系都是无法忍受的,一种是经济剥削关系的加强,另一种是政治压迫关系的加强。雇主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少人情味。不错,这确实使工人的潜在自由程度得到增强,因为农场里的雇工或家庭工业里的帮工(按汤因比的话来说)"被放在农奴的地位和公民的地位之间",但这种"自由"意味着他们更多地感觉到了不自由。他们在力图抵抗剥削的斗争中前进的每一步都与雇主或国家的力量相遇,而且通常是同时遇到两者的力量。

大多数劳动人民是从剥削的性质及其强度的变化中感受工业革命的残酷经历的。这种说法决不是用今天的眼光去推导过去而强加于证据之上的。我们可以描述一下 1818 年(即马克思诞生的那一年)某位引人注目的棉厂工人所遭受的一部分剥削过程。这是一名"棉纺帮工"向正处在罢工风潮中的曼彻斯特公众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其叙述一开始就指出雇主和工人"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人":

>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雇主:他们是这样一种人,几乎没有例外。他们都出身于棉纺织作坊,没有教养,没有风度。他们只有在同曼彻斯特交易所的商人做交易中获得的那一点点知识。但是,为了弥补那种缺陷,他们会向你摆阔气,炫耀精美的宅第,成套的家具,仆从,园圃,猎马和猎狗等等,他们特别喜欢以自负的样子向外地来的商人们夸耀。他们的房屋的确是豪华的宫殿,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你在伦敦附近看到的那些干净漂亮的别墅……但是,那些对自然和艺术相结合的美有真正认识的观察者会发现他们的嗜好有可悲的缺陷。他们把子女送到最昂贵的学校去培养,决意要把他们自己缺乏的东西双倍地给予后代。他们的头脑里几乎只有一个念头,即自己是他那个地区中道道地地的小君主、独裁者和专制者。为了维护所有的这一切,他们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如何花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量的劳动上……。总之,我最大胆地不怕有人反对地说,那里的工厂主与纺纱工人之间的差别,比伦敦的商人首富与他最低贱的仆人或最低级的工匠之间的差距还大,而且简直无法相比。我知道,绝大多数的纺纱厂主为了使纺纱工人永远贫困潦倒……为了从他们的口袋里拿

200

走剩余物而尽可能地降低工资。这就是事实。

棉纺纱厂主是这个国家中不同于所有其他业主的阶级。他们无知、骄傲、专制。那么，作为这种工厂主的工具，或者不如说是东西的那些人，又怎么样呢？喏，多少年来，他们连同妻子儿女——都是残酷主人的男女奴隶——必须忍耐。有人说这些人是自由的，法律既保护富人也保护穷人，纺纱工人如果不欢喜这份工资可以离开他的工厂主嘛。他们就是这样来对我们共同的认识横加讥讽打击的；不过，这是徒劳的。确实，他可以走，但又走到哪里去呢？为何不到另一家工厂去呢？是的。好，他去了，于是他受到盘问，“你原来在哪儿工作？他把你开除了吗？”“不，是我们不能接受那样的工资。”“那么，我不能雇你，以那种方式离开工厂主的任何人，我都不能雇用。”因为**工厂主之间有一种**讨厌的**联合**。这种联合于1802年首先成立于斯托克波特，从此以后推广到各个地区。曼彻斯特周围方圆许多英里内的大工厂主都加入了这个联合。不过，小工厂主没有参加；他们被排除在外，对大雇主来说，他们是最讨厌的人，想象不出比谁更讨厌的了。这种联合一成立，就首先制订了一条规定：任何工厂主必须查明，如果工人是被他原来的主人解雇的，便不能再雇用。这些工人怎么办呢？如果他去一个教区，那是个独立自主的坟墓，便会得到通知：我们不能救济你，如果你是同老板吵了架，又不养活你的全家，那么，我们就送你去监狱。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得不服从老板。他不能像鞋匠、木匠、裁缝那样外出觅工，他在任何市镇都找不到工作，他无法离开自己的地区。

一般说来，工人是不会欺侮人的，是谦逊而消息灵通的。他们怎样获得消息，对我来说几乎是个谜。假如没有被逼得太急，他们是驯服的、听话的；只要我们想到他们从6岁就开始从早晨5点到晚上8—9点学做工，这就不奇怪了。让一个主张服从老板的人每天早晨5点以前站在通往工厂的街上去看看这些小孩的可怜相吧，无论什么样的天气，他们的父母都要一大早就把他们从床上叫起来。再让他去看看他们吃的那一点点可怜的食物吧，他们的食品主要是掺了碎燕麦饼的稀粥，一撮盐，有时用一点点牛奶着着色，午餐则是几个土豆，一片腊肉或肥肉。伦敦机器工匠会吃这种东西吗？他们到了工厂（迟到几分钟便要克扣一天的1/4工资），一直到晚上9点钟被关在温度极高的房间里，比今年夏天最热的那几天的温度还高。他们得不到休息，一整天只有三刻钟的时间用来吃饭，超过了这个时间就必须一边劳动一边吃饭。西印度群岛的黑奴如果在炎热的太阳下劳动还有喘息一会儿，扇扇扇子的时间，他们还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给他们一些时间去种地。英国的纺纱奴隶却不能享受室外的空气和吹荡的微风。他们被关在八层楼高的工厂里，直到笨重的机器停止了才能喘一口气，然后回到家里去恢复体力以便第二天再劳动。他们没有时间与家人愉快地聚会，他们一个个疲劳不堪、筋疲力尽。这里一点也没有夸张，完全是事实。我还要再问一句：英国南部的机器工匠忍受得了这个吗？

201

当棉纺织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在称作蒸汽机的那些可怕的、取代了必需的人力的机器开始使用之前，有

一大批当时被称作“小老板”的人；这些人有一点点资本，能采办几台机器，雇用一些劳力，包括男人和男孩子（大约20至30名），他们的劳动产品都被拿到曼彻斯特的中心市场去出售，便落到了掮客们的手中……掮客将产品卖给商人。通过这种方法，纺纱老板便可以呆在家中劳动，看管工人。原棉一般是大捆大捆地散发给各家纺织工人的妻子，由她们加热清洗，为工厂里的纺纱工做好准备。她们每周可以赚到8先令、10先令或12先令，并在家做饭，照顾孩子。但是，现在不再有这样的工作了，因为所有的原棉都用被叫作魔鬼的蒸汽机驱动的机器来拆散打松。于是，纺纱工的妻子们失去了工作，除非她们也到工厂去整天劳动，去做儿童可以做的工作，每周赚几个先令，4先令或5先令。过去，如果工人同老板发生了争吵，可以离开他，到别处去寻找工作。但是，几年的功夫一切事情都变了。开始使用蒸汽机了，为了购买蒸汽机以及建造可容纳蒸汽机和六七百个工人的厂房，需要大笔资本。蒸汽机动力可以生产比小老板能生产的更多的（虽然并不是更好的）产品，并以同样价格在市场上出售。结果，这些小老板很快就破产了。大资本家通过他们的衰落取得了胜利，因为小老板是横在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对工人实行完全控制的惟一障碍。

202

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各种争吵都起因于产品质量问题。工人按照发给他们的一定量的原棉所生产出来的棉纱束数或码数来领取工资，数量要由监工来鉴定，监工的利益决定了他们必须依赖老板，因此总是谎称产品粗糙。如果工人不服，就**必须把老板叫到地区长官**

> 面前去对证，而所有的地区长官，除了两名受人尊敬的教士外，全与纺纱厂主一样，出身于乡绅。纺纱厂主总是叫他们的监工去出席听证，回答询问，因为他们认为不屑于同低于他们身份的奴仆会面。地区长官的决定总是有利于工厂主的，因为他们只听监工们的陈述。工人们不敢向上级法庭申诉，因为他们花不起申诉费。
>
> 工人的这些不幸都来源于那些地区的令人诅咒的垄断，财富和权力都落在少数人手中，他们傲慢得自以为是天下的主人。[13]

这些事实读起来有相当的说服力，不过这像布鲁厄姆勋爵的“政治经济学”一样，是一面之词。所不同的是，这位“棉纺帮工”描述的事实是另一类型。我们不必管他的所有判断是否都可靠。他的公开信详细诉说了工人群众对资本主义剥削性质变化的一宗又一宗不满，比如缺乏传统权威或义务的一个雇主阶级的兴起；主人与工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利用他们的新财富和新权力进行的剥削趋于明朗化；工人失去了社会地位，尤其是失去了独立而完全依附于工厂主的生产工具；法律的偏袒和不公正；传统家庭经济的瓦解；劳动纪律、单调的劳动、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丧失了闲暇时间和人生的乐趣；工人沦落到“工具”的地位，等等。 203

不管怎么说，工人觉得不满——而且是强烈地不满——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有力地提醒我们，那些年代一些最激烈的冲突所围绕的争端并不是由生活费用的数据引起的。引起最强烈感情的往往不是“面包和黄油”的简单问题，而是价值观念问题，例如传统习惯，“公正”、“独立”、安全保

---

[13] 《黑矮人报》，1818年9月30日。

障、家庭经济等等，这些都面临危险。19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骚动所涉及的各种争端，工资是次要问题：对陶瓷业工人来说，是反抗实物工资制；对纺织工人来说，是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议案；对建筑工人来说，是争取合作社的直接行动；对全体工人来说，是争取参加工会的权利。1831年东北部煤田的大罢工是为了争取就业保障、"煤田实物工资制"以及有关童工的问题。

剥削关系不只是不满和相互对立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与所有制和国家权力的形式对应的不同形式。工业革命中典型的剥削关系是非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它不承认相互间的长远义务，如家长式的或服从的义务、"行业"利益的义务等等。不存在与自由市场力量的作用相对立的"公平"价格的余地，也不允许有受到社会和道德观念支持的工资的默契。对立被看做是这种生产关系中固有的特征，管理和监督职能要求压制除了能够从劳动中攫取最大剩余价值以外的一切特性。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剖过的政治经济学。工人已经变成了单纯的"工具"，是各种投入成本中的一项。

实际上，任何复杂的工业企业都不可能按照这样的哲学来204 运行。出于对工业劳资关系和睦、对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对有经验有技术的劳动者的需要，到1830年，棉纺织厂已经非提高管理技术不可，而且事实上也出现了新的家长制。在过去的分散家庭手工业制度下，劳动力供应过剩，总有足足一大批尚未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在为就业而彼此竞争，因此，上述新的想法行不通。现在，旧的习惯已经衰落，旧的家长制已被抛弃，这种剥削关系于是上升到了主导地位。

这并不意味我们可以把对工业革命的种种冷酷性的"责难"都加之于"老板"或加之于自由放任主义。工业化的过程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条件下，必定都会带来苦难，造成可贵的旧生活

方式的解体。最近的许多研究揭示了英国的这一过程存在一些特别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市场风险;战争给商业和金融带来的重重后果;战后的通货紧缩;贸易条款的变动;人口"爆炸"造成的空前压力等等。此外,20世纪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使我们对笼罩在经济增长上的问题有所了解。可以说,工业革命中的英国遇到了"起飞"的种种问题;对运河、工厂、铁路、铸造厂、矿山和其他设施大量的长期投资是以牺牲当时的消费为代价的;1790至1840年的那几代工人为了将来而牺牲了一部分,甚至全部的消费增长的希望。[14]

有许多论点都值得密切的注意:例如关于南美市场需求的起落变动以及国家银行危机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造成个别工业部门成长或停滞的原因。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学术观点相左并不等于反对实证研究的方法,只是反对一鳞半爪、一知半解地认识整个历史过程。首先,实证主义者把一些事件从这个过程中孤立出来进行考察。由于产生这些事件的条件是假定的,因此,不仅可以而且不可避免地要从他们自己的含义上加以解释。例如支付战费必须加重税收,战争便以这种方式加速经济增长,或以那种方式阻碍经济增长。既然这是可以证明的,也就意味着这是必然的。但当时成千上万的英国人赞同托马斯·比尤伊克所谴责的"这场最邪恶的战争"。[15] 不公平的纳税负担、债券持有人从国债和纸币中渔利——这些都不是当时许多人所接受的设定的数据;相反,这些是激进派的大事谈论的主要证据。 205

然而,实证主义者还有第二个研究步骤,他们可以把这些支

---

⑭ 见S.波拉德:《投资、消费与工业革命》,载《经济史评论》,第2集,第11卷(1958),第215—226页。

⑮ T.比尤伊克:《回忆录》(1961),第151页。

离的研究成果组合在一起，又放回去重现一个由许多个相互关联的"必然"所构成的历史过程模式，亦即用零碎拼凑起来的整体。我们仔细考察信贷机构或贸易条款，发现每一件事都可以得到解释，而且每一件事都是其他事件的充足原因，这样一来，我们就抵达了一种事后宿命论的境界：人的能动性没有了，阶级关系的背景也被遗忘了。

实证主义者所指出的那些事确曾存在，这当然是事实。1811 年，枢密院令几乎使某些商业活动中断，战后木材价格的上升大幅度地提高了建筑成本，流行饰品的变化（例如丝带花边）可能使考文垂的织机无法开动，动力织机与手工织机展开竞争等等。不过，即使对这些明显的事实以及有关的证据也还应当提一些问题：谁的枢密院？为什么发布这样的命令？从木材紧缺中渔利的是哪些人？当成千上万的农村姑娘迷恋上了花边却又买不起的时候，为什么织机都无法开动？节约劳力的发明，靠什么社会炼金术才不致造成灾难的推动力？简单的事实——例如一场歉收——似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事实之所以成为事实，却要通过具体而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法律、所有权、权力而显现的。我们听到某些生动的词汇时，例如"贸易周期的潮流起落"，就应当立即提高警惕。因为在这种贸易周期背后的还有社会关系的结构，它支持着某类掠夺（地租、利息和利润），而使其他掠夺非法（盗窃、封建税等）；使某些冲突合法化（竞争、武装的战争）；同时又禁止另一些冲突（工会、面包骚动、群众政治组织等）。从未来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野蛮于一时的结构。

提出这些大问题也许没有必要，因为不能总是向历史学家所研究的社会表示怀疑。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当时的人们提出来的，其中不仅有上层阶级（雪莱、科贝特、皮科克、汤姆森、欧文、霍奇斯金、卡莱尔），也有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

的代言人不仅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政治机构，而且对其社会的和经济结构产生了怀疑。对于正统政治经济学的事实来说，他们反对了他们自己的论据和计算。早在 1817 年，莱斯特的织袜工人就在一连串决议中提出了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理论：

> 削减工资所造成的大批人的贫穷不幸，与由此必然造成的产品消费〔力〕的减少成正比。
>
> 如果全国的技工都能获得充足的工资，产品的家庭消费将立即增加一倍以上。结果，每个劳动力将很快获得充分就业。
>
> 我国技工的工资被削减到极低的水平，使他们无法靠劳动养活自己。他们为了赢得一名国外顾客而把出口产品低价在国外市场上出售，结果丧失了两名国内顾客……[16]

如果把就业工人的劳动时间缩短，如果禁止使用童工，便可以为手工工人提供更多的工作，失业者便可以获得工作，用他们的劳动直接交换产品——缩短难以预测的资本市场的循环周期——商品将会更便宜而劳动却获得更高的报酬。他们用“新道德秩序”的说法来反对自由市场的词藻。正是因为在 1815 到 1850 年之间两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人类秩序观——一种以互利为基础，另一种以竞争为基础——彼此发生了冲突，才使今天的历史学家感到需要做出选择。

如果我们不运用最起码的想像力去理解那位“棉纱帮工”是如何看待证据的，恐怕就很难写出当年民众骚动的历史。他所说的“雇主”并不是指个人的集合，而是一个阶级。他说，“他们” 207

[16] 内政部档案：第 42.160 号；又见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 303 页；奥斯特勒有关手工织工的证词，见后文，第 298 页。

否认他的政治权利。如果营业萧条，"他们"便减他的工资。假使营业兴旺，他须同"他们"和他们的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分享经营改善带来的利益。假使粮食丰裕则"他们"得利，如果粮食短缺，"他们"盈利更多。"他们"不仅在这样和那样的个别事情上耍滑头而且在根本的剥削关系上玩弄阴谋，使所有的事实都合理化。确实存在着市场的兴旺和疲软、农业歉收以及其他，但是，尽管这些原因造成了种种困难，加紧剥削的过程却始终不断。它不是直接地给劳动群众带来负担，而是曲折地反映在极不公平地分配经济得失的所有制和权力上。

近几年来，所谓的"生活水平的大争论"在学术界开展(一切学者都必须在这个争论中表示赞同或反对)，妨碍了前述思路开阔的考虑。1780 至 1830 年之间，或 1800 至 1850 年之间，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呢，还是下降了？[17] 为了弄清这场争论的意义，我们必须先扼要地考察一下这场争论的发展过程。

有关价值观念的争论从工业革命以来已经开始了。而有关生活水平的大争论却是从较近的时候开始的。有关意识形态的混战更是最近的事。我们先来看看这场争论中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在《现代英国经济史》第 1 版(1926)的前言中，约翰·克拉潘爵士写道：

> 大约从"人民宪章"的起草到大博览会之间的一些时期内(即 1837 至 1851 年——E. P. 汤普逊注)关于工人生活状况恶化的传说完全破产了。实际情况是，1820

⑰ 使用不同的基准线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1780 至 1830 年的基准线支持"悲观派"的观点，而 1800 至 1850 年的基准线却支持"乐观派"的观点。这说明这场讨论很可能是没有结果的。

> 至1821年的价格下降后,工资的一般购买力(当然不是每个人的工资)显然高于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以前。这个事实与人们一般的说法极不同,因此很少被人提及。社会史学家长期以来忽视了统计学家在工资和物价方面所进行的工作。

对此,J. L. 哈蒙德在《经济史评论》(1930)中作出了回答。他的回答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他批评了克拉潘有关农业部门收入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是把各郡农业的平均收入数字相加后除 208 以郡数,从而得出全国农业的平均收入。但是,实际上,南方工资收入较低郡的人口多于收入较高的那些郡的人口(后者的农业收入还因靠近工业地区而贬值),因此哈蒙德便能指明,“全国平均收入”掩盖了一些郡中60%的劳工工资低于“平均数”的事实。他的第二部分的回答则以最含混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态度一变而转到了对于价值(幸福)的讨论上。对于第一部分的回答,克拉潘在《英国现代经济史》第2版(1930)前言中表示,他接受哈蒙德的说法,但是,他认为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第二部分的回答(他说这是“用词语构成的曲线”,是“较高的问题”),尽管他也承认:“从根本上说,我充分同意……决不能用物质福利的统计数据来衡量群众的幸福程度。”此外,他还指出,在批评“一切都恶化了”的观点时,“我并不是想说一切都改善了。我只是说近来的历史学家过分……强调恶化,看轻了或忽略了改善的事实。”对此,哈蒙德夫妇在《惨淡的时代》1947年的修订版中表示赞同:“统计学家告诉我们……他们满意地看到收入已经增长了,而当这种不满之声喊得响亮之时,大多数男人和女人的处境比他们在18世纪开始像秋天那样平静地发展时还好一点。当然,这种总的看法证据不足,解释起来也不容易,但大致是正确的。”对群众不满要做出解释“必须到严格的经济条件以外的领

域中去寻找。”

到此为止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个时期历史学家们的大部分丰富的想法——但不严谨——却遭到一位最著名的实证主义者的严厉批判。结果，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尽管双方之间的争论后来导致了更激烈的争论，但双方相互争吵的学者在严酷的经济条件上并没有多大的实际分歧。如果没有哪位认真的学者提出“全盘恶化论”的观点、就不会有认真的学者坚持“全盘改善论”。霍布斯鲍姆博士（悲观派）和艾什顿教授（乐观派）一致认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一段时期里，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霍布斯鲍姆博士不同意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全面提高，而艾什顿教授则认为经济气候在1821年以后“转暖”——出现了“明显的向上运动，仅由于1825至1826年和1831年的萧条才有所中断”，而且从茶叶、咖啡、食糖等商品进口数量的增加来看，“很难相信工人没有分享利益”。另一方面，他自己编制的奥德姆和曼彻斯特地区的物价表证明，“1831年，穷人在日常伙食上的支出不可能明显低于1791年，”但他没有提供相应的工资表。他的结论提出，工人阶级中有两个主要群体，一个是“一大批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阶级”，另一个是“大批的非技术工人或略有一点技术的工人——特别是季节性就业的农业工人和手工织工，他们几乎把全部收入用于支付生活必需品。”“我倾向于这样的推测，能够从经济改善中获得好处的人数大于无法从中得到好处的人数。前者的数量正在稳定地上升。”[18]

209

---

⑱ 着重号是作者加的。见T.A.艾什顿：《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1790—1830》，载F.A.哈耶克编：《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第127页；E.J.霍布斯鲍姆：《英国的生活水平，1790—1850》，载《经济史评论》，第10卷（1957年8月）。

实际上，从1790至1830年期间，情况并非如此。绝大多数人的状况在1790年相当糟糕，到1830年依然很糟糕（而且应当看到40年是段很长的时间）。不过，对于各个工人阶级群体的规模究竟有多大，看法不一致，以后10年的情况如何，也不见得更清楚。1832到1834年间工会活动大为开展，加入工会组织的工人的实际工资无疑有了增加。但是，在1833至1837年的商业繁荣时期，工会因遭政府、地方官员和雇主的协同打击而瘫痪；而1837至1842年又出现了经济萧条。因此，“大致从人民宪章的起草到大博览会之间”的某一个时候，比如说，从1843年的大规模修建铁路开始，情况开始逆转。此外，即使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工人群体的境遇仍然悲惨，而铁路建设的衰退又导致了1847至1848年的经济萧条。看起来，这完全不是一个“成功的过程”。在工业主义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半个世纪里，虽然并非全体工人，但绝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仍然处在生存线上。

然而，当时出版的多数著作没有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早一代历史学家同时也是社会改革家（例如索罗尔德·罗杰斯，阿诺德·汤因比和哈蒙德夫妇等），他们对穷人寄予的同情有时将历史研究和意识形态混同起来；无独有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经济史学家对资本主义企业家所寄予的同情，使他们把对历史的研究和辩护术混同起来。[19] 1954 年出版的由 F. A. 哈耶克 210

[19] 为了不使读者对历史学家做出太苛刻的判断，我们可以摘录约翰·克拉潘爵士的说法来看看这种选择性原则可能如何来排列证据。他说：“这样的疏忽是很容易造成的，我在 30 年前曾经读过并标点了阿瑟·扬的《法国游记》，并根据标点的段落进行教学。5 年前，我又通读了这本书，却发现我只标点了阿瑟·扬提到的生活悲惨的法国人，却没有注意到他在许多地方同样提到了幸福和繁荣的法国人。”人们据此可以怀疑，10 至 15 年来，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也许一直忙于在论题中补充有关幸福和繁荣方面的证据。

主编的《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的学术讨论会的汇编的出版，是一个转变点的标志。这本书汇编了一批专家的研究成果，“几年来，他们一直在定期举行会议，讨论有关维持自由社会不受专制主义威胁的问题。”这批国际专家把“自由社会”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们把经济学的理论同具体的辩护结合起来所获得的成果就很可悲；其中有一位作者，即艾什顿教授的文章就是这样，他把1949年得出的谨慎结论变形为直言不讳的陈述却又不提出进一步的证据：“总的说来，学者们一致公认，大多数人的实际工资所得是很可观的。”[20] 争论到这个阶段进入混乱状态。尽管近来有人试图努力恢复其学术性，[21] 但在许多方面仍是混乱的主张与各取对自己有利的论点进行诡辩的论战。

这场大争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要根据大量的零零碎碎的证据着手建立工资序列、价格序列和统计指数，这一点极为困难。我们在后面讨论有关手工工匠的情况时，就要考查对证据进行解释的困难。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遇到一连串新的困难，因为“生活水平”这个词把我们从量化的统计数据（工资或消费品）带到了有时被统计学家描述为“不可计量”的方面去。我们从食品进入家庭，从家庭到健康状况，又从健康状况进入家庭生活方面，然后又涉及闲暇生活、劳动纪律、教育、娱乐、劳动强度等各个方面。于是，“生活水平”这个词把我们带到了“生活方式”上。但这两者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是对量的测度，后者是对生活质量的描述（有时也是估计）。统计数据的证据仅适用于

211

⑳ T.S.艾什顿：《历史学家看资本主义》，载《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第41页。艾什顿教授的文章《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原载于1949年的《经济史杂志》，也收入该书。

㉑ 关于这场争论的最有启发性的评述，见A.J.泰勒：《英国的进步和贫困，1780—1850》，载《历史》，1960年2月。

第一部分，在处理第二部分时，我们必须主要依靠“文字证据”。之所以产生混乱情况，主要原因是从只适合于某一部分的证据中得出另一部分的结论。统计学家们常常说：“这些指数证明茶叶、食糖、肉、肥皂的人均消费量有所增加，因此，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比较幸福了。”但是，社会史学家却回答说：“文字史料揭示，人们是不幸福的，因此，他们的生活水平肯定恶化了。”

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但是，我们必须得出简单的观点。平均的统计数据和人们的经历完全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在用数量来说明人均生活水平有所上升的同时完全可能发生人们在生活方式、传统关系和道德约束力质的方面大大地失调。人们在消费品增加的同时，他们的生活也可能变得更不幸福，更不自由。在工业革命的整个时期内，在人数上仅次于农业工人的最大劳动人民群体是家庭雇用的仆役。他们绝大多数是同东家住在一起的仆人，从事家务劳动。他们挤在狭窄的小房子里，劳动时间很长，每周只赚几个先令。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把他们列入工业革命中生活水平（指食品和衣服的消费）略有提高、处境比较幸运的群体中去。但是，那些濒于饥饿边缘的手工织工及其妻子仍然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高于这些“奴才”。我们再来看看诸如煤矿等一些行业，这些行业中的实际工资在 1790 到 1840 年之间有所提高，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更长的劳动时间和更大的劳动强度，这些养家糊口的人不到 40 岁就“精疲力竭”了。但从统计数据上看，他们的生活水平呈现为一个上升的曲线；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恰似一种实际的灾难。

因此，漫不经心地看，显得相互矛盾的两种结论完全可能同时存在。1790 到 1840 年之间，平均的物质生活水平略有提高。在这同一时期，剥削加强了，不安全加剧了，人类的苦难也增多了。到 1840 年，与 50 年前的前辈相比，大多数人的“生活改善 212

了”，但他们已经忍受的并将继续忍受的这一略微的改善，却似一种灾变性的历程。工人阶级的意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表现就是从这个经历中产生的。为了探索这个经历，我们应当做的几件事是：第一，我们要考查三类工人的生活经历的变化，即农业工人、城市手工工匠、和手工织工。[22] 第二，我们将讨论有关人们生活水平中某些不那么容易“量出来”的因素。第三，我们将讨论工业生活方式的内在强制力以及卫斯理宗对他们的影响。最后，我们还要考查新出现的工人阶级整体的某些方面。

[22] 我之所以选择这三类工人，是因为他们的经历最能说明19世纪上半叶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矿工和冶金工人的影响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充分显示出来。另一类重要的工人——棉纺工人——已在哈蒙德夫妇的《技术工人》中作了卓越的研究。

第七章　农业工人

213

我们先来考察占各种产业中人数最多的一类劳工，即农业工人。当我们考察他们从1790至1830年的历史时就会看到，要估计出“生活水平”是多么的困难。[①] 有一种说法（如哈蒙德夫妇所说的），说这方面的史料“稀少”，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更为困难的往往还是如何作出解释。关于19世纪初的工资和物价，有大量的记载，不过，同一个地区或同一职业中可靠的连续性数据却比较少。只要考查一下约翰·克拉潘爵士的《现代英国经济史》中汗牛充栋的史料，有关各个地区和各种职业之间多种多样的证据，就会感到此书内容极其丰富。确实，克拉潘所写的“农业组织”和“工业组织”两章本身就是一种训练——不是训练如何解释史料而是训练如何评定史料。

这位伟大的实证主义者在全部辛勤的研究中避开一切一般化结论，而只留下一个，即神话般的“平均”。在他关于农业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的只有“平均的农场”、“平均的小土地占有”和劳工对雇主的“平均比例”等等——这些概念往往把事情弄得更模糊而不是更清楚，因为这就把威尔士山区和诺福克谷物生产地区的证据混合在一起，尽管克拉潘自己也在竭力想把它们区别开来。继而我们又看到了“受圈地影响地区的普通农场雇工”、由于工业副业的产生而造成农业收入的“平均”减少、“形象十分

① 193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农业中就业的家庭有96.1万户，占英国家庭总数的28%。

含糊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平均劳工的"大致收入,等等。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平均"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结果:1830 214 年,在工资较低的那些郡中有全国60%的劳工,这些郡低于这个"平均"水准。[2] 克拉潘承认:"在所有的平均数中,有50%的数字其平均数可能低于平均线。"但是,如果这些平均数本身是依据长期就业工人习惯的工资得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地主审查自己的账簿并且通知农业部在田里耕作或驾车的农民习惯的工资为12先令,那么我们便可以得知全体或大多数临时工的平均工资将低于这个平均线。

克拉潘在讨论辅助收入和圈地的影响时,把我们来来回回置于实证的琐碎事务(如在格拉莫根"愉快地收割"、在勒德洛有半英亩宅边园地等等)和"平均"的估计之间;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感到同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了:

> 如果养猪和宅边园地给1824年英格兰的普通劳工带来的收入少于1794年……那么,很可能是那块土豆地的收入弥补其减少的部分,当然又是平均而言许多地方的劳工在这30年里丧失了公用地的使用权,当然使他们景况恶化,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就英国平均而言,由公地的大量圈占而造成的福利损失是不是相当大。在民众的回忆中,损失被夸大了;因为它在英格兰的许多地区影响并不大,在威尔士影响更小;在苏格兰,对纯农业工人的影响几乎等于零。[3]

那么,平均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论点的第一部分如果可

---

② 参见上文,第208页。全国"平均数"是从郡的"平均数"中计算出来的,各郡的"平均数"本身也受到同样的批评。此外,这些数据不是从劳工的证据中而是从雇主的证据中得出来的。

③ 摘自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第126页。

以证实在同一个村庄中失之于宅边园地又可补之于土豆地的话(虽然我们还应当考虑有关的地租),那它也许还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第二部分结论已经溶入了令人愉快的传统之中,这不是使用平均方法的例子,而是统计递减的例子,他要求我们用没有圈地地区的数字去冲减已圈地地区的数字,然后用郡的数字来除以这个弱等式中的得数,从而得出"由于圈地"而造成的福利方面的"平均"损失。不过,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因为人们不可能从性质不同的数量中得出平均数,更不可能用郡的数字去除以这个数字而得出有价值的平均数。可是,克拉潘却恰恰这样做了。

实际上,他所做的事当然是想为圈地狂潮时期的"福利状况"的难以捉摸的生活质量提供无从捉摸的价值判断。不过,要 215 达到这个目的,还必须在作出判断的同时考虑其他的许多因素,包括文化的因素和物质的因素。由于这个判断就像是在由环境的细节所构成的灌木丛中长出来的一颗高大的橡树——由于它本身披上了"平均数"的伪装——因而很容易被错误地当作对事实的描述。

事实本身也不像克拉潘所说的那样已经清楚了。19 世纪大部分的农业收入顽固地不肯转换成统计数字。[④] 我们不仅面临着劳力需求上明显的季节性的起落,而且还至少面临着四种不同的主仆关系:(1)按年度或季度雇用的农场仆佣;(2)基本上按年度雇用的大农场里的全日制长工;(3)按计时工资和计件工

---

④ 重要的是在克拉潘对工资和生活费用的比例变化进行估计时,不是依据他自己编制的数据,而是依据其他学者的成果,其中主要有西尔伯林的数据,这个生活费用的序列数据近来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见艾什顿在《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中的论文。关于在把结论一般化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方面,见 J. 萨维尔:《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人口的下降》(1957),第 15—17 页。

资付给报酬的临时工;(4)或多或少的有技术的专门人员,他们按工作签订合同。

第一类农业工人的数量在这个时期减少了,他们的工作最有保障,但独立程度最低。他们工资少,劳动时间长,但农场主在家中为他们提供食宿。第二类农业工人中既有条件最好的,也有条件最差的。一方面,是耕作工人或牧畜工人,他们在精明的农场主手下获得了工作保障,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也可以优先获得充当临时工的机会,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购买牛奶和粮食。在另一方面,是十来岁的农场人手,他们居住的房屋和吃的食品与早期工厂中贫穷的学徒一样差,他们住在堆干草的棚里,随时可以被解雇。在两者之间的是"生活必需品迫使他们沦为某个人的奴隶的那些不幸的人们",住的是租来的农舍,"整年只能为某种程度的低工资而从事劳动。"⑤ 第三类农业工人内部差别很大,可分为赤贫工人;妇女和儿童其工资与赤贫工人工资相仿;爱尔兰的流动工人(甚至纺织工人或其他城镇的手艺人为收获时节的高收入也会抛开本来的工作);分级计件劳工,例如刈割不同质量的草地而付给报酬的计件劳工。第四类劳工有数不清的具体做法,包括隐瞒转订的契约或全家共同收入等等,使得统计表格一团混乱。埃塞克斯一位农场主 1797 年的账簿上曾经有这样的记载:⑥

216

3 月 21 日:

萨姆森:水耕 29 亩	8 先令 9 便士
罗伯特:锯树梢一天	1 先令 9 便士

⑤ 农业部:《王国农业情况》(1816),第 162 页。林肯郡的一份报告把某个农场的租农舍的农民与另一个庄园里地主租给每个劳动者 1 英亩土地以种植土豆和 4 英亩草地养牛的劳工做了比较。

⑥ A.F.J.布朗:《埃塞克斯史料中的英国史》(切尔姆福德,1852),第 39 页。

5月20日：

外来者：锄小麦地5英亩

每英亩3先令6便士	17先令6便士

7月29日：

莱特：割苜蓿草7英亩	14先令
理查森和帕维利：清池塘	2镑12先令6便士

约瑟夫·卡特谈到1823到1830年农业工人的情况时，对亚历山大·索默维尔说道："我是个扎篱笆、铺草顶的，以筑篱为业"，

> 地主说，在7年内我每年都以那种工作从他那里赚得64英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要有一个人来帮我，有时还要加上两名妇女；但是他没有讲这一点。在那几年里，我有些年份要付给助手20英镑，他没有讲这一点。[7]

如果这些数字"没有讲这一点"，也就不可能讲出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实物报酬或低率报酬、宅边园地和土豆地、圈地的影响，税收、什一税、狩猎法和济贫税的影响，农村工业就业情况的变化，以及尤其值得一提的1834年前后济贫法的执行情况。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地方可以感受到不满情绪所产生的影响很是不同。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农场，除工资以外还有额外的实物报酬，这表明生活状况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一位农业史学家告诫我们）在更为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把这些补贴看做是"在农业中玩弄文雅而口是心非的交易——是一种压低工资的手段，或者在极端情况下是完全免去货币工资的制约手段。"[8]

---

⑦ A.萨默维尔：《扶犁的人》（曼彻斯特，1852），第262页。

⑧ 有关的类似问题，见O.R.麦克格里戈尔为厄恩利勋爵的《英格兰过去和现在的农场》（1961）所写的很有价值的导言，特别见第118—121页。

克拉潘有时候提出一些间接证据，目的是加强“乐观派”的观点，而多数证据的总的方向恰好却指向相反的结论。[9] 例如在讨论圈地的影响时，他举的事例给人的印象是公地的丧失导致牛的饲养业衰落；以此作为证据是矛盾的，并为各种不同的解释敞开了大门。但在这方面，1790 到 1820 年的证据显然是清楚的。温奇尔西勋爵在 1796 年写道：“凡在中部各郡旅行过而且愿意多询问的人，都会得到这样一个回答：过去这里有许多养牛的农场雇工，而现在土地都落到农场主的手中。”这不仅因后者希望扩大用地面积，而且还因“他们希望有更加依附于他们的劳动力。”[10]

217

事实证明，所有这些相互矛盾难以理清的证据——在济贫法的影响和种土豆的新土地两者之间；在丧失了的公用地使用权和宅边园地两者之间——“平均的”劳工在其中都显得极难捉摸。[11] 但即使没有这些平均数，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地描绘出在全国许多地方正在发生的某种总的进程。我们首先应当牢记，18 世纪推动农业改良的精神并不是——像一些冗长的著作所说的那样——产生于开发贫瘠的荒地以便“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粮食”的利他主义的愿望，而是产生于增加地租和更多利润的愿望。这样一来，他们便向劳工露出了一副悭吝鬼的面孔：

> 午前和午后给他们喝酒……不管是什么工作，这种普遍的做法，是可笑的习惯，应当立即废除。最荒谬的事

⑨ 克拉潘前引书，第 116—117 页。

⑩ 亦见农业部：《圈地总报告》(1808)，第 18 页；和《王国农业状况》(1816)，第 8—17 页。

⑪ 在这一方面，哈蒙德夫妇的《农村工人》和厄恩利勋爵的《英格兰过去和现在的农业》仍然是最好的叙述。关于农民住房，衣服和食品的状况，见 G.E. 富塞尔的《英国农业工人》(1947)。

情莫过于看见农夫在寒冷的冬天每过半小时就把耕地的马停下来跑去喝酒。[12]

圈地宣传者一般都提出这样的论点，说圈地可以提高地租的价值和平均亩产量。但圈地在一个又一个的村庄摧毁了勉强维持生存的贫民经济——养牛或养鹅，从公地上拾柴草取得燃料以及其他东西。茅舍农无法从法律上证明他们的这种权利，因而极少能得到赔偿。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有这种权利的茅舍农获得了一小块土地，但仍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存，相反在很高的圈地费用中，他们却要承担不相称的分额。例如在亨伯河畔巴尔顿 218 的圈地中，虽然考虑了对公用地权利的补偿，但我们发现，在近6000英亩被圈占的土地中，60%(3733英亩)由3个人分得，其余的51人只得到1至3英亩的土地。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分析：10个土地所有者占有81%被圈占的土地，剩下的19%的土地由116个人占有。在(1794至1799年)5年的时间里，这个教区圈占的可耕地，地租平均价值从每英亩6先令6便士上升到20先令，增加3倍多。[13]

问题不在于找到一个"平均"的村庄——即用邻近的海巴斯托去和巴尔顿对冲(希尔巴斯托显然是不允许茅舍农有公地使用权利的)，再以此去约分约克郡的皮克林(皮克林情况特殊，那里的房产持有人的收入比土地所有人好[14])——问题在于要注意经济的和社会的各种趋势的结合。(无论怎样强词夺理)圈地都是按照明显的财产规则及有产者和律师组成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而进行的一种明白的阶级掠夺。在整个拿破仑战争中，进

---

[12] 伦尼、布朗和希雷夫：《约克西区农业概览》(1794)，第25页。

[13] R.C.拉塞尔：《亨伯河畔巴尔顿和希尔巴斯托的圈地》(巴尔顿工人教育协会，1961)。

[14] W.马歇尔：《约克郡的农村经济》(1788)，第50页起。

行圈地的目标(提高地租)已经实现,由于亩产量的提高和物价的提高,一直维持着高额地租。在1815至1816年和1821年,当物价下降时,地租仍然很高——或像以往的情况那样,缓慢地下降——从而造成了那些在圈地运动中获得几亩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的破产。[15] 高额地租使地主得以维持铺张的享受和炫耀性的支出,与此同时(正像科贝特所抱怨的那样),物价的提高滋长了农场主和他们妻子对社会地位的更高欲望。这就是拜伦在《青铜时代》中所挖苦的那种"农村爱国者"的极盛时期。

不过,仅仅用贪婪还不足以解释在那个年代农业劳工何以会出现地位的沦落。在地主和农场主的财富大量增加的同时,农业劳工们怎么可能被迫处于牲畜一般的生存水平上呢?对此,我们必须从当时的整个时期内反对革命的普遍论调中去寻219 找答案。1790年以前的10年中,劳工的实际工资可能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在工业区和矿山附近的地区。18世纪90年代北方的某些乡绅甚至叫嚷说:"要通过一场战争来削减工资。"[16] 法国革命引起了贵族对法国的大恐惶和阶级对立的反思,这为强化雇主与被雇用者之间的剥削关系消除了障碍。在战争期间,城市里的改革者遭到镇压,以怀威尔为代表的讲仁道的乡绅们也销声匿迹了。在普遍进行圈地的问题上,除了"贪婪说"外,还有一种新的论点,即"社会纪律说"。在托马斯·比尤伊克的记忆中,公地即"穷人多年遗留下来的遗产"依然存在着,独立劳工依然居住于其上,他们用双手为自己造起了茅舍,[17] 而现在,这却被看做是无纪律的危险中心。阿瑟·扬把他们看做"野蛮人"

---

⑮ 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衰落的典型,见W.G.霍斯金斯:《中部地区的农民》(1957),第265—268页。

⑯ R.布朗:《约克西区农业概览》,第13页。

⑰ 比尤伊克前引书,第27页起。

的温床，“培育了为害天下的一类人”；在谈到林肯郡的沼泽地带时，他说：“那样荒野的郡培育了像沼泽一样野蛮而不开化的人。”[18]

除了自私自利所起的作用以外，意识形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乡绅们认为，他们所谓的公益精神就是要取消茅舍农的公用地使用权，使劳工成为依附者，削减他们的补充收入，赶走小土地所有者。当华滋华斯在高度赞扬年迈的迈克尔夫妇的美德，说他们为维护“世袭土地”而进行斗争时，影响大得多的《商业和农业杂志》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耕农”：

> 狡猾而固执的小农场主就像是院子里的母猪，他们是几乎与世隔绝的人，互不来往，也不管世界上有什么看法。

至于说茅舍农在圈地中有什么权利，他说“对他们的要求看来可以不加理睬”：

> 不过，其他的人提出了一些要求，他们的兴趣最终集中在让劳动者得到一定份额的土地上……，因为这样的恩赐必定可以大大地减少济贫税；只要1/4英亩的宅边地就可以让农民独立地生活着，不再需要任何援助。然而，这种慈悲的意图必须受到节制，否则我们便会把劳工转变为小农场主，会把一切行业中最有用的人变成废物。如果一名劳工所得到的土地超过了他全家夜间耕种的能力……农场主就不能再依靠他来不停地工作，翻晒干草或收割庄稼……一定会受到损害，……这有时甚至会给整个国家带来不利。

220

至于村庄里的穷人，他们是“狡猾的无赖，他们使用种种借口去

---

[18] 阿瑟·扬：《林肯郡农业概况》(1797)，第223、225、437页。

欺骗教区"。"他们把全部本领都用在欺骗上，以便从教区官员手中弄到钱，从而可以懒惰和挥霍。"[19]

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例外。但是，从1790到1810年，情况基本如此。增加廉价劳动后备军的依附性是个政策问题——"勤勉劳作"以翻晒干草，收割庄稼，使农场主有方便可图，还要从事由圈地而来的筑路、筑篱和排涝等劳动。科贝特所说的"苏格兰哲学"和哈蒙德夫妇所说的"时代精神"得到了地主和工业家同样衷心的赞许，尽管这完全符合工业革命的状况，然而在农业中，(从最好的角度而言)这与更古老的家长制传统(即地主对他的劳工负有责任)发生冲突，也与以满足基本需求为基础的收入传统(按照年龄、婚姻和子女状况付给不同报酬的古老的习惯，这种习惯体现在斯品汉姆兰济贫制度中)发生冲突。与此同时，(从最糟的角度而言)这又得到了对低微的劳工阶层态度傲慢的封建贵族的支持和强化。劳动按照供求规律实现其自己的"自然"价格的学说早就把关于"公平"工资的想法取代掉了。在战争期间它还被以各种方式进行宣传。1800年，一位乡村行政官员写道："对劳力的需求必然会调节工资"。他接着又说，济贫税维持着剩余人口的生存，鼓励结婚，从而使劳动力的供应超过需求，结果降低了工资。这位官员确实是"平均"学的先驱者：

> 我们假定把全英格兰每年的济贫税和工资总数加成一个总量，我认为如果不再征收济贫税的话，这个总量将会低于纯工资总数。[20]

221

把救济与面包价格和子女人数联系起来，种种这一类济贫制度的出现，无疑有多方面的动机。1795年建立斯品汉姆兰制度的

---

[19] 《商业和农业杂志》，1800年7月、9月和10月号。

[20] 《商业与农业杂志》，1880年10月号。

决定既出于人道的动机，也出于需要。不过，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的斯品汉姆兰制和“推销员”制度却产生于大农场主要求（在对季节工和临时工有特别需要的行业中）有一支常存的廉价劳动后备军。

战争以后，重点发生了新的转移：农场主非常愿意听从马尔萨斯发出的“限制人口”的警告。济贫税从18世纪80年代每年低于200万英镑上升到1803年的400万英镑以上，1812年以后又上升到600万英镑。正像济贫法委员会在1834年所说的，“限制人口就是限制懒惰和犯罪。”地主和农场主开始对公用地的丧失痛心疾首，因为农民利用公用地来养牛，养鹅，取泥炭，可以使穷人维持着生存，而不必求告于教区济贫吏。农村恢复饲养牛群，到处扩大种植土豆的小块土地，农业部慷慨宣传分配土地。但是，要把整个进程扭转回来已为时太晚了：公用地没有恢复（尽管更多的公用地被圈占），地主也不愿意冒险把土地出租给劳工（养1头牛需要4英亩土地，最低的租金为每年6英镑）。既然农场主在战争的繁荣时期制定了节俭的原则，在小麦价格下降的时候他们必然会更加节俭。此外，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增加了村庄的人口，破产的小土地所有者也加入了农业工人的队伍；因圈地而常常需要的工作量减少了；纺织业向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集中进一步削弱了东盎格利亚、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劳工的地位。新的或扩大了的农村工业（麦秆编结和花边业）虽然可以在某些郡暂时起一些缓解作用，但全面的衰落（特别是纺纱业的衰落）是无法逆转的。随着家庭就业的减少，妇女充当廉价农业劳动力的情况增加了。[21]

地租的上涨或物价的下降；战债高筑和货币危机；啤酒税、

---

[21] I.平奇贝克：《女工与工业革命》(1930)，第57页起。

222 窗税、马税；狩猎法和看守猎场人的用具，弹簧枪，捕人的陷阱以及1816年以后的流放判刑，所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加强了对劳工的压榨。科贝特谴责说："连雅各宾派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 政府会借口说这些都是'老天爷'做的吗？……啐！这些事是法国为摧毁自由而付出的代价，**除非法国的榜样会在英国产生一个改革**。这些事就是为此而付出的代价……[22]

劳工也不可能期望去找一个"平均"水平的教区牧师做他们的保护人。在科贝特看来，这牧师是住在教堂外面的兼职神职人员，在巴思与全家玩乐，却由一名获酬低的副牧师到教堂去主持礼拜：

> 如果你同他们[教区牧师]谈谈，他们一定不会承认在我们国家有什么苦难；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已从中获得了多大的好处。他们永远是傲慢和蛮横的；而反雅各宾派的时代使他们更傲慢更蛮横了……这是他们的荣耀时代。他们希望战争；他们把号角吹得最响。他们看到他们收取的什一税已处在危险之中……[23]

在将近40年的时间中，人们感到传统约束力的腐蚀作用，感到反革命的势力在农村里占绝对优势。1816年，贝德福郡的一位"哲学家"（麦奎因博士）给农业部写信说："关于济贫税，我总认为是和工人阶级的懒惰和堕落联在一起的"：

> 社会中下等人的道德和举止自从法国革命早期阶段以来一直在退化着。平等和人权的道理还没有被遗忘，

[22] 《乡村游记》（人人版），第1卷，第174页。
[23] 同上书，第2卷，第96页。

> 而是受到了盲目的爱护，同时又不情愿地弃置在一边。
> 他们以为各自的教区是他们的权利和遗产，他们有资格去依靠……[24]

人们好不容易才想到英国也是属于劳工的。

在南部和东部各个教区中，长期的消耗性的战斗围绕着济贫资格这个中心进行着。在公用地丧失以后，受救济的权利就是劳工最后的——和仅有的——权利了。年轻人和单身人——或村庄的手工业者——可以沿着运河（后来则是沿着铁路）到城市去冒险，或移居他乡。但是，成年劳工有家庭的牵挂，害怕失去“居住”安全。这一点连同他对家乡和农村习俗的依恋使他无力在工业劳动市场上同爱尔兰的贫民作全面的竞争（爱尔兰的贫民比他们更为不幸，甚至没有住所更说不上丧失住所了）。即使在工业地区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迁徙他地也不会得到鼓励。1834年以后，济贫委员会试图鼓励这种迁徙，主要是向兰开郡和约克郡工厂的迁徙——也许作为对工会的迎头一棒——把优先权给予“子女较多的寡妇家庭或人口较多的……手工业者家庭。成年人不能得到工厂里那种先进的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技能”。在曼彻斯特和里兹开设了劳动力市场，在市场里工厂主可以仔细了解各个家庭的详细情况，如儿童的年龄，作为工人的素质，道德品质以及有关的评语（“健康状况良好”，“适合其年龄”，“愿意承当三个孤儿的一部分父母职责”），市场就像出售货物一样。萨福克的一位有前途的督导员补充说：“我们有一批小家庭，比如说只有夫妻两个，如果你全部雇用他们的话，他们愿意

223

---

[24] 《王国农业状况》（1816），第25页。

按男人8先令，女人4先令的工资受雇。"[25]

济贫税是劳工的最后一笔"遗产"。从1815到1834年，斗争在继续着。乡绅和济贫吏一方，有权进行经济控制、居住权诉讼、罚做碎石工作和其他工作、掌握成群的廉价劳动力、侮辱性的劳动力拍卖甚至把人们圈在车上。穷人一方则有对济贫吏的威胁，零星分散的破坏活动，"奴性狡猾"或"愠怒不满"的精神，济贫委员会报告上逐页记载着明显的意气消沉："我们马上去做奴隶也比在这样的制度下劳动好一些……当人的精神已经崩溃，他还有什么用呢？"在南部实行斯品汉姆兰制度的各郡，劳工有他们自己辛酸的笑话——农场主"在这里(用济贫税)养活我们，就像把我们当做地窖里的土豆，直到非需要我们不可的时候才把我们拿出来。"[26]

224 这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说法。科贝特责骂了农村人口的普遍减少，他正确地说明了原因，但结论却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圈地——尤其是战争期间南部和东部地区对可耕地的圈占——可能并没有造成人口的全面下降，劳工们如涓涓细流一般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这个郡向那个郡移民，人口总数的上升可能超过了由此造成的人口减少。战争结束后，物价下降，农场主不能再"向我们的陆军和海军提供年轻人"了(他们在地方长官的手中是一支很有用的、有纪律的力量)，于是出现了关于"剩余人口"的叫喊。不过，事实证明，1834年新济贫法实施后，"人口过剩"的说法在许多村庄是虚构的。在这些村庄里，养活劳工主要

---

[25] 《济贫法委员会第一份年度报告》(1836)，第313—314页。W.多德：《工厂制剖示》(1842)，第246—247页。亦见A.雷德福德：《英国的劳工移民》(1926)，第6章。

[26] 同上，第212页。1845年的威尔特郡也有相同的笑话，不过"地窖"改成了"工房"，又见萨默维尔前引书，第385页。

靠济贫税。劳工们偶尔工作几天或半日工作然后又去依靠教区。一位济贫吏说："当霜冻开始时，工人被解雇。季节转暖时，农场主又来到这里，把他们带回家去。农场主把我的房子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劳动介绍所。"潮湿的天气造成了"剩余"，收获季节又造成了"短缺"。雇主们不愿意用济贫税来帮助自己邻近的劳工，却要遣散自己的人而到济贫吏那儿去要求得到工人。"某某解雇了他的两个工人，如果我要给他们付工资，他就应该给你们付工资，你们必须开路！"这个制度造成了混乱、浪费和敲榨的无穷循环，也给劳工们玩花样打开了一点点方便之门。不过，这除了造成狡猾和顽固的倾向外，还有一个倾向，就是劳工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工资或劳动生活的最后的小小机会。㉗

"这个制度"——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用这句时髦话来指斯品汉姆兰制度——"打破了雇主和受雇者之间相互依存的纽带"。实际上，南部的劳工已经沦落到对作为一个阶级的雇主的完全依附。但是，奴隶劳工是"不经济的"，特别是当它产生于对失去权利心怀不满并开始实行"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抵抗权利时更是如此。对小批劳工进行监督也是"不经济的"（尽管多年来在东部各郡一直是这么做的）——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劳工们必须三五成群地靠自己的主动精神带着农具耕畜在田野里 225 劳动或筑篱墙。在这些年里，剥削关系简直已经强化到停止"付钱"的程度——赤贫劳工已变成了偷萝卜的小偷、酒店里骗吃骗喝的乞丐、偷猎者和流浪汉。迁移比抵抗容易，因为加强剥削关系就是加强政治上的镇压。没有文化，精疲力竭，有抱负、脑子

㉗ 雷德福德前引书，第58—83页；关于虚构的"人口过剩"，参见《济贫法委员会第一个年度报告》(1836)，第229—238页；桑顿：《过剩人口》(1846)，第231—232页。

快的年轻人离开乡村，地主和牧师的重重阴影，对圈地暴动、面包骚动和偷猎进行野蛮的惩罚——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造成了听天由命的思想，使不满无法表达出来。科贝特这位最伟大的劳工代言人曾在农场主和小市镇中得到了许许多多的支持者，在1830年以前，很难说有多少劳工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有一次，科贝特骑马经过老萨勒姆的“不幸山”，遇见了一位下工回来的劳工：

> 我问他生活得怎么样，他说，糟透了；我问他原因何在，他说**时事艰难**。我说：“什么**时事**？不是有晴朗的夏天，很好的收成吗……？”他说：“啊，他们使得穷人的处境糟透了，使所有的一切都糟透了。”我说：“**他们？他们**是谁？”他沉默了。我说：“啊！不，不！我的朋友，不是**他们**，而是这不幸山抢劫了你们……”[28]

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个“社会大结构”全靠“悲惨的……农村基础”支持着。戴维·戴维斯写道：“这些人的妻子们艰难地抚养着一大群孩子，这些孩子除了为国家提供所需要的人力外，还填补了死亡在军营和城市里不断造成的空缺。”[29] 战争结束后，物价高涨，军人回乡，酝酿着骚乱。一封从约维尔地区来的信上，落款画的是一颗血淋淋的心。信上说：“我们决心不再忍受压在我们头上的负担了。血！血！血！一场总革命一定会来的……”[30] 但是，这种暴力的威胁却表达着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只有东盎格利亚，那里的劳工往往是大批大批地被雇用，在1816年爆发了严重的骚动。这次骚动把限制最低工资（每天2

㉘ 《农村游记》（人人版），第2卷，第56—57页。

㉙ W.贝尔沙姆：《论改善穷人生活的提案》（1795），第5页；D.戴维斯：《农业劳工的状况》（1795），第2页。

㉚ 穆迪圈地会致西德默思信，1816年5月13日。内政部档案，第42.150号。

先令)和限制最高物价的要求结合起来,出现了食品骚乱,对乡绅强征捐款,并捣毁打谷机。可是,骚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骚动者转而进行秘密的偷猎战,写匿名信,烧谷垛。[31] 226

1830年的骚乱开始时,有一批奇怪地犹豫不决、不主张流血的暴民("士气不振的自由人骚动"),在骚乱中也达到"黑面人"起义时出现的同样程度的暴怒心情。滑铁卢的胜利者记载道:"我劝地方行政长官们自己骑上马,"

> 每个人都带领着自己的长工和仆人、马夫、猎手、猎场看守,拿起马鞭、手枪、猎枪和一切能够拿到手的东西,共同地向……暴民们发动进攻,驱散他们,打垮他们,把那些无法逃跑的人抓起来,监禁起来。[32]

但是,派出特别使团去恐怖镇压起义的并不是威灵顿公爵,而是(要在议会中通过改革法案的)新上任的辉格党内阁。而且正是中等阶级激进主义的机关刊物《泰晤士报》带头呐喊主张严办。它发出告诫说:

> (1831年)1月9日记载,23名囚犯因捣毁造纸机器在伯明翰被判处死刑;11日在多塞特有3名囚犯因敲诈勒索钱钞和两名囚犯因抢劫被判处死刑;在诺里季,55名囚犯因捣毁机器和骚动被判罪;在伊普斯威奇有3人因勒索钱钞,在佩特沃思有26人因捣毁机器和骚动,在格拉斯特有30多人,在牛津有29人被定罪;在温彻斯特,有40多人被定罪,6人将处死刑……,在索

---

[31] 内政部档案,第42.149/51号。关于东盎格利亚的劳工群体,见W.哈斯巴奇:《英国农业劳工史》(1908),第192—204页。

[32] 《威灵顿快讯》,第2集,第8卷,第388页。摘自H.W.C.戴维斯前引书,第223页。

尔兹伯里有44名罪犯被定罪……。[33]

三年以后，另一名辉格党首相批准了多塞特郡托帕德尔劳工的流放判决，因为他们无视禁令，组织了工会。

农业劳工的这次造反蔓延开来，发展到东盎格里亚和中西部及南部各郡，其范围和持续的时间都比哈蒙德夫妇书中的叙述更广更长。劳工方面很少留下什么第一手叙述史料。1845 227 年，萨默维尔记载了约瑟夫·卡特的故事，他是汉普郡的一个村庄萨顿斯科特尼（这场暴动开始爆发的地点之一）的工人，因参加起义被判处流放，并在普茨茅斯的囚船上服刑二年。卡特说："每个人都得去，不可以拒绝"：

> 我参加了街对面转角处那所房子里的集会。那天晚上，乔·马森向我们大家宣读了奥弗顿来的一封信。那封信没有署名。不过乔说他知道是谁写的。乔很有学问。我知道这封信是年迈的德××写的，他大概已经死了。信是从牛顿而不是从奥弗顿寄来的。信上说，我们全都应该离开工作，萨顿的老乡应该出来，不再耕地。他们应该把农场主的马赶回去，让他们自己去照料。他们要把农场主的工人带出谷仓，要一起去把农场主用来打谷的（机）器捣毁掉。……
>
> 嗯，关于那封信，乔·马森读的那封信，我们当时不知道信是谁写的。不过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在场的所有人知道，年老的德××跟这封信有关，他是科贝特先生的好朋友，他常常给科贝特先生写信。他从没有遇到过麻烦。他是一个太能干的人了，让别人陷入麻烦，

---

[33] 普伦蒂斯：《曼彻斯特历史纲要》，第372页。最后，有9名工人被处以绞刑，457人被流放，约400人被囚禁。见哈蒙德夫妇：《农村工人》，第10—11章。

而自己却不牵进去。不，我不是怪罪科贝特先生。我是说年老的德××，那个鞋匠……

劳工们于是向乡绅和农场主收钱或敲诈钱，约瑟夫·卡特当上了司库：

他们说我很清白，把钱交给我管。我一次有40英镑，这40英镑全是先令。有人对我说应当带着这笔钱溜走，我曾想那样干一下。我们走在伦敦大道的时候，来了一辆车，我突然想要坐那辆车，带着那40英镑，不再做那些事了。可是我想到要抛下我的妻子，想到他们都会说我是流氓，于是，那辆车很快就从我身边过去了。

根本就没有必要审问我。我被关进温彻斯特监狱后，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来找我，让我指控马森家两个人。只要我供出他们，我就可以没事了。如果我说出我知道的什么，他们就会被绞死，就像波罗曼、库克和库珀被绞死一样。我和其他囚犯曾被带出去看他们被绞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一个一个地威胁我们说出我们知道的事。但我决不能告密。所以，两个马森只被判了流放，他们也把我流放了。我是被暴民们裹胁进来的，不是我的意愿，但这也不足以让我去告密，因为你明白，我同他们站在一起……那都是年轻人干的……。[34]

劳工暴动是一场道地的捣毁机器的骚动，连一点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也没有。谷垛和其他财产（农业地区的一些机器设备）被捣毁，主要的攻击对象是打谷机（尽管预言家有过告诫），228

[34] A·萨默维尔前引书，第262—264页。

这种机器明显地正在取代已经饥肠辘辘的劳工。因此，捣毁机器实际上起到了某种及时发泄的作用。[35] 不过，在"年轻人"当中，具有未来意义的政治思想可能正在广泛地传播着。[36] 像乔·马森那样"有学问的"人可能预示着乔治·洛夫莱斯的出现，而德某某那样激进的鞋匠在大多数小市镇里都可以见到。可以说，在诺福克郡的村庄里可以看到雅各宾派和激进派进行鼓动的迹象。1830 和 1831 年，在林肯郡，当局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恫吓那些读过科贝特的《纪事》的劳工。[37] 不过，即使存在着动荡的政治意识，也还没有达到城市和乡村的劳工建立共同的组织并形成共同目标的程度，直到这次农工暴动被镇压的多年以后才达到这样的程度。[38]

1830 年的暴动并非完全没有作用。它造成南部各郡工资的暂时提高，间接地说，也对腐败的旧制度给予了致命的打击。许多对事情看不下去的农场主和一些乡绅同骚动者进行谈判，或者给予他们消极支持。这次骚动既削弱了乡绅的信心，也有助于唤起 1831 至 1832 年的议会改革宣传。科贝特写道："这个事件的重要特征在于，至今为止，中等阶级总是沆瀣一气，一般说来是反对工人阶级的，现在，中等阶级却从心里同他们站在一起，虽然并不总是在行动上站在一起……99％的小商人，甚至是

---

[35] 见 E.J.霍布斯鲍姆：《捣毁机器者》，载《过去和现在》，第 1 期（1952 年 2 月），第 67 页。

[36] 肯特一位劳工的说法广泛地流传着："今年我们要捣毁谷堆和打谷机，明年我们要同牧师们较量，后年我们将向政客们开战。"可参见内政部档案第 40.25 号中的传单。

[37] 见 J.休斯：《无尽期的审判》，载《农工》杂志，1954 年 11 月号。

[38] 1833 年，詹姆斯·沃森要求工人阶级全国同盟的成员要做出特别的努力，在农业工人中建立分部。《工人之友》，1833 年 8 月 3 日，亦见《激进改革派》，1831 年 11 月 19 日。

伦敦的小商人，都站在劳工一边。"[39] 贵族丢了"面子"，议会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趋于明显。于是从这时开始，在农业工人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政治发展了：30年代农业工人中隐藏着工会主义想法；1835年，约瑟夫·阿奇的父亲（"一个像古人一样坚强和稳重的人"）为拒绝在支持谷物法的请愿书上签名而受难；宪章派分会遍布于东盎格里亚和南部地区。 229

但是，劳工的不满像过去一样，仍是一种与构成城市工人阶级意识的其他因素合在一起的共鸣。虽然——与法国或爱尔兰不同——他们的不满情绪从未导致全国性的一致的宣传运动，但从最大程度上看，却总是归于**土地**。（1834年，伯明翰郡劳工请愿书上写道）"布莱德洛圈地以前日子好过一些……。我们享用1/4英亩土地和支付全部租金"。（1837年，埃塞克斯劳工请愿书上说）"给每个劳工分配一小块土地，让他们可以用铲子耕种……"（1845年，威尔特郡一个劳工的演说）"他希望每个劳动者都按照农场主所支付的同样的租金得到三四英亩土地。他们会交纳租金的，而且是愉快地交纳。（大声欢呼……）"劳工或其子女迁往城镇后，这种愿望仍然存在。当什一税、狩猎法和打谷机已被人们遗忘以后，失去的权利仍然留在人们记忆中，或者像克拉潘所说的，在"民众回忆中""被夸大了"。我们将会看到科贝特和亨特这两位农场主如何帮助形成新的城市激进主义，不过，农村的回忆通过无数个人的经历被输入了城市工人阶级的文化之中。[40] 在整个19世纪，城市工人公开表达也许是他的祖父暗中就有的对"土地贵族"的仇恨；他欢喜看活报剧中丑恶的

---

[39] 《政治纪事报》，1830年12月4日。

[40] 20世纪30年代，理查德·霍加特曾证明过利兹的工人阶级中还残存着农村的回忆。见《应用文字》(1957)，第23—25页。

地主角色；他宁可进济贫院也不愿接受慷慨的夫人给予的救济；他认为地主无“权”得到他的财产，却愿意工厂主哪怕是用下流的方法“赚”他的钱。城市工会会员对流放托帕德尔农工的案件立即作出普遍的反应，对于后来阿奇工会的斗争也作出了不亚于此的反应。对土地的渴望，从斯彭斯时代一直到宪章派土地计划以及以后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地升起，与（领料之后在工厂外面做工的）外作工对“独立”所抱的愿望交织在一起。也许我们在今天的一份土地和小园地里还保留着这种愿望的遗痕。土地永远同联合相伴随——社会地位、安全和权利的联合——它比庄稼的价值更为深远。

230

早在18世纪90年代在雅各宾派对土地贵族的仇恨中，我们就可看到这种影响。这是潘恩的《农业正义论》和斯彭斯宣传的“土地国有化”培育起来的手工工匠的激进主义中一贯的特征。在战后严重的萧条中，沃森医生和其他演说家得到了失业者的巨大支持，也得到了被解雇的水手和士兵的支持，他们都参加了矿泉地的集会：

> ……贸易和商业被消灭了，但还有土地，这是自然界的安排，土地就是为了养活人类的。在任何时候，土地都是以使人们免受苦难……只要他有铁铲和锄头……[41]

在以后的十年中，欧文主义在平民追随者当中改变了形式，在土地上建立合作公社的梦想获得了非凡的力量。

于是，在“诺曼杂种及其武装匪徒”来到之前英吉利本来是有自由的这样一个政治神话之上，如今又增添了社会神话，即在圈地和战争之前有一个农村公社的黄金时代：

> 就是说，我们要活到那一天，亲眼看到恢复英国的古老

---

[41] W.M.柯尼：《詹姆斯·沃森审判案》(1817)，第1卷，第70页。

> 时代，英吉利的古老集市，英吉利的古老节日和英吉利古老的公正，每个人都依靠自己的汗水生活着……到那时，织工用自己的织机劳动，站在自己的土地上伸懒腰，到那时，法律承认穷人充分享受每一样东西的权利……

这就是宪章派领袖费格斯·奥康诺对这个神话所做的宏伟的描绘，不过却是科贝特、亨特、奥斯特勒和其他二三十个激进派领袖作出的贡献。英格兰过去野蛮的刑法、贫困、拘留所等等统统被忘却了，而已经过时的家长制社会本身却成了一种神话力量——也许，同欧文和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乌托邦幻影一样有力。我们说这是一个"神话"，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是虚构出来的，而是说，它是回忆的综合，是一个"平均"，其中每一种损害和每一种凌辱都被集合起来了，构成了一个整体。(在奥康诺的一个小册子中)"老罗宾"告诉工厂主说，他年轻时，"特威斯特先生、格拉布先生和斯克鲁先生[42]家后面的新街道……全是空地，8岁，9岁，10岁，11岁，噢，还有12岁的孩子们常常在那儿玩耍，度过时光，他们玩板球，捉迷藏，玩弹子，打球……做跳背游戏……后来时代变了，富人说着'他来了'，'他们来了'，把穷人吓坏了"。工厂主于是问："'他们'是谁，罗宾？" 231

> 怎么，当然是波尼[即波拿巴]和法国人。那时，富人吓走了穷人，偷走了所有土地。这都是公用地，史密斯先生，……左边的右边的，直到监狱和军营，所有的土地都是公用地。在魔鬼墓地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可以在公用地上养牛，养驴，养马，他们可以玩板球，赛跑，摔

[42] 人名双关语：特威斯特(Twist)，即折磨；格拉布(Grab)，即抢夺；斯克鲁(Screw)，即小气鬼。——译注

致……

……现在他们在一头造起了军营，在另一头造起了教堂，最后，所有的人都卖掉了牛，向格林德律师、斯奎斯律师⑬交钱……他们当中一位的儿子现在是市长，另一位的儿子是银行经理。啊，天啊，许多诚实的人为了古老的公地被绞死了，被流放了。⑭

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地发动要求归还土地而骚动的并不是农村劳工而是城市工人。他们当中有些是农村劳工的儿孙，城市的政治生活增长了他们的智慧，摆脱了地主的阴影。有些土地计划的支持者是农村出身的织工和手工工匠："父亲、祖父和所有的乡亲都属于我耕种的这块土地，既然它没有害了他们，那么，为什么要害我呢？"⑮ 面对着不断发展的城市中的砖头废料上的艰苦与失业，伴随着被剥夺而产生的新的痛苦，对失去权利的回忆重新出现。

我们早已离开了对"平均"的讨论。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把福利状况做一个平均。我们看见了与简·奥斯汀小说中所描写的世界相对的一面，生活在那一面的人们充分地感到了那个时代是一个灾变。科贝特写道："当农场主成为绅士的时候，他们的劳工都变成了奴隶。"如果可以说在这个进程的结束时有所收益，那么，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收益给了另一些人。如果拿萨福克的劳工与他在棉纺织厂工作的孙女相比较，则我们比较的不是两种生活水平，而是两种生活方式。

不过，关于那些"平均"，这里也许有两点说明。第一，有可

---

⑬ 人名双关语：格林德(Grind)，即压榨；斯奎斯(Squeez)，即敲诈。——译注

⑭ F.奥康诺：《雇主和雇工》(1844)，第15、41—42、56页。

⑮ 《劳工》(1847)，第46页。

能拿同样的数字来证明贫困的相对下降和绝对上升。在劳动力需求上，农业是一个伸缩性很小的部门。如果某个农场在1790年需要10名劳工，那么，到1830年所需要的劳工可能还是10名，或者由于改良犁和打谷机的使用，需要8名。我们可以证明在这个时期内，有正常工作的劳工或车夫的实际工资增加了；与此同时，村庄里的人口——还有临时工和失业者——的增加造成了穷人数量的绝对增加。如果这在农业中最为明显，那么，我们在讨论全国的情况时必须记住一个相同的假设。出于论证的需要，我们来假设40%的人口（1050万人）生活在1790年设定的“贫困线”以下，而到1841年只有30%的人口（181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么，穷人的绝对数字就从400万左右上升到了500万以上。更多的贫困被人们“感觉”到了，而且事实上穷人也增加了。

这并不是玩弄数字游戏。这样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但与此同时，关于平均状况的任何估计都无法向我们说明人与人的关系之间的“平均状况”。为了做出这方面的判断，我们必须尽可能通过相互冲突的主观证据来开辟一条路。对这个阶段进行判断还必须考虑到“平均的”英国绅士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我们并不需要接受科贝特作出的抨击：他们是上帝创造的一切事物中“最残酷，最无情，最蛮横傲慢”的人。但是，我们决不能回到近来重新出现的奇谈怪论中去：“英国农村绅士确实是最特殊的人类阶级，世界上任何其他的社会都没有产生过这样一个阶级。”[46]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提供诺福克一位劳工的看法，他在给“阿希尔的绅士们”的一封匿名信中说：“这个时候，你们把最重的负担压在我们身上，把从来没有见过的最硬的轭套在我

[46] R.J.怀特：《从滑铁卢到彼得卢》(1957)，第40—41页。

们颈项上”:

> 我们实在难以忍受了,你们常骗我们说,所有这些错误全怪议会中那些当官的,但……他们同这个教区所做的规定毫不相干。
>
> 233 你们为所欲为,抢走了穷人的公用地权利,犁掉了上帝让它长草的土地,而穷人却全靠草地来养牛,养猪,养马,当然还养驴。你们把垃圾和石头堆在路上,不再让草生长……你们五六个人把教区的全部土地弄到手,你们想发财,却让所有的穷人挨饿……

“我们计算过,我们和你们是 60 比 1,所以这么许多人比一个人,你们难道想统治吗?”[47]

但是,农村社会尤其恨那些靠消费什一税而生存的教士们。1830 年,埃塞克斯的一位教区牧师收到一封包着两根火柴的恐吓信,信中说:“准备好同你丑恶的灵魂一道下地狱去吧,你和你的一班人马是教区里最大的穷光蛋……。”(怀特岛的)弗雷希沃特的教区长收到一位教区居民以轻微纵火的方式加以更明确的提示并附来一封信:“20 年来,为了维持你那该死的骄傲,我们一直在忍饥挨饿”:

> 我们这样做是不得已的,而你的心肠却像法老的心肠一样硬,……你不要以为放这把火是当众冒反[冒犯]你,要不是你罪有应得,我们也不会这样坐[做]。好吧,我的老朋友,你说不定在这儿,我怕你会被烧焦。要是这样的话,农民们会怎么样大笑起来,看像你这老牧师到底被烤焦了……

[47] 爱德华兹牧师 1816 年 5 月 22 日致西德默思信附件,内政部档案,第 42.150 号。

写信的人最后以同样阴沉的口气说:“至于这把小火,你不要太吃惊,当我们把你的谷仓烧掉时,它还更厉害呢……”[79]

---

[79] W.M.赫洛克牧师1830年12月14日信附件,迪恩·伍德牧师亲启信,1830年11月29日,内政部档案,第52.7号。

第八章　工匠及其他

如果农业工人的平均状况是无从捉摸的，那么，当我们讨论城市工业中的劳工的平均状况时，也并不亚于此。到1830年，典型的产业工人并不在工厂里工作，而是（作为工匠或“机工”）在小作坊和自己家里工作，或者（作为劳工）在街道、建筑工地或码头上从事多少带有临时就业性质的工作。1816年，科贝特主办的《政治纪事报》以平民百姓为对象，他所指的平民百姓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帮工和劳工”。我们将会看到，“工匠”这个词所包含的意思有很大的差异，它从富裕的手工业师傅直到整天汗流浃背的穷苦劳工都有，前者自己雇用工人，不依附任何雇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要准确地估计各种不同行业中工匠的人数和地位是困难的。1831年人口普查的职业统计表不加分析地把工匠师傅、独立劳动者和劳工归在同一个项目内。[①]建筑业的人数居农业工人和家庭仆役之后占第三位（1831年列于大不列颠栏下仅女性家仆就有670491人），其人数在1831年大约是35—40万成年和不成年男工。如果不算外作制占优势的纺织业，工匠人数最多的行业是制鞋业，成年男工的人数在1831年约为133000人，其次是成衣业工人，为74000人（这些数字包括雇主、乡村鞋匠或裁缝、外作制工匠、店铺主和真正的城市工匠

① 梅休后来说这份职业统计表是“粗糙、未经消化、本质上不科学的”，这份文件的“缺陷使国家丢脸，商业阶级和工人阶级全都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职业分类的方法连刚入门的生手都感到害羞。”

在内)。多西萝·乔治博士对伦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匠中心所做的估计看来是权威性的,她估计 19 世纪初那里的各类帮工大 235 约为 10 万人,约翰·克拉潘爵士告诉我们:

> ……典型的伦敦技术工人既不是酿酒工人或造船工,也不是丝织工人,而是建筑行业中的一员;或制鞋匠、成衣匠、家具匠、印刷匠、钟表匠、首饰匠和面包师——这只是一些主要的行业,每个行业在 1831 年都有 2500 人以上的成年工匠。②

19 世纪初,技术工匠的工资不是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而是取决于声誉或"习惯"。习惯的工资规定可以包含许多东西,从传统形式的农村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到城市中心的复杂的制度规定。工业仍然极其广泛地分散在整个农村,白铁匠、磨刀匠和商贩带着他们的技艺与货物,走乡串户,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从一个集市到另一个集市。大村庄里往往有石匠、盖屋顶者、木匠、车轮匠、鞋匠,还有铁匠的锻炉。小市镇里则有马鞍匠、马具匠、鞣革匠、裁缝、鞋匠、织工,很可能还有当地的特长,诸如马镫匠、枕头花边匠,以及驿站旅店、运送农业产品和煤、碾磨谷物、烤面包等各种行业的活动。这些农村工匠当中有许多人受过较好的教育,有多方面的技能,自视"高于"城市工人(如织工、织袜工人或矿工),他们进城时会同这些工人接触。他们随身带来了自己的习惯;这些无疑影响到后来发展成城市大工业的建筑业、车辆制造业,甚至机械制造业等等的小市镇手工业中的工资定额和差异。

在许多乡村工业中,制约价格的不是(难以理解的)成本而

---

② 关于这些数字,见《议会文件集》(1833),第 37 卷;克拉潘前引书,尤见第 72—74 页和第 5 章;R.M. 马丁:《英帝国的税务》(1833),第 193、256 页。

是习惯，特别是在使用当地原料如木材或石料的情况下尤其如此。铁匠打造一件胚料是收一个英镑，而再加工成精品却只加收一点点费用。乔治·斯图尔特在其经典著作《车轮匠的作坊》中曾经描述过他在1884年接管法纳姆一家家庭工场的时候习惯价格如何占主导地位的，他说："我最大的困难是怎样弄明白习惯价格"：

236

> 我怀疑这个地区的生意人——可以肯定这儿没有车轮匠——是否真正知道他的产品成本是多少，能够获得多少利润，或者是否真正知道他的行当是赚钱还是赔本。

利润主要是来自于"加工"和修理工作，至于车辆，"对我来说，赚钱的惟一机会是靠降低产品的质量；而工人的脾气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使其完全不可能。"工人按照工艺要求的速率工作："他们可能（而且恰到好处地）强调匠人的信誉，强调原料的质地"，就原料而言，"一个惹人讨嫌的工人常常会不肯使用我们提供的材料"。在工人心中"储藏着一个好车轮匠应当干出什么样的活计来的全部当地的知识。"③

在一般情况下，工艺的传统习惯总是同"合理"的价格和"公平"的工资的残余观念缠在一起的。社会的和伦理的标准——生存、自尊、对工艺信誉水平的自豪感，对不同程度的技能给予习惯的奖励等等——如同严格的"经济学"观点一样，在早期的工会抗争中一直据有主导地位。斯图尔特所描绘的车轮匠作坊说明许多古老的做法长期保存下来了。农村中的车轮制造业同城市中的车辆制造业的根源相同（在19世纪初），其内部的确有一种等级分类，其工资差别无法用经济学的理由以证明其合理

③ G. 斯图尔特：《车轮匠的作坊》(1923)，第10、37章。

性。1818 年出版的一本《英国行业手册》告诉我们,“工资与工作的优劣成正比”,车身匠的工资每周 2 至 3 英镑,装饰匠“约两个基尼”,车架匠 1 至 2 英镑,铁匠 30 先令,而漆匠又有自己的等级——花纹漆匠给车身绘制风头十足的大型花纹,3 至 4 英镑,车身漆匠 2 英镑,帮工漆匠 20 至 30 先令。工资上的这些差别证明或反映了社会地位的等级高下:

> 车身匠居首位,其次是车架匠,再次是装饰匠,然后是铁匠,然后是弹簧匠,再后依次是车轮匠,漆匠,镀金匠,支架匠,等等。在所有工匠中车身匠最富有,他们构成了一类贵族,其他工匠怀着半尊重半妒嫉的感情看待他们。他们也觉得自己是最了不起并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其他工匠:车架匠是可以亲密态度去俯就的那类人,对装饰匠可不能看不起,对漆匠的头儿他们会表示尊敬;但对普通的漆匠,他们最多点点头,就算是给了面子。④

237

“(马车)客车匠仁爱会”的活动证实了这些情况,他们在 1819 年协会总书记及其他 20 名成员受到结社法的追究时,仍然坚持了下来。但在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最早使用了“贵族”一词来指技术工匠。⑤ 人们往往认为“工人贵族”的现象是同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技术工人的工联主义相一致的,或者说它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但事实上,在 1800 到 1850 年之间,既有旧的也有新的工人特权阶层存在。旧的特权工人由工

---

④ W.B. 亚当斯:《英国的游乐马车》(1837),转引自霍布斯鲍姆:《19 世纪工业中的习俗、工资和工作量》,载布里格斯和萨维尔编:《劳工史论文集》,第 16 页。

⑤ 1939 年《警务总监的第一份报告》第 134 页上也首先使用了这一词。由此可见,这个词在当时已经被普遍使用了。

匠师傅组成，他们认为自己同业主、店主和专业人员一样"值钱"。[⑥]（《英国行业手册》照老规矩将药剂师、讼师、眼镜商与木匠、鞣革匠、成衣匠、陶瓷匠相并列）。在某些行业，工匠的特权地位通过习惯势力保存下来，或通过结社和严格的学徒制在作坊或工厂的生产中继续存在，也可能是因为在制作豪华精致的玻璃的、木料的和金属的作品等专门生产奢侈品的行当中需要保持其高超而专门的手艺。新的特权工人是随着冶铁、机械和制造业中新技术的兴起而诞生的。这在机械行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即使在棉纺织业中，我们也必须牢记这样的告诫："我们根本不是纺纱工人"。因为在1841年的人口普查中例举棉纺织业项目之下有1225个就业工种，其中包括监工、调试和修理机器的各类熟练的"看管工"、印花染织的图案绘制工和各种其他的熟练辅助工匠。他们赚取的工资特别高。

如果说在伦敦的奢侈品行业中，或在大制造业的手艺与技238术、管理职能之间的交接点上找得到得天独厚的贵族的话，那么在几乎每一个需要技艺的行业中也可以找到次一等的小工匠贵族或特权工人。我们只要从托马斯·拉奇那双好奇而幽默的双眼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是莱斯特的一名织袜工，1812年他参加一个游说代表团，到伦敦去向议员们游说，要求他们支持有关针织业劳动条件规定的一项议案。[⑦] 这批织袜工人一到伦敦，就立即同伦敦的工联主义者发生联系。织袜工当时还没有永久性的工会组织，只组成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去推动他们的议案，而伦敦的工会则不顾结社法的限制，已经轻易地在职业介绍所立稳脚跟。托马斯·拉奇在给中西部地区的朋友们回信时说

⑥ 关于18世纪的"贵族"，参见乔治前引书，第4章。

⑦ 见后文，第535—540页。

道：

> 我们进驻的那个房间是木匠委员会曾经用过的房间，当时他们在这里打关于雇用没有学徒资格的生手的官司。我们有机会向他们谈起我们的事情，他们以为我们有一笔永久性的资金可以在任何时候应付各种需要，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们倒会借给我们两三千英镑（他们那个工会有两万英镑基金），可是等他们一弄明白我们根本没有这样一笔基金来维持自己时，就不借钱给我们了，他们的鼻子不自觉地翘了起来，互相点头以目示意，突然喊叫起来，天哪!!! 多傻啊!!! 他们一定会结结实实地得到报应的！十倍的报应还不止!!! 我们总以为织袜工是一批可怜的人！可是口袋需要装满钱就像人需要灵魂一样。我们这个行业如果不联合起来，结果将会怎么样呢？也许会和你们今天一样可怜！看看其他行业吧！他们全都联合起来了（只有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例外，他们的处境多么惨啊）。看看成衣匠、制鞋匠、钉书匠、箔金匠、印花工、泥瓦匠、外衣匠、制帽匠、鞣革匠、石匠、洋铁匠吧，他们的每周收入没有不在 30 先令以上的，有的还达到了 5 个基尼，这些全得靠联合起来，要是他们那些行业没有联合起来，就和你们一样糟糕……⑧

在托马斯·拉奇开列的这份名单上，我们还可以加上许多其他的行业。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收入接近每周 30 先令的特权线，他们面对着伦敦业主的联合力量，经过了特别艰苦的斗争才

---

⑧ 摘自《诺丁汉选邑档案，1800—1835》（1952），第 8 卷，托马斯·拉奇 1812 年 4 月 24 日致织袜工人委员会信。

组织起来。有些技术工人并没有这么幸运。铸字工的联合被破坏了，他们每周的工资在1818年据说平均只有18先令；从239 1790年以来从未增加过。眼镜匠和制管筒的匠人的情况也差不多。《女怪》说，1819年伦敦普通"机械匠"每周的工资大概为25先令，以一年为平均数。[9] 可是，到1824年，即结社法废除的那一年，伦敦各个行业的工会公开问世，我们从1825年《行业报》最常见的栏目里常常提到的某些行业中可以了解到所谓"小工人贵族"的情况：在拉奇开列的名单上，我们又可以加上铜匠、造船工、锯木工、填船缝的匠人、金属拉丝工、铸铁工、皮货工人、整皮工、制绳工、铸铜工、染丝工、钟表匠、制革匠等等。这是一份很可观的名单。那些年的伦敦和其他的大城市里，这些人构成了工匠文化和政治运动真正的核心。这些行业享有的特权并不一样，其中一些行业工会的成员在1825年还不足100人，很少有几个是超过500人的。地位特别高的工匠集团之间也有差异，例如家具工（他们通过招收学徒而获得"数量很大的外快"）与濒临危机而且地位正在下降为户外工人地位的鞋匠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别。[10]

类似的特权工匠或技术工人组成的重要集团分布各地，不但存在于同一行业中，而且也存在于伦敦所没有的行业中。特别是设菲尔德的刀具行业和伯明翰的小五金行业。直到19世纪很长一段时期以后，后一种行业的小作坊仍然为数极多，使伯明翰成为小业主的都会。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博尔顿的梭和工厂可算是规模较大的。不过，到18世纪末，这个城市的绝大

⑨ 见《女怪》，1818年10月17日、11月21、28日和1819年2月6日、3月20日。

⑩ 1825至1826年的《行业报》。

多数人口仍受雇于小作坊，他们或者充当劳动力或者是半独立的手工业者。只要列举出伯明翰的那些产品，就可以记得纷纷纭纭星罗棋布在该地众多的技术工匠，例如各色纽扣、刀具、靴刺、烛台、玩具、枪械、别针纽扣、装饰品、鞭子把柄、咖啡壶、墨水台、铃和钟、马车配件、蒸汽机、鼻烟盒、铅管、珠宝首饰、灯具、厨房用具等。骚塞在 1807 年写道："我所碰到的每个人身上都发出一股机油和金刚砂的气味。"⑪

19 世纪头 30 年代，黑乡（the Black Country）的专业化过程趋向于把较简单的程序，如制钉和制链，推向四周的外作工村庄，而伯明翰城市则保留着较高的手艺制作。⑫ 这些工匠行业内小业主师傅与有技术的帮工之间的差距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经济方面来看都可能比帮工与普通城市工人之间的差距要小一些。只有在这些行业里工作的人，他们的儿子才可能进入这一行业，否则，只有支付高额的学徒费才有可能进入这些行业。他们用行业的行规限制外人进入他们的行业（例如设菲尔德刀具公会的这种行规到 1814 年才废除），业主们鼓励这种限制，工会也以互助会的名义出现，维持这些行业的规章制度。在 19 世纪初（正如韦伯夫妇所说的），在这些工匠中间"我们的工业社会依然是在各行业中纵向地划分，而不是横向地分为雇主和工资收入者。"⑬ 同样，在一个特定行业中，只有那些有特权的部分工人才有可能成功地限制新工人加入或成功地升高他们的地位。近来对伦敦搬运工人的研究揭示了工人中一个部分——其中包 240

---

⑪ J.A. 兰福德：《一个世纪的伯明翰的生活》，第 1 卷，第 272 页；C. 吉尔：《伯明翰史》，第 1 卷，第 95—98 页；骚塞：《英国通信》，第 36 封。

⑫ 见 S. 蒂明斯编：《伯明翰和中部五金生产区》（1866），第 110 页及各处；H.D. 丰格：《英国工厂制的胜利》（天津，1930 年），第 165—169 页。

⑬ 韦伯夫妇：《英国工会史》（1950），第 45—46 页。

括鱼市搬运工的历史是十分复杂的，人们很容易以为他们是临时工，但实质上他们处于市政当局特殊的监护下，直到19世纪中叶，他们在非技术工人的海洋中仍然保持着特权地位。[14] 在更多的情况下，技术工人或学徒出身的工人与普通劳工之间例如铁匠与他的打铁助手之间，泥瓦匠与他的辅助工之间，以及印花布印花工与他的助手之间等等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亨利·梅休所描绘的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伦敦工匠与劳工之间在地位、组织和经济报酬方面的差别，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差别相比，如果不是更大的话，至少是同样大的。梅休评论道："我们从伦敦西区的技术工人当中走到东区的无技术劳工当中，发现道德和知识上的变化太大了，就像来到了一个新大陆，置身于另一个种族之中"，

241

> 工匠们几乎就像是感情激动的政治家。他们受过充分的教育、有思想，堪称能认识到他们在这个国家有重要的地位……无技术劳工却是另一类人。他们还像听差的，没有政治观念，对强烈的民主观点没有兴趣，对任何事情他们都没有政治观点；反过来说，即使他们有政治观点，……他们宁愿"随遇而安"而不主张工人应当当家做主。[15]

在南方，正是在工匠中互助会成员人数最多，[16] 其工会组织最持久最稳定，教育运动和宗教运动兴盛，欧文主义的影响也植根

---

⑭ W.M.斯特恩：《伦敦搬运工》(1960)。

⑮ H.梅休：《伦敦工人和伦敦贫民》(1884)，第3卷，第243页。与此相反的是，梅休在书中曾经提到他的一名清洁工人所说的话："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我是宪章派。"

⑯ 关于互助会的社会成份，见P.H.J.H.戈斯登：《英国的互助会》(曼彻斯特，1961)，第71页。

最深。"流动"寻觅工作的习惯也是在工匠当中最为普遍的，有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工匠的大旅行"。[17] 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自尊心以及对独立的渴求如何为战后的政治激进主义增色。如果他们失去了手艺和工会的庇护，这些工匠就会成为梅休笔下伦敦最可怜的一群人。旺兹沃思和克拉潘联合工厂的老板对梅休说："这些贫穷的机械匠是与一般的游民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们的宿舍和"职业介绍所"与流动的劳工及"旅行者"的团体不同。他们只是在绝望以后才到济贫所去："他们在申请进所之前有时已经把身上的衬衣和马甲全都卖光了。……"这些贫穷的机械匠像迷路的人一样呆在收容所里，惊惶不已。……如果被赶了出去就像没了笼子的鸟，不知道上哪儿去觅食。"[18]

伦敦的工匠很少沦落到如此恶劣的处境，他们走进济贫所的大门之前往往要经过许多中间阶段，他们的经历因行业不同而相去甚大。如果我们离开伦敦到北部和中西部的工业中心去，就会发现另一些类型不同的技术工人和工厂工人，他们都很重要，例如某些煤矿的矿工、棉纺工人、技术建筑工人、冶铁业和其他冶金业工人，他们就是艾什顿教授所说的那种"能够从经济进步中分享好处的人。"其中也包括科贝特于1832年所描述的(桑德兰地区)达勒姆的矿工： 242

> 你在这儿看不到任何美妙的东西，但一切又似乎很有价值；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工人生活得很好……矿井工人每周赚24先令，他们不必付房租，不必花钱买燃料，也不用花钱请医生。当然，他们的劳动无疑非常艰苦，

---

[17] E.J.霍布斯鲍姆：《流动工匠》，载《经济史评论》，第2集，第3卷(1950—1951年)，第313页。

[18] 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351页。

他们也许没有得到他们本来应当得到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他们有好住宅和好家具；……他们的生活似乎达到了人类中劳动者理应期望达到的水平。[19]

许多地区的矿工几乎是"世袭等级"，其收入相对之高颇有名气：

矿工小子穿金又戴银，
工厂小子只有黄铜皮。

艾什顿教授认为，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时期的实际工资可能是最高的，仅低于战争年代的最高水平。但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可能是越来越糟了。[20]

许多这类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790至1840年之间有所上升；但是工资上升的幅度并不像有时说的那么顺利，那么持续。这与各个行业中工会的成败有密切关系，失业和淡季缩短的工作时间还应与"乐观派"提出的工资系列数据相抵。不过，若是我们只讨论有固定工作的并"参加了协会"的技术工人，有关生活水平的争论本来早就可以以乐观派的胜利而告终。

243 实际上，整个问题极其复杂，难有结果。学生们在教科书中可以读到这样果断的陈述：

1831年的生活费用比1790年增加11%，但在同一时期，城市工资也至少提高了43%。[21]

学生们读到这句话时，应马上警觉到其中存在着问题。有激烈

---

⑲ 《乡村游记》，第2卷，第294页。但是R. 法因斯的《诺森伯兰和达勒姆的矿工》第4—7章以及《技术工人》第2—3章对东北部煤矿区暴风骤雨般的事件——赫普本工会在1830至1832年间的兴衰——所做的描述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⑳ 见T.S. 艾什顿：《18世纪的煤矿工人》，载《经济学杂志》(增刊)，第1卷(1928)，第325、331、334页。

㉑ T.S. 艾什顿：《工业革命，1760—1830》(1948)，第158页。

争论的问题还不仅仅是生活费用指数本身——艾什顿教授自己说他的结论所依据的指数，就像从"糖尿病人"的食谱中抽取的一样。[②]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城市工资的指数主要是依据完全就业的技术工人的工资。于是在这里就出现了一大堆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假设，在人口增长极为迅速的时期，就业的技术工人比失业的贫穷工人所占的比例一定会越来越大？社会史学家为什么要反复列举证据来试图说明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极端痛苦的时期？如果英国的非技术工人在 1820 到 1850 年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经过了 1850 至 1880 年 30 多年确凿无疑的发展之后，他们怎么会仍然生活在布思和朗特里揭示的在 19 世纪 90 年代那种受到极端剥夺的生活条件之下呢？

19 世纪上半叶必须视为就业连年不足的时期。技术工人的行业就像孤零零的岛屿，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技术革新的威胁，受到了非技术工人或少年工人的拥入所造成的威胁，即便是技术工人的工资，其中也包含着一些强制性的支出，例如机器租金，使用动力的费用，工作时因出现差错或违犯纪律而交纳的罚款，或是其他各种强制性的扣除。矿井、冶铁和制陶业转手承包很盛行，这也在建筑业中相当普遍，就是说，"承包人"亦即"把头"自己又雇用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工；而织工或矿工则要雇用儿童以充当织布厂的接线头工或矿井里的拉煤工。1818 年，曼彻斯特的棉纺工人说他们的 2 英镑 3 先令 4 便士工资中要扣除以下几项支出：

第一名接线头工(每周)	9 先令 2 便士	244
第二名接线头工	7 先令 2 便士	

② T.S. 艾什顿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中的文章，第 146 页。

第三名接线头工	5先令3便士
蜡烛(冬夏平均每周)	1先令6便士
生病或其他意外支出	1先令6便士
共计	1镑5先令

就是说,他的工资还剩18先令4便士。[23] 在每个行业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工人所说的工资数量与雇主所说的工资之间存在着差额。"以物易物"的工资和工厂的"实物工资制"等等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水手和码头工人一直受着特别厉害的敲诈,往往是受酒店老板的敲诈,例如到1843年保护法案通过以前,泰晤士河担煤工只有通过客栈兼酒店老板才能找到就业机会,而客栈兼卖酒的老板只雇用那些把一半工资花费在他酒店里的人。[24]

在技术性较强的行业中,工匠们十分关心维持自己的地位,一方面戒备非技术工人,同时又对雇主施加压力。1830年以前,既能满足技术工人的要求,同时又能使同业中的非技术工人感到满足的工会极为罕见。在欧文主义极为兴盛的时期,当建筑工人接受建议接纳普通劳工时,差距就表现得极为明显:

> 这些分会按级别由建筑工匠、石匠、石板瓦匠、木匠、泥水匠、泥瓦匠、管子工、玻璃安装工匠、漆匠,还有采石工、烧砖工和普通劳工组成,只要他们能够养成较好的习惯,掌握更多的知识,在其他行业的分支系统的帮助下能营生自理;他们的最大利益将是在最短的时间内

㉓ 见《黑矮人报》,1818年9月9日。加入疾病保障会(甚或工会)交纳会费是必要的"支出",这意味着一种生活水平的改善。

㉔ 见G.W.希尔顿:《实物工资制》(剑桥,1960),第81—87页。

提高家庭的思想和道德水平以及一般的生活水平。[25]

但是，我们还必须牢记，在技术革新迅猛进展以及工会的自卫力量还比较弱的时期，许多技术都处在不安全的地位上。发明使旧技术贬值的同时也提高了新技术的价值。这个过程是不平衡的。晚至1818年，《英国行业手册》(主要记载伦敦各门技术行业的手册)上没有列入机械工、蒸汽机制造工和锅炉制造工等行业；旋工大抵仍被视为细木工，而机械工的技术合并于“机匠”——一种掌握多种手艺的多面手师傅，“心灵手巧，有丰富的机械知识”，因此他“需要细木工、铸铜铸铁工、铁匠和旋工在最广大差异上的才能和经验”。仅仅10年以后出版的一本900多页的名叫《操作技工和英国机匠》的书指出，过去统称为机械安装的技术现在已经分为许多不同的技术。新技术的划分还可从那些早期成立的协会亦即工会中看出来，它们后来合并为机械工会：18世纪末组织良好的机械安装工人俱乐部后来发展成翻砂铸铁工人互助会(1809年)、钳工和旋工互助仁爱会(伦敦，1818年)，机匠互助联合会组织(布雷德福，1822年)、蒸汽机制造工协会(利物浦，1824年)和机匠互助同盟(曼彻斯特，1826年)。 245

不过，从这些协会的发展中我们决不能推论出进步是随着新技术的确立而不停地发展的。相反，机械安装工(至少在伦敦)是属于工人贵族，他们得到自己的组织(此组织曾十分强大，

---

[25] 《先驱报》，1833年9月。摘自R. 波斯特盖特：《建筑工人史》(1923)，第93页。

是导致结社法通过的因素之一)[28] 以及限制学徒人数的保护，而且在19世纪头几年内，他们把工资保持在两基尼的水平上。但1814年，伊丽莎白工匠法中学徒条款的废除，就使他们面临严重的竞争。1824年，伦敦机械行业的一位主要雇主，原伦敦通讯会的助理书记亚历山大·盖洛维作证说，在废除该项法令之后，"不管是工作过一年、两年、三年的工人，还是从来没有工作过的工人，都被允许就业，这给所有的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旧的安装工人"全被新手顶替；没有他们，但愿我们照样能行。"与此同时，计件工资制和来自其他方面的刺激最终造成了工会主义者的彻底失败。"总是嘲弄、看不起机械工"的安装工，认为机械工是低人一等的暴发户，现在却轮到他们自己面临消亡了。没有学徒资格的机械工可以找到每周18先令的工作，自从车床应用自动原理(滑动台架亦即莫兹利发明的"走车")以后，大批的年轻人和非技术工人拥入机械行业。 246

然而，即使是这个工业行业(的确是引进新技术的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工匠地位和工资的提高也与技术革新的速度不易相称。相反，它在18世纪末达到极盛时期，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由于非技术工人的大批拥入而迅速衰退，接着在这个行业里又出现了新的等级制和新的结社形式。劳动分工的程度很高(反映在早期工会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上)，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很

[28] 根据枢密院档案第A.158号"有关机械安装工帮工事实的陈述"，安装工的日工资从1775年的2先令6便士至3先令上升到1799年的4先令6便士。帮工为小业主师傅工作，小业主本人又受雇于"酿酒商、面粉商和其他制造商"，其工作可由任何罢工而陷于停顿。因此，罢工的帮工可以避开自己的主人而直接同厂商签订契约。

难说哪个行业确立了优势。[27]在机器制造业中，由于他的经验难能可贵，因此导致技术机械工的兴起。在早期的机械作坊中，人员变动的情况多得惊人。盖洛维在1824年雇佣了八九十个工人，可是他说12年以来有1000人到1500人在他那儿工作过，变换的人数都比每年劳动力的总数还多。外国雇主的代理人走遍了英国各地，希望引诱技术工人到法国、俄国、德国和美国去工作。[28] 伦敦的雇主自然受损失最大。（盖洛维说）外国代理人“只要站在我的门口，看工人们走进走出并记下最能干的人的名字，许多合同就是这样签订了”。结果，技能最好的工人工资稳步上升，直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属于特权工人。英国的第一家纺织机械厂，（奥德姆的）希伯特—普拉特工厂，雇了近2000名工人，技能好的工人工资在30先令以上。（一位卫斯理派工人报怨说），机械工人随意花钱，参加赛马和赛狗赌博，养良种狗，“每天两三餐”吃鲜肉。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倒转过来。） 247
1824年，盖洛维不得不贿赂手下最好的工人留下来工作，而现在，机械工人的技术已被很多人掌握，因此希伯特—普拉特工厂可以仔细挑选素质最高的工人了。我们那位卫斯理派的教徒回忆说：“我看见许多工人第一天上班就被付了工资后打发走了，有些人的试用期甚至更短”。机械工人已经再也不能凭借技术的紧缺而提高身价了。他不得不回到工会里去，重要的是，希伯特—普拉特厂在1851年机械工人的封厂斗争中正是一个风暴

---

[27] 参见盖洛维所提供的证据：“我们的经营范围有6到8个不同的部门；在木工中，我们称为木模工的其中包括高明的家具工、细木工、安装工和其他制木部门的工人；我们有铸铜和铸铁工；有铁匠、司炉工和锻工；……钳工和锉工；铜旋工、铁旋工和木旋工，种类很多。”

[28] 为了保证英国的工业优势，法令禁止许多种类的技术工人出国，违者为非法。

中心。[29]

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旧技术的消亡和新技术的兴起是相互重叠的。在19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纺织业中家庭生产的旧工艺一个接着一个地消亡，例如剪毛工(或称做剪绒工)、手工印花工、手工梳毛工、绒布修剪工等等。不过，也有一些相反的事例表明，家庭工业中一些非常辛苦而报酬却很低的工作有时是由儿童来做的，这些工作由于技术发明而转变为要细心保留下来的工艺了。在呢绒业中，梳理工序要使用皮背板的梳子，皮板上密植数千只细金属丝制成的梳"齿"，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项工作由儿童来做，植入1500到1600根梳齿只能得到半个便士的报酬(我们从约克郡西区的一个纺织村中得知)："几乎在每个农舍家庭里都有一些年纪小的工人。他们连走动放松一下的时间都少有，一直在做那单调无味的工作，把梳齿植入梳子中，供村庄中的每个居民梳毛之用而且每植一根金属丝，就要叫骂一个人名字来代表这根金属丝。"[30] 40多年以后，皮梳植丝机的不断改进使植丝工和机器维修工有了特权地位挤进了呢绒业工人"贵族"的行列，建立了自己小小的行业工会。

不过，当回顾了某些工业部门的历史，并且看到了新技术的兴起和旧技术的衰落之后，我们可能会忘记旧技术和新技术几乎总是由技术不同的工人来掌握的。19世纪上半叶，工厂主大

248

[29] 见《英国行业手册》(1918)，第237—241页；J. 尼可尔森：《操作技工和英国机匠》(1829)；J.B. 杰弗里斯：《机械工人史》(1945)，第9—18、35页；《下院特别委员会关于工匠和机器的第一份报告》(1824)，第23—27页；克拉潘前引书，第1卷，第151—157、550页；托马斯·伍德：《自传》(利兹，1956)，第12页各处。又见W.H. 查洛纳：《饥饿的40年代再考》(历史协会，1957)，不过，这本书不明智地认为希伯特—普拉特工厂的技术工人的良好处境在"40年代"比手工织工的悲惨状况更具代表性。

[30] 弗兰克·皮尔：《旧克勒克希顿城》，载《克勒克希顿卫报》，1884年1至4月。

力推动每项技术革新，使他们能够减少成年男子技术工人，并用女工和少年工来代替。即使在旧技术被一种需要同等或更高技术的新方法取代的地方，我们都很少看到同一个工人从一种技术转到另一种技术，或从家庭生产转到工厂生产。在机器和发明面前因失去保障而生恨，并不仅仅是偏见或是（如同当时的政府当局所说的）对“政治经济学”缺乏足够的知识而造成的后果。剪绒工和梳毛工都清楚地知道，新机械有可能为他的儿子或别人的儿子提供技术性的就业机会，但他们自己得不到工作，“进步进展”的果实总还有别人采摘。

我们考查一下卢德运动，就会对此有更清楚的了解。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是刚刚接触到问题的边缘，因为所有这些具体的不安全只不过是那个时期所有的手艺总的不安全的一斑。奇怪的是，整整一代经济史学家如此关心的有关生活水平的争论，竟然对临时工、衰落行业和失业等整个问题却过问得如此之少，近期中惟一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评价的霍布斯鲍姆博士指出，约翰·克拉潘爵士在《经济史》中甚至对工业革命期间的失业状况根本未加讨论。不错，“过硬”的经济资料确实非常缺乏，只有某几年或几年中某些时期受救济的贫民数量的大致统计，[31]而且这些数据很不可靠。其他的资料，例如道路上的游民统计，互助会的记录，萧条时期某些工业部门或城镇的失业人数等，固然可以用来弥补不足，但依然不足以反映事实。因为，首先，教

㉛ 见《济贫法委员会十周年报告》(1844)，第285页。其中的数字说明接受济贫的穷人在1803年为1040716人，在1813年为1426065人，在1815年为1319815人；此后则直到1839年都“没有统计报告”。新济贫法完全实施以后，从1840到1848年，每年有一个季度统计了接受济贫的穷人的数字。这些数字证明，在整个没有饥饿的40年代接受济贫的人数急剧上升，从1840年的1119529人上升到1848年的1876541人。1844年到1846年之间略有回落。

区救济亦即讨厌的济贫院(1834 年以后)是陷入绝境的人们最后的依靠;第二,固定就业的观点——即在一个劳动场所工作几年,其中的劳动时间和工资标准都是正规的观点,完全是用 20 世纪的情况去推测 19 世纪的现实,这是用现在去想象过去,因而是弄错了时代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农业中的问题是连年出现的半就业问题。大多数工业部门也有同样的问题,城市也普遍存在这个问题。技术工人和出师的徒工有自己的工具,一生都在某个行业中工作,但这种工人的数量很少。众所周知,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发展中的城镇吸引了各种类型离乡背井的移民劳动力,今天的非洲和亚洲仍是这种历程。工人们即使定居下来也在迅速地更换着工作,以技术行业交纳的地方税为根据得来的工资系列统计数据并不能告诉我们失业周期和临时工那种棘手而不可用数字统计出来的实际状况。一位约克郡的宪章派分子回忆他在 19 世纪 20 年代末到 40 年代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他的回忆如下:

> 汤姆·布朗的就学日子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因为我一生中没上过一天学。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去工作,夏天的早晨四五点钟就被拉起床,拉着驴子走一个半英里,然后要给好几头奶牛挤奶;到晚上又得去送牛奶,直到八点钟以后才能干完。后来,我去了一家制梳作坊,植 1500 根梳齿才能得到半个便士。1842 年到 1848 年,我每周工资平均还不到 9 先令。户外的劳动更糟,工资很低。我当过毛织工,梳毛工,铁路粗工和采石工,因此,我敢说我对工人阶级的状况还是略知一二的。[32]

---

[32] B. 威尔逊:《一位老宪章派的斗争》(哈里法克斯,1887),第 13 页。

有一些证据说明，在整个19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40年代，问题变得越来越糟。这就是说，就工资相对生活费用来说，虽缓慢地向有利方向发展，但每年不能完全就业的工人所占的比例相对于完全就业的工人来说，却向不利方向发展。亨利·梅休在那部关于伦敦贫民的巨著中，用了整整一节来讨论临时工的问题。他认识到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 几乎所有的职业中都存在……**剩余的劳动力**，仅仅这一点就足以造成大批劳动者的就业是临时性的而不是固定的。总的说来，各行业的计算表明在一年中有1/3的劳动力完全就业，1/3的部分就业，而另外1/3失业。[13]

250

梅休是19世纪中叶无人可比的最了不起的社会调查者。他有敏锐的观察力，冷静而超脱并有同情心，他注意到了统计所忽视的细节。在一个事实不断被发现的时代，他努力去寻找被从事调查的统计者所忘记了的事实。他的著作有目的地向当时的权威成果提出了挑战，显示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冷酷“规律”——“低报酬造成了过度的劳动”和“过度劳动造成了低报酬”。他知道，当东风吹临泰晤士河时，20000名码头边的工人立即会失业。他了解木材贸易、制帽业和糕饼业的季节性的淡和旺。他不厌其烦地寻找扫垃圾的工人一年中就业的时间实际上有多少个小时和多少个月。在他所调查的行业中找工人开会，记录了他们的日常活动。如果(如同艾什顿教授所说的)有关生活水平的争论实际上是靠“推测”哪类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

---

[13] 梅休前引书，第2卷，第338页。我在后面几页利用了梅休著作中的部分章节，包括他于1849年在《晨报》上对裁缝和靴鞋匠的描述，及《伦敦工人和伦敦贫民》，第2卷，第335—382页以及第3卷，第231页起。

幅度最大——哪些人“可以分享经济进步带来的好处”，哪些人“却一无所得”——那么，梅休的推测值得我们注意。

梅休以这样的形式表述他的推测：

> ……估计工人阶级的数量在400万到500万之间，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只要考虑到有多少工人的就业是取决于时间、季节、时尚和偶然的机会，考虑到几乎在一切工资较低的行业中都存在大批过度的劳动和马虎的劳动……有多少妇女和儿童被拉进不同的手工劳动，这是因为减少了男工的工资，在某些情况下，机器代替了劳力之故……当我们把所有这些事实都考虑以后，那么，我相信我们可以得出可靠的结论……那就只有仅仅足够的工作给我们一半的劳动者以**固定**的就业，因此只有150万人可以完全地连续就业，另外150万人只能半就业，还有150万人则完全失业，他们只能**临时地**代替别人得到一天的工作。[34]

但这毕竟还是推测，是对伦敦的复杂阅历做一个统计式的

251 表达。不过，这也是从另一些发现中产生的，特别是“作为一般的规律……每个行业中参加工会的人只占工人总数的1/10”。[35]工会工人的工资是按习惯规定的，并由工会来执行。非工会工人的工资则“取决于竞争”。直到19世纪40年代，伦敦同一行业中的工人有“体面”与“不体面”之分，其中最明显的行业是家具制造业、木工和细木工、靴鞋业、裁缝业和所有的服装及建筑

---

[34] 梅休前引书，第2卷，第364—365页。又见《机械杂志》，1823年9月6日：“很明显，为什么我们有一半的工人没有工作，那就是因为其他那一半比他应做的多做了一倍工作。”

[35] 根据梅休在其他著作中提供的证据。家具制造工和裁缝的情况显然被夸张了，比较可能的数字也许应当为1/5或1/6。

行业。“体面”的部分包括生产奢侈品和高质量产品的部门，“不体面”部分则是各种“廉价而肮脏”的部门——做成品服装的，做华而不实的或是简陋的家具的，做花里胡哨的针线盒的，磨制廉价眼镜的，在教堂建筑中（由“小包工头”）做转手承包下来的零碎活的以及承包军队或政府交办的劳务的。

在托马斯·拉奇1812年所列举的组织程度较强、工资较高的一些行业中，工匠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在以后的30年中都严重地凋萎下降。行业地位下降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一些迟至19世纪30年代才在激烈的冲突后宣告完成。威廉·洛维特原先在彭赞斯的绳索业中当学徒，1821年来到伦敦，他靠自己原有的行当找不到工作，于是想去当木匠或做家具。在这两个行业中，“体面”和“不体面”的区别不那么明显。他没有经过这类行业的学徒训练，这对他极为不利。但是，经过了在下等作坊中一段不顺利的遭遇以及不得不兜售自己产品的更糟糕的经历之后，他终于在一家大家具作坊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人们发现他没有经过学徒训练，

> 于是用他们的行话讨论如何‘整整我’，意思就是搞掉你的工具，毁掉你的工作，用这种方法跟你捣乱，把你从作坊里赶出去。……我……一弄清他们的情绪，就想到最好是召集一次作坊集会，把我的情况当众说明白。要召集一次所谓的集会，第一个前提是出去买一些饮料（一般只要一加仑啤酒），然后用你的铁锤敲打夹钳，打出铃一般的丁丁声，这就召唤了全体工人都聚集到你的工作台旁边。然后推定了主席。主席让你当众说说你的情况。

252

洛维特对自己的困境做了解释，工人们感到满意，“但条件是我要为他们每个人买酒喝，要向他们学各种活计，加上罚款和

店铺里的赊款，往往要花去我每周一基尼工资中的七八个先令。”[36] 一二十年以后，他还是应该得不到体面的作坊或工会作坊里的工作职位：当时有势力的家具制造工人协会（洛维特担任该协会的主席）巩固了会员们在该行业中质量高的部门里的地位，对没有受过学徒训练的工人和半熟练的工人则悄悄地关上了大门。与此同时，不体面的行业也大批涌现出来：[37] 中间商设立“屠宰房”即建造大型的家具仓库，伯思纳尔草地和斯皮特菲尔兹穷苦的“亭子间老板“雇用自己家庭的成员和“学徒”制造椅子和以次充好的家具，拿到仓库去削价出售等等。就是不大走运的工人也可以买来或搜集一些木材，制造工具箱或牌桌，拿到街上去兜售，或拿到东区减价商店去出售。

每个行业的历史都不相同，但是可以说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总模式。一般认为在战争年代物价上升的时期，生活水平就下降（普通劳工、织工和完全没有组织的工人都属于这种情况），不过，战争也刺激了许多工业部门（枢密院反大陆封锁令时期除外），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伦敦的兵工厂、造船坞和码头繁忙起来，生产军装和军事设备的行业得到政府的定货。在大陆封锁政策执行之前，伯明翰也同样地繁荣了。战争晚期，有关学徒的限制无论是在实际上还是在法律条文上，都放松了，最后终于在 1814 年废除了伊丽莎白工匠法中有关学徒制的条款。工匠们从维护自己的地位出发，对这种威胁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我们必须记住，当时还没有什么学校教育，既没有技工学校，也

253

[36] W. 洛维特：《在追求面包、知识和自由过程中的斗争和生活》（1920），第 1 卷，第 31—32 页。关于“人伙”的旧风俗（新来的工人或学徒必须为作坊中全体工人买酒），见 J.D. 伯恩：《工人阶级社会状况简介》（无出版日期），第 39—40 页。

[37] 梅休第 3 卷，第 231 页。他列举了六七百名协会工人和四五千名非协会工人。

没有机械工程学院，行业中的全部技能和"秘密"都是靠在作坊中口授或示范而传授的。工匠们把这些"秘密"看做自己的财产，声称他们对于"保守秘密和独占利用以及享有他们的……手艺和行业"是有无可争议的权利的。结果，法令的废除不仅受到了抵制，在伦敦还成立了"各业初级联合委员会"，他们在全国征集了6万人签名，请愿要求加强学徒制法令。[38] 有证据表明，行业俱乐部因受到威胁反而明显地加强了，结果伦敦的许多工匠在战争中相对地加强了他们的地位。

不过，从此，不同行业的历史开始分道扬镳。非技术工人的浪潮造成了压力，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程度的暴力，叩打着大门，破门而入。在某些行业中，体面部门和不体面部门之间的界线在18世纪已经出现。[39] 体面行业仍然维持了地位，虽然也许有若干理由说明那种长期威胁的存在。18世纪许多行业制造奢侈品，它要求高质量的工艺，这些工艺靠血汗劳动是无法学到的。此外，在充分就业的时期，小规模的不体面部门所提供的条件实际上优于参加组织的工人。1818年的《女怪》报在谈到眼镜工匠和铸字工匠时说道，

> 一小批称做**亭子间老板**的生意人成长起来，他们出售的产品不仅比大作坊生产的便宜，业务更广泛，而且实际上付给雇工的工资也较高。我们相信各个行业中都有类似的情况……[40]

---

[38] 见T.K.德里：《学徒法令中学徒制条款的废除》，载《经济史评论》，第3卷(1931—1932)，第67页。亦见后文，第517页。

[39] 多萝西·乔治博士在《18世纪伦敦的生活》第172—175和197—198页上提到了钟表制造业和制鞋业中的"亭子间老板"和"厢房业主"。又见E.W.吉尔波伊：《18世纪英国的工资》(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1934)。

[40] 见《女怪》，1818年11月21日。

裁缝有“硬活”、“赖活”之分，鞋匠当中也有战斗性强而且组

254 织较好的做女鞋的鞋匠和做男靴的鞋匠行业之分，因此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区分的大致界线。不过，这两种鞋匠都最先觉察到“非法”工匠的拥入所造成的全部后果。由于诺桑普顿郡和斯塔福德郡大批人在厂外或在家中从事鞋靴职业的发展，伦敦靴鞋匠的地位削弱了[④]。一位斯彭斯派社会主义者，阿兰·达温波特记载了伦敦靴鞋匠人历史上的一些事：

> 我从 1810 年开始为本布里奇先生工作，就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参加了作坊的集会。我以前工作过的那些作坊都与集会无缘……也许他们认为这没有意思……我受到女鞋鞋匠工会第五支部的友好欢迎，他们当时在荷尔波恩的约克纹章酒店开会；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我成了代表……从我成为会员起到 1813 年，女鞋工会因增多了会员而获得了极大的力量，在财政方面也颇有增长，我们一度在伦敦建立了 14 个支部，此外还同整个王国内大大小小的重要城镇的同行保持定期通信，以保持团结。但是，就在那时，靴鞋业开始依法起诉一位业主，因为他雇用了一名非法工匠而且拒绝解雇他。这个案子由两位作坊里聪明的工匠出面……并得到王座法庭的一位律师的帮助……我们胜诉了，但这场官司花去工会 100 英镑的诉讼费，这笔钱结果是白白扔掉了，因为本来依伊丽莎白法令的规定，我们这个行业业主雇用没学徒资格的人是违法的；

④ 见克拉潘前引书，第 1 卷，第 167—170 页；M.D. 乔治前引书，第 195—201 页；A. 福克斯：《全国靴鞋工会史》（牛津，1958），第 12、20—23 页。关于 1803 年的靴鞋匠帮工工会章程，参见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 80—82 页。

> 但后来伊丽莎白法废除了，于是任何人都可立刻进入我们的行业。

1813年春天，这个工会举行罢工，支持一份详细的价目表："工匠的每一项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于是我们都高兴地回去工作"，

> 但是，有一些不那么安分的会员陶醉于我们上次罢工的胜利，几个星期后提议再举行一次罢工。……这次任性的举动给行业带来了危机。当时业主们还没有建立他们的组织，彼此之间也不大来往。现在他们着慌了，于是集合起来，成立了他们的组织。他们全都组织起来了，罢工受到抵制。工匠们失败了，一哄而散。数百名男工、女工和童工都在这年冬天经受了最厉害的贫困。我把这次惨败看做工人力量下降和制鞋业雇主施行暴政的开端。[42]

255

鞋匠斗争的艰苦状况，可以从战后那些年份里许多会员成为极端激进主义者的事实中看出来。女鞋鞋匠在1820至1825年的经济繁荣时期维持住了自己的地位，但1826年的经济衰退立刻暴露了他们的弱点。在组织起来的工匠周围有大批"不体面的"小作坊，在这些小作坊里，靠"冒牌鞋匠"即"仿造匠"制鞋，8便士或1先令做一双。1826年秋，发生长达7周以上的罢工，有一些会员因斗殴和骚乱而受到审判，有一名工会会员据称对一个"工贼"说，"他因为接受低工资，应当把肝脏挖出来"。[43] 但是，靴鞋工人还是保持住了某种形式的全国性组织，在1832到1834年的工会大浪潮中，诺桑普顿郡和斯塔福德郡的在厂外的

---

[42] 达文波特：《生平》，重刊于《全国合作运动领袖》(1851年)。罗伊登·哈里逊博士帮助我注意到了这份资料，特此致谢。

[43] 《行业报》，1826年9月10日、12月10日。

或在家里做鞋的工人加入了同一场争取"平等化"的斗争。[44] 直到1834年总工会失败以后,他们才最终失去了工匠的地位。

裁缝的工匠地位保持得更久,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工会看做准合法的工匠工会的模型,[45] 弗朗西斯·普雷斯于1818年发表的著述,是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其行动的最完整记叙。通过有效的联合,伦敦裁缝在整个战争期间施加压力提高了工资,尽管工资的上升仍然赶不上生活费用的上升。(按普雷斯提供的平均数,)他们1795年的工资为25先令,1801年为27先令,1807年为30先令,1810年为33先令,1813年为36先令。每一次增加工资,业主们的抵制就更顽强一次。但"在这个时期如果不用强制的手段,一个先令也休想增加。"在地位高的"硬活"裁缝的许多"职业介绍所"保存着工会会员的名册,业主们实际上把介绍所当做他们的雇工代理处。[46] 行东们没有征得工会的同意,谁也不能提出就业申请。工作按填表顺序来分配,工会培训"无技能的"人。裁缝要交纳两种费用,大部分保留起来充做福利费,小部分供工会需要时使用。除了充分就业的时期,一般都实行12小时工作制。他们为失业的会员征集资金,有时为准备罢工也可以征收特别费,即使对资金的使用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会员们也不会提出问题。工会的实际领导小心谨慎地避免触犯结社法,每个介绍所设一名代表,是

> ……按照某种默许选拔出来的,大多数人往往不知道谁当选了。代表们组成委员会。他们以大致相似的方

---

[44] 关于南特威奇的组织,见下文,第427页。

[45] 普雷斯认为裁缝的结社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当然他的地位特别适合于发现他们的秘密。

[46] 见报纸上的这样一些广告:"凡有能力在建筑业中担任监工者,请到下列介绍所申请……"(1825年7月17日木工帮工在《行业报》上刊登的广告)。

> 式选出一个人数少的委员会，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掌握全部大权……。

普雷斯写道："什么法律也不能压制它，只有工人们自己不再信任它的时候才能中止它。"这些"针线骑士"至少到 1826 年的经济衰退以前都显得极为强大。他们的组织完全可以描述为"一种军事体制"。不过，在普雷斯的叙述中暗伏着弱点的征兆：

> 他们分成两类，叫做"硬活裁缝"和"赖活裁缝"。硬活裁缝有约 30 个职业介绍所，赖活裁缝只有 9 个或 10 个。硬活裁缝实行计日工资，赖活裁缝既实行计日工资又实行计件工资。他们之间过去存在着强烈的敌视，赖活裁缝的工资一般说来比较低，不过近年来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在最近发生的几次罢工中总是采取共同的行动。

这也许可以看做是试图把下等行业与身份感很强的"硬活裁缝"团结在同一组织内所做的令人难忘的努力，据普雷斯估计，1824 年"赖活裁缝"只有"硬活裁缝"的 1/3；但是"赖活裁缝""工作时间长，还需要家庭成员当助手。"到 19 世纪 30 年代初，廉价的制成品成衣业已如浪潮无可阻挡。1834 年，这些"骑士"终于在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降低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据说当时有 2 万名工人以"平等化"为口号举行罢工。[47]

约翰·韦德仍然能够说在 1833 年，伦敦的裁缝"得到的报酬比首都一般的劳动人民高得多"。确实，他认为他们是通过联合 257

---

[47] 《女怪》，1818 年 9 月 26 日、10 月 3 日和 10 日；《关于工匠和机械的第一个报告》(1824 年)，第 45—46 页；科尔和菲尔森前引书，第 106—107 页；[T. 卡特：]《一个工人的回忆》(1845 年)，第 122—124 页。关于 1834 年的罢工，参见 G. D. H. 科尔：《为建立总工会而奋斗》(1953)。关于有组织的制帽匠和不体面的"帽工"之间的对立，见 J. D. 伯恩前引书，第 41—42、49—50 页。

增强了自己力量的榜样，"巩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与公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48] 但是，梅休在 1849 年为《晨报》着手调查时，却认为裁缝是生产"价廉质次"的血汗行业中最差的例子之一。梅休估计，伦敦在 1849 年有 23517 名裁缝，其中 2748 人是独立开业的裁缝师傅。其余人中，有 3000 人是体面的行业工会的会员（而 1821 年还有 5000 或 6000 人），18000 人在不体面的行业中工作，制作"现成衣服"，完全是依赖大中间商获得收入。

尽管伦敦是工匠的雅典，但伦敦工匠的状况不能视为特例。值得注意的是，那里存在着一种剥削方式，与以体面行业中有组织的工人工资价格为依据建立的工资统计数据不相吻合。这种形式既冲破了习惯的条件和限制，也冲破了工会的防线。一般说来，"工匠"的行业经历了两个严重的冲突时期，第一个时期从 1812 到 1814 年，其间学徒制规定被废除。制鞋工人和裁缝这些已经组织起强大的工会或行业俱乐部的行业，此时尚可通过罢工或其他形式的直接行动在该项规定废除后在一定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地位，虽然业主们在同一时期也成立了更大的组织。但是，从 1815 至 1830 年，封闭而"有组织的"作坊内部的巩固却付出了代价。"非法工人"被排斥在行业中较好的部门以外，这只是使协会以外的无组织"不体面"行业中人数猛增。第二个重要时期是 1833 到 1835 年，工会的大浪潮达到顶点，要求达到"平等"的工作条件，缩短体面行业中的工时，禁止不体面的工作。面临着雇主与政府的联合力量，这些要求（尤其是伦敦裁缝）失败了，而且至少造成了"有组织"的工匠地位的暂时下降。经济史学家应当看到，托帕德尔的蒙难事件和 1834 年大规模的

[48] J. 韦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第 5 版），第 293 页。

封厂行动正如当时的激进派和工联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对各种等级的工人来说都是这种失败的结果[49]。

不过，工匠与大雇主之间的冲突只表明更普遍的剥削方式的一部分。行业中不体面的部门增加了；大"制造厂"和（雇用家庭手工业者或转手的承包订货的）中介人取代了（雇用几名帮工和学徒的）小业主；（在体面行业的孤岛以外）学徒制等有效的保护措施已经失败，大批的非技术工人、女工和童工拥进各个行业；劳动时间延长了，实行星期日工作制；工资、计件价格和批发价格被压低了。生活状况的恶化在方式上和程度上都与工业的物质条件有直接联系，例如影响到原料成本、工具和有关的技能，对工会组织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影响到市场的性质等等。于是，制木工和鞋匠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获得原料，拥有自己的工具，因此失业的工匠可以自立为独立的"亭子间老板"或"厢房老板"，全家人一道参加劳动，有时也可以雇用其他儿童，每周工作七天，自定价格兜售产品。木匠需更高的成本支出，因而就沦为"拼命作坊"里的工人，那里在工头巡回监督下以令人生厌的步调干华而不实的活计，谁若落后便被淘汰。无力购买布匹的裁缝，只能完全依赖中介商人，包下中介商的活计但拿的是血汗工钱。女衣业是最辛苦的"血汗"行业，主要由在与大企业订合同的作坊里的针线女工做活（她们往往是来自乡村和小城镇的移民），建筑工人既没有能力自己购买砖石，又不可能把街头教堂的一角拿去叫卖，必须依赖转手同合的包工头；即使是参加"组织"的技术工人，在冬季也只等着被暂时解雇。这两类工人往往都想依靠建筑业对地皮的直接投机来摆脱困境，正如克拉

[49] 科尔的《为建立总工会而奋斗》是有关第二个时期的最优秀的著作，虽然仍不够全面。

潘所说："抱着希望租地，靠借债购买材料，用尚未售出或租出的建成一半的房屋作抵押，冒着破产的极大风险。"[50] 但是，另一方面，制车匠、造船工人和机械工人，既没有自己的工具，也没有能力购买材料，只因他们工作的性质以及他们的技术奇货可居而处境较好，保持和增强了工会的防卫力。

259

在外地的旧工业中心，工匠的地位同样也下降了。但是有许多复杂情况和许多的条件，所以差异较大。一方面，斯塔福德和北安普顿郡的靴鞋业早已失去了工匠的特征，以经营家庭的手工业生产为基础，而这时的伦敦鞋匠仍在拼命抗拒沦为不体面行业。另一方面，设菲尔德刀剪业中高度的专业化及工人中强烈的政治倾向和工会传统——(他们是最坚定的雅各宾派)使他们在半独立的朦胧状态下保持了工匠的地位，他们受雇于某个商人(有时也受雇于好几个商人)，租一个"公用转轮"作为动力，严格按价格表行事。尽管"设菲尔德刀具匠法"(1814)废除了自由人进入该行业的限制，造成"人人皆可在法定行会中工作和招收学徒而且没有人数和条件的限制"的局面；但工会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它们有时采取"搬走或破坏机器"或别的恫吓手段)足以阻止非熟练工人拥入，虽然他们不断受到来自"小业主"，有时还有"非法"工人和独立帮工的威胁，他们总是想掏空合法的行业。[51] 在伯明翰的各行各业中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情况，从大作坊和无数小作坊，到体面或不体面的独立帮工，再到制造铁钉的村庄中衣不蔽体的，处境越来越糟的厂外谋生的劳动者。从沃尔弗汉普顿 1819 年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亭子间

---

[50] 克拉潘前引书，第 1 卷，第 174 页。

[51] T.A.沃德：《回顾过去》，A.B.贝尔编(1909 年)，第 216 页起。S.波拉德：《设菲尔德劳工史》(利物浦，1959)，第 2 章；克拉潘前引书，第 1 卷，第 174 页。

老板”如何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出现的：

> 整个秩序……完全颠倒了。现在，对于濒临饥饿的帮工来说，最后一条出路是自己开业。他的雇主无法为他找活干以便靠他来坐收可能的利润，所以只好将他解雇；这个可怜的家伙只好卖掉眠床买个铁砧，采购一点铁，打造几件产品，四处兜售……尽量弄一点收入……过去作为雇佣工人，他每周可得 10 先令，现在作为主人能赚到 7 先令就是幸运的了。[52]

260

在考文垂的织带业中有另一种朦胧状况，他们处于半外作工和半工匠地位：“织工老大”保留着穷工匠的地位，因他们有自己值钱的织机，有时还雇用一名“工匠的帮工”。此时这座城市里的其他织工则受雇于工厂或作坊，工资类同；但是，在北部的纺织村里，有一批半失业的织工，干活的工钱被压得像厂外临时工的工钱一样的低。[53]

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认为真正的外作工业是完全失去工匠地位的行业，在这种行业里，“体面”部门已不复存在了：

> 只有当原料归经商的雇主，而工序完成后又回到雇主手中时，才可以说完全确立了资本主义化的外作工业。外作工匠的技能正是这个过程所需要的——羊毛发出去纺线，纺成的线发出去织布，衬衫发出去“缝、拼接和拷边”，制钉的铁条回到雇主手中时成了铁钉，边角碎

---

[52] 《新月刊》，1819 年 7 月 1 日，摘自 S. 马可比前引书，第 335 页；又见 T. S. 艾什顿：《兰开郡早期工具制造业中的家庭手工业制度》，载《经济杂志》（增刊），1926—1929 年，第 1 卷，第 131 页。

[53] 见 J. 普雷斯特：《考文垂的工业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0），第 3、4 章中明澈的叙述。

布回来变成了玩具娃娃，皮革回来成了靴子。[54]

克拉潘估计，这是乔治四世时期工业组织的“主导形式”；如果我们在真正的外作工匠（手工织工、制钉匠、大多数梳毛工、锁链匠、一部分靴鞋匠、织袜工、粗布裁剪工、手套制作工、一部分陶工、枕头花边工还有许多其他的工匠）之外，再加上伦敦和其他城市工匠行业中的“不体面”部分，就很可能到1840年以前仍占据主导的地位。

织工，作为外作工匠的一个例子，我们在以后还要考查。不过，这里需要先讨论与外作工和工匠都有关的一些一般观点。首先，织工或“廉价品”工人的困苦处境，并不能用“机械生产过程取代了旧工艺而造成旧工艺的衰落”的解释来开脱。我们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这就是以轻蔑的口吻认为“收入最低的不是工厂雇的工人，而是保留了18世纪的传统和方法的家庭手工业工人。”[55] 这种说法使我们心中联想的是这些状况与工业革命所具有的真正促进作用无关，它们属于前工业的“旧”秩序，而资本主义新秩序的本质特征表现为蒸汽、工厂工人和天天吃肉的技工。不过，外作工业中的雇佣人数在1780到1830年之间成倍地大大增加，而蒸汽和工厂往往是造成这一增长的原因。正是工厂纺纱和铸铁厂铸出铁条去制钉子才雇了许多外作工人。意识形态也许想重此轻彼，可是事实却让我们说，这是同一进程中相互补充的因素。这一进程首先造成了手工工人（手工染布匠、织工、粗布剪裁工和梳毛工）的成倍增加，然后，又用新机器灭绝他们的生计。此外，外作工人处境的恶化并不简单地

---

[54] 克拉潘前引书，第1卷，第179页。

[55] F.A.哈耶克和T.S.艾什顿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中的论文，第27—28、36页。

能用“被机械生产过程取代”一句话说明得了,它完成于一种剥削方法中,这种剥削方法类似于不体面行业中的剥削方法,而且往往发生在机器竞争之前。家庭手工业工人的“传统和方法是18世纪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说18世纪家庭手工业工人的生活状况是19世纪半失业无产者外作工的先兆,能证实这一点的惟一一个大群体是斯皮特菲尔兹的丝织工人,因为丝织业的“工业革命”先于棉织业和呢绒业。确实,我们可以说,大规模的血汗外作生产就如同工厂生产和蒸汽一样都是工业革命的本质特色。至于不体面行业中“廉价品”工人的“传统和方法”,在几个世纪里,只要廉价劳动力大量存在,当然就会一直持续着。不过,这显然与18世纪末伦敦工匠的生活状况根本对立。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工匠们感觉到了他们的地位和生活水平在1815至1840年之间受到了威胁,或者正在恶化。技术革新和廉价劳动力的过多的存在,削弱了他们的地位。他们没有政治权利而国家权力被用来摧毁他们的工会,哪怕这样的使用只是间断性的。梅休明确地指出,(不体面行业中的)低报酬不仅造成了超负荷的劳动,而且使劳动机会全面减少了。正是这样的经历为工匠在政治上的激进转化,尤其是外作工的急剧的激进化,提供了基础。理想和现实不满汇合在他们身上,变成愤怒——他们失去了尊严,经济状况直接恶化,随着手工艺的日渐贬值而丧失自豪感,失去了上升为业主的愿望(哈迪和普雷斯那一代人还有可能上升为业主)。有“组织”的工匠虽然稍为幸运一些,但并不是最不激进的,像威廉·洛维特那样,伦敦和外地工人阶级的许多领袖都产生于这个阶层。他们只有凭借工会的战斗性才有可能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活经历不断教育他们说:竞争是坏的,集体行动是好的。他们亲眼看到不交好运的邻居和作坊里的伙伴(由于事故、酗酒)而下陷得更低。凡是 262

陷落的人最需要政治上的思考；但却最没有时间来思考。

如果说农业工人渴望着获得土地，那么，工匠则渴望着获得"独立"。这种渴望为早期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历史奠定了基调。但是，在伦敦，希望变成小业主的愿望到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已经化为了泡影（这种愿望在18世纪90年代仍十分强烈，即使在19世纪30年代的伯明翰也还是强烈的）。因为面对着"厢房老板"或"亭子间老板"的经历，所谓"独立"只不过意味着为货栈或廉价商品作坊整周劳动作奴隶而已。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19世纪20年代突然出现了对欧文主义的支持——工会的传统与追求独立的愿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由社会来控制生活资料的理想，这是一种**集体**的自主独立。[56] 当欧文主义者所做的奋斗大多归于失败之后，伦敦的工匠依然为独立而战斗到底：当皮革、木材或布匹都用尽之后，他们便去充实街头的叫卖者，兜售靴带、橘子和核桃。他们主要是一些进入"拼命作坊"的农村工人，伦敦出生的工匠难以跟上这样的发展步调，但他们也不愿成为无产者。

我们也许还没有弄清工资指数的状况，但我们提出了阅读263 和考证现有指数的方法。我们特别必须随时弄清楚这些数字究竟是来自于有组织的工人还是无组织的工人，以及在某个行业中某个已知的时期，这种划分究竟到什么程度。大多数行业或工业部门都存在着一些相同的经历，很少在战后的经济萧条中不受损害。在1820到1825年之间，大多数行业和工业部门出现转机，在这样一个就业比较充分的时期，不体面行业确实可以扩大其范围而很少引人注意，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有组织工人的

---

[56] 见下文第779—806页关于欧文主义的讨论。

地位造成威胁。结社法废除后的 12 个月是转机最旺的时期，当时的普遍的繁荣和咄咄逼人的工联主义同时出现，导致许多工人团体取得相当的进展。1825 年夏，《行业报》上刊载了一篇来自制陶区的报告，以当时激进报刊和工人阶级报刊上极其少见的语言，承认他们的状况颇为不凡："很难说出有哪个时期……除织工以外的工人阶级享受过更大程度的舒适。"在过去的 8 个月里，制陶区卷入一场真正的罢工浪潮：

> 在斯塔福德郡，木工首先举行罢工，然后，每个行业都轮流地举行了罢工。挖煤工人知道陶业工人没有他们就无法烧陶；当制陶工取得了工资的上升以后，他们依然不举铁镐，不放吊桶……陶业工人于是举行了第二次罢工，他们提出要求，现在的普通劳工每日工资是 6 先令，而有优势的工匠按计件收入实际上每周 3 英镑。连裁缝也坚决拒绝剪样或缝纫、拼接或填充衣领，除非把原因告诉他们；与此同时，情绪激动的理发师……也坚持要提高 50% 的工钱……[57]

这一成果的大部分在 1826 年失去了，但在以后的 3 年中又失而复得，30 年代初却又失去。在这个涉及面较宽的历史事件中各行各业还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总的说来，在需要较多的资本、技术和机器的行业中，工匠失去一定的独立性，但比较容易成为技术熟练的，甚至有些特权的无产者；水车匠变成机械工亦即金属机械工匠，造船工的技术分割成造船业的各种行业。在那些可以将活计分发出去的工业部门中，或者在可以大量收容非技术工人和少年工的工业中，工匠依然保留了一定的独立，但为此必 264

[57] 《行业报》，1825 年 7 月 24 日。亦见 W. H. 沃伯顿：《北斯塔福德郡陶业工会组织史》(1931)，第 28—32 页。

须付出失去保障及社会地位严重下降的代价。

当回过头来考查战后的政治史时,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工匠们的观点。因此,我们在讨论在他们之下居于更底层的人们时,也许就只能比较凭印象来对待了。实际上,对于19世纪头十年中非技术工人的状况,人们知道得更少,因为他们没有工会,极少能有领头的人物去明白地表达他们的不满,除了公共卫生和住房问题外,就没有议会的各委员会去调查他们的状况[58]。地位下降的工匠很少有体格或能力去从事辛苦的半技术或非技术劳动。这些职业群体要么是只由内部来补充,要么就是由农村移民和爱尔兰移民来扩充。其中有些人干些无规律的不固定的工作,工资并不低——在码头上或当挖土工、铲土工等。这些人渐渐成为"临时工"即临时的劳动力,而完全失业的进城移民,正像威廉·洛维特在年轻时第一次来到伦敦时那样,可能"连续几个星期每天都只吃一便士面包,在最近的水泵旁喝一口水"。他同康沃尔郡来的另一位同胞

> ……每天都要在5点钟起床,到各作坊和建筑工地上去找工作做,一直找到9点钟左右。然后,我们用一个便士买一个面包圈,两人分着吃;然后又四下里去找工作,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做完一天的工作以后,再买一个面包圈分着吃;然后两脚酸痛,饿着肚子,很早就上床睡觉了。[59]

但是,这样含辛茹苦地省出最后几个便士的磨炼并不多见。一切社会调查者都知道:时常不稳定的就业使人们难以做出长远的打算,这会产生一种人们所熟悉的循环,即艰苦的生活与有

[58] 参见下文第429—443页有关爱尔兰劳工的讨论。

[59] 洛维特前引书,第1卷,第25—26页。

工作时偶尔的挥霍放纵相互交替。与（马夫、清道夫、河边苦力、非技术建筑工人、赶马拉的货车的工人等）劳工不同的是那些街头商贩、乞丐二流子、贫民及偶尔犯罪和职业犯罪者以及军人，对他们来说“碰运气”是他们的谋生之路。有些街头商贩是很有钱的商贩，另一些却是管束不住的小偷；还有一些如沿街叫卖水果或鱼的小贩，唱顺口溜和歌谣的卖艺人，他们对爱德温·查德威克和凯伊博士格言式的论点提出嘲弄式的针锋相对的反诘。人类靠急中生智使自己活下来，如拾狗粪、卖 265 野花或代别人写信，一次可得一两个便士（代写情书“还需要有金边信纸、漂亮的信封和一本字典”）。到19世纪40年代，大多数街头小贩无疑陷入了绝望的贫困。如果深入查看统计数字，我们可以不避毁誉地认为，直到（19世纪30年代末）有效的警察力量建立以前，犯罪（不包括娼妓）的平均生活水平上升了，因为在仓库、市场、运河上的驳船、码头和铁路上行窃的机会成倍增长。许多临时工也许靠这种方式来补充自己的收入。一些天才的职业罪犯或“游客”自称，他们过着极其美妙的生活，他们也许可以算作“乐观派”。除了在兰开郡等一些妇女就业机会比较充分的地区以外，未婚母亲的生活水平也许下降了：她们不仅违背了威尔伯福斯的看法，而且违背了马尔萨斯和政治经济学的规律。

在当时的纺织城镇里，一个有5岁到15岁年龄不等的6个孩子的寡妇可以算是比较幸运的妇女。求乞的盲人是当时流浪者弟兄中的“贵族”。眼睛明亮身体健全的弟兄带着他们四处流浪，以便分享他们讨得的东西。一位叫卖靴带的瞎眼小贩告诉梅休，“盲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人们的指引，因为他们知道，他肯定能得到一点东西。”他从家乡诺森伯兰出发，沿着一个又一个工人宿舍流浪，慢慢想出了乞讨的“花样”。他说：“我的日子

过得越来越快活，我奇怪人们怎么会学别人的样子”。最后，他来到了伦敦。他说：“当我走在街头时……我不知道究竟是我带领着街道还是街道带领着我。”[60]

在其他的乐观派当中，还有高度职业化的“二流子”，他们就像能迅速改换节目的演员一样，根据行业状况，假扮出别人的不幸来变换节目（如“体面的破产商人或落难的私掠船长”，“潦倒的机匠”和“运河上的水手”等等）：

266

> 我……走到街上去，扮做浅水旅的一名士兵，穿着黑色衬衫和汗裤，或破长衣裤。我们4人一组，生活相当好，在我们之间每天能弄到16先令或1英镑。我们总是招呼每个遇见的人，从卸煤工人等等到海战的船长。我们总是说：“喂，我尊敬的海战船长，从左舷弹药库把剩下的一发向我们射来吧，纳尔逊的炮手们。”……浅水旅在伦敦变得婆婆妈妈好挑剔了［远近闻名］，因此供应相当紧张。所以我离开了这陆上的海军。在街上翻船的事太平常了，你看，人们并不管他们……。[61]

骗子们对市场很有研究，他们能很快改造痛苦这种商品的市场供应，以迎合美玉般憨直的人类同情心的滥施；他们生活得比真正的受苦人还好些，后者过于孤傲，或太没有经验，不能把他们的苦难投放于市场而获取最大盈利。到19世纪40年代，骗子的伎俩已被人们熟知；除非人们有狄更斯和梅休那样的知识和人道主义精神，否则，中等阶级就只会从每一只摊开的手掌上看到懒惰和欺诈的证据。在伦敦和其他大城市中心，他们

---

[60] 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452页。

[61] 同上书，第1卷，第461页。在战后的几年中，退伍水兵在伦敦的乞丐中所占的人数最多。见《消灭行乞协会的第四份报告》（1822），第6页。

也许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漫步在超现实的世界上：伸开的手掌可能是一张纳赃的手；衣衫褴褛的人可能在暴风雪中玩弄"瑟缩骗局"（"在险恶的天气下……这可不是个好玩的花招，……有一个时期曾一天得到两个先令"）；一个穷苦孩子为一包打翻的茶叶哭哭啼啼，或者诉说一个丢掉零用钱的故事，这可能就是他母亲教给他的花招。失去了双臂的煤矿工人是人嫉妒的对象：

> 这种人长着壮实的腿，坐在马路边，不停地叙述矿井里的运煤车如何从他身上碾过。他说得很生动，十分精彩。[62]

最悲惨的受害者并不在这里，他们留在家中，住在斯皮特菲尔兹的亭子间里，或安科茨和利兹南部的地下室里，住在外作工的村庄里。我们充分地相信贫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在1834年新济贫法颁布以前的30年里，人们一直在企图减少济贫税，企图取消户外救济的办法，或创造新济贫院。[63] 济贫院并不是查德威克式的"巴士底狱"，而是克雷布在《选邑》一书中（1810）所描写的那种早期的样子：

> 只为你一己之利，
> 你的计划我不欢喜；
> 你把穷人放在那里，那可怜的一小批。
> 他们在这一间房子里，度过一生，
> 这座他们讨厌看见的贫民宫殿：
> 巨大的建筑，高耸的墙院，

267

[62] 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465页。

[63] 见J.D. 马歇尔：《诺丁汉郡的改革派及其对新济贫法的贡献》，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13卷（1961年4月3日）。

那些强忍疲惫的步子，那空旷高大的殿堂！
那个大时钟啊，
响亮地敲出每一个钟点令人心悸的钟声，
那些大门和巨锁，都是权力的象征：
这是一座监狱，却用了温厚的名称，
住在这里的居民，
就没有一个是不知道羞耻和畏惧的人。

1834年的法案以及随后由查德威克和凯伊等人建立的管理机构毫不考虑人类的需要，这大概是英国历史上企图强加一种意识形态的最始终如一的努力。假如我们不去考查焦头烂额的济贫法指导委员会贯彻执行查德威克那些不切实际的“指导通报”，取消或严格限制萧条的工业中心地区的户外救济造成了什么后果；假如我们不看一看济贫法助理特派员们如何想把马尔萨斯—边沁主义的原则应用于讲求实际的北部地区，那么，有关1834年以后生活水平的讨论就毫无意义了。纪律和约束的原则从一开始就重于“不适合居住”的原则。[64] 这个最善于标新立异的国家总在费尽心机建立机构，企图把济贫院的条件弄得比亭子间老板、多塞特郡的劳工、织袜工人和制钉工人的状况更糟。心理威慑的政策取代了不切实际的系统的饿馁政策，那是一种“劳动，纪律和约束”的政策。一名助理特派员说过：“我们的意图就是要把济贫院弄得尽可能像监狱一样”。另一名特派员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在里面建立严厉的和令人生畏的纪律，使穷人害怕，阻止他们进来”。凯伊博士心满意足地记载了他在诺福克的成功之举：事实证明，“详尽的日常生活诫

[64] 1834年以后，济贫院穷人的生活条件比外面处境最差的劳工还要差，这就是“不适合居住”的原则。

律”，宗教仪式，吃饭时不准说话，“坚决服从”，不同的性别完全分开，拆散家庭（即使性别相同），从事劳动和与外界完全隔离等做法，比减少伙食更为有效。他用一种在古怪的仪式中使用的英文（这种英文总有一天会像古代夹手指刑具和足铐一般离奇） 268 记录说：

> 我看到在济贫院的院墙内保留着一种习惯，允许居住在里面的穷人永远保存自己的财产，例如箱子，陶器，衣物等等……因此，我指示各个济贫院院长把这些东西拿去保管，存放在贮藏室里。科斯福德联合济贫院在做出这种改变时，普卢姆先生发现这些箱子里藏了大量的面包（可见伙食多么丰富），还有肥皂等东西，都是从济贫院仓库里偷的……做出这一改变的那天上午，12 名强壮的女贫民离开了济贫院，她们说宁可到外面去干活。

凯伊博士学着查德威克一样的腔调继续写道，无论是有家的寡妇，还是老弱病残者，都不必为在济贫院而感到耻辱，他们应当为不断地浪费和欺骗而觉得心中不安，应当为他们在有能力活动的年龄就不想去勤奋劳动，……不事节俭……不谨慎……不尽孝道……不像劳动者那样独立地工作而觉得心中不安……。

凯伊博士和普卢姆先生获得了多么辉煌的胜利啊！12 个强壮的女人一举而变得节俭和谨慎了（也许她们还一举从悲观派转变成了乐观派吧?），然而，尽管他们用尽了全部力气，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 443 个联合济贫院的内容不完全的报告还是证明，1838 年的 3 个月中这些新巴士底狱（尚未将兰开郡和约克郡西区包括在内）中，共有 78536 名济贫院居民，到 1843 年，这个数字上升到 197179 人。关于贫穷达到何种程度的最有力的

证据实际上还在于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寄居人。[65]

[65] 凯伊博士的证词，见G.康沃尔·刘易斯：《关于爱尔兰贫穷调查委员会的第三次报告》(1837)，第34—35页；关于1838年济贫院穷人的状况，见《济贫法委员会的第五份报告》(1839)，第11、181页；关于查德威克"不切实际"的指示信，其中可作例证的一封是面临工业萧条需要进行户外救济时给曼斯菲尔德几位督导员的信，见《济贫法委员会的第三份年度报告》(1837)，第117—119页；《第十份年度报告》(1844)，第272页。在有关济贫法的大量著作中，德赖弗的《托利激进派》(1946)第25、26章生动地叙述了北方地区对济贫法的抵制。

第九章　织　工

19世纪织工的历史萦绕着过去美好日子的传说，这种回忆在兰开郡和约克郡最为强烈，但在英国大部分地区以及纺织业的大多数部门里也可以听到。关于18世纪80年代的中部地区织袜工人的情况，有过这样的记载：

> 每当假日来临，织袜工人的小花园里结满了豆荚，还有满满一桶醇香的酒。

他有"一套平时穿的衣服，还有一套是在星期日和游玩时穿的服装"。[①] 关于格洛斯特郡的织工也有记载说：

> 他们的小农舍里弥漫着幸福和满足的气氛……织工要求教区救济的事情十分罕见……他们的表情宁静而满足。[②]

有关贝尔法斯特的麻织业地区的记载说：

> ……过去那是一个十分整洁规则的地区，他还记得他们有粉刷洁白的房子，有小花园，他们全家人出现在市场上或去做礼拜的时候打扮得非常体面。这些房子现在却充满了污物和悲伤……。[③]

---

① W.加德纳：《音乐和朋友》(1838)，第1卷，第43页。又见M.D.乔治：《转变中的英格兰》(企鹅版，1953)，第63页。

② T.艾克塞尔：《格洛斯特郡织工简史》，摘自芬伯格编《格拉斯特郡研究》(莱斯特，1957)中E.A.L.莫伊尔文章《织工绅士》，第247页。

③ 贝尔法斯特议员艾默森·坦南特1835年7月28日在下院的演说。(关于斯皮特菲尔兹的丝织工人，)见上文，第143页塞尔沃尔的叙述。

多萝西·乔治博士在《转变中的英格兰》一书中生动而有说服力地指出，这种“黄金时代”总的说来纯属神话。她的论点一时占优势。

这样做也许太容易了。如果我们把“黄金时代”的论点当做九柱戏的木柱竖立起来，要击倒它们毕竟是不困难的。当然，斯皮特菲尔丝织工人在18世纪的状况并不让人妒羡，而且，西南270 部和诺里季毛纺业和毛织业中早期的资本主义组织还引起了多种形式的对抗，这些对抗后来在兰开郡和约克郡又得到发展。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加斯克尔在他那本很有影响的著作《英格兰的制造业人口》(1833)中把18世纪织工地区的状况理想化了，(继加斯克尔之后)，恩格斯对1844年的工厂工人们祖辈的情景推想说他们“过着虔诚和诚实的正当而平静的生活”，也把他们的状况理想化了。

但是，一方面是18世纪的艰苦和冲突，另一方面又是19世纪把它理想化，这并没有解决事实上的问题。记忆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证据也依然存在，不允许对它简单地解释。有事实表明，在全国多数地方都存在着从种植小块土地甚或一小块宅边地，从纺纱和收割稼禾等等来补充收入的现象。迄今为止已经得到建筑方面的证据，说明奔宁山区许多纺织业小村庄是在18世纪后期最终形成的。今天最常见的谬误并不在于加斯克尔或恩格斯，而在于乐观派的错误，他们用轻松的语言搅混了工匠在地位上向潦倒的外作工转变过程中的困难和痛苦的性质，诸如：

> 认为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这种观点乃是神话。早期工厂时代的许多罪恶并不比过去更早时代的罪恶坏。18世纪的家庭纺工和织工受到布商的“剥削”，与19世纪40年代工厂工人受到工厂主的

"剥削"同样残酷无情。[4]

我们可以把18世纪织工—雇主的关系区分为四种。第一种是顾客—织工关系，像赛拉斯·马纳一类的人，住在村庄或小镇里，有独立地位，与裁缝业主十分相似，承包顾客的订货。像他这类人数量正在减少，我们在这里无须讨论。第二种是有高级工匠地位的织工，他们自立门户，可以选择老板，计件工作。第三种是织工帮工，他们可以在老板兼布匹商的作坊里工作，但更普遍的是在自己家中用自己的织机为一个老板加工。第四种是农民织工或小土地持有者织工，他们只用一部分时间做织布的工作。

后三类织工之间有重叠，不过，将他们区分开来讨论当然更好。例如在18世纪中叶，曼彻斯特大多数的细纹布料和方格纹布料是由织工—工匠（即第二类织工）制造的。他们有高度的组织。18世纪下半叶，随着棉纺织工业的日渐扩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即第四类织工）被高工资吸引，变成了半日制的织工。与此同时，约克郡西区的毛织业依然主要以小服装兼布匹商人为基础，他们在自己家中只雇数名帮工和学徒（即第三类织工）。如果我们说在1780至1830年，这三类织工并成一类，他们的地位大大地下降，变成无产的在自己的家里工作的外作工有的拥有织机，有的租借织机，按照某工厂的代理人或某中间商要求的规格把纱织成布——如果我们这样说，就概括地说出了他们在这些年的经历。他们丧失了第二类和第三类织工期望获得的地位和保障，也失去第四类织工的副业收入，而且面临陷入伦敦工匠眼中所谓的那种"不体面行业"的境遇。

271

④ W.O.亨德森和W.H.查洛纳为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导言（1958），第14页。

在北方的织工当中，对失去的地位的记忆植根于真实的经验之中，因此也就连绵不绝最为长久。在西部地区，织工们到18世纪末已经沦为外作工，受大乡绅布商的雇佣。大乡绅布商"购买羊毛，付工资令他们梳毛、切条、纺纱、织布、缩呢、染色等等"。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们雇佣的工人总数可以多达上千人。约克郡的一位目击者在1806年对这两种制度做了对比，在西部地区

> 没有那种我们在约克郡称做家庭制的东西。我说的家庭工业制是指住在村庄里或偏远地区的小织匠商人用自己的资本经营，并过着舒适的日子……我明白英格兰西部的情况恰恰相反，那里的制造业主，除了有单独的房子居住以外，与我们约克郡工厂里的普通工人一样。在西部，羊毛被分发出去让他们织成布；而在约克郡，羊毛是工人自己的财产。[5]

不过，在18世纪约克郡的家庭工业中，羊毛是小布商业主的财272产，而不是织工的财产。大部分织工是帮工，只为某一个布商工作，而且(不管后来被理想化到何等程度)处在依附的地位上。从"作于1730年左右的一首布商生活方式叙事诗"中可以看到布商的生活是一幅"田园诗画"，描述织工们"从早5点到晚8点，辛苦地工作，做完活"以后在公用桌子上进餐，但它没有说汤姆、威尔、杰克、乔和玛丽究竟是帮工，学徒，还是"老板"的儿女。

> 老板说——"孩子们，好好地干吧，但愿
> "下个集市也许能把布卖掉。

---

⑤ 摘自E.A.L.莫伊尔前引文，第226页。关于英格兰西部的工业，亦见D.M.亨特：《英格兰西部的毛织工业》(1910)；J.de L.曼：《18世纪威尔特郡的布商和织工》，载于L.S.普雷斯纳尔编：《工业革命研究》(1960)。

“汤姆明天要到纺纱机上去，
“威尔要去把锭锤都找来，
“杰克明早要按时把床起，
“上浆房里把布浆，
“整经机上把线网理，
“才可在织机上面把布织。
“乔，去拿玉米把马喂，
“明晨我要赶到沃尔兹，
“记住把我的靴子擦干净，
“明天早晨我将准时把床起。
“玛丽，这是羊毛，你快拿去染，
“就用它至少多做出拼花桌布！”

老板娘说：“你给我安排了这些事，
“我想我更需要修补你的衬衣，
“请告诉我，谁去使用筒管盘？
“经轴架自己可不会长出面饼来！
“我们得烤面包，纺线，转身过来又揉面，
“挤牛奶从牛栏取出送到学校去，
“还要给小伙子们做布丁，
“发面用的酵母饼，快去找，‘要像那样
厚的酵母饼’！
“早晨、中午、晚上都要洗干净，
“碟子刀叉要烫水烫，牛奶快快喝光它，

"晚上再到仓库去取粮食!"[5]

这个情景不禁使人联想起科贝特所做的怀旧式的描述，他描述了18世纪南方的小农场主与雇工之间家族式的关系，他们一起食宿，祸福与共。在哈里法克斯和利兹地区，这样的情景曾是一度可信的，当时那里的布匹生产几乎全部过程都在一个家庭生产单位内进行。到18世纪末，事情就讲究起来了。制造业主不再到沃尔兹去买羊毛，(他们现在直接向纺纱厂购买纱，)整布工序也要送到专门化的作坊去完成。他出售产品的市场也不再是"自由"市场了，尽管晚至1779年，哈里法克斯还建起了一座大型的自耕农布匹贸易所，利兹也在18世纪90年代新建一座非法经营的布匹贸易所，无执照的营业者和未经过学徒训练的"鞋匠和补锅匠"以及独立经营的织工都到那些地方去出售布匹。小布商对大商人和工厂是越来越依赖了。如果他经营顺利的话也有可能成为小资本家，雇佣15至20名织工，大多数织工在自己家里做活。如果不顺利，他便会发现自己逐步地失去了独立性，他的利润损失在支付加工费上，在把纱织成布后落入中间商人的清单。他在行情不佳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大商人借贷，在这样的过程中，小布商逐渐完全沦为操作手工织机的织工。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老板娘的家庭经济也在生意的需求中丢失了。

这个过程是缓慢的，起初并不十分痛苦。1807年，数百名自耕农小布商跟着其他人众前往约克，投票支持威尔伯福斯。[7]

⑥ 这首诗的原稿藏于利兹档案馆，誊印件见《托雷斯比协会出版目录》，第41集，第3部分，第95号，1947年，第275—279页。H.希顿的《约克郡的毛织业和毛纺业》(1920)，第344—347页上曾作摘引。希顿教授的这部著作依然是有关18世纪约克郡家庭工业的权威著作。

⑦ 威尔伯福斯(1759—1833)，英国政治家和慈善家。——译注

行业的一再分工使一些小业主又支撑了50年以上，而另一些小业主却建起了整布[⑧]和剪绒的小作坊。此外，纱线产量的大大增加为织工提供了更多的劳动机会，所以1780至1820年这段时期，布商丧失独立和社会地位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被当时大量工作机会的存在所掩盖。如果业主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下降到帮工的地位，那么，汤姆、威尔、杰克或乔的地位看起来似乎在上升。纺纱厂和工厂在搜寻织工，于是织工得以脱离小布商业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他现在有可能挑选雇主了，这就是毛织业和棉织业中帮工的"黄金时代"。

诗中所描述的18世纪早期的那种关系，只在家长制的意义上才是田园式的。一方面，帮工对业主的关系就像农场长工对农场主的关系一样，没有多出丝毫的独立性。教区学徒如果分配给了一位坏师傅，他在几年里将处于近乎被奴役的地位。另一方面，帮工会自视为"布商"，而不仅仅是织工。他的工作种类繁多，大多数工作是在织机上做的，但也有一些在织机外或织机边做。他希望获得借款去购进羊毛并希望成为自负盈亏的小业主。如果他不在业主的作坊而是在自己家中工作，除了自我约束以外，不必遵守什么劳动纪律。小业主与劳工之间的关系是私人关系，有时还是亲密的。他们遵守同样的习惯，忠于同样的小团体价值观念： 274

> "小制作匠"……是一些对谁都不脱帽致敬的人，他们不承认地主和牧师有管他们闲事的权利，也不同他们打交道……他们说话粗鲁而直率往往得罪人……如果这些小制作匠……的地位真是上升到足以雇用少数几

---

⑧ 英文为 textile finishing，指织物织成后所进行的各种加工工序，为捶、轧光、缩绒、拉绒、压呢和拉幅等。——译注

个邻居，他会仍然用自己的双手不停地工作，会像被雇用者一样卖力地工作，甚至比他们更加卖力。无论在谈吐上还是在穿着上，他们并不想高人一等。[9]

工业革命时期的小业主兼布商都是农民或富农，正因有了他们，约克郡才有了直率和独立的名气。

棉纺织业中的情况就不同了。生产的单位一般都比较大，其间的关系类似于从18世纪后期起在诺里季和英格兰西部见到的那种关系。到18世纪50年代，曼彻斯特生产细纹布和格纹布的织工已经组织了强大的行业协会，靠抵制没有学徒出身资格的劳动者拥入以求保护他们的地位。"非法"的劳工开始"成倍地迅速增加，达到隔一个大门就有一个人"。（织工们抱怨说，）一到夏天，这些人就"接受外作任务，比如当日工"，而到秋天，

他们又回到了织机旁边，只要冬天不挨饿，他们愿意在任何报酬下工作，答应做任何一种奴隶般的劳动。他们所答应的这些条件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共同的规矩……[10]

1759年，当奥德姆的格纹布织工要求司法依法执行学徒身份的规定时，巡回法官做出了对他们不利的判决，判决把国家的法律抛在一边，而支持亚当·斯密当时还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学说。275 如果要实行学徒法，"那么开设企业的自由（这是当时曼彻斯特得以繁荣的条件）[将受到]摧残"：

---

[9] 弗兰克·皮尔：《老克莱克希顿》，载于《克莱克希顿卫报》，1884年1—4月。皮尔是地方史学家，他的写作忠于事实，描述了约克郡西区在19世纪30年代的情况，该地是业主布商生存时间最长的地区。

[10] 见A.P.沃兹沃恩和曼：《棉纺织业和工业的兰开郡》（曼彻斯特，1931），第348页。

当工业还处于幼年时代，伊丽莎白女王的法令是为了保证公共福利；但是现在，工业已经成熟到我们看到的那种完善程度了，废除这些法令大概是合适的，因为这些法令有可能阻碍和束缚起初必须靠规定才能获得的知识……。

至于结社，“如果下级要对上级指手画脚，如果脚想要变成头，执行法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压制下去，是社会的每一个朋友所不可推卸的责任”。[11]

这次奇特的判决预示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工匠法”的真正废除。虽然织工组织并没有完全消失，但由于早期纺纱厂的纱线产量极大增加，兰开郡东南部地区织布业有很大发展，从而使织工处于无法受到法律保护的地位上。威廉·拉德克利夫对这个时期奔宁山地所做的叙述是非常出名的，他说：

……旧的织机作坊变得不够用了，每一个堆栈甚至旧仓库、车棚和作坊以外的各种房屋都修理了一番，凿破墙壁，安上窗户，来满足织机作坊的需要。最终当这些劳动房间都不够用的时候，四面八方就涌现出新的织工房间作为织机作坊……。[12]

正是这些织机，而不是棉织厂，吸收了成千上万的移民。18世纪70年代以后，奔宁山地开始出现一个个大居民区，如米德尔顿、奥德姆、莫特拉姆、罗奇代尔等。博尔顿的居民从1773年的5339人陡然增加到1789年的11739人，战争开始时，

尽管有许多人登记，然而给工人阶级修建房屋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去年夏天市镇郊外建起的许多房子，

[11] 沃兹沃思和曼前引书，第366—367页。

[12] W.拉德克利夫：《动力机织业的起源》(斯托克波特，1828)，第65页。

> 现在全都住满了。[13]

276 小农场主转变为织工，农业工人和移民工匠也进人这个行业。拉德夫利夫把1788到1803年之间的15年描绘成织布“这个大行业的黄金时代”：

> 他们的住房和花园干净而整洁，家家户户穿着得漂漂亮亮，每个男人的口袋里都有一只怀表，妇女尽情地打扮起来，每逢星期日，教堂里人满得挤不下。房屋布置得十分漂亮，墙上挂着用桃花心木制作或配以花色钟架的钟，美观的茶具是斯塔福德郡生产的……伯明翰，陶器区和设菲尔德制造的供日常使用，也用做摆设……许多家庭的农舍里还养了牛……[14]

在这里，实际的经历和神话混合在一起，就像加斯克尔说的织工家庭在世纪交替时每周能赚回4英镑一样，也像班福德在《早年岁月》中对米德尔顿所做的描述一样。我们从奥德姆的一个日记作者处得知，斜纹布亦即粗纹布织工并未享受这样的繁荣。[15]事实上大约只有少数织工达到了拉德克利夫所说的那种生活水平；不过，许多织工希望达到这样的水平。在略有繁荣的这15到20年之间，织工地区出现了一种不寻常的文化类型，比如有节奏的工作和闲暇；某些村庄的卫斯理教会在织工中间有组长

---

[13] A.艾金：《曼彻斯特……的乡村景象》(1795)，第262页。请注意，这里最早使用了“工人阶级”一词。

[14] 拉德克利夫前引书，第167页。

[15] 见S.J.克拉潘：《兰开郡的棉纺织业》(曼彻斯特，1904)，第40页。有些迹象表明，棉纺织业工人的工资从1797年左右开始普遍地下降，设在博尔顿的一个棉织工人协会称1717至1799年工资下降1/3。见R.班克罗夫特牧师的信，1799年4月29日，枢密院档案第A.155号；A.(博尔顿，1799)；拉德克利夫前引书，第72—77页。但是，从1802年5月26日的《布莱克本邮报》上可以看到，该地工资已经达到每周45至50先令的最高水平。

和当地的牧师从而使其同19世纪头十年相比就比较温和并更为人道(班福德的主日学校教他读书写字);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宣传,还有对独立的价值观的深深依恋等等。

不过,机器纺纱产量的增长所引起的繁荣掩盖了更主要的地位下降。织工工匠或织工帮工正是在这个"黄金时代"开始逐步向普通的"手工织布机"织工转变的。除了少数专门的生产部门,过去的工匠(他们的学徒制壁垒已经完全破裂)已经同新来的移民处在同等地位上。与此同时,许多农民织工放弃了他们的小块土地,集中在手工织机旁。织工由于要完全依赖纺纱厂或依靠把纱带进山地来的"运输贩子",他们的工资也在一轮又一轮地减少。 277

工资的降低长期以来不仅迎合了雇主的贪婪,同时也得到一种广泛传播的理论的支持。这种理论认为贫穷是刺激勤奋劳动的必要条件。《羊毛的回忆》一书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心中也许在想着英格兰西部的工业,他说:

>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匮乏推动了工业,靠3天劳动就能维持生活的工人在这一周其余的几天里肯定会懒惰、酗酒……工业地区的穷人在一般的情况下都不愿劳动更多的时间,只要赚的钱能够维持生活和供一周的狂饮之必需就行了……我敢公正地证明,呢绒制造业中工资的降低对国家是幸运而有利的,对穷人也没有真正的损害。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维持贸易,提高租金,而且还感化了人。[16]

这样的理论在棉纺织业地区的雇主以及许多地区长官和教士当

---

[16] J.斯密斯:《羊毛的回忆》(1747),第2卷,第308页。

中已极为流行。[17] 织工的富庶在一些业主和地方长官的头脑中引起了极为惊恐的感情。一位地方长官在 1818 年写道：织工"几年以前的收入太高了，他们一周只要工作三四天就可以过上相当惬意的生活。""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金钱都花在酒店里，他们每天在家中两次坐在茶桌边，有一瓶朗姆酒和最好的小麦面包与黄油。"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强制实行降低工资的有时是大雇主，有时是较为持重的雇主，有的时候则是为"委托经销商行"工作的小业主或独立织工造成的。当市场疲软时，制造业主利用这一形势，把活计分发给愿意以任何工资取得就业机会的织工。于是在"根本没有人要雇他们的时候迫使他们连续生产大量产品"。[18] 当需求回升时，这些产品被低价抛售于市场，因此，在每次小小的萧条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市场充斥廉价商品的时期，从 278 而使工资压低到萧条时期的水平上。在某种程度上，雇主的做法是不道德的，既表现在对偷工减料施以罚款上，也表现在分发棉纱时短斤少两上。在工资越来越低的时期，织工的人数在 19 世纪的头 30 年中却不断地增加，纺织对于北方的失业工人是仅次于做一般苦力的第二大工作源，斜纹布织工的工作比较繁重、单调，但也比较容易学会。农业工人、退役军人和爱尔兰的移民都在不断增加着劳动大军的人数。

工资第一次猛烈而普遍降低发生在世纪之交。战争的最后一两年工资有所上升，1815 年工资又下降了，从此工资一直不断地下降，从 1790 年开始，织工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在法律上

---

[17] 见沃兹沃恩和曼簡引书，第 387 页起。

[18] 据称，1807 年织工要求规定最低工资法案的请愿书上，据说有 13 万棉织工人签字。见哈蒙德夫妇：《技术工人》，第 74 页。

规定最低工资——这一要求也是有些雇主所支持的，以便以此为手段来迫使不够道德的对手进行公平竞争。紧接1808年5月下院否决这项要求之后爆发了罢工，有10000至15000名织工连日在曼彻斯特的圣乔治广场示威游行。行政长官驱散了示威的织工，造成流血事件。国家对著名的制造商民军中校约瑟夫·汉森提起起诉并监禁，充分暴露了政府当局的报复心理；汉森支持最低工资法案，因而被控犯了在织工中纵马胡言，“用恶毒和煽动的话”公然发表演说的罪。他说：

> 坚持你们的事业吧，你们一定会胜利。纳丁和他的党羽今天不可能将你们赶出广场。先生们，你们的劳动养活不了你们……我的父亲是个织工，我自己也为教会在纺织行业中做事，我是织工的真正朋友。

后来，织工们送给汉森上校一件礼物，那是一只由39600人捐钱购买的银杯。曼彻斯特的历史学家阿奇博尔德·普伦蒂斯评论说：“这次不明智的起诉所造成的影响是长久而犹感贻害尚存的，它带来了对雇主的痛恨感情，在1812年、1817年、1819年和1826年一再地表现出来……。”[19]

普伦蒂斯提到的这些年份发生了捣毁动力织机（1812，1826）、背毯进军（1817）和彼得卢事件（1819）。织工们要求法律保护的希望落空了，于是更直接地转向政治激进主义。[20] 但是，1800年以后的数年间，卫斯理宗与“教会和国王派”的暴行联手，使大多数织工成为政治上的“保王派”。据说，有两万名织工在战争早期加入民军；有一段时间，如果有人批评国王年金名册，就会被打倒在地。1834年，博尔顿的一位证人对下院手织

279

---

⑲ 豪厄尔：《国家审判集》，第31卷，第1—98页；普伦蒂斯前引书，第33页。

⑳ 关于导致卢德运动（1812年）产生的多次事件，参见下文，第541页。

工特别委员会说:"我亲眼看到两三个人因为是老改革派而陷入极大的危险。"激进运动的浪潮是战后才真正掀起的,1818年发生了雇主和织工之间的第二次大冲突。那一年,曼彻斯特举行了棉纺工人的大罢工,第一次明确地试图建立总工会(即"慈善大力神"会)。除了曼彻斯特以外,博尔顿、伯里、伯恩利等各个纺织业城市都爆发了织工的罢工,他们把织梭收起来,锁在教堂或车间里。罢工以雇主的短期让步为结束,而织工的一些领导人则被起诉,被监禁。[①] 这是兰开郡织工最后一次有成效的总罢工运动,从此以后,纺织业的大部分行当的工资不断地下降(每周工资9先令,6先令,4先令6便士,而临时工则甚至更低),直到19世纪30年代为止。

把织工处境的恶化归咎于动力织机的使用,那就过分简单化了[②]。织工的地位在1813年已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而当时联合王国的动力织机估计总共为2400台,机织对手织的竞争主要是在心理方面。1820年,动力织机的数量估计上升到14000台,但即使在那时,机织仍又慢又笨,还不适用于提花原理,所以不能织难织的图案。可以断言,非常廉价和过剩的手工织工的

280 劳动力阻滞了织布业中机械的发明和资本的运用。织工地位的降低类似于不体面的工匠行业中工人地位的降低。他们的工资每下降一次,他们的处境就变得更无助。织工现在必须劳动更长的时间,以至直到夜晚,然而工资却更少;他的劳动时间的延长就反过来增加了其他织工失业的机会,就连新"政治经济学"的信徒对此也吃惊。一位人道的雇主由于诚实的行为而导致自

① 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109—121页。哈蒙德夫妇引用的内务部关于1818年罢工的文件全文刊载在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246—310页。

② 18世纪在斯皮特菲尔兹的丝织业中能看到相同的过程,该地根本没有动力机问题。见M.D.乔治:《18世纪的伦敦生活》,第187页。

己破产，他大叫道："亚当·斯密博士仔细思考过这样的情况吗？"

> 读了他的书也找不到解除这些抱怨的办法，他无法想象这种情况的存在，即（据说）在不存在需求的时候，10万名织工做了15万名织工的活，还只能吃个半饱，其余的织工要靠济贫税生活。他能够想象某个工业部门的利润，可以是一个雇主比另一个雇主从穷人辛苦挣来的钱中榨出的更多吗？[22]

"15名织工做了15万名织工的活"——这就是不体面行业的本质，如梅休后来在伦敦看到的那样，那里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半就业的工人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互相压低彼此的工资。正是织工的这种劳动状况，特别是在山地的村庄里，给工联主义以额外的阻力。1834年，索尔福德的一名织工曾向特别委员会解释说：

> 手工织工就是处在这样奇怪的环境下，使他根本没有可能哪怕最低限度地控制自己劳动的价值……事实是，某个雇主手下的织工可能分散在很广的区域内，这就为雇主提供了持久的机会，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把他的织工用作手段，来交替降低彼此的工资。他可以对某些织工说，其他织工报酬少得多，因此他们不应拿得再多了；要不然就走开，不给你工作。然后，他又对其余织工如此再说一番……织工们生活困难，他们想核实这个说法是对还是不对，要花时间，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又怕别的织工会抢走他们的工作，……所有织工的脑子里都激起了妒意和不满，在感情上和表现上

---

[22] 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123页。亦见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298—301页中有关1823年曼彻斯特织工的生动陈述。

使他们分裂，所有这些心思的巧合都使工资的降低变成事实……

约克郡的毛织业和毛纺业工人的地位下降经历了相似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比棉纺织业内的变化往往晚15年以上。1806年向呢绒业委员会提供的证据表明，家庭工业制度在呢绒业中仍占统治地位。不过，"小制造业主"也在减少中，"过去业主的房屋成了现在工人的房屋"；与此同时，制造商则把手工织机连同整布工序一起放在无动力的"工厂"里。（某个证人说："工厂就是把大约200名工人雇来放在同一个屋子里。"）工厂——尤其是利兹的本杰明·戈特的几个工厂激起了业主和帮工的恶感；因为它们一直在夺去最好的主顾，在整布工序里有组织得非常好的梳工、剪绒工，但工厂却雇用"非法的"工人。一位证人声称：财富"大部分落到笨汉手里去了"。帮工抱怨说，在兴旺的时候，工厂把更多的工作交给外作工去做，却毫无自责地把他们赶走，而小业主布商仍在想为自己的帮工找事做。此外，即使在动力使用以前，手工"织布厂"就冒犯了根深蒂固的道德偏见。剪绒工和织工间的一个工会组织——织造业同仁会或称"协会"——公开提出的目标是联合小织布业主发动请愿，要求对工厂施加限制，执行学徒制。[24]

"小制造商"和帮工都未能从下院得到满意的答复，他们的请愿仅仅引起了议会对他们结社的注意以及对旧家长式法规的注意，以后不久这种法规就被废除了。在利兹和斯彭河谷的纺织业地区，小布商的地位比较巩固，他们的衰败又延长到50多年之久。在布拉德福德和哈里法克斯的呢绒业地区以及哈德斯菲尔德以南的花色毛纺业地区，外作工业制度在19世纪20年

[24] 参见下文，第527—529页。

代以前最充分地发展。像棉纺织业一样呢绒业织工成了削减工资和“屠宰场老板”的牺牲品，那些人囤积了大批的减价商品。

282 就像布匹剪绒工是毛纺业中的上等工匠一样，梳毛工则是呢绒业中的上等工匠，他们掌握了生产过程的关键，只要能限制别人进入他们的行业，他们所处的位置本身就足以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因为他们至少早在18世纪40年代就建立了当时还少有的工会组织。19世纪初，尽管有反结社法，他们仍有有效的全国性组织和堂堂正正的章程，有地下工会的种种手段，并因桀骜不驯和不守工时而扬名。

> 他们会在某个星期一早晨来到这里，在梳毛罐下点着火，然后常常离去，到星期三，甚至星期四才回来……铺子里总有一个多余的台板，供给游荡的工人休息……[25]

1825年2月，布雷德福的梳毛工人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纪念梳毛工的圣者布莱茨主教。[26] 6月，就像在标志向新工业主义的转变一样，他们发动了布雷德福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罢工，2万名梳毛工人和织工参加了罢工，坚持了23个星期，结果以罢工者的完全失败而告终。[27] 反结社法在一年以前已经废除，罢工者最新提出的要求是增加工资和工资的合理化，不久以后就转向了要求承认工会合法化的斗争。工厂主走得很远，父母若不在与工会断绝关系的文件上签字，连孩子也要开除出纺

---

[25] 《英国行业手册》(1818)，第441页。

[26] 见下文，第425—426页。

[27] 关于这次罢工，见J.伯恩利：《毛纺业和梳毛业史》(1889)，第166页以下；J.詹姆斯：《毛纺业史》(1857)，第400页以下；《行业报》，1826年6—9月；W.斯克鲁顿：《一八二五年大罢工》，载《布雷德福考古学报》(1888)，第1卷，第67—73页。

纱厂。这场斗争被全国都看得至关重要,作为支持罢工基金的捐款高达2万英镑。罢工失败后,梳毛工人一夜之间就从特权工匠变成了没有抵抗能力的外作工人。学徒制的限制早已被打消,1825年以前的几年中,数千工人被高工资吸引进入了这个行业。当有些梳毛工人在大工场里工作时,其他人习惯上是3人或4人共享一个独立的铺子。现在,他们有数百名新来的工人补充进来,在自己家中进行那种有害健康的工作,尽管到

283 1825年已经有了梳毛机,但是那种机器能否做高质量的梳毛工作还值得怀疑。廉价的工资使他们在以后20年间仍能避免机器的威胁。在这个时期里,梳毛工人仍然以独立和"民主"政治而著名。按照工会的估计,1825年布雷德福有7000至8000名梳毛工人就业。20年以后,这个地区的手工梳毛工人还有1万名,许多工人是19世纪20年代从农村地区迁来的。布雷福德的一份记载说:

> 他们来自肯达尔、北约克郡、莱斯特、德文郡甚至来自爱尔兰。所以,如你在酒店(梳毛工人称作解渴店)里呆上一个小时,就可以听到各种方言混成一片。……他们身上还有农村生活的特征,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每当收获季节来临,他们就放下手中的羊毛梳,拿起长柄大镰刀……回到自己的农村去收割……。他们还是养鸟的行家,梳毛作坊往往变成很好的鸟舍。……有些梳毛工人还是天才的朗诵家,有很妙的背诵能力……还有一些梳毛工人十分聪明,善于扮演戏剧中的角色,有时甚至可以自己组成一个剧团。……㉘

㉘ W.斯克鲁顿:《50年前的布雷福德》(布雷福德,1897),第95—96页。

克莱克希顿的记载则比较阴沉：

> 工人中间恐怕要算旧式梳毛工人最倒霉。他们的工作全在家中进行，农舍中最好的一部分用来做这种工作。全家6到8口人，不分男女，都围在用木炭烧热的"梳毛罐"旁边一起工作，气味非常难闻，有害健康。如果我补充说，这个工作间还要当作卧室使用，你就不会奇怪几乎每个梳毛工人大多是形容枯槁……许多人活不到正常寿命的一半……

他们的妻子也"常常同丈夫一道，站在'填料岗位'上，从早6点一直工作到晚10点。"

> 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这些梳毛工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狂热的政治家……，他们是宪章运动中最热情的参加者，《北极星报》是他们惟一的读物。㉙

梳毛工人从"体面"行业跌落到"不体面"行业，可能是工人集团中最突然的一种。毛纺工和毛织工根本就不知梳毛工人在18世纪享有的那种特权地位为何物。他们的工资开始下降时，并没有进行太顽强的抵抗。晚至1830年，布雷福德手工织工最大的雇主曾经写道： 284

> 在我接触过的各类工人中，织工是最有纪律，最稳定的。据我所知，他们从来不曾强求提高工资，而是以几乎从无先例的逆来顺受的态度来面对困难和苦楚。㉚

㉙ 弗兰克·皮尔前引书。J.伯恩利在《呢绒业和梳毛业史》中的第175—185页叙述了19世纪40年代梳毛工人的境遇。E.西格斯沃恩描述了19世纪40年代末由于梳毛机的改进而使梳毛工人在布雷德福突然消失的厄运，见C.费伊：《工业英国巡礼，1830—1850》(1952)，第123—128页；关于1856年哈里法克斯梳毛工人的消失，见E.贝恩斯：《约克郡的过去和现在》，第2卷，第415页。

㉚ 摘自W.卡德沃恩：《布雷德福地区工人阶级状况》(布雷德福，1887)。

两年后，科贝特骑马经过哈里法克斯地区，他报告说：

令人感到真正悲哀的是成千上万的工人过去每周赚20到30个先令，现在却不得不靠每周5先令、4先令，甚至更少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更令人悲伤的是看到这种状况下的工人仍然保留着他们在独立的时期形成的坦率和不拘的性格"。[31]

哈德斯菲尔德的"花色"毛织业从1825年起就一直不断地萧条下来，1826年，2500个家庭列入了萨德尔沃恩地区德尔夫的穷人名单。(在兰开郡某些棉纺织业地区已实行的)"工业斯品汉姆兰制度"现在得到扩展，织工们一边工作，一边领取济贫税，结果他们的工资进一步降低了。(在萨德尔沃恩，织工只要每周做两天修路的工作，便可以每天领到12磅燕麦食品。)1829年，哈德斯菲尔德一个雇主委员会证实，假如把工资在家庭成员中平分，那么在29000名居民中，有13000人靠每人每天2便士维持着生活。但是，这是一种奇怪的"萧条"，呢绒布匹的实际产量超过以前任何时期。直截了当地说织工的状况就是由于那种"令人憎恶的降低工资的制度"造成的。[32]

工资的降低又进一步引起了与动力织机严重的竞争。毛纺业一直没有引进动力设备，直到19世纪20年代末才开始。30年代末，"花色"毛织业才开始(但只是部分地)使用动力织机，而直到1851年动力机才有效地适用于织地毯。即使在与动力发生直接竞争的地方，织布的速度也只是缓慢地达到3倍或4倍

[31] 《政治纪事报》，1832年6月20日。

[32] W.B.克伦普和G.戈巴尔：《哈德斯菲尔德毛纺业史》(哈德斯菲尔德，1935)，第120—121页。

于手工织布产量的速度。[33] 不过，当织工从平棉布和斜纹布的生产上被逐出来，而转到丝织、毛纺乃至高级呢绒和毛毯业时，无疑发生了连锁反应。[34] 的确，在10年、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里，动力在各种纺织行业中始终充当手工织布的辅助手段。一位证人(多少有些不合逻辑地)告诉特别委员会说：

> 哈里法克斯有两位最大的工厂主(阿克罗伊德先生)是两兄弟，一个使用动力织机，一个使用手工织机。……他们彼此竞争，出售产品，因此必须使工资尽可能接近以便比较……从而可以获取利润。"[35]

这里的动力织机显然是降低手织工工资的杠杆，或者相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位工厂主十分满意他的做法，可以把自己稳定的经营置于动力织机的基础上，而在市场繁荣的时候又可以把更多的工作分发给手工织工，由他们自己承担房租，织机等固定的开支。一名助理特派员1839年对约克郡西区进行调查后报告说："在需求缩减的时候，"

---

[33] 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论点。关于动力和手工织平棉布的产量，比例是3:1还是5:1，证人在《议会特别委员会关于手织工请愿书的报告》中做出不同的估计。丹迪织机就布匹在其中移动的方式而言，是一种机械操作的手工织机，织工需要跟上加速运动的手抛织梭，据说，这种织机能够跟上动力织机的速度，但织工的健康会受到很大损害。J. 詹姆斯估计，在毛织业中，1835年的约克郡西区有2768台动力织机，相比之下，1838年布雷德福地区估计有14000台手工织机，而1841年约克郡西区有11438台动力织机。据1835年3月28日和4月11日的《利兹时报》估计，毛纺业的动力织机(一般是每个姑娘或妇女管两台)的产量是手工织机的2.5到3倍。但是，15年以后，一码半宽幅的织机其织梭的运动速度加快了一倍以上〔见H. 福布斯：《毛纺业的兴起，进步和现状》(1852)，第318页〕。克罗斯利动力织毯机于1851年获得专利，其速度是手工织机的12倍到14倍(《一名工人的50年回忆》，载《哈里法克斯信使报》，1888年7月7日)。

[34] 见《特别委员会关于手织工请愿书的报告》(1835)，第148页(2066号)。

[35] 同上，第60页(465—466号)。

> 使用动力织机又用手工织机的工厂主当然要尽可能长久地经营固定资本，因此，他首先考虑的是解雇手工织工。

大多数织工的状况，从19世纪20年代（棉织业中更早）到286 19世纪40年代以后，常常被说成是“无法描述的”或“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们的状况确实值得描述，或更好地了解。直到19世纪30年代，还有某类织工因其有特殊的技术而保持住了工匠的地位。利兹的呢绒织工的境遇比大多数人好，而诺里季的毛纺工人有特别强烈的雅各宾派和工会的传统，并把布置纠察线、恫吓业主和“非法”工人，参与市区政治、猛烈反对机器等手段结合起来，在19世纪30年代得以使工资持续上升——但这些却导致了约克郡西区的工业超过了诺里季。[5] 但是，绝大多数的织工生活在饥饿的边缘，有的已经处于饥饿之中。1827年，移民问题特别委员会所提供的证据说明了兰开郡某些地区的状况，读起来就像是预见了爱尔兰的马铃薯灾荒：

> 赫尔顿夫人和我去访问穷人们，一位饥饿难忍的人请我们进一间房子。我们看到火炉旁有一位年迈的人，显然快要死了。另一边有个大约18岁的年轻人，膝上坐着一个孩子，孩子母亲刚刚死去，已被埋葬了。我们正想离开房子的时候，那位妇女说：“先生，你还没有看到全部哩”。于是，我们上了楼，在几块破布下面，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年轻人，即那位死去的妻子的丈夫，他已经动弹不了，翻开破布，里面还有一个快死的人，就在

[5] 关于（从业主的角度）对诺里季织工委员会在反抗“那种称之为廉价劳动的肮脏东西”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所做的描述，见《保安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1839)，第135—146页。参见克拉潘：《毛纺工业从诺里季向约克郡西区的转移》，载《经济杂志》，第20卷。

那天，这个人死了。我们再没有疑问了，这个家庭确实处在饥饿之中……。

这是来自西霍顿的报告，那里5000个居民中一半人“没有床铺，甚至没有衣服”。报告中还对6个将要饿死的人作了描述。

的确，这里所提到的当时的低工资（从10先令到4先令）可能只是同一个家庭中好几份工资中的一份，因为许多的妻子、女儿和年轻人在使用第二台或第三台织机。但是，这些工资中也暗含另外的支出和扣除。1835年，布雷福德的织工说，从10先令的平均工资中需要支出4便士用于上浆，3便士用于租织机，9.5便士用于捻经线，3.5便士用于照明，还有4便士必须用于织机的折旧。如果加上房租（1先令9便士）、燃料和洗涤（1先令6便士）的支出，总共的扣除达到5先令3便士，尽管有些地方，妻子或儿子也在合用一架第二台织机工作，这些经常开销中的有些钱可以从两份工资中分摊。[37] 有些情况下，织机是租来的，有些情况下织工自己有织机，但是，他们必须向雇主租用传动装置才能织出图案。许多织工长期处于对运输贩子负债的状态下，只有通过工作才能分期还清债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无法拒绝无论多么低的工资。 287

随着处境的进一步恶化，他们却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无报酬的工作，例如取东西，送东西以及其他许多工序等。1844年，一位观察者写道：

我决不能忘记过去的时光，当时的制造商在这些地区租了房间，经线和纬线都用马和车送过来，为的是给织工很多方便，雇主还要问候被雇者。但是，现在的情况全颠倒过来了，劳工不仅要走很远的路程去寻找工作，

---

[37] 《利兹时报》，1835年3月7日。

而且肯定会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33]

来自帕德西的报告还有更生动的叙述，描写这些没有报酬的辅助工作。

当行情不坏的时候，织工和纺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工作的情形是十分常见的。……如果顺利的话，他们总要接受一些条件，例如帮助梳拢羊毛；就是说，要解开羊毛捆，然后是粗梳回丝，剔除腿部毛、臀部毛，把毛摊平成落层，然后到厂里并帮助洗涤，然后是"浅色"或染色。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报酬的，除了在某些情况下拿一点补助去喝一小杯酒，吃一点奶酪和面包。……当初纺工落出第一道粗纱时，由谁来接做下一道活，便成了严重的问题，他们往往用掷骰子的方法来决定。……在整经网做出之后全部需要上浆，通常的做法是织工自己买浆料。……给经网上浆后，全部工序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把它拿到室外去晾干。……选好地方后，张开网柱或撑架，如果遇到霜冻，就要用镐头挖洞埋柱，拉住网头。……有时会看到工人和他的妻子冒着齐膝深的大雪出来把经网晾干。……

288

然后，才能开始织布，直到深夜，在烛光或油灯下，"一个男孩或女孩，有时是织工的妻子，站在织机的一头，看管着织机，注意纱线断头，织工则注意着另一端，因为一根线断了，另一投梭走过时，也许有十几根线断掉。"布织好后，还有六七个零星工作要做，才能由运货人把织好的布匹运到利兹去。

---

[33] 外科医生 R.豪厄德：《赫普顿斯塔尔—斯赖克的斑疹伤寒史》（赫布登桥，1844）。

> 我们说，所有这种零星工作都是没有报酬的。……织工们完成工作后，在一段时间里拿不到报酬，也是常见的事情。……因此，手织工后来被叫做叩击贫穷之门的人，我们对此就不会感到奇怪了。[39]

棉纺织业没有这样一些做法。毛纺业中某些做法早已转为专门的工序。这说明，小规模的毛织业已过时而萎缩。但是，在花色毛纺业和高质毛织业地区同样也有费时间的工作要做。在山区分散的纺织村里，有一种称做"驮夫"的人，那里的男人或女人要用自己的体力背着沉重的布，走 5 英里甚至 10 英里的荒原小路。在布雷德福、基思利、哈里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托德莫登、罗奇代尔、博尔顿和麦克尔斯菲尔德等中心城市周围的纺织地区，可以找到完全陷人绝望境地的大量外作工人。1834 年议会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说，它发现"那批数量大又很宝贵的人所经受的痛苦，不仅没有被夸张，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其广度和深度几乎不为人所相信，也不为人所描述"。约翰·菲尔登在 1835 年向这个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声称，数量非常多的织工无法得到足够的最普通最便宜的食品，他们衣衫褴褛，以至于不好意思把儿女送到主日学校去读书。他们没有家具，有些人还睡在草铺上，"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的现象并不少见"，廉价酒使他们道德败坏，营养不足和不健康使他们身体衰弱。"黄金时代"获得的财富已经从织工的房子里流失了，博尔顿的一名证人说：

289

> 自从我能够记事情开始，我所认识的每个织工家中都有五斗柜，有挂钟、安乐椅、床架和烛台，甚至还有画和奢侈品。现在，我发现这些东西全都不见了，它们都跑到机匠家中或较高的等级的家中去了。

[39] J. 劳森：《就帕德西的发展致年轻人》（斯坦宁利，1887），第 26—30 页。

这位证人是个制造商，他“记得我的织工中很多年里只有一个人买过一件上衣。”一床价值 2 先令 6 便士的粗呢床罩，新的时候常常代替毛毯使用。“我看到很多人家中只有二三只三脚凳，在有些人家中，我连一只凳子或椅子都看不见，只有一个茶柜，用来放衣物，又当凳子用。”

穷苦织工和他们一家人的伙食，是单调划一的，即燕麦粥、燕麦饼、土豆、洋葱粥、搀水牛奶、糖浆或家酿酒，而茶、咖啡和咸肉算是奢侈品。理查德·奥斯特勒说：“他们当中许多人一年到头不知道什么叫做吃鲜肉……他们的孩子有时跑到哈德斯菲尔德去乞讨，带回来一片鲜肉，那就是相当奢侈的东西了。”如果需要证实的话，请看那些助理特派员们细心的调查，他们在 1838 年被皇家特派委员会任命之后，走遍了全国各地。处境最糟糕的也许是在利兹和曼彻斯特等大城镇发现的地窖里的住户，他们从爱尔兰来，是企图用手工织机赚几个先令的失业者。

人们很容易假设，农村织工住在坚固的石头房子里，织布作坊里有长而直的窗子，在奔宁高原的考尔德河谷上游、沃夫代尔河谷上游、萨德尔沃思或克里特罗，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以此来补偿他们的贫穷。但一位外科医生曾在赫普顿斯塔尔附近一个小村庄里调查过传染性斑疹伤寒的情况（那里在内战时期曾是一个繁荣的毛织业小城镇），结果留下了这一类社区的可怕的图像：居住于高高荒野之上的人们，水源却受到了污染，一道溪水，被屠宰场污染了，到了夏天，就像是“令人作呕的动物养殖场”，阴沟从一户织工农舍前的石板路下直接穿过，房屋潮湿，寒冷，地板比地面还低。“完全可以这样说，燕麦粥和土豆是他们生存的惟一依靠”，还有陈奶和糖浆。如果无法弄到茶和咖啡，就用薄荷、艾菊或海素草泡的水来代替。就连这样的饮食“它们也根本不够……居民的生活状况迅速恶化”。医疗费和

丧葬费在济贫税中支付,只有 1/10 的产妇在生育时能够得到医生的照料。

> 手工织工的妻子临产时的情形如何呢?她双脚着地,一边站着一位妇女,她双臂分别搂住她们的颈项。生理上的痛苦使她几乎把扶她的人拽到地上。她们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生了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呢?她们回答说,因为没有床单可换。……

这位仁慈的医生惊呼:"他们究竟怎么设法地活下去的,听起来都叫人目瞪口呆。"[40]

哈蒙德夫妇的著作现在引起极强烈的反感,以致在引用这一类资料时总要被指责为心怀叵测。而这一类资料现在实在是多得举不胜举。但是又非得引用不可,因为没有这些细节,便会忽视"手工织工的衰落"这种事实,认识不到他们的悲惨生活达到何种程度。织工的社区在中西部地区和奔宁山区连绵存在了三四百年之久,在其他地区形成较晚,但仍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模式和传统——这些社区,竟是全然消失了。赫普顿斯塔尔——斯莱克的人口模式是特殊的:有 348 人,一半以上在 20 岁以下(15 岁以下的 147 人),只有 30 人超过 55 岁,它并不表明这是个正在发展的地区,而表明它对生命的期待不高。在 19 世纪 30 与 40 年代这些大灾难的时期,动力织机出现了,爱尔兰移民大量拥入,新济贫法开始实施,从而使削减工资所开始的过程最终结束。这时,随着宪章派织工中滋生着反抗的希望,更可怕的情景却在发生。儿童丧葬协会成立了(主日学校的每个学生每周交纳 1 便士,作为他自己或同学的丧葬费),(署名为"马库斯的")一份小册子广为传播,鼓吹杀婴,并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严

---

[40] R.豪厄德前引书,散见书中各处。

肃的讨论，但这还不是全部的事情。直到这些最后的痛苦到来

291 之前，旧的职工社区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仍使其居民流连不已，而不向往物质生活较好的工厂城镇。赫普顿斯塔尔一名织工的儿子在19世纪20年代还是个孩子，他回忆说，织工过去"有过幸福的时代"，"当时的空气还没有……被工厂的浓烟弄得臭气熏天"，

> 也没有铃声催他们在四五点钟起床……他们在自由按自己的意思开始或停止工作。……到了晚上，虽然他们仍然在工作，可是一到主日学校的成立纪念日，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可以快乐地唱圣歌，与音乐般的织梭节奏融合在一起。……

一些织工可以从自己的园地里采摘水果、蔬菜和鲜花，"我在织机旁工作，当不捻线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教我读书，写字，还教我算术。"基利一个工厂的孩子在18岁时离开了工厂，回到织机旁边，他对萨德勒委员会(1832)说，他宁可回到织机旁，也"决不愿意"到工厂去。"我轻松多了，有时间考虑自己的事，也可以走出去呼吸一会儿新鲜空气。"在布雷福德，中午休息时，织工们聚在一起吃午饭，这成了他们的习惯，

> 同别的织工和梳毛工一道谈论当时的新闻和说说闲话。他们三五成群地谈上一个小时，如养猪、喂鸡、捕鸟等等，经常对大赦等事情进行非常激烈的争论，或讨论婴儿受洗礼和成人受浸礼的做法是对还是不对。有许多次，我看见一些人几乎为……这些话题打起架来。[41]

---

[41] J.格林伍德:《回忆录》,载《托德莫登地方报》,1909年9月10日。J.哈特利:《大事记》,载《托德莫登地区新闻报》,1903年;斯克鲁顿前引书,第92页。

社会保守主义,地方的自豪感和文化特色混合在一起,构成了约克郡或兰开郡织工社区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社区真是“落后的”——他们以同样的执着墨守着当地的方言和习俗,没有一点医学知识,而且迷信。但是,我们越仔细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越会显出关于经济进步和落后的简单理论站不住脚。此外,在北方的织工当中,颇有造诣的自学成材的人以及思路开阔的人,的确发挥影响。每个织布地区都有自己的织工诗人、生物学家、数学家、音乐家、地理学家和植物学家,《玛丽·巴顿》一书中的老织布工形象无疑是取材于生活。北方一些 292 博物馆和博物学会至今仍保存着由织工记载和收集的鳞翅目昆虫标本,还有一些记载叙述了偏远村庄中的织工们在石板上用粉笔自学几何,并且很喜欢讨论微积分。[42] 在粗纱一类的单调工作中,还可以在织机上放一本书,一边工作,一边看书。

织工们还写了一些诗歌,这些诗歌有的比较传统,有的比较复杂。兰开郡一首叫“格林菲尔特的琼”的歌谣经历了战争初起时的爱国周期(与雅各宾的反歌谣一起),再经过宪章运动,一直流传到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但是,最动人的还是战争结束时唱出的一首歌“格林菲尔特的小琼,”歌中说:

> 我是穷困的棉织工,人人皆知我,
> 家中没吃的,身上着烂衫,
> 天天辛劳苦,难赚 6 便士,
> 脚上穿木鞋,光脚无袜穿。

---

[42] 参见 J.F.C.哈里逊:《学习和生活》(1961),第 45 页;关于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参见乔治前引书,第 188 页;中西部地区、诺里季尤其是苏格兰的织工中也有这种强烈的传统。在斯皮特菲尔兹,丝织工人出资帮助数学协会、历史协会、花卉栽培协会、昆虫协会、朗诵协会和音乐协会,见 G.I.斯蒂柯勒:《关于经济问题的五次演讲》(1949),第 26 页。

请你想一想：
送往收容院，
拼命把活干，
这有多么难。
我们的教区牧师，谆谆教导我：
只要好好把活干，定有好时光；
我已好好把活干，气都不敢喘，
心中却在想，要我死了才算完。
我知道他过着好日子，
我们拼命把活干，
他却一辈子什么也不干。

我们忙了整整6星期，
眼看完工之日即来临。
我们不停地织啊织，
直到最快地把梭换。
我们靠荨麻过日子，
荨麻可不差。
稀粥才是我们最好的美餐；
我得对你说实话，
我是什么都知道，
他们的生活比我还要差……

保安官员冲了进来，经过一番搏斗后，拿走了他们的家具。

我们躲在地面上，
开口对我的玛吉把话讲，
"在我一生中，
从没这么惨"……

当琼把织好的布匹送到老板那儿去的时候，他才知道，织好的这些布还不够抵偿他欠的债，因为上次那匹布多付给了他钱。于是，他绝望地走出仓库，回到了妻子身旁。

293

> 我的玛吉开口说，
> 我们最好把门关，
> 还是去伦敦寻找好时光；
> 如果这样拖下去，事情不改观，
> 他们就会开始说，
> 流血斗争，誓不罢休。
>   谁也不是国王，
>   但谁都喜欢公平，
>   当人们受到伤害，
>   就要起来把话讲。[43]

另一种织工诗人是自学成才者，最突出的例子是托德莫登的织工塞缪尔·劳。1772年，他发表了一首诗歌，是模仿汤姆逊的《四季歌》的风格。这首诗的文学价值并不高，但反映出他对维吉尔、奥维德和荷马的原著有所了解，对生物学和天文学的知识也有所了解：

> 是的，每个漫长的白天和阴沉的夜晚，
> 我在喧闹的织机旁冥思苦想，
> 一边织着花案，
> 手指僵冷，腮如冻土，
> 整个身躯不时地，

㊸ J.哈兰德：《兰开郡的歌谣》(1865)，第223—227页。

阵阵寒栗和病意。[44]

后来的织工诗人往往表达出一种哀切之情，自觉地模仿外国的文学形式(特别是“自然诗”)，很少涉及织工的真实生活。有一位织工在1820至1850年一直是手工织工，后来在机织厂找到了工作，他抱怨这个变动对他的诗产生了影响，他写道：

那时我在一间小屋子里工作，眺望卢丹登教堂的院子。在午餐时分，我常常出去，漫步在四野和灌木林中，倾听着夏天的鸟儿的歌唱，注视着卢丹登河的流水潺潺。……有时，幻想着某个因失恋而痛不欲生的姑娘……对着无情的风哭泣。这种幻想激动了我，于是赶忙回家去写。……但，一切都完了，我必须在喳喳的机器声中不断工作。

多年的自学只带来一些陈旧的诗篇，这确实令人伤心，但这些成果本身带来了真正的满足。这位在19世纪20年代末还很年轻的诗人对自然的观察比对失恋姑娘的观察深刻得多：

294

我同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一道采集昆虫。我们办起了一个图书馆。我相信我和一个同伴……收集了22大箱昆虫，120多种英国鸟类的蛋，还有(陆地上和淡水里的)大量贝壳，化石，矿石，古代和现代的钱币……。[45]

塞缪尔·班福德是把18世纪民众的社区传统(还延续到下个世纪很长的时间)和19世纪初较自觉的思想成就沟通起来的一座桥梁，他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经历了两种深刻的转变，即卫斯

---

[44] 兰开郡织工、托德莫登附近巴雷威斯的塞缪尔·劳：《家乡的冬天》(利兹，1772)。

[45] W.希顿：《老战士》(1857)，前言，第23、19页。

理宗的经历和政治激进主义的经历。[46] 在叙述其思想的影响时，我们不应当忘记有相当一批小布商业主下降到织工的地位，他们有时会带来教育的成果和小图书馆。[47]

织工群体的价值观念充分表现在宪章运动的历史上。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宪章派地方领袖中，绝大多数是外作工人，他们成熟的年代是在 1810 至 1830 年之间。其中一名是哈里法克斯的本杰明·拉什顿，生于 1785 年，到 1832 年已经成为“老一辈”改革家。还有一名是巴恩斯利的亚麻织工威廉·艾什顿，生于 1806 年，1830 年因参与策划罢工骚动而被流放，1838 年获释，得到织工同伴的捐助而从澳大利亚返回家乡，他在宪章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并因此再次遭到囚禁。另一位织工原是手工织工叫理查德·皮林，后来成为机织工人，以兰开郡活塞骚动之“父”而著称。此外，约翰·斯克文顿是原教旨卫斯理宗的地方牧师、织袜工人、拉夫巴勒的宪章派领袖；威廉·赖德是利兹的毛料织工；乔治·怀特是布雷德福的梳毛工人等等。[48]

叙述这些人的生平会脱离本书的范围，但是，兰开郡 1816 至 1820 年的激进运动在很大程度是织工的运动，这批后来的领袖就是在这类织工社会中形成的。他们对早期工人运动的贡献不可忽视。他们像城市工匠一样，意识到失去了自己的地位，长期保留着对“黄金时代”的怀念。正因为如此，他们对独立的价 295

[46] 关于卫斯理宗和织工的关系，见下文，第 11 章。关于战后的政治激进主义，见第 646—648 页。

[47] 约翰·菲尔登对 1835 年议会特别委员会说：“我想，在我们居住的邻近地区中，至少有 3/4 的制造业者陷入了贫困之中”。

[48] 关于拉什顿，见下文，第 398—400 页。巴恩斯利档案馆中有关于艾什顿的各种史料。关于皮林，见《宪章派审判集》(1843)。关于斯克文顿，见 J. F. C. 哈里森：《莱斯特的宪章运动》，载 A. 布里格斯：《宪章派研究》(1959)，第 130—131 页；关于怀特和赖德，见哈里森：《利兹的宪章运动》，同上，第 70 页起。

值极为珍视。就此而言，他们自然成为1816年科贝特著作的热心读者。除开截留纱线这个莫衷一是的问题外，几乎所有证人都指出织工诚实而具有自立精神，"同陛下臣民中一切法人团体一样忠诚，讲道德和值得信任"。[49] 但是，和城市工匠不同的是，他们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平等思想。在繁荣时期，他们的生活方式为全体所共有，因此他们的痛苦也就为全体所分担。他们的地位已经降低到在他们之下不存在非技术工人和临时工之类的程度，因此无须垒起经济和社会的高墙来反对他们。这使他们的反抗活动具有道德上的共鸣，而不一定要以欧文主义或圣经的语言来表达。他们诉之于基本的权利，诉之于人类共存共荣的基本思想，而不要一部分人的派别利益。作为一个整体，他们要求改善生活，而那些想一举之下重新设计社会的乌托邦思想——欧文式公社，全面大罢工和宪章土地计划，像火焰一样燃遍了他们的全体；他们产生了多种形式的梦想，但本质上却是一样的：建立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社会，实行产品的直接交换以避免雇主和中间商人的剥夺。晚至1848年，巴恩斯利的一位亚麻织工（与威廉·艾什顿一道遭到流放的宪章派）在全国宪章派公会上宣布，当宪章派取得胜利后，"他们将把土地分成小农场，使每个人都有机会靠自己的艰辛劳动而生存。"[50]

295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更仔细地研究19世纪30年代织工的真正处境以及可能改善的办法。他们的苦境被习惯地描绘成"没有希望"，经营着"病态"或"过时"的行业，"斗争注定会失败"，并且面临着"不可避免的衰落"。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直

[49] 拉德克利夫前引书，第107页。

[50] 《哈里法克斯卫报》，1848年4月8日。

到19世纪20年代，动力织机被当做借口，用以掩盖造成手工织工衰落的其他原因。[51] 1830年以前，动力织布和手工织布之间直接竞争的事例尚未出现，尽管棉纺织业中动力织机的数量成倍地增加，但是，请不要忘记这个时期的棉布消费也有了成倍的增加。[52] 到1835年为止，毛纺业中也是类似的状况，毛织业的其他部门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也是这样。[53] 因此，手织工的衰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30年或1835年以前，在这个阶段里，动力织机是潜伏的辅助因素，它造成的压力主要在心理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又是造成工资降低的杠杆）；在第二阶段里，动力织布代替了手工生产。工资的降低主要发生在第一个阶段（大约从20先令下降到8先令）。 296

这两个阶段是否都不可避免？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显然是

---

[51] G.H.伍德：《棉纺织业的工资史》（1910），第112页，提供的资料表明，1797年棉织工人的工资平均为18先令9便士；1802年为21先令；1809年为14先令；1817年为8先令9便士；1828年为7先令3便士；1832年为6先令。这些数字可能还不足以说明工资下降的幅度，因为可以肯定，19世纪30年代许多地区的周工资平均为4先令6便士。毛纺业和毛织业的大多数部门的工资也一样地下降，但开始得晚些，也极少下降到这么低的程度。统计数据所表明的趋向可参见议会特别委员会和助理委员会报告中浩如烟海的证词，《特别委员会关于手工织工请愿的报告》（1834），第432—433和446页上的图表很说明问题，菲尔登：《民族复兴》（1834），第27—30页上也有有用的图表。

[52] 关于英格兰动力棉织机数量的估计，1820年为12150台；1829年为55000台；1833年为85000台。经纱消费量的估计，1820年为870.96亿磅；1829年为1495.7亿磅。联合王国的手工棉织工的数量，1801年估计为16.4万人；1810年为20万人；1820年为24万人；1830年为24万人；1833年为21.3万人；1840年为12.3万人。见N.J.斯梅尔：《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化》（1959），第137、148—149、207页。

[53] 在毛纺业为主的哈里法克斯教区，羊毛的消费量从1830年的365.7万磅急剧上升到1850年的1442.3万磅。在同一时期，动力毛纺机的数量从几百台增加到4000台，在布雷德福的毛纺业中，动力织机与手工织机的比例到1836年大约仍为3000台对14000台。

不可避免的，尽管他们有时也认为织工本应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指导。但是，在当时的大多数人，包括织工以及他们的代表们看来，这并非不可避免。在工资下降的第一个阶段，互为作用的原因有十多种，其中包括战后7年中通货紧缩的普遍影响，但基本的原因首先是中断了习惯和工会的保护作用。其次是全体织工暴露于削减工资的最坏方法下，第三是这个行业积累了过多的失业者，对失业者来说它是"失败者最后的庇护所"。博尔顿的一名制造商言简意赅地说明白了动因：

> 从博尔顿一开始出现平纹细布生产的时候，我就发现织布业必然发生人为的工资下降，并且大幅度地开始降低，人们以为可以为织工的报酬找到某个适度的水平，但是，从一开始，它就在任何一个带头降低工资的制造商的控制之下。我所了解的事实是，当他们无法为商品取得某个他们认为应该取得的售价时，就立即去降低织工的工资。

297

但是，与此同时，1834年——繁荣的一年——的博尔顿"并没有失业织工，同时也没有任何失业的危险。"[64]

习惯的破坏以及工联主义的崩溃是由于国家的干预直接造成的。如果我们接受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反对革命的基调，那么这就是"不可避免的"。织工及其支持者用完全相反的分析和政策来反对这种意识形态，要求规定最低工资，并由制造商和织工组成的行业委员会来实施。他们针锋相对地否定"供求关系"的信条。当人们问道，是否应该让工资自己去寻找某个"水平"，曼彻斯特的一名丝织工人答道，在"所谓的资本和劳动之间没有相似之处"：

---

[64] 《议会特别委员会关于手工织工请愿书的报告》(1834)，第381、408页。

> 我可以证明资本就是劳动产品的积累，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劳动总是被那些一无所有因而必须立即将其出售的人拿到市场去，……如果我学资本家的样子，因价格不好而不肯出售……我这个星期本可付出的劳动，难道能把它装在瓶子里，或者放到盐里去吗？……劳动和资本的性质有两个区别（一是穷人总是出卖劳动，富人总是购买劳动；二是劳动不可能贮存，必须是要么立即卖出，要么立即失去），这足以使我相信，劳动和资本决不可能公平地服从同样的规律。……[59]

理查德·奥斯特勒作证说：织工看的很清楚，“**资本和财产受到了保护，他们的劳动则要靠碰运气。**”奥斯特勒向议会特别委员会提供证词时，受到了一位“政治经济学”党人的诘难，他们的对话构成了两种不同社会责任观的戏剧性对话：

> 奥斯特勒：劳动时间应当缩短……政府应当建立……由制造商和工人选举出来的人……组成的委员会……去解决如何调节工资的问题。 298
>
> 问：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岂不是葬送了劳动自由吗？
>
> 答：我只要结束谋杀的自由，结束超出劳动者的体能雇用他们的自由。我要制止任何阻碍穷人靠公平合理的劳动获取良好生活的东西，我要制止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对人类生命是毁灭性的。
>
> 问：这能够达到你所希望的效果吗？
>
> 答：我敢肯定，自由劳动现在的结果是贫穷，灾难和死亡……

---

[59] 前引书，第188页。

问：如果你把商品的价格提得相当高，不就没法出口你的商品了？

答：我们可以在国内使用。

问：难道你用得了这么多商品吗？

答：3倍之多，甚至还不止。因为劳动者的报酬提高了，他们可以消费这些商品。资本家不使用这些商品……这就是一个重大错误……如果工资提高了，劳动者便有能力买衣穿，……买食品吃……那些劳动者毕竟是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最大的消费者不是大资本家，不管他多么富有，至少他一次只能穿一件大衣，他肯定很少一次穿两件大衣。但是1000名工人现在一件大衣也没有，如果他们能够买得起1000件大衣，完全可以肯定，贸易将增长……

对于委托经营所或“屠宰房”的问题，奥斯特勒则主张直接地进行立法干预。他说：

你们从未制定过有关这种场所的法律，说这是干预自由。你们制定一些法律防备偷窃，那是对一个人的自由的一种干预；你们制定些法律防止人们杀人，那是对一个人的自由的一种干预……我应当说，那些屠宰馆的人们是不做这些事的……

资本家“似乎是人类中的特权等级，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是特权等级”。[56]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织工们在织布而他们自己却穿破衣服，还要强迫他们接受正统经济学谬误的教育。兰开郡的

---

[56] 《议会特别委员会关于手工织工请愿书的报告》(1834)，第283—288页。

织工面临着动力织机的竞争——同时，他们的人数大量增 299 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唱出了“悲凉的歌”：

> 绅士们，商人们，你们肆意驰骋，
> 低头看看这些穷人吧，足以让你们羞愧；
> 低头看看这些穷人吧，当你们上下驰骋。
> 我想自有那天上的主啊，定将把你们的傲慢全打掉。
> 〔合唱〕你们这些英格兰的暴君，
> 　　你们的赛马会即将开始，
> 　　你们将会为你们的行为受到清算。
>
> 你们无耻地降低我们的工资，
> 你们到市场去说销路不佳，
> 当我们问道，这样的不景气何时完，
> 你们的回答脱口而出：“等到战争结束吧”。

织工的孩子们穿着破衣烂衫，“你们的孩子却打扮得像戏台上的花花公子”，

> 你们是星期日上教堂，我想不是玩耍，而是炫耀你们的
> 　　骄傲，
> 你们把仁爱抛在一旁，那能有什么宗教。
> 如果天堂有什么地方像你们的交易所一样，
> 那穷人的灵魂就别想走近它，就像迷途的羔羊只能四
> 　　处徘徊游荡。
>
> 你们的餐桌上，堆满了美味佳肴，
> 醇香的美酒，让你们面放红光，
> 你们邀集朋友——这是你们全部的欢乐，
> 你们一起策划，只为了让我们面色苍白蜡黄。

你们说波拿巴是万恶之首，
还说我们有理由诅咒他的倒台，
波拿巴现在已经死去，不再回返，
这清楚地证明我们自己的波拿巴是残暴之王。[57]

他们所受的剥削日益明显，从而增加了他们的愤怒和痛苦；把军队调往彼得卢广场，或者雇主们可以在工业地区建立高楼大厦，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从来就不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规定工资的做法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却从不感到需要用具体事实来加以证明。约翰·菲尔登提出的由地区行业委员会定期进行审查、实行最低工资的建议，其可能性并不小于遭到同样反对但经过30年深入的鼓动终于得以通 300 过的十小时工作法案。站在菲尔登这一边的不仅有织工，而且有许多工厂主，他们也希望对比较恶劣的工厂主和“屠宰房”做一些限制。困难并不在于（斯梅尔泽教授所说的）“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而在于少数工厂主强有力的反对和议会的态度（斯梅尔泽教授却恭维它成功地“处理”和“沟通”了织工们“不合理的骚动迹象”）。[58] 1834年，议会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佩斯利的一位有同情心的工厂主约翰·马克斯韦尔担任主席，他与（该委员会的成员）菲尔登一起确保能提供有同情心的证人。这个委员会虽然对织工的苦难境遇表现出深切的关注，但在1834年却没有提出有力的建议。1835年，该委员会在进一步收到证据以后提出了明确的报告，支持菲尔登的最低工资提案，“这项措施产生的结果将剥夺那些现在有规定工资权的支

[57] J.哈兰德前引书，第259—261页。

[58] N.J.斯梅尔泽前引书，第247页。这里应当公正地对斯梅尔泽教授补充一点，他的著作虽然在基本论点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它在说明技术变化对棉纺织工人家庭关系产生的影响方面却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

付极低工资的工厂主手中的权力”。为这项措施举行听证会是必要的，“这至少证明议会同情受害者，愿意倾听他们的祈求”：

> 本委员会坚决反对这样的情绪，即认为议会不能也不应该干预这种性质的案件。相反，只要英国臣民的生活和幸福处在威胁之中，无论其数量多大，本委员会都认为议会应当毫不迟疑地进行调查，并且尽可能地予以纠正。
>
> 为此，本委员会建议，由菲尔登先生提交的这种性质的议案应立即成为提案……[59]

根据这项建议，约翰·马克斯韦尔的议案作为法案于1835年7月28日提交上去了。普勒特·汤姆森的发言持反对态度，显示了反对派的力量。他说：

> 本国政府怎么可能对工资做出固定的比率？工人的劳动怎么可能没有自由？

这样的一种措施是“暴君的行为”。鲍林博士和爱德华·贝恩斯(《利兹信使报》)劝织工让子女到别的行业去就业，自己“解救自己”。《汉萨议会记录》说约翰·菲尔登的发言“听不见”，因此不予记载。这项法案以129票对41票遭到否决。1836年，马克斯韦尔再次提出这项法案，但二读多次被延期，终于被搁置起来。1837年5月，马克斯韦尔在延长会期的动议提出时再次提出让这项提案成为法案，结果以82票对39票被否决。面对一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立法机构的凶残扼杀，佩斯利和托德莫登的制造商(其选民中有许多处于饥饿的边缘)继续进行斗争，1837 301

[59] 见《议会特别委员会关于手工织工请愿书的报告》(1835)，前言，第15页。我摘引了这份报告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纠正斯梅尔泽著作第263—264页和克拉潘的著作第1卷第552页上所做的不准确的叙述。

年12月21日，约翰·菲尔登提出一项新提案，被以73票对11票遭否决。但是菲尔登从席位上站起来发出警告说，如果议会对此无所作为，他将反对一切拨款法案。这次，菲尔登的声音"听得见"了，于是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由老资格的正统"政治经济学"老前辈纳索·西尼尔紧紧地控制，另一个"处理和沟通"的阶段开始了。1838年，助理特派员被派往各个贫困地区调查，西尼尔事先告诫他们要做好准备，"与许多流行的理论作斗争，可能会使人们对许多含糊不清、狂妄自大但被长期珍视着的某些预想感到失望。"在一些地区，仁慈和明智的人员，对织工的环境做了细致的调查，但他们毕竟是自由放任主义的空想家，他们的报告以及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于1839和1840年发表；约克郡西区的助理特派员那份枯燥的报告说，他的辛苦本来就是多余的——除非对后来的社会史学家有使用价值：

> 我力图提出的一般结论是，立法的任务是消除对资本积累的全部障碍，从而改善对劳动的**需求**；而劳动的**供给**则和它无关。

然而，就连他的报告也认为，"即使有俄国沙皇那样的权力，"

> 也不可能为处于这种境遇下的工人提高工资……因此，其余需要做的事情全是启发手织工去认识他们真正的处境，劝说他们脱离这个行业，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领进这个行业，就是犯了最残暴的罪。[60]

302 所有这些"处理和沟通"至少产生了两个效果：一是它把织工转变为宪章运动中坚定的"实力派"，二是仅在棉纺织业中，

---

[60] 《下院议事录》和《汉萨议会记录》，随处；《皇家手织工委员会报告》(1840)，第3部分，第590页；A. 布里格斯：《宪章派研究》，第8—9页。

1840年的织工人数就比1830年减少了10万人。不错，菲尔登的提案只可能产生一部分效果，只可能使织工在19世纪30年代面临动力织机越来越强的竞争时“稍微得到一些解脱”，而有可能把大批的半失业工人赶到其他一些工业部门去。我们必须审慎地选用措词，这个措词就是：“稍微得到一些解脱”。但在30年代，这可能意味着生与死之间的差别。1834年，奥斯特勒对议会特别委员会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拖得太久了，我相信时日的拖延已经把成百上千的英国工人送进了坟墓。”兰开郡在10年的时间里减少了10万织工，其中也许只有少数人找到了其他职业，大部分人中，一些是自然死亡，而另一些则是过早地“夭亡”。[61]（有些人要靠进入工厂工作的儿童养活。）而到1834年，那个发现自己没有能力采取任何措施去救济织工的立法机构，却又用济贫法修正案来主动直接地打击他们的生活条件。从19世纪30年代末起，许多地区所依赖的救命稻草，有时以“斯品汉姆兰”比率实行的户外救济形式，（至少在理论上）被“巴士底狱”取代了，其后果完全是灾难性的。如果斯梅尔泽教授去考察一下织工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他就会发现一切济贫方法都不受欢迎，而对马尔萨斯式的济贫院来说，独立和婚姻的价值观念成了绝对的忌讳。新济贫法不仅拒绝给织工及其家庭以救济，把他们终生禁锢在这个行业中，而且实际上还把其他人——例如一些贫穷的爱尔兰人——赶进了这个行业。博尔顿一名平纹布织工对1834年议会委员会说：“看到这样的状况，我决不可能无动于衷”：

---

[61] 见一位名叫W.瓦利的织工写的日记，载于W.贝内特：《伯恩利史》（伯恩利，1948），第3卷，第379—389页；如（1827年2月的日记）：疾病流行猖狂；但愿一切好起来，穷人又冷又湿，饥不果腹，还要辛劳地工作……每家都有两三个孩子被天花和麻疹夺去了生命。

我处在这种环境中，我现在离60岁还差一年，我计算了一下，在8年之间，我自己变成一个贫民，我使尽全部力气也得不到一个先令。我健康的时候需要用尽全部的力气来苟延残喘，……我是作为亲身经历这种环境的人用感情来谈论这个问题的。我看现在的这个济贫法修正案是胁迫穷人的制度，我也很快就要落入它可怕的强制之下。我不会赞同这种东西。我是忠诚的，我忠于我国的制度，爱我的国家。"英国啊，尽管你全错了，但我仍爱你"。这就是我的心里话……。[62]

303

正是在诸如艾什顿(宪章派牧师约瑟夫·雷纳尔·斯蒂文斯在那里发表过煽动性的演说)、托德莫登(菲尔登在那里断然公开反对济贫法)、哈德斯菲尔德和布雷德福等纺织业地区，对济贫法的抵制和反抗最为猛烈、持久和紧张。

进入织工地位下降的第二阶段——与动力织机全面竞争——以后，采取了什么弥补措施呢？克拉潘写道："除了国家设立织工的老年金，立法禁止动力织机或禁止教授手工织布以外，很难看出还有什么有效的办法。"[63] 这些并不是织工们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虽然他们提出抗议，反对……

不加限制地使用(其实是滥用)改进过的和正在继续改进的机器……。

……忽视了为贫穷的爱尔兰人提供就业和生存的机会，他们是被迫为了一片面包而拥入英格兰劳动市场的。

……机器每改进一次，就要使用更多的童工、年轻

---

[62] 同上，1834年，第456—460页。
[63] 克拉潘前引书，第1卷，第552页。

> 工人和妇女，从而把本来应当劳动的人——**成年男子**排斥在外。[64]

这些决议证明，织工对机器做出的反应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不加任何区别。直接毁坏动力织机之举已少见了，除非恰逢经济极端萧条和大批失业的时候（如1812年的西霍顿，1826年的布雷德福）才会发生。从19世纪20年代末以后，织工提出了三项坚定的主张。

首先，他们建议对动力织机征税，以保证平等的竞争条件，可将税收的一部分款项拨作手织工的济贫。我们不应忘记，手工织工不仅本身要交纳济贫税，还要承担沉重的间接税：

> 他们的劳动被动力织机夺走了。他们吃的面包交过税，他们的麦芽酒交过税，他们的糖、茶叶、肥皂以及使用和消费的每件东西也都交过税，而动力织机没有交税。

304

这是1835年利兹毛织品工人的一封信中所说的。[65] 当我们讨论财政问题的细节时，有时会忘记战后税收制度疯狂地剥削的基础以及它的再分配功用，即从穷人手中转移到富人手中。需要课税的其他东西还有砖、蛇麻子、醋、窗、纸、狗、蜡烛、桔子（穷人家孩子的奢侈品）。1832年，国库收入约5000万英镑，主要取自对大众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其中2800万英镑以上用于偿还国债，1300万英镑用于军事，与用于行政机构的35.6万英镑，用于警务的21.7万英镑形成对照。1834年，一位证人向议会特别委员会提供了每位工人一年要承担的赋税量：

---

[64] 《布雷德福·利兹和哈里法克斯等及其附近的手工毛纺工人代表会议的报告和决议》(1835)。

[65] 《利兹时报》，1835年4月25日。

第一项，麦芽酒税4镑11先令3便士；第二项，糖税17先令4便士；第三项，茶税或咖啡税，1镑4先令；第四项，肥皂税，13先令；第五项，房税，12先令；第六项，食品税，3镑；第七项，衣服税，10先令，

每个工人一年承担的赋税为11英镑7先令6便士。假设一位工人每天收入1先令6便士，一年工作300天(许多人就是这样的)，那么他一年的收入为22英镑10先令，这起码可以说明，他收入中的一半到全部被当做税收抽取掉了……因为不管他想干什么，吃、喝、睡，不是要付这样的税就是要付那样的税。[66]

这个税单上所包括的项目极少手工织工能负担得起，连面包都常常包括在内。埃比尼泽·埃利奥特的《谷物法诗集》中有一首写道：

交了面包税的织工们，都能看到
这税款为你做了什么事，
孩子们被领着，无精打采地
为了羞辱的面包而唱着赞美诗，
一直等到每条街道的石头
对他们一双赤裸的小脚都认识。[67]

正因如此，科贝特对债券持有者的攻击立即受到欢迎；正因如此，费格斯·奥康诺在北方发表演说时，"穿平纹布和粗布"的人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奥康诺说：

305

你们以为你们什么也没有付出，错了，一切都是你们支

---

[66] 议会特别委员会关于手织工请愿书的报告，1834年，第293页起。证人R. M. 马丁是《英帝国税收》一书的作者。

[67] E. 埃利奥特：《壮丽的村庄》(1834)，第1卷，第72页。

> 付的。是你们支付了600万到800万的赋税去养活军队。为了什么呢？为了保证税收……。[68]

当然，对动力织机课税并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比课窗税、桔税和碱税更为困难。

另外两个建议，一个与动力织机工厂劳动的时间限制有关，一个是关于成年男子动力织机工人的就业问题。前一项建议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引导许多手工织工支持十小时工作制的宣传。从19世纪30年代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始终阴云不散，工人被骂成“躲在女人裙子背后”，或拿儿童的苦难做幌子提出自己缩短工时的要求。事实上，工厂工人和织工公开宣布了自己的目标；缩短工厂劳动时间将会减轻儿童的劳动，使成人每天的劳动时间得到减少，可以让更多的手工织工和失业者来从事现有的这些工作。这就是他们提出的另一种政治经济学模式的精髓所在。至于第二个问题，当时精纺机基本上是由成年男工人操作的，而大多数动力织机却是由妇女或少年操作的。这样，我们就要来进一步考察手工织工反对工厂制的原因了。

“原因”一词的使用也许不太合适，因为这是两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我们已经看到，早在动力织机出现之前，毛织工就十分憎恨手织机工厂。他们首先不满意工厂的纪律、铃声和汽笛，不满遵守时间，因为它有害于健康，不利于家庭的安排，也不利于对其他职业的选择。威廉·蔡尔德是一名织工帮工，因积极进行1806年“协会”的活动而受迫害，他拒绝进手织机工厂，因为他反对“那种每一小时和每一分钟都按部就班的工作以及那里面所做的种种坏事……”：

> 在家中，一个厚道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工作；而在那里，

---

[68] 《哈里法克斯卫报》，1936年10月8日。

你必须准时到达:5:30,铃声响了,然后,6:00,又响起了第二道铃声,有10分钟时间让大门开着;10分钟过后,大门又关上了,任何人,无论男女和儿童都不让进入。你只能站在门外,或回家去到8:00再来。[69]

在"黄金时代",人们常常可以听到雇主的不满,他们说织工有"神圣的星期一"——有时星期二还放假——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才把工作补足。按照传统,织机在每个星期的头几天以慢吞吞的节奏响着"啪啦—滴嗒、啪啦—滴嗒"[plen-ty of time, plen-ty of time,即时间还多,时间还多之意]。但在周末织机咯咯地响着"啊滴特啦,啊滴特啦"[A day t'lat. A day t'lat,即一天完了,一天完了]。19世纪的织工当中,只有少数人的生活像持有小土地的织工那样多变,18世纪80年代的日记表明,后者只在下雨天纺织,天气晴朗时则做别的活,如赶车、挖渠排水、刈草、制乳酪。[70] 不过,各种各样的营生和活动一直存在到最萧条的年代,他们要养家禽、某些园艺,"假日"或节日活动,甚至花一天时间带着猎狗打猎。有一首诗写道:

喂,你们这些棉织工,快快起床吧,
从早晨到中午,你们得去工厂工作;
你们不能在花园里每天闲荡二三小时,
你们必须听从命令,不停地用梭子织布。[71]

"必须听从命令"——这是他们感到最为不满的侮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布匹的真正制造者(他们的父母还记得当时的棉的或毛的纱都是在家中纺成的)。有一段时间,工厂只被看做是赤

[69] 《毛织业委员会的报告》(1806),第111页及散见各处。

[70] T.W.汉森:《祖父日记》,载《哈里法克斯考古协会通讯》,1916年。

[71] J.哈兰德前引书,第253页。

贫人家孩子的工作地点，即使当这样的偏见消失以后，进工厂就是从自己做主的人（无论他们多么穷困）下降到做仆人和“长工”的地位上。

其次，他们抱怨工厂制对家庭关系造成的影响。即使纺纱已经不再是在家庭中进行，但织布为全家提供了就业。小孩子绕筒子，大一点的孩子看差错，分档投梭，或帮着把梭子投入宽织面。年龄再大的孩子看管第二台或第三台织机，妻子轮换着在织机上织布，或做家务。全家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吃的无论多么差，至少可以按自己选择的时间坐下来吃饭。以织布作坊为中心的家庭和社区的整个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了，他们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谈天或唱歌。只为儿童提供就业的纺纱厂和只雇女工和少年的动力织布厂一直受到抵制，直到贫穷挫败了他们的抵抗能力。这些地方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充满了性放纵、说脏话、残暴、斗殴、格格不入的举止等。[72] 证人们向议会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反对工厂的看法：

307

> ……谁都不喜欢在动力织机旁工作，实际上也不喜欢动力织机，它的喀嗒声和吵闹声简直让人发疯。其次，工厂要遵守手织工从来不愿遵守的纪律。
>
> ……所有在动力织机旁工作的人都是被迫的，因为他们舍此没有别的生存办法。他们都是全家遭受苦难的人，他们自己的经营破产了……他们恰似小小的殖民地被遣去拓殖那些棉纺厂。……

曼彻斯特有一位证人，他的儿子在工厂的一次事故中丧生。他

---

[72] 1823年，曼彻斯特的织工们说：“工厂生活的罪恶是数不胜数的，无知和放纵的男女青年混杂在一起，没有父母的监督。高温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思想受到腐蚀，生命和肢体受到机器的威胁，在那里长大的人40岁时的体格就像60岁的人……”（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300页）。

说：

> 我已有7个男孩，但即使我有77个男孩也决不会再把其中的任何一个送进棉纺织厂。……我最为反对的事情是那里的道德极其极其败坏……在工厂里，他们必须从早晨6点工作到晚上8点，结果没有时间受教育……也没有他们应当学习的好榜样。……

"按照我个人的想法，既然他们发明了机器取代人力劳动，他们也必须找到用铁做成的汉子去管理。"[73]

最后，我们不能个别地看待这些反对意见，而要把它们看做是社区"价值观念体系"的反映。这的确可能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宝贵资料，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是个"多元的社会"，工厂区、纺织区和农业区各有自己不同的传统、规矩和期望，相互撞击着。在某种程度上，1815至1840年的历史是前两者汇合在一起的历史，汇合在共同的政治鼓动中(激进主义、308 1832年议会改革、欧文主义、十小时工作制运动、宪章运动)；而宪章运动的最后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它们之间艰难的共存和最后的解体的历史。在曼彻斯特或利兹等大城市，手工织工有工匠的许多传统，与他们通婚，很早就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工厂，因此，与工匠的差别最不明显。在山区的村庄中，亲族特征则较强，他们看不起"城里人"，说他们"讨厌而无聊"。[74] 像萨德尔沃思、克利特罗、考尔德河上游等地区，住在山腰的织工与河谷下的纺织厂长期地不发生联系，他们培养自己的子女来顶替他们在织机旁工作。

---

[73] 《议会特别委员会关于手工织工请愿书的报告》(1834)，第428页(5473号)、440页(5618号)、189页(2643—2646号)。

[74] 埃德温·沃：《兰开郡概况》(1869)，第128页。

以后，当然是在19世纪30年代，我们开始说到了“垂死的”职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本身的社会保守主义而葬送了自己。但是，即使在那些织工们俯首听命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皇家委员会向他们发出“脱离这个行业”的劝告仍旧是文不对题的，孩子们可以在工厂里找到工作，正在成长的姑娘也转到了动力织机旁去工作。有一首诗歌说：

如果你进入织机房，那里有三四套织机，
他们都停着不动，只不过是房子里的点缀。
如果你要问这是为什么，年长的妈妈会坦率
地对你说，
我的女儿们抛弃了它们，去用蒸汽织布啦。[75]

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总是存在。在许多纺织厂，纺纱工人和原来在那里工作的工人，有优先安排自己的子女的特权。而发生了这种情况的地方，织工靠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生活，这就增强了他们的羞愧感，传统的角色以强制和受侮辱的方式被颠倒过来了。

我们还必须记住，在早期的工厂里，成年工人与少年工之间缺乏平衡。19世纪30年代初，棉纺织厂工人（从事各类劳动）有1/3到一半是在21岁以下的。在毛纺业中，少年工占的比例却高得多，在成年工人中，妇女占了一半以上。尤尔牧师根据1834年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做出的估计是：英国纺织厂的成年劳动力总数为191671人，其中102812人是女工，男工只有88859人。[76] 男性就业模式非常清楚： 309

---

[75] J.哈兰德前引书，第253页。

[76] A.尤尔：《制造业哲学》(1835)，第481页；J.詹姆斯：《毛纺制造业史》，第619—620页；《布雷德福史续篇》(1866)，第227页。各种报告对少年工数量的估计往往偏低。

在兰开郡的棉纺织厂，男性工人就业量最大的那个年龄期内，即11岁到16岁其平均工资为每周4先令$10\frac{3}{4}$个便士，在以后的5年里，即16岁至21岁，周平均工资上升到10先令2.5个便士，当然，工厂主要尽可能减少领取这种工资的人……。在此以后的5年期，从21岁到26岁周平均工资为17先令2个半便士。因此，只要情况允许，工厂主就会进一步削减男性工人，这种动机是更强烈了。在后来的两个5年期内，平均工资继续上升到20先令4个半便士和22先令8个半便士。只有在需要强壮的体力，或高超的技术，在某种艺术工艺或密传的工作中……或是受到重用和信任的从事办公室工作的男子才能受雇，拿到这样的工资。[77]

在这样的就业模式中有极其明显而又非常重要的两点需要加以说明。第一点已经同"不体面"行业联系起来了。即在我们的心里，不能武断地把工厂里的"高"工资同"过时"行业中的低工资截然分开。在以"只要情况允许"工厂主就会削减成年男工为基础的制度下，工厂技术工人的工资与16至21岁时被工厂解雇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当然，在呢绒纺织业中，十几岁就被工厂解雇的童工有时被迫回到手工织机上去。第二，对于成年男手工织工来说，即使困难的处境迫使他们丢掉了成见，他们在工厂就业的机会也不比农业工人多。他们很难适应工厂的工作。他们既没有"强壮的体力"，又没有工厂所需的工艺技能。1835年，最善良的工厂主之一的约翰·菲尔登回忆说：

---

[77] 尤尔前引书，第474页。

每个星期都有几十名手工织工来向我申请工作，他们的处境使他们无法生存下去了，不得不寻找这样的工作。我和我的合伙人……不得不拒绝许多要求工作的人，因此心中总觉不安。[78]

19世纪30年代初，兰开郡工匠行业中的工资按理说是比较高的，例如铸铁匠、机械匠、鞋匠、裁缝和技术建筑工人的工资从15先令到25先令不等（机械匠的工资更高）。但是这样的工资 310 是靠结社的力量取得的。他们结社的目的之一是坚持要求把工厂开除的年轻工人和手工织工排除在外。如果织工有可能改行——或让他们的儿子当学徒，转到别的任何工匠行业上去，社会保守主义是不会阻止这样做的。一些完全可以理解的成见对非技术劳动很不利，即把这类工作看做是社会地位的完全丧失。格林菲尔特的琼"在痛苦至极"的时候宣称：

我要丢掉这个行当，去用铁锹进行工作，

或者到公路上去做碎石的工作……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问题。曼彻斯特一个丝织工人曾向下院详述劳动价值论的精华，但却无法转行变成搬运工人（工资为14先令到15先令）。织工的体力难以承担沉重的非技术劳动（砌砖工人和挖掘工人的工资为10先令到12先令），也竞争不过比他们强壮又愿拿较低工资而工作的爱尔兰工人。[79] 大城市的织工无疑可以找到其他各种各样报酬很低的临时工作，而农村的中年织工却无法举家迁居：

变化的可怕后果……一直挂在老年手织工的心上。我

---

[78] J.菲尔登：《工厂制灾祸》（1836），第68页。

[79] 这里提到的工资数额摘自1832年曼彻斯特商业工会的平均工资表，见《济贫法委员会第一份年度报告》（1836），第331页；《英国年鉴》（1834），第31—61页。

们亲眼看到帕德西的一名老织工含着眼泪……数说他的织机如何好。哦，不错，它曾经挂在梁子上，如同一切织机挂在梁子上一样；它来回摆动，如同一切织机来回摆动一般；跑过去的部分很容易再跑回来，很自在地进行工作；它可以收进任何数量的纬线，不管它有多长。当初它从英国某个最好的制造人手中买回来时……邻居们都来观赏，赞不绝口，也想买一架。可是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架和另一架织机……都悄无声息了，上面蒙满了灰尘和蜘蛛网。……[80]

手工织工的历史在许多方面深深触及了工业革命期间生活水平的普遍问题。在最初的若干阶段上，显然为"乐观派"提供了证据，例如纺纱厂的成倍增加，吸收了成千上万的外作工人，311 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等等。但是，随着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地位和自卫能力却下降了。从1800到1840年的记录几乎摆脱不了"悲观派"。如果我们不从"未来学"的角度，而是从经历过那个时期的几代人的角度来衡量生活水平，我们定会看到，织工作为一个群体不但没有"分享"经济进步带来的"益处"，反而承受了急剧的衰落。由于纺织业是工业革命中的支柱，而且成年织布工人远远多于成年纺纱工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叙述那个时代的经历如同其他角度一样有效。也许是出于大事宣扬的风格之故，习惯的描述都集中在增长的东西上(精纺机、工厂和蒸汽)，因此，我们也就考查了成倍增长着的劳动者。

当然，"乐观派"是承认织工的苦境的；但他们的陈述都带着些保留语句，除了"少数极为不幸的那部分人例如手工织工"，"繁荣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或者"技术方面的就业不足造成的小

[80] J.劳森：《帕德西的发展》，第89—90页。

小的影响"[81] 等等。但克拉潘十分清楚，在 19 世纪 40 年代末以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织工说成为一"小"群。在英国，织工曾经是，也许在几百年的时间内一直是最大的一个产业工人群体，他们是我国主要工业的耕耘者。在 1820 到 1840 年之间，他们在人数上仅次于农业工人和家庭仆人，占职业人数的第三位，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其他任何产业工人群体。"对它们〔指联合王国的织机数量〕虽从未普查，但决不可能少于 50 万也许还要多得多。"[82] 据估计，联合王国的棉、毛、丝、亚麻等纺织业和一些专门行业如织带业中的织机(但不含纬编)曾一度增加到 74 万台。不过，许多家庭可能有 2 台、3 台甚至 4 台织机。1834 至 1835 年的议会特别委员会估计，有 80 至 84 万人(织工及其家庭)完全靠织机生活，这个数字比较接近我们的估计。

在陈腐的意识形态中，有一种长期存在的关于自由的神话，认为立法机构应该无所作为，让"自然的"经济力量去打击社会的某一部分，这可以构成完整的自卫能力。动力织机为国家和 312 雇主提供了铁一般的证据。但是，我们从织工的事情中也可以认为，它反映了工业革命中存在的一种极为反常的状态。在织工的历史中，我们还看到了对那一部分没有工会保护的工人进行压迫和剥削的制度的范例。政府不仅积极干预他们的政治组织和工会，而且用资本自由的消极信条来打击织工，就像他们用这样的信条无情地打击爱尔兰饥馑的受害者一样。

这种信条的幽灵，今天仍在四处游荡。艾什顿教授叹息金融的因素耽误了对动力织机的投资。他说：

---

[81] 克拉潘：《经济史》，第 1 卷，第 565 页；F. A. 哈耶克的文章，载《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第 28 页；哈特韦尔：《英国生活水平的提高，1800—1850》，载《经济史评论》，第 2 集，第 13 卷(1961 年 4 月)。

[82] 克拉潘前引书，第 1 卷，第 179 页。

人们有时认为,工业革命的"罪恶"产生于它速度快而能持续,但家庭纺织业工人的状况却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如果在织布技术方面早已有个阿克莱特式的人,[83]如果利率保持在低水平上,如果没有移民,也没有济贫法,那么向工厂的转变也许会更快一些,经受的痛苦也会小一些。事实上,大批的手工织工何止是一代人在不断地进行着反对蒸汽动力的徒劳的战斗。[84]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对于动力织机雇主们说来,这却非"战斗",而不过是最最方便地拥有廉价劳动,作为在繁荣时期的一种贮备和压低管理动力织机的女工和女童的工资(1832年曼彻斯特为8先令至12先令)的一种手段而已。此外,并不是没有"向工厂的转变",如果动力的使用比实际上还要更快,它的后果(其他一切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就会更具灾难性。

在铁路时代来到之前,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发明确实取代了成年技术工人(冶铁工业例外)。有些经济史学家(也许因为隐藏在心中有一种把人类进步和经济增长等同起来的"进步主义"的思想之故)看来并不愿正视这一明显的事实。这种被排挤出去的劳动力遂为全凭人体肌肉并且耗费时间的艰苦工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在矿井、码头、制砖场、煤气厂、建筑 313 工地、运河开凿和铁路修建、货车运输和搬运等工地上很少或根本没有机械化。煤炭仍然靠人背负着,从长长的跳板梯运进船的货舱。在19世纪30年代的伯明翰,人们仍然可以以一天1先令的工资,受雇并用手推车运送砂石到9英里远的地方,然后推着空车再走9英里回来。1832年的工资在机械师(26至30

---

[83] 理查德·阿克莱特(1732—1792),英国纺织机发明人。——译注

[84] T.S.艾什顿:《工业革命》,第117页。

先令)或木工(24 先令)同挖掘工人(10 至 15 先令)或织工(约 8 先令)之间的差别就是如此悬殊,我们不能听任社会保守主义的独家解释,它说技术性的行业才是例外,而非技术的体力劳动和外作业远不是什么"特别不幸",它是雇主、立法者和意识形态专家精心设计出来,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降低体力劳动工资的一种制度的基本特征。在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的时候,织工大量过剩这个事实就是一种明证。马克思曾经写道,外作工业中的剥削"更加无耻","因为在这些被现代工业和农业造成的大量'剩余'群众的最后一个生存手段中,为工作而竞争达到了顶点。"[65]

当然,有一种"未来学"的论点值得注意,经历了苦难时代而后来有所好转的许多工人实际上采纳了这样的论点。无论在这个转变中如何充满了痛苦,有这样一位工人却说:

> ……使用动力织机的工人无须买织机和珍妮纺纱机为他们纺纱,他不必购买筒管、浅篮和筐篓,不必付房租和税,不用买蜡烛或煤气或煤来点灯并给车间供暖。他们不必付修理费,损耗费,……不用购买织梭,清棉机、工具箱、工作柜、打梭棒、梭盘和头经纱、梭子……他们不必在踏板和座板上支撑着身子……或不必裹紧护腕以增强腕力……他们不用取头道粗纱、绕他们的经网、叠布边,上浆并把网拿出去晾干,找传送装置,固定匹头、拉幅、翻覆、喷湿并折叠布匹,而他们最不会想到的是揉毛、洗毛和染毛,这一切也都是不拿钱的。[66]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看手工织工的劳动,那显然是痛苦和

---

[65] 《资本论》(1938),第 465 页(参见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12 月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06 页,"工厂制度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中的内容。——译注

[66] J. 劳森前引书,第 91 页。

过时的，无论有多么大的苦难，转变都是有道理的。但这样一种论点是用未来的收益去轻视一代人所经受的痛苦。对于受尽苦难的人们来说，这种回顾的欣慰却是令人心寒的。

第十章　生活水平和经历

314

1. 生活品

如果从探讨那种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的假定的平均工人的工资水平，转向对食品、衣服、住宅等消费品乃至健康和道德状况的注意，那么，有关工业革命期间生活水平的争论也许就会有最高的价值。这场争论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是复杂的，这里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对无休止的讨论做一个评价。当我们考虑用量化方法来衡量时，1790 至 1840 年之间国民产值的增长大于人口的增长，这似乎没有任何疑问。但是，最困难的问题是讨论国民产值如何进行分配。即使我们将其他的因素(例如，由于不利的贸易条约，国民产值的增长中有多大的比例供出口；其中有多少进入投资，而不是进入个人的消费品等)暂时搁置在一旁，也很难发现人口中的不同部分所分享的份额各占多少。

有关工业革命期间人民的饮食水平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粮食、肉类、土豆、啤酒、糖和茶叶等食品的消费上。从 18 世纪后期到 19 世纪前 40 年，小麦的人均消费量可能有所下降。专门研究土豆的历史学家萨拉曼博士极为详细地叙述了“面包圈之战”，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地主、农场主、教区牧师、工厂主和政府通过“面包圈之战”竭力把小麦从劳工的餐桌上夺走，让土豆变成他们的主食，其中关键的年份是 1795 年。此后，人们又把战争的需要作为第二条理由来论证让穷人吃廉价的基本食品是大有益处的。战争时期土豆种植面积的增加不能完全归

因于小麦短缺。"小麦的短缺确实存在;但是,由于价格的上涨而引起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不平等的承担份额则更是一个潜在因素……。"英国的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北方,到1790年,已从食用粗粮转变为食用小麦,他们自豪地以白面包当作自己社会地位的象征。南方农村的劳动者即使濒临饥饿的边缘,也拒绝放弃以面包和奶酪为主食的饮食习惯。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饮食上的阶级战争不断发生,在南方,土豆渗入了面包,在北方,燕麦和土豆渗入了面包。哈勒维发现卫斯理宗起着稳定社会的作用,而萨拉曼博士却发现土豆的作用更为有效。他写道:

> ……土豆的使用真正使工人能够尽可能地靠最低工资生存下去。土豆很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把英国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恶化和退步又延长和推动了100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选择吗?只有流血革命。英国之所以在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避免了这样的暴力动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土豆。[①]

营养学专家现在告诫我们,土豆有充分的营养。当生活水平的提高足以使土豆成为辅助食品,使饮食实现多样化时,土豆无疑有很大的好处。但是,用土豆代替面包和燕麦粥却使人们感到是个退步。爱尔兰移民以土豆为主食(埃比尼泽·埃利奥特把他们叫做"爱尔兰吃根的游牧民")就是有力的证明。许多英国人都同意科贝特的说法,即穷人是一场要把他们降低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上的阴谋的受害者。在整个工业革命期间,面包(和燕麦食品)的价格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第一项指数。

① R.N.萨拉曼:《土豆的历史和社会影响》(剑桥,1949),第480、495、506、541—542页。J.C.德拉蒙德和A.威尔布里厄姆这两位历史学家在《英国人的食品》(1939)中也把这个时期看做是衰落的时期。

1815年通过谷物法时，议会不得不调动军队防备群众。在彼德卢广场，最鲜明的旗帜就是“不要谷物法”；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反谷物法请愿斗争（尤其是在兰开郡），情况仍旧是这样。

像小麦一样，在饮食的价值观念中，肉类也含有社会地位的情结。古老英国的烤牛排可让手工工匠引以为骄傲，也是劳工所期望的。在1790至1840年间，肉类的人均消费量可能也下降了；但在下降的数量上有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伦敦屠宰场 316 宰杀的肉畜的数量和质量上。但是，即使这些数字确定了，我们也无法肯定是哪一部分人吃肉，他们占多大的比例。肉类当然是衡量物质水平的一个敏感的指标，因为实际工资一俟升高，购买的第一批商品中就会有肉类。季节工对52个星期日的主餐并不省俭细算，相反只要他有充分的工作就很会花钱，并在一年的其他时间里寻找机会。有人对亨利·梅休说：

> 在漫长而晴朗的夏日，勤劳的制砖工家的小女儿会到肉铺去买排骨和其他美食，她会说：“先生，爸爸现在不计较价格，但他一定要好排骨。要剁整齐的排骨。先生，嫩一点，因为他是制砖工人。”在冬天，她只能说：“啊，先生，我只有4个便士，你得给爸爸切一块便宜一点的肉。他不计较什么肉，只要便宜就行。现在是冬天，他没有工做，先生，因为他是制砖工人。”[②]

一般说来，伦敦工人的期待值比外省工人高一些。在1812年严重的经济萧条时期，一位观察者得到这样的印象：伦敦穷人的日子比北部和西部穷人的日子过得好一些：

> 首都穷人的生活实际上比较舒适，尽管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高得很。在那里，最低微的劳工也常常吃肉（鲜

② 梅休前引书，第2卷，第368页。

肉),餐餐有面包、奶酪,还有某种啤酒。西部的农民却
不可能给家里弄到这样的食物。[3]

当然,那里也会出售各式各样的低档"荤食",例如熏鲱鱼和熏青鱼、牛蹄、羊脚、猪耳朵、烤肝、牛肚和黑香肠等。兰开郡的农村织工看不起城镇的食物,他们喜欢吃"用刀刚刚割下来的东西。"这句话既反映了他们自己仍在养猪,也反映了他们怀疑城镇的肉染病了。如果不得不在城镇里吃东西,那么"每一口都伴随着痛苦的思考,他在想这四只脚的畜牲活着时是什么东西,它为什么要活生生地死去"。[4] 城镇居民吃的是不洁的掺假的食品,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随着城市工人比例的增长,这种事变得更糟。[5]

317

啤酒的人均消费量在1800到1830年之间下降了,茶叶和糖的人均消费量都上升了,这一点没有疑问;而在1820至1840年之间,白酒和威士忌的消费量有显著的增加。再一次证明这既是个饮食问题也是个文化问题。在农业工人,卸煤工人和矿工看来,啤酒是任何重体力劳动者不可缺少的饮料(用来"收收汗的"),在北方一部分地区,啤酒和"饮料"指的是同一回事。家酿酒是家庭经济中的必需品,因此"如果一位青年妇女能烤燕麦饼和酿制好酒,她就会成为一名好妻子";一些"卫斯理宗小组领导人说,不喝'一大罐'饮料,他们就无法领导小组"。[6] 啤酒税是造成啤酒消费量降低的主要原因。这种税目最不得人心,当时甚至有人认为这项税收会引起一场革命。1812年,汉普郡的

③ 《观察家报》,1812年8月16日。

④ E.沃:《兰开郡概貌》,第128—129页。

⑤ 见J.伯内特:《英国19世纪食品掺假的历史》,载《历史研究所公报》,1959年,第104—107页。

⑥ J.劳森前引书,第8、10页。

一名牧师兼职地方官说，只要取消啤酒税，

> 劳工们就会高高兴兴地去做工，拼命地把活干好，并且变得忠于家庭，**尤其是**会忠于国家。因为国家允许他和上级一道分享这种大众饮料。的确，穷人希望英国议会有可能给予他们的就是这个东西。[⑦]

对度数高的啤酒征收的附加税引起了普遍逃税的现象，到处都有“地下酒店”。有一次，塞缪尔·班福德被酒店里的人怀疑是税收官员，几乎把它杀死，幸好有一个酒客认出他是“正在逃亡”的善良的激进派分子。

收税的结果无疑大大地减少了家庭酿酒和家庭饮酒的量，同时也使日常餐桌上的饮料越来越少，酒成了家庭之外活动时的主要饮料。(1830年取消了对度数高的啤酒的征税并通过啤酒法案，5年之内，有35000家啤酒店就像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一样，遍布各地。)饮茶量的增加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代替啤酒或者牛奶，当时有许多人——以科贝特为核心——认为这个现象再一次证明生活水平下降了。茶被看做一种蹩脚的代用品，(与白酒消费量的增加一起)反映了因劳动时间过长和饮食不足而需要刺激物。到1830年，茶叶也被当作生活必需品，穷得买不起茶叶的家庭往往向邻居购买煮过一次的茶叶，甚至把沸水倒入烧焦的干面包来冒充红茶颜色。[⑧] 318

总之，这些记载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工业革命的50年里，工人阶级从国民产值中分享的份额相对于有产阶级和职业者阶级所享有的份额来说，肯定是下降了。关于工人阶级的种

---

⑦ 《英王国的农业状况》(1816)，第95页。

⑧ 要了解此处论及的某些问题，参见前面提及的T.A.艾什顿、R.M.哈特韦尔、E.霍布斯鲍姆和A.J.泰勒的有关生活水平的各篇文章。

种证据都说明，在国民财富增加了的同时，“平均的”工人却仍然在接近于维持生存的水平上生活。财富的大部分明显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却又以同样明显的方式落到了雇主的手中。用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种现象在人们的感觉中十分酷似生活水平的下降。他们在“经济进步的益处”中所能分享到的东西是更多的土豆，为家庭弄到了一些棉织衣物、肥皂、蜡烛、一些茶叶和糖，还有《经济史评论》上的大量文章。

2. 住　家

有关城市环境的证据也不太容易讲清楚。18 世纪末有一些农场工人全家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小房子内，潮湿，地面低于地平面。50 年以后，这种情况少了一点。尽管在成长中的工业城镇，人们对事先未经过设计而且往往偷工减料牟取暴利的建筑物议论颇多；但是这些房屋比起许多从农村迁移来的人们原来习惯居住的房屋还是好了一些。但是，随着工业城镇逐渐陈旧，供水、卫生和过分拥挤的问题以及把住宅当做生产场所用的问题都成倍地增加，以致我们最终看到 19 世纪 40 年代对住宅和卫生进行的调查揭示了那些令人惊讶的状况。不错，农业村庄和织工村庄的状况可能同普雷斯顿和利兹的状况同样糟糕。但是，大城镇里的问题范围更大，成堆的环境问题加速了疾病的传播。

319 此外，大城镇的状况——至少令人感到更加讨厌和不方便。村庄从井里打水，井又靠近坟地，可能是不清洁的，但村民们至少可以不必到晚上去取水并到几条街合用的惟一的水压汲水龙头前排队等候；村庄里还不必付水费。工业城镇的居民往往无法避开工业废料臭味和阴沟，他们的孩子只能在垃圾和阴沟旁边玩耍。北部和中部工业地区的证据说明这种环境毕竟至今仍

然存在。

城市环境的恶化是工业革命最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之一，无论是从美学的角度，从社区环境的角度，还是从卫生条件和人口密度的角度来看都是这样，这不仅使当时的人们感到惊愕，也使我们今天的人感到震惊。此外，在一些“高工资”地区，这样的状况更为严重，而“乐观派”用来证明生活水平有所改善的证据，就是从这些地区汲取的。常理告诉我们应当把这两类证据结合起来考虑。但是，实际上他们却提出了各式各样令人宽慰的结论。一些主张改良的工厂主对雇工的住宅条件加以关心，这些事例也许会让我们更多地思考人类的本性。但是，这样做仅仅触及了问题的皮毛，就像值得称赞的慈善医院对死亡率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一样。从 1840 年以后或者从 1842 年以后，1842 年关于城镇健康状况的调查引起舆论哗然，1831 年和 1848 年的霍乱又引起舆论的警觉，大多数认真的模范社区的试验（除新拉纳克之外）就是自此以后才开始的。1840 年以前的那些试验，如阿什沃恩在图尔顿的试验，则是在自给自足的纺织村庄中进行的。

有人说，正在恶化的环境之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因为它不是谁的过错，尤其不是“资本家”的过错，在这里找不到谁是“坏蛋”。一些质量较差的房屋是由小包工或小投机商人，甚至是由独立经营的建筑工人建造的。设菲尔德的一位调查者谴责了地主、（放高利贷的）小资本家和“只拥有几百英镑”的进行 320 小型投机活动的建筑工人，其中有些人“实际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9] 对波罗的海地区进口的木材、砖、瓦、石板等一直课以关税，艾什顿教授可以为所有这些指责开脱罪责，他说：“应该

[9] G.C.霍兰：《设菲尔德人口变动统计》(1843)，第 56—58 页。

强调指出：机器、工业革命，甚至投机的砌砖工人和木匠都没有错。”[10] 事实可能就是这样：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就像一句大家知道的谚语所说的：每只跳蚤身上“都有一批小跳蚤在吸它的血”。19 世纪 20 年代当兰开郡许多织工拒付房租时，据说有些农舍的东家也被迫去靠救济生活。在大城镇的贫民窟里，有些酒店老板和小店主往往是人口拥挤的“牲口棚”，即用碾碎的灰浆搭起来的最坏的房屋的主人。但是，这丝毫不能缓和实际的困境，而对于责任由谁分担的争论也不能为某些人掠夺穷人开脱罪责。

另一种比较有价值的说法是，它强调改善的程度：在一些较古老的城镇里，街道、路灯、下水道和清理贫民区可能从 18 世纪就开始的。但是，拿常提到的伦敦为例，到底市中心的改善是否扩大到了东区和码头地区，到底在战争期间，这样的改善在多大的程度上保持下去了，却谁都弄不明白。公共卫生改革家索斯伍德·史密斯医生对 1839 年伦敦的状况所做的报告说：

> 尽管做出了系统的努力，……在富有者阶级居住的地区大规模地拓宽街道，……扩大和完善排水和下水道工程，但是，在穷人居住的地区并没有做任何改善的事。[11]

东区的状况如此有毒有害，以至医生和教区官员们在他们任职期内都冒着生命的危险。此外正像哈蒙德夫妇所指出的，正是 321 在工业革命中繁荣起来的市镇里，环境状况最为糟糕，“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兰开郡经历的痛苦就是当年伦敦（在商业革命

---

⑩ 《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第 43—51 页。

⑪ 《济贫法委员会的第五份年度报告》(1839)，第 170 页，又见《第四份年度报告》，附录 A，第 1 号。

中)所经历过的那种痛苦。”[12] 设菲尔德这古老的比较繁荣的城镇,技术工匠占较大人口比例。19世纪上半叶,尽管在那里也建造偷工减料的房屋,但是可以肯定,其住宅状况有所改善。在1840年,每所房屋里平均居住5人;大多数工匠租一幢小住宅,包括一个休息室和两间卧室。而在纺织地区,在像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普雷斯顿、博尔顿和布雷德福等爱尔兰移民最多的城镇,住房条件极端恶化的证据也最充分,比如,拥挤密度太高,有些人住在地窖里,肮脏得难以言状等等。[13]

最后,有人唠唠叨叨地反复表示,贫民窟、发臭的河流、自然的破坏以及建筑方面的丑闻都情有可原,因为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太混乱,在人口急剧增加的压力下,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先例可循。“造成苦难的原因往往是无知而不是贪婪。”[14] 实际上,这两种原因同时存在着,事实还证明,这两个原因中没有哪个比另一个更可原谅。这种观点中只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多数的大城镇里,医生和卫生条件改良家,边沁派和宪章派,都曾反复地为改善环境进行斗争,反对有产者的无动于衷,反对关于所谓“廉洁政府”的纳税人的蛊惑宣传。到这时,工人实际上已被隔离在臭气冲天的圈地上,而中等阶级则尽量远离工业城市,远到马拉交通感到方便的程度,从而反映了他们对工业城镇的真正看法。就是在建筑状况比较好的设菲尔德,

---

[12] 见M.D.乔治:《18世纪伦敦的生活》,第2章;《转变中的英国》(企鹅版),第72页;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3章及第2版前言;R.威兰医生:《论伦敦的疾病》,载《医学与健康杂志》(1800),第299页。

[13] G.C.霍兰前引书,第46页起;关于19世纪中叶利兹工人的城市环境,最好的描述见J.F.C.哈里森:《学习和生活》(1961),第7—20页。

[14] 哈特韦尔前引书,第413页。

除了工匠和贪得无厌的店主外，所有的阶级都被乡村的舒适和恬静所吸引，律师、工厂主、杂货商、布商、鞋匠和裁缝，都在风景美丽的地区安下了他们的住宅……。

322 1841年，设菲尔德的66名律师中，有41名居住在乡间，其余的25名律师，有10名是刚进城的新手。在曼彻斯特，穷人住在大院和地下室，

周围是高大的仓库、工厂、商店和生产设施，不被阶层高的人所见；他们富有的邻居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奇塔姆、布罗顿和肖尔顿，对他们的了解并不比对居住在新西兰或坎查塔的人了解得更多一些。

“富人看不见穷人，或者说，只有当流浪者、乞食者和犯罪少年逼上门来，他们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才认识他们。”“有一句谚语说：‘世界上有一半人不知道另一半人如何生活。’我们可以把这句谚语改成：‘世界上有一半人不管另一半人如何生活。’阿德威克人对安柯特斯人的了解并不比对中国人的了解更多一些。……”[15]

当然，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在工业区的集中，会给任何社会带来大问题，尤其给那个以追求利润、敌视计划为其理论基础的社会更是如此。我们应当把这些看做是工业化固有的问题，但由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它就变得更加严重。不管对这些问题下什么定义，这些定义都不外乎对同一事实做不同的描述或解释。任何对1800至1840年工业胜地的考察都不会置满目疮痍和破坏自然景观的事实于不顾，到改建巴

---

[15] G.C.霍兰前引书，第51页；W.库克·泰勒：《兰开郡工业地区旅行札记》(1842)，第12—13、160页。

思的下一个世纪，人们就既不缺乏美感，也不忽视政府的责任了。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在这两点上都退步了，至少留下了一个严峻的教训，即不打算把这些对生活的理想扩大到工人当中去。不管大城镇中穷人的状况在1750年以前是多么地令人心惊，但在先前的几个世纪里，这些城镇一般都有某种市政的价值观念和建筑的美，达到了职业、市场和工厂之间的某种平衡，带有多样化的意识。“焦炭区城镇”就是第一批人口超过一万人的市镇，也是专心注重工作和“实情”的市镇。

3. 生　活

健康和寿命的问题更难讲得明白。直到最近都广为承认，1780至1820年英国人口“爆炸”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的下降，323 特别是新生儿死亡率的下降。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医学知识的进步，营养(土豆)、卫生(肥皂和棉布衬衣)、供水或住房状况的改善的结果。但是，这个论点现在完全引起了怀疑。人口“爆炸”可以看做是全欧洲的现象，同时并举地发生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和爱尔兰，虽然这些原因在各地发挥作用的程度并不相同。其次，人口学家现在对公认的证据提出抗议，提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论点，强调造成人口“爆炸”的因素主要不是死亡率的下降，而是出生率的上升。[16]

即使我们接受克劳斯博士的观点，也就是说1781年以后出生率上升了，而1831年以后下降了，而且“死亡率没有重大的变化”，这也并不等于提供了证据来说明工人阶级的健康改善了，

[16] 尤见J.T.克劳斯：《1781—1851年英国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载《经济史评论》，第2集，第11卷，第1期(1958年8月)；《英国工业革命中某些被忽视的因素》，载《经济史杂志》，第19卷，1959年12月4日。

寿命提高了。有趣的是，1821年，生育率（每1000名育龄妇女中4岁以下儿童的数目）最高的地区首先是工业革命的腹地（兰开郡、约克郡西区、柴郡、斯塔福德郡），其次是受打击最严重的南方的一些"济贫法郡"。这一事实似乎证实了马尔萨斯的论点：斯品汉姆兰救济制度和工厂就业的机会增多（包括童工）提高了出生率。这种观点在当时非常流行，却遭到了科贝特的反对。我们不必假定父母在有意地决定多生子女以便增加赚钱的人数或有理由领取济贫金。解释生育率的上升，可以有种种理由，比如社区生活和家庭生活传统方式的崩溃（斯品汉姆兰制度和工厂都可能削弱对早婚和"草率"结婚的禁忌），"寄宿"农场工人和学徒的减少，战争的影响，向新兴市镇的集中，生育力最强者的遗传选择等等。此外，出生率的上升决不能用来当做生活水平提高的证据。[17] 最穷的工人和最"草率"结婚的工人占家庭数量中的大多数，这正是19世纪的观察家大讲特讲的主题。在爱尔兰，大饥荒的残酷经历改变了爱尔兰农民生活中的整个婚姻模式。[18]

这些讨论太复杂了，最好还是暂时给人口学家去议论。但是，我们已经到了需要用新的观点去看待证据的时候，这些证据习惯上是以假定死亡率下降来解释的。医学的进步似乎在1800年以前并没有对工人阶级的寿命产生太大影响。18世纪中叶，伦敦和其他一些较古老的"工匠"市镇中，死亡率下降，原因是喝酒减少以及早期努力改善卫生条件和开导工作的功效，这却是可能的。"人口爆炸"可能开始于18世纪中叶，主要原因

---

⑰ 见J.T.克劳斯：《当代历史人口学著作的某些含义》，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1卷，第2期，1959年1月。

⑱ K.H.康内尔：《土地立法和爱尔兰的社会生活》，载《经济史评论》，第11卷，1958年8月1日。

是流行疾病的减少，那是由“人类无法控制的毒性和抗毒性方面发生变化”而造成的。[19] 最初的人口增长是受长期农业丰收和最初的(不是以后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改善这两者的激励所致。随着工业革命的速度不断加快，随着迅速兴起的大城镇里人口拥挤道德败坏的现象成为典型的现象，而且又加入了大量无家可归的移民，城市人口的健康状况也发生了严重恶化。在 19 世纪的头三四十年中，新兴工业城镇和农业地区的新生儿死亡率非常高——但有时却比农村更上升一倍之多。利兹的特纳·撒克拉医生说：“大城市的居民当中完全健康的人不到 10%。”[20] 当时还有大量的文字证据说明工人阶级的疾病发生率、营养不良、新生儿死亡率和职业病的状况，它们有时自相矛盾，特别是关于工厂童工的后果问题。因为鼓吹十小时工作制法案的运动在 19 世纪 30 年代达到最高潮时，医生们往往是从另一面的陈述加以论证的。不过，“乐观派”历史学家把医生那些有利于改革派要求的证据斥为“有偏见”，同时又把支持雇主一方的医学证据当作“客观”和权威而加以接受。这种倾向现在应当结束了。[21] 325

《中央注册处处长的第一份报告》(1839)证明，死亡总人数

---

⑲ T.麦克昂和 R.G.布朗：《有关英国 18 世纪人口变化的医学证据》，载《人口研究》，1955 年 11 月。又见 J.H.哈巴卡克：《18 世纪的英国人口》，载《经济史评论》，第 6 卷，第 2 期，1953 年；G.基特森·克拉克：《维多利亚英国的形成》(1962)，第 3 章。关于某地区的经济和人口数据的深入研究，见 J.D.钱伯斯：《1670—1800 年的特伦特河谷》(经济史学会副刊，1957)。

⑳ A.米克尔约翰编：《工艺、行业和职业……对健康和寿命的影响》(1957)，第 24 页。

㉑ 主张用这种方法形成证据的，只有 W.H.哈特的《19 世纪初的工厂制》这篇文章，载《经济学》，1926 年 3 月，重印于《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第 166 页起。作者以令人无法满意的和印象式的方法讨论了有关童工的医疗方面的证据，见后文，第 336 页。

中的20%是由于肺结核造成的。这种疾病在乡村和城市中都十分流行。在1818至1827年之间，利兹一家呢绒纺织厂中死亡的成年工人和青工为92人，其中至少有52人死于肺结核，或称做"痨病"。其次的两类致死原因为"体力耗尽"或"太老"(9人)和气喘病(7人)。看一看设菲尔德总医院的外科医师霍兰医生提供的更详细的数字就很有趣，它包括从1837至1842年的5年间在设菲尔德户籍区内死亡的原因。在这5年内死亡的11944人(包括婴儿)中，造成死亡人数在百人以上的原因如下表所示：

1. 肺结核	1604人
2. 惊厥	919人
3. 肺炎	874人
4. 自然死亡	800人
5. 事故(据验尸官报告)	618人
6. 热病、猩红热	550人
7. 虚弱	519人
8. 牙病	426人
9. 肠炎	397人
10. 脑炎	351人
11. 痨病	346人
12. 麻疹	330人
13. 天花	315人
14. 百日咳	287人
15. 不明炎症	280人
16. 一般热病	255人
17. 气喘病	206人
18. 喉头炎	166人

19. 瘫痪病	107 人
20. 肝病	106 人

毋庸赘言,这份证据从诊断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充分的(它没有列出肠胃炎和白喉等疾病)。霍兰医生认为,这份报告"可依赖的程度不高",所谓"痨病"和许多"气喘病"例实际上就是肺结核。在注册中只有一人死于"缺乏食物",对此霍兰评论说:

> 任何医学工作者如并未得出这个城市中有成百的人是死于缺乏生活必需品的结论的话,他的观察定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们可能死于某种病;但这些病是生活贫困再加过度疲劳而引起的。

不过,设菲尔德的数字指出,这5年内,生育死亡人数为64人(这里可以说不会有诊断上的错误),这说明在过去的100年里的显著的进步。生育死亡率下降的原因是产褥热减少,卫生的改善,助产术的进步等等真正的功效。但如果说各个阶级中产妇的死亡率都有下降,那么,工人阶级母亲的存活只是使其生育出更多的子女,而子女的生存机会在工业中心却正在降低,如果婴儿死亡率比较高,那么我们还必须记住,儿童生命的关键时期不是1岁以下,而是5岁以下。由此,在这个时期,设菲尔德总共死亡的11944人中,各种年龄的死亡人数为:

1岁以下	2983 人
1岁	1511 人
2—4岁	1544 人

就是说,5岁以下的死亡人数为6038人,其余的5906人死于5岁以上各年龄组。因此,儿童死亡率(1岁以下)约为25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506‰。曼彻斯特的情况也大致上相似。(凯伊医生指出,)"穷人家庭一半以上的后代……死于5岁以下",注册处长的报告(1839)也证明该地5岁以下的年龄组死亡 327

率为517‰。不过，这些数字低估了——也许大大地低估了——实际的儿童死亡率，因为工业中心的成年移民不断地猛增。1851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了出生地点)证明"在几乎所有的大城镇里，从外地迁入而定居的移民在数量上超过了本城镇出生的人"，移民的死亡不断地掩盖着儿童死亡率的真相。到1840年以前，大城镇人口的增长并不是因为那里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大于农村。如果传统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在旧的中心城市和市场村镇，大部分人的健康都能从工业革命的成果(以及对清洁卫生习惯的开导)中有所受益，但创造这些成果的人并未从中得到好处。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在"高工资"的工业中心，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出世，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儿童在不太会说话时就夭折了。而在"低工资"的农村，由于有济贫法的补助，儿童们生存下来了，并到城镇中定居去补充成年劳动力负担沉重的工作。[22]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工厂成年工人的健康水平低于一般人。有些证据说明成年棉纺工人的健康状况在1810至1830年间改善了，而后来随着对劳动时间的限制，机器罩了外壳，场地空间通风和粉刷等都改善了，他们的健康程度更快地提高了。不过，他们的子女仍同其他劳动力一样受苦。1833年，曼彻斯特的雇主受权进行一项调查，从而发现被调查的已婚纺纱工人共生育3166名子女(平均每个婚姻生4.5个孩子)，"其中有1922个子女活下来了，占总数的60.5%。死去的子女为1244名，占39.5%。"[23] 人们可以合理地假定，这39.5%有可能会上

[22] G.C.霍兰前引书，第8章；J.P.凯伊：《曼彻斯特棉纺织厂中就业的工人阶级的道德和身体状况》(1832)；《总注册处处长的第一份年度报告》，各处；A.雷德福，前引书，第16页。

[23] W.库克·泰勒前引书，第261页。

升到 50%，因为有些儿童在调查时是婴儿，而等他们达到 5 岁或还没有达到 5 岁时，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人们通常认为在工业革命中获利最多的工人的子女也有这样高的死亡率，这可以部分归因于总的环境健康状况太差。也可能因女孩从小就在工厂里做工，造成盆骨的变形和狭小，容易造成流产；母亲临产[328]前一个星期仍然在工厂里劳动，致使新生儿虚弱；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儿童得不到适当的照顾。[24] 母亲因怕失去工作，在产后三个星期甚至更短的时间后就回工厂去劳动。19 世纪 40 年代，在兰开郡和约克郡西区的一些城镇里，婴儿被带到工厂里去，以便在吃饭时喂奶。年轻的母亲从八九岁起就开始在工厂工作，从未受过家务的训练，惊人地缺乏医疗知识，父母（有时在教会的鼓励下）成为宿命论迷信的受害者，他们常用麻醉剂，甚至鸦片酊，让哭闹的婴儿安静下来。他们把婴儿和正在学走路的孩子交给亲戚去看管，或交给育儿院的老婆婆看管，或交给因年龄太小无法在工厂找到工作的其他儿童去看管。有的父母给婴儿一个肮脏的布奶头让他们去吸吮，“里面绑上一片用奶和水浸涨的面包”，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两三岁刚学走路的孩子“嘴里含着这些布奶头在工厂周围跑来跑去。”[25]

> 一名跛脚的人写道：工厂的工人走在街上很容易被人们认出他是干什么的，因为他有些关节总有毛病，不是双膝内向，脚踝肿大，两肩一高一低，就是弯腰驼背，鸡胸，或另一种体态畸形。[26]

㉔　见利兹的 S. 史密斯医生在《贫民言论报》（1832 年 5 月 5 日）上提供的证据。设菲尔德的产妇生育时的死亡率较低，原因可能是那里的职业要求每天站立 12 至 14 个小时，能够就业的女孩比较少。

㉕　W. 多德：《工厂制说明》（1842），第 149 页。

㉖　多德前引书，第 112—113 页。

但无论是在工厂里面还是在工厂外面，多种工业职业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如果棉纺工人40岁以后很难找到工作(那些找到了工作的人也经过了淘汰弱者的长期选择过程)，那么，年老的矿工和刀具工遭遇也一样。撒克拉医生发现，在再生毛织工人和拾破布的人当中，职业病的发病率较高，霍兰医生则写了一篇论文，详细地论述了在设菲尔德磨工当中的疾病和工伤事故。我们已经知道家庭梳毛工恶劣的工作条件，而织工也面临着肢体畸形之虞。蒙迪普斯山的制玻璃工人、烤面包师傅，以及伦敦的许多血汗业工人都面临着这种后果。裁缝由于每天要长时间329 地“交叉着两腿坐在条板上”，他们的特征是肩膀和胸部都成畸形。

特纳·撒克拉医生看不出最差的家庭劳动与棉纺织厂的劳动有什么差别，他看到的留在曼彻斯特棉纺织厂的儿童……

> 几乎全是满面病容：瘦小、羸弱、赤脚、衣衫褴褛，许多人看上去还不到7岁。男人们一般都在16岁到24岁之间，还有未成年的人，他们都像儿童一样苍白和消瘦。只有妇女的样子还好一些。……

他把这些人同约克郡西区规模较小的工厂和整布车间中的工人们作对比，“那是些粗壮的漂布工、强壮的粗纺工和面色红润，脏而快乐的接幅工”，而在棉纺织工人中，

> 我看到了，我觉得看到了，一个退化的人种——受压而发育不全，被弄得衰弱的，被糟蹋的人类——男的和女的不会活到老，儿童永远不会长成健康的成人。

他对棉纺织厂雇主们所收集的有关健康状况的证据表示怀疑，因为大多数男工在刚成年时就被解雇了，而且没有力气的棉纺工人在别的行业中将会死去。无论是在新的工厂还是在许多旧式的家庭工业中，老工人“无论在体力还是在外表上，都比老农

民差得多”。[27]

但我们还是看看乘数和积数吧。毫无疑问，有大量的儿童在工厂致残，同时，还应该估计一下在手织工和外作工的孩子中，有多少儿童患了佝偻病。（这两种情况不应混为一谈，工厂致残就是工厂致残，而佝偻病按照利兹医院外科医生史密斯的解释，“一般都始于婴儿期，在儿童达到进工厂的年龄以前，肢体变形已经形成。”）[28] 到 1830 年，人们普遍认为，“平均的”城市产业工人都属于发育不良，他们由于体力衰弱不适合于从事一向留给爱尔兰穷人干的重体力劳动。棉纺工一旦失去工作就陷入绝境，最佳的情况就是指望被雇去“当听差，招徕顾客，出售发夹和针，沿街卖唱，兜售扁带和花边，橘子，姜饼。”[29]

330 只要在人口的基本统计数据上还存在着争论，任何结论都须进行探讨。我们不可低估 18 世纪初的伦敦在酒精“流行病”时期达到的令人震惊的死亡率。不过，在 18 世纪下半叶，工匠和一些农业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似乎比 19 世纪上半叶的工厂工人和外作工人好一些，如果在这个时期里，伦敦和伯明翰的死亡率正在下降，这也许因为它们依然是“工匠”城市，养育子女的水准较高，工作环境还不那么有害于健康。在北方工业地区，在陶瓷业地区和大多数煤田，婴儿死亡率上升，寿命缩短，生活更加悲惨。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饮酒和使用鸦片剂的人增加了，这又加剧了职业病的风险。悲惨景况也许促使生育率的上升，霍兰医生发现设菲尔德“最放荡、最轻率和最不顾后果的人”是在收入最低和组织性最差的工人中。“从大量的调查中，我们

---

[27] 撒克拉前引书，第 27—31，146，203—205 页。

[28] 《贫民言论报》，1832 年 5 月 5 日。

[29] W. 多德前引书，第 113 页。

敢说，工匠的生活状况越坏，结婚就越早。”[30]

即使我们承认全国的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在19世纪的前40年里略有下降，我们仍然要对这样的统计提出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就是我们对工资和消费品的统计数提出的问题。我们决不能设想垂死的或生病的儿童会分布得比肉类和衣服更为平均。我们知道，事实绝非如此。奥斯特勒说，有钱的人很少同时穿两件大衣，但是，他的家庭看医生的机会、服药、育儿、饮食、居住面积以及环境的安排等等则胜过穷人10倍以上。根据各个中心地区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在1842年死亡的平均年龄做出的估计如下：

	绅士	商人	劳工
拉特兰郡	52	41	38
特鲁罗	40	33	28
德比	49	38	21
曼彻斯特	38	20	17
贝思诺草地	45	26	16
利物浦	35	22	15

331 在利兹，这三类社会群体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4岁、27岁、19岁，整个平均年龄为21岁。在哈里法克斯，一个分布很广的教区与比较集中的中心相比死亡率较低，当地的一名医生曾经计算过死亡时的平均年龄：“绅士、厂主及其家庭”55岁，店主24岁，工人22岁。[31]

---

[30] G.C.霍兰前引书，第114—115页。

[31] 《关于劳工阶级环境卫生状况的报告》(1842)，第153页；G.C.霍兰前引书，第128页；关于哈里法克斯的情况出自亚历山大医生，引自W.兰杰：《关于哈里法克斯……的报告》(1851)，第100页起。以后的统计数字见詹姆斯·霍尔：《工人阶级的家》(1866)，第18页起。

人口学家认为这些只是"文字性"的证据而不是统计证据，这是对的。但是，它也表明数百万中等阶级和工人贵族当中婴儿死亡率实实在在地降低和平均寿命的延长，这在全国的平均数中掩盖了工人阶级一般状况的恶化。设菲尔德的霍兰医生早在我们之前就提出了这个看法，他说：

>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出，工人阶级现在遭受的痛苦以及由此造成的死亡率大于过去。在大多数工业地区，工人阶级的死亡率如果可以单独进行研究，而不把**它同整个人口联系起来研究**的话，必定高得令人惊讶，难以设想。对寿命延长的猜测主要是因为……中等阶级的人数比过去大大增多……。

他接着又说，从"粗糙的报告中"，"我们受骗了。"

> ……以为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状况都在逐步改善。但是占人数最多的阶级可能真是一点改善也没有，甚至还正在恶化。[②]

4. 儿　童

我们在前面已经接触了童工的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一个问题居然会引起争论，这是奇怪的。在1780到1840年之间，对童工的剥削程度明显地增强了，熟悉史料的历史学家都知道这个事实。矿井里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效率低的小型矿井里，通道有时十分狭窄，只有儿童才最容易穿过；在几个较大煤田，随着采煤工作面越来越远离竖井，需要儿童当"运煤工"，或者看管通风口。在纺织厂，童工和少年工的人数逐年增加。在一些外作工业和"不 332

② G.C.霍兰前引书，第124页。

体面"行业中，劳动时间更长，工作更紧张。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

自从哈蒙德时代以来，"乐观派"围绕这个问题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说法，简直令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在玩弄什么诡计，以便把童工问题一笔勾销。他们说，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旧"工业的状况同新工业一样糟糕。他们说大多数证词是有偏见和夸大的，早在19世纪30年代发出有关童工问题的呼吁之前，事情已经在改善之中。他们说工人自己就是虐待儿童的最坏的犯人。呼声来自各种"利益"方面，即仇视工厂主的地主、要求为自己限制工作时间的成年工会会员，或对这个问题实际上一无所知的中等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自相矛盾地）说，这整个问题揭示的根本不是艰苦与麻木不仁，而是雇主阶级不断发展的人性。历史上很少有几个问题是被专门的辩解及空论随心所欲地混合而被搅得如此不清的。

童工现象不是新问题。在1780年以前，儿童本来就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的组成部分，直到学校的建立将他们解救出来为止。扫烟囱的孩子或船上的小勤杂工也许是所有职业中较糟的，但不包括早期工厂中最坏的情况。教区"学徒"出身的孤儿被送给某个彼德·格兰姆斯或一个醉醺醺的煤船水手，关在小小的"白日洞"里，那种孤独可能最使他觉得残酷可怕。[33] 但是，如果从这些极端的例子中就概括出工业革命前的流行态度，那就错了。不管怎么说，彼得·格兰姆斯的故事中的一点是他被渔村的妇女们赶走，他的罪过把他送向他自己的坟墓。

那时最流行的童工形式是在家庭或家庭经济的范围内。刚刚会走路的儿童就要开始工作，要去取东西，运东西。克朗普顿

[33] 见M.D.乔治：《18世纪伦敦的生活》，第5章。

的一个儿子回忆他“一会走路”，就开始工作：

> 我母亲总是拍打筛子上的棉花，然后把它放进一个棕色的深桶内又倒入很浓的肥皂水，然后她把我的小外衣卷起来，卷到我的腰部，把我抱进桶内，要我用脚用力把棉花踩到盆底。……这件事需要从头到尾不停地做下去，做到棉花把桶装满，再也站不住为止。这时，她拿过来一把椅子，放在旁边，让我扶着椅背。

323

他的另一个儿子回忆说，“我7岁的时候就开始站在凳子上把棉花铺在梳棉机上，作纺纱准备。我哥哥摇着轮子，把机器转动起来。”[34]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把纱绕在筒管上。到10岁或11岁时，开始纺纱，如果腿长得足够长，够得着踏板的时候，就开始织布了。在纺织业里，童工劳动的历史由来已久，甚至引起那些无法为儿童找到工作来增加家庭收入的其他行业中的工人们的妒嫉；而在毛呢工业中，早期的手工织布“厂”之所以遭到抵制，就是因为它导致了儿童的失业。1806年，有一位证人宣称，如果工厂制将来流行起来，

> 将会把全体穷苦工人从住宅和家里拉出来，送进工厂……他们就会失去过去那种在家中有家庭成员帮助劳动的好处。假如我是个家长，有4个、5个、或6个孩子，其中一个14岁，一个12岁，一个10岁，如果我在家中同家人一道工作，我就可以让他们有事做，一个绕筒管，一个使用织布机，还有一个使用珍妮机。但是，如果我进了工厂，他们不会让我带孩子们去，只好

---

[34] G.F.弗伦奇：《塞缪尔·克朗普顿传》(1859)，第58—59、72页。亦见B.布赖尔利：《回忆家庭》(曼彻斯特，1886)，第19页。

把他们留在荒野中死去……。[35]

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这样的状况是艰辛，甚至是残忍的。家家户户的女孩都忙于烤面包、酿酒、洒扫洗涤等家务杂活。在农业中，孩子们——往往衣不蔽体——无论什么天气都要到田里和农场去劳动。但是，同工厂制相比较，这种情况却有明显特征。工作有种种变化（对于儿童来说，单调最为残酷）；在正常环境下，劳动是间歇性的，每一个工作之后就是间歇。甚至像按规格作业的绕筒管工作，除特殊情况以外（例如一两个童工为两个织工做助手），也不需要一整天干活。小孩子不必每周6天每天8小时地站在桶里踩棉花。总之，我们可以设想，他们随着能力和年龄的增长，逐步地交待工作，间或去传话，采黑莓，拾柴炭或去玩耍。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是在父母的照管下在家中从事家庭经济劳动的。不错，父母对待儿童的态度在18世纪确实非常严厉，但根本没有做一件通常意义上的残暴或缺乏父母慈爱的事情。

有两种情况证明这个解释是确凿的。18世纪，仍有各种游戏、跳舞和体育运动。如果儿童的时间全被限定在工厂里劳动，就不可能持续下来了；另外，手工工匠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早期的工厂，就是这个原因；早期的工厂只能雇佣穷人学徒。在1780至1830年之间，童工数量的急剧增加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工厂制造成的首要的事实是专业化本身、经济角色的不断分化以及家庭经济的破坏。其次是18世纪人道主义的破产以及战争期间反对革命的氛围，它们滋长了雇佣阶级严厉的教条主义。

我们在后面将会讨论第二个原因。先说关于第一个原因，

[35] 《呢绒业委员会的报告》(1806)，第49页。

334

18 世纪人所共知的几乎一切恶习在 19 世纪初的几十年依然存在并且更加泛滥。正如狄更斯所了解的，维多利亚时代初期在伦敦找到的彼得·格兰姆斯也可以在乔治时代的奥尔德堡找到。1842 年儿童就业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表明，在斯塔福德郡、兰开郡和约克郡，新监护委员会仍在强迫穷人家把 6 岁、7 岁和 8 岁的孩子送到矿工那里去当学徒，给一个几尼“买衣服”。孩子“完全落到了监工的手中”而收入却不到一个便士。哈里法克斯有一个孩子受老板的责打，老板还向他投掷煤块，他逃走了，睡在废弃的矿井里，“吃了好多时候的蜡烛，那是我从坑道里发现的蜡烛，那是矿工们前一天晚上扔在那里的。”[36] 这份简要报告坦然把孩子们的恐怖和注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一个 8 岁的女孩被雇来开关通气门，每“天”工作 13 小时。她说：“我扳动着开关，没有一丝光亮，我很害怕……有时，一有亮光，我就唱歌，但在黑暗中我就不唱了，因为我不敢唱歌。”17 岁的佩兴斯·克肖在谈论各种工作的优劣时说：

335

> ……我头上没有头发的地方是用头推煤筐造成的，我的腿没有肿，但姐妹们腿肿了，因为她们要走到纺纱厂去。我在地底下来回匆匆地送着一筐筐的煤，它们重三个英担，路程有一英里多长，……我为挖煤的人工作，他们赤身裸体，只戴一顶帽子……。如果我稍微慢一点，他们就打我……。我宁愿到工厂去工作，也不愿在煤井里劳动。[37]

这种情况不过是 18 世纪最坏的条件的加剧而已。但是，专业化和经济的分化使工厂以外的儿童承担专项的工作，拿计件

---

[36] 《儿童就业委员会的报告·煤矿》(1842)，第 43 页。

[37] 前引报告，第 71、88 页。

工资，而这又要求他们每天付出10小时、12小时或更多时间的单调的劳动。我们已经提到了克勒克希顿这个以加工梳毛机为主要职业的村庄，“在那里，年龄仅有4岁的刚会走路的小家伙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不停做着单调的工作，用他们纤细的手指把铁丝安装在梳毛机上，直至他们的小脑袋昏昏沉沉，眼睛红肿发胀，虚弱一些的孩子弯了腰驼了背。”这种事本来可以在家里做，证据表明，这种类型的血汗童工要是有什么情况，那就是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在大多数的外作工业、农村工业（麦草编结、花边等）和不体面行业里增加了。[38] 工厂制的罪恶就在于它在没有家庭作为补偿的情况下继承了家庭工业制度中最坏的特征，“它使童工劳动系统化——无论他是穷人家的孩子还是自由人家的孩子，对其进行同样残酷而长久的剥削……”[39] 在家里，儿童的处境因父母或老板的脾气而变换；在某种程度上给他们的工作是根据能力加以斟酌的。而在工厂里，机器支配着劳动的环境、纪律、速度、节奏以及劳动时间，而不管他们是否虚弱或健壮。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重新叙述从早期工厂中的穷苦学徒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厂法宣传运动之间这样一个漫长而悲惨的童工史。但是，既然使人们感到宽慰的各种论调现在不胫而走，认为当代人和历史学家叙述的历史“夸大”了事实，那么，我们就应当对其中某些说法加以讨论。这里的大多数观点是哈特教授在192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具有相当大的煽动性，又充满了轻松之感。一勺柠檬汁有时对身体有好处，但我们

---

[38] 请注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的一些最坏的事例皆引自19世纪60年代童工委员会的报告。

[39] H.L.比尔斯：《工业革命》(1928)，第60页。

不能永远靠柠檬汁活下去。这种不足道的没有史料价值而且常 336
常直接把人引入歧途的东西，至今还以脚注形式出现，而且已经重新刊印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中。[40] 这篇文章提出的每个论点，在鼓吹十小时工作制的争论中，几乎都被提出来争论过；尤其是约翰·菲尔登写的那篇严谨和史料翔实的《工厂制的灾祸》，这篇著作的重新发表对研究人员应该是非常有用的。

重述所有这些论点是冗长乏味的。不错，18 世纪末一些暴虐横加在穷苦学徒身上，而 19 世纪，教区学徒制日益让位于“自由”劳动。不错——而且令人闻之振奋——有些雇主，像塞缪尔·奥尔德诺和格雷格家族等，公正地为学徒提供了体面的环境。不错，有些改革家查出了一些最恶劣的事例，并在事后的许多年引证了这些事例。但是这决不表明同样的劣迹在 19 世纪 30 年代都绝迹了（改革家们要取得当代雇主劣迹确凿的证据常常碰到很大的困难，惟一的原因是工人怕失去工作）。不错，1802 和 1819 年，皮尔的两个法案表明了人道主义的复兴，也表明一部分大工厂主试图把一些规定强加在较小或最不道德的对手头上。不错，到 1830 年，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以及附近地区的状况有了全面的改善。但是，这些改善并没有扩展到较远的地区、农村地区和棉纺织业以外的工业中去。由于 19 世纪初的 30 年中农村纺织厂有了很大的发展，毛纺业也实行了全国的工厂制，且发展到丝织业和亚麻纺织业之中，因此，曼彻斯特所取得的进步就被布雷德福、哈里法克斯、麦克尔斯菲尔德以及兰开郡高地发生的种种劣行抵销了。

不错——而且有一个情况常常被提及——为 1832 年萨德勒委员会提供的证据有党派的偏见，而哈蒙德夫妇、哈钦斯和哈

---

[40] W.H.哈特：《19 世纪初的工厂制》，载《经济学》，1926 年 3 月。

里森等历史学家(不包括菲尔登和恩格斯)在引用这些证据时又丝毫不加批判。在奥斯特勒的帮助下,要求缩短工作时间的工人委员会组织了收集证据的工作——尤其是在约克郡西区收集证据——并向委员会呈交这些证据,委员会的主席迈克尔·萨德勒是十小时工作法案在议会的主要倡导者;而这种证据是在从雇主一方取证之前就公布了。但是,并不能就得出结论说萨德勒委员会收到的证据是不真实的。事实上,读过大量这些证据的人都会发现它们具有权威性,不能不相信,虽然仍有必要把不同的证人谨慎地区别开来;还要注意区别小工业中心(例如基利和杜斯伯里)的小工厂里一些最恶劣的状况,它们与大棉纺织城市的大工厂里的情况相比有所不同。哈特教授的断言是没有根据的,他说在工厂主的坚持下在下一年任命的皇家工厂委员会"对于向(萨德勒)委员会提出的几乎所有控告都做出了有效的回答",说关于一贯虐待儿童的指控"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所谓"蓄意虐待儿童之事,如果有的话,那是工人们自己强加于儿童的,是违背老板的意愿和老板不知情的"。提交给皇家委员会的许多证据可以有不同的结论,此外,当证据互相矛盾时,人们会对要求我们不假思索地偏爱工厂老板(及其工头)提供的证据,而反对雇工提出的证据而感到无所适从。[41]

哈特教授和斯梅尔泽教授等人抬高皇家工厂委员会(1833)的证据来反对萨德勒委员会的证据,就是犯了哈蒙德夫妇曾经为之受到批评的同样错误。不论是对还是不对,奥斯特勒和十小时工作日委员会都认为皇家委员会的任命是在有意地拖延时

---

[41] 《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第165—166页。哈特教授还反复地提到工厂主和尤尔牧师所说的恶棍,例如毫无根据地说约翰·多尔蒂曾因"下流骚扰"妇女罪而被判刑。

间，而委员会的成员无异于雇主们的工具。作为政策，十小时工作日委员会拒绝向皇家委员会提交证据。在工业地区，助理特派员的行动受到了密切的注意。人们指责他们与工厂主一道吃吃喝喝，只用了少得可笑的时间去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来到之前，工厂已经被粉刷一新，打扫干净，年龄不足的儿童被藏起来不让人看见。对此，工人们抱以敌视的态度。[42] 皇家委员会的报告受到工人一方的批评，就像萨德勒委员会的报告受到雇主的批评一样。向萨德勒提供证据的一个证人说："我的一个邻居来问我"，

338

> 要我向委员会提出建议，让他们早晨5:30就到利兹桥上去，那时工厂的穷苦儿童要从桥上经过，这样，他们用1小时获得的证据比用7年的调查获得的证据都多。我亲眼看见一些孩子哭着跑进工厂，手里拿着一点儿面包，这是他们到中午12点以前的全部食物。他们哭，是怕迟到。

即使我们把有关虐待狂工头的故事暂且放在一边不说，一群儿童也必须每天工作到晚上七八点钟。在每天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孩子们哭着，或站在地上就睡着了，手掌被纱的"接头"磨出了血，就是他们的父母也会打他们一巴掌，让他们醒来，况且还有手持皮鞭的工头在来回地巡视着。在依靠水力的乡间纺纱厂里，夜班或每天工作14至16小时是常见的事情，尤其在"涨水的季节"。如果哈特教授不认为这些是"一贯的虐待"，那么费尔登和伍德等仁慈的工厂主却无疑认为这是虐待。

---

[42] 见《约克郡西区之声》，1833年6月1日："利兹的人们——工人阶级——尽到了崇高的职责。他们愤慨地拒绝与那批人合作，哪怕这批人还有一点点的诚实，他们就会让残暴的工厂主们自己去干那些肮脏的活……"又见《约克郡西区之声》，1833年6月15日、22日；德赖弗前引书，第19章。

成年工人的态度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们当中就有许多是童工的父母或亲戚。斯梅尔泽教授指出，在一定的意义上，家庭手工业制度的家庭经济在工厂制里被保留下来了。儿童赚的钱是家庭工资中不可缺少的一份。[43] 在许多场合下，尽管可能不是大多数，成人纺工或工人实际上是为他们劳动的那些儿童的亲人。由于他们是在共同工序中劳动，所以必然在限制童工的工作时间时也限制成年人的工时；如果只限制儿童的工时，就不能防止推诿误工或者不能防止儿童做双班工作（从而也延长了成年工人从的工作日）。只有把工厂里的机器停下来，才能保证实行限制劳动时间。但是，如果成年工人缩短时间中获得好处，那也不意味着他们对人道的考虑漠不关心，而且也不能证明有些人的侮辱性的暗示就有道理，即在19世纪30年代为工厂儿童而做的那些仁慈义举与疾呼抗议完全是伪善之举。

339

千真万确，父母不仅需要其儿女赚的钱，而且希望他们去工作。有少数工人即使对自己的子女也粗暴，但证据表明工业地区希望建立起大家都遵守的某些人道主义标准。杜斯伯里的一个纺纱工人因脾气坏，喜欢用粗纱机辊打孩子而远近闻名，所以“在全城都找不到一个孩子来为他工作，他只好搬到别处去……”。父母有时找虐待他们子女的工人去报仇的事屡见不鲜。一位证人对萨德勒委员会叙述他小的时候遭到粗纺工人的痛打：“一个管梳棉机的青年人跑出去，把我的母亲找来，”

> 她一走进来……就问我是被什么东西打的，我不敢说，旁边有几个人指着那个东西……于是她抄起那件工

[43] N.J.斯梅尔泽前引书，第9、10章。

具,乱打那家伙的头,把他揍得鼻青眼肿。[44]

一些不负责的说法提到普遍的漠然态度,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两个委员会的报告中提供的证据都说明,是机器的规则,加上在工头或(小工厂的)老板的逼迫下滥施的纪律,才是虐待儿童行为的根源。硬说虐待儿童的做法在各个行业里都是普遍现象,"是违背老板的意愿和老板不知情的",这种说法不值一驳。许多父母当然喜欢自己的子女在还没有达到1819和1833年的立法所规定的合法年龄以前就出去工作,但还是多尔蒂以及十小时工作制委员会中的那些人在十分积极地向工人展开宣传,反对这样的罪恶;多亏了他们去鼓励沉沦的人们提高自己的尊严,并向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解释教育的价值。工厂运动还卷进了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他们并不是工厂工人,而是些想要"封煞蒸汽怪兽"的织工。这些织工被少年工人顶替进不了工厂,变成了只能依靠自己子女的工资维持生活的父母。1833年,加斯克尔发现工人的不满并不只产生于简单的工资问题,而是产生于 340

> 家人的分离,家庭的破裂,以及把人的心灵与人性中善良的成分联系起来的所有那些纽带受到的破坏……[45]

工厂运动在最初阶段上并不说明中等阶级人道主义的成长,而是说明工人自己对人权的一种肯定。

事实上,极少的论点是如此貌似有理的,即认为无限制的儿童劳动在18世纪曾经得到宽容,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当它以新的更严酷的形式出现时,就很少得到宽容了,这也是另一

---

[44] 当然应该记住在战争期间,成年工人自己也虐待穷苦的学徒,其虐待之狂令人发指。参见J.布朗:《罗伯特·布林科回忆录》(曼彻斯特,1832)、第40—41页。

[45] P.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人口》,第7页。

个标志，说明这个“时代”的人道主义正在成长。哈耶克教授提过所谓的“社会良知的觉醒”，提到

> 越来越多地发觉了过去未加注意的事实。……经济上的苦难不但更加明显，而且显得很少是合乎道理的，因为总财富的增长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快。

艾什顿教授用另外的方法来表达了这种相同的论点：19世纪的皇家委员会和议会调查委员会

> 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英国引为光荣的事物之一。他们标志着社会良知在加速提高，是对苦难的一种敏锐的感觉，是在任何别的国家和别的时期都未曾如此明显的。

艾什顿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为议会调查人员进行辩护。他说：

> ……这一代人有胆识而且勤奋地收集了各种事实，并且具有揭发这些事实的诚实品德，以充沛的精力提出改革的任务，现在，他们却不被看成是蓝皮书的作者，相反背上了制造罪恶本身的恶名。[46]

19世纪的蓝皮书有多种用途，改革在所有这些用途中只处在最末的位置上，议会调查变成了对请愿书的例行公事的反应，341 成了“处理和沟通”不满情绪，拖延处理或搪塞不问议员们不良行为的一种方法，或纯粹从过分的好管闲事的功利主义出发。爱尔兰在一个接一个的灾难中衰落下去，直到发生似乎无法避免的灭顶大饥馑。在这整个过程中议会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缓解措施，只进行了每年平均5次的议会调查。[47] 手工织工和针织工在挨饿的时候得到及时的调查。在警察制度建立以前的

---

[46] 《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第18—19、35—36页。

[47] 见E.斯特劳斯：《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和英国的民主制》。

10年中,进行过8次调查。(后面这项调查产生了行动,前面述及的调查却一无结果,这个事实很有启发性。)可以肯定,格拉德格林德先生在1815年以后曾四出进行过各种调查。但是,狄更斯却清楚地知道他进行调查并不是为了"社会良知的觉醒"或"对苦难的一种敏锐的感觉",而是为了建立有效、廉价的中央政府,确立自由放任主义以及完善的"政治经济学"。

(至少在有关环境卫生的大调查开始以前,)蓝皮书不是"时代的"产物,也不是"一代人"的成果,而是改革者和阻挠改革者相互厮杀的战场。人道主义的事业屡次三番地被埋葬在这种战场上。至于在上层阶级当中,我们在19世纪30年代看到的并不是新的"良知觉醒",而是在整个拿破仑战争期间曾经平寂下来的社会意识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的人们中像火山一样爆发。这种社会意识在18世纪下半叶的确是明显的。1788年,汉韦参加了保护扫烟囱儿童的运动其结果成了法令,而没有遭到反对。在战争期间,每一项关于劣行的报告以及事后确保新的保护童工立法的努力都遭到直接的反对,并被上院否决——因为如扫烟囱的孩子受保护,勋爵老爷们就不得不设法对他们的烟囱进行改造。[48] 霍华德为囚徒做的一切高尚的工作,没有留下持久的印象,因为他死后情况逆转了。我们已在前面提到阶级仇恨和阶级恐惧的蔓延是如何侵蚀人道主义的良知的。不错,1802年的皮尔法案确实是针对这种阴暗面而提出的,但却界定于对穷人学徒有效,与其说它是新立法的先例,不如说它仅仅试图在新的环境下延续对通常的学徒制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对工厂儿童来说更悲惨的是)乡绅意识的萎缩,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权威或传统的职责来保护穷人。 342

---

[48] 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176—193页。

这种萎缩和各阶级间深远的道德分歧，惟有在真正的"觉醒"到来时才能予以证实。许多乡绅和自由职业者对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道主义事业给予过支持。然而在20年代，他们看来虽一直住在人口稠密的工业区，却对离他们大门百余码的各种劣行茫然无知。理查德·奥斯特勒住在哈德斯菲尔德城的附近，但是，直到布雷德福的工厂主约翰·伍德对他谈起儿童劳动状况以后，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当女孩们半裸着身体走出矿井时，当地的头面人物似乎才真正惊讶了：

> 斯坦兰德开业的律师霍尔罗伊德先生和外科医师布鲁克先生在场，承认他们虽然只居住在几英里之内，却不能相信居然存在着这种违背基督教精神的残酷制度。[49]

我们暂且不管这些劣迹在他们说出来以前究竟"不为人们所知地"延续了多久，也不管人们怎能对惨况熟视无睹，直到悲惨的东西忍无可忍。在1790至1830年之间，在"富人"的眼里，廉价的工厂儿童是"忙碌"、"勤劳"和"有用"的人。如果他们产生了困惑，总可用宗教的自责来使其安静，就像在1819年，一位高尚的议员就扫烟囱儿童的问题上说的："在这个行业中干活的孩子一般不是穷人的孩子，而是富人的孩子，这是他们行为不端惹出来的。"[50] 这倒显示了他对道德规矩的微妙见识和完全没有阶级的偏见！

不过，在这个时期，"富人"的良知是充满复杂性的。有人说，由萨德勒、沙夫茨伯里、奥斯特勒和迪斯累里等人代表的"托利党"在19世纪30年代对工业主义罪恶的激昂攻击只不过是

---

[49] 《童工委员会的报告·矿山》(1842)，第80页。

[50] 摘自《城市工人》，第190页。

土地所有者对工厂主以及他们的反谷物法同盟的报复，这在“党派政治的”意义上倒是有道理的。确实，对传统主义者而言，技术发明和有钱的中等阶级力量的增长正是他们的不满和不安的深刻根源。但是，我们只要翻一翻《西比尔》、哈蒙德夫妇写的沙夫茨伯里的传记或塞西尔·德赖韦写的奥斯特勒的生动传记就会发现，仅仅从这些措词上去判断一定是肤浅的。我们似乎目睹了一次文化的更迭，或像在18世纪的立宪主义中那样，目睹了一套似乎空洞又陈旧的老花样，它在人们的心中把热情当作了有意识而动感情的信仰。 343

此外，在托利党家长制论调的陈旧观点中，我们还看到了失望的浪漫主义产生的较新的影响。华滋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人从启蒙主义退回来，重新肯定传统的尊严，以及“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本能”。在回归旧的秩序、权威和责任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忘记卢梭在儿童问题上提出的告诫。华滋华斯在《游记》第8卷中对照过去的农村家庭经济来谴责工厂制：

家中空空的！或许
只有母亲一人在家，——却无帮手
摇着摇篮里哭闹的宝贝；
身边没有女儿，在纺轮旁忙碌，
或者匆匆于每天的没有前途的
家庭职业；没有精美艺术的
针线活；没有炉火边的热闹，
曾满怀自豪地烹调午餐；
没有振作心情，让日子过得快的好事；
也没有什么可赞美，可教训，或去命令！
　父亲要是还
操持旧业，到田野或者林地去，

不再有儿子前行后随；

他们有时偷偷懒——但他都看在眼里；

呼吸清新的空气，踏踏嫩绿的草地；

直到结束他们短短的儿童欢庆，

永不回来！那与生俱来的权利已经失去。

今天的错误是把家长式的情感想象成公平、宽厚的情感。这种情感可以是炽热的、全心全意的。从华滋华斯和骚塞到卡莱尔乃至其他人一直传下去的这股传统派的社会激进主义潮流，在其开始及发展过程中，都包含着一种辩证逻辑，因而不断地萌发革命性的结论。传统派和雅各宾派的起点是相同的。瑟344 尔沃尔说："什么是高大的工厂？不就是一个公共监狱吗？一大批倒霉的民众被判处去从事耗尽精力的强迫劳动，而一个人可以因之大发其财。"[51] 他的同伴，雅各宾派的托马斯·库珀经历过兰开郡早期阶段的工业革命，他声称：

我厌恶这种工业制度。由于这种制度，你必须把一大批人转变成纯粹的机器，无知、堕落、残暴。他们每天工作 12 小时或 14 小时，剩余价值流进了富裕的商业和工业资本家的口袋，为他们提供奢侈的生活。[52]

骚塞愤怒地谴责工业"哲学家"安德鲁·尤尔牧师，他甚至痛骂工业制度是"国家身上的毒瘤和多余的真菌。"[53] 尽管雅各宾派和托利党在政治上是对立的两极，但他们之间仍在不断地交流着

---

[51] 《月报》，1799 年 11 月 1 日。D.V.埃德曼博士为我提供了这些资料，特此致谢。

[52] T.库帕：《关于美国的一些消息》(1794)，第 77—78 页。

[53] R.骚塞：《托马斯·莫尔爵士：对话……》(1829)，第 1 卷，第 711 页；A.尤尔：《工业哲学》(1835)，第 277—278 页；亦见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和社会》(企鹅版，1961)，第 39 页起。

感情和论证的火花。"向智慧进军"的预言家们，如布鲁厄姆、查德威克和尤尔，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每当传统派的托利党在工厂制的问题上超越了思辩的论证，试图采取行动来发泻泄情感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同工会运动者或工人阶级激进派结成勉为其难的联盟。中等阶级自由派常常以此来证明托利党的虚伪性。1832 年，当萨德勒在议会改革法选举中争取当选利兹的议席(但最终失去了这个席位)时，一位小店主在日记中写道：

> 除了一小批被暴君约束的人和一小批最低等级的激进派以外，谁也不会支持他。老托利党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得不转向激进派，以便维乎(护)自己的制都(度)，这只不过是他们惯用的一个小把戏而已。[4]

两年以后，新济贫法以其马尔萨斯和查德威克式的条款激怒了每个"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本能"，迫使少数激进的托利党人在等级观念和人道观念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大多数托利党人退缩了，他们只能满足于人道主义的各种改良计划。但是，也有少数 345 托利党人不仅准备同科贝特派联合，而且准备同欧文派、宗教自由派者以及宪章派联合。约瑟夫·雷纳·斯蒂芬斯号召人们去火烧"穷人的巴士底狱"；奥斯特勒煽动进行平和的——有时也煽动非常不平和的——违抗。他以工厂儿童的保护者自诩，甚至呼吁使用工业破坏手段来反对违法工厂主：

> 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印一张有关针、砂和锈铁钉的小卡片，写上适当的、非常明确的指示，它将迫使这些违法的人环视周围，后悔曾经像疯子似的嘲笑法律和国王。

---

[4] 罗伯特·埃雷的日记手稿，藏利兹档案馆，参见下文，第 823 页。

我的这些卡片将会变成工厂儿童的护身符。[55]

奥斯特勒10年来一直处在革命的边缘上，但是他给自己的一份期刊起了这样一个名称，叫做《家庭、圣坛、王座和农舍》。

我们很难把热情的迸发归之于使斯蒂芬斯受监禁，使奥斯特勒受中伤的"时代"。凡是在早期真正献身于保护工厂儿童的人经受了他们自己阶级的为非作歹和虐待，有时是个人的损失。正如德赖弗博士所说的，奥斯特勒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不是觉悟到童工事实的存在，而是他与激进的工会运动者达成"菲克斯比协约"。无论如何，这样的觉悟不是整个托利党的特征。如果我们想去剖析1800至1830年间托利党的良知，就应当从地主对待自己劳工的态度开始。19世纪30年代的人道主义当然有它的文化渊源，这可以在托利党的家长主义和反对国教的自由派所主张的关于报效和"敬业"的更加驯服的传统中找到。但是，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它只能零零落落地出现在个别的男人和女人身上。菲尔登和加斯克尔夫人不是非国教徒自由良知的代表，奥斯特勒和布尔也不是托利党的代表。

假使托尼是对的，而如何对待儿童和贫困是揭示"社会哲学真正特征"的两个试金石，[56] 那么，正是自由传统和非国教派的传统在1830年在接受这一检验时遭受了最严重的挫败。确实，有一个半信半疑半反国教而不太引人注意的朦胧世界，其中许多最好的东西形成了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和精神生活。但同样确实的是，在1790至1830年之间，反国教派的社会良知之衰微令人惊讶。更重要的是，当时有一些著名的非国教派的工厂主以及他们手下的卫斯理宗的工头，他们令人厌恶的名声就

346

---

[55] C.德赖弗前引书，第327—328页。

[56] 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企鹅版)，第239页。

在于他们每周 6 天在强迫儿童推动机器，在工厂里一直工作到星期六的午夜 11:55，然后又强迫这些孩子在安息日去上主日学校。

弗朗西丝·特罗洛普在《工厂的孩子迈克尔·阿姆斯特朗》(1840)一书中有一章描绘一种景象："罗伯特和约瑟夫·托姆林斯先生是两位严厉的绅士，拥有这家工厂。每逢星期天的早晨他们都亲自来监督师傅和儿童把时间花在赚取利润上"。这是一个虚构但生动的景象，写的不像是 1840 年，倒像是 1820 年；不像是在棉纺织业的大城镇里，倒像是在还保留着教区学徒制的偏僻乡村的工厂里。不过，特罗洛普夫人书中描绘的德比郡的"深谷"景象，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在兰开郡和约克郡的奔宁山脚下许多偏僻的乡村里还可以找到。有一位十小时工作制的宣传家曾在考尔德河谷上游四处寻找事实，特别注意当地教士的反应，他的行程证明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出任何带普遍性质的结论都是非常不易的。里本登的国教牧师拒绝给予支持，但卫斯理教会却把教堂租给十小时工作制会议去开会。赫布登桥有一名世俗的卫斯理宗老传教士宣称他常在讲道时对工厂制作反宣传，"他说：'虽然我们在讲道时可以闭口不言，但是，只要允许工厂制还像现在这个样子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就决不会善罢甘休。'"他因此引起美索姆罗伊德卫斯理宗工厂主对他的憎恨，每次轮到他讲道的那一天，那里的教堂大门总是锁着。在索尔比桥，布尔大牧师也拒绝给予支持。他是有名的比尔利的布尔牧师(与奥斯特勒一道宣传十小时工作制的著名伙伴)的兄弟，他相信工厂主的仁慈之心"决不可超越"。当一群工人走过工厂主萨克利夫先生建造的卫斯理宗教堂时，他们"用眼睛盯着这座教堂，希望它会沉到地狱里去，萨克利夫先生也跟着一道下地狱去。"

我说，这很不好，因为萨克利夫先生建造这座教堂是为他们好。另一个人说："他混蛋，我了解他，我知道他的为人，那教堂有一个角落是我的，整个教堂都属于他的工人。"[57]

347

克拉格溪是考尔德河的发源地，这个偏远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深谷"。一位不知道属于哪个教派的牧师曾经说过：

如果英国有一个地方需要法律干预的话，那就是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常常是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有时整夜工作。啊！这是杀人的制度，工厂主就是害虫，他们是社会的耻辱。人法和神法都无法制止他们。他们无视霍布豪斯法案，还说："让政府去制订他们认为合理的法律吧，在这个河谷里我们可以大钻其空子。"

他还叙述了一个他刚刚埋葬的男孩的故事，那男孩手臂里抱了一抱羊毛，站着睡熟了，可是又被揍醒过来。那一天，他已经工作了 17 个小时，等到父亲把他背回家时，他已经不能吃晚饭了。第二天早晨四点钟，他又醒了。他央求哥哥看着工厂的灯光，因为他怕迟到，然后就死去了（他的弟弟在 9 岁时就死掉了，他的父亲是主日学校的一位"朴素而勤奋"的教师）。到这时，我们这位英国国教的牧师表示，他将无保留地支持对童工的限制：

我看到了穷人在这个河谷里受着压迫，我想，把这些事实揭发出来是我的责任。……为了对我担任的职务负责，我一定要拿它与福音书中所说的自由和仁慈的真理相对照……凡存在压迫的地方，最沉重的压迫总是

---

[57] 据信，许多工厂主都掌握从工人罚款中收取的基金，用于慈善救济和修建教堂。在杜斯伯里有一座大教堂，直到现在老一辈人还称它为"断线头教堂"，是用断线罚款的经费建造的。

> 落在最无力承受的人们头上……因为寡妇没有丈夫，她们的儿女失去了尘世的父亲……我们发现他们最被人当牛马使唤……

由于他的讲道——以及他亲自对工厂主表示抗议——工厂主就在街上咒骂和侮辱他和他的女儿。这些事实被揭发后，河谷里举行了一次抗议集会，以奥斯特勒特有的风格发布的公告说：

> ……你们比西印度群岛的看管奴隶的监工更横暴、更虚伪……我证明，你们吹嘘的**自由**……就是暴戾，你们自夸的虔诚……恰恰是亵渎神明……你们的“鞭打”制度，还有“罚款”制度、“旅馆”制度、“实物工资”制度、“午餐时清洗机器”制度、“星期日工作制度”、“低工资制度”等等……全要经过“公众审查”的裁决……

348

奥斯特勒说：“就在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开完会回来，”

> 看见两家工厂在河谷里发出隆隆的机器声。里面的人，穷苦的小受难者们，仍不得不工作到 11 点半钟。我还发现其中一家工厂的老板是一个声声念佛、言谈伪善的宗教徒……[58]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卫斯理宗的教徒，看看他们为什么要为雇童工当辩护士，而且以此作为自己特殊的使命。[59] 毫无疑问，布尔牧师在攻击雇主这一“类别”时，他心里想到的主要是非国教派的工厂主。

> ……这类人的全部智慧都包含在狡猾当中，从而使他们能够想出最便宜的办法让年龄尽可能小的工人在尽

[58] 工人 G. 克雷布特里：《考尔德河谷巡游简叙》(1833)；《约克西区之声》，1833 年 7 月 20 日，27 日；《赫布登桥民众集会纪要》，1833 年 8 月 24 日。

[59] 但是，塞西尔·德赖弗在前引书第 100 页上提到了原旨卫斯理宗常常将教堂租给理查德·奥斯特勒使用，注意到这一点很有意思。

可能短的时间里做尽可能多的工作，却付给他们尽可能少的工资……阿古尔会这样谈论这类人："这是一代人，啊！他们眼神多么高傲啊！仰起了他们眼皮睫毛。这是一代人，牙齿似剑，臼齿如刀，他们能吞噬天下全部的穷人。"[60]

另一方面，当布尔和奥斯特勒以及十小时工作制委员会的工人们（其中一些是在工厂主自己办的主日学校里第一次学读《圣经》）用《圣经》的教义攻击非国教派，并指出实际上是整个非国教派共同一致地犯罪的时候，他们决不是说国教派在同心协力坚持不懈地保护儿童。确实，从沙夫茨伯里本人那里——如果国教还值得赞誉的话，那就是他带来的——我们可以知道，除了布尔属于例外，国教的教士"作为一个整体……不会做什么事。"[61]

349 因此，关于普遍的"良知觉醒"之说乃是哄骗。它所起的作用仅仅是缩小那确实存在的愤怒的同情心，正是这种同情心推动了北方几十个自由职业者承担了保护儿童的事业，他们遇到的猛烈反对有时把他们推到了革命的边缘上。此外，正如一些人道主义历史学家喜欢做的那样，它还贬低了约翰·多尔蒂等人以及工人自己组织的十小时工作制委员会在20多年来紧张而热烈的鼓动和宣传中所起的作用。近年来，有一位作者用一种厌烦的口气讨论了这个问题，其气度完全适合于原子时代那种豁达的意识。他说，现代读者"已经训练得对集中营的情况相当熟悉"，因此对童工的状况"比较无动于衷了"。[62] 也许，可以让

---

[60] 《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广告报》，1835年11月29日。

[61] E.霍德：《沙夫茨伯里传》(1887)，第175、378页。

[62] 哈特韦尔：《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各种解释》，载《经济史杂志》，第19卷，第2期，1959年6月。

我们来重申一下这种更为传统的观点：对儿童如此规模和如此程度的剥削是我们历史上最可耻的事情之一。

350

第十一章　十字架的转换力

1. 道德机器

清教派——反国教派——非国教派：从衰退而溃落为屈服。反国教派依然在高喊着抵抗地狱魔王和巴比伦的妓女，非国教派则自我隐退和谢罪：它要求慎身独处。马克·拉瑟福德是很少几个知道非国教派在19世纪的孤独秘史的人之一。然而他本人就是或多或少地保留非国教派的价值观念的证人。他在《自传》中记录了他年轻时的那种礼拜仪式：

> 我们一般都从承认我们是罪人开始，但不承认种种个别的罪孽，随之是一种与上帝的对话，非常非常像后来我在下议院的议会开幕时建议人和附议人向国王的陈述。

这个例子取自加尔文主义的独立派。不过，这也将极好地用来说明卫斯理宗在世俗当局面前的姿态。这样的屈服隐含在卫斯理宗的起源中，隐含在它的缔造者的托利主义以及他对国教的矛盾感情之中。卫斯理教徒从一开始就模棱两可地夹在反国教派和国教派之间，对教派和世俗当局，都夸大其辞。充当当局的辩护士，而在当局的心目中，他们是被嘲弄的或是接受恩赐的对象，根本不可信赖。法国革命以后，他们举行的一次次年会一直在声明他们的顺从和他们在同现存秩序的敌人作战时的热忱。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推动中间等级

的忠诚和社会下层等级的服从和勤劳"上。[①] 但是，国教派仍然极少让他们向民众传教，而且只能从后门进去，从来不能用荣誉的地位来装饰炫耀。如果在一些报道中提到了他们，那就可能妨碍他们去做最适合于他们做的道德监视一类的事情。

351

卫斯理宗经历几次战争而其信徒却显著地增加。[②]（哈勒维告诉我们，）他们见证了各非国教派别的"革命精神都在不断地衰退"。在战争期间，卫斯理宗以两件事情特别著名。第一，它在新的工业工人阶级中赢得的信徒是最多的。第二，在卫斯理死后几年中经历了一次非国教牧师官僚制度的加强过程，并认为他们的责任在于巧妙地操纵信徒的顺从，并训诫惩罚滋长在教会内部的所有的离经叛道以防止其冒犯权威。

在这些方面，他们非常有效。几个世纪以来，国教一直在向穷人宣讲顺从的职责。但是，国教同穷人的距离太远了——这一时期教士不在任职地工作，过着双重生活，因此，他们的讲道没有多大效果。农村的顺从源于对地主权力的痛苦经历，而不是出自任何内心的觉悟。事实证明，教会内部的福音派运动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汉纳·莫尔的许多半便士传单被丢弃在大住宅内仆人的下房里。但是，卫斯理宗——或其中的许多人——是贫民，他们的传单中有许多是穷人赎罪者的忏悔。许多地方上的牧师出身卑微，（正如某人所说的）他们在"我的珍妮纺纱机旁边"寻找演说的词汇。卫斯理宗1790年以后的大发展主要是在矿区和工业地区，沿着较旧的塞勒姆和贝瑟尔，不伦瑞

① 摘自哈勒维前引书，第3卷，第53页。关于这个时代卫斯理宗的政治立场，见E.R.泰勒：《卫斯理宗与政治，1791—1850》和R.F.韦尔默斯：《卫斯理宗与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1800—1850》(1937)年，尤可参阅其中"卫斯理宗的忠诚"和"卫斯理宗的中立"等章。见《城市工人》的第13章"为穷人辩护"。

② 见下文，第389页。

克式和汉诺威式的用砖砌的新教堂表达着对卫斯理宗的忠诚。1811年,一位牧师写信给杰贝兹·邦廷大牧师说:

> 我听到你们利物浦大教堂的重要消息,一个人要有很大的肺活量才能把他的话从大教堂的这一端传到那一端。在布雷德福和凯利,他们正在建造教堂,像设菲尔德雕匠街上的教堂一样大。卫斯理教会几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③]

352 杰贝兹·邦廷在整整半个世纪里一直积极地从事着传教活动,从卢德运动一直到宪章运动的末期,他都是正统卫斯理宗的主要人物。他的父亲是曼彻斯特的裁缝,曾经是"彻底的激进派","热烈地支持法国第一次大革命参加者的事业",但他本人却仍然是卫斯理宗教徒。[④] 18世纪90年代末,基勒姆派的新教团分裂出去以后,涌现出一批较年轻的牧师,邦廷就是其中之一。他最关心的是清除雅各宾派在卫斯理宗教派中的影响。1812年,邦廷因清除卫斯理派中的卢德派而赢得名望。第二年,在利兹,他列举出"他的经常的听道者中有几名旧派的托利党地方官,以前的国王与教会派,这些人以前可能从来没有跨进过非国教集会室门槛一步。"[⑤] 他以及他的牧师同伴们是组织者、管理者,忙不完地玩弄宗派阴谋和有过分的纪律热忱,其中有个较讨厌的人,名叫爱德蒙·格林罗德。卫斯理对于反国教派自治的无政府状态的厌恶被他的继承者们继续下去,他们把权力赋于卫斯理宗年度大会(其权威性由于卫斯理亲自选定的牧师们出席而加重了)以及该会的全权委员会(1803)。原教旨卫

---

③ T.P.邦廷:《神学博士杰贝兹·邦廷传》(1887),第338页。

④ 同上书,第11页。奥斯特勒的父亲是利兹的布商,也是卫斯理宗教徒,"汤姆·潘恩派"。奥斯特勒成年后对卫斯理宗的看法并不比科贝特更加恭维。

⑤ J.雷伊:《里兹的卫斯理公会》,利兹档案馆。

斯理宗被排挤出去,因为他们害怕那个集团举行的营地会议会造成“骚动”并且被当做政治先例(如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帐篷派卫斯理宗”或圣经基督教派即布赖恩派也受到同样的纪律约束,禁止女性讲道。年会和巡回督察的权力加强了。相互监视道德上的缺点受到鼓励;各个小组内部的纪律都加强了。1815年以后,许多地方牧师遭到驱逐或被从“计划”中除名,罪名是在政治或宗教上“违背〔计划〕宗旨”。我们发现在哈里法克斯地方牧师会议记录上有一段话:“M兄弟在小组活动的时候却去参加政治集会,因此受到批评。”(1816年12月16日)。我们还发现从纽卡斯尔写给邦廷的一封信惊慌地报道说:

> ……鉴于痛心地得知我们的两名(北希尔德的)地方牧师参加了激进派的大型改革集会……我希望在激进派当中不再发现我们的兄弟。但是,我们的少数领导人却在其精神上和目标上都是他们最坚定的朋友。……一些真正虔诚的误入歧途的姐妹们帮他们做旗帜。我高兴地说,在进行规劝之后,其中一些人已退出各自的小组(他们采用了卫斯理宗的几乎整个组织体制,如“小组领导人”、“地区礼拜会”,等等,这在他们当中极为流行)。如果人们被训练成在传教的圣经会议上带着冥想面对大众,并且学到了演说的技巧,然后,就运用由此而获得的强大道德武器去危及我国政府的存在,那我们肯定会焦虑不安……

353

这是1819年,是彼得卢年。[⑥] 卫斯理宗的全权会议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是发表一份通告,通告中带着邦廷文风的“清晰痕迹”,表示:

---

⑥ 邦廷前引书,第527—528页。

近日来，某些骚乱性的集会在我国一些地区发生了，对此，我们表示坚决而强烈的不满。大批民众混乱地聚集(往往站在有令人惊骇的不信神明标语的旗帜下面)……据推定，他们由异教邪说、狂妄欺骗的政治理论以及暴力和煽动性的演说纠集到一起……目的是给政府带来耻辱，造成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反抗和无政府状态。⑦

卫斯理至少还是一名老练的宽宏大量的人，他一向严于律己，是个对宗教狂热的人，曾经站在市场的十字架下受到不断的痛骂。邦廷以其"严肃而用语精确的发言"，则不太被人崇拜。"你的原则要适应你的困境"是他自己的忠告。他年轻时的一位牧师朋友对他的儿子说：

在我们家中，他说话从来都是严肃而有启发性的。就像牧师站在传道坛上，每个字都用得是地方，每一句话总像是深思熟虑过的，……有时，你亲爱的母亲禁不住的妙语突然搅乱了我们庄重的气氛，但他从不动声色而保持着自己那种基督福音牧师的应有的气质。

邦廷不妥协地执行安息日制度，但刚好在自己想要行方便的时候就止住了。"他在履行必要的牧师工作时会毫不犹豫地雇佣严厉的人，尽管他总是内心有所保留……"但在对待儿童问题上却是另一回事。当我们回忆卫斯理宗至少在其主日学校里给儿童和成人上初等教育课时，就不禁会宽恕它的某些罪恶。班福德的快乐景象有时会令人想起18世纪90年代末的米德尔顿学校里上学的"矿工小伙子及其姐妹"，和从惠特尔、鲍利、江玻和

---

⑦ 指1819年8月16日在曼彻斯特广场屠杀民众和平集会的事件。——译注

沼泽地区来的纺织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子女。但正是这种早期卫斯理教徒的悠然的景象，恰恰是邦廷无法宽恕的。1808 年，当他在设菲尔德当牧师时，他眼见主日学校的儿童正在学写字，大为光火。他说这是“安息日的非常坏的恶习”。从神学角度说这无疑是不恰当的——因为儿童听圣经读圣经是一种“心灵的善良”，而写字却是“凡夫俗子的技艺”，可能助长“世俗优势”。于是在设菲尔德开始了一场战斗（过去的“雅各宾派”詹姆斯·蒙哥马利在《设菲尔德彩虹报》上撰文维护儿童利益），邦廷从这场战斗中胜利地显露头角。第二年（1809），他又在利物浦取得了同样的胜利。直至 19 世纪 40 年代，邦廷领导着这场运动，成功地清除了这种对主日的阴险“亵渎”。这就是邦廷在全国赢得名气的一种方法。[8]

这种名气在一个星期的 6 天里对儿童来说也许是需要的。在邦廷及其信徒们方面，我们似乎触及了一种与工厂儿童肢体上的畸形互补的感情上的畸形，他们认为儿童的劳动是没有害处的。从他早年在工业腹地（1805 至 1814 年曼彻斯特、利物浦、设菲尔德、哈里法克斯和利兹）任教职时写的大量的信件，无休止的小宗派争论，道德的空话以及对年轻妇女的私人行为的不无邪念的调查来看，他和他的教友们对工业主义的后果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安。[9] 但是，卫斯理宗这些年轻的领袖不仅仅在童工问题上因闭口不言而犯了共谋罪，他们在穷人中加进积极服从的分子，从而从内部软化穷人；他们在卫斯理宗教会内部培 355

⑧ 邦廷前引书，第 295—297、312—314、322—323 页；班福德：《早年岁月》，第 100—101 页。应当公正地指出，国教和其他非国教派团体也禁止在星期日教写字。

⑨ 邦廷等卫斯理派教徒们不断给予支持的惟一人道主义事业是反奴宣传运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这个问题一次次地宣扬，人们开始怀疑，与其说这是残留的社会良知，不如说是想削弱举起禁奴大旗的批评意见。

育那些最宜于形成劳动纪律的心理方面的因素，而这是工厂主们求之不得的。

早在1787年，老罗伯特·皮尔就写道："我把我在兰开郡的大部分工作让卫斯理宗办理，他们非常称职。"[10] 韦伯和托尼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清教伦理的相互渗透做了很透彻的分析，看来无须再作补充。卫斯理制度可以看做清教伦理在变化的社会背景下的简单的延伸。在这里，"经济决定论"观点的事实依据就是：在邦廷时代，以其加强纪律和秩序的功效及其道德之奥妙莫测，卫斯理宗特别适应自立起家的工厂主和制造业主以及工头、监工和低级管理人员等一批人的需要。认为卫斯理宗是工厂主及其附庸们为自己辩护的一种工具的观点，包含着一部分重要的真理。约翰·卫斯理后来常被引用的一段话既包含着预见也包含着悔恨，他说：

> ……宗教必须自然地产生勤奋和节约，也可能产生富裕。但是，随着富裕而来的还有自豪，愤怒和对世界的爱。……卫斯理宗作为人们衷心信奉的教派，虽然现在茂盛得像绿色的月桂树，但是，如何才能继续保持这样好的状态呢？因为各地的卫斯理宗信徒都勤奋和节俭，结果他们的财富就增加了。由此，傲慢、愤怒、肉欲、色欲和人生的骄傲也相应地增加了。虽然信教的外表依旧，精神却瞬息消失。

19世纪早期，卫斯理宗的许多工厂主以及邦廷本人都证实了这一预见。[11] 但是，这一论点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不稳定了，因

---

[10] L.台尔曼：《约翰·卫斯理》(1870)，第3卷，第499页。又见J.萨克利夫：《卫斯理宗评述》(纽约，1805)，第37页。

[11] W.J.沃纳前引书，第168—180页。

为恰恰这时，卫斯理宗作为工业资产阶级信仰的宗教（虽然也同其他非国教派都在共同的区域传道）同时也作为广大无产阶级各界信仰的宗教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毋庸置疑，工人阶级的许多群体（包括矿工、织工、工厂工人、水手、陶瓷工人和农业工人都同样）衷心地信仰卫斯理宗。那么，对于卫斯理宗来说，怎样才可能以其特有的活力来做语含双关的祈祷呢？ 356

这是一个韦伯和托尼都没有讲过的问题。他们两人主要专注于对16世纪和17世纪的清教徒以及商业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大体上，两人都论述了中等阶级的心理和社会发展；前者强调清教关于"感召"的观念，后者重视自由、自我约束、个人主义和利欲追求的价值观念。不过，对他们的论点来说，都是内在的，即清教徒的教义给中等阶级群体以心理的和社会的凝聚力，从而感到自己受到"感召"或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同时他们又在忙于追求物欲（并取得一些成功）。那么，这样一种宗教怎样才能投合那在特别艰苦的时代中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的心意呢？他们人数众多使他们体会不到任何意义上的上帝的群体感召，他们的劳动经历和群体生涯使他们偏爱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他们的节俭、纪律、追求等品德与其说给他们带来成就，不如说是给他们的老板带来了利润。

不错，韦伯和托尼都对清教徒或准清教徒的价值观在工人阶级中的扩展从雇主的观点来看有何功利主义的用途作了有力的解释。托尼剖析了"医治贫困的新药"，那种"新药"指责劳工的懒惰和目光短浅，还提出一种方便的信条，即：假使成功是上帝选择的表示，[12] 那么贫穷本身就是心灵奸恶的证据。韦伯却更重视对无产阶级来说十分关键的一个问题，即工作—纪律。

[12] R.H.托尼前引书，第227页起。

韦伯写道："现代资本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开始用加强劳动强度来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就在什么地方遭到……前资本主义劳动极其顽强的抵制。"

> 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个庞大而完整的体系，个人在这个体系中出生而这个体系本身也呈现在他面前……作为不可改变秩序的事物，他必须在这个体系中生活。个人只要卷入了市场关系的系统，就被迫不得不顺应资本主义的行动规则。

357 但是，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这些行动规则显然是违背自然的可恨的约束。农民，未圈地的村庄中的农业劳工，甚至城市的手工业者或学徒，并不单单用赚来的钱来衡量其劳动的回报；他们反抗周复一周的受纪律约束的劳动。在韦伯（不能令人满意地）描写为"传统主义"的生活方式中，"一个人并不'生来'就想赚越来越多的钱，但只想过他习惯过的生活，并为此目的赚必要的钱。"如果没有内在的强制，就是计件工资或其他的刺激手段也会最终失去效力。农民赚到了足够的钱，就会离开工业，返回自己的村庄；手工业者则去饮酒作乐。同时，在需要技术、专心和责任的劳动中，反过来用低工资作为纪律的约束也是无效的。所需要的正是——在这里，弗罗姆引伸了韦伯的论点——一种"内在的强制"，将证明"能比任何外在强制都更加有效地利用全部精力去工作"：

> 针对外在的强制，一定常有相当大的顽固性，阻碍工作效率或使人们不能适应为了需要才智、创造性和责任感而形成的任何任务的分工。……如果不把人们的极大部分能力引导到工作上去，资本主义无疑就得不到发展。

劳动者不得不回到“他自己这个奴隶主监工手中”。[13]

这些论点完全符合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状况。在整个18世纪,所有的教会和大多数雇主不停地、异口同声地抱怨劳工的懒惰、放荡、鼠目寸光和不节俭。宗教宣传品和牧师唠叨的传道里时而谴责酒店,时而谴责“上午懒懒地躺在床上消磨时光……,冬天更加如此”,时而又谴责“神圣的星期一”习俗。[14]老实说,民众对“黄金时代”或“快乐的英格兰”有根深蒂固的眷恋。这并非想到了1780年比1840年物质财富更充沛,而是对工业主义的内外约束压向工人之前已经形成的那种劳动和悠闲 358 方式的眷恋。18世纪雇主的陈腐的原则是简单的。那就是只有尽可能低的工资才能迫使穷人去劳动,正像阿瑟·扬在1771年所说的:“除了白痴,人人都知道,必须叫下等阶层贫困;否则他们永远不勤劳。”卫斯理宗对这一陈腐原则绝无异议,他们真的还用贫穷幸福等老一套教义以推行这个原则。其所作所为也就是提供一种内在的强制力。

这种强制力的因素不是新的。[15]韦伯提到了17世纪时雇主在“外作”工业中(特别是在织布业中)的各种困难,是工人不规则的劳动习惯造成的(例如酗酒、偷盗纱料等等)。在英格兰西部的毛织工业区——基德敏斯特——由于长老派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的传教,使劳动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可以

---

⑬ 韦伯前引书,第54、60—70、160—161、178页。E.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1960),第80页。

⑭ 见N.J.斯梅尔泽前引书,第70—75页;华兹华斯和曼前引书,第387页起。

⑮ 并不只有卫斯理宗才有这种工作纪律。我们在此讨论卫斯理宗是把它当作发展的主要事例,工业革命期间的福音教派以及大多数非国教派别的历史上也有同类的发展。

在1673年他写的《基督教指南》中看到许多充分发展的卫斯理式的劳动纪律因素。[16] 矿主以及北方的毛织业和棉纺织业的工厂主在整个18世纪也遭到了类似的困难。矿工一般按月领工钱，他们受到的抱怨是：天生蛮横，喜怒无常，举止和性格粗鲁：

> 他们收入高，但不稳定，他们的就业是一种承包的形式，很难预先确定其利润。这种状况养成了他们那种赌徒一样的挥霍习惯。……
>
> 矿工的另一个特征是为避免犯上而变换岗位……矿井里的工人变动如季节之每年更换一样差不多是常见的事情。……不管他已经得到了什么好处，他都很容易想到假如他不肯做一件事，那么以前的好处就都会被一笔勾销。[17]

359 众所周知，拥有一小块土地的织工在农场有急事时便停织。在18世纪大多数工人为了一个月的收庄稼而乐意换工作。早期棉纺织厂的许多成年工人有"自由散漫的习惯，很少长期留在厂房里。"[18] 从韦奇伍德在埃特卢里亚的工厂罚款一览表上，可以看出早期企业管理上的一些问题：

> ……凡殴打或辱骂工头的工人一律开除。
>
> 凡在工作时间将啤酒和烈性酒带入工厂的工人一律罚款2先令。

---

[16] 韦伯前引书，第66—67、282页；托尼前引书，第198页起。巴克斯特的作品是早期卫斯理派教徒喜爱阅读的。19世纪最初几十年曾多次再版。

[17] 《改善贫民生活状况协会的报告》，第1卷(1798)，第238页起，有关(曼彻斯特附近)布里奇沃特公爵煤矿工人的记载。那里的工人被认为比多数矿工都"讲道德"，"公爵的代理人中有些是宗教人士，他们办起了一些主日学校……"。

[18] A.雷德福前引书，第19—20页。晚至19世纪30年代，塞缪尔·格雷格仍在抱怨"安静不下来四处游荡的习气是工业地区居民的主要特色之一"。

凡对着有窗的墙上投掷手球者一律罚款 2 先令。……[19]

工业革命期间的大工厂主，无论他的工人是在工厂还是在各自家中工作，他都要为工人的纪律问题烦恼。(从雇主的角度来看，)外作制工人需要接受开导，养成“井井有条”的习惯，规规矩矩地听从教导，按时完成合同，对偷窃物资材料有犯罪感。(当时有人告知我们)到 19 世纪 20 年代，“大批的织工”曾被“深深地灌输了卫斯理宗的信条。”一些白手起家的人，现在是他们的雇主，都是卫斯理宗教徒或反国教的教徒，他们因节俭——正如卫斯理所料——而发财致富。他们倾向于照顾信奉同一教派的工人，认为他们能“保证行为端正”，和“懂得品行的重要性”。[20] 织工有“工匠”的传统，而且重视独立的价值，某些变异的清教徒的信仰正在等待着他们。[21] 工厂工人又怎样呢？在安德鲁·尤尔牧师的《工业哲学》(1835)一书中(此书有撒旦般的主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发现它整地预言了“经济决定论”所说的宗教具有的劳动纪律功能。在尤尔看来，工厂这个词

包含着一个庞大自动机的思想，它由各种机器元件和智力元件组成，为生产一个共同的劳动对象而不间断协调地动作着，都服从一个自我调节的运转力量。 360

---

[19] V.W.布莱登：《工业革命中的陶瓷区》，载《经济杂志》(增刊)，1926—1929年，第 1 卷，第 130 页；又见 M.麦肯德里克：《乔塞亚·韦奇伍德和工厂信徒》，载《历史杂志》，第 4 卷，第 1 期(1961)，第 30 页。韦奇伍德的目的是“制造不会犯错误的人的机器”。

[20] R.格斯特：《棉纺织业简史》(1823)，第 38、43 页。

[21] 在 17 世纪清教各宗派中有大量的织工教徒。但是，到了 18 世纪初(除英格兰西部外)，这样的传统已曾衰微了。

工厂制品的"主要困难"并不在技术上，而在于"把一个器具的各个不同部分分布成一个合作的整体，"首先是"训练人类抛弃散漫的劳动习惯，让他们与这个复杂的自动机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认同"：

> 设计一套有效的工厂纪律并加以执行，使之适应工厂所需的勤奋是阿克莱特艰巨的事业，也是他杰出的成就。即使在这个制度已经组织完善而且工人至为明理的今天，要把来自农村或来自手工业已经过了青春期的人转变为有用的工厂劳动力，也近乎不可能。经过一番费力地征服其倦怠和倔强习惯之后，要么是他们自动地放弃工作，要么是因为工作疏忽而被工头开除。

"实际上，需要的是有拿破仑的魄力和野心的人来压服习性反复无常，只有在冲动时才奋发一阵子的脾气倔强的工人……这样的人就是阿克莱特"。此外，一个工人的手艺越高，就越不容易服从纪律，"越固执己见……越不适应成为机械系统中的一部分。因为在这个系统中，偶然的工作事故，就会给整个系统造成损失。"因此，工厂主们指望把需要"由熟练工人中特别熟练和稳当的人手去操作"的任何工艺程序"撤出，……并把这一工序置于一种可由儿童看管的，能自我调节的机械装置"的执行下。所以，现代工厂主的大目标就是，通过资本和科学的结合，把他的工人的工作减少到只须全神贯注和熟练地操作的程度——从青年时就能迅速培养成熟的能力。"㉒

㉒ 尤尔前引书，第13—21页。第23页上写道："事实上，机械的每一个改进的始终一贯的目标和趋势，就是完全排除人的劳动；或通过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换掉男人的劳动，用普通工人的劳动换掉训练有素的工匠来降低成本。"作为表达工厂主的意图，这是很有趣的，而且适用于纺织业。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表达，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许对尤尔的主张太过相信了。

对于儿童来说，工头的纪律和机器的纪律已经足够了；但是，对于"已经度过青春期"的工人来说，还需要内在的强制。于 361 是，尤尔在其书中专门写了一节"工厂制的道德经济"，并专用一章写了宗教问题。在尤尔的眼中，不可救药的工人是可怕的，是"巧妙的煽动者"的牺牲品，长期地搞秘密小集团和结社，做得出任何坏事去反对自己的老板。棉纺工人的高工资能让他们饱食终日，撑出神经病来。这种饭对他们的室内工作来说是太丰盛，太令人激动了。

> 制造业不知不觉地把许许多多人聚集到其周围的狭小的范围里，为秘密小集团提供各种方便；……制造业把知识和能力传授给粗俗的头脑；用慷慨的工资作为鼓励争斗的经济来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日学校呈现出"壮观的场面"。1805年建立的斯托克波特主日学校委员会在1832年庆幸当其他地区处于"政治动荡"的时刻，它在该城中仍做到了"举措得当"、"不经过一个或更多的安静的堡垒就不可能接近这座城市，它创立了仁智的伦理堡垒去反对罪行和无知的侵蚀。"于是，尤尔从中推断出道德不仅是一种一般的政治服从，而且也是一种工厂中的行为方式：

> 用老练的眼光观察，就可能轻易地发现任何工厂中若忽视道德的约束，就会出现制度的混乱，机器的失调，时间和材料的浪费等等……

仅仅靠付工资还不能保证"热情的服务"。不考虑道德的问题，而自己又"不懂福音书中无私的美德的厂主"

> 知道自己受到的尊敬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他于是要执行那讨厌的监视，以防止他被工人蒙骗，但无效——全体工人出于本性而共同反对这样的厂主，无论他怎

样煞费苦心都无法掌握良好的工人队伍。……

> 所以，**创立同厂主的机械原理一样可靠的厂主的道德机器**，正是每个厂主的额外的大事，否则他就无法掌握工人们坚定的手、注视的眼和敏捷的配合，而这些，对于优良的产品是必需的……实际上，福音书中"对上帝的虔诚是最大的福祉"这条真理，再也没有比对大工厂的管理更为适用了。[23]

362

论证就是这样完满。工厂制要求人性的转化，手工工匠和外作工的"劳动冲动"必须规范化，直至这些人适应机器的纪律。[24]但是，怎样把纪律的美德灌输给那些不太能得到世俗盈利的虔诚信徒（除非他们成为工头）呢？这只能把"首要的训诫……人必须期望其最大的幸福不在今世而在未来的天国"的福音来灌输。"超凡的上帝用爱影响我们的意志和感情"，赐给我们灵感，让我们懂得要把劳动当做"纯洁的善行"来完成。

> 但人们到哪里去寻找这种转化力呢？——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正是牺牲才能免除犯罪的内疚，正是这种动机免除犯罪欲；牺牲表明的是，奸恶行径无法抹煞，只有用这样可怕的赎罪方式，方能制止犯罪。牺牲抵偿了不服从的罪过，激励了服从，取得服从的力量，牺牲使服从变得切实可行，乐于接受，在某种意义上，牺牲变成了服从，服从不得不作出牺牲；最后，牺牲不仅是服从的动机，而且是服从的方式。[25]

因此，尤尔变成了棉纺织城的理查德·巴克斯特。不过我们

---

[23] 尤尔前引书，第3卷，第1、3章，着重部分是作者加的。

[24] D.H.劳伦斯在《彩虹报》上写道："他们相信必须改变自己以适应矿井和工地，而不是改变矿井和工地来适应自己。这样做比较容易。"

[25] 尤尔前引书，第423—425页。

在这里暂且从他的神学超验的高度上走下来,去简单地思考一下神学的世俗事务。显然,在1800年,一切开放的英国教会在神学中都有足够的分辨伦理是非的能力去加强工厂主自己的道德自尊意识。无论他是坚持等级的信仰,感觉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还是把自己的成功看做上帝的恩惠或虔诚的证据,他都不会因此而受到鼓励,去把他在布拉福德工厂旁边的住宅和巴德西岛上修道院小房子对调。然而,卫斯理宗的神学依靠其杂乱无章的机会主义,成为比任何别的神学都更适合于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宗教,这个阶级的成员从社会经历上说,没有丝毫理由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神学上,卫斯理似乎排除了清教派最好的成分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其中最坏的成分。如果在阶级的意义上卫斯理宗是各阶级共处的,那么在教义上则是非驴非 363 马的了。我们已经注意到卫斯理宗与旧的非国教派的圣公会的知识传统和民主传统的决裂。但是,路德教服从权威的信条在1789年以后则可当做卫斯理宗任何一次年度会议的决议的样本:

> 即使掌握权力的人邪恶而不信上帝;权威及其权力仍然是好的,是来自上帝的……
>
> 上帝宁可容忍现存的政府,无论这个政府多么邪恶,也不允许乱民骚动,无论他们做得多么有道理。……

(然而,杰贝兹·邦廷与路德不同,他永远也不会承认民众可能是"正义"的。)人们常常注意到卫斯理的学说中有路德派的一般倾

向。[25] 卫斯理对上帝普恩济世教义的拥护与加尔文教的“上帝选民”概念互不相容。如果恩泽普天下，那么罪恶也就遍天下。任何愿意悔罪的人都可能受到恩惠并知道他自己是用基督的血赎罪的。至此，这是一种讲究灵魂的平均主义的教义：不论穷人富人，在罪恶和恩宠的机会上至少是平等的。作为“感情”的宗教而不是理智的宗教，无知的和受教育最少的人都会盼望获得恩泽。在这个意义上，卫斯理宗排除了一切教义的和社会的障碍，对工人阶级敞开了大门。这提醒我们，路德教也是一种穷人的宗教，正如闵采尔所宣称的以及路德自己所经历的，灵魂平均主义有一种冲破天国的堤岸并流向世俗的渠道的趋势，并在路德派教义以及卫斯理宗所重现的这种教义中造成永恒的紧张。

但是，基督的赎罪只是暂时的。卫斯理的理论在这世界上还没有确立。他玩弄着恩泽永恒的概念。上帝一旦赐恩于忏悔者便永远保祐了这个人，这样，就使令人寒心的加尔文主义（“上帝选民”现在变成了“得救的人”而受到保佑）又偷偷地回来了。但是，随着18世纪的流逝，因信称义（即信仰耶稣就能得救）的信条坚固了——这显然是大批在信仰复兴运动中的“得救者”在几年或仅仅几个月之后，又回到他们的老信条上去的缘故。信条就这样成立了：只要悔过者不再做坏事，其前愆便永远得到宽恕。“得救”的兄弟姐妹们处在有条件的暂时的选民状态中。“违背教旨”总是可能的，在上帝和杰贝兹·邦廷看来，由于人类的弱点，那还不仅是可能。此外，邦廷还力图提出上帝的观点是：

364

[25]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简要讨论卫斯理宗时，夸大了卫斯理的神学理论中加尔文教的成分，因此没有看到它特别适应于作为无产阶级的宗教。他过分地强调了卫斯理信徒中的“天命”感，尤其在用它解释工人阶级的“天命”意识时更是这样。“天命”说在美国的重要性不及服从驯服的学说产生的影响大。

罪……从本质而言是不变的……犯罪者的赎罪，是为了减轻其“特别深重的罪”。惩罚被免除了，受惩罚的义务解除了；虽然惩罚是罪有应得的，但却得到慈仁的赦免，因此就是赦罪了，也要表现出不断地忏悔的悲恸行为和本分。虽然应受的惩罚被上帝的仁慈之举赦免，但我们仍应牢记，自卑自贬之身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合适的地位。[27]

但这个教义还有更为复杂的涵义：一个人可以根据他自己决定的行动自己拯救自己，这是一种冒昧的假定。拯救是上帝特有的权力，一个人所能做的一切乃是完全谦卑地为自己的得救做准备。但是，一旦深信主恩，一旦完全献身于卫斯理宗兄弟们，“违背教旨”对于男女工人来说就不是一件小事了。这意味着从他们所知道的工业荒原上惟一存在的共生群体中被驱逐出去，意味着时常出现一种对永远可怕的惩罚快要降临的恐惧感：

在那可怕的地狱
　　有永远的痛苦，
罪人必须和魔鬼同住在
　　黑暗中，火和锁链中。

那么，怎样向上帝求宠呢？不是靠善行，因为卫斯理认为信仰高于行善：“你应做的一切不过是拯救灵魂。”善行是骄逸的陷阱，最好的德行与泛起的罪恶混在一起，虽用另一种机会主义的说法来说，善行又可以是恩泽的标志（对工厂主和老板来说，这是萎缩了的加尔文主义）。由于现在是在通往永恒的走道上，像财

---

[27] 杰贝兹·邦廷：《关于因信称义的讲道》（利兹，1813），第 11 页。邦廷的比喻提醒我们，在同年的 1 月份，一些卢德派在绞刑架下得到了完全的“惩罚结局”，其他人由于惩罚被“慈悲地减轻”而处以 14 年的流放。

富和贫穷之类的世俗之物就无关紧要了。富人可以通过为教会365服务(特别是为他们自己的工人建造教堂)来显示皈依的证据。穷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肉欲、色欲和生活的骄傲”的诱惑。他们似乎更能保护主的恩宠,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天命”,而是因为极少面临堕落的诱惑。

他们面前有三种显而易见的方法可以保住上帝的恩宠。第一,为教派本身服务,他们可以当组长、地区传教士或担任更低的职务。第二,通过宗教仪式和读经进行自己心灵的修行——尤其是努力再产生一次皈依的感情震栗、悔罪、忏悔和邀恩。第三,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最重要的是,劳动的本身有上帝恩典的明显的征兆,劳动(劳动之卑贱和不愉快绝不能同行善混为一谈)不应该是出于别的动机,(如尤尔牧师所言)而是“一种纯粹的美德之举”。

此外,当上帝把亚当逐出伊甸园时,对亚当的天罚是无可辩驳的教义的根据,“你必终生”勤勉劳动、贫穷和悲哀,而这些就是幸福。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卫斯理宗向工人阶级灌输的那些美德与中等阶级功利主义的迫切需求之间特殊的对应关系。[㉘] 尤尔暗示了其间的连接点,他告诫工厂主“创立同机械原理一样可靠的厂主的道德机器”。从这方面来看,在向工业资本主义的劳动纪律过渡的时代,卫斯理宗展现了功利主义内心世界的荒芜风景。手工工人的“劳动冲动”变得规范化,他们不愿劳动的冲动受到控制,而他的感情和精神的激情都多起来了。卑劣的宗教忏悔

㉘ 当然,韦伯和托尼都注意到了清教教条和功利主义原理的平行发展,参见托尼前引书,第219页,他写道:“功利主义者锁子铠甲上的一些链环是被……17世纪的清教神学铸造出来的”,而不是卫斯理宗铸成了套在无产阶级身上的功利主义链环中最后的一环。

短文是爱德温·查德威克和凯伊博士的那些失去人性的文风的另一面。“向理智进军”和心灵的压制配合起来了。

但是,恰恰是卫斯理本人主张卫斯理宗是一种“心灵的宗教”。正是因其“热情”和感情的波动,卫斯理宗才最明显地区别于各种旧的清教徒派别。[29] 18 世纪 90 年代有典型的宗教小册子叙述一个名叫约书亚·马斯登的水手皈依宗教之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宗教经历中几个被称许的阶段。这些小册子一般是按照常见的方式写的。先是对一个罪孽深重的年轻人的描写:骂人、赌博、酗酒、懒惰、纵欲,或仅仅是“肉欲”。[30] 然后若非讲些戏剧性的经历(奇迹般地治愈了不治之症,船只失事或他的妻子或儿女的死),使这个罪人意识到死亡;就是讲这个人偶然有机会听到了上帝的说话,这个有罪的人遭到嘲笑并终于知道了得救的道路。我们这位水手经历过所有这一切。一次船只失事,把他抛弃在“顷刻会被水和火吞没的处境,他害怕得发抖……他过去的罪孽的鬼魂以各种可怕的样子涌现在他面前”。重病“使他常常啼哭和伤心欲绝,他因此转而寻求上帝的恩典。重病还耗尽烧尽了他的感官欲望”,“向他展示不信基督的人临死前的可怕之状”。一位朋友请他去参加一个卫斯理宗的小组会,“他的感情化成孩子般的哭泣……泪如细泉之水流在双颊。”然后是为求宽恕,经受着代人祈祷以及同使他返回到以前的罪恶生活中去的诱惑力进行搏斗的长久的考验。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开启束缚人们灵魂的七障:无知、骄傲、无信仰、敌意、任性、欲望和

366

㉙ 当然,浸礼派属于例外,尤其是威尔士的浸礼派。

㉚ 引自该小册子的一例,见上文,第 58 页。

贪婪。忏悔者在"见习修身"时期一次次屈服于朦朦胧胧的"引诱",[31]

尽管有种种努力,他有时抵挡不住迅猛的引诱,以致锐气受挫万分痛苦。他被罪压倒后,就加倍祈祷……有时他怕在得不到宽恕时就死去而心惊肉跳,又怕一觉醒来已到了那永恒的世界而吓得不能入睡。

当"肉欲"有一定程度的衰退时,"恶魔"就把更阴险狡猾的诱惑放在忏悔者的道路上。主要是用一切办法使他"心肠冷酷",例如反复无常,骄傲;但最严重的引诱是靠善行"赎买得救",而不是耐心等待,"通过悲痛的调停者的无限功德,把拯救作为上帝慷慨的恩赐来接受"。善行信条是"这《希伯来人书》,这罗马教皇制度的人类功德教义",于是"心肠冷酷"就存在于一种人物特性中,而这特性是抗拒完全的驯服。

367

上帝……在他能够慷慨地为我们释罪之前……必须使我们的外壳衰弱,使骄傲的希望之花枯萎,取走自倚的支柱,剥去我们身上那违背基督精神的华丽的正义伪装,制止法利赛式的自信自夸,把内疚的、自卑的、惭愧的、怕羞的、自感绝望的罪人带到十字架脚下。

在自卑自贬这一点上,"他的全部前景很像是一片呼啸荒野"。但是,"获得拯救的时刻已在眼前"。在卫斯理宗教堂的信徒聚餐会上,忏悔者跪在长条座椅上,"灵魂痛苦,开始虔诚地祈祷"。尽管"敌人的狂怒犹如洪水滚滚向他冲击着",

[31] 这种语言往往暗示"罪"的真实成分是手淫。这很可能从三种事实推溯出的根源:一,忏悔者自己一心不乱的内向的肉体的要求;二,摆脱不了卫斯理宗关于性器官有罪的说教;三,指望卫斯理宗的孩子在到达青春期的年龄时应产生犯罪感。见G.R.泰勒:《制造天使的人》(1958),第326页上关于近年来在文学方面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著作增加的情况。

一些组长和一些虔诚的妇女来到走廊内，一同代他向仁慈的主教祈求恩赦。他们越祈祷，他的痛苦和负担越重，直到最后他几乎精疲力竭，浑身汗透……他躺在长条座椅的坐板上，连动一动的力气也没有了。然而，这就是他得救的时刻……他有了无法说出来的感觉，有一种什么东西降落在他身上，像是上帝来了，通过他的全身。他跳立起来，觉得因为诚实便能紧紧地依靠基督了。

从此，"罪的重负卸掉了"，"新的再生表现为新的道德美感——爱、欢乐、希望、和平、孝敬、热爱耶稣、温柔的信心、渴望更加紧密的灵交、更加遵奉教规……一个新的正义王国已经种在他的心灵中了。"上帝的荣耀是"每个举措的目的"。但是，得救是有条件的：相信上帝的恩泽，必须同时认识到人是一种"可怜的、盲目的、堕落的、卑鄙的、不幸的（没有上帝的恩典）得不到帮助的罪人"。[32]

我们的这个罪人现在"从撒旦的掌握中被转移到上帝之子的天国和心像中了"。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心灵经受考验的可怖图景。在考验中，前工业社会的劳工或手工业者不顺从的 368 性格被强制地重新铸造成驯服的产业工人的性格结构。这真是尤尔所说的"转变力量"。它是一种现象，差不多犹如恶魔般的渗透，进入人类品格的本源中，直接导向感情和精神功能的"压抑"。但是，压抑一词会产生误导。这些能量，与其说是被禁止，还不如说是从个人及社会生活的表达中被置换出来，并充当为教会服务之用。像盒子一般刷成黑色的教堂耸立在工业地区，

---

[32] 约书亚·马斯登：《一个水兵早期生活掠影》（用第三人称写的自传）（赫尔，无出版日期）。

就像是一个个捕捉人类心理的大陷阱。教会之内有感情激动的戏剧场面，那是违背教规者、忏悔、与撒旦搏斗、迷途羔羊的动人戏剧场面。人们不必怀疑虔诚的姐妹可以在其中找到宗教中一种最大的"宽慰"。对于较有知识的人来说，这里却有精神的戏剧，它们是：

考验、诱惑、心灵沉沦、怀疑、斗争、深沉、显圣、胜利、冷淡、徘徊、烦恼、拯救、帮助、希望、回答祈祷者、调停、解脱、控诉……心灵的努力、信仰的行动、引导穿越神秘天命的迷津……火刑，以及在沉沦时刻的援救。[33]

不过，这里必须强调卫斯理的唯情论的间歇性。同时代的人们在提到普通卫斯理派教徒的特征或他们的家庭生活时，最常说的是他们的规范化、纪律化以及受压制的性格。与"心灵的宗教"相矛盾，它竟以抑制一切自发性而闻名。卫斯理宗只在必要时在教派里称赞"心灵的努力"，卫斯理宗的信徒写赞美诗，但没有写过出色的世俗诗歌。在当时，若想象有一个感情充沛的卫斯理宗信徒在恋爱，那是十分滑稽可笑的(卫斯理告诫说："避免一切带感情的举止")。说这样的话也许会令人不快，但是，在当年的卫斯理宗中，总会看到以宗教仪式出现的心理手淫。本来对社会秩序有危险的那种(借用尤尔的概念)没有再生能力的精力和感情，现在在经常举行的聚餐会、除夕晚会、铜管乐演奏会和信仰复兴运动等无害的形式中发泄掉。在聚餐会上，人们369 在唱过赞美诗；仪式性地分吃糕饼或水加饼干后，传教士以一种不加修饰的感情方式谈起他自己的精神体验、诱惑，以及同罪恶的抗争：

当传教士这样做的时候，叹息、呻吟、热诚的喘息

[33] 马斯登前引书，第104、111页。

> 声……祈祷后突然的喊叫[34]或赞美声从听众的各个角落发出。

在紧张气氛中，参加教徒集会的人一个个地站起来，忏悔他们内心的罪或受到的引诱，而这些往往与性的问题牵连着。一名目击者提到"一些年轻的女人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说话，就显出了害羞和明显的内心激动的神情。"[35]

（骚塞写道：）卫斯理宗把宗教当做"感觉和感情的东西，永远渴望同情和刺激"。[36] 主日的感情高潮更容易使人们把这些精力转移到每星期6天枯燥的生产劳动上去。此外，由于拯救并没有保障，诱惑又潜伏在四周，因此产生了永恒的内心激励，要求每天的每个小时和每年的每天都有"清醒和勤劳"的举止，即受上帝感化的可见标志。劳动时不遵守纪律的结果不仅是被解雇，而且可能面临地狱之火。上帝是无所不在的监工，工厂的烟囱上甚至贴着"上帝在看着我"的话。卫斯理宗的教徒不仅受到告诫要"背负贫穷和耻辱的十字架"，并且（正如尤尔所见）受苦受难的考验正是表示服从的真正的方式。"我们是受苦受难的耶稣的忠实信徒，啊，我们每天都愿死在你的十字架上"。[37] 劳动就是十字架，"转化过来"的勤劳工人就被钉在这上面。

但是，如果没有人格的中心分裂，便不会有感情冲动的急剧转向。我们可以看出黑兹利特为什么把卫斯理宗描述为"宗教

---

[34] "突然地喊叫"的原文是 ejaculation，也是射精之意，语含双关。——译注

[35] 约瑟夫·奈廷格尔：《卫斯理宗素描》(1807)，第203页起。

[36] R. 骚塞：《卫斯理生平及其宗派的兴起与进展》(1890)，第381页起。

[37] J.E. 拉顿伯里：《卫斯理兄弟的圣餐颂歌》(1948)，第240页：

> 将我们的罪投入火中，
> 依赖你的献身把它烧光，
> 连同一切卑鄙和亵渎的欲望。
> 去经受每天痛苦的考验直到末日审判。

病人的集合”。[38] 如果卫斯理从路德那里继承了权威主义，那么卫斯理宗又从17世纪的加尔文教和英国清教牧师那里继承了忧惧心，即与“严格回避一切自发的享乐”相结合的井井有条的生活纪律。[39] 该宗从这两个教派教义中继承了近似摩拉维亚教关于人在堕落时的犯罪意识。作为不必要的补充，卫斯理兄弟把18世纪早期恋尸癖的怪现象和摩拉维亚教传统中最令人不愉快的变态意象，收入卫斯理宗的赞美诗和写作中加以传播。韦伯从巴克斯特那样的牧师所做的讲道中注意到了性抑制与劳动纪律之间的联系：

> 清教苦行的禁欲主义与修道出家的禁欲主义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并没有原则上的根本不同。而谈到清教的婚姻观，其实际影响则比后者更为深远。即使在结婚的夫妻之间，性交也只有在按照训条的“多产和繁殖”原则，根据上帝的意志作为增添上帝的荣耀的手段时，才是允许的。和素食与冷水浴一样，对性诱惑还可以开出另一剂药方来抑制对宗教的怀疑和对道德的轻视，那就是：“按上帝的召唤去努力工作吧！”[40]

卫斯理教义中充满了关于性行为有罪以及性器官极其有罪的说教。这些——特别是男性生殖器（因为妇女不感到“肉欲的欢乐”已渐渐成为常规）——就是撒旦的看得见的肉欲大本营，是产生诱惑，引起无数不符合教义（诚心为信仰的生殖除外），不出

---

[38] W. 黑兹利特：《论卫斯理宗的起因》，载《圆桌论坛》（1817）；《著作》，第4卷，第57页起。

[39] 韦伯前引书，第53页。

[40] 韦伯前引书，第158—159页。

于生育动机的冲动的永久的源泉。[41] 但是，卫斯理宗这样纠缠于性行为本身就反映了卫斯理宗的想象中有反常的色欲。我们已经提到，在约翰·纳尔逊的信仰转变中，撒旦和作为崇拜对象的男性生殖器是等同的。上帝常常就是父亲的形象，复仇心重，奉行权力主义并且禁令繁多。基督必须向他求情，受苦受难的耶稣"仍在流血，为每个人的灵魂/恳求神恩"。但是，把女性——或更多地是性的意象——与基督联系起来，就更令人困惑和不快。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层又一层相互冲突的象征。基督是"爱"的化身，卫斯理宗的大量赞美歌是献给基督的。基督依次是母性的，恋母情结的，性欲的以及施虐—受虐的。人们常常注意到，在摩拉维亚教的传统中，创伤与性的意象总是互相同化的。人类作为有罪的"蛆虫"，必须在"耶稣的伤口里找到食宿之处"。但是，性的意象轻易地转化为子宫的意象，那"神圣、宝贵、无比美丽的壁上可爱的小口子"，也是罪孽的庇护所，罪在其中"休养呼吸再生"： 371

> 啊，宝贵的壁穴的空腔
> 我要在你的里面度过一生……
> 在那一壁穴里快乐极了，
> 我要在里面度过余生，
> 是的，是的，我要永远寄居在
> 那儿，寄居在你壁裂的地方。[42]

性的意象与"子宫回溯"的意象显然在这里便合二为一了。

---

[41] 只有认识到这种纠缠在多大程度上渗透了英国的文化——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文化——才能理解劳伦斯为了什么写《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书。

[42] 见R.A.诺克斯：《热情》(牛津，1950)，第408—417页；G.R.泰勒前引书，第166—167页。

但是，卫斯理兄弟与摩拉维亚教兄弟会决裂后，他们在赞美歌里使用的语言以及他们对摩拉维亚派团体中的反教律派异端的不断谴责，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丑闻。在约翰·卫斯理和查尔斯·卫斯理的赞美诗歌里，明显的性意象被有意地压制了，代之以子宫和肠子的意象：

来吧，啊我那有罪的兄弟，来吧，
在你罪行的重负下呻吟吧！
他流血的心房给你让出地方，
他张开了壁将接你进去……

但这一意象是从属于难于抗拒的流血牺牲形象的，就仿佛是使早期基督教会感到烦恼不已的太阳崇拜的祭血的地下传统，在18世纪的卫斯理宗赞美诗中又突然涌现出来一样。这是基督"流血的爱"，是献身的耶稣的血，罪人必须用它来沐浴，牺牲和忏悔者的罪行合在一起了。这是"从他的壁中涌出的'泉'，张开好让一切都可进去"：

你的血之泉还在
　　为罪人们大大敞开；
啊！我的上帝，我的主，就是现在，
　　我还在你的壁中洗净我自己。

372 献祭的、色情受虐狂的和色情的语言都在同一血的象征中找到了共同的联系：

我们渴求喝你宝贵的血，
　　我们衰弱地在你的伤口中憩息，
渴求那不朽的食物，
　　长久地宴用你全部的爱。

与基督的爱相结合，尤其是在圣餐的"婚宴"中（这时，教会因"把

基督的肉体奉献给上帝”而集体地“把自己奉献给上帝”)[43]，与自我禁欲的感情、思恋遗忘的子宫以及苦恼的性欲合为一体了，“隐藏在救世主的怀抱中”：

> 我将永远居住在这里，
> 　　一刻也不离开，
> 躲藏在你的璧的裂口中
> 　　保持在你心中直到永远。[44]

很难设想人类生命中还有比这更为根本的分裂，以及在人格各方面必定会表现出来的自发性源泉的浊化。由于把享乐和罪恶、犯罪联系在一起，把痛苦(基督的伤口)和善良、友爱联系在一起，所以每种冲动都会扭曲到它的反面，这样便自然会认为大人和儿童只有在进行痛苦、勤勉和忘我的劳动时才在上帝的眼中找到恩宠。劳动和伤心就是寻找快乐，受虐待就是“爱”。简直无法设想人们真能像这样生活，但是卫斯理宗的许多教徒都尽力而为。怀特菲尔德打算结婚时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如果我还了解自己的心，那就是我并没有世界上称为爱的那种愚蠢感情了”。卫斯理所到之处追逐妇女，似乎是一种虚假的求偶而永远达不到圆满，既伤害了自己，又羞辱了妇女。当他 373

---

[43] J.E.拉顿伯里前引书，第132页。

[44] 同上书，第109—111、202—204、224—234页；又见J.E.拉顿伯里：《查尔斯·卫斯理的圣歌中的福音教义》(1941)，第184页。这个课题应给以必要的修订和专门的研究。G.R.泰勒先生的论文《天使缔造者》有启发意义，不过他试图用“性”来解释儿童倾向于恋父还是恋母的历史变化，反而得出了荒谬的结论。应当指出“璧”这个词当时既是暗指女性生殖器的也是指子宫的。作为色情的和受虐狂——奉献的意象之同化的暗示，乃是：“流血的璧”一词系指在月经来潮(夏娃的“诅咒”)期内禁止交媾或猥亵动作而言，于是性欢乐及绝对禁止交媾这两种观点便与耶稣受难之说联成一体了。有罪的人只有有一种罪孽深重和手淫的意识才能同等地被“纳入”基督的璧内。

结婚时，似乎是对自己的惩罚，但尤其是对他妻子的惩罚。卫斯理宗纠缠于女色与妓女的一贯好色的思想感情，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凄凉的叙述除了从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一位卫斯理宗的牧师虔诚的日记中找到外，人们还可以到哪里去寻找呢？日记中写道：

> 圣诞节。我在南演兵场给一对新人主婚，然后到（百合花巷的）浴池去，浸在冷水中。我跪在地上结束了这伤心的一年……我的心升向上帝。[45]

在工业革命的时代，这种奇怪的想象不仅常见于卫斯理宗的赞美诗中，而且常见于布道和忏悔的语言中，这当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利·亨特在《论卫斯理宗粗俗和渎神的狂喜》一文中评论道："上帝被人格化了，表达在最粗俗的形象之中。如果必须用世俗感情的语言对上帝说话，为什么不把他当做父亲，而把他当做情人呢？"[46] 不过到18世纪末，卫斯理宗出现了悄悄的变化。从对爱情的否定或爱情的升华转而崇拜它的反面：死亡。查尔斯·卫斯理本人曾写过不止一首预示着这种转变的圣歌：

> 啊，多么可爱的死的相貌！
> 　　世上没有什么壮观能如此美妙。
> 一切华丽的赛会表演勃勃生气
> 　　也比不过那长眠的身体。

---

[45] E.V.查普曼：《约翰·卫斯理公司（哈里法克斯地区）》（哈里法克斯，1952），第70页。

[46] 《观察家报》编辑（利·亨特）：《揭露卫斯理的愚蠢和危险》（1809），第54—64、89—97页。这种语言也使卫斯理宗受到指控，说他们的爱心聚餐、除夕守夜和复兴者的狂热往往演变成混乱的性交。在严肃的批评者中，索廷格尔批驳这样的指控，利·亨特却赞成骚塞保留自己的看法。见署名"一名教授"的下等作者所写的《一个卫斯理宗教徒的忏悔》（1810）。

在这方面,卫斯理宗的传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卫斯理宗传教士用尽一切手段去引起对死亡和地狱中无尽痛苦的恐惧。儿童从会说话时就开始被那些因极轻微的行为失检而不断地受到惩罚的形象所惊吓。福克斯的《殉道者传》以及类似的读物把他们的夜晚弄得毛骨悚然。[47] 但是,与此同时,在整个19 374 世纪初,凡是能读书的人都纷纷钻进了歌颂"神圣之死"的宗教书籍中。卫斯理宗或福音派为成人或为儿童阅读的杂志的内容,无一没有死人卧床的场面,而在此场面中(正如利·亨特所提及的),死亡一词往往是急切盼望新婚之夜的新娘或新郎最先说出的话。

死亡是惟一可以不负罪而追求的一种目标,是一生的苦难和劳动之后所获得的平静的奖赏。

近年来,卫斯理宗的辩护士或公正的世俗论者撰写了许多卫斯理宗的历史,企图对他们所无法理解的这一运动做出评价。有人曾令人震惊地提到了莱基在19世纪末作出的判断:

> 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宗教恐怖体系了,它更适于动摇不稳定的思想,使敏感的人性变得阴暗和痛苦。[48]

工业革命孕育了一个名叫杰贝兹·布兰德厄姆牧师的人物(几乎可以肯定是按照杰贝兹·邦廷的模型塑造的)。他在洛克伍德所作《顶点》一书开端的噩梦里出现:"天哪! 这是什么传道! 竟然分成490章……每章讨论一种罪恶!""你不可"的信条无所不在,这些年中,它在不同程度上渗入全部的宗教追求,正是在这

---

[47] 参见W.E.H.莱基:《18世纪英国史》(1891),第2卷,第585页:"鬼怪的形象(即卫斯理宗的传教士)不断地损害他们的想像力,在暗淡或消沉的每个小时里缠绕着他们,使他们对判断的世界没有光彩,还要加上他们对坟墓中的黑暗产生的十倍的恐惧。

[48] 莱基前引书,第3卷,第77—78页。

种背景下，我们才可能充分地认识威廉·布莱克的才华。1818年，他终于把《永恒的福音》从寓意深刻的预言书升华为格言般清晰的最后阶段。他在这本书里重申了一种价值观，以近乎反教律主义的观点肯定了性行为的乐趣，肯定了出现在他早期歌曲中的纯洁无罪。几乎在每一行里，都可以看到在向卫斯理宗和福音主义宣布进行"精神战争"。[49]他们的"基督形象"就是他的形象的"最大敌人"。特别重要的是，他对宣扬谦卑和顺从的说教做了直接的攻击。正是这种应当否定的谦卑"玷污了日月"，"颠倒了乾坤"，

> 连根带枝拔去了
> 被埋葬的灵魂及其一切珍贵的东西。

375

2. 绝望中的千年至福

卫斯理教派可以用来作为一种劳动纪律是明显的事实。然而，比较难以理解的倒是如此之多的工人为什么竟然愿意接受这种形式的心理剥夺？卫斯理宗为什么能成功地发挥既作为剥削者的宗教又作为被剥削者的宗教这样一种双重的作用呢？

从1790到1830[50]年之间的情况来看，可以推论出三种理由：直接思想灌输、卫斯理宗的群体意识以及反革命的心理后

---

[49] 参见威尔伯福斯：《现实的基督教观点》，第437页："记住，我们都是堕落的人，生而有罪，当然会堕落。基督教不承认无罪或善心。"

[50] 杰贝兹·邦廷及其同僚兴起并占主导地位正是在这些年代。1830年以后，在卫斯理宗内部出现了自由化的趋势，尽管邦廷对这个趋势进行了坚决和不懈的斗争；但是，到40年代卫斯理宗进入一个比较温和的新阶段。一方面，一些第二、第三代的工厂主和雇主脱离卫斯理宗，皈依尊贵的国教。另一方面，卫斯理教派成为一些小店主、小职员和低级经理人员的正宗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里，某种尚未确切表明的激进思想和"自助"的意识结合起来了。参见E. R. 泰勒前引书，第5、6章；W. J. 沃纳前引书，第122—135页。

果。

第一个理由，即思想灌输，不宜夸大。福音教派的主日学校一直非常活跃，尽管很难估计它们的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教育”活动。卫斯理宗的信徒从创立者那里继承了一种特别强烈的信念，即认为儿童生而有罪。这种信念表现得如此强烈——在卫斯理的例子中——甚至使一些耶稣会士也逊色了：

> 必须及时制服他们的意志。在他们能够独立行走之前，会说一些简单的话之前，或在会说话之前就必须加以驯服。不管多么痛苦，你若不愿糟蹋孩子，就应制服他们的意志。孩子从1岁多起就要教他们害怕体罚，轻声哭泣。从那样的年纪开始就要叫他们听话，即使要打他10次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现在就要制服他的意志，他的灵魂将一直存在，他会祝福你直到永远。[61]

在卫斯理创办的金斯伍德学校里，只允许进行严格的功能性质的“消遣”——例如劈木材，挖土，等等——因为“基督的儿童不屑于”游戏和玩耍。（卫斯理很少说言不由衷的话，他曾说：“我要么杀人要么挽救人，非此即彼——要么办一所基督的学校，要么什么也不做”。）只要看看19世纪新主日学校通用的“教材”就会发现其真正目的。卫斯理为成人祈祷用的凄凉的圣歌被艾萨克·瓦茨的《儿童圣歌》或后来作者写的道德教训文章抄本所取代。牙牙学语的儿童学着唱歌，说他们“无论从天性还是从实际 376

[61] 骚塞前引书，第561页。我们从班福德18世纪90年代写的回忆录和托马斯·库帕的《生平》中可以看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新卫斯理的许多信徒把他的教导人道主义化（库帕在19世纪20年代担任卫斯理派的小学校长时，曾经认为不打学生是上帝的恩赐）的例子。此外，参见杰贝兹·邦廷在《描述一项伟大工作的布道》（1805）中所主张的正统的实用主义的说教。

中，都是罪恶的沉沦奴隶”。无所不见的上帝有“锐利的双眼”，注视着他们最“秘密的行为”：

我们犯的每个罪行，
　　我们说的每句脏话，
全都记录在你的可怕的簿子里，
　　到上帝最后的审判之日，必得报应。

当时有一个典型的道德说教故事宣扬这种“教育”的总趋势。[62] 约翰·外斯是个“穷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有许多孩子，他辛苦地劳动，都无法给他们赚来面包，他每天都拼命干活，但只靠燕麦饼和燕麦粥过日子”。他的父亲是个“常常祷告的人”，不停地因为上帝的保佑而感恩，例如他说：“我们一些人本来会死去，但全都活下来了。”约翰的母亲用艾萨克·瓦茨的圣歌来教育他，这是一首赞颂太阳遵守劳动纪律的圣歌：

从东方的居室
　　从早晨开始了奔跑，
他永不疲倦，永不驻足，
　　围绕着世界永放光芒。

我要像太阳那样完成
　　今天的责任，
我要及时开展我的工作，
　　在我神圣的路上永远继续前进。

父母教育约翰说安息日是神圣的，他们讲授种种教诲，要人们尽职、恭顺、勤劳。然后是关于约翰的坏妹妹贝蒂的可怕故事。她星期天出去散步，回家时弄得又湿又脏，还弄丢了一只鞋。父亲

[62] 《穷孩子约翰·外斯的故事：儿童教育资料》（哈里法克斯，1810）。

训斥她，对全家读起摩西的十诫，说在安息日拾柴的人应当被乱石打死，贝蒂的罪比那个人还要严重，不过这次她得到宽恕。但是，更严重的罪行发生了，有些儿童不去上主日学校，反而去踢足球。第二个星期天，这些儿童受到警告，并对他们讲了一个故事，说42名儿童由于嘲弄年迈的以利亚，仁慈的上帝下令将他们撕碎。于是孩子们唱起了瓦茨的另一首圣歌： 377

一群嬉戏的孩童，

如此对待年迈的以利沙；

叫这位先知走开，

"滚吧！你这个秃头，滚吧！"

上帝立即制止了他们邪恶的喊叫，

派来两只狂怒的熊，

把他们撕成一片又一片，

鲜血淋淋，一片呻吟和眼泪。

最后，约翰和他的父亲的虔诚获得了报偿，他们由于耐心地安于贫困，深深地感动了一位外地人，让他们继承了一大笔财产。

人们也许会发笑，但是对儿童施加的心理暴行在他们看来却真实得可怕。人们可以怀疑不久前一位作者强调的说法，即清教徒使用（一种很紧的襁褓）均匀包扎婴儿并对婴儿进行便溺训练，这能造成抑制效果。对此，尽管怀疑，这种观点却是无法驳斥的。[13] 但不论在大多数教科书中为何重复着陈词滥调，作为这个时期教会的"教育启蒙"，主日学校确实是村庄女私塾令人敬畏的替代品。18世纪贫民教育的设施——尽管不充分，拼

⑬ G.R.泰勒前引书。

拼凑凑——但毕竟还是某种教育设施，即使（如同申斯顿的女校教师所说的）这种学校只教给孩子认花草的名称。在反对法国革命时期，主导的福音派观点毒害了这种教育，教育的功能自始至终变成对穷人的孩子的“道德拯救”。[54] 不仅教儿童写作受到诘难，而且很多主日学校的教师听任学生们不会阅读。按照《旧约》的观点，认为如此开导至少是上帝的祝福。还有些孩子获得的知识不比一个小女孩对某个调查矿山童工问题的皇家特派员所说的更多：“我过去不知道，昨天他们在学校里才告诉我，如果我死的时候是个好姑娘，便会升天堂，倘若我是个坏姑娘，就会在硫磺石上被火烧死。”[55] 儿童在青春期以前很久就已在主日学校或家中（如果他们的父母虔诚的话）受到某种最动感情的压制，要他们忏悔自己的罪过，获得一种得救感。许多儿童像托马斯·库珀小时候一样“每天 20 次去到某个秘密的地方，虔诚地祈祷以求得到宽恕……”。[56]

莱基所谓的“宗教恐怖”，对一个不向穷人儿童提供可选择的教育手段的社会来说，的确一点也不过分，至少在兰开郡慈善学校运动出现以前是不过分的。在兰开郡学校运动中，真正的教育目标以及用工业生产知识来训练儿童的功利主义倾向冲淡了“道德拯救”的观念。[57] 但是——现在讲我们的第二个理由——我们应当注意不要依据主日学校的初级读本的证据或邦廷一类人的传道而把各福音派教堂描述得太苍白太粗糙。正统的卫斯理宗牧师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一回事，许多团体中所发生

378

---

[54] 参见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1961)，第 135—136 页。

[55] 摘自哈蒙德夫妇：《沙夫茨伯里勋爵》（企鹅版），第 74 页。

[56] 库帕：《生平》，第 37 页。

[57] 今天有些作者揭露商业化地滥用交流媒介造成了人的贬值。我认为他们由于忽视了早期那种群众灌输的性质及其程度，从而夸大了这方面。

的实际状况可能是另一回事。这里,我们就涉及了第二条理由。旧派的"阿明尼乌斯派"卫斯理教徒对主日学校的教学持有一种比较人道的态度,新教团的卫斯理宗比正统派的卫斯理宗信徒在方法上更为理智。我们已经提到(《设菲尔德彩虹报》的)詹姆斯·蒙哥马利领导了设菲尔德非国教徒的斗争,要求在主日学校的教学大纲中保留教儿童写作的课程。自愿提供服务的世俗教师不那么拘泥于宗教的教义,连续不断的紧张局面有时可能产生意外的结果。1798 年,博尔顿的一位牧师写信给波特公爵说:

> 即使我们的主日学校有时也会变成宗派的温床,我们已经发现有一个人在校长的名义下进行联合英格兰人的宣誓,这样的事例最少发生过一次。[58]

1817 到 1820 年间,约瑟夫·哈里森牧师和斯托克波特政治联盟掀起了激进派的主日学校运动。这些学校的成员中有些是 379 过去正统学校的教师和学者,于是,尤尔博士在 19 世纪 30 年代所竭力推荐的"静悄悄的堡垒",即斯托克波特的主日学校,现在就被完全包围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被取代)。[59]

这不仅应当从学校的内部,而且应当联系到卫斯理教堂普遍的影响来看待这个问题。作为一种说教,卫斯理宗表现为无情劳动的思想,但在实践中,这种说教根据它所处社会集团的要求、价值观和社会关系模式,而在不同的程度上被调和了、人道主义化了并且改变了形式。教会毕竟不仅仅是个教堂,也不仅仅是牧师的传教和讲道。教会还包含着小组集会、缝纫小组、筹

---

[58] 托马斯·班克罗夫特牧师 1798 年 2 月 12 日的信,枢密院档案,第 A. 152 号。

[59] 见 D. 里德:《彼得卢》(曼彻斯特,1957),第 51 页起,亦见下文,第 717 页。

集捐款等等活动，地方传教士往往在工作之余步行数英里远的路程，来到牧师们足迹鲜到的边远村庄，参加那里的小型宗教仪式。卫斯理教徒们的团体景象通常被描述得太欢快了，它甚至强调得把教会的其他特征全都遗忘。[60] 但是，卫斯理宗打开教堂的大门，为工业革命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某种团体，以取代正在瓦解的旧社团模式。作为非国教的（虽然是不民主的）教会，劳动者觉得可以将它变成自己所有。在卫斯理宗扎根的地区（矿区、渔村和纺织村），社会联系交织越紧，这种情况就越如此。

在那些年代，卫斯理宗教会成员的"入场券"对于许多人来说的确非常重要，甚至达到了令人崇拜的程度。对于浪迹人间的工人来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这是进入新群体的"入场券"。在这个宗教团体内（正如我们所见）有它自己的戏剧、自己的等级地位和个人重要性，有它自己的蜚短流长，和成员间许许多多的互相帮助。团体内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尽管教士们极少是出身贫困家庭。当这些男人和妇女在教会里面时，都感到自己在一个不那样敌对的世界里，有了一点某种地位。他们也许会因为自己的谨慎或贞洁，或虔诚而得到别人的承认。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积极方面，例如有助于家庭的稳定等等，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回过来讲一讲。说到清教徒，他们的身份不能看做仅仅是为教会和雇主服务的。一旦发生变化，人们扮演原来角色时的献身精神也照样在工会和汉普登俱乐部的干部们身上表现出来。他们自学到深夜，有指导工人阶级组织的责任感。在分析卫斯理宗的意识形态时，我们做出了一个

380

[60] 早年的教会团体的意识，见 L. F. 丘奇以同情口吻写的著作《早期的卫斯理宗的人们》（1948），这类著作很多，亦可见韦尔默思博士的著作。

合理的概括。在社会生活之流中，简单的常识、同情心、旧的社会传统的顽固生命力等等全都融合在一起，调和它的禁区界限。

第三个原因是在拿破仑战争年代，劳动人民格外听任卫斯理宗的渗透。这也许是最有趣的原因，却很少被提及。为了便于探讨，最好是回忆一下卫斯理宗和浸礼派以及更小教派的信仰复兴运动的歇斯底里劲头。在工业革命最悲惨的那些年代里，多个工业地区都广泛地使用了真正的麻醉剂。查尔斯·金斯利所使用的"群众的鸦片"一语，使我们想起许多劳动人民皈依宗教是为了求得"安慰"，尽管卫斯理宗的教义所鼓舞的梦想并不那么美妙。复兴派传教士们的激动的感情是他们吸引人们注意的方法：神情紧张的开场白；逼真地描述暴死和悲惨的结局；用泛泛的词藻谈论罪的深重；戏剧性地提供赎罪机会。于是户外的人群和早入卫斯理宗的会众，也因产生强烈的"热情"——神魂颠倒、呻吟、大叫、哭泣，陷入突然之间的发作而引人瞩目。骚塞曾经指出宗教复兴主义十分类似于催眠术：卫斯理"引起一种新疾病，他不是用医学理论而是用神学理论来说明这种疾病。"[61] 这些症状有时表现为剧烈的群众性歇斯底里，就像卫斯理在1788年3月的日记中记载的布里斯托尔的事件那样："全体与会者迅如闪电般爆发出强烈的喊叫声"：

> 恐怖和混乱不可名状。你可以把那想象为一座正在被风暴袭击的城市，人们强烈地相互冲撞，长凳摔成了碎片，十分之九的会众都因这种狂热而震惊。

381

1786年的记载表明，在弗里恩河边教堂里，这种歇斯底里已经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形式：

> 其中一些人，也许是许多人，一起拼命高声嘶喊。有人

---

[61] 骚塞前引书，第382页起。

> 在祈祷时用词不当甚至鄙俗。几个人像死一样倒在地上，犹如尸体一样僵直，但俄顷又跳起来呼唤，赞美主，赞美主……。

卫斯理把这种过分的歇斯底里谴责为“把真正的礼拜变成了丢脸的事情”，[62] 但在整个工业革命期间，卫斯理宗的复兴运动包含着一种形式比较沉默的歇斯底里。狭小的社区、矿工、山区农民或织工起初也许会抵制在他们中间进行户外讲道和祈祷会的运动，然后在“干柴中出现微小的运动”，接着“火焰爆发，就像野地里的荆豆花放在火上，灿烂夺目。”[63]

这种例子取自于从1799至1801年在约克郡西区纺织村庄进行的宣传中，当时全体居民宣称他们都(至少是暂时地)“得救”了。人们很少注意到，在战争期间，卫斯理宗不仅极大地扩展，尤其是在北方工人阶级中的扩展；而且有新的事实证明随着扩展而来的还有歇斯底里。例如在1805至1806年，当时在布雷德福成群追随卫斯理宗的人，“在许多事例中，刚宣布圣经经句，人们就悲痛地哭喊，打断了牧师的话，立刻把牧师的祈祷……变成了一种全体诚挚的代人祷告。”[64] 1816年，德文的一位基督教圣经主义派的牧师在日记中洋洋得意地写道：“当我正在讲道时，3个人倒在地上。我们祈祷时，又有几个人倒下，我敢肯定有6个人找到了安宁。”这个教派在荒原的农民和农业工人中做礼拜时常常伴随着强烈的感情爆发，匍匐在地，“高呼赞美”以及“忏悔者大声而虔诚的恸哭。”[65]

卫斯理宗也许可以阻止革命；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它在战

---

[62] 见R.A.诺克斯前引书，有关“热情”的讨论，第520—535页。

[63] F.A.威斯特：《乔纳森·萨维尔回忆录》(哈里法克斯，1844)。

[64] W.M.斯坦普：《布雷德福卫斯理宗大事记》(1841)，第85页。

[65] F.W.伯恩：《基督教圣经主义派》(1905)，第36—42页。

争期间的迅速发展是反革命心理作用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一种看法认为，强调来世的任何宗教都是失败者和失望者的千年王国。卡尔·曼海姆在叙述另一种宗教运动时说过这样一番话："乌托邦的幻想引出一种相反的幻想，革命者千年王国的乐观主义最终将导致顺从的保守态度的形成。……"他还给我们指出了解这种心理作用的线索： 382

> 千年王国总是伴随着革命的爆发而兴起，并为革命提供精神支柱。当这种精神消退并背离运动时，留在世上的就是赤裸裸的群众狂乱以及失去精神支柱的狂想。[66]

在18世纪90年代的英国，由于革命的推动力尚未达到"爆发"点就受阻了，所以当精神消退时，反动也就没有落到"狂乱"的程度，在这几十年里出现的许多现象大概也只能这样来解释。18世纪90年代末，随着英国雅各宾派的溃败，随着战争的爆发和理查德·布拉泽斯被关进疯人院，真正的千年至福说的道理也就终结了。但是，在此后的15年中，"新耶路撒冷派"的一些宗派却兴盛起来，[67] 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预言家，像德比郡山区一个偏远村庄(哈克洛)的基督教的惟一神教派牧师埃本内泽·阿尔德雷德那样：

> 他在那里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陷入了梦幻和狂想，掌握了预言术，说在《启示录》中看到了拿破仑，最后，梦见他自命为先知，站在非陆地非水上的地方，宣告一个大城市将要毁灭。……

---

[66] K.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60)，第192—196页。

[67] 1801年3月，菲茨威廉伯爵调查了布拉泽斯在布雷德福的信徒的活动，其为首的是一个名叫扎克乔斯·罗宾逊的织工，他"长期以来就是卫斯理宗的中坚成员，即所谓的小组领导人"。见菲茨威廉文件，F.45(a)号。

他身穿白袍，白发垂肩，驶船泰晤士河上，散发传单，预言末日审判。[68] 他激进神秘，为竞争《启示录》中的〔长老的〕长袍而战斗；他在伯明翰和外滨找到了早已被湮没的以色列人部落；他所发现的"证据"说明："大英帝国是弥赛亚的特别领地，是他所许诺的海上领地。"[69]

不过，能够证明"失去精神支柱的狂怒"的最令人吃惊的事例是围绕着——而且持久不衰——最大的女预言家乔安娜·索思科特而展开的。1801 年，她第一本古怪的预言小册子《信仰的奇怪效应》出版了。于是，出现了预想中的狂热气氛，这位德文的农家女儿和家庭女仆名声大噪，其声望在农村中迅速流传。她的感染力奇怪地混合着许多成分，其中包括对古代英国的生动的迷信想象，特别在她老家的西部地区印象尤强。1811 年的《汤顿信使报》上写道：

> 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普遍充斥于西部各郡，而几乎在所有的村庄，人们都依赖至少一个精通"地狱的黑色语法"的人。这个桑福德的妖女一度赢得了成千上万的信徒。……[70]

卫斯理宗圣餐式中有凄惨的想象和狂热(按照骚塞的说法)，乔安娜"热烈地依附"在其中。[71] 乔安娜的文风是一种奇怪的混合，既有神秘的打油诗，又有机智而带文学色彩的自传体散文——如对童年回忆的记载，痛苦的爱情经历，以及倔犟的农家女儿与不虔诚的牧师和乡绅之间的冲突等等。尤其有那些年战

---

[68] T.A.沃德前引书，第 188—189 页；伊本—伊泽：《小书》(1811)。

[69] R.韦奇伍德：《回忆录》(1814)。

[70] 摘自《阿尔弗雷德报》，1811 年 8 月 24 日。关于被魔鬼缠身的妇女以及一位"自称为基督"的妇女，亦可见 F.W.伯恩前引书，第 55、64—65 页。

[71] 骚塞《英国通信》(1808，第 2 版)，第 3 卷，第 238 页。

争带来的苦难以及对战争的厌倦，有对千年至福的期望；就是那个时代，布拉泽斯的信徒们整天生活在希望获得新启示的期待中，在那个时代：

一个疯子把他的梦幻印成书，另一个疯子刊登他的白日梦；一个人看见天使手持出鞘的宝剑从太阳里飞出来，另一个人看见恶龙在空中飞翔，而一群天使则排成战阵……下等人……开始相信，七玺即将开封……[72]

乔安娜不是圣女贞德，但她具有圣女贞德对穷人的一种感染力，即让他们感觉到，启示落到农民女儿的头上，与落到国王头上是同样地容易。她被人们看做是布拉泽斯真正的继承者，她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亲信，其中还包括几名受过教育的男女信徒。（如果说布莱克的那些预言性书籍可部分地视为极近于流行预言口气的一种风格独特的作品；他的一位熟人，过去的"雅各宾派"、雕刻工威廉·夏普，则是完全忠于乔安娜的信徒）。384 不过，乔安娜的感染力在西部和北部（布里斯托尔，兰开郡南部，约克郡西区和底斯河畔的斯托克顿）的工人当中表现得最为强烈。

啊，英格兰！啊，英格兰！英格兰！斧头砍在树上，树一定会被砍倒。你们不知道何日将获得天赐……深夜将要降临在你们大家的头上，将向你们发怒。我警告你们，危险迫在眉睫，一切即将实现。"他是谁？那从以东来的人，穿着波斯拉[73]的染色长袍，说着正义的言语，他威力无穷，能拯救一切信仰他的人。至于我的敌人，我要在愤怒中践踏他们，在我狂怒中蹂躏他们，复

[72] 同上书，第3卷，第232页。

[73] 以东和波斯拉是《圣经》中的地名。——译注

仇的日子已在我的心中，我的赎罪之年即将来临。”

乔安娜的预言不过是很含糊地表达启示录中恐怖场面的情景和灾难的预兆，所以易于用在拿破仑一世时代的欧洲那时的恐慌和动荡，而波拿巴自己就是野兽的形象。她的举止缺乏布拉泽斯的革命特色，但她的启示十分明确，犹如绵羊和山羊不可混同一群。上帝让乔安娜代他宣布：“大地将充满我的仁慈，地狱将充满我的恐怖……我的怒火将前去，我的爱和仁慈将尽力拯救一切追随我的人。”

> 醒来吧！醒来吧！啊，锡安山，穿上你那美丽的长袍，啊，耶路撒冷。我将立即降临……我将摧毁高贵者的骄傲，我将使温顺的人鼓起勇气……”

被得救的人将进入多荫的乌托邦：

> 当我的人获得拯救，
> 脱离了地狱和罪恶，
> 我将为你们建立新居，
> 宫殿将出现在你们眼前；
> 我贮藏着许多金矿，
> 汹涌的海水冲向岸边，
> 带来无数的珍宝：
> 金刚石矿将出现在眼前……
> 我有阿斐的金子，将用来
> 重建耶路撒冷，
> 那些首先获得拯救的人们
> 将会说，这些就是我们的保证……

385 这里听到潘恩关于“恶徒及其武装匪帮”的回声[74]，甚至暗示土

[74] 指国王与贵族。——译注

地将回到劳动人民的手中：

现在我要让继承者获得自由，
遣散一切受束缚的人，
真的继承者将不须怀疑；
我将剥夺这类恶徒，
让真正的继承者取而代之
为了拥有这片土地……

事情可能是这样：乔安娜·索思科特不是骗子，而是个简单和常常自疑的妇女，是她自己心理不平衡和轻信的牺牲品。(有人认为，在“怂恿”她的那个圈子中，有些人可能更加厉害。) 她的“呼声”转换为文字表达时反映出一种哀切之情，上帝指示她传谕的长篇大论中充满了对乔安娜本人能力的最高褒奖：

大地上已出现新的事物，
自从大地的基石奠立我就告诉你在这儿，
如此非凡的女人从来就不卑贱，

在最优秀的信徒的如此奉承下，她能够对那些轻信的人施加心理恐吓术，比宣讲地狱之火的牧师们并不稍少恐怖。有一天，她在销售完毕打扫完屋子之后，“在主的同意下，似乎是偶然地发现了”一个普通的印章。从此以后，她的信徒——“乔安娜们”或索思科特派——可以从她那里获得一个特别的印信，这是一个获得承诺的记号，凡带有这种记号的人都可以“继承生命之树，成为主的继承人，同耶稣基督同为主的继承人。”千年至福的承诺只给那些“带有印信的人”，而藐视她的人将会受到更可怕的威胁：

如果敌人增加，我在这里要告诉你，
悲哀也将随他们很快地增加，

战祸连连，因她的激动他们永不休止

除非人们的心归向于我

才能摆脱对你粗暴的迫害。

成千上万的人（一种估计为10万人）就这样“带上了印信”。一时间，出现了一个印信的市场，堪与中世纪晚期的那种出售基督受难十字架遗留的残片的市场相比。感情的失衡不仅表现在“乔安娜们”的热忱上，而且表现在暴徒们相应的狂暴感情上，乃至有时候会对她手下的那些预言家进行攻击。索思科特派决不是一种革命的千年王国，它决不会鼓励人们采取有效的社会行动，也决不会对现实的世界宣战。它对《启示录》的热情十分类似于卫斯理派的热情，它把对个人拯救的渴望发展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但是，它无疑是崇拜穷人的，乔安娜的上帝诅咒了英格兰的假“牧人”（即地主和官员），他们密谋提高面包的价格：

假使他们在丰腴之中将穷人陷于饥馑，我就要严厉地惩罚他们。我的审判在这块土地上必将严厉……我对尼尼微、所多玛和蛾摩拉的诅咒，我对雅罗和西顿的诅咒[75]，我对加利利人的诅咒，现在都降临在英格兰牧人的头上。

“巴比伦淫妇”[76]的旧景象恢复了，带有享乐的迷乱，“全国的教士”都被揪出来，说他们全是耶洗别[77]的“情人和奸夫”，他“奸污

---

[75] 尼尼微、所多玛、蛾摩拉和西顿都是《圣经》中的城市，为上帝所毁。——译注

[76] 《圣经》中把巴比伦比作罪恶荒淫的代名词。巴比伦淫妇一词，亦影射骄奢淫逸终将灭亡之意。——译注

[77] 《旧约·列王纪下》载，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王国亚哈王的异族妻耶洗别以无耻恶毒闻名，后被人从窗口扔下而死。——译注

了我的圣经[78]，就像奸夫与淫妇私通一样”。同一切对穷人的歌颂者们一样，他们的痛苦与以色列儿童的苦难被直接地等同起来：“就像法老追杀以色列儿童一样，撒旦将追逐带有印信的人们，从内部去诱惑，从外部去镇压他们……”。有时一切微弱的鉴别意识都消灭在如此混乱的景象之中，而《旧约》中的词句与古代皮斯托尔的韵句交织在一起：

> 出来吧！出来吧！让所多玛感到末日的来临。罗德今在何方？在索亚很安全！她的妻子在何方？她不是全身变成盐柱吗？[79]墙上写着——你这个胆大妄为的人竟敢用上帝的金银器皿狂饮。[80]让巴力粉身碎骨吧！[81]……圣徒现在审判世界。上帝在此掌握权力，发出圣灵的话——剑、白马、众王之王抽出了光芒四射的剑！欢呼吧；圣者们，欢呼吧！……伟大的噩王和亚甲王[82]，你们在何方！你这耶利哥的城墙化为平地吧！约书亚的羊角，第七和第十二，越过了约旦

---

[78] “奸污我的圣经”句中的原文 adulterate，亦作“掺假”解。——译注

[79] 《旧约·创世记》中的故事。所多玛，蛾摩拉，城中的居民恶罪大，最终遭上帝降天火毁灭，亚伯拉罕的侄子罗约住在所多玛，一天有两个天使到他家，所多玛的居民要害天使，罗约宁愿牺牲自己的两个女儿换得天使的安全但无效，天使便拉着罗的一家逃出该城，叫他们快逃命，不要回头看。天火下降焚烧该城，响声震天。罗约之妻未遂天使之嘱，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子。——译注

[80] 《旧约·但以理书》中故事。巴比伦王叫人把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掠夺来的金银器皿拿来作为酒器，大开千人宴会。忽见一只神秘的手在墙上写字，叫人来解释，乃上帝示警，是责备他们竟敢用这些金银器皿来饮酒。当夜，这位巴比伦王即被杀，波斯大利乌王夺取了巴比伦国。——译注

[81] 巴力、邪神、假神。——译注

[82] 噩王是《圣经》中的巴珊王，亚甲王是《圣经》中的亚玛力人国王。——译注

河[83]……救世主的统治——以法莲的家族或律法，十合而为一，维持在犹大支派的周围[84]。——人子统治了以色列——现在枯骨复生了[85]……新娘来了——新郎接受了婚姻的印记。律法和福音现在合为一体——月亮和太阳停在天际[86]——迦勒和约书亚胜利地渡河而恢复家园——汝等迦南人今又何在？汝等疯狂的乌合之众今又何在？——

387 赫梯人走开！休得再来招惹或骚扰；
以色列人之子已经赢得和平，迦南的
　　土地就得了安乐。
看哪！我出现在以东地，身着染血的
长袍；我的儿子们解放了，得救了，

---

[83] 《旧约·约书亚记》故事。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以渡过约旦河。第7天亦第7次绕城，祭司吹角，军民大呼，该城即塌陷，以色列人夺得城乃过河。——译注

[84] 《旧约·创世记》载，亚伯拉罕之孙雅各在归途中遇一人和他摔跤，那人无法取胜遂停手。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放你走”。雅各道了姓名后，那人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从此你叫以色列”（希伯来文以色列是“与神角力的人”）。雅各有12子，繁衍为以色列的12支派，成为以色列民族。12子有个叫犹大的。其子孙住在耶路撒冷以南的地区，为犹大国。犹大之弟叫约瑟。约瑟有两子名以法莲和玛拿西。此二人后来又各成一个支派。按：以色列民族其他支派以后都流散了，只有犹大国一直保持民族特色，今之犹太人的历史，基本上是犹大支派的历史。——译注

[85] 《旧约·以西结书》载，古以色列人久受亡国之苦，失望消沉。先知以西结受上帝感召，去骸骨遍野的平原，忽闻响声震动，见枯骨复生为人，成为一大支军队。——译注

[86] 《旧约·约书亚记》载，古希伯来人领袖约书亚率众进入迦南地区时，在基遍城郊击溃守敌，敌争相逃命。约书亚祷告上帝，要太阳停在基遍，月亮停在亚雅仑谷，以便全歼敌人。上帝恩准日月停留天上约有一天。——译注

沐浴在紫色的潮中[57] ……

第一次这样狂热的歌颂与崇拜是在1801至1804年;1814年再度进入高潮,那一年,上了年纪的乔安娜病态地怀孕了,许愿要生下上帝之子"希罗"。在约克郡西区,"整个地区出现了一批留胡须的预言家",而兰开郡的艾什顿后来成为北方"乔安娜派"的"中心"。[58] 1814年的最后一个星期,这位女先知去世了,悲剧性地幻灭在她自己的"声音"中,但事实却证明其崇拜有特别的根基,一个又一个人声称自己有权继承这位女先知的衣钵,其中最著名的是布雷德福的一名梳毛工,名叫约翰·罗。索思科特派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派生出来的变种,直到19世纪末以前,他们都在证明自己有能力突然闪现出救世主的活力。[59]

索思科特崇拜无疑在卫斯理宗阵营中造成一场大混乱,特别是在布里斯托尔、兰开郡和约克郡。乔安娜的一些神学论战文章的确是针对卫斯理宗的。她指责他们坚持"加尔文派"的信条,因而

---

[57] 最后一行话不是乔安娜写的,而是她的信徒即"一位极受尊敬的绅士思想中的一小部分"。其他的,全是乔安娜写的。见《信仰的奇怪效应》,第5卷,第235页;第6卷,第275页;《预言的连续性》(1802),第15、48—49页;《及时的劝告》(1803),第17页;《向聪明人进一言》(1803),第32页;《圣上发出了警告》(1804),第31、45页,《警世之言》(1804),第8页;《文集与文集选》(1804),第49页;《通信录》(1804),第44—45页;《答利兹信使报的五项指责》(1805),第20—21页;《上帝和心灵的交流》(1809),第20、39页。亦见G.R.巴尔兰:《发现过去》(1956),第1—7章;夏普:《对世界的回答》(1806)。

[58] 这种崇拜的信徒必须留胡子。关于索思科特派向北方的渗透,见J.克罗斯利:《J.科金牧师的讲道词质疑》(利兹,1806);G.特纳:《为上帝的荣耀辩护》(利兹,1807);W.库克·泰勒前引书,第230页;F.皮尔:《斯彭河谷的非国教派》,第187—188页。

[59] 见G.R.巴尔兰前引书,第8到14章;W.H.G.阿米塔奇:《人间天国》第274—276页;并见下文,第799—802页。

> 把众人的造物主与天父弄成如此残忍的一个形象，这种形象竟无言可以表达，无笔可以描绘，而他本来是把爱普及四方，把仁慈施于一切人的。[90]

卫斯理宗与索思科特派相比，当然有许多优势，他们有稳定的组织，有经费，还有政府当局对他们的宽厚态度。在索思科特崇拜中失去的人，他们很快又能争取回来。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这种崇拜看成仅仅是一种"反常行为，"与社会发展的麻木倾向毫无关系。相反，我们应当认为这个年代的"乔安娜们"与卫斯理宗的复兴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战争是巡回俗人传教士的黄金时代，他们有"虔诚的精力爆发，渴望天国、像天使般销魂"[91] ——那种"彻头彻尾的胡言乱语"使科贝特怒火中烧，他说：

> 他们的天赋才华，他们的天命，他们的神灵启示，他们在内心感到的神恩以及他们其余的那些听不清楚的诉哀絮叨，都是对常情的粗劣而猖狂的凌辱，是国家的一大丑闻。只要这样一个教派还在日日发展，我们自夸为文明之国是没有用的[92]。

像正统的卫斯理宗一样地发达起来的还有"喧骚派教众"的一些分离出来的宗派团体——颤动派（传到美国叫"震教派"）、原教旨卫斯理派、"帐篷卫斯理派"、陷入恍惚之中或称为"幻觉派"的"魔力卫斯理派（活动于德莱米尔森林）、布赖恩派即圣经主义派、沃林顿的"贵格派卫斯理宗"以及麦克尔斯菲尔德的"独立卫斯理宗"。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英格兰的信仰复兴运动的使者们

---

[90] 《上帝和心灵的交流》(1809)，第 33 页。

[91] 哈里法克斯剧院皇家剧目单，1793 年。

[92] 见《政治纪事报》，1813 年 6 月 12 日。

穿街走巷地呼喊："归心于上帝吧！寻求拯救吧！"

人们感到吃惊的不仅是一种不平衡感，而且是改皈卫斯理宗现象的不持久性。教徒数的上升曲线是迷惑人的，我们知道的倒是复兴主义者人数的上升下降的变化，亦即希望时期与失望和心灵苦恼时期之间的一种摇摆现象。1795 年以后，穷人再次陷入屈辱的低谷。但是，他们不是心甘情愿的，而是带着对过去的眷恋。每当又有了希望时，宗教的复兴主义就被抛到一旁，只是在政治上获得解救的希望被推倒时，才在其废墟上重燃狂热。从这个意义上看，卫斯理派在 1790 至 1830 年的人数大增才可视为一种绝望的千年至福论的复兴。

我们这里不对这一时期作习惯上的解读，而是提出一种假设，需要更详细的考察。在法国革命前夕，卫斯理宗声称在大不列颠有 6 万名信徒。这说明它只不过在几个工业地区有立足点罢了。嗣后，据称数字增加到：1795 年为 90347 人；1805 年为 10.7 人；1811 年为 15.4 万人；1827 年为 23.7 万人。[93] 复兴运动吸收新成员最快的年份是 1797 至 1800 年，1805 至 1807 年，1813 至 1818 年，1823 至 1824 年，1831 至 1834 年。这些年份与政治觉悟最高涨和政治活动最活跃的年份非常吻合，霍布斯鲍姆博士因此正确地指出，我们应当注意"宗教、社会与政治觉悟引人注目地平行发展"。[94] 不过，政治与宗教激奋之间的关系

---

[93] 这些数字包括新教团和一些较大的团体，但不包括北威尔士的加尔文式卫斯理宗。1815 年成员超过 1000 名的正统卫斯理宗巡回教区据说包括伦敦、布里斯托尔、雷德卢思、圣艾夫斯、伯明翰、伯斯莱姆、麦克尔斯菲尔德、曼彻斯特、博尔顿、利物浦、科恩、诺丁汉、设菲尔德、利兹、伯斯塔尔、布雷德福、哈里法克斯、马恩岛、桑德兰、威克菲尔德、杜斯伯里、埃普沃思、约克·赫尔、达林顿、巴纳德堡、纽卡斯尔和希尔兹。见 M.E.爱德华兹：《拿破仑时期卫斯理宗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伦敦博士论文，1934），244 页。

[94] 《绿林好汉》，第 129—130 页。

之密切虽然显而易见，但这种关系的性质尚不清楚：那种所谓“卫斯理宗随着激进运动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激进主义的衰落而停止发展”[85] 的结论，却未必就能够顺理成章。可能的情况是哪里的“政治”亦即世俗的期望受到挫折，宗教复兴主义就恰恰在哪里得势。这样，我们差不多可以从与法国大革命及其《人权宣言》相关联的意义深远的感情激荡的局面着手提出一幅说明信仰问题的曲线图。18 世纪 90 年代早期出现了世俗的雅各宾主义以及理查德·布拉泽斯的千年至福派的期待；18 世纪 90 年代末和 19 世纪，有卫斯理宗的复兴运动以及“乔安娜们”的狂热。不止一个同时代的目击者证明他们同出一源并吸引了同一批听道的群众。[86] 卢德运动（1811 至 1812 年）以后一个宗教复兴主义的新浪潮，让位于 1816 至 1817 年冬天的政治复兴。在这最后的两年，原教旨卫斯理宗向诺丁汉郡、德比郡和莱斯特郡的织袜工人村庄渗透，宗教复兴运动与政治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密切了。据说，在 1816 年的圣灵降临节，有 12000 人参加了诺丁汉森林的野营集会。从 1816 年秋至 1817 年夏，民众的热情似乎被激进派的鼓动所吸引，并在 1817 年 6 月的彭特里奇的“起义”中达到顶点。在这次“起义”中，至少有一名地方教士起着领导作用。但是，1817 至 1818 年在这些郡发生的原教旨卫斯理宗大复兴（“所经历的……非凡的复兴运动之一”）似

390

---

[85] 见 E. J. 霍布斯鲍姆：《卫斯理宗与革命的威胁》，载《今日历史》，第 7 卷，(1957)，第 124 页。

[86] L. 罕特前引书，前言，第 14 页。

乎是在彭特里奇的悲剧以后才爆发的。[47] 在战后的10年中，1819年是政治活动达到高峰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复兴运动并不显著；然而，1831至1834年间宗教复兴运动的热情也许有一部分要归因于"最后的劳工起义"的后果所导致的南方和东方的农业各郡所发生的运动。[48]

这里只是一种推测。要想进一步了解，就不仅应当逐年地，而且应当逐月地了解复兴运动；不仅应当了解各个郡，而且应当了解市镇和村庄。此外，原教旨卫斯理宗或圣经基督教派与政治鼓动之间的关系与正统卫斯理宗有很大不同。对经历过复兴运动的教堂所做的一项详细的考察表明，它们的进展不是稳定向上的运动，（由几次因群众大皈依而突起的上升斜线来点缀，）其更多的是处于上下跳动的状态，每次信徒的猛增就有一次倒退相随。托马斯·库珀在19世纪20年代皈依，他所做的叙述可以视为一个典型。他说："榜样具有巨大的感染力。数百人在（康斯博罗）镇和巡回区内开始为神圣的皈依而祈祷。……"在几个星期里，他感到自己在"神圣的人间天堂里"化为善人。但后来他又回到了人间，在他执教的学校里对学童发脾气，于是又失去善人感：

> 城里，巡回区的村庄里有几十个信徒的经历同我相似。教团各巡回区都有这种经历。所谓"复兴"往往始于某个或更多的人努力寻求圣人。这个话题点燃了他人的

---

[47] H.B.肯德尔：《原旨卫斯理宗史》（1919），第7—8、31页。肯德尔记载过一个传说，可以肯定信仰复兴的作用，据说1817年有一名"卢德分子"正在思考暗杀行动而在他履行使命时被擒但却只把他带进了教堂而已。关于彭特里奇起义，参见下文，第659—669页。

[48] 相类似的是，阿米塔什教授也发现，19世纪80年代从工业地区向天国摩门教城移民人数最多的年份恰恰是宪章派最不活跃的年份，参见下文，第802页。

希望……有时一个巡回教区充满激情达数月之久。但是，退步却无一例外地开始了……[98]

库珀叙述了他的经历。但是，从社会过程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它与物理上的振幅相比拟，以宗教复兴为负极，以激进的391 政治运动（带上了革命的千年至福派色彩）为正极。连结两极的则始终是"以色列的子孙"这样一种概念。在一极上，绝望的千年至福说把卫斯理宗劳动者降到人类最低下的地位上。牧师不断地告诫他们要反对改革派，因为他们都是"无赖"："我们……应当静静地等候着上帝的拯救。时间一到，他就会救出自己最宠爱的子民"。[99] 当上这种"子民"，他的工具有时就会被捣毁，他们自己会被人们怀疑是雇主的"密探"，而被拒之于工会大门之外。科贝特进一步对卫斯理宗攻击说："在北方的人们当中，他们充当了密探，是靠别人流血来挣钱的人。"[100]

另一方面，似乎是要否定这种说法，在19世纪，卫斯理宗的工人其实正是地方传教士——他们三三五五地分散多处——作为活跃的工人在工人阶级政界各领域不断地出现。有一些是卫斯理宗雅各宾分子，较多的是卫斯理宗卢德派分子，许多卫斯理宗的织工参加了彼得卢的示威，还有卫斯理宗工会主义分子和宪章派。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创始者**（矿井工人中的工会主义及后来的农业工会主义例外）：创始者的角色往往由欧文主义分子和宗教自由派来充当，他们来自不同的道德根源。但是他们常被认为是热心的雄辩家和组织者，并且——即

---

[98] T.库珀：《自传》，第85—86页。

[99] 这句话出自一篇激进派短文《卫斯理宗牧师与改革派对话》（纽卡斯尔，1819），指责从一位卫斯理宗牧师口中说出来的，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卫斯理宗布道的语言。

[100] 《政治纪事报》，1824年1月3日。

使在他们被赶出卫斯理教会之后——仍怀着对他们的团体的信心去说服人们。

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卫斯理理论的核心中的许多张力。正如对性欲的压制一直有被引向反面之虞——要么引向典型的清教徒叛逆（劳伦斯的先驱者）的形式，要么引向唯信仰论形式；所以卫斯理宗的集权教义常常会培植出与意志自由论对立的理论。卫斯理宗（与福音派中相应的宗派一样）是很有政治意识的宗教，在1789年以前的100年里，反国教按其流行的理论有两大敌人：原罪和教皇。但是，到18世纪90年代，仇恨的指向发生急剧转变；教皇不再坐在遭受天谴威胁的位置上，取代他的是拾级而上的汤姆·潘恩。邦廷宣布："卫斯理宗像仇恨罪恶一样仇恨民主"。但是，不断地进行反对雅各宾派的布道，也把这个问题放在了公众意识的前面。在处境困难的时候，或者在政治热情进入高潮的时候，"被抑制的敌对情绪"[⑩] 会在卫斯理宗的工人心中迸发出来；随着宗教复兴运动的迅速发展，雅各宾即激进思想就迅速传播开来，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92

其次，我们应当记住作为路德教特征的宗教平等和世俗平等之间的冲突。劳动人民在《旧约》中找到的不仅是一个复仇心重而专权的上帝，也找到他们自己磨难的象征。正是这富有象征意义的文本（与《天路历程》一起）被千年至福派、"乔安娜"、"颤动派"和正统的卫斯理派所坚信。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能为其信徒们完全理解：在实践时它们被感情用事的和经验的评判分解成千百个意向。工人阶级社区把自己的互相帮助、邻里关系和团结的价值观带进了教堂。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

⑩ 参见E.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1960)，第81—83页。

到，若把织工和矿工们日常的经历放在一边，那些希伯莱世系、咒语和编年史早就有如不可信的神秘而无意义的非洲神祇一般。圣经的经文总要跳入眼帘而且几乎适用于任何情况。看起来，他们既可以以阶级斗争的人物出现，也可以以宗教朝圣者的姿态出现。1801 年的"地下活动"就属于这种情况，根据可靠的报道，兰开郡的密谋者就是凭着《以西结书》宣誓的：

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罪恶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已到。

主耶和华如是说，当除掉冠、摘下冕，景况必不再像生前。要使卑者升为高，使高者降为卑。

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也必不再有，直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

有刀、有拔出来的刀，已经擦亮，为行杀戮，使它像闪电以行吞灭。[48]

393 我们也在纽卡斯尔区看到独立卫斯理宗那些不取薪俸的牧师之一所说的话(这个团体开除了那些激进的世俗牧师后，在 1819 年就瓦解了)：

不平等的法律和一个偏心的政府在人人胸中种植荆棘，把阴郁播在每张脸上……统治者就是这样，他们的藤是所多玛的藤，田地就是蛾摩拉的田地；他们的葡萄是恶毒的葡萄，他们那一串一串都是苦的。他们的酒是龙的毒，是毒蛇残忍的毒液。但是，在弥赛亚的王

---

[48] R.F.韦尔默思：《卫斯理宗与工人运动，1800—1850》，第 61 页；《圣经·以西结书》，第 21 章，第 25—28 节。有趣的是英国平等派也使用了这些章节，杰勒德·温斯坦莱：《丛林之火》(1650)中说："你们这世上压迫人的权力……你们可还记得；你们将倾覆、倾覆、倾覆，这将降临在你们身上……"其他例子可见下文，第 512 页。

国，和平如河水流淌……上帝权力的力量来自天国，不
是压迫的权力。[⑭]

在这方面，即使在主日学校的“堡垒”里，也可能滋长叛逆。19 世纪托德莫登的一份筹款名单上罗列了为罢工而捐款者的姓名，都用假名进行登记，这份名单使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感情”，在当时的工业危机时期，教堂和小酒店正在从事共同的事业：

	镑	先令	便士
一个遗憾地看到有人头戴时代元银冠并笃信所罗门之真理、箴言第 27 章第 22 节的人	0	2	6
带着笨蛋的老练家伙	0	0	2
坚持真理者	0	0	6
兔狗小酒店	0	0	6
爱慈悲、行正义者	0	0	4
该死的老家伙	0	0	2
塞进一个塔姆的老婆	0	0	2
法律顾问	0	1	0
皇家乔治小客栈	0	1	0
叫老罗伯特肖读一读《耶利米书》第 22 章第 13 节的人[⑮]	0	0	6
东伍德的织工们	0	5	4
如果乔斯的狄克夫人不让我们			

⑭ H.凯利：《山上采出的石头》（纽卡斯尔，1821），第 13 页；凯利：《独立卫斯理宗信史》（纽卡斯尔，1824）。

⑮ 作者拥有此单据。建议参阅“耶利米书”下列文句：“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

烧那些报告，老桑德堡、克劳格就会要她穿半个星期的裙腰垫	0	4	3.5
穿上衣的家伙	0	0	2
割下他的尾巴再缝上以示惩罚	0	0	4

394

但是，要把1790至1830年之间反叛的卫斯理宗世俗牧师及其他一些人参与极端的激进活动说成是“卫斯理宗”对工人运动的“贡献”，那就像把在极端的唯信仰论者之间实行两性同居无须履行结婚仪式说成是“清教徒对性解放的贡献”一样地荒谬可笑。两者都是反作用的文化方式。清教徒中间的性叛逆者（例如劳伦斯）对男女之间的“正当关系”深为关切，在这一点上他仍是一个“清教徒”。所以，卫斯理宗的政治叛逆者具有深厚的道德热诚、正义感和“天职”感，为维护组织的忠诚而具有的“循规”的能力，以及（在其最佳状态下）高度的个人责任感。我们在曾参加彭特里奇起义的卫斯理宗信徒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中有一名在德比以谋反罪被处死，他“一直是巡回教区中最能干的地方传教士”。[16] 我们在塞缪尔·班德福的优良品德以及他在1819年的示威中倡导自我约束的行为里也看到了这一点。我们还在洛夫莱斯、多彻斯特劳动人民和“托帕德尔蒙难者”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每当民众的骚动厉害起来之时，这种“离经叛道”就明显起来了。确实，到19世纪30年代（无视邦廷的旧卫道士们如何用诅咒和开除的手段以维护其地位），整个的地区，特别是织工和织袜工人的地区，都在把自己的卫斯理宗信仰与宪章运动结合起来。

另外一些因素也影响了这个过程。到19世纪初，领取薪俸的职业卫斯理宗牧师团和志愿的世俗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明显紧

[16] 本杰明·格雷戈里：《自传回忆录》(1903)，第126—129页。

张起来。许多俗人教徒对于把正统卫斯理宗的最高行政权交给一小批强行任命的牧师感到不满，基勒姆派新教团的退出并没有平息他们的不满。科贝特一再讽刺卫斯理宗大会是“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他说这是新的官僚制度，由“世上最忙碌和坚定的一班人”所组成，目的是维护他们的现世利益，永久实行新的世袭教职职位，靠穷人一便士一便士奉献的经费过舒适的生活。他认为卫斯理办的学校，金斯伍德学校，是继续培植新贵族的机构。[103] 科贝特就是把这些职业牧师而不是地方的传教士指责为“英格兰的自由的死敌”的：他们

395

> ……像国教教士一样仇恨自由。他们的刻骨仇恨是那些流氓习气的宗教派别的仇恨无法相比的……他们写了一本书又一本书，一篇文章又一篇文章。他们举行了一次又一次邪恶的讲道。他们确实嘲骂……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但你从他们那儿听不到一句反对兰开郡和爱尔兰的奴隶主们的话。相反，他们喋喋不休地告诉人们应当感谢上帝……不是因为他们取得了温饱，而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上帝恩泽天下，而为此他们每星期仅仅交纳1个便士。[104]

科贝特的攻击并非完全没有私心。他曾经用相反的理由而以同样毫无顾忌的方式攻击卫斯理宗，那时他还属于托利党，他发现了德斯帕德中校的一些同伙正是卫

---

[103] 会议成员在“国王的林子里（与‘金斯伍德’谐音）有一所学校，他们的儿子（而不是普通信徒的儿子）在受教育……这也是靠普通信徒出钱维持的……这些儿子就是这样受了教育，时机一到，便冒了出来成为绅士，也就是说……成了地方税务官、收税员、职员和各类官员。”《政治纪事报》，1820年1月27日。

[104] 《政治纪事报》，1824年1月3日

斯理宗教徒。[10]这是他的长期偏见中的一个。19世纪20年代初,他不仅被邦廷的死硬托利派观点和"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激怒了,而且被卫斯理宗教会向参加激进示威的每个教徒收取一便士罚金的做法所激怒。毫无疑问,许多世俗讲道者和小组领导人同他一样厌恶专职的牧师以及在教堂里让有钱人花钱买座位或取得特权的做法。科贝特则竭力激励这样的厌恶心。他写道:"整个星期都在做鞋子的人决不会在星期天去向处境更坏的人宣讲做鞋":

> 成千上万的劳工、工匠和工厂工人决不愿意去传道,他们能比卫斯理宗大会成员更好地传道,这些人大部分一直是劳工和工匠,但他们成了讲道者,因为**讲道比劳动**更舒服。

396 "虔诚而没有私心"的不领取薪俸的地方传教士(在科贝特的描述中)被大会"傲慢的寡头集团"所"**压制**":

> 大会中的先生们对他们蹙眉,把他们看做闯进来的没有资格的人,派他们去小村庄里向几个人或十几个人传道,他们自己却向上千的人传道。现在该是全王国的卫斯理宗的教徒只能去听这些公正的人传道的时候了,如果大会将这些人拒之教堂的大门之外,他们应当在自己家里听,随着他们到仓库里去,或者到树下去。

科贝特给卫斯理宗开出的另一个"药方"是"**拒绝交费**",至少是只向改革派的牧师交费。[13]

---

[10] 1803年7月23日《政治纪事报》:"与德斯帕德一道处死的……有6名叛国者,3名是卫斯理宗信徒,还有1名卫斯理宗的牧师在最后一分钟也加进来……这个宗派的成员主要是大市镇和工业地区及其周围的卑恭屈膝的人。"参见T.E.欧文:《卫斯理宗揭密》(1802)。

[13] 《政治纪事报》,1820年1月27日和1821年1月13日。

不清楚的是，许多卫斯理宗的教徒是否采纳了科贝特的建议；或者是否因为已经这样做了他才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他肯定有助于我们去理解19世纪头十年中许多分离出去的派别的特征，特别是原教旨卫斯理宗信徒和圣经主义派的特征。基勒姆派的分离表现了卫斯理宗内部领导层的裂痕，一些更理智的教徒脱离了该派，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其他分离运动则是信徒间普遍的分裂，世俗传道者及其教众割断了同专业牧师的关系。由于威廉·奥布赖恩这位热忱的世俗教徒发现卫斯理宗权力机构不承认他的天职，于是就造成了圣经主义基督教派的兴起。他在德文的北部举行免费的讲道，无视该教会的纪律约束，被当做“游丐”而开除出教会，他带走了皈依于他的教徒。读邦廷的传记并和休·伯恩的传记相比（伯恩是个诚实的机器安装工和细木工，他被叫到斯塔福德郡的矿里和“山区农场”去装修机械、修理木柱或做铁工活，并创立了原教旨卫斯理宗），其泾渭分明十分明显。伯恩回忆说：“我们的教堂就是煤井的井口区或随便什么地方，我们用会话的办法对一切人，好人和坏人，粗鲁的人或温顺的人，宣讲福音书”。[43] 卫斯理宗的地方权力机构对于伯恩和克洛斯在矿井和陶业城镇吸收的教徒很少感 397
兴趣。反国教的福音主义传道热情（于1807和1808年）导致草堆山顶的第一次野营集会，但很快就被否定了。

邦廷出于高傲的派别纠葛，蔑视工人。伯恩和克洛斯却是劳动人民的。邦廷意欲把卫斯理宗领上国教之下的第二把交椅；而原教旨卫斯理派仍然生活在卫斯理宗初创时的艰苦而受迫害的世间。我们很难把这两派教会混为一谈。原教旨卫斯理

---

[43] J.T.威尔金森：《休·伯恩传，1721—1852》(1952)，第21—32页。参见威尔金森写的《威廉·克洛斯的生平》。

宗的讲道就同其教众的生活一样的艰苦;它需要的是霍布斯鲍姆博士曾说在"金子般纯真的得救与火狱烧黑的混蛋"之间最鲜明的对比。那不是对穷人的讲道,而是由穷人来讲道。在原教旨卫斯理宗和其他教派那里,地方的传教士把教会变成了自己的教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教派对于后来的工会运动和政治激进运动的贡献远比正统教派更为直接。[⑫]

另外还有一种环境,卫斯理宗的任何一个派系在这环境中,必然地采取更有阶级意识的方式:这就是在农村地区。乡村里的小教堂不可避免地要冒犯教区牧师和乡绅。小教堂是个中心,劳工在这个中心获得了独立和自尊。事实再一次证明正是原旨卫斯理宗的影响最明显,尤其在阿奇生活的约克郡东区。我们从一个愤怒的乡村牧师在 1805 年写的小册子里已经可以看到这种逻辑,那是原教旨卫斯理宗成立以前好几年的事。[⑬]皈依卫斯理宗的农业工人被指控为有各种各样骚乱治安的意图。他们说:"地上的玉米和各种果实都是按照上帝的意志生长的,既为富人也是为穷人"。他们对工资越来越不满,越来越不愿意去做"东家因农时极需而可能要求他们去做的加班加点的农活"。更糟的是,他们在星期天不是为下周的劳动恢复体力,而是消耗力气走几英里远去听人讲道。在每周工作日的夜晚,他们并不就去睡觉,而是花费柴火和蜡烛唱圣歌——这位牧师惊讶地看到这种情景:"在我们这里一些最贫穷的人的农舍里……冬夜还磨蹭到 9 点钟那么晚"。多年后,乔治·豪厄尔在评论罗彻斯特的劳工时强调指出,这类看法在乡绅当中一直未

---

⑫ E.J.霍布斯鲍姆:《绿林好汉》,第 8 章。原教旨卫斯理派在 1811 年只有 200 人,1820 年有 7842 人,见 H.B.肯德尔前引书,第 31 页。

⑬ 《就卫斯理宗问题致一位乡村绅士的信》(伊普斯威奇,1805)。

变。卫斯理宗“在那些日子里，在许多村庄里，是最惊人的犯罪，尤其在罗彻斯特郡和其他西部数郡。真的，除偷猎外，这是一切犯罪中最严重的。

在一个其神学原则就是要劳工驯服和奉献的宗教的本质中，紧张关系就以这种种方式不断产生出来了。这种互动的辩证关系最充分的发现应归入后来矿工和农业工人的工会运动史和宪章运动史。但历史发现其根源在 1810 至 1830 的 20 年，那时是宪章运动的领袖如哈里法克斯的本·拉什顿和拉夫巴勒的约翰·斯克文顿完成他们草创事业的年份。拉什顿是一名手工织工，生于 1785 年，曾经是卫斯理新教团的地方传教士，在彼得卢时期激进的政治中积极活动，可能入过狱，在科贝特号召卫斯理宗教徒拒绝交纳会费之时，拉什顿不是被新教团逐出便是自己退了出来。19 世纪 30 年代，他又在为济贫法的鼓动积极活动并是手工织工的代表。1839 年，在宪章派第一批大规模的野营集会的一个野营中（这些与会者以原教旨卫斯理宗为榜样），拉什顿与其他几名传教士一道发表了演说。其中有一个传教士名叫威廉·桑顿，他用祷文宣布集会的议程说——让“邪恶者的邪恶结束吧”——费格斯·奥康诺拍着他的肩膀说：“干得好！桑顿，到我们赢得人民宪章的时候，我愿看到你成为约克大主教”。另一个人提出一项决议，规定会众“不得到管理做礼拜的机构对公民自由抱有敌意的任何地方”去聚会，“……将来则根据情况需要在各自的地点聚集。”本·拉什顿附议并宣布：“他本人从 1821 年起就从不向牧师纳费，下一次他们若收到他的钱就会对他们有好处。”另一位地方传教人汉森接着对教士进行了谴责：

> 他们宣讲基督，宣讲表面的、被动的服从和不反抗。人们啊，离开那些教会和教堂吧（“我们同意！”）。去听那些说基督就是吃饱肚子，基督就是穿好衣服，基督就是

住好房子，基督就是有普选权的人的传道吧。[11]

399 像拉什顿、桑顿和汉森这样一些人对宪章运动做出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算溢美之辞。我们在野营集会的特征中理解了这一点，从他们的宪章派歌谣诸如“穷人集会歌”的热情中也理解了这一点，这首歌唱道：

> 看看勇敢的人吧，你这个意志消沉者，
> 　　他们坚持着你的正义事业，
> 谁不在高声反对他们？
> 　　他们像耶稣一样，
> 受着坏人以及邪恶法律的迫害
>
> 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
> 　　打掉他们的骄傲；
> 壮大你们的队伍，增加你们的人数，
> 　　将宪章传播四方；
> 　　真理与我们同在，
> 上帝与我们同在。[12]

我们在活塞暴动者的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向哈里法克斯进军，高唱着“古老的百人村”。我们在拉什顿的家乡奥文登村织工们举行宪章派示威时高举的大旗上写的口号中看到了这一点，这口号是：“不要害怕他们，记着上帝是伟大而厉害的，为你的兄弟、子女、妻子和房子而战斗。”[13] 我们在宪章派的教

---

⑪ B.威尔逊前引书，第3页；《哈里法克斯卫报》，1839年5月25日，汉森因为这次演讲而被卫斯理宗革出教门。

⑫ 《全国宪章派诗歌集》。

⑬ 《哈里法克斯卫报》，1848年4月21日。参见下文第693页所载1819年提出的口号。

堂里看到了这一点；这里是斯彭河谷，普里斯特利执事曾将小麦散发给“基督的贫民”，约翰·纳尔逊曾看到撒旦在戈默索尔的山顶上，19世纪开初那里出现过索斯科特派、唯信仰派和卫斯理宗的卢德派；而现在，我们却看到这样一座小教堂，其中，在19世纪40年代，拉什顿在这里以经句“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为题进行传道。在他的心目中，穷人被划分为三类，一类是残疾人和盲人，他们是“上帝可怜的穷人”；另一类是懒惰和轻率的，他们只顾自己管自己；

> 还有第三类，就是在别人不正当的做法和压迫下终生艰辛劳动，被弄成贫穷并摆脱不了贫穷的人……他然后用犀利的语言谴责那些拒绝将政治上的公正给予邻居并且把他们一直压制到他们仅仅为生存就不得不苦苦挣扎的人。

他的雄辩言词和义愤之情聚集了力量，“听众的情绪迸发出来，溢于言表……最后，拉什顿先生对压迫者的强烈谴责使其中的一个人忍不住地大叫：‘啊，让他们下地狱！让他们下地狱！’”[17] 400

像拉什顿这样一些人在许多地区为运动带来了非同一般的道德热情，但是，如果因此就以为他们本来就倾向于宪章运动内部的“道义”力量（与“实力”相对），就大错而特错了。相反，他们为一个战斗的上帝效劳，新模范军的战士才会理解这位上帝，而且许多曾当过世俗传教士的人会乐于按经句说：“没有剑的要卖掉外衣换剑。”拉什顿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说是“坚定、无畏、正直的政治家，永远站在英国的讲台上”，他愿意领导活塞暴动者（换句话说就是要进监狱），他60多岁时还作为欧内斯特·琼斯的代理人帮助他竞选。这位织工传教士一直到死都很受欢迎。我们

[17] F.皮尔：《斯彭河谷的过去和现在》（赫克蒙德威克，1893），第317—319页。

现在知道他穿着一套旧衣服和木底鞋在一个纺织村庄的纪念仪式上讲道，听众们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也就是木底鞋和工作服，包括长外衣和垫腰”。我们现在知道他每晚徒步数英里，努力使斗争中的宪章派支部保持活生生的锐气。（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同伴提醒说他的木底鞋底破得露出袜底了。这位正在发表政论的老人只停顿了一下：“嘿，只要想想以后的报答就好啦”。）他于 1853 年去世，为他举行的是一个伟大的宪章主义者的葬礼。因为拉什顿曾留言，领取薪俸的教士不得担任司仪，因此葬礼就由甘米奇和欧内斯特·琼斯发表演说。[13]

杰贝兹·邦廷与本·拉什顿决不属于同一个世界，除非对想象肆意歪曲，我们实在难以认为这位宪章派织工会同那个集权的教士在同一个“运动”中有什么联系。拉什顿是什么人，难道他不是邦廷的上帝所诅咒的亚当吗？

[13] 《共和报》，1866 年 11 月 16 日；《人民报》，1853 年 7 月 2 日；《卢登堡副主教教堂的历史》（1928），第 5 页。拉夫巴勒的约翰·斯克文顿是原旨卫斯理宗中同他一样有力和完美的人，关于他可参见哈里森：《莱斯特的宪章运动》，载布里格斯：《宪章运动研究》（1959），第 70 页起。

第十二章　社　会

1.闲暇与人际关系

卫斯理宗在战争年代的复兴促成了工业主义的劳动纪律，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反映了工人群众中存在着的绝望情绪。把卫斯理教义和功利主义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工业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不过，从卫斯理宗方面我们看得最清楚的只是整个社会中各种起作用的过程的表面反映，它的许多主要特征还要由各种教派的福音运动以及一些功利主义和自然神论的社会教导来加以重现。同卫斯理一样，汉娜·莫尔也强烈地主张"把儿童看做天真纯朴的人是个根本的错误"，相反，他们"有腐败的天性和罪恶的本质"。[1] 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之初，英国国教教会在许多村庄里兴办了主日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我们看到它们强调纪律和压制(尽管有时带有较多的家长口气)，就像我们曾经提到的在斯托克波特和哈里法克斯的主日学校里的情形一样。主日学校的功能有划一的规定，就是要在贫民的子女中培育"勤劳、节俭和虔诚的精神"。(林肯郡)凯斯特主日学校的教师得到指示，要

> ……驯化他们当中暴烈的桀骜不驯的脾气——压制他们过分粗野的举止——惩戒他们说讨厌的和不道德的下流话——驯服他们顽固的反抗心——把他们培养成

① H.莫尔:《现代妇女教育制度的结构》(1799),第44页。

诚实的、听话的、谦虚的、勤劳的、服从的、遵守纪律的人……[②]

实施纪律和秩序的压力一方面是从工厂，另一方面是从主日学校，扩展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闲暇时间、人际关系、言论和举止。除了在工厂、教会、学校、地方政府和军队里设立了纪律的机构外，还设立了半官方的机构，以便强制推行秩序的道德行为。威尔伯福斯是皮特的高级助手，主管道德教化，他把卫斯理宗的精神和国教的宗教热情结合起来，在1790至1810年之间，非常活跃地推动着这项事业。1797年他详细地陈述了"纲伦大法"，规定了管理贫民的条款：

……上帝之手赋予他们的是一条比较低的路途，他们份内之事是忠实地尽其义务，甘心忍受不自由与不方便。事物的现状是短暂的；世俗的人们围绕着各种目标激烈地相互冲突着；但这种竞争是不值得的……[③]

到1809年，明显的雅各宾派运动的危险已经没有了，他很满意。但是，从道德上无纪律的表现中他看到雅各宾危险的回复。他写道："我们对政治上的不法行为非常敏感，但对道德上的犯罪我们似乎极其麻木。"

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是太谦虚了，因为仅仅在1801至1802年，他自己组织的"恶习纠正会"就积累了623项对违反安息日

② R.C.拉塞尔：《内特尔顿和凯斯特的小学和成人教育的历史》（凯斯特，1960），第5、7页。

③ W.威尔伯福斯：《从实际的角度看当前流行的基督教宗教制度》（1797），第405—406页。

法的合格的起诉。[4]不过，他认定在下层阶级的道德轻浮与政治煽动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这倒是他的那个阶级的特征。对酗酒和淫猥行为的起诉增多了，布莱克的宿敌、兰达夫主教沃森于1804年主持了一次讲道，其中他发现通常告密者的角色“无论从宗教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高尚的安排。”宣传和立法都反对贫民的娱乐，甚至把最无害的娱乐也一直视为可怕可恶。“恶习纠正会”把干预的范围扩大到“两便士啤酒、姜饼义卖和淫秽画。”[5] 裸体海浴被指控为犯罪，似乎那就是走向死囚车和断头台的前兆。约翰·鲍德勒曾含糊地写道：“按照犹太教的法律，通奸应处以极刑。一些人认为……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福音教派劝诫上层阶级也要改善自己的举止，以便为贫民树立榜样。在大革命之后的年代里，“协会”本身“的持重风格日益加强……对欢乐与幽默甚为不利。”[6]

403

推行社会纪律的过程并非没有对抗。鲍德勒博士的支持者要在下院通过监禁通奸者的新立法的企图失败了；针对通奸的立法和惩罚流浪者、补锅匠、舞女、杂技演员、民歌手、宗教自由论者和裸体海浴者与一般的违反安息日的人是不一样的；该项立法可能因对于富人和穷人的娱乐一概排斥而易于招致反对。企图对民众闲暇活动进行干预的其他立法提案，在下院也遭到微弱多数的否决，这部分人当中有自由放任情性的人，有维护臣民自由的福克斯派，也有对“吃吃玩玩”持宽容态度并讨厌卫斯理宗“狂信”传统的托利党人。（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陆军

---

④ 参见L.拉奇诺维奇前引书，第3卷，第504—506页，及第3、4卷各处。又见G.R.泰勒前引书，第36页：“……道德上重大变化的时期不是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之际，甚至根本不是19世纪，而是……1790至1800年的十年中。”

⑤ 《女怪》，1819年4月24日。

⑥ T.莫尔：《谢里登传》(1825)，第217页。

大臣温德姆针对福音派和改革派为斗牛所做的辩解，导致撒旦堡垒中一片欢呼："温德姆和自由！"）

但是，如果说用立法强化社会纪律的人在几个立法的回合中失败了，他们在工业革命这场战斗中却胜利了。在此过程中，常被看做18世纪城镇乡村中英国贫民特色的"爱尔兰人"脾气，也被转化成为工业资本主义有条不紊的生活方式。在农村，这一胜利最明显地表现为货币经济战胜了农民半饥半饱状态中的随遇而安的、不经济的生活节奏。在工业地区，这一胜利可以在工厂的铃声和时钟所规定的纪律中看出来，它从工作时间扩展到闲暇时间，从工作日扩大到星期日，还侵袭着"皮匠的星期一"及传统的节日和集市。

尽管集市在18世纪仍具极重要的经济功能——一年一度"找雇工"、买卖牛马、出售多种商品等等——我们却不能忘记它在贫民的文化生活中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工业革命早期，劳动人民的岁月仍是由劣质的份食和不时有一些"快乐"的日子形成的循环；而在那些"快乐"日子里，则有许多饮料和肉，给孩子买苹果和丝带之类的好东西；还有跳舞、求爱、快活的拜访和参加体育活动。直到19世纪末，整个农村都存在着一个集市网（当局试图限制和禁止其中的许多集市，但从未达到目的），有着熟人关系的商贩，玩纸牌的人，真真假假的吉卜赛人，民间歌手和叫卖小贩都来赶集。[⑦] 1750年，诺森伯兰的一位日记作者记述了圣灵降临周星期一的情况：

> ……去参加卡尔顿赛会——带着马鞍、缰绳、马鞭等等，一切为了快跑……。许许多多的少男少女都对竞

⑦ 读者也许会回忆起哈代描写威塞克斯的小说。关于19世纪30年代的集市，参见《警事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第30—42页。

赛和娱乐如痴如狂，以致他们说忘了吃饭。……最后他们玩够了，来到酒店痛饮，男人亲吻情妇，整夜与她们玩耍……

3个星期以后，在莱伯斯顿举行了另一场赛会——“人们掷铁圈套铜盆……，还有一只打扮的漂漂亮亮的鸽子，身上拴着各色彩带和其他装饰品，乡村姑娘为赢取它跳舞……”[⑧] 1783年，博尔顿的一位地方长官抱怨说，在燕麦要卖两几尼一车的时候，

……这个镇里却没有一点匮乏的样子。有一天晚上，我遇见一大群年轻的男男女女，拿着小提琴、花环和其他一些农村的漂亮玩意儿，在大路上跳莫里斯舞，为的只是庆祝一个荒唐的节日，或按照他们这一两年来高兴的叫法，庆祝在邻近公地一家破草房小酒店里举办的一个集市。[⑨]

有一种解释认为，旧式的赛会与节庆之所以衰落，完全是因为“城市的”价值观念取代了“农村的”价值观念。但这是误解。在18世纪，伦敦和一些大城市同农村一样也经常举行比较粗野的娱乐活动，有时甚至次数更多，无论这些活动是难看的斗兽和拳击等，还是比较欢快的节日庆祝，各种形式都有。这些娱乐活动很活跃，一直延续到19世纪，让人们回想起都铎时代伦敦学徒那种不守规矩的传统，而且在那时伦敦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从农村迁移进来的。他们最重要的节庆是巴托罗缪集市，集市上有动物展览、扒手、丑角哑剧、玩牌的骗子，还有多种表演、野人展览和马术表演等。《行业报》在1825年抱怨说：　405

几周以来，教堂讲坛和报刊一直在批评这种集市，它们

⑧　见《斯威克手稿·日记》，摘自G.R.泰勒前引书，第16页。

⑨　B.T.巴顿：《博尔顿历史拾零》（博尔顿，1881），第1卷，第263页。

报道种种故事，说学徒变得不老实，各类女仆受蹂躏，

还有吵架打破头等等……[10]

10年以来，当局一直担心这种集市会变成“煽动性的大集会和骚动的信号。”[11]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榨取了农村中的一些工业，破坏了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之间的平衡，也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农村是孤立的和“懒惰的”印象。(从习惯的含义上说，)18世纪英格兰的城市文化是比较有“农村气息”的，而农村文化又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得多。科贝特坚持说，“以为人总是居住在老地方就会变笨，这种想法是一个大错误。”大多数新工业城市成长得超过了农村时，并没有取代农村的多少东西。19世纪初，最常见的工业地区是商业或者制造业中心，为分散在其周围的工业村庄提供了活动的中枢。随着村庄变成郊区，农田被砖房覆盖，19世纪的具有卫星城的大都会就此形成。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力量猖狂到能摧毁老传统。在兰开郡南部、陶瓷业地区、约克郡西区和黑乡地区，地方上的习俗、迷信和方言，既没有被割断，也没有被嫁接，农村和小镇的手工业者变成了产业工人。班福德在《早年岁月》一书中证实了世纪交接之时兰开郡纺织村庄的传统生气勃勃。那里有许多关于巫婆、招魂术、“鬼火”的故事；有热闹的拳击和斗鸡游戏，盛行“找鸡蛋”(在复活节)或“骑黑孩”的等习俗；还有带着他们传统的庆祝活动的节日——圣诞节、忏悔节、“鼓钹星期日”和8月份的“献堂纪念节”，那时米德尔顿、奥德姆或罗奇代尔有许多人跳莫里斯舞，他们唱道：

[10] 1825年9月11日。

[11] 《舍温每周政治纪事报》，1817年9月15日。

我的新鞋多漂亮，

我想去跳莫里斯舞。

要是戴了帽子又把好看的衬衫穿身上

我会把莫里斯舞跳得最最棒。

406

再说，5 月 1 日是“恶作剧节”，在这一天，小伙子们可以在村妇的门槛上留下多种记号：

一束荆豆表示这妇女不正派。一束冬青树枝表示一个人有私下的恋情。一只公羊角暗示这个男人或女人对婚姻不忠实。一束幼树苗表示忠于爱情。小小一枝白桦则表示这家有一位漂亮的姑娘。⑫

我们可以把班福德对 18 世纪 90 年代的情况的描述和约瑟夫·劳森对 19 世纪 20 年代的约克郡西区一座名叫帕德西的“落后”织布村庄的回忆作个对比。当时这个村庄正处在从旧的生活方式向新的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那里的房屋离乱分散，“就像随意撒下的种子长出来的”；没有路灯，也没有旗幡。一组一组的房子周围是蜿蜒曲折高低不平的小路。房间低矮，窗户很小，没有窗格：

人们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环境卫生科学，医生来到一家有热病病人的家中，一走进房子就用手杖打破一个玻璃窗，他开的第一剂药就是新鲜的空气。

大多数的房屋里没有炉灶，只有烤面包用的“烤石”，石头地上铺着沙子，家具不多而且非常简单，“一些房子里有橡木匣子，是传家宝，或是拐角上吊着一个小橱和一个陶的容器用来放盘碟”。由于水源缺乏，一到洗涤日，二三十个人排队等在井边。煤和蜡烛都很贵，到了冬天，几家邻居全在一起取暖。烘烤面包、酿酒

⑫ 《早年岁月》，第 13—16 章。

是在家里做的，白面包和肉食被视为奢侈品。“燕麦饼、黑面包、稀布丁、脱脂牛奶、土豆，还有一种他们称做‘饮料’的家酿啤酒都是他们每天主要的食品”。

稀松的日常生活偶尔会被“节气”或所谓的宴饮所打破。这时他们会买“一块牛肉”，大家都去集市，那儿有姜饼、水果和玩具出售，有画着滑铁卢战役场面的西洋景，有滑稽戏表演、赌场、秋千，集市也向来是“爱情市场”，小伙子用“时鲜的白兰地姜饼和核桃去取悦姑娘。能阅读报纸的劳动者人数极少，虽然在铁匠铺、理发店或一些酒店可以拿到报纸（并大声朗读）。大部分新闻靠书报小贩和街头歌手来传递。无论老少，都对古老的迷信感到恐怖，比如在杂货街，城外绞刑台和巫师巷常有鬼魂出现。父母为了哄吓孩子听话，常把他们“关进地窨或其他黑暗的地方，说要让巫师来抓他们”；“到处都流行着另一种最厉害，最吓人的迷信，相信孩子的死是上帝的意志，命该如此。”想改良环境卫生的人被看做“不信教”。斗狗和斗鸡是寻常之事，还有的寻常事是吃喝玩乐之时可以“看到儿圈的人，男人们在圈子中赤膊打斗个把小时，这些勇武好斗之人都脸肿鼻青面目皆非……”。酗酒也非常普遍，尤其是在节日和“皮匠星期一”，织工、修布工和皮匠一直都庆祝这个节。不过，他们也有许多比较平和的娱乐，例如在大街上玩木球，“躲小球”或足球。每个村子都是内向性的小集团。有一些非常古老的传统被保留下来，例如有一种称做“骑斯登”的习俗，如果知道某个男人虐待妻子或怀疑某个女人淫荡，喧闹的人们便按这人的面目扎一个草人穿街过巷，然后在犯事者的家门口焚烧。[13]

[13] J. 劳森：《帕德西的发展》，随处。

地方传统虽然并没有消失，但在工业革命初期，地区自豪感和自我意识也有可能在成长着。兰开郡南部和约克郡西区早在1780年以前已经不再是荒凉的农村，早从两个多世纪以来，已变成家庭工业的中心。随着新的工厂纪律渗入手工业工人的生活方式，随着公司街和典礼街在耶普福德、弗罗格、霍尔和托林斯的旧址上建立起来，因此自我意识也就在失落中明确起来。一种半民族主义的情绪和阶级感情在产业工人的文化中融为一体(比如新机器与旧习俗对立，伦敦暴政或“外来”资本与当地布商对立，爱尔兰劳工愿拿较低工钱而抢了本地织工的工作。)乔治·康迪是十小时工作制运动的主要评论家，他为罗比的《兰开郡传统》(1830)一书写过一篇前言：当时许多平民作家步18世纪“蒂姆·鲍宾”之后尘，赞扬地方的习俗和方言，并把它们理想化，班福德就是其中的一个。 408

但这是对正在消失的老生活方式的一种有意识的对抗并经常和政治激进主义联系着。[14] 在老生活方式消失的过程中，不仅是公用地和“活动场地”等有形的丧失，同样重要的也表现为闲暇的消失，[15] 人们失去了玩耍，玩耍的兴致也受到压制。卫斯理说：“避开一切轻薄，如同你逃避地狱之火；避开一切休闲，如同你逃避赌咒和起誓。不要接触女人……。”班扬或巴克斯特的清教徒教义在卫斯理的这番话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玩纸牌、穿花衣、个人的打扮、去剧院——全都在卫斯理宗的禁止之列。他们写了许多小册子，反对“渎神”的歌曲和

---

⑭ 这使我们想起了科贝特。不过，威廉·霍恩的《每日纪事》、《日常纪事》和《纪事》及斯特拉特的《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都出版于19世纪20年代，对老习俗的记载更详细。

⑮ 见哈蒙德夫妇：《悲惨年代》，第4章。

舞蹈。[16]凡内容中没有宗教献身精神的文学和艺术都深受猜疑。早在维多利亚女王诞生以前，令人生畏的"维多利亚式"安息日制开始扩大其压迫，甚至在维多利亚出生以前已经开始。

一本特色鲜明的小册子说明卫斯理宗决心从工业地区清除工业革命前的旧习俗的程度。[17] 小册子提到1799年设菲尔德卫斯理宗季度大会一些成员"还没有完全从一年一度大宴时互相家访的应酬习俗中摆脱出来。"这样的饮宴在不同的地区各不相同，在德比郡和斯塔福德郡是"通宵礼拜节"，在兰开郡是"献堂纪念节"，在英格兰西部是"狂宴节"。它们起初也许是得到默许，但后来糟糕地"被滥用于最邪恶的目的。"时间都消磨在"无节制的吃喝、亵渎神灵的谈天上或至少是说笑打趣的无稽之谈、通奸或未婚而私通上……"。参与者至少是"暗中做无益之事的亲密伙伴"。穷人浪费了原可节省的钱，许多人甚至借债。凡混杂在这种饮宴中的卫斯理教徒就处于无法逃遁的世俗的道路

409 中——普遍的结局便是堕落。他们应当拒绝招待来访的朋友甚至亲戚(因为他们从不改信基督教的地方来，如果无法将这些来访者拒之门外，就应当用读《圣经》，讲道和唱赞美歌来招待他们：

> 啊，兄弟，我们在做些什么？酒罐里面是死亡，瘟疫就要降临，神灵将要惩罚无所事事的人们，罪恶正伏在我

---

[16] 辩护士们对《旧约·传道书》中对"有时间跳舞"的依据是有些异议的。但既然"在圣经中找不到两性协同起舞的事例"，则正可论证为只能准许一性的(同异性隔离的)舞蹈者在平日而不是星期天的宗教圣事的白天跳舞。(此类事如今无记载)。见A.扬：《跳舞的时间到了》(格拉斯哥，无发表日期)；也可见骚塞前引书，546—549页。

[17] 詹姆斯·伍德牧师：《给卫斯理宗的教徒的一封公开信》(1799)，随处。

们的头上……。

另一种残存的习俗，例如在为葬仪"守夜"时大吃大喝，也遭到一样的谴责。即使亲戚在平常的安息日相互拜访也不能宽恕，除非是去探望突然生病的亲戚。⑱

这种争论之热烈，说明在许多像班福德的米德尔顿一样的地方，旧的生活方式同新纪律之间的较量是尖锐而持久的。劳森对帕德西的描述说明"教堂里的人们"作为一个群体因不苟言笑的规矩而置身在社会整体之外。在虔诚的家庭中长大的许多人都强烈反抗他们所受的培养，如威廉·德维特所说：

> ……整个星期天不得不3次总去一个地方做礼拜，除了圣经和祈祷书，什么书都绝对禁读，除了上教堂之外，赏心散步是不允许的……这足以证明那些孩子气的感情。我可怜的母亲……以为天地间造成无数的欢乐、活泼歌唱的伟大力量必须首先在庄严的面孔、整洁的衣服、半醒半睡的言行举止中得到满足，她以为真实的宗教存在于倾听一次次重复的人类堕落的故事中……⑲

像洛维特那样战后的一代人，认为卫斯理宗是古怪而落后的。这使我们想起要对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整体的道德观点

⑱ 守夜节是亲戚相聚的重要节日，城里人下乡去拜访亲戚，"出嫁的女儿带着孩子回娘家"。豪伊特把这种节日称做"不停运转的劳役机器的短暂休止"。他记载说，当他向乡村的老人提到那些在城里的儿子和女儿时，老人会说："嗯，嗯，我们会在守夜节见到他们的。"即使主张强化纪律的韦奇伍德也对通宵宴饮的守夜节无可奈何，他说这样的节日"必须举行，尽管世界将同它一道毁灭"。见R.E.利德：《回忆过去的设菲尔德》(设菲尔德，1876)，第200—202页，W.豪伊特，《英格兰的农村生活》(1838)，第1卷，第59、245—254页；麦肯德里前引书，第46页。

⑲ 洛维特前引书，第1卷，第8页。

410 和行为举止做一般化总结有多么困难。看得明白的是，在1780至1830年之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平均的”英国工人变得更守纪律，更加顺从于“时钟”的生产步调，较为谨慎，较为循规蹈矩；不那么粗暴，不那么随心所欲反复无常了。传统的体育活动换成了较为恬静的爱好：

> 抑或如兰开郡的一位作家在1823年所抱怨的那样，掷铁圈、摔跤、足球、抓俘虏游戏、长弓射击等竞技活动渐渐过时了，……他们现在是鸽子迷、养金丝雀和种郁金香。⑳

弗朗西斯·普雷斯看到并经常提到一种变化，他把这种变化看成是自尊的增长，“工人品质”的提高。在彼得卢事件发生1个月之后，他曾经写道：

> 就拿兰开郡来说，几年前，当一个陌生的行人经过他们的城镇时，便会引起“轰动”，那就是哄赶，有时用石头追打。“兰开郡的蛮子”是众所周知而名副其实的外号。直到不久以前，不论任何场合，只要有500人聚集在一起，都会是危险的事。至少是面包房和肉铺要遭到抢劫，而现在，哪怕10万人聚集在一起也不会发生骚动了……。㉑

正是在这一点上要作出评价是最为困难的。从科贝特到恩格斯，许多当时的著作家都在叹息英国旧习俗的消失。但是，仅仅从田园诗般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变化却是可笑的。这些习俗并不都是无害的或富有奇趣的。

据报告，19世纪开头的一二十年卖妻之事在科恩、普利茅

⑳ 格斯特前引书，第38—39页。

㉑ 沃拉斯前引书，第145—146页。

斯、设菲尔德、史密斯菲尔德等市场广为发生。的确，那里的老百姓认为，只要妻子承认她曾经不忠实，丈夫就有权将她卖掉——(一位在普利茅斯牛马市场上出卖妻子的丈夫说：)“许多乡下人告诉他可以这样做”。[22] 凡是未婚而生育的母亲会在感化院里受罚，或从她可以有权领取救济金的教区里被驱逐出去，她是没有理由去赞美什么“快乐的英格兰”的。松子酒巷、刑场 411 买卖、狂饮酗酒、兽奸、穿上带铁钉的鞋为奖金而进行致命的打斗，所有这些的消失都不足以哀伤凭吊。尽管卫斯理宗的劳动纪律压制人性，残伤人体；但是，若没有某种形式的劳动纪律，也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而旧的生活方式与新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不管何种形式，都必定是痛苦的。

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传统的“娱乐活动”，其中的界限很难确定。例如，人们常常认为老派的托利党乡绅对旧习俗是宽容的，甚或积极地保护这类娱乐活动免受攻击。事实证明，农业郡的情况大约就是这样。但正是这些乡绅使用惩罚手段来维护自己的野外游乐狩猎权。他们住得离工业中心越近就越珍惜自己的隐居生活和特权。设菲尔德刀具匠的女儿再也不能在5月去拾核桃等坚果(因为街上贴了布告，警告说要对拾坚果的人起诉)：

---

[22] 《关于卖妻情况的真实逐一的报告》(盖茨黑德，1822)；J.卡尔：《科恩纪事年鉴》(科恩，1876)，第83页；《利兹信使报》，1802年8月28日；《行业报》，1825年8月14日；《泰晤士报》，1822年11月23日；G.C.米勒：《布莱克本》，第92页；《布莱克本邮报》，1793年9月4日；平奇贝克前引书，第83页(描述克罗伊顿1815年的状况)；H.W.V.坦佩利：《1832年英格兰的卖妻》，载《历史教师集萃》(诺里季，1925)，第3卷，第67页；(当然)还有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某些实例说明卖妻的做法并不总是野蛮的，可能只是流行的一种离婚形式，是得到妻子同意的。她的情人象征性地花一笔钱把她“买”下来。在民间，公开市场上进行这样的转让属于合法的交易，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其他有效的离婚形式。

[1812年，一本小册子的作者报怨说]：国家的大人物宣布……他们有权拥有所有的野兔、鹧鸪、山鹬和松鸡，等等，更不用说那里的鱼；而最后，他们又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普通的坚果了。[23]

还可再举一例来说明。卫斯理宗和福音派袭击贫民在星期天的娱乐活动，他们的出发点往往是一种好管闲事的固执，或是想寻找与撒旦发生遭遇战的戏剧性的场面。[24] 但是，这里面有时还包含着更复杂的问题。30年代，纽卡斯尔地区一场尖锐的争论是由福音主义的各派教徒要禁止夏天的"星期日雇工"的做法而挑起的，那里的农业工人被赌场、赛马和酒吸引到集市上去，农412场主则从集市上获得劳动力去收割庄稼。一些工会人士支持福音派，而宪章派、农场主、行商小贩、赌场老板和酒店老板却站在赞成星期日集市的这一边。[25]

卫斯理宗的历史学家倾向于以为，工人品行的转变至今为止可归因于卫斯理宗的教义的影响所致：但这种说法目前还不

㉓ "一个同情被压迫者的人"：《乞丐的抱怨》（设菲尔德，1812）。在大萧条时期，偷猎，在毗邻工业地区的附近往往具有内战的形式。一份有关诺丁汉卢德运动的报道（内政部档案，第42.119号，1811年12月24日）下结论说："一批绝望的偷猎者闯入了诺丁汉附近沃拉顿的米德尔顿勋爵的私人猎场，打死了至少100只野鸡。"亦见E.W.博维尔在《英国农村生活，1780—1830》（1962）一书中对"偷猎战争"的精彩叙述，第12章。

㉔ 1808年，原旨卫斯理宗的创始人休·伯恩听说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雷金节"高潮时有举行狂饮的习俗，"我立即产生了一个念头，把传教士们叫来，在那里举办一个野营布道会。"有关他仇视诺顿的"守夜节"以及1807年在草堆山顶举行第一次野营集会的由来，参见J.T.威尔金森：《休·伯恩传》，第43—47、58—59页。

㉕ 见J.埃弗雷特：《星期日雇工》（纽卡斯尔，1837）；《纽卡斯尔安息日》期刊，1838年6月16日及以后几期。

能肯定。[25] 毫无疑问，福音运动在一般意义上，主日学校在具体的意义上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工匠身上清教徒性格的形成，他甚至在当时（像洛维特）还谴责他的培养方式的狭隘性，并且成为一个自由宗教论者。在托德莫顿斗牛场的旧址上建立起来的卫斯理宗教堂，当然可以看做是这些变化的标志。但是，这些证据往往失之片面。如果一些老迷信消失了，新歇斯底里幻觉却成倍地增加着。卫斯理本人就坚持无知和野蛮的迷信，例如用圣经算卦，相信魔鬼附体，认为18世纪的医药治疗危险而又残酷等等。我们已经提到过卫斯理宗喧嚣派和索思科特派的错乱；更有甚者，在福音派小商贩或工匠的固执外表底下，可能萦回着搜捕巫婆和蒙昧主义的无情而卑劣的做法。此外，还有用宿命论的观点看待儿童的夭折，对待"无神论者"和宗教自由论者极端地偏执等等。

确实，处在老的迷信和新的固执之间，当遇到福音派自称一直是思想启蒙运动的推动力时，最好是持谨慎的态度。我们已经提到，卫斯理宗的倾向是使自己这个宗派坚强，不许他们的信徒和不愿皈依过来的人接触，并且要他们认为自己是处在同酒店及投向撒旦城堡的人的战争状态中。卫斯理宗在其人数少的地方，双方都持强硬的态度；都自称信守道德并振振有词地反对罪恶，但同他们表现的深刻仇视相比，其真实风格却并不多见。此外，在19世纪初的气氛中充满了立论和反立论，特别是手工工人和工厂工人的价值观念相互冲突，反对童工制和主张童工制的价值观念相互冲突。批评工厂制的人认为它破

413

[25] 例如可参见J. 卫斯理·布鲁迪：《卫斯理以前和以后的英格兰》（1938）；J. H. 怀特利：《卫斯理的英格兰》（1938），以及韦尔默斯博士的著作。关于激进派的严谨道德，见下文，第737—743页。

坏了家庭生活，不断把工厂说成是最下流的性行为的伤风败俗中心；兰开郡工厂女工的下流语言以及她们无视任何约束的举止使许多目击者瞠目结舌。加斯克尔把家庭工人田园生活式的质朴同工厂里混乱的男女杂交行为作了对比。家庭工人的青年时代在异神教的自由中度过，只有怀孕以后才承担婚姻的义务；而在工厂里，有些雇主们和女工们混杂淫乱的热闹场面，

> 连罗马人淫荡的农神节，印度宝塔女的仪式和奥斯曼帝国最淫逸的后宫生活都自叹不如。[27]

这些生动的描述自然使雇主们感到不快，就连工厂的工人也十分不快。他们指出，许多农村地区私生率比工厂市镇的私生率高。许多工厂里规矩很大而严格。工厂主当中若有一些“奥斯曼”的话，那么也有搞家长制的统治者，一旦发现任何女工道德堕落便予以开除。

这场讨论不会产生什么结果，这倒不是因为有关家庭生活和性行为方面的证据太少而是因为这些证据不足以说明父母与孩子之间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本质关系。教会无疑会在那些亲眼看到酗酒或无责任心的父母给孩子带来痛苦的人们当中赢得皈依宗教的人众。但是，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抑制性行为的规矩和家长式的家庭关系增进了幸福和爱情。即使是无情而野蛮的举止也比冷酷有罪的性行为好；19世纪初，性行为受约束更多，并变得更加隐密，而在大城市中卖淫业也发展了。我们也无法设想教徒的身份甚或婚姻的形式和家庭忠诚两者之间的直接的因果联系。梅休后来发现叫卖小贩等社会群体中有信奉异教和纳妾的习俗，但却表现得如同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样相互

---

[27] 《英国的工业人口》，第64页。

忠诚。

工人在工业革命中发现道德语汇是真挚而深刻地表达他们集体的不满和愿望的;但当用到个人间的关系上的时候却显得牵强附会和言之过甚了。然而,在工业革命期间,坚贞的家庭忠诚支撑着许多人,这种例子很多。在主要的激进主义者和宗教自由论者当中,为数不多的男男女女在有意识地寻找在18世纪的工人群众中尚未发觉的同志关系和平等关系。细木工威廉·洛维特的婚约中断了一年,因为他的未婚妻(一位夫人的侍女)发现他的宗教观点离经叛道;但他们结婚以后洛维特让她一起自学,"向她朗读并解释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门功课",这可以看做是一个例子。 414

在这方面很难找出四平八稳的结论。一方面,有人认为工业革命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不过,若是一旦把这种说法与长时间的劳动,拥挤的住房,过多地生儿育女以及惊人之高的儿童死亡率等记录加以对照,就显得并无意义了。另一方面,纺织业地区给妇女以充分的就业机会,使之取得了独立的工资收入者的地位。老处女或寡妇摆脱了对亲戚的依赖,也摆脱了对教区救济金的依赖。多亏许多工厂"道德纪律"松弛,即使未婚而生育的母亲,也有可能获得过去闻所未闻的独立性。麦克尔斯菲尔德最大的一家丝织厂中,正直的雇主以女工一次"失足"就予以开除而感到自豪。一位目击者将这种做法同曼彻斯特散漫的行为做了对比,他的话引起道德家们的深切不安:

> 我发现很普遍的……情形是,如果纺织厂和工厂里几乎没有私生子女的母亲存在,那么街上就会有许多妓女。相反,如果允许女工生了孩子后再回厂工作,那里的街道上这些不幸的人就会相对地没

有了。[28]

这个时期到处是这样的尴尬情况。战争年代出现了大量传道和劝诫性的传单，主张限制甚至否定妇女的权利，他们把这种权利同“雅各宾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使用最明白无误的话表述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从属地位。佩利说：“基督教圣经以断然的、绝对的方式”规定妻子在婚姻关系中唯有服从，“这种要求似乎扩展到只要是不犯罪，不与妇女的幸福相违背的一切事情上。”[29] 但是，就在这同一个时期主要在大城市的自由职业者和激进工匠中间顽强的少数人也有一种说法，他们提出的要求与法国革命以前所出现的要求相比，其意义更为深远。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威廉·布莱克和托马斯·斯彭斯在18世纪90年代提出的要求从未被完全放弃。战后，这些要求不仅在雪莱的文人圈子中，而且在激进派的出版物中也反复出现。在《黑矮人》报上以自我贬责的口气予以表述；在理查德·卡莱尔的报刊上则咄咄逼人；而在安娜·惠勒、威廉·汤普逊和欧文主义运动中则表达得最为有力。[30] 其实，还是在纺织业地区，妇女经济地位的改变引起劳动妇女最早广泛地参加政治和社会运动。18世纪末的妇女互济会和卫斯理宗妇女小组可能为她们提供了经验和自信心——由妇女来充当地方宣讲师的主张被看做是卫斯理宗一贯的“异端表现”。战争期间劳动力日益紧缺，不仅纺纱工

---

[28] W. 多德：《工厂制解析》，第194页。马格丽特·休伊特的《维多利亚工业中的妻子和母亲》(1958)一书，主要以1840年以后的一些材料为依据对一些事例进行讨论，尤见第5章。

[29] W. 佩利：《青年劝诫简篇》(1809)，第68页。亦见T. 吉斯本：《女性职责之研究》(1797)，第226—229页。

[30] 《黑矮人报》，1818年9月9日和30日。关于卡莱尔和欧文运动，见下文第16章。

厂而且手工织机都是这样，这种情况也加速了这一过程。[1] 1818和1819年，在布莱克本、普雷斯顿、博尔顿、曼彻斯特和莱恩河畔的阿什顿先后成立了最早的妇女改革协会。塞缪尔·班福德的叙述——如果我们可以信赖的话——说明在觉悟方面突然发生飞跃。在兰开郡和约克郡交界的萨德尔沃恩地区的一次集会上，班福德发表了一次演说：

> 在这篇讲话的始终，我坚持凡参加这类集会的女性对各项决议都有权利举手表示同意还是反对，坚持这样做是合适的这是一种新的思想，大量的妇女参加会议，站在阴冷的山脊上，她们强烈地为这种新思想而高兴。当妇女们举起手在许多笑声中赞同这些决议时，男人们没有反对意见。从此以后，妇女在激进派的会议上同男人们一道进行表决……。妇女政治联盟成立了，他们有自己的女主席、委员会和工作人员；这已经成为现实。宗教和慈善机构很快就……从我们这里学会了这种做法。[2]

416

（与此同时，在纽卡斯尔，有一个杰贝兹·邦廷的通讯员正在痛惜"虔诚的姐妹们"正在绣改革派的旗帜而不参加活动。）在1815至1835年的20年间，第一次在女工当中也有独立的工会的活动迹象。约翰·韦德评述1835年约克郡西区有1500名梳毛机植齿女工罢工，并指出其寓意："杞人忧天者之辈可能把妇女独立的这些迹象看做是一种威胁，比'下层民众教育'对现存机构的威胁更大。"[3]

---

[1] 关于战争时期妇女织工人数的增长，见艾维·平奇贝克：《女工与工业革命》(1930)，第164—166页。

[2] 《一个激进派的生平》(1893)，第141—142页。

[3] J.韦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55)，第570—571页。

但是，在这种进步中甚至也存在矛盾的感情。交织在北方劳动妇女的激进运动中的，是对丧失的地位的怀念和对新奠定的权利的维护。当时的常规坚信妇女的地位有赖于她们在家庭经济中能否成功地充当主妇，未雨绸缪地安排家庭生活，烤面包、酿酒、洗洗扫扫、带孩子等。妇女在纺织厂或在织布机旁全天工作而获得的新的独立，使她们有可能提出新的要求，但同时她们又感到失去了地位和个人的独立性。劳动妇女变得更加依赖于雇主和劳动市场，这使她们更加向往过去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她们只要在家门口就可以靠纺织和养家禽等手段取得家庭的收入。年份好时，家庭经济像农民经济一样，是集中支持着一家一户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家庭内部的任性和强迫比表面的教养更为显而易见。在工业分工和专门化的每一个阶段上，家庭经济都遭到了冲击，打乱了男人与妻子之间以及父母与孩子们之间那种习以为常的关系，而且“劳动”与“生活”之间的区分更是明显。以后要花足足 100 年，这样的分工才带着节省劳动的家用设备把好处带向劳动妇女的家庭。在这种时期到来之前，每当早晨工厂的钟声响时，硬把一家分开，而也是靠工资生活的母亲就常觉得自己不论在家还是在工厂里都是处境最糟的。

417 “从前，我们可以欢迎你，用我们殷勤供给的食品在你的桌上摆满英国风格的热情款待的饮宴。”博尔顿的妇女改革协会在 1819 年对威廉·科贝特说，“从前，我们可以面带英国女性欢乐的表情来迎接你……带你去参观我们住的房子，拿它的洁净和安置与王宫相比”。布莱克本妇女改革协会也说起住房的事——她们的“房子里的摆设全被抢光了”，她们的床“被没有感情的包税商人无情的手拆散了”，而她们全家只能睡在草铺上。她们最关心的是为孩子们呼吁：“我们每天看到他们狼吞虎咽地

吞下这些粗糙的食品，心如刀绞，而这种食品，有些人几乎都不给猪吃”。科贝特立即在《农舍经济》中对她们表示支持，奥斯特勒则非常重视“家庭”，因而他们自然得到妇女的响应。无论是科贝特还是奥斯特勒都不支持妇女选举权的主张，连妇女改革协会也没有为她们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她们的作用只局限于给予男人以道义上的支持：为他们制造旗帜和自由小帽，让他们拿出去参加改革派的游行示威活动；通过决议和宣言，扩大集会的人数。[34] 然而，就是这种形式的参与也招来了反对者的谩骂。《信使报》把曼彻斯特的“衬裙改革派”说成是“道德败坏的女性”，犯了“最坏的卖淫、灵魂卖淫”之罪，“擅离她们的职守”，把妻子和母亲的“神圣天性”抛在一旁，而去“进行煽动暴乱和亵渎上帝的骚乱罪恶勾当”。无论科贝特对妇女选举权持何种态度，这里暂且不谈，但他从未犹豫过要对妇女改革派进行支援：

> 难道女人只能烧燕麦饭和打扫房间吗？难道女人没有头脑吗？难道汉娜·莫尔和写传单的大人先生们不是把英国妇女降低到非洲黑人妇女的水平上吗？难道英国从来就没有女王吗？[35]

2. 互助之风

418

人们一再忽视对“古老英国的消逝”进行分析。如果我们想起，工业革命并不是一个定型的社会，而是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过渡阶段，我们就更清楚地看明白了变化的线索。我们必须想

---

[34] 一名告密者在1819年11月17日写的关于曼彻斯特政治同盟的报告中提到了另一个传统的兴起：“这个同盟极其贫穷，他们想去请求妇女同盟给予援助，因为他们穷得不敢借债—怕无力还债”。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

[35] 《政治纪事报》，1819年10月23日、12月29日；《信使报》，1819年7月15日。

到，不是一个“典型的”地区（例如米德尔顿或帕德西），而是许多不同地区相互共存着。仅仅在兰开郡的东南部就建立了许多地区，相距都不过几英里，其中有曼彻斯特这样的四通八达的都会，聚集了来自本王国各地的移民；有从半封建制度崛起的采矿村庄（例如布里奇沃特公爵的煤矿）；有家长式类型的村庄（例如特顿）；有新的纺织厂市镇（例如博尔顿）；还有比较老的纺织村庄。所有这些地区都有一些共同的影响在起作用，全在趋向于强化纪律，以及推动工人阶级意识的成长。

19世纪初的工人群体既非家长制亦非卫斯理宗，而是高度的有意识的工人阶级共同努力获得的成果。在纽卡斯尔或曼彻斯特，工会和互助会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他们强调自我约束和团体的共同目标。18世纪50年代曼彻斯特细布纺织工人的一些规定保留到现在，证明早就对工作程序和机构的规则予以精心地注意维护。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按确定的次序就坐，大门必须关牢。这里有周全的规定用来保护“保险箱”的安全。成员被提醒：“酗酒、仇恨和亵渎上帝都是瘟疫和害虫，会腐蚀整个协会的灵魂。”

>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协会不是男人们聚在一起高兴地喝酒抽雪茄烟和漫无边际谈天说地的一群伙伴；而是大家坐在一起来保护这个数百人以此为生的行业的权利和特权……那么，看到协会的成员乱七八糟地混杂在一起谈起一切主要问题时都冷漠以对，那又是多么不像话啊……

“体面与规矩”是他们的口号。他们甚至希望“绅士和行政长官”看到了这样的秩序以后“不但不会惩罚这样的协会，而且会表示

尊敬”。[56]

419 这些规定反映了自尊的工匠们的规则，尽管他们希望这样的节制会取得当局的同意，但结果使他们大失所望。哈迪和普雷斯等人就是在伦敦接受了这一类学说的教育的。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这种规则（有时采用标准规章的形式）广为扩大到工人的各行各业之中。小手艺人、工匠和劳工都竞相加人“保险箱俱乐部”即互助会为其成员，以求在生病、失业或举行葬仪的花费上有所保障。[57]但是，为了管好基金，为了开好会和对有争议的议案做出决定，纪律就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求与新的劳动纪律一样需要在自我约束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我们找到一本拿破仑战争时期纽卡斯尔地区互助会的章程制度，其中有一本罚款和惩戒册，其记载比博尔顿的棉纺织厂的登记簿更为完整明确。任何成员只要“非难”别的成员领取疾病补助，在安息日喝酒、打人，“互相叫彼此的诨名”，带醉走进俱乐部，轻慢地议论上帝，总会就要对他罚款。麦芽制造工互助会除了上述的罚款外，对于在任何时候酗酒或不参加本会兄弟或其妻的葬礼的人都要课以罚款。玻璃制造工互助会（建于1755年）还对不参加会议，不肯轮班当干部，不肯按要求安静下来，几个人同时发言，与办事员顶嘴，在会内打赌，或（这是一个常见的制度）将互助会的秘密泄露出去的人课以罚款。此外，

> 名声不好的人，品质恶劣的人，爱吵架的人或不守规矩的人，不得加入本会……井下工人、煤矿工人、凿矿井

---

[56] 华滋华斯和曼前引书，第345—347页。

[57] 工人群众认为葬礼特别重要，清贫的葬礼被认为是最丢面子的事。葬礼在民俗中占有重要地位，临死的人特别重视。一位被宣判死刑的卢德派分子写道：“我希望约翰·劳森、约翰·罗伯兹和约翰·罗帕为我抬棺；亲爱的妻子啊，另外3个抬棺人可由你来选择。”见《“卢德将军”……传奇史》（诺丁汉，无出版日期），第239页。

工人或船工不得加入本会……。

船工协会不甘落后，他们也有一条规定："凡是同不洁的女人睡觉而得了淋病或梅毒的人"，不得享受本会补助。相互嘲弄或挑拨是非也要罚款。同心互助会规定，领取疾病救济金的会员一经发现"在酒店喝酒，赌博或喝醉"，一律取消领取资格。为了维持全体的一致，凡是提出"对政治或宗教事务或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问题进行讨论或争论的人"都要被罚款。各业互助会都有一种规定同下棋的"吃子"相似；"假若一经发现任何成员碰上了应罚兄弟的款之事而不去罚"，该成员亦被罚款。鞋匠互助会另有一条规定，凡未得到办事员的准许就招呼大家饮酒或抽烟的人，应当罚款。家具木工和细木工互助会还规定禁止"发牢骚"或唱"政治歌曲"。[38]

420

诸如禁止讨论政治问题或唱政治歌曲的规定很可能只是说说而已。有些互助会不过是二三十名经过选择的工匠组成的疾病救济会，他们在一家小酒店里聚会聚会。而另一些互助会则很可能是工会活动的掩蔽所。在纽卡斯尔和设菲尔德，"两项法案"颁布以后成立的互助会，大概是用来掩护雅各宾派的组织的。(1816年，某"公司"的互助会证实了纽卡斯尔许多互助会有"忠诚、爱国与爱好和平的规章"，但是，它抱怨说这些规定往往不足以防止"热烈的辩论和激烈的语言")。[39] 在战争时期，当

㊳ 《在威廉·福斯特先生家中集会的互助会的章程和秩序……》(北希尔兹，1795)，第11页；《麦芽制造工互助会的规定和秩序》(纽卡斯尔，1796)，第6页；《玻璃制造工互助会条例与规章制度》(纽卡斯尔，1800)，第5、11、15页；《船工互助会……条例》(纽卡斯尔，1804)，第11页；《万众互助会条例》(纽卡斯尔，1824)，第11页；《各业互助会……条例》(纽卡斯尔，1804)，第9页；《鞋匠互助会……条例》(赫克萨姆，1806)，第8页；《家具木工和细木工慈善协会章程》(纽卡斯尔，1812)，第7页；《矿工协会……条例》(纽卡斯尔，1817)。

㊴ 《安格斯先生工厂里的……慈善协会简况》(纽卡斯尔，1816)。

局对互助会深为怀疑,制定章程的目的之一就是保证在地方长官那里进行登记注册。熟悉现在的工会和工人俱乐部的活动程序和规矩的人,都能认得出在若干规章中保留至今的惯例之来源。总之,这表明自我约束已经产生一种实在令人难忘的秩序,作为经验已经传播开来了。[40]

据估计,互助会的人数在1793年有648000人,1803年有704305人,1815年有925429人。按照1793年的第一个互助会法令规定,在地方长官处登记注册的互助会的经费因主管干部拖欠不付而诉讼时,经费能受法律的保护,但仍有不知多少大批互助会没有注册,若非出于对当局的对立及狭隘的惰性,便是出于严格的保密性。霍兰德医生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感到这种保密性仍旧强烈得足以阻碍他在设菲尔德的调查研究。在1815年以前,几乎所有的互助会都有十分严格的地方的和自治的性质,它们把疾病保险的功能和夜餐欢聚及每年一次的“远足”即宴饮活动结合在一起。1805年,马特洛克附近有人观察到: 421

> ……在大约50名妇女组成的队伍前面有一个独奏小提琴手,奏着欢乐的曲调。这是一个妇女互济会,她们在埃亚姆听过讲道之后,正准备去聚餐。这种乐趣是我们设菲尔德的妇女慈善协会所不愿放纵自己去为之的,我们只有茶喝,一般说来,只是唱歌、跳舞、抽烟、喝尼古斯混合酒。[41]

---

[40] 关于那个时期互助会的法律地位,参见P.H.J.戈斯登:《英国的互助会》(曼彻斯特,1961),第5页。关于设菲尔德互助会的社会成分,参见G.C.霍兰前引书,第17章。

[41] T.A.沃德前引书,第78页。亦见J.H.普里斯特:《里彭登妇女协会》,载《哈里法克斯考古学会通讯》(1943)。

互助会的会员在社会地位上很少有高出职员或小手艺人之上的；他们大多数是工匠。每个成员都在会中存一笔钱，从而保证会员的稳定，保证他们积极地参与协会自治。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中等阶级会员，虽然有些雇主很尊重他们。但他们在实际行动中却不给家长式的控制留下丝毫余地。由于缺乏实际经验，它们常常失败，不履行职责的职员也不时出现，但是，这些互助会发展到了全国各地，成了聚积经验（常常是令人心碎的经验）的学校。

在有很秘密色彩的互助会中，在上层阶级不透明的复查之下，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证明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和组织在成长着。这是亚文化群，少数的稳定的工会从其中成长出来了，工会干部也在其中得到了训练。[42] 工会的规章，在许多事例中，是按疾病救济协会一样的管理规则加以详尽修订成章的。有时，如在梳毛工的例子中，是按秘密的共济会规章的做法加以补充的：

422

> 陌生人，我们一切支部的意图就是爱和统一，
> 结合着建立在公平法律之上的自我保护，
> 等你通晓了我们全部的神秘权利，
> 我们的全部秘密将向你公开。[43]

18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雅各宾派鼓动的影响下，互助会规章的前言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应；富有哲理性的启蒙运动使用的"社会的人"一词最新奇的后果之一，便是在工业的英格兰那些

---

[42] 政府当局不断抱怨互助会允许会员在罢工时提取基金。1812 年的麦克尔斯菲尔德被说成是"非法协会的巢穴"，"统统都是疾病丧葬互助会，它们是革命的策源地"，C.S. 戴维斯：《麦克尔斯菲尔德史》（曼彻斯特，1961），第 180 页。

[43] [E.C. 塔夫内尔：]《工会的性质、目标和影响》（1834 年，1934 年重印），第 42 页起。

小酒店或叫“黑店”中开会的一些无名的俱乐部之规章中，一再使用“社会的人”一词。泰恩河畔的“社会协会”和“慈善协会”用广告式的警句表达他们的抱负，包括“一个巩固的持久的和爱的社会”，“促进友谊和真正基督徒的博爱”，“人不仅是为自己而生”等，直到更响亮的富有哲理的诺言：

> 人，由其健壮之体魄，心灵之所向，乃是为社会而形成之“人”也……。
>
> 我辈皆本协会之成员，均应认真深思，人既成为社会的一分子……恒需互相帮助与支持；对于任何同胞兄弟之不幸，我辈感同身受，则人道之理同情之心油然发自肺腑矣……。[44]

在不同地区出现的互助会，发挥着统一的文化影响。虽然由于财务和法律上的原因，它们自己之间的联合要慢慢来，但却方便了地区性的和全国性的工会组织的形成。他们用“社会的人”这个词也推动了工人阶级意识的成长。它把基督教的博爱的语言和卫斯理宗（还有摩拉维亚教派）传统中冥思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意象，以及欧文社会主义中的社会的承诺融合在一起。许多早期欧文派的协会和商店都在其规章的前言中引用圣经中的《以赛亚书》（第41章第6节）中的一句话：“他们各人帮助邻居，各人对弟兄说，壮胆吧。”19世纪30年代，流传着几十首互助会和工会的歌谣，详尽地表达了这一主题。

雷蒙德·威廉斯先生曾表示：“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生活中最关键的特点就……表现在有关社会关系本质的不同观点 423

---

[44] 《联谊会……规章》（纽卡斯尔，1812）；《西博尔顿互助会……条例》（桑德兰，1811年）；《善意协会章程》（纽卡斯尔，1815）；《同心互助会条例》（纽卡斯尔，1804）；亦见 H.J. 马尔比：《布雷德福早期的互助会》，载《布雷德福古典学》，第7卷（1933），其中例举了卫斯里宗对章程的影响。

中”。与中等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或(在最好的情形下)有关服务的思想不同,“‘工人阶级文化’一词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思想,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组织机构,行为举止,思维习惯和目的意图”。[45] 互助会并不是从某一个思想中“派生”出来的,思想和组织都产生于对某种共同经验的反应。但是这种区别是重要的。在互助会这种简单的细胞状结构中含有日常的相互援助之风,我们可以在工会、合作社、汉普登俱乐部、政治同盟以及宪章派各个分会中看到,它的许多特征正以更有经验和复杂的形式在重现着。与此同时,也可见这种协会正在把非常广泛地普及在“浓厚”而“具体”的工人相互关系细节中的互助风气提炼出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工作中。19 世纪上半叶的各种证人,包括教士、工厂监察员和激进的出版者,都论述过在最贫困的地区存在着广泛的互助关系。只要出现紧急情况,如失业、罢工、疾病、生孩子等等,就总是穷人在“帮助他邻居的每个人”。在普雷斯对兰开郡生活方式的变迁发表评论的 20 年之后,库克·泰勒对兰开郡工人忍受的“最可怜”的状况感到吃惊。他说:

> 情操高雅,举止适度,体面、整洁、秩序,……这些都与我亲眼看到的最可怜的状况不相称。我看到这个国家和天下任何国家最高尚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人正逐渐变成牺牲品。

“我在曼彻斯特北部遇见的每一个受苦受难的工人……几乎都特别害怕被迫去接受教区救济。”[46]

如果把这看做是惟一有效的“工人阶级”伦理,那是错误的。

---

[45] 《文化与社会》(企鹅版),第 312—314 页。

[46] 库克·泰勒前引书,第 37—39 页。泰勒写作这本书时正处在 1842 年棉纺业萧条的时代。

工匠和技师对“贵族气派”的向往，“自助”的价值观，以及罪恶和堕落，也都广为蔓延过。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不仅发生在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也发生在工人阶级整体内部。但是，424 到19世纪早期，可以说，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在许多工业地区是最主要的观念，它有一套明确的道德法则，如对工贼、雇主的“工具”和出卖邻居的人进行制裁，对不同心同德或个人主义的人不予以宽容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被自觉地遵守着，而且在政治理论、工会活动和道德词汇中尽皆推广普及。的确，正是这种集体主义的自觉意识以及相应的理论、机构、纪律和团体价值才使得19世纪的工人阶级不同于18世纪的暴民。

政治激进主义和欧文主义都吸收并丰富了这种“基本的集体主义思想”。弗朗西斯·普雷斯把1819年兰开郡的群众在行为方式上的变化，归因于“自从1792年宪法会和通讯会积极活动以来”政治意识上的进步“正传播到全国各地”，普雷斯的观点应该是正确的。他说：

> 现在，为什么10万人能聚集在一起而没有骚动呢？……人民有了目标，追求这个目标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提高了自我认识，于是正是这些人物以前也许是骚动的领袖，如今却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47]

另一位观察者却认为兰开郡的变化归因于科贝特和主日学校的影响，并指出各劳工阶级的品质发生了“普遍而急剧的变化”：

> 穷人在受苦受难和不满的时候不再制造骚乱，而是举行集会——不是攻击他们的邻居，而是责难内阁大

[47] 沃莱斯前引书，第146页。

臣。[48]

自尊和政治意识的成长是工业革命的真正大收获。它消除了一些迷信和顺从的精神，再也不愿容忍种种压迫。我们能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互助之风的稳定成长，是工会和行业俱乐部的力量和真正的自豪感的表现。这些工会和行业俱乐部，是在结社法废除后，从半合法的状态中崛起的。[49] 在纽卡斯尔，互助会有很深的根基，当布雷德福的梳毛工在1825年举行罢工的时候，纽卡斯尔的工会为这次罢工捐赠了基金，捐钱的人当中有铁匠、机器安装工、造船工、锯木工、裁缝、梳毛工、制帽工、鞣革工、织工、陶瓷工匠和矿工。[50]此外，互助会还助长了对纪念活动的爱好，提高了对工匠行会地位的自豪感，并把这些带进了工会运动。确实，直到19世纪初，这些传统在一些老板和技工师傅的老式特许商会或行会中仍有明显的活力，他们定期举办纪念活动，表达了"本行业"的老板们及其帮工们的自豪感。例如，在1802年，普雷斯顿的"行会"举行50周年大庆。在长达一周的纪念活动和展览会中有贵族、绅士、商人、店主和工厂主来参加，[51] 庆祝活动还给予帮工以某种显赫的地位：

> 在梳毛工和棉纺织工的队伍之前……有24名年轻漂亮的妇女为前导，每人都拿着一根棉枝，跟在后面的是几个男人，肩抬着一架纺纱机，然后是一辆撬车拉着一架织布机，每台机器上都有工人在忙碌地工作……

---

[48] 曼彻斯特"1819年8月16日受害者救济委员会"成员[J.E.泰勒]：《评与当前国内形势有关的文件并作解释……》(1820)。

[49] 参见前文，第239页。

[50] 《行业报》，1825年9月11日

[51] 到场的商社有鞣革业、皮毛业、手套业、制鞋业、木器业、屠宰业、葡萄酒业、成衣业、铁匠行业、绸缎业和布匹业。见《利兹信使报》，1802年9月4日。

在布雷德福1825年大罢工前夜，梳毛工举行了极其壮观的活动来庆祝布莱兹主教节：

一名擎大纛的开路先锋

24名羊毛商骑马的队列，马匹都以羊毛织物披挂在身

38名细毛精纺工和制造商骑马的队列，身穿白色呢马甲，肩披细毛条，腰系白色呢带，马匹的颈上全都覆盖厚羊毛线网。

如此等等，一直到我们看见： 426

布莱兹主教

牧羊人与牧羊人之妻。

牧羊的小伙子。

160名选毛工骑马列队头戴装饰

美丽的及色彩缤纷的细毛条。

30名梳机制造工。

烧炭工

梳毛工的旗帜。

乐队。

470名带羊毛假发的梳毛工，等等。

乐队。

40名染匠、帽佩红帽章，

腰系蓝围裙，红蓝双色

交叉相编的细毛条。[52]

大罢工结束后，这种庆祝活动竟再也不能举行了。

---

[52] J.詹姆斯：《布雷德福史》(1866)，第164—167页；J.伯恩利：《约克郡史》(利兹，无出版年月)，第165—175页。

从"行业"的旧面目演变到一端是雇主的组织，一端是工会。这一双重演变把我们带进了工业革命经历的中心。[53] 互助会和工会至少和雇主组织一样想维持庆祝活动和旧传统的自豪感。由于工匠们(他们仍被称做生意人)感到自己是**生产者**，雇主是依靠他们的技能的寄生虫，因此他们确实更重视传统。结社法一经废除，他们的旗帜就在各条街上公开飘扬了。1825 年，伦敦泰晤士河船舶塞缝工工会(成立于 1794 年)亮出了他们的[用法文书写的]标语："手和心"，"主动、诚实、融洽、及时"，表达了他们对中世纪手工技艺的自豪感。绳索工会举行的游行高举一面白色旗帜，上面画着围绕着蜂箱的一群蜜蜂，写着"工业之子！工会赐与力量！"(当游行到答应给他们加工资的雇主家门口时，他们停下来，表示敬意)。约翰·加斯特的泰晤士船舶制造工节俭会是伦敦"行业"工会领头的，做得最出色，用一面蓝绸大旗，写着"橡树之心[54]保护老年人"，6 匹栗色马拉着一只漂亮的船，3 名驭者身穿蓝茄克，后面跟着一支乐队，然后是委员会，其成员们各持大小不等的旗，以及来自谢尔兹，桑德兰和纽卡斯尔同一个行业的代表们。工会会员佩带着蓝色的玫瑰结和橡树枝，船中是一些老年的船工，他们居住在斯特普尼工会的养老院里。[55] 1832 年，南蒂奇的制鞋工人以他们的旗帜，"全套秘密的等级徽章，白色法袍，整洁的围裙……还有鞋匠之王克里斯宾的王冠和王袍"，来保持手艺工匠工会的社会地位感。1833 年，这位王爷

427

---

[53] 关于"中等阶级意识"在 1780 至 1846 年间的形式，见布里格斯教授在《过去和现在》杂志 1956 年 4 月号上发表的以此为标题的文章。关于卢德运动中"行业"观念的重要性，见后文，第 453—550 页。

[54] Hearts of Oak，其寓意为"军舰和水兵"。——译注

[55] 《行业报》，1825 年 8 月 14 日、21 日、28 日。船舶塞缝工工会有 300 名会员，绳索工会有 200 名会员，船舶制造工会有 1500 名会员。

骑马穿过全镇，他后面跟着一班随行人员，官员，带着特许状、圣经、一双大手套，还有各种各式和女式靴和鞋的漂亮样品”：

> 大约有500人参加了这次游行，每人腰围整洁的白围裙。一名工人殿后，背着整套工具，持手杖，正步行走。[56]

工人群众举止行为变化之明显，讲起来真是一言难尽。[57]我们也不应当夸大这个变化的程度。酗酒和喧闹仍然时时充斥于市井。但是，事实上，战后的20年以来，在工人最热心维护他们的权利时，常显得最认真最守纪律。所以我们不能同意所谓认真乃是福音教派宣传的结果，或其主要成绩的论调。此外，如果我们把整个事情翻过来看看它的反面，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到1830年，在大多数工人阶级集中地区，不仅英国国教，还有卫斯理派的复兴运动，都受到宗教自由论者、欧文派以及无教派的基督教徒针锋相对的抵抗。在伦敦、伯明翰、兰开郡的东南部地区、纽卡斯尔、利兹以及其他城市，卡莱尔或欧文派的无神论中坚分子有大批的追随者。卫斯理宗确实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越来越倾向于代表小商贩和享有特权的工人团体，而在道德上便与工人群体生活隔离了。原来一些宗教复兴运动的中心又回到了“不信教”的地步。19世纪40年代，在纽卡斯尔的那个“以祈祷也和嗜烈酒一样地出名，以唱赞美诗也和骂人一样地出名”的砂门地区，卫斯理宗在穷人当中失去了所有的信徒。在兰开 428 郡部分纺织地区工厂的工人同样地大批脱离教会，卷入了欧文主义和自由思想的潮流中去：

---

[56] W.H.查洛纳编：《托马斯·邓宁的回忆》，载《兰开郡和切郡考古学会通讯》，第59卷(1947)。在这次壮观地炫耀力量之后，紧接着就是1834年对工会的全面进攻，南蒂奇工会领导被逮捕。

[57] 关于工匠文化的进一步讨论，见下文，第711—746页。

如果没有主日学校，社会在这之前早就陷入可怕的状况之下了……不信奉宗教的思想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传播着，人们读卡莱尔、泰勒和其他不信宗教的人的著作而不是读圣经或别的书……我看到织工们一周又一周地聚集在一间可以容纳400人的房子里向坚信和论证根本不存在上帝的人鼓掌。我曾经到我做礼拜的那个教堂周围的农舍里，发现有20个人在一起阅读不信奉宗教的出版物……。[59]

像过去宗教复兴运动那样，欧文主义和世俗运动常常像"荒原野草"着火燃烧一样。

1844年恩格斯根据他在兰开郡的经历写道：除了爱尔兰人、"少数老年人、半资产阶级、监工和工头等人"以外，"工人不信奉宗教，也不去教堂"。"群众中普遍流行着一种对宗教完全淡漠的情绪，最多也只有一些自然神论的踪迹"。恩格斯的言过其实削弱了他的说服力，但是，多德从斯托克波特一家工厂的情况引证说，10个工人就有9个不去教堂；而1842年，库克·泰勒对于兰开郡与基督教正统教义论争的工人们生气勃勃又有圣经知识感到惊讶。一个工人曾对卫斯理传教士说："如果我想到是上帝造成了我周围的苦难，我就不再去做礼拜，并且说他不是我所希望的那个上帝。"同样，在宪章运动的那几年里，纽卡斯尔有成千上万的工匠和机工自认是自由思想者。在一家有2万个雇工的工厂里，"去做礼拜的人不超过六七人"。一个工人说：

工人阶级正在积累知识。他们积累的知识越多，他们与各种宗教派别之间的距离就越大。这并不是因为他

[59] 博尔顿一个雇主的证词，《下院特别委员会关于手工织工请愿的报告》(1834)，第419页。

们不了解圣经。我自己是尊敬圣经的……当我细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先知是站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谴责做错事的人，不论他是多么的有钱有势……如果牧师回过头去使用旧经文，我就会回过头去听他讲道，但只有到那时才去……

主日学校结出了意想不到的果实。[59]

429

教会的控制之软弱无力并不意味着阶级的自尊和纪律的松弛。相反，在工业组织和政治组织方面具有悠久传统的曼彻斯特和纽卡斯尔，在宪章运动的年代里都以群众游行的纪律而著名。那里的市民和店主以前曾惊恐万状地害怕“可怕而野蛮的井下矿工”用某种力量闯入纽卡斯尔，而现在，煤矿主必须寻遍城里的贫民窟，找来“下流坯”和拾垃圾的人去驱赶举行罢工的矿工。在1838和1839年，成千上万的工匠、矿工和劳工一周接一周地游行，穿过街道，秩序井然，常在经过咫尺之遥的军队之时，则避免一切的挑衅。他们的一名领导人回忆说：“我们的人民已经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暴乱，而是革命”。[60]

3.爱尔兰人

在工人阶级的新的集体里，一定漏掉了对一个组成部分——爱尔兰移民——的分析。据估计，在1841年，40万以上大不列颠的居民是出生于爱尔兰的；父母为爱尔兰人但出生在

---

[59] 恩格斯前引书，第125—126页；库克·泰勒前引书，第153—155页；《纽卡斯尔编年史：贫民状况考查》(纽卡斯尔，1850)，第32、56页。又见多德前引书，第181、186页。

[60] 法因斯，前引书，第19页。托马斯·伯特：《自传》(1924)，第34页；T.A.德维尔：《19世纪珍本书籍》(纽约，1882)，第184—185页。

不列颠的人何止几万。大多数爱尔兰移民是天主教徒，是收入最低的劳工，主要住在伦敦和工业市镇里。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大约有 1/5 到 1/3 的工人是爱尔兰人。

这里没有篇幅重述 19 世纪上半叶爱尔兰民族的悲惨经历那骇人的故事了。折磨爱尔兰的悲惨灾难，主要不是马铃薯疫病，而是紧接着(1798)联合爱尔兰人起义被残酷镇压后出现的一种反革命的后果。这次镇压比英格兰所经历的任何一次都更野蛮。另一个原因是 1800 年的合并法造成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后果。有一位爱尔兰教会的教士，名叫威廉·杰克逊，是联合爱尔兰人组织的威廉·汉密尔顿·罗恩与法国人之间的接头人。1794 年他在都柏林被捕，随身带着一份文件，简述了爱尔兰的形势以及法国人入侵时如何给以支援的计划。按这份文件的估计(未必准确)爱尔兰的人口有 450 万，[61] 其中的 45 万人可能是英国圣公会教徒，90 万是不信国教者，350 万是天主教徒。按该文件的说法，不信国教者(“本国最开化的一个群体”)

> 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献身于自由。他们在法国革命的各个阶段都热情地支持革命。天主教徒人数最多，最无知，最贫困。他们欢迎任何变革，没有什么变革能把他们的处境变得更糟，因为作为天主教徒的爱尔兰的全体农民可以说是欧洲最受压迫，最命苦的人。

如果英国人反对高卢人的偏见，在任何地方“都能把各阶层人团结起来反对入侵者”，那么，反过来说在爱尔兰，“这一被征服被压迫被凌辱的国家里，英格兰的名字及其权力是所有人都憎恶的……”。

> 非国教徒是通过理性和思考成为英国政权的敌人的，

[61] 根据 1821 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爱尔兰人口的数字为 685.3 万人。

天主教徒却出于对英吉利这个名称的憎恶……

总之，由于思考、利益、偏见、崇尚变革的精神、浩瀚的民族苦难，特别是近7个世纪以来遭受暴君的凌辱而对英吉利名称的仇恨，任何入侵无疑都会得到人民的支持。[62]

有一种有争议的说法，说法国人不是在莫斯科城下失去欧洲的，而是早在1797年，有一支哗变的海军出现在他们和即将起事的爱尔兰之间时，就已失去了欧洲。[63] 但是，当入侵真正来临时，却是另一种入侵，是爱尔兰的穷人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入侵。杰克逊的简述提醒我们，爱尔兰移民中的芥蒂之深比人们通常想象的大。在1798年前后的几年里，爱尔兰最为工业化的省份厄尔斯特(北爱尔兰)的非国教徒并不忠诚，他们是爱尔兰人当中雅各宾思想最强烈的一批人；那只是在叛乱被镇压之后，都柏林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才有意识地煽动"奥兰治派"和"天主教派"之间的对立。爱尔兰人移民中有康诺特的季节收割工，有韦克斯福德离乡背井的小自耕农，有厄尔斯特的工匠，他们之间的不和就像康瓦尔郡的农工与曼彻斯特的棉纺纱工人之间的不和一样。(周末晚上讨厌的吵架，在爱尔兰人之间发生的次数多于他们同英国人的吵架，这些争吵并不都涉及宗教问题，在普雷斯顿和巴特利的同一信仰的教徒中和短巷院子中，伦斯特、蒙斯特和康诺特三地区间的对立也重又出现了。)移民的浪潮一个接着一个。[64] 在1790到1810年之间，新教徒和厄尔

431

---

[62] 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0A(2)号；《威廉·杰克逊牧师审判案》(1795)，第80—81页。

[63] E.H.S.见琼斯：《失败的入侵》(牛津，1950)。

[64] 关于18世纪伦敦颇具规模的爱尔兰移民居住区，见M.D.乔治：《18世纪伦敦的生活》，第113页起。

斯特人仍杂居在一起，其中有许多小商人、工匠、织工和棉纺厂工人，有些人是《人权论》一书的信仰者。由于合并后经济不平等竞争的影响已是人人可以感觉到的，丝织工人、亚麻纺织工人和棉纺织工人就离开那些正在衰退的行业，而到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巴恩斯利、博尔顿和麦克尔斯菲尔德去。约翰·多尔蒂就是随着这股浪潮而来的，他十几岁时曾在米恩的一家棉纺织厂里劳动，战争快结束时到达曼彻斯特，几年后成为兰开郡棉纺织工人最重要的领导人。

从这个时期起，又有一个天主教徒和农民的大移民。1811年，一家地方报纸提到，林肯郡的自耕农"几年以来一直公开用广告吸引他们到这里来"。这里所指的是季节性的移民，即收割庄稼的工人。他们的"勤劳精神"受到称赞，与林肯郡"贪心的"劳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他们知道农场主必须依靠他们，因此想过分地抬高工资，在农忙季节一天给他们半个几尼还嫌少，

他们还因妒忌"爱尔兰辅助工人"而受到谴责。[⑯] 移民的道路走畅通了以后，更多的移民来到这里居住。马铃薯的连年遭灾，尤其是1821至1822年的饥荒，更加推动了移民的浪潮。

在1828和1830年之间，大批"保有世袭地的农民"被驱逐（那时他们的人数从19.1万下降到14200人），挤满了开往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的船。但是，英格兰"不是他们心目中的麦加，却是他们最不想去的地方"。一些比较幸运的人才能积蓄经费而移居美国和加拿大。移居英国的是他们当中最穷的人。他们来到这里，一旦有机会就异常勤奋地工作，以便向爱尔兰汇款，

⑯ 《波士顿公报》，载《阿尔弗雷德报》，1811年9月21日。

也常筹措一小笔钱帮助亲戚们渡过海峡到英格兰来，让全家团圆。[66]

绝大多数战争结束以后移居的移民以前在爱尔兰的生活状况(用蓝皮书的话来说)不足以应付"最普通的生活需要"：

> 他们住在肮脏破烂的棚屋里，一家好几个人挤在一起，睡在草铺上，或睡在地上……他们吃的常常是土豆干，而这种东西他们还要每天限制只吃一餐。……他们有时也有一块鲱鱼或一点点牛奶，但是，只有在圣诞节、复活节和忏悔节才能有肉吃。[67]

他们是西欧最廉价的劳动力，关于这方面的情节是人们熟悉的。蓝皮书逐页记载他们的卫生状况、犯罪、住房、手工织工的情况，连篇累牍地叙述爱尔兰人带到英国来的不卫生状况：他们住在地窖里，没有家具也没有床铺，垃圾堆在门口，过分拥挤，愿意拿低工资与英国劳工抢饭碗。他们的用处对雇主的最后目的来说，是毋庸赘言的。曼彻斯特一家丝绸厂主说："一旦我遇上工人罢工，急需劳力的时候，我就派人到爱尔兰去带 10 个、15 个或 20 个家庭来这里……"。[68]

不过，爱尔兰移民的影响比这更为矛盾而且更加有趣。正是要有压力来顺利地实现英国工人整体性格的改变，才提出需要一支未被工业劳动纪律改造过的辅助劳力，这真是自相矛盾！ 433 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这种纪律要求沉稳而有条不紊的勤勉工作，有内心认真的动力，有事先的考虑和对合同一丝不苟的遵

[66] 关于移民的一般状况，见雷德福前引书，第 114 页起；有关移民的经济和社会原因的出色概括，见 E. 斯特劳斯：《爱尔兰的民族主义与英国的民主》(1951)，尤见第 9—10 章。

[67] 《调查爱尔兰穷苦阶级委员会第三份报告》(1836)，第 3 页。

[68] 《英国的爱尔兰穷人状况的报告》(1836)，第 7 页。

守。简而言之，这种纪律就是在技术工作和半技术工作中需要有控制地付出精力。相比之下，在工业社会底层的重体力工作需要毫不吝啬地消费纯粹的体力——需要前工业化工作节奏中高强度劳动和疯狂放松间的交替轮换，而这种状况是体力较弱又有清教徒习性的英国工匠或织工无法适应的。

因此，爱尔兰劳工是工业革命不可缺少的因素，这不仅——可能并非主要——是因为爱尔兰劳工是“廉价”的（英国织工和农场工人的劳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考虑都已经足够廉价了），而且因为爱尔兰农民没有受到巴克斯特和卫斯理的影响。在半饥半饱的生活状况下，由于实行土地分租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爱尔兰农民为了得到一小块种土豆的地，而沦为农场主的半奴隶），他们在爱尔兰已经丧失了元气，因此以冷漠和无精打采而著名。当一个优秀的佃农因租金成倍加码大为吃亏之时，那么，在这块土地上，体力就不再是宝贵的财产了。在英国，他们有能力创造惊人的业绩，

> ……对最繁重、最讨厌和最没人愿意干的各种粗重的劳动都又情愿、又敏捷、又坚韧不拔地干，例如当石匠、砌砖工和水泥匠，在修建码头、船坞、运河和道路工程中当挖土工，当运输工和为船只当装卸工。

1835 年，凯伊医生曾调查爱尔兰劳工对兰开郡雇主有什么价值，他发现，在各种技术工种中英国工人更受欢迎，具备“工厂工作所需要的那种特殊的刻苦耐劳”。“英国人比较可靠、干净、技术比较强，在完成主仆之间的合同上比较有信用”。虽然棉纺织业雇佣了上万的爱尔兰人，但他们“几乎都不在高级的工序中操作……而在鼓风房里劳动……”。虽然有些爱尔兰劳工“当上了纺纱工”，但是都不在“受信任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在非技术的劳动职位中情况恰恰相反，1836 年，伯明翰的一名雇主提供

的证据是：

> 爱尔兰劳工愿意在任何时候工作……我认为他们是很有价值的劳动力，没有他们就不行。只要好好地对待他们，他们什么事情都愿意给你做。……英国人做不了他们做的活，当你催促他们时，他们愿意服从，英国人可不愿意。只要不挨打，他们宁可累死；为了不让别人超过他，他会不停地辛苦工作直到倒下……。

“他们需要更多的监视；他们在工作时喜欢说话”——人际关系的刺激常常比经济刺激对他们更有效。他们自己很幽默，也会很好地为鼓励他们互相竞赛的很幽默的雇主工作。“爱尔兰人暴躁易怒，但不像英国人那样固执、绷脸和任性。”他们的宽厚和冲动的性格，容易被人利用。确实，“只要不挨打，他们宁愿累死。”“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是出名地懒惰和马虎；渡过海峡之后，他们成了勤劳和进取的模范。”他们在码头或在挖土工地领取计件工资或分组工资。他们都想超负荷劳动，几年之内就损坏了健康和体格。这些就是搬运工、挑煤工和许多普通工人在伦敦的情况”，其中有很大一批是爱尔兰人。有人在利物浦码头上看到工人用这样的方式把燕麦装上船： 434

> 这些人（主要是爱尔兰人）从起重机的钩子上接过装满东西的袋子，扛在肩上，人就像突然矮了半截，然后扛袋穿过道路。逢到夏天，在整个白天的劳动时间里，他们以统一和不间断的步子干着这样沉重的工作，以每小时至少 5 英里的速度小跑，仓库到轮船之间足有 50 码之距……一个健壮的工人干这样的工作，每 100 袋可赚到 16 便士，一天可赚到 10 先令。因此，他们每天要走 750 趟，……有一半的路程要肩扛满袋的燕麦，因此，这要……走 43 英里长的路程。……

到19世纪30年代，这一类的劳动全都落到爱尔兰人身上，因为英国人要么不肯做这种下等的讨厌的工作，要么就是跟不上步子。[69]

这样，在惊人的程度上，雇主们从前工业化和已工业化的世界都获得了最佳的劳动力。被纪律束缚的工人的内心讨厌他的工作，这样的性格结构有利于勤勉有利于技艺，却同时造成自尊的障碍，使他们不愿从事肮脏或下等的劳动，建筑业的一位雇主提供的证词解释了苦力的角色全由爱尔兰人来承担的理由，他说：

435

> 他们从来很少成为好机械匠；他们不认真琢磨要加工的东西，他们懂事快但懂得肤浅；成不了好的机器安装工或机械工或做不好任何需要思考的事。……如果给爱尔兰工人一张机械设计图，他需要不停地关照；否则就会出错，或者根本不往下干"。

这不是"天资不足"而是"勤奋不够"；不是"知识"的缺乏，而是"道德"的缺憾：

> 一个不管明天而只为眼前过日子的人不愿意忍受严格的纪律，无法养成一个机械工所需的那种耐心和艰苦的努力。[70]

在30年代的各种蓝皮书中，《英国的爱尔兰穷人状况的报告》是一份最生动的社会学作品，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

[69] 《英国的爱尔兰穷人状况的报告》(1836)，第5、7—9、30—31页；斯特劳斯前引书，第14章："英国的爱尔兰人"；《济贫法委员会的第一份年度报告》(1836)，第305—306页；G.C.刘易斯：《评调查爱尔兰贫民状况的皇家委员会第三份报告》(1837)，第24页；约翰·韦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第242—243页；G.黑德爵士：《英国国内游记》(1835)，第190—191页。

[70] 《英国的爱尔兰穷人状况的报告》，第9、30—31页。

> 爱尔兰向英国的移民，是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的下层人口向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的底层扩张蔓延的事例之一。他们在任何工业部门都无法取胜，只能在初级的体力劳动部门里获取位置。

陶瓷业的一位雇主指出，雇主们发现这一点对他们“非常有利”，“因为本民族的民众在更有创造性和更需要技能的工作中得到完全的就业”。但许多雇主认为移民的“好处还不止一端”。因为爱尔兰人在休息时和在工作时一样都表现得精力充沛，无拘无束。“在制造业城镇的爱尔兰劳工大多是这样花钱的”：

> 星期六晚上，他们领到了工资，先还掉欠商店的帐，……交清房租，……把债还清以后，他们就去喝烈酒，直到把钱花光。到了星期一早上，他们就一文不名了……。

他们维持着一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水平，一点也不高于他们在自己国家里的那种生活”。他们没有清教徒的节俭和自制的品德，就像他们没有勤勉和远见的素质一样。在曼彻斯特、利物浦和其他工业城镇里，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成百上千的醉醺醺和吵吵闹闹的爱尔兰人填满街巷。

此外，爱尔兰人的善恶标准在许多方面都与受纪律束缚的英国工匠相反。爱尔兰人有时粗暴地，有时又幽默地蔑视英国当局。统治者的法律、宗教的歧视和社区的惩罚制裁都不会让他们感到在英国的法庭上受指控是一件耻辱的事。一位雇主说，只要友善地对待他们，他们就值得信任，“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被发现偷了点小东西，别人就不再理睬他”。但是，偷窃不得人心的雇主或农场主的东西或拒绝支付房租，这种行动不仅得到同胞的认可，而且得到集体力量的支持。曼彻斯特一位棉纺织业的雇主宣称，“他们时常做出一些不顾后果的事情”。他 436

们自己不停地打架斗殴，但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受到敌人的攻击，他们又会团结起来，就像一个人一样。争夺私酒酿制所会导致用短刀或砖块进行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爱尔兰妇女不会落在男人后面。在曼彻斯特的小爱尔兰区，采取法律行动去收房租、债款和收税，就像是采取一次小型的军事行动去对付英勇善战的人群。1836年，曼彻斯特的副保安长官说："到一家雇了许多爱尔兰人的工厂去逮捕人是非常危险的，当警官上楼的时候，爱尔兰人就向他们头上扔砖头和石块……。"曼彻斯特警卫队的警监证明说：

> ……在本城的爱尔兰人居住区逮捕一名爱尔兰人，我们需要出动10个、20个，甚至更多的警卫。他的左邻右舍全会拿着武器跑出来，就连妇女都会半裸着身体，把砖块石头送给男人们去投掷。一个人也会抵抗，打人和挣扎，以便争取时间等他的朋友集合起来救他……[71]

这些爱尔兰人既不愚蠢，也不野蛮。梅休经常谈起他们的慷慨，有"说话的能力和敏捷的理解能力"。他们坚持一个与英国工匠不同的价值体系，而且在冲击英国人的礼仪方面，人们觉得他们常常自得其乐，旁若无人。博尔顿的一名律师回忆说，他们往往欺骗法庭，把一大堆同乡带来作为"有资格的证人"，从他们支吾搪塞之言中显出他们对法律程序知识之精通，治安法庭的法官被他们的花言巧语哄骗得都糊涂了。同样，由于他们不在乎说谎，许多人成了花言巧语的乞丐。他们彼此之间是非常慷慨的。如果他们存钱，那是为了一些明确的大计划——移居

437

---

[71] 《英国的爱尔兰穷人状况》，第10、16—17页。《治安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1839），第167—169页。

加拿大或结婚。为了把妻子儿女和兄弟姐妹带到英国来，他们可以几年内“半个便士半个便士地积累”，但是，“他们却不愿意省下钱来保证自己或儿女不至被送到济贫院去……”。作为街头小贩，他们沿街叫卖，收购破烂，总是最穷的小贩。梅休干巴巴地说，他们的脾气不适于“在最廉价的市场上买东西和在最昂贵的市场上卖东西”。对英国的济贫法，他们采取高高兴兴的态度去沾光。他们使过时的定居法对他们有利，用教区的费用在全国四处周游（谁知道曼彻斯特是不是张三李四的出生地呢?），只要看停靠的地点适合，他们就从济贫法督察的马车里溜出来。他们会“毫不羞愧地接受”教区的救济。[72]

这是已经形成的工人阶级中一个未确定的因素，就像是一支源源不断的援兵在为撒旦城堡的城垛补充兵员。在有些市镇，一部分爱尔兰人被隔开居住在他们自己的街区。在1850年，梅休看见他们在伦敦的罗丝玛丽巷周围如迷宫一般的小巷子里居住。在层层叠叠的小屋内，可以看到“头发蓬乱的小淘气赤脚在水洼子里跑来跑去，不戴帽子的小姑娘们裹着披肩，懒洋洋地靠在门框上”。在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地窖里也有类似的隔离爱尔兰人的居住区。也有宗教的隔离。到1800年，信奉天主教的当地工人人数已经很少。在爱尔兰的移民中，天主教教会看到了在英格兰恢复信仰天主教的神圣计划的一种迹象；无论爱尔兰人到哪里，神父们都紧跟其后。再说，爱尔兰的全体教士是欧洲较穷的较接近农民的。据估计，他们每年的薪俸平均为65英镑，事实上，他们要靠教徒来养活他们，他们在教区居民的家中吃饭，依赖教徒的善良意愿。沃特福德的新教主教说： 438

---

[72] H.M.理查德森：《博尔顿40年之回忆》（博尔顿，1885），第129、131页；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109、121页。

教士们必须紧跟民众的浪潮冲击，否则就要流落在海滩上消亡……爱尔兰的农场雇工对教士……这样说："同我一道生活，像我一样生活；不要用你那高深的学问和修养来压迫我，怀着感激之情接受我给你的东西，靠顺着我的政治信念或行动来当我们的神父吧"。

1797年，沃特福德的天主教主教猛烈地批评他手下的教士，也证实了这种情况。他说：

不要让你们成为这个世界上富人的工具，……他们试图把你们当作压迫穷人的工具，来达到他们自己世俗的目的。……穷人永远是你们的朋友，即使在最坏的处境下，他们也会毫不动摇地忠于你们，忠于他们的宗教。他们同你们分享少得可怜的饮食，与你们的前辈分享这些饮食。……如果他们……像富人那样做，那就不仅会对你们关上大门，还会常像野兽一样追捕你们。我就没有可能以教会权威的名义站在这里对你们这些可尊敬的教士们讲话了……。

这个教会曾找出一位教士去充当韦克斯福德起义的领袖，找出另一位被送上英国的断头台（奥·科伊格里）；这样一个教会与全国的农民必然有共同的愿望和要求。1810年以后的30年里，丹尼尔·奥康内尔一直在设法（主要通过天主教同盟）让教士来充当辅助的政治鼓动者。当爱尔兰的穷人到英格兰之后，教士们采取各种手段控制自己的教徒，使用的手段有：忠于教士的职守（爱尔兰教士对其教区居民的思想活动的了解程度，是英国教士所无法相比的）、心理恐吓、经济接济、财政讹诈、对亲戚施加压力、在有难时给以安慰，等等。他们相信要在新教的英国取得胜利，只有一种福音主义形式，即高生育率。英国的卸煤工、挖土工和叫卖水果或鱼等的小贩中有许多人"不信神"，而他们的

爱尔兰同事却去参加弥撒。教士是惟一的权威，爱尔兰劳工只对他们表示尊重和服从。一个天主教的教规能平息博尔顿星期六夜晚的骚动而地方长官却不能。梅休曾随一位教士巡视他的信徒，他看见：

> 到处都有人出来迎接他……妇女拥挤在门口的台阶上或从地窖的活板门里爬出来，不过是向他屈膝行礼……当这位牧师走过街道时，孩子们也快步跑来，让他停下来摸摸他们的头发……。[73]

439

因为这样的移民有许多，教士的权力的确增强了。他们已经离开了自己成长的家乡，教士成了他们与旧的生活方式之间的最后一点情结。教士们有文化，而且在社会等级方面又与他们相距不远，在身份方面不受英国雇主和官方的干涉，有时甚至懂得盖尔语，经常往来于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带来家乡的消息，有时是亲人的消息；人们信任教士，托教士办汇款、积蓄和送信。因此必然的后果便是爱尔兰农民带到英国来的最持久的文化传统——传到第三代和第四代——是一个半封建的民族主义的教会。在最肮脏的地窖里面，人们也许会看到一些罗马天主教的玩艺儿，如烛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色彩艳丽的圣徒像和殉道者像”，并且与“解放者”奥康内尔的像一道挂在墙上。相比之下，丰富的爱尔兰民谣和民间故事的大批遗产却往往同第一代移民一道消失了。移民们在一段时间里还会继续遵守村民的习俗，访问彼此的住处，并在那里“狂烈地跳起快步舞和旋转舞”。但是，到了他们的孩儿那里，小提琴、烟斗和盖尔语都抛到一旁去了。

---

[73] 同上书，第 1 卷，第 12 页；E. 韦克菲尔德：《爱尔兰叙事》(1812)，第 2 卷，第 577 页；哈勒维前引书，第 3 卷，第 93—95 页；赫西法师：《牧师给天主教教士的信》(沃特福德，1797)。

尽管在某些城镇里，爱尔兰人有自己的居住区而不与外界杂处；但也从来没有因社会压力而落到像犹太人聚居的种族隔离区的地步。要把操着共同语言而在合并法通过之后已成为英国公民的一个民族变成处于从属地位的少数民族，本来就是困难的。相互通婚的现象很普遍。在爱尔兰人被工人阶级整体所吸引时，值得注意的不是冲突，而是这个过程相对的轻易。当然，骚动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建筑业或码头上，爱尔兰和英国的非技术工人处于直接的竞争中。19世纪30和40年代，在修建铁路的掘土工人当中发生了对阵的搏斗，并且造成伤亡。敌视天主教和敌视爱尔兰人的感情在伦敦尤其强烈。议会在1800至1829年间为天主教解放运动而进行的长期较量中，每个阶段上都出现用下流传单和歌谣谩骂天主教徒的现象。迟至1850年，当天主教主教得到任命时，还导致人们焚烧他们的模拟像，引起一片"天主教入侵"的呼声。梅休发现，"打油诗"和"赞美歌"的作者认为一首敌视天主教的好打油诗就是投向天主教的匕首。有一首打油诗写道：

440

修士、修女和笨蛋四处串联，

教皇的训令堵不住我们的嘴，

振作起来，喝退教皇，

连同他的枢机主教韦斯曼。

但是，梅休所记载的赞美歌和连祷文都没有提到爱尔兰人。大多数词句来源于史密斯菲尔德大火的传说以及民族感情，例如这样的句子出现在"古老的英国约翰牛吞罗马的教皇牛"等传单中。住在罗丝玛丽巷附近地窖里的居民们很难被有关外族入侵的民谣所同化。[24]

---

[24] 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243、252—253页。

相反，倒是有许许多多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英国的激进主义或宪章运动应当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共同战斗，尽管这种同盟关系难免存在紧张和对立。在陆军、海军和北方的纺织城镇里，他们之间的对立很少以种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因为在这些地方，爱尔兰人与英国人同是受害者，他们并肩劳动，并肩斗争。自从联合爱尔兰人创建，爱尔兰人持棒参加保卫托马斯·哈迪的住宅以来，就存在着一种有意识的政治联盟。英国的改革派一般都支持天主教解放运动，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多年来在议会里争取天主教解放。科贝特不仅通过《政治纪事报》，而且写了一本《英国的新教改革》(1823)来推动这项使命。他在这本书里编造了一些神话，把"腐败的旧制度"和"那东西"归因于都铎王朝时期对修道院和慈善机构的掠夺。激进的宣传家让人们始终牢记着 1789 年的野蛮镇压，霍恩、克鲁克香克和伍勒无情地控诉卡斯尔雷("德里—唐—三角同盟")参与拷打和鞭笞的行为。费格斯·奥康诺的父亲罗杰·奥康诺是伯德特的密友，曾经被提名为伯德特竞选威斯敏斯特议员的伙伴。1828 年，伦敦反对奥康内尔的激进派爱尔兰人组织了公民政治自由同盟，得到了亨特和科贝特的支持，这个组织与英国先进的激进派密切合作，是 1830 年成立的工人阶级全国同盟的发起者之一，后来在 1836 年又成为宪章派伦敦工人协会的先驱。[75] 441

---

[75] 可参考舍温的《政治纪事》，1817 年 7 月 19 日、26 日；霍恩的《改革派纪事报》，1817 年 7 月 19 日；科贝特的《政治纪事》，1818 年 1 月 17 日；《自由帽》，1819 年 9 月 8 日；科尔：《威廉·科贝特传》(1924)，第 308—309 页；D. 里德和 E. 格拉斯哥：《费格斯·奥康诺传》(1961)，第 12—14、19 页。罗杰·奥康诺声称自己是合法的爱尔兰国王(费格斯也继承了同样的要求)，结果使他与英国激进运动的关系复杂化了。罗杰建议在威斯敏斯特竞选议员，遭到科贝特的反对，理由是："不行，我们不要那么多的王族；我们有一个王族就足以让还没有完全失去良知的民族感到满意了"。

显然，在 1790 至 1850 年之间，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的激进主义保持着连续不断的联盟，这种关系不时因奥康诺家族的命运而稳固或松弛。但是，爱尔兰移民问题的影响在中西部和北部地区不那么明显。1798 年以后的 20 多年里，爱尔兰各个郡连连发生农民骚动，秘密会社采用恐怖手段来保卫佃农的权利，阻止地租和物价的上升，拒绝交纳什一税，把英国地主驱逐出去。在这些秘密会社中，有打谷会、卡拉瓦特会、萨纳维斯特会、唐郡的托米会、卡片会、绿带会以及后来的莫利·马基尔派。[76]打谷会在 1806 年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康诺特，长期结怨的卡拉瓦特会和萨纳维斯特会于 1810 年活跃于蒂帕雷里，克里以及沃特福德。1813 年，骚动蔓延到米思、王室直属郡和利默里克等地。在 1821 至 1822 年的土豆大饥荒时期，动乱遍及芒斯特、伦斯特和康诺特的一部分地区。持枪勒索，劫持人质互相滥杀，地方仇杀，抢劫枪支，用武力征收费用等——长期受压的农民的仇恨之爆发，有如洪水刚被堤坝拦住（用处死和流放的手段），立刻又在另一处决堤。1811 年，爱尔兰总检察长慨叹说："武装的农民和非武装的乡绅这样一种现象已经产生可怕的结果。"首席法官将一个几乎还是十几岁的偷武器的小孩处以死刑，他宣布：

> 我们能不能再忍受这种情况：让人们白天劳动晚间立法；白天耕地晚间来执行法律、治理国家？

多尼戈尔的托马斯·德维尔是爱尔兰移民，后来成为宪章派北方政治同盟的书记，他从小就听惯了武装的男人"排成半军事队

442

[76] 莫利·马基尔，相传是一寡妇，19 世纪 40 年代曾领导爱尔兰人反对土地所有者。20 年后，成为美国矿工的秘密组织，称为莫利社。——译注

列"晚间在村庄的街道上通过时"沉重的脚步声",[77] 像他这样的爱尔兰移民不在少数。

我们无法在某本传记中找到具体的事例(哪个爱尔兰人会在英国法庭上承认自己过去是卡片会或"平均派"的成员呢?),但是,毫无疑问,一些爱尔兰的移民带来了这些秘密组织的传统。他们的影响在1800至1802年以及在卢德运动期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78] 他们在晚上涂黑面孔,行动迅速,他们持枪抢劫,偷窃马匹和牲畜,许多爱尔兰人都曾沿袭使用这种方法。其次,在各个工业城镇都有爱尔兰人的聚居区,从而使消息的传递灵通而迅速。这些有助于失去祖辈产业的人们自然地结合成秘密会社。如果爱尔兰人是好争吵的,他们也是爱急公好义的。

假使许多爱尔兰的农民带来了革命的遗风,但教士们却不。爱尔兰教会并不打算叫人们注意居于少数地位的天主教力量在英国不断壮大,也不想使它受到进一步打击。在19世纪30年代,教士们在政治上仅仅是对奥康内尔表示忠诚。奥康内尔这时已经抛弃了爱尔兰的40先令不动产自由持有农,以此去交换天主教的解放;他还投票反对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他的夜郎自大,他那花言巧语的忠君言论,他与辉格党人一会和好一会闹翻,这些都使他的爱尔兰同胞们感到疑惑,造成混乱。这说明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激进主义之间的联盟现在到了最低点。因此,在英国的各种教会中,只有天主教会不产生有"倾向"的教士,他们把自己同工人运动视为一体。爱尔兰劳工虽然很快加

---

[77] 哈勒维前引书,第2卷,第28—30页;韦克菲尔德前引书,第2卷,第763页起;斯特劳斯前引书,第88—89页;关于对卡拉瓦特会和萨纳维斯特会的审判,见豪厄尔:《国家审判集》(1823),第31卷,第419、423、464页;德维尔前引书,第93、101页。

[78] 参见下文,尤见第596—599页。

入了结社组织，但他们大多数都在非技术行业中工作，那里的工会主义是最弱的。因此，他们很少产生英国工人运动中明显的领袖(约翰·多尔蒂是个例外，他始终不懈地关注着工会组织，有意识地对奥康内尔的组织方法进行改造，以适应1829年成立的全国劳工保护协会的需要)。爱尔兰人的影响，在地区和他们劳动的处所，在他们的叛逆的秉性中最为明显，他们好向政府当局挑战，好用"实力"威胁别人和不怕所谓中止宪政的恫吓。一位天主教教士在1836年承认，爱尔兰人"与英国人相比，更愿意加入工会、结社和秘密会社"。另一位证人说，"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大喊大叫和带头闹事的人"。恩格斯把"爱尔兰人热情而活泼的性格"看成是使遵守纪律又矜持稳重的英国工人去采取政治行动的催化剂，他说：

443

> ……将爱尔兰人之易于同人相处、敏感和暴躁的性格同英国人的稳定、好推理和不折不挠的性格混合在一起，在长期内，必定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爱尔兰人的宽容、重感情的天性没有经过种族的杂处和日常的生活接触以融合冷漠而理性的英国性格的话，无礼的、利己主义的英国资产阶级将会更牢固地把工人阶级掌握在自己手中。[79]

对于恩格斯所使用的"天性"和"种族"这两个词我们可以质疑。但是，只要把这两个词换掉，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判断依然是正确的。当精密的机械工程与用铁铲和钉镐挖沟的劳动同时并存的时候，对雇主大为有利，因为他们可以雇佣两类不同的劳

---

[79] 《英国的爱尔兰穷人状况的报告》，第23页；斯特劳斯前引书，第125—130页；恩格斯前引书，第124页；亦见雷切尔·奥希金斯：《爱尔兰人对宪章运动的影响》，载《过去和现在》，第20卷(1961年11月)，第84—85页。

动。但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把老练的政治激进主义和比较幼稚而敏感的革命情绪汇合起来。这一汇合表现在宪章运动中，而当费格斯·奥康诺与奥康内尔发生决裂，布朗台尔·奥布莱恩根据英国的条件提出社会主义的土地国有时，造成的危险就更大了。过去有一个时候，即 18 世纪 90 年代，当费格斯的叔叔亚瑟·奥康诺与奥科伊格里以及宾斯一道在梅德斯通被捕时，似乎英国的雅各宾主义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有可能采取共同的革命策略。要是奥康诺能像带动英国北方那样带动爱尔兰，那么，宪章派和“青年爱尔兰”运动就有可能发展到共同起义的地步。但是，因为一面是宪章运动中“道义派”的保留态度，另一面是奥康内尔的以及教士们的影响，还要加上“大饥荒”造成了严重的士气衰落，才阻碍了起义的爆发。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 444

4. 永世万代

即使我们现在已经更清楚地看到了构成 19 世纪初工人阶级整体的许多组成成分，我们对“生活水平”的争论必然还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因为在“水平”一词的下面，我们总要遇到一个事实的问题和一个对价值的判断问题。我们希望说明，那些价值不是“不可测量的东西”，历史学家也许会谨慎地搁置此事，因为他们考虑到，既然这些价值无法衡量，那么没有谁的观点会比别人更正确。但是，恰恰相反，价值涉及到人类的满足，涉及到社会变化的方向，如果历史学想要在人文学科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历史学家就必须对价值进行测量。

历史学家，或社会历史学家，实际上对两种形式的价值判断必须加以关心。他们所关心的第一位的是生活在整个工业革命期间的人们**实际上所具有的**价值。新旧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各

自支持着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它们有各自特点不同的生活方式。人类满足有两种不同的常规和观点，它们在两类群体中实际上是相互冲突的，如果我们想对这种继之而来的紧张关系进行研究，证据并不缺乏。

历史学家必须关心的第二位的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过程进行某种价值判断，而我们本身就是这个过程的一种终极产品。正是我们自己的参与才使判断变得困难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采取某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因为一是工业主义从其本身的一部分经历出发作出的"浪漫主义"的评判；一是面临这种经历的手工织工、工匠或乡村手艺人进行顽强抵制的记录；他们牢牢地坚持着他们所要的那种文化。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的变化，所以我们只好持这种态度。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失去了什么，什么转到了"地下"，什么还没有解决。

要对生活质量作出评价，就必须对有关的人们的全部生活经历，以及对文化和物质上多方面的满足或剥夺作出估价。从这种观点出发，就必须接受过去提出的有关工业革命是一场"灾变"的旧观点。在1780至1840年之间，英国人民经受了苦难的经历，虽说从统计数字来看，物质条件有可能略有改善。查尔斯·斯诺爵士告诉我们，"穷人离开了土地，按照工厂能够接纳他们的速度进入了工厂，这一点是毫无异议的……"，对此，我们必须和利维斯博士一样回答说："整个人类问题的真实历史不知要比这种说法复杂与痛切多少倍！"[⑧] 有些人在工业城镇灿烂工资的引诱下离开了农村，而旧的村庄经济在他们背后崩溃了。他们离开农村主要的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要离开农村，而是

⑧ C.P.斯诺：《两种文化》(1959)；F.R.利维斯：《C.P.斯诺的含义》，载《观察家报》，1962年3月9日。

受外部推动力的支配，例如圈地、战争、济贫法、农村工业的衰落、统治者的反革命立场等等。

工业化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它必定会导致传统生活方式的消逝。但是，这个过程在英国伴随着异乎寻常的暴力。暴力在英国没有被缓和；不像经过全国革命的国家有国民共同努力的意识去缓和暴力。英国工业化时期的意识形态只是雇主的意识形态，它的救世主般的先知是安德鲁·尤尔博士。尤尔认为，工厂制是"地球文明的伟大执行者"，它将"科学和宗教这种生命之血输给那些还躺在死域的阴影下的……芸芸众生"。[81] 不过，那血液的输出者没有感觉到这是在输血，"芸芸众生"更没有感觉到是在接受血液。苦难的经历以成百种形式压在他们的身上，对农田劳工来说是失去公地使用权利、村社民主制；对工匠来说是失去手工业工匠师傅的社会地位；对织工来说是失去生计和独立性；对儿童来说是失去在家中的劳动和玩耍。对实际收入有所提高的各类工人来说，他们失去的是安全保障和闲暇生活，而且城市的环境在不断地恶化。R.M.马丁于1834年向议会手工织工委员提供了一份证词，他当时离开欧洲已十多年，刚刚从国外回到英格兰，他对于物质和精神方面退化的事实感到惊愕，他说：

> 我不仅在这个国家的工业区看到了这一点，在农业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活泼生动的精神、野外的竞技和村庄的体育活动。他们变成了肮脏、不满、悲惨、忧心忡忡和竭力挣扎的人，没有健康，没有欢乐，也没有幸福。

446

艾什顿曾经把人类与"自然"或"土地"相"脱离"这一类说法

---

[81] 《工业哲学》，第18—19页。

恰当地形容为“单调乏味”，但要想到这些词句中去寻求解释则会误人歧途。“最后一次农工起义”之后，与“自然”足够接近的威尔特郡农工堕落的程度远远大于兰开郡的纺织厂女工。这是施于人性之上的暴力。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追逐利润造成的后果，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贪心既摆脱了旧的制裁，又不受新的社会控制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像马克思一样认为这是资本家阶级的暴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技术所引起的劳动和生活之间强横的分隔。

给工业革命的年代笼罩上最黑暗的阴影的并不是疾病和贫穷，而是劳动本身。手工业者出身的布莱克对我们叙述了这样的经历：

> 于是，给尤里森的儿子们留下了犁耙、织机、锤与凿、直尺与圆规……
>
> 他们把谋生的手艺变成了死亡的手艺。
>
> 计时的沙漏被看不起，因为它的简单的工作方法像耕夫的工作方法那样简单。
>
> 把水戽进水塘的木轮水车的木轮被劈开投火中烧掉，
>
> 因为它戽水像赶羊那样简单。
>
> 巧妙的水车发明了，是没有轮子的水车，为的是使年轻人花不起这笔钱，把那些永世万代的人
>
> 束缚在抛光铜和铁那极累的手艺活中，
>
> 叫他们无法知道，把他们本应学习智慧的时光，消耗在伤心和劳累之中，以得到一小片面包，
>
> 他们不知道举一反三，也不知道推论，这就是示范，对一切简单的生活惯例都茫然无知。
>
> 在无知中，他们看到一小片，便以为是全部，并称之为

示范。他们对一切生活的简单规则一无所知。

这些“永世万代的人”似乎被囚禁在劳动中，有时就好像被关在墓穴里一样。他们终生付出最大的努力，并且还得到互助会的帮助，也不能保证他们得到如此受民众重视的东西——一个“体面的葬礼”。新的工艺正在出现着，旧的喜好仍然保持着，但在所有这一切中，我们感觉到令人讨厌的漫长劳动的全面压力，而这样的劳动是在为某种异己目标而建立的严格纪律下进行的。447 D. H. 劳伦斯写道，这就是“丑恶”的本源，它“违背了 19 世纪人类的精神”。[㉒] 当一切其他的印象都淡去之后，这一点却留下来了；留下的还有一切有形的社会凝聚力已经丧失的印象，惟一没有失去的，是工人群众在与他们自己的劳动及雇主对立的过程中，为自己制造的凝聚力。

㉒ 《诺丁汉与矿区》，载《选集》（企鹅版），第 119、122 页。

第三部 工人阶级的存在

“革命开始了，
回家去拿枪，
瞄准威灵顿公爵，射。”

——贝尔珀的街头歌谣

“人民不愿……为追求光辉的戏剧效果而选择叛乱。”

——威廉·黑兹利特



第十三章　激进的威斯敏斯特

451

在通讯会瓦解、人身保护法中止以及所有的"雅各宾"表现形式都被宣布为非法之后，民众的激进主义并没有消失。它只不过失去了连续性而已。它在书报检查与威胁恐吓下的数年间，难于公然发表见解。它失去了宣传阵地，失去了组织机构，还失去了明确的方向。但它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然存在，仍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要把这些不连贯的事件写成一部连续的历史是困难的，不过我们还要尽量去做。

1797年，正当皮特在全国大肆镇压之际，格雷和福克斯向下院提出了最后一个动议，为房产持有人争取选举权。随后，福克斯和他那批剩余的贵族辉格党"共和人士"退出下院，抗议人身保护法的中断和反对战争。他们退到各自的庄园上去，隐退到寻欢作乐之中，做做学问，或者在霍兰公馆和布鲁克斯俱乐部里清谈一番。他们富裕而有影响，所以不可能被完全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牢固地掌握着衰败的选邑，而这些选邑，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原则所不容的。[①] 1800年以后，他们又回到议院，重新坐上他们的席位。虽然这批人对于服从多数人的民主信条只是说说而已；但其中个别人——如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塞缪尔·惠特布雷德、H.G.贝内特等，却一次又一次地在下院挺身而出，捍卫政治自由或社会权利。1797至1802年间，福克斯大概

---

① 当时最妙的一个讽刺就是1800年霍恩·图克作为最衰败的选邑老萨勒姆的议员当选，但他因有关的规定的原因而丧失资格，因为他以前担任过教会牧师。

是改革的惟一保护伞。到处都有人在一起聚会，为福克斯和格雷的健康干杯，他们要求恢复政治上的自由，为实现和平而上书请愿。在诺里季，以前的雅各宾派就这样聚会，并且从1799年起开始举行"自由之友的每月公开会"。②

但这类团体哪怕只要一露踪迹，马上就会引起官员的注意，452 并导致反雅各宾政论作家们的猛烈抨击——其中颇为尖酸刻薄的一人，就是新近从美国回来的办报人威廉·科贝特，他在美国是一个反雅各宾的雄辩家，回国后，他的爱国行径受到嘉奖，陆军大臣温德姆资助他创办了《政治纪事报》(1802年)。但即便公开的改革派被驱散或不得不转入地下，在1799年到1802年，普遍的不满仍在蔓延。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使英国的工业停滞，失业率上升，物价高涨。厂商们为和平而请愿，博得公众舆论的日益支持，这就迫使皮特摊牌。抢粮风潮席卷全国；还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有组织的地下反抗运动。③

短暂的亚眠和约时期(1802年4月至1803年5月)造成一个新的阶段，皮特暂时让位给阿丁顿(即后来的西德默思勋爵)，这是个软弱的首相，尽管他在反雅各宾、继承镇压传统方面是坚定的。战争打了快十年，和平的消息使人欣喜若狂，张灯结彩。拿破仑的使节在伦敦大街上被人们拉着一起凯旋游行，科贝特的办公室则被人捣毁，因为《纪事报》主张继续打下去。满心好奇的辉格党人和改革派人士，包括福克斯自己，成群涌到巴黎去，看看那新成立的共和国。(1795年曾把自己的军服丢给约克"兔崽子"的桑顿中校，这次到巴黎时带了一队猎狐犬和马，还

② 人民一分子：《致在天使酒店聚会……庆祝C.F.福克斯生日的该协会的第三十六封信》(诺里季，1799)。

③ 见下文，第472—484页。

有一箱手枪，作为礼物送给第一执政[拿破仑])。

和平带来了一次大选，大选中，有五、六个选区推出的候选人得到雅各宾派的支持，并且取得惊人的成功。在肯特郡，通讯会曾一度在该郡中部市镇有很大的实力，一位福克斯派候选人挫败了现任议员。在考文垂，在那些严重的骚乱之后，激进派候选人仅以八票之差而落选。在诺里季，陆军大臣温德姆落选，两名福克斯派候选人在雅各宾派的积极支持下当选议员。在诺丁汉，福克斯派的市政团和兴高采烈的人民群众支持一位改革派人士当选为议员之后，出现了兴奋异常的场面。乐队在游行中奏《新纪元》和《马赛曲》，三色旗飘扬，还有(据一位反雅各宾的小册子作家说)"一个全裸的女性扮成理性女神，她是在场的显眼人物!!!"科贝特曾说，诺丁汉民众"在任何方面都是……一群共和革命的暴徒"。但1803年，下院借口推说骚乱者威胁了选民，因此撤销了得胜者当选的资格；这件事被作为提出立法以加强乡村法官在工业城镇的权力的机会。④

453

但大选中最轰动的事件发生在米德尔塞克斯，即当年威尔克斯的选区。三年来丑闻不断，暴露了那些"受人身保护的罪犯"即伦敦通讯会和联合英格兰人被捕成员所受到的待遇，他们没有被及时送交审讯，就被关在冷泉场监狱，置于典狱官阿里斯的看管下。霍恩·图克的朋友、议员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曾收到受难者的一件上诉书(据科贝特后来说)，上诉书是用小木片蘸血写在一本书的衬页上的。伯德特发现，有些犯人已经虚弱

④ J. 鲍尔斯：《上次大选之感想，表明雅各宾主义在进展》(1802)，第3—4页；《魄力的好效率》(1804)，第141页。改革派愤怒驳斥鲍尔斯的裸体女士的说法，斥其为谎言，见《关于诺丁汉上次竞选的十封信》(诺丁汉，1803)，第24—25页；萨顿：《诺丁汉纪实》，第244页。真实情况或许是关于游行队伍中有一个妇女"穿着肉色的衣服"，见《致约翰·鲍尔斯》(诺丁汉，1803)，第9页。

不堪，“形容枯槁”，于是就经办这些案子(尤其是德斯帕德中校的案子)，并在下议院内外四方投诉。一夜间，伯德特就成了伦敦人心目中的英雄，人们高喊：“不要巴士底狱！”1802年，伯德特参加米德尔塞克斯的竞选，与一个现任议员对抗，这个人名叫梅因沃林，是政府的支持者，同时又是地方官，与阿里斯有联系。这场竞争引起全国的注意。1794年曾被上枷示众的约翰·弗洛斯特成为伯德特的助手，其他一些以前的雅各宾派和被关押过的人也都来协助伯德特竞选。当时还是托利党的科贝特慨叹说：

> 从皮卡迪利到设在布伦特福德的投票点，一片混乱和煽动暴乱的景象实属前所未见，除非在革命最恐怖的年代的巴黎郊区。……一路上……从圣贾尔斯教堂起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痞子，咆哮着“弗朗西斯·伯德特——不要巴士底狱”。在投票点，每天都有五、六个分配到感化院去的犯人受雇在那里用咒骂去反对梅因沃林先生当选并以此逗引乌合之众的高兴。

伯德特的胜利是张灯结彩的信号，其规模与庆祝和平时不相上下。科贝特哀叹道：“它会引起一种极可怕的效果，它会使这个畸形发展和堕落的都会里的那部分不守法的、不正直的人胆大起来和人数多起来。”⑤

454

就连兰开郡都出现了竞争。当时一位女士向“雅各宾式的群氓”发表演说，她说：“这是一场皮鞋与木鞋之间的竞争，是好衣服与坏衣服之间的竞争，是富裕与贫穷之间的竞争，只要人民

⑤ 当选者宾(辉格党)，3843票，伯德特(激进派)，3207票，未当选者梅因沃林(托利党)，2936票。见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02年7月10、17、24日；J.G.阿尔杰：《拿破仑的英国客人和俘虏》(1904)；J.德尚：《法国大革命时的英国下腹部》(布鲁塞尔，1949)，第5章；M.W.帕特森：《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1931)，第4、7章。

决定伸张其权利,他们就能得到一切。”[6] 看起来,一场比1792至1795年声势更浩大的运动正在形成。假如有五年的和平,英国历史的进程就有可能重写。但事态的发展把一切都搅乱了。1802年11月,德斯帕德中校因叛国罪被捕;一月份,他被处死。[7] 1802至1803年之交的冬季,英法关系恶化,1803年5月,两国重新交战。

不过对许多改革派来说,这场战争的性质变了。1802年,拿破仑成为终身第一执政;1804年,他接受王冠,成为世袭皇帝。潘恩的忠实信徒是不能吞下这个苦果的。坚定的雅各宾派受此重创,正如当初较温和的改革派对罗伯斯庇尔感到沮丧一样。不管英国改革派如何企图划清界限,他们的士气却与法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第一帝国给英国共和主义沉重的一击,英国自此以后一直不能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人权宣言》在控诉国王的权力、中世纪的野蛮制度和世袭的称号时最为激愤;而当战争进行下去时,拿破仑却与梵蒂冈和解,晋封一批人为王,提拔一个新的世袭贵族,这些都使法国丧失了它最后的一点革命吸引力。“新纪元”甚至在诺丁汉人的记忆中都褪色了;如果自由之树还要生长,它就必须嫁接到英国的树干上来。

现在,在许多人眼里,法国只不过打着与英国在商业和帝国方面竞争的幌子,而对西班牙和意大利人民进行压迫而已。 455
1803至1806年,拿破仑大军在海峡对岸严阵以待,只等取得制海权。“雅各宾主义已经死了,一去不复返”,1802年12月谢里登这样宣布,他此时已经加入了阿丁顿内阁,“被谁杀死? 被那个不再是雅各宾主义之子、雅各宾之斗士的人杀死了,被波拿巴

⑥ J.鲍尔斯:《上次大选之感想》,第63页。

⑦ 见后文,第478—484页。

杀死了。"温德姆这时已经从诺里季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他在下院发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呼吁，呼吁全国团结起来，以对付战争的再起：

我要向那些雅各宾派呼吁——不是以爱社会秩序、爱良好的政府、爱君主制度的人的身份呼吁，而是以精神饱满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爱自由的人、高尚而热血沸腾的人的身份来呼吁——我要问他们，是否愿意套上枷锁，接受法国的压榨？⑧

战争重新开始后，志愿兵每个星期天都进行操练。也许他们并不像当时政论作家和爱国的传闻所说的那么得人心。"志愿兵"本来是个误称。很多军官都自告奋勇乐于操练，而那些杂凑起来的缺乏训练的兵众，却因失去他们惟一的休息日而倔强地反对操练。为了不让不满分子得到武器，也要煞费苦心。谢里登曾代表政府说："在大城市，像伯明翰、设菲尔德、诺丁汉，我们宁愿看到较高阶层的联合，而在乡下农村则宁可是较低阶层的联合。"1804 年，《泰晤士报》报道说，在诺里季的

城里……和附近，老百姓已经对志愿去当兵的制度反感了。在星期一，他们（特别是妇女）企图阻止诺里季志愿兵团的志愿兵去集合地集合。他们辱骂军官，还责备志愿军是面包变小和谷物涨价的原因。

乡绅、律师和制造商子弟欢喜骑马穿戴整齐，去参加志愿军的舞会。贵族和中等阶级达成共同谅解，形成了后来的在彼得卢（大屠杀）场上得胜的那种"团结精神"。而在化妆舞会上，他们的姐妹挑选丈夫，正是他们使商业和土地的财富相互交融，从而使英国的工业革命闻名于世。行伍的兵丁却得不到这种好处：在诺

⑧ 《科贝特议会辩论录》，卷 2，增补第 1667、1752 条。

森伯兰的一个村庄里,"志愿兵"的比例很高,其中"13 个愿在步兵服役,25 个愿在骑兵服役,130 个愿做向导,260 个愿赶运货马车,300 个愿赶牲口。"⑨

但不管这潜在倾向如何,谢里登是对的。雅各宾主义作为一个从法国得到启发的运动,大体上已经死了。1802 至 1806 年间,民众中的爱国情感的确复苏了。"波尼"[即波拿巴·拿破仑]若还受到推崇,那他是被作为一个"战士",而不是作为人民权利的化身被推崇的。爱国主义的通俗小册子、传单、印刷品在英国到处可见。如果诺里季的妇女曾经抵制,诺森伯兰的村民曾经保持沉默,那么兰开郡成千的织工却参加了志愿兵。纳尔逊是战斗英雄,其得人心的程度是自德雷克以来在英国所仅有的。人们认为他是同情人民权利的人,也还记得他曾为了救德斯帕德中校而说情调停。他在特拉法加取得的又苦又甜的胜利(1805),成为那么多民歌民谣的主题,也是每一家酒店每一个小村庄谈论不休的话题。1806 年,福克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自己进入联合政府(即"全体人才内阁")而听任战争继续进行。⑩

然而如从前一样,激进主义还是没有被消灭。但是其论调变得难以辨认了。以前的雅各宾派变成了爱国主义者,热衷于指责拿破仑背叛共和事业,其程度不亚于拥护王朝的正统派指责他篡夺波旁王朝。(1808 年,伦敦通讯会的一个前书记约翰·

⑨ 《科贝特议会辩论录》,卷 4,1191,1362 条;《黎明士报》,1804 年 11 月 5 日。时人对志愿军中土地与商业利益妥协一致的记载,可见 T. A. 沃德的设菲尔德日记:《回顾过去》,散见各处,并见简·奥斯汀书。

⑩ 关于民众的爱国心情,见 F. 克林伯格和 S. 赫斯维特:《警鼓咚咚……1803 年的传单》(加利福尼亚大学,1944)。就连约翰·瑟尔沃尔也撰写《关于纳尔逊勋爵之死的诗和演说》(1805)。

博恩作出有意义的努力以重新唤醒过去的事业，于是出版了名叫《理性人》的杂志以支持战争和许多“雅各宾的”老要求[11]。）其他一些人，像设菲尔德的里德黑德·约克等则自感有罪，他们急于自我开脱，这种情形就像近来常在醒世言情小说中所见的那样；约克在 1804 年变成了“反雅各宾”的政论作家，其言词之恶毒，竟迫使科贝特厌恶之极，从而倾向于改革派一方。

457 正是从这意想不到的方面，传来了新的激进主义的号角，因为，那些使老一类的雅各宾主义风流云散的影响，也导致老一类的反雅各宾主义失去了一些势头。如果说，拿破仑是敌人，因为他是暴君，他把一切大权集于一己之手，那么皮特又如何呢？他（1804 年起重掌政权，直至 1806 年初去世时为止）侵蚀英国的自由，不经审讯就监禁人民，贿赂报纸，利用每一种行政上的影响去支撑自己的权力。科贝特，这位好斗的托利党的报人，无论怎样丰富的想像力都不可能把他说成是雅各宾主义的人，竟在 1804 年开始转变立场，向政府发动论战性的攻击：

> 风向变了，从全民的热情跑回到专制主义去了：波拿巴上升到终身执政的岗位，开始了人们思想的大转变，而这转变又因他最近的篡位[即当皇帝]终于完成了。这种转变不仅预先消除了因为赞成自由的流行学说而被逮捕的危险，还能激起另一种担忧，使我们担心大臣依靠手中掌握的发行公债和纸币的机构而权势极大，并且仍在不断地扩大权势。我们虽然不叫奴隶却在事实上可能变得不比奴隶强，但又不是国王的奴隶而是当今的大臣的奴隶……。

---

⑪ 这份刊名令人起敬的刊物，因缺乏支持而停办了。见《理性人》，1808 年 4 月 16 日。

拿破仑的专制和皮特的专制有什么联系，在逻辑上丝毫也不清楚。科贝特在具体问题的辩论上头头是道，至于在主要原则上却往往大言不惭。不过在他越来越有力而频繁的高谈阔论中的要点却是清楚的：必须和国内的专制主义作斗争，也和国外专制主义作斗争。报纸被收买了，政府无能而腐败，豢养了一帮"马屁精、寄生虫、领取年金的人、受贿赂的议员、董事、承包商、股票经纪人、职业介绍所老板、国家大臣等人"。王室费用是派系的贿赂，是由超额收税之款支出的钱来支付的。那些"新富"的暴发户们靠战争发财，他们威胁着国王的权利和人民的自由。只有一个自由的英国，才能抵御外国的入侵。诸如此类。这是一个托利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奇妙结合，他在这种结合中不指责改革派，而指责政府，说它

> ……竭力想在[人民中]传播不和的种子，想把他们再次分成雅各宾派和反雅各宾派；想寻找一个借口来实行高压政策；想制造不满和不忠，挫败人民作战的勇气，让我们拜倒在敌人的脚下。[12]

458

科贝特言论之非同寻常不亚于改革派时机之不寻常。梅因沃林向下院请愿，推翻了1802年的选举结果。1804年，米德尔塞克斯举行补选，政府动用一切手段，想把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赶下台，而以梅因沃林的儿子取而代之。伯德特的能力并不足以成为全国性的改革派领袖。他是贵族激进派，有意无意地模仿威尔克斯的策略方针；[13]因同索菲娅·库茨小姐结了婚而得到一大笔钱。尽管他在竞选时戏演得不错，但在以后的10至

---

⑫ 《政治纪事报》，1804年9月1日。

⑬ 1804年他在竞选演说中说："我将……竭尽全力，使'第45号和自由'与我们这一代人联系在一起。"

15年中，他在下院的表现却说明他只是一个软弱的改革派领袖。然而他到底是国内几个主张改革的代言人之一，只有他的声音能让全国听到。他不想洗清因他同霍恩·图克和亚瑟·奥康诺的友谊而给他带来的雅各宾主义的烙印。1804年，他坚持他的立场，当民众高呼“不要巴士底狱”时，他尽情地嘲笑托利和辉格之流。15天中，选票数在梅因沃林和伯德特之间来回上下起伏着。每天投票结束，伯德特总要对人数众多、情绪激动的人群发表演说，以“独立”为口号，呼吁米德尔塞克斯的自由持有农，一遍又一遍地敦促他们“积极起来去游说拉票。”米德尔塞克斯的选民能不能发出“自由而独立”的呼声？或者，是不是要把席位永久出卖给“有利害关系的酿酒商、卖酒商和啤酒商的联合控制，或地方官和承包商的联合控制”？每天投票结束时，梅因沃林也登上竞选讲台发表演说，但都被狂吼和哼声赶下台。支持梅因沃林的人在伦敦张贴海报诽谤中伤伯德特，说他与“雅各宾派”有联系，并向伯德特的选民挑衅，把在政府影响下的每一个选民——“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书记员、唱诗班歌手和敲钟人”，“警官、股票经纪人和巡捕”都在选民册上登记。到第15天，即最后一天，看来伯德特有一票多数，他得到2833票，梅因沃林得2832票。欣喜若狂的人群把伯德特拉着在伦敦城里胜利游行，459 “在游行的人马中间，好像有一片移动的树林，因为车和马都覆盖着绿色的树枝。”乐队奏《不列颠尼亚之治》，一面旗飘扬在伯德特的座车上，旗上画着赫拉克勒斯把多头蛇踏在脚下。第二天早晨，郡长根据在检票收盘时出现的技术问题更改了选举结果。不过，精神胜利是圆满之至的。[14]

科贝特说潮流变了，这话说得很准。他自己就支持了伯德

[14] 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04年8月25日。

特，这在两年前根本就不可想象，而这本身也就是潮流转变的标志。对此，竟有如此多的自由持有农本来要赞成伯德特，表明了有一股不常见的倔强劲头存在于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和小乡绅以及工匠师傅之中。他们有一大堆抱怨，有些与经济利益无关（如执着于古老的“自由”与“独立”的风尚），有些则与较多的利益有关；例如政府通常把马车、马鞍和军服生意包给少数几家大商号或中间人，而忽略了多数小业主和工匠师傅。1804 至 1806 年，科贝特并没有倡导而只是追逐一股改革的新浪潮。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的《政治纪事报》一个论点一个论点地表达着一种好斗的激进主义，所指的每一种弊端都被条分缕析地张扬和论证，所以这种激进主义是更可怕的。科贝特揭发文官、军官之渎职以及挪用、侵吞公款，约克公爵的情妇出售官职，军队中残酷的鞭笞刑罚；其揭发言词之有力，竟使各种信仰不同的人们不得不注意，而对其中许多人来说，18 世纪 90 年代形成的一套老准则失去了意义。由于科贝特多多少少地还是一个托利党分子，他又回到了那些坚定、独立、直言不讳的人的理想之中，他们不讲财富和地位，只忠于自己的宪政，因此，他避免了反雅各宾派的偏见，而能够使改革者们重新组织起来。

但伯德特因为有一批更为激进的伦敦民众的存在，取得胜利是可能的。1806 年，民众找到了一个渲泄情绪的机会，成批地涌进威斯敏斯特进行大选。米德尔塞克斯实行自由持有农选举权，威斯敏斯特则是南部英格兰少数几个“开放”选区之一，凡持有房产的人都有选举权，允许许多工匠师傅和一些帮工去投票。1780 年以来，那里的两个席位之一是福克斯的。霍恩·图克曾竞争另一席，在 1790 和 1796 年的竞选中得票率可观，但是出于默契，这一席却进入一个政府提名的人之手。“皮特方面指定一个议员，福克斯方面指定另一个，两方面都不想当真地去选 460

举。事情就由两派举行的联席会议来决定，就如小偷们瓜分赃物一样。……”[15]

福克斯死后，空缺的一席留给了辉格党，诺森伯兰公爵冒称有提名权而推荐其子珀西勋爵，于是珀西就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当选”了。弗朗西斯·普雷斯带着厌恶的心情注视着当时那些身穿制服的公爵的仆人们朝着奴颜婢膝、互相争夺的人群扔出大块的面包和奶酪，分发啤酒。[16] 当一次大选临近时，科贝特给威斯敏斯特的选民们写了四封公开信，其主旨是简明的：

> 听人们谈起威斯敏斯特的选举情况，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选民们只是少数几个大家族的奴隶，或充其量也不过是他们卑下的仆从。问题……看起来不在于选民希望选举谁，而在于那几个贵族看中了谁……

选民们应该维护自己的独立性，消除敬畏权势的心情：

> 你们几乎有**两万**人。你们的行业与职业……对雇主来说必不可少，正如他们提供的工作机会对你们来说也必不可少一样。假如有一家店号辞退你，那么总有另一家准备雇你；假如你失去一个顾客，你就会得到另一个顾客……

尤其是“在威斯敏斯特选民中为数不少的帮工们，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受诱惑的……”。雇主们想要强迫雇工投票，应该被揭露出来让“公众窥视”：“一个铺子的工匠，若听从老板的指使并让他领着去投票处，那就把自己降到了牲口的水平上”。除非一些独立的候选人自荐于大选，“否则，威斯敏斯特就把自己放到了老

---

[15] 见科贝特12年后对1806年竞选所作的有倾向性的描述，见1818年1月17日的《政治纪事报》。

[16] 见前文，第77页。

萨勒姆或加顿的地位上。”[17]

托利党提名胡德海军上将。辉格党则提名福克斯的老同事谢里登，当时他在联合政府中任海军大臣，每年有6000英镑的收人。科贝特与改革派和他没有来往。在最后的五分钟，有一个自告奋勇的候选人，他本身正体现着激进派阵营的内部混乱，他就是詹姆斯·波尔，珀思的一个裁缝的儿子，是自己奋斗在印度经商致富的，1804年返回英国，为的是在弹劾总督韦尔斯利的活动中出一臂之力。他被福克斯的圈子搜罗去，当时，这个圈子有威尔士亲王的支持。他作为一个可能给皮特当局制造些麻烦的人，被指定到怀特岛的衰败选邑纽汤镇的席位上(1805)。反对韦尔斯利的行动按时发难。但当福克斯派参加了联合政府，波尔就被私下告知，把这件事放下，或至少要“偃旗息鼓”，波尔愤怒地拒绝了。但议会解散时他发现自己被排挤出纽汤镇的席位，而且他本来天真地以为把他的事业记在心中的那些人却也和他断绝了往来。他的回答就是在威斯敏斯特的竞选坛上去猛烈地攻击那些人。

在激进运动史上，波尔是过眼云烟，没有人再费事地去找有关他的什么材料。人们照例只把他看成是一个满肚子个人恩怨而好争论的小个子而忘掉。然而，他的恩怨却不仅是个人的。韦尔斯利在处理奥德问题时之傲慢、蛮不讲理和背信弃义，本是无可置辩的事实。不应该设想波尔对在印度的“放肆侵略和残暴”并不痛恨，他把这些和“我们每日指责”法国的那些所作所为做比较。假如这一类争端对威斯敏斯特的选民是遥远的，那么波尔作为辉格党和托利党都想让他沉默的一个人，就不得不令人尊敬了。科贝特后来写道：“一个人应有的才干与知识”

---

[17] 《政治纪事报》，1806年8月9日、9月20、27日。

被波尔的勤奋和勇气来弥补了。他身材矮小，但他这个人是好的。他是好斗的鸡，浑身每一寸都是：真正的斗鸡。

他对英国的政治几乎无知，作为演说家，缺乏雄辩；作为作家，没有说服力；但他也没有政治上的禁忌与野心。三星期吵闹的竞选，一个新的改革派联盟成立了，其中包括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一位贵族激进派，他在竞选讲坛上提名波尔作候选人；科贝特，一位经验主义改革家，他指导了波尔的竞选运动；卡特莱特少校，老资格的男子选举权的提倡者，他得到波尔诺言，说他自己是一个议会的改革家。

科贝特回忆："我们必须对选邑集团的全部力量进行斗争，462 他们公开地、积极地团结在一起拼命同我们作对。"头四天波尔得票数领先，于是，曾经嘲笑过波尔并说他不可能取胜的胡德和谢里登就联手共同对付波尔。一时间，伦敦城到处是大纸的宣传品、小纸的讽刺文章和歌谣：

瞧！腐败在自由的掩饰下昂首阔步，
自由人！集合你们的队伍，保护你们的收获，
高高挥舞你们的旗帜，为了自由的号召——
高喊你们的口号——**独立和波尔！**

让那些官迷心窍的家伙狂喊反对我们的政治主张
说着我们是雅各宾、叛徒和如此之类的无用黑话，
我们坚决支持国王宁肯死去——
我们的事业必胜——**独立和波尔！**

他是穷人的朋友，人类的自由，
愿意尽其所能，减轻我们的赋税……

波尔的对手则取笑他的卑微出身和外表：

……那边的古怪的小家伙是谁，

谁会像一个被拖到池塘去的扒手？

科贝特宣称：争斗的双方中，一方面"是地方官和领年薪者、收税人、治安官、警察和护从人员"，还有谢里登的私人班底"演戏的、换布景的、剪蜡烛芯的和听从……不道德的召唤而来的人们"；另一方面是工匠和帮工们中间第一次严肃地试图成立民主竞选组织的证据；是教区助选委员会以及在鞋匠、帮工、漆匠和成衣业之中的有组织的声援活动。群众一晚接一晚地把波尔拉着在街上到处张扬声势。

詹姆斯·波尔未能获得席位，但他只比谢里登少 300 票；[18] 这次竞选打破了两派对威斯敏斯特的控制。科贝特说："这是真正的斗争，是自由在威斯敏斯特的真正胜利。"但当第二年胜利真的到来时，波尔却与此无缘。伯德特未能赢得 1806 年米德尔塞克斯的大选，一些自由持有农对他的极端立场大为吃惊，尽管他仍旧博得了竞选讲坛前的欢呼声；在失败时"肯辛顿和奈茨布里奇两地多数的房屋都灯火辉煌，似乎完全是一种胜利的景象……"。但是他的失败又另有原因，一个典型的唐·吉诃德式的原因。在以前竞争时，他使用传统的拉票方法，以其财富慷慨地大批款待选民，赠酒送钱普遍地讨好，其程度也许不亚于他的那些对手。但现在，他因被指控行贿而恼怒；而作为其盟友的科贝特，在整个 1806 年都滔滔不绝地重申着廉洁选举的要求。1806 年在霍尼顿闻名的补缺选举时科贝特要求绝对禁止行贿和请客，要求候选人庄严保证，一旦当选则既不接受公职，也不领取公款。伯德特于是采取廉洁的风度，但他对此不满，他除了每天 463

[18] 胡德 5478 票，谢里登 4758 票，波尔 4481 票。

到竞选场所露面,除要求"独立的选民"自动自愿地挺身而出之外就不肯做别的事了。他不去奔走游说,不搞请客吃饭,不为年老选民提供车马,无论什么组织行动都没有。支持他的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他反而在竞选演说中驳回了它并敦促他们信赖"无需协助的公众原则"。如此一来,便减少了他的得票数。

1807 年大选给改革派带来了机会。科贝特每个星期都在《政治纪事报》上给威斯敏斯特的选民写信,向他们发出警报。支持波尔的人做了准备并成立一个委员会,指名伯德特去争夺另一席。但伯德特已经泄气了:

> 我们的掠夺者手中有万能的舞弊手段,同他们进行一切斗争都是徒劳的。我们只有一直等到腐败把舞弊的手段耗尽,愈合我们的创伤和新生。……但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我请求让我隐退,不为议会工作效劳……。

有一个代表团去拜访他并问他,如果不需他本人同意或介入而把他选出来,他是否愿意接受席位?对此,伯德特无精打采地加以承认:"如果我在威斯敏斯特当选,……我就必须服从召唤,……但我不会为这次选举花一个几尼、出一份力。"事情甚至更糟,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在得到这个消极的允诺后,就打算推举伯德特和波尔作为争夺两个席位的竞选伙伴。但伯德特似乎希望摆脱他的平民竞选伙伴,于是那只"斗鸡"就勃然大怒,向伯德特提出决斗要求,而在决斗中双方都受了伤——波尔伤势严重,支持他的人只好放弃他的候选人资格。在 15 天的投票开始之前,改革的事业似乎就要在内讧中以闹剧收场了,[19] 但在最后

[19] 这次事件见《年度纪事》,1807 年,第 425—428、632—639 页;M. D. 乔治:《政治讽刺和个人讽刺编目》(1947),第 8 卷,第 528—529 页。

一分钟，一个名气不大的候选人，激进航海家科克伦勋爵带来了一点复兴的希望。不过，在投票开始那天早晨，伯德特委员会中的人却“非常消沉”：

> 我们没有钱，没有夸耀的手段，没有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托利党看不起我们，辉格党愚弄我们。为了这些而被嘲笑，发生了最最糟糕的影响，……经得住谩骂的人却难以忍受嘲笑。

但就在两个星期后，威斯敏斯特的工匠和小店主们已经把伯德特和科克伦抬到街上去闹哄哄地游行庆祝胜利了。伯德特得票大大领先于其他人，科克伦则赢得另一个席位，票数比谢里登多1000张。（在投票的最后一天，科克伦为谢里登感到难过，他把他的监票员打发开，让他把投他票的选民人数重数几遍，好让他成为更体面的失败者。）从此以后，威斯敏斯特就一直掌握在激进派手里（除1819年一段奇怪的情节之外）。这是惟一的大众选区，议会就设在这里，但它被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异口同声地称作是“雅各宾派”的人夺去了。[20]

1806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听起来并非是信口胡言。有人告诉波尔，他的竞选委员会里有一个主要人物，是众所周知的雅各宾派，名叫勒梅特，是法国人。这使波尔害怕，他要勒梅特离开委员会并请科贝特去传递口信。科贝特尽可能温和地去传达这个解职意见，但不料他碰到的是个出乎他意外的意志坚强的人。勒梅特以前确是个雅各宾派，一个伦敦通讯会的积极成

---

[20] 科克伦把他的席位保持到1818年，然后辞退以便去援助南美国家。伯德特作为威斯敏斯特的议员一直延续到1837年，然后，他作最后一次唐·吉诃德式戏剧化表演，辞掉了席位并从这一党派的议员转到另一派的议员以保守党的身份竞选，勉强取得了胜利。波尔并不幸运，他在决斗后只活了一年多一点时间，1808年自杀。

员，是表壳匠；1794 至 1795 年在“汽枪阴谋”大恐慌中他曾被捕，1796 年未经审讯再度入狱，1798 至 1801 年他第三次被收465 监，“在 18 到 25 岁之间大部分时间里，都关在监牢里。”获释后，他曾经帮伯德特在米德尔塞克斯竞选，从中得到了相当的经验。在投票到第三天时他进波尔委员会办公室，发现该委员会“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协调竞选活动事务的制度”。在好几天内，他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竞选计划。现在，他把这项计划拿给科贝特去看。科贝特看后不禁大叫：“勒梅特先生，我以名誉担保，这是我在本委员会里看到的惟一有用的东西！”于是向他道歉，而勒梅特就留了下来。

1807 年的胜利，完全是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工作的结果。委员会中，有些主要人物曾是伦敦通讯会的前委员。勒梅特事先就准备好了对每一条街每一个里弄都做竞选游说工作的计划。普雷斯在“一家名叫不列颠尼亚咖啡馆的酒馆”四楼上，从天亮到夜深，整整工作了三个星期而分文不取，细心地管理帐目，核查收回的选票数，为总委员会准备报告。另外一位以前曾坐过牢的人里克特是他的副手，普雷斯写道：

> “我们这些人都是无名之辈”，没有一个有名气，没有一个普遍为选民们所认识。这么一堆无名之辈竟聚在一起，反对财富、地位、名望和权势的操纵；承担了威斯敏斯特的选举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对手嘲讽他们，说他们是“无名之辈、普通的裁缝、理发师。……笑我们愚笨，骂我们鲁莽”。原则和基金短缺都决定这是一次廉洁的选举：

> ……不能有领取报酬的顾问、领取报酬的律师、领取报酬的监票员或领取报酬的竞选宣传员，不搞贿赂，不能代付地方税，不请客，不佩戴帽徽，除了两名把守

竞选委员会办公室大门的警卫以外，没有花钱雇用的警察。

花钱都要由委员会投票决定，最大宗的花费（直至胜利游行需要的旗帜、乐队和彩带之前）是印传单和海报。普雷斯是委员会天才的组织者，他只有一次离开办公室去竞选场所。[20]

466

现在，我们必须探究一下1807年时英国激进主义的状况。首先，"激进主义"这个词意味着一种豪放磊落而又目标不确定的运动。18世纪90年代的雅各宾派都忠于《人权宣言》，忠于某些公开的组织。随着19世纪的进展，"激进主义"内部存在许多不同的倾向。在1807年，激进主义意味着运动的勇气和论调，同激进主义致力的任何原则相一致。它意味着不妥协地反对政府；蔑视软弱的辉格党，反对限制政治自由，公开揭露腐败和"皮特体制"，以及一般地支持议会改革。但在社会、经济问题上却又并不一致，而最坚持不懈的是伦敦民众的激进主义，它广泛得足以时时把处境不稳的厂商或小乡绅接纳进来。

1806和1807年的较量是实在重要的，虽然是混乱的。改革事业再次变得清晰可见了。有两位极端激进派，他们是由一个平民选区选举到下议院的。有一个周刊，编写得颇具天才，政

---

[20] 关于1806和1807年的选举，主要据科贝特《政治纪事报》的记叙，见1806和1807年各期；同上，1818年1月17日；弗劳尔：《政治评论》，1807年5月；《普雷斯回忆录》，见沃拉斯，前引书，第41—47页；及科尔和菲尔森：《英国工人运动》，第79—81页；无名氏：《威斯敏斯特和米德尔塞克斯大选史》（1807），第15、36—37、145、157、345、379、437页；威斯敏斯特委员会散发的《导致F.伯德特准男爵竞选发迹的一些情况介绍……》（1807）。亦见M.W.帕特森：《F.伯德特爵士》（1931），第1卷，第10章；G.D.H.科尔：《科贝特生平》，第9、10章；C.劳埃德：《科克伦勋爵》（1947），第2部分，第1章；S.麦科比：《英国激进主义，1786—1832》，第207—208页。科贝特的记叙虽不完全可信，却纠正了普雷斯的一些说法，这些说法不加批评地被人接受，但忽视了1802和1804年米德尔塞克斯大选的重要性，嘲笑波尔且把1807年成功的原因完全归结于普雷斯自己的组织天才。

府很难禁止而该周刊又宣称是远离托利党或辉格党的权势的。就连“改革之父”卡特莱特少校也重新受到公众的注目与好感，[22] 人们第一次听到了一个新人即一个经营农场的绅士亨利·亨特的名字，他按照威斯敏斯特的榜样，发表了一篇致威尔特郡自由持有农的呼吁书。在伦敦，有一种新型的竞选组织建立起来了，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并不曾自行解散，而是保留了许多年，成为战后改革组织的样板。伯德特、卡特莱特、科贝特、亨特、普雷斯这些人成了后来15年中激进主义信史上有名有姓的杰出人物。伯德特许多年一直是伦敦民众心爱的人物。卡特莱特则长期矢志不移地经历过各种磨难，促成了第一批汉普登俱乐部的成立。科贝特一步一步从维护“独立”发展到完全彻底地指责“腐败的旧制度”，还确实指责了萎靡不振的激进派人士，如伯德特和普雷斯。亨特一时期作为科贝特的盟友，一时期作为他的对手，用他高超的群众演说技巧与科贝特高超的论战技巧相抗衡。普雷斯推广改革派的渗透政策和工匠与中等阶级联盟的政策，并成为边沁改革派与工会、与民众辩论团体之间的联络人。

1807年的胜利是威尔克斯的贵族的高超策略和较为进步的民主组织形式之间的一种妥协，收获是重要的，“独立”获得了新的含义。迄今为止“独立”一词成了富裕和地产利益的同义语：辉格党和托利党候选人之所以被推举到竞选坛上是因为他们富有，应该说，这就能使他们保持“独立”，而不必巴结大臣或国王以得到恩宠与官职。科贝特的“独立”则力主选民的义务，不管这些选民是自由持有农、是商人、还是工匠，都运用自己的

---

[22] 卡特莱特除支持波尔和伯德特以外，在1806年还在自己的波士顿竞选，得59票，获胜的候选人得了237票。

权力摆脱庇护人、贿赂与依附。威斯敏斯特委员会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即他们的胜利是独立于他们自己的候选人之外的,威斯敏斯特的"小老百姓"是用他们自己的权力作为一股力量而崛起的;此外,他们做出了一种效率高的新的竞选组织的鲜明的榜样,不靠候选人的财富或权势,而靠选民自愿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正因如此,威斯敏斯特人觉得这次胜利是他们自己的。

然而,若说威斯敏斯特委员会领导了一个独立的"民众"运动,那就错了,当然更谈不上领导一个工人阶级运动。选民(1818年大约有18000名房产持有人)[23] 中包括许多独立的手艺人和一些工匠。但其基调则越来越多地由小业主和小商人决定。这些集团的激进程度是战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曾影响到英国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证明这个部分始终使政府当局难堪。最重要的政治和报刊审判都在伦敦举行,而陪审团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被挑选出来的。小店主和小商人 468 在18世纪90年代曾组成难以对付的陪审团,财政部法务官的记录中保留着能胜任的陪审团成员的名单,在德斯帕德案子和奥科伊格里案子上可以看得出,王国的司法官们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把同情雅各宾的人清除出陪审团。[24] 尽管他们如此防范,当局仍在1817至1819年间在伦敦那些陪审团手中丢了丑。[25]

---

[23] 《女怪》,1818年7月4日。

[24] 其中一份名单在有可能参加陪审团的人的名字上打了记号:G表示"好"(good),B表示"坏"(bad),D表示"靠不住"(doubtful)。打"B"的人中有许多是小生意人,如其中有一个制秤的,一个卖玻璃的,几个卖杂货的,一个造帆的,一些酿酒商(索思沃克一个酿酒商的名字上标着"极坏"字样)。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33号。

[25] 把参加矿泉地暴乱(1817)的沃森医生无罪开释的那个陪审团,团长是卖彩票的,成员中有制扣工、打锚铁匠、毛料商、剩果制造工、铁器商、银匠、布商、鞋匠、搬运业者和药剂师。《人民报》,1817年6月21日。

嗣后，陪审团变得比较听话了，一方面是因为当局精心策划了新的特别陪审团制度和其他“辞退”的手段，一方面是因为伦敦老城的激进主义（及其代表人物如韦特曼参事和伍德参事）变得越来越脱离平民运动。

所以，威斯敏斯特的胜利很难说是工匠的胜利，而不管他们为这个胜利尽了多少力。而且，这个胜利也有一部分是虚幻的。除了所需的资格限制把挑选候选人的范围局限在有产者之外，即便不谈这个事实，普雷斯的总委员会中也居然没有一个人（至少是普雷斯）想到要把本委员会中的某个人推荐为候选人。这席位是伯德特的，委员会的职能是争取支持他。在以后的岁月里，委员会表明它自己作为一个民主组织具有重大的局限性。1807年，它是在一次新的民主精神的冲动中成立的，随后几年中，它却本质上成了一个自封的团体——或者，如科贝特抱怨的，一个“秘密会议”——一部分在伯德特的控制下，一部分则是小生意人工匠师傅的代表，如普雷斯。战争结束时，普雷斯成了边沁和詹姆士·穆勒的信徒，他对亨特和科贝特变得越来越有敌意，也越来越讨厌对“成员无数”的宣传方法。威斯敏斯特委员会是个有用的地方，可以借此运用谨慎的幕后操纵来维护稳重469 勤勉的工匠的利益。1818年，科克伦的席位空出来了，科贝特提名的卡特莱特少校却被边沁激进派霍布豪斯的票数超过而没有获胜。当普雷斯变得越来越“自鸣得意”和越来越讨厌游行和竞选活动时，委员会也相应地越来越脱离伦敦的劳动人民了。[59]

这多多少少是1807年激进派所处地位的必然结果。反雅各宾主义根本没有消失。科贝特冲破报刊检查几乎是偶然的，

---

[59] 要了解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见A.阿斯皮诺尔：《1814年的威斯敏斯特选举》，载于《英国历史评论》，第40卷(1925)。

此外就很少有定期的激进报纸了。(1810年,科贝特本人被监禁两年,因为他攻击军中滥用鞭刑。)威斯敏斯特委员会作为一个竞选组织而保留了下来,但政府当局并无意准许民众俱乐部有新的发展。曾经是伦敦通讯会领导人的约翰·盖尔·琼斯在伦敦大莱市附近组织过一次"英国论坛"的辩论跨过了谨慎的界线,下院就判处他进新门监狱(1810年)。而当伯德特谴责下院的这一行动是非法时,下院就判处他监禁于伦敦塔。确实,这几乎使所有的伦敦人都站到了伯德特一边。而伯德特最初采取威尔克斯的对抗策略,据守在皮卡迪利自己的家中,不向下院屈服。科克伦勋爵乘坐出租马车赶到伯德特家门口,向门厅里滚进一桶火药,准备炸掉所有的入口处而用武力保卫伯德特。人民成群在几条街上兜来转去,一场1780年规模的暴乱似乎在所难免。普雷斯自己则认为,军队中存在不满情绪,因此有一些阵发性的暴动可能发生。但这次事件的性质及其对威尔克斯的戏剧性的模仿,加上激进领袖中间的混乱,突出了改革派的弱点,即若由他们来驾驭一场造反潮流,他们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团结一致的政策。法律取缔通讯会社及公开的政治集会已经分散了运动的力量,所以,运动领导人的个人主义的和争执不休的行为,不过起着一种"喉舌"作用而不是站在运动组织者的地位上。

激进主义仍旧是一个由对当局不满的广泛的群众支持的防御性的抗议运动,却不是一个进攻性力量。如果要理解伯德特和科克伦在1810年的极端观点,只要读读拜伦的作品就知道了。那些人不屑于争权夺利,鄙视他们自己阶级的伪善和新富们的摆阔炫耀。在失望之中,他们也许会时时梦想来一阵子革命以推翻"旧腐败制度"的全部结构。如要理解科贝特的愤怒,只要想想那些引起他愤怒的事情,那就是油水大的承包合同、王室公爵的肮脏丑事、猛涨的租金和税款、农业工人的贫困和枯 470

竭、政府给报纸的津贴以及道德监督会的告密者们对大众娱乐的摧残破坏。有一百个理由在助长不满的情绪。反抗强征人伍、伤残士兵的痛苦、工匠们被那些靠军火合同迅速发展的公司企业排挤而纷纷抱怨，以及在特拉法加战役后，反对那看似无休止又无目的战争的一股地下逆流正在不断地壮大。

1808年，设菲尔德一个非国教牧师这样写道："情况很可能是"

> 每当人类想组织成社会，建立化剑为犁的王国时，……大人物将是这荣耀功德的反对者；反对的行为尤其可料定来自那些**将军、海军将领、承包商、代理人**诸如此类；说不定那些倡导"**基督太平盛世**"的人在等待来自他们那邪恶之手的凶猛的虐待。

"基督的王国"只有经过"许多反对和许多流血"后才能降临人间，因为"魔鬼和他的代理人"不会原谅它用任何别的方式到来：

> 我无时不听说穷人的妻子和母亲当押掉仅有的衣服以便从**卑鄙狠心的兵贩子们的手中**赎回丈夫或儿子，啊，苍天！穷人们该受何等苦难……

"悲乎，贫穷！尔乃不赦之罪恶！……尔无权利，尔无特许，尔无豁免，尔无自由！"

> 撒旦**老儿**，老杀人者，尔若来，吾欲待尔如尔之待比我更好之人也。吾将依次携尔登临"无比巍峨高山之巅，示尔以基督世界众王国，及众王国固享之荣耀……撒旦，尔其俯身眺望基督教界，审视红尘滚滚陆离苍生；如许圣经，如许刀剑——教派不少，兵营纷逞——教堂林立，堡垒甚多——衣黑者和平之牧师，衣红与蓝者战争之人——夫沐猴而冠俨然**救世主**者几希，千百万之众独以分门别类毁灭人类为己任……**真正和平之子**横

受轻视，遭埋没，遭怠慢而受侮弄——对**杀人之英雄**及掠夺者，竟可敬之、颂之、誉之、赏之而垂名乎千古……㉗

这呼声发自温斯坦莱和班扬的古英格兰，但这个古英格兰已开始读科贝特的文章了。它提醒我们，在设菲尔德、纽卡斯尔或拉夫巴勒这些地方，威斯敏斯特的选举又何其遥远！在伦敦城，激进派可以在酒店咖啡馆里聚会讨论，也可以感觉到自己在数量上的优势。在那些雅各宾的宣传曾深入人心的外省中心区，只有诺里季和诺丁汉具有广泛的选举权，足以让激进派利用选举的手段。伯明翰、曼彻斯特、利兹和多数正在发展的工业中心，在未经改革的下院里都没有代表。在这些地方，以及在更小的城镇和工业村庄，教会与地方官监视着任何"煽动"的迹象，就连订阅科贝特的《纪事报》的人，都能发现自己已被盯上了。改革派感到孤立无援——"被埋没，怠慢和侮弄"。威斯敏斯特的胜利把外省抛进了遭受更大压制的黑暗之中。

正因为如此，激进运动在中西部地区和北部工业区具有相当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不同将在半个世纪中影响事态的发展。在伦敦，中等阶级改革派和工人阶级改革派保持着沟通渠道，典型的组织形式是委员会。在委员会中，少数几个自由职业者和自学有成的工匠们并肩工作，而这些工匠总有些看不起政治落后的工人和伤风败俗及犯罪的穷人。当压制放松时，论坛、辩论会和讨论小组也就恢复起来了。威斯敏斯特定期的选举至少提供了一个安全阀，对喧闹骚乱起到了关阀作用。但在中西

㉗ 和平福音长老 G. 博蒙特：《武人镜》(设菲尔德，1808)，作者可能是洗礼派教士。用类似口气表达激进的基督教反战立场的，还可见《剑桥通信》，及《太田河信使报》上刊载的信件，如 1808 年 1 月 5 日的那封信。

部和北部地区，激进主义被打入地下，进入了非法工会的世界而和工业中的疾苦、秘密集会和誓约等等交结在一起。所以，直到1815年，伯德特和科贝特在工业革命的心脏地区仍旧无关紧要。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对卢德活动没有什么启示作用，而在特伦特河以北我们找到了非法活动的传统。

第十四章　替天行道

472

1.黑灯照

"来看这逆贼的头啊!"1803 年 2 月,刽子手在伦敦围观者面前高举起爱德华·马库斯·德斯帕德的头。他和他的六个难友被判犯了叛国罪(图谋杀害国王),七个人全都英勇就义。德斯帕德坚称他无罪,他的死是因为他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朋友"。围观者既愤怒又同情。伦敦报纸担心,若殉难者是沿着大街拉向刑场,而且是在泰伯恩刑场[1]或肯宁顿公地而不是在索思沃克处决的,就有可能发生暴乱和劫法场的事。在那些目睹行刑的人中,有个叫杰里迈亚·布兰德雷思的青年工匠。14 年后,他自己的头也要在德比城堡前的一群人面前高高举起:"来看这逆贼的头!"

从德斯帕德到布兰德雷思,非法活动的传统延绵不断。这个传统将永远不能从朦胧不明中澄清出来,但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接近它:其一,可以通过对 1800 至 1802 年间"地下活动"所留传下来的证据进行考察。其二,通过对史料作出的批评性意见。其三,通过对半合法的工会传统进行考察。我们若不预先做好这些准备工作,我们就不能理解卢德运动,也不能理解战后年代的彭特里奇起义、奸细纳奥利弗和卡图街密谋等等。

---

① 泰伯恩刑场,在伦敦泰晤士及左岸的小支流名曰泰伯恩河,是伦敦的水源之一,河西岸有塞克斯绞架。1300 至 1783 年绞架所在地一直是刑场。——译注

在18世纪90年代末“联合英格兰人”若明若暗的社会活动中，我们看到非法活动的传统在萌生。[②] 1800年到1801年，整个英格兰又突然发生许多骚乱，其中多数是抢粮风潮，由拿破仑大陆封锁时期的粮食匮乏和物价腾贵所引起。但这里也有某种初步组织的迹象。有些骚乱和买者“罢买”是由传单事先通报的，其规模表明有委员会在做组织工作，他们可以接触印刷机。1800年9月伦敦出现这样一份传单：

473

> 同胞们！
>
> 对被收买后的奴才和政府的佣工强加给你们的半饥饿状态，你们还将默默地怯懦地忍受多久？你们还能容忍他们继续进行扩大他们的垄断范围而你们的孩子却正在哭着要面包吗？不，不能让他们再存在一天了！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从沉睡中醒来吧。星期一在谷物市场上见！

六天中谷物市场上骚乱不已。11月有传单号召“商贩、工匠、帮工、零工等等去肯宁顿公地集合”——这次会议只是由于军队到场才没有开成。在朴茨茅斯，造船厂“机工”决议在价格下跌之前，“不再食用黄油、奶油、牛奶和土豆”。在诺丁汉，军官们试图叫观众高唱“上帝保佑吾主”，却被观众扔石子赶出了剧院。也是在诺丁汉，在18与19世纪之交的时候，人们还是每年举行庆祝活动栽种自由之树。有一次，当局曾截获一封信，内容描述一次成功的抢粮风潮，信中热情称颂“人民在星期二的行动，他们以无所畏惧的勇气顶住了义勇骑兵队的火力，以致使绅士们吃惊……”。写信人还加上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群众不再有“雅各宾”和“教会与国王”派之分了，“最叫绅士害怕的是看到各

② 见前文，第167—172页。

派联合,现在没有……潘恩派,也听不到像'上帝保佑吾主'这样的歌了。"可见在"暴民"的半政治性行动中,群众的态度有了重要转变。[3]

与此同时,警报不断涌向内政部。闹事最严重的地区看来在诺丁汉、兰开郡工业区(据说联合爱尔兰人和联合英格兰人仍在该地十分活跃)和约克郡西区。我们可以把约克郡西区的有关材料拼凑在一起:地下组织从雅各宾的据点设菲尔德向外扩散,1800年9月,在一个作坊里发现公然贴着一份煽动性传单, 474 其中说:"农夫K-G-正忙着往穷人的空肚子里赛(塞)刺刀"。[4] 12月,设菲尔德的地方官发觉有必要颁布一份文告,禁止夜晚在田野里召开"有很多人参加的"会议。各种报告送到郡守菲茨威廉伯爵手里。在一次讨论怎样才能最有效地降低食品价格的会议上,一个奸细听到有人谈论长矛和武器,当这个奸细暴露身份时,他就被赶了出去。人们加入各种秘密社团,还庄严地进行结盟宣誓:"有一个组织系统正在发展——秘密委员会——正在准备敌视政府的武器"。设菲尔德附近经常召开会议——

> 晚上十点——一个演说家戴着面具向群众高谈阔论——他借着烛光宣读外社团的来信,读完就立刻把它们烧了。

任何人若不向外圈的哨卡通报口令,就不得进入会场。[5]

---

③ 内政部档案,第65.1号;J.阿什顿:《19世纪在英国的开端》(1906),第19页;D.V.厄尔德曼:《反帝国的预言寄托布莱克》,第317—319页;哈孟德夫妇:《城市工人》,第291页。

④ "K-G-",即KING GEORGE,指乔治三世。乔治三世曾以"农人乔治"的笔名写文章,故有此挖苦之言。——译注

⑤ 菲茨威廉文件,F.44(d)和(e)。

1801 年 3 月,恐慌已扩散到利兹和哈德斯莫尔德;地方官担心"下层等级正在图谋反叛",有"一些人走门串户,拼命想拉老百姓起誓,叫他们此呼彼应地调整和压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兰开郡两个地方官在一封信中断言:一月份在莱恩河畔的阿什顿附近召开过某种形式的代表会,与会的"代理人"来自约克郡、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和伦敦。就在这个时候,皮特用来禁止煽动性集会和中止人身保护法的两项法令(1795 年底获通过)到期了。尽管各个团体间有组织的通信仍属非法,但从技术上说召开群众大会又算合法了。几星期内,在几十个广泛散布的地区召开了抗议大会,这些会议往往靠手写传单召集。约克郡在设菲尔德、威克菲尔德、杜斯伯里、宾利等地开了会。在宾利,4 月初有人把传单偷偷塞进门缝和市场摊铺,号召人民参加475 一次"自由之友联合"的示威集会。会议的目的是抗议食品价格过高,"揭露欺诈舞弊和形形色色的世袭制政府,减轻税务压榨,提出方案使无依无靠的儿童能够上学,使老人和穷人有舒服的生活……灭绝可怕的战争行为"。

> 你们是否愿忍受那一大帮贪心的帮凶政府坏蛋——谷物贩子——当官的——领年金的——寄生虫等等欺诈你们,而你们自己却饿得没有面包吃?不,不能让他们再有一日稍存,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把宪法从密室里拉出来——把它公之于众,让大家监督——撼树要撼根……⑥

下院一个秘密委员会报告说:"时局似乎在动荡,国家的不同部分在同日同时突然召开无数集会,其势头之大,若不加阻止,必大大危及公众的安宁。"4 月底煽动性集会法再度生效,人身保

⑥ 同上,F. 45(a)。

护法继续中止一年。

宣传活动又立刻转入地下。我们可以再次到约克郡西区去追踪它的历史。集会在1801年夏季持续不断，主要是在晚上开，巴特利、奥塞特和萨德尔沃思也成了集会的中心。1801年7月，在哈利法克斯似乎召开过某种形式的代表委员会，到会的有来自各纺织城镇的代表，有一个设菲尔德人曾发言。会上谈到宣誓问题，也就是与联合不列颠人即联合英格兰"合作"的问题，该组织主要活动中心大概是彭奈恩山脉那边的博尔顿。所有参加者都要正面回答三个问题：(1)是否要求全面改变制度？(2)是否准备在使子孙后代获得自由的斗争中承担风险？(3)是否愿意尽你所能地去缔造自由之友们的友爱和亲善精神，不遗余力地摄取可以得到的一切政治信息……"八月份利兹也有报告说那里召开过一次代表会议；据一个地方官说，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在法军登陆之前不可能再召开任何会议"，随后就休会了。威克菲尔德一个地方官也附和说："……他们的目标是发动革命，而不满分子的叛变完全有赖于敌军对我国的入侵。"[7]

集会现在变得相当普遍，以致《利兹信使报》也注意到了。476 这家报纸的编辑爱德华·贝恩斯曾经是普雷斯顿一个"雅各宾"俱乐部的书记，但现在却急于要和"一切有政治目的的秘密团体决裂"。该报在社论中评论说：半夜三更召开政治性集会已变得"极为常见"。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们是出于"不好的动机"，也可怀疑与法国有秘密通信。他还指责改革派"像无法无天的匪徒"一样缩进"深洞里"。贝恩斯的评论促使本杰明·弗劳尔毫不妥协地作答，他的《剑桥消息报》(还有蒙哥马利的《设菲尔德彩虹报》)是坚持到19世纪的最后几张改革派地方报纸。1800

⑦ 菲茨威廉文件，F. 45(a)和(d)。

年11月弗劳尔发文号召举行群众示威要求和平，人民（他说）“看出并且感觉到战争和捐税的后果是抬高一切消费品的价格”。他指责贝恩斯“见风使舵”，为“教会与国王派”的宣传助威，蓄意诽谤改革派“与法国通信”，往他们脸上抹黑（而他们，除秘密集会外别无他法）还安慰：

> 那腐败放荡的制度，这个制度使欧洲大片地区荒无人烟，杀害数百万人类同胞，剥夺我国人民最宝贵的权利，把国家引向崩溃的边缘。

弗劳尔这种人的旧潘恩式激进主义（这种人不怕起诉，也不怕冒险在不满群众中进行鼓动）与贝恩斯谨慎的“立宪”辉格激进主义的分道扬镳，在19世纪的进程中将变得日益重要。[8]

10月，当和平预备条约获准通过时，群众欢欣鼓舞，似乎出现了一个间歇期。但在1801至1802年的冬天，约克郡西区又开始报道“夜半”会议，还报道反麦芽税、窗户税和限制自由的抗议活动。和平在1802年3月到来，但晚间集会仍在继续，尽管地方官多方努力，却找不出谁是会议的领袖。1802年8月利兹市长给菲茨威廉伯爵的一封信最详细地记载了其中一次集会：

477

> 关于夜间集会，他们继续举行，虽然不到开会时别人根本不知道集会地点。星期五晚上约在午夜时分，在离利兹六英里、伯斯托尔二英里、远离一切交通要道的一段荒路或峡谷中开了一次会。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告诉我，说他企图参加会议，但发现老远就有人在各个方向上把守，最外一层警戒的人走过来搭讪，想把他引到相反方向上去。他吵着要过去，这时，他发现还有一道不

---

⑧ 《利兹信使报》，1801年8月1日，E. 贝恩斯：《爱德华·贝恩斯生平》（1851），第51页；《剑桥消息报》，1800年11月15日，1801年8月8日。

固定的流动警戒，他们询问他是干什么的，当他继续向“黑灯照”挤过去时一声口哨响了，随即他听到人的说话声，其言词和声调使他决不敢再向前走出一步。他们在等一些他们称之为绅士的特殊人物，但这些人还没有来，他能够轻而易举地记起在路上无意中听到的话……

从其他可靠方面我得知，组成“黑灯照”的总委员会在星期五晚上大概由200人（由那些和其他九个人谈过这问题，并让他们宣誓入会的人）组成，这些人按同样的原则成为委员会成员，循环无限。“取消一切赋税，享受全部权利”，这就是头领们提出的话题，也是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纽带。“到圣诞节时他们就能功成名就，某一天晚上他们会在各个地方同时举事。”[9]

只要有组织，它就有可能使用印刷机。1802年6月，一个约克郡西区地方官交给内政部一份小小八页纸的“致联合不列颠人”，声称要把所有想推翻民族之压迫者的人联合到“感情的链条上来”：

他们把一个有见地的民族的独立自由看做是叛逆，因为他们害怕正义会落在他们罪恶的头上……。[10]

秋天，有两个设菲尔德人威廉·李和威廉·隆克斯利因主持秘密宣誓而受审。据供述，他们在1801年10月至1802年8月间是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在设菲尔德有1000人，他们打造 478

⑨ 内政部档案，第42.66号，全文刊于阿斯皮诺尔编：《英国早期工会》，第52—53页，原文见菲茨威廉文件，F.45(d)。

⑩ R.沃克1802年6月28日致内政部（附件），内政部档案，第42.64号。

矛头，拥有埋藏武器的秘密仓库。组织由“长官及指导”率领，这些人在夜间对会员操练。组织上的目标不清楚，但（利兹市长致信菲茨威廉说）“穷人中有一种想法——认为他们不应该纳税……成千上万的人怀有秘密的信念，并纵容着一种希望：时机已经成熟了”。[11] 李和隆克斯利被判七年流放。[12]

11月，德斯帕德及其伙伴在伦敦被捕。12月，有更多的消息说设菲尔德在准备武器。迟至1803年8月，还有人向菲茨威廉告密说，起誓及制造矛头的活动仍在继续。尽管菲茨威廉一向怀疑，他还是写信给国务大臣说：秘密组织“渗透到本国制造业区的一大批人中，军队和民兵也有大批人起誓”，誓词如德斯帕德事件中所用的一样。地区间有特使来往，“很少有什么东西写下来，而一旦有，就一定在传递后立即销毁”。“领导人从不在自己的镇上开会，当他们需要商量时，他们就离开家走得远远的。”[13] 这以后，“黑灯照”仿佛就消失了。

在同一时期，南兰开郡和中部部分地区也有类似的报告。显然存在着一些地下组织，它们想把对物价腾飞和食品短缺的不满转到革命的轨道上去。这方面证据之多，又出自许多独立的资料来源，故而完全不可能支持那种广为接受的历史虚构，说什么除了在大臣、地方官和奸细想象之外，根本不存在“骚动”。然而在这一点上资料只能导向模糊不清：“联合不列颠人”真在全国存在过吗？德斯帕德中校是否和它有牵连，或和兰开郡、约克郡西区的地下组织有牵连？是否与法国及都柏林的罗伯特·

---

⑪ J.狄克逊1802年7月17日信；W.库克森1802年7月27日信；J.洛1802年12月3日信，以上都载于菲茨威廉文件，F.45(d)。

⑫ L.T.里德：《19世纪的约克堡》，第198—201页。

⑬ 菲茨威廉文件，F.45(e)。菲茨威廉还附言道：告密者是个“稳重、勤劳的人，不年轻，我看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是个饶舌的人在闲着无聊时磨嘴皮”。

埃米特有联系？地下组织在 1802 年之后还存在吗？

德斯帕德审判案几乎没揭露什么。虽说包含着大量的暗示。德斯帕德中校（1751—1803）出身于爱尔兰地主家庭，有过卓越的军功。纳尔逊[14]应召出庭作证时说："我们一块儿去西属美洲海岸，我们一块儿和衣而睡了许多夜晚，我们一块儿测量敌军围墙的高度。在那些日子……谁也比不上德斯帕德中校那样对君主对国家忠心耿耿。"[15] 纳尔逊对他的战友评价极高，曾指望他能升到军中最显著的职位上去。但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1780 年之后他们就没有见过面。从 1772 年起，德斯帕德一直在西印度群岛和英属洪都拉斯服役，直至 1790 年应召回国，领取半薪。看来他一直是当时那一大批军官的典型，他们的钱和势都不足以被人承认，升迁的机会被别人骗了去，斗不过与宫廷有牵连的一些笨伯，被对手指控为行为不佳，在权力的门口长期等待。[16]在德斯帕德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役军官的个人不满混合着对腐败伪善的政治生活的普遍厌倦，而这种同样的混合使科克伦勋爵变成一个激进派。

但德斯帕德又是个爱尔兰人，1796 年或 1797 年他已经全力置身于爱尔兰的独立事业，因而既在伦敦通讯会的总委员会也在联合爱尔兰人和联合英格兰人隐密的伦敦小圈子里工作。奥科伊格里在弗尼瓦尔地下酒店接触的那批人中有一个就是

---

⑭ 霍雷肖·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将领，曾在特拉法加海战中击败法西联合舰队，挫败了拿破仑入侵英国的计划。——译注

⑮ 参见 1780 年 7 月 18 日《伦敦官报》："几乎没有对欣琴布鲁克岛开炮，而只是由纳尔逊上尉或工兵队长德斯帕德中尉加以瞄准……"。

⑯ 德斯帕德的早年生涯见查尔斯·奥曼爵士：《不幸的德斯帕德中校》（1922）；J. 班南廷：《E. M. 德斯帕德回忆录》（1799）

他。[17] 1798年初，枢密院接到许多关于他活动的报告，说他在建立一支地下军事组织，把伊丽莎白时期的职业军队风格和19世纪革命军的特点奇妙地交织在一起。虽然组织的目标是雅各宾式的，但应征为德斯帕德服务的人却被许以成功后的高官厚禄。1798至1800年人身保护法中止期间，德斯帕德锒铛入狱，他的案子在当年弗朗西斯·伯德特和伦敦群众的"不要巴士底狱"的鼓动中曾经是最突出的。1800年他出狱后，大概就立刻又着手组织他的革命军去了。

480 他在1802年11月的最后一周被捕于兰贝思的"奥克利纹章"酒馆，他当时大约和40名工人与士兵在一起。他受审时，有些事实是明确无误的，德斯帕德及某些同伴在前几个月中不停地奔波于工人阶级伦敦酒馆的聚会场所中，比如纽因顿的"飞马"，白教堂的"双铃"和"车马"，干草市的"火腿与风车"，圣贾尔斯的"棕熊"和"黑马"，哈顿菜园的"流血的心"等。所有这些地方的同伴都包括零工和士兵，爱尔兰人的比例很高，肯定讨论过某种密谋。

他受审时，当时的报纸还引用了其他事例，但这些则必须用更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据引述，在查塔姆和伦敦两地兵营中，雅各宾派禁卫兵招募了大批人马，让他们通过秘密起誓后加入密谋。在犯人们身上发现的文件，记录了协会的"章程"，那就是：

> 在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独立——公民、政治及宗教权利平等化——在斗争中牺牲的英雄，其家属将得到充足的生活品。
>
> 有功者重赏——这些就是我们争取的目标，为实

[17] 见前文，第169页。

现这些目标我们宣誓团结在一起。[18]

士兵们受到邀请去参加"宪法协会"，以便"战斗，砸碎这奴役束缚的锁链"。这个组织(据说)在索思沃克一地就至少有七个师和八个旅，在巴勒、玛丽莱本、斯皮特菲尔兹和布莱克沃尔还有更多的师，主要分布在"零工、帮工、普通士兵"、解雇的水手以及爱尔兰码头工人中。这是个仿军事组织，"每 10 人一连，当达到 11 人时，第 11 人领导"一个新连。各连都由一名"上尉"率领，每五连组成一个"旅"，由"上校"指挥，而另一方面，若这就是公认的组织形式，那么看起来并没有广为实行。据一个证人说，德斯帕德曾说过： 481

正规组织在伦敦对我们是有害的，它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但在外地正规组织却是必要的，而且我相信，是相当广泛的……

这种组织在伦敦"确实是不可能的"，但他提到利兹、设菲尔德、伯明翰、曼彻斯特和查塔姆是"外地的"中心，这几个地方都有这种组织，而且他和它们有联系。

审判还提出另外一些说法，指责德斯帕德中校及其革命军在急切准备政变，说他们想袭击伦敦塔和英格兰银行，从内部夺取兵营，打开监狱，杀害或逮捕国王。据称德斯帕德曾说："我已深思熟虑过一切，上帝可以知道，我的心已经变硬"。在密谋者眼中，内阁是"吃人者。"夺取伦敦塔或抓住国王对伦敦群众来说是起义的信号；而邮车(它们都从一个中心驶离伦敦，这个中心在皮卡迪利)"被挡住，这就是对外地人民的信号，说明伦敦城已经暴动了"。

并没有真凭实据说德斯帕德的案子是"编造的"，虽然在当

[18] 1802 年在约克郡也发现同样的文件；菲茨威廉文件，F. 45(d)。

时，人们普遍相信他无罪[19]，而且这种说法在辉格党史学传统中一直传下来。不错，为政府作证的人声名狼藉——特别是过去的雅各宾派钟表匠约翰·恩布林及某个禁卫兵，他们俩都转而为政府作证，后者还把他兄弟的命给卖了；同样不错的是，关于军中密谋的大量证据只是间接地牵连到德斯帕德，而且也许是背着他甚至违背他的劝告而进行的；而那些企图杀害国王和夺取伦敦塔的绘声绘色的描述，也许是作为应景之作捏造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德斯帕德和他的辩护律师都没有对那些频繁在伦敦下等小酒馆召开的会议目标作出过丝毫解释，而在这种酒馆中，像德斯帕德这种身份的绅士是不大可能光顾的。德斯帕德只是在死刑判决通过之后，才打破他在对自己及同伴的审判过程中始终保持的沉默。而即使如此，那也只是一种告诫：

> 大人，你把诱惑这些人的角色归之于我；但从审判中所出示的东西及为反对我而引用的证据中，我看不出任何证据说明是我诱惑了这些人。

在当时的场合下，这话只能被理解为他承认有一个密谋，不过德斯帕德远不是发起者，而只是被别人拉进去了的，至于这些人是谁，他却忠诚地保持着沉默。

弗朗西斯·普雷斯（他曾和德斯帕德同在伦敦通讯会总委会共事）30多年后为一份手稿作注时说："德斯帕德中校……是位少有的心地异常善良的绅士人物——一个少有的好心人。""雄辩者"亨特是在他碰到德斯帕德的时候（在王座法庭吃官司时）最早接触雅客宾思想的，他也以类似的笔触写道："这是个善良

---

[19] 例如，可参看C.F.莫蒂默著：《基督徒在回忆中努力提高爱德华·马库斯·德斯帕德绅士及其他六名公民身上的神威，他们现在无疑是与神光辉地在一起》（1803年），该书引《马太福音》，第28章，第12节："他们拿许多银钱给兵丁……"。

的绅士般的人。"我们是否应接受那通常的说法，即追随他的人"微不足道"，或"若不设想他心智不全，就无法解释他那愚蠢的阴谋"[20]，1798年爱尔兰的形势就足以搅乱每一个爱尔兰爱国者的心。而且若我们设想（我们有理由可以这样设想）德斯帕德这个圈子可以接上伦敦通讯会的老关系，也可以接近在英国的"联合爱尔兰人"[21]，而且他们还和约克郡的"黑灯照"这类组织有松散的联系，[22] 那么密谋之说就相当严肃了。此外，海军兵变提醒我们：军中有革命组织也绝不是不可能。陆军中怨声载道，其程度并不比海军轻——比如对津贴、伙食、居住、家属的赡养、纪律、鞭刑等等。士兵们获许在晚上穿便装去伦敦的酒馆和工匠劳工们坐在一起，安全保卫措施很少，雅各宾派使者可以轻易地走进营房中兵士的宿营地——正像1817年班福德和米奇尔所做的那样。[23] 在今天看来，一个投弹兵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波拿巴"，这似乎不大可能；但德斯帕德的一个同伴却这样做了。政府方面说禁卫军第三营至少有300士兵、第一营有三四十人卷入这项密谋，这个说法恐怕有点牵强附会，但选出来和德斯帕德一起受审处的六个牺牲者，却都是禁卫兵，这个例子说明政府确实对密谋的范围有所不安。

483

---

[20] 见科尔和波斯特盖特：《平民百姓》，第163页；H. W. C. 戴维斯：《格雷和皮尔时代》，第95页。

[21] 密谋者中至少有另一人（查尔斯·彭德里尔）是伦敦通讯会的前领导成员，他是土利街的鞋匠帮工（以前是师傅），1798至1800年和宾斯一块在格洛斯特监狱坐牢。尽管他在审判时被说成是主谋之一，德斯帕德及其同伴被处死后他又由大赦释放了，后来却又在1817年的一次类似密谋中露面。见下文，第652—653页。

[22] 1801年，有一些"联合英格兰人"在博尔顿被捕，其中之一卡伦特后来以吸引兵士叛变罪处死，见W. 布顿姆洛：《博尔顿政治史》，(1882)，第一部，第14页；G. C. 米勒，前引书，第404页。

[23] 见后文、第651页。

全面观察这些论据，就应该把德斯帕德一案看做是英国政治史上真正重要的一件事。它把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德斯帕德与罗伯特·埃米特有一些接触）与伦敦的劳工、北英格兰的剪绒工及手织工的疾苦连接在一起了，它是18世纪90年代老雅各宾主义的最后一颗火星，它和德斯帕德一起受到最惨的失败。这件事好像证明政府的“告急”政策和暂停公众自由的政策是对的，它还在一个极端雅各宾派的小圈子里为政变的策略（或者可以说是政变的幻想）开了头，后来这一直是伦敦一些小组织的目标，直到卡图街密谋（1820年）时为止。而阻挡邮车，用它来传递总起义的信号，这种念头到宪章运动时又萌生。

德斯帕德带走了大多数机密。假如真如他所说，他的图谋杀害国王和内阁罪是无中生有，那么他也没有解释过：他的组织的目标是什么。据有人记载，他在绞刑架上说：

> 我知道，由于敌视政府那些血腥、残酷、强制而又非法的手段，政府已决意拿我开刀，而用他们津津乐道的法律作借口。……公民们，我祝你们健康、幸福、昌盛；虽说我不能活着见到那神圣的变化带来的幸福，但请相信，公民们，那一天终会到来，而且会很快到来，那时，自由的光荣业绩将凯旋而归……

484

如果说德斯帕德并未参与禁卫军中的共谋，那么有可能他是出于道义的原因而不能进行辩白，因为这会牵连其他人。但起诉也是有克制的，它将案子仅局限于某些有真凭实据的公开活动上，同时又宣称它还掌握着从告密者那里得来的更多情报，这些告密的人在审判中没有暴露，因为他们“为国家未来的安全……应不被别人怀疑”。案子审理的时候英国仍与法国保持着和平，有谣传说有关法国牵连在内的证据都抽掉了。《晨报》说：“德斯帕德深受这种观点影响”：

即革命不是由广泛的群众团体完成的……而是由一小批奋不顾身的人来执行，这些人在施展沉重的打击之后，比如暗杀了国王，使伦敦充满恐慌时，就能够找到成千上万的人支持他们。

“穷人……相信他是个殉难者”。“德斯帕德的无头之躯是否会走进每一间酒吧，去找到100倍的新信徒……？”[24]

2. 无形之影

许多年中，《晨报》发出的警告看来是过分了。直到1811年，地下活动才重露端倪，而这时是以暴烈的产业冲突——卢德运动的形式出现的。卢德派以特别的工业目标为攻击对象：摧毁动力织布机（兰开郡）和剪绒机（约克郡），抵制中部地区针织业中违背惯例做法等等。要解释这些行动，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随即的经济和产业方面的灾难情况吗？ 485

但我们要提出另一种解答。要想作出任何解答，历史学家都会在解释史料时遇到困难，而史料却又非解释不可。从18世纪90年代到1820年，这些史料又非同寻常地打着党派的印记。

首先，是当局有意识的派别倾向。从皮特到西德默思，政府

---

[24] 此处关于德斯帕德密谋的记述基于以下资料：J. H. 格尼记录：《爱德华·马库斯·德斯帕德审判案》（1803），尤见第33、36、44—45、72—73、79、115、127、137、174、269页；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32号，第11.333号；“约翰·奥克斯莱德的自述”（普雷斯作注），见附加手稿，第27809号；《利兹信使报》，1802年11月27日；《晨报》，1803年2月22日；国家审判集散见《德斯帕德中校审判案全录》（1803），第78页。15年后奸细奥利弗报告他和主谋之一查尔斯·彭德里尔的谈话时说：“他承认士兵深深卷人在内，而且非常坚定。”有一次约200名士兵携带武器在伦敦塔附近的房屋中集合，准备政变，而且彭德里尔“好像很相信那时伦敦塔可以被士兵轻易拿下，再放弃掉。如果当时他们聚集起意想中的人数；但到场的人太少了。奥利弗的记叙，见内政部档案，第40.9号。

只遵循一种政策。对于不满情绪必须先声夺人压服之孤立之；而为做到这一点，可以把不满说成有亲波拿巴分子的密谋嫌疑，或者（在 1815 年以后）有狂暴造反的图谋。每个下院秘密委员会（1801 年、1812 年、1817 年）都曾呈递断定存在着谋反组织网的危言耸听而缺乏证据的陈述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需要密谋者，这样就可以为继续执行镇压性立法提供合法依据，从而防止出现全国性群众组织。

但如果说所有的改革派都是法国的代理人，这种神话就必然会导致一种古怪的逻辑。它不仅意味着改革派被迫采用了隐蔽的秘密活动方式，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当局也被迫以其他任何时期未曾有过的规模使用奸细和密探，以渗透到这些活动中去。密探和挑唆人之间的界限很模糊。密探计件取酬，因此他的情报越耸人听闻，他的生意就越有利可图。无中生有的情报对传播这种神话的当局来说真是求之不得。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人知道政府本身会被密探所编造的阴谋欺骗到何种地步。为孤立和恐吓潜在的革命者，有可能采取一种故意挑唆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皮特在压制通讯会社时所执行的政策，合乎逻辑地导致了奥利弗事件和 1817 年的彭特里奇起义。这些年来充分暴露了捏造事实、恐吓威胁、双重奸细等种种令人作呕的现象，因此这种逻辑没有导致预定的结果反而是值得遗憾了。假如卡图街的密谋者达到了目的，暗杀了全体阁员，那么内阁就是被那些由其自己的镇压性政策所造就、为其自己的奸细所武装起来的密谋者所杀害。

因此，当局为 1798 至 1820 年间地下密谋活动所提供的证据，是大可怀疑，甚至是一无价值的。而这也确实就是当时改革派据以反驳的主要理由。包括伯德特和塞缪尔什·惠特布雷德等在 1817 年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施鲁斯伯里议员 H.G. 贝内特

486

把秘密委员会的报告掷在下院地板上并说这是“对全体人民的诽谤……是垃圾，我只认为适合把它踩在脚底下”。一代代历史学家也持有大体相同的观点，他们或者是想严格遵守信证法则，或者是同情改革派，或者像最近一段时间那样，冷冷地不加验证就断言任何有意识的革命活动都是非英国式的。他们为对抗关于雅各宾阴谋和斯彭斯派阴谋的神话，便宣扬一种英国“合法主义”的反神话，把信任寄托在另外一种主要的情报来源——弗朗西斯·普雷斯搜集的档案(手稿、回忆录、小册子、剪报等等)上。

这些档案价值连城。但普雷斯却绝不是那子虚乌有的“客观旁观者”，他也有高度的派别色彩，而且深深卷入在使1806至1832年整段时期光彩大减的激进派内部纷争中，他对意见不同的人很不耐烦——在他看来，科贝特只是个“无原则的吃软怕硬的懦夫”，雄辩者亨特“冒失、活跃但庸俗”。他是功利主义有关工人问题的官方资料搜集人，当他着手写回忆录时，他一心想强调温和派的贡献，贬低“民众鼓动家”的作用。此外，资深改革派对他极不信任，1810年他是一桩验尸案陪审团的陪审长，这个陪审团认定不得人心的坎伯兰公爵无罪，为他洗刷颇有证据的谋杀书僮罪嫌疑；人们还知道他和某些改革派所讨厌的人来往；伯德特和亨特都曾在公开场合下指责他是“奸细”。这种指责是荒唐的，因为奸细总的来说是更可鄙的一类人。但从另一方面说，普雷斯——在1810年以后——对必须进行合法主义的改革，深信不疑，因此如果他真的掌握着密谋造反的证据，他完全有可能把它转交给当局。所以我们在谈论普雷斯档案时，必须记住他虽然处在有利的位置上，可以搜集首都改革运动和比较“体面”的工会、行业俱乐部等情况，但在某些范围内，他的情报与政府的一样大而化之。他对中部和北部地区知之甚少，对非 487
法工会组织知之甚少，而且如果真有严肃的地下政治组织存在，

其组织者必不允许普雷斯探见它的机密。[25]

这样，我们就比较接近问题的核心了。还有第三大理由说明史料为何遮掩不清，这就是工人阶级要它们这样，而"要"这个词是十分恰当的，确实，在英国有两种文化。在工业革命的中心，新组织新观念新社会模式不断涌现，它们被有意无意地用来抵御官员、雇主、神父或奸细的侵蚀。新的团结不仅是一种融合的团结，而且是一种排斥的团结。在当局看来，他们的问题有3/2是能不能得到可靠的情报。地方官从他的驻所骑马而行，穿过拥挤的邻街走出数百码，就发现人们把他当做敌对的外国人来看待。他们想找出工会的分支组织，比皮萨罗的海盗似的冒险家在秘鲁的村庄落中寻找金杯更无能为力。[26]

所以，我们在读内政部档案（我们主要的第一手资料）时常常因其荒杂而为难。官员和军官们像不识途的游人，由他们自己的密探任意摆布。互助会对一个从未考虑过穷人安葬费的人来说，有可能像一台煽动机器。而一个在野地里夸夸其谈的传教士，听起来就像是德斯帕德的代理人。雇主有可能希望用雅各宾的故事来把地方官吓得魂不附体，以确保对工会分子严加惩处，治安官从告密者（给钱的、或匿名的）及其他中介人如酒馆老板、行商小贩、士兵等等那里攫取零星的消息。这里人们发现有人把当天早上理发师带来的闲言碎语郑重地报告给约克郡西区的郡守。那里人们又发现另一个人在1802年从巴恩斯利写信说："女人们都在神秘地交谈，期待着某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事"。一个地方人们又发现某个卫斯理牧师写信给波特

㉕ 附加手稿，第27809号，第16、17页。亦见W.E.S托马斯：《弗朗西斯·普雷斯和工人阶级历史》，载于《历史杂志》(1962)，第61页。

㉖ 皮萨罗（1475—1541），西班牙殖民者，曾率众捕捉印加王，灭印加帝国。——译注

兰公爵谈1801年以博尔顿为基地的某个革命者的大联合会——而事情的出处是某个“可靠的朋友”，这个朋友从设菲尔德一个教堂的“卫斯理宗歌手领班”那里听来，而领班又从另外一个什么人那里听说这条消息。[27] 488

这一类闲言碎语自然无聊，但我们应更细致地考察一下密探的作用。英国人天真地相信在内部事务中使用奸细是“非英国式”的，那是“大陆的奸细制度”。事实上这是一种古老的英国治国术，也是一种古老的警察手段。早在克里斯托弗·马洛[28]落人密探的圈套前很久，这种东西就已经存在，反天主教、反共和国和反詹姆士党，斗争中的间谍和反间谍活动，则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刑事犯罪活动中，它出于一种颇为不同的理由持续存在(1780至1830年的50年中尤为盛行)。常备警察力量很不完备，导致“按成果付酬”的制度产生，即按定罪的程度给一定级别的报酬(亦称泰伯恩票证)。这又反过来滋养了一群讨厌的中间人，他们靠揭发犯罪获利，而为了利益所在又要求他们夸大，甚至编造事实。19世纪初在纯刑事案件上揭发过好几起这种骇人听闻的挑唆事件，而且无疑还有许多事未被人知。卢德派也和其他刑事案犯集团一样，受到高额悬赏，征求可以定罪的情报，臭名昭著的曼彻斯特代理警监约瑟夫·纳丁，就有人怀疑他用不正当手段弄泰伯恩票证加以出售从中渔利。1817年英格兰银行控告124个人假造钞票或使用假钞，而激进派报纸则揭

---

[27] 菲茨廉文件，F. 44(a)和45(d)，R. F. 韦尔默思：《卫斯理宗和英国工人运动，1800—1850年》，第60页。比较T. A. 阿布迪1795年12月20日致波特兰公爵的信，说他转告“我的猎场守护人”的消息，“他的地位使他比我这个地方官更有机会听到更多……”，见内政部档案，第42.37号。

[28] 马洛(1564—1593)，英国著名剧作家、人文主义者，1593年为密探刺死。——译注

露在有些案子中，靠出卖人命赚钱的密探把假钞票“栽”到无辜的受害人身上，而从其定罪中提取酬金。[29]

如此，政治的和刑事犯罪的传统都赞成雇用密探，“平定”爱489 尔兰所取得的经验加强了这种看法，特别是在1798年以后，但是这样雇用来的密探素质却大不相同。在少数场合下，为对付激进的政治运动，当局可能挑选像“公民格罗夫斯”那样有一点文化也有一点能力的人打入到运动中去，格罗夫斯在1794年成功地渗入伦敦通讯会的核心会议中。但大多数密探却主要是那种传统的“卖人命赚钱”的雇佣兵，最近有人竭力想消除人们在传统上对奥利弗这种人的某些憎恶感，把他们描绘成“侦探”，在其心目中他们似乎扮演某种危险却又诚实的角色，这种做法是全无道理的。[30] 在战争中，甚至在内战中，都可以这样来看待密探；但在皮特或西德默思向改革派发动的战争中却不可以这样看，因为力量的对比大不均衡，况且告密者分成两种，首先是有些被当局找了麻烦的人，他们操持此业，是为赎身免遭官司（或者释放出狱）。招募这种奸细的最好土壤是债务监狱，19世纪之交有个叫巴洛的人就是这种应募人中最叫人恶心的一个，在曼彻斯特和设菲尔德的酒馆中寻欢作乐（还企图牵连一批中等阶级改革派），又不时写信给内政部可怜地要钱，不仅为其手头开销，而且是为偿还以前债务，（据他自己说）这是在他接受雇用

---

[29] 刺探犯罪情报的整个体系及其弊端可见L.拉齐诺维奇前引书，第1卷，第333页以下；骚塞：《英国通信》（1808年第二版），第1卷，第173页；黑兹利特：《论奸细制》，载于《作品》第7卷，第208页以下。关于纳丁可见，里德：《彼得卢》（曼彻斯特，1957），第65页。伪钞案见《黑矮人报》1816至1818年，各处；《达克特快报》，1818年2月9日；H.亨特著《回忆录》（1822），第3卷，第483页。

[30] 例如，可参见A.F.弗里曼特尔：《密探奥利弗真理》，载于《英国历史评论》，第4期（1932），第601页；R.J.怀特：《从滑铁卢到彼得卢》，第13章；F.C.马瑟：《宪章运动时期的公共秩序》（曼彻斯特，1959）。

时给他许的诺。他显然做得太过分了,在他的一封乞讨信背后有人(也许是波特兰公爵)粗暴地写道:"为甩掉巴洛如果还需要什么理由的话,那就是这封信了。我提议给他20镑之后立刻打发他。"①(据某个动机不那么卑鄙的、后来又为这种行为感到羞愧的密探说,政府与卡斯尔、奥利弗及爱德华兹间的联系,"全都开始于舰队街监狱"。②

第二种密探中有叛徒,他们曾是积极的改革派,为保全自己或为钱而当上奸细,也有偶尔自愿的贪心汉,企图按"件"出卖情报。荣誉心和职业道德在这两种人身上都很少。③ 但另一方面,若认为这些人的报告一概没有价值,那就错了,坏人可以在坏事中起作用。④ 假使可以从内政部、财政部和枢密院收藏的各种全然不同的文献资料作一个概括的话(包括书面报告及信件、誊抄的口供、囚犯的坦白等),它们可能会是这样一种情况: 490

1. 告密者显然有一种使自己的报告耸人听闻的倾向(如哈孟德夫妇及其他人已指出的那样,他越是出于为钱的动机,他就越挖空心思想提供其雇主所希望收买的情报)。

2. 但雇主又不全是傻子——这是个常被人忽视的事实。

---

① 巴洛1799年11月16日信,枢密院档案第164号。实际上巴洛并未就此被打发,因为他(也许善于见风使舵)开始送来有关非法结社活动的长篇报告。

② A.B.里奇蒙:《工业人口状况记叙》(1825),第159页。(有关奥利弗)亦见查尔斯·彭德里尔的口述,载于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18年5月16日;及本书下文,第653页。

③ 有关政治奸细制度的概况,见F.O.达维尔:《摄政王时期的民众动乱和公共秩序》(1934),第12、14章;哈孟德夫妇:《技术工人》,第12章;F.W.钱德勒:《政治奸细和挑唆特务分子》(设菲尔德,1933);W.J.菲茨帕特里克:《皮特手下的秘密活动》(1892)。

④ 菲茨威廉写信给佩勒姆说,某个奸细是"……完全的无赖,品质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尽管他或许是一文不名的,刺探起不满分子的机密来却可能不是个太坏的间谍"。1802年9月25日,菲茨威廉文件,F.45(d)。

他们也了解这种倾向，地方官的利益所在也是取得准确的情报，他们并不愿意像傻瓜那样被派去搜寻根本不存在的武器库，也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追踪酒馆演说家上面。他们常常事先就心存戒备，不只雇用一个告密者（相互不认识）作为核实情报的方法。治安官在向内政部传递情报时，要对情报的可靠性作出某种估价，是普遍的做法。

3. 然而这种情报却是一面观察历史的哈哈镜，又不仅仅是因为多数奸细倾向于给非罪的活动套上一个有罪的框子，而且因为有一些情报他们没有发出，这包括了对政治不那么热心的多数人的思想及兴趣，同时也包括了不列颠的大片地区。这里，我们不仅应考虑奸细的动机，而且要考虑雇用奸细的治安官们的动机。从公共档案馆的资料看，自 18 世纪 90 年代末到 1820 年，博尔顿似乎是英格兰的头号造反中心。但完全搞不清这究491 竟是因为博尔顿人特别喜欢革命或是因为博尔顿受到两个精力太盛的治安法官之害。托马斯·班克罗夫牧师和弗莱彻中校这两个人都似乎以不同寻常的规模雇用奸细（或“使者”）。

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英国在这段时间中基本上是由托利党统治。一个地方官若孜孜不倦地给内政部写信，他大概会是个狂热的反雅各宾派托利党，或出于私人的理由博取政府的赏识。在同一时期，约克郡来的许多报告比兰开郡的简单得多，虽说没有理由相信设菲尔德或巴恩斯利就比曼彻斯特或博尔顿革命情绪更少。约克郡有一个辉格党郡守菲茨威廉指导下的辉格党地方政权，菲茨威廉不喜欢托利党干预他的事。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许多“老派”的治安官，不管是辉格还是托利，他们认为维护治安是教区的事，是当地贵族的责任，给内政部写长信毫无必要，令人厌恶，而且还多少有点失身份。

对中央政府的这种嫉妒事实上是导致了许多纠纷。历届内

政大臣都以一些异常积极的地方官为依靠，这些人的权威伸展到自己的边界之外。高级军官和地方官彼此打小报告，报告对方的动静。卢德运动时，斯托克波特一个积极的诉讼师劳埃德先生受到鼓励，把他的权威伸展到约克郡，甚至把政府方面的证人拐骗到彭奈恩山另一边。[35] 在战后年代，博尔顿的弗莱彻中校掌握的曼彻斯特改革派情报，往往比当地法官还要多。1817年奥利弗直接由西德默思派往中北部时，他好几次差一点被地方治安官逮捕，以为他是真正革命者。

由此，我们必须认为内政部档案的确失真，不仅是在这点那点上的失真，而且是整体上的失真。我们不仅应对呈送进来的信件的字里行间，而且要对从未送出的信也加以探讨。 492

4. 大体上可以说，当局向非法政治组织的渗透比向工业组织的渗透成功得多，对地区组织的渗透比对地方组织的渗透成功得多。无论在全国范围还是在地方范围内都是如此。这里的原因不说自明。对一个密探来说，假扮成雅各宾分子或激进派要比冒充大剪绒工或针织工容易得多。政治社团集结于广大地区并来自不同的社会集团，而非法工会或卢德派团体则产生于工场或村落，其中每一个人大都彼此认识。奸细们发现，正是在镇与镇相连，地区与地区相连的地方，他们最容易渗透。

5. 记住所有这些后，我们还有两点要谈。首先是一句老生常谈，即根据旁证的一般规则，每一份报告都必须仔细审查。提到这点很有必要，因为现在变得有点时兴的是对所有这类报告都认为不可信而不予考虑，或谓对所有一切同纯正解释无法吻合的报告都不予考虑。但很少有什么报告不给批评留下把柄，为其他材料、内证、本质上可能的结果等等所证实或反驳。

㉟ 见后文，第580页。

我们可以看两个例子,都是1817年的。第一例是某密探报告曼彻斯特一个改革派的演说:

他然后陈述穷人及其子女的状况。孩子对父亲说:给我一点面包,父亲回答说没有,孩子说到处都没有了吗?父亲说,有的,有很多,但暴君和强盗把它从我们这儿夺走了。现在该你们(指人民)伸出手去把它再拿回来了。[36]

第二个例子是给一位王室律师的信:

利奇菲尔德先生,有一事我不支(知)说过没有,但是我想可以告诉你,马上要有小分队开到伦敦内外的大门头,不让政府向全国各地送邮件,因为只有一个骑兵跟着……这是小沃森和西斯尔伍德提议的,也被全体同(通)过。[37]

还有比这更明显的差异吗?第一份看上去很可信,是一个未经正规训练的探子写出来的报告,显然这密探忘记了自己,被这段493 发言打动了,他对这位民主演说家风度的记录比一般出现在激进派报纸上的"文学"气味的叙述更生动。第二份报告的作者则是那臭名昭著的内奸约翰·卡斯尔——一个青楼妓女的"保护人",1817年沃森受审时,其证词被撕成碎片。但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一点,他的文风在第一句话中将他暴露无遗,他舞动他那支文盲之笔,急切地想进一步巴结政府当局。这不是说他证词中每一句话都是谎言。但确实意味着每句话在被历史承认之前,必须批判地过滤一遍。

要说的第二点是:人们会惊奇地看到在1792至1820年间,

---

[36] 《关于巴古利讲话的报告》,见内政部档案,第40.4号。

[37] 《约翰·卡斯尔1817年3月6日信》,见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351号。

政府不仅没有被成群的骗子牵着鼻子走，而且它居然用高超的技巧成功地防止了严肃革命的发生，并保证有关图谋造反的可靠消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政府。他们在伦敦通讯会中成功地安插了奸细(虽说在核心部分是间断地安插)。发现了有关联合爱尔兰人和联合英格兰人的相当一部分情况。他们打入并瓦解了德斯帕德的密谋，还终于渗透进某些卢德派活动的地区(但只是局部地并且经历了巨大的困难)。在战后年代，我们将看到，政府在事发之前就知道了密谋的一切细节，而这个密谋在彭特里奇起义时发展到最高峰。亚瑟·西斯尔伍德从1816年起就被盯梢，直到他死在绞刑架上。在曼彻斯特，“我们用字母B来称呼的那个人”是为德斯帕德少校辩护筹款的司库，而1812年，这同一个“B”或另一个“B”被任命为某个准卢德派的“秘密委员会”的司库，他和其他的密探对1816至1820年间兰开郡的每一个动向都了如指掌。若熟悉内政部的文件，那关于英国统治阶级从来就是愚蠢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事实上，一部可靠的英国雅各宾主义和群众激进主义史，只能根据特务活动对运动的影响来写。早在其初期阶段，伦敦通讯会就对典型奸细所装出的过分热情和挑拨态度有所认识。1794年，托特纳姆一个叫琼斯的人被(错误地)指控为奸细，因为他提出激烈的决议，人们说这些决议是“想陷害协会”，而琼斯(据真奸细格罗夫斯不无挖苦的报告)则抱怨说： 494

> 假如一个公民因提出一项看来有点火药味的动议就被当成是政府派来的奸细，假如一个公民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只是观察会议如何进行因而可以更好地去汇

报……那么公民们就很难知道该如何行动了。[38]

为了加强安全，伦敦通讯会于1795年通过一个新章程，其中包括以下规定：

以表现热情、勇气或其他动机为借口而企图破坏纪律者，应予以怀疑。吵吵闹闹并不算勇敢，过分的热情则往往是伪装的背叛。[39]

但这种规则一旦制定，可以被一个更改了自己形象的演员所规避。而战后的政治激进主义刚开始复活，就遭到卡斯尔和奥利弗事件的打击。假如我们想为战后激进主义的分裂和人们忠于报纸编辑而不忠于某个组织的问题作出某种解释，答案就在这里。

出于这种原因，秘密政治的传统要么是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德斯帕德、彭特里奇、卡图街），要么是虚弱的宣传，既遮遮掩掩的，又是小规模的一点一滴的宣传，处于猜疑的环境中，因此它很难有什么结果，除非在某些地区它能与秘密的劳工传统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存在于卢德运动中，而在诺丁汉和约克郡，卢德派抵挡奸细的渗透最为成功。在这里，政府当局面对一种工人阶级的无形文化，它可以抵挡一切渗透（只有在拷打和绞刑架的威胁下，被捕的卢德派才有可能垮掉）。当两名经验丰富的伦敦警官被派到诺丁汉后，他们向内政部报告说："不管城里还是乡下，下层等级几乎每一个人都站在他们那一边"。[40]

495 现在可以特别就卢德运动的研究提出以下几点了。假如这

---

[38] 《格罗夫斯1794年7月21日的报告》，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0A(3)号。

[39] 附加手稿，第27813号。

[40] 《科南特和贝克报告》，1812年1月26日，内政部档案，第42.119号（抄件亦见诺丁汉文献馆）。

些年中确实有地下活动存在，那么就其本性来说是不会留下什么文字证据。它不会有报刊杂志，也不会有会议记录，由于当局检查邮件，也不会有多少信件，人们也许指望某些成员会留下回忆录；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业经考证的第一手卢德派记叙。许多卢德派积极分子虽然识字，却不读书也不写字。此外我们还应该从1813年往后看，卢德运动在绞刑架上结束，此后的40年中，在任何一刻宣称自己曾经是卢德派鼓动家，就都有可能引起政府的反感，甚至在那些被处死者还有亲属活着的地区，有可能亲属被强加一些罪状。那些悔恨过去的卢德派正如有犯罪前科的人一样，不想让人们提起他们的青年时代。而那些不追悔过去的人，我们应该记住，革命密谋的趋向经过1816至1820年和1830至1832年这两个时期一直发展到宪章运动的最后岁月。对那些具有绅士派头的侦探来说，滋生出1848年宪章运动实力派的中、北部工人阶级文化，并不比战时年代更明显。至于那些“被饶了性命，继续留在乡下的”卢德派，照弗兰克·皮尔的记叙：

> 应特别指出，他们许多人看来终其一生都与后来的政治社会运动纠缠在一起，这些运动多多少少都为法律所禁止。

他们多数追随科贝特、亨特和费格斯·奥康诺。（据皮尔记载）有个老卢德派从不愿透露运动的丝毫机密，到老年糊涂时却给孙辈们唱卢德派歌曲；另一个从约克郡搬兰开郡去住，25年以后，因参加宪章运动而坐牢；还有一个始终对卢德运动“缄默不言，直至去世”。[41] 在中部地区的针织业村落里，夜半集会、军事训练和造反的言论一直延续了40年。约克郡西区也是这样，

---

[41] 弗兰克·皮尔：《卢德派起义》（赫克蒙德怀克，1895），第269—270页。

496 有传闻说1812年埋藏的卢德派枪支在后来的危机中被挖出来使用,诸如此类残存的记忆,就作为秘密传下来。

事实上,直至19世纪60和70年代,活下来的人才把自己的身世付诸报端,但一个在1811年仅21岁的人,到1870年已是80岁了。约克郡西区有好几个这样的幸存者,他们的故事由当地历史学家搜集起来,带着同情在可判别的意义上,以某种准确性记载下来。由于这些著作是口传机密最后的表达形式,因此它们应当被看做是严肃的历史资料。[42]

诺丁汉的情形令人迷惑不解。至少有一个针织工领袖的政治文化水平相当高。格雷夫纳·亨森(1785—1852)在某一方面比得上弗朗西斯·普雷斯,在另一方面又比得上约翰·多尔蒂。(当时有人写道):“本世纪最初40年中,中部数郡没有哪个行业结社是……亨森所不熟悉的。”1812年,他是针织工委员会幕后的策划人,而这个委员会显然与卢德运动有亲缘关系。随后几年人身保护法中止时他曾入狱(1817至1818年),后来又在废除结社法的斗争中起过领导作用。他自学成才,身体粗壮,脖子短,眼小而尖锐,下巴很宽,且上翘到不合适的高度。他对有关工业和工会法律异常了解,出版过《针织花边业史》的第一部(1831年),还为激进报纸和地方报纸写文章。在诺丁汉地区,人们都说他曾是卢德派,甚至还是“卢德将军”本人。这大概肯定不是真的,但毫无疑问,亨森知道很大一部分卢德派史实。但正是这样一位流畅的作家直至生命终止,都“坚决不肯”谈论这

---

[42] 这种史料在下面两本书中都保留一点,夏洛蒂·勃朗特的《雪莉》——但几乎完全从“另一方”的角度来写——A.L.的《悲惨年代》(哈德斯菲尔德,1870);在下面几本书中则较多,D.F.E.赛克斯和G.沃克的《卢德派分子比尔地方的老本》(哈德斯菲尔德,无出版年月),以及弗兰克·皮尔的《卢德派起义》(1880)。后两本书都自称是根据幸存者的回忆写成。

件事的细节。当然，确实有人说他把一些揭开卢德运动秘密的宝贵手稿留在诺丁汉市政团一位"有影响的成员"那里，"商定一旦某些派别让位从而消除惟一的障碍时，就将它们公之于众"。但这些手稿从未问世，也许那有"影响的成员"宁愿把它们带进坟墓"。[43]

497

亨森"不肯"透露事实，不仅没有冲淡卢德派有明显的地下活动的说法，反而加强了它。现在我们要从评论史料转向积极的推测了，从德斯帕德到西斯尔伍德再往下，有一片秘密历史的空间，就如同圭洛德大平原埋藏在海底下一样。我们应尽可能地将它复原。

3. 反结社立法

隐藏在动乱后面的"黑手"中，最受当局怀疑的是托马斯·斯彭斯。当局认为斯彭斯派鼓动 1800 和 1801 年的抢粮风潮，虽说 1801 年斯彭斯受审入狱，但当局仍归罪于他的煽动性书刊，1817 年下院秘密委员会再次发现"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协会"的一个密谋。而另一方面普雷斯则说，斯彭斯派"并没有什么不平常"，"既无害又单纯"。

我们还会回到 1816 至 1817 年的事件上来。不过很可能直至 1814 年斯彭斯去世，普雷斯的说法都是最接近事实的。斯彭斯既不想当真做一个密谋者，也没有在行动上这样做。另一方面他的团体却使地下不满活动在伦敦保存下去，比如书写粉笔标语和散发粗制的传单。在镇压的条件下，更重大的是斯彭斯

[43] W. 费尔金：《机织编袜和花边制造业史》(1867)，第 17 页，第 240—241 页；《诺丁汉评论》，1852 年 11 月 19 日；W. H. 怀利：《新旧诺丁汉》(1853)，第 234 页。所谓有影响的成员，据一项记载，是指参事员约翰·布雷德利。这些手稿若能发现将引起极大的兴趣。

不相信高度集中有纪律的地下活动。他的策略是扩大宣传。1801年3月，斯彭斯派同意尽可能松散地组织起来，设"野外宣讲员"。追随者应组成协会，"自由自在地在酒馆聚会而无须费脑筋去制定章程"——协会的任务是交谈和传播公民斯彭斯的小册子。(1807年，一个叫"自由自在"的协会每星期二在小风车街的"羊毛酒家"聚会。他们是想让不满情绪无形可寻，这样政府就找不到中心，也找不到组织的脉络。)[44]

498 这些都不是"黑灯照"和卢德运动所用的方法，但在其扩散宣传的策略中，仍可看见某种线索。因为从1800至1820年，非法活动的传统从来没有中心。既没有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也没有邦纳罗蒂向全国各地派遣使节；[45]如果我们想找到这个中心，我们就和当局犯了同样的错误。雅各宾主义成为工人团体中特有的东西的同时，就失去了全国性中心和绝大多数中等阶级支持者。正是在雅各宾宣传的旧中心地区——设菲尔德、诺丁汉、南兰开郡、利兹等地——瑟文沃尔的"苏格拉底精神"在工场作坊中扎下了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自觉的传统。相互认识而信任的潘恩派团体秘密地聚会，《人权论》从一个人手上传到另一个人手上。据某个绘声绘色的说法，

> 在默瑟尔一小批对潘恩的《人权论》和《理性时代》顶礼膜拜的人，聚到山上的秘密地点集会，他们从一个大圆

---

[44] O.D.拉德金：《托马斯·斯彭斯和他的团体》，第122—123、146—147页；附加手稿，第2780号。

[45] 巴贝夫(1760—1797)和邦纳罗蒂(1761—1837)：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领导"先贤祠俱乐部"和"平等会"，主张密谋暴动。1796年组织秘密起义委员会，泄密后被捕，巴贝夫被处死，邦纳罗蒂监禁后改判流放。——译注

石或类似的隐藏点取出书本，满怀激情地阅读。[46]

梅休记录过一个伦敦老书贩的话，这个书贩曾“偷偷地卖过汤姆·潘恩的书”。

要是有人买一本书而愿意付……三倍于标价的钱，他就送一本《理性时代》……他的书摊上全是信神的书，也不时有一两本《反雅各宾评论》……虽说他的抽屉里有“汤姆·潘恩。[47]

在设菲尔德，“老哥儿们”还聚在一起为潘恩的健康祝酒，唱“上帝保佑伟大的潘恩”：

当宫廷和国王被触动，
事实也就变成煽动，
军队于是开始出动。
建起了兵营和巴士底，
无辜的人们进监狱。
鲜血无端往外淌，
上帝见了也着慌……[48]

德斯帕德被处死后，工业区这种潘恩派团体就失去了全国性联系，而缩回到自己的地方圈子里。其影响也取决于地方事务和经历。只是在发生大动荡的时刻，它们才会小心翼翼地伸出触角，起先是寻求地区的联系，然后再寻求全国的联系。但既然它们缩了回去，其思想也就反过来由每个地区的特殊情况所定，不满的重点将在经济和产业方面。在博尔顿和利兹，为面包

499

[46] C.威尔金斯：《默瑟尔·提德维尔史》(1867)，同一说法中说：“信教的人把靴底的钉子排成T.P.字样，这样就可以象征性地把汤姆·潘恩踩在脚下”。

[47] 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318页。

[48] 约翰·威尔逊：《约瑟夫·马瑟歌集》(设菲尔德，1862)，第56—57页。参见B.布赖尔利：《费尔斯沃思：我的故乡》，第14—16页。

价格组织一次罢工或示威，要比组织一次政治讨论会，请愿或暴动容易。雅各宾或潘恩派于是消失了；但对人权的要求却比以前传播得更广泛。镇压并不能打碎平均主义的英吉利共和国之梦；它解除了工人对雇工残存的忠心，不满于是弥漫到一个当局所不能渗透的领域。某个充当地方官的牧师 J. T. 比彻曾怒气冲冲地谈到他对卢德运动起源的看法：

> 我把这些……暴行归因于雅各宾的原则，我们诺丁汉的改革派将这些原则孜孜不倦地灌输给下层人民，这些改革派在许多场合下成为秘密组织和罪恶私党的目标。而这些组织是在他们的邪恶榜样、放肆言谈，以及为取得党派目标而开办的煽动性报刊影响下才生成……于是，这些邪恶……被引进来，当成宝贝受珍爱，直至它在这个那个工业区与社会状态完全融为一体。[49]

在这种爆发的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怨恨。比彻是个托利党（摄政王对他来说，既是教会也是国王），他认为诺丁汉的袜商是罪有应得，他们中有些人在 18 世纪 90 年代是改革派；现在是非国教分子，1801 年曾呈请要求缔和，1802 年，协助撤换了一个托利党议员，而这恰好与骚乱和法国新纪元同时发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议员丹尼尔·帕克·科克在 1803 年官复原职，而他对织袜情况的关注要甚于那些辉格党雇主）。十年前他们在诺丁汉市场上种下的龙牙[50]，现在全都手执武器地跳出来围住他们。[51] 但在有一点上比彻是看对了，他看出少数人过去

500

---

[49] 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 170、174 页。

[50] 日耳曼神话，种下龙牙，化为武士互相砍杀。——译注

[51] W. H. 里德：《不信神的协会的兴起与解散》，第 20 页，说"俱乐部活动分子"认为"他们的任务是钻进各种类型寻欢作乐的协会中去"，尤其是共济会。

的宣传现在"与社会状态完全融为一体",而雅各宾主义嫁接其上的砧木正是非法的工会组织。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潘恩派有意识地决定要"打入"工会和互助会。但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任何时刻,若我们心目中把政治上的不满和产业组织完全分开,那就会犯错误。互助会在合法时不允许发生地区性和全国性的联系,这时,"不搞政治"的规定常常生效。有一些年深日久的行业俱乐部也有类似传统。但在多数制造业地区,任何有组织的运动都很可能由少数活跃分子发起,而那些有胆量组织非法工会、有能力掌管其书信来往及财政经济、有知识向议会或向律师请教的人,就很有可能对《人权论》毫不生疏。年轻的工会领袖顶上来时,他们很快会由于他们与雇工、地方官或抱严惩态度的下议院的矛盾而转向极端的激进主义。

正是皮特实施结社法,才无意中使雅各宾传统和非法的工会结合起来了。兰开郡和约克郡的情况尤为如此,1799年的法案促使雅各宾派和工会分子结成一个着重于半政治性、半产业性广泛的秘密结盟。一个告密者(巴洛)报告说:

> 它起源于设菲尔德……的共和派协会——与约克郡的主要工业城镇有联系——与本城(曼彻斯特)及斯托克波特,尤其是伯里通消息。

同一个告密者在设菲尔德发现:"最近的法案在各类的工匠和机匠中造成普遍的不满情绪……我担心这法案已经促成更多的结社,要不是这些法案,他们还想不起这样做的。"据他报告,工会活动家正在造可能受结社法反向影响的工人人数统计表。据估计,兰开郡有6万人,约克郡有5万人,德比郡有3万人。新团体的秘密委员会"处在共和派的操纵之下"。有趣的是,这以后北部和中西部幸存下来的政治俱乐部放弃了"爱国会"、"宪法 501

会"这一类名称，而改称自己是"联合会"——这种叫法模棱两可，因它既含政治目的又含产业目的。这个名称(即使组织没有保存下来)成为战后年代出现的联合会和政治同盟的名称。[②]

在兰开郡，抵制结社法的活动由一个技术工人的工会委员会发动，其中包括粗布裁切工、棉纺工、鞋匠、机器自制工、白布印花工等等。[③] 在约克郡，不断有报告说，呢料整布工和剪绒工扮演着秘密组织发起人的角色。其目的既是产业的，也有更深远的。1799 年结社法通过并提交枢密院时，一份备忘录专门把剪绒工挑出来谴责："他们所拥有并行使的那种专断权力，简直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④] 1802 年，约克西区温和的郡守菲茨威廉伯爵连续向内政部报告，说剪绒工的组织和一般的非法结社好像完全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起先，菲茨威廉倾向于对有关搞密谋暴动的报告的真实性打一个折扣。7 月份他写道："我担心真正雅各宾式的密谋多少是有一点的……但我深信真正的秘密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其他人只是受了骗……他认为绝大多数夜间集会只是"为提高工资，而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至于是否应接受某些大制造商提出的要求，对这种会议进行武力镇压，他采取谨慎的态度。不能因为有必要镇压煽动性集会，就以此为借口在"制定限制性更强的法律反对以增加工资为目标的帮工结社"，当行业兴旺时，帮工们也有权分享"收获季节"。

502 对其结社进行惩治是不公正的：

我认为我们不应当给他们提供对恶政表示不满的理

---

② 枢密院档案，第 A.161 和 164 号。差不多就在这时，有很多人来找卡特莱特上校，"商量成立若干新生组织的事，起名联合会"。F.D.卡特莱特前引书，第 1 卷，第 243 页。

③ 《T.贝利 1799 年 11 月 6 日致内政部》，枢密院档案，第 A.164 号。

④ 《关于工人结社的问题》，枢密院档案，第 A.152 号，见后文，第 524 页。

由，我们不应当把他们驱赶到真正的雅各宾事业中去，
不应当以我们的行动，为他们的行动提供根据……[57]

但只隔两个月他就改变了看法。理由有三个：首先，他得到了关于"黑灯照"和秘密工会组织的报告，报告相当详细，其中工会的目标与传闻中的长远目标难分难解。他得知说：

……委员会开会的房子在利兹有三座，在威克菲尔德也有三座——他们估计其中有一座房子会在某个时候被搜查，就把文件藏在煤堆下和房屋地板的活门里，每个会员每星期交一便士作基金；委员会选举了很多委员，而每个委员手下又都有十个人……他们把每周会费送到利兹，将在同一天晚上在全国发动叛乱，第二天早上就改变一切。

其次，他从内政部得知可靠证据，说明约克郡的剪绒工组织和英格兰西部有联系。那里使用起毛机的工厂最近被毁。第三，他对工会活动取得成功、其势头不断高涨并囊括十几个行业的报告越来越感到惊慌。9月初，利兹市长写信给他，沮丧地谈到"各阶层工人（尤其是剪毛工）的结社热情所表现的严重情形"：

奖金、特惠、工时、工作方式、工资率，应该雇用谁，等等，等等——现在这一切都要征得我们工人的同意，而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而且每个部门都在为分享这些新权力而斗争。现在这件事已成定论，即瓦匠、石匠、木匠、纺车匠等等的工资，在利兹或曼彻斯特比威克菲尔德、约克、赫尔和罗奇代尔每星期高三个先令……

1802年9月底，利兹最大的呢绒制造商戈特所雇用的全体剪绒工罢工，反对招进两个超过公认学徒年龄（14岁）的男孩。（这 503

[57] 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41、45—46页。

件事是一个借口，引起戈特与剪绒工之间以及随后约克西区全行业关于学徒问题的摊牌。)菲茨威廉伯爵于是写信给佩勒姆勋爵，要求“进一步限制帮工的结社”：

> 我不得不坚决认为所有集会或怀疑中的集会，都起自于我现在要谈的这些人的结社——剪绒工。他们是国家的暴君，他们有权力有影响是因为他们工资高，他们可以有储蓄，从而不怕行为不当造成的不便，但他们又是一种对生产并非必需的人，假如商人们决意摆脱他们，他们就会失去影响，他们的存款就会耗尽，结社就会垮台，我们也就不会再听说有任何种类的集会了……[56]

我们不知道在剪绒工工会的主要人物中，是否有五年前写信给伦敦通讯会的“劳动机匠”社成员。[57] 但我们确实知道世纪交替的时候，小生产者在利兹建立过呢绒自由贸易行，绕过有钱的呢料商控制，一般人都把它叫做“汤姆·潘恩行”。我们还知道为约克郡剪绒工和西部各郡剪绒工传递信件的主要人物是一个利兹鞋匠——乔治·帕尔默，他是否就是那闻名天下的激进鞋匠呢？我们有理由假设这些有文化、有技术而又有能力的人中，有一些就是潘恩派。

此外，1799 年和 1800 年结社法把工会驱入一个非法的世界，秘密活动和敌视当局正是其存在的实质。从 1799 年到废除结社法(1824 至 1825 年)，各种工会的地位十分复杂。首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矛盾，正是结社法生效的年代里，工会运动取得巨大的进展。不仅那些远植根于 18 世纪的工会：梳毛工、

---

[56] 同上书，第 53—64 页，亦见哈蒙德夫妇：《技术工人》，第 174—178 页。

[57] 见文，第 177 页。

制帽工、制革工和鞋匠、造船匠、成衣匠的工会在结社法生效的许多年中，多少不受干扰地继续存在，而且有证据表明结社向许 504 多新行业扩展，还有最早组织总工会的尝试。韦伯夫妇断言说许多伦敦手工艺行业"从未像 1800 至 1820 年间……那样完全地组织起来"，[58] 许多手工行业如成衣业甚至有网状的行业俱乐部或地方分会、候工所、资格证、流浪生活津贴、学徒期控制（这给工会基金添加了一大笔钱）、救济金、银行存款等，有时还有与雇主商定的正式工价。这些情况都表明结社法几乎形同虚设，如果认为这些年中有"反对自由的运动"存在，那是太夸张了。[59]

与这种看法同样不确实的另一种看法是：认为结社法使以前合法的工会变得非法了。这种观点有时可以在一些流行的说法中看到。事实上，在 18 世纪 90 年代以前，有足够的立法可以使任何可能的工会活动受到起诉——例如习惯法中的聚众密谋罪，也可以说工会撕毁契约、未完成工作任务，将它与涉及到个别工业部门的法令相对照。结社法是由反雅各宾派和地主的议会通过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在现有法律中加上恐吓政治改革派的条文；但也想整理现有的反工会法律，简化程序，并授权两名地方官就可以执行即决审判。他们的新发明即在于无一例外地禁止一切结社，同时也在于这个事实，它与早期家长制立法传统不同。因为它没有制定保护性的条款作为补偿。尽管从技术上说，它也禁止雇主结社，却正如阿斯皮诺尔教授所说，这是个"讨厌的阶级立法"。

---

[58] S. 韦伯和 B. 韦伯：《工会运动史》，第 83 页。亦见上文，第 252—257 页。

[59] 见 M. D. 乔治：《结社法》，载于《经济史评论》，1936 年，第 6 卷，第 172 页起；关于工会在该法之前及生效时期，法律地位的有益总结，见阿斯皮诺尔前引书，序，第 10—30 页。

就这样,这个立法在所有工会人士的头上整整悬挂了25年,而且时常被引用。1802年一个内政部探子从英格兰西部写505 信道:"每天在这个或那个工业城镇,都会有两名或更多的法官坐到一起。由于结社法为传唤任何嫌疑犯到庭并在令其起誓后提审提供了方便的借口,我因此不断把这种人交给他们。结社法正是由于这样一种不加区别笼而统之的特性,才变得如此"方便"。现在还没有人计算过在结社法名义下审理过多少案子(这要求对地方报进行漫长的研究),但熟悉这些年代的人都怀疑它有过禁止结社的普遍影响。另一方面有许多有趣的理由说明它为什么不像所预期的那样被广泛使用。首先,尽管立法很有分量,但在某个模糊的范围内,某种工会活动是在事实上得到许可的。一方面,伦敦手工业中那种行业俱乐部主要起共济会的作用,在全国性联系和劳资谈判问题上不声不响。这些俱乐部可以长年累月地不受干扰,直至劳资冲突或罢工冒犯了雇主或当局。另一方面,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即某一行业的帮工——至少在不同的城镇和地区——可以合法地向议会请愿申诉他们的利益,或出席下院调查委员会。此外,结社法并没有完全取代旧的渐渐废弃不用的立法,这些立法授权地方官可以仲裁工资争议,为使帮工能够向地方官或议会吁请保护,就必须允许他们有某种组织去选举他们的发言人,筹集必要的经费。(政府并不愿意完全堵住申诉疾苦的合法渠道。)

因此,这是个在合法边界上有争议的地区。它在导致卢德运动的历史中相当重要。但此外,还有几个理由说明雇主为什么常常只愿把结社法当作威吓来使用。在工匠的行当中,如成衣或制鞋业,有许多行业小师傅自己就有一些小型组织。伦敦或伯明翰有大量这种人。他们本身就是激进派。他们蔑视镇压

性立法[60]，而他们对使用这种立法会感到良心不安。他们和自己帮工的关系往往是非正式的、私人间的；行业俱乐部早就作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了。很小的雇主仍然觉得学徒制度很方便，他把自己的生意看做是提供一个过得去的生活的手段，而并不在扩大经营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因此，他和工人一样嫉妒少数的大雇主。因为这些人不顾习惯和学徒制，抢走了最好的市场，雇用廉价劳工。在这些行业中，工匠工会就存在于一个不确定的宽容区分内。假如他们跨越某些界限，比如罢工或提出“无理”要求，他们就会面临起诉，或与雇主的相应组织相对抗。他们并没有摆脱结社法的约束，但他们学会了在它旁边生存。 506

在工匠手工业之外——事实上是在北、中、西部的广大工业区，还产生了其他情况。在那些工作分发到外面去做，或有工厂和大型工场手工业的地区。对工会运动的压制就相当严厉。生产单位越大，要求的技术越专门化，劳资间的对立就越尖锐，雇主也越有可能达成相互谅解。我们发现一些最尖锐的冲突涉及到有特别技能的人——如棉纺纱工、白布印花工、制模工、机械安装工、造船工、剪绒工、梳毛工、某几种建筑工等等，他们想夺取或保持特权的地位。其他的尖锐冲突则涉及到大批户外工（特别是手织工和织袜工），他们企图抗拒削减工资和反对自身地位的恶化。

但即使在这一点上，结社法也并不总是能用上的。首先，结社法把起诉的责任推给雇主，虽在不同的工业部门曾有过一些雇主的早期结社，但每一个雇主却都受到与他竞争的人的妒嫉。雇主的企业越大，妒嫉也就越甚，其对手也越愿意从他的困境中渔利。（因此 1802 年戈特企图搞垮剪绒工时，他却由于其他雇

[60] 结社法就是其中之一。

主向工会的要求让步而失败了。)其次,在工会强大的地方,起诉有很多困难。尤其困难的是要在工人中找两个证人起誓说工会存在,雇主知道他会失去许多最好的工匠。假如他们不坐牢不507 罢工,他们就会三三两两地走掉,给他的作坊或工厂"抹黑"。此外,起诉的结果并不一定总能抵偿所蒙受的损失。一个人被首次定罪后,惩处仅仅是三个月监禁,虽然定罪一般决不成问题,但不是自然成立的。雇主还受制于"向州法院上诉的权利……这可以把事情搁置三个月,然后再做出决定,而在此期间告发人就不会有生意做,因为他的剪绒工场会受到驱逐出教的制裁"。[61]

正因为如此,起诉往往不引用1799至1800年的结社法,而是援引以前的立法——习惯法中的阴谋法,或是对工人不完成工作进行惩罚的伊丽莎白工匠法令(伊丽莎白女王第5年第4号)。前一种立法的好处是它可以用于对付一个组织的"头领"或干部(同时没收文件和资金等);可以施行更严厉的处罚;而且起诉的责任交给当局而不是单个的雇主。这一点也并非无所谓。后一种立法的好处则是:在罢工时,雇主可以用罢工本身作证,依靠即决司法打官司而不需要找证人,让他们对正式的工会组织发誓作证。织袜工领袖格雷夫纳·亨森写道:"用结社法起诉,很少能够生效。"

但在工匠法令下却有过成百上千个案子,这项法律若不改,劳工们永不得自由。结社算不了什么;雇主们是引用了有关完成工作的法律,而找麻烦并把工人的工资压下来的。[62]

以上这些说明是很重要的,但不应该为此就认为政府方面

---

[61] 见《克特1803年1月28日致菲茨威廉的信》,菲茨威廉文件F.45(e)。

[62] 转引自M.D.乔治前引书,第175页。

对工会采取温和态度。从工会人士的角度看，他们是受结社法起诉，还是受习惯法或伊丽莎白第5年第4号立法的起诉，其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后者更严厉或更迅速。对一般百姓来说，无论这些立法如何，它们都归在"反结社立法"这一名目下，立法的效力不由起诉的次数来判断，而是看它有没有起阻碍作用。在危机时刻，或在发展过程的关键点上，工会人士受到不同法律的打击，比如：英格兰西部的毛织工(1802)，约克郡呢绒工的"协会"(1806)，兰开郡棉纺工(1808和1818)，《泰晤士报》排字工(1810)，格拉斯哥织工(1813)，设菲尔德刀具匠(1814)，针织工(1814)，白布印花工(1818)及巴恩斯利的麻织工(1822)。这些案子通常出现在组织广泛发展并取得成功时，或发生在政府本身对动荡或周围的"煽动"宣传感到担心时，内政部信件表明这种一般性考虑常常先附于个别的工业问题，而在希望雇主提出起诉的政府(内政部或地方官)和希望把责任推给政府的雇主之间，又一直存在着龃龉。[63] 就连较大的雇主也常极其谨慎地行事。1814年，菲尔德一个雇主在未婚妻向他抱怨时承认："法律是苛刻的，若非依靠结社，工资就很难提高，如果是在雇工反抗较弱的时期，我是不想运用这些法律的"。[64] 我们又看到那无定形的宽容区了，它只会因工会取得令人不安的成功或是在反抗时，才会被扰乱。 508

这样，在工匠手工业中，尤其是在伦敦，就有一个半合法的朦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地位很高的组织获得预期的成就，

---

[63] 一个极好的例子是当时的总检查官斯潘塞·帕西瓦尔1804年10月5日的议论："假如政府对靴鞋制造商的申诉加以干预，那就要准备其他各行各业都会来申诉，结果人们就会认为，提出起诉不是该行业中感到受害的雇主的事，而是政府的事了。"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90—92页。

[64] T.A.沃德前引书，第216—219页。

积累了相当一批资金(我们已知托马斯·拉奇曾暗示木匠们在1812年有2万英镑,也见过达文波特在同一时期关于鞋匠们的陈述),正是在伦敦,第一个与工会事务有关的期刊《女怪》于1818年问世,它由分毛工约翰·韦德主编并得到造船工领袖约翰·加斯特的支持。然而在北部、中部工业区,结社要么散布很广且富有战斗性,要么就一无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或另一个反结社的法律就常被使用,用来协助削减工资或进行欺骗,粉碎刚出现的工会,并把别的工会打人地下。在纺织业中,格雷夫斯·亨森把结社法看做——

509

> 一块巨大的磨盘石绕在当地工匠的脖子上,把他压倒在地。他想做的每一件事,他为维持工资或提高工资而想出来的每一种方法,都被说成是非法的;世俗权力和地方势力的全部力量都用来对付他,因为他非法地行动,地方官自信是在和立法机构协调一致,他们采取行动阻止结社,压制工资,……把工匠中任何想改变其状况的企图看做是……某种煽动或反对政府。他们中每一个组织或积极分子都被看成是危险的动乱分子,应该加以监视,如有可能,则应压制。[65]

亨森的1813年针织工协会,其证件上印有一个纹章,上面有一架织机,一只拿着锤的手,还有一句箴言"Taisez vous"(保持沉默)。诺丁汉郡的工人(据亨森在1824年说)认为结社法"太压制人",他们的警句因此是:'你们若找到监狱,我们将找到尸首。'"[66] 韦伯夫妇写《工会运动史》,其中资料是19世纪末收

---

[65] G.怀特和格雷夫纳·亨森:《简评当前调整雇主和雇工关系的法律之现状》(1823),第86页。

[66] 《关于工匠与机器……的第四个报告》(1824),第281页。

集的。他们注意到每一个老牌工会都有其“早年的浪漫传说”，比如“爱国者半夜在一块地边开会，埋在地里的档案箱啦，秘密宣誓，坐牢的补贴等等……”[67] 于是，1810年成立的铸铁工协会据说是“半夜里在中部各郡高地的山顶、沼泽和荒地里”开会的。[68] 在举行深夜集会的地方（无疑是有这种集会的），整个气氛鼓励谈论革命，即使其直接的目标是产业，更常见的是工会在一个同情他们的客店老板的私室里开会。组织的形式使密探很难渗透。有些场合以“班”为基础（一种借用卫斯理宗的组织形式），[69] 有的则经过甄别，这可能取自雅各宾或爱尔兰的经验。这样，作坊选出代表参加城镇委员会，城镇又选出代表到地区委员会，一个精心设计的体系建立起来，有可能掩蔽工作人员和委员会代表的姓名，甚至不让广大会员知道。（有时工作人员的委员会的秘密无记名投票决定，名单只有书记或司库知道）。[70] 万一当局探知了组织的某个部分，其他部分也可以安然无恙。 510

可怕的誓言和入会仪式可能也相当流行。梳毛工（或建筑工）的入会仪式许多人都知道——门里门外有岗哨，眼睛蒙着在死神像面前庄严起誓，以保守秘密等等，对这些情况的可靠性没有理由加以怀疑。

> 上帝在天作证，我作庄严地宣誓：我要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即便死也不能让我直接或间接地透露与本会有关的任何情况，也不透露与本会有联系的其他类似协会的任何情况，我决不写也不叫别人写出有可能泄密的文字，不管是写在纸上、木头上、沙土上、石

---

[67] 作者前引书，第64页。

[68] R.W.波斯特盖特：《建筑工人史》，第17页。

[69] 见R.F.韦尔默思前引书，第3卷第2章。

[70] 见A.B.里奇蒙前引书，第77页。

头上，还是其他什么东西上。[71]

这种誓词有许多来源，它部分来自共济会，部分来自古老的行会传统，或来自陈腐的民间仪典，比如市民的立誓等。“自由编筐人协会”在18世纪中期使用的誓词，就要求会员忠诚、卓越地保守行业机密，不传授给“除有权获得本技巧之外的任何人”，作为本会弟兄和自由人应履行一切义务。[72] 弗莱彻中校在博尔顿的特使找到一份更令人毛骨悚然的誓词，据信是爱尔兰“绿带会”[73]使用的：

当众兄弟之面及圣母玛丽亚之面，我宣誓：我有生有业之年将坚信并拥护我们神圣的宗教，摧毁一切异教，无一例外。[74]

19世纪早期的誓言就是这些完全不同来源的混合。卢德派主要取自爱尔兰传统，工会则主要取自行业及共济会传统。[75]

511 入会起誓也许在伦敦手工业和其他大城市的工匠中最早废弃。但入会仪式和起誓在北中部（及其他地区）持续下去，直到结社法废除后好久还在用。它不仅被当成是抵抗雇主的安全措施，也因为它成了工人道德文化的一部分——意味着团结、忠诚与威吓，而这些对工会的存在都至关重要。1831年老机匠工会哈德斯菲尔德分会成立时，就买了一把手枪，一本圣经和十码窗帘布；显然，会费开销的第一笔钱是买入会式用品。在1832至

---

[71] E.C.塔夫内尔：《工会的特点、目标及影响》(1834；1933)，第67页。

[72] 章程藏大英博物馆，打印编号L.R.404.a.4(52)。亦见《誓词集》中大量不同形式。

[73] “绿带会”是19世纪初北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故以下誓言中有强烈宗教色彩。——译注

[74] 内政部档案，第42.119号。

[75] 共济会传统及仪式、入会式的一般作用，见E.J.霍布斯鲍姆：《绿林好汉》，第9章。

1834 年的总工会运动大潮中，宣誓似乎有所恢复，尤其在神密的约克郡“各业工联”中更如此。矛盾的是，“保持沉默”的传统好像骤然间达到一个过度夸张的仪式的最终阶段，而这个阶段远不是沉默的。绅士们惊惶地听到谣传，说有所谓“庄严可怕的誓言”，令工人杀死叛徒和坏主人。有人见煤窑子和建筑工人走进客店，在里面“发生嘈杂的声音，仿佛是在军训，……一个晚上通常要放四五十发枪弹，每个人在起誓后，立即向他头顶上开一枪。……”[76] 工会领导人西米恩·波拉德不承认进行过这种起誓，但 1825 年领导过梳毛工罢工的约翰·特斯特（现在却坚决反对工会运动）却挖苦地写到工会在那一套行头上所花的钱——短剑、死神、布影、袍子、旗帜、战斧以及大大的像军用钱箱似的空盒子。利兹附近的法斯利有一个爱尔兰年轻人因破坏罢工，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殴打致死（1832 年 12 月），在调查这件事时，查出的一些细节大概是可信的。工会一个支部每星期在“海湾之马”酒店聚会，一星期付 3 便士使用三楼的一间私室：

> 他们用极端措施来防备有人偷听房间里发生的事，搁栅底部钉着一英寸厚的木板，隙缝里填着木屑，开会时门外布着岗哨，啤酒和其他饮料都由会员送进房间。

512

死者的父亲作证说，他曾在雇主要求下参加工会，以便揭露其图谋。他的说法看来是可信的：

> 一个人入会时，有两个房间，其中一间是分会开会的地方。首先的动作是把他两眼蒙起来，然后由两个会员带进会场，人们叫他说口令，那一次口令是阿尔法和欧米伽。他然后绕着房间走，这时一块铁皮发出轰隆隆

---

[76] 安·利斯特日记手稿（藏哈里克斯市班克菲尔德博物馆），1832 年 8 月 31 日，9 月 9 日。

巨响——然后人们哼歌——而他继续绕着房间走两三圈，人们问他动机纯不纯——然后把他眼睛上的布拿掉，这时他首先看见的是一幅死神像，有一个人那么大，上面有这样一些字：切记你的下场。画像上悬挂着一把出鞘的剑——他的眼睛于是又被蒙起来，再绕着房间走，这时发出一个信号，全体会员都跺起脚来，发出一片吵声——人们然后令他跪在一张桌旁，再把蒙眼布拿下来，他看到一本大圣经，手被按在那上面。……他们读第94页赞美诗，誓言就进行了，赞美诗大意是这样的：他应服从工会委员会的一切指令，应保守每一项秘密——起誓末尾有一个咒语，每一个发誓人都必须说他愿在违背誓言时，让他的灵魂永世在地狱最底层受火烧炼……[77]

在一个早已忘记战神的时代，我们可以引用一下工会挑选出来读给新入会者听的那些赞美诗段落：

耶和华啊，你是伸冤的上帝，伸冤的上帝啊，求你发出光来……

耶和华啊，恶人夸胜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

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话，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

耶和华啊，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

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者，又杀害孤儿。……

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开他的产

[77] 《利兹信使报》，1832年12月15日，亦见利斯特日记，1832年8月4日，12月8日，12月22日，（关于特斯特）《利兹时报》1832年6月7日、14日。我在此大段引用原文，是因它们从另一方面证明科尔还算相当不错的叙述，见《成立总工会的尝试》第7和16章。

业。

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 513

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

那借着律例戏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么？

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义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

但耶和华向来作了我的高台，我的上帝作了我投靠的磐石。

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孽之中，他要剪除他们。我们的上帝耶和华要把他们剪除。[78]

这种誓词和这种赞美诗，摆在一家旅店后厅的死神像前，对那些仍旧畏惧迷信的人来说，确实是严重的事——他们中有一些可能虔信过乔安娜·索斯科特，或卷入卫斯理的宗教复兴。况且，一个人在工作时，当然也可能在酒店或教堂时，要抬起眼睛，就能遇到其他信守同样保密誓言的人的目光。正是由于某种这样的宣誓，多尔切斯特的农业工人"托帕德尔烈士"在1834年被流放，而在此之后，宣誓就迅速地不再使用了。在利兹的亨斯莱特草地举行的一次抗议多尔切斯特审判的群众大会上，一位著名改革派公开宣布：

我知道有些品格极为高尚的下层人士，也曾举行过同样的宣誓，他们的人数太多了……如果要把他们找出

[78] 其他誓词基于《以西结书》，第21章（见前文，第392页），《民数记》，第30章第2节及《申命记》第23章第21—23节。参见E.J.琼斯：《苏格兰乡巴佬和威尔士的早期工会运动》，载于《经济学杂志》（增刊），1926—1929年，第1卷，第389—391页。（本处译文取自中文《新旧约全书》中的旧约《诗篇》。——译注

来流放，就会使约克郡西区人口减少。[79]

然而对非法活动的岁月，我们却不能给它涂上太多的英雄色彩。客店后厅中作出的许多事都是单调无味的，其中有大量共济会善后会那种实实在在又无声无息的事务。在平时，许多最坏的情况不是由雇主引起，而是因为领导人无经验或办事疏忽。慢慢积累起来的资金可能因领导人潜逃而丧失，又不可能诉诸法律去追索，就像针织工杜克斯伯里分会那样，他们愚蠢地信任分会书记，这个人"看起来是个能干、笃信宗教的人"。[80] 工作人员一般虽不领取工资，但委员会开会时却用工会资金大喝一顿，工会的社会作用是很重要的，但早年帐簿中留下了足够的证据，说明约翰·特斯特的另一个抱怨并非虚构：

> 我见过很多委员实在是……不合格，惟有咀嚼能力特强，他们的消化力的确惊人。[81]

没有理由说秘密活动传统应该是沼泽中的夜半集会而不应该在酒馆举行。这两个地方都不会有绅士光临，陌生人只要一走到柜台，就立刻会引起注意。保守秘密不能只看做起誓和仪式，在战时及战后年代，它还包含一整套行为规矩，这几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作中不需要领袖或代表去与雇主交涉工人的要求；而只是留一个暗示，给监工一点提示，或给雇主留一张没有签名的字条。假如要求未被满足，(那么在小作坊中)是没有必要来一次正式罢工的；工人会拂袖而去，或写一个离职报告。即使查出了领袖，也可能得不到他们活动的证据。1804 年威克

514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79] 《利兹时报》，1834 年 4 月 19 日，会议主席托马斯·巴洛插话说："我很高兴听说：你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搞宣誓了"。

[80] 诺丁汉市档案馆，第 39841 号，1812 年 6 月 22 日。

[81] 《利兹时报》，1834 年 6 月 7 日。例子可见波斯特盖特前引书，第 21—22 页。

菲尔德某个地方官写道："他们变得极其谨慎，故无须总罢工，也不与雇主对话，他们只要把事情做得让雇主一看就懂，却又不可能提出证据说他们在结社。"[82] 普雷斯20年后写道：

> 有那么几个人拥有同伴的信任，当行为中有事需要讨论时，不管是在俱乐部还是在一个单间的房屋里，在工场或院落，只要这件事重要起来，人们就会指望这些人出来指导行动，而他们又确实出来指导——仅用一个暗示。工人于是照此行动，一致照料那些有可能被解除工作的人。……群众并不知道是谁在指导，20个人中也许没有一个知道指导行动的人。他们的规矩是，什么也不问；而那些知情最多的人，他们有另一条规矩就是，要么不回答，要么给一个错误的回答。[83]

此外，非法状态意味着工会人士时常要依靠直接行动，去争取那种既不能诉诸法律，又不能有公开谈判的要求。这可以采取多种方法。较温和的形式大概就是强大的道德压力。低于工会工资率以下工作的匠人会受到抵制，"非法"工人会发现其工具"不见了"，或被其工友们"罚款"。在斯皮特菲尔兹，丝会断在织机上；在呢绒区，料子会被剪破；针织业中，织袜机上关键的部件"开关"会不翼而飞。工贼和坏主人会知道有人在盯梢，砖头会从窗子里飞进来，晚上则可能在小巷里遭到伏击。格洛斯特郡的织匠工贼被放在自己织机的大梁上扛出去抛进池塘。有时甚至应用更激烈的威吓形式；在格拉斯哥、都柏林、曼彻斯特和设菲尔德都有零星的报告说有过或企图有暗杀行动，向作坊里扔硫酸、火药包。最轰动的事件广为传播，就连中等阶级持同情

[82] 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93页。

[83] 韦伯夫妇前引书，第86—87页。

态度的人，其心中也会生出对秘密工会暴力性质的深刻恐惧。[84]

通常，这一类直接行动总是被工人社会的道德文化小心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人们把工贼看做一种威胁，从勤奋工作，无辜受害人的嘴角夺走面包；然而，虽说他遭到袭击或“受到教训”时并没有人同情他，但对其暗杀或伤害的行动就得不到道义上的支持。卢德运动是这种直接行动的延伸，但它也被小心地控制在这种无须言明的法典中。就连在森德兰和北希尔德这些民风粗犷的煤村港镇中，凶猛的示威和暴乱往往发生在较为固定的组织活动之前，暴力也有一定的界限，它可以感到却难以描述。

矛盾的是，秘密活动和偶尔出现的暴力，持续不断，这反而使取消结社法的论点更为有力。弗朗西斯·普雷斯的论点是人所共知的：

> 反结社立法……使工人群众犯法而不顾法，使他们怀疑愿意为其效劳的每一个人的动机，使他们痛恨雇主而又带有怨愤，其他任何东西都不会产生这样的怨愤；还使他们痛恨本阶级中不肯跟他们跑的那些人，其根之深使他们渴望对这些人搞一点恶作剧。[85]

普雷斯自己关于废除结社法的宣传运动很成功的说法，被人们如此经常地加以引述(而且不作任何批判)，以致现在变成了某种传奇。据他说，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就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议会内外开始宣传。而在这方面工会人士几乎未给他帮助，反而还有一些抵触：

---

[84] 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感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可以在加斯克尔夫人充满感情的小说《玛丽·巴顿》(1848)有关工会的叙述中看到。

[85] 沃拉斯前引书，第239页。

工人们上的当太多了，不愿意信任他们不大了解的任何人，他们狡诈的习性，对上流等级的疑虑，加上看不出结社法会有所松动，更看不出它被废除的可能性，他们就不肯轻信我的话对他们有用，也就不肯为此而自找麻烦，更不肯提供在他们看来有朝一日会用来反对他们的情报。我对他们太了解了，所以我既不丧气，也不生他们的气，我决心竭尽全力去为他们效劳。[56]

最后他找到约瑟夫·休谟这样一位议员，既有能力又有恒心，还深得大臣们信任，由他在下院指导废除结社法的行动。小组专门委员会满是支持废除结社法的人。在院外，普雷斯为工会运动设立了一个常设总部，准备了最好的证人，向休谟提供材料证据。1824年，他们靠"保持沉默"的战略通过了一项提案，通过时竟如此"沉默"，就连最坚定的支持者都受到警告，要他们不要讲话。这议案不仅废除了讨厌的结社法，还公然使工会会员不受习惯法里密谋罪的起诉。接着就掀起一股公开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浪潮。1825年雇主和政府对此都发动反攻，他们任命了一个新委员会，指望它建议恢复镇压性立法。但普雷斯和休谟再次不懈地工作，抗拒或修改这种立法。请愿书源源不断地来自各地，议会走廊中全是代表团，要求作证。结果，1825年的修正案在这一点上收紧了，它规定用任何形式说服或恐吓非工会会员即是犯罪，然而让最主要的成果保留下来：工会运动和罢工不再像以前那样是犯法的了。[57] 517

这个说法并非不真实。普雷斯的成功是聪明的幕后操纵加

---

56 沃拉斯前引书，第204页。

57 普雷斯的叙述全文见沃拉斯前引书，第8章；韦伯夫妇前引书，第2章；波斯特盖特前引书，第2章。

以大量辛勤的消息灵通的院外活动的伟大胜利。对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他一点都不放过。他知道他在和一个充满了绅士的下院打交道。绅士们对工会问题感到厌烦,其中有些人不喜欢工业,另一些人则把"自由放任"当做无可怀疑的教条,而多数人则对这一类问题迷惑不解或漠不关心。普雷斯是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现实。但他的说法又早就该重新审查了,下面这几点就应该加以考虑。

首先,工会人士有理由怀疑普雷斯。他们的苦难不仅由于通过了结社法,而且(这一点可能更重要)由于同时取消了过去保障工人利益的一切立法而更加深了。[⑧] 但普雷斯和休谟都是正统"政治经济学"的信徒,曾积极参加与撤销一切限制"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的立法。因此在1812年7月,当格雷夫纳·亨森为通过一项保护针织工的提案进行院外活动而面临强烈反对时,他伤感地写信给诺丁汉委员会说:"休谟先生站在亚当·斯密博士不干预贸易的立场上反对我们的提案……。"取消伊丽莎白第5年第4条立法中有关学徒制条款的动作是由普雷斯积极筹划的。组织这场取消运动(1813—1814)的制造商雇主委员会由亚历山大·盖洛韦任主席,他曾是伦敦通讯会以前的助理书记。现在他在铁园的工场是伦敦主要的机械厂。雇主委员会的书记约翰·里克特又多少年来一直是普雷斯最亲密的伙伴。这件事曾受到工会的激烈抵制,成百上千的请愿书递进来,要求保留或延续使用学徒法规,总共有30万人签名。普雷斯把工人的反对(还有一些伦敦手工业中小业主)的反对,斥为"固执"——"证明帮工"完全不懂他们的真实利益。因此,工会人士在1824

518

⑧ 见前文,第257页;及(有关剪绒工和织袜工)后文,第544—545页。

年仍然对普雷斯及休谟的"动机表示怀疑",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88]

其次,普雷斯根本不是在进行一场"单枪匹马"的斗争。事实上,格雷夫纳·亨森就走在普雷斯前头很远(他在工会会员中更有威望,尤其在特伦特河以北),他起草过一个提案,得到考文垂激进派议员彼得·穆尔的支持,穆尔在1823年提出这个提案。普雷斯和休谟迅速行动,既是为了促成自己的提案,也是为破坏亨森的提案。亨森的意见按普雷斯的话说,常被斥为"复杂而荒唐",是"一大堆谬论"。韦伯夫妇较为审慎地说那提案是"精心制作的",既废除结社法,又"为调节计件工资和解决劳资争端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机制"。他们继而评论道:"其中有一些建议令人赞叹地预见了后来的工厂法,但实行这些措施的时机却不成熟"。他们还继续赞扬普雷斯卓越的政治敏捷性,使用了高度迂回的费边技巧,将亨森和穆尔推到一边。[89]

其实,普雷斯的"政治敏捷"不过是这样:他相信结社法不仅是秘密活动和暴力活动的原因,也是罢工和工会运动本身的原因。受到他在小裁缝铺里经历的影响,他以为雇主和雇工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每个雇主就能多少宽厚地解决他与工人的问

[88] 《诺丁汉选邑档案》,第8卷第156页;韦伯夫妇:《工会运动史》,第61—62页;T.K.德里:《学徒法令中学徒资格条款的废除》,载于《经济史评论》,第3卷(1931—1932),第77、85页。

[89] 沃拉斯前引书,第207—210页;韦伯夫妇前引书,第100页,注释1。穆尔(及亨森)的提案确实相当繁杂,而且在战术上判断不周,它提议废除近400个法律或法律条款(包括在结社法废除后很久仍旧使用的主仆关系法),并制定以下法案:1.责成雇主发给雇员正式证书,载明工资和工作条件;2.限制加班;3.取消实物工资制;4.帮助雇员采取反对雇主恢复工资的行动;5.建立仲裁机构。许多小条款谈到一年为期的雇用,克扣原料工具问题等等。见《议会文件集》(1823),第2卷,第253页以始;《汉萨议会记录》(新版),第8卷,第366号。

题。供求规律会调节劳动的价格，而在少数情况下地方官的仲裁能够解决困难。他在给休谟出谋划策，建议他如何能压倒穆尔时说，“事情其实很简单”，

废除每一项讨厌而麻烦的条款，用很少几条来取代它，让工人和雇主尽可能自由地用自己的方式去讨价还价。这就是防止争议的办法。……

1825 年他写信给伯德特：

很快就不会有结社了，工人长期聚集在一起，是由结社法压迫所至。结社法废除后，结社就失去了将他们结合起来的理由。从而就会破裂，一切都会井然有序了。甚至，可以像奎克派教徒要求的那样。我坐在工人那儿，一点儿也看不出他们会认为，当他们能自由地行动、不再受结社法的压榨而被迫处于联合起来时，他们还愿意为远方那些可疑的试验方式出钱，去企想那靠不住的好处。[91]

“这就是防止争议的方法……。”这句是普雷斯一切院外活动的基本注解。《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老前辈麦卡洛克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相似的论点，正是这篇文章促使许多议员支持废除结社法。亨森自然没有这种谬想。然而作为一个外作工，他从自身的经历中知道，对手织工、针织工及其他工人来说，仅有工会运动还不够，因此他的提案想提供一种积极的保护机构。对此下院可能还不“成熟”，但外作工却是急不可待需要的。

工会对 1824 和 1825 年事件的反应，现在看来比较好说明了。他们看亨森的提案被排挤掉，这样做的人过去曾反对工会

---

[91] 沃拉斯前引书，第 210，217 页。

要求，并和政府好像有某种谅解。因此，在早期阶段就相当不愿意出来支持；而当他们确实出来给休谟委员会作证时，普雷斯又发现他们满是保留：

> 工人不好管事，需要极其细心，肯花力气，还要有耐心，不去触动他们的偏见。……他们满脑子糊涂想法，把苦难归咎于错误的原因。……他们都期望在结社法废除时，工资一下子提得很高；没有一个人洞悉工资和人口间的关系……

当他们看到普雷斯快要成功时，就给他支持，但并不热情，而是出于有比没有好这个原则。一旦结社法废除，他们就急切地利用这种新自由。1825 年，在结社法似乎又要恢复时，就连政府也被铺天盖地的抗议、请愿、集会和各行业代表团吓坏了，从兰开郡、格拉斯哥、约克郡、泰恩河畔来的“聪明警觉的人”，现在到议会来观察议程的兰开郡棉纺工领袖约翰·多米蒂写信给普雷斯说：想恢复结社法的任何企图，都会引起广泛的革命运动。[92] 520

普雷斯是废除结社法的主要设计师，因此在工会运动史上青史留名，这一点自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斥责工会“漠不关心”（如韦伯夫妇所说）[93]，也不能低估当时那种欢快的混乱状况。普雷斯是个教条主义者，他希望废除结社法，是因为

---

[92] 沃拉斯前引书，213—214、228 页；韦伯夫妇前引书，第 106—107 页。《工匠及机械委员会调查报告》（1824）各处。

[93] 早在 1824 年 1 月，《黑矮人》就发出了，要求为支持废除结社法而进行请愿的普遍号召：1824 年初几个月，各地行业俱乐部送来几十份这种请愿。考虑一下为甩开彼得·穆尔的提案，政府成员（如哈斯基森）对休谟的提案容忍到哪一步，是十分有益的。见《黑矮人报》，1824 年 1 月 17 日；《技工杂志》，1824 年 1 月 24 日，2 月 7 日；《下院议事录》，第 79 卷，1824 年；哈斯基森 1823 年 5 月 27 日的议会辩论发言，《汉萨议会记录》（新版）第 8 卷（1823）。

结社法冒犯了真的政治经济学(也因为他对工人阶级身受压迫感到愤慨)。他并不想靠磋商或协议来为工会运动"效劳",他想控制工会代表,正如他操纵议员一样:"我知道得很清楚,假如要为他们效劳……就不能征求他们的同意,不能由他们说了算"。[94] 至于工会方面,他们认明了普雷斯,看出他是真心实意的,又有影响,就给他适当的支持,尽管他的提案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普雷斯认为亨森的提案不能在下院通过,要使它通过比十年后才成功的马克斯韦尔和菲尔提出的调节织工工资的议案更难。他的看法基本正确。另一方面,普雷斯在废除结社法可能产生的后果问题上,可说是自己骗了自己,而部分地正因为这个幻觉(即废除结社法能防止劳资争端),才使休谟在一个冷淡或敌对的下院争取支持。

521

结社法一旦废除,进入这新的自由领域的,不是麦卡洛克的"规律",而是像约翰·加斯特、多尔蒂、亨森这样一些人的组织。伦敦的工会人士没有到普雷斯那里,而是到托马斯·霍奇斯金那里去接受理论。有很短一段时间,某些工会善意地看待普雷斯关于劳资利益一致的福音。[95] 然而阶级合作的理论刚一问世,就受到各方面攻击,首先是加斯特的《行业报》,其次是欧文派社会主义者。[96] 除了几个手艺工会是例外,这个理论完全被拒之门外,在15至20年的时间中几乎对工会发展没有影响,人们不禁要问,普雷斯这位伟大的木偶牵线人,是不是自己被挂到工会这根线的线头上呢?

---

[94] 沃拉斯前引书第204页。

[95] 设菲尔德刀具工送给普雷斯一件漂亮的礼物,兰开郡的工厂棉纱工安排了一桌酒宴,其间霍布豪斯、休姆及普雷斯受到祝酒,并向"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商祝酒,愿他们及工人间的和谐安宁长存久在"。见《行业报》,1825年7月24日。

[96] 见后文,第16章。

4. 剪绒工和织袜工

以上是写在叙述之前的话。关于废除结社法的最令人信服的论点，首先是从未有效地防止工会运动发展；其次，工会的暴力活动流行，到卢德运动时形成戏剧性高潮。我们已试图从三个方面来接近卢德运动：某种政治"地下活动"的无形传统；史料的含糊暧昧，活跃的非法工会传统。现在我们要更详细地分析一下卢德运动产生的工业背景。

分析早就有人做过，[67] 但应由最新发现的史料加以纠正和补充。1811 至 1817 年，严格意义上的卢德运动仅限于三个地区与行业，即约克西区（的剪毛工），南兰开郡（的棉布手工织工），以及以诺丁汉为中心包括莱斯特郡、德比郡局部地区的针织业区。 522

这三群人中，剪绒工或称平绒工[68] 是享有特殊待遇的技术工人，属毛呢工人中的贵族。手工织工和针织工是外作工，有很长的匠作传统，但地位正在恶化。剪绒工最近似大众想象中的卢德派。他们与机器直接对抗，他们自己和雇主都深知这种机器会取代人。剪绒工的工作在 1800 年行呢业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中被描写成下面这样：

呢绒工人的工作是拿一块从市场上买来的粗呢，或大

---

[67] 哈蒙德夫妇的《技术工人》仍是叙述卢德运动发生背景的最好书籍，见第 4 章《棉业工人》，第 6 章第 4 节《剪绒工》，第 8 章《针织工》及第 9 和第 10 章关于诺丁汉和约克郡的卢德运动。弗兰克·皮尔的《卢德派起义》（关于约克郡）是最生动的地区性研究。F.O. 达维尔的《摄政王时期的英国民众骚乱与社会秩序》广泛引用内政部档案，然而缺乏想象力。

[68] 这两种叫法可以互换，但"剪绒工"多在约克郡使用而"平绒工"多在西部各郡使用，有时用更一般的称呼"手整布工"或"毛料工"。

块从浆洗房送来的粗毛料，首先使绒毛隆起，然后，假如料子好，他就湿剪，然后再拿起来补绒，摇荡；补绒是在用湿剪刀剪之后，把呢子底填平，做的时候每只手拿一根柄子，上面装着起毛果，做过之后就把料子荡一遍，张到布架上，晾干。假如料子不错，在张起之后还要干剪三趟。……

在这样处理以后，背面还要剪，然后查看疵点、修补、刷光、洗净、压平，也许还要最后修剪一次。[99] 所有这些工序都由呢绒工即剪绒工完成。除了清洁、拉（即张）、压之外，剪绒工的技术表现在中心程序上，即使料子的表面毛隆起来，然后将毛剪去或平掉。毛用起毛果隆起，平绒则使用很重的手剪（从柄到刃 4 英尺长，重 40 磅）两道工序都需要经验和技巧。此外，由于习惯上剪绒工的工资是成品毛料价值的约 5%，"他们可由于精心操作或马虎行事而使一块料子涨价 20% 或落价 20%"。这样，他们就处于异常强有力的谈判地位上。[100]

至 18 世纪末，这套羊毛织物的整理已成为高度专门化的过程。有些大厂商将整个程序置于单独的"工厂"中，戈特在自己的厂房中就雇了多达 80 名的剪绒工。但多数商人从较小的呢绒商那里买回未完成的料子，然后把它们外放到作坊中去完成，在利兹这种作坊雇有"40、50 甚至 60 名"技术工人和学徒；但在约克西区的村落里，较小的成品作坊只有五六个人。1806 年估计在约克西区有 3000 至 5000 以上的剪绒工（第二个估计数包括学徒），另加上梳毛工，英格兰西部的数字大约是该数

523

[99] 前引文，第 296 页，清楚说明这些程序的是 W. B. 克伦普的书《利兹呢绒业，1780—1820 年》（利兹，1931），第 38—51 页。

[100] 《论结社》，1799 年，枢密院档案，第 A152 号。

的1/3。[101]

剪绒工就这样控制着成品阶段，而且和梳毛工一样，处于组织起来以排斥非技术工人的有力地位。他们形成约克郡西区呢绒工人的贵族，如果充分就业，在19世纪初期可以每星期赚30先令。他们向来就以"独立"或"不依附"的气质，以政治觉悟和疲塌好玩著称。《利兹信使报》一个通讯员写道："剪绒工严格来说并不是受雇用的人"，他不认为自己是，也不把自己叫作这种人，他们自称是呢绒工而与鞋匠、细木匠、裁缝等等属于同一类。……他像他们一样爱来就来，爱走就走，根据其工作多少……决定他休息时间长一点或短一点。

据另一个记载，他们"花在酒馆里的钱是手工织工、整布工或染工的两三倍"，而且"在这个重要的行业里，是受雇于其中的最难管束的人"。[102]

然而与此同时，他们是常常知道机器使他们的地位变得不稳，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他们从"精英"变成"一种对本行业毫无用处的人"。起毛机是一种旧发明，而事实上，导致卢德运动的许多冲突，其关键在于爱德华六世的一项禁止使用起毛机的法令。起毛机其实是一个简单的装置，根据这个设计，毛料在装着起毛果的滚筒中间穿过，而不是用手来起毛，剪绒工(以及某些整饰 524 业)坚持说，起毛机只适用于最粗糙的料子，不适用于其他，它会把较好的料子拉坏并拉扯得太长。但企图用这种说法来证明手工技巧不可缺少，这本身就拉扯得太长。起毛机威胁到的是要把成品过程中的一道工序从剪绒工那里夺走，而新近发明的剪

---

[101] 《议会毛呢业委员会》(1806)，第239—289、297页。

[102] 《曼彻斯特汇换导报》，1812年4月21日，引自达维尔前引书，第60—61、106页。

绒机则含有同样严重的性质。这种装置把两把或更多剪刀安在一个架子上,用来通过毛料表面,其简单易行就排除了对工匠手艺的需要。

反起毛机的斗争追溯到18世纪。虽说它在英格兰西部少数地区早就运用,呢绒工人却始终不满于它的使用。18世纪末,约克西区部分地区有少数起毛机在开动,但剪绒工组织起来,不让它被引进利兹。多年来,剪绒工在约克郡和西部各郡间川流不息,因为他们的技术可以互换,18世纪90年代,反起毛机的斗争达到热点,1791年利兹呢绒商发表公开宣言,表明他们打算引进新机器,此后10年,剪绒工捣毁了不止一架利兹的机器。1799年枢密院得知剪绒工有一个"总金库",金额超过1000镑。

> 他们十分强大,足以规定非工会会员不得受雇用——。一个出于感恩戴德而在主人需要时挺身而出的工人,成了被放逐的孤立者。只要有持工会证件的人在场,他就不能工作,甚至他恳求中立,交出随意强加于他的罚款。

假如雇主想缩短某道最后工序,剪绒工就坚决要求向他们的基金付罚金。假如雇主退回活计,说它做得不好,事情就交给一个工人委员会来裁决。利兹一家使用起毛机的工厂当着"几百个"目击者的面被捣毁,但尽管后来重金悬赏,却找不到一个人出来作反对工人的证词:

> 这个制度的存在,更主要地是它与少数几条简单的工会规则相一致,而不是靠书面的形式。为规避定

罪的可能性，他们现在组成一个健康总俱乐部。[103]

健康俱乐部大概就是“协会”或“呢绒制造人共同体”(1802) 525 的最初形式，总部在利兹；但1802年，威尔特郡是放火烧工厂和群众骚乱的中心。这也许不是力量，而是绝望的表现。在利兹，剪绒工组织太强大了，根本不可能引进起毛机。1802年8月，利兹市长写信给菲茨威廉伯爵说：

由于深信商人若违反呢料工的规定，他们就一定要把威胁变为行动，所以我在过去9个月中依靠个人的影响，私下里说服了几个厂家，叫他们暂时打消在厂里添加起毛机或剪绒机的念头，否则，我坚信我们这儿也会有西部地区那种值得悔恨的可怕暴行的。[104]

这些“可怕暴行”于18世纪最后几年在西部达到高潮。一两千人的大群骚动者攻击可恨的机器，1797年12月，萨默塞特郡有：

两三百人脸上涂黑，手持大头棒，走进离弗鲁姆大约3英里的……一个剪绒商屋子，破坏了大约值30镑的剪刀。[105]

但在威尔特郡，已经有某些迹象表明，由于与约克郡西区相关的行业地位衰落，剪绒工已经被削弱了。短暂的和平时期，许多平绒工从军中复员，失业问题变得更尖锐了。1802年，“一个回到妻子和哭喊的幼儿身边的战士”从布雷德福(威尔特郡)写信给某位议员说：

---

[103] 《论结社》，枢密院档案，第A.152号。亦见《议会毛呢业委员会》(1806)，尤见第235、264—265、369页，W.B.克伦普前引书，第46、317、327页；哈蒙德夫妇：《技术工人》，第171—180页；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40页及以后诸页。

[104] 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52页；菲茨威廉文件，F.45(d)。

[105] 《鲍恩1797年12月20日致波特兰公爵》，内政部档案，第42.41号。

> 我们知道，那些有工厂的人已经提醒议会的伟人和大臣们他们已雇用了多少穷人，但与此同时他们却不提如果像过去那样用手工操作，他们还能多雇多少人。我们看见贫民院里全是鬼鬼祟祟的男孩……许多人告诉我将有一场革命，在约克郡一个通讯会有3万人。……我们知道烧工厂、对别人的财产放火是不对的，但饥饿驱使本能去做他所不愿做的事。……[106]

格洛斯特郡一个女呢商收到一封更吓人的信：

> 俺们听说到消息你有了平茉器[107]，要是你不在两个新(星)期内拆掉它，俺们就来为你拆你这老王八蛋。在全能的上帝更(跟)前我们要推平一切有平茉器的工厂，我们要把你的全体心肝挖出来如果你留这些东西。我们要叫旁人来吃你的心肝，要不然我们也同样对待他们。[108]

无论爱德华六世禁止起毛机的法令如何古老，重要的是剪绒工知道这一点，并认为反对机器取代工人不仅是他们的"权利"，而且是宪法的权利。他们也知道伊丽莎白工匠法令中规定7年学徒的条款，以及腓力和玛丽时期限制每个雇主使用织机数目的法令。他们不仅知道这些法律，而且要认真执行这些法律。1802年，他们在约克西区争取民意，在与戈特的抗争中大受同情。他们反对新机器，看来并不出于轻率也并不绝对，他们有过这样的建议，就是逐渐引进机器，而为被顶替的人找其他工作，或对机器整的毛料抽每码6便士的税，用做失业者找工作的

[106] 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172—173页。

[107] 即平绒机。

[108] D.M.亨特前引书，第21页。

基金。剪绒工看来希望进行行业内部的普遍谈判，而对受"报复心和贪婪心"驱使的少数雇主的态度，感到特别愤慨。因为这些雇主"意识到……法律可以轻易地对非法结社判罪"，因而竭力主张利用这种便利。[109]

正是如此，结社法中罪恶的阶级压迫在每一点上向他们压来。当习惯法中的密谋法或伊丽莎白第5年第4号法令被用来击败工会活动时，任何人企图实行法令中对工人有利的条文，一定会遭到失败或受经济损失。英格兰西部毛呢工人组织募捐，聘请律师提出诉讼，反对使用起毛机和没有学徒资格的人，但一次也没有成功。[110] 雇主受到很大震动，于是请愿要求取消呢绒业中的一切保护性立法。约克郡的毛呢工人也卷入类似的立法斗争。1802年至1803年间，他们花了很多钱请代理人，代表他们出席议会，派出证人代表帮工作证。雇主的提案在1803年受挫，议会已把精力集中在与法国重起的战事上，提案也就失败了。此后许多年，每年都几乎不经讨论就强行在下院通过一项中止法案，停止实施保护工人的所有立法，而半合法的协会则花费大量金钱，试图抵挡雇主的进展。1806年，一个剪绒工证人说，在过去三年中，仅约克郡一地剪绒工和手织工已经募集了10000至12000英镑，用以进行诉讼和出席议会。

527

与此同时，人们的怒气在上升，对剪绒工的支持也在增加。协会在约克郡已成为令人生畏的组织。不仅剪绒工声称几乎100％地组织起来（一个证人说："我认为在约克郡只有不到20

---

[109] 见《利兹信使报》上刊登的"一个旁观者"和"一个商人"的有趣信件，1803年1月15、22、29日。

[110] 见E.A.L.莫伊尔前引书，第254、258、259页；W.E.明钦顿：《格洛斯特郡毛织业中工会运动的起始》，载于《布里斯托尔和格洛斯特考古学会简报》，第70卷（1951），第126页以始，《毛织工协会章程条款》（格洛斯特，1802）。

个呢料工不属于协会”),而且许多小业主和手织工也向其交纳会费。1806 年他们的帐本被查获时,显示出许多其他类别的工人,要么隶属协会,要么曾接受其基金馈赠,比如说挖煤工、瓦工、羊毛分类工、呢绒工、细木工、锯木工、麻布整饰工、鞋匠、铺路工、家具制造工、花样模型工、造纸工等等,此外它还和曼彻斯特棉纺工有金钱支付关系。到 1806 年,剪绒工的情况实际上已基本融入工人总体的疾苦及要求中,对剪绒工来说这种疾苦是特殊的:起毛机和剪绒机好像要变得普遍起来,如果允许它们发展,我们中成百上千的人就要饿肚子了。对手织工来说事情则含义更广:古老的伊丽莎白第 5 年第 4 号法令中的学徒条款还有用吗?能不能堵住非技术工人的决堤之水?所有工匠都把对恢复还是全部取消有保护性或调解性的旧的劳工法规的表示视为对当局的一次测验。因为这旧法规是惟一尚可盼望的对削减工资和因引进机器而削减人手的全面压力能够提供法律保护的法规。对许多小业主来说,家庭工业制本身看起来受到了威胁,他们中成千上万人参加了 1805 年 39000 人的请愿,支持一项限制织机数,禁止使用起毛机、加强学徒制的提案。1806 年议会任命一个新的委员会调查毛呢业状况,这时从毛呢工人和小业主的多数集团中涌现出许多代表团给委员会作证,约克郡和西部地区都有,给人深刻印象。所有的证词都集中到对工厂制的厌恶上。委员会报告说:“他们坦率地承认希望保留这项法律(即学徒法),因此这不利于实行工厂制,因此可以阻碍其发展。”相对大雇主违反工作常规、破坏已有的生活方式而言,起毛机所造成的威胁只不过是一项总爆发中的一个因素而已。[111]

[111] 《议会毛呢业委员会》(1806),第 232、239、277、347、355 页,附录 13;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 180—186 页;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 66—67 页。

如果说工人的作证受到1806年委员会冷淡的接待，这还是一种忧郁谨慎的说法。工人及其代理人受到鼓吹自由放任、维护秩序，反对雅各宾主义的人的威胁恐吓。请愿被看做是密谋的证据。剪绒工花钱派往伦敦的证人被当做罪犯受到盘问（有一个剪绒工曾规劝道："只要我知道，我便会说出真相，我以面包担保"），工人从别人那里征集金钱并同西部地区的毛呢工人保持联系，这些都成了滔天大罪。他们被迫说出在工会中共事的干部的姓名，他们的簿本被没收，帐目被查看。议会委员会去掉伪装公正的假面具，把自己变成一个调查审理的法庭。它向议会报告说：

> 本委员会无需指出这一类协会在其终极倾向上，从政治方面看比从商业方面看更叫人担心。……

529

委员会从剪绒工组织那里看到"存在着一个系统而有组织的计划，它既有效又危险，这不仅是因为其力量壮大，也因为这种力量有呼之即出的……便利及机密。……"正是这一点，需要"议会"认真而严肃地加以考虑"。[11]

协会于是转入地下。接着的两年多，议会继续通过中止法案。1808年剪绒工再次请愿，声称"关于使用那种机器的大问题……已提交给这么多届议会，花费都把我们弄垮了。"最后，1809年，毛呢业一切保护性立法全都取消（包括学徒期、起毛机、织机数目等）。通向工厂的大门被打开了，现在可以使用起毛机、剪绒机，也可以雇用没有技术的工人和童工，而凭借宪法手段来作出补救的道路则最终被堵死。如果说剪绒工队伍中曾有过"合法"派和"卢德"派的话，那么卢德派现在占据了上风。早在1805年，皇家兑换保险处就收到一封匿名信：

---

[11] 《议会毛呢业委员会》(1806)，第244页，附录，第17—18页。

诸位董事先生：

根据本郡(即约克郡)呢绒织造工各委员会主席秘密召开的全体会议精神，特奉命要求你们(为你们自己的利益着眼)不要对使用与呢绒编造工有关的机器的工厂承受保险业务。会议已下令再次为我们的权利向议会请愿。如果议会不愿赋予我们权利，不禁止与我们有关的机器，我们就下决心自己去争取，但不希望你们会由此而有任何损失。

谨奉呢绒织造工之命特上[13]

1806和1809年之后，任何使人想到毛呢业帮工可以指望议会立法来保护他们地位的立法都消失了。在实行枢密院令[14]的那些萧条凄惨的年代里，一些大雇主抓紧安装新机器，想依靠廉价劳动力垄断剩下的那一点贸易，卢德运动就几乎以必然的逻辑出现了。对剪绒工来说，内德·卢德[15]是古老权利的捍卫者，是失去的法律的维护人：

530

我们永不放下武器，直至下院通过法律禁止对公众有害的机器，并废除吊死砸机者的法律时为止。但我们，我们不再请愿——这样做无用——必须战斗。

替天行道大将军内德·卢德

收记官签名

永行天道，阿门！[16]

---

[13] 同上书第312页。此信无疑是可信的，但没有证据表明它受权于协会。

[14] 指英国针对拿破仑的大陆封锁而颁布的枢密院令，对法国的盟国实行海上封锁。——译注

[15] 内德·卢德是传闻中第一个砸毁机器之人，究竟有没有这个人始终不得而知，但卢德运动即以此得名。——译注

[16] W.B.克伦普前引书，第230页。

但卢德运动的信号却首先来自针织工，而不是剪绒工。他们的情况很复杂，没有因为像起毛机那样单一的讨厌机器而引起他们的造反，而且就他们来说，合法的策略和卢德式策略似乎并不交替，而更像是同时使用的战术。这里我们首先要阐述的是合法这一条线。

战争中针织工被贫困打倒的过程，和手织工衰落的经过很相像。但织袜机却比多数手织机贵得多。行业控制在袜商手中，生产由织袜工进行，他们在自己家里工作，或是在袜匠师傅的小作坊里工作。有些织袜工[117]自己有织机即织架，但1800年以后则日益归袜商所有，或者归一些独立的投机商，他们在织机上投下多多少少的资本，由此收取租金，正如同房产主所做的差不多，因此，除有关工资减少，工作习惯的一般抱怨外，还加上有关租机的切实抱怨。袜商事实上有两个手段可以降低工资；一是减少工作报酬，二是提高机租，正如在手织业中，最不谨慎的雇主败坏了全行业的情况。

531

1811年，全国大约有29000台织袜机，50000人在该行业工作或与这个行业有关。[118]虽说伦敦这个17世纪的织袜业之乡还保有一小块织袜区；但现在它主要集中在诺丁汉—莱斯特—德比三角地区。如同约克郡的呢业一样，有少数大作坊或“工厂”发展起来。但到这时为止，绝大多数织袜工在工业小村落中只有三四架织机的作坊里劳动。与有技术的剪绒工不同，针织工是外作业，其地位特别容易受剥削，他们也就和手织工一样顾惜往日的好时光。关于18世纪下半叶的情况，人们各有各的说

---

[117] 织袜工和针织工是可互换的词。

[118] 诺丁汉档案馆，第3984 Ⅱ，第 f.29 号的详细说明称该行业有29355名工人，W.费尔金前引书，第239、437页说1812年有29,58。架织袜机、50000针织工。

法，但从1785到1805年，看起来就业率相当高，一天工作12小时每星期可得工资14或15先令。18、19世纪交错时织袜业面临着困难的重新调整。反雅各宾协会阴沉的调子使革命前那种豪华长筒袜的需求下降，虽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由普通袜子需求量增加及逐渐引进了机织花边而得到补偿。织袜工的前景越变越坏，反应也很强烈。正像手织工的情况一样，可发现一些地方官和雇主，他们把工人的不驯服归咎于以前富足所造成的"骄奢淫逸"，"一个星期的前半周工人们就是谈谈政治、赌博或在酒馆里消磨时光，而不是尽工作义务，剩下来的三四天就足以赚到应当付当前花费的钱了"——"下层等级大手大脚腐败堕落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他们几乎全部被腐化了……"。[10]

织袜工的疾苦很复杂，要想全盘了解，就要细心关注织袜业的详细情况。[11] 中部地区不仅织普通袜和花式袜，也织手套、背带、女用长臂手套、网状女衬衫、马裤、领巾及各种其他物品。莱斯特产许多精工制品，在卢德运动时期，不像诺丁汉受的打击大。但所有的不满都针对最不谨慎的袜商为节省劳动力和降低产品价格而采用的种种方法。有些村落中，"实物工资制"极为流行，几乎要掩护真正的工资。工作由复杂的计件法计酬，如织花边，就看花边上丝绒的粗细。工人抱怨说，他们的工资在较粗的活计中给他们的报酬一直太低，而且往往还不肯使用一种叫做"网架"的测量丝绒粗细的工具。织袜工还要从不足额的工资中扣除缝合接口、买针、灯油、领取活计的费用等等。不谨慎的中间人或私商，即所谓的"背袋子袜商"，走村串户地劝那些工作

532

---

⑩ 见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222—226页，达沃尔前引书，第28—34页。

⑪ 最明了的概述见达维尔前引书，第2章及A.坦普尔·帕特森：《激进的莱斯特》第3章。亦见F.A.韦尔斯：《中部地区织袜业史》(1935)。

量不足或是想节省时间、不肯把他们的产品拿到诺丁汉大袜商仓库里去的织袜工接受低于工资率的活计。但最严重的不满是针对"剪裁袜"和"使用生手"的。中等阶级激进报纸《诺丁汉评论》曾写道:"诺丁汉及其附近并没有出现新机器让工人对其施行报复。"

> 机器,或机架……被砸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新发明……,
> 而是因为在机上织出来的东西没有什么用,是骗人的,
> 损坏了行业的信誉,从而孕育出捣毁机器的种子。[120]

剪裁袜子(及其他产品)由织好的大块袜料制成,大块料在宽机上织出,然后裁成所需要的形状,再在接口处缝合起来。[122] 这种产品便宜,而且和传统的织袜机相比,它可以成批生产。但行业内对此极不喜欢的理由很多。工人及许多雇主认为产品太低劣,缝合工序又分开进行。在不懂行的人眼中,它们和正品完全一样,因此可以压低用"手艺人风度"造出来的袜子的价钱——而这正是南美市场崩溃、枢密院令引起的总萧条导致需求下降的时候。此外,剪裁袜低劣的质地还打击了工匠的工作自豪感,并使全行业的产品信誉普遍下降。进而,这些弊端又直接导致"使用生手",也就是雇用非技术工人或过量的学徒。粗制滥造推动了廉价的无技术性劳工的泛滥,针织业降格为一种"不体面的"行业。 533

像剪绒工一样,织袜工在保卫自身地位时,既有合法斗争又有暴力斗争的漫长历史。一个针织工公会从查理二世那里取得特许状,但在 18 世纪,中部地区事实上已突破了它的规定,而公

---

[120] 《诺丁汉评论》,1811 年 12 月 6 日。

[122] 关于反对使用这种宽机,见《莱斯特日报》1811 年 12 月 13 日和《德比信使报》1811 年 12 月 19 日刊登的信。

会也已变得默默无闻了。1778至1779年之间，他们曾下决心争取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提案失败后，骚动和毁机行动就紧跟着而来。1787年，袜商和工人谈定了一份工资表，它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20年之久。从1807年起，工资下降，织袜工再一次使用合法宣传手段。古老的针织工公会复活了，帮工要交纳高达1镑13先令6便士入会费，接着又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一场反对“生手”的试探性官司打赢了，但陪审团判决的1先令赔偿费并不能阻止其他人犯法。工资从1807年的水平下降1/3。1811年，已成为工人们杰出领袖的格雷夫纳·亨森试图用结社法起诉雇主，这是有案可查的很少几次行动中的一次。他提出证据说，有一些雇主联合起来降低工资，而且在诺丁汉报纸上刊载了他们的决议。地方官不肯听他陈述，市政书记官则不肯签发令状。[13]

正如剪绒工的情况一样，针织工感到可以保护他们的一切法令都废弃了，或者不再受重视，而依靠工会活动来维护他们“权利”的尝试，又都属于非法的。尽管在1811年以前有些袜商也希望制止“剪裁法”和“生手”，但阶级分野却一日甚于一日，以534 前曾存在于政治上是激进派的雇主与其帮工间的亲切感，现在消失了。不过很有理由设想，在1811至1812年，某些按习惯支付工资，又不生产“剪裁袜”的雇主是相当同情卢德派宗旨的，即使并不同情卢德派做法也罢。在诺丁汉，和约克郡一样，卢德运动很有针对性。只有工资偏低或生产“剪裁”袜的织机被毁，而织机上的成品被抖乱或货担上的货物被拦截时，“剪裁袜”被毁

---

[13] 哈蒙德夫妇：《城镇工人》，第66页；《技术工人》，第227页；达维尔前引书，第43页，《议会针织工请愿委员会》(1812)；J. D. 钱伯斯：《针织工分会》，载于《经济学》，1929年11月号。

掉,织边良好的袜子却安然无恙。这种区别,清楚地体现在"卢德将军的胜利"这首歌中:

让有罪的人恐惧,但他决不把复仇的利剑
指向诚实者的生命与财产,
他的怒火只焚烧
宽机和支付低工资的机件,
这些捣乱的机器应该处死。
这是全行业一致的意见,
卢德不怕任何人反抗,
他是命令的总执行官。
有人说卢德无法无天,
但他为什么不片刻细想,
正是那可鄙的过重负担,
造成这不幸的局面。
直到那傲慢不再压迫卑贱,
卢德才收起他征服的剑,
让苦难立即得到解除,
和平于是快快实现。
聪明的大人物请出谋划策,
不要再袖手旁观站在一边,
直到古老的工资伴随完善的产品,
再由习惯和法律来树建,
艰苦的斗争于是过去,
行业的光荣又重现,
生手、剪裁和笼络

再不能抢夺工人的饭碗。[124]

事实上，针织工甚至为捣毁机器寻找了法律依据。在查理二世的特许状中有一个条款授权针织工公会指派代表检验产品，可以把制作低劣或弄虚作假的产品剪成碎片。卢德派就把这种权力视为权利。针对地方官反对卢德活动的公告，他们发表了一个反宣言，使用“鉴于”、“无论何时”等公文套话，声称他们有意也有权“销毁织造下列赝品的任何种类的织机，及不按迄今为止雇主及雇工双方同意的正常比率支付工资的任何织机”。宣言下面附着一张犯忌的机型及开业活动的一览表。[125]

诺丁汉卢德运动主要在1811年3月至1812年2月间，在此期间又有两次高潮，即3至4月和11至次年1月，当时毁机活动蔓延至莱斯特郡和德比郡。整个运动过程砸毁织袜机约1000台，价值大概在6000镑至10000镑之间，无数的成品被销毁。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些事件，但在诺丁汉，卢德行动和合法抗议很有趣地相互交替。而且可能两种活动都受同一工会组织的指导——至少到1814年都是这样。在这个组织里，卢德派和宪政派（可能由格雷夫纳·亨森领导）也许意见不同。在议会把毁机活动定为死罪的法案通过后，卢德运动的主阶段结束，“内德·卢德”的《宣言》将此法案斥为“无效”，因为它是用“最骗人的欺诈，偏私和到处拉票的方法”通过的。但1812年2月法案的通过使针织工极为震惊。他们立即组织起半合法的“针织工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文件（1814年被缴）有许多至今仍保留着。

---

[124] 抄件，见内政部档案，第42.119号（调寄“穷杰克”）。

[125] 《科南特和贝克致内政部信》，内政部档案，第42.119号，达沃尔前引书，第170页将其部分重制。

诺丁汉委员会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与伦敦、莱斯特、德比，甚至都柏林、杜克斯伯里和格拉斯哥建立通信联系，试图推迟通过这讨厌的法（并没有成功），以使议会能听到他们的陈述。他们收到的回信显示要形成合法组织是多么困难。莱斯特的来信（1812年2月20日）说：

大家认为应该使我们受到法律宽宏的保护，应在本选邑诸位地方官的同意下……召开一次行业集会……。

德比来信（1812年3月3日）说："本腐败选邑的地方官不容忍我们开一次行业会议"。在伦敦只有100名左右的织袜工仍在开工，哈顿莱园的地方官就比较帮忙，但（据1812年3月4日来信）"两个警官出席会议，以使地方官对我们议事的合法性感到满意"。杜克斯伯里也有人写回信（3月2日）说地方官阻止了一次集会，信件也被拆开了。托马斯·卡瑟姆，他和亨森一起（主持通信）给"吐克斯伯里"市长写了一封辛辣的信： 536

先生，你可知道，那一般称为"禁言法"的法令，早已因它的自然死亡而死亡？

应当知道人民"是会被迫犯罪的，当他们不能行使权利时，就会进行复仇"。但尽管有种种困难，上述这些中心还是都建立了织袜工委员会，而且和设菲尔德、阿什菲尔德的萨顿、贝尔珀、希纳、卡斯尔、唐宁顿、戈达尔明等地保持了通信联系。[120]

诺丁汉委员会的目标是促成一项提案，使织袜工得到议会的救助。有几个委员会提出为拟订一项关于最低工资而请愿，诺丁汉委员会反对这些建议：

众所周知，政府不会插手一定量的劳动应该拿到一定量的工资，因为事情本身会归结到讨厌的一点即确定

---

[120] 诺丁汉档案馆及《记录》第8卷，第139页。

一个商品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但商品上下浮动，就好像我国的繁荣和衰退来回波动一样……政府的确在很久很久以前插手调节过工资，但亚当·斯密博士的书把上流社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改变了。所以，想靠议会的影响增加工资，就如同想调节风向一样荒唐。

显然，亨森和他的同伴已测算过会遇到多大程度的对抗。若想取得工人所要求的工资增长（诺丁汉委员会争辩说），就必须制定更详尽的立法，来防止间接削减工资：

537 本委员会认为……本城及邻近地区最近发生的暴力行为有其根源，因缺乏议会调节，袜商给工人造成了五花八门的负担。

所以他们想起草一个提案，其中包括一些详细的条款：(1)用“插杆”即织袜机里的钢丝数来规定袜子的规格；(2)给一切袜子强制打标记，以区别质地好坏；(3)强制使用网架，以便能估计机制花边的报酬；(4)禁止仿制滥造优质产品；(5)强制每个作坊公布工资表；(6)授权治安法官调整租机费。

最后，他们草拟了一项提案，以阻止编织制造业中的欺诈陋习，其中有以上条款中的几条，还包括禁止用“实物”支付工资。1812 年 3 月，他们忙于送募捐单和支持提案的请愿书，到 4 月底，在针织工中征集到一万多签名（“注意：本行业一切男子都可签名但女子不可”）。其中：

诺丁汉市 2629
诺丁汉郡 2078
莱斯特市 1100
莱斯特郡 2057
德比市 239
德比郡 1809

杜克斯伯里 281

戈达尔明 114

伦敦 92

募捐单表明在织袜工队伍以外也受到广泛支持——酒馆老板、杂货商、面包师、屠夫、磨坊主、农场主、印刷工、某些织袜业雇主,还有许多工匠都解囊相助。还有人向健康俱乐部呼吁捐款。6月,当提案送交议会时,一个士兵写信表示愿在大亚茅斯民兵团里征集募款,而诺丁汉委员会则感谢"拜伦勋爵的慷慨捐赠"。

4月下旬至7月末,亨森、拉奇、莱瑟姆及其他代表经常在伦敦,密切注视提案的进展。他们发回的报告对伦敦很不恭维。因为他们不仅发现有技术的工会人士目中无人,而且发现工会给他们的经费补助极度紧张。4月22日他们报告说在小伙子巷"双颈天鹅"旅馆住了第一夜: 538

> 晚饭冷牛肉加上住宿,堂倌和女佣人,他们想弄走我们25先令,这使小托米(即拉奇)搔着头大叫起来:"伦登(敦)真见鬼!!!"

(5月亨森已回到诺丁汉,他写信问他的同事:"伦敦的气氛是不是好一点了。"办事开销很大,基金大部分用在提出法案和议会活动上了,但代表们也需要路费和其他开销(亨森在6月中旬匆匆访问都柏林),他们的妻子得到一些津贴(每星期14先令),也给全部时间花在募捐上的委员会委员一笔津贴(每天3先令)。织袜工本身的反响也不同,莱斯特地区毛织袜业不像诺丁汉地区棉织袜业受影响大,因此热情也小,拉奇在4月写道:"城里只有五六个好汉,他们主要是绿林英雄"。[⑰] 5月份一个委员失望地写道:在诺丁汉郡织普通袜(使用两根针)的村落里缺少支持,

---

⑰ 即卢德派。

这个行业的人怀疑提案主要对织花边和丝袜的人有利:"我已经出来两天了,但弄不到一分钱,他们滑机(稽)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个放牛的。"几个月过去后,人们开始问花在维持伦敦代表团及他们在家的妻子身上的钱(这种嫉妒心理在每一个早期工会那里都无可避免地存在)。并且,正当织袜工委员会在奋力压制砸毁机器的活动,因为它可能损害自己在议会的努力时,诺丁汉的情形却激动起来,3月份,当地有7个卢德派被判处7年或14年流放。委员会即使没有把卢德派领袖吸收在自己的行列中,它至少也肯定知道谁在指挥上一年的活动。4月,中部地区动荡局势中惟一一次暗杀企图发生了——一个叫威廉·特伦特姆的袜商在家门口被打伤。在此之前,曾有一封来自"上尉"的匿名信,指责特伦特姆给女工的工资不足:

539

> 你应该知道先生,这些不幸的女孩很容易因太穷受惑而变成妓女,上尉指示我宣布这些人没有防卫能力,故此他认为她们更直接地处于他的保护下,因为他相信她们的工资在全英格兰最低。

莱斯特地方委员会的书记失望地给伦敦代表团写信说:我听说诺丁汉的袜商特伦特姆先生星期一晚上在自家门口被枪击,有消息说上星期六他裁减工人工资,每双袜减掉两便士,还叫他们去告诉内德·卢德。我不知道这事的真实程度如何,但现在这种时候肯定不能用奇耻大辱来激怒公众。事情在伦敦的发展有一点悲怆的味道,织袜工代表——特别是亨森——在审理提案的议会委员会前深刻感人地描述了工人的情况。[18] 代表们也拼命进行院外活动,把劣质产品的样品和漏织脱线的残缺品拿给议

[18] 见《议会针织工请愿委员会》(1812),尤见第38—46页。工人的证人中有一个是约翰·布莱克纳,诺丁汉历史的编写者,从1780年起他自己就是针织工。

员们看，将最好的成品分送给有影响的人（从织袜工委员会的基金中开支），还送给摄政王几双袜、一块丝巾、一个丝夹子和几块手帕。西德默思和蔼地接见了代表团，为他女儿定做了几双袜子和一块头巾，代表们看起来是要成功了。在提案三读前夕，亨森带着胜利的口气写信给诺丁汉说（1812 年 6 月 30 日）：

> 我们有理由（认为）摄政王也是赞成的。我们只需要和亚当·斯密博士的信徒去拼斗了，他们的原则在全国到处受诅咒。

两天后他写信时就丧气了。休谟反对提案，随后下院就休会，"在场的不满 40 个议员，我们的事提交讨论时他们就像失了火一样往外跑"。几个月的请愿、募捐、牺牲和成立合法组织的尝试就此结束。在小组委员会上，下院接纳了最后一分钟送到的莱斯特及诺丁汉袜商的陈言请愿，因而决定划掉提案中与织袜业有关的一切条款，只留下与花边及实物工资制有关的无力条文。亨森把这个消息写在一封信里送回诺丁汉，附加了下面几句愤怒的话： 540

> 又及：现在他们可以心满意足地裁减工人，做裁剪袜、收买、用单股棉线、偷、窃、扒、拿和压迫别人了。

由于希望某些条款能重新加上，代表团就拜访了激进派领袖：

> 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告诉我们，议会从来不介入雇主和工人的争端。……弗朗西斯爵士并没有参加投票支持我们，相反他离开议会……倒是下院中政府方面的人在鼓吹我们改提案。

被阉割的提案确实通过了三读，虽说在 7 月 21 日，休谟又作了一次反对提案的长篇演讲："大臣们支持提案，它通过时下院只有 12 个人，所有的爱国者都照例走开了"。但很难理解"政府方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因为 3 天以后，提案被上院否决了。最强

烈反对提案的(没有人支持它)是西德默思的发言:他“对天起誓,再不能让这种原则在任何提案中带进下院”。[129]

针织工组织的历史并不到此为止,简言之,提案失败后委员会采取措施加强工会。他们调查了“木匠、裁缝、鞋匠、刀具匠是如何管理工会的”,起草了一个新章程(也许由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建议),工会取名为“争取议会救助、鼓励机匠改进机械的协会”。[130] 如此它实际上存在了大约两年,发放养老金、失业救济、罢工补助。工会不成功地雇用了一些会员直接进行生产,这些活动足以有效地阻止卢德运动的一次复发。然而,1814 年毁机的行动再次爆发,一种说法认为这有违亨森和“合法派的愿望,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是加强工会的补充手段,卢德派小股队伍实际上接受了工会的基金援助。诺丁汉一个大织袜商铺子里发生罢工,导致袜商和市政团一个“秘密委员会”采取行动,而市政团早就使用密探刺探工会活动。工会两名领导人被捕入狱,工会的文件也被没收。砸机活动一直到 1817 年都时有发生;但同时也很清楚,就在这相同的年份里,工会也一直活跃在地下,秘密活动一年一年地让位给群众有组织的公开示威,让位给公开的谈判。[131]

541

[129] 诺丁汉档案馆,第 3984 号 I、II 卷各处;《记录》,第 8 卷,第 139—162 页,哈蒙夫妇前引书,第 229、270 页。

[130] 《章程总则》(诺丁汉,1813),复本见诺丁汉档案馆第 3981 号,第 2 卷,第 126 页。

[131] 见哈蒙德前引书,第 229—254 页,W. 费尔金前引书,第 238 页;A. 坦普尔·帕特森前引书,第 6 和 7 章;达维尔前引书第 139—150、155—159 页;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 169—183、230、234—242、320—328 页。亨森曾短期地受工会专职雇用。1816 年他成功地进行两次诉讼,反对袜商破坏实物工资法。1817 年他在伦敦被捕,当时他正在为被判死刑的卢德派请愿赦免,并在人身保护法中止期间没有罪名地被监禁了 18 个月,见后文,第 671 页。

这些历史大体上属于卢德运动的余波。但调整针织业的提案流产的过程，却使卢德运动时期工会的困境变得明显起来。虽说我们手头没有文件可以使我们弄清楚手织工和剪绒工领袖的想法，但1800至1812年间，他们一定在花费巨大又一无成果地向议会求助时，遭遇了同样的经历。前面我们略为详细地追述了兰开郡棉织工的历史。但必须注意：兰开郡的卢德运动产生过家长式管理和自由放任之间的冲突，这恰如织袜业和呢绒业中的情形一样。迟至1800和1803年，手织工在进行了激烈的鼓动后至少还在"棉业仲裁法"中得到了正式的保护手段。他们和格拉斯哥的棉织工已有通信来往。而且(在博尔顿的弗莱彻中校看来)，他们的鼓动"源出于雅各宾会社，目的是用来使手工织工的心境始终动荡……"。[12] 但仲裁法的胜利却是一个幻像。地方官获得居中调停和强制实行最低工资的权力，

> 他们在财产和地位上与雇主更接近，而且与之应酬往来、彼此更熟悉，所以遇事便马虎处置。[13]

1807至1808年，争取最低工资法的宣传活动进入第一个紧要 542 时期，有许多请愿、示威和罢工活动，结果是汉森中校被捕入狱。[14] 有一个苏格兰人证明说他曾在组织中发挥过战斗作用，他记得很清楚，1809至1812年曾有过一个全国性织工工会，中心在格拉斯哥，苏格兰、兰开郡、卡莱尔和北爱尔兰都是坚强堡垒。[15] 1811年，手工织工重新动员争取最低工资法，曼彻斯特的

---

⑫ 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67页，(仲裁法)见第62—69、72页以始。

⑬ "一个同情被压迫者的的人"：《乞丐的抱怨——反对收取高额地租的地主、贩卖粮食的中间商、大农场主、垄断商人、印发纸币者及战争……》(设菲尔德，1812)，第100页以始。

⑭ 见前文，第278页。

⑮ A.B.里奇蒙前引书，第24—28页。

4 万名织工，苏格兰的 3 万名织工和博尔顿的 7000 名织工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保护并反对肆无忌惮的雇主：1812 年，手工织工委员会似乎出现了分歧，兰开郡人不再指望能受到保护，于是转向卢德运动；格拉斯哥和卡莱尔人则到法庭上去打漫长而花钱的官司，提出调节工资和学徒制的问题。格拉斯哥人甚至还打赢了官司，但这是在提交高一等法院并花费巨大开销之后才取得的。但是制造商立刻就拒付地方官在州法院商定的最低工资，结果（在 1812 年 11 和 12 月）从阿伯丁到卡莱尔发生一次纪律严明又大受支持的大罢工。工人们（据里奇蒙说）决心靠“同时并举的道义努力”来取得法律所赋予的工资，并决心为“其阶层力争立足于社会的最后基地”。格拉斯哥领导人（“极其冷静又极有能力的人”）曾在每一点上都费尽心机地请教律师，努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事，这时却因此而被捕，判刑 4 至 18 个月不等。两年后，伊丽莎白第 5 年第 4 号法令中的学徒条款被废除，一份新的请愿书（这次是来自兰开郡手工织工）宣称：“废除上述法律的提案使请愿者的心冰凉透彻，无可名状，他们不再存有任何希望……。”[16]

格拉斯哥手工织工领袖的遭遇最冷酷地表明了这时工会的困境，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把我们的分歧收拢来，找出促成卢德运动的原因。退回到经济主义这种毫不说明问题的理论上去当然很容易，它把卢德运动简单地归咎于枢密院令及其后果。的确，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及枢密院的报复性禁令瓦解了英国纺织业销售市场，兰开郡、约克郡及中部地区的工业因此而停滞

[16] 同上书，第 29—40 页及里奇蒙的证词，载于《关于工匠和机器的……第二个报告》(1824)，第 59 页以始；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 85—88 页；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 137—150 页，尤见《J. J. 狄龙致西德默思信》，第 143 页以始。

不前，战争和接连不断的歉收又把粮食价格抬高到"缺货"的高价水平。但用这些来解释卢德运动是不行的，它也许有助于解释卢德运动的时机，却解释不了卢德运动的特点。1811 和 1812 这两个荒年在已有的痛苦上又加上持续的饥饿这个最严重的痛苦，从而使最不道德的雇主所采用的节约劳动力、降低劳动力价值的每一种方法(如动力织机、平绒机、剪裁袜等等)变得更加使人反感。但卢德运动并不是盲目的反抗，也不是抢粮风潮(像其他许多地区发生的那样)。也不能把卢德运动描述成"原始"的工会运动。因为正如我们所知，组织和掩盖了卢德运动及为其辩护的人远不原始。他们机灵而诙谐，其中有一些仅次于伦敦的工匠，是"勤劳阶级"中最有代表性的人。少数人读过亚当·斯密的书，更多的人对工会法有研究。剪绒工、织袜工和手织工有能力管理复杂的组织，承办其财政、通信事务，把代表远派到爱尔兰，或与西部各郡保持正常的联系。所有这些人都通过他们的代理人与议会有所交往，而诺丁汉经过学徒阶段的织袜工还是市民和选民。

应当这样来看待卢德运动：它起于家长式立法消失的关头，起于把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学强加给工人、而不顾其愿望和心意的时刻。这是从 14 和 15 世纪就开始的历史的最后一章，而这部历史的主要部分则见载于托尼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诚然，这种家长式立法的多数就其本意来说不仅是限制性的，而且对工人还是惩罚性的。然而，在这各法统中有一个一切人共有的仁慈国家的虚幻影子，它对肆无忌惮的制造商和不仁不义的雇主们不仅有司法的，而且有道德的制约，帮工们在其中总还算是国家的一个"等级"，而不管其地位如何低下，至少从理论上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可以请治安法官仲裁或保护，即使事实教育工人只能期待含混的答复；人们却仍根据这种理论来 544

对待地方官。工业的作用是为受雇于其中的人提供生计，而明显地损害“行业”利益的实践和发明，则必须不加宽恕。帮工为其手艺而自豪，不仅因为它增加了工人在劳动市场上的价值，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手艺人。

这种理想也许从来就只是理想，而到18世纪末，也许就更加陈旧。然而在人们想象的理想世界中，它却始终是强有力的现实，工匠、帮工和许多小业主尤能与之产生共鸣。不仅如此，这理想还存在于传统制造业、社会团体的许可与习惯中。每当帮工们欢天喜地、隆重盛大地举行鞋匠的圣克里斯平节聚餐[18]、普雷斯顿市的“行会”联欢或梳毛工的布莱斯主教聚会时，他们就大力赞美这种理想。早期半合法的工会组织在他们华丽的证件和会员卡上印着这种传统的标志，如平绒工有徽记，顶上是两把交叉的大剪刀，夹在正义和自由两女神之间；鞋匠则写上他们的口号：“让克里斯平子孙的产品踩在全体世人的脚之下”，所有工会又都有他们的宣言和声明，最后签着“受行业之命”。正如常发生的那样，当传统越接近尾声时，它就越充满缅怀的曦光。

此外，人们有时会忘记家长式立法消失得多么快。重要的“斯皮特菲尔兹法”迟至1773年才制定，经过某些修改而持续生效了50年，丝织工据此取得合法的最低工资——而这是其他织工和袜工所想要而徒劳无获的东西。[19] 棉织业的“仲裁法”（1800至1803年）虽无效却至少维持了“保护”这个概念。这以后，在10年之中，所有家长式的法典几乎全都扫涤一净。1803至1808年间涉及毛织业的规定全都暂停，1809年则根本废除。

---

[18] 圣克里斯平是传说中的鞋匠保护神。——译注

[19] 《斯皮特菲尔兹法》实施的情况见M.D.乔治：《18世纪的伦敦生活》，第4章；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209页以始；J.H.克拉潘：《斯皮特菲尔兹法》，载于《经济学杂志》，1916年12月。

1813年伊丽莎白第5年第4号法令有关学徒的条款被废除。1814年,则轮到授权地方官实行最低工资的条款(而未完成工作就离职即算犯罪的条款却保留下来了)。1814年刀具业中学徒资格的限制被"设菲尔德刀具工法"废置了。就在这10年,工人可以因为直接的工会活动而受到结社法的惩罚,于是日益求助于法庭,企图加强行将消失的立法。由此,才会有毛呢工针对起毛机和学徒制的诉讼,有织袜工针对"生手"和"实物工资"的诉讼,有棉织工针对学徒制实施最低工资的诉讼,以及1809至1813年伦敦各业造车工、制锁工、机器制造工等等就类似问题而进行的十多场官司。[139] 其中大多数案子都不成功,少数几个成功了,却耗尽工会的基金,造成哭笑不得的损失。最后,习惯或法律对开放市场上物价的最后一点控制也逐渐消散了,而恢复习惯法中关于囤积居奇的规定又遭到失败。

我们应该想像亨森和拉奇在耗费巨资出席议会时,其痛苦的经历扩大了100倍。工人很清楚出了什么事。他们前有狼后有虎,一方面他们面对现存秩序之狼,并非所有的乡村地方官都教条地支持自由放任,就连郡守们也未必如此。有时,他们会因调停对帮工不利而真正感到不安,甚至很不喜欢大雇主的做法。但是当工人的不满清楚有效地表达时,这正是他们威胁到秩序与价值的时候,老派的绅士有可能会同情一个饿得快死的织袜工以消极的原告的身份站在他们前,但他决不同情秘密委员会、街头示威、罢工或破坏财产。

但另一方面,工人们又面对雇主这条虎,他每天都从自由放任的信徒中吸取新的力量。1815年的谷物法将表明贵族乡绅离真正支持这种学说还相差多远。但战争期间,出于纯粹的反 546

[139] 见T.K.德里:《学徒条款的废除》,前引书,第71—72页。

革命机会主义，政府发现接受“自由竞争”的说法很方便，只要这论点只妨碍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妨碍土地的利益。事实上，1813 年西德默思提出废除工资仲裁时，他很少想到这事还值得争论：

> 如诸爵爷这般敏睿之人，是无须花心思来弄清事情在此种状况下对雇主和雇工会多么有害，而又特别对后者有害的。因此，爵爷们一定会深信，废除这类有害的法令自是合乎时宜。[10]

若说剪绒工和织袜工代表在大臣那里受到了挫折，那么他们也没有在休谟甚至伯德特这样的激进派那里得到安慰。反对他们的一面是有关秩序的价值观念，一大群心慌意乱的议员在这二者间选择最简单的出路，“我们的事提交讨论时他们就像失了火一样往外跑”，而其中某些议员，有可能对造成的不公正带有某种负疚感。

拜伦在上院作反对把砸毁机器定为死罪的著名演说时，并没有夸张其辞：“当一个解放或救助的法案提出时，你们犹豫不决，想过来想过去地盘算多年，你们拖延处置，收买人心，但死刑令却必须马上通过，而毫不顾及其后果。”工人们感到把他们和社会其他部分联系在相互的权利和义务中的纽带，无论其如何理想化，都一根接一根地中断了，他们被抛在宪法大门之外。而对疾苦最有切肤之感的是手织工和织袜工这批人，他们感到其547 工匠的身份受到损害。1811 年“德比普通丝袜工”向袜商们呼吁说：

> 我们是心灵手巧，使用昂贵原料的工匠，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认为应当在社会上有更高的地位，在工资

[10] 见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 87 页。

上应该和第一流的机匠平齐……因为有结社法作梗，我们不能以整体的名义对你们说话，不能要求增加工资，但我们能够说，正义要求我们为额外的劳动取得报酬。[140]

1811年，兰开郡一个手织工委员会宣布："鉴于立法机构已干预过较不重要的事务——颁布过调节谷价的法律，规定面包价格的法律，……增加法官和教士薪水的法律等等……本委员会完全不知道在如此必要的情况下进行立法干预有何不妥之处"：

假如你们有7万张选票，去选举出席议会的议员，还会有人对你们的请求漠不关心，乃至不闻不问吗？我们相信不会。[141]

所以，卢德运动首先应放在这种背景中考察。帮工和工匠觉得自己被剥夺了宪法权利，而对此他们深信不疑。内德·卢德是"替天行道的人"，是"大执行官"，他（"经行业一致同意"）保卫着"习惯及法律"为工人确立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如此深刻，决不是一小帮雇主甚至议会所能不顾的：

不要再吟唱罗宾汉，
也别把他的业绩赞叹，
我如今要歌颂卢德将军的成就，
他现在威震诺丁汉。……[142]

其次，我们却不能夸大织袜工和剪绒工所被迫陷入的孤立状况。在整个卢德派"暴乱"期间，中部地区和约克郡西区的公众舆论

[140] 《诺丁汉评论》，1811年12月20日。

[141] 内政部档案，第42.117号。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84—85页对这份重要文件有较多的摘引。

[142] 《卢德将军的胜利》，内政部档案，第42.119号。

一直支持砸机器的人。大雇主及整个工厂制度在成千上万的小雇主中挑起深刻的对立情绪。1795年，约克西区的毛呢业小雇主积极活动，争取人们支持一个提案，“以恢复并保持过去经营呢绒业的一整套制度……”。

> 直到最近，这个制度还是由居住在不同村落里的人织出毛呢，然后在利兹的公共会所卖给商人，商人并不从事呢绒料生产。
>
> 近来有一些商人成了毛呢生产商，他们为更好地进行生产而建造起很大的楼房，称之为工厂，打算在里面雇毛呢匠为佣工，像前面提到的那种分散的工人及其家庭，现在就在这些厂房内或其附近集结起来，处处仰人鼻息。

提案（意在阻止商人制造商在公共会所买进呢料以补足定货）“目的是维持本行业制度，产生更多的独立、昌盛及良好品行，因此也就比国内其他任何工业部门都导致更大的幸福。”[14]

服从主人命令、遵守主人纪律的“佣工”，即工资雇佣者，与能够随心所欲地“来来往往”的工匠之间的地位之差，真是大到可以让工人为之流血，而不愿让自己被别人推着从一边走向另一边。况且从集体的价值观念看，抵抗身份降低的人做得对。1797年布雷德福建立第一座动力纺织厂而招来的是几群人的威胁呵斥。约克西区的“小生产者”在阿克莱特那多烟囱、来自彭奈恩山另一边的创造物上，看见了他们自己家庭工业的死亡证书。在1802至1806年间支持“协会”或“呢绒商公会”的小雇主，在背后有道德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支持。

人们很容易忘记新出现的棉纺厂名声有多坏。它是剥削的

---

⑭ 《酝酿中的提案要点……》手稿，哈里法克斯资料馆。

中心，是囚禁儿童的可怕监狱，是伤风败俗和劳资对抗的中心；[138]尤其把勤劳的工匠贬低到“仰人鼻息的地位”。社会上一种生活方式濒临死亡。因此，我们决不可把剪绒工反对某种特定机器的斗争，仅仅看做是某个特定的技术工人集团在维护其自身的生计。这些机器象征着工厂制的侵犯。有些毛呢商道德上的先人之见如此强烈，以致我们知道在有些场合下，他们故意压制节省劳动力的发明，而理查德·奥斯特勒的父亲在1800年宁愿卖掉一家兴旺的铺子，也不肯使用他认为是“富人压迫的工具、穷人苦难没落的手段”的机器。[139] 这种情绪弥漫于毛呢商、整饰业雇主、工匠及各式普通工人甚至某些专业人员之间，正是它支持并保护了卢德派。格雷将军1812年在约克郡西区统帅当地驻军时曾沮丧地谈到：

549

> 上当受骗而怀有恶意的老百姓现在把气出在起毛机和剪绒机上面，居民中较体面的那部分居然也在这个问题上和他们一致，并且还波及该部门中拥有别种类型工场的人……[140]

这种情绪在中部地区也有，那里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机器改革引起争议。织袜业主、商贩、工匠乃至某些袜商完全站在针织工一边，尤其是1812年针织工请求议会帮工时最明显。规定破坏机器为死罪的法案就连有些袜商也看不起，而据说这个法案

---

[138] 试比较当时还是托利党的科贝特1803年7月23日在《政治纪事报》上所说：“星期天，孩子们从那据说叫做工厂的可怕监狱里……放出来，才可以伸展一下他们那发育不全的肢体……”；自由派的《利兹信使报》也说（1802年3月6日）：“本城及其他城市中的工厂是各种乌七八糟事情的温床，……这样说的真实性无可置疑。”

[139] 德赖弗前引书，第17—18页。

[140] 达维尔前引书，第62页

是维护他们利益的。如此看来，过去把这几年中的卢德运动看成是盲目地仅对机器，这种说法就越来越说不通了。人们争执的是资本家有没有破坏行业习俗的“自由”，而不管他用什么方法——是新机器、工厂制，还是靠无约束的竞争、降低工资、低价出售打倒对手和降低工艺水平等等。我们对下面这种观点已经太习惯了，即各行业在19世纪初从“限制”措施中解脱出来，既无可避免又很“进步”，以致要有很强的想象才能理解：那些用以上这些手法积聚财富的“自由”工厂主、大袜商和棉纺织业制造商在当时不仅受到嫉妒，而且被看成是进行缺德和非法活动的人，下等人并不把“自由放任”看做自由，而只是“肮脏的欺骗”。他们看不出有什么“自由规律”，靠此某个人或某些人可以从事明显伤害别人的活动。

550 一封致“敬爱的兄弟爱德华·卢德总指挥”的“非常公告”，就表达了“行业”的道德经济学的所有观念：

> 鉴于我们——北方各郡为解除职工苦难而召开的全体鼓动员大会得知，查尔斯·莱西，诺丁汉市人，英国花边制造商，犯有弄虚作假及压迫行为罪——用单股绒编织冒牌的棉绣花边……从而使我们700名亲爱的弟兄陷于贫困和苦难之中，他自己却赚到15000镑巨款，由此毁灭了棉织花边业，毁灭了我们可敬可爱的弟兄，而其养家活口舒适的生活完全指望花边生产继续进行。
>
> 据信该查尔斯·莱西完全为邪恶动机所驱使。本公告……宣布没收该15000英镑，并据此……命令查尔斯·莱西交出该款，在1807年从事棉绣花边生产的

全体工人中平分……[16]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把卢德运动看做是反对无限制工业资本主义情绪的狂烈喷发，它追溯已废弃的家长制法典，又得到工人整体的传统支持。不过在这一点上，如果用"反动"这个词来形容就太轻率了。因为尽管对卢德派有那么多的说教（当时及后来），说新机器和"自由"企业会有什么好处——这些论点卢德派无论如何是有智慧去自己权衡的——但仍然是砸毁机器的人而不是写小册子的人最能够现实地估计其短期后果的。剪绒工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一种手艺轻易地消失会是什么样：

> 1806—1817年约克郡的剪绒工厂据说从5家增加到72家，机器剪子从100把增加到1462把，3378个平绒工中至少1170人没有工作，而1445人只是半工作。[18]

他们的工作由非技术工人和童工顶替了，据1841年一个记载：

> 1814年利兹有1733名剪绒工，全都充分就业，而现在，自机器引进以来，呢料全都……由相对少的人来整饰，主要是男孩，工资每星期5先令至8先令……少数成人10先令至14先令。以前的剪绒工现在是能找到什么就干什么，有的给人看田地，有的挑水度日，有的当清道夫、卖桔子、卖糕点、卖丝带花边、生姜饼、皮鞋油、等等等等。[19]

551

一种体面的手艺竟落得如此下场。织袜工和棉织工后来的

---

[16] 该公告用细铜版印制，发表时间为1811年11月，并授权爱德华·卢德在命令未被遵从的情况下"执行死刑"，执行者分享50英镑，见J.拉塞尔：《卢德派》，载于《索罗顿学会会刊》，第10卷，1906年，第53—62页。

[18] E.利普森：《呢绒呢织业史》(1921)，第191页。

[19] W.多德：《工厂制图解》，第15页。

历史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那种"进步"的观点，打破了习俗限制措施有什么好处。我们已详细考虑过纺织工的生计如何被破坏，但假如工业革命中还有什么比手织工的遭遇更凄惨的话，那就是织袜工的遭遇。据费尔金说，到 1819 年他们许多人每天劳动 16 至 18 小时，每星期工资却下降为 4 至 7 先令，只有移民好望角才是惟一的出路。19 世纪 20 年代初情况有所好转，当时引进机织花边（即螺旋网或筒子网"热"给行业注入新的生命，但接下来又是持续的衰落。1840 年一个织袜工对托马斯·库珀说："我们间或会有一点兴隆，但很快又回到饥饿中去。"（4 先令 6 便士被说成是有工作做时的"平均"工资。）他们一方面要付机租，另一方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剥削——如削减工资（"扣工资"也就是罚款、实物工资等等），在这两面夹攻下，"可怜的针织工被耗干了，直至你在离莱斯特一百里的地方碰见一个人，都能凭他特有的悲怆和心灰意懒的气质认出他来，而这还仅仅是受"自由竞争"的影响，还没有引进任何机器，不涉及蒸汽或水力在其中。[150]

即使我们把产品便宜这一条算上，也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把随后二三十年在该业做工的工人地位下降的过程称为"进步"。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把卢德运动看做是过渡时期的对抗。一方面，它缅怀不可再现的老习惯和家长制立法；另一方面，它552 又企图复活旧的权利以便开创新的先例。在不同时期，他们的要求包括实行法定最低工资，控制女工童工的"血汗劳动"，仲裁调停，雇主负责为受机器排斥的技术工人寻找工作，禁止偷工减

---

[150] 费尔金前引书，第 441 页以始；T. 库珀：《生平》，第 137—142 页。亦见 J. F.C. 哈里森：《莱斯特的宪章运动》，载于 A. 布里格斯主编：《宪章运动研究》，第 121—129 页。

料，给予公开组织工会的权利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既向前看，也向后看，其中含有的模糊影子与其说像家长专制主义，不如说更像民主社会。这个社会中工业的发展应根据伦理的优先地位来调节，而利润的追求应服从人类的需要。

这样我们应当把1811至1813这几年视为分水岭，它的水一股流回都铎时期，另一股则向前流，流向以后一百年的工厂立法。卢德派有几分像最后一批行会分子，但同时又有几分像最早进行鼓动而导致十小时工作日运动的人。在两个方向上都有替代"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学及道德标准，在工业革命那关键的几十年中，劳动人民完全被遗弃在历史上最有辱于人类的一种教条——不负责任又毫无节制的竞争理论的摧残下，外加工或干活的几代人就死在这个摧残中。在十小时工作日法(1847)里，正是马克思看出了证据表明"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中等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服从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159] 袭击卡特赖特在罗福尔兹开的工厂的人宣布了这替代的政治经济学，虽说那时是在夜半的一场混乱的遭遇战中宣布的。

5. 绿林好汉

在一般人心中，卢德运动是没有文化的手工工人粗鲁而自发的行为，盲目地反抗使用机器。但破坏机器的历史却长远得多。毁坏原料、织机、打谷机，淹没矿井或破坏井口辘轳，抢劫不得人心的雇主的财产或烧毁他们的房屋，这些以及其他形式的直接暴力行动，都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大量使用，而捣蛋做法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还在设菲尔德刀具业某些部门中流行。这些方法有时是针对人们感到讨厌的那些机器，但更多情 553

[159] 卡尔·马克思：《选集》(1942)，第2卷，第439页。

况下是用来维护习惯、恐吓工贼和“非法”工人及雇主，或作为(时常很有效)罢工及其他“工会”活动的辅助手段。[63]

虽然和这些传统有关，卢德运动却必须和它们区别开，首先是因为它高度的组织性，其次是它蓬勃发展的政治背景。这些区别可以用一个简单特点来总结：尽管工业中的特殊疾苦是它的原因，卢德运动却是个半造反运动，它一直摆动在未来的革命目标的边缘上。这并不是说它已是完全自觉的革命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又确有成为这种运动的倾向，而正是这个倾向最常被人们所讳言。

兰开郡卢德运动表现得政治性最强，同时自发性和混乱状况也最突出。诺丁汉郡的卢德运动最有组织纪律性，同时又最严格地局限在产业目标上。约克郡的卢德运动则从产业目标转向进一步的目标。在具体分析这些区别之前，我们应简短地叙述一下。

主要的骚动在1811年3月从诺丁汉开始。织袜工举行一次大示威，“吵吵嚷嚷地要求工作和比较公平的售价”，结果被军队驱散。当晚，阿诺德这个大村子里有80架织袜机被砸毁，参加暴动人的没有预先化妆，他们受到群众欢呼。以后几个星期，动乱在诺丁汉郡西北的织袜业村庄里一直延续，而且主要在夜里。尽管临时巡捕和军队在村子里巡逻，他们却抓不到任何人。

虽说大约在30年时间里砸毁袜机的活动到这时开展得最广泛，但三四月份它最早爆发时，却并未引起轰动。这种那种的

554 动乱在工业区司空见惯，因此很少引人注目。但1811年11月

[63] 见E.J.霍布斯鲍姆：《砸机器的人》，载于《过去与现在》，第1卷，1952年2月，第57页以始。虽然霍布斯鲍姆博士的文章出色地考察了砸毁机器这个一般现象，但他却忽略了卢德运动（就本章的定义而言）之于其他毁坏机器活动的不同特点。

初，卢德运动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砸机行动不再是“暴乱者”所为，而是纪律严明的小分队所做，他们在夜间从一个村庄迅速转向另一个村庄。运动从诺丁汉郡发展到莱斯特郡和德比郡部分地区，而且不间断地持续到1812年2月间。11月10日布尔韦尔发生激烈冲突，当地有个袜商叫霍林斯沃思，他奋起而保卫自己的财产。双方交了火，一个卢德派被打死，三天后，一大队卢德派以长枪、手枪、斧头和锤子为武器，毁坏了阿什菲尔德的萨顿镇一个大袜商工场里的70台袜机。三个多月中，每一夜都有袭击事件，有时同一夜发生在相距很远的两个村庄里。

到12月底，《利兹信使报》驻诺丁汉通讯员声称：“过去一个月中，这个郡的造反形势在查理一世的动荡日子以后便前所未有。”尽管地方官采取各种规模的行动，军队也得到大量增援，却仍旧不能阻挡卢德派。袭击每一次都表现得有计划有秩序：

> 他们只砸那些降低了工人工资的织袜机，不削减工资的人的织袜机他们就不触动，昨天夜里一座房子里有6台机子中的4台被砸，另两台属没有削减工人工资的雇主所有，他们就没有去动一下。

卢德派戴假面具或进行化妆，有哨兵也有信号，“他们通过口令互相联络，短枪或长枪的鸣火一般是危险的信号，或撤退信号”：

> 暴动者突然出现，成武装团伙，有正式指挥员，其首领无论实际上是什么人，一律以卢德将军相称，他的命令都绝对地服从，似乎他有国王的权威。

一般都相信卢德派根据庄严的誓言进行活动，不服从“将

军"的命令就要被处死。[153]

同时，抄查武器、为卢德派基金摊派捐款也变得普遍起来。555 一封来自阿肖弗的信描写卢德派行事时具有何等权威：

> 两个人到这儿来，说他们是委员会派出的视察员，他们跑到每一个织袜工家里，给他们一张工资表，叫他们不要以低于表上的工资干活。……他们召集所有的织袜工以及雇主中的12至14人到一家酒店去，结果就像他们拥有摄政王的委任状一样，他们把这些人召到这里后，据我现在所知，就是为了向他们募钱，去赡养那些因为被别人砸了机子而挣不到饭吃的家庭。如果他们发现哪台机子是没有学过徒的人在操作，或由妇女操作，他们就把这些人打发走，这些人要是愿意走，他们就在机子上贴张纸，上面写着这些字——"本机可保留，生手已赶走"。[154]

在彭特里奇(这个地方5年后因另一事件而闻名)，"他们在全村巡视，检查了织袜机和使用机子的人，看他们的产品和所得的报酬，然后没做什么坏事就走了……"。有些袜商出于同情或自我保护而顺从了织袜工提出的条件，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织袜机上张贴印刷的单据："**本机制造全合格产品，支付全酬**"。[155]

> 卢德派的巨大成功使他们士气大振：
> 威武不能屈，恐吓何所惧，
> 死亦压抑不了他的高昂情绪，

---

[153] 达维尔前引书，第67—70页；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261—265页；《利兹信使报》，1811年12月7日，14日，21日。

[154] 阿斯波诺尔前引书，第118页。

[155] 《艾尔弗雷德报》，1811年12月9日。

军队煞不住他的威风，
更不能阻碍他的成功，
胜利的消息正传遍远近，
叫他的敌人胆战心惊，
他坚强的勇气所向披靡，
制敌的法宝是全能的武器。
……
破坏的工作一旦开端，
奇计良谋何止万千，
水火也能大显神通，
天地万物助他成功。
哪管士兵沿途防护，
哪管士兵严守房屋，
他不分昼夜打击敌人
死亡的命运在等待他们。[153]

他们不但公开“悬赏”，让人们告发泄露他们秘密的人，而且 556
还发出警告，威胁那些冒名顶替私筹款项或抢劫孤立农场的假卢德派。“卢德将军”的纪律最充分地表现在一封寄给某个“不知名的陌生人”的信里，随信还附有在克利夫顿(诺丁汉郡)一次袭击中被盗的物品，请他把这些物品“归还给他各自的主人”。

……我非长(常)抱欠(歉)地告诉你这些冬(东)西，怎么会到我的手，我和我的人出去时由(有)一些以前没有跟过我的人进来是这些混蛋抢东西但是我们出了克里夫顿时我的一个人来告诉我说他相信这些人弄了不相干的东西我所以命令对他们搜身……

[153] 《卢德将军的胜利》，内政部档案，第42.119号。

此信的结尾十分严厉：

……我们正准备把一个坏蛋吊起来这时我们听说土(士)兵快到我们晌(想)还是走为上。注意：弄冬(东)西的这些人完全不晓得我的命令否则他们不会碰一样冬(东)西，但他们已受到惩罚其中一个人给吊了3分中(钟)然后再放下来我是受苦受难的穷人的朋友是压迫者的敌人。

——卢德将军[18]

1812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中部地区卢德运动的主要阶段停止了。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卢德运动取得部分成功——袜商中多数同意支付较高的报酬，每周工资普遍增长了两先令。其次，该地区现在有好几千军队，还加上临时巡捕和地方警戒队。第三，把砸毁机器定为死罪的提案正在议会讨论，(如前所述)卢德运动突然让位给合法的鼓动——变化如此突然，以致人们不得不相信新成立的委员会至少部分地是在前卢德派指导之下。[19] 然而就在诺丁汉的卢德运动渐趋宁静的时候，兰开郡和约克郡的卢德运动则起而效尤。

557 在约克郡，剪绒工热切地追问诺丁汉的消息，据传说，《利兹信使报》上的记载在作坊里高声朗读。对卢德运动的首次模仿出现在1月中旬，当时一队人涂黑了脸突然袭击利兹桥。这以后，已充分发展的卢德运动似乎就处处仿效诺丁汉的纪律和战术，但伴随着更多的严辞恐吓信件。这些信有可能出自同一个中心，当然也可能不是，1月份，利兹不多的几个起毛机厂之一

---

[18] 《利兹信使报》，1812年2月15日，《诺丁汉评论》，1812年2月7日。

[19] 亨森自称是他建议成立行业俱乐部来替代卢德活动，见《关于工匠及机器的……第四个报告》(1824)，第282页。

被烧;2月,哈德斯菲尔德和斯彭河谷地区夜夜都有袭击活动,这些地方是起毛机和剪绒机数量最多的地区。有一次,在袭击成功之后,

> 一旦破坏完成,头领就叫他手下人排队,然后点名,每个人都答应一个特别的号码而不是名字,然后他们就放枪……大叫一声后,以正规军的行列离开。

除了叫人憎恨的机器外,他们没有毁坏任何东西:

> ……队伍中有人问头领应如何处置某个人的财产,他说不要碰一根毫毛,但如果有必要以后再去造访他一次,那就对他不客气。[159]

约克郡西区似乎有不同的卢德派"领导",分别以利兹、哈里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和斯彭河谷的呢绒业小村落为中心。这些小村落的代表(来自克莱克希顿、赫克蒙德维克、戈默索尔、伯斯托尔、默菲尔德、布里格豪斯、埃兰及"更远的地方")据信在2月份开过会,一两周以后又派代表到哈里法克斯参加另一个会议。[160] 利兹散发过一份传单,其言辞比诺丁汉卢德运动的任何文字都更富有造反性:

> 致剪绒工、手工织工等等及人民大众
>
> 慷慨的乡亲们:
>
> 今要求你们应声而起拿起武器,帮助救世军匡正时弊,打开那个蠢老头的可恨枷锁。[161]他的儿子和无赖大臣们,比他还蠢,一切贵族和暴君都应该打倒。大家

558

[159] 《利兹信使报》,1812年1月18日,2月29日;弗兰克·皮尔前引书(1880),第17页。

[160] 皮尔前引书(1895)第44页以始。应特别注意,皮尔的记叙凡是能加以检验的,通常总是很准确,连细节也如此。

[161] 指国王。——译注

赶快起来，学习勇敢的巴黎市民的崇高榜样，他们当着3万个残暴士兵的面，把一个暴君拉下马。这样做对你们自己最有好处。4万多英雄已冲出来了，要打碎旧政府，建立新政府。

有事找替天行道大军总司令卢德将军。[163]

哈德斯菲尔德一个制造商史密斯先生收到一封信甚至更叫人心惊：

今接报告说你拥有万恶的剪绒机，我的人要我写信给你公正地警告你把机子拆了。……你应当注意，若在下星期结束前机器仍不拆除，我就派一个副官带至少300人把它们砸掉。还应该注意你，给我们找麻烦的话我们就叫你更难过，要把你的房子烧成灰。你若敢向我的人开枪，他们有令在先，会把你杀死，还烧掉你的府宅。你最好告诉你的邻人如果他们剪绒机不赶快拆除，同样的命运在等待他们。……

接下来史密斯先生及其"罪恶的兄弟们"得知，说仅在哈德斯菲尔德大军中就"有2782名由贫穷连接在一起的结义英雄"，在利兹，结义的人加倍：

通讯员最近来信告诉我们，以下这些地方即曼彻斯特、威克菲尔德、哈里法克斯、布雷德福、设菲尔德、奥德姆、罗奇代尔及整个棉织业地区，生产者即将奋起加入我们，改变不公平的待遇，勇敢的汉森先生将指导他们直至胜利。格拉斯哥和苏格兰许多地方的手织工也要加入我们，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会团结得像一个人，这样他们大概就会给士兵们找到其他事情干而不是呆在哈

[163] W.B.克朗前引书，第229页。

德斯菲尔德睡大觉，而士兵们现在守着的地方就要遭殃了。……[164]

10天之后(1812年3月20日)，哈德斯菲尔德地区最活跃的地方官本人也收到一封恐吓信，信上说它发自诺丁汉的舍伍德森林，[165]出自卢德将军的律师之手，要执行"诺丁汉卢德法庭"的判决。[166] 约克郡继中部地区之后也获得成功，军队软弱无力，公众情绪敌对，这些对小厂商来说已经足够了——而当他们接到这种毛骨悚然的信件时就尤为如此。他们中许多人于是就缴械投降，砸毁自己的剪绒机或把它们藏起来。据传说，卢德派常在夜里实行军训："拿枪的人10人一排站在前面，然后是带手枪的人……持矛或斧头的在第三排，没有武器的一大群人排在最后。"[167] 然而在民间故事中居显要地位的是使锤子的人，他们手挥号称"伊诺克"的特大铁锤，开门撬锁，砸烂剪绒机。剪绒机(和锤子)是由马斯登的伊诺克·泰勒制造的，这人是铁匠，后来造机器。所以卢德派的口号是："伊诺克造了它，伊诺克砸了它。"攻击行动在剪绒工歌谣中受到赞颂，这首歌以"真正打快板的格调"演唱：

入夜悄悄静无声，月掩半山照无人，
携枪带斧上前来，我行我素是时辰，
剪绒工，棒小伙，身强体壮跟着我，
铁锤底下机身碎，剪绒工们跟上我！

---

[164] 同上书，第229—230页，汉森先生大概就是汉森中校，1808年因支持手工织工而入狱。

[165] 舍伍德森林是传说中罗宾汉出没的地区。——译注

[166] 阿萨·布里格斯：《论〈雪莉〉的个人主题和社会主题》(勃朗特协会，1958)，第9页。

[167] A. L.：《悲惨年代》，第112页。

大伊诺克打前锋，有谁胆敢来阻拦，
勇敢的伙计蜂涌来，有携枪带斧冲向前！
剪绒工，棒小伙，……[109]

约克郡卢德运动的主阶段在4月中旬陷人危机。这时它只有效地存在了六七个星期，由于使用这种侵犯工人的机器的小厂数量大减，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卢德派要么乘胜而止，要么试着去破坏少数几个仍在顽抗的大工厂，他们选择了后者。3月最后一周他们成功地袭击了利兹附近的两个厂。4月9日，约瑟夫·福斯特在威克菲尔德附近霍伯里的"大规模"毛呢工厂被一支多达300人的卢德派队伍袭击，他们也许集结于不同的指挥系统下，之后工厂被一洗而空并付之一炬。[110] 当时一般人都估计两个主要的大企业之一会受攻击，其业主都因为断然反抗卢德派而声名狼藉。哈德斯菲尔德附近奥蒂威尔的威廉·霍斯福尔对攻击等得既焦急又不耐烦，他手下的人都武装起来，厂里还安了一门大炮，对着进攻路线掏了许多枪眼。他自诩要踏着卢德派的血"骑马而过"，对他的仇恨竟如此深重，以致小孩子也在街上对他们叫嚷："我是卢德将军！"斯彭河谷地区罗福尔兹的威廉·卡特赖特，不像那样大喊大叫，但其决心并不稍逊，每晚他的厂房里（他自己就睡在那儿）都有武装的工人和士兵，有人站岗放哨，楼梯上（如果外层防线被攻破的话）有尖头棍栅栏，楼顶还有一大桶硫酸。据传说，卢德派抽签决定先打哪个厂，结果选中了罗福尔兹。

罗福尔兹攻击战已成为传奇故事了。大约有150个卢德派参加攻击（据说还指望有更多的人来，利兹或哈里法克斯的队伍

[109] 弗兰克·皮尔：《斯彭谷的过去与现在》，第242页。

[110] 《利兹信使报》，1812年4月11日。达维尔前引书，第114页。

未能及时赶到)。他们由哈德斯菲尔德附近朗罗伊德桥下一家小成品铺中的青年剪绒工乔治·梅勒率领,与严阵以待的守军进行了20分钟的激烈交火,在火力掩护下,一小批持锤执斧的人几次三番想打开沉重的工厂大门。这一小批人损失惨重,最后有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当卢德派突然撤走时,他们被留在现场。据说指挥者梅勒是最后离开战场的。他无法帮助这两个伤员。因为他协助把另一个伤员(他自己的堂兄弟)搬到安全地带去了。工厂周围的地上丢满了枪支、斧头、长矛和金属器械。

有关这次攻击及其余波的细节成千上万,纷纷流传在雇主的传闻和民间传闻中。在此,我们要停下来问一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并进一步考察当局的力量,考察1812年4月和5月份的政治背景及兰开郡同期内发生的其他事。 561

有一部分背景情况由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雪莉》忠实地展现出来。工厂主穆尔(卡特赖特的原型)被准确地描写成一个半辉格党、半激进派的中等阶级人物,以《利兹信使报》为其喉舌,他对战争漠不关心,或持敌视态度,他希望取消加在商业上的一切限制,强烈批评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反对枢密院令。好战的牧师赫尔斯通(大体上以哈蒙德·罗伯逊牧师为原型)是个狂热的"教会与国王"派托利分子,认为《利兹信使报》是在恶作剧,工厂主心怀不满,自己给自己找来麻烦。所有这些描写都是真实的。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雅各宾——辉格派乡绅约克先生既忠诚于自己的阶级又同情民众的疾苦,他也许在治安法官中有不只一个原型,这些人在卢德运动爆发时一直古怪地无所作为。

当然,《雪莉》的局限性在于对卢德派及其同情者的态度上,但小说却真实地表达了一个中等阶级的神话。1812年,传统的

阶级对抗经受着卢德运动的严峻考验，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工厂主和乡绅严重对立，卢德派吓唬住一个又一个的制造商时，罗伯逊之流的蔑视就增长了。这时，卡特赖特用自己在罗福尔兹的英勇壮举赢得了军官和托利党乡绅的尊敬与感激。有好几个星期，他在北方是与威灵顿齐名的英雄。罗福尔兹的枪声标志着大工厂主和当局在感情上的根本和解。经济利益胜利了，制造商在工人阶级雅各宾主义面前最终表现出效忠之情，这由一个戏剧性的事件表达出来。

然而使有产阶级取得感情一致的东西，在有产者和工人阶级之间却造成深刻的对立。罗福尔兹事件的民间传说强调的是卢德派的英勇斗争和防守方面的冷酷无情。民间的说法夸张其细节插曲，夸张独特的危险和人物的相互影响。在卢德派撤退之后，卡特赖特据说不给那两个受了致命伤的人饮水和包扎，除非他们泄露卢德派的机密。哈蒙德·罗伯逊据信更像是审讯员而不是在当牧师。好几百人聚集在两个人临死前安放的旅馆外面的大街上，床单上发现有硝酸的印渍(大概是用来烧灼他们的皮肤的，大家都相信对他们采用了严刑逼供。据说罗伯逊曾俯身在其中一个人的床头——19 岁的约翰·布思，一个国教教士的儿子那里，等候他作临终的忏悔。在死亡来临时，小布思向罗伯逊示意："你能保守秘密吗?""当然，当然，我能保守秘密"，罗伯逊迫不急待地答道；"我也能"，布思回答，不久他就死了。

当局曾缴获一封信，是一个住在约克郡的诺丁汉工人(也许是卢德派难民)写给家里人的，信中谈到了对这件事的直接反响：

> 卢德派与军队干了一仗，卢德的人被打败了。元(原)因是哈里法克斯的卢德派没有如约好的那样赶到，16个人发动进攻，有两个被打死，伤员都给抬走，没有人

被捉住,后来那两个人在上星期四埋在阿特斯菲尔德。[10]。尸体放在一个黑屋子里,里面点6支蜡烛,卢德的朋友们跟在后面,每个人都伤心地戴一个带黑边的丝围裙,神父不肯安葬他们,但卢德派坚持要把他们埋在教堂,还要有一个大石碑,他被抓住后还活了24小时,他是个教会牧师的小儿(孩),好多人去看他,但是他不肯说话。[11]

围攻之后的几天有不少事刺激着群众的想像力,许多故事说人们怎样在军队眼皮下逃脱掉,说受伤的人如何藏在谷仓里,守卫卡特赖特工厂的一小队士兵中,不止一个人对执行任务毫无兴趣,其中有一个在整整20分钟的枪战中不肯开枪,"因为有可能击中我的一些弟兄",这不幸的士兵(属坎伯兰国民军)后来受军法审讯(被判处鞭刑300下)——有可能会致人死命的处罚。处罚在罗福尔兹执行,卡特赖特被减免了大部分刑罚,从而挽回部分民心。 563

但他并没有挽回多少。在中等阶级神话里,卡特赖特和罗伯逊不仅是时代的英雄,而且还无情地追捕"心怀叵测的人",即那些来自远方的神密使者和蛊惑家,他们是动乱的教唆者。夏洛蒂·勃朗特在写信给杰勒德·穆尔时说:"他不知道谁是头子",

那些都是陌生人,是大城市里来的密使。其中多数并不是工人阶级出身,而主要是一蹶不振的人,是破产的人,负债累累的人,又总是醉酒醺醺——是些无可失而多所得的人,在身份、财产、整洁方面都可以有所得,穆

[10] 哈德斯菲尔德。

[11] 《拉德克利夫手稿》,第126/132号。写信的人实际上把约翰·布思下葬的情况和哈里法克斯的哈特利的葬礼弄混淆了。布思的下葬因估计到会有大批群众前来致哀因此在哈德斯菲尔德仓促进行,后者情况见下文,第586页。

尔对这些人像警犬一样追踪，他真爱这项工作……他爱它，胜过爱织呢子。

然而在民间传说中，卡特赖特和罗伯逊只是"嗜血鬼"，整个社会都以非常方式向其关闭。直至进攻罗福尔兹之前，约克郡的卢德派（像中部地区一样）严格地局限于毁坏机器。是卡特赖特而不是卢德派让人们流出第一滴血。好几个月中尽管在约克西区有4000名军队而且密探四布，参与攻击罗福尔兹的人却没有一个人被确切地认出来。而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认识其中的一两个，传闻中就记着非国教牧师和外科医生不肯报告情况，小呢商把自家的卢德派工人藏起来，还有士兵对证据假作不知这样的事，整个的教区中"监视"条例不起作用，卢德派歌谣流传：

想要活干的英国英雄
彼此忠诚别做狗熊
紧紧跟着卢德将军
刺刀上膛也是无用。[12]

就连暗杀奥蒂威尔的霍斯福尔这件事（4月27日），也没有像预期那样太多地扭转人们的感情。把"教会与国王"派及《利兹信使报》——（罗伯逊与卡特赖特）——拉在一起的危机，也同样把人民中反对地方官和大雇主的情绪连接起来了。[13]

564

此外，在1812年四五月，收成不好加重了粮食短缺和物价

---

[12] 布里夫：《第五王》，米尔恩斯和布莱克巴勒，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263号。

[13] 关于卢德运动的"民间传说"，可在A.L.著的《悲惨年代》、F.皮尔的《卢德派起义》、《斯彭谷的过去与现在》雇用、赛克斯和沃克的《比尔家的老本》等书中找到。只要有可能，本处叙述就曾与《利兹信使报》及继起的审讯材料上的说法对照核实过，卡特赖特叙述卢德围攻及士兵"背叛"的信件，见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305—306页及H.A.卡特曼：《愚人的过去与现在》（利兹，1930），第114—116页。

上涨,制造商把这些灾难都归咎于战争的延续,特别是归咎于枢密院令,卢德运动还是一种散布很广同时又颇为混乱的暴动紧张气氛的中心。这部分是由于1811至1812年发生的经济总危机。由于战争不得人心,由于反枢密院令的宣传鼓动,英法之间相互封锁,对美贸易的中断等等,都在1807—1812年间给制造业许多部门带来极大困难——如伯明翰、设菲尔德、利物浦和纺织业区,因为它使大部分欧洲处于封锁下。意味深长的是:卢德运动发生在那种大雇主利用时局的艰难引进新方法新机器从而失去民众支持的工业部门,而像设菲尔德、伯明翰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曼彻斯特这一类中心,由于整个工业都局部瘫痪,雇主们自己就在发动反枢密院令的示威及请愿(由布鲁厄姆领导,在伯明翰则是年轻的托马斯·阿特伍德)以及工人的不满大体上保持着合法的形式。[19]

事实上,到1812年,古老的乡绅阶层很少能控制工业地区了,除非他们能得到大雇主的支持。但矛盾的是,在雇主敌视政府的地方,治安问题反而较小。卢德运动就揭示着这整个治安问题。1812年夏,在骚乱的各郡至少有12,000名军人,比威灵顿指挥下曾在伊比利亚半岛作战的军队还要多。好几个月的时间中这些军队毫无作用,这大概部分是由于许多普通士兵同情人民,所以当局必须将他们不断地从一地调往另一地,生怕"不满"会在队列中传播。但同时也由于卢德派极度的保安措施和相互联系,他们静静地通过人所共知的地段,而骑兵则吵吵嚷嚷地从一个村庄转到另一个村庄。约克郡西区的山中骡马羊肠小道纵横交错,卢德分子在这里通行无阻。骑兵的行动,刀枪铿 565

[19] A.布里格斯:《进步时代》,第164—166页;A.普伦蒂斯:《曼彻斯特纲领》,第41—47页;切斯特·纽:《亨利·布鲁厄姆传》(牛津,1961),第4、6章。

锵、马蹄得哒半夜里老远就听得见，弄得众所周知。卢德分子在树篱后面悄声潜行，伏在庄稼地里或走小路，行动就比较容易。……”[13] 卢德派的目标在许许多多星罗棋布的村庄和工厂中，这些村庄实际上没有警备，而军队又很不愿意让士兵三三两两地在危险的孤立中分散住宿，骑在马上的地方官既不懂工业又不了解人民，因此就一无所用。只有工厂主或制造商因其厂房及工资簿册主宰村庄，才能够实行控制。因此，在雇主失信于工人的地方，治安的整个结构就出现风险，而权威就只能像在罗福尔兹那样的加以补救。在罗福尔兹，主宰者是卡特赖特，而不是罗伯逊。但是在设菲尔德和伯明翰这样的地区，制造商和工人们仍旧由反政府的共同抱怨联结在一起，真正动乱的危险是受到雇主的控制的。

这样，卢德运动就不仅把地方官和工厂主拉到一起，它还使政府对制造业的利益作出不可避免的让步。这种让步是在胜利中得到的，1812 年 6 月枢密院令宣布废除。[14] 卢德运动也许和阿特伍德及布鲁厄姆的合法鼓动同等地促进了这一过程。但废除枢密院令有更为险恶的背景，因为此时除约克郡和中西部地区的卢德运动之外，又加上兰开郡的严重动乱。

很难弄清兰开郡的动荡在多大程度上可算作真正的卢德运动，它其中一部分是自发的骚乱，一部分是非法然而“合宪”的政治改革宣传，部分是奸细罗织的偶发事件，还有部分是真正的起义准备工作。1812 年 2 至 4 月间，至少有两种形式的“秘密委员会”存在于某些兰开郡城镇中。首先，有手织工委员会，其秘密组织多年来一直在为制定最低工资而宣传和请愿。这种委员

566

[13] D. F. E. 赛克斯：《科恩河谷史》(斯莱恩韦特，1906)。

[14] 1813 和 1814 年还废除伊丽莎白第 5 年第 4 号法令。

会据报告4月初存在于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博尔顿、费尔斯沃思、萨德尔沃思、莱恩河畔的阿会顿、奥德姆、斯泰利布里奇、德罗伊斯登、普雷斯顿、兰开斯特、亨德尔、纽顿、德里斯代尔、霍林伍德、威林顿、埃克尔斯等地。[17] 其次，在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地区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存在一种早期各行业的秘密会议(或称"各业委员会")，包括"纺纱工、裁缝、鞋匠、瓦匠、粗布剪绒工、细木工及其他许多行业"。这种委员会在1797年结社法初通过时即已存在曼彻斯特，工会人士无疑在情况需要时会正式或非正式地商讨聚会。

3月20日，威廉·拉特克利夫的仓库在斯托克波特受袭击，他是最早使用动力织机的制造商之一。4月份，事件接连发生。4月8日，曼彻斯特交易所发生一次多少有一点夸张的暴乱，事情至少间接地带有政治性。多年来人们以为摄政王支持辉格党，甚至支持政治改革，他为自己的宗派目的而在战争初期赞助过福克斯反对派。人们曾不断指望，到1812年初，当他的权力不再受限制时，就能够组成一个"和平改革"的政府，由格雷和格伦维尔两勋爵担任主角。然而摄政王所做的，仅仅是向"形成我公务生活的早期习性有关的某些人"提出参加联合政府，而所定条件又是他事先就知道不会被接受的。随之而来的政府改组中，由珀西瓦尔领头组成一个更不得人心的政府，而以卡斯尔雷为外交大臣，西德默思(首次)为内政大臣。人民的期望成了泡影，其影响远在想象之外，甚至有人说这种失望就是约克郡卢德 567

---

[17] 这些城镇和村庄都是亚伍德的叙述及"B"(本特)1812年4月的报告中提到过向各种秘密会议派出代表的地方，见内政部档案，40.1号；亦可见托马斯·惠特克在内政部档案第42.121中词，说3月25日在索尔福德"撒玛利亚好人"酒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方圆15至20英里内的每一个城镇几乎都有代表出席。有关这些说法的真实性可见下文，第593—598页。

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17] 曼彻斯特的教会与国王派完全错估了公众的情绪，他们在交易所召开群众大会，向摄政王呈递颂词，庆贺他保留其父的大臣们连续任职。改革派在曼彻斯特四处张贴海报号召人民参加会议，否决颂词。托利党于是撂挑子，打算取消会议。但大批人群围在交易所附近，其中许多人（主要是手织工）接着向圣安妮广场进发，在那儿他们自己开了个会。同时，有些年轻人冲进报刊室打碎了玻璃，翻倒了家俱，接着发生一场大乱。这并不是一件大事，然而"标志着公众舆论掉转风向。在从前'教会与国王'是大家欢喜的口号，搜索'雅各宾'则是安全的消遣……但这以后，就不再有'教会与国王'暴徒了！"[18] 有个老改革派后来曾这样回忆。

此后两星期中，曼彻斯特、奥德姆、阿什顿、罗奇代尔、斯托克波特、麦克尔斯菲尔德等地都出现更严重的骚乱，这些基本上都是抢粮风潮，特别狂暴又范围特别广，目的在迫使马铃薯和面包的价格压下。但同时，又有一些混乱的报告，说"卢德派"即雅各宾派鼓动者在积极煽动和组织参加暴乱的人。斯托克波特有两个男子穿着女人的衣服，自称"卢德将军的妻子"，走在闹事者前面。恐吓信不仅寄给有动力织布机的人，而且还寄给有改进过的整布机的人：

> 出于公平人道我们认为有毕（必）要通知你如下，也就是假如你不在七天期限内拆除整布机……你的工厂和其中一切就都要一定要给放火烧掉……我们决不会让你快快活活而是下决心要摧毁整布机和动力织布机而

[17] 见后文，第589页。

[18] 普伦蒂斯前引书，第48—52页；达维尔前引书，第93—95页。

不管其主人是谁。……[illegible]

(这封信并不是卢德签署,而是"正义将军"签署。)4月20日,米德尔顿发生一次大骚动,丹尼尔·伯顿的动力织布厂被数千人围攻。进攻的人用排炮般的石块攻打,守卫者则开枪作答,打死三人,打伤更多。第二天早晨吓人的人群来得更多,中午时又加上一队人,由一二百人组成,其中有些拿着枪,枪口上着刺刀,其他人则带着矿工用的鹤嘴锄。他们列队进入村庄,参加到暴民之中。这批武装歹徒的前面抬着个稻草人,代表出名的卢德将军,他的掌旗兵挥动着一面红旗似的东西。……[illegible]

568

工厂很难攻,参加骚动的人就烧了厂主的家。这时他们与军队遭遇,至少有七个人死在他们手里,许多人受伤。

就直接攻打机器而言,这是兰开郡卢德运动的高潮。很显然,这远不只是手织工的运动——被打死的人中有一个面包师,两个手织工,一个装玻璃的,一个细木工,在第二天的攻击行动中,霍尔姆菲尔德的矿工是主要参加者。就伤亡来说,这也是全国最严重的一次卢德派闹事。但4月24日发生一起带有神秘色彩的事——威斯特霍顿的雷邓克罗夫工厂被烧。此事之神秘,并不在于工厂受到袭击——这个厂是破坏活动的一个明显目标。它不仅一再受到恐吓,而且在一个主要是由弗莱彻中校雇用的内奸控制下的博尔顿"秘密委员会"鼓动下,已经发生企图攻击它的事件。但叫人迷惑不解的是,在这些鼓动无效的情况下(看来确是这样)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袭击。[illegible]

[illegible] 匿名信,1812年4月19日,内政部档案,第40.1号。

[illegible] 《利兹信使报》,1812年4月25日自米德尔顿报道。

[illegible] "老S"和"小S"拐弯抹角的说法记叙在哈蒙德夫妇的前引书的第10章中,亦见达维尔前引书,第5、14章,普伦蒂斯前引书,第52—58页,及匿名作者的《1812年的涂黑脸人》(博尔顿,1839)

卢德运动的这段插曲充满了各种假象，人们的思想却很少能跟着那曲折复杂的过程。但如果说兰开郡卢德运动只不过是弗莱彻中校和约瑟夫·纳丁之辈借机对手织工进行挑动，这种(从博尔顿事件中得出的)假设却不能成立。不错，从表面上看，兰开郡的活动几乎没有诺丁汉和约克郡西区事件中所表现的那种组织纪律性。另一方面，捣毁动力织机所提出的问题，又和织袜机、剪绒工的问题属不同类型。动力织机是昂贵的机器，只是最近才引进，只在很少几个有蒸汽动力的工厂中使用，并大量散布在乡村各地的小作坊中。这样，夜半游击战在兰开郡就几乎不管用，每次攻击都必须有罗福尔兹或伯顿事件那样的规模，因此有可能直接与军队发生冲突。但这样做几乎没有意义了，即使从有限的战术角度来讲也是如此。同时，几十年来兰开郡人都和蒸汽动力纺纱厂生活在一起，所以必然有许多(也许是多数)织工会怀疑抵抗新机器是否有效，而这种怀疑由于有报告说手织工自己的"秘密委员会"中也有严重分歧而得到证实。所以，兰开郡的卢德运动在三四个星期的时间里就越过了砸毁机器的阶段。然而就在攻击工厂的活动告一段落的同时，关于起誓、武装和军训的说法却流传得最广。对动力织布机的攻击在五六月间让位给更严肃的暴动准备工作。尽管1812年5月底兰开郡和切郡巡回法庭都对参加4月骚动的人判处酷刑，[⑲] 动荡则一直延续到秋天。6月中旬，兰开郡一个消息最灵通的密探写道："100多人的卢德派队伍每天夜里都进入民宅搜拿武器"，他们以枪声、狼烟、"火花"为号，表现了(按某一个军官的意

⑲ 兰开斯特58个被捕者中28人判定有罪，其中8人被判死刑，18人流放。切斯特的47个被捕者中29人判定有罪，其中15人被判死刑(但只有2人执行绞刑)，8人流放。

见)高度的组织一致。好几个星期中,兰开和约克交界的整个地区实际上是处在军管之下,特别是某个军事指挥部还建立起恐怖统治,它随意抓人、搜捕、进行野蛮的审讯和恐吓,而相应的情况只有在爱尔兰的历史上才能找到。[⑭]

初夏,卢德运动进入危急关头。在发生米德尔顿和威斯特霍顿事件的那一个星期,全国许多地方也出现报警的迹象,布里斯托尔、卡莱尔、利兹、设菲尔德、巴恩斯利等地发生严重的抢粮风潮,康沃尔矿工举行罢工,向集市进发,要求降低食品价格,普利茅斯和法尔默思出现动乱。其中有些地方的抢粮风潮比预计的情况要含意更深刻,它们是政治或公民行动,且是争取最大多数群众。在设菲尔德,人们冲进一座国民军弹药库,两个领头的人竟然不是饥饿的失业者——这些人组成示威群众的多数——而是"本城最机敏的两个巧匠",每星期可以有四个半基尼的工资。[⑮] 4月27日,威廉·霍斯福尔在约克西区遭暗杀,5月11日,首相珀西瓦尔在下院被刺。整整一天中全国一片混乱,人民并不掩饰内心的欢快。在博尔顿(弗莱彻中校抱怨说),消息传来时"贱民们表示高兴"。在陶瓷制造区,一个当事人听到消息时看见: 570

> 有人沿街快跑一蹦三尺高,把帽子举过头顶挥舞,狂喜地大叫:"珀西瓦尔尔给打死了,哈哈,珀西瓦给打死了,哈哈!"

诺丁汉群众举行庆祝,"敲锣打鼓地在城里游行,旗帜胜利地飘舞"。当消息透露出来时,伦敦本身的群众聚集在下院外面,行

⑭ 《劳埃德1812年6月17日致内政部》,内政部档案,第40.1号;F.雷恩斯:《向人民呼呈》(1817),第20—21页及各处。

⑮ 《利兹信使报》,1812年5月2日;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5480号。

刺人约翰·贝林厄姆被带走时,"愚昧恶劣的一部分群众中再三发出欢呼声"。当有消息说贝林厄姆也许是神经病,而且是出于私人恩怨而采取行动时,人们几乎感到失望;他们希望出现另一个而且是成功的德斯帕德。贝林厄姆走上绞架时,人们高叫:"上帝保佑他",科尔里奇还听见他们说:"这只是开始啊!"给珀西瓦尔举行公葬被视为不合适"。[19]

在英国历史上反叛的义愤很少像这样广泛流传。连续几个星期,约克西区的门上墙上常有粉笔涂画的告示,以100基尼代价悬赏摄政王首级。[20] 5月中旬,摄政王及其私人秘书收到几十封恐吓信,其中一封署名"民声"的在开头写道:"粮食要便宜——面包或者流血——告诉你的主子,他是个没良心的混蛋。……"[21] 但对约克郡的人来说,摄政王毕竟远在天边,而工厂主和地方官则近在咫尺。在罗福尔兹失利之后,约克区的卢德运动进入拼死拼活的阶段。它在这里一向就比诺丁汉更富于军事纪律性,也更环绕在保密和宣誓的气氛里,因为它出现的时候,正是砸毁织袜机的行动被定为死刑的时候。暗杀霍斯福尔的决定也许是地区指挥员乔治·梅勒自己作出的,而不是在约克郡代表会议上作出的。据传说,牧师的儿子布思是他特别要好的朋友和心腹,布思的死使他气得发狂。后来为政府作证的行刺帮手本杰明·沃克说,梅勒及他在朗罗伊德桥下的约翰·伍德工场中的剪绒工伙伴们"谈到……在卡特赖特那里被打死的人":

---

[19] 内政部档案,第40.1号,普伦蒂斯前引书,第46页,《利兹信使报》,1812年5月15日,皮尔:《卢德派起义》,第156—157页;A.布里格斯:《进步时代》,第157页。

[20] 拉德克利夫手稿,1812年3月17日,第126/26号。

[21] 《伦敦报》,1812年5月19日;内政部档案,第42.123号。

他们说这是件严重的事，梅勒说砸剪绒机的方法应该放弃，代之以枪毙雇主。这是我听到的主要内容；他们说已经失去两个人，必须杀雇主。

为一个远方的首相被刺欢呼是一回事，躲在墙背后冷酷地暗杀一个按时骑马而过又"属于"这个地方的人——尽管他不得人心——却是另一回事。如果说人们感情上曾经有过突发的变化，这种说法似乎太过分了一点，上千的人一定曾猜测过谁是凶手，但好几个月中未走漏任何消息。更接近事实的情况是，那些以前仅是被动地同情或袖手旁观的人，他们的感情发生了突发变化，与此同时双方的极端派则情绪更坚定了。霍斯福尔死后三天，哈蒙德·罗伯逊写信给卡特赖特说：

"附近地区我所认识的一切居民中"，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人对国家的局势是敏感的，或者说，没有一个能够并敢于断然指导军队的行动，要是我能把全部时间用于军队，我愿意尽我全力去做。[⑩]

572 卢德派方面的人数开始减少，他们开始用恐吓来恢复松弛的纪律，攻击剪绒机的活动停止了(虽说现在很少有厂家还在抗拒)，而代之以四处搜罗钱财武器。这些搜索和兰开郡一样，在5月、6月、7月、8月和9月一直延续，虽说偶或有一两队盗贼冒充卢德派，从而搅浑了水。有关这些搜索活动的记叙可以和在敌占区活动的骚扰部队相比较，1812年7月一个地方官曾对克利夫顿村(约克郡)的一次搜索有所描述并发表评论说：

……准、猛、快，一帮武装匪徒就是这样井然有序地在一个人口稠密(有一英里长的)村庄里搜索枪支，并拿走六七支而丝毫不想碰一碰其他财产。他们接连向屋

⑩ 见A.布里格斯：《论〈雪莉〉的个人主题和社会主题》，第12页。

子里和稍微企图反抗的人开枪，其麻利迅速及明显的纪律即使是正规军也不过如此。……[109]

约克郡的卢德运动在逮捕、背叛、威胁和失望中消失了。这一次，事情又由民间传说传下来，当然也透露在1813年1月的约克审判案中，从其他地区募征来的奸细发现了一些情况。于是在哈里法克斯逮捕了一小批潘恩派，其中包括制帽匠约翰·贝恩斯，罪名是进行卢德派起誓。接着，梅勒的工友及同伙本杰明·沃克说出了霍斯福尔暗杀案之谜。其他一些卢德派也去告密，以此来救自己一命。有些参加罗福尔兹事件的人被追踪，巴恩斯利和霍尔姆弗思也进行了几次逮捕。10月份，最热衷于追踪卢德分子的地方官约瑟夫·拉德克利夫接到最后一封恐吓信："我肯定会当第二个贝林厄姆，我已经造了子蛋(弹)，假如我在教堂动手就把它射进你的心血管。"[110] 11月份收网了。1813年1月，在约克的特别法庭上，当其他审判还在进行时，梅勒及两名同伴被判犯有谋杀霍斯福尔罪并立即处死，其他5人因参加 573 罗福尔兹攻击或搜索武器而被判极刑，其中只有一人减为终身流放。还有6人因进行非法起誓而判7年流放，其中包括哈里法克斯的老民主派贝恩斯。如果他们的罪行是在1812年7月底而不是7月初犯的，那么就会被判处死刑。

与此同时，诺丁汉和织袜区在1812年春夏一直十分安静。针织工委员会此时正试图保证其法案在议会通过。1811至1812年运动中的领袖没有一个可以被确认是定了罪。尽管1812至1813年显然平安无事，匿名信和重新活动的威胁却始

---

[109] 菲茨威廉文件，F.46(g)。

[110] 《拉德克利夫手稿》，第126/91号。拉德克利夫在以后几年中还不断被恐吓骚扰，1815年3月有一个匿名写信的人警告他："卢德运动将要在这里重新开始"，剪绒工们"发誓要首先毙掉你，他们说你是老王八。"见第126/136号。

终对雇主保持着压力，要他们同意织袜工的条件：

> 乔治·罗博顿，本信特通知你（1812年4月有一封信说）在阿诺德、布尔韦尔、赫克诺尔和巴斯福德镇未（没）有一个人来领活干，除非工资额满，式样完整，有合适的价钱和规格。特此通知你，假如你再不按完整的式样、全面的工资和合适的规格收进或给出活计，你就要在脖子上套一根绳子来开这台织袜机。[⑩]

1812年11至12月，卢德运动有轻度复活，但两年中织袜工看起来把信心完全置于工会活动上。这以后出现一些零星的攻击工厂活动（1814），而且有一些织袜商似乎在试着挑动工人去砸毁机器，以便为采取行动反对工会寻找借口。[⑪] 工会瓦解以及两位领导人被捕后，攻击活动就流传得更广了。1814年9月贝斯福德一个织袜工詹姆斯·托尔因参与一次攻击活动而被捕，但在1815年的春季巡回法庭上获释。1816年夏至1817年最初几个月，中部地区的卢德运动经历了最后的阶段，其激烈程度为1811年以后所未见。其中最轰动的一次，是攻击希思科特和博登在拉夫巴勒的一座相当大的工厂，工厂守卫被手持大口径短枪、头戴面具的人群所压倒，人们高呼："卢德派，好好干吧，这是一场滑铁卢大战，上帝保佑！"在口号声中厂里昂贵的花边织机被毁无遗，仅这一次攻击就造成6000多镑的损失。詹姆 574 斯·托尔再次被捕，这次他被定了罪，在11月中旬处死。攻击活动又持续了一两个月。据一种说法，托尔的兄弟带着一帮人，急于想做给"詹姆斯看，他们没有他也能干点事"。另一种说法，则

---

⑩ 在这信中胡乱画着一个绞架，还写着一行不吉利的话："本织袜机以全工资完全式样操作"。内政部档案，第42.122号。

⑪ 见C.格雷：《诺丁汉500年史》（诺丁汉，1960），第165页。

说卢德运动的这最后阶段是一两支几乎“以此为业”的团伙干的，他们受到转入地下的工会地方支部的召唤，并由此领取报酬。在受刑的那天早上，詹姆斯·托尔在忏悔式上说，他从未作过秘密起誓，也不曾听说有这种起誓：

> 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基金，但在打算行动或为某种目的需要钱用时，就在当时恰好有活干的织袜工或花边工中筹集捐款。……他们没有武器弹药库，许多人在家里藏有一两支枪，……打算行动时，三四个为首的人物就出去转一圈，在那些他们深知是极其倾向卢德活动的人中找帮手。

但托尔并没有暴露谁是这种“为首的人”，他的忏悔可能是编造出来迷惑审问他的人。1817年初，他这一伙中又有人暴露身份，1817年4月在莱斯特又有6人被处死，还有两人被流放。处死的人中有一个叫托马斯·萨维奇的，他在行刑前两星期的一份口供上说运动的最后阶段中，“卢德活动和政治紧密联系”。他声称在法国加来有一个卢德派难民的侨民区。[14] 他还想暗杀格雷夫纳·亨森，就是全体之头（他指责格雷夫纳“几乎干尽罗伯斯庇尔所做的坏事），但他绘声绘色的可疑说法，事实上并没有把亨森本人牵连到任何砸机行动中去。他的指责是说亨森在织袜工中领头进行极端激进主义的宣传，从而在1816至1817年之交的冬季引发出汉普登俱乐部行动，他还说亨森希望发生共和派的革命，“谈论攻击诺丁汉兵营”。不管这些是真是假，6月份发生彭特里奇的“起义”时，亨森却不能任意表达他的同情了。因为正是在萨维奇对他作如上指责的同一个星期，诺丁汉一个

575

---

[14] 这并非不可能，加来确有一个英国针织工的侨民区，见《关于工匠及机器问题的……第四次报告》中亨森的证词（1824），第274页，内政部档案，第79.1.31号。

地方官告诉西德默思说，亨森（“一个聪明的家伙并酷爱言谈”）已经登上去伦敦的邮车，打算呈递一份请愿书，以拯救被判死刑的人。他在伦敦被捕，在人身保护法中止之际被关了18个月，而早在这之前很久，我们这里所定义的那种卢德运动已经偃旗息鼓了。[88]

6. 奉行业之命

> 拜伦在上院感叹道：“竟会有这样的进军和回军！”
>
> ——他们[89]从诺丁汉到布尔韦尔，从布尔韦尔到班福德，再从班福德到曼斯菲尔德！最后当小分队豪情满怀、列队庄严、像打一场光荣的战争那样终于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刚好及时赶来看已经造成的破坏，……然后在老妇人的哄笑及孩童的叫骂声中返回基地。

无疑在被送上绞刑架的人们中，会有一些地方性的卢德派领袖，证据和传说都确凿地表明乔治·梅勒和詹姆斯·托尔是卢德派“上尉”。但时至今日，卢德运动仍不肯完全吐露真情，是谁在“幕后”策动？到底有没有这些人，或者说运动只是某个地区模仿另一个地区自发地在蔓延？不同地区存在着何种委员会？它们间有没有正常的联系？秘密起誓进行到何种程度？卢德派暗怀着何种政治目标和革命目标？

对这些问题，大多只能进行一些猜测，但应说明，某些公认的答案与证据并不相符。有关卢德运动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哈蒙德夫妇和达维尔的成果。《技术工人》是本很好的书，但有关

---

[88] 《W.伯欣供词》，见内政部档案，第40.4号；托马斯·萨维奇交代，见内政部档案，第42.163号；H.W.C.戴维斯：《格雷和皮尔时代》，第172页；达维尔前引书，第144—149页；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238—242页。

[89] 指士兵。——译注

卢德运动的章节读起来有时像为辉格党反对派准备的发言提纲，目的在涉及运动的密谋的革命性质时，推翻当局夸张的说法，书中对奸细、坐探的作用过分强调，以致竟暗示不存在真正的革命地下活动，也没有证据表明各郡之间有代表来往。至于宣誓活动，哈蒙德夫妇说："即使解释得再宽，也没有证据表明宣誓的范围很广，或者除奸细活动的地区外**还确实有过宣誓的事**。"[19] 真正的卢德运动（据暗示）并没有深远的目标，因此若不是自发的骚乱（如在兰开郡），就是严格局限于产业目标的行动（如在诺丁汉和约克郡）。

576

F.O.达维尔的《摄政王时期的英国民众骚乱与社会秩序》一书，在多数论点上附和哈蒙德夫妇，他直截了当地说：

> 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卢德派方面有丝毫政治动机，没有一次事件可以证明，卢德派进攻工厂的行动除表现主仆之争、工人与雇主之争外，还有什么更深的含意。没有对任何一个卢德派……提出过叛逆的罪行，或确认过这种罪行。尽管奸细们竭力要证明这种动机，却根本没有迹象表明，除少数几个次要而没有代表性又不负责任的鼓动家外，有哪个卢德派确实有某种庞大的政治计划。

"虽说有过细致的搜查，却找不到奸细所说的大量武器储藏。也查不出一地的不满分子与另一地有什么联系。……"兰开郡各镇的秘密委员会是"株连生长"，受控于奸细和那些"把适度煽动作为收入来源的人"。至于较大的卢德攻击活动，"这种乌合之众的组织性，并不见得比在校园里自发搞'恶作剧'的人群强多少"，"除奸细不可信的证词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卢德派曾

[19] 见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339页，黑体为作者所加。

进行过秘密而非法的宣誓。"[19]

若沉湎于每日细碎的报告中——有时是迂腐的军官,有时是吓坏了的地方官,再有时是歪曲不实的奸细汇报——确有可能令人全然怀疑卢德运动的真实性。但如果离开这些报告片刻,我们就会看出这种权威的结论和最耸人听闻地说卢德运动是阴谋活动的说法一样不可信。任何人若抢过枪,或组织过标枪比赛,就都会知道一次校园里自发的"恶作剧"是不可能在半夜里把几十个人组织起来,叫他们化了妆,以大枪锤斧为武器,从不同地区来到指定地区集合,排成队,按号点名,走上几英里去进行成功的袭击,还随时打信号放狼烟的。任何人若了解北部中部的地形的人,就很难相信邻近三个郡的卢德派彼此间会没有任何接触。在一个心怀不满的爱尔兰人成百上千地涌入兰开郡,人们又在大街上欢天喜地地庆祝首相被刺杀的时代,要把卢德运动孤立起来,看做是纯粹的"产业活动"并完全与"政治"无关,确实需要敏捷的才思才行。总之,对卢德运动的这种观点的论证只依赖于一种特别的抗辩术,即把当局的愚蠢、怨恨及挑拨作用夸大到荒唐的地步,或是因缺乏割裂生活、轻视民众传统的学术想像力。 577

事实是,关于卢德派的组织情况,没有哪种证据材料是不曾在某种程度上遭受"污染"的。正如哈蒙德夫妇及达维尔所说,我们知道有代表与宣誓活动,仅仅是从传谣中,或从"奸细"的叙述中,或从地方文武官员处,或从已被宣判死刑或害怕被判死刑又急于求生的人的口供中得来的。有关卢德运动的深远目标也是这样。然而哪里又有其他证据呢? 每一个犯人都自动地成为强制的对象,而每一个告密者都立刻成为"奸细"。

---

[19] 达维尔前引书,第174—196页。

我们可以拿宣誓为例，如果说很少有中部地区卢德分子进行宣誓的证据，那可能是有原因的。中部地区砸毁机器的主要阶段在1812年2月结束。正是在这个月砸毁机器才成为死罪。约克郡和兰开郡的卢德运动在开始时就知道暴露即是死亡，因此很可能会进行一些秘密宣誓（奸细和民间传说都这样说）。1812年7月，当局出于重判的目的，使宣誓也成为死罪。有谣传说，宣誓在约克郡一直进行到年底。而1814至1816年中部地区卢德运动再兴起时，从事活动的各小团体好像不愿在新的578 犯法行为上再添加死罪的风险。

1813年1月的约克郡巡回法庭上，有两批犯人因宣誓而定罪，其中一例——贝恩斯及哈里法克斯民主派案——十分可疑。他们之定罪是基于两个职业奸细的证词，这两个人是道德败坏出了名，专门为这个目的而被从曼彻斯特弄过来，很有理由相信这个案子是“罗织”的。哈蒙德夫妇和达维尔都暗示另一个案子——巴恩斯利一个手织工案——也值得怀疑，也是一个职业“奸细”所作所为。[19] 但情况并不尽如此。告密者托马斯·布劳是巴恩斯利的手织工，共济会会员，他自愿告密的原因不甚清楚。1812年8月他当着两个设菲尔德地方官的面宣誓作供，据说，他在当年早些时候曾参加一个巴恩斯利5位织工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他们在巴恩斯利拉了2000人，主要是手织工，但也有两个酒馆老板，一个制帽工，一个园丁（爱尔兰人都不准入会）。他的任务是参加会议，收集经费并与其他委员会通信。巴恩斯利（该地没有发生卢德运动）被视为是新开辟的薄弱区，主要力量则在设菲尔德和利兹。卢德分子的圈子里，流行着这样一种夸大其辞：设菲尔德有8000人入了

[19] 见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314、325页。

会，利兹有 7000 人，霍尔姆福斯有 450 人。代表们被派到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和阿什顿去参加会议。在哈里法克斯，卢德派在“宗教外衣下以不从国教者的身份”开会。许多卢德派也是国民军队成员。“卢德派想靠发动国家的革命而最终推翻政府制度。”布劳顿自己曾参加阿什顿的一次代表会议，在那里另一个代表告诉他进攻两院就是第一个信号。假如革命成功，卡特莱特少校和伯德特会指望参加。他还收到 10 先令 10 便士用作代表的开销费。[29]

如同其他这类供词一样，我们几乎不可能区分这份证词中的真伪。但这里可以指出两点。其一是布劳顿似乎是个告密者，也就是说，他曾是真正的卢德派，后来变成叛徒。其二，是根据布劳顿的证词在约克提审的案子——针对巴恩斯利委员会成员约翰·伊登的案子中，并未引用该证词中的任何一个字。起诉只想提出证据来证明他进行过非法起誓。 579

> 我自觉自原(愿)地宣布并庄严宣誓我永不以任何言行暗示向任何……透露可能导致泄密的任何事，否则甘愿被第一个遇见我的弟兄送回老家。我进而宣誓，若我们之中出现叛徒我将惩处跟踪追击复仇不止，哪怕他逃到天涯海角，我将真诚、稳重、诚实地与弟兄们交往，愿上帝助我信守誓言，阿门！[30]

从字面上看，这誓词应该是真的。[31] 但这里需要进一步考查当局的意图。英国的统治者对工人群众冷漠无情，但英国却不是一个“警察国家”。它当然有文武官员，如哈蒙德·罗伯逊和

---

[29] 《供词》，菲茨威廉文件，F. 46(g)。

[30] 国王对伊登案，豪厄尔的《国家审判集》，第 31 卷，第 1070 栏。

[31] 奸细伪造的誓词往往显得更可怕，例如有一个誓词就含有砍掉叛徒及其家人的头和手的内容。

博尔顿的弗莱彻中校之流，这些人对卢德运动的仇恨根深蒂固，和曼彻斯特臭名昭著的副警事长纳丁一样，会不惜以暴力及欺诈手段谋求定罪。但也还有另一种公众舆论是需要对付的。例如约克郡西区的辉格党郡守菲茨威廉伯爵就是一个持温和立场的人，他后来因公开抗议彼得卢事件而丢掉官职，因而不大可能容忍实际的挑唆活动。法官贝利先生在处理中部地区卢德派的几个案件中，因其宽大为怀而大受攻击。另外，在 1812 年夏，曼彻斯特一个更重要的案子中，陪审团也不肯将纳丁试图"罗织"的 38 名激进改革派定成从事卢德派起誓的案件判定有罪。司法官员们深知，定罪并不是自动成立的。[illegible]

此外，这时的政府为劳动人民所痛恨，又实在不讨中等阶级许多人的欢心。即使司法官员在类似布劳顿这样的证词基础上提出以叛逆罪起诉，如此办案也不合当局的利益。人们会怀疑他们的行动主要有政治动机，就会激怒公众舆论。因此他们想干的是将起诉限于明显的犯罪行为上，如砸毁机器和半夜袭击，抢劫武器，进行宣誓等等。像布劳顿所作的这种证词对法庭来说，无论如何显得证据不足，特别当被告聘请布鲁姆这种人当辩护人时更为如此。这种证词的依据只是一些未经证实的革命言谈，或有外地代表参加的会议而代表姓名又往往不知或只是假名，要不就是明显的夸张和完全不可能的各种说法——比如说卡特莱特、惠特布雷德或伯德特将领导革命等等。

580

事实上，最古怪的冲突发生在地方当局和内政部之间，而以 1812 年夏秋在约克郡表现尤为显著。"劳埃德先生是斯托克波特一个非常活跃的律师，他受政府雇用，向各地派奸细以搜取情

[illegible] 这就是为什么主要的卢德派案件都由特别法庭审理。

报”(约克一个治安法官写信给菲茨威廉说)。[204] 他在内务大臣的直接保护下行动，采用一些为某些乡村治安官所不齿的方法来拼凑完整的案件，他还把主要证人实际上都绑架起来，带过彭奈恩山脉实行秘案保护性拘禁。[205]

有人会说这只是处理方法的不同。一方面，内政部（在西德默思领导下）执行的是导致战后发生奥利弗、爱德华兹、卡斯尔挑唆事件的政策。西德默思、劳埃德、纳丁这些人想进行大规模逮捕，进行耸人听闻的审判和执行死刑，在卢德派和改革派的心灵上打下恐怖的烙印，而几乎全不顾受害人是不是“真正的卢德”派，也不管用什么方法来编造证据。另一方面，像菲茨威廉和拉德克利夫这种人并非不希望整垮卢德运动，但他们在方法上比较谨慎，决心抓住真正的犯人——例如暗杀霍斯福尔的凶手和攻击卡特赖特工厂的人。这样，交付审判的主要案件（除曼彻斯特的三十八人案之外）都是要针对特定罪行而蛮有把握的“侦破、定罪、判刑之实例”，较严重的政治煽动罪名则被细心地掩盖起来。即使是哈里法克斯民主派一案，虽说其暗藏有政治动机已无可置疑，[206]起诉也只是煞费苦心地以犯人的见解间接治罪，而把案子置于在某种具体场合下向某个具体人进行宣誓这一明显行动的证据上。因此，如果要问为什么不提出叛逆罪，答案是这种罪名不得人心、在法律上不可靠，并可能以无罪开释告终（如曼彻斯特的案子那样）。 581

[204] 菲茨威廉文件，1812 年 7 月 9 日，F.46(g)。

[205] 这种古怪的争端可见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 315 页以始，及达维尔前引书，第 125—133 页。

[206] 《财政部司法处文件》中“国王对贝恩斯案”概要开头就说：“老贝恩斯为制帽工，以对政府不满而臭名昭著”，见《财政部司法处文件》，第 11.2673 号。

当局也不愿大批审判起誓案，它只想将其终止。[90] 为做到这一点，他们希望把最便当的案例作为典型，进行审理，叛处流放。而出于不同的原因，哈里法克斯和巴恩斯利人被挑了出来。若设想当局一心一意要把每一桩事都穷追到底，这是弄错了权力的本性。在约克郡，一旦杀死霍斯福尔的人被处以死刑，一旦有几个人因宣誓活动而被流放，另有 14 人因抢劫武器和深夜袭击而走上绞刑架时，"受损伤的法律"和秩序的价值就得到了补偿。再走远一点就会叫公众的舆论受不了，直到北方每一个治安官和厂主们都终日在咒骂声中生活。卷宗正是在此合上的，大赦由此发出，报复不是足够了吗？

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提交审判的案子，也不能用起诉使用的证据来讨论卢德运动的组织。事实上，当局通常是根据不在审 582 判中提出的证据及强烈的猜测来行事的，[91] 他们握有关于秘密集会、操练、起誓、互派代表等等的大量证据，其中有些是捕风影，有些是声名狼藉，多数在法庭上很少有价值。这些证据包括匿名信和告密者的信件、供词，有一些简直是无关紧要的，例如有一份材料描述卢德派的暗号系统：

---

[90] F.雷恩斯的见证《诉诸公断》(1817)，尤说明问题。雷恩斯上尉指挥一班人，特别负责渗透并探寻卢德派教唆人的工作，曾在兰开郡(1812 年 6 月至 9 月)，及约克郡西区(1812 年 9 月至 12 月)。出于个人恩怨，他后来发表了供职记事和与顶头上司的通信。在兰开郡的某些区如纽顿，起誓"在制造业及下等人当中几乎普遍存在"。他的特务不止一次渗入密谋中，但卢德派(察觉自己败露了)立即跑到最近的地方官那里忠诚宣誓，"洗清"自己的干系——这使雷恩斯上尉十分恼怒，细读这本小册子，就不会再怀疑起誓的流行程度了。(曼彻斯特市立档案馆抄本)。

[91] 到这一点上作此详述是因为它也有助于澄清有关德斯帕德和布兰德雷思两案的某些混乱看法。财政部司法处现存的简短记要表明，政府方面的司法官员极小心地筛选证据，导致最容易证实的公开活动。就连在奥科伊格里案中(见前文，第 170 页)，政府方面的概述上也加批道："是否要提人侵爱尔兰一事？"(财部司法处档案，第 11.333 号)。托马斯·培根案见后文，第 665 页。

你必须把右手高举过右眼——假如有另一个卢德派在场，他会把左手高举过左眼——然后你应将右手食指举到右嘴角边——另一人就把左手小指举到左嘴角边并且说：你是干啥的？回答：铁了心眼儿的。他会说：为什么？你答：自由。[29]

这一类供述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但假如我们步哈蒙德夫妇和达维尔的后尘，忽视所有这些证据，[30]我们就落到了可笑的境地。我们必须假设当局实际上通过自己的特务制造出密谋的团体，然后又制定新的死罪，而这些罪行（如起誓）又只存在于想象中，或只是他们自己奸细迷惑的结果。再者，这种说法的全部含意表现出他们未能从地方社会的角度去考虑卢德运动，尤其是诺丁汉和约克郡西区，这里卢德派的力量之所在是一些工业小村庄，那种地方每一个人都与邻居们相识又束缚在同一个亲属密封网中。誓言的制裁对有迷信心理的人们来说，已经够可怕了，而集体的制裁力甚至更强。卢德派领袖在各自的村庄中都深孚众望，如手织工乔治·豪沃思，他也许是约克郡秘密委员会的一员——他“气色很好，身材粗壮，交往中的好歌手，谈吐粗俗，好像是乡下人……”。[31] 当局极难叫一个证人出来说出邻居的名字，这部分是由于害怕卢德派报复，但更重要的是，充当密探就是背叛道德经济学，承受着被逐出群体的危险。就连地方官也只能把本杰明·沃克，那个为政府作证告发梅勒的凶杀帮手视为犹大。梅勒在其被处决前夕曾说：“他宁

583

[29] 菲茨威廉文件，F. 46(g)。

[30] 这一类证词在内政部档案中相当多，提及进行操练的代表、革命的目标等等。达维尔对此不作任何引述，只在注脚中轻蔑地把每一个例证都说成是密探们想象或切身利益的产物，这就使他容易提出论点了。

[31] F. 雷恩斯前引书，第114—115页。

愿处在现在这样一个地位上，尽管这很可怕，也不愿对告发人的罪行负责，他不愿和告发人互换位置，即使有自由和2000英镑也罢”。那些为当局提供证据而救了自己一命的卢德派，他们的情况甚至比处死的人还可怜。有一个教友派教徒曾在约克处决一批人后去见沃克，发现他“面色……苍白可怕，全身骨架子像散了一样，几乎撑不住他的身体。”事实上他从来没有领到答应给他的那2000英镑血腥钱。他继续过悲惨的流浪生活，最后竟沦为乞丐。诺丁汉有两个告密的卢德派害怕丢命，便恳求政府送他们去加拿大。其他有告密之嫌的人被完全冷落，一个约克郡人不肯再和妻子共同生活，因为她轻率愚蠢地提供了证据，导致罗福尔兹袭击行动中的一个人被处决。几年后，两个约克郡告密者在相似的情况下被人们冷落，直至终其余生。他们若走进房间或是酒店，聚在一起的人会立即住嘴不说话，或站起来走开。[⑪]

我们应想象一下集体的团结，想象当局极端的孤立，正是这一点把卡特赖特和罗伯逊提拔到夏洛蒂·勃朗特心目中的英雄的高度，在宪章派宣传运动中，她自己也经历过霍沃思牧师公馆中的孤立之苦。罗福尔兹受攻击时，尽管枪声大作，村子里却没有一个人去救援。只是当卢德派撤退之后，才有三四个本地人跑出来，说他们站在被围的人一边的，被围攻的人是哈孟德·罗伯逊牧师、科克希尔先生（大染坊商）、狄克逊先生（化工厂经理），加上当地的美食家名叫克拉夫。他们很快被七嘴八舌的人群围住，这些人的同情心很清楚是在受伤的卢德派

584

⑪ 《卢德派历史纪实》（哈德斯菲尔德，1862），第79页；皮尔：《卢德派起义》（1895），第278页；皮尔：《斯彭谷：过去与现在》，第261、264页；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241—242页；赛克斯和沃克：《比尔家的本》，第335页。战后，政府采用的做法是答应把工人阶级告密者送往某个殖民地。亦见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259—261页。

一边。[19]此外，审判和葬礼都为表现群众的同情提供了机会，这有时是以威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有时则以宗教狂热的形式。诺丁汉提审被控的卢德派是在恐吓和示威中进行的，有一次还在一个挤满人的审判室里进行，据说其中包括武装人员，有一个陪审团曾判定几个人参与了 1812 年 3 月诺丁汉的卢德派攻击活动，因而其陪审长就一直被追踪到沃克索普：

先生

受卢德将军专送特快《快件》之命，我到沃克索普查询你对我们事业的态度。我遗憾地说我发现它合乎你最近对我们的行动。切记，像你这种人后悔的日子很快就要至(到)来，不久就会有人找你。切记——你(是)受监视的人。

为卢德将军代笔：一个真正的人。[20]

尽管约克郡审判在约克举行，离闹事中心有 30 多英里，当局还是另外征召了武装人员，害怕有人劫狱。被处死的人坚强不屈，就连反对他们的人都为之钦佩。梅勒和两个伙伴不肯作任何招供，几天后处死的另外 14 人也一样。“假如这些不幸的人知道什么秘密的话，《利兹信使报》写道：他们是带着这些秘密殉节了，发掘这些秘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21](据传

[19] 皮尔：《斯彭谷》，第 255—256 页。参见《利兹信使报》(1812 年 5 月 9 日)：“……我们相信下层阶级中普遍倾向是得意洋洋地来看待这伙人的活动，更不用说是倍加赞许了，这就是结社的力量及生命之源泉之所在。”

[20] 内政部档案，第 42.122 号。

[21] 有个军官曾目睹处决，他写信给拉德克利夫说：“我认为有 8 个真正的卢德派……9 个趁火打劫的强盗”(即破门而人的人)。监狱牧师告诉他“真正的卢德派”不肯忏悔：“我确实相信他们认为即使有罪也决不是什么大罪”，他还说：“我相信他们都是卫斯理宗教徒”。《诺顿中校 1813 年 1 月致拉德克利夫》，《拉德克利夫手稿》，第 125.14 号。

585 说，首席法官这次表现得有一点轻浮，有人问他14个被处死的人是否应该被吊在一根横梁上，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哦，不，先生，我想他们还是吊在两根梁上好，这样会舒服一点。"）首批带去当一大群人面执行处决的7个人，边走向绞架边唱卫斯理宗的赞歌：

瞧那人类的救星，
钉在耻辱的树上，
多少爱倾注着他，
他为我死，为我伤。
听，他在呻吟！天地在颤动，
大地的柱石在倾斜，
神庙的帷幕碎成片，
坚固的巨石也开裂。
而后，他付出宝贵的赎金，
高叫："将我的灵魂拿走"，
看他垂下神圣的头，
他死了，垂下神圣的头。[41]

在所有这三个郡，我们都有一种印象，即当地居民给一切卢德派活动予以道义上的赞许，只有实际的暗杀行动除外。当局自己也曾抱怨说：

对这些罪行在道德上的败坏提出质疑，反给它们增添了勇气，宗教狂热将罪恶推向高潮，不幸，这种狂热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实在是太多了。[42]

---

[41] 《约克特别法庭审判记录》（利兹，1813），第67—69页；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332页；H. 克拉克森：《回忆可爱的威克菲尔德》（威克菲尔德，1887），第40页。

[42] 给核准的约克郡审判引言，见豪厄尔：《国家审判集》，第31卷，第964栏。

正如民间传说把所有的坐探都描绘成犹大一样，夏洛蒂·勃朗特在讥讽摩西·巴勒克拉夫时也采用中等阶级的看法，说他是个“喧嚣派”传教师，“结伙的卫斯理宗派”，伪善的卢德派教唆犯，并且用《旧约全书》的调子来谈论对杰勒德·摩尔的暗杀企图：“恶棍完蛋时，人们齐喝彩；旋风过去后，恶棍不再来。……”[20]这里的证据也和往常一样混乱。在约克被处死的人中有两三个肯定是卫斯理宗信徒。但即使他们中许多人是受卫斯理宗（或其喧嚣派及索斯科特派旁支）的文化所哺育，其牧师死在牢中也仍然对他们无能为力。而牧师们特别关心的就是使卫斯理教免于牵连。对《旧约全书》的热情已几近于是一种阶级团结，就连杰贝兹·邦廷也很难渗入。 586

卢德派葬礼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在1811年11月一次骚动中被杀的卢德派约翰·韦斯特利的葬礼，成了诺丁汉反映公众同情心的一个机会。他的“遗体被死者生前的一群会友们簇拥在前，他们手持黑杖，上面缠着黑色纱结”。

> 场面真是可怕。郡长大人、副郡长及五六个地方官在场，由一队巡捕及大约30个龙骑兵作陪……尸体移走之前，城里好几个地方宣读了防暴令。[21]

因伤在罗福尔兹死去的两个人也得到同等同情。哈德斯菲尔德阻止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葬礼，这仅是因为当局悄悄地在预料的时间之前埋葬了布思。哈特利的葬礼在哈里法克斯，有成百上千的人参加追悼会，手臂上缠着白纱。他的朋友要求以卫斯理宗的仪式埋葬他，而当邦廷拒绝颂祷告时，就出现了愤怒的场面，下一个星期天有大量人群集合起来参加一次追悼仪式。当

---

[20] 《雪莉》，第8、15章。

[21] 《利兹信使报》，1811年11月23日，贝利前引书，第4卷，第247页。

地一个跛脚的传教士乔纳森·萨维尔回忆说,那是"在哈里法克斯教堂的最大的一次集会",

……人们从远近各地赶来表示他们对死者的哀伤，他们把教堂挤得满满的，成百上千的人站在外面进不来，巡捕们在门口巡行以维持治安，那天下午安排好的牧师跑到哈德斯菲尔德去了，大概是想回避一下。……

邦廷还不肯登台,而命令萨维尔代替他。跛脚牧师于是就信教者与不信教者死亡之间的区别加以宣讲:

现时不信宗教的情况在下等人中也许比任何时候都盛行,……我说:"不信教,死之亦难,死神来临时永不可收起黑旗!"这似乎效果很好……

587 但效果并不像萨维尔想造成的那么好,他在走回家时被人扔了石子,墙上和门上有人用粉笔写字:"为无辜者的鲜血复仇"。事件后的几个星期中,邦廷(他也收到了恐吓信)在下乡赴约时都给配备了一名武装护卫。当卫斯理宗牧师拒绝为在约克处死的人举行葬礼时,霍尔姆弗思和格里特兰(在哈里法克斯附近),也出现相似的麻烦。[29] 同样的群众抗议也出现在1816年11月的诺丁汉。詹姆斯·托尔的葬礼上,当时一个充当地方官的教士怀尔德牧师禁止宣读丧葬祈祷。尽管如此,还是有3000人参加了仪式,据一个奸细报告:

我听说,一个小学校长分发咏叹曲,由6个年轻妇女从他家一直唱到坟墓……棺材盖上有一个星或十字,许

---

[29] J. U. 沃克:《哈里法克斯卫斯理宗历史》(哈里法克斯,1836),第255页;E. V. 查普曼:《约翰·卫斯理公司(哈里法克斯分部)》(哈里法克斯,1952),第35页,F. A. 韦斯特:《乔纳森·萨维尔回忆录》(1844),第24—25页。

多人猜测那表示什么意思，有些人说那是因为他至死不屈，其他人说，是因为他被吊死了，还有人咒骂怀尔德牧师不准宣读丧葬祈祷。巴德说……那对詹姆斯没什么意义，因为他不要牧师在身旁。[21]

对卢德运动作为产业性的有限解释或否认其暴动反叛的基调而仅谈论一小批"头脑发热的人"，这一类说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即使在诺丁汉，那里的卢德运动在追求产业目标时也表现了最大的纪律性，其捣毁袜机和政治煽动之间的联系也仍在交叉出现，因为不仅是针织工，而且是一般的"下层等级"都在卢德派对袜商、军队和地方官的斗争中与其合作。在兰开郡——虽说那里的组织骨干是由织工组成的——煤矿工、棉纺工和各式商贩也都在动荡中有份；在约克西区，虽说攻击的目标是起毛机和剪绒机，与卢德派合作的人却不仅是剪绒工，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织工、裁缝、鞋匠及几乎每种手工行业的代表"。约翰·布思，在攻击罗福尔兹时被杀害的那位牧师之子，就是一个马具匠的学徒。[22] 被带到约克特别法庭受审的犯人中，有28个剪绒工，8个农工，4个织工，3个鞋匠，3个煤矿工，3个棉纺工，两个裁缝，两个布商，及屠夫、起毛机制造工3、木工、织地毯工、制帽工、小贩、店主、石匠、船工和毛纺工各一人。[23] 588

我们现在要试着来解释一下卢德运动的原因，它在诺丁汉是以直接的"工会"强制行动的形式于1811年开始的，受到工人

---

[21] 哈蒙德夫妇前引书，239页。

[22] 皮尔前引书，第6、18页。

[23] 《约克郡……巡回法庭审理报告》（汉萨，1813），第14—19页。但应该说明，这些人中有一些是假卢德派，他们被指控打家劫舍，而制帽工、鞋匠和起绒机制造工是哈里法克斯的民主派。所有因参加罗福尔兹事件而被起诉的人都是剪绒工。亦见《财政部司法处文件》，第11.2669号。

群体的支持，因此，它立刻被指控非法，正是这种处境迫使它向更叛逆的方向发展。1811 至 1812 年之交的冬季，“代表们”很可能去了北部其他地区而不管他们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24]约克郡卢德运动(1812 年 2 月)则在更富于反叛性的气质中发生。一方面，剪绒工积压已久的忧郁之火被诺丁汉的榜样所点燃，另一方面，民主派或潘恩派小团体在卢德运动中看到了更广泛的革命机会。这两种动力都可以在两封卢德派信件的字里行间看出来。它们都寄于 1812 年 3 月，第一封信可能发自哈德斯菲尔德，其中表达了剪绒工的特殊疾苦：

> 注意：……将军……命我通知你们哈德斯菲尔德地区的整布工，已花费 7000 英镑向政府请愿以执行停止使用剪毛机及起毛机的法律，但毫无效用，故开始试用现在这个方法，他也听说你们怕它会被用于其他目的，但你们不必害怕，因为一旦这种罪恶的机器停止使用或被摧毁，将军及其勇敢的军队就将解散，像其他忠诚的臣民一样回去工作。[25]

另一封信发于大约一星期前，最不可能像一个“忠诚臣民”写的。它暗示摄政王未能组成和平、改革的内阁，因而引起失望(后来成为在曼彻斯特交易所发生骚乱的原因)，这就是卢德运动的导火线：

589

> 我们开始动手干的直接原因是摄政王写给格雷和格伦维尔二勋爵的那封卑鄙的信，它使人们失去了对于逐

---

[24] 如可见一封被截获的从约克寄给诺丁汉一位弟兄的信，谈到一位住在他们那儿的诺丁汉人：“我们……把他作为你的一位朋友接待了他，我们相信他正是这样。我们用一两罐啤酒款待大家，他给我们念卢德先生的歌。”1812 年 4 月 19 日，《拉德克利夫手稿》，第 126—132 号。

[25] 《拉德克利夫手稿》，第 126—127 号。

渐好转的一切希望，还有他和珀西瓦尔这帮流氓同流合污，而我们把国家的一切苦难都归于这些人。我们希望法国皇帝[26]能帮助我们摆脱这有史以来最腐败、最无耻、最残暴的政府之压迫，打倒汉诺威暴君和一切大大小小的暴君。我们将受一个公正的共和国的治理。千百万国人衷心希望并祈祷全能的上帝促进这幸福的时刻赶快到来。……[27]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封信都确凿可信，那就意味着约克郡的卢德运动源出于不同的图谋。如果是这样，反叛的气质就随事件的逐一发生而占上风。这样，由弗兰克、皮尔搜集的口头传说的影响力必须重视。据这些传闻，哈里法克斯的老制帽工贝恩斯确处于一群"汤姆·潘恩分子"的中心位置上，他们在哈里法克斯组织了一个"民主或共和派俱乐部"，在鞋匠神酒店开会。在这儿，一次重要的卢德派代表会议于3月份召开，而贝恩斯作为主席表示欢迎他们的运动。

30年来我力争唤起民众反对这种罪恶，……因为我的观点而深受身心及财产之苦。现在，我已接近我的天年之限了，但我将死亦如生；我最后的年限仍将奉献给人民的事业。我欢呼你们起来反抗压迫者，希望反抗继续下去，直至没有一个从事征服的暴君。我已经等了许久，期待着来日的黎明，我虽已老了，却仍可能看见民主的凯旋胜利。

据同一传闻，一个叫韦特曼的诺丁汉代表也发言说："本委员会与一切不满情绪中心区团体保持每日的联系，并主张在5月份

[26] 指拿破仑一世。——译注

[27] W.B.克伦普前引书，第230页。

发动一次总起义。”[26]

有理由设想：在这些说法中，不是个别的词句，而是其总体倾向是真实的。当局显然下决心要给贝恩斯定罪，虽说其奸细的证据完全靠不住，一个证人声称贝恩斯曾说他“不屑与任何人来往，除非这个人理解贵族与民主这两个字的含义”，而法官则认为贝恩斯曾炫耀“其双眼已睁开了 23 年”，[27] 这使其罪恶更为昭著。这个案子仅仅是想“陷害”当地的激进派还是说他们确实与卢德运动有关联，这是另一回事。但兰开郡主要的告密者“B”在 1812 年 3 至 4 月写的报告中提供了某些线索。“B”声称有一个叫沃尔什的利兹代表来找过他，还（在 4 月）收到过利兹某个叫曼的人的信，叙述卢德派的成功举动。[28] 沃尔什告诉他，利兹的秘密委员会“不让任何老雅各（即雅各宾派）活动，因为他们近年来一直受怀疑”：

> 有些老雅各希望活动，但老委员会活动得太过分，既不谨慎又不成功，所以没有一个被准许进入委员会，而只是流（留）在后台。

约克郡的组织（沃尔什对“B”说）是由一个“行业委员会”指导的，其会议都是极其秘密地在利兹举行的：

> 委员会从不在酒馆开会，而是在私人家里开会，如果天气允许甚至晚上在野地里开会，而且不像过去办事时

---

[26] 皮尔前引书(1880)，第 23—26 页。在其 1888 年的第 2 版前言中，皮尔叙述了这些传说是如何流传下来的。

[27] 《巡回法庭审理报告》，第 124、207 页。

[28] 詹姆斯·曼是利兹剪绒工，1817 年人身保护令中止时被捕（见后文，第 668 页），后来成为利兹最主要的激进派书商。如果这两位“曼”是同一人，那是很有趣的。

那样让整个镇子都知道。[234]

有可能正当"老雅各们"在利兹留在后台时,哈里法克斯的卢德派则不那么谨慎。有人说在罗福尔兹攻击行动失败后,约克郡卢德运动采取更普遍的反叛形式,这种说法是符合现存证据的。无疑到4月间,约克西区已经有某种代表制度在活动。罗福尔兹以后,卢德派组织将其重点转向总体革命的准备工作。4月至9月,经常有抢夺武器、收集钱财和进行宣誓的传闻出现。铅(做子弹用)像热天的雪一样不见了,"唧筒和水管总是失踪",[235] 就连染桶和排字版隔条都会不见。密谋蔓延到如设菲尔德和巴恩斯利这些地方,而这里既没有剪绒工,也没有起毛机和剪绒机。卢德派受激于"推翻政府这种浅薄的观念,其组织这时已蔓延到全国,他们也搜集到了足够的武器"。[236]

591

如果说约克郡的卢德运动从剪绒工的疾苦向更一般的革命目标扩展,那么兰开郡的不满则有一个单独的主题将其纠合起来。抢粮风潮、煽动性的粉笔标语,私下鼓动政治改革,地下工会委员会,抢夺武器、袭击动力织机以及密探的挑唆等等同时发生,有时是自发地,而且相互间常常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在《技术工人》一书中,"兰开郡卢德运动"是最不令人满意的一章。有些显然不实,比如说到1812年5月初,兰开郡和切郡的所有动荡都已终止。其他一些说法——例如对博尔顿的几个密探及曼彻斯特的"B"赋于了过大的影响——则是建立在推测和特殊抗辩的基础上,不过表面上似乎是在叙述。结论几乎很可笑,作者要我们相信1812年5月,步兵的71个连,骑卫兵和龙骑兵的

---

[234] "B"的报告,1812年3月25日,4月18日,内政部档案,第40.1号。"老委员会"和"过去办事"大概是指1801和1802年的密谋,见前文,第474—478页。

[235] 《利兹信使报》,1812年6月6日。

[236] 皮尔前引书(1880),第9页。

27个支队,加上成千上万的特别巡捕(仅索尔福德一个村就有1500名)在兰开郡辛辛苦苦地执行任务,原因只是"老S"、"小S"和"B"用一些关于暴动的故事吓坏了他们的主子,同时又发生了一些自发的抢粮风潮。

最值得注意的是,哈蒙德夫妇在处理史料时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以某种假设为其研究之始,也就是假设工人方面任何真实的暴动意图若不是极不可能,便必定是错误的,不值得同情的,因而应归咎于工人中昏乱的不负责任的一翼。然而却很难弄懂在1812年为什么要这样想。这时战争已持续20年了,中间只有一年的间隔。人民没有公民自由,没有组织工会的自由。他们没有预见历史的能力,不可能知道以后的30年中等阶级将得到选举权,而因此感到慰藉(况且那时他们中会有多人已经死了)。1812年,手织工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灾难般地下降。人们饿极了,不惜赔上性命去掀翻一桶马铃薯。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人们没有策划革命起义,会比策划了更叫人吃惊,而且这种情况看来完全不可能哺育一批渐进的宪政改革派在一个不允许其政治存在的制度下活动。

592

人们至少会猜测,民主文化会要求这些处境不妙的人处事谨慎并谦恭。但事实上却不是这么回事,对这个时期作研究的历史学家中,有几位(哈蒙德夫妇、韦伯夫妇和格雷厄姆·华莱士)具有费边社信念,他们根据后来的改革立法和工会代表大会及工党的成长过程来回顾"工人运动的早期历史"。由于卢德派和抢粮的人看起来不像是合格的"工人运动先驱者",他们就既不同情也不对此多加注意。这种偏见还从另一方面得到补充。加上了那种正统经院传统的更为保守的偏见,于是"历史"就公正地对待了托帕德尔烈士,令人作呕地对待了弗朗西斯·普雷斯;而数百个因为起誓,因为雅各宾密谋,因为卢德运动、彭特里

奇和格兰奇沼地的起义，因抢粮、圈地、税路风潮及伊利暴乱和1830年农工暴动及几十件较小的骚动而遭处死、放逐的男男女女们则被所有的人忘却了。只有少数几个专家还记得，而即使还有人记得他们，也把他们看做是傻瓜或沾染着犯罪恶习的蠢人。

但对那些生活于其中的人，历史既不“早”也不“迟”。“先驱者”是已往的又一个继承人。人们应该根据其自己的环境来判断，而在这种环境中，我们能看出像乔治·梅勒、詹姆斯·托尔、杰里迈亚·布兰德恩这样的人具有英雄的本色。

甚而，偏见可以深入到历史研究的细节上去，这特别适用于兰开郡卢德运动的情况，只有把内政部档案中有关其革命性的种种供词都视为虚假，要相信这一点只能有一个理由，即先假设这些证据注定是假的。而一旦如此假设，哈蒙德夫妇就航行于虚构历史的大海之中了。试举例：在卢德运动和战后年代里兰开郡最经常进行告密的是一个叫做“B”的人，这个“B”有可能自1801或1802年起就已经受雇做密探了，[29] 他同时为曼彻斯特极端激进派所信任。他的名字叫本特，是个小商人，1812年据称是“买卖废纱头”的，[30] 相对来说比较富裕，他常被任命为各不同秘密委员会的司库——这对密探来说，是个很好的监听位置。很显然，他的处境极利于提供内部情报。 593

在《技术工人》中，“B”时常出现，扮演一个激化感情、煽风点火的人：

---

[29] 见《技术工人》，第67、73页及本书前文，第493页。但并不能绝对肯定“B”就是这个人，因为还有其他的“B”在受雇用——比如说巴洛。见前文，第489页。

[30] 《H.亚伍德1812年6月22日的口供》，载内政部档案，第40.1号。他还被描述为是一个“体面的棉花商”，见《曼彻特三十八人审判全录》(曼彻斯特，1812)，第137页。

内政部档案中有大量从他那里来的文字不通的书信，其中满是可怕的暗示，说下层的爆发正在临近，并受到神秘的上流人物的鼓动。他喋喋不休的主题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全国不同地区想发动总起义。

（哈蒙德夫妇宣称）兰开郡卢德派的起誓“不无理由去设想……是出自‘B’的发达大脑”。当他们发现证据表明曼彻斯特的一个代表走访了斯托克波特手织工的一个秘密委员会，想把他们卷进革命的准备之中去之时，哈蒙德夫妇找到了一种方便的解释：

现在，通读过这一时期内政部档案的人，无不可以听出在有关曼彻斯特代表言论的报告中回响着“B”的声音。……

基于这种假设（有冒似高深的知识的支持，因此很难有几个读者会对此加以质问），煽动的虚构就编造出来了。但仅几页之后，当上述这些作者们相信“B”的报告中的另一部分适合他们口味时，他们又殷勤地告诉读者说：“本特曾当真想诱使其同伴们使用暴力活动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像约翰·奈特 594 这种人就不会再信任他。……”总之，“B”的报告可以任意歪曲，只要它刚好适合情节的需要就行。

有人会说对内政部档案可以有不同的读法。本特不是挑唆者，而只是告密者，他把他的活动限制在能确保其激进同伙们持续信任的范围内，他似乎是个有点愚蠢但又机警的人，这种混合性格并不见得反常。因此，他的证据只有当他描述他亲身参加的事件时才可信，而他在报告不可告人的目的或国内其他地区的组织情况时，他只是在传递更残忍的蛊惑家的海口吹牛而已。至于说本特就是把斯托克波特委员会卷入到密谋计划里去的曼

彻斯特代表，这种说法也经不起检验。[29]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再追踪挑唆这条线索，就有可能把兰开郡卢德运动的内部历史整理得更有条理，而在很大程度上仍使用哈蒙德夫妇用过的同样史料。首先，我们应该记得雅各宾主义在兰开郡比在其他任何工业区都扎根得更深，而且爱尔兰移民还使它具有特别的革命色彩，兰开郡几乎独一无二地有一条不间断的公开鼓动反战和改革的延绵之线，从18世纪90年代起，经过"联合英格兰人"，一直到卢德运动。1808年，这种鼓动不仅在曼彻斯特，而且在罗伊顿、博尔顿、布莱克本等地都有报道。当一批博尔顿手织工宣布打算在两个月时间内每个星期天都在城外的契据沼泽举行示威时，他们问道：

> 这难道还不是把英国宪政从它的藏身之地拖露出来，透露其本来的纯真实朴，而将祖先的法律昭示于每一个人的时候吗？[30]

年复一年，手织工争取最低工资的无效宣传，把他们驱赶到政治鼓动的方向上去，不管是革命还是立宪。

其次，当卢德运动于1811—1812年开始时，非法的工会活动，已经在兰开郡植根很深了。我们已注意到曼彻斯特手工行业和棉纺工人的组织和协商程度。手工织工的组织可能也相当广泛并基础牢固。在兰开郡的城镇甚至某些村庄，都有某种程度的织工代表制"秘密委员会"，在诸如向议会提出要求、请愿、 595

---

[29] 1812年整个早春"B"都定时不断地发出报告。哈蒙德夫妇关于斯托克波特2月会议的说法基于托马斯·惠特克的口供，但"B"于3月25日还报告，说他仍未能得以参加任何秘密会议，虽然他希望不久就能获准参加（内政部档案，第40.1号）。4月份他确实成功地参加了几次织工的会议，但被排除在5月份一次重要的会议之外，原因是在金钱问题上发生争执（亚伍德口供，内政部档案，第40.1号）。

[30] 见阿斯皮诺尔前引书序，第23页注2，第98—99页注1，第100—101页注2。

征集基金等问题上习惯于相互磋商。[48]

所以，当卢德运动传到兰开郡时，并不是搬进了真空。在曼彻斯特和较大的中心地区已经有工匠工会、织工秘密委员会和一些新老潘恩派激进分子的小组，还有一个奔放的爱尔兰人旁支。兰开郡之所以是奸细、挑唆分子活跃的土壤，并不因为这里事太少，而是因为这里事太多。报告中矛盾百出，并非全体告密者都在撒谎，而是因为运动本身有矛盾。在一个像兰开郡这样政治上相对成熟的地区，必然会对捣毁机器这种做法有不同的看法。工人团体中这种冲突在 1812 年 2 至 4 月底造成许多不和。因此，可能在 2 月某个时期真正的卢德运动方针受到织工代表会议的支持，他们代表若干城镇的秘密委员会。据一个叫亚伍德的人供称，织工们加入(起誓"入伙")一个以捣毁蒸汽织机、积钱购买武器并以武力反对为宗旨的组织，而亚伍德自己就是斯托克波特秘密委员会的小组代表。该组织每周征收一便士会费，而约翰·巴克利·布思[49] 这位前"非国教的牧师"，事实上被聘用了一两个月的，做专职组织工作。但在这一点上亚伍德的说法含混不清。其他行业，尤其是纺纱工、裁缝和鞋匠，似乎在曼彻斯特和斯托克波特的秘密委员会中也有代表，而且除织工外还有许多其他人"入伙"。但亚伍德并不知道委员会的确切计划，他只是斯托克波特组织的一个地区书记，他把钱交给约翰·巴克利·布思并从他那里接受指示。

596

---

[48] 见《A.B.里奇蒙的证词》，引自前文，第 542 页。非茨威廉文件，F46(g)中也有一段完整的证词涉及一个影子"织工工会"，据称散布于"从伦敦到诺丁汉，再从诺丁汉到曼彻斯特和卡莱尔"之间由最严格的保密制度维系在一起，在不同组织层次上有不同的级别的起誓，传送文件时十分小心——如约定在晚上在草场开会，在一块指定的地角上放一根空心杖传递信息等等。

[49] 也许是当地的传教士。

从亚伍德和其他人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委员会之间是分裂的。早在4月5日曼彻斯特委员会就拒绝了“卢德派”。

> 那天晚上他们彼此争执不休，各区甚至没有凑到足够的钱去支付秘密委员会喝的一点点东西。

为派代表到博尔顿和斯托克波特去，“通知他们曼彻斯特不愿一致行动”，就有必要弄一笔钱，可以（根据亚伍德的提议）向“本特先生借……，我曾见到他在摄政王之徽酒店里和秘密委员会在一起”。4月中旬的骚乱在多数场合下似乎是一些自发的事件，并不是秘密委员会发动的（甚至未得到其支持）。4月底，曼彻斯特各业（特别是纺纱工和裁缝）拒绝支付更多款项，结果，曼彻斯特代表（包括本特）被排斥于5月4日在费尔斯沃思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代表会议之外。

这以后，兰开郡似乎出现了并行的（也许不是交叉的）两种组织形式。一方面，运动的一部分致力于恢复对和平与议会改革的宣传。本特报告说，5月18日召开过一次代表会议，为此目的准备一份请愿书，与会的代表来自兰开郡及约克郡的某些市镇，像往常一样，他设法使自己当司库。约翰·奈特等“38人”所卷人的正是这个宣传，他们6月份在曼彻斯特被纳丁逮捕（本特告密的结果），罪名是进行起誓活动。另一方面，运动的另一部分肯定是在做暴动准备工作。早在3月28日本特就曾称与爱尔兰的密谋者开过一次会：“他们是危险的亡命之徒，其中至少有4个人曾参加过爱尔兰叛乱”。4月份他宣称确曾有爱尔兰的代表造访过他，这个人到过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和格拉斯哥，还准备到德比、伯明翰和伦敦去，他自称是爱尔兰叛乱的一名军官，说自己叫帕特里克·坎诺文，“他大约40岁，绅士风度，黑衣贴体，穿黑帮长靴。下一个来拜访本特的是伯明翰代表，他 597

在经普雷斯顿和卡莱尔去格拉斯哥的路上顺道到曼彻斯特。5月中旬又一位代表从制陶区的纽卡斯尔来，拜访了委员会一名成员，带来消息说，在他那个地区有好几千人起誓并武装起来，但伦敦却"非常落后，……出人意外地没有按预期的精神行事"。伦敦卷入密谋的"主要是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和裁缝"，即"针线骑士"。

关于地下活动的说法并非绝对不可能，而地下活动的主要联络渠道是1798年的爱尔兰难民。但若把事情截然分开，分成这半边的合法改革者和那半边的造反的爱尔兰人，这样做就又错了。同样有可能的是，较成熟的政治改革者们认为自己是比机器破坏者更严肃的革命者。[⑲] 本特5月初写道：

> 执行委员会建议人们要和平处事，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扰乱治安——扰乱治安的人不是入了伙的人。……

5月6日，一个匿名的雅各宾派署名"汤姆·潘恩"于兰开郡写道：

> 事实是，人民有一个正规、广泛、进步的组织在发展，可以把他们叫做汉(普)登派、西德尼派或潘恩派。上天让我团结众人，我们——因为我以大众的名义说话——我是说我们否认，完全不承认与破坏机器的人、烧毁工厂的人、敲诈钱财的人、抢夺私产的人有任何联系。我们知道每一个节省人类劳动的机器对于我们也是其中一员的大家庭来说都是一种好事，我们打算从我们苦难的根源着手，因为请愿是无用的，我们要求得到一种摆脱苦难的方法。……

---

⑲ 参见皮尔对哈里法克民主派有关霍斯福尔被刺一事反应的评论："暗杀在老民主派贝恩斯那里既得不到支持也得不到辩护"。皮尔前引书，第164页。

可以设想，到1812年5月，兰开郡和约克郡的卢德运动已基本上让位给革命组织，它以爱尔兰移民和老雅各宾派为中介，598 实现了与许多中心地区的联络(如设菲尔德、巴恩斯利、伯明翰、制陶区、格拉斯哥等地)，这些地方并没有发生过卢德运动。在其本来意义上的卢德运动来说，现在只剩下有卢德将军这个名字保存了下来。粗糙的手制卡片以及符牌、暗号、口令等等都用来保障会议的入场。甚至有一些更吸引人的证据，包括一些文件，据称是在卢德派袭击威克菲尔德附近霍伯里的福斯特工厂之后不久在路上被拾到的。其中有两大篇演讲，用华丽的自由派风格写成，还有一份"章程"和一个"誓词"，和在德斯帕德的一个同伴身上发现的在他受审判时曾被作用证据的那种如出一辙。[40] 因此，除非我们设想这里有某种精心编织的"圈套"(没有理由这样设想)，这个证据确凿地指出了1802年和1812年地下活动之间的关系。[41]

有关这一类地下活动的证据实际上来自许多不同的史料，如果对所有这些证据都不加理会，我们就只能退回到某些严重混淆视听的假设上去——例如存在着货真价实的谣言工厂，制造捉襟见肘的奇想，而其惟一的目的就是蒙骗当局。有一个完全另一类型的坐探，名叫"R. W."的织工，他在6月初告诉其地方治安官说在斯托克波特召开过一次一个兰开郡代表会议，参加者有从诺丁汉、德比和哈德斯菲尔德来的人。代表们谴责——

---

[40] 见前，第480页。

[41] 奥利弗报告过一次约克西区代表会议(1817年4月28日)："我发现他们中许多人毫不犹豫地说在1802年他们准备和德斯帕德这帮人在一起，说那次事情完全是由于损失了少数人而失败的，这些人忽视了相互保持紧密的联系。"《奥利弗"叙述"》，见内政部档案，第40.9号。

这里的人轻率地在指定时间之前，在他们有足够的人装备起武器之前匆匆忙忙开始暴动。

据报告，设菲尔德在大力制造长矛，这在一个有大量小工场和铁匠店的城镇里是件相对简单的事。人们说起义预定在9月底或10月初发生。在迪兹伯里附近一块田里举行的半夜集会上，有599 个"绅士风度的人"讲了话，他没有就"工厂或机器问题说一个字"，而是号召举行一次总起义而不是"部分"起义。他"像国内很多人一样是个适于在圣坛或法庭上"演讲的人。[20]

但正是在有关全国组织和"绅士"领导人的传闻上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很明显，真正的鼓动者企图用全国性支持这种宏大的许愿或甚至有希望支持革命的个人（如卡特莱特、伯德特、科克伦、惠特布雷德、沃德尔中校及其他人）来鼓舞其追随者的士气。但不管卢德运动与织工工会、"针线骑士"或游荡的爱尔兰代表之间有什么含糊的联系，它只是一个没有全国性领导或中心的运动，而且在共同的苦难及推翻政府的愿望之外几乎没有全国性目标。尤其是，有关伦敦"大委员会"的说法（如本特这一类人传递的）则完全是凭空的想象，而且表现了在外地革命者中间对他们的真实处境的误解。

梅特兰将军也许正确地宣称卢德运动"没有真实基础"，而且在现时，所有这些革命运动一般来说都只限于人民中的最低等级，限于运动已发生的那些地方，除了在每天发生的那些公开暴行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以外，既没有统一行动，也没有制定计

---

[20] 本处关于兰开郡卢德运动的讨论主要以本特、亚伍德、惠特克、"R. W."等人的陈述及地方官的报告、匿名信等为根据，见内政部档案，第40.1、42.121和42.123号。

划。[77]

我们只要仔细留心这些话，就可以接受话里的论断。发论的人若不像梅特兰这样熟知内情，便会吓坏了自己，因为他们很难想象一个“革命运动”可以没有由“出谋划策的邪恶之徒”组成的内部核心，没有某些贵族或中等阶级领袖在秘密地鼓动一切。当找不到这种共谋者时，另一种极端意见就会出现，若没有指导者，就根本不会有革命运动。剪绒工、织袜工和手织工们居然会自己企图推翻当局，这是不可想象的。[78]科贝特在评论1812年下院秘密委员会的报告时这样说：“似乎没有证据表明有人在挑唆，没有证据表明有人搞阴谋。这是使内阁最感迷惑的，他们根本找不到蛊惑者，这是人民自己的运动。”[79]

600

而这次运动竟能在几个月内拖住12000名军队，并迫使约克西区的副郡守在1812年6月宣告该区正直接走上“公开的反叛之路”。

> ……除士兵直接占据的若干点之外，本区实际上是在不法之徒手里……不满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和平居民。[80]

从某一角度看，卢德运动最像一次工业工人的一种“农民暴动”，他们不是掠夺庄园别墅，而是袭击象征其受压迫的最

---

[77] 达维尔前引书，第175页。参见《贝克特1812年8月29日致梅特兰信》：“在有必要担心他们造成严重祸害之前，他们的活动必须更协调一致，更有系统。”内政部档案，第79.2号。

[78] 见《卢德派历史纪实》，第11页：“有一种看法很流行，即认为某些从事过激活动的人的想法延展成了革命行动，以期推翻政府。但这种看法似乎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而且各方面都承认，领导骚乱的人虽说很有影响，却都是劳工阶级出身。”

[79] 科尔：《科贝特生平》，第180页。

[80] 达维尔前引书，第310页。

直接的目标——剪毛机或动力织布厂。卢德派产生在出版和公众集会已几乎寂静了 20 年后，它不相信有任何全国性领导可以信赖，也不知道任何全国性纲领可以与自己的宣传相一致，因此，它总是在地方社会中最强大，在有限的产业行动中最有凝聚力。

但就在攻击这些剥削和工厂制象征的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更远大的目标了；小群的"汤姆·潘恩派"存在着，能把他们引向进一步的目标。但是在这儿，用以摧毁棉纱厂或织袜机的严密组织就不再有什么用处了。无疑，在约克郡和诺丁汉还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地区领导。而这只有极少数"队长"如托尔和梅勒才知情。但如果关于在艾什顿、斯托克波特和哈里法克斯召开代表会议的说法是确切的，而且看来也像是确切的，那么正是在这

601 里卢德运动最虚弱——最容易受奸细渗透，也最容易引导到依靠法国人、爱尔兰人或苏格兰人之助发动起义的夸夸其谈上去。只是在 1812 年仲夏才有迹象表明出现了一个严肃的密谋组织，它摆脱了有限的产业不满情绪并扩散到新的地区。到 8 月份(根据雷恩斯上尉的意见)，卢德派要么只能"孤注一掷揭竿而起，"要么运动必然瓦解。[⑩] 两个原因导致其结束：第一，枢密院令的解除，商业迅速发展。第二，当局压力增大，有更多的军队，更多的奸细，更多的逮捕，以及在切斯特和兰卡斯特的处决等等。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又可以把卢德运动看做是过渡性的，我们应透过砸机行动看到那些挥舞大锤的人们的动机。作为"人民自己的运动"，它给人深刻印象的与其说是落后，不如说是它日益增长的成熟性。它远不"原始"，相反，在诺丁汉和约克郡

[⑩] F.雷恩斯前引书第 58 页。

还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和自制力。可以把卢德运动看成是工人阶级文化的一种体现,它比 18 世纪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都更加独立更加复杂。1811 年之前的 20 年中,非法活动的传统丰富多彩,对此我们惟可揣测,特别是工会运动,其新尝试不断增长的经验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政治觉悟等等在各方面都很明显。卢德运动出自这种文化似乎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共济会、秘密仪式和起誓,半合法地向议会请愿,酒店里的手艺人集会等等。在这个过渡时期中,自信的工会运动之潮虽受反结社法的阻挡,却努力冲出堤岸,成为清晰明了的现实。这也是以德斯帕德和"黑灯照"为一方,以彼得卢为另一方的中间过渡时期。1812 年 5 月 1 日,一个(可能是未经授权的)[79] "卢德将军的秘书"曾自诺丁汉写信到哈德斯菲尔德说:"本人经收(授)权宣布": 602

> 将军及其麾下认为只要那个叫摄政王的流氓醉鬼嫖客及其仆从还与政府有关,那就只有灾难会降临我们这些做他们垫脚板的人的头上。我还想宣布,你们应记住你们和格尔格·居尔普斯·犹纳是用同样材料左(做)成的,小麦和酒给你也给他。

在这三个郡中,要求议会改革的宣传恰恰开始于卢德运动被击败之时。甚至在贝恩斯受审之前,哈里法克斯就建立了最早的议会改革同盟。乔治·梅勒在约克城堡中等候受审时曾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听说你正在向议会请愿改革,我希望把下面这些名字也加上……",其中包括 39 名同狱犯。(他还加上一句:

---

[79] 除了可能是发自真正的卢德派团体的信件之外,这一时期大量自由的书信写作问世。我所见到的作者中有"手枪先生"、"卢德夫人"、"长毛绒彼得"、"正义将军"、"托马斯·潘恩"、"真正的人"、"伊丽莎·卢德"、"无王氏"、"卢德王"、"纵火者乔"等,所用地址如"罗宾汉石洞"、"好汉树林"等。

“请记住，灵魂比工作或金钱更宝贵”。）假如把这种逻辑贯彻到底，我们就可以相信1817年德比郡一个地方官的愤怒评论：

> 卢德派现在主要在搞政治和偷偷摸摸的事，在莱斯特—德比—纽瓦克三角地带的几乎每一个村庄都形成的汉普登俱乐部里，他们都是主要的头领。[29]

[29] 《拉德克利夫手稿》第126/46和126/127A号；《告全国书》（哈里法克斯，1812）；《洛基特1817年1月12日致贝克特》，内政部档案，第40.3号。

第十五章　蛊惑家和殉难者

1.心怀不满

战争在骚乱中结束,除一小段间歇之外,战争已持续了23年。《谷物法》(1815)通过时,两院受到军队保护以免遭受民众威胁。成千上万的陆海军士兵解甲归田,在家乡找不到工作,其后的4年便是大众激进主义的辉煌时代。

这时的激进主义不再是少数派的宣传运动(如同1790年代时一样),仅以几个组织和几位作家为特征。1815年之后,《人权》中的主张已不再新奇,它们已经得到采纳。大部分宣传激进主义的演讲和文章都注意一点一点地揭露"选区贩卖"制度,或者"资金控制"制度的弊端,如收税、滥用资金、贪污腐败、臃员闲职、教士兼职等等,并认为这些弊端都根源于一小批贪图贿赂,自私自利的地主、朝臣和官吏,同时弊端本身还指出了根治的办法——彻底进行议会改革。这就是激进主义宣传的主调,其在报刊上明显的代言人是威廉·科贝特,在讲坛上最能打动人心的演说是亨利·亨特。科贝特在他著名的《工人》(1816年11月2日)一文中写道:"至于我们当前苦难的原因,正是那庞大的税收;政府强迫我们纳税去供养其军队、官吏和年金享受者,并且去偿付其债务的利息。"

"雄辩者"亨特也把握这同一主题。1816年底,他在伦敦矿泉地一次大规模示威活动中宣称:

就业不足的原因何在?税收。税收的原因何在?腐

败。正是腐败才使得选区贩子们能够发动旨在摧毁各国自由但主要是我国自由的血腥战争……。凡是有关人民生存和舒适的东西都征了税。他们的面包不是要征税吗？他们的啤酒不是要征税吗？他们吃的、喝的、穿的甚至说的一切不是都要征税吗？……这些税是一个选区贩子集团的政府强加的，他们不想别的，只想压迫人民，他们是靠巧取豪夺苦难大众过活的……。[①]

激进主义是一种大众化的自由主义呼声，它是人民同未经改革的下院之间一场持续的斗争；这场斗争把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推到了人的面前。在这场斗争中产生了（也许应该说科贝特创造了）一部激进主义的殉道者传，而尤其是产生了一部魔鬼列传，在其中，摄政王、卡斯尔雷、西德默思；奸细奥利弗、卡斯尔和爱德华兹和曼彻斯特义勇队、皮尔及纸币；还有像布鲁厄姆这一类三心二意模棱两可的改革者，都扮演了其既定的角色。有时候其他人的声音会比科贝特或亨特更有影响，例如T.F.伍勒及《黑矮人报》，威廉·霍恩的讽刺文章，卡莱尔及《共和报》等等。不过这种大众化的激进的争鸣囊括了所有这些人，并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中从其最老成的喉舌——拜伦以及黑兹利特、亨利·怀特的《独立辉格党报》、约翰·亨特和利·亨特的《观察家报》一直扩展到最极端的激进主义期刊，如《美杜莎》和《自由帽》。

这种呼声反映了伦敦和其他城市以及工业区群众的激进主义倾向，并得到其支持。伦敦民众有一种几乎从未中断的反专制主义意向，从威尔克斯事件到1795年伦敦通讯会召集的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再到支持"伯德特，反对巴士底"的民众鼓动，进而到战后激进主义的大规模集会等等都是这种意向的表现。即

① 《观察家报》，1816年11月17日。

便是在1802至1803年间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倾向，它不仅表现为同情德斯帕德，而且还表现为伴随着要塞司令沃尔赴死刑时发出的咒骂声，因为他犯有命令鞭挞一个无辜士兵致死的罪行。[②] 十年之后，当伊顿这位信仰自然神论的老出版商因以《理性时代》的"第三部分"为题出版了潘恩的一本小册子而遭受披枷示众的惩罚时，这种倾向甚至表现得更为明显。科贝特在几年之后曾回忆说： 605

> 我目睹了伊顿先生披枷受辱的过程。就在前一天的同一地点，有个人曾因伪证罪披枷示众，人们向他投掷臭鸡蛋，并把从屠宰场弄来的污血和内脏劈头盖脸地泼在他身上，差点把他给闷死了。伊顿先生的境遇则大不相同！在整个受罚期间，黑压压的人群向他欢呼，有些人拿出饼干，似乎要送给他吃，另一些人向他举起葡萄酒，还有的人拿着表示胜利的小旗和花束。相反，行刑者和司法官员遭到了嘲骂。**这才是后来不得不终止披枷示众之惩罚的真正原因！**

科贝特说，这群人是"伦敦人的缩影"，这当中有"绅士、商人、各种小商贩、工匠和劳工以及相当数量的女性"：

> 他们不是不知道伊顿先生披枷受辱的原因……但他们不能赞成为观点问题而受惩罚。[③]

因此可以说，伦敦民众的激进主义并非是一种新现象，但在战后年代它采取了更有意识、更有组织、而且也更成熟的斗争形

---

② 载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06年2月6日。鞭挞也许在过去的英格兰是仅次于抓壮丁的最令人憎恨的制度。科贝特曾因于1810年谴责这一恶习而被捕入狱，从此他便在普通人中名声大振。关于沃尔，还可参见萨瑟的《英格兰来信》的第9部分。

③ 同上，1820年1月27日。

式。较新的情况是战争期间外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民众的准政治态度发生了转变。在18世纪90年代，官方只把诺里奇和设菲尔德视为难以制服的雅各宾派中心，到19世纪初，诺丁汉、考文垂和博尔顿也被视为此类地区了；到卢德运动时期，兰开郡和约克西区的大部分城镇，以及中部地区的许多其他市镇都出现了不满。战争结束时，从卡莱尔到科尔切斯特，从纽卡斯尔到布里斯托尔，“暴民”都倾向激进主义了。反过来看，我们还可以从战时修建大量兵营的计划中找到这方面的证据：1792至1815年共修建了155个兵营，其中许多都是有意建在中西部和北部的“不满”地区的。[④] 早在1792年，英格兰就已经是靠惟命是从再加上绞刑和“教会与国王”派的暴徒的补充来统治了。到1816年，英国人民已被暴力捆住了手脚。

606 因此，经常的情况是：战后激进主义与其说是少数人有组织的运动，还不如说它是整个社会的反响。我们可以看看1817年发生的两件事。其一是处死一个名叫卡什曼的水兵，他是因为在1816年12月2日矿泉地集会之后参与袭击一家枪械商店而被处死的。[⑤] 卡什曼是爱尔兰渔夫，曾在海军中服役多年，9次受伤。按他自己的说法，海军部欠他5年以上的薪水及相当数量的奖金。他签约约定每月划给他在爱尔兰的贫困不堪的母亲的1英镑，也从来未曾支付过。战争结束时，他被遣散而分文不给。为求赔偿损失，他曾在一个个拖拉因循的衙门中被听询问证。暴动那天上午，他再次去了海军部，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一个当下士的水兵弟兄”，此人劝他参加矿泉地集会，还请他在路

④ 哈勒维：《1815年的英国》(企鹅书社)第1卷，第104页；哈蒙德夫妇：《城镇工人》，第85页。

⑤ 见下文第633—635页。

上喝了烈酒和啤酒。他弄不清这次集会的目的,并且,或许也回忆不起来多少事情。

当局几乎找不出另一个比卡什曼更得人心的牺牲者,而且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能引发伦敦民众的全部同情心和潜伏的激进主义情绪的人物了。不列颠水兵(其中许多人参加过矿泉地集会)以其喜爱闹事而著称:"他们总爱打头阵,……无论是打仗、喝酒、跳舞或吵闹都这样"。他们是无数有关战争的民谣小调中受人欢迎的英雄,而水兵们所受卑劣待遇同冗职闲员、大臣亲属以及指挥官们所得到的丰厚津贴又形成令人愤恨的对照,威灵顿就曾得到40万英镑拨款为其购买一份宅第和地产(外加其他津贴),甚至那些不在位的港口测量和海军部的职员也得到补助金。卡什曼本人主要是对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对他"像一个普通强盗那样"被装在车上拉过长街感到义愤,他高声喊道:

> 这不是因为我胆小怯懦,我被带到这里不是因为犯了抢劫罪……。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死在烈火中而不是死在烟尘里,我从来不反对国王和国家,相反,我为他们打过仗。

行刑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群众示威,绞架四周不得不架起栅栏并由"大量"巡捕加以保护:

> 当郡长走上前时,民众表现出来最强烈的义愤情绪。四处发出叹息声和嘘声,人们数次向前推拥……卡什曼……似乎受了民众情绪的感染,也以极响亮的声音同人们一起呼喊……"水兵弟兄们,万岁!胜利了!鼓足劲!"

607

在绞架前,两个英国教会牧师像幽灵一样拉卡什曼作忏悔,被他拒绝了:"别打扰我,这没用,除上帝之外我不需要任何的人怜

惘。"随后他对民众说:"你们这些蠢货,我的脚一悬空,就为我三呼万岁";接着又对刽子手说,"抽掉桅杆吧"。就在卡什曼"脚下那块致命的踏板落下的一瞬间,他发出了一声欢呼"。经过几分钟死一般的沉寂之后,大众"又开始咒骂和谴责每个参与这场可怕的表演的人",他们高喊"谋杀!"、"可耻!"。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人们才散去。⑥

另一事例发生在同一个月,是在兰开郡。塞缪尔·班福德,这位米德尔顿的织工同时兼当地汉普登俱乐部的书记,在本村被约瑟夫·纳丁及一队士兵逮捕。这时当即有一大群人围住纳丁和他的士兵,并威胁要实施营救。逮捕班福德的人把他塞进一辆马车,在一队龙骑兵的护送下通过查德顿,想继续逮捕另一些人,班福德后来回忆说:

> 在前往查德顿市政厅的路上,我劝指挥官停住车,然后回到曼彻斯特去,我向他保证那天抓不住我的任何同伴了。为了证实我的话,我指给他看查德顿高地和附近农村中几十个人正像猎人一样在奔跑,似乎要在罗伊顿附近截住马车。我说整个地区都动了起来了,他所要抓的每个人都知道他要来了。他大骂一声,说他从未见过这种事。那个骑马走在马车门旁的龙骑兵军官评论说:他在爱尔兰曾见过类似的事,但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见过。⑦

2. 领导权问题

汉普登俱乐部1812年建立于伦敦,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一

---

⑥ 《快报》,1817年3月12日;科贝特:《每周政治手册》,1817年3月15日;《黑矮人报》,1817年3月19日。

⑦ S.班福德:《一个激进派的一生》(1893),第77页。

个重要团体:他们是一群有选择的辉格党改革派,每个成员都有每年 300 镑以上的地产收入。然而,它却为卡特莱特少校提供 608 发表演说的讲坛,也为他在英格兰中部和北方作宣传议会改革的旅行提供了基础。他曾这样回答那些对他的宣传提出批评的人:"英国绅士一年四季都在旅行,有些人去观山看水,为什么就不允许别人去看看忍饥挨饿的人民的实际状况呢?"[8]

很难把卡特莱特在 1812 年、1813 年和 1815 年所作的福音宣传旅行的重要性说过了头。15 年来,全国各地的议会改革者从未有过全国性领导核心及斗争策略,而只有伯德特和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及科贝特的《纪事报》所提供的那种除外。卡特莱特和科贝特都把卢德运动的造反局面看做是可恶的、徒劳的,但他们又都重新对北方和中部地区感到关注,那里正在增长着骚动。科贝特在 1816 年才引人注目地转向"工匠和工人";而不屈不挠的卡特莱特少校则决定进入卢德运动地区,当时他已年过七旬了。

卡特莱特并不打算造成一次"工人阶级"的激进运动,事实上他认为他有责任反对——

> 任何旨在发动穷人起来侵犯富人财产的企图。侵犯富人财产并不能改善穷人的状况,只有靠……公平的法律……。

改革的压力只有"最大程度地经过中等阶级"才可能获得最佳效

⑧ F.D.卡特莱特:《卡特莱特上校生平与书集》(1826),第 2 卷,第 45 页;E.哈勒维:《自由主义的觉醒》(1949),第 11 页以始。

果，他希望把造反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合法的轨道上来，[9] 并为继续开展全国性的议会请愿运动奠定基础。在伦敦的汉普登俱乐部里，不得不把自己关于男子普选权和年度议会的主张收藏起来，并同要求纳税人选举权的主张妥协。即便如此，贵族改革家们还是报怨他的意见太过头，甚至不去出席俱乐部的年度聚609 餐。卡特莱特看不起怯懦的辉格改革派。他仍然主张对"数量不受限制的成员"进行宣传，他更看重的是共事者们的原则，而不是他们的收入和职业。

在这方面他显示出了勇气。他于 1812 年 5 月写道："我近来一直同那些与骚动地区有联系的人保持往来，为了把不满情绪引上有利于议会改革的合法轨道，他们急于要得到我们协会的忠告和支持"。早在 1812 年 1 月，他就去过德比和莱斯特，并在卢德运动进入高潮时试图在诺丁汉召开一次群众改革大会。他曾在《诺丁汉评论》上以公开信的形式劝告那些不支持他的绅士改革派人士不要胆怯："先生们，当商业萧条、工人买不起面包时，不就是集会的合适时候吗？"1812 年夏，当约翰·奈特和"38人"被监禁于曼彻斯特时，卡特莱特立即写信鼓励他们，并在辩护方面为他们提供帮助。到了秋季，他再次决定去"骚乱地区"。

在 1812 年的巡回旅行中，他曾在莱斯特、拉夫巴勒召集会议（出席者 600 人），也在曼彻斯特、设菲尔德、哈里法克斯、利物浦和诺丁汉等地召集过会议。他在 1813 年的 1 月和 2 月又作了第二次巡回旅行，在不到 30 天的时间里，在中部、北部和西部

---

⑨ 1801 年 1 月 5 日卡特莱特致信托马斯·哈迪说："我不赞成许多人的观点，他们认为现在要想平息公众的情绪并使之保持在要求改革的范围之内而不是把它引向革命，已经为时太晚……。法国的先例肯定会起作用，促使我们不再考虑在全新的基础上解决问题。"F. D. 卡特莱特前引书，第 1 卷，第 292—293 页。

的35个地方召开会议。[10] 这次巡游——以及1817年奥利弗的巡游——提醒我们对于铁路出现之前的交通困难强调得过度了。在所有的这些地方都有一批改革派核心人物在为大会作安排，卡特莱特随请随到，而不管邀请者是绅士、小商贩、工匠还是织工；并且他还恰好处处地对那些不冷不热的上等人以及辉格派大雇主冷眼相待，这些人对他所交往的下层人民不屑一顾，就连他的老伙伴怀维尔也曾在一篇匿名文章中指责他鼓励卢德派分子和纵火犯。有一次设菲尔德"议会改革之友会"为他设宴以示敬意，一个自认为是改革派的工厂主竟大发雷霆，因为"餐票 610 价格太低，以致一同就餐的人中除少数例外几乎全都是最低等级的人"；"年度议会和普权派"事前就占了上风，主席位置被"我们的一个激烈分子"所占据。[11]

卡特莱特宣称他在这些巡游中带回了20万人要求改革的签名。(1815年他又到苏格兰去巡游。)集会并不是不受干扰的。1813年1月22日(仅在14个卢德派分子被处死的一周之后)，他在哈德斯菲尔德举行的集会就遭到军方干涉，文件和请愿书均被查获，卡特莱特和当地改革者(主要是"技工")都被逮捕，只因他熟悉法律才未受到进一步迫害。在博尔顿、罗奇代尔和索尔福德，那些为他的请愿书征集签名的改革派也遭到监禁或迫害。可以想象，当卡特莱特匆匆往来于各市镇时，他留在身

---

[10] 拉特沃思、欣克利、莱斯特、拉夫巴勒、切斯特菲尔德、设菲尔德、哈德斯菲尔德、布拉德福德、韦克菲尔德、利兹、普雷斯顿、威根、利物浦、博尔顿、曼彻斯特、利斯、斯托克波特、纽卡斯尔、伯明翰、伍斯特、杜克斯伯里、格洛斯特、斯特劳德、巴恩、谢普顿、马利特、布里奇沃特、汤顿、威灵顿、布里斯托尔、卡恩、马尔博罗、纽伯里、亨格福德、阿宾顿、雷丁。

[11] F.D.卡特莱特前引书，第1卷，第243页，第2卷，第17、21、31—55、110页；内政部档案，第42.119号；《诺丁汉评论》，1811年12月27日，1812年1月3日和7日；T.A.沃德：《寻找过去》，第119页。

后刚刚建立起来的俱乐部是很难维持的。实际上，这些俱乐部直到 1816 年才在工业地区扎下根来。[12]

雅各宾主义的根据地一直是在手艺人的聚集区。但到 1815 年之后就不可能划出如此明确的界限了。在 1815 至 1832 年之间的不同时间里，以反对所得税、什一税、谷物法及冗员闲职这类特别的弊端为目标的鼓动涉及了相当多的人。除工匠和工人之外，工厂主、农场主、小乡绅以及自由职业者都要求某种形式的议会改革。然而，推动改革运动的持久力量却来自"勤劳阶级"，即织袜工、手织工、纺纱工、工匠，以及与此有联系的散布在各地的小业主、小商贩、酒馆老板、书商以及自由职业者等等，从这些集团中时而会产生出地方政治团体的领导人。

改革运动的情况因地方不同而呈现出差异，这种差异又影响到运动的战略和侧重点。战争结束之前，亨利·亨特曾是布里611 斯托尔一次引人注目的宣传鼓动的发言人。在这次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工匠，特别是皮匠和玻璃匠。[13] 在兰开郡南部大厂主和工人之间的鸿沟最深，因而这里的工人阶级改革运动也最"独立"，它甚至对曼彻斯特活跃的中等阶级改革派也保持着距离。约克郡西区的经济鸿沟不那么深，手织工只是到 19 世纪 20 年代后期才陷入危机的最坏阶段。所以在利兹，工匠和中等阶级改革派就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在伯明翰，社会等级较不明显，工匠们一心指望成为小雇主，在这里有一个天生就蓬蓬勃勃的激进主义运动，它得到许多雇主支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中等阶级的领导之下。

---

⑫ F.D.卡特莱特前引书，第 47—55 页；菲茨威廉文件，F.46(g)；《拉德克利夫手稿》，第 126/117 号。

⑬ 亨利·亨特：《回忆录》(1822)，第 3 卷，第 7—12 页。

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的激进主义都同各自地区的社会结构直接有关。然而，若要指出真正的伦敦激进主义发源于伦敦的工业结构和社会模式，这就不那么容易了。每一个追求激进主义领导权或希望树立影响的人都在伦敦有自己的追随者——科贝特、伯德特、卡莱尔、西斯尔伍德、边沁派、亨利·亨特和其他许多人都是如此。伦敦出版界不断推出激进主义报刊和书籍，但直到1832年前，伦敦都不像是改革性群众团体的全国中心。

造成这一状况的部分原因是，伦敦面积太大，行业也太多。在制造业中心，地方领导人有可能从知名于当地并肯定能得到当地支持的人物中产生出来。而在伦敦，激进势力强大的地区就有好些个，比如贝思纳尔草地、兰伯思、索沃克、芬斯伯里、伊斯灵顿等，从这些地方有时会产生领导人。"斯彭斯派"以及卡图街密谋者都曾相信会得到大众的支持，尤其是得到建筑工人、码头工人以及正在开凿帕丁顿运河的"引水员"们的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斯皮特菲尔兹的丝织工可指望参加激进的示威活动；倾心于合法斗争的威斯敏斯特改革者则总能在工匠的行业俱乐部那里得到支持。不过事实上的伦敦领袖往往是置身于这种支持之上，而不是直接从这种支持中产生的。同巴恩斯利或拉夫巴勒相比，有才智的工匠在伦敦具有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在工业村和小城镇，激进领导人可能停留在他的职位上，其职业和社会地位在20甚至40年中都几乎不变。 612

伦敦的领导权，有不固定性。突出的全国性人物、雄辩家、幕后人、新闻界人士以及酒馆蛊惑家们都曾相继受欢迎，而在群众眼中他们又常卷入激烈的自相残杀式的争论中。此外，伦敦激进主义在战争中兴起时就已经相当分裂。领导权明显的觊觎人是老资格的威斯敏斯特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这时已决定向

与工匠和中等阶级改革派结成联盟的方向发展了。激进主义热情趋于冷却的伯德特在1816年4月发动了一场运动，要求给交纳直接税的人以选举权。他得到威斯敏斯特委员会的支持，当时该委员会已开始其战后鼓动，提出反对所得税的请愿（实际上是直接向有产阶级尤其是伦敦城区的改革派要求支持，而其代言人是市参事员韦特曼）。科克伦勋爵仍持有威斯敏斯特的另一席位；他具有拜伦式的贵族革命者的风格，但其名誉却因股票交易所的丑闻受到玷污。作为政治领袖，他并没有多少天赋，在他辞去议席之后（为了要成为南美战争中一名民主主义的独立冒险家），他的位置最终被边沁派人士约翰·卡姆·霍布豪斯所取代。这是因为，同主张成年男子选举权的卡特莱特或亨特相比，霍布豪斯是伯德特和普雷斯更中意的人选。[13]

威斯敏斯特的这一变动不是偶然的。弗朗西斯·普雷斯和他的工匠小雇主们（其中有些如亚历山大·盖洛韦已是大雇主了）已经放弃了雅各宾主义的信仰，不再相信男子普选和无限制的群众鼓动。他们鄙视伦敦民众，对他们的骚动造反气质感到惊恐不安。他们与酒馆世界很少接触，而新一代鼓动家正在这个世界内展开活动。普雷斯后来宣称说，科贝特“太无知……竟看不出那些未得到有钱有势的人物支持和鼓励的普通人在这方面（即政治组织方面）的愚蠢无能。”普雷斯自己直接受边沁和詹姆斯·穆勒的影响，他蔑视缺乏效率和理性的贵族政府，也对谷物法和任何压迫性的立法感到义愤，在这方面他无疑是个激进主义者。但他却对任何公开发动和组织群众的策略怀有深深的敌意。1817年1月30日，汉普登俱乐部的代表在伦敦开会时，

613

[13] 几乎每一个进步的激进主义者都反对这项选择。参阅沃拉斯前引书，第138页。

普雷斯为霍恩的《改革纪事》草拟了一份宣言，其意图很明显：即要求把改革运动从男子普选权纲领的影响下解救出来。宣言说“现在如同像其他时候一样必须把所有对英国人来说十分宝贵的一切都委托给中等阶级，让他们去拯救……。必须从这个阶级那里……去取得可能得到的一切好东西”。[15]

到1817年，科贝特已把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叫做“残余委员会”了，而到1820年，他便开始谴责它是个“干涉威斯敏特政治大事的小集团”，“一个小巧玲珑安乐舒服的团体，曾经仁慈地承担起为伦敦挑选议员的责任”，而且就像一个“卑鄙的私党……它为了种种实际的目的，已把威斯敏斯特变成了像加顿和老萨勒姆一样腐败的选区”。[16] 若在此处搜罗伯德特、普雷斯与科贝特、亨特之间这些年来互相抹黑的言词，并无多大意义，真正重要并需要注意的是，在1816年，伦敦激进分子中组织最好的团体其策略是使用国内的运动脱离亨特和科贝特的影响，并引导工人阶级去追随一个新的议会领导集团，它的新星人物是休姆、霍布豪斯和布鲁厄姆。

这种策略对于那些囿于雅各宾主义传统而更为坚定的改革者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对伦敦民众中大多数激进分子也没有吸引力。但在1816年，惟一可能替代威斯敏斯特委员会领导权的只有一个小小的“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协会”。托马斯·斯彭斯本人在1814年9月就已去世，当时由“约40个信徒”“以某种盛大的仪式安葬了”他，而协会也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协会领导 614

⑮ 附加手入稿，第27809号，第16、17、51帧。应该说明，霍恩实际上并没有听从普雷斯的编辑指导。

⑯ 《政治纪事报》，1820年12月9日、16日。

人据说包括沃森父子[17]、阿瑟·西斯尔伍德、托马斯·普雷斯顿、艾伦·达文波特以及埃文斯父子等。由于普雷斯回忆录的影响，大多数历史都把这些人描写成怪癖和不足取的人物：老沃森"生性不羁，……穷困邋遢"；他的儿子是"无法无天的淫逸之徒"；协会图书管理员埃文斯是一个怪人，他"腋下夹着本破旧的圣经，从家里步行到……协会碰头的酒店"。[18]

普雷斯认为斯彭斯派都"不值一提"，他们"无害而天真"。不过，他们既然是1816至1817年同普雷斯和威斯敏斯特委员会争夺伦敦激进运动领导权的主要对手，普雷斯在这方面就不是一个无动于衷的见证人了。作为功利主义者，他会认为托马斯·埃文斯的《拯救帝国的基督教纲领》(1816)是愚蠢的，但人们也许会说，埃文斯的农业社会主义比边沁的幸福计算法更符合理性，并更有根基一些。斯彭斯派的鼓动家在行业俱乐部，尤其是在鞋匠中赢得了许多支持者，他们的纲领——"废除国家的封建制度和领主制，宣布土地为人民共有"——为工匠们日后接受欧文的《新社会观》作好了思想准备。[19]

如果说斯彭斯派还不只是"天真"，那么他们在1816年就也还有一些影响了。在普雷斯的术语中，"不值一提"的意思是他们在议会和有势力的中等阶级圈子中无计可施。不过，普雷斯顿和西斯尔伍德显然比普雷斯更了解伦敦的酒吧社会。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彭斯派一直鼓动在兰贝斯或贝思纳尔草地举行"自由自在"非正式的集会。议会秘密委员会曾在1817年2月报告说，战争一结束，斯彭斯派团体在技工和制造商、退役士兵和水

---

[17] 切不可把她们同詹姆斯·沃森相混淆，后者是激进书商，是卡莱尔和赫瑟林顿的合作者。

[18] 附加手稿，第27809号，第72、99帧。

[19] 关于埃文斯的《基督教纲领》，参阅前文，第162页。

兵中成倍增长，由此看来这一情况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危言耸听。有证据表明，到 1816 年斯彭斯派已经在过去伦敦通讯会方案的基础上重新组合为区和分部了。[20]

此外，在“斯彭斯派”的名称上或许也有一些混乱。埃文斯无疑是斯彭斯的信徒，他敢于发表文章主张剥夺土地所有者——这在土地所有者的议会看来不啻是罪恶之首，为此，他和他的儿子尤其受到当局的追踪迫害。1816 至 1817 年，他和他的小圈子曾发起一次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小规模哲学宣传运动。[21] 不过，伦敦更有影响的政治领袖——詹姆斯·沃森医生、阿瑟·西斯尔伍德和托马斯·普雷斯顿也许更应该称作是共和派，是继承了老传统的雅各宾主义者。他们在充满失业的战后年代也曾赞成恢复小农场和“锄头耕作”制，以此作为解决饥饿问题的途径。[22] 关于沃森医生我们所知不多，1816 年他大概 50 岁，审讯时被说成是“医护人员和药剂师”，他很穷，参加地下政治活动也许已有好多年了。[23] 他是另一个雅各宾派外科医生约翰·盖尔·琼斯的朋友，琼斯曾在沃森任主席的好几次大会上发过言。阿瑟·西斯尔伍德先前是陆军军官和绅士农场主，18 世

615

---

[20] O.D. 拉德金：《托马斯·斯彭斯和他的同时代人》，第 146—149 页；A.W. 沃特斯：《斯彭斯及其政治著作》；A. 达文波特：《斯彭斯的生平、著作与学说原理》；W.M. 格尼：《詹姆斯·沃森审判案》(1817)，第 1 卷，第 45 页；《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宣言》(1816)，第 4 页。

[21] 见罗伯特·韦德伯恩所编辑的两份小期刊《绝望之希望》和《断根之斧》(都出于 1817 年)。(一位苏格兰绅士和牙买加女奴所生的儿子)罗伯特·韦德伯恩是有色人种和“弗林特”裁缝。埃文斯父子曾在 1817 至 1818 人的人身保护法暂停期间入狱(第二次)，此案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同情。

[22] 见沃森医生在矿泉地的演说摘要，前文，第 230 页。

[23] 见托马斯·普雷斯顿 1816 年 12 月 4 日在受伦敦市长审问时说的话：“我一直认为沃森父子是英国最勇敢的人……我相信他俩都是外科医生”。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 11.203 号，亦可见《国家传记辞典》中的有关条目。

纪90年代后期一直在法国(有人说),他曾在革命军队中服过役。普雷斯顿有时被说是鞋匠,但他似乎已是制革业里的一名小雇主。1816年12月,他曾对伦敦市长这样说:

> 我在斯皮特菲尔兹看见过许多苦难,以致我恳求上帝把我吞掉——我见过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9个月没在床上睡过觉——我已经破产,我手头1英镑也没有了,我雇了40个工人……。

这些人构成了伦敦极端激进主义的核心,不管他们是斯彭斯派还是承袭了德斯帕德密谋传统的"老雅各"。他们的宣传阵

616 地在行业俱乐部和小酒馆,[24] 塞缪尔·班福德及其来自北方汉普登俱乐部的同伴代表们1817年头几个月在伦敦时就曾好几次出席过这种集会。[25] 这个集团的大多数人都可能继承了德斯帕德的信念:无论是通过骚动而最终形成攻打伦敦塔和各监狱以及议院的总起义,还是通过武装政变的手段,伦敦都必须在英国革命中扮演巴黎的角色。大家不要以为,如果有足够的刺激,1817或1819年的起义连取得至少是暂时的成功也不可能。不过,若是这个集团中有些人确有不幸的机会显露了他们的勇气,他们仍免不了要受到轻举妄动的指责。他们是自我夸张的牺牲品;他们密谋准备了自制手榴弹和长矛,但在伦敦街头他们却连一座防卫路障也不能垒起;他们不止一次地陷入浪漫幻想之中。而西德默思的密探却能轻易地打入到他们虚张声势的酒馆的地下世界中去。就是在这里,密探奥利弗得到了可以接近中部和北部改革派人士的信任证书。而在伦敦发生过的两次真正的图

---

[24] 普雷斯顿说过,自由自在的俱乐部(在斯皮特菲尔兹)是聚众的最好方式。J.威廉森1817年9月24日的供词,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197号。

[25] 班福德前引书,第25、26页。

谋暴动中(即矿泉地暴乱和卡图街密谋),人们一直怀疑,它们是否真有一大半是政府自己派出的煽动分子卡斯尔和爱德华兹制造出来的。

因此,伦敦的改革运动一开始就陷入分裂,一方是谨慎小心的合法派,另一方则是密谋者,处于两者之间的是卡特莱特、亨特和科贝特。但要想全面了解激进主义组织及其领导权问题的复杂局面,我们还须把目光投向伦敦之外,看看扰乱治安会社法颁布之后改革者所面临的形势,而当初的各个通讯会就是在这项法制下于1799年遭到镇压的。

在这项法律下,任何全国性政治组织皆为非法。此外,组建某个全国性社团的地方分会,或是以通讯和互派代表的方式与某个全国性中心发生联系的地方社团也属非法。(这项法律后来对1841年的全国宪章派协会也还是一个障碍。)这样,改革者们仅有的无可争议的权利就只剩下两项了,其一是组建地方性的自立的俱乐部或研讨会;[26] 其二是向议会或国王请愿,并为此目的集会。[27] 617

非正式俱乐部和酒馆聚会是躲过了1796和1806年镇压而存留下来的民主进程的一部分,在伦敦及外地都如此。1902年,《利兹信使报》的一位通讯员曾谈到这类"协会和俱乐部",其中工匠们

> 每夜在酒馆聚会。大市镇的几乎每一条街上都有这种小型议事会。出席会议谈论国事,再斟上一杯黑啤酒,

---

[26] 在某些地方治安官根本不把这看做是"权利",他们自以为有权干涉并驱散集会。利兹的汉普登俱乐部就是因治安官的干涉而解散的。

[27] 即使在镇压最激烈的年代,政府仍在口头上谈论这项"不可侵犯"的权利。可参看P.弗雷泽:《公众表愿与1832年以前的议会》,载于《历史》,第46卷,第158期(1961年10月)。

这是自由不列颠人长期所声称拥有的特权，而且得到所有政府的承认。[28]

就是在这类"会社"里，比尤伊克和他那些激进的工匠伙伴们于战争时期在纽卡斯尔聚会。1812年选举期间，布鲁厄姆曾从利物浦写信给格雷勋爵说：

你不会想到利物浦选举的性质……。你得每天晚上都去那些不同的俱乐部、共济会等等，那儿不是开会便是高谈阔论……我每天除在投票结束时作一次演讲外，就有9个晚上去了俱乐部。我在那段时间里作了160多次演说……。[29]

难怪科贝特可以在1817年这样写：

我们有皮特俱乐部、辉格党俱乐部、除恶习俱乐部、查办小偷俱乐部、圣经俱乐部、学校俱乐部、共济会俱乐部、卫斯理宗俱乐部、汉普登俱乐部、斯彭斯派俱乐部、军事俱乐部、海军俱乐部、赌博俱乐部、吃喝俱乐部、饮酒俱乐部、雇主俱乐部、帮工俱乐部以及上千种别的俱乐部和协会。[30]

然而，从非正式的酒吧团体发展到自认不讳的激进俱乐部，如汉普登俱乐部或政治同盟那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有关于组建兰开郡第一批汉普登俱乐部的有趣的讨论记录。例如，有一份告密者提供的报告，此人曾参加了1816年11月在小博尔顿"狗字号"酒店举行的一次"改革委员会会议"：

618

约翰·凯一开头就问我们是否已在心里认真掂量过后

---

[28] 《利兹信使报》，1802年3月6日。

[29] 布鲁厄姆：《一生时代》(1871)，第2卷，第62页。

[30] 科贝特：《每周政治手册》，1817年3月1日。

> 果。他说,你们是否已作好准备为伟大的改革义举而独自忍受对你们个人的迫害?……我们的工作是艰难危险的。你们在座的愿意参加这样一项工作吗?罗伯逊·布雷德利说,我知道我们将成为受难者,实际上,我担心在冬天结束之前就会这样。他说,压迫者把我们逼到这种境地,生命和自由均难保障……。凯说,以改革的方式纠正弊端是合法的,但是议会一旦开会,他们可以宣布集会为非法。看来他们不可能顺从地放弃他们多年享有的闲职和年金。他说,那些恶人宁愿牺牲全国一半的人民也不愿和平地让步。若要他们让步,就得使用武力,而在他们倒下来的时候,他们又会碾碎我们成千上万的人。……

大家同意写信给奈特先生(1812 年受审的 38 人中的奥德姆老改革派),同时也写到"W.科贝特先生那里"去,"希望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为了支付租金、通讯联络和政治读物等等而在门口收钱,这是否算合法……。"约翰·奈特对这一询问的答复也保存了下来:

> "先生,我刚收到你们的信,现答复如下:你们可以弄一个房间作为讨论政治和其他问题之用(而不须登记该房),只要你们不收入场费,你们人在里面时也不要锁住外面的大门,以便让人随意出入即可。昨天我收到一来自伦敦的信,信中建议这类集会要公开发广告,要让一位地方官知道。此外最好是不要开秘密会议,还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到会——会上使用的语言应当温和并合法,但又要明确而坚定。我们在这里(即曼彻斯特)搞了一个房间能容纳 1000 人。我们本想在下周一将其开放,但为了争取有较多的上层阶级人士(人

们这样称呼他们)也来,我们已同意将其推迟一周开放……。[31]

奈特很可能是从卡特莱特上校或他的助手托马斯·克利里那里得到建议的。兰开郡和莱斯特郡的各个俱乐部在1816—1817年之间的冬季都自由地在郡内互相通信,甚至居然召集人数相当多的代表大会或郡委员会会议。1817年1月6日,莱斯特俱乐部里的一个告密者作出如下报告:

619

已派出一个代表团去曼彻斯特,是格雷厄姆和沃伯顿去的。格雷厄姆讲述了他们在兰开郡看到的惨状:大部分穷人仅能弄到一点水,一点盐和一点燕麦——有的人每天仅吃一顿饭,有的人3天才吃一顿饭。随后他宣读了一封德比来信,说一个曼彻斯特人在去伯明翰和布里斯托尔的路上要访问莱斯特俱乐部。后来又读了卡特莱特上校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已得到14个不同会社的消息,打算派代表去伦敦参加1月22日的一个委员会……。[32]

在此之前的几周,兰开郡的改革者甚至走得更远。在米德尔顿举行的一次由"切郡、约克郡西区代表"以及兰开郡参加的代表大会上,任命了四个"宣讲员",其中两个途经制陶区去伯明翰,另外两人则在约克郡召开集会。会议甚至决定:"联合王国所有请愿团体都应该派出……一个至多个代表去曼彻斯特……以协助同盟的所有力量形成统一认识"。[33]

因此,在1816年最后几个月里,外地汉普登俱乐部或参加

---

[31] 内政部档案,第40.3号,引自H.W.C.戴维斯:《1816至1817年的兰开郡改革派》(曼彻斯特,1926),第21—22页。

[32] H.W.C.戴维斯:《格雷和皮尔时代》,第181页。

[33] H.W.C.戴维斯:《兰开郡改革派》,第27—28页。

同盟的协会有了很大的发展；[34] 在其建成的几周之内，这些俱乐部都急于要与外界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联系。一时间，曼彻斯特似乎要成为全国的领导了。不过，后来还是卡特莱特和伦敦汉普登俱乐部出面召开由各俱乐部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于 1817 年 1 月底在"王冠与锚"酒馆开幕。这次由 70 名代表参加的会议力图绕过政府法令，它采取群众会议的方式，并宣称它代表"正在请愿的各市、镇及其他社区可能选出的人，他们在此聚会以讨论……实施宪法改革的最佳方式"。会议进程未被当局打断，若把这种境遇同 1793 年爱丁堡的"全英代表大会"相比 620 较，那还算是一个微小的进步。但这次会议同时也强调它与全国性运动不相干。

这次会议召开的直接背景是科贝特日益增大的群众影响，以及 1816 年 1 月和 12 月的矿泉地大规模集会，亨利·亨特曾在会上发表过演讲。关于这一点，班福德的叙述是人所共知的：

> 这时，威廉·科贝特的文章突然权威起来了。在南兰开郡，在莱斯特、德比和诺丁汉，在所有这些工业区，以及许许多多苏格兰的工业城镇中，几乎每一座村舍炉边都在读这些文章……。他给读者指出受苦的真实原因——劣政；指出适当的矫正方法——议会改革。骚乱很快就很少见了……。汉普登俱乐部建立起来……工人们……变得行动审慎而有条不紊……"。[35]

"在周围的穷人中具有任何的政治常识和固定的政治原则是最近的事"，一位曼彻斯特改革者在 1820 年写道，他也把这种变化

[34] 除兰开郡和莱斯特郡之外，汉普登俱乐部的主要中心还有诺丁汉郡、德比郡、伯明翰、诺里奇以及约克西区的部分地区。

[35] 班福德前引书，第 11—12 页。

归功于"科贝特先生论述本国的财经形势和税收在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的作用的佳作"：

> 这些便宜出版物流行相当广泛；加之作者的风格强劲有力、清晰明了、简洁精炼、论证性强，使其作品很受读者中那个数量最大的阶级的欢迎……。[36]

由于沉重的印花税，科贝特的《政治纪事》（当时售价一先令半便士）好些年来一直只能在北方发行。[37] 在科贝特发现印花税法的漏洞之后，决定性的变化就在 1816 年 11 月发生了。他开始以两便士的售价把他的主要论文以《每周政治手册》的形式（"两便士随笔"）分别出版。第一篇就是著名的《告英国工人大众书》：

> 朋友们、同胞们：
>
> 无论地位、财富和学识会诱使某些人相信什么……一个国家真正的力量和所有的资源都来源于而且也必须来源于人民的劳动……。高雅的礼服，华丽的家具，宏伟的建筑，平坦的马路和运河，飞跑的马和马车，许多坚固的航船，堆满货物的仓库，所有这些……都是民族财富和资源的众多表现形式。然而这一切都源于劳动。如果没有工匠和工人，这一切都将不存在……

621

"傲慢的雇员称你们是暴徒、贱民、渣滓，是一大群猪猡，还说你们的意见等于零，公共集会不干你们的事……"。科贝特用简洁的语言论证了间接税给人民造成的沉重负担，指责"闲职冗员和

---

[36] J.E.泰勒：《对有关国内形势的文件……的注释和评论》（1820）；还可参见前文，第 424 页。

[37] T.A.沃德引前书，第 163 页。早在 1810 年，设菲尔德就有"订阅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的俱乐部"，称"科贝特俱乐部"。

年金领取者"的高额费用,并阐明了税收和代表权在本质上的关系。他抨击马尔萨斯的论调,即穷人受的苦是早婚和多子女的缘故("那么,一个小伙子手挽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必定就是恶水啰!")和补救失业的惟一办法就是向外移民。科贝特认为:"你们用你们所交的税维持了他们,你们和他们一样有留在本国的权利!你们同他们一样都有父母兄弟姐妹,有孩子有朋友……"。惟一正确的解决办法是经过改革的议会:"我们必须先有议会改革,否则将一无所有。"

> 我劝你们以和平合法的行动,但同时又要有热情和决心去行动,去争取这个目标。如果那些缩头乌龟不参加,如果那些"坐在炉边的体面绅士"对此敬而远之,你们就自己干。任何人都可以起草一份请愿书送到伦敦去……。[38]

到1816年11月底,这篇讲话已售出44000份,——"如果她有能力的话,就让腐败当局去把它抹掉吧。"而到1817年底,这份公开信据称已卖出20万份。[39] 自《人权》以来,还没有哪一份作品获得过如此广泛的影响。从此以后又以信件的形式发表许多每周一期的小册子,标题为:《致汉普郡善良真诚的人们》、《致所有真诚的英国人》、以及《致个别政治家》等等,每种小册子的销量也相当大。然而,当改革运动就要跨入有组织的阶段时,科贝特却停步不前了。虽然科贝特的作品促成了汉普登俱乐部的建立,但这并非他的本意。1816年11月5日、12月2日以及12月10日发生在伦敦矿泉地的规模巨大的改革示威,是在极 622

---

[38] G.D.H.和M.科尔:《威廉·科贝特的主张》(1944),第207—217页,这篇讲话的大部分已由此书转录。

[39] 见W.H.威克沃:《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819—1832年》(1928),第52—54页。

有影响的“斯彭斯派”（沃森医生、西斯尔伍德、普雷斯顿、胡珀）领导的一个委员会的首倡下举行的。科贝特一开始就拒绝了约他在大会上首先发表演讲的邀请。结果三次集会的主要演讲人都是亨利·亨特。

亨特是个富有的绅士农场主，10年来他一直是具有科贝特倾向的改革者。在1812年的布里斯托尔选举中，他作为激进主义者赢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从此便蜚声全国。班福德曾凭记忆描述过1817年的亨特：他是一个五官端正的人，“风度和服饰都像绅士，身高在6英尺以上”：

> 他的嘴唇较薄，优美地弯向两边……。他的眸子呈蓝色或微泛灰色——不太清沏也不太机敏，但相当凝重；正如我后来有机会观察到的那样，他的眼睛只有在他说话激动时才会改变；每到这个时刻他的眼睛就会显得深邃而有神；如果他劳累过度……他的双眼就布满血丝，而且就像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似的。他嘴唇的表情是可以观察到的：善意的微笑会化作轻蔑的一抿或是义愤的诅咒。他的嗓音响亮，脸庞涨红，他手掌紧握，似乎要把什么东西碾碎，他的整个风格都象征着一种竭力想表达出来的痛苦的力量。

亨特的自负同自尊心一样大的米德尔顿织工班福德不太相投，班福德对亨特的最后评价是苛刻的。但班福德也对亨特作出了重要的评定：亨特“总是……把自己置于最艰难的境地……。他总是在同自己或别人制造的风暴相斗争。因此，同其他处于他那种地位和时代的人相比，他要忍受更多的东西，人们应该据此来评价他。”[40]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除了19世纪20

---

[40] 班福德前引书，第19、20页。

年代中期的几年之外，亨特从战争结束到改革法案的通过，一直都是改革运动最主要的雄辩者。1816年他曾在矿泉地演讲，1817年人身保护法中止期间，科贝特认为隐居美国更明智，而亨特却继续他的活动。在彼得卢的集会上他是主要演讲人，并为此遭到监禁。1830年，他在普雷斯顿这个“纳税”选区当选为议员，成为未经改革的下院中惟一支持工人阶级改革运动的人。从1830至1832年，他仍然坚持成年男子普选权，而且还批评1832年法案出卖了平民改革者。他的一贯性和战斗性使他成了人们争论的中心和流言蜚语攻击的目标。 623

然而，流言蜚语并非毫无根据，因为亨特既有一个鼓动家的美德又有其弱点。此外这些特点在那个时代的众多领袖人物身上都能发现，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特点看做是那个时代运动的特点。首先，威尔克斯的老传统只能逐渐消亡，这样，即使是民主运动也还是期待着贵族或绅士出来领导。因为只有像伯德特、科克伦、亨特、费格斯·奥康诺这类绅士才懂得高层政治的形式和语言，而且可以在竞选讲坛上尽显英雄形象，或是用大臣的腔调把大臣们痛骂一顿。尽管改革运动可以利用平等的言词，但人们所崇尚的仍然是旧有的东西，甚至在狂欢的人群中也是如此。即使是在改革运动中，每当一个工人似乎就要“出人头地”时，他立即会遭到他本阶级中许多人的妒嫉。其次，在一个被排斥于权力之外或者连权力的希望都没有的人民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蛊惑因素，这种情况助长了毫无建设性的批判和攻击。除了运动的牺牲者和无所畏惧的自愿者之外，激进运动中还包括了醉汉、携款私逃的司库以及反复无常吵吵闹闹的新闻记者，这些人说起话来总是夸夸其谈，华而不实。鼓动成千上万软弱无力的人去敌视武装的现存制度，这样一种人民运动的真正困窘却用夸张的言词表达出来。作为重大改革集会

的演讲人,亨特知道怎样去打动听众。他的演讲的风格正是他的听众遭遇到的困境促成的。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导致了这位鼓动家的崛起。就全国而言,激进主义政治组织从来就不知道自律约束。既然任何政党或通讯中心均为非法,既然不存在经过选举产生的执行机构来决定政策和策略,那么领导责任就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单个的演说家和新闻记者身上。策略上的真正不同意见也就演变成为624 个人间的妒忌;反之,如果哪位领导人的策略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得到批准,他就可以从中找到自负的资本。鼓动工作中的这种情形使各种问题都同个人因素联系起来了。大规模群众集会需要有特色的头面人物。头戴白色大礼帽的亨特欢喜别人知道他是"自由的拥护者"或是(在彼得卢事件的监禁期间)"伊尔切斯特的圣亨利",正如奥斯特勒后来把自己描写成"童工之王"、奥康诺则把自己说成是"自由之狮"一样。

此外,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大众激进主义和宪章运动一直都处于困境之中,但却从中产生了瑟尔沃尔、盖尔·琼斯以及18世纪90年代的雅各宾"保民官"之类的人物。改革者中"道义派"和"实力派"之间的冲突有时被人们说得过于激烈,似乎可以在沃森医生和西斯尔伍德这类坚定的密谋者与普雷斯或班福德这类纯正的宪政主义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事实上,激进主义和宪章主义都界于这两个极端之间。1839年之前,几乎没有几个改革者认真准备过武装起义,但更少的人打算完全否认人民在面临暴政时有反抗的最终权利。宪章派的口号"可能则和,必须则战",同样也表达了1816至1820年以及1830至1832年的激进主义者的共同信念。卡特莱特少校坚持认为公民有携带武器的权利,温和的《独立辉格党人报》编辑亨利·怀特是许多激进主义新闻记者中惟一提醒读者注意1688年"光荣革

命"先例的人：

> 他们把至今仍然被准许享有的每一份公民自由权和宗教自由权都归功于一次革命……而且，如果纠正时弊的所有合法手段都被否决，他们将最终被迫诉诸革命。[41]

汉普登俱乐部的名称本身就会使人想到一个更为激烈的先例。科贝特就曾煞费苦心地强调说光荣革命是善良的辉格党人的信念。他写道，以武力反抗压迫的权利"是英国的法律和惯例所明确宣称并规定的"：

> 我并不是说现在就应该实施这项权利……我要讨论的是布莱克斯通法官所指出的一点，即反抗压迫的权利总是存在的，但又必须让构成这个民族的那些人在任何成熟的时候自己去决定压迫达到什么程度时行使这项权利才是正当的。

625

除此之外，科贝特还曾有意出来为彭特里奇起义辩护，他说："布兰德雷思做的什么事超过了辉格党人在光荣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呢？"[42]

科贝特审慎地选择了这样一种含糊不清的表述：人民有反叛的权利，但只是在压迫超过了某种无法界定的界限之后才如此。伍勒在《黑矮人报》上也采取了同一说法："人民反抗压迫的权利总是存在的，而且……干这事的必然权力总是取决于人民的共同意志"。[43] 卡莱尔在彼得卢事件之后走得更远，在《共和报》上鼓吹诛戮暴君。[44] 每份大众激进主义的报刊杂志以及每

---

[41] 《独立辉格党人报》，1817年7月27日。

[42] 《政治纪事报》，1818年4月4日，6月6日，20日，12月26日。

[43] 《黑矮人报》，1818年12月30日。

[44] 见下文，第764页，还可参见舍温的《政治纪事》（1818年5月23日）。

个演说家都曾间接或直接地提到反叛的权利。运动的壮言的实质部分几乎不提通过参政权合法地纠正弊端的途径,而是暗示、告诫甚至大喊大叫人民要最终诉诸实力。当亨利·亨特在第一次矿泉地大会(1816 年 11 月 15 日)上演说时,并不比其他几十个演说家走得更远:

> 他知道道义力量比实力优越,除非他发现前者无效,他是不会求助于后者的。在使用实力之前,他们的责任是请愿、劝谏并为适时的改革大声疾呼。那些对抗人民的正当要求的人才真是混乱流血的助长者……然而,如果生死攸关的日子注定要到来,他会向人保证说,如果他还了解自己,他是不会躲在柜台后面或是藏在后方的。[45]

谈到"生死攸关的日子"或"算总账的那一天"是会赢得民众最热烈的喝彩声的。我们决不应该掩饰这种说话方式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它助长了酒馆蛊惑家这类激进主义往往存有较多水份的人;它甚至还会助长那些靠巡回演说挣钱的人(班福德极不赞成这些人),"这些人做着高谈阔论的生意",他们互相竞争,肆无忌惮地用最疯狂最放肆的言谈来博得民众的喝彩。[46] 全国性

626 的领袖人物如拿笔的科贝特和伍勒、动嘴的亨特等等知道怎样巧妙地使自己的言词刚好不致于犯叛国罪,虽然他们避免参与非法活动。但他们(之后是奥斯特勒和奥康诺)还是免不了被指控为鼓动他人从事非法和叛国活动,而自己则从其后果中逃避出来。

这只是激进主义领导人争吵不休的一个原因,他们内部长

---

[45] 《观察家报》,1816 年 11 月 16 日。

[46] 班福德前引书,第 36 页。

期不和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经费问题。充当激进主义领袖是一桩费钱的差事，科贝特和亨特都知道这个道理。除了演讲、出版、旅行和通讯需要花钱之外，请辩护律师以及参加竞选还需很大开销。科贝特，尤其是亨特，在他们爱好的方面都算是挥霍浪费者——科贝特是在农业投机方面，亨特是在生活的总体风格方面。他们两个人在财务上都有些漫不经心。缺乏统一性的激进主义运动，由于没有经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和委任的司库，始终只得靠一些特别委员会出面呼吁这样或那样的应急基金援助。科贝特靠出版赢利弥补了个人损失，而亨特为了使自己的宣讲有利可图则出售"激进早餐饮料"(一种用烤谷子制作的代替茶和咖啡的混合物，亨特把它推荐给激进主义者以抵制某种征税商品)。由于私人的营业收入与运动的资金之间并无明显的界线，激进运动的基金的使用和托管问题，以及公私利益的混淆都成了公众指控的丑闻。这类事情后来对奥康诺和欧内斯特·琼斯也是同样的。[47]

然而，激进运动内部不和的最大原因纯粹是虚荣心。由于他们经常为此发生纠纷，因此，与其把虚荣看做是他们争吵的原因，不如把它看做是激进运动普遍缺乏统一组织的一种症状。几乎所有的改革领导人在不同意见刚一出现就立刻尖锐地指责其他领导人的动机。当挑唆分子卡斯尔、奥利弗和爱德华兹的真实面目被揭露出来之后，这种互相怀疑进一步加剧了。从 627 1817年起，由于人们互相指控对方为"密探"，由此产生的怨恨

---

[47] 例如，彼得卢事件之后，亨特陷入了一场同自己的改革派同事——曼彻斯特的约瑟夫·约翰逊——的旷日持久的争吵。这场暴吵把他同别人互相请客所花的费用、洗衣店的帐单，他的马吃的燕麦数量，以及在旅店给某位女仆的小费(也可能还不是给的)统统公开出来了。参见约瑟夫·约翰逊：《给亨利·亨特的一封信》(曼彻斯特，1822)。

使怀疑的气氛变得浓厚起来。

由于缺乏民主的政治组织,激进主义政治打上了个人烙印。1816 年之后的运动具有 18 世纪 90 年代运动的许多优点,但没有它那种平等的特色。科贝特是树立一代风气的人物,因此在这一点上批评他是没有多少道理的。独立的激进主义出版物在战后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成功。他自己对这一成就的解释(写于 1817 年和 1819 年)是接近真实的:

> 多年以前……我作为某种自立的政治家开始了自己的生涯。我有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偏见,瞧不起人云亦云之辈。在我之前,每位有才华的作家总把自己归附于某个党派,某位大臣,或是其他什么的。我同所有这些都毫不相干……。因此多年来,我一直是那些当权人物和追逐权力的人的仇视的目标……。

到战争结束,他已成为(用黑兹利特的话来说)"国家政治中的第四等级",[48]而且"无疑是当代最有势力的政治作家"。"当他还是托利党时,改革者读他的作品;他现在成为改革者,托利党人倒要读他的书"。连续几道旨在征收报刊杂志税以及加紧实施煽动性诽谤罪的法令大都是针对科贝特本人的。科贝特曾声明说:"我说这话并无自我中心的意味",不过他的结论却富有个人色彩:

> 一个人不能因狂妄自大而获罪。阻止他写文章,就是在这个伟大王国的法律上造成全面的革命。这样一个人必定会成为人们谈论和记载的一大对象。他所有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乃至他的身材、头发的颜色也会

---

[48] 法国的人口在大革命之前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由僧侣组成;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平民。第四等级是新闻记者自嘲之喻。——译注

成为那个王国的人民感兴趣的东西。

科贝特最喜欢的题目当然是博特利的威廉·科贝特。他的《纪事》连篇累牍地刊登了他自己的事迹、自我辩护、主张、感伤、一时印象以及他的遭遇等等。结果,改革事业被说成是个人的事,变成了威廉·科贝特和腐败的旧制度之间的斗争;卡斯尔雷,"博尔顿的弗莱彻"、威尔伯福斯、马尔萨布鲁厄姆、伯德特等人都是或变成了他个人的敌人。科贝特这种变化无常的热情常常使他的改革派同事心神不安。黑兹利特的见解是比较公允:"一旦他自己的作品使他自己创造的人物出了点小风头,进而锒铛入狱之后,他就同他们争吵"。 628

我们不得不把科贝特的缺点作为他的天才的阴暗面来理解,他的天才使他能在英国历史上的30年间(一周复一周地)比任何新闻记者发挥的影响都更大。只是在对他的天才视而不见的情况下,他的那些缺点才是令人太厌恶的。科贝特树立的风格不可避免地为他的同事和竞争者所仿效;亨特在伊尔切斯特监狱分期发表的《回忆录》中以及卡莱尔在《共和报》中都模仿了这种风格,还有12个名气较小的人物也是如此。从战争结束到改革法案通过这段时期是"自立政治家"的时代,每一个激进主义者都是政治上的抗议者;每一位领袖人物都声明自己是独立的,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和良心,不崇尚任何权威。黑兹利特在1819年写道:

> 改革者常常为一种矛盾的精神所支配,他是一个不好使的工具,是机器中一个不合拍的部件,他不可能被训练成守纪律的人,因为……他头脑中的第一原则是至高无上的良心和自我判断的独立权利……他的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不然他就寸步不让。他绝对不会为某个党派放弃原则。他宁要奴役也不要自由,除非这种自

由正好符合他的方式……。

黑兹利特还说："一位改革领导人常与同一条战壕的所有人争吵……并认为他为事业作出了一份有益的贡献，他放纵他的坏脾气和个人意志，并把这些误以为是对自由的热爱和真理的热诚！"

> 其他人……则进入了各种委员会……并自认为是与另一党派相对立的某一党派的首脑人物，相互咒骂、诽谤、揭露、陷害、抵制、拆台，并把成功的机会抛到共同的敌人手中……。[49]

这种顽固的个人主义的长处在卡莱尔与当局的长期斗争中显示出来。[50] 然而，无论是亨特还是卡莱尔，其缺点都是令人不快的，并且整个危及到改革运动。在澎湃汹涌的人民骚动中，大小领袖人物的虚荣心像水蒸气一样冒了出来。普雷斯把除他自己和几个功利主义者之外的所有人都看做是可操纵的傻瓜，班福德常显出一个自我成才者的满足和自尊，他的原则可以经得起迫害，但却经不起西德默思爵士的甜言或者某个绅士对他的诗文的恭维。卡莱尔终究是个人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判断相当自信，甚至不承认政治协商或组织这类概念。亨特（如果我们仅仅是相信他的某些同事如班福德和约翰逊对他的一部分的指责）的虚荣心方面有时表现得很无聊。彼得卢事件之后，亨特的几个同他一起被控告的同事在候审期间在兰开郡的棉业城镇作了一次公开巡行。班福德回忆说："我对身边不断发生的事除了感到有点羞耻之外还感到可笑"：

> 亨特坐在马车夫旁边的位子上……穆尔豪斯则站在马

629

⑲ W.黑兹利特：《政治论文序》（1819），《全集》，第7卷，第13—17页。

⑳ 见下文，第720—728页。

车顶上，手里抓住一根两边拴在铁攀子上的绳子。从博尔顿出发他就一直保持这个姿态……亨特不时地脱下帽子，拿在手里慢慢转动，并优雅地向人们点头致意，不时还要说几句好听的话；但如果 5 分钟或 10 分钟过去了还没有一两声欢呼声，或是更令亨特满意的“亨特永远健康”的呼喊声……他就会从座位上站起来，转过身劈头盖脸地责骂可怜的穆尔豪斯说：“你为什么不喊？为什么不喊？给他们打打气，你没见他们疲倦了吗？”[31]

当我们估量亨特、伯德特、奥斯特勒或是奥康诺的影响时，必须记住，他们的巡行简直就像深得人心的国王，而他们的出场又像挂头牌的明星来了。1819 年亨特曾在兰开郡的一个村里受到热烈欢迎，他走过的路上铺满鲜花，人们高喊“要伯德特，不要巴士底狱！”、“亨特！自由！”，同时还唱着歌：

跟着亨利·亨特我们向前走，
跟着亨利·亨特我们向前走；
扬起自由帽，不顾纳丁·乔。[32]

在曼彻斯特激进派主日学校里，学生班长们脖子上佩戴的不是耶稣受难像而是亨特的盒像。[33] 再如，每当群众集会结束时，人们总要卸下主讲人的马车，然后拉着坐着扬扬得意的主讲人的车穿过一条条街道。盛大的示威活动都有礼仪式的特点，630 演讲人以口若悬河的雄辩、措辞考究的提问来打动听众，以期获

[31] 上引书，第 200 页。

[32] J. 哈兰：《兰开郡的民谣与歌谣》，第 262 页。

[33] D. 里德：《彼得卢》（曼彻斯特，1957），第 54 页。

得预期的喧嚣效果。[58] 因此，有特色的演说家都是那些善于为自己制造戏剧性效果的人，20000 人震耳欲聋的欢呼使大多数人自我膨胀起来。随着虚荣心的增长，演说家开始沉湎于台下人山人海喝彩欢呼的景象。普伦蒂斯写道："亨特的胃口吊高了"。他开始嫉妒自己的竞争者，经常注意寻找机会树立一种戏剧性形象，并开始对自己那些不重要的同事漫不经心敷衍了事。反过来，这些人因民众的忽视而感到虚荣心受到损害——为什么就不能喊"约翰逊！自由！"或者"班福德！自由！"呢？

鼓动家是有害亦有益的领袖人物。亨特的言论的既不是自由主义的原则，甚至也不是系统周密的激进主义策略，而只是运动的情绪。他总是拼命去说那些能激起最热烈欢呼的话，他不是领袖，而是成了民众中最不安分的那部分人的俘虏。据普雷斯说：

> 亨特说过他的行动方式就是蜻蜓点水地触及好的观点，而对这些观点一点也不多嘴；他不同任何委员会或党派搅在一起；他愿意自己行动；他不想冒犯任何人；但也不怕得罪什么人。

彼得卢事件之后，亨特的声望达到顶峰，并在伦敦受到了凯旋式的欢迎，普雷斯（在致霍布豪斯的信中）也曾用比较宽容的措词描写亨特：

> 是啊，这也是他应得的（即伦敦的欢迎），而且还应该更多一些。如果人民——我指的是工人——只有一个人为他们说话，他们至少会，也应该会用他们的喊声去支

---

[58] 例如，萨克斯顿就曾在罗奇代尔说过："全国人民只有团结起来……要求他们的权利，正如人们决心要获得自由，否则他们将在斗争中高尚地死去（热烈的喝彩声）。"见舍温的《每周政治纪事》，1819 年 8 月 7 日。

持这个人。他们愿意同他一起战斗，或是为他而战，这种情况也是很多很多的。没有更好的人能像他那样与人民打成一片，这又怨谁呢？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愿意同一个与他们有着共同事业的人、一个最好的人连在一起。我记得我当工人时的那种感觉……。如果除了亨特就再没有人出来为工人说话，亨特自然就是他们的。[55]

3. 汉普登俱乐部

631

如果我们不考虑战后激进主义运动领导人的个性和领导权问题，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一极端混乱的运动。这是大众激进主义的英雄时代，然而，纵观全国，很难发现哪位领袖人物看起来像是英雄，相反，他们有时还显得滑稽可笑。从 1815 年到宪章运动期间，激进运动一直是相当活跃，持久不衰，从根本上说也是健康的，尤其是在巴恩斯利、哈里法克斯、拉夫巴勒和罗奇代尔这些地方中心。运动的真正英雄是地方上的书商、报纸经销人、行业工会的组织者，汉普登俱乐部和政治联盟的书记和发言人——这些人后来都遭到监禁，却并不指望为此得到终身酬报；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是无名小卒，最多只在当地报纸和内政部的文件上留下少数几份有关其活动的记载。他们为那些喜好争论和提出异议的领袖人物提供了讲坛，不然，那些领袖们肯定无能为力了；不过他们经常沮丧地注视着领导人之间的争吵。

1816 至 1817 年冬春所发生的混乱无序的事件表明，日益发展的全国性运动缺乏一个全国性的中心。1817 年 1 月，在卡特莱特少校的倡议下，来自各地的汉普登俱乐部代表在“王冠与

---

[55] 沃拉斯前引书，第 120、146 页。

锚"的大厅集会，这是全国性请愿运动的高潮。从多方面估计，这次呈交的改革请愿书（多数是主张年度议会、成年男子普选权、无记名投票）所征集到的签名总数在50万到150万之间。

但是，从卡特莱特发出要求召开会议的传阅信件（1816年9月）到会议召开期间，12月2日第二次矿泉地大会引起的骚动事件已经出现了。这些骚动的起因和意义则不清楚。早在1816年3月，伦敦就已出现旨在反对监禁债务人的极端雅各宾主义骚动。当局曾截获一封致"我们受到监禁的同胞"的信。该信大概出自"三色委员会"之手，它宣布要在3月2日举起"三色旗"，到那天"牢门将被打开，……高高在上的各类巴士底狱将化为灰烬"：

632

> 你们要设法使伦敦的每一个监狱——王府法庭、舰队街、海事法庭、卖马人巷等等——都知道我们的计划，这样你们就可以同时行动。[56]

这样的骚动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伦敦和伯明翰在战争时从事定货生产的小雇主们是战后经济萧条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当中许多人破了产。战争期间，这些小雇主有许多一直是为大代理商从事转包合同生产的，后者从中获得较大份额的利润。小雇主发现他们的劳动只是养肥了这些中间人，而自己反倒要负担沉重税收和穷困地区的贫穷救济金。[57] 这样的境遇迫使他

---

[56] 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203号；内政部档案，第40.7/8号。

[57] 伦敦东区的小雇主和工匠对征收济贫税一直不满。在不景气的年代里（18世纪90年代），伦敦斯皮特菲尔兹以及迈尔恩德等地的济贫税在每镑收入缴纳5至10先令之间，而在西区仅缴纳2先令6便士。参见《一位长官关于伦敦地区肉与汤的施舍的记叙》（1797）；W.黑尔：《就斯皮特菲尔兹地区穷人的苦难问题给S.惠特布雷德的信》（1806）；T.F.巴克斯顿：《斯皮特菲尔兹的穷困》（1816）；《行业报》，1826年10月15日。

们转向了极端激进主义，而伦敦通讯会和威斯敏斯特接连几次的议会选举的长期宣传则早就为这种转变做好了准备。如果说关押负债者的监狱有时可能是招募密探的地方，那么，从更重要的程度上说，监狱也是激进主义者的进修学校。在这里，那些遭到债务法严厉惩罚、内心极度痛苦的受害者们不仅能够读书、讨论而且还能结识更多的朋友。[58]

1816 年 3 月的那封威胁信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但攻打监狱的说法在 12 月的矿泉地事件中又出现了。关于这事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必须对此作一番谨慎的考察。第一种说法出自审讯詹姆斯·沃森医生时的起诉书；第二种说法出自亨利·亨特 1822 年的《回忆录》；第三种说法则出自沃森医生的辩护律师的答辩词或他自己的辩词。但这些说法都不可靠。首先，政府的说法主要出自一名政府帮凶约翰·卡斯尔的证词。他早已是个挑拨离间之徒，后来又被证明是声名狼藉的证人、伪誓者、妓院"老鸨"的保护人；[59] 其次，亨特的《回忆录》是在卡图街密谋事件之后在伊尔切斯特监狱中写的，在这之前他就同沃森发生根本性的争吵，他当然有意把自己同此事的关系缩小到最低程度；而沃森则于 1819 年秋在报上同亨特进行论战，他不肯把他这方面的事公布出来，理由是时机尚未成熟。 633

事情的真相也许是这样。1816 年秋是一个极端困难、充满失业的时期，兰开郡、约克郡、伯明翰各行业以及伦敦都受到了影响。首都的两大工业——钟表业和丝绸业——同时陷入了萧

[58] 虽然《破产法》于 1797 年和 1801 年得以通过，但还是救不了小债务人，因为他们被迫呆在监狱里，而监禁的费用还得加在债务上。参见 J. 尼尔德：《小债务人救济协会记叙》(1802)，第 301、335—337 页。在内政部 1816 和 1817 年的文件中就有许多债务人的凄惨请愿书。

[59] 见下文，第 489、492 页。

条。仅在斯皮特菲尔兹一地，据说就有45000人缺乏食物，而且吵着要在11月进入济贫院。[60] 同时，伦敦还有一大群退役士兵和水手。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威斯敏斯特委员会退缩了，拒绝在伦敦民众中进行任何鼓动。除了威斯敏斯特竞选场合(以及伦敦城选举，此时有大量人群聚集在市政厅前)以外，自1795年以来，伦敦就再没出现过激进主义性质的、完全"不限人数"的示威活动。这样，一个小型的极端雅各宾主义的(或称斯彭斯主义的)委员会形成了，其中最活跃的成员是沃森父子、普雷斯顿、西斯尔伍德、胡珀和密探卡斯尔。该委员会于1816年11月15日在矿泉地举行示威活动，并发信邀请几位主要的激进主义者出席。科贝特同此事保持着距离，仅有亨特同意到会演讲。大会前夜，亨特把该委员会提出的大会决议案作了修改，使之比较温和，而直到这时他才见到大会的组织者们。大会的准备工作很不充分，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讲台都没有。然而到会的人都相当多，完全出乎大会组织者的预料，结果，亨特只得站在一个能够俯瞰会场的窗口前演说。

大会"延期"到12月2日。用亨特的话说，大会组织者们因成功而洋洋得意，一起陪他回到旅店，并在晚餐桌上高声侈谈革命。在这当中，正是卡斯尔说出了这句祝酒辞："愿最后一个国王被最后一个教士的肠子勒死。"(沃森和西斯尔伍德第二天拜访了亨特，并为卡斯尔的行为向亨特表示歉意！)大约在同一时候，某种"行业委员会"在伦敦成立了，普雷斯顿积极参与了其活动，而另一个密探(T. 托马斯)成功地当选为主席。据托马斯说，普雷斯顿成功地把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组织起来，并在私下

---

[60] 尤见《人民报》，1817年4月19日；T. F. 巴克斯顿：《斯皮特菲在尔兹的穷困》(1816年)。

曾说出要清除所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公债持有人，还提出举行起义，攻打英格兰银行、伦敦塔和各监狱。卡斯尔积极支持这些建议，而且真的在 12 月 2 日把一些武器装到一辆车上运到矿泉地。这次到会的民众比前一次多得多，其中还有许多士兵和水兵。事先也有谣传说会上要“出事”，这一谣传甚至远远传到了英格兰北部。[61] 在普雷斯顿看来，军队即将哗变，这不仅是因为士兵心怀不满，而且也因为普遍同情人民。[62] 会场上展开的一面横幅上也这样说：“英勇的士兵是我们的朋友，善待他们。”

“……腹中空空使人热血沸腾……”。这是为军队草拟的一份传单底稿上的一句话，据说这份底稿是矿泉地大会之后在沃森的家中发现的。但是 12 月 2 日头脑发热最厉害的似乎不是士兵，而是沃森医生的儿子。沃森父子俩(普雷斯顿说)会前一直在喝酒，小沃森已经是酩酊大醉了。他老早站在一辆马车上对着一部分群众高谈阔论，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像卡什曼)同他一样，似乎也是醉醺醺的。随后，他跳下马车，走入人群中，一些人朝伦敦塔方向走去，剩下的人则向不同方向涌去。好些个枪械店遭到抢劫。一些暴动者到了伦敦塔，其中一人(也许是普雷斯顿或西斯尔伍德)爬上围墙，号召军队加入人民的行列。在铸币厂也发生过好几次的暴动，其规模使人想起戈登暴动，结束时有一个骑在马上的人率领这群暴民(无论是当局还是密探都不知道他的身份)。政府曾事先得到暴乱要爆发的警报，并采取了防范措施，而亨特也曾吃惊地发现在冷浴地监狱门前配置

635

[61] 12 日 3 日，曼彻斯特曾有一群群来自附近的汉普登俱乐部的代表在等待伦敦的邮件。设菲尔德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62] 普雷斯顿称：“他们的境况比技工好些，但他们的朋友和亲戚的悲惨状况会使他们烦恼”。(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 11.203 号。)事实上，在派兵平息 1815 年的谷物法骚乱时，部队就已明显地缺乏热情，见哈蒙德夫妇的《城市工人》，第 86 页。

了"大批巡捕和警官"。不过,只有一小部分卷入了暴动,更多的人则留在原地听亨特演讲。[63] 他们同意再次把大会"延期"到12月9日之后,便和平地散开了。

出席第三次矿泉地大会的人数实际上比第二次还要多。[64] 要对所有这些混乱事件做出一种解释是不容易的,这些暴动并非简单的酗酒闹事,也不是精心策划的挑衅行为,同时也没有明显的模仿攻陷巴士底狱的意图。然而,这些暴动在某种程度上却具有三方面的性质。沃森医生或许并不想看到示威活动本身以外的一些后果,不过西斯尔伍德和小沃森(在卡斯尔的鼓动下)倒有可能多多少少想要引发一次"自发的"暴动并以此打开全民武装政变的道路。小沃森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几个月后他化装成一个教友派教徒(用腐蚀剂毁容),偷偷登上了泰晤士河边一艘去美国的轮船。[65] 亨特当然同暴动阴谋无关,不过在开庭审讯沃森时,他还是愿意出庭作证并为沃森辩护,同时来证明自己的温和影响,[66] 并且在此后他还与沃森共事了两年。

636 普雷斯把矿泉地的暴动者称为"一伙卑鄙的傻瓜和歹徒",但我们没有理由就此认为大多数伦敦人也持这种看法。如果说

---

[63] 沃森医生声称他也留下来了,而且还劝民众保持安静。见《独立辉格党人报》,1817年8月3日。

[64] 计划在1817年2月和3月(两项法案和终止人身保护之后)再次在矿泉地举行示威活动的几次努力均告失败。以上说明主要取自W.M.格尼的《詹姆斯·沃森审判》(1817)一书,尤其是第1卷,第45—51、51—61、73、531页,以及第2卷,第190页;《H.亨特回忆录》(1822),第3卷,第329、344、369—372、447页;财政部法务处档案,第11.203号中伦敦市长对普雷斯顿的审查,1816年12月4日和5日;内政部档案,第40.4号中《T.托马斯致N.克南特先生》(1816年11月9日和27日);内政部文件,第40.3和7号;《国家传记词典》。

[65] 《独立辉格党人报》,1817年7月27日和10月12日。

[66] 在庆祝沃森医生无罪释放(他曾经被指控犯了叛国罪)的宴会上,亨特还当了主席。同上,1817年8月3日。

暴动者们是那些浅薄外行，并且受到好装腔作势的领导人的摆布，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威斯敏斯特委员会没有坚持先前的雅各宾主义原则所产生的后果。矿泉地事件至少产生了三个严重后果，第一，它为当局压制改革派提供了所需要的借口；第二，当战后激进的改革运动刚刚起步时就吓退了温和的中等阶级改革派，并使之推出了大众的激进运动；[67] 第三，它使改革领导人在汉普登俱乐部的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陷入了惊慌失措之中。伯德特先前曾代表伦敦汉普登俱乐部在卡特莱特关于召开代表会议的传阅信上署名，他自己却去他在莱斯特的领地而不去“王冠和锚”出席会议。而科贝特，照他自己的解释，直到大会前仍犹豫不决，他认为“在这样的紧急时刻开这样的会，将会为腐败政府提供他们需要的靶子”，而且代表们会暴露身份，即使不遭逮捕，至少也会引起政府密探的注意。[68]他以比大多数改革者更加敏锐的洞察力看透了政府的挑衅手段和用激将法激励极端激进分子进行流产的暴动，以便分裂运动。他在 1816 年 12 月写道：“他们全靠阴谋诡计，哦，他们太靠阴谋了！他们挖空心思，用尽手段，焦躁不安，浑身是汗，完全不能自拔，他们搞阴谋都快搞到死的地步！”[69]

直到最后一分钟，科贝特才同意（作为威斯敏斯特的“代表”）同亨特（作为布里斯托尔和巴思的代表）一起参加会议。卡特莱特少校以其沉稳的风度坐上了主席的交椅，他“身着棕色长

---

[67] 见哈勒维前引书，第 18—22 页。

[68] 《政治纪事报》，1818 年 4 月 11 日，亦见该报 18 日：“我总是（对伯德特）说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把一群毫无防护的人暴露在腐败政府的毒牙面前。”

[69] 《政治纪事报》，1816 年 12 月 14 日，还可参见科了著《科贝特传》，第 216 页。

礼服，头戴褐色假发，步入房间，平静地坐上第一把交椅”。[70] 然而来自兰开郡和莱斯特郡那些充满活力的俱乐部的代表很快就会看到大会陷入争吵之中，他们为此感到沮丧。（在科贝特的支持下）会上曾有人企图按照未列会的伯德特的愿望把改革者的要求限制在房产持有人选举权上。亨特则支持成年男子选举权，他的主张得到了外省代表的支持。后来，科贝特出于纯粹的实用主义考虑又宣布自己改变了主意，他解释说，他以前支持房产持有选举权仅仅是因为他不相信“那些没有固定的看得见的住所、因而对安全不感兴趣的人们……正确地投出选票”：

637

> 我想象不出如何才能阻止那么从一个教区步行到另一个教区，一天之内投两次或三次票而且是为 5 个或 6 个候选人投票。

最后，一个“非常聪慧、谦逊的人，很抱歉我忘了他的名字，不过他来自兰开郡米德尔顿”，就他提出的异议作出了答复，指出，由于实行民兵法，每个教区都有成年男性居民的名册，这种名册同样可用作投票人名册。“于是我全明白了，以前我是根本想不到这种事……。”[71]

那位“聪慧、谦逊、来自米德尔顿的人”就是织工塞缪尔·班福德，不论人们对他作出什么样的批评，他依然是 19 世纪早期激进主义运动最伟大的编年史家。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像班福德这样的人给科贝特留下的良好印象比起他谈到民兵名册更能使科贝特转变到拥护成年男子选举权的事业上来。实际上，主张房产持有人选举权还是主张成年男子选举权多年来一直是中等阶级改革运动和工人阶级改革运动的分水岭，科贝特

[70] 班福德前引书，第 20 页。

[71] 科贝特：《每周政治纪事》，1817 年 2 月 22 日。

加入后者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然而,他的加入仍没有解决各汉普登俱乐部所面临的统一组织和领导的问题。科贝特既厌恶伯德特和威斯敏斯特委员会的"尾巴"的妥协政策,又厌恶伦敦酒馆俱乐部的秘密地下活动。对于改换宣传鼓动的方式,科贝特之所以给予正式的支持,是出于年迈的卡特莱特少校的建议。但卡特莱特的想法在许多方面仍然属于怀威尔以及小绅士改革派的郡联合会那个时代。如果乡绅们退缩不前,卡特莱特会乐于同工匠和小雇主联手。不过他依旧相信旧的行动方式,即请愿和召开郡会议。秘密委员会可以时有时无,人身保护法可以中止又中止,但卡特莱特少校却岿然不动,准备当局把他送进监 638 狱,他发表宣言,寻求古代宪法先例(因为他仍生活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时代),在不合法手段的模糊界限上寻找可行方法。坎宁曾带有敌意地说卡特莱特是"伦敦的老心脏,全国的动乱情绪从此得到支持"[72]。而班福德从一个乡村激进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所作的赞扬就比较准确。他写道:"在1817年人身保护法中止期间,德高望重的少校岿然不动,他英勇如雄狮,平静如处子;在那个纷乱不宁的时期竟几乎未被人们注意"。[73]

卡特莱特做得够多了,科贝特在1817年接过卡特莱特有关组织的过时观念时,只在其中增加了对自己作品力量的无限信赖。他一生中都对雅各宾团体感到踌躇不安,他对任何脱离自己影响的运动都感到不快。他夸大了印刷品对"公众"的影响力,轻视组织的重要性,不知道公众舆论必须通过组织的媒介才能产生效力。而且,从1817年开始,他就因公众和个人原因表现得十分谨慎。这是因为战争期间的铁窗生活曾使他受尽迫

---

[72] 见R.J.怀特:《从滑铁卢到彼得卢》,第134页。

[73] 班福德前引书,第44页。

害，这时他又一次陷入了周期性的经济窘迫之中，因此他私下决定避免引起当局的再次注意。

所有这些因素，包括个人的和观念的，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1817年1月底伦敦召开汉普登俱乐部代表大会结束还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激进主义运动就陷入了四分五裂、一片混乱之中。这次大会本来就没有作出任何严肃的组织决定，在周末一两天的争论之后就散会了，只是从科克伦那里得到了一道呈交请愿书的诺言。摄政王在1月28日出席议会开幕式之后的回家路上受到民众围堵，他的马车窗户被砸坏了。政府立即发动从皮特政府以及1795年事件中承袭下来的"警报"手段，而且还任命了"秘密委员会"。当这些人还在从律师的文件箱中仔细筛选他们想象的叛国罪证据之时，一大群改革示威者已经用椅子把怀抱着一卷"约像琵琶桶一样大小的"请愿书(来自布里斯托尔)的科克伦勋爵抬到了下院。上院委员会在2月中旬的一份报告中用最阴沉的言辞叙述了斯彭斯主义者、矿泉地暴动者以及汉普登俱乐部的活动。报告中提出的证据表明：

639

> ……以总暴动的手段，旨在推翻既定政府、法律以及王国宪法并实现对财产的全面掠夺和分配的叛逆阴谋已在首都形成……而且计划……还扩大到某些人口最密集的工业地区。[74]

2月末和3月，议会采取了一系列对付改革者的措施，以最严厉的方式重新颁布了18世纪90年代的镇压法，人身保护法被中止到1817年7月1日，扰乱治安集会法(一直生效到1818

---

[74] 关于上院委员会的报告可见《汉萨议会记录》，第35卷，第411页。西德默思把汉普登俱乐部看做是"打着议会改革旗号意在制造公共混乱和革命"。见《西德默思致菲茨威廉信(1816年12月10日)》，菲茨威廉文件，F.45(g)。

年7月24日）的用意是要把所有的改革"社团和俱乐部……作为非法组织和结社加以彻底镇压和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必须事先通知地方长官后方能举行，而地方长官则有权解散任何（照他们自己的判断）具有扰乱治安倾向的集会。与此同时，西德默思还从内政部发出通函，提请地方长官的注意：他们有权逮捕那些涉嫌传播扰乱治安的诽谤性言论的人。

此时，科贝特变节了。他的变节有两层含义。首行他选择了当局正在打击汉普登俱乐部的时刻发表了他自己全面否定所有改革团体的言论：

> 我劝告同胞们不要同任何政治俱乐部、任何秘密集团、任何通讯会发生联系，而要靠个人的努力和公开集会……。这些俱乐部中固然有非常高尚非常热诚的人，但我很难相信他们是以最佳最有效的办法在工作。

640

科贝特是在2月中旬说这番话的，两周以后，他对改革团体作出了更强烈的否定：

> 我一直非常真诚地试图说服公众：各种各样的俱乐部总的说来都具有有害倾向，而且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好处。我曾说过……如果目标不是通过公众思想的普遍、自由、未加装饰、没有偏见的表达和影响去实现的话，这个目标就不可能，而且也绝对不应该实现的。[75]

科贝特全面否定民众组织的言论正好在中止人身保护法那一周发表。伍勒被激怒了，他在《黑矮人报》上规劝科贝特说："先生，看在上帝的面上，别说只会造成危害的话，别把我们出卖给敌人"：

> 我们的敌人在我们周围全面组织起来。那些军事俱乐

[75] 《每周政治纪事》，1817年2月15日和3月1日。

部、海军俱乐部、选区贩子俱乐部不在为腐败的事业效劳吗？……我一直认为各种俱乐部都是收集和提炼普遍的、自由的、不加装饰和没有偏见的公众意见的最重要的方式，而你说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先生，你把最有损于改革事业的言论送给了改革的敌人，你是在用十分有害的方式玩弄改革事业……。分裂国民的人实际上是在摧毁民意。[76]

3月底，科贝特又一次变节。他自愿流放美国，还辩解说这是因为国内政府的镇压法令是特地针对他的。[77] 此后，其他许多种刊物很快填补了科贝特的《纪事》留下的空白，主要是《黑矮人报》、霍恩的《改革家纪事》以及舍温的《政治纪事》。这些刊物成功地顶住了迫害，从而使科贝特的变节黯然失色。不过，他的出走还是直接导致改革派的心情沮丧和士气低落；而且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之中，改革运动的全国中心也就不复存在了。

641 在迫害和混乱发生的同时，出现了"背毯进军"、"阿德威克密谋"和"彭特里奇起义"这些互相牵连的事件。在英格兰中部和北方的许多地区，地方改革运动仍然是强大有力的。1816年秋季和冬季就曾出现过引人注目的公众集会。[78] 与春季出现的政治危机伴随的是出现了极度的经济困难，纺织业和制铁业地

[76] 《黑矮人报》，1817年3月5日。

[77] 科贝特是在1819年底才回到英国的。但是在沉默一段时间后，他又重新开始出版他的《纪事》，从远处评论在英国发生的事件，通常是在事件发生5或6个月之后。因此，他对"德比处决"一事（1817年11月7日）的评论直到1818年4月才出现在《纪事》上。由于他同英国的同事仍然有通讯来往，而且也从流亡到美国的改革者那里得到一些报告，因此他的评论从总体上看是很准确的。

[78] 例如，1816年9月和10月，诺丁汉、博尔顿和设菲尔德（到会者有8000人）就出现过改革集会，此外还有伯明翰（1817年1月）。参见《诺丁汉评论》，1816年9月27日、10月4日和11日；朗福德：《伯明翰100年》，第2卷，第414—416页。

区的失业和价格飞涨。这一切一直持续到1817年的夏季末。在1816至1817年间的冬季，政治集会、读书讨论的风气已经蔓延到大多数工业地区。从诸如莱斯特、曼彻斯特、诺丁汉、德比、设菲尔德和伯明翰这类中心向外扩散，在周围工业村庄中出现了与改革团体相联系的网络。在一些产生了中心组织的较大市镇，改革派通常包括一些工匠、小商贩、少数劳工以及中等阶级中的某些极端的"亨特分子"。这些人不仅在自己的城镇，而且还能够从周围地区的工匠或手工工人中得到支持。一旦改革事业在针织业、制陶业、制钉业或是手工织造业发达的村庄打下根基，几乎完全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镇或村的俱乐部也就形成了，而且能像卢德分子那样控制地方社区的同情。

关于莱斯特和兰开郡两地的运动情况，我们了解得相当充分。莱斯特俱乐部建立于1816年10月，其主席是个染色匠兼木材商，副主席是个鞋匠，最积极的成员有一个排字工、一个针织机制造工以及当地针织工的领导人。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这种俱乐部的成员(每周交1便士会费)就增加到500多。一个奸细曾报告过1816年11月底的一次大会的情况，到会的有200多人，一个多小时花在喝酒谈天收会费。然后威廉·斯科特，一个当地针织机制造工的首领，18世纪90年代的老资格的潘恩信徒当选为当晚的主席。他向大会致词，介绍大家看一本宫廷纪事的抄件，并宣读一份年金领取者的名单。他的讲话引来了听众的嘘声和评论： 642

> 有人说，我们开会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家伙关起来……另一个回答说，"让他们死在他们的吊袜带上"，还有一个人说："把他们关进伦敦塔"，另个又说："只需等两年"……他们高声谴责常备军……。一个名叫利的人提议每周买100本科贝特的《纪事》……。这项提

议经举手表决后得到通过。

在通过感谢主席的表决之后，斯科特唱了一首歌以示谢意：

他说他现在唱歌就跟18年前暴徒闯入"三王冠"酒店的情形差不多，他还说："人民大众要自由！"听众热烈鼓掌。他唱了一首革命歌曲。

到1816年底，据说在莱斯特的村镇已有30多个汉普登俱乐部。有迹象表明，这些俱乐部的是同针织工人的工会组织同步发展的。有些地区的地方长官惊恐不安地把这些俱乐部看成是一种"旨在把议会改革运动纳入卢德运动轨道的尝试"。当局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政治激进主义渗入农村，并断定织袜工"完全是受了革命即目的这一信念的影响，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作好准备以便在必要时参与战斗"。人身保护法中止之后，莱斯特各汉普登俱乐部的公开活动随即停止，正是这同一个政府当局推断（不无道理）：这是改革派退隐至秘密形式的组织中去的证明，因为卢德运动的经历已为他们作好了准备。[79]

兰开郡的情形大致也差不多。尽管一些较大的市镇如奥德姆、斯托克波特、博尔顿、罗奇代尔不时也能成为改革运动的典范，而且在曼彻斯特的改革派陷入争吵之际也能起到稳定运动的作用，然而，曼彻斯特仍然是改革运动的中心城市。班福德的回忆录一开头就列出一份1816年底"兰开郡的主要改革者"的名单：

这些人当中有曼彻斯特的约翰·奈特（纺织厂厂主）、威廉·奥格登（版印刷匠）……威廉·本波（鞋匠）、布雷德伯里（石头切割匠）、艾什顿的查尔斯·沃克（织工）、莫

---

[79] 内政部档案，第40.3号；A.T.帕特森：《激进的莱斯特》，第107页及以后数页；H.W.戴维斯：《格雷与皮尔时代》，第180—183页。

斯利的约瑟夫·沃森(木鞋匠)、约瑟夫·拉姆斯登(毛织工);利斯的威廉·尼科尔森(活版印刷工人);奥德姆的约翰·黑(丝织工)、约瑟夫·泰勒(帽制工);罗伊的约翰·凯(织厂厂主)、威廉·菲顿(外科医学学生);伯里的罗伯特·皮尔金顿(棉织工);米德尔顿的阿莫斯·奥格登(丝织工),凯莱布·约翰逊(棉织工)以及塞缪尔·班福德(丝织工)。不久,我们当中又增加了曼彻斯特的约翰·约翰斯顿(裁缝)和利物浦的约瑟夫·米切尔(绸布商)。

我们还可以补充另外一些1816至1819年间杰出人物的名字,奥德姆的约翰·布劳(机品制造工,卫斯理宗一神教的俗人传教士);班福德的滑稽朋友,约瑟夫·希利(理发师,"庸"医);约翰·巴古利(仆人);斯托克波特的塞缪尔·德拉蒙德("背毯进军"的主要组织者);曼彻斯特的约瑟夫·约翰逊(小制刷业主),以及聚集在激进的《曼彻斯特观察家报》(创办于1819年初)周围的一群人,其中有名的是沃德尔、詹姆斯·罗以及J.T.萨克斯顿。此外,因涉嫌参与阿德威克密谋而被扣留的人,包括一个磨刀匠,一个箍桶匠和一个漂布业者。

兰开郡运动头几个月的情况有一种描述,出自印刷匠约瑟夫·米切尔之手,他的说法并不那么可信。早在1816年他就是"利物浦一心会"的成员。这是一个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协会,由于它拒绝从事公众宣传,米切尔对此感到反感:

他们总是喝酒、唱歌、祝酒、说俏皮话、高谈阔论,推杯换盏时是如此,饱餐之后还是如此。他们对于布鲁厄姆这样的人以及类似人物也嗤之以鼻……但就不愿做

一件有利于人民事业的事。[80]

为了寻求工作米切尔到了兰开郡南部，他碰见许多"信誓旦旦"但行动消极的改革者，并决心"深入民众传播道德和政治知识"。他成了第一个自封的政治传教士，从一个镇走到另一个镇，靠销售卡特莱特的小册子与他自己的《致人民书或政治入门》维持生活。1816年11月初在伦敦拜访了卡特莱特，并同科贝特见了面。科贝特把《政治纪事报》的兰开郡经销处交给了他（他似乎是同本波一同分担这一职位），从此他便同汉普登俱乐部结下了不解之缘。[81]

644

虽说有少数小厂主和职业人士积极参加了兰开郡的运动，但这些人同曼斯特那一小群中等阶级改革派却有着明显的差别。那些人有自己的出版物，而且明显地信仰边沁的思想体系，他们竭力同追随亨特的改革者保持距离，即使是在他们共同参加的运动或是在（如彼得卢事件之后）他们大力支持后者的时刻。[82] 奇怪的是在地方的激进主义领导层中却没有纺纱工人和工厂工人。纺纱工人的激进主义倾向是毋庸置疑的，曼彻斯特当局曾在1817年2月注意到"当附近的纺纱厂停工之时，参加改革集会的人数就大大增加了。这证明不满情绪并不是只有贫穷不幸的人们才有，纺纱工人的状况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的。但这个群体近来也在捐款支持改革者。"[83] 这些年来，纺纱工人

---

[80] 关于"一心会"，可参见B.惠廷厄姆—琼斯：《利物浦的政治俱乐部》，载于《兰开郡和切郡历史协会公报》(1959)，第129页。

[81] 《稳进军者报》，1819年11月27日，《致人民书》(1816)，载内政部档案，第40.9号。

[82] 关于中等阶级改革者的情况，可参见A.普伦蒂斯前引书，第73—74页；D.里德：《彼得卢》，第5章。

[83] H.W.C.戴维斯：《兰开郡的改革者》，第30页。

的境况日渐衰落，他们进入了第一次工会运动的高峰。1818 年发生了纺纱工人大罢工，并出现了组织“总工会”的初步尝试。罢工期间，在地方长官致财政部的信函中，就曾有许多报怨巴古利和德拉蒙德这类激进主义鼓动家的话，原因是他们不仅影响了织工而且还影响了纺纱工。[84]

确实，处于北方工会运动中心的兰开郡纺纱工人正在开创全国规模的新的组织形式。那么为什么在他们当中没有产生著名的改革领袖呢？其部分在于环境，而另一部分则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纺纱工会（在《结社法》控制下）是一种准合法团体。多年来，纺纱工人已经习惯于把他们有经验的领袖藏在幕后。此外，同织工或工匠相比，纺纱工更容易受到雇主的伤害，而且兰开郡的纺纱厂老板还惯于把政治的鼓动家列入黑名单。[85] 从这个意义上说，工厂工人比手织工更不“独立”，即便后者已经濒临饥饿的边缘也是如此。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在纺纱厂里工作的时间是很长的。班福德根据在骚动的高峰时期半就业的织工和工匠可以利用没有工作的时间走许多英里路去参加代表会议或参加改革者们高谈阔论的集会而描写的生活方式，是不易被老成的棉纺工人接受的。

645

不过要进一步举出纺纱工不愿进入改革领导层的原因也并不困难。科贝特和亨特鼓吹的激进主义强调的是经济独立的价

---

[84] 参见哈蒙德夫妇：《技术工人》，第 5 章；阿斯皮诺尔：《英国早期工会》，第 7 章；科尔：《建立总工会的尝试》，第 2 章。关于《黑矮人报》1818 年发表的一位纺纱工写的感人信件，见上文，第 199—202 页。

[85] 19 世纪早期曾有人鼓励兰开郡的纺纱厂老板开除雅各宾嫌疑分子（见阿斯皮诺尔前引书，前言，第 23 页）。1816 年 10 月，“暴君有产者”也曾解雇过参加激进运动的工人（见内政部档案第 40.9 号）。19 世纪 30 年代还发生过清洗欧文派工厂工人的事。见 G. 西斯著《工人阶级》（1849），第 70 页。

值，它在感情上敌视工厂制度，把人们过去的互相联系和经济互惠当做理想，并以此来批判现在，这种激进主义当然不能指明工厂工人的困境。直至19世纪20年代欧文主义和工联主义开始合流之时，也很难从纺纱工人自身经历中产生出激进主义；不过，也有某些证据表明，有一些地区的纺纱工人更喜欢伍勒和卡莱尔宣传的那种更严格、更功利主义的东西，而不喜欢科贝特《纪事》中的道德说教。亨特的激进主义既没有涉及到工厂改革，也没有从总体上谈到社会问题，这样，在1816至1820年间，工厂工人的能量就主要是通过了组织自己的工会来表达了。这里产生的后果是直接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大多数纺纱工人是激进主义者，但当局既不害怕纺纱工人起义，也不担心他们会进军伦敦。

此外，我们还可以说，曼彻斯特作为一个大都市除有一些长处之外也有某些弱点。这个城市的面积很大，行业众多，贫民区遍布。外地人的不断出入，使这个城市形成了很多个镇区，内聚力因此减弱，不如那些内地的小城镇。人口最多的爱尔兰人虽然同情1816至1820的骚动，但他们并不卷入。并且，如果说某些棉业城镇（尤其是博尔顿）有狂热的"效忠国王"的地方长官，646 那么，许多较小的城镇几乎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时连一个警察也没有。[⑧] 曼彻斯特有一个常驻警监约瑟夫·纳丁，他在卢德运动时期追捕过激进分子，并从中获得了经验。著名的激进主义领袖全被盯住了，而且密探们还不断渗入"曼彻斯特宪法知识会"或"政治同盟"。在1817和1819年，纳丁手下的人和改革

---

⑧ 在谈到莱斯特郡的情况时，A. T. 帕特森也提到这一点，他说当时拉夫巴勒仅有一个常驻的治安法官；此外，他还（通过比较）把莱斯特郡北部村庄的"实力派"传统同莱斯特自身具有的守法特点区别开来。见《莱斯特郡的卢德运动、汉普登俱乐部以及工会》，载于《英国历史评论》（1948），第63期，第172页。

派领袖还在曼彻斯特街上互相发生多次争吵，有时甚至还停下来互相嘲笑或威胁。1817年月3曾被逮捕的威廉·奥格登证实说："声名狼藉的J.纳丁早在6个星期以前就多次向我宣称，如果我不停止参加公众集会，他就要逮捕我。"[87] 纳丁有一次曾这样鼓励一个囚徒：开头的日子不会很长，但在回里顿之前就难熬了，我想你会被绞死的。[88] 不过，"乡下人"只是偶尔才会受到纳丁的令人不快的注意。

于是，"乡村爱国者"就成了这些年改革运动的中坚，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在参加1816年10月底曼彻斯特的一次公开集会之后，一个告密者曾同"一群弗尔斯沃思的改革者"一道回家：

> 他们用最刻薄的语言诅咒和谴责曼彻斯特人，但他们主要是针对上层阶级。他们安慰自己说，曼彻斯特人不到会是受到了雇主的威胁……告密者认为参加大会的人有一半来自农村。[89]

大多数带着请愿书和毛毯从曼彻斯特出发进军伦敦（1817年3月）的人是乡村织工。[90]

在可敬的约瑟夫·哈里森牧师（卫斯理宗教士，后来成为激进主义的雄辩家，小学校长）领导下，斯托克波特曾在1818年成为城市改革活动中作风大不一样的重要的典型；但是"乡下人" 647

---

[87] 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18年5月16日。

[88] 班福德前引书（第3版，海伍德），第174页。

[89] H.W.C.戴维斯：《兰开郡的改革者》，第24页。应该指出，这次大会曾多次请求曼彻斯特的中等阶级改革者出任主席，但曾多遭到拒绝。

[90] 被捕者的名单（见内政部档案第42.172号）表明他们大多是织工。在一批有48人的被扣留者中就有29名织工、2名纺纱工、2名劳工，家具工、锯木工、钉书工，细木要、机器制造匠、脂烛匠、染荠、鞋匠，绳工、年历匠"各一名。在另173人的被扣者中，纺纱工、梳毛工、漂白工、修补工稍多一些，但大多数仍是织工。

再一次是1819年的主要因素。正是这些人，他们的夜间操练(班福德对此曾有生动逼真和过分天真的描写)是彼得卢事件的前兆(曼彻斯特的纺纱工既无时间作此准备亦无在静静旷野进行操练)。也是这些人，他们那非常整齐的队伍(来自利斯、萨德尔沃思、米德顿、罗代尔、奥德姆和伯里等地)在1819年8月16日占满了很大一部分圣彼得广场。正当外地极端的"实力派"在等待伦敦发信号时，相当多的山地织工却在期待着曼彻斯特发生起义，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的愤怒不仅仅针对当局，而且(人们怀疑)也针对冷酷无情的工厂制度，从而在1817年和1819曾两度助长了这一谣传：变"曼彻斯特为莫斯科"，发动一次起义。1819年底，当曼彻斯特的运动因个人争吵和派系纷争开始解体之际，由一个奸细报告了曼彻斯特联盟的一次充满可怕忿恨且又杂乱无章的会议，报告的最后部分是令人感兴趣的：

> ……此时有两个乡下人也来开会，其中一个站起来说，他想知道这是否就是联盟——在场的人一时沉默了——终于有人回答说这应该是——那位陌生人接着说他从弗利克斯顿来，想看看改革的进展如何——有人喊道："你是赖特法官派来吗？"那个老头子不理他，反而接着说，在他们农村，每天都有数百人加入联盟的地方组织，如果他把这晚所见的事告诉他们，他们就再不会信任曼彻斯特联盟了。——好几个领导人来到两个陌生人的身旁，并在劝他们回去后不要提起那晚他们所见之事。[91]

这些人当然主要是手织工，关于他们的问题和生活方式我们已在前面章节作了探讨。到1819年，整个兰开郡地区的织工

---

[91] 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全文。D.里德前引书，附录B，第221页，转录。

都已投入改革事业，而且从此时直到宪章运动末期，织工和织袜工一直都是改革事业最坚定最彻底的拥护者。要求议会保护的 648 运动接二连三地失败，直接导致改革或推翻政府本身的问题。他们不能单单指望通过工会运动来改善他们的地位；他们曾希望1818年的织工大罢工给他们带来持久的利益，但这次大罢工的失败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如果科贝特和亨特所鼓吹的经济"独立"和不屈不挠的政治个人主义与工厂工人的经历并不相吻合的话，这种意识却正好适合织工的需要。科贝特厌恶工厂的喧嚣和压迫，他强调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汗水获得一份充足的食物、一件体面的外衣以及物质的福利；他怀疑伦敦、怀疑纸币以及"那个东西"；他喜欢道德的，而不是功利主义的说教；他还对正在逝去的乡村生活价值念念不忘，他的这一切都为织工拥护欢迎。说实在话，织工们除了对他不赞成政治结社和俱乐部的言论反应冷淡外，他们迫不及待地响应了科贝特1817年的大部分主张。

因此可以说，极端改革者的力量隐藏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手工工人的村庄中。我们不认为那些从事工业生产的村民就是"乡下佬"或"庄稼汉"，是人民中最"落后的"一部分人。虽然城里的工匠据点——如在伦敦、伯明翰、诺里季、设菲尔德、纽卡斯尔中——为卡莱尔的自然神论以及欧文的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最早的追随者，但是手工工人在知识和读写方面也许仅次于他们。如果同其他从事工业的集团（如冶铁工人、矿工、城市贫民、体力劳动者和许多纺纱厂工人）相比，他们还优越一些。[②]

---

② 参见P.K.韦伯：《早期维多利亚英国的工人阶级读者》，载于《英国历史评论》，(1950)第65期，第333页。该文证明，1840年手织工的识字水平优于其他集团（尽管不断抱怨织工的状况日趋恶化）。

早期工业革命时期由于机器的大量生产而出现的相对富裕,不仅带来了物质的丰富,也带来了文化价值的上升。正是因为这种手工行业生活方式遭到了破坏,他们的反抗才格外有力。如果激进主义的"密谋"中心 30 年来都在彭特里奇、拉夫巴勒和巴恩斯利这类地区,如果讨论阴谋计划的地点是在米德尔顿的某个教堂里,在桑希尔利斯的某个酒馆或赫克蒙德威的某个砂石坑,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地方偏僻边远,而是这些城镇和村庄的人民处在无计划的经济个人主义与一种旧的生活方式相互冲突的中心。手织工和织袜工是自由放任主义最惨烈的受害者,因此他们引起了西德默思爵士和奥利弗的密切注意。织工们并非后进,而是工业革命在这一阶段中最典型的工人。

649

4.布兰德雷思和奥利弗

手工业工人大量集中的地区全都离伦敦有 100 至 200 英里。如果纺织业中心是在埃塞克斯,制针业的村庄是在苏塞克斯——如果织工们把他们的旗帜插到矿泉地,而不是圣彼得广场——那么,英国历史的进程也就改变了。实际上,每当反叛情绪还在彭宁山脉或沃里克郡酝酿时,它并没有明显的近期目标。到 1817 年,卢德运动已基本上不为人取。如何让政府感到外省感情的压力呢?"背毯进军"(也许在其准备的初期阶段,卡特莱特和科贝特已经知道并予以鼓励)是施加压力的一种尝试。兰开郡人带上请愿书和平地向伦敦进军,他们在路上还召集大会以期获得人们的支持。他们指望得到来自约克郡和英格兰中部的其他进军者的支持。据报道,有一位曼彻斯特的领袖讲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能使你们到达伯明翰,那就一切都好办了,因

为我确信你们的人数将会达到 10 万。"[93] 至于他们打算在伦敦干什么，那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组织者宣称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向摄政王呈交请愿书。然而，伦敦民众可能会以喧嚣的方式欢迎他们，并且进军者们可能会被期望担当马赛人曾在 1792 年的巴黎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必须再问一个问题。不仅仅是打算做什么事，而且是谁打算做？手工工人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仅使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而且也在通信联络和组织方面给他们造成极为严重的弱点。我们已经注意到较小工业社区所具有的内部凝聚力以及在面临当局追究时所表现出的能力。但是它们同地方中心缺乏联系，650 尤其是地方中心同伦敦缺乏联系，则始终是它们在组织方面的弱点。因此对当局来说，要派奸细打入曼彻斯特，甚至打入设菲尔德和诺丁汉的组织都是比较容易的事，而且这些奸细往往凭自己的积极热心和空闲无事被选入地区委员会。在伦敦酒馆的极端分子之中安插奸细则是最容易的事情。

关于 1817 年春夏之事有一种广为接受的说法：

> 地方官们在 3 月和 6 月突然袭击了各地工人阶级的代表大会，并逮捕了所有代表，他们认为这些代表是在制定总暴动的计划，但除了那些拿薪水的奸细和告密者提供的证据之外，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这回事，这些狂热的言论无疑是有的，但没有清晰的证据证明存在着有组织的密谋。[94]

这就是辉格派对 1817 年事件的标准解释，也是那个时代的改革

[93] H. W. C. 戴维斯：《兰开郡的改革者》，第 31 页。斯塔福德的矿工在 1816 年第一次未遂的"饥饿进军"中留下了先例。"背毯进军"实际上被军队阻止了，有 200 多人被捕，几乎没有几个人走过利克。

[94] 科尔和波斯特盖特：《平民百姓》，第 217 页。

者所使用的辩护辞。此外，这种解释还得到了哈蒙德夫妇在学术上的支持，他们的《技术工人》(第12章)一书对臭名昭著的奥利弗的生涯作出了最具威权的重新说明。[95]

不过辉格派的解释实实在在是太简单了。我们没有必要再讨论何为“清晰的”证据这一问题，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1817年确有某种“实力派”密谋在酝酿之中，而且还同政府挑拨分子的反密谋活动交织在一起。早在1816年12月，伦敦的“雅各宾派”就同地方的极端派建立了松散的联系。至少有两名由兰开郡代表会议在这个月任命的特使接受指示去约克郡和英格兰中部，这两人——威廉·本波和约瑟夫·米切尔——均属“实力派”。从此米切尔(一位消息灵通的地方官曾把他说成是“这一地区相当于首脑的人物”[96])便频繁来往于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方之间。当班福德于1817年1月出席汉普登俱乐部的“代表会议”时，米切尔和本波已在伦敦建立了许多联系。本波扮演着“几乎是掌礼官的角色”，而米切尔则陪同班福德访问了一些兵营(据班福德不巧妙的说法，这是偶然的)，并在营中分发了激进的小册子。由于卡特莱特、科贝特及亨特不愿在组织上充当认真的领袖人物，一些地方代表就去找了沃森医生及他那帮人，并且还在格拉夫顿街的“雄鸡酒店”同他们会晤，其间讨论了建立全国性的通信联络以及(也许)秘密组织的计划。[97]

651

因此，当人身保护法在3月份第一星期中止时，就已经存在

---

[95] R.J.怀特在新近评述彭特里奇起义时(见《从滑铁卢到彼得卢》，第13章)所凭借的材料大多来自A.F.弗里曼特尔的文章《奸细奥利弗的真相》[载于《英国历史评论》(1932)，第47期，第601页]。但这两种描述都不如哈蒙德夫妇的描述。

[96] H.W.戴维斯：《兰开郡的改革者》，第28页。

[97] 班福德前引书(1893)，第21，32—33页；H.亨特：《律师档案袋阴谋》，第9页。

建立全国性组织的初步计划。当局曾断言当时有四个由“秘密委员会”控制的组织中心:1.诺丁汉、德比以及莱斯特;2.伯明翰周围地区;3.兰开郡,4.约克郡。毫无疑问,这些地区的激进派代表之间的交往和通信联系是相当多的。米切尔对这几个月作了记载,当时,他同本波以及奈特为躲避当局“几乎很少在一个地方逗留两夜”。[98] 班福德也曾描述过同希利一起“东奔西藏”的日子。当时某些兰开郡的改革者白天不敢露面,“只能像猫头鹰一样在夜幕降临时出来”,其他人也只能“以各种不同的借口聚会”:

> 有时他们把这些聚会称为“互济会”,有时又称“植物学会议”、“救济被监禁的改革者家属会议”或是“救济逃离英国者会议”;但是他们的真实意图(仅对参与者透露)是要实施夜间进攻曼彻斯特的计划……。

一个参加了3月在查德顿召开的一次这类会议的告密者曾用人们从卢德运动到宪章运动都熟悉的语言报告说:

> 一个查德顿人说,大多数人已武装起来了。他说,他认为他们将收集到70支燧发枪……”[99]
>
> 大家同意星期五下午3时来曼彻斯特,并在阿德威克桥的王家橡树酒店集会,听听来自伯明翰、设菲尔德和其他地方的消息,从中得到他们所期待的信息。那个查德顿人说他见过伯里的代表,还去过哈德斯菲尔德和利兹,他确信人民随时都可以起事,因为他们已在整理卢德运动之后收藏的一批武器。[100]

652

---

[98] 《背後进军者报》,1819年10月23日。

[99] 在前面装弹药,在后面用火点着引火线发射的枪,俗称土枪。——译注

[100] 班福德前引书,第44页;H.W.C.戴维斯前引书,第35页。

"他们看见狼烟就会前进……"。类似这样的话在内政部1839年和1845年的文件中都能找到。实力派一直等待着"听听来自"伯明翰……或伦敦……或新港的"消息"。从某种定义上说,情况是可悲的。"阿德威克密谋"是用五六次上面提到的那种集会为素材于3月底被人制造出来,并以此为借口逮捕了积极的曼彻斯特领导人的。从另一方面说,情况更加严重。男人们曾几十次分别在十几个地方带着一些枪支和自制武器在英格兰中部和北方的村庄聚会,但他们在行动上优柔寡断。这倒不是因为胆怯,而是担心会被出卖。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有一种地理上的孤立感。只要在危机时刻有"消息"传来,只要某个中心城市被革命者"夺取",暴动就会迅速波及到其他地区。到了5月,革命情绪仍然在好些地区高涨,而且这些地区之间还不时有联系,但当时却没有可靠的组织中心。全国都期待着伦敦,然而那些已同乡下人建立初步联系的伦敦人却不愿发动一场暴动,在这方面他们还不如乡下人。诺丁汉的制针匠威廉·史蒂文斯曾积极参加过密谋活动,后来逃到美国。他证实,人身保护法中止之后,"他认为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现在是反抗的时候了":

> ……这就是他所在的城市里大多数人在1817年3月、4月和5月考虑问题的方式……。

"虽然人们迫切希望找到反抗的方式"……但"直到5月的某个时候反抗的计划才得以形成"。第一次提出这一方案是在4月,"米切尔先生途经诺丁汉……在去伦敦的路上"。[90]

班福德说,米切尔"在他自己的圈子里活动,这个圈子有多大范围除了他之外无人知晓。4月,他在伦敦拜访德斯帕德从

---

[90] 证言载于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1818年5月16日。

前的一个朋友，即雅各宾派的鞋匠查尔斯·彭德里尔，当时他正准备出走美国。彭德里尔帮助一个叫做威廉·奥利弗的人从债务监狱里出来：出狱后不久，奥利弗就“开始表现得像一个激烈的爱国者，而且异乎寻常地急于知道是否有他可以参加的任何政治协会”。[⑫] 奥利弗的表白被人相信了，到3月他已进入到伦敦改革者的内层圈。3月28日他求见了西德默思勋爵。4月，经彭德里尔和其他改革者的介绍而与米切尔见面。米切尔对他房中壁炉台上的“拿破仑全身铜像”以及伯德特、科贝特、霍恩·图克、福克斯等人的肖像印象很深：

653

他告诉我说，同乡下的朋友建立联系是伦敦朋友们的愿望。我说，……这也是乡下非常需要的。

但是，当米切尔正式提出要同伦敦委员会见面时，奥利弗又肯定地对他说同时召集他们太危险了。[⑬]

奥利弗要米切尔同意让他在下一次各地旅行时陪同米切尔，米切尔被说服了。这两人是在4月23日动身的，由于奥利弗的缘故，这次旅行持续了23天，并使他得以见到英格兰中部和北部一些主要中心的改革派领袖。[⑭] 这是一次绝妙的侦察行

---

⑫ 彭德里尔的证言载于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1818年5月16日。彭德里尔从1811年起就认识奥利弗，那时他是个木匠领班。奥利弗被人描述成是建筑工、木匠或会计员，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高级职员，或簿记丈量员之类。

⑬ 《背毯进军者》，1819年10月23日。

⑭ 奥利弗4月24日离开伦敦；25日到伯明翰；26日经德比到达设菲尔德；27日、28日到威克菲尔德、杜斯伯里；29日，到利兹；30日，到曼彻斯特；5月1日、2日到利物浦；3日到曼彻斯特；5日到威克菲尔德；6日到哈德斯菲尔德；7日，到威克菲尔德；8日到哈德斯菲尔德；9日，到巴恩斯利；10日，到奥西特；11日，到斯彭河谷；12日，到布雷德福；13日，到利兹；15日，到伦敦。在伯明翰至利兹的途中，米切尔利用“换马的时间”把奥利弗介绍给了德比的一位改革派领袖。参见H.亨特：《律师阴谋》；亦见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号题为《奥利弗的旅行》的文件；奥利弗的《记录》（内政部档案，第40.9号文件）以及信件（内政部档案，第40.10号）。

动，就连西德默思也对奥利弗的报告极为满意。5 月 5 日奥利弗报告了在威克菲尔德参加了一次中心代表会议，与会者是来自伯明翰、设菲尔德、哈德斯菲尔德、巴恩斯利和利兹的代表，另外还有代表英格兰中部靠近北方的托马斯·培根。他们也向每地行将起义的众人作了约定。起义日期定在 5 月 25 日，而奥利弗则许诺伦敦“也将会作好准备”，他私下报告说这是“一个软弱无力不切实际的计划，如果被耽搁，它就会自行破灭”。[18]

654

然而（也许是因为一次错认），米切尔在 5 月 4 号就被捕，此后，奥利弗便作为“伦敦的代表”独自前行。[19]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状况：暴动的准备在好几个地区进行，但惟一能被人确认的伦敦联络员却是个政府特务。在伦敦，沃森、西斯尔伍德、普雷斯顿和胡珀等人因叛国罪（参与矿泉地事件）正在等候审讯，他们大概会被判有罪；有些改革派领袖藏了起来，而另一些则跟随科贝特去了美国；还有一些已被监禁。到这时为止，问题似乎是相当清楚的，但各方对以后所作的解释却充满了党派偏见。改革派以及批评政府的辉格党人（诸如下院的贝内特和《利兹信使报》的贝恩斯）煞费苦心地举出各种证据说明奥利弗是 6 月 9 日事件的主要煽动者和组织者；在另一方面，当局则断言奥利弗仅起到一个告密者的作用；如果他干涉了革命计划，计划就只会被推迟或瓦解；只是由于他们的警惕，才使得危险的暴动得以避免。

真实的情况也许比这两种解释更复杂。奥利弗并非是打入秘密组织中的惟一奸细。兰开郡和诺丁汉的地方官经常能得到

[18] 亨特前引书，史蒂文斯的证言。

[19] 有一种说法，当时米切尔是化名旅行的，他“穿戴像个织工，身着粗柳条布衣，腰间还围有围腰”。参见菲茨威廉文件，F. 52（C）中《T. W. 塔蒂致茨威廉信》（1820 年 1 月 22 日）。

当地告密者的报告，另外，煽动革命的人也不仅仅就是奸细。5月在米德尔顿拜访班福德的人并非是奥利弗，而是德比的代表——托马斯·培根和特纳，这两人后来都参与了彭特里奇起义。威廉·史蒂文斯证实说，当托马斯·培根从5月5日的威克菲尔德会议上带回给英格兰中部靠近北方地区委员会的报告时，

> 布兰德雷斯、特纳以及勒德拉姆均在场，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人……。5月26日前约5天或6天，设菲尔德的朋友们的一封信到了诺丁汉，通知我们，由于奥利弗的劝告，起义已推迟到6月9日……因为到那时夜色会更浓，而且全国也将进入更成熟的起义状态……。结果，诺丁汉和周围地区的准备工作一直进行到了起义那天。

655

在这期间，奥利弗返回伦敦向其主子作了汇报，但他并没有忘记到冷浴地监狱看望他的老同事米切尔（为此米切尔长期被怀疑是奸细）。[⑩] 5月23日（按照官方说法），英格兰中部和北方的地方长官曾通知西德默思无论暴动能否得到伦敦的支持，它

⑩ 曾在《利兹信使报》上揭露过奥利弗的贝恩斯同时也带头抨击米切尔。米切尔是个浅薄愚蠢的告密者，但他并不是奸细。由琼斯·伯德特为首的一个正式的激进派调查委员会曾为他洗清了污名。班福德曾用了一章的篇幅为米切尔辩护，他的结论是大写的："如果他是密探，他早就把那些从未被出卖过的人出卖了"，这就承认了关于密谋的计划还有更多的内容是奥利弗所不知道的。米切尔获释后并不接受卡特莱特少校的劝告：若是个诚实的人，他就应该退出公共生活。他重新参与了激进的政治活动；在他的《背毯进军者报》上驳斥贝恩斯的指责以维护自己的声誉；后来他遭到石头袭击，被人们扔进利兹运河；1820年因煽动性诽谤罪入狱。参见班福德前引书，第12和26章；《爱德华·贝恩斯的一生》，第109页；《背毯进军者报》1819年10月23日和11月20日；菲茨威廉文件，F. 52(C)；L. T. 里德：《19世纪的约克堡》，第630页。

也将于6月9日发生。“他就通知奥利弗搭邮车进入这一地区。”[108]

然而，在第二次旅行中，奥利弗却像一个接受了完全不同的指令的人，他的言谈中满是诺言和保证。先前他还时常说自己是伯德特、科克伦、亨特或是卡特莱特少校“委派的人”。[109] 这次他却谈起了沃尔弗汉普顿的改革者占领威登兵营的计划；他说《黑矮人报》的编辑伍勒“此时正在伦敦印制即将由临时政府发布的公告”；每个地方的准备工作都比他正在的地方做得更深入，他的注意力尤其集中在西区和诺丁汉两地。[110]

656 奥利弗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个地区是大有讲究的，因为卢德运动的秘密组织曾在这两个地区最为强大。而且，它们还是具有更老的革命传统的中心地区，舍温曾写道：“诺丁汉从未具有……憎恨压迫的习惯性心理，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镇都不能达到的。”[111] 早在1816年12月，本波就曾在彭特里奇召集会议，这一地区的改革领导人托马斯·培根大约有40多岁，是一位

[108] 参见H.亨特前引书。

[109] 可以参见斯科尔斯的证词，载于《利兹信使报》，1817年6月21日；W.克利夫（德比）的证词，载于《达基特快报》，1818年9月9日。

[110] 题为《奥利弗的旅行》的文件，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号，其中列有以下日程表：5月23日离开伦敦；24日，伯明翰；25日，德比；26日，德比；27日，诺丁汉；28日，诺丁汉附近的村庄；29日，从设菲尔德到威克菲尔德；30日，布雷德福和哈里法克斯；31日，曼彻斯特；6月1日，利物浦；2日，从曼彻斯特到威克菲尔德；3日，威克菲尔德；4日，在此地军营（宾将军在威克菲尔德附近的司令部）；5日，利兹；6日，桑西尔利斯、杜斯伯里附近：留下信件去诺丁汉；7日，诺丁汉：搭伦敦邮车离开。根据班福德和普伦蒂斯说，在兰开郡，中等阶级改革派和工人阶级改革派都已怀疑奥利弗，并告诫人们提防他的诡计。参见舍温：《政治纪事》，1817年12月15日和1818年2月14日；奥利弗的“纪事”及信件，见内政部档案，第40.9/10号；布雷德利和狄金森的证词，内政部档案，第42.165和167号。

[111] 舍温：《政治纪事》，1817年6月21日。

"老杰克"。他曾在巴特利铁工厂干过几年铸铁工或修整工。(因参加政治活动受到迫害,1817年不得不又从事针织行业。)政府方面曾准备过一份针对他的简报(但后来从未使用过),根据这份材料,他从1791年起就是"自由平等学说的积极拥护者,同时也是托马斯·潘恩的狂热信徒"。他主张财产应该"平等",地产应该分割,每个男子都应分得8英亩土地。在培根看来,科贝特的《纪事》以及汉普登俱乐部"还走得不够远"。[12]

在另一个革命中心——西区,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菲茨威廉的辉格派地方当局常同西德默思勋爵发生矛盾(这位郡守自己很可能还不知道奥利弗的身份和任务)。在5月的最后一周,行动积极的设菲尔德地方官们依靠自己的情报来源,半夜突然袭击了在"钱德勒先生的磨坊里"举行的一次"10人队领袖"会议。"与会人员大吃一惊,纷纷夺门越窗而逃,钻入了密林之中"。当地的领袖之一沃斯顿霍姆和另外3人被捕。从此设菲尔德的运动就陷入混乱之中。

我们可以比较两份来自当年诺丁汉的独立的材料,这两份材料可能会存在相对立的见解。第一份材料是一个当地的告密者(他并不知道奥利弗的真实身份)给当地官员的报告:

> 我……去杰里·布兰德雷思家是今晚6至7点之间……。我们离开他家……在监狱对面遇见了(史蒂文斯)。我们沿桑迪巷走……史蒂文斯说我应该在星期一晚上在这里……。他说,有一个伦敦的代表报告说伦敦约有7万人准备同我们一道行动;伯明翰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他没说这人住在哪里,只说他是一位忠实的朋友,而且……他星期一或星期四还要到这

657

[12] 国王对托马斯·培根案;其摘要可参见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号。

里来，并要把决定好的暴动时间通知我们。[13]

第二份材料是史蒂文斯在约一年之后自己作的解释：

……6月1日或2日，奥利弗来到诺丁汉……到了这位证人的家里。他说伦敦方面将为6月9日作好一切准备……奥利弗当时就同我们开了会，到会的有布兰德雷思和特纳以及其他许多人。在会上他把一份他称为"战役计划"的文件放在我们面前……

当奥利弗和我们一起把每一件事都定好之后，他又准备前去筹办约克郡的事宜，这样，一旦伦敦发生起义，全国都能作好行动的准备。他说伦敦已有5万人准备好了武器，还说他们要占领伦敦塔……。

为了作好最后的安排，将于6月7日在设菲尔德召开北方代表的"代表大会"：

会后，代表们将分头去许多大城镇；他们不是去自己所在的城镇，而是去别的地方，这样可以建立互相信任，也可以使真实的信息得以相互交流……

史蒂文斯确实于6月7日动身去设菲尔德，但"被一个骑马的小伙子追上了"，结果他回到了诺丁汉：

他在自己家里见到奥利弗。他说在约克郡发生了一些叛变；不过，既然伦敦已作好一切准备，只要诺丁汉和德比的人坚持他们的承诺，那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的。我们当即开了会，奥利弗也参加了……。

会后，奥利弗立即乘邮车去了伦敦。他解释说他必须"给伦敦的

---

[13] 告密者（布尔韦尔的H.桑普森?）于1817年6月1日在恩菲尔德致西德默思信，见内政部档案，第40.6号。

起义者一个保证,即全国各地会衷心合作"。[114]

奥利弗6月2日至6日在约克郡的活动大致是清楚的。为准备6月6日在桑希尔利斯(杜斯伯里附近)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他飞快地奔走于各镇之间。开会前两天,他悄悄地与指挥北方部队的约翰·宾少将见面。此后,桑希尔利斯会议就被宾将军指挥下的部队包围,代表全部被捕。[115] 部队虽让奥利弗"逃走",但几个小时之后,一个改革者就在"威克菲尔德旅馆里看见他(他刚要乘去设菲尔德的驿车离开)正在同宾将军的一个仆人谈话。事情的真相就这样暴露。当奥利弗7日晚到达诺丁汉时有人叛变的传闻就已经在这个城镇里出现了。史蒂文斯描述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人们措辞激烈地反复盘问了密探奥利弗,他能瞒过去算是幸运。一个高个子说(奥利弗报告)"他们并不想在诺丁汉白白地被绞死,就像在兰开郡那样,如果我不在乎,他还不知道该如何看待我"。[116]

658

然而,"杰里"[117]布兰德雷思却没有参加这最后一次会议。早在6月5日,诺丁汉镇公所的书记长就从告密者手中得到报告:

我看见杰里在家里……我问他,除那个伦敦代表之外,他们是否还同其他人有联系。他说他们没有,但有些

---

[114] 威廉·史蒂文斯的证言,载于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1818年5月16日。这两份证言材料否定了A.F.弗里曼特尔和R.J.怀特的说法,即奥利弗同布兰德雷思之间从没有任何联系。亦见《诺丁汉评论》,1817年11月7日。

[115] 这些逮捕是由一个狂热的地方官强制实行的,并不是西德默思或宾本意所在,见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358页。

[116] 关于这几天的情况,见内政部档案,第40.9号,以及《利兹信使报》,1817年6月21日。

[117] "Jerry"在英文中意为"草率的",这正好是布兰德雷思名字的昵称。——译注

家伙有……。他说他去彭特里奇后就不回家了，他要去指挥在那里起义的人，而且还要把他们带到这里……还要在他们经过的每一个城镇里募捐……

那天稍后，那个告密者又从布兰德雷思的妻子口中得知他已经走了："她认为他要到那事开始才会回来"。[10] 西德默思勋爵知道发生的一切。从6月7日起，政府、军队和地方治安官就作好了准备，单等彭特里奇的暴动。7日那天，那位诺丁汉镇公所的书记长整天都在同治安官们开会讨论"如何制止和镇压这个市镇及周围地区期待着的暴动"。9日，那位书记长写道："我的心腹人员正在注意彭特里奇附近地区，监视老培根曾威胁要采取的那些行动……。我们坐在镇议会里等了一夜。"[11]

659 "奥利弗去了伦敦，他接二连三地把他的牺牲品们抛入了他为其准备的陷阱之中……。奥利弗的老板们本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制止那些暴动准备并把它们公布出来……。但(他们)却不想制止，反而要把它们制造出来……，"[12] 这就是科贝特的解释，我们很难看出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可以说明以上证据。最近有人认为奥利弗并不是一个煽动分子，即使他是，他的行为已经超出西德默思的指令。[13] 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利物浦行政当局的成员一看到流血就会呕吐，或者真有什么犯罪感。利物浦勋爵在拒绝为典礼官奈伊被处死一事说情时曾亲笔写道："人们决不能以为国王不处死叛逆者其地位也

---

[10] 内政部档案，第40.6号。

[11] D.格雷：《诺丁汉500年》(诺丁汉，1960)，第169页；S.麦科比前引书，第352页。

[12] 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18年5月16日。

[13] 参见A.F.弗里曼特尔和R.J.怀特：上引书。

能稳固”。[12] 卡斯尔雷是靠镇压爱尔兰起义起家的。财政大臣埃尔登勋爵在为死刑作辩护时，就要同罗米利以及刑法改革者进行战斗。[13] 当时的政府不仅准备对沃森医生及其同事处以叛国罪，而且也准备对设菲尔德和格拉斯哥改革团体这样做。[14]《混乱的假面戏》揭示的并非雪莱判断中的那种“无知的不法行为”，[15] 而是雪莱的大多数同胞所具有的判断。政府需要的是流血，而不是大屠杀；但也要足以让其他人害怕。

彭特里奇事件很快就说明了这一点，布兰德雷斯，这位“诺丁汉首领”，扮演了他所应承担的角色。6 月 9 日前两三天，他就在做公开准备了，在彭特里奇的旅馆里招募人员，召集会议。9 日夜，来自各村的 200 至多达 300 人聚集起来，他们来自德比峰山脚下的村庄——彭特里奇、南温菲尔德和里普利等。他们当中有织袜工、采石工、制铁工(来自巴特利铁工厂)以及农业工人。他们的枪支不多，更多的人拿着长矛、大镰刀和大头棒。他们当中许多人姓勒德拉姆、韦特曼或特纳，互相之间都有亲戚关系。他们冒着雨朝诺丁汉方向走了 14 英里，路上还去了一些农场和住宅，并在那里寻求武器和支持。就在其中的一个农场里发生了起义中惟一的一次流血事件。布兰德雷思专横地命令进入一幢据信有一枝枪的房子，他朝窗口开了枪，打死了一个农场 660

[12] 参见 R.J.怀特前引书，第 95 页，E.P.汤普森作《上帝、国王、法律》，载《新思考者》(1957—1958)，第 3 期。

[13] 例如，1813 年，他曾主张保留中世纪对叛国罪的刑罚。参见 L.拉齐诺维奇前引书，第 1 卷，第 519—520 页。

[14] 5 月底被捕的 6 个设菲尔德工人被指控犯叛国罪，但一直未受审讯——部分原因是奥利弗暴露之后，整个约克郡(包括许多的乡绅)的舆论都发生了改变。2 月曾有一些格拉斯哥改革者被捕，但由于一位主要检举人的勇气，他们在 7 月底就被释放了。

[15] R.J.怀特前引书，第 70 页。

帮工。布兰德雷思怀着不屈不挠的决心，带领着一队士气逐渐低落(人数逐渐减少)的人马。他反复吟诵一些诗句，这些诗句正好切合那一夜的情绪：

> 大家人人施展身手武艺，
> 出兵上阵，不得逃避；
> 要想吃饭就得战斗，
> 莫怕军队凶残如兽。
> 你们都清楚地看到，
> 反抗政府的时机已到。

他的一个副手向一个跟随者保证说：

> 人们期望的全国起义时间已经确定了，也就是在这周星期三、四之前。他相信成千上万的人会拿起武器……全国上下都作好了准备。……

此刻，布兰德雷思还说了一些激励士气或者说是适合于他的听众口味的话："在他们到达之前诺丁汉就会投降"，"他们将从诺丁汉出发进军伦敦，还要取消国债"，大队人马"一大早就会像潮水一样从约克郡涌出"，而且：

> ……从他昨天见到的一封信来自伦敦的信中得知，伦敦塔的钥匙会交给汉普登俱乐部的人，如果还没有交出的话。

布兰德雷思向某些犹豫不决的参加者保证说，将有"烤牛排和淡啤酒"以及甜酒，甚至还会有特伦特河上愉快的旅行。"临时政府"将组成，还将拉齐全国起义者的妻室儿女。他总是保证说，"北方的大队人马"会到来，"北方的人会……扫除他们前面的一切障碍，拒绝的人将被就地枪决"。整个夜晚沿途各村庄都被"枪声、号角声、喊声和各种不同的吵闹声"搅得鸡犬不宁。第二天，这支队伍接近了诺丁汉，未见有任何支援队伍的接应，便更

661

加垂头丧气，并开始偷偷逃跑。此时的布兰德雷思也更专横，并威胁说要枪毙逃兵。最后，他们看见了一小队轻骑兵向他们开过来，于是就立即丢下武器，四处躲藏，军队则在后面追捕，没用几天他们全被抓住了。暴动就在这样的恐慌中结束了。[16]

彭特里奇并非是在6月8日至9日夜间发生起义的惟一村庄。虽然约克郡的代表在桑希尔利斯被捕了，[17] 但几百名受蒙蔽的工人（主要来自霍尔姆福斯河谷）在一位领袖的率领下攻进了哈德斯菲尔德。那位领袖对他们说："小伙子们，整个英国都拿起了武器——我们的自由有望了——富人将受穷，穷人将致富"。既然奥利弗叛变之事已经为人们所知，那么为什么还要发生这次袭击事件呢？两名暴动者的口供对此作了解释。一份口供说，一位当地领导人宣读了《利兹信使报》之后说："一切都完了，因为计划已全被探知，他还说现在就必须干，否则我们都将被绞死……"。另一份口供讲，一位领导人说："小伙子们，我们必须去，左顾右盼将会一事无成，今晚就必须动身，"——"他认为我们应为自由而战……"。这次事件的许多细节都再现了彭特里奇起义，然而，参加"弗利会堂"起义的暴动者要比德比郡的暴动者幸运得多。他们和一小队士兵相互打了几枪，但无人丧生。当军队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后，暴动者（也许是因为发现哈德斯菲尔德并没有被革命者所控制而感到垂头丧气）就在黑夜中

---

⑯ W.B.格尼：《杰里迈亚·布兰德雷思审判案》(1817)，第1卷，第87、152页，第2卷，第398、420、443、450页。暴动者路过的村庄包括伊斯特伍德，见D.H.劳伦斯的《古老狂暴的英格兰》。

⑰ 这些代表来自利兹、威克菲尔德、纽斯伯里、霍尔姆福斯、哈德斯菲尔德以及斯彭河谷，他们很可能都是被奥利弗引诱并非前来开会的工人阶级改革者。但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即詹姆斯·曼，利兹的剪绒工，是当地的改革派领袖，他后来成了利兹主要的激进派书商。他们很有可能在事实上是某种意义上的"代表"。见《利兹信使报》，1817年6月14日及21日。

662 撤离了。有两个领导人藏了起来。《利兹信使报》揭露了奥利弗之后人们的感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那些被捕者也从中得到了好处，当他们在7月被提交审讯时陪审团拒绝给他们定罪。[18]

我们详细叙述奥利弗的事件，因为这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而且是有几分神秘性质。奥利弗是激进派当中典型的犹大，他所扮演的传奇般的角色将对整个19世纪的历史发挥影响。我们来分别谈谈直接的和较长期的影响。在卢德运动时期，较大工业城镇的地方官实际上已经常雇佣告密者，自18世纪90年代起，政府的一部分经费就已被用于这种秘密目的。然而，公众舆论普遍认为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英国的法律精神。"出于预防目的"的警察行动这一概念甚至在刑事案件中也是令人震惊的，当这一概念延伸到"国内的"政治观念领域时，这就同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各种成见发生了冲突。《利兹信使报》揭露了有特殊使命的煽动分子——奥利弗的真实面目后，公众舆论简直一片哗然。当今的历史学家在读到内政部文件中奥利弗的那些报告时也许不会感到惊讶，只会把他看做是密探部队中最勤奋最大胆的一员，但在1817年，成千上万的零售商、乡绅、非国教派牧师以及专业人员都不会想到英国还会发生这类事情。

奥利弗在起义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被《利兹信使报》揭露，政府声誉为此受到极大损害。就在彭特里奇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沃森医生因叛国罪正受到审讯，被告一方把主要原告人卡斯尔驳得体无完肤，陪审团在作出裁决之前刚好有时间听到有关奥利弗真相的第一批材料，结果，他被判定"无罪"。这还仅

---

[18] 《利兹信使报》，1817年7月19日、26日；D. F. E. 赛克斯：《哈德斯菲尔德史》(1908)，第292—294页；菲茨威廉文件，F. 45(K)中约翰·巴克利以及约翰·兰利的供词；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336以及4124(2)号。

是一系列法庭败诉中的一例。此外还有格拉斯哥的弗利会堂的“密谋者”以及被指控犯有煽动性诽谤罪的伍勒和霍恩(12 月)等人被宣布无罪释放。由于人身保护法的中止，在整个 1817 年有许多改革者被投入狱，然而，在反对“大陆密探制度”的呼声却日益高涨起来。“实力派”改革者没有被孤立，在反对奥利弗的行动中，极端派与温和派反倒携起手来了。约翰·韦德曾在《女怪》中把奥利弗事件说成是“历史上所记载的最可鄙的做法”，10 年之后，弗朗西斯·普雷斯写道：“我简直无法用适当的语言来表达我对这种卑鄙至极的无耻小人的行为的感想，这无异于卑鄙的谋杀行为”：

> 那些在 1817 年通过“封口令”[⑫]以及 1819 年通过“六项法令”的人是一群恶棍，在一个治理有方的社会里他们若这样干的话，他们就会被绞死……[⑬]

科贝特(在美国)作出的反应不可避免地滞后了；不过人们只要是读过他在 1818 年所作的第一批评论，就不会忘记布兰德雷思和奥利弗的名字。政府的做法不仅凌辱了改革者，而且也凌辱了所有那些看重古老的自由主义立宪制度的人，因为这些人认为政府的惟一目标应该是保护个人的权利。

感情上的这种疏远后来又因审讯并处死德比暴动的参加者而变得更加长久了。既然布兰德雷思的案子已有了预定结局(因为他已杀了人)，他的下属也就可以只被指控犯骚乱罪。但行政当局却非要让更多的人流血，他们指控 35 人犯有叛国罪，并格外精心地挑选了最温顺的陪审团。[⑭] 原告方由 10 名律师

---

⑫ 指“两项法案”——译注

⑬ 《女怪》，1818 年 6 月 27 日；沃拉斯前引书，第 123 页。

⑭ 参见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 366—368 页。

担任，以便对付两名指定的被告的辩护律师。被延期到10月的审讯是在恐怖气氛中进行的。被告们几周以来只靠面包和水生存，他们也不得会客。（在德比的万圣堂教堂的墙上用石灰浆书写着："绞死所有的雅各宾分子"。）审讯的过程也有些奇怪。当时整个国家都有谈论奥利弗，而且人们还满怀信心地希望被告律师会设法证明奥利弗所起的煽动作用。然而，律师连这个奸细的名字也未曾提及。原告方（他们用假名把奥利弗藏在德比）则依据被告所从事的公开活动来断案。为布兰德雷思辩护的"克罗斯律师"声称，被告并非是受了奥利弗而是受了科贝特以及狡猾阴险的激进主义出版物的挑唆和欺骗：

664

> 我不能不提到……迄今发行的英国出版物中的一篇最恶毒最凶暴的文章……，它的标题是：《告英国工人大众书……》。

这些都是"迄今为止传到人类手中的最有害的出版物"。[13] 布兰德雷尼被定罪之后，那个辩护律师又改变了他所强调的重点，他说，布兰德雷思的同伙是被他们那位能呼风唤雨的领袖所迷惑的。登曼把那位诺丁汉首领比做拜伦笔下的海盗：

> 面对他锐利的目光，
> 无人敢露出不恭的表示；
> 他的嘲笑犹如魔鬼，
> 令人愤怒又使人惊悸。

无论这种辩解会使登曼在法庭的声誉提高多少，似乎也不足以平息德比陪审团中那些农场主的怨气。特纳、勒德拉姆以及韦特曼均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在此基础上则让剩下的被告，包括老资格的改革者托马斯·培根以免除一死为条件认了罪，奥

---

[13] W.B.格尼：《审判集》，第1卷，第198—200页。

利弗所起的作用就这样“被遮掩了”。[133]

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全国各地竟有一些改革者甚至冒着自陷法网的风险，也要自愿到德比去证实奥利弗的所作所为。[134]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解释，即辩护律师没有传讯奥利弗是因为奥利弗事实上同布兰德雷思没有关系。首先，我们知道他同布兰德雷思有关系。其次，登曼知道此事。在审讯之前他曾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有理由认为奥利弗是“整个事件”的主要人物。1820 年他在下院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说：“作为被告们的法律顾问，他当时知道的一些事，以及后来弄清的另一些事……”都使他“非常肯定”那次起义就是奥利弗煽动的。不过他认为叫密探来做被告方的证人是不明智的，因为按照诉讼程序的规则，他不能盘诘他自己的证人：“由于这种盘诘难以进行，他们就可能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被告”。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考虑：如果让奥利弗出来“说说他与布兰德雷思之间的谈话，那只会证明暴动计划实际上要比犯人们自己所主张的那个计划更深入一些。我们现已确实知道在被告律师的答辩要点上有人批了一短语，说如果想证明奥利弗的煽动作用“是不能允许的，如果允许了，犯人的邪恶并不会减少……。”[135]

665

这似乎是一种有理的解释。但我们很难相信不能找到某种程序手段，来把那如此罪大恶极的煽动案揭露出来。虽说奥利弗从事煽动的证据不一定能构成被告方的法律依据，但伦敦和约克郡的陪审团实际上已经表明，人们的怀疑可以产生多么大

---

[133] 韦特曼的死刑是缓期执行的，他同另外 13 人一起被流放了。

[134] 见舍温：《政治纪事报》，1817 年 11 月 15 日。

[135] J.阿诺德：《登曼勋爵……回忆录》(1873)，第 1 卷，第 116 页，《汉萨议会记录》(新版)，第 1 卷，第 267 页；R.J.怀特前引书，第 173 页，亦见《诺丁汉评论》，1817 年 8 月 8 日。

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些可能的解释，即当局急于要给被告定罪。(西德默思勋爵10月份一直在生病，“德比审讯的结果比医生给他开的任何药方对他的身体都更为有益”。)他们也愿意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防止人们提出奥利弗的问题。从财政部司法务文件中的答辩要点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方面起初是打算第一个以叛国罪和暴乱罪审讯托马斯·培根的(他实际上并未参与起义)。但是(该答辩要点表明)，既然要给培根定罪就不能不提出奥利弗的证词，那么，这个老资格的改革派就肯定会以某种方式提出反驳，甚至还会为自己辩护。于是，政府在最后一刻改变了策略：“我们决定不提出任何可能使奥利弗的名字被人提出的起诉”。把布兰德雷思作为主要被告就可能把指控局限于公开的暴乱活动这个范围内了。

此外，被告们直到审讯前一直同外界没有接触，很可能并不了解奥利弗的全部真相。他们的亲属为了给被告筹资曾卖掉了家中的一切，包括床铺。但只是到了秋季，一个名叫韦斯特的伦敦激进的金属线工组织了一个被告委员会之时(最后还在德比说服了亨特参加这个委员会)，他们才得到了全国的援救。实际 666 上，政府对辩护律师施加某些压力是完全可能的，他们甚至在绞架上也要千方百计地阻止被害者行使“临终留言”的传统权利，即让一名牧师挡在死刑者与民众之间。激进主义报刊曾渲染说，原告方同被告方之间早已有默契，把最坏的动机归咎于“克罗斯律师”。布兰德雷思的案子是没有救的，但政府方面会不会暗示：如果被告律师不提到奥利弗所起的作用，就有可能不处死布兰德雷思的部分或全部同伙？或者，如果奥利弗的证言被提

了出来，原告会不会威胁要把更多的改革派株连入案？[18]

但这种考虑容易把那些被告抛在脑后。杰里迈亚·布兰德雷思是何种人呢？哈蒙德夫妇的描述有其自己的特点。他们笔下的布兰德雷思是"一个半饥半饱、未受教育而且没有工作的针织工"，"随时可能……提出不知多么狂妄的建议"。这是轻蔑性的描写。我们知道布兰德雷思并非是文盲，如果说他半饥半饱失去工作，那么成百上千同他一起的织袜工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他曾受雇的"德比郡的支柱"行业。我们知道他在诺丁汉有一幢房子，而且在他被捕之后，他妻子作为贫民被送到她在阿什菲尔德的萨顿的居留地。一听到她丈夫被判决的消息后，她就从那里写信给他：

> ……如果你是（人们都这么说）受了那个卑鄙无耻的奥利弗的欺骗，你就宽恕他，让上帝和他的良心去惩罚他。上帝会把报应给予每一个人的，不过，我把他称为人时，我心里几乎也不这么想了（虽然他有人的外形）。啊，但愿我能补救一切并救你的命。

（这封信甚至也被监狱看守扣压了。）身无分文的安·布兰德雷思后来为了向丈夫道别，从萨顿步行到了德比。布兰德雷思给她的最后一封信是"清晰、平易而坚定的"：

> 我将在死亡的阴影中毫无惧色地通往永生；为此我希望你像我一样对着自己的灵魂向上帝发誓：我们将会在天堂里相聚……。亲爱的……这里我给你留下几件物品——一个工作包，两只毛线球，一只棉球，一条手

667

[18] 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 11.351 号；H. 亨特：《回忆录》，第 3 卷，第 499—502 页；《黑矮人报》，1817 年 11 月 12 日；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18 年 4 月 25 日；哈蒙前引书，第 368 页；R. J. 怀特前引书，第 172 页；E. P. 汤普森前引书，第 73—74 页。

帕，一双旧长袜和一件衬衫，以及我心爱的姐姐留给我的信……。[137]

我们必须根据审讯中的材料以及这些细节来重新塑造布兰德雷思的形象，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他直到最后仍拒绝“说出他何处出身，一生中曾从事过哪些不同的职业以及任何涉及他家系的特殊之事”。人们传闻他曾有过不同的行业而且生于埃克塞特。他在监狱里声称自己是“浸礼会信徒”。登曼曾对一个朋友讲，“很多人都谈论他性格中那种坚定和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在监狱里他曾“滔滔不绝地痛骂和挖苦”一个企图要他自首的地方官，但在其他时候他却格外地沉默坚定。[138]

事实上，这些密谋者并不全是某些历史学家所想象的是目不识丁的庄稼汉。[139] 我们不能因他们的追随者中有一个人以为“临时政府”同“粮食”[140]有关就认为他们都是乡巴佬，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是曾在很多地方见过世面的退伍士兵。布兰德雷思的伙伴之一，47 岁的石匠威廉·特纳就曾在埃及和其他地方服过役。[141] 韦特曼是锯木工，“很有教养而且正派”，是“一个头脑清醒，性情温和的人”。艾萨克·勒德拉姆“是一个有少量财产的人”，“他同别人在德比附近合伙开了一个采石场，在方圆数英里

---

[137] 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 358 页；阿诺德前引书，第 116 页；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18 年 4 月 25 日。

[138] 《利兹信使报》，1817 年 11 月 8 日，15 日；阿诺德前引书，第 115 页。

[139] 在德比受审的 35 人中，有 13 名针织工，7 名劳工，5 名煤矿工人，2 名石工，2 名农场主，1 名石匠，1 名翻砂工，1 名铁匠，1 名技师，1 名裁缝。见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 11.351 号。

[140] 在英文中，临时政府为 provisional，粮食为 provisions。——译注

[141] 《独立辉格党人报》，1817 年 10 月 23 日。

的范围内他还是个很有名的卫斯理宗传道士”。[112] 在监狱里他读的是巴克斯特的《召唤不信教的人》，以此安慰自己。那些被捕的约克郡代表大都是高级工匠，[113] 而弗利会党起义之后被指控有罪的 24 人中也有 9 人是剪绒工。

以上情况表明我们应该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些暴动者。不断有传闻说布兰德雷思本人曾是卢德分子，或许甚至是一个卢德派“首领”。[114] 弗利会堂的暴动者是从霍尔姆福思河谷出发的，这个地区常会使人联想到 1812 年卢德分子的起誓活动。至少有一名暴动者拥有“一支据他说是在卢德时期曾合作过的旧戟”。一个军官曾在笔记中写道，袭击是伴随着山上的烽火以及表示信号的枪声而来：“这种方式同卢德时期的方式完全一样”。利兹剪绒工詹姆斯·曼很可能曾是利兹地区卢德运动的一名领袖；另一名在桑希尔利斯被捕的代表（斯莫勒）据说曾是“1812 年臭名昭著的偷窃武器的人”。一名利兹的治安官报告说，“在暴动前两三周，剪绒工场的人已经在纷纷谈论 8 日或 9

668

---

[112] 《利兹信使报》，1817 年 10 月 23 日。这一点在下一周的报纸上因“请求”而被更正了。不过勒德拉姆很可能属于某个分离派卫斯理宗小团体，即新教团或原教旨派。亦见于 B. 格雷戈里的证词，见上文，第 394 页。

[113] 2 名剪绒工，3 名呢绒匠，1 名鞋匠，1 名木匠，1 名织工，1 名制刷匠以及 1 名酒店老板。见《利兹信使报》，1817 年 6 月 14 日。

[114] 见 1818 年 3 月 1 日的《立法者》及菲茨威廉文件 F. 45(k)中《1817 年 8 月 25 日 G. 卡文迪什勋爵致菲茨威廉》。更值得注意的是，处死德斯帕德时布兰德雷思也在场。当有人问他对叛国罪的惩罚有何看法时，他说这是可以饶恕的，他说这话是在目睹了德斯帕德的案例之后（见《独立辉格党人报》，1817 年 11 月 9 日）。另外两还有名密谋者当时曾卷入德斯帕德事件，这两人是彭德里尔以及威克菲尔德的斯科尔斯。亦见奥利弗的证词，见上文，前一章注 242。

日的暴动了”。[165]

因此，有理由认为有些参与起义的人并不是容易受骗的人，而是有经验的革命者。布兰德雷思的长期沉默包含着一种英雄义气，这是人们所不理解的。他对奥利弗的事守口如瓶，很可能是想以自己的死来减轻他的同伴们的罪过，同时也避免牵连别的改革者。有一份材料表明，“据说布兰德雷思曾公开说，他是应该死的。因为他已经杀了人，但他希望他是惟一的牺牲者”。但同时他对自己犯的杀人罪“并不感到悔恨”。虽然他“愿意参加任何宗教活动”，但他“无所谓悔悟，而且对任何恐惧都能经受得住”。他写信给妻子说，“上帝使我极度坚韧，使我能在受审时保持自己的灵魂。”[166]

我们可以把彭特里奇起义看做是历史上最早的、没有中等阶级支持的、完全无产阶级性质的起义之一。这次革命运动的目标也许用贝尔珀街头歌曲的歌词最能加以概括——“革命开始了……”。[167] 这次起义为在战争期间陷于极端孤立境地的北方和英格兰中部的工人投下了一线光明，卢德运动也从此开始转为 1818 至 1820 年以及 1830 至 1832 年“民众的”激进运动。即便没有奥利弗的巧妙煽动，某种形式的暴动也可能发生，而且成功的机会也许会多一些。[168] 实际上，在政府的心目中，暴动的

669

[165] 《伍德致菲茨威廉》，1817 年 6 月 6—7 日、9 日；约翰·巴克利的口供；《J. 阿米塔奇上尉致菲茨威廉》；以上条款均见于菲茨威廉文件，F. 45(i)及(k)。关于曼，见上文，第 590 页。

[166] 《独立辉格党人报》，1817 年 11 月 9 日；《诺丁汉评论》，1817 年 10 月 24 日。

[167] B. 格雷戈里：《自传回忆录》，第 129 页。彭特里奇起义者自称是“复兴者”。

[168] 参见詹姆斯·伯金的口供（他是深知暴动内情的人物之一），他相信，如果没有奥利弗的插手，暴动也会在“诺丁汉、约克郡、兰开郡以及斯塔福德郡的多个地区”爆发（内政部档案，第 42.172 号）。

主要唆使者既不是奥利弗，也不是米切尔，而是那个曾在诺丁汉、德比、约克郡、兰开郡和伯明翰等地四处奔走的托马斯·培根。[149]

用现实政治学的术语来说，这一情况为西德默思以及政府的行动提供了一点点正当理由。由于相信某个暴动不可避免，他们便决定以某种特殊方式来解决问题，即强行制造出一个恐怖和刑惩的典型，并以此一劳永逸地平息"下层阶级"可怕的骚动。这并非是说在1817年的情形下工人阶级的起义会有成功的希望。起义的每一个细节都能显示出革命者在组织方面的弱点，他们缺乏有经验的领导集团。那位诺丁汉的告密者显然也是一个受雇的煽动分子（诺丁汉镇公所书记长和西德默思都知道），他的证词揭示了上百个工业村庄中改革者所面临的处境。6月6日，他去阿诺德（以前曾是卢德运动著名的中心）见了查尔斯·史密斯，"并同他谈起了那件事，还问他是否已让所有人都作好准备了"：

> 他说全镇都准备好了，即使有成功的可能性，他也不认为有那种机会；他说，除非组织得当，而且有一位好领袖，不然什么也干不了。他还劝我要小心不要落到治安官手里，因为这事只会让许多人走上绞架……。[150]

5. 彼得卢

成千上万像查尔斯·史密斯这样的人在其后的几个月时间

---

[149] 财政部法务处档案，第11.351号；国王对托马斯·培根案，摘要见菲茨威廉文件，F.45(k)中《G.卡迪文件勋爵致菲茨威廉》，1817年8月25日。

[150] 内政部档案，第40.6号。在前一周，史密斯同告密者谈话："他已经读了许多关于革命的书，没有一次革命是在缺乏伟大人物合作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而且他认为当前的行动就缺乏帮助。"

里一直为布兰德雷思感到悲伤。除卡什曼而外,他是双方对抗
670 中的第一个牺牲者。此事造成的心理影响是深刻的,从此之后的政府和改革者双方都意识到这纯粹是一种力量的较量。然而,奥利弗事件所造成的较长期的影响却增强了改革运动中与革命相对的合法主义的力量,一个没有奥利弗的起义有可能把惊慌失措的中等阶级推到了行动当局一边;而一个有奥利弗参与其中的起义却使得辉格党人和中等阶级改革者警觉起来。3年来,中等阶级一直把公民自由和出版权利作为决定性的政治论战的核心,他们为这些权利辩护而且对此非常敏感。奥利弗事件使1817年以后的工人阶级改革运动变得毅然但又有合法主义的特征。"和平方式"从此压倒了"暴动方式"。伍勒、霍恩以及弗利会堂的暴动者被无罪释放,以及菲茨威廉伯爵和诺福克的科克这类人(还有出版界的许多人)对"密探手段"的抗议都强调了日益萎缩的权利和合法主义传统的重要性。彭特里奇起义的失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密谋活动的极端危险性,只有彼得卢的突然打击(1819年8月),才把一部分人重新推回到革命道路上去。但卡图街密谋事件(1820年2月)又再次强调了奥利弗事件和彭特里奇起义的教训。从1817年直到宪章运动时期工人阶级的主要斗争方式是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宣传鼓动和抗议,他们不再积极从事暴动准备了。

温和的改革派和辉格党人也不失时机地抓住奥利弗事件的教训为自己服务。事实上,《利兹信使报》对奥利弗的揭露已总结出这样一个教训,工人阶级必须使自己置身于辉格党人和中等阶级改革者的指导和保护之下。该报就德比审讯发表的社论曾劝告改革者:

……要像避开敌人那样避开任何一个企图把致命的暴动种子移植到人们头脑中去的政治传道士。……那些

> 谈论各种"力量"而不谈论理性的力量……的人都应该被怀疑是密探或告密者，要不就是煽动分子……。[158]

在伦敦，伯德特派的《独立辉格党人报》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教训：在德比审讯中，有一个牺牲者在1817年早些时候取消了订阅的《独立辉格党人报》，而且还宣称打算订阅《政治纪事报》，从这次起义中就可以看出宣传科贝特的"有害教条"的后果。[159] 而在科贝特看来，他的警告是要人们提防各种方式的"俱乐部和通讯会"，这是可信的，而亨特为了平息沃森、克利里和西斯尔伍德这类人的批评，在后来则不止一次在大声疾呼警惕"奥利弗"。40多年来奥利弗的名字就像丧钟一样在实力派改革者和宪章运动人士的记忆中鸣响，他们每一次的暴动准备都因优柔寡断而化为了泡影。 671

彭特里奇起义直接地、而且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彼得卢事件，这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它是格外强大、格外坚决的"合法主义的"宣传运动(大体上是工人阶级性质的)在潜在的革命气氛中发展的结果。人们在1819年所看到并不是英国传统体制的力量，而是它的逐渐衰落。由于内部分裂和恐怖统治，加上许多地方领导人被捕，改革运动在1818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没有表现出有组织的迹象。然而，奇怪的是，当局也是软弱无力的。政府在伦敦遇到了反对势力，陪审团拒绝给伍勒和霍恩定罪，怪模怪样的印刷品和讽刺诗文出现在窗户上；在当局看来是煽动犯罪的出版物大模大样地到处流传。他们被迫一个接一个地释放1817年因涉嫌犯罪而被捕的改革派——托马斯·埃文斯、格雷夫纳·亨森、奈特、班福德、约翰逊、巴古利、米切尔以及其他许多

---

[158] 《利兹信使报》，1817年10月30日。

[159] 《独立辉格党人报》，1817年10月23日。

人。这些人出狱之后到处演讲，参加向他们表示敬意的晚宴，而且还试图控告政府非法拘捕。此外，在兰开郡和英格兰中部还爆发了大罢工，其间据说是非法的工会居然组织上街游行。90年代的镇压不仅得到了土地所有者和许多雇主的赞同，而且在舆论上也得到了相当数量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从而使雅各宾派不再吭声；然而，1817年的镇压反倒增强了激进改革者的力量，而大部分中等阶级则对政府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1795年，皮特还能以保卫宪法、反对法国标新立异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但在1819年，利物浦、西德默思、埃尔登和卡斯尔雷则被人们视为一心要以专制的"大陆式的"统治来取代宪法权利的人物了。

1819年是1832年的预演。这两个时期都可能发生革命（而且第二个时期离革命非常近），因为政府陷于孤立，而且统治阶级内部分歧很大。在1819年，改革者具备了合法主义者的角672 色，因此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们对权利提出了要求，其中有一些是按法律角度难以拒绝的，而统治阶级从不打算把这种权利扩大到"下层阶级"。但是如果下层阶级得到了这些权利，那么迟早都会导致旧制度的灭亡。许多地方官在给内政部的报告中都用几乎相同的字眼写道：如果集会、结社以及煽动性的小册子不被禁止，这事还能有完结吗？没有人认为权力的结构只是靠皮特的军营就能得以维持。权力的表层，在农村和自治城镇，是由服从与畏惧所构成的，即使骚动和罢工不可避免，但只要某一个暴动首领遭到惩罚，这两个因素仍然足以使那些犯上作乱的人为之慑服。

在1817年，这个旧世界正在逝去，而到1819年，它就已经从英国的各个地区消失了。服从的防线早已被非国教徒和卫斯理教派（不管它自身如何）削弱，后来又进一步受到卢德运动和

汉普登俱乐部的挑战。1817 年 5 月，舍温在瑟尔沃尔观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制造业对工人的影响。“他们的职业性质促使他们组成了社团。”制造业地区的工人以收集会费的方式组织起来了，因此，政治讨论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人数众多就导致了服从的丧失：

> 如果一个贵族在街上遇到一个织工而后者不向他脱帽致敬，那个要人对此也毫无办法。人们对那些趾高气扬而且有专制主义思想的人的轻蔑不断增加，这种情况是我们在所有工业市镇都能观察得到的，而且从这种轻蔑中还产生了……一种露骨的、根深蒂固的仇恨，每当我们听到一个具有贵族思想的人谈到那些工业繁荣、政治思想活跃的地区时，就能知道这一点……。[13]

1819 年，改革者要求的权利是政治组织、出版自由和公共集会自由，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求选举权。我们可以依次谈谈这些权利。首先，英国的工人阶级早已成为（一百年来一直是如此）欧洲工人阶级中最“喜欢组织俱乐部的一个阶级”。英国工人在 19 世纪早期组织社团的爱好是相当惊人的。卫斯理宗和非国教派教堂的影响，互助会和工会的长期经验，议会立宪制度的形式（这既能从议会选举过程观察到，又能从中等阶级及自学成才的改革者向工人阶级运动所传达的思想中得知），所有这些影响都容易使人热衷于立宪主义的组织形式和规范。据说常有这种情况，只要有 6 个工人住在同一间屋中，他们就要任命一个主席，并提出议程，或动议先决问题： 673

> ……有人提议，“除小组领导人之外，谁也不应有选举权”——有位绅士站起来说了这样一番话，主席先生！

---

[13] 舍温：《政治纪事报》，1817 年 5 月 24 日。

主席先生!! 主席先生!!! 我要你尽到维持秩序的责任。他重复了这么多遍,竟使我为他的肺而担心。那位主席大声叫喊秩序! 秩序!! 他的嗓门太大,让我感到阵阵战栗。那位绅士接着说:主席先生,我想我们都是到这里来处理改革事宜的议员,这事应该照议会的方式(我把这里比做议会)来办……。他刚坐下就有另外两三个人说话了……其中一个说他有几句话要反驳那位绅士,因为他把此地竟比做了下院——腐败和小偷的巢穴,如科贝特恰如其分所说的那样;如果他非要把在坐的比做那帮人,他决不再到这里来……。[158]

这份报告发自曼彻斯特。如果另一份告密者的报告是可信的,我们就可以证明当卡图街密谋者在一间阁楼里策划刺杀内阁成员时,确实发现有必要任命他们当中一员为主席(以此作为这一职位的象征),他们讨论了把卡斯尔雷斩首以及用适当方式烧毁伦敦的问题,并用投票方式对提议进行了表决。

像这样模仿议会只是那种组织传统所表现出的可笑一面。织工和煤矿工人这类人在面临剥削和压迫时所作出的本能反应几乎都是寻求联合,他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只有组织起来,他们才可能由一群暴民转变为一种政治势力。此外,虽然皮特提出的禁止选举全国代表和组织通讯会社的立法还保留在案,但是,当"封口令"在1818年终止生效后,官方就很难从法律上对组织地方会社的权利提出异议了。在1818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819年初出现一些新形式的地方改革会社:"斯托克波特政治联盟"、"赫尔政治抗议协会"以及伦敦的"全英论坛"。同各类通讯会社和汉普登俱乐部相比,这些会社都具有公开的特点。最重要的

[158] 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全文载D.里德前引书,第219—220页。

是,它们都是辩论和政治讲座的中心(在纽卡斯尔,这类社团被叫做"政治读书会"),同时还销售激进主义出版物。这样,这类会社反不易受到奸细的挑唆。奸细们可以混入这类会社,但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干什么呢?[133]

在缺乏全国性组织的情况下,地方会社便从激进主义刊物中寻求指导。正是这类刊物为运动提供了思想联系,否则运动就会四分五裂,因此,要求最充分的出版自由便成为激进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尤其是在1816至1820年,大众激进主义运动从手工印刷品和周刊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种宣传手段尚完全处于平等的阶段,因为蒸汽印刷机几乎还没有使用(其使用始于1814年《泰晤士报》),而且下层改革团体同教会或国王一样有条件使用手摇印刷机。由于运输太缓慢,全国性的(或伦敦的)报纸并不能削弱地方报纸的阵地;但却有足够时间使每周一次的《政治纪事报》或《黑矮人报》保持每期登出新闻评述,印刷费用也比较便宜,即使没有基金和广告收入也能大获其利。成功的激进主义刊物不仅为编辑而且也为地方代理商、书商以及流动报贩提供了生计。激进主义第一次成为一种可以供养专业鼓动家的职业。科贝特、卡莱尔、伍勒和韦德等人主编的报刊,在有利的条件下销量可以同大多数官方报刊相匹敌或压倒它们。[134]

科贝特变节后,《黑矮人报》便成了激进读者人数最多的报刊。该报编辑T.J.伍勒(1786—1853)是位出生于约克郡的印刷工。他曾在肖尔迪奇做过学徒,他早期的政治活动是参加一

[133] 关于引人注意的"斯托克波特政治联盟"的情况,可以参见本书的717页;关于"政治抗议者协会",可以参见韦尔默思前引书,第88页以及哈维勒前引书,第59—60页。

[134] 关于这方面的所有细节,参见下文,第718页。

675 些小型辩论会(例如常在哈克尼的"人鱼酒馆"聚会的苏格拉底同盟),战争期间在一些杂志社中工作。[⑰] 1815年,他创办了《剧坛》,这份刊物的辛辣讽刺和自由主义的倾向后来成了《黑矮人报》的风格。他得到了卡特莱特少校在精神上(或许还有津贴方面)的支持。他既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又是一个文笔流畅的作家,他甚至好几次直接把文章写在石印石上。[⑱]他始终不渝地主张以公开的符合宪法的方式来组织激进派:

> 那些谴责俱乐部的人或是不知道他们能做些什么,要不就是希望什么都不做……。且让我们看看,然后再学学教友派的坚韧决心。他们获胜不是靠武力,也不靠暴力和恐吓。他们是靠联合制胜的。

在他看来,"政治抗议者协会"(他们的第一个俱乐部于1818年7月在赫尔成立)就提供了一种恰当的组织形式,这类组织内部分成许多小组,每组人数不超过20人,每周交纳一便士会费,主要任务是销售和讨论激进出版物。"较大的集会不那么适合于这类讨论"。按照规则,所有"秘密活动"均须予以拒绝;提出此类建议的人应受谴责或是被开除。"我们的书籍和帐目……随时可以让地方官检查"。有了这些措施,(他宣布说)"密探就不起作用了",而且(以他自己颇具个性的夸张笔调写道)"西德默思和卡斯尔雷之流的特务们就像被伊瑟利尔天使点触过的那个瞎眼恶魔一样无害,而且在听到夏娃的名字时也会吓一跳"。[⑲]

伍勒有许多竞争者。在伦敦有亨利·怀特的《独立辉格党人报》,该报纸每周一期,内容丰富,其新闻报道相当出色,但(出于

---

⑰ 见《国家传记词典》的有关条目。

⑱ 石印石是石版印刷用的石版。——译注

⑲ 《黑矮人报》,1818年9月9日。

辉格派或伯德特派的政见)对激进组织不感兴趣。还有约翰·亨特的《观察家报》以自己出类拔萃的风格成为激进知识分子的周报,黑兹利特就是该报的定期撰稿人。有约翰·瑟尔沃尔也再次复出,担任了《斗士》的主编。这些刊物全都对平民运动敬而远之。约翰·亨特和亨利·亨特都曾因把他们俩混为一谈而表示愤怒。他们不欢喜下层阶级的"粗俗"。(第一次矿泉地大会之后,《观察家报》曾发表社论宣布同雄辩者断绝关系——"他从没说过一句值得听的话"——这种偏见既无价值又愚蠢。[59])在众多 676 小册子式的期刊中,舍温的《政治纪事》以及《女怪》最有影响。舍温曾是索斯韦尔—布里奇韦尔猎场的看守人,后因宣称自己是潘恩信徒而被解雇。尽管他还不到 18 岁,但他的《纪事》(仅次于《女怪》)也许是观点最中肯、文笔最优美的刊物了。由于舍温同理查德·卡莱尔有过交往,他的刊物在激进理论的发展史中还占有一席之地。卡莱尔先是出版《纪事》,后来又控制了其编辑工作,最后把它改为著名的《共和报》。[60] 售价一便士的《女怪》发行量较小,而且仅限于伦敦和曼彻斯特。在约翰·韦德(先前是分毛工)的主编下,《女怪》在说理方面是最严谨最有声望的刊物。韦德同样也是最引人注意的《黑皮书》的作者,该书以充分调查研究后所得出的事实披露了议会腐败、冗员闲职、教会中的多处任职和尸位素餐及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重用亲戚、奢侈浪费的现象。它以双周一期的方式发展,每期 6 便士,售量达到 10000 册。《女怪》的主要影响在于促成了工人阶级运动理论的形成,起到了连接功利主义和激进工联主义的作用:"我们希

---

[59] 《观察家报》,1816 年 11 月 24 日。

[60] 舍温的《纪事》开初用过这个刊名。关于舍温,参见威克沃著前引书,第 69 页起;关于卡莱尔,参见下文,第 762—768 页。

望”(韦德宣布说),“我们这些主张普选权的极端激进改革者要同温和的改革者友好”。[162] 在伍勒和科贝特的旁边还有若干多少有点短命的暴力派刊物,其中寿命最长的是《美杜莎》,或称《一便士政治家》。该刊物的编辑是史密斯菲尔德的书商托马斯·戴维森。《美杜莎》曾刊载过诸如“摧毁现存制度”这类题目的社论,而且还警告批评家们说:

> ……到处都有树、街灯柱和绞索架,如果需要就地正法,就可以在这里惩办一批不思悔改不可救药的恶棍,或大大小小的财富掠夺者,以此作为对他们的警告。[163]

以上这些刊物把激进主义思想从伦敦传播到了各地,与此 677 有关的编辑、出版商、书商、流动小贩,甚至还有张贴广告的人都成为1817至1822年间为出版自由而斗争的前线战士。[164] 激进主义者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增加刊物的销售量,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地方中心开始发行自己的出版物。在这些出版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曼彻斯特观察家报》,这更像是一份报纸而不是杂志,其发行量在1819年底已接近《黑矮人报》,而且在报道运动方面比其他竞争者更加具有新闻嗅觉。当然,这份报纸深深卷入曼彻斯特政治;地方政治其他中心地区也同样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乔治·德蒙兹为了确保自己在1819年4月入选伯明翰救贫局,曾在伯明翰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激进主义运动。他是以一系列的信件来指导这次运动,[165] 而《埃德蒙兹的每周纪事》就

---

[162] 《女怪》,1818年7月25日,见本书第770页以及威克沃前引书,第60—61、67页。

[163] 《美杜莎》,1819年5月1日和29日;亦见威克沃前引书,第63—64页。

[164] 见下文,第727—732页。

[165] G.埃德蒙兹:《致伯明翰教区居民的信》(1819)。另见反对埃德蒙兹的系列论文(大英博物馆,8135 cc.6);以及《伯明翰观察员报》(1817)。

是这些信件的产物。在诺里季，曾经在 1802 年把威廉·史密斯送入议会的雅各宾派与辉格派的联盟仍然存在。正是在这里，1818 年的大选产生了《蓝白矮人报》。在考文垂和达德利出现了许多小的传单，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垃圾工和搬运工都在阅读并讨论政治；劳工、帮工和雇主都在异口同声地表示着不满和反抗”。[166] 逐一复述地方官和大臣们就这一情况发出的惊呼是令人感到乏味的。在一位观察者看来，由于出版物的影响——

> 社会不同等级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明显了，根深蒂固的憎恶和凶猛残忍的复仇心理也在劳动阶级的心中滋长。[167]

1819 年底，正当霍恩和克鲁克香克卓越的讽刺诗文正处在其高峰时节（据说《杰克营造的政治大厦》售量有 10 万册），埃尔登愤慨地宣称说：

> 他在任职期间（1794 年担任首席检查官）从未听说有人驾驶满载煽动性报纸的马车在公路沿线以及各村庄散发，乃至分送到农舍中去……。在王国……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小店专卖亵渎神明、蛊惑人心的读物。[168]

“博尔顿的弗莱彻”写道：“国内几乎每一条街或每一根柱子上都张贴有煽动性的标语口号”。除进行迫害之外，某些接受了津贴的保王派报刊多次想把“科贝特驳倒”。这些报刊是默尔的《白矮人报》、谢杰特《针对科贝特、伍勒、舍温以及其他民主主义的不信教的作家的每周评论》、《曼彻斯特爱国者》，以及伯明翰的 678

---

[166] R.K.韦伯：《英国工人阶级读者》，第 48 页及以下。

[167] A.B.里奇蒙：《叙事》，第 54 页。

[168] 见威克沃前引书，第 135 页及以下。

"乔布·诺特"等那些下流的小册子作者写的东西。(改革者阵营内部的长期争吵为这些报刊提供了大量的话题)。

我们可以举出这些刊物中的一例以说明 1819 年底所能见到的恐慌情绪。利兹曾出版过一份伪造的《改革者指南》(旨在以假乱真),洋洋自得的伪作者们为了获得西德默思勋爵的赏识,还寄了一份给他:

> 激进改革即是全面革命。它是建立在共和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一次政府变革,其目标是修正人权。这就是它的真正性质,而它的特点是掠夺、谋杀和屠杀。

改革者坚持"平等原则","如果我们对其他人的财产拥有同等权利……那么,根据同一原理,强暴他人的妻子和女儿也会得到姑息和原谅的"。

> 那些靠你们的蠢行发财的是些什么人?去问问那些政治书商就行了……。起初他们就像有毒的爬虫,藏在阴暗的胡同、洞穴和隐蔽处,不敢爬出来……。

但现在他们却利用人民的老实可欺从中得利:

> 愿上帝怜悯你们,你们既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事,就去做那种心怀不满拉帮结派的人。值得庆幸的是你们是英国人……。读读圣经吧……。别让你们的妻子和女儿出门……。[⑭]

合法派改革 1819 年所要求的第三项权利是公共集会和示威自由。从"伦敦通讯会"组织的最后一次示威活动到矿泉地集会之间有 20 年间歇。在整个这段时期,除了选举期间的集会和当地辉格派当局召集的郡会(由乡绅主持)之外,民众的政治集会大体上都停止了。在各地的保王派乡绅看来,工人参加由其

679

⑭ 《改革者指南中白人的权利之再思考》(利兹,1819)。

本阶级主办的集会无异是暴动和反抗行为。1817 年初，一个身兼牧师职位的地方官在伯明翰制止一次秩序井然的改革集会时说过这种话："乱七八糟和不体面的程序，受到错误引导的大众，喧嚣和暴力行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恶劣的诡计。"[110] 当第一次公开的改革集会在陶器区（伯斯莱姆，1817 年 1 月）举行时，斯塔福德郡守和塔尔博特伯爵和一群地方官就感到有必要亲自出席，而此时在附近看不见的地方已经布置了军队。[111]

尤为重要的是，宪法派新型的改革示威活动首先在兰开郡发展起来了。早在 1816 年 10 月，布莱克本就发生过一次组织很好的公开示威。1817 年 1 月，奥德姆的一次集会游行在前排布置了仪仗队，最后还有由一个教友派药剂师作象征性指挥的乐队演奏。[112] 矿泉地事件以及彭特里奇的教训，促使合法主义者下决心去改变对他们的指责：他们是一群无法无天、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班福德在谈到彼得卢集会的准备工作时有一段话是人所共知的：

> 人们认为这次大会应该正正经经、卓有成效，应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风貌，这样才是得策的。报刊上过去的常辱骂我们召集的人衣衫褴褛，面孔脏脏……队伍乱七八糟，活像一群群暴民……。

"'整洁'、'稳健'、'秩序'，是委员会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后来经亨特先生建议又加上了'和平'这一条"。这就是 1819 年 8 月 16 日之前的每日夜间或清晨操练的主要目标。后来在游行

---

[110] G.埃德蒙兹：《致伯明翰居民的信》(1817)，第 15 页。

[111] 内政部档案，第 40.4 号。这次有 3000 人参加的集会组织得井井有条，给塔尔博特伯爵留下了深刻影响。为此他建议西德默思勋爵镇压汉普登俱乐部（而不是取消集会权利）。

[112] 内政部档案，第 40.4 号。

前往曼彻斯特的路上便出现纪律严明行列壮观的场面——每一百人有一个领队(帽子上别一枝月桂以示区别),队列中有数个乐队还有几面绣花大旗(妇女联盟以隆重仪式赠送的),打头阵的是一队"我们最标致的姑娘"。[123]

680

但是班福德把这样一种训练和场面说得过于新奇了,因为激进主义者所采取的那些方式有好些个来源。原教旨卫斯理宗的野营集有某种影响,但这种影响对北方的宪章派野营集会则显得更明显。此外,那些为激进派做训练官的退役老兵也起了某种作用,但改革者们受激进的政治传统以及工会和互助会传统的影响更大。自威尔克斯时代以来,伦敦人每逢重大的政治庆典都要设宴纵酒,即使是饮酒有度的普雷斯的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在1807年庆祝胜利时所花的钱也比整个选举活动花的钱多。[124] 每一次重大庆祝都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计划,该委员会要安排游行队伍的顺序、路线,选择适当的纪念物和口号,准备乐队和旗帜。当亨利·亨特1819年9月15日(在彼得卢事件之后,受审之前)以凯旋的姿态进入伦敦之时,报上用了整整一栏的篇幅来报道那天的欢迎场面:"数百名步行者扛着大枝的橡木、杨木等物";"一名步行者扛着象征团结的叉在草耙上的一捆棍子……";"全体委员携带白色的官杖,身系红色绶带,帽子上还插着月桂枝";"一面绸缎做的绿色绸旗,上面绣着有金字和爱尔兰竖琴",还有"乐队,骑手";"一面顶上和四周都扎有黑纱的白旗",白旗上有用黑字写的致彼得卢事件牺牲者的字;然后是"一面题有'普选权'字样的旧红旗";此外是一辆载着亨特先生的朋友——沃森、西斯尔伍德、普雷斯顿和其他朋友的马车,以

---

[123] 班福德前引书(1893),第24和25章。

[124] 见上文,第465页。

及更多的乐队、旗帜,更多的骑手,亨特先生……等等。甚至连狗也披红戴绿,颈围上还写有"不要狗税"。济慈曾写信对他的兄弟乔治说:"要让我给你详细描述,得花我一整天时间,还得用一摞纸,从伊斯林顿的天使酒家到王冠与锚的道路两旁都挤满了人。"⑮

这种传统显然在北方不那么强,因为那些地方并不存在选举伯德特和威斯敏斯特委员会这类事。那里较有影响的是互助会和工会。我们知道普雷斯顿同业公会和梳毛工都借用中世纪的仪式,而且那些合法的互助会以前大多模仿了这些仪式。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在战后年代里,"非法"工会一直在公开显示他们的力量。1819年,杜斯伯里的矿工在游行时曾一队一队旗幡飞舞地走过镇区。同年,针织工在诺丁汉举行了秩序井然的示威活动。在1818年的大罢工期间,曼彻斯特的纺纱工"星期二沿着皮卡得利街行进,队伍足足走了23分半钟",告密者本特这样说,"艾克店里的一名伙计被选出来,他指挥他们,把他们排成队……他们像军队士兵服从他们的团长那样严格地服从他的指挥,整个队伍就像一个团队,行进中几乎没人讲话。"⑰

681

宾将军当时曾发表意见说:"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员采取和平行动,这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这句话是值得深思的。那些曾把改革者诬蔑为暴民的乡绅在发现他们并非如此之后都感到心惊肉跳,有些人甚至会惊恐万分。

当他们眼见这些人穿着"激进派的破衣衫"

---

⑮ 《自由帽》,1819年9月15日;《独立辉格党人报》,1819年9月19日;约翰·济慈:《全集》(格拉斯哥,1911),第5卷,第108页。

⑯ 见上文,第425—427页。

⑰ 杜斯伯里,见阿斯皮诺尔上引书,第341页;诺丁汉,见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320页;曼彻斯特,见《技术工人》,第100页。

和平地向前行进，举着旗和幡，

……正是他们以前夸奖的这个等级，

而今却使他们万般痛恨苦恼之极。[14]

宾将军在纽卡斯尔说的那番话对于曼彻斯特的情形具有双重意义。审判长诺里斯在彼得卢事件之后提审亨特时曾谈到(也许他还说得轻了)一次会议，

集会是在这样一种场面和气氛下召开的：会场上一面黑旗和一把带血的匕首，还有“没有平等的代表权毋宁死”的标语……。人们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入会场——他们聚集在死亡的旗帜下，这表明他们要推翻政府。[15]

班福德证实，利斯和萨德尔沃思联合会的漆黑大旗上有用白颜料写的“爱”字，上面还画有两只连在一起的手以及一颗心，它是“人们可能设计的最阴沉的景物之一”。然而，引起那无比惊慌的主要还不是那些旗子，而是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6万或10万大众遵守纪律的景象。在这次集会前的数周里，一些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的老兵有时也参加了操练，在有机会的时候他们便把木棒扛在肩上代替滑膛枪，或以击掌代替射击，这就为那些原告证人所说的“军事队列”提供了证据。(亨特自己曾反对过这种“学习当兵的把戏”。)从对这一偶然事情的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暴乱转变成为有纪律的阶级这一事实给统治阶级内心造成的恐惧。

甚至连中等阶级改革者也惊慌不安地注视着这一发展：“喧嚣混乱、冗长费时”而“持续不断的会议”，“措辞激烈的决议”以

[14] 《愚人村的震动》，见《激进的星期一》(纽卡斯尔，1821)，第4页。

[15] 一位观察者：《彼得卢大屠杀》(曼彻斯特，1819)，第46页。

及“狂妄的演说”只会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从而使温和人士完全不希望他们成功”。[180] 在保王派当局看来，他们似乎面临着这样一种挑战：是维持秩序还是让所有道义，甚至武力和权威丧失。一位约克郡的保王派人士写道：“先生，无论他们是武装的还是非武装的”，

> 我把这类集会，例如在曼彻斯特发生的那一次，只看做是人民在造反；我相信，如果让其继续发展，人民的这些造反活动最终会酿造成公开叛乱……。[181]

每次持续的示威游行活动自然影响了改革者们的士气。随着服从的堤坝一次又一次地被破坏，反抗的洪水便一涌而出了。单个的织工或鞋匠因为人多势众、行列壮观以及豪言壮语而不再害怕了，他们的士气更加高涨。如果像这样继续公开地组织人民，统治阶级就不可能进行统治。彼得卢事件前数周，在各个地区中心曾出现了几十次小型集会活动以及（一周接一周的）较引人注目的示威游行：6 月在曼彻斯特和斯托克波特；7 月在伯明翰、利兹和伦敦。[182] 采取公开的合法运动实际上证明比采取密谋和暴动手段更加具有革命意味。伍勒和亨特无需任何秘密“通讯会”或秘密代表制就获得了一种地位，由此他们能够发动一场全国性运动。查尔斯·沃尔斯利先生（7 月在伯明翰）为无代表权人民的“立法代理人”，更意味着一种危险的发展趋势：由激进选举权产生的同议会分庭抗礼的全国代表大会。面对这一日益壮大的势力，腐败的旧制度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改革者实行镇压，要么作出让步。然而，在 1819 年让步就意味着向基本 683

---

[180] 《曼彻斯特公报》，载 D. 里德前引书，第 71 页。

[181] 一位约克郡的自由持有农：《一封致 S. W. 尼科尔乡绅的信》（1819），第 8 页。

[182] 见哈勒维前引书，第 62—63 页。

上是工人阶级的改革运动让步，这是因为中等阶级改革者还不够强大（不像他们在1832年那样），还不能提出一个较温和的前进方向。这便是彼得卢事件发生的原因。

必须再次说明，最近有人提出彼得卢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无预谋的，它部分起因是曼彻斯特已经恶化的社会关系，但在任何意义上都同政府所考虑的镇压政策无关。唐纳德·里德先生在《彼得卢》一书中着力把这一事件放到当地背景中去研究，他认为：

> 来自内政部的证据显示，彼得卢事件绝对不是利物浦内政部为制服下层阶级所希望采取或促成的一次流血镇压行动。如果曼彻斯特的地方官们遵循了内政部的政策精神，就绝不会发生"大屠杀了"。

我们也许根本就无法确定利物浦和西德默思是否参与了以暴力驱散集会的决定。[18] 不过，我们如果只依据曼彻斯特当地政见是不能理解彼得卢事件的深远意义的，这正像我们只根据战场和那一天的兵力部署，对滑铁卢战役的战略之重要性也是不可

---

[18] 里德前引书，第207页。里德先生非常重视西德默思在彼得卢事件前12天写的一封信，该信曾告诫曼彻斯特的地方官"不要采取任何行动驱散暴民"。然而，如果西德默思和地方官确实作出了任何有关"彼得卢事件的决定"，那么，这一决定很可能已经在集会前的那一周内被秘密送到，而且极不可能在正式的内政部的档案中留下任何记录以备以后查阅。在霍布豪斯、宾以及诺里斯之间的"私下和秘密的"通信（载内政部档案，第79.3号）中也有一些令人奇怪的含糊之词。好几封信（摆出一副"以供记录"的样子）都反对对民众采取"轻率的"或暴力的行动（第479、480和483号）；但又表现出一种空前的期待，而且还给诺里斯审判长（曼彻斯特）留下了通讯地址（第489号）。彼得卢事件两天之后，霍布豪斯记下了西德默思对莱斯特兰奇中校的决断表示了满意的话，即"他使用义勇骑兵是符合那项计划的，我知道你打算根据该项计划采取行动"（第510号）。我的意见是：1、曼彻斯特当局肯定打算使用武力；2、西德默思知道，而且赞成他们在集会中途逮捕亨特并驱散民众，但他没有考虑到这样做法需要使用暴力。

能理解的一样。如果政府对彼得卢事件无准备，当局也就不会在事发之后那样起劲地充当帮凶。在两周之中，西德默思的祝 684 贺以及摄政王的感谢已经转到了地方官和军队手中，以表彰他们“为保障公众安宁所采取的迅速、果断和有效的措施”。要求议会调查的提议被断然拒绝了，检查长和副检查长们都对地方官采取行动的合法“深信不疑”。大法官（埃尔登）“确信”这次集会“是一次公然的反叛行为”，他估计会出现“一种可怕的选择——或是要军政府，或是要无政府状态”，国家起诉一开始就不是针对罪犯，而是针对那天的受害者——亨特、萨克斯顿、班福德以及其他人——只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最初的企图（以叛国罪控告他们）才被放弃了。如果是曼彻斯特的地方官们主张采取镇压政策，那么政府就以各种方式表示赞同并让他们自由处置。亨特、卡特莱特、伯德特、卡莱尔、查尔斯·沃尔斯利爵士、罗（来自于《曼彻斯特观察家报》）和伯明翰的埃德蒙兹等人只是 1819 年底被监禁或等待起诉的那些人中的一部分。身为牧师的地方官海在彼得卢审判中表现突出，因而获得罗奇代尔 2000 英镑奖赏。菲茨威廉伯爵则因反对大屠杀而被解除了郡守职务。六项法令为 8 月 16 日的行动签字盖章。即使彼得卢镇压不是预先安排的，它似乎也是政府一直期待的某种信号。[⑲]

利物浦勋爵宣称，曼彻斯特地方官们所采取的行动虽然并不十分“谨慎”，但“大体上是正确的”，“除支持他们外别无选择”。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致使这次冲突变得不那么“谨慎”的原因还在于它本身所特有的野蛮性质，

---

⑲ 见 C. D. 杨格：《利物浦勋爵生平》（1868），第 2 卷，第 378、409、419—422、432 页；H. 特威斯：《埃尔登勋爵生平》，第 2 卷，第 337—340 页；威克沃前引书，第 129—131 页及以下；佩卢：《西德默思勋爵生平》，第 283 页以始。

要对这一点作出解释我们还得对曼彻斯特的背景情况作一番考察。曼彻斯特的保王党人同工人阶级改革者之间存在着非常激烈的对抗。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工人阶级运动的成熟；此外还包括许多因素——许多大的工商家族的保王党的感情；他们对工会的敌意；卢德运动及1817年的传统；纳丁的影响；托利派牧师的影响等等。普雷斯曾在信中对霍布豪斯说："这伙曼彻斯特义勇骑兵和地方官比你想象的更野蛮"

685

> 我认识其中的一个，此人常骂道："真他妈的瞎了眼，每周给他们7先令就足够了"；他出去巡看他的织工干了多少活时，还带着一条吃得油光体圆的狗……。他不久前还说，"那些婊子养的把曼彻斯特周围十英里的荨麻都吃光了，他们的汤里再没有青叶子了"。我对此事表示了义愤，他立即说，"他妈的瞎了眼，你关心他们有什么用？如果我照顾了他们，我卖给你的货能这么便宜？"

"他们把人民砍倒并用脚踏碎，并以为人民会像公地里的金雀花丛那样不复存在"。[⑱]《曼彻斯特观察家报》的一位作者在彼得卢事件前一周曾在报上对"曼彻斯特的官方绅士们"说："试问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那些残忍的党徒敢不敢成为更专制更暴虐的一伙。"[⑲] 彼得卢事件一月之后，一位身为牧师的治安法官自恃有法庭特权竟对被告说：

> 我相信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改革者。你们改革者中的一些人应该被绞死，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肯定会上

⑱ 沃拉斯前引书，第141页。

⑲ 《曼彻斯特观察家报》，1819年8月27日。

绞架——绳子已经套在你们的脖子上了……。[107]

不知为什么人们没有注意到有关彼得卢事件的两个问题。其一是那天发生的流血暴力事件，它确实是一次大屠杀，我们没有必要在此赘述。[108] 不过，无论某些参加操练的织工想干什么，亨特在事件前一周的努力确实有效地使人们听从了他的要求，即"冷静和秩序"以及"沉稳、坚定和温和的态度"。各地的领导人也曾告诫他们各自率领的群众不要理会任何挑衅行为。许多棍棒——即"拐杖"——被丢弃了，如此众多的妇女和儿童到会充分证明了这次集会的和平性质，而这次会议(改革者们知道) 686 是全英国都在注视的。对大众的袭击确实是出于恶毒和恐惧。

然而这种恐惧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被人群包围的凶恶骑兵们所感到的恐惧，而是阶级仇恨所引起的恐惧。义勇骑兵，指骑在马上的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商人、酒馆老板和店主，他们造成的破坏比正规军(骠骑兵)更大。(一位中等阶级改革者证实说)，义勇骑兵当中"某些个人的政治仇恨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109] 这些人对扛旗的人紧追不放，他们知道演讲者的姓名并伺机予以报复，得势之后他们还列队欢呼胜利。一个棉纺工说："当时四处都是吆喝声，每当有人喊'发发慈悲吧'，他们就

[107] 《泰晤士报》，1819年9月27日。

[108] 参见班福德、普伦蒂斯、J.E.泰勒等人的记述；泰亚斯(在《泰晤士报》)、贝恩斯(在《利兹信使报》)和卡莱尔(在舍温的《政治纪事报》)等当时人所作的报道；亨利·亨特的《审判》和奥德姆的《约翰·利斯审判》中证人以及当事人的证词和他们在控告伯利上校时所提供的证词；F.E.布鲁顿：《彼得卢纪事》(1919)，《关于彼得卢事件的三种描述》(1921)，以及[弗朗西斯·菲利斯](的辩护)《揭露流言蜚语》(1819)。

[109] E.泰勒前引书，第175—176页。亨特公布了参加8月16日镇压行动的义勇骑兵的职业名单：有好几个人是酒店老板和工厂主的儿子，一个酒商一个代办商，一个舞蹈教师，一个乳饼贩一个屠夫等，见《致激进改革者》，1822年10月29日，第13—16页，亦见D.里德前引书，第81页。

说：‘该死的东西，谁让你们来这儿？’”我们可以从以下记述中感受到当时的混乱场面：

> 我拾起一顶自由帽；一个骑兵在后面追我并要我交出来；我拒绝交。这时上来了两个骑兵问发生了什么事。那个骑兵说，这家伙不交出自由帽。那两个当中的一个接着说，该死的东西，把他砍倒。听到这话我立即就跑……。一个骑兵要砍萨克斯顿，但他的马似乎不听话，砍空了。他随即对另一个骑兵喊道，“萨克斯顿在这儿，该死的东西，把他捅了。”那个骑兵说：“我不想这样干，还是你去干吧。”当我到达沃森街的尽头时看见10个或12个义勇骑兵，还看见两个骠骑兵正用马刀砍那些挤在一起的人。这时一个骠骑兵军官骑马来到他的部下跟前，挑起他们的刀说：“该死的，你们这样干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对义勇骑兵们大声喊道：“真丢脸，先生们；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些人已经跑不了啦。”他们停了一会儿，但等到那个军官一离开，他们又开始砍起来。[illegible]

只有阶级战争这一术语才能对此作出解释，但这是一场卑鄙的单方面的战争。力图逃命的人们挤成一团互相践踏，根本就顾不上反抗，只有场地边沿的几个被包围的幸存者发现自己就要被逼进街道和庭院时才向追赶他们的人投掷了砖块。被杀或因伤势严重而亡的共有11人。那天夜里，在从曼彻斯特出来的路上随时都能见到受伤的人。到1819年底，彼得卢救济委员

[illegible] 《约翰·利斯审讯》(1820)，第70、80页。对比一下泰亚斯在《泰晤士报》上的描述：“两个义勇骑兵紧追萨克斯顿，‘恶棍萨克斯顿在哪儿……，你把他捅了吧。’另一个回答说，‘不行，我不想干，还是你去干吧。’那人立即向萨克斯顿刺去。”

会已核实出 421 个因在场受伤要求救济的人(还有 150 人在等候调查),其中 161 例是刀伤,其余的都是被人群挤压或马踏伤的。受伤者中有 100 多人是妇女和女孩;虽然这当中有假冒者,但同样也有许多受伤者没有要求救济,这类人或是因伤不重,或是因害怕受骗上当。[19] 班福德对那天场景的描绘是令人难忘的:

> 十分钟之后,……整个场地变得空空荡荡,如同遭到遗弃一般,讲台还在,旁边立着几根破损的旗杆,一两面划破的旗帜低垂着;场地上遍地都是帽子、围巾和鞋以及男男女女被撕破、践踏、血迹斑斑的衣衫残片。义勇骑兵已下了马——有的在为马放松肚带,有的在整理装备,有的在擦拭战刀……。[20]

彼得卢事件中人们所忽视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次事件的规模,即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和连锁反应的程度。这次事件无疑成了英国政治史和社会史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分别谈谈这次事件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反响,就像谈到彭特里奇起义时那样。全英国在两天之内就知道彼得卢事件,不到一周,人们就开始在啤酒馆、礼拜堂、工场和私宅里谈论这次大屠杀的每一个细节。起初,要指明人们的具体反应是困难的。改革派及其支持者的基本反应与其说是恐慌还不如说是义愤、愤怒或同情。当时在现场,亨利·亨特(在危机期间他表现得最出色)似乎就已感到彼得卢事件是激进派在道义上的胜利,他本人就是义勇骑兵暴行的受难者。他被捕之后受夹道笞挞,两旁的临时巡捕用木棍打他, 688 "就在他走上通往地方官住宅的台阶时",克莱将军"双手举起一

---

[19] J.E.泰勒前引书,第 170 页。

[20] 班福德前引书,第 157 页。

根大木棍朝他的头猛击”，他那顶漂亮的白礼帽被打落而且“紧扣在他脸上”。受到这种待遇的亨特从地方官的住宅出来时(一个正派的反对者回忆说)：

我觉得我在他的脸上发现胜利的微笑。有个人(我想是纳丁)想伸出手来挽住他的手臂，但被他拒绝了，他还低声说道："不，不，那太过分了……"。[13]

几天来，在兰开郡复仇成了人们直接谈论的话题。曼彻斯特似乎也处于军法管制之下了；骚动出现了，还有谣传说“乡下”人正以军事队形向这里进发。班福德曾描述过人们磨镰刀以及准备“旧斧子……螺丝刀、生锈的刀剑、长矛和钉耙”的情景。[14]然而到8月底，暴动的心理冲动反而因为全国出现不可抵挡的道义声援而受到抑制并趋于平稳。“彼得卢”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着可怕的嘲讽意味，它比任何别的事实都能表明当时的情绪。在其后的几周里，由于受到克鲁克香克和霍恩的讽刺诗文的感召，暴风雨般的激进出版物便滚滚而来了；曼彻斯特的“刽子手们”不仅受到亨特和伍勒滔滔不绝的自由主义雄辩的抨击，而且还得面对更加难以忍受的辛辣讽刺。“杰克营造的政治大厦”写道：“所有的人都衣衫褴褛”，

他们诅咒自己出版的时代，
税收太重难以忍受，
祈求解救从暮到晨，
各种请愿都是徒然，
和平集会要求改革，
都被义勇骑兵乱杀乱砍，却受到那个人的感谢，

---

[13] F.A.布鲁顿：《关于彼得卢事件的三种描述》，第20—21、68页。
[14] 同上书，第163页，亦见《独立辉格党人报》，1819年8月22日。

面修的光光发剪得齐齐，

身上挂满勋章——其实又很孤单，

60 岁老花花公子，点头哈腰风度翩翩，

喜好假发、领圈、花边和珍品，

他把国家和财富留给傻瓜和坏蛋。

英国在流泪，他在坐船兜风寻欢悠闲……

甚至连摄政王在议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也招来另一道讽刺诗： 689

看吧！

在月亮郡——

珍妮纺纱机、纺纱车和织机，

那许多恶魔之子，孕育出生。

从此阴谋和背叛到处蔓延！

天啊！

我的议——员们和绅——士们，我们有许多担忧！

改革，改革，下流的暴民大叫大喊——

这当然是流血、动乱和造反——

这群大胆狂徒！你们，我的议员们，还有我，

知道让他们不声不响地饿死理所当然……[18]

彼得卢事件违反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所有信念和成见——言论自由的权利，"光明正大的态度"，不可攻击无防备者的禁忌等等。极端激进派和温和派一度放弃前嫌而共同参加抗议运动，许多辉格党人竟也愿意参加这些运动。举行的抗议集会有：8 月 29 日在史密斯菲尔德，主持人是沃森医生，讲演人为阿瑟·西斯尔伍德；9 月 5 日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更大规模的集

[18] W.霍恩（同克鲁克香克一起）：《月中人》(1819)。

会，演讲人有伯德特、卡特莱特、霍布豪斯和约翰·瑟尔沃尔。[188] 10天之后亨特凯旋进入伦敦之时，《泰晤士报》估计有30万人上街。

大凡研究彼得卢事件反响的人都不会认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传统仅仅是观念意识上的。在其后的几个月里，政治对抗加剧了，没有人能够保持中立；在曼彻斯特，"保王党人"陷入了极端孤立，而拥有一批追随者的卫斯理宗的信徒们是仅有的站到他们一边的团体(以谄媚的陈述)。[189] 如果说许多乡绅和职业人士对彼得卢事件感到震惊的话，他们也不愿意见到恶魔般的人民示威活动。[190] 彼得卢事件之后的运动大致都由工人阶级690 发动并且具有工人阶级性质，这些运动开始是呼吁"复仇"，而后则转入了各种形式的合法主义的抗议活动。

如果说彼得卢大屠杀的意图是遏制公共集会的权利，那么它的后果则刚好相反。人们的愤愤不平，使得那些以前从未出现过激进组织的地区产生了激进组织，甚至在深受"保王党人"影响的地区也出现了公开的示威活动。在沃尔弗汉普顿附近的科斯利成立了一个政治联盟——这是"黑乡"地区出现的第一个组织。一个当地的治安法官抱怨说：

> 这一地区的不满情绪肯定不是因为贫困所导致的，因为从矿井和铁厂的就业及工资状况来看，这里工人的

---

[188] 《独立辉格党人报》，1819年8月29日，9月5日。

[189] 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曼彻斯特主日学校的校务委员会决定(1819年9月24日)，凡戴白帽子或激进徽章的儿童均不得入学。不过，D.里德前引书，第203页认为卫斯理宗内部意见不合。

[190] 这里也有许多例外，例如，约克郡和诺福克的抗议集会活动就是由辉格党人主持的。

处境比王国任何其他部门的工人阶级都好些。[109]

纽卡斯尔的抗议示威最引人注意，此外还有诺森伯兰以及德勒姆的煤矿工。尽管这一地区自90年代就一直有激进主义传统（如比尤伊克和他的工匠、手艺人伙伴们以及强大的互助会和工会）；但教会与国王派掌握了市行政机关并常威胁那些试图公开组织的改革者。《独立辉格党人报》曾写道，“长期以来，皮特那帮人”一直在夸耀英格兰这一地区人民的默从和缺乏生气，然而到1819年7月和8月，激进的“各类读书会”一下子就变成了政治抗议者同盟（这种组织形式曾受到《黑矮人报》的赞扬）。彼得卢事件之后，整个地区似乎都转向了改革派。10月11日（在市长的允许下）举行了公开的抗议集会。事前有人曾预计，由于煤矿行业“比较稳定”，再加上某些煤业老板威胁开除参加集会的人，人们对集会的支持会是有限的。结果，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人们从东南西北四面来，激进派

6人一排阔步进了城。

一支乐队奏着“约翰尼·科普，正在走过来”的曲子为之助兴。

5至10万人“就像变戏法似的突然冒了出来”，观察家们惊讶地发现不仅是担惊受怕的矿工，而且连森德兰和希尔兹的水兵都遵守“秩序、昂扬一致”的指令。行过8英里后，从希尔兹来的那些人甚至还拒绝“享用人们为他们提供的一桶啤酒”，他们 691

“决心……不做任何有损那天的团结一致气氛的事”。大会演讲人有织工、教师、裁缝、印刷、书商和皮匠。这个“激进的星期一”过后（人们把它称为纽卡斯尔“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公共政治集会”），这个城市便从此进入了全国3至4个激进和宪章运动的

---

[109] 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两名面包师，一名铁匠，一名煤矿经理人，一名链工，一名矿工，一名小农和一名鞋匠。

中心城市的行列。在以后的几周内，激进派的“小组”就以信仰复兴运动的进度在附近的所有工业村庄和港口迅速形成了，其中有贾罗、里夫希尔、彭肖、雷恩顿、霍顿、纽巴特尔、赫顿、赫伯恩、南希尔兹、温拉顿、森德兰——在这里，“几乎在你遇见的每一个矿工的帽盔中都可以发现《黑矮人报》”。煽动的言论一直在散播着，鼓动工作甚至做到了韦尔默思主教的矿工那里，他们(一个怒气冲冲的地方官写信对西德默思说)“胆大妄为，竟提出要让那些人所共知的激进派商贩为煤矿提供消费品”。[90]

为了对付这一威胁，纽卡斯尔的保王党人成立了“武装协会”。针对这一情形，矿工和锻工们也转而拿起了武器，这些都是内战的前奏。我们过分地受了班福德的影响，他把人们对彼得卢事件的反应说成是除少数几个头脑发热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冷静和克制的。实际上，在10月和11月间，激进合法运动本身就曾转向革命。如果他们的对手要动武而且以非宪法的方式行动，那么他们也会行使每个公民武装反抗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卡特莱特一贯主张的)。如果集会活动被镇压，他们就会带防御器械来开会。他们的主要武装是长矛和粗木棍，木棍的一端有槽口，可以插上锋利刀刃(通常放在持棍人衣袋里)。这种刀刃(大小不一，价格在1至3先令之间，视改革者的财力而定)，很容易在小铁匠铺里打制，况且这类铁匠铺在纽卡斯尔、设菲尔德、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也是相当多的。我们知道一个名叫纳曼·卡特的曼彻斯特“企业家”的一些情况(他一方面读《黑矮人报》，另一方面又注视着发财的机会)。他太不慎重，竟然雇了

---

[90] 《纽卡斯尔居民大会的详细报告》(纽卡斯尔，1819)；《愚人村的骚动》，见《激进的星期一》；《黑矮人报》和《纽卡斯尔编年纪事》，随处可见；《德勒姆广告报》，摘自《政治观察家报》，1819年12月19日；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独立辉格党人报》，1819年10月17日；R.G.韦尔默思前引书，第102—103页。

一个受雇的告密者"Y"作他的主要经理人(他的业务就是在旅店和纺织业村庄的"黑店"兜售矛头样品,然后从买主那里分期 692 收回货款)。我们还不能把"Y"的那些琐琐碎碎而且还经常添枝加叶的报告简单地看做是捏造。有一次,他到那个激进的铁匠卡特家去,发现他正同他妻子打架——我告诉他说在安息日打架是愚蠢行为,如果他们一定要打出个结果来,最好是推迟到星期一。他妻子说,我不会再让你打了,你制造枪尖矛头,我要让你蹲纽贝利监狱——她说这话时,他正又推又踢企图把她撵出门去……。

但纳曼·卡特遇到的婚变并不影响枪尖矛头生意在11月的第一周的兴旺势头。"Y"发现了大量喜欢这类样品的顾客,其中一个还说"这会让摄政王和他们那群坏蛋好受的"。他的一个顾客正巧是班福德,在"Y"的报告中班福德并不像他本人在20年之后自我描绘的那种形象。在生意成交的黑店里,班福德敬酒时说,"愿自由之树生长在地狱里,并让曼彻斯特的血腥刽子手成为树上的果!"他的一个同伴在闻到非法酿酒溢出的香味后说,他们要用"长矛狠狠地捅那些曼彻斯特的刽子手们",然后他就回家干活,让上帝来惩罚他,他的双手会突然脱离身体,并唱着布列塔尼亚之歌,魔鬼就会出来把他们全带去。[90]

这种情绪无疑在工业地区普遍存在。据传闻,有人还用"罐车"把手枪从伯明翰偷运到北方。在10月和11月份,一个接一个的市镇传来报告说人们在准备武器,从事操练和武装示威,这类市镇是纽卡斯尔、沃尔弗汉普顿、威根、博尔顿和布莱克本。11月,哈里法克斯的改革者在集会结束后返回时,"排成8人或

---

[90] 见"Y"向曼彻斯特市政官作的口头报告,1819年11月6日和8日。载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

10人一排的队伍，有乐队伴奏，还有六七面旗帜，有人还举着点燃的蜡烛；“许多人都手持木棍……”。到一个地方他们便“大声呐喊并朝天放枪”。在伯恩利，虽然地方官发出告示警告人们不得示威，但仍有1万至1.5万人参加了示威活动。领头的人拿着一块木牌，上面写有“秩序、秩序”，但他们还是“放了几十枪”。在哈里法克斯举行的一次较早的大会上，41面旗帜中只有一面写着“我们苦苦呻吟，忍辱负重，盼望解救……。但我们满怀喜悦期待着佳节的到来。”（并不是期待乔治三世的即位纪念日。）[68]另一面旗帜宣称：“血债要用血来偿”。来自里彭登的人扛着一幅画，画面是一个正在织布的半饥半饱的手织工：“穷人的劳动就像富人的财产一样珍贵”。在设菲尔德，巨大的游行队伍向布罗科前进，队伍前面的乐队演奏“死亡进军在梭罗”和“同华莱士[69]一起牺牲的苏格兰人”。[70]

693

但到1819年12月底，运动实际上已进入了消沉状态。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激进运动领导人内部不和；二是“六项法令”的压制。第一个问题是纠缠不清的，而且一直未得到成功的解决。我们已知伦敦的激进派组织长期处于软弱涣散的状况，到1818年和1819年早期，伦敦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像英格兰中部和北方的政治联盟及政治抗议者协会那样的有凝聚力的团体。他们的

---

[68] 乔治三世于1760年继承英国王位，1820年去世。此处可能指乔治在位60年的庆典。——译注

[69] 华莱士是苏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因为反对英格兰国王囚禁苏格兰国王并统治苏格兰，乃率众反击并组织以平民及小地主为主的军队攻入诺森伯兰郡等地。1304年被英格兰人所捕，砍头并被肢解成4块。——译注

[70] 《有关国内状况的文件》，见《议会辩论集》，第41卷（1820），随处可见（此处所选的地方官们的报告等文件有些带有感情色彩）；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J.E.泰勒前引书，第102—134页；《不列颠人》，1819年11月11日；《独立辉格党人报》，1819年10月10日、17日、31日；哈勒维前引书，第66页。

活动常常用特别的名义举行——如以“伍勒先生的朋友的聚会”或在“王冠与锚”饭店的专门聚餐会。1818年威斯敏斯特的两次选举使伯德特的支持者同其他激进团体之间的裂痕大大加剧了(伯德特坚持第一候选人为其银行家朋友金奈尔德,然后是约翰·卡姆·霍布豪斯为第二候选人,此人和伯特德一样是反对卡特莱特、科贝特和亨特的主张的)。

虽然矿泉地大会失败了,但沃森医生和西斯尔伍德在组织伦敦大众激进主义运动方面仍然是最坚决的中心人物。如果一个隐蔽较深的告密者(约翰·威廉森)的报告是可信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西斯尔伍德和普雷斯顿在1817年秋就开始了密谋准备。[⑱] 他们感到彭特里奇起义后,他们的工作很难开展。斯皮特菲尔兹地区的穷困现象已不再那么严重。9月(据威廉森说),普雷斯顿说“他去斯皮特菲尔兹……见过两三个老熟人,他发现他们在干活,而且不喜欢像他那样的人”。他们没有停下活听他的“说教”,反倒继续织布。西斯尔伍德出席了一个又一个的午夜会议,还含糊地谈到他们从一个住在巴黎的英国人——18世纪90年代的流亡者那里得到了津贴。参加的人宣了誓,但这个组织仍是极小的,“普雷斯顿说”,要到行动前3小时,“他们才会知道他们的计划”。普雷斯顿去伯明翰(1817年12月)停留了很短时间,并报告说那里的人“精神饱满”。威廉森本人也曾被西斯尔伍德派去侦察一下兵营,并弄清那里有多少门加农炮。然而这伙人除了作出一些暴动的奇思异想外,取得的实际成果却微乎其微。他们让西德默思读到了几份危言耸听的小 694

⑱ 按照舍温的《政治纪事》(1817年9月13日)的说法,当局得知暴动计划在巴塞罗缪市集那天同时举行的传闻后惊恐不安,调集了4个团队的骑兵,市长还派人到“牡蛎船、红肠棚和姜饼篮”里搜寻武器。有关这次密谋的细节见内政部档案,第40.7和8号。

报告，还建立了几个酒馆团体，而且还在伦敦民众游行示威的好几个场合充当过啦啦队队长。[29]

虽说沃森医生仍同西斯尔伍德保持联系，但他似乎并没有参与密谋企图。[30] 1818年2月，西德默思找到了不用审讯就能把西斯尔伍德送进监狱的便利手段。西斯尔伍德曾发表过一封公开信，该信把公众不满和私人怨恨绞在一起，并要求内务部长“给予满足”——也就是要同他决斗。结果最高法院以扰乱治安罪把他拘留起来，关在王座法院监牢里。西德默思勋爵自己掏腰包为他支付了生活费。1819年，激进的伦敦重新觉醒，许多酒馆团体和辩论会(其中有些称为联盟会)相继成立。沃森也再次开始了建立中心组织的努力。在1819年夏，他得到了被释放出狱的西斯尔伍德的合作，后者似乎接受了合法主义宣传鼓动的策略，暂时转而反对政变阴谋。到1819年夏季，“200人委员会”在伦敦成立。[31] 从6月到10月，沃森、西斯尔伍德、普雷斯顿以及沃丁顿一直是伦敦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领导人物，这尤其是在劳动人民当中。他们除以得到卡莱尔的《共和报》、《自由帽》以及《美杜莎》的支持之外，还得到了老雅各宾主义者、演说家约翰·盖尔·琼斯的支持。彼得卢事件之后，“200人委员会”率先提出为亨特进入伦敦作妥善安排，[32] “医生”本人主持了欢

695

[29] 见威廉森证词，1817年12月18日；西斯尔伍德说：“卡莱尔明天将受到审讯，希望他们都来，同时还带上尽可能多的人以便为他三呼万岁。”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197号。

[30] 同上，1817年9月27日：“西斯尔伍德在沃森来到之后就没有说多少话了，我想他不喜欢他。”亦见1818年2月11日证词，载内政部档案，第40.9号。

[31] 《美杜莎》，1819年7月31日。

[32] 当时有两个筹备委员会：一是由沃森医生领导，另一个与之竞争的委员会由托马斯·埃文斯·盖洛韦和卡莱尔等人组成。不过这两个委员会在沃森任主席时合并了。见《独立辉格党人报》，1819年9月12日。

迎仪式，而且还对傲慢自大、政治上挑剔的亨特表现出了相当的自我克制和灵活。

1820 年，卡图街密谋事件之后，曾有一个心怀敌意的观察者描述过位于威奇街"白狮酒家"的"激进委员会所在地"，这里被说成是伦敦激进"地下组织"的中心，在酒吧间里：

> 坐着一伙可疑的、面目不善的家伙……在靠右边的一张小桌前则坐着某某先生，他面前摆着一本书、一些纸和印制的传单；这个地方阴暗隐蔽，除了某某先生面前放着的蜡烛放出的光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到会的陌生人即使以后在某个地方见到那些人也不会认出他们来。在右手边……是个小客厅，一个精心挑选的委员会夜间在此开会，其他人不得进入。最秘密的事务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进行的；西斯尔伍德先生或沃森警告经常出来并在过道上同前来办事的人谈话。在楼上的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曾有 100 多面目不善的人在某天傍晚开会；公开的委员会以及协会的一般成员也曾在那儿聚会……。他们在这里布置行动队伍等等事情；还存放着……旗帜，而较机密的事情都是在下面客厅里进行的。[40]

这样的中心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政府密探经常注意的目标，不过他们的行动并不都是滑稽可笑的，伦敦的"极端"激进派在彼得卢事件之后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自由帽》10 月直截了当地宣称，"不流血，改革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不负责任的《美杜莎》则写道： 696

> 全国各地的邮局没有一个不提供一些新的令人吃

[40] G.T.威尔金森：《卡图街密谋》(1820)，第 56—57 页。

惊的情况以证明必须坚定不移地武装起来。[21]

卡莱尔(在两年之后)概括地提出这一时期他的所有作品的基本思想:"直到现行当局不再有力量阻止改革时,改革才会成功,在这之前是不行的……。"[22] 此外,在彼得卢事件两月之后,全国领导核心的弱点就充分暴露出来了。亨特的怯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彼得卢事件之后他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改革者和当局都急切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使他的虚荣和自大发展到了极点,彼得卢事件竟成了他个人的奋战,簇拥着他在兰开郡和伦敦走过的队伍也成了他个人的成功。他因伦敦的游行队伍也向沃森表示了敬意而不满;他不同意委员会事先选定的行进路线,结果让成千上万翘首待望的伦敦人等了大半天。(他始终对伦敦怀着怨恨,因为他在1818年的议会竞选时曾受到粗暴待遇而且还受到讥笑。)他因欢迎宴会选举盖尔·琼斯为主席一事同沃森吵了起来,并当众对他大吼说:"你是讨厌的好管闲事的多嘴多事的家伙;我为什么就不能像弗朗西斯·伯德特先生那样在游行之后来当主席?"他然后又为钱的事发生争吵。在兰开郡,他把当地大多数改革领袖都得罪了,反过来又要让数千人的送丧队伍参加他的宠马的葬礼,他实际上(这并非没有理由)还是想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审讯中谋取更有利的地位而并不关心全国的运动。[23]

到了9月,改革者开始分为革命派和合法派两翼。亨特和

---

[21] 《美杜莎》,1819年10月9日。

[22] R.卡莱尔:《为平息利兹改革派内一些小小的争论和误解所作的努力》(1821),第10页。

[23] 《彼得卢大屠杀》,第72页,班福德前引书,第247页起;《自由帽》,1819年9月15日;J.约翰逊:《致亨利·亨特的信》,随处可见;亨特、沃森和西斯尔伍德在普通报刊上互致的信件,1819年10月和11月。

伍勒主张的策略是对彼得卢为非作歹之徒采取消极抵制、抗议和法律行动，同时还抵制各种征税商品。这项策略在8月曾得以大力推行，并得到运动各派的忠实支持。但到了10月这项策略便开始失势，指望从法律方面革除弊端明显是徒劳的，这在兰开郡尤为明显；此外，让北方织工去抵制征税商品也是一种画蛇添足的事。再者，随着抗议运动周复一周地发展壮大，温和派除了叫人耐心等待议会的召开之外提不出任何建议。如果当时没有对彼得卢事件进行调查，或者在人身保护法被中止了，他们还是会提出另外某种建议的。然而，议会直到11月23日才得以召开，那已是彼得卢事件3个多月之后的事了。“极端”激进派以渲染的口吻声称亨特的建议使全国的运动陷入死气沉沉的境地，放弃了公众的首创性，而且在实际上把领导权交给了议会中的辉格党中人。像别的鼓动家一样，亨特似乎也对他自己呼唤出来的那种精神感到惊慌不安。 697

等了差不多两个月之后，“极端”激进派提出了另一项策略，并得到沃森和卡莱尔的支持。这项策略要求“在同一天在全国……集会”，最先提出的集会日期是11月1日，后来又两次推迟。面临这一情况，合法主义运动还是再上一个台阶，而真正的密谋者（阿瑟·西斯尔伍德是其中一员）也许早就希望同时集会将直接导致暴乱。在10月，这项策略得到了支持，纽卡斯尔、卡莱尔、利兹、哈里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巴恩斯利、曼彻斯特、博尔顿、威根、布莱克本、伯恩利、泰因河畔的纽卡斯尔、诺丁汉、莱斯特和考文垂等城镇都计划举行集会。到月底，一向消息灵通的宾将军就看出西斯尔伍德“已经接替亨特而成为伦敦人崇拜的对象”。西斯尔伍德曾去曼彻斯特游说（那里既有极端激进派的联盟也有亨特派的爱国协会），在那里，他的建议得到了广泛支持。一些集会实际上已经举行了，而且还为11月15日的集

会作了进一步安排。10月中旬，亨特看到运动正在逐渐脱离他的双手，便竭力要加以重新控制。在《曼彻斯特观察家报》(10月19日)发表的“给北方改革者的一封信”中，亨特谴责了同时集会的计划。他随后又发表了一封信，提到了奥利弗的名字，而且还特别把密探的污名同西斯尔伍德联系在一起。

698 在其后的数周里，报刊上出现了西斯尔伍德和沃森为一方，亨特及其支持者为另一方的互相攻击的信件。保王党人的报刊欣然把这些信件重登出来并冠以讽刺性的标题“激进派的公文”。沃森医生因未付清欢迎亨特时留下的一份账单而被捕入狱；亨特也曾几次就他用募捐的钱用于何种开销之事作过令人生疑的解释。他们双方的论战大多是不负责任的，亨特在其中似乎还有充分理由怀疑西斯尔伍德的密谋行动，并认为沃森医生是软弱外行的政治领袖。从另一方面看来，西斯尔伍德似乎确实成功地在全国建立起了一个地下通讯网，这个通讯网在英格兰中部和北方的部分地区还顶住了亨特的抨击。[40] 曼彻斯特政治联盟因“亨特及其私党”拒绝支持建议举行的集会而感到垂头丧气。修改过的计划要求伦敦、西苏格兰、兰开郡、约克郡、伯明翰和陶器区等地的“地下组织”的代表在议会重新开会之时在诺丁汉聚会，并使这个秘密会议成为永久性的起指挥作用的“执行委员会”，一旦人身保护法被中止就能号召各地同时集会。因

[40] 仅有两三千人在11月的第一周出席了由200人委员会在史密斯菲尔德召集的一次集会，西斯尔伍德和普雷斯顿在会上发表了演说。然而，到会人数甚少，究竟是因亨特两周前的抨击还是极端恶劣的天气所致目前尚不清楚。见《独立辉格党人报》，1819年11月7日。

为亨特的激烈反对，这些计划流产。[29]

虽然西斯尔伍德的行为被人们指责为愚蠢，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实在是出于极端的愤怒，全国的激进派领袖们对六项法令（12 月在议会匆匆通过）的反应从根本上说是软弱无力的。 699
11 月初，科贝特已结束了他的流亡生活，他在利物浦上岸并受到兰开郡人民凯旋式的迎接。由于久离英国，科贝特已失去了正确的判断，他根本不想领导一次工人阶级的起义，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手足无措的人。在利物浦，他宣称自己带回了最伟大的英国人之子——汤姆·潘恩的遗骨。然而（结果表明）科贝特所敬重的并不是潘恩的共和主义思想，而是货币改革的主张。《纪事》一会儿向公众说大话（"大众有权武装自卫"），一会儿又给他们浇冷水："我真诚地希望人民会完全信赖举债。"这位"掘洞者"会以自己的效力摧毁腐败的旧制度，而无需人民费力：

> 让鳟鱼筋疲力尽，我们只需稳住鱼竿、鱼线和鱼钩，这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六项法令通过后，他提出一项宏大崭新的建议，来"为我国的权利和自由进行斗争"。该建议要求建立一项用于改革的约 5000

---

[29] 这一说法基于多方面的资料，载内政部档案，第 42.198 号和 199 号；A. B. 里奇蒙前引书，第 181—184 页；J. E. 泰勒前引书，第 134 页；《自由帽》，1819 年 10 月 13 日和 12 月 15 日；《共和报》，1819 年 11 月 12 日；宾将军致威灵顿的信，1819 年 10 月 28 日，载《威灵顿快件》，第 1 卷，第 84 页；亦见 D. 里德前引书，第 147—150、155—158 页。曼彻斯特领薪水的治安法官诺里斯曾把极端激进的曼彻斯特政治联盟的书记 W. C. 沃克（此人品性恶劣，有"两个妻子"，为此曾在一次会议上引起轩然大波）看做是"这一地区的西斯尔伍德"。不过博尔顿的弗莱彻中校和西德默斯勋爵更了解详情。一份内部文件证明，沃克（他内定为诺丁汉"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之一）大概不是别人，正是弗莱彻中校雇佣的"阿尔法"。沃克（"阿尔法"曾以某种自负的口吻通知弗莱彻说）"已经建立了最有用的关系并为警察巧妙地提供了证据"。见"阿尔法"致弗莱彻的信，1819 年 11 月 15 日和 17 日，载内政部档案，第 42.198 号，还可以参见 D. 里德前引书，第 157、218—223 页。

英镑的基金，筹集的方法是由每个改革者和工会会员都捐出两个便士，然后“把这笔钱存在我这里”：

> 当然只能由我来使用，而且不受任何人的检查和控制；任何人都无权询问这笔钱的用途……我也不会对任何人讲我打算如何使用这笔钱：我不回答任何问题……。[10]

六项法令似乎是1795和1817年法令的集中体现和发展。第一项法令禁止操练和“军事”训练；第二项法令规定，一旦怀疑藏有武器，治安法官就可以不用搜查证进入并搜查住宅；第三项法令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不过也有某些例外（郡和教区集会）和附加条件（旨在镇压激进主义的演讲集会）；第四项法令（这在其后12年中非常重要）增加了期刊出版物的印花税，使之达到6便士和6便士以上；第五和第六项法令均旨在扩充和促进当

700 局的权力，尤其是在对付煽动诽谤罪方面。[11] 惟一没有再次利用的镇压措施只剩下中止人身保护法这一条了。随后，政府便在法庭上发动了英国历史上最持久的迫害运动。到1820年夏，亨特和4位曼彻斯特改革者（被控参与彼得卢事件）以及伍勒、伯德特、查尔斯·沃尔斯利先生、J.哈里森牧师、奈特、卡莱尔、埃德蒙兹、罗·约翰斯顿、巴格利、德拉蒙德、米切尔等人均被监禁。在此之前，“煽动性”和“漫骂亵渎”的报刊就遭到了大规模突袭，

---

[10] 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19年11月6日和12月5日，1820年1月6日。那笔基金筹集了几百镑，而且大部分都被科贝特在1820年在考文垂争取候选提名的过程中花费了。科尔在《科贝特生平》第242页中对这一政治上的可耻事件作了一定程度的掩饰。

[11] 有关这方面的有用总结可参见哈勒维前引书，第67页以始，杰夫森前引书，第2和502页以始；麦科経前引书，第20章。关于出版界的迫害情况可参见下文，第720—726页。

几十例针对出版商或报纸经销人的迫害均系私人迫害团体所为，或是依照即决裁判权处理的。阿瑟·西斯尔伍德最终被当众绞死了。

6. 卡图街密谋

1795 年的两项法令至少是在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的情况下通过的（福克斯本人甚至也放下架子在示威集会上发表过演说）。1819 年 12 月，亨特、科贝特、伍勒或伯德特应该可以使伦敦、英格兰中部、北方和苏格兰的街道上也充满游行示威的人群。[61]不难推论，激进派领袖们自己对工业中心城市中他们的追随者的品性也是感到不安的。亨特匆匆忙忙地同极端分子断绝了交往，并避免参加任何可能给他即将面临的审讯造成不利的活动。科贝特则教导他的读者用烤麦代替咖啡以及以水代酒的优越性。1820 的 1 月 22 日，他终于公布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建议"女士们发起节酒、节俭和抵制赌博"的运动。[62] 战后民众运动的最后一个片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

有关阿瑟·西斯尔伍德和卡图街密谋者的情况我们所知不多。[63] 西斯尔伍德是位绅士，他遭受过多种不幸，这大都（似乎是这样）是由他自己造成的。凡是被控犯有两次叛国罪的人大 701

[61] 见联盟的评论：《一部崭露头角的新刊物》(1831)（约翰·赖兰兹图书馆，R. 106147)："1819 年，政府的安全完全归功于亨特先生的克制态度。"

[62] 《政治纪事报》，1819 年 12 月 4 日，1820 年 1 月 22 日。

[63] 在这一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发掘。约翰·斯坦厄普的《卡图街密谋》(1962)一书在人们所熟知的"神秘故事"传统方面是很有趣的。该书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爱德华兹所起的挑拨作用，其证据取自内政部档案，第 44.4—6 号。然而，该书并没有提供这次密谋的多方背景，而且有关人物的生平细节大多取自报刊上的敌意报道以及 G. T. 威尔金森对审讯的记载。有几份背面署有"西斯尔伍德文件"字样的文件还有待于人们从内政部档案第 42 号和 40.7—10 号中进行研究。

多不愿意像西斯尔伍德在 1817 至 1818 年以及 1820 年第二次和第三次自陷危境。他的勇气中三成以上是蛮干;不过埃米特或“复活节起义”的那些人也是如此。他死后报刊上发表的那些粗鄙下流的有关他的生活传记已成为盖棺定论之说,而且在当今的作品中仍然有所体现。[20] 然而这个问题至少可以说尚未证实;而且这也和他在绞架上的行为不相吻合。乔治·博罗也许是把秘密社会的口头传说理想化了,在他看来,西斯尔伍德是“老激进分子”中的一员——“一位英勇的战士”,“曾作为军官在法国服役,并立过战功”,还是“欧洲的优秀剑手之一”。他“从不同别人开战……除非是为了保护弱者和被辱者——他心地善良、襟怀坦白,但过分天真单纯……”。“啊,那些家伙差不多都这样!”[21]

我们很难毫不保留地接受他的敌人以及博罗的那些见解。他无疑是个“老雅各宾”和彻头彻尾的共和主义者。而且,当他的众多朋友在新闻报刊上和群众中长篇大论振振有辞地谈论共和主义思想时,人们反倒认为他比较沉默,只是关注实际的组织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应该了解这样一个人所面临的困境。11 月初在“白狮酒家”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个奸细报告西德默思说),沃森医生告诉委员会“他本人同乡村的通信已中断,原因是他们支持了亨特”。这一次“西斯尔伍德是同斯皮特菲尔兹的

---

[20] 例如,在 R.J.怀特前引书第 199 页中,他被比做“凶恶的流浪汉”支持的“超级卖国贼”;斯坦厄普先生也提到西斯尔伍德患有“精神病”性质的“心理变态症状”(第 28、57 页)。事实上,在 1819 至 1820 年,这些具有临床精确性的形容词只能用在卡斯尔雷勋爵身上。见 H.M.海德:《卡斯尔雷勋爵的奇怪之死》(1959)。

[21] G.博罗:《吉卜赛绅士》,附录,第 10 章。博罗还谈到西斯尔伍德失去财产并不是(像某些粗鄙下流的描述所说的)因为赌博,而是因为他自己不动脑筋把钱借给了一个朋友。

织工站在一起的"。[23] 按照另外一些说法,西斯尔伍德本人被亨 702
特的指控即他是奸细深深刺伤了,痛苦之余,决心以某种大胆的举动来消除对他的伤害。当六项法令正在议会通过时,他又重新建立了一些地下团体,主要是在约克郡和格拉斯哥。[24] 到12月,卡图街密谋已在酝酿中了。

即使就某些细节而言,卡图街密谋也是德斯帕德和矿泉地事件的翻版,不过是更加轻率、更加激烈、更加悲惨。西斯尔伍德认为他自己有责任把国家从镇压中拯救出来。一旦在伦敦塔、英格兰银行、议会或王宫的第一枪打响,就等于发出了信号,(他坚信)那时斯波特菲尔兹、矿区、史密斯菲尔德就会起义;同时"乡村"也会扫除他们面前的一切障碍。除此之外,西斯尔伍德似乎还向各地的密使发过誓,保证伦敦也会以这种方式行动。他的行为是鲁莽的,在1820年1月和2月的行动简直就是头脑发昏,这种鲁莽是出于绝望。他焦急地(他本人陷入了极端贫穷的境地)在伦敦极端激进分子中以及信奉自然神教的工匠、工人和小商人中活动,这些人阅读并赞成托马斯·戴维森的《美杜莎》或肖特的《神学彗星报》并赞成其观点。这两份报刊急迫地盼望以流血手段推翻国王和教士的统治。[25]

有许多人热烈地欢迎起义的主张,特别是鞋匠已作好了准

---

[23] 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I.S"的报告,1819年11月10日。

[24] 主要参见A.B.里奇蒙前引书,第183—184页。1819年12月23日,9名兰开郡秘密组织的代表被捕,大概是被"阿尔法"告发的。见《独立辉格党人报》,1820年1月1日。

[25] 例如,《神学彗星报或理性的英国人》1819年8月28日称:"致曼彻斯特的嗜血猎狗"——"你们不是非常虔诚地倾向于极恶的刽子手摩西的残忍和屠杀行径……吗?"

备，他们的工会实际上是雅各宾组织，[26] 1798年起爱尔兰人据说曾于11月在伦敦戴维森的店里聚会并"力图再次煽动爱尔兰的下层阶级起义"。[27] 此外，还有些人提出如何进行第一次攻击。乔治·爱德华兹是位差劲的美术家，他曾为卡莱尔制作一尊潘恩的半身像，而且他还是斯彭斯团体的一位前任书记的兄弟，703 他的建议特别多。西斯尔伍德在接受死刑判决之前的挑战性的发言中宣称"他提出了"

> 一项炸毁下院的计划。这并不是我的主张：我只想惩办犯罪者，因此我拒绝这点建议。他随后又提出我们应该在西班牙大使举办的庆祝宴会上袭击大臣。我坚决反对这一建议……这次宴会邀请了女士——连我这种就要上绞架的人当时都对这个主意感到毛骨悚然，因为政府的代理人先前在曼彻斯特给了人们一次教训……。

"爱德华兹也别出心裁，他最后提议在内阁成员的晚餐时发动袭击"。他们在好些个房间以及在卡图街的一间阁楼里开过会。屠夫詹姆斯·英格斯很有些跃跃欲试异想开天，他为自己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着迷了，（根据这项计划）一旦进入那幢住宅，撞开内阁成员晚餐的房门："我就说，各位大人，我带来了一群群像曼彻斯特义勇队一样勇敢的士兵——进来吧，公民们，各就各位。"他们计划把卡斯尔和西德默思的头挑在矛尖上——在城市里张

---

[26] 鞋匠中的雅各宾传统源于托马斯·哈迪和约翰·阿什利（两人均为伦敦通讯会的书记），后来历经查尔斯·彭德里尔（以及德斯帕德的其他朋友）和达文波特（斯彭斯派），到极端激进主义者普雷斯顿和沃丁顿。卡图街密谋者中多数是鞋匠和靴匠，中、西伦敦分部决定各自拿出50英镑作为辩护费（《独立辉格党人报》，1820年3月12日）。

[27] "I.S"的报告，1819年11月15日，内政部档案，第42.198页。

贴“临时政府”的宣言——对伦敦塔和伦敦市长官发动小规模的佯攻。随着建议中的袭击时间的逼进，西斯尔伍德似乎只是抱着冒死一拼的荣誉感了。必须发动一些进攻，他说，“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弃所要干的事，一旦你们动手，那就是另一次德斯帕德事件。”

这项计划当然早就为那些头脑人物所预知，而该计划就打算把他们的首级挑在矛尖上游街号令示众。甚至连《新泰晤士报》也在广告上宣称内阁晚宴是一个骗局。密谋者均被及时逮捕，当然这当中并不是没有小冲突，西斯尔伍德就在冲突时从一个巡捕的手中逃脱。这些逮捕造成了轰动，这正是政府为证明六项法令的正确性所需要的，而且还帮助他们赢得了大选。[29]当审讯开始(4月中旬)以及爱德华兹的煽动作用被揭露后，轰动效应也就逐渐消失了。

西斯尔伍德和他的同伴们在审讯过程中和绞架上都表现出勇气，甚至还保持了气势。(西斯尔伍德仅有的幻灭感似乎在审 704 讯前数周内，当这些刑事被告从伦敦街头走过而伦敦大众并没有营救他们时才开始产生。)除戴维森(牙买加“有色人”，同卫斯理有些关系)之外，所有的人好像都是自然神论者，而且都拒绝了监狱教士的慰藉。不只一个被告在等候判决时写下了蔑视当局的诗句：

暴君，对你的残暴穷人害怕
你剥夺他们的权利
提高肉食和面包价格
因而使他的劳力竭尽疲乏。
你们永不劳动，从没有辛苦

---

[29] 见麦科比前引书，第366页。

却能佳肴美酒饮宴摆谱

你们从不耕耘培土

更想不到穷人嗷嗷待哺……

詹姆斯·英格斯写信给他妻子说:"亲爱的西莉亚",

按照法律我必死无疑,只得把你留在这个充满腐败的国度了,正义和自由已从此地逃到了遥远的彼岸……。亲爱的,我希望你记住,导致我上绞架的是一种纯洁的动机,我想为忍饥挨饿的同胞兄弟、妇女和儿童效力……。

鞋匠约翰·布伦特判决前在法庭上"非常勇敢豪放而且大大方方地"宣称,

他过去能以自己的勤劳每周挣到约3至4英镑,只要是这样,他从不参与政治;然而当他发现自己的收入降到每周10先令时,他便开始观察周围……。他发现了什么?哎呀!那些处心积虑的当权人物聚在一起掠夺国家并使人民挨饿。他把曼彻斯特交易场视为最恐怖的地方……他加入了为公众谋利益的密谋活动。他不是那种会中途洗手不干的人。他决不是,他会一直走到底的……。他会像古代不列颠人的后裔一样去死……。

西斯尔伍德在绞架上以他浓重的林肯郡口音宣称:"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记住,我是为自由事业而死的……"。科贝特在一篇动人而朴质的记述中还提到了托马斯·莫尔。目睹过行刑过程的霍布豪斯,在其日记中写道:

705

"那些人像英雄一样就义。英格斯或许是因唱"要么死亡要么自由"时嗓门太大,西斯尔伍德说,"安静点,英格斯,我们能够无声无息地死去。"

大众被拦在离绞架很远的地方，这就使任何营救计划无从实施，同时也使人们无法听到临终遗言了。当被害者的头被展示时，民众狂怒了——"聚集的民众发出的喊声和咒骂声简直无法想象"。[22]

"旧激进主义"就这样结束了，就其特色而言，它是18世纪90年代的雅各宾主义在19世纪的延续。（参与卡图街密谋的鞋匠们是最后一批使用"公民"和其他雅各宾术语的人。）我们力图对这样一种习惯说法作一点小小的修正，即卡图街密谋者是一伙罪恶的无赖。西斯尔伍德使他的追随者们暴露于一种明显的挑唆阴谋中，他这样做当然是愚蠢的。（"我就像一头被驱赶到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卖的公牛"，英格斯在受审时破口大骂："西德默思勋爵在两个月前就知道这一切了。"）他的计划——夺取大炮和军械库，大烧兵营以及在伦敦市长官建立临时政府——无异是胡思乱想。他还从罗马时代那些为诛戮暴君行为辩护的人那里找到他的阴谋计划的正当理由。在审讯中他宣称"当局在曼彻斯特对人民犯下了叛国罪"：

> 布鲁塔斯和卡西亚斯因杀死了恺撒而受到崇高的赞誉；[23]的确，当任何个人或一批人把自己置于一个国家的法律之上时，除了暗杀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伸张正

[22] 西斯尔伍德、英格斯、布伦特、蒂德和戴维森于5月1日被处决，其他5人被流放。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取自G.T.威尔金森著前引书，随处；H.斯坦普：《卡图街密谋》，尤其是第6章（关于爱德华兹的角色）；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20年5月6日，R.F.韦尔穆思前引书，第71页；《独立辉格党人报》，1820年5月7日；布劳顿勋爵：《漫长一生之回忆》（1909），第2卷，第126页；E.艾尔默：《乔治·爱德华兹自传》（1820）。

[23] 布鲁塔斯和卡西亚斯是公元前44年刺杀罗马独裁者朱利乌斯·恺撒的阴谋集团的两个领袖。同年9月，该集团同恺撒一派的屋大维等人作战，因战败而先后自杀。——译注

义的。

然而，即使某个类似卡图街密谋的行动在直接的目标方面取得了成功，也很难看出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也许在几天之中会发生更大规模更为血腥的"戈登暴动"；随后极有可能是"白色恐怖"，在10多个英格兰和苏格兰城镇重新发生"彼得卢"。西斯尔伍德一直没有看出莎士比亚通过布鲁塔斯的嘴所表达的

706 讽刺：

> 屈身吧，罗马人，
> 让我们把双手浸在恺撒的血中
> 一直没及肘，把剑也弄脏，
> 然后走向广场，
> 一路高高挥开带血的刀剑，
> 齐声高呼"和平、自由、解放"。

然而，那些与西斯尔伍德一同受难的人（他们最有资格批评他的愚行）似乎还以极大的忠诚去追随他。苏珊·西斯尔伍德似乎也不是一个猥琐小人，而是一个勇敢的雅各宾分子。她冷静聪慧，随时准备积极参加辩护。[49] 卡图街密谋在多大程度上同真实存在的全国性计划有联系，目前尚不清楚。密谋者被捕之后很快发生了3起未遂起义——一起在格拉斯哥，另外两起在约克郡。格拉斯哥附近的几小批织工在4月5日和6日举行了起义（他们的著名旗号"苏格兰不自由就什么也没有"），他们在"邦尼米尔战斗"中同军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有3个人被处死。一个是詹姆斯·威尔逊，此人系"老雅各宾分子"；另一个

---

[49] G.T.威尔金森前引书，第73—74页；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20年5月6日；班福德前引书，第299页。

是基尔·哈迪[28]的祖先。这两人都是通过自学具有非凡造诣的人。[29] 暴动者们似乎相信他们是按照计划同苏格兰、约克郡、兰开郡、卡莱尔以及所有织工聚集地的织工同时起义的。

6 天前(1820 年 3 月 31 日)哈德斯菲尔德附近的纺织业村庄已经出现了踌躇不定的活动。如往常一样,深深卷入其中的通常都是些剪绒工。彼得卢事件之后出现了数十个俱乐部。订阅的报刊有《黑矮人报》、《自由帽》以及《曼彻斯特观察家报》。一名参加过示威活动的剪绒工,他扛的旗帜上写有下列字样:"起来吧,不列颠人,维护你们的权利:感到危险的狮子醒来了。"他供认说,起义曾计划在 11 月举行,"因为对曼彻斯特事件进行的调查没有按照他们的愿望进行"。他们散发写有"民"字的半张卡片,起义的信则是传送写有"主"字的另半张卡片,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政府"。随着烽火的升起,200 名手持长矛、干草叉和枪支的暴动者集合了,仅仅是因为另外几队人马没有露面他们才散了伙。4 月 11 日夜,在巴恩斯利附近的格兰奇荒地发生了最后一次未遂行动。在这个城镇的亚麻织工和矿工中有 40 或 50 个激进"小组",由一个总的代表委员会来联系,在此之上还有一个 7 人秘密委员会。他们在会上讨论的主题有:

> 对穷人的压迫、税收和国债以及对生活必需品的税……还有大臣的腐败,每年在大臣身上、养老金和各种官爵上要花费多少民脂民膏。

巴恩斯利的激进派预计整个北方和英格兰中西部都会在同一天夜里起义。他们准备向格兰奇进发,在那里同其他各路人马会

707

---

[28] 哈迪(1856—1915),工人领袖,是苏格兰工党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29] 彼得·麦肯齐:《揭露在格拉斯哥采取的密探手段》(格拉斯哥,1832),第 71—232 页,及《詹姆斯·威尔逊审判案》(格拉斯哥,1832),A. B. 里奇蒙前引书,第 184 页。

合，然后出发：

从巴恩斯利到设菲尔德后到伦敦又据说苏格兰人会像我们一样很快到达利兹，即使比我们迟到也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

大概有300人集合，他们带着鼓、武器、行军粮袋（3天的口粮）以及一面镶着黑边的绿旗，上面写着"该杀的致死者必定被处死"。带队的是两个退伍士兵——康斯蒂弗（"滑铁卢战士"，"称职的习字教员"）和艾迪（带一顶象征性的白帽）。他们艰难地向着格兰奇荒野方向走了12英里，在路上还裹挟了几小批人。他们深更半夜一两点钟才到达那块集合地点。他们在那里等了一些时候之后，队伍中就流传起关于政府阴谋的谣言，接着他们就垂头丧气地四散而去。康斯蒂弗、艾迪以及另外好些个人都因这两次未遂行动被流放。

在工业区到处流传着一些谣言。一位伯恩斯利织工在日记中（4月7日）写道："听人说苏格兰人会很快侵入英格兰并加入英格兰激进派"；但10天之后他写道：3个极端激进分子"离开了我们国家，尽管有人说他们要到海外，但他们的去向仍然是谜"。4月14日，一名叫做约瑟夫·泰亚斯的织工在哈德斯菲尔德附近被捕，在他妻子的帽子里发现了一封他写给"我们兰开郡的兄弟"的信：

708

亲爱的弟兄们——

身陷囹圄是痛苦不堪的，但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身体健康……我们的乐队在约克郡演奏过两次，而你们的乐队在兰开郡连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们的乐手都病了吗？……

忧郁、悲伤、凄惨的约克郡，你们的改革者矢志不移……约有300人在格兰奇荒野，他们整夜行军，人人

> 带着毛毯、长矛或枪(枪),而且装满了弹药。可怜的人们受那些目光短浅之辈的欺骗太甚。如果你们看见那些勇敢的人在走了 12 英里路程之后还在那个阴雨绵绵的夜里严阵以待,你们就会为之感动。结果没有一个人按照约会同他们会合。他们把所有的矛杆都留在那里。除了三四支上得太紧的矛头之外所有的矛头都被拔掉,那些可怜的人击鼓拍胸直到天亮前还保持着振奋的心情,但没有别的人马加入他们。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在返回巴恩斯利的途中他们所能想的只是已经没有别的指望了。他们都开始落泪,非常伤心,悲痛欲泣……

那封信最后说:"我希望我们也许还能携手同声再次会合……。"[24]

《曼彻斯特观察家报》发出忠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诫我们的……同胞不要听信任何……来自外地的伪称代表某种权力机构的陌生人的话。"[25] 卡图街密谋再次使改革者们想起了奥利弗事件的教训。随着集会被禁止和出版物被焚烧,政治团体开始分崩离析。随着这一情况的出现,又发生了另外两件事并改变了运动的性质和方向。首先,从 1820 到 1825 年出现了几年普遍繁荣,物价降低,就业比较充分,削弱了激进主义愤怒的势头。与此同时那些幸存的激进撰稿人(几乎是出于一种解脱)决定开始一项新的事业——为卡罗琳王后的荣誉和王权大肆疾呼。卡罗琳王后因行为不轨而成为乔治四世想要排除的人,她

---

[24] 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 11.4131 和 3573 号;皮尔:《斯彭河谷》,第 262—264 页及《卢德派起义》(1888),第 313—319 页;贝内特:《伯恩利史》,第 3 卷,第 380 页;内政部档案,第 40.11/12 号。

[25] 《曼彻斯特观察家报》,1820 年 4 月 15 日。

也是“律师绿色文件袋”的最后一个牺牲品。我们不必去探究王后事件中的空话，这件事把激进运动的(也包括保王派的)每一个弱点都显露无遗。它的得意之处(在激进派看来)在于它使腐败的旧制度陷于最荒唐可笑和被动的境地，它使激进主义的演讲、净谏、抗议和请愿能够以捍卫荣誉、正义以及“真诚依恋王权”的名义来进行，它也使霍恩和克鲁克香克能够写出一些他们的最为得意的讽刺诗文。在整个1820年，科贝特的《纪事》周复一周地完全致力于为王后辩护。布鲁厄姆、科贝特和伦敦市参事员伍德为王后处理事务，甚至还替她写回信以答复人民的致函(这些信函也可能是他们写的)。就连极端保王的《约翰·牛》也有正当的理由认为：“她同在她之前的亨特一样完全成了激进派的领袖”：

> 这些高谈阔论、摇唇鼓舌、盲目轻率专门制造混乱和骚动的人并不关心王后，他们对亨特也是如此。她被用作升起革命的自由帽的竿子。伯德特一度成了竿子……亨特是王后之前的最后一根竿子；现在王后陛下确确实实被造成了名噪一时的红帽母亲。[29]

然而，挂在王后头上的已不再是“革命的自由帽”了，这顶帽子早已在彼得卢卡图街之间的某个地方丢失。实际上，布鲁厄姆、伍德和霍布豪斯在鼓动运动中的崛起，是19世纪20年代新运动形成的预兆，指导他们的是中等阶级功利主义者和较年轻的辉格党中的一派。[30]

对英国政治传统具有最持久影响的事件也许既不是卡图街

---

[29] 《约翰·牛》，1820年12月24日(引自麦科比前引书，第354页)。

[30] 关于卡罗琳王后的事件，见切斯特·纽：《亨利·布鲁厄姆生平》，第8章；哈勒维：《自由主义的觉醒》，第80—106页；麦科比前引书，第20章；科尔：《科贝特生平》，第16章。

密谋也不是六项法令，而是彼得卢事件，因为人们在它的短期反响之后，不能感到它的较长期的影响。首先，它促使中等阶级改革家和辉格派注意到他们失去对无代表权群众的影响后所产生的结果。甚至连威尔伯福斯也认为某些温和派改革者或许应该站出来"解救受亨特和西斯尔伍德这类人控制的人民大众"。[39] 1819 年的喧闹沉寂下来之后，中等阶级改革运动采取了更坚定的姿态。其次，战后的宣传鼓动动摇了旧制度自身的信心，某些1819 年的保王党人在 19 世纪 80 年代愿意承认有限让步的必要性，于是就发生了曼彻斯特义勇队的伯利中校也在 19 世纪 20 年代为把议席从腐败选邑转交给曼彻斯特而斗争。[40] 像皮尔这类人也开始逐渐相信为了对付工人阶级，产业势力和土地势力之间必须建立某种联盟。

710

然而，彼得卢事件第三方面的经久影响远在于它所引起的纯粹恐怖。在 1819 年，保王派的行动还能从本阶级中赢得许多辩护者。10 年之后，这一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甚至在乡绅的记忆中也成了一种罪孽。后代人把彼得卢事件作为一次大屠杀来看待，这一事件引起了公愤，我们可以说，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编年史中，这次大屠杀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一次胜利。就连腐败的旧制度也从心里意识到它再不敢这样干了。既然这个民族的道德舆论宣布践踏和刀劈毫无武器的民众为非法，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应该是——获得公众集会的权利是不言而喻的。当局日后也许会用马队或暴力驱散罢工者或农业工人，但自从彼得卢事件之后，他们再也不敢对英国和平民众使用那样的武力了。就是在处理"活塞暴动"(1842)和流血星期日(1887)事件

---

[39] 威尔伯福斯：《传记》，第 5 卷，第 37 页。

[40] 见 D. 里德前引书，第 11 章。

时，他们也是小心谨慎地加以控制的。8 月 16 日那在最异常的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圣彼得广场，而是晚些时候发生在从曼彻斯特出来的路上。塞缪尔·班福德急切地寻找妻子之后又朝回家的路上走，见到有数百人混乱地朝山地方向涌去。在哈珀海他追上了一大群来自米德尔顿和罗奇代尔的人：

我重新和同志们在一起了，我们近千人排成队，伴着笛声和鼓点声出发，还挥着我们惟一的一面旗，我们就是以这种形式重新进入米德尔顿城区的。

第十六章　阶级意识

711

1. 激进文化

当我们把19世纪20年代前的激进主义时期同其后的宪章运动时期作一对比就会发现，19世纪20年代这10年似乎令人奇怪地平静——温吞吞的繁荣状态下的社会太平。然而多年之后一名伦敦小贩告诫梅休说：

> 人们以为一切平静，万物也就停滞了。但实际上，宣传运动一直在继续进行着。正是在一切平静的时候，种子开始发芽成长。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推行他们的主张。①

在这些平静的岁月里，理查德·卡莱尔一直在为出版自由而斗争；工会力量在成长壮大而且反结社法也被取消了；理性思想、合作社实验以及欧文理论都在发展。在这些年月里，个人与团体都力图把我们曾描述过的两方面经历——工业革命的经历以及大众激进主义的暴动和失败的经历——上升为理论。在这10年快结束时，腐败的旧制度和改革之间展开了决定性斗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讨论劳动人民对其利益的意识以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状况。

把这些年的大众激进主义描述为一种思想的文化是有道理的，自修者的明确意识首先是一种政治意识。19世纪上半叶，

① 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22页。

大多数人的正规教育并没有超出读、写、算的范围，但这决非思想萎缩的时期。在城镇，甚至在村落，自修者的热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具有初步阅读能力的散工、工匠、零售商和职员以及小学教员以几个人或小组的形式一直在自己教育自己。他们的书籍和教员常常是宣传改革的。一个通过读旧约全书而学会识字的鞋匠，会苦读《理性时代》；一个小学教员所受的教育几乎全是宗教训戒的，现在则试着读伏尔泰、吉本、李嘉图的书。各地的激进派领袖、织工、书商和裁缝都有大量的激进主义刊物，而且还在学习如何使用议会蓝皮书。目不识丁的劳工则每周去酒馆听别人宣读科贝特的编辑信件并且参加讨论。

712

工人们就这样超越了自身的经历，他们借助于自己含辛茹苦所获得的不规范的教育，形成了有组织的社团，这是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他们学着把自己的生活看做是定义并不严密的“勤劳阶级”与未经改革的下院之间全部斗争史中的一部分。1830年之后，定义较明确的一般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意识开始成熟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工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所从事的既是旧的又是新的斗争。

很难概括这个世纪早期的识字率情况。“勤劳阶级”的一端是许许多多目不识丁或者只能写出几个单词或自己的姓名的人；另一端则是具有相当的学识造诣的人。我们应当记住，不识字绝不会不发表政见。在梅休笔下的英格兰，民谣歌手和“顺口溜表演者”仍然生意兴隆。他们顺着大众心情，在人行道表演滑稽戏或在大街拐角朗诵滑稽诗。根据市场状况把一种激进的或反罗马天主教的意思，编人他们的颇有讽刺风格的独脚戏或赞美诗中。[②] 不识字的工人可能会步行数英里去听一次激进主义

② 尤见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252页以始。

演讲，正如他（或另一个人）去体验一次宗教礼拜。在政治动荡时期，没有文化的人还会要求他们的工友朗读期刊上的文章；在职业介绍所里人们还要读新闻；在政治集会上大量的时间都用于读宣言或通过一连串的决议。真挚热切的激进者甚至把他们自己喜欢却又读不懂的著作视为神圣。切尔腾汉的一名鞋匠每个星期日都准时去 W. E. 亚当斯家请他读"费格斯的信"，但却自豪地拥有几本科贝特的书，还把这些书小心翼翼地保存在软皮箱里。[③] 713

最近的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那些年代工人阶级读者的情况。[④] 简单地说，在那个世纪早期，每三个工人中就有大约两个人多多少少有点阅读能力，当然能写的人还是相当少。由于工人中要求自我提高的倾向越来越强烈，同时由于主日学校和日校愈见成效，文盲的数量下降了，虽然在使用童工最甚的地区这种下降被推迟了。但阅读能力是最基本的，发表抽象连贯的议论的能力则绝非与生俱来的；它必须是在克服了几乎是难以逾越的困难——失去受教育的机会，缺乏闲暇时间，不得买蜡烛（或眼镜）——之后才能获得。在早期的激进运动中有时也使用一些观念和术语，很显然，某些热烈的信从者只具有盲目崇拜的意义而没有理性价值。一些参加彭特里奇起义的暴动者竟然把"临时政府"看做是保证较充足的"粮食"供应的政府；此外，还有一份有关 1819 年东北地区矿工状况的描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把普选权理解为普遍受苦……如果一个成员受苦，所有

③ W. E. 亚当斯：《一位社会成员的回忆录》（1903），第 1 卷，第 164 页。

④ 尤见 R. K. 韦伯：《英国工人阶级读者，1790—1848》（1955），以及该作者的文章《早期维多利亚英国的工人阶级读者》，载于《英国历史评论》，第 65 期（1950）；R. D. 奥尔蒂克：《英国普通读者》（芝加哥，1957），尤见第 4、7、11 章；J. F. C. 哈里森：《学习与生活》（1961），第 1 部分。

的人都得受苦。”[5]

目前残存的一些可以证明,19世纪头20年工人的文学成就的资料说明,要对他们的识字状况作出概括是愚蠢的。在卢德运动(除工人外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行动)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无名之作,有自觉地呼唤“面带微笑的自由”的,也有用石灰写在墙上的几乎无法辨认的东西。我们可以举出这两方面的例子。1812年,索尔福德验尸官对一个袭击伯顿工厂的人被枪杀一事作出了“正当杀人”的判决,他因而受到警告:

714

> ……知道你是个该诅咒的献媚者,如果伯顿的恶劣行径是“正当的”,暴君的法律就成了理性的指令。——你可要当心点!即使在地狱之潮泡上一个月也别想让我们忘记这一血淋淋的事实,它只会促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并使人们义愤填膺。[6]

信的结尾用的是拉丁文“卢德作”——这使人想起了曼彻斯特人自己曾夸耀过的一所语法学校(班福德本人曾在那里短期上学)和其他私立学校,工匠的孩子们在这些学校学到的拉丁文还是足够他们署名的。另一份文件是在切斯特菲尔德市场发现的。目的大致相同,尽管作者错字连篇。但多多少少带有更大的说服力:

> 我要通知你有6000人将在4月去你那里然后我们要去炸掉议园(院)且毁掉我们面前的一切劳动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除了英国政府那样的所有杂种但没有关系在普遍知道他们而且是君对(军队)来我们立刻引起这

⑤ 《政治观察家》,1819年12月19日。“临时”(provisional)与“粮食”(provision)、“普选”(suffrage)与“受苦”(suffering)字行相近。

⑥ 另一封信(《伊丽莎致W.R.海牧师》,1812年5月1日)的开头是:“先生,您无疑非常熟悉美国的政治史”;二信皆见内政部档案,第40.1号。

伟大的革命然后全部这些大人物的头都要砍掉。

“诺迪将军”许诺的其他好处是:“我们要拆掉监狱而且我们要在法官睡着时洒(杀)他。”⑦

这两份文件的不同之处(评论家会告诉我们)不仅是在于风格,而且还在于它的感情程度。我们可以假设第一封信是由一个戴着眼镜头发斑白的工匠——皮匠(或制帽工或乐器制作工)写的,他的书架上也许有伏尔泰、沃尔尼和潘恩的著作,而且他还喜爱悲剧作品。1817 年在国家监狱中还有一些来自兰开郡的这一类人,如 70 岁的活版印刷工威廉·奥格登曾在监狱里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尽管我戴着脚镣手铐,但我决心要像处于同一境地的伟大的卡拉塔库斯⑧那样去面对我的敌人。”另一位印刷工约瑟夫·米切尔给自己的女儿分别取名为米蒂拉、卡罗莱娜、科迪莉亚,当他在狱中得知他的第四个女儿出生了便急忙写信给他妻子,建议给这个小孩取名叫波蒂亚。塞缪尔·班福德自己也许给妻子作过更具体的指示:“一个改革者的妻子应该是位女英雄。”⑨ 第二封信(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煤矿工人或乡村织袜工之作。这封信同东北煤田的一位矿工于 1831 年(和他的几个同伴在一次罢工骚乱时闯入煤矿检查员家中)留在煤矿检查员家中的那封打趣的信极其相似:

715

我咋(昨)夜在你家过得很舒服。你离开家一个人在煤矿,我看见你有许多房间,还有大酒窖,里面有大量的葡萄酒和啤酒,我享用了我那一份。我还知道矿上的

⑦ 内政部档案第 42.121 号。

⑧ 卡拉塔库斯:不列颠特里诺文特部族国王,公元 26—75 年时期,其王国在西部有汉普郡、格罗斯特郡等民族。克劳狄乌斯侵英格兰时,他率本族进行抵抗。——译注

⑨ 内政部档案,第 42.162 号;《背毯进军者》,1819 年 11 月 20 日。

一些人有了三四个孩子而他们却住在一间不到你的酒窖一半大的屋里。我不假冒自己懂得很多，但我知道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别。周末我们惟一能去的地方只有酒馆而且要喝上一大杯。我不想冒充预言家，但我知道而且我的许多朋友也知道，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获得知识是为了知道我们的无只(知)。不过我们也是刚刚发现这个道理。你们这些老板和厂主可得小心点，因为你们将不会以你们的方式得到那么多的好处，我们就要得到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10]

舍温写道，"如果圣经协会和主日学校没有产生其他好结果的话，它们至少还有一个好处——教成千上万的儿童读书识字。"[11] 我们可以从布兰德雷思及妻子、卡图街密谋者以及被关在国家监狱里的其他人所写的信中多多少少地看出那些技术工匠的学问见地以及粗通文字的人所具有的文化程度。[11] 约翰斯顿夫人给狱中的丈夫(亲爱的约翰斯顿)——他是个裁缝帮工——写的信大概算得上两者之间的中等水平：

……相信我，亲爱的，从早到晚我或多或少地想着你。我可以向全能的上帝恳求，但这是真实的，我休息的时候就祈求上帝饶恕我所有的敌人并且改变他们的心肠……。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设菲尔德的细木工沃斯顿霍姆给他妻子的信：

---

[10] R.法因斯：《诺森伯兰和德拉姆的矿工》(1923)，第21页。

[11] 舍温：《政治纪事》，1817年5月17日。

[11] 见上文，第666页和704页。

我们的牧师借给我4卷传教纪事，这些书给了我极大的赎罪感，我看到了上帝在遥远的地方所从事的伟大的事业。

写这封信时还遇到一些困难，原因是"眼镜给打破了"。[12] 这些信是在特殊的闲暇状况下写的，我们差不多可以看出沃斯顿霍姆是一笔一划地吃力地写他的信，当他想到"赎罪"这个问题时还停下来请教一个较"有学问的"拘留犯。约翰斯顿夫人可能请教过（也可能没有）一个在许多城镇和村庄都能找到的"专业"书信代笔人，这种人以正规格式代人写信，每次收费1便士。因为即使在有文化的人当中，写信也是一件难得的事。单是邮费就足以使人咋舌，所以只能是很少通信。因为从北方寄一封信到伦敦大概得花1先令10便士，而且我们也知道约翰斯顿夫人和沃斯顿霍姆夫人由于各自的丈夫不在而经济陷入困境——约翰斯顿夫人穿的鞋灌满了水，自从她丈夫被捕之后，她一直没钱买鞋。 716

所有因卡图街密谋而被捕的人似乎好歹都能动动笔。鞋匠布伦特曾用法文为一些讽刺诗润过色，詹姆斯·威尔逊则写道：

事业激励布鲁塔斯
拔剑刺杀惊恐的暴君
事业使勇敢的汉普登为之献身
为此豪侠的格朗特·泰尔敢于藐视
暴君的傲慢和尊严

而另一方面，鞋匠理查德·蒂德则只能拼凑出这样的句子："先

[12] 内政部档案，第42.172号。这些通信者焦急地等待着居留释放，他们知道监狱长阅读过他的信件，因此总是爱在信上插上几句请求宽恕、怜悯以及要努力读书之类的话。

生，在写作方面我是相当差劲的。”[13] 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些人作为“范例”，因为他们从事的政治活动说明他们属于少数紧跟激进刊物的较有意识的人。不过他们的例子也能告诫我们不应低估实际识字水平的发展状况。[14] 工匠是特殊的——他们是自己阶级的知识精英。然而在英国各地还有大量为劳动人民提供教育的机构（虽然“机构”一词对于那些私塾的女教师、工厂残废人或受伤矿工办的每周收费 1 便士的夜校和主日学校来说是过分正规了）。在彭奈恩河谷，织工的孩子们穷得连石板[15]和纸张都买不起，他们是用手指头在沙盘上学着写字的。即使成千上万717 的人在成年之后又失去了读写能力，非国教教会、互助会和工会的影响及工业本身的发展要求也会使这种能力巩固并且提高。机匠业业主亚历山大·盖洛韦 1824 年报告说：

> 我的业务经营方式是制图和作书面说明，缺乏读写能力的人对我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如果一个申请工作的人说自己没有读写能力，我就不再向他提问了……。[16]

大多数工匠行业中的师傅和小雇主都意识到他们的职业需要他们读些书和从事一些计算。

除民谣歌手之外，“常去工人阶级聚居的地区兜售通俗故事、歌谣之类的小册子[17] 以及历书、临终遗言和（在 1816 到 1820 年，此后就时断时续）激进主义刊物。1812 年，有位为“曼

---

⑬ 见 J. 斯坦厄普前引书，第 161—167 页。

⑭ 目前残存的一些最早的工会书信——诺丁汉市档案馆保存的针织工书信——表明他们普遍具有读写能力。见上文，第 535—540 页。

⑮ 石板：用粉笔、石笔在上面练字用的深色薄石片，几十年前在我国各地也给小学生练字用。——译注

⑯ 《有关工匠及机器的第一份报告……》（1824），第 25 页。

⑰ 卡特纳赫的《瑟特尔审讯》，50 万册（1823），《科德的自由及被处死》，116 万 6 千册（1828）。

御斯特辉格派煽动性的印刷商"考德雷和布莱克出去经营的"卖历书者"被地方官逮捕。因为他们发现其售品目录上写着"不要瞎眼国王——内德·卢德永在"。[18] 战后激进主义运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扩大这些成就和提高人们的政治觉醒的水平。早在 1816 年 1 月，巴恩斯利的织工就成立了一个俱乐部，每人每月会费为 1 便士，以便为购买报刊杂志。汉普登俱乐部和政治联盟为建立"读书会"煞费苦心，他们在陶器区的汉利这类较大的中心市镇长期开办了阅报室、阅览室。开放时间从早晨 8 点一直到晚上 10 点。而且还要对那些骂人、说脏话、酗酒的读者处以罚款。此外，他们每晚为读者"朗读"伦敦的各种报纸。按照约瑟夫·米切尔的说法，1818 年，在斯托克波特联盟开办的读书室里，每星期一晚上都有一次各小组领导人会议，星期二是"道德和政治阅读"，星期三是"交谈或辩论"，星期四教授"语法、算术及其他"，星期六是社交晚会，星期日则是成人及儿童等的上课日。在布莱克本，妇女改革协会的会员发誓要"竭尽全力给我们的孩子灌输对腐败、专制统治者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她们的方法之一是使用"一种供妇女改革者的孩子们使用的贬义字母"：B 代表 Bible（圣经）、Bishop（主教）、Bigotry（顽固）；K 代表 King（国王）、King's evil（国王的罪恶）、Knave（流氓无赖）以及 Kidnapper（绑票者）；W 代表 Whig（辉格派）、Weakness（软弱）、Wavering（摇摆不定）、Wicked（邪恶），等等。 718

虽然政府在 1819 年之后采取镇压阅报室（有时是某个激进派书商的商店）的行动，但这种提供阅报室的传统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 20 年代。战后伦敦的咖啡馆大大增多，而且大多兼作阅报室。约翰·多尔蒂著名的"咖啡阅报室"就和他的曼彻斯特的

---

[18] 内政部档案，第 40.1 号。

书店相连，到1833年，这里每周订阅的报纸就不下96种，其中包括非法的"无印花税"报纸。较小城镇和村庄的读书团体虽不正规，但重要程度却不亚于伦敦。他们有时在小酒馆、"黑店"或私宅聚会；有时则在工场里读读期刊并进行讨论。在"知识税"最沉重的时期，期刊的价格极高，这反倒使无数希望买到自己中意的报刊的小组纷纷组成了俱乐部。在热烈讨论改革法案期间，南特威奇的一位名叫托马斯·邓宁的鞋匠同他的工友和"我们的惟一神教牧师合伙订阅《每周快报》，价款为8.5便士，其中4便士为印花税。这对一个收入微薄的鞋匠来说太昂贵了……。"[19]

激进出版物的发行量极不稳定。科贝特的2便士《纪事》其鼎盛时期，即1816年10月至1817年2月其发行量每周在4万到6万册之数，是其他任何与之竞争的刊物许多倍。[20]《黑矮人报》的发行量在1819年约是12000份，不过这个数目在彼得卢事件之后也许增大了。尽管卡莱尔的刊物在20年代的大部分年月里仍能印刷数千册，但此后由于印花税（以及运动衰退），其发行量被严格削减了。在改革法宣传鼓动期间，激进出版物再次大批量发行：多尔蒂的《人民之声报》发行3万，卡莱尔的《挑战者》22000份，赫瑟林顿的《贫民卫报》为16000，而十几种较小的刊物，如奥布莱恩的《毁灭》，发行量也超过1000。在实施印

719

---

[19] 关于激进派的读书室见A.阿斯皮诺尔：《政治与出版物》（1949），第25—28、第395—396页；韦尔穆思前引书，第24—25、第88—89、第97—98、第111—112页。关于邓宁见"回忆录"（W.H.查洛纳编），《兰开郡、切郡考古者协会公报》，第59期，1947年，第97页。关于斯托克波特联盟见，《北毯进军者报》，1819年11月27日，以及D.里德前引书，第48页以始。关于布莱克本，见W.W.金西：《兰开郡激进运动的若干方面》（硕士论文，曼彻斯特，1927），第66—67页。

[20] 1822年，主要日报的发行量为：《泰晤士报》，5,730份；《观察家报》（周报），6,860份。

花税的10年间，价格昂贵的周刊(售价从7便士到1先令不等)的发行量大大减少，这一空白的很大部分为日益增长的廉价书籍和个人小册子所填补。《杰克营造的政治大厦》为10万册，科贝特的《农舍经济》在1822至1828年间为5万册，《新教"改革"史》和《训诫》在1821至1828年间为211000册。同一时期，在大多数中心城市还出现了一种或多种(伦敦是十几种)日报或周报，尽管这些报刊并不宣称自己是"激进的"，但却迎合了广大激进派公众的需要。正是这非常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读者群体的发展，使得这些报刊得到那些有影响有势力的机构(特别是"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和"有用知识传播会")的公认，它们作出慷慨而大量的财务上的努力，奖励读者们转而关注更为有益并处于改善中的事物。[④]

这就是在书摊周围、酒馆、工场和咖啡屋里辩论的文化。雪莱在"致英国人的歌"中所欢呼的那种文化，也是孕育了狄更斯的天才创作的文化。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个"读者群"视为一个单一的、无可分类的群体，那就错了。我们也许可以说当时存在着好些个既互相冲突又互相重叠的不同"群体"，同时又是按不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纯粹、单一的商业群体，在激进主义奋进时，常常利用它(布兰德雷思或西斯尔伍德审讯案同其他人的临终忏悔一样具有市场价值)，但它遵循的是赚钱准则，还有一些多多少少是围绕在教会或技工学校周围的有组织的人们；消极群体是那些改进协会力图争取并予以拯救

④ 我同意R.D.奥尔蒂克前引书，第381—393页提出的数据，只是对《人民之声报》和《挑战者》的发行数量有所怀疑。关于正统出版物的相应数量，见雷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1961)，第184—192页。关于某些刊物企图用安全和改进的主题取代激进出版物的情况，见R.K.韦布前引书，第2、3、4章，哈里森前引书，第1、2章。

的;积极群体、激进群众是在敢针对六项法令和知识税而公然自行组织起来的群体。

W.D.威克沃在《为出版自由而斗争》一书中颇为赞叹地谈

720 到了激进群体为自身建设和巩固所进行的斗争。[2] 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这样为争取出版权利而进行如此尖锐,如此大获全胜,而且同工匠和劳动者的事业尤其一致的斗争。如果说彼得卢事件确立了(以一种矛盾的感情)公众示威的权利,那么,"出版自由"的权利则是通过15年以上或更多年的斗争才赢得的,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愚顽的、残忍的、不可克服的鲁莽行为。卡莱尔(白铁匠,在德文郡阿什伯顿的语法学校受过一两年教育)正确地看出,1819年的镇压使出版权问题成为激进运动的支撑点。科贝特和伍勒则修改了他们的基调以迎合六项法令,他们期待有朝一日再作斗争(其出版物的发行量因此大降)。卡莱尔则不然,他升起官逼民反的黑色船旗,犹如海盗舰上放下来的一艘小船,径直驶入国家和教会联合舰队的中央。由于受彼得卢事件的牵累,他曾受到审讯(因出版潘恩的著作),所有的激进出版物都对他的勇气表示敬意,但又因失败而对他不抱任何希望。当他数年后从监狱里出来时,联合舰队已经溃不成军。他早已使政府耗尽了弹药,并把政府依职权进行的起诉和设立的特别陪审团变成了笑料。他还顺利地搞掉了那些秘密控告团体,如"宪法协会"(或称"桥街帮")和"道德拯救会",两者都是由贵族、主教和威尔伯福斯赞助和津贴的。

---

[2] 他描述的是1817—1832年时期,主要涉及斗争的第一阶段——出版权利——尤其同理查德·卡莱尔有关。斗争的第二阶段,即"成功地取消印花税"(1830—1835)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卡宾特、赫瑟林顿、沃森、克利夫和霍布森等人。但还没有历史学家对此作过系统描述。不过也可参见C.D.科利特:《知识税史》(1933),第2章,及A.C.巴克:《亨利·赫瑟林顿》(无年月)。

当然，卡莱尔并非是靠他个人的力量取得这些胜利的。第一轮斗争发生在1817年，当时有26人因煽动暴乱和亵渎诽谤罪受到起诉；此外还有16人被王室法官依职权而起诉。[23] 这一年的胜利桂冠落到了伍勒和霍恩以及伦敦陪审团（他们拒绝给被告定罪）的头上。伍勒是自我辩护的，他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有些法庭经验，此外在辩护过程中他还显示了自己的能力以及说话夸张的自由主义者的风度。两次审讯（1817年6月5日）的结果是：一次判决"无罪"，另一次胡乱地判为"有罪"（三个陪审员对此表示异议），但后来被王座法庭推翻。[24] 1817年12月对威廉·霍恩的三次审讯是法庭审讯记录中最有趣的一部分。霍恩是个穷书商，曾经一度是伦敦通讯会的成员，因出版亵渎、诽谤性作品（这些作品把《教义回答》、《连祷文》和《教义》模仿成滑稽体裁）而受到了起诉。实际上，霍恩仅仅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倡导人，他倡导的那种政治短文形式在卖报人和滑稽顺口溜表演者中早已根深蒂固，而且各个党派的人物，从威尔克斯到反雅各宾主义的文人还使用过更高级的形式。霍恩本来不想为这些滑稽短文而冒失去自由的危险。1817年2月开始镇压时，他曾试图把这些短文收回，只是由于卡莱尔拿去再版才迫使政府动了手。下面便是这种短文中的一篇：

721

> 我们的主啊，无论你叫什么名字，你总是在财政部。你的权力无限，能在帝国全境奏效，就像在每次议会会议上一样。把平日的面包片赐与我们，并宽恕我们在投票时的偶然缺席。我们保证不饶恕那些投反对票的

---

[23] 威克沃前引书，第315页。那种异常不公平的起诉形式，即依据职权起诉，实际上使得未经审讯即可监禁。见威克沃前引书，第38—39页。

[24] 《对T.J.伍勒的两次审判》（1817）。

人，不要把我们逐出家园，就让我们留在下院里，在有年金和富足的地方吧；把我们从人民的手中解救出来吧。阿门！

霍恩无法弄到1000英磅的保释金，他从5月到12月一直在监狱里，健康状况也很不好。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使内阁成员们特别愤怒，原因是他使内阁成员们背上了他们永远忘不了的恶名："老财"（指大法官埃尔登），"德里沙丘三角"（指卡斯尔雷），"医师"（指西德默思）。当得知霍恩打算自我辩护时，人们对他并不抱多大希望。不过霍恩一直在利用被拘禁的时间收集从过去到现在的其他滑稽文作者的例证。因此他第一次在艾博特法官面前受审时便被判无罪。在其后的两天中，那个年老多病、性格暴躁的高等法庭庭长埃伦巴勒只得亲自出面主持审讯。从一页页的审讯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埃伦巴勒的插话，霍恩对庭长的行为所作的不紧不慢的指责，朗读从各种报刊上挑选出来的滑稽可笑的讽刺诗文以及司法长官威胁要逮捕"我看见的第一个想笑的人"等内容。尽管埃伦巴勒提出了不适当的指控（"……遵从自己的良心和上帝，他宣布这是一起最邪恶的最亵渎的诽谤罪"），但陪审团还是提出了两份"无罪"的判决。结果（据说）埃伦巴勒一病不起了。从此之后——甚至在1819和1820年——各种滑稽作品和讽刺短文就不再受到起诉了。[25]

迫害在嘲笑面前是难以站住脚的。这些年的出版斗争给人们留下两点深刻印象：第一是霍恩、克鲁克香克、卡莱尔、戴维

[25] 《对威廉·霍恩的第二次审判》（1818），第17、45页；《为霍恩捐款的一次公共集会记录》（1818），F.W.哈克伍德著《威廉·霍恩》（1912），第9—11章；威克沃前引书，第58—59页。一位唱顺口溜的老者告诉梅休（第1卷，第252页），虽然几次宣告霍恩无罪，但要在街上"唱"他的滑稽作品还是很难："大量官员和警察会随时出来阻止……那些想讨好大人物的治安人员还会想法阻止他们……。"

森、本波和其他人不是以一本正经、如临大敌的姿态而是带着兴致勃勃的样子捉弄了官方。(这一惯例被赫瑟林顿所继承,他作为无印花税的《贫民卫报》的主编而忙于业务时,伪装成教友派信徒,却装得很不像,但也能几个星期之内在警察的鼻子底下来来往往。)监禁,对一个激进出版商来说并非耻辱而是光荣。一旦出版商们事先决定准备进监狱,他们便竞相想出新招,并用最滑稽可笑的方式吸引对手注意。激进的英国怀着愉快的心情(没有人比黑兹利特更愉快)注视着《瓦特·泰勒》——骚塞青年时期含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作品——在舍温的努力下复活。而骚塞这时是桂冠诗人,他带头鼓吹制止出版界煽动性的放肆行为,并要求当局禁止舍温侵犯版权的行为。埃尔登勋爵拒绝发出这样的禁令,因为法庭不能理会"诽谤性出版物的肮脏利润"一类的财产争端讼事。黑兹利特问道:"那位作为《瓦特·泰勒》一诗的作者正在要求一项针对自己的禁令,同时,他又建议颁布一些针对我们的禁令,并以此通过暴力来弥补他在言论上的亏损,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26] 在另一方面,卡莱尔(他已经把舍温的业务接了过来)在得知禁令被拒绝后就不仅仅是高兴了——因为在他开业之初的困难时期出售这本诗集可以给他带来大宗利润。他在6年后写道:"光荣属于你啊,骚塞!当其他各种政治出版物衰败之时,《瓦特·泰勒》一直是利润的源泉,世人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应该是归功于骚塞的。"[27] 723

非法翻印《梅布女王》和《审判目击记》事件也是这种沸沸扬

---

[26] 《黑兹利特全集》,第7卷,第176页以始。黑兹利特认为骚塞先生不应该要求禁止《瓦特·泰勒》,而是他要求禁止柯勒律治先生的言论那就好了,因为后者曾在《信使报》上为他作过辩护。

[27] 舍温:《共和报》,1817年3月29日;卡莱尔:《共和报》,1823年5月30日。

扬策略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不列颠的君主会像卡罗琳王后[㉘]骚动时期中的乔治四世被用可憎的粗话描写的那么可笑的样子；尤其是在霍恩和克鲁克香克出版的《王权神授说走向错误统治》、《王后的婚姻阶梯》、《不是我的错》和《月中人》中更是如此。同一作者的《捆警察与桥街帮》(1822)以政府资助的《新时代报》的版式面世，并辅之以一个模拟的新闻报戳和一个猫爪图像及一句题词："他对任何东西都要伸出爪子"，此外还有一些假广告和伪造的生卒一览表：

婚姻启示

> 摄政王陛下行将就木的专制政府娶了至高无上衰老不堪的古董小姐，18世纪的愚昧女神。新人的服装华丽无比。

卡莱尔出狱后继续进行斗争，讽刺家们还把起诉他的那些人狠狠地挖苦了一番。

第二，尽管政府的威胁仍然存在，但是争取公民自由权利的人和合法主义者的传统是不屈不挠的。这不仅是因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在霍恩的认捐名单上，从一位辉格派公爵到一位侯爵和两位伯爵都是带头捐款的，这表明统治阶级自身的不安。各次政治审讯中政府司法官员的报告还表明，他们是小心谨慎地安排诉讼程序的，尤其是他们注意到了陪审制度的不可靠性(就他们的目的而言)。按照福克斯1792年提出的诽谤

㉘ 英王乔治四世之妻，她和丈夫一样，丑闻甚多。她与即位前的国王婚后生一女，不久两人分居。她曾被控与人私通，生一女。当时枢密院的一个委员会宣布她无罪。当其夫摄政时，她被排于宫外，寄居意大利，据说与一信差关系暧昧。1820年其夫即位为乔治四世，她不顾劝阻由欧陆回英格兰。英政府提议解除双方婚约，除其王后称号。但经长期听证后，上院将此案否决了。当乔治四世行加冕典礼时(1821年7月1—19日)，她被禁止入威斯敏斯特教堂，19天后病逝。——译注

法,出版行为及有损名誉的行为由陪审团裁决,虽然法官不会设法避开这一条,但实际上终究意味着12个英国人不得不对他们认为的“诽谤”是否已经危险到堪判入狱作出判决。一项失败的国家起诉是对当局士气的打击,这要靠三次成功的起诉才能弥补。即使在1819至1821年间,几乎每一个案子都由政府和起诉团体提出时,[24] 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较好地使用了法律手段以及对陪审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卡莱尔的言语太刺激人,结果使问题由煽动变成了咒骂,我们也不可能把这种情况说成是“集权式的”或“亚细亚方式”专制主义。审讯记录必须传阅,这些记录包括关键的段落,有时甚至是整本书,在法庭上朗读这些文章——被告就是因这些内容而被判刑的。卡莱尔出狱后继续镇定地编辑他的《共和报》;他的一些伙计则在那里编着另一本刊物,以此作为自我提高的手段。1824年,伍勒的《黑矮人报》衰落了,但科贝特仍然在斗争。他在20年代早期确实是相当温和的。他不喜欢卡莱尔的共和主义和自然神论,也讨厌这些学说对大城市工匠的影响,他日益转向农村并疏远工人阶级运动。(1812年,他办了第一期《乡村旅行》,他的天才似乎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合理的形式和内容。)但即使他疏远了工人阶级运动,《政治纪事报》仍然一直存在,而且仍然像《共和报》那样设有专栏,揭露各种迫害事件,从博德明事件到贝里克事件均是如此。

724

这场斗争所带来的荣誉并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约翰·亨特和约翰·瑟尔沃尔(当时已是坚定的中等阶级温和派)属于受“桥街帮”折磨的一类人;查尔斯·沃尔斯利先生、伯德特、约瑟夫·哈里森牧师属于那些因煽动罪而遭监禁的人。不过卡莱尔

---

[24] 3年中共有150项起诉和45起依照职权的指控。

和他的伙计们是属于那种坚定反抗到底的人。虽然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又重新开始了一些起诉，而且亵渎案件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也时有发生，但是激进的斗争到1823年已告结束。卡莱尔的最大罪过是他满不在乎地出版了汤姆·潘恩的《政治著作》和《神学著作》——自从1792年潘恩被缺席审判、丹尼尔·艾萨克·伊顿在战争期间被连续审判之后，"老雅各宾派"在城市的根据地秘密流行的著作其实就已经被禁止了。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别的罪过，随着斗争的发展，他本人也从自然神论转向了

725 无神论，而且更富于攻击性，例如鼓吹暗杀[③] ——无论怎样看，这些都会遭致起诉。几年的铁窗生活也未能使他有所改进。他的力量在于：第一，他甚至不承认失败的可能性；第二，他的背后有工匠文化的支持。

第一点似乎表现得并不明显。事情通常是这样：果敢坚毅的人（如在18世纪90年代）要不是保持沉默就是失败。奇怪的是卡莱尔的那种决心（"舰队街的商店理所当然是不会关闭的"）确实是当局难以对付的，无论他们那一边有多少法律条款的支持，他们总是会因起诉而遭人憎恨。然而，在六项法令下，他们已经授予自己取得了流放犯有煽动罪的作者的权利，而这些人的罪过还远不如卡莱尔所犯的、并自豪地承认过的那些罪严重。甚至在1820年，这一法令的条款也未能得以使用，这说明那个时候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而且合法的思想共识对权力也会产生某些制约。除非把他流放或是砍掉他的脑袋，或者更加现实的是把他单个关起来，否则卡莱尔还是不会沉默的。然而，政府没有实施极端措施也有两个理由：第一，在政府看来，到1821年这些措施似乎已不那么必要了，因为已加重的印花税自会发

---

③ 见下文，第764页。

生作用;第二,第一轮冲突之后,情况已经明朗,如果卡莱尔默不作声,就会有半打新冒出来的卡莱尔取代他的位置。实际上,最先冒出来的两个卡莱尔就是他妻子和妹妹。此后,他的那些"伙计"还会步其后尘。据一项统计,在斗争结束之前,卡莱尔已得到150个志愿者的帮助,这些人是零售商、印刷商、报贩——他们总共为卡莱尔蹲了200年监狱。这些志愿者是应《共和报》的广告而来的,都是"自由的,有能力并愿意在卡莱尔将军的军团服役"的人:

> 务请最充分而明确的理解,为了宣传这些原则并为此目的而牺牲自由……并不是为个人,必是焕发了这些志愿者的动机;因为——虽然R.卡莱尔保证要……用他的力量给这些志士最好的支持——如果一大批人被监禁,他的财产状况或前景是不可能允许他每周拿出任何特别的款项的……[31]

从那时起,舰队街的"理性神殿"就很少有一天晚上没有客人们留宿。前来的男人和妇女情况各异,而且全是不为卡莱尔所认识的。他们仅仅是些伦敦人,或是从林肯郡、多塞特、利物浦和利兹乘公共马车前来的。他们都出自同一文化背景。 726

这种文化不同于织工或太因河畔矿工的"工人阶级"文化。在斗争中表现突出的有职员、店员和一位农夫之子;鞋匠本波后来成了书贩;詹姆斯·沃森,里兹的一位批发商,他在一家干货店"寄放过一匹鞍子马";有剪绒工詹姆斯·曼,他后来也成了书贩(也是利兹人)。这种知识传统一部分是在雅各宾时代形成的,

---

[31] 威克沃前引书,第231页。

他们的圈子曾一度聚集在戈德温和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②]或伦敦通讯会成员的周围，该通讯会的最后一个真诚的发言人——约翰·盖尔·琼斯——就是卡莱尔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这种文化传统的另一部分是新近形成的，其中某些东西应归功于边沁日益增长的影响，还有一些东西应归于"理性思想的基督徒"和惟一神教徒，如本杰明·弗劳尔和 W.J. 福克斯等。这种传统涉及到日报的编辑和萨里技工学校的讲师们当中形成的生气勃勃的亚文化，而那些为爱好文化的《黑树林》所不齿的人——中小学教员、学医的穷学生或公职人员读的是拜伦和雪莱的作品以及《观察家报》，他们所推崇的既不是辉格党也不是托利党，而是经过个人的抽象思维得出的是非曲直。[③]

卡莱尔的个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普遍认为)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但如果据此就给这种文化贴上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标签，那就无助于研究了。这样表述也许更接近于真实：(战争年代中)大体上局限于激进知识分子中的理性启蒙热潮现在已被那些具有福音传道士般的热情的工匠和某些技术工人(例如棉纺工)所继承，他们要把这种文化带给"无数成员"——这种传教士的热情即使在边沁、詹姆斯·穆勒或济慈身上也是很难发现的。为卡莱尔的运动捐款的人在伦敦最多，其次是在曼

②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英国女作家，以争取女权闻名。曾在伦敦书商 J. 约翰逊公司中工作。参加激进团体，与戈德温、布莱克等交往，有《女权辩护》等著作。——译注

③ 见济慈给其兄弟乔治的信，1819 年 9 月 17 日，《全集》(1901)，第 5 卷，第 108 页。信中写道："在我看来，这反倒使书商卡莱尔成了重大事件中的人物。他一直在销售宣传自然神论的小册子，再版了汤姆·潘恩的书以及其他许多含有可怕的异端邪说的著作……。他们终归还是不敢起诉他。他们害怕他辩护；那会在整个帝国的报纸上发表出来。他们为此吓得发抖。审讯会点燃起他们无法扑灭的火焰。你不认为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吗？"

彻斯特和利兹的。工匠文化首先是自学者的文化。沃森在回顾他的铁窗生活时写道："在这 12 个月中，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吉本的《罗马帝国的兴亡》、休谟的《英国史》以及……莫斯海姆的《教会史》，受益良多。"[4] 构成卡莱尔所支持的"研讨会"（以及后来的圆厅剧场）核心的工匠们对传统文化深为怀疑，因为这种文化把他们排除在权力和知识之外，而且还用使人厌烦的说教和小册子来答复他们的不满。启蒙著作则给他们带来了启示的力量。

这样，一个逐渐具有工人阶级特色的读书群体就被迫自己形成了。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头几年就已经出现"御用"报刊和激进报刊并存的局面。到了 20 年代，多数中等阶级出版物挣脱了政府的直接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利用科贝特和卡莱尔过去创造的有利形势。《泰晤士报》和布鲁厄姆勋爵——他也许同埃尔登勋爵一样厌恶"穷人的报刊"（尽管原因不同）给激进主义这一术语完全不同的定义——"自由贸易"、廉价的政府及功利主义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尽管决非全部）他们只说服了激进的中等阶级——教师、医生和店主，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曾支持过科贝特和伍勒——这样，到 1832 年，两个激进群体就形成了：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前者向着反谷物法同盟，而后者的报刊撰稿人和编辑（赫瑟林顿、沃森、克利夫、洛维特、本波、奥布莱恩等）已经在为宪章运动的兴起作准备了。在整个 20 年代，工人阶级报刊一直在印花税的重压下挣扎，[5] 科贝特在这段时间也只是同下层阶级运动而不是同中等阶级运动保持着松散的变

728

[4] W.J. 林顿：《詹姆斯·沃森》（曼彻斯特，1880），第 19 页。

[5] 1830 年，每份报纸或周刊的印花税为 4 便士，广告税为 3 先令 6 便士，此外还有小额纸税和针对诽谤行为的大额保释金。

化无常的联系。两种运动的分界线不再是“改革”策略的不同(因为中等阶级改革者有时也可能在语调上同工人阶级一样革命),而是在政治经济学的主张上不同。1830年农业工人的“起义”成了试金石。当时《泰晤士报》(科贝特称之为“血腥的老泰晤士报”)带头要求惩罚几个起义者以儆戒众人,科贝特和卡莱尔因煽动性作品而再次受到起诉。

反抗的黑旗在1830和1831年又升了起来。科贝特找到了法律中的漏洞,又重新开始出版他的《两便士论文》。但这一次却是印刷工赫瑟林顿率先开始了前沿战斗,他的《贫民卫报》刊登了手工印刷机的标记和“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并把“为了试试以‘权’压‘理’的能力而违‘法’出版”作为报头的标题。他在开篇辞中还引用了他要藐视的法律条款:

> ……《贫民卫报》……将刊载“新闻、消息和事件”及“与此有关的评论和意见”,议论“教会和国家事务”,坚决“激励对本国依法建立的政府和宪法的仇恨和蔑视”,而且也“对贬低宗教的弊端”……

该报还公然蔑视印花税法的每一条款,

> 或任何别的法令,而且不顾法律界、任何暴君或暴君集团的意愿和喜好,也不顾以前任何时候或任何地方发生过的任何事情……不管后果会怎么样。

他在第四期上登出了一份广告,“招聘”数百名没有工作不怕失去任何东西的穷人……将这份报纸卖给穷人和无知识的人,此举不仅征集到了志愿人员,而且还导致了其他几十种非税报纸的出现,其中著名的是卡莱尔的《挑战者》和乔舒亚·霍布森的《约克西区之声》。到1836年,斗争大体上也就结束了,宪章出版物的发行已经就序。

然而,“最大的无印花税报”显然是一份工人阶级性质的出

版物。《贫民卫报》和《工人之友》事实上就是工人阶级全国联盟的机关报；多尔蒂的《贫民辩护士》是工厂运动的喉舌；乔舒亚·霍布赫先前是手机织工，他曾通过自己的劳作制造出一部木制的手推印刷机；布朗台尔·奥布莱恩的《毁灭》，有意识地发展工人阶级的激进理论。这些版面小、排版密并便宜的周报刊登的内容有：这些年中开展的成立总工会的伟大斗争，1834年厂主们搞的停工闭厂，托尔帕德事件引起的抗议活动。此外，这些周报还对社会主义和工会理论做过细致的讨论和解释。我们对这一时期所作的探讨，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把我们带到工人阶级不再处于形成过程而是（以宪章运动为形式）已经形成的时代。我们必须记住的一点是，争取出版自由斗争的程度，对于正在成形的运动具有关键的形成性的影响。或许有500人因印制和销售"无印花税报刊"遭到起诉，[36] 从1816年（实际上是从1792年）到1836年，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编辑、书商和印刷商，而且还有成百上千的报贩、书贩和志愿经济人。[37]

729

迫害事件的记载年复一年。1817年，两个在希罗普郡贩卖科贝特小册子的人被一个身兼牧师的治安法官"按流浪法令命人……予以逮捕……而且还被捆在鞭挞柱上狠抽一顿"，同年在普利茅斯、埃克塞特、黑乡、牛津和英国北部，小贩们也受到这种待遇；1819年，在德文郡的一个村庄，一个卖西洋镜的小贩仅仅因为放了一张彼得卢的图像就遭逮捕和监禁，时间几乎都不超过一年（报贩通常未经审讯就被判处几周监禁，然后又被释放），但这些监禁对于受害者的影响比起编辑们被监禁（这类事曾受

---

[36] 曼彻斯特书商艾贝尔·海伍德声称人数是750。

[37] 为了支持"无印花税报刊"的发行，还组织了一些传播"真正有用的知识"的协会。见《工人之友》，1833年5月18日。

到更为广泛的宣传)更为严重。他们被投入令人厌恶的“感化院”,经常还带着脚镣手铐,一般都缺乏法律知识和辩护手段。除非他们的情况引起了科贝特、卡莱尔或某些激进派别注意;否则,他们的家庭成员就会因为缺乏收入而被迫进济贫院。[38] 在较小的城镇,争取自由的斗争确实是非常艰巨的。在曼彻斯特、诺丁汉或利兹均有激进派的根据地和集会场所,并且准备为受害者提供救助。在有市场的镇区或工业村庄,凡订阅科贝特或卡莱尔报刊的皮匠和教师,(在20年代)都可能受到监视和间接的迫害。(科贝特寄给农村订户的内装《纪事》的邮包甚至经常到不了,原因是在邮局寄包过程中“丢失了”。)在战斗性很强的报刊周围,出现了具有民间特点的销售方式:小贩们(梅休听人说)为了“出售”《共和报》,便兜售草帽,然后把夹在里面的报纸送给他们的顾客。在“无印花税报刊”盛行的年代,人们只须在斯彭河谷某些居民的门窗栅栏里塞进一便士,报纸就会“出来”。在其他地方,人们常在夜里偷偷溜小路或穿过田野到他们自己知道的聚合地,藏在棺材里或是藏在理性思想者的敬神仪仗行列中的“无印花税报”不止一次地从当局的鼻子底下运走。

730

我们可以举出店员和商贩中的两个例子。我们先看一个女店员的例子,这个例子能够告诉我们,在理性主义者和欧文派的团体中,妇女权问题(18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无人提及)已经

---

[38] 威克沃前引书,第40页,第103—104页;《对威廉·霍恩的第二次审判》(1818),第19页;关于罗伯特·斯温德尔斯一案:他被囚禁在切斯特城堡,妻子和婴儿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死去,留下的一个孩子被送进了贫民院;舍温的《政治纪事》(1818年3月14日)曾谈到沃林顿地区的梅勒和皮林的情况,他们被关在普雷斯顿监狱达19周之久,而且还带着重罪犯的脚镣手铐,后来被解到伦敦的法庭受审——他们必须步行200英里才能到达——审讯后又转到兰开郡进行(再往回走200英里)——随后才被释放。

再次被提了出来，而且逐渐从知识分子扩展到工匠中。支持卡莱尔的受到审讯并蹲过监狱的妇女同胞，大多是出于忠心而不是信念。赖特夫人则大不相同，她是诺丁汉的一名花边修剪工，卡莱尔的自愿队员之一，后来因销售卡莱尔的一篇《宣言》而受到起诉。卡莱尔这篇宣言所包含的主张具有他的特色：

> 代议制政府很快看到把教堂和礼拜堂变成科学神殿……把珍爱教士变为珍爱哲学家是一种正当要求。我把国王的花招和教士的诡计视为社会的毒物……，这两大邪恶联合起来破坏人们身心的安宁幸福，可能让我们忘却生活中的苦难。后者还力图用一个永恒幸福的希望，来愚弄我们。

赖特夫人为自己作了长篇辩护，[3] 中间几乎没有人插话。辩护结束时，

> 赖特夫人请求允许她退下去给正在哭的婴儿喂奶。请求被准许了，她离开法庭 20 分钟。当她来回走过城堡咖啡屋时，聚集在那里的数千人向她鼓掌喝彩，所有的人都叫她别灰心，坚持住。

不久，即 11 月的一个夜晚，怀抱 6 个月婴儿的赖特夫人被投入新门监狱，睡觉的地方只有一张席子。像赖特夫人（还有利兹地区的曼夫人）这样的妇女，不仅要面对惯常的起诉，而且还得面对愤怒的保王派报刊的侮辱和暗讽。《新泰晤士报》写道，“这个卑鄙的不知道羞耻的妇人有好几个女性”陪伴，“这种情形还不足以震动每一颗反思的心灵吗？”她是个“放荡的东西”（这是对妓女的惯常称呼），“已经失去了女性特有的廉耻心、畏惧心和端 731

[3] 卡莱尔给他的大多数伙计都准备了长篇的书面辩护辞，她的情况也可能是如此。

庄"。她的"可怕榜样"已经毒害了其他母亲的心灵:"这些具有女性外形的怪物,板着铁石般的面孔,公然出来支持下流粗俗可怕的亵渎行为,这在基督教世界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卡莱尔则写道,"她是一个身体相当柔弱但精神正常并没有问题的妇女。"[40]

报贩中判刑最长的人要算约瑟夫·斯旺,此人是麦克尔斯菲尔德的一名制帽工,1819 年因销售小册子和一篇煽动性诗歌被捕:

> 甩掉镣铐,踢开奴役的颈轭;
> 现在就动手,否则锁链永远不能打破;
> 迅速起义吧,给他们致命打击。

他先是同重罪犯关在一起,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最后被定数罪并罚 4 年零 6 个月,其中 2 年为阴谋煽动罪,2 年为亵渎诽谤罪,还有 6 个月是煽动诽谤罪。当这些荒谬的判决被通过之后,斯旺扬起他的白帽子并且向法官说:"你判完啦,全部就那些?我还以为你要给我弄根绞索把我绞死呢。"他的妻子曾被短期拘留(因继续销售小册子)。她和她的 4 个孩子靠每周 9 先令的教区津贴过日子;卡莱尔和科贝特都曾给过他们一些帮助。科贝特本人确实对斯旺的案子特别有兴趣。卡斯尔雷自杀后,科贝特那颇为得意地给斯旺写信,上面有对卡斯尔雷的咒骂:"卡斯尔雷已经割断自己的喉咙,他死了!愿这消息能传到你所在的地狱深处……并给你受难的灵魂带去安慰!"斯旺服刑 4 年 6 个月之后,"走出了切斯特堡大门……他的思想仍像以前一样顽固。他继续从事制帽业,但并没有停止活动。1831 年 11 月,

---

[40] 威克沃前引书,第 222—223 页,《对苏珊娜·赖特夫人审判案》(1822),第 8、44、56 页;《新泰晤士报》,1822 年 11 月 16 日。

《贫民卫报》报道了斯托克波特治安官法庭发生的诉讼案，被告就是约瑟夫·斯旺，罪名是销售“无印花税报刊”。法庭主席克拉克上尉问他在辩护中有什么话要说：

被告——先生，我已经失业一段时间了，我也无法找到工作，我家里人都在挨饿……。另一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我卖这些东西是为了我们同胞，让他们知道议会并没有代表他们……我想让人民知道他们是怎样被蒙骗的……

法官——住口。

被告——我不！因为我想让每个人都读读这些出版物……

法官——你太放肆，你要因此被判处3个月监禁，进纳茨福德感化院，做苦工。

被告——我一点也不感谢你；只要我能出来，我还要卖。你记住(看着克拉克上尉说)我第一份就要卖到你家里。

约瑟夫·斯旺随后被强行带离被告席。[41]

在20世纪论述民主的华丽文章中，他们大多数已为人们所遗忘，原因是他们冒失、粗俗、过分真诚或者说是“狂热”。而那些模仿他们的做法传播进步的载体，那些接受政府津贴的《一便士杂志》和《星期六杂志》(其销售者没有一个被起诉)却挤了进来，跟在后面的是资力雄厚的商业性报刊，虽说只是到40和50年代才真正开始引起激进读者群的注意。(即使到那时，大众化

---

[41] 威克沃前引书，第105—107页；《独立辉格党人报》，1820年1月16日；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22年8月17日；《贫民卫报》，1831年11月12日；A.G.巴克：《亨利·赫瑟林顿》，第12—13页。

的出版物如克利夫、豪伊特、钱伯斯、雷诺和劳埃德等人的报刊,仍然是从激进主义的背景中涌现出来的。)这场斗争的两个后果也许是尤其要注意的。第一(也是最明显的)在30年代成熟起来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从此以后它虽经许多次转变却经久不衰)特别重视出版、言论、集会和个人自由等权利。"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传统当然更加古老。然而在某些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称,这些对权利的要求,似乎是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遗产的继承,此说恐怕难以成立。奇怪的是,在1792至1836年的斗争中,工匠和工人们却把这种传统当做自己的东西,他们在其中加进了言论自由的要求,并认为他们自己有权利以尽可能廉价的方式无拘无束地传播这种思想的成果。

在这方面,他们确实是有一种时代所特别赋予的幻想,而且733 还竭力要把这种幻想纳入工人阶级斗争的背景之中。那个时代所有的启蒙主义者和进步论者都认为,理性和知识的传播仅仅是由于缺乏媒介而被限制住了。他们的类推通常是机械的。兰开斯特和贝尔力图以廉价的方式通过儿童辅导员的努力使学生的专门知识增加,他们的教育方法被(贝尔)称为"道德蒸汽机"。皮科克把布鲁厄姆的"有用知识传播会"称为"才智蒸发会"是极为准确的。卡莱尔非常自信地认为,"读小册子注定会在人类中产生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巨大必然的变化":

> 严格地说,印刷机也可以称为用于人类心灵的乘法口诀表。印刷术使人类的心灵成倍地丰富……,小册子销售者是改革机器中最重要的推动力。[42]

欧文曾怀着救世主式的、但却是机械的乐观主义情绪仔细考虑过以宣传的方式建立新的道德世界。

---

[42] 威克沃前引书,第214页。

然而，即使这当中有一部分理性主义的幻想，我们还得考虑第二个——也是更直接的——后果：从1816到1836年，这种"成倍增长"似乎发生了作用，因为代表工人阶级激进的"无印花税报纸"编辑及撰稿人，一直在利用具有倍增效应的印刷机器；而且前25年的经历已经使全国各地的能够接受他们现在读到的东西，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可以从激进组织的稳步发展中看到：这些激进组织已从大城镇和工业区发展到小选邑和集市小镇。六项法令之一（有权搜查武器）只是在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某些特定的"骚乱区"实行。[43] 从1832年以前一直到宪章运动时期，在每一个郡、许多最小的集市，甚至在较大村庄建立的激进派的核心，而且几乎每一个都是在当地工匠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在克罗伊登、科尔切斯特和伊普斯威奇、蒂弗顿和汤顿、南特威奇或切尔顿哈姆这类中心地区，都有勇敢大胆富有战斗精神的激进派或宪章派团体。在伊普斯威奇，团体是由织工、马鞍工、马具工、裁缝和鞋匠组成的；在切尔顿哈姆是鞋匠、裁缝、石匠、家具匠、园丁、泥水匠和铁匠——他们都是诚实可敬的人——才智方面都大大超过一般水平。[44] 这些人都是被科贝特、卡莱尔、赫瑟林顿和他们的经济人"发动起来的"。 734

"诚实可敬的人……"——人们对这种自修者的文化从来就

[43] 兰开郡、切郡、约克西区、沃里克郡、斯塔福德郡、德比郡、莱斯特郡、诺丁汉郡、坎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诺森伯兰郡、德勒姆郡、考文垂市，以及郡级市太因河畔的纽卡斯尔和诺丁汉。

[44] W.E.亚当斯前引书，第169页；我感谢A.J.布朗先生提供的有关伊普斯维奇地区情况的资料。关于萨默塞特和东盎格利亚地区宪章运动，还可参见A.布里格斯编《宪章运动研究》。

没充分分析过。[45] 虽然有大量的资料证明这些人所受的教育并不充分;但他们中大多数都具有一定的初等教育水平:

> 我清楚地记得在宾利上的第一所半日制学校。那是在磨坊旁边的一所小房子里,教师是个穷老头,以前做着一周12先令的简单零活,现在开始教半日制学生。但他生怕教得太多太费时,上课时他还得在一个大木板上借助沉重的木槌打制的垫圈。[46]

这也许是18世纪30年代早期最糟糕的"教育"了。较好的乡村学校,或由工匠们赞助的收费低的学校,在20年代还是可以找得到的。而且在这段时期,主日学校开始摆脱了(尽管是缓慢的)教学写作的禁律。与此同时,第一批全英的国家学校(无论它们多么不完善)也开始发挥某些作用了。然而,在中等教育方面,工匠、织工或纺纱工还得靠自学。他们自学的程度可以从科贝特的教育作品的销售量中看出来。他的著名的《英语语法》出版于1818年,6个月中就销售13000册,在此后的15年中又卖出了10万册。[47] 而且我们还必须记住,销量(或刊物的发行量)并不等于读者数量,因为同一本书或报纸会被人借阅、朗读和经过很多人的手。

735 工人们的"中等教育"有多种形式,单个自学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尤其是工匠,他们并不像人们一般所想象的那样长期住

---

[45] J.F.C.哈里森在《学习与生活》中作了精彩的描述,但他低估了1832年以前的激进主义文化所具有的活力。最佳的第一手资料可以从威廉·洛维特的自传以及托马斯·弗罗斯特著的《四十年回忆》(1880)年中找到。

[46] 托马斯·伍德:《自传(1822—1880)》(利兹,1956)。亦见一位老陶工:《我小的时候》(1903),第1章。

[47] M.L.珀尔:《威廉·科贝特》(1953),第105—107页。当是还有许多偷印版。

在愚昧无知的社区里，为了找工作，他们在全国各地流浪。姑且不论因战争而被迫流动的人，单是出国的技工就有许多；成千上万的人移居美国和别的殖民地(不仅仅是贫穷所致而且出于对机会和政治自由的渴望)。其相对的便利程度也可以说明国内的社会生活处于普遍的流动状态。在城里，兴盛同时也是猥亵的平民文化同比较斯文的工匠传统并存。19世纪早期的许多歌谣证明，当时的保王派和激进派曾利用歌曲进行过激烈的斗争。1816至1820年上演传奇剧的大众剧场也许最适合雅各宾派和"老激进派"的口味。从19世纪90年代早期起，剧院，尤其是地方剧，就成为敌对派别在幕间休息时以"点歌"方式互相挑衅的场所。一个"雅合宾式革命者、平等派"描述过1795年北方某个港口城市的一家剧院的情况：

> ……由于剧场通常是志愿兵军官们竞选的地方，这些好战的英雄们……要求唱"上帝保佑吾主"，还命令观众起立脱帽……我既不起立，也不脱帽，以此蔑视军人。[48]

只是在镇压年代，这首歌(以其对雅各宾派的"奸诈伎俩"的揭露)才取代了"古老英格兰的烤牛排"成为"国歌"。然而，当战争还在继续时，听众们并不像他们的后代人那样时常被"教会与国王"派暴徒轻易吓住。1812年，设菲尔德的一家剧院发生了骚动，起因是从德文郡南部来的军官坚决要求唱"上帝保佑吾主"，坐在廉价席上的观众则坚持不要唱……一个扰乱者还被送进了监狱。[49]

19世纪的大多数剧院骚动(即使仅仅表现为正厅前座观众

---

[48] 《博爱主义者》，1795年6月22日。

[49] T.A.沃德前引书，第196页。另见诺丁汉的事例，见上文，第473页。

同顶层楼座观众之间的对抗）都具有一定的激进主义色彩。那些有专利权的剧院对与他们对抗的小剧院甚为提防，因为后者推出的"滑稽小歌剧"以及"让马、猴、狗、舞剑术、翻筋斗人和走钢丝演员进行的表演令人感到羞辱"，[50] 那里的观众热情奔放的危险情绪也让雇主们厌恶。1798 年，伦敦造船厂附近的"富裕商人、造船业主、制绳业主"以及其他雇主向政府请愿，并抱怨说伦敦塔附近忠诚剧院的表演鼓励了"他们中的许多制造商、工人、仆人以及其他人的"浪费和放荡恶习"。[51]（这种控诉已经持续了 200 多年）。1819 年，在有名的"歌剧票价"骚乱中，混乱狂暴席卷伦敦中心区，一夜接一夜，一周连一周，因为特鲁利街的剧院门票涨价之故。正是当局对剧院场所混乱一团的闹事和骚乱治安特别反感，才使得那些专利剧院把自己的专利权的垄断保持到 1843 年之久。

平民剧院的艺术造诣是不能同它的活力媲美的，对激进派的感情最有积极影响的并不是小剧院，而是莎士比亚的复活。不仅是黑兹利特，而且伍德、班福德、库珀以及许多自学成才的激进派和宪章派作者都习惯于在自己的论述前面冠以莎士比亚的语录。伍勒从文最初是就从戏剧批评开始的，1825 年办的纯粹为工会报纸的《行业报》不仅辟有运动栏（报道职业拳击赛以及雄狮尼罗同 6 条狗之间的竞赛），而且还有戏剧批评栏。[52] 在 1780 至 1830 年间，其有大众性的，而且也是最复杂最优秀的艺

---

[50] 见内政部档案，第 119.3/4 号，其中记载 1812—1818 年间，以大莱市及德鲁街剧场为一方，以及以"非法"小剧院为一方，双方进行的指控与反指控。

[51] 内政部档案，第 65.1 号。

[52] 《行业报》，1825 年 7 月 31 日，8 月 21 日以及下列等。有人曾要求该报主编就刊登职业拳击赛和动物比赛一事作出道歉；但该报是由伦敦工联的一个委员会管理的，而委员们的愿望又不能不得到满足。

术都是政治版画。

这首先是吉尔雷和罗兰森的时代，其次是乔治·克鲁克香克的时代，虽然这也是其他许多漫画家的时代，这批人中有些是有能力的，有些则是在粗制滥造。这种艺术首先是大都市艺术，漫画家们的人物原型只要是乘马车从他们的版画店通过，他们的政治（或个人）的罪恶连同他们自己就会被漫画家们无情地勾画下来。无论哪方的人都无一幸免，瑟尔沃尔、伯德特和亨特常常被保王派描绘成野蛮的纵火犯，一手拿着燃烧的火把，另一手拿着手枪，腰带上还插满屠夫用的各种刀；克鲁克香克则把国王（1820）描画成一个喝得酩酊大醉、懒洋洋地躺在王位上的人，他四周是破酒瓶，屏风前还点缀着几个色情狂和大乳房的妓女。（主教们的形象也好不了多少。）这种深受大众欢迎的版画根本不是一种为文盲服务的艺术，因为他们不认识从画中人物嘴边吐出来的全部文字道白就是证明。但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参加这种文化活动，他们可以在版画店的橱窗前站很久，想法辨认出吉尔雷或克鲁克香克的最新作品中的那些复杂的可以直观的细目。例如在香苹果巷奈特的画店、费尔伯恩在勒吉特山附近的画店以及霍恩在舰队街的画店（萨克雷回忆说）："以前这里总有一群……性情温厚乐呵呵的技工，他们琢磨这些韵文的含义，然后说给他们的同伴听，其中的幽默之处常使他们发出会意的微笑。"版画造成的影响有时是巨大的，舰队街常被一群群的人堵住；克鲁克香克认为，他的"银行限制票据"（1818）使一项死刑制度（使用假币者当处死刑）被废除了。18 世纪 90 年代，政府实际上是唆使吉尔雷卷入了反雅各宾运动。在战争期间，版画的主流是爱国主义和反天主教的（约翰·牛在这些年又恢复原样），然而在国内问题上它们则分歧很大，而且通常是亲伯德将军的。战后，激进主义版画开始像潮水一样涌出来了。即使是在卡罗

737

琳王后骚动期间亦然。因为起诉会遭致更多的嘲讽。运用各种画面的变化(虽然许多从业者的作品粗糙),版画仍不失为一种技艺高超的大都会的艺术:它可以是刻薄而诙谐的或是直率无情和暴露的;但无论哪一种,它都靠获取街头巷议的材料和靠熟悉的哪怕是少数参与公众事务的人的行为及其性格上的弱点,才能设计出——一幅发人深思的影射时事的宝鉴。[53]

从更广的意义上讲,剧院和画店文化比激进工匠的文学文化更通俗。因为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自修者文化其主调是道德节制。人们通常把它归因于卫斯理宗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是直接或间接的——无疑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清教的性格结构强调道德诚实和自律,这使人们在白天辛劳之后继续在烛光下读书学习,但我们还得提出两个重要的保留意见。第一,卫斯理宗是一种强大的反理性势力,英国大众文化从没有完全摆脱其影响。在卫斯理原本要涉入的圈子中,卫斯理将其教授的阅读面限制为相对狭窄的范围。他本人的著作以及他自己的一系列书的节本,这就构成卫斯理藏书的主要部分。[54] 19世纪早期,地方传教士和小组领袖们受到鼓励,要他们读更多的书:巴克斯特的重版书,卫斯理教派运动的圣徒记和"传教记事册"。但他们不相信诗歌,哲学、圣经批评或政治理论被视为禁忌。卫斯理教派的教育完全是"心灵纯洁"能给人带来幸福,无论他们的地位和才艺如何。这一教义给该教派增添了平等主义的精神魅力。但它同时(有时是在极广大的范围内)也为那些几乎未受过教育的人提供了无知的借口。黑兹利特揭露说:"这是无知和愚

[53] 有关这类作品的复杂性我们可以从多萝西·乔治博士非常学究气的著作中获得一些见解,见其《大英博物馆政治、人物讽刺作品的目录》,第7、8、9、10卷。同见布兰查德·杰罗尔德:《乔治·克鲁克香克》(1894),第4章。

[54] 骚塞:《卫斯理生平》,第558页。

味的全权证书"，

> 那些……不能或不愿全面地理性地思考问题的人立即就可以免除这种义务，只须告诉他信仰和理性是相互冲突的就行了。[55]

面对潘恩、科贝特和卡莱尔持续不断的抨击，卫斯理宗教士为他们的教徒辩护说：没有监督的文化知识是"魔鬼的陷阱"，这方面的证据是太多了。

卫斯理宗的某些支派如卫斯理宗惟一神派（一个奇怪的联合体），特别是新教团，比较具有理性主义倾向，其宗教集会也同较老的反国教派相似。然而，卫斯理传统的主流都是对启蒙渴求的一种不同方式的反应。我们已经提到[56] 卫斯理宗同中等阶级的功利主义之间的潜在亲缘关系。当我们想到边沁和他对"变戏法的"迷信的憎恶，这事就显得有些奇怪，时代精神却一直在促成这两种传统的结合，如果说卫斯理派不赞成理性的探究，那么他们则可能把获得有用知识视为神圣和充满益处的。当然，关键是有用性。单有劳动纪律是不够的，劳动力还必须获得较高级的学识技能。机会主义主张——研究大自然没有害处，因为它是上帝所创造规律的明证——早已同基督教的辩解相融合，于是便产生了早期维多利亚文化中的奇特现象：非国教派牧师手按旧约全书，眼睛却对着显微镜。 739

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效果是可以从 20 年代工人阶级文化中感受到。科学——植物学、生物学、地理学、化学、数学，尤其是应用科学——在卫斯理派看来是有益的，只要这种追求没有同政治和思辨哲学搅在一起。功利主义者正在营建的实实在在、

---

[55] 摘自《圆桌》(1817)、《全集》，第 4 卷，第 57 页以始。

[56] 见上文，第 365 页。

可以统计的理性世界同样是符合卫斯理派口味的。他们还编出了主日学校学生的统计表。(有人认为)如果邦廷也能用查德威克计算出保持一个穷人有力气劳动的最低限度的饮食标准般的正确性来正确地计算出所谓心灵皈依程度的话,他早已很高兴了。所以在教育上的尽力和普及"进步"知识连同提倡信仰上帝方面,非国教派和功利主义者结成了联盟。在20年代,这种类型的著作已经出现,其中还有道德训诫(和描述无人看望的汤姆·潘恩在临终床上纵酒狂言的文章)的印张上,边靠边地印出了有关委内瑞拉植物群的小注释、里斯本地震死亡统计、菜谱、水力学等的注释:

> 每一物种……都需要不同的食物……。林奈说过,奶牛吃的植物有276种,不能吃的有218种;山羊吃的449种,不吃的有126种;绵羊吃的387种,不吃的141种;马吃262种,不吃的212种;猪比以上任何动物都挑食,只吃72种植物,其余一概不吃。然而,造物主还无限慷慨,他们以自己的博爱为无数生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并抚育着它们!"所有这些生物都注视着他,他张开自己的手,满足每一生物的愿望。"[57]

740 而且,在20年代,政治经济学就被视为道德学有用知识的第三伙伴,它所论述的是上帝赋予的永恒不变的供需法则,资本甚至比猪更挑食,他只选择勤劳顺从的工人并拒绝其他任何人。

因此可以说,卫斯理宗和福音主义对明晰的劳动人民文化并没有贡献多少积极的理性成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说他们为

[57] 托马斯·迪克:《论传播知识与社会进步》(格拉斯哥,1833),第175页。另外第213页上认为:"算术、代数、几何、二次曲线以及其他数学分支"更是神圣的研究,因这当中"包含永恒的不可改变的真理"。

知识的寻求增添了些诚实的心灵。(阿诺德后来还认为非国教派传统是相当无知的,对"甜蜜光明"漠不关心。)我们要提出的第二个保留意见,即工匠界是节制的,就是源于这一点,道德节制实际上是激进和理性主义宣传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过去的非国教派和雅各宾派传统。这并不是说激进派不存在酗酒和游行队伍混乱的问题,伍勒只是激进领袖中据说相当喜好杯中之物的一员,而且我们都知道伦敦酒馆和兰开郡的黑店都是重要的聚会场所。然而,激进派竭力要把"暴民"的污名洗干净,他们的领袖也不断地表现出一幅节酒的形象。

此外,强调节酒还有别的动机。巴恩的议会改革联合规章(1817年1月制定)中有一条是很有特色的:

> 真诚建议每个会员不要把自己的钱花在酒馆里,因为那些钱的半数都成了养肥腐败蛆虫的税金。[58]

战后年间,亨特和科贝特都大力号召抵制各种征税商品,还特别宣传以清水代替烈酒或啤酒的种种好处。节酒是卫斯理宗派的一个标志,还是科贝特感到有必要予以赞扬的惟一特点:"我在很大程度上把酗酒视为灾祸、苦难和犯罪的根源,它危害整个社会。"[59] 这并不是科贝特的一直主张,在别的场合他也可能替劳动者哀叹啤酒的价格。然而,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看到这一普遍的道德戒律。节酒是那些在吵吵闹闹的非技术工的冲击下保住了自己地位的工匠和技术工人独有的意识。卡莱尔在谈到自己早期的成年生活时写道:

741

> 我是一个生活有规律、积极好动而又勤恳的人。从早

---

[58] 内政部档案,第40.4号。

[59] 《政治纪事报》,1821年1月13日。节酒运动一直可以追溯到战后的这一次。

到晚……下工之后我便回家同妻子和两个孩子在一起，没有什么地方比家更令人愉快的了，我一向讨厌酒馆。……我有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不能好好利用每一个先令的人……就是一个傻瓜。[60]

他曾多次省下饭钱，"回家时带着一些6便士刊物以供夜里阅读"。这种情况在威廉·洛维特……在追求面包、知识和自由过程中著的《生活与斗争》中表现得特别令人赞叹和感动，其标题本身就概括了我们所要描述的一切。

共和主义者和理性思想者的这种倾向在受到多次攻击后反而增强了。保王党人的讽刺诗文及教会牧师的说教，把他们指责为声名狼藉的罪恶典型。于是他们就要力图说明他们的人品和非正统观念一样无可指责。保王党人把法国革命说成是充满血腥的盗贼厨房并把理性圣堂比作妓院，他们则同这件奇谈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们对于性关系不正常、财务处理不当以及缺乏家庭道德这类指责尤其敏感。[61] 卡莱尔在1830年出版过一本充满说教的小册子——《道德家》，科贝特著的《致青年人的忠告》则只不过是一篇措辞较诚恳可读性较强的文章，其主题同样是勤劳、忍耐和自立。理性主义者对这样一种指责当然是特别反感，即拒绝基督教信仰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切道德约束的解体。沃尔尼的有影响的《帝国毁灭》被译为英文小册子问世，他的《自然定律》，以对话的形式主张凡可敬的品德都必须根据社会功利的法则坚决遵循：

---

[60] 威克沃前引书，第68页。

[61] 对照T.弗罗斯特著《四十年回顾》，第20页（关于30年代反对欧文主义的宣传）："要让原告和证人去说某人犯有盗窃罪、弃妻罪或几乎任何一种其他罪行的最普通的方法，就是让他说'他是个社会主义者'；有关这类案子的报道还加了副标题：'欧文主义的后果'……"。

问：你为什么说夫妻之爱是一种美德呢？ 742

答："因为和谐的结合是夫妻之爱发展的结果，它可以使夫妻在天伦之乐的气氛中养成很多好习惯，从而有利于家庭的兴旺和稳定……。

如此等等一共占用了大半页篇幅。其后各章是论知识、节欲、自制、清洁、家庭道德等，读起来就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部道德大纲。即使在性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异端邪说，如同欧文式的公产主义者那样，那它也是以清教式的热诚表达出来的。[62]20年代早期，曾有一小群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以极大的勇气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避孕法。他们坚信，"勤劳阶级"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惟一道路是限制自身人口的增长。如果有人提出这些方法会导致性自由或个人自由，普雷斯和他的伙伴们恐怕也会大吃一惊。[63]

轻浮或享乐主义并不符合激进派和理性主义者的意愿，这正如它不符合卫斯理宗的意愿一样。而且我们还得考虑到雅各宾主义者和自然神论者都深受非国教派传统的影响。然而，人们有可能太按照书面的记载和某个雄辩家的公开形象来作判断了。在实际的运动中，不仅是霍恩，而且还有赫瑟林顿、洛维特

---

[62] 例如，在1839年4月20日(随处)的《社会先驱报》上有威廉·霍德森的这样一段话："先生，请允许我陈述……我对(婚姻)问题的意见……男人和女人没有平等权利，他们谁也不可能幸福，为建立家庭而结婚——现在通常是如此——就是买卖人肉；这是最恶劣的奴隶买卖……。我主张，所有的婚姻都应当而且只能是出于爱情——一旦爱情不复存在，保持婚姻就纯粹是……卖淫。"

[63] 沃拉斯前引书，第166—172页；N.海姆斯：《J.S.穆勒如何看待新马尔萨斯主义》，载于《经济学杂志》(增刊)，1926—1929年，第1期，第459—462页；M.斯托普斯：《避孕法》(1923)；N.海姆斯：《1823年的节育传单》，载于《柳叶刀》，1927年8月6日；M.圣·J.帕克：《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生平》(1954)，第56—59页。及本书第777页。

以及他们那个圈子的人都不断地向人民传播令人欢乐快活的信息，同他们的大师卡莱尔的主张相比，他们的主张更温和，更幽默，更能反映人民的要求，他们没那么多说教，但决不是没有决心，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效法卡莱尔或沃尔尼的理性主义的工匠们，在行为方式上却同卫斯理教徒如出一辙；一方面建议节酒和清洁，以此表示对上帝和权威的遵从，743 另一面又说这些都是立志废除教士谋略和国王诡计的群众所必需的品质。对于一个不懂这种语言的观察者来说，这两种说法在道德属性上是无法区分的。但这仅仅是部分情况，因为沃尔尼著作的各篇标题后面还要加上"社会美德"、"正义"这类词。同样的训诫既可用于拯救个人的灵魂，又可作拯救一个阶级工具，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激进的和具有理性思想的工匠非常真诚地相信公民的积极责任。

除节制而外，工匠文化还懂得了探究知识、重视合作的必要性。在为出版自由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第一种品质的充分表现。自修者的理解力常常是经过困惑的周折、费尽辛苦而获得的；但这理解力却是他自己的。因为形势所迫，他不得不自己探索知识，他也就对什么都不相信了：他的思想没有局限在正规教育的固定常规中。当局过去曾力图镇压他们，因为他们的思想是大大冒犯当局的。所以，他们乐于倾听任何新的反对当局的观点。这便是工人阶级运动不稳定的一个原因，从1825到1835年情况更是如此；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文主义的迅速传播以及人们为什么在当时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乌托邦和公产主义方案面前摇摆不定。（这种工匠文化在维多利亚时代仍然像酵母一样起着发酵作用，因为那些自力成功的人及20年代工匠的子弟又为这种文化增添了活力和多样性。）我们所说的合作精神指的是共同学习、共同讨论和共同进步的传统。我

们已在伦敦通讯会中看到了这方面的某些情况，为目不识丁者朗读报刊的习惯也要求——这也是必然结果——把每一次读报活动转变成与此有关的小组讨论：科贝特用尽可能平易的语言提出他的主张，织工、织袜工或鞋匠则就此进行讨论。

同这种小组并立的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共进会，他们每周聚会一次，意在学习知识，通常由其中的一个成员领导。[62] 在这里，以及在机工学校中，礼拜堂及激进派的某些传统开始融为一 744 体，但两者共存是不容易的，也不总是相安无事。机工学校的早期历史从1823年成立伦敦技校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30年代，其本身就是一部意识形态斗争史。在激进工匠或工联主义者看来，伯克贝克博士和一些非国教派牧师及信奉边沁学说的专业人士热心帮助他们建立知识促进中心，是应该大受欢迎的。但他们决不准备因这些帮助而答应任何条件。在近年的某些论著中，布鲁厄姆被说成是一个伟大的但又是机会主义的激进主义者，但在1823年的"老激进派"看来，他根本就不是如此。1817年，他们曾看见他为密探制度作辩护（科贝特在一次讲话中曾一再提及）；在卡莱尔的运动高潮时期，他们又看见他站在下院，宣称他对"最近的几次审讯结果感到高兴"，并认为被告们出版了"一大堆下流之极罪大恶极的东西"[63]。布鲁厄姆对学校的热心一开始就足以使他们感到怀疑，普雷斯曾几次试图充当布鲁厄姆（普雷斯在私下是看不起他的）和伦敦工会人士（他们比较公开地怀疑他）之间的中间人，但他的努力不大可能消除他们的疑惧。他们在管理、财务独立以及学校是否应该讨论政治

[62] J.F.哈里森前引书，第43页及以后。

[63] 威克沃前引书，第147页；普雷斯的评论是"干得不赖，伪君子：你不是一个基督徒"。

经济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后一问题上，普雷斯和布鲁厄姆压倒了霍奇斯金。在前两个问题上，伯克贝克热烈主张筹集资金扩充学校设备，他的意见压倒了罗伯逊、霍奇斯金和约翰·加斯特的建议——如果办事的雄心小一点，工匠们自己就能筹集到必需的资金，还可以拥有并且控制一切。

以上两个意见被否决，以及布鲁厄姆的政治经济学讲座的开张(1825)都意味着控制权转移到了中等阶级支持者的手中，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到1825年，《行业报》已经把伦敦技校看成是一件失败的事，因为它依赖"上层人物和富人"：

> 学校成立时曾唤起了一种强烈的普遍的情绪，希望它能代表伦敦的技工，如果这种情绪没有受挫，……我们完全相信为使学校成为最辉煌成功的事业，技工们自己是可能而且也会提供一切必需的财金的……。

745

在全国各地，技工学校的历史更是多姿多彩。在利兹(如哈里森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学校一开始就为中等阶级赞助者，主要是非国教派的厂主所控制；在布雷德福和哈德斯菲尔德，学校曾一度为激进工匠所控制。20年代中期之后普遍的趋势是，工匠传统开始逐渐让位于对下层中等阶级的传统，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说也逐渐进入教学大纲。然而，即使在1830年，运动仍然保持着非正统的面貌(原因是它有一大批信奉功利主义和惟一神论的赞助者)，从而使许多国教派和卫斯理宗牧师对它敬而远之。1826年，一位约克郡的本堂牧师曾把机工学校看做是推行普选权和"普遍理性思想"的代理机构，并且及时蜕化为成雅各宾俱乐部和成为不满情绪的摇篮。19世纪30年代早期，一个副牧师曾攻击莱斯特机工学校的管理人员把学校引上了邪路，使之变成了"传播异教思想、共和主义和平等原则"的场所。据

说在他的图书室里收藏的报刊中就有卡莱尔的《挑战者》。[66]

我们已经谈到20年代的工匠文化。这一术语是目前最准确的一个，但它仍旧是一个近似术语。我们发现用“小资产阶级”这个词(通常有轻蔑意味)是不恰当的；而要把它定义为“工人阶级”文化却又为时过早。然而，要给工匠下出定义我们就应该了解他的周围环境，这在一方面涉及到伦敦的造船工和曼彻斯特的工厂操作工，另一方面又涉及到那些地位已经衰落的工匠，还有外作工。在科贝特看来，这些人包括“帮工和劳工”，说得更简单点也即是“人民”。1820年，他在给兰达夫主教的信中说，“我认为阁下深受蒙蔽，竟然也把人民，或老百姓——既然你喜欢这样称呼他们——视为一群不懂事理的人”：

746

> 我可以向阁下保证，人民并非津津乐道于小事琐事，他们既不欢喜口若悬河的雄辩言辞，也不喜欢模糊空泛的言论主张，在过去的10年之中，他们的思想已经经历了非常伟大的革命……。
>
> 请允许我……说……根据我的某些了解，目前这些阶级比社会上任何其他阶级都更进步……。他们比议会和大臣们看得更远。——他们追求知识时就有这样一个优点。——他们没有特殊利益；因此，他们的判断也不会受到偏见和私利的蒙蔽。除此之外，他们相互之间的交流也是完全自由的。一个人的思想可以转变到另一个人的其他思想。任何意见都能在无拘无束的气

[66] J.F.C.哈里森前引书，第57—88页，第173—178页；《机工杂志》，1823年10月11日和18日；T.凯利：《乔治·伯克贝克传》(利物浦，1957)，第5、6章；E.哈勒维：《托马斯·霍奇斯金》(1956)，第87—91页；切斯特·纽前引书第17章；《行业报》，1825年7月17日；F.B.洛特：《莱斯特机工学校的沿革》(1935)；M.泰莱科特：《1851年前兰开郡和约克郡的机工学校》(曼彻斯特，1857)。

氛中讨论，人们之间没有猜疑，没有傲慢，也没有不必要的谨慎小心。因此也能很快找到真理。[67]

这是哪一种主张，哪一种真理呢？

2. 威廉·科贝特

从战争结束直到改革法案通过，科贝特一直发挥着自己的影响。说他完全不是一个有思想体系的思想家并非是说他没有重大的思想影响。正是科贝特创造了激进的思想文化，这并不是因为他提供了这种文化的最初概念，而是因为他找到了织工、教员和造船工都乐于接受问题的态度、风格和主张。他协调了激进派各种各样的不满和利益，他的《政治纪事报》就像通货一样为那些学识造诣大不相同的人提供交流经验的共同方式。

在这一点上，只要多注意他的风格少看他的奢望，我们就明白了。还有一种做法，即把他的处事方式和黑兹利特的处事方式作对比。黑兹利特是中等阶级激进派中最"雅各宾"化的。长期以来，他跟一个与工匠运动类似的运动保持着最为密切的联系。他主张革除公债持有者和闲职官员：

正统的政府（高兴时我们也可以奉承他们一下）不是另一部异教徒的神话集，他们既不像太子版的《奥维德变形记》那样便宜，也不那样壮观。他们真是一群贪得无厌的"天吃星"，但在其他方面则是"我们人类的病患"。他们不靠神仙食品过活，也不喝仙酒；他们吃的还是地里长出的普通果实，却是最大最好的一份。他们喝的是葡萄酒，流的是臣民的鲜血，他们定的法律不是针对他们自己，他们征的税随时就被他们一口吞掉。他们

747

[67] 《政治纪事报》，1820年1月27日。

> 的需求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从公共积蓄中任意挑选，自然是尽他们自己先得益，而不用考虑其他人会步其后尘……。我们的华贵的叫花子把手伸进每个人的盘子里，每天都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住的是公馆，平时就懒洋洋地坐在大马车上混日子。尽管有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他们的马群还是要浪费我们地里的作物，他们的狗群吞噬的食物也足以使穷人的孩子过活了。他们每年的服装、家俱要花我们很多钱，勋章、布带、蓝绶带和大十字勋章又要花很多钱——宴会、早餐和晚餐也要花很多钱。这些所得税的主角、王室费用单的名士、朝廷托钵圣人（法国百合花的同伙）手下都有一群天生的和非天生的傻瓜，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不过前者花费更大……。你会发现供养他们一个星期比一个月更容易；时间一到，你从合法主义的美梦中醒来，就可能像半兽人卡利本那样说，“哎呀，我真是个傻瓜，竟然把这个喝醉酒的怪物当成了神。”[68]

黑兹利特的感情是复杂的也是令人钦佩的。他是为数不多的能感受到法国革命的全部震荡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否定启蒙运动中的天真成分，同时又重新肯定自由平等传统。他的风格的每一点都表明，他不仅在同伯克、柯勒律治和华滋华斯（更直接地是同《黑树林》以及《季刊评论》）较量，而且他也意识到他们的某些见解的力量，有时对他们的回答还有一定的同感。即使在他最惹人注意的激进文章中（以上便是一例），他也不把论战的矛头指向大众文化而是指向他那个时代彬彬有礼的文化。他

---

[68] 《什么是人民?》，见《政治随笔》(1819)，《全集》，第 7 卷，第 263 页。

的《政治随笔》可能是由霍恩出版的。[69]不过他在写作时考虑得较多的并不是霍恩的读者，而是希望能使骚塞感到不安，使《季刊评论》瘫痪，甚至在中途堵住柯勒律治的判决。

这是一点也没有批评的意思。黑兹利特交游广泛，对那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欧洲冲突有一种责任感，而这使贫民激进派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看起来都只是地方性的了。这是个角色的问题。科贝特不可能写出这一段落中的任何一句。他不能容许别人(哪怕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对正统当局作自愿的奉承，他不能接受"世界"规范，而黑兹利特认为有这个东西，哪怕只用于惩罚也罢，他不能说"我们的华贵的叫花子"，因为他竭尽全力要让他的读者把股票经纪人和官吏看做是他们。由此推论，由于有亲疏之感，他不可能说"穷人的孩子"——他也许会说(对他的读者)"你们的孩子"，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他不大可能说"他们一年要花我们很多钱"；他会写下一个明确的数字。"这些所得税主人"——这种称谓比较接近于科贝特的骂人手段[70]；然而，黑兹利特是慢慢吞吞地说出这番话的，就像带着贵族腔调的人民之友那样(像威尔克斯或伯德特，一旦他们要在下院作一番最厉害的讥讽时，也会发一通脾气的)；科贝特却说不出那种表面彬彬有礼实际却是讽刺的话——他开口便骂乡村牧师马尔萨斯，博尔顿的那个弗莱彻，那玩意儿，等等。其直率程度甚至连雪莱也甘拜下风("科贝特的怒气，复仇")。

这是强调问题，然而，从强调中至少也能发现科贝特政治见解的一半。黑兹利特的风格有张有弛，对比生动，具有一个随笔

[69] 霍恩在广告中说："出版商真诚地认为，作者在这本书中明确表达的思想比他的其他任何著作所表达的都更新颖更公正。"

[70] 参照科贝特：《棉纱贵族，珍尼纺纱机君主，纱线义勇军》。

作家的文化修养。尽管科贝特写有《乡村旅行》,但人们并不轻易认为他是个随笔作者。说实在的,既然黑兹利特的丰富典故引喻及学者风格属于一种工匠们无法企及的文化,那就很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敌意。科贝特谈到冗员闲职时用的是这样的一些术语:

> 有大小不同的空位和多少不等的年金,从每年两三万镑到差不多四万英镑!……还有好些个官吏,每人的收益就能维持1000个家庭……。雷斯顿先生……此人是议员并有大片地产,谈过此事,"每个5口之家,即使是最穷困的工人之家都可能交纳间接税,每年至少是10英镑,或者超过每周7先令工资的一半!"然而那些蛮横无礼的帮闲们却把你们称做暴民、乌合之众大群蠢猪,还说你们的意见等于零……[71]

这里的每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同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没有联系,但与共同有用的经验相关。甚至连普雷斯顿先生也得紧随其后。科贝特将正统的格调变成了啰啰唆唆的议论。不过他的演说还是充满热烈辩论而有力的。 749

看看他就为熟悉的论题——判断牧师不是看其职业而是看其行为——所写的一段话:

> 至少可以说,基督教会同卫斯理派在行动方面的完美结合表现了某种不幸的东西。宗教不是一种抽象观念,也不是某种思辨的东西。它对人的行为将产生影响,否则会毫无用处。它对人们的各种行动是有益的影响。它对于事务和人的外界状况都会产生好的影

[71] 《告工人大众书》,《政治纪事报》,1816年11月2日。

响。那么，如果基督教……。[72]

在这样的段落中（这种例子在第一期出版的《纪事》上就有了——几乎每期《纪事》都有类似的例子），科贝特非常明确地向他的读者表达了自己的意思，这是任何人都可以伸出手就感触到的。它是一种主张，其中也有建议。科贝特在写"思辨的"一词时想到了他的读者，他不知道这个术语能否被理解。他对此作了解释。他用最平易的语言反复解释，但却把定义扩大了，使之带有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含义。在把这些短句写完之后，他再次开始解说。我们感到，在"那么"这个词中有一种暗示："如果你们所有的人都把握了我的观点，那我们就进一步……"。

不难看出，科贝特有一些非常愚蠢和自相矛盾的想法，有时候他还把一些貌似有理的观点强加给他的读者。[73] 但是这样看待问题是有失中肯的，这是因为不理解科贝特的看法对他的读者是深远的、真正深远的影响之故。潘恩也具有这种风格。但科贝特 30 年来一直用这种强调对他的读者说话，直到全国的人都像他那样谈论为止。他认为这是一个勿须论证的问题，即每个公民，无论其智力如何，只需向他们讲明普通人所能理解的道理，就能解决问题。在过去的 10 年间（他在 1820 年写道）——

> 我没有因图成功而对人民说过脱离事实以及违背我所能提出的最好论点的话。我的论题通常具有最为复杂的性质……我没有使用过引起好奇心或迎合别人口味的手段。一切都求助于读者的理解力、辨识力和正义感。

---

[72] 同上，1820 年 1 月 27 日。

[73] 保王派报刊喜欢把科贝特自相矛盾的言论列出来予以发表。他的极端激进的反对派出于相反的立场，同样也喜欢这样做；见盖尔·琼斯的力作《出版界为诬蔑中伤科贝特作辩白，兼论他的政治生涯及观点》(1823)。

科贝特没有使用"引起好奇心"的手法,当然不是真的。如果说他把自己的读者当成是平等的人,那么他把大臣、主教和贵族就当成差了一大截的人。(他有一封公开信是这样开头的:"威尔伯福斯,我叫你来先读读我这并不精彩的一小册子。")对于这点,科贝特还使用了另外两种手法。第一种是朴实实用的类推,这种方法主要源于乡村生活。在这方面,科贝特准确地把握住了他的全体读者都适用的经验。这一类的人物,对他来说,不过是点缀作用或提提罢了。科贝特把他们拿起来,握在手中,经过一番处理,从容不迫地摆开摊开,提出论点,然后加以谴责。我们可以举出科贝特把布鲁厄姆和温和改革者描写成稻草人这样的有名例子——"让我告诉你们其中的原因。"

> 稻草人是用稻草或其他材料制做的吊在一根插在地上的杆子上摇摆转圈的假人……手里还插着一根棍子或枪。做稻草人的目的就是让它驱赶糟蹋谷物或种子的鸟,有时也用来吓唬那些偷吃樱桃或其他水果的鸟。人民要求议会改革,长期以来,就有一小伙人不断在表达议会改革的愿望。他们提出动议,发表演说并通过表决,意在使人民保持希望,这样就能使人民一次次地保持沉默。他们从不想成功;因为成功会使他们获利的希望化为泡影;同时他们已经要弄了人民。众多派别都知道他们观点的真实意义,因而为他们的虚假努力感到非常高兴,这种努力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尽情掠夺。这正像小鸟对地里或果园的稻草人一样。起初,小鸟把稻草人当作了真正的人;只要一直是这样,它们就不敢偷吃东西。然而,当它们用敏锐的眼睛观察了一会之后,便意识到这稻草人的手或脚根本不会动弹,它们也就毫无顾忌而且也不再受其妨碍,只把它当作

一根桩子了。这些政治稻草人的作用也是如此；不过……他们还会干坏事……我记得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些政治骗子所起的作用。我在博特利种的萝卜秧被小鸟破坏的一塌糊涂，我对管家说："竖起一个稻草人吧。""那没有用，先生"。……他回答……并告诉我说，那天早晨，在他的邻居莫雷尔的菜园里，他确实看见一只口中衔着一个豆荚的麻雀，停在稻草人的草帽上，就像在餐桌上一样，把豆子一个个地啄出来吃掉。在这里，它可以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接近它的敌人。这比在地上吃东西更安全些，因为在地上它有可能被什么东西给吓一跳。这正是我们的政治稻草人所起的作用。农用的……稻草人只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骗骗偷吃东西的小鸟，但它们却不断地欺骗那些把稻草人竖起来而且依赖这稻草人的人。这些人不是早晨立刻起来冲出去用火药枪轰击窃掠者，而是相信那些可怜的稻草人，因而使自己的谷物和种子受到损失。那些容易受政治稻草人的欺骗的人正是这样。在萨福克和东部其他的郡，他们把稻草人叫做骗子……。[74]

751

人们会从这样的作品中了解到什么呢？从一方面看，这是一篇天才的想象之作。但其中的类推开头有点生硬：政治和农业互不相干，引喻也让人感到牵强附会。一直说到"敏锐的眼睛"时，两种议论才融为一体，论战的喜悦也油然而生。科贝特并不全是在说俏皮话。他的隐喻还带着超现实的成分——布鲁厄姆的帽子上停着一只麻雀，改革派有火药、枪弹、萝卜秧和邻

[74] 《政治纪事报》，1830年9月1日。参见G.D.H.和M.科尔：《威廉·科贝特的思想》，第253—254页。

居莫雷尔(此人可能再不会出现了)。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英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真是超乎寻常!这不光是辩论,也是政治理论的一部分。科贝特用工人或工匠非常理解的语言阐明了真正英国式的改革方法所起的作用。除此之外,他穿过一个世纪,让其他党派和其他时代的"骗子"曝了光。

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已经谈及,[75] 就是把政治问题人格化——以博特利的科贝特本人为中心。但是如果说科贝特是以他自己为主题的,那么他是以不常见的客观性来处理他的这种主题的。他的自我主义超出了其本身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使读者感觉到的不是科贝特的自我,而是他的直言不讳、实事求是的观察力和敏锐性,于是便激励他自己跟他完全一致起来,这种一致性迫使他看见的不是科贝特而是同他站在一起。这种方式的 752 成功可以从他的《乡村旅行》中看到。当他同地里的劳动者交谈,骑马穿过村庄并停下来喂马时,不仅是他的同代人,而且后代人也都感受到了他的明显存在。由于令他满意的事情给他带来了喜悦,他的义愤也就格外有力。在坦特登——

> 那天下午非常晴朗,当我登上山然后到街上去的时候,人们已经出了教堂,沿着街道纷纷走回他们的家里去。这是一幅很美的景象。衣衫褴褛的人不到教堂去做礼拜。简单地说,我看见了这个镇的身着盛装的美女,她们一队队地从我眼前走过,我看见许许多多非常非常漂亮的姑娘;而且也看见她们穿着最漂亮的衣裳。我想起了"克斯之乡"的姑娘们,说真的,我认为坦特登的姑娘同她们一个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非一样不可,原来一水之隔正对这个地方的就是克斯之乡。

---

[75] 见上文,第627页。

在萨里的一个村庄里，贫困已不存在了，这个鲜明的特点同普遍的贫困状况形成了对照：

> 在厄普尔森至伊斯迪恩的半路上，我曾招呼一个年轻人，把他叫到我面前，他当时正同其他挖萝卜的人坐在一个四周围有篱笆的窝棚下吃早饭。他手里拿着食物就朝我跑来了；我高兴地看见他拿着一大块用次等面粉做成的面包和一片不算很小的腊肉……。同他分手时，我说："这么说你确实有腊肉啦？""咳，是啊，先生！"他加重了语气，而且还摇头晃脑似乎要说："我们肯定有而且还会有。"我非常欣喜地看到几乎每个农业工人家里都有一头猪。他们的住房不错，而且也温暖，有些农园还是我在英国见过的最上乘的花园呢。仁慈的上帝，这是多大的差别啊！这个地方同邻近的那些腐败地区——大贝德温和克里莱克之间的差别太大了，如果这个人吃的是乱七八糟的冷土豆，那还算什么早餐？吃这样的食物，他能干活，能在雨天里干活吗？岂有此理！如果劳动者过着像猪一样的生活，就没有一个社会可以维持下去。

"正对这个地方的……就是克斯之乡。""这个地方"，"这个人"——无论科贝特到什么地方，他总是用自己直接的观察、紊乱的感想和描述、内容充实的细节以及实地感受，来促使读者赞753 同他的立场。"立场"是一个恰当的词，因为科贝特已经把自己牢牢地置身于某种自然的环境中——在博特利他的农场里或在去坦特登的途中——才从他感知的迹象到他得出的一般的结论而及于外表的。即使他流亡在美国期间（1817—1819），他也明显地表述了这种实地感受：

> 从我的房间一侧可以看到一个农场院落，里面堆着饲

料，还有一些牛、绵羊、猪及大群家禽，而这个院落几步远的地方是萨斯奎汉纳河，它比泰晤士河宽，河中还有无数的鸟鸥，其面积在从 1/4 英亩至五六英亩之间。从我的房间的另一侧可以看到一个 40 英亩的苹果树、桃树的果园，它位于一个狭长的谷地之中，两边是状如屋脊的小山，高约 640 余英尺，一直延伸到河边。昨天下了雨：早晨前开始结冰，树上的水滴也变成了冰粒；灿烂的阳光同英国五月的阳光一样耀眼，这些冰粒在阳光的照耀下就像无数闪闪发光的小珍珠。

然而，这些背景只是为他表达更强烈的感情（在给亨特的一封信中）——布兰德雷思及伙伴被处决的消息所激发的感情——作了铺垫。

亲爱的亨特，我心里现在只有沃尔特姆猎场和博特利公地上的那些茅屋，我感觉到这种情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我甚至更愿意住那种既符合英国人的性格又符合自己身份的最简陋最劣质的小房子里，而我现在拥有的房子，也就是我前面描述的，并不具有那种特点。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说，我离开英国之后，怎么也不像热爱英国人那样热爱其他人民。

如果说科贝特在改革运动的斗争中塑造了魔鬼和英雄，那么他本人就是这部封神榜里的中心人物。不过要指责他有过多的个人虚荣恐怕还得谨慎为之，因为这部封神榜同样也要求把科贝特看成是一个具有非凡的战斗性、不屈不挠，而才能又不出奇的平凡英国人——读者可以认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在萝卜地里干活的工人或者（只要有这样或那样的环境和机遇）是苏萨克斯的一个乡村小旅店女房东的儿子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女房东叫她儿子给我送些奶油来。这小伙子同我年轻

时一样，穿着也非常相似。他身着一件已经褪色的蓝色工作服，衣服上还有几块新布打的补丁……。看到这身工作服便使我想起了许多令人亲切的往事。我敢说这小伙子将会在比林舒特或离那儿不远的某个地方有一番作为的。要不是因为偶然的原因使我离开了与此类似的一个地方，会有多少受人欺负的贱民和傻瓜会在夜里安安稳稳的睡大觉，白天无忧无虑大摇大摆的四处乱逛啊！

他对穷人所表的同情总是具有这种性质："要不是上帝的恩宠，是不会有科贝特的。"他的装模作样比不装模作样更"正常"。他决不会让他的读者忘记他曾经种过田，而且还当过普通士兵。由于他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人，因此他喜欢的并不是新闻工作者（他装着不是那种人）的服装，而是老式的乡绅服。在黑兹利特的笔下，他穿的是一件"有吊带的深红色的呢马甲，这是上个世纪乡绅的习惯装束"；在班福德笔下，他穿"一件蓝大衣，黄天鹅绒马甲，淡褐色呢短裤，脚登长筒靴……完完全全就是他希望充当的——英国乡绅的代表。"只有黑兹利特对科贝特的虚荣心问题提出最合理的评价：他的自我主义是令人愉快的，因为这当中没有矫揉造作。他写自己不是因为没东西可写，而是因为他所遇到的某件事可能就是某个主题的最好说明，他也并不是那种会因事情的微妙复杂而不敢就某个主题作出最好说明的人。他对自己和他的主题都非常喜欢。他并不把自己置于主题之前。也不说"首先崇拜我吧"，而是把我们同他自己摆在一起，并让我们看他所看到的一切。这里没有……抽象的无意识的自我陶醉，也没有对他个人——作为代表人物——的偷偷崇拜：一切都是朴素自然光明正大的。他把自己写成是一个平凡的威廉·科贝特，像任何人所希望的那样把自己完全暴露出来——总之，他

的自我主义全是个性的表现，几乎没有任何虚荣心。[76]

这是一个宽宏的文学性质的判断。然而，政治判断必须更严格一些。大众激进主义在态度和风格方面的大变化，可以从潘恩和科贝特之间的对比中看出来，黑兹利特又是最早对此作出界定的人：

> 潘恩喜欢把事物纳入最重要的原则之中，喜欢宣布不言自明的真理。科贝特却去为细枝末节的地方详情劳心费神……。潘恩的作品有点像论述新计划的政治算术入门书，科贝特则在记流水账。他把一年到头发生的事件和麻烦问题统统记了下来。

755

政治的个人化——某个在农舍旁边的菜园里干活的散工如何，某人在下院的发言如何——适应了刚刚具有政治意识的读者的实用主义倾向。它关注周围的短暂事件和特殊的不满，并且避开极端形式的讨论。它促使保王派和共和派、自然神论者和国教信徒都参加到一个共同的运动中来。但这样的论断也许会被误解。潘恩的《人权》在没有文化的读者中造成了反响，而且还助长了一种更带有原则性的大众权利理论；此外，较有理论倾向的报刊杂志在这一时期的成功，也证明存在着一个能够单独理解政治问题的庞大工人阶级。非理智化和理论上的机会主义（以“实用的”经验主义面目相标榜）一直是英国劳工运动的重要特点，在其创立和发展过程科贝特在事实上是起了作用的。

“我记得母亲习惯读科贝特的《纪事》。她说她并不懂人们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反对它的话；她看不出《纪事》有什么不好，相

---

[76] 《政治纪事报》，1817 年 6 月，1818 年 4 月 11 日，1819 年 10 月 2 日；《乡村旅行》，随处；班福德前引书，第 21 页；黑兹利特：《杂谈》(1821)。

反，她看到其中极多好的东西。"[77]詹姆斯·沃森的母亲是一个牧师家里的佣人，又兼任一所主日学校的教师。1817年，霍恩写道，"科贝特先生的《每周政治纪事》"，

> 应该精装起来，和《英国史》、《天路历程》、《鲁宾逊漂流记》和《青年知识读本》放在同一书架上。全国的每个农舍、每个乱糟糟的藏书阁楼里几乎都能见到它的踪影……。

它就像"主妇指南"和巴肯的"家用药品"一样"普遍和令人熟悉"。[78] 实际的情况大致也就是如此。伍勒和卡莱尔用更深奥更具理性的方式表达了城市工匠的激进主义思想；然而，惟有科贝特能够在1816年成功地把织袜工和织工引入同一问题的对话之中。

756

科贝特从保守主义者逐渐转变为激进主义者的奇闻，使他的立场具有某种机会主义性质。这使他在战争年间既能够避开反天主教势力又能避开反雅各宾势力的伤害。在辩护中他能够宣称自己同法国革命和汤姆·潘恩均无干系。最终(他本人曾大大方方承认过)他还是接受过潘恩的许多主张。然而，他总是避开任何形式全盘否定传统原则的雅各宾观点，因而他能够以一个既是激进的改革者同时也是立宪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在《致工人大众书》中告诫人们要提防这种人——他们总是要让你们相信，由于事情已经背离了其真实目的，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中

---

⑦ W.J.林顿：《詹姆斯·沃森》第17页；参照T.弗罗斯特前引书，第6页："我在父亲家里看到的仅有书籍，除圣经和几本学校旧书之外……就是一些不齐全的科贝特的《纪事》了。"

⑱ 1817年4月5日霍恩《改革者纪事》谈到科贝特去美国。然而，伍勒的愤怒回答是："我们全都希望科贝特先生只写……这类主题，……只去骗骗厨房女仆和帮工那就好了。"《黑矮人报》，1817年4月9日。

已经没有好东西存在了。其实不然，请问：汉普登为何会死在战场上，西德尼为何会死在绞刑架上？同英国分离的美国人，也曾小心谨慎地保留“大宪章、权利法案、人身保护法”和习惯法的主体部分：

> 我们需要大改动，但我们不要任何新东西。改动和修正均应适合时代和环境；然而大原则应该而且也必须是相同的；否则，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混乱。

即便在他（晚年）力主人民以暴力反抗“新济贫法”时，他仍然是以宪法权利和神圣习惯法的名义提出这一问题的。他对理性主义者的态度也是既含激进主义又含传统主义的。他竭力维护他们发表反对严格的基督教徒生活的论点的权利。但是，卡莱尔糟糕到用那“木匠的妻子的儿子的 1822 年的年份”来记《共和报》的日期时，在科贝特眼里，这就是亵渎神灵之事，于是他便求助于私刑了。如果这种事情在美国发生（他愤怒地说）——

> 你立即会……被浑身涂上柏油粘上羽毛，光着屁股捆在横杆上抬着走，一直走到某个林子或沼泽旁掉下来为止，他们会把你丢在那里，以便让你仔细想想你自称新政府和新信仰的创造者是否明智（姑且不说是否谦虚谨慎）。[79]

在我们的历史上几乎还没有一个作者像科贝特那样写了许多露骨地抨击国教牧师（尤其是农村牧师）的作品。然而，他从来没有提出什么像样的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经常宣称自己不仅服从王权（在卡罗琳王后骚动事件期间他几乎快把王权搞垮了），服从宪法（他的追随者在 1819 和 1832 年遭到屠杀），而且也服从国教。有时他甚至还能写出“我们的责任是压制住令人 757

[79] 《政治纪事报》，1822 年 2 月 2 日。

痛恨的土耳其人和犹太人",因为基督教是"法律的重要部分"。

这种机会主义态度使科贝特主义不可能发展成一种系统化的政治理论。他的许多经济学偏见也同样具有这种毛病。他的学说既不是一种对政治制度也不是对"合法制度"的批判理论，而是一种对"腐败的旧制度"的臭骂。因此，他把经济分析变成了一场针对既得利益寄生现象的论战。他不能容忍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一种批判理论，因此他详细地(反复不断地)提出了一种恶人作怪说，即人民的不幸是税收、国债和纸币制度以及大群的寄生虫——资金控制者、官吏、掮客及收税官——他们养肥了前三种人。这并非是说这种批判没有根据——税收中的明显剥削以及东印度公司和银行的寄生行为都是科贝特批判的目标。然而，就其特点而言，科贝特的成见是同小生产者、店主、工匠、小农场主以及消费者的不满情绪密切相关的。人们对土地所有者或工业资本家的注意被转移到中间人身上，即中间商或掮客，他们垄断了市场，并从人民的匮乏中得到好处，他们不劳而获，同土地和工业没有任何密切的联系。这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既是道德的又是经济学的。人们有权利致富，但必须让别人看见他在努力干活。除闲职官员之外，科贝特还对教友派的投机商很厌恶。

由于理论的缺陷，科贝特在政治策略方面的直接影响有时也明显地具有危害性，而他在个人行为和公开表现方面又不总是像他要求他人的所做的那样正直坦白。他未能成为政治领袖并不全是他的责任，他是个新闻工作者，并不是一个政治领袖或组织者，只是因为环境(有效的政治组织失去了合法存在的权利)的变故才迫使他扮演另一种角色，然而，即使他不肯成为政治领袖，他也(像其他处于这种困境的人那样)不情愿看到运动不按他所规定的方向发展。考虑到所有这些和其他方面的弱

点，人们便容易低估科贝特，把他看成是一个怀旧的浪漫主义者，要不就是一个暴徒。

我们时常听到的那种陈腐见解，即科贝特"其实是一个托利党人"，那是站不住脚的。这里有一个经过充分考证的理由：他的腔调具有民主主义的特点。他同读者之间的关系特别亲密，我们必须记住他一直在同他的读者交谈。在改革集会上他向他们发表演说，他还做"巡回演讲"。即使在美国，他的邮袋也是满满的，苏格兰机工和流亡的改革者代表常到萨斯奎汉纳河边去拜见他。他还骑马到乡下去，看看人们在想什么谈什么。与其他把科贝特的主张看做是单向的宣传，还不如把它看做是读者与他之间的炽热交流。"我总是说，我从人民那里获得的见解是我给他们的十倍。"

> 一个致力于教导这样一个民族的作家经常会得到鼓励，他不仅会因为得到人民的热烈欢呼而感到他的劳作行之有效，而且他还不断地从那些新思想中获取力量，而这些新思想，就是他的思想在人民的心中引发的，正如火石和铁具的碰撞产生火一样。[80]

能够洞察出他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的辩证性质是多么令人鼓舞！科贝特的思想不是一种体系而是一种关系。几乎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他那样成为自己读者的"喉舌"。因此，人们在他所为之辩护的运动中遵循他天才的指导也就成了可能之事。在危机时刻，他的言词是炽热的。当运动衰落时，他则表现得非常急躁和怪癖：他的风格也变得沉闷无聊了。这种情况直到他晚年也是如此；由于读者的情绪变化，他也随之发生改变。

这就是雷蒙德·威廉斯曾恰如其分谈到过的科贝特具有的

---

[80] 《政治纪事报》，1820 年 1 月 27 日。

"非同一般的直觉的领悟性"。然而，这是对什么东西的直觉呢？759 首先，这种直觉揭示了变化中的生产关系的真正本质，在科贝特看来，这种生产关系一方面同过去那种理想化的家庭经济相对立，另一方面也是同每一个个体劳动者的价值相立，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落后的表现。其次，科贝特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化身。他把18世纪的传统精神汇集起来，加以新的强调，并把它引入19世纪。他的见解同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非常接近。他衷心赞成的那些价值观（毫无拘束地阐发自己的见解是他写作得最好的时候）是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和独立性。他悲叹小农和小商人的衰落；哀叹全国的财富被少数人堆积成"山"；哀叹织工失去了"在经济独立时期养成的直率豪放的性格"。[81] 这些小农怨恨有大片庄园的酿酒商或（不在自己地产上居住的）外在地主；小布商为反对工厂制而请愿；小裁缝或靴匠发现了中间商在接受政府的合同或在包揽市场——这些人都是科贝特的当然读者中的读者。他们也都对"投机"和"商业体系"同仇敌忾；但他们（同科贝特一样）一旦面临任何对财产权的激进批判便止步不前了。

如果这就是问题的全部，科贝特可能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了。但他的读者——激进运动自身——却把他引向更远的地方。"我们日益朝着这样的国家迈进，这只有两个阶级，雇主和卑贱的依附者。"科贝特在估量工匠和棉纺工的地位时，是根据那些正在沦为工人阶级的小雇主的经历进行推论的。他认为曼彻斯特的工厂无产者并非是新型的一类人，而是失去了独立和权利的小生产者，因此，工厂纪律也就是对他们尊严的一

[81] 《政治纪事报》，1832年1月30日；R.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塘鹅版），第32—34页。

种压迫。他们进行暴动是正当行为，自己如果处于同样的境地，也会这样做。至于童工劳动，那简直是“违背天理”。

科贝特对农业劳动者的态度有些不同。尽管他竭力在理解商业和工业社会，但他头脑中的政治经济学模式在本质上仍然 760 是农业性质的。他赞成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土地所有人、品行良好的佃户、小土地持有者及劳动者都各尽其责，他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和和社会关系必须置于确定的相互义务和相互制约的条件下。有个地主，他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曾引了一个老佃农的事例，他接收博特利的那个农场时，此人已退休而且已住在那里。

> 这个老人没有付给我任何租金。他死后我还在他的墓旁立了一个石碑并注明他是位诚实的、有技能的、勤劳的劳动者。只要我在博特利，每周我都给他的妻子一个先令。㉘

在这方面他同那种比较贤明仁慈的地主并无二致，他曾多次为这种地主的消失感到悲痛。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全部。他也有令人不快的语句：“如果劳动者过着猪一般的生活，任何社会都不应该存在下去。”任何社会都不应该存在下去——他的社会批判真理就是劳动者的生活标准。在劳动者起义或新经济贫法实施期间，他认定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无法忍耐的，于是他决心向公认的社会秩序挑战：

> 上帝赋予他们生命；他们同你们一样有权利生存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无疑有权以劳动交换的方式从这块土地上获得生计。如果你们不能利用他们的劳动管理你

㉘ 《两便士文摘》，1830 年 10 月 1 日。

们的土地，从而取得生计，那么，就把土地让给他们吧……。[83]

这段话是科贝特在去世前不足6个月之时写的。

这就是为什么科贝特(以及他的朋友，1832年后竞选奥德姆议员的伙伴约翰·菲尔登)几乎成了工人阶级代言人的原因。一旦劳动人民——科贝特指的是农业工人，菲尔登则指工厂童工——被用来检测其他一切政治手段善恶的标准，那么，我们就几乎可以得出革命的结论了。科贝特、奥斯特勒和卡莱尔虽都曾用不同方式表达了隐藏在外表下的有"怀旧"心情之中的"穷人的历史权利"，也有正在成熟中的为社会援助穷困和无依无靠的人的新主张，不是出于慈悲而是作为权利。[84] 科贝特厌恶慈悲的道德挽救性质的"安抚制度"，而在他的《新教徒"改革"史》中，他为他的社会权利观提供历史根据。中世纪的教会土地是教会受托为穷人保管的，尽管这些土地被非法私吞或分散，但穷人们仍然有要求土地的权利。(在科贝特看来)这是旧济贫法间接认可的。取消这些法令是一系列无耻掠夺中的最后一幕，穷人的权利就是这样被诈夺的：

761

这些权利包括：有权在我们出生的地方生活；有权通过正当和诚实劳动的方式从我们出生的土地上换取一份生计。万一我们遭遇到不幸，无论是由于疾病、衰老、年迈，还是由于无法找到工作……我们都有权从这块土地长出的产品中获得必需的供给。一千年来，什一税产品一直提供救济必需品。当什一税被贵族拿走并

---

[83] 《政治纪事报》，1835年2月28日。

[84] 阿萨·布里格斯：《福利国家的历史发展》，见《欧洲社会学档案》(1961)，第2卷，第235页。

据为己有，或全部给予教区牧师之后，作为对被剥夺之物的补偿，生活物资只能由土地提供了。这种补偿是由济贫法规定的地方税提供的，取消地方税就是破坏了协定，劳动者在陷入困境时，有权从土地上获得救济，正如土地所有者有权获得地租一样。[85]

这种假定是以教会、乡绅为一方，以农业工人为另一方，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中世纪的社会契约的历史神话，被人用来证明新社会的权利，正如有人用阿尔弗雷德的自由宪法理论和诺曼枷锁理论来证明新政治权利主张一样。按照这种观点，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占有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取决于他们履行社会义务的情况。科贝特和菲尔登都没有产生这种臆想——劳动人民有权把地产和资本据为己有；但他们俩都承认，如果现存的财产关系由于农业工人以其孩子的缘故违反了人类自我实现的根本要求，那么，无论多么激进的补救措施都是可以讨论的。(对菲尔登来说，这意味着他——那位兰开郡第三"经纱大王"——愿意同约翰·多尔蒂一起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发动一次总罢工。)

762

科贝特的检验标准还是他的政治理论和中等阶级功利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无法逾越的障碍。如果说马尔萨斯的结论劝导人们去移民，去限制穷人的婚姻等等，那么科贝特的标准对这些结论是持批评态度的。如果"苏格兰哲学家"和布鲁厄姆只会摧毁穷人在旧济贫法下享有的权利，让织工挨饿并支持工厂使用童工劳动，那么这一标准就宣布他们是一伙狡猾的骗子。有时，它已不成其为难，而成了一种断言、一种诅咒、一种感情冲动。但

---

[85] 《苏格兰游记》(1833)，引自 W. 赖策尔(编)，《科贝特自传》，第 224—225 页。

这已经够了。为使激进派和宪章派不成为功利主义者或反谷物法同盟的追随者，科贝特比其他任何一个作者做的工作都要多，他培育了一种阶级的文化，他感到了这个阶级的苦难，却不知道如何去解救它。

3. 卡莱尔、韦德和加斯特

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科贝特昙花一现的政治作品中表现出的前后矛盾、盛气凌人、非理性主义、对王权和教会的忠诚、理论上的机会主义以及兜圈子绕弯子的情况。对于那些更善言辞的激进主义者来说，这些弱点是非常明显的。1817 年，科贝特已经受到其他刊物杂志的激烈批评。到 1820 年，尽管有许多激进工匠喜欢科贝特那巨人式的论战；但他们已不再把他看做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了。他们继续读他的作品；但他们也开始读其他杂志刊物。在 1817 到 1832 年间的这些较小刊物中出现了许多新颖的、探索性的思想。1832 年之后，这些思想使一个阶级的政治觉悟得到成长。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发现四种倾向：潘恩—卡莱尔传统；工人阶级功利主义者及《女怪》；聚集在约翰·加斯特《行业报》周围的工联主义者以及同欧文主义相关的许多倾向。

我们已经探讨过《人权》的主要思想以及它在卡莱尔为出版自由而斗争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潘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为卡莱尔所正式承认，而且其学说的正宗地位也不断被重申：

> 惟有托马斯·潘恩的作品才称得上激进改革的检验标准。凡不拥护托马斯·潘恩的全部政治原则的人都不是激进改革派……，除了……共和形式的政府以外也

就谈不上激进的改革。[86]

从切尔顿汉姆宪章派支部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是如何坚决、忠诚地维护这一学说的,会议主席是个老铁匠: 763

有天晚上……有人说到了汤姆·潘恩。主席一下子站了起来,他非常愤怒,大声说道:"我不愿当主席,我不愿看到那位伟人受到诽谤。"记住,他不是职业拳击家,不能叫他汤姆·潘恩。请你们称他为托马斯·潘恩先生。[87]

对世袭原则和"中世纪"迷信及残余毫不妥协的敌意,对人民权利的大胆肯定——均属于这种学说的长处。然而,在英国,至少是到20年代后期,潘恩—卡莱尔传统中已经有了令人不快的声音和非现实的倾向。当我们因工业革命的进展、贵族特权和工业商业的财富复杂地相互渗透而考虑到英格兰的现实的权力结构时,那"打倒贵族"的声势已不大了。理性主义者讽刺"教士"是特权雇的辩护士和愚昧的传道团体,蓄意要保持人民受奴役的状况。这款讽刺总有点远离了目标;他们也许能触痛爱好猎狐的乡下牧师或身兼牧师的治安法官,然而,那些已在积极创办不列颠和民族的学校的福音主义者和非国教派牧师对此却充耳不闻。抽象的论战容易分散自身的力量;它抓不住听众,也引不起兴趣,科贝特的论战却不是这样。卡莱尔所说的"教士"是一些被描写成忙于"跪拜、什一税、朝圣、驱邪祛魔、洒水洗礼、画十字、圣礼、净身仪式、割礼以及说莫名其妙的话"的人,其间还干着"淫荡和酗酒……"的勾当。[88] 尽管卡莱尔比其他任何激进

[86] R.卡莱尔:《利兹改革派》(1821),第7页。

[87] W.E.亚当斯前引书,第1卷,第169页。

[88] "慈善者":《教士之品行》(1822),第4—6页。

派都更清楚英国监狱的情况，但他却一直把它同巴士底狱混为一谈。如果乔治四世真是被兰多夫主教的内脏勒死了，那就是一个胜利，但并不是卡莱尔所预想的那种胜利，因为他还得对付最后一个城市参议员和最后一个地方传教士。

由于具有空论家的特点，他时常企图篡改现实使之可以证实他的原则。他以新的挑逗来回敬迫害他的人：

764

> 我认为当今的多数大臣都是暴君，是人民利益及福利的敌人，因此我也斗胆地说，如果有哪位在他们的统治下曾受过不公待遇而不顾自身性命杀死了他们当中的一个或多个，我就要弹琴赞美他。

如果他要找一些同伙来执行这样一次诛戮暴君的行动，那就是显得“缺德”了；他应该让这一决定成为单独行动：“我谴责为这类目标而建立的任何组织。”[⑧] 这段话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其他弱点。首先是他的不负责任性的个人主义。他所发表的煽动就是煽动言论（就像他发表其他言论一样），是不考虑后果的煽动。像其他那些把思想整理成正统学说的人一样，他并不是简单地宣传他的老师的观点，他把它们变成了僵硬的教条；他接受了潘恩的一部分思想（个人权利的原则），而对他的其他思想则不理会。同时，又把他接受的那部分思想推向极端，变成了极端的个人主义。

每个公民都勿须服从权威，行动时就当权威不存在，他自己是这样做的，而且也准备承受其后果。他认为公民惟一的义务是服从自己的理性；他并不是非得请教他人，即使是他自己一派的人，他也不必服从他们的意见。实际上，具有党派观念就是讨

---

⑧ 《共和报》，1821年1月19日。卡莱尔还重新出版了萨克斯比的《刺杀并非谋杀》。

厌的。他承认他们之间惟一的凝聚力就是理性力量，而报刊杂志则是他们扩张其队伍的惟一工具：

当托马斯·潘恩所断言的政治原则为广大民众深入地理解之后，为表明本意，一切都需要实际行动。那时，密谋活动和代表会议也就完全成为不必要的事情……在这个国家目前的状况下，人民除了自己去弄清何为他们的政治权利以外就没有其他真实的义务……。同时每个人都应该作好准备，作为武装的个人，同自己的邻居没有联系也不用同他们商量，一旦形势需要他，就举行起义保卫他已经拥有的自由和财产不受任何暴虐企图的伤害……。要让每个人都尽到自己的义务，公开尽义务，勿须去看他的邻居做些什么……。

他把普遍知识的力量称为“探索要素”： 765

让我们在知识上进步，因为知识是一种可以证明的力量。只有知识的力量才能抑制住内阁和宫廷的犯罪，只有知识的力量才能结束血腥的战争以及兵荒马乱留下的悲惨后果。[90]

第一段话写于1820年这个黑暗的年代，部分原因是卡莱尔急于要使激进派不至于成为某种易于被奸细挑拨渗透的组织。然而，他的“自由”、“知识”、“血腥战争”以及“内阁和宫廷”缺乏具体内容，而且他还严重地误解了他的读者：“让每个人都尽到自己的义务……勿须去看他的邻居做些什么……。”他难道就不知道工人阶级激进运动的本质，在于每个人都要“同他的邻居商量”吗？如果没有这种商量，他的伙计们就不会挺身而出；他的

[90] 《共和报》，1820年10月4日，1822年4月26日；见威克沃前引书，第213—215页。

国内代理人也就不会坚守岗位了。造成这种混乱不清的关键也许就在于这句话:“保卫他已经拥有的自由和财产不受任何暴虐企图……”,这不仅是潘恩而且也是洛克的思想。

我们的脑海里又一次出现了这个术语:“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个术语中的某些贬意色彩,便能发现这个术语用在卡莱尔身上倒是合适的。他思想深处考虑的也许是小雇主、制帽匠、制刷匠、书商。卡莱尔身上不仅有小资产阶级局限性,而且在这多事之秋还代表着他们的力量。如果比尤伊克年纪再轻一点,他或许也会去读《共和报》的。卡莱尔的所作所为是接过资产阶级对王权的妒忌,对他们的政治权和财产权进行辩护,再把这种妒忌传播到肖迪奇的制帽匠或伯明翰的玩具匠以及他们的工厂之中去。

就出版和言论权利而言,他的主张所产生的后果同科贝特的民主主义调子一样具有戏剧性。然而,就政治经济理论而言,这种立场不是徒劳无益便是虚妄的。洛克思想的有力之处在于,资产阶级是一批拥有大量财产的人,要求约束国家控制或干预就是他们的解放要求。但制帽匠几乎没有财产,其他的财产则更少。不要国家调节只会意味着,给他们的较大竞争者(或曰“市场力量”)以更大的自由,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卡莱尔不得不把责任归咎于臃员闲职、官吏及食税者这批恶魔,在这方面他并不亚于科贝特。小雇主们遭受巨大祸害,其原因必定是税收,政府必须尽可能的小,花钱也必须少。

766

这种主张已经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当然这仅仅是从最消极最保守的意义上讲的。每个人都必须有思想、写作、贸易和持枪的自由。前两项权利是主要的,而且是有先决意义的,从这一点看,出版自由已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人权》第二部所展示的有关社会问题的建议,是这部杰作中他最不感兴趣的

一部分。他具有自力成功者对无用之辈的那种轻蔑，也有自学成才者对那些不利用机会自我提高的人所表现的不耐烦。他坐牢是为了打开通向理性之门，那是他们自己的过失。“我知道啤酒馆对大批技工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91] 他是个只考虑少数的人。

他的理性主义同他的政治理论一样，是由一系列的否定构成的。他的乐事是揭露圣经的荒谬并公布从圣经中发现的那些肮脏淫荡的段落。他在《道德家》中提出的基本德行也就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个不冷不热的理性主义者为资产阶级的有家之人的德行所作的辩护。他对诗歌(或任何具有想象特点的东西)的态度同边沁一样偏狭、片面，尽管他剽窃过《该隐》和《判断力》中的某些内容，但他仍然要煞费苦心地指出他这样做“并非是出于对这些作品的钦佩，而是因为我看到他们受到了我的敌人的危害”。他曾读过的《唐璜》六篇，“在我看来不过是无稽之谈，对人类毫无用处”。(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唐璜》中的任何一篇都充满机智和妙语)：

> 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诗歌爱好者，诗的性质应当同散文一样——具有教育人类、传授有用知识的力量。[92]

“在我看来……”——这种语句会使人想到自修者的文化也变得庸俗和市侩化的。有才智的民众面临变成巴托罗缪一类的集市之众的危险。人人在此可以摆货摊，人人的意见都一式一样地高明，最奇怪的余兴节目——愚笨的女人们和一些贫穷的百依百顺的粗鲁老汉们——全可以上演卖艺。工匠们误入其间，掏出了他们的便士；他们很快也受到感染，摆出了自己的摊

767

[91] 《共和报》，1822年8月23日。

[92] 威克沃前引书，第272页。

子，尚未学会做这门生意之前便开始吆喝争论起来。思想较深刻的人——霍奇斯金或汤普森，奥布莱恩或布雷——同样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作品，他们肯定曾多次咒骂过那些固执己见的小贩在他们四周叫卖。

然而，当所有这些批评都提出来之后——批评是多方面的，而且还用了很大的劲去解释 19 世纪那种吵吵嚷嚷的、好斗的理性主义传统——当所有这些都说过之后，却发现这个市场是卡莱尔所建立的。这可不是一种形象化说法，他出版的东西就是一个市场——是他出版了潘恩、沃尔尼、帕尔默、霍尔巴哈以及其他许多作者的作品。不过他同时也创建了一个辩论的市场。1830 年他建立了圆厅剧场，有关伦敦工人阶级运动的组织问题的辩论可能就在这里，讨论记录定期发表在他的《鼓动者》上。这份期刊最好应该叫做《煽动者》，因为这正符合卡莱尔的实际情况。他是主张理性思想的风头人物，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他四处物色能吸引大众的名角，老资格的雅各宾主义者、外科医生约翰·盖尔·琼斯则一直控制着一批追随者。但他的最大成功却是煽动了罗伯特·泰勒牧师，他是位背叛国教者，先前曾做过国王的礼拜牧师；他身披法衣，却宣讲无神论，攻击"自私邪恶的教士"。泰勒是个热心而又有学问的人，他曾在监狱中服务，并为进一步削弱"神圣女王陛下、18 世纪的愚昧女神"的影响做了不少事。他的讲道是对希伯莱经文的批判，对听众来说，便成了某种庞杂奇怪的东西。圆厅的另一个风头人物也是如此，他是索斯科派衣钵的传人蔡恩·沃德，他以对《启示录》和新教的使人茫然入迷的高谈阔论去蛊惑听众。虽然有这些吸引力，卡莱尔报道说，参加每周宗教问题讨论的人数(1831 年 8 月)仍然在令人遗憾地逐渐减少。此时的圆厅在星期三晚上由一个新租户，即工人阶级全国联盟租用。卡莱尔(他

768

再次进了监狱)对这个联盟有一点愤怒,因为它建议组织另一轮争取出版自由,即“废除印花税”的斗争。他写道,“我同任何组织都不相干,也不寻求……任何这类的支持。”像别的个人主义者一样,他的自我中心主义压倒了事业,他对其他人企图将事业据为己有的想法太不以为然。1个月之后他又写道:“要提防政治俱乐部。”他对俱乐部、协会,甚至工会或互济会是非常反感的。“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的几乎每一恐怖行为都源于政治俱乐部……我断言它们都是些畏畏缩缩的、卑鄙、琐碎、下贱的乌合之众。”当争取改革法案的斗争逐渐进入较危急的关头时,他出版了有关路障、手榴弹和燃烧剂的资料:“让每个人自己组织起来。”但全国联盟仍然在圆厅聚会,他们当中许多最有感染力的领袖——沃森、赫瑟林顿、洛维特、克利夫、希伯特——都是卡莱尔的朋友,他们早就把他抛到后面,然而却仍然坚持他的最初原则:“自由讨论是惟一必要的宪法——惟一必须的宪法法则。”[⑩]

经过汉纳·莫尔和威尔伯福斯的兰多夫主教以及卫斯理宗大会20年的说教布道,激进派中的反教会势力已经出现了。《女怪》竟可以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描写“那位曾率领满身疥疮肮脏不堪的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温文尔雅的摩西”:

> 我们不愿说摩西是一个像穆罕默德那样阴险的大骗子。我们不愿说摩西需要大祭司亚伦就像波拿巴需要佩里戈·塔列朗一样。我们不会说约书亚同老布鲁歇或苏沃洛夫一样是好战的大恶棍,不会说在迦南发生的残酷屠杀比25年革命战争中发生的屠杀还残忍10

⑩ 《共和报》,1823年7月11日;《魔鬼讲坛》,1831年3月4日和8日;《鼓动者》,1831年8月30日,9月30日,10月15日;《激进报》,1831年9月24日;内政部档案,第40.25号。

倍……。[94]

然而,这正是《女怪》要说的话。这一点是同卡莱尔传统相吻合的;此外这两人都同功利主义有亲缘关系。在卡莱尔的思想中,这一点是含蓄的;即便是诗,也必须有用,必须给人以知769 识。《女怪》的思想发展更令人感兴趣,它毫不隐讳地力图把边沁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经历结合起来。但这种努力并不是简单地把中等阶级功利主义者的思想传给工人阶级读者。(如果普雷斯接受了这种思想,他也许会那样做的。)约翰·韦德以前做过分毛匠,1818 至 1819 年担任《女怪》编辑,他是个有创造性并且非常勤勉的人,不会不负责任地提出自己的思想。他一方面倾听普雷斯,另一方面又倾听约翰·加斯特的忠告。我们将会看到,后者一直在反对普雷斯特别赞成的正统政治经济学主张。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结果:《女怪》似乎并没有接受这些忠告,相反却在与之斗争:它在探索这一问题——功利主义能够用于工人阶级经历这一背景中吗?

普雷斯的影响是重大的,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这个人。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一直注视着这个人,因为作为一个(伦敦通讯会、威斯敏斯特激进主义以及取消反结社法等活动的)档案保管人和历史学家,他的偏见一直被严重地引起误解了。他是由一个做马裤的裁缝起家的,后来成为生意兴隆的零售商和雇主,他是边沁和穆勒父子的挚友,还做过下院议员的顾问。从 1800 年开始,他便提出了建立工匠和中等阶级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他支持兰开郡的办学运动及机工学校;他关心的是行为稳

[94] 《女怪》,1819 年 4 月 24 日。雪莱在 1818 年至 1819 年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时曾给了那个朦胧莫测的革命之神一个名字——"魔王":人们怀疑这是否同这些思想有联系(布鲁歇和苏沃洛夫分别是反拿破仑战争中普军与俄军的统帅。——译注

重品行端正的工匠以及他们在自我修养方面的努力。然而，由于他显然是费边传统的创始人(格雷厄姆·沃拉斯曾不加批判地这样看待他)，我们就不应该只把他看做是中等阶级的“俘虏”，也不应认为他是无力采取一种毫不妥协的立场的人。在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等问题上，他仍然算得上半个雅各宾。他帮助出版了英国版的《理性时代》，尽管他逐渐把卡莱尔视为“狂信者”，他还是在他的早期斗争中给予他大量的支持。我们知道他对1817和1819年的镇压非常愤怒，也看见他为建立工会权利所作的巨大努力，即使他对工会的事业所表现的热心奇怪地同麦卡洛克的政治经济学混杂在一起。就思想而论，1818年之前，他确实是边沁的俘虏：他学习边沁和老穆勒的学说而不是对此进行探问；在他自己的作品中，除了增加些他辛辛苦苦收集到的解释性的证据外，他几乎没有为这些学说增添什么新东西。然而，就政治而言，他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势力；他不仅在自己所控制的威斯敏斯特选区为功利主义者提供了一个议席，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联系激进商人和工匠的接触点。他这样一个能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发挥如此一种作用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现象。 770

普雷斯为《女怪》作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所收集的有关伦敦各行业(尤其是裁缝业)的事实资料。[45] 约翰·韦德为这种刊物定了调子和重心。(除普雷斯之外)他是激进派中最有感染力的事实搜罗者。他的《黑皮书》远远优于其他激进人士所作的这类调查。人们可以看出他被边沁派的踏实的调查研究和他们对于

---

[45] 见上文，第255页。韦德究竟是接受了普雷斯提出的见解，还是在编辑过程中对此作了任意改动，目前尚不清楚。尽管普雷斯支持《女怪》，但他从未见过韦德，而且这份报刊“完全不是我所喜欢的那种出版物”。见沃拉斯前引书，第204—205页。

具体而有实效的改革(如法律、监狱、教育)的关心吸引住了。从另一方面说,从一开始,《女怪》便对民众激进主义流行的空泛之谈表示愤懑。它强烈地批评所谓宪法的古代制度之说的貌似有理的论调——最经常地可以在《黑矮人》报上看到,当时卡特莱特少校还在那上面刊登有关贤人会议的文章,并反复论证诺曼枷锁的理论:

我们确实认为,如果在考虑这一主题时,不顾及所有代表着先前社会状态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更好地推进改革事业……。

韦德指出,工人阶级改革者很少发出美好的古老年代这类议论。那些搜集起来的古代学问中有许多是对付劳动者的严厉镇压法规的重要部分。难道改革派领袖们能够(他问道)

不把矛头对准古老腐败的选区贩卖制度却去指向陈腐的羊皮纸文件、发黑的书信和拉丁语引文,那么,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过时的货币系统,还有穷人的数量就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批评和控诉的吗?如果说韦德不同意对先例提出那种貌似有理的求救,他同样也不同意潘恩对"自由权利"的要求。如果主张所有的人都自然有选举的权利,那么又怎能反对妇女的同771 样权利呢?对韦德来说(对科贝特也是如此),这是个间接证明法问题。精神病人和进习艺所的收容者与妇女一样因明显的社会功利理由而被拒绝给予选举权;而且这似乎是工人阶级激进派(或者至少是占他们总数一半的男性)的主张所依据的最合理的基础:

普遍功利是社会惟一的最终的目标,我们对于反对这一目标的任何自然的或长期形成的主张决不予以考

虑,无论它是神圣的或是有价值的。[96]

要证明选举权应当依据这一基础并不困难。但是,煞费周折的事来了。韦德兴致勃勃地苦心致力于社会改革和工会组织问题。如把功利主义演变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就需要某种关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怎样确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对雇主有用的东西会是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吗?韦德的社会结构理论是凭印象而派生的,但他提出的东西至少比科贝特提出"腐败的旧制度"或"选区贩卖制度"的空论有见解。他把社会分为寄生阶级和生产阶级。前者是(a)上流阶级,包括教会和法律界的达观显贵、贵族;(b)"中等阶级"——忠诚的教区牧师、税务监督、税务署各部官员。他把这些人均视为腐败势力。后者是"生产阶级",这个术语空泛得足以包括职业人士和雇主,但它强调的是"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增加财富的人,诸如农民、技工、散工等等"。在这些群体之下是一些不可名状的人,如穷人和吃国家救济的人:

> 勤劳阶层好比土地,万物均从中发育生长;其他阶级好比树木、稗子、杂草和蔬菜,它们在土地的表层……吸取其养料……。

当人类进入"较完美"的状态时,就只有勤劳阶级应该存在下去。"其他阶级主要是起源于我们的恶习和愚昧……由于不再起作用,他们的名望和职务将会在社会中消失"。[97]

772

在这方面,韦德获得了普雷斯的帮助,而且《女怪》也开始以每周特写的方式刊登有关工人阶级状况的材料。他们俩谁的影

---

[96] 《女怪》,1818年6月20日,7月18日,8月22日。

[97] 《女怪》,1818年8月8日;及《特别黑皮书》(1831),第217—218页。亦见A.布里格斯:《19世纪早期英国的阶级语言》,载于《劳工史论文集》,第50页。

响更大尚不清楚。该报十分强调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由于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在上一年出版，这种强调也许就变得更有力了。[98]《女怪》写道，“劳动是一个国家用之不竭的产品，也是我们出卖的主要商品”：

> 在4种主要产品即棉织品、亚麻制品、毛织品和铁器制品中，原材料还不到其产品价值的1/10，其余9/10是由织工、棉纺工、染匠、刀具匠和其他50种匠人的劳动创造的……。这些人的劳动构成了这个国家的主要流通商品。正通过买卖英国工匠和工人的血汗，我们的商人才发了财，国家才得以繁荣昌盛……。

这段陈述充满感情但并不太准确。我们注意到把劳动视为一切价值的源泉的观念不仅可以在瑟尔沃尔的《自然权利》中找到，而且也可以在科贝特1816年的《致工作大众书》时强有力的调子中发现。人们可以感到，科贝特在写作时考虑的是他自己的农场以及那些忙着照料牲畜、耕地、修理住宅的农业工人。在韦德（或普雷斯）的眼中，是手艺人和外作工、分毛工或裁缝；这些人领到原材料，按确定的某种规格并付出他的劳动或技巧对原材料加工处理。在价值上，原材料只为其1/10，而剩余的是9/10。[99]

然而，就是《女怪》中的同一篇文章开始向工会会员传授政治经济学的平凡道理。劳动报酬是由供求确定的，工人工资的增加伴随着雇主利润的相应减少——工资提供了积累。劳动价值提高之后，就迫使资本从那个生产部门输出去，而且（这种语

---

[98] 1818年9月26日的《女怪》引用了李嘉图的著作。

[99] 《女怪》，1818年9月12日。本章论及的劳动价值论的起源简短而欠妥当。读者可参见G.D.H.科尔：《社会主义思想史》及《先驱》（1953）；A.门杰：《对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1898）；R.N.米克：《劳动价值论研究》（1956）。

言同普雷斯支持取消工匠法)的话非常相似——

> 雇主和工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单个地而不是集体地行动。任何一方采用非自然的或人为的手段,其结果都是非自然的。

被韦德关在正门外的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理论就被普雷斯从后门引入了。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在考虑中等阶级功利主义时,已不能不想到马尔萨斯和正统政治经济学了:功利原理只有借助于人口"定律"和供求定律才能得到阐明。如果功利主义进入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就会成为雇主阶级的俘虏。

但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在 1818 年 9 月、10 月和 11 月,《女怪》一直在刊载详细探讨伦敦某些行业——裁缝、铅字铸工、眼镜商、排字工——状况的[⑩] 文章,同时它还为曼彻斯特棉纺工的罢工活动辩护,这次罢工当时正受到保王派和新型中等阶级激进派报刊(尤其是《泰晤士报》)的猛烈抨击。它对有组织和没有组织的行业近 20 年以来的工资率进行比较,得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无论是"自然的"或"人为的"社团,都能发挥作用:

> ……我们过去总以为雇主和工人的幸福是同步的和不可分离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工人状况恶化的原因以及不同等级工人的不同恶化程度,完全在于他们的成熟程度,即结社。但法律却把这种成熟谴责为犯罪。工人的状况一点也不依赖于雇主的繁荣或利润,而在于他们有权利为他们的劳动要求——而不是硬要更高的价格……。[⑪]

---

⑩ 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调查,见本书第 253 页。

⑪ 《女怪》,1818 年 11 月 21 日。

我们知道普雷斯已在1814和1824年采取了另外的主张，[112]上述观点不可能是他的，很可能出自约翰·加斯特之手；但也可能韦德是被他的两个顾问平分秋色地拉来扯去。结果，他实际上还是774 接受了中等阶级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他那部有名气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史》(1835)就是一部混杂着激进政治学和正统经济学、并配有辛勤收录的事实的著作。然而，这却是《黑皮书》的作者、《女怪》的编辑所作的一部令人遗憾的著作。

加斯特的经历与众不同。他和格雷夫纳·亨森、约翰·多尔蒂是前些年中真正令人瞩目的三个有名的工会领导人之一。每人都来自工业部门，经受极不相同的经历，因此而各有其特殊的贡献。亨森是外作工斗争的榜样，略知一些卢德主义，组织他们的非法工会，参与进步的政治激进主义，直到1824年一直在要求施行或颁布有利于他们的保护性法规。代表棉纺工人的多尔蒂更注重工人自己靠联合的力量去改善他们自己的条件或改变整个制度的能力；他还是要求建立总工会、要求工厂改革、合作组织和"民族复兴"等一系列伟大运动的核心人物。加斯特出自一个较小但很有组织的技术行业。他一直关心组织问题以及伦敦的各行业同全国的各行业之间的相互支持问题。

加斯特是个造船工。他在布里斯托尔开始自己的学徒生涯，于1790年前后来到伦敦。(在1825年)他在泰晤士河边干了"30或40年"，其中有28年是在德普特福的一个造船厂度过的。他是那里的"领班工人"，手下约有16个人："我在那里帮助建造的战舰就不下20至30艘……并且还不算商船。"1793年，造船工人组织了圣·海伦娜互助会——但沿河的入会者还不到

[112] 普斯雷告诉负责调查工匠和机械的特别委员会(《第一份报告》[1824]，第46页)：没有哪种政治经济原理比现在的工资制更好：工资的增长必须来自利润。

10人,互助会失败了。但在1802年发生了造船工人罢工并成立了由加斯特领导的橡树之心互助会。这个协会相当成功,它不仅为会员提供了疾病、死亡和意外事故方面的通常救济,而且还拿出基金为退休的造船工设立了13个养老院。1824年,泰晤士造船工节俭联合会成立,加斯特担任了第一任书记,那时他差不多已有50多岁了。[103] 反结社法废除之后,造船工人同雇主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斗争,因为雇主们在1825年以收买议员的方式强烈要求通过新的反工会法。[104] 这样,加斯特和他的联合会的作用就变得突出了,不过在这以前他就长期受到伦敦工会界的尊敬。我们知道,在他同《女怪》有联系的同时,在筹建(在曼彻斯特和伦敦)名为"大力神慈善会"的第一个所有行业的总工会的努力中,就是最杰出的。[105] 很明显,到1818年,加斯特已经不止是一个伦敦"行业"委员会的领袖人物了。此外,在1819到1822年之间,伦敦工人激进主义发生了某种有趣的转变。1819年即彼得卢事件之后,亨特凯旋进入伦敦之举是由一个委员会筹备的;参与此事的人有诸如(在老雅各宾分子、职业人士、小雇主和几个工匠中的)沃森医生、盖尔·琼斯、埃文斯和西斯尔伍德等杰出人物。当亨特于1822年底从伊尔切斯特监狱被释放出来时,约翰·加斯特则代表"有用阶级的委员会"欢迎他抵返伦敦。[106] 从此之后,伦敦工人的激进主义便获得一种新的力量,人们很容易看出这种力量源于哪些行业。在加斯特的委员会里可能有一个"行业会议"雏形。1825年,由于反结社法的取消以及

775

[103] 《行业报》,1825年7月31日。

[104] 见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138—140页。

[105] 同上书,第311页;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第84—85页;沃拉斯前引书,第189页;G.D.H.科尔:《建立总工会的尝试》,第81—82页。

[106] 亨特:《致激进改革者》,1822年12月9日。

面临着这些法令重新恢复的威胁，各行业强烈感到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周刊《行业报》。[107]

《行业报》的座右铭是"帮助他的每一位邻人"，该报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充分阐明了工会运动的力量，直到现在人们还必须到法庭和内政部文件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中去寻找这种力量；[108]而且还暗示了中等阶级功利主义同新出现的"工会理论"之间的某种完全脱节。两者的冲突是相当明显的，普雷斯和韦德似乎

776 坚持《女怪》的正统方面，而那些非正统的、强调结社价值的主张则成了加斯特新开创事业的基础。有些批评是专门针对普雷斯的，其方式既可怜又不公平，这也许有助于解释加斯特和伦敦各行业为何极不看重普雷斯这些年所提出的主张。论战实际上在一年前的《黑矮人报》（即该报寿命的最后一年）上就已经公开了。[109] 它是因为詹姆斯·穆勒在自己书中把马尔萨斯主义同政治经济学庄严地结为一体而引起的。该学说露骨地宣称，失业[110] 是一个自然的而非人为的问题，是由人口"过剩"引起的，

---

[107] 筹办该报的是"那些聚集在伦敦以便观察有关反结社法的最新调查进程的镇与郡的行业代表"。他们捐出 1000 英镑办报，除造船之外，锯木工、箍桶匠、木匠、女鞋工匠、捻缝工和丝织工似乎都直接参与了此事。该报由一个行业委员会管理。

[108] 见上文，第 238—239 页。

[109] 可参见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战，它始于 1823 年 11 月 12 日，随之还有一系列问题争论。

[110]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失业"一词在 19 世纪 20 年代还不存在，这一说法也许源于 G.M. 杨著《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牛津，1936）第 27 页上的不恰当的陈述："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者还不会使用失业一词。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适当的词来表达这种意思"；这句话上还加了一个注脚："在 60 年代以前我还没有看见过这个词"，其实这一说法是错误的。（语义问题的"时间鉴定"通常如此，杜鹃通常在《泰晤士报》宣布它到来之前几周到达英国诸岛了。）"失业的"、"失业者"及（较不常出现的）"失业"等词都可以从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会和激进派或欧文派的作品中找到："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者"不用此词的原因必须以其他方式加以解释。

因此失业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无法解决的问题便成为工资率的决定性基本要素。因为——尽管技术可能采取限制他人进入其行业的方式以获得特权地位——工人大众将发现供需的自然法会降低过多提供的劳务价值。

科贝特早就对此表示了激烈的愤怒（“乡下牧师马尔萨斯！苏格兰哲学家！”）《黑矮人报》则提出了比较热心的见解：“就业的数量是无限的”，

> 我在这个为世界各地提供长筒袜的产业大国看到男人和女人没有长筒袜穿……。如果国内的每一个人都穿得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好，国内的消费就会增长十倍。

他最后说（以此答复普雷斯的相反意见）：“改善人类状况的方法不是减少他们的数量，而是提高他们的智慧。”[111]

第一期《行业报》再次阐述了这一见解。该报的第一任编辑为先进的激进主义者 J. C. 罗伯逊，他是伦敦机工学校的先驱，同时还是托马斯·霍奇斯金的同事。[112] 该报的社论对麦卡洛克以马尔萨斯的理论告诫工人的那些话——“为了不使劳动力的需求过剩，你们要限制自己的数量”——提出了异议。加斯特写道：“这是在同自然、道德和幸福作对。”限制人口增长的可行办法或是禁止婚姻，或是回避婚姻的欢乐，要不就是使用避孕工具。普雷斯坚定地支持马尔萨斯的立场，并大胆地在工人阶级当中传播其学说；然而，由于对节制性欲的可能性缺乏信心，他进而支持悄悄地发行宣传节育方法的传单。[113] 普雷斯还企图在

777

---

[111] 《黑矮人报》，1823 年 12 月 3 日和 31 日。

[112] 有人认为编辑的责任只限于对付印的文字作专门处理，因此我猜想——这也许是错误的——最初的那些社论是由身为各业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加斯特写的。要确定《贫民卫报》和欧文派报刊的作者同样也是困难的。

[113] 见 F. 普雷斯：《人口原理的说明和证据》（1822），及本章注63。

《行业报》上为麦卡洛克辩护。

如果普雷斯由于最固执的功利主义原因而参加一项勇敢的行动，那么加斯特则出于两个理由对他进行激烈的抨击。一方面他暗示普雷斯同一种“下贱”、不道德、令人厌恶到无法形容的地步的主张有关联。（我们应该记住，几乎各方面都对这样看待避孕问题作出了反应，没有理由认为加斯特对此并不真正震惊。）另一方面他作出一种意义更为深远的评价：

> 如果人们都相信了马尔萨斯、麦卡洛克、普雷斯等诸位先生的话，即工人阶级必须考虑的问题仅仅是如何最有效地限制其人口数量以便使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得以彻底解决……马尔萨斯等人……就会把全部的问题简化成机工与他们的恋人或妻子之间的问题（而不是）雇工和雇主之间——工匠、谷物种植者与垄断者之间——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的问题。[11]

这则短文之言很明白。加斯特否定了所谓“自然的”和自我调节（听任其不受限制则会在雇主们和雇工们的利益上起作用）的政治经济模式。他认为利益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对抗，问题的解决和调节必定是由力量来决定的。对资本有益的东西很可能是对劳动的压迫。领取丰薪的退役海军少校托马斯·霍奇斯金1825年出版《反对资本、为劳动辩护》一书（以“一个工人”为笔名发表），给正在形成的工人阶级理论以重要的思想支持。加斯特和霍奇斯金在机工学校就已建立了联系，因为后者曾在那里讲授过政治经济学。1825年下半年，《为劳动辩护》的大部分内容还摘要在《行业报》上发表，而且还有一系列的社论文章对

778

[11] 《行业报》，1825年7月17日，24日，31日，9月11日。普雷斯似乎还支持过《行业报》的一个不成功的竞争对手——《伦敦及地方工匠纪事》（1825）。

此表示热烈的但又不是不加批评的欢迎。加斯特以特殊的赞成态度从霍奇斯金的著作中选择了劳动价值论的原理："劳动的技能"是惟一可以积累的东西：

> 欧洲所有的资本家即使拥有全部的流动资本，他们自己也不可能提供哪怕是一个星期的食物和衣物……。[19]

霍奇斯金的原始社会主义理论特别适合于伦敦各行业的经历，他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那种经历。在面临新的立法威胁的情况下，他提出了有力的常识性的主张为工联主义辩护："结社本身并非是犯罪；恰恰相反，它就是原则，这原则使社会各界团结在一起。"他的愤怒是直接针对充当企业家或中间人的资本家：

> 他介于粮食生产者和衣被制作者之间，他介于工具生产者和工具使用者之间，资本家既不生产也不使用这些东西，却一步一步地把两者的产品据为己有……他渐渐地连续地暗中介入他们之间，在他们盈利日多的生产劳动的滋养下，日渐膨胀成了庞然大物而把他们撑开分隔得很远，使他们彼此不明白每人经过资本家而收到的生活费是怎样敛得的。在他剥夺这两人的同时使他们完全看不到对方，他们双方都相信自己是靠他的恩惠才得以生存的。

就其积极的技术或管理作用而言，资本家被认为是生产性的；在这方面他也是劳动者，而且也应该得到报酬。然而，作为经纪人或投机者，他完全是寄生虫： 779

> 旨在增加工资而建立的最成功最广泛的联合，除了会

[19] 《行业报》，1825年8月21日和28日及以下。

减少那些靠利润和利息生活的人以及那些没有正当权利而只是靠惯例从国民生产中获取份额的人的收入之外,不会造成任何其他有害影响。

霍奇斯金没有提出另一种"制度"(否则就得在戈德温的某种意义上废除所有制度),他有意绕过财产权的问题。他主张的是以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以及思想和道德的手段逐渐增加有组织的压力,以没收资本家掠夺的全部财富。这场"诚实勤勉"与"懒惰奢侈"之间的劳资战争一直要等到工人获得了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直到比他脚下的泥土或他管理的机器更受尊重时"才会结束。

4.欧文主义

《反对资本、为劳动辩护》的发表以及《行业报》对此所表示的欢迎代表着"劳工经济学家"即欧文主义者同工人运动中的一部分第一个明确的结合点。[16] 当然,欧文走在霍奇斯金的前面;但即使欧文、格雷、佩尔和汤普森未曾动笔,霍奇斯金的著作也必然引导人们去探讨这样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如果资本大都是寄生于劳动之上的,那么劳动可以摆脱资本或是以一种新的制度来取代它吗? 此外,功利主义也可能以一种奇怪的曲折方式引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评价一种社会制度的惟一标准是效用,而

[16] 在以下数页中我并不想重新考察欧文或"劳工经济学家"的思想。我的意图是从一两方面来说明理论对工人阶级的经历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新观念如何被选择、如何被改变,也就是说,我更注意的是这些观念的社会学意义而不是观念本身。关于霍奇斯金,见G.D.H.科尔再版的《反对资本、为劳动辩护》(1922)及E.哈勒维:《托马斯·霍奇斯金》(1956,A.J.泰勒译)。关于欧文和劳工经济学家情况的简明扼要介绍见H.L.比尔斯:《英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1933),第4和5章;关于较全面的概括性介绍见G.D.H.科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先驱者》,及M.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第3部分。

那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辛苦劳作者，那么任何对风俗习惯或野蛮的见解所表现的尊重都不会妨碍人们去设计出有可能使人民大众交换并享用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最有用的计划来的。因此，欧文社会主义一直包含着两种从未完全融合的成分：780 其一是启蒙运动的博爱主义，即按照功利和仁爱原则设计的“崭新制度”；其二是吸收了欧文的观念并在自己特殊的环境中应用和发展这些观念的那部分工人所具有的经验。

新拉纳克的罗伯特·欧文的事迹众人皆知，甚至带有传奇色彩。那位模范的家长式纺织厂主和自立成功的人带着博爱主义的建议在王室、朝臣和政府之间奔走游说。当他受到彬彬有礼的赞扬和实际上的劝阻之后，他开始愤怒了。他向各阶级宣传，并宣布了他的太平盛世计划，部分劳动人民对他的想法和许诺逐渐产生了兴趣；早期创办的试验公社，包括著名的奥比斯顿，一个个均由盛到衰；然后欧文去美国做更多的公社试验(1824—1829)。他不在英国期间，其学说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汤普森、格雷和其他人则丰富了他的理论；一些工会人士还采纳欧文主义的一个形式；金医生以其《互助合作者》在布赖顿起步(1829——1830)；合作贸易的试验广泛分布于各处；1829至1830年，伦敦的一些工匠——洛维特是他们当中的杰出者——率先发起了宣传合作原则的全国性运动(全英合作知识促进会)。欧文回国后感到了异常的欣喜，澎湃的浪潮已经把他推到了运动的巅峰，这一运动导致全国大团结工会的建立。

这是一个超乎寻常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某些部分本来就是如此。我们可以从家长式传统谈起，而我们必须看到在新拉纳克进行的伟大试验一开始便遇到劳动纪律，以及我们在讨论卫斯理教派和尤尔牧师时已经涉及到的难以控制的苏格兰工人适应新的工业秩序等方面的困难。“那时，苏格兰的下层

阶级……对陌生人怀有强烈的偏见……”，“因此，在这些工厂受雇的人对新来的管理者怀有强烈的反感……”：

……他们身上带有一个社会群体的几乎所有的恶习而鲜有其美德，偷窃和接收赃物是他们的职业，懒惰和酗酒是他们的习惯，撒谎和欺骗是他们的外表，民事与宗教纠纷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联合起来反对雇主仅仅是出于一种惯常的狂热。

781

《新社会观》(1813)中的这几段话同那位新生的纺织厂主即铁面雇主的经验大体上是一致的。问题是要向青年灌输“专心、敏捷和守秩序的习惯”。为达到这些目标，欧文既没有采取卫斯理教派的心理恐吓手段，也没有采取派监督工和罚款的训戒方式，这完全是他的光荣。但我们必须时时看到，欧文后期的社会主义保留着其最初的痕迹，欧文是这样被塑造成社会主义的慈父的。慈善家欧文先生，在战后的年月能够获准进入宫廷和内阁会议室(直至他不谨慎地，但又是以温和、宽容的态度把所有公认的宗教视为有害的非理性主义的东西加以排斥之时)，没有经过任何意义上的激变，就变成同工人阶级交谈并向他们发表演说的“仁爱的欧文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个极端的功利主义者，他把社会设计成一个巨大的工业场地。此外，他还是工业界的汉韦，很为儿童着想，希望看到他们幸福，对于他们受到的无情剥削真正感到义愤，这是他最令人钦佩和最仁慈的方面。然而，工人阶级以自己的行动达到自己的目标进而取得进步的想法却同欧文的思想格格不入，即便他在1829年和1834年期间确实卷入了这种运动。这一点可以从他所有作品的调子看出来，(他在1817年曾说)他希望“重新教化下层阶级”。除“仁爱”一词外，早期欧文主义作品中最常出现的是“为他们提供”。教育应该把有助于个人和国家的未来幸福的观念和习惯

铭刻在青年的头脑中，只有把他们教育成有理性的人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 第四——如何才能作出最好的安排，使这些男子及他们的家庭成员能够恰当地、经济地得到住房、饮食、穿衣、培训、教育、就业和管理等等呢？[118]

这种腔调表明欧文不仅同工会运动而且同大众激进主义的运动之间存在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织工和工人阶级此时对于我以及我所有的观点和意图都是陌生的”，这句话是欧文（在他的《自传》中）在战后初年写下的，“他们的那些主张民主主义的、多有错误的领袖教导他们说，我是他们的敌人，想要在联合的互相合作的村庄里奴役他们。”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作为慈善家的欧文先生在绝望的战后萧条时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绅士对失业和贫困的程度非常吃惊，同时他们又担心和害怕失业者们叛乱的倾向。农业从战时的兴盛转向衰落，使济贫税的支出也一度超过了 600 万英镑。穷人的状况不堪入目，他们成了犯罪之源，成了国家的沉重负担和危险。报刊的评论栏中充斥着有关修改济贫法的讨论，所有这些讨论都把经济问题视为更重要的目标。欧文先生（他在新拉纳克拥有的大片地产变成了绅士们前往观光的时髦地方）此时带着他的计划出现了，他的计划不见得是更美妙的。他建议把穷人送进“合作村”——从税收中拿出一笔创业资金给他们之后——他们就会在那里自谋生路，成为“有用”、“勤奋”、“理性”、自律和有节制的人。坎特伯雷大主教喜欢这个想法，西德默思勋爵还同欧文先生仔细讨论过此事。1817 年夏，欧文在伦敦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讨论济贫问题的公开信，其中一封写道：

782

[118] R.欧文：《新社会观及其他作品》（人人版），第 74 页，第 260 页。

"西德默思勋爵会原谅我,因他知道我没有恶意——众所周知,他性情温和对人和蔼……。"这封信是在彭特里奇起义和奥利弗暴露之后两周发表的。

这项计划带有马尔萨斯主义和某些地方官(如那些被奇怪地称为"诺丁汉改革者"的地方官)的那些严酷试验的气味,而且后者已经在拟定一项节约济贫院的救济开支的查德威克计划。即使欧文本人(如某些激进主义者愿意承认的那样)非常真诚,为穷人的苦难深感沮丧,但如果他的计划得由政府来接手,就肯定会朝那种方向发展。科贝特曾把欧文的"合作村计划"谴责为"穷人的四边形村庄",在他看来,这种计划不仅带有他非常厌恶的具有恩惠和施舍性的"安抚制度"的意味——如果欧文的想法783 在1817年被当局所接纳,就有可能导致济贫院内部"生产性就业"的扩大。但科贝特仅仅是表达着一般激进派的反响。(舍温写道)欧文建议设立的机构会成为"监狱","一个奴隶社会":

> 在我看来,欧文先生的目的似乎是要以济贫院来遮住国家的脸面,并培植起一个奴隶社会,结果是使劳动者绝对依附于有财产的人。[10]

欧文曾试图在伦敦城大饭店的一次有许多人参加的会议上说服激进派赞同他的建议,结果,激进派领袖们——卡特莱特、伍勒、韦特曼市政参事等——一个接一个地起来齐声反对他。盖尔·琼斯指出,这项计划至少是可以研究的,结果被轰下了台,还被指责为叛徒。[11]

这场争论暴露了双方的弱点。就一方而言,在大数多人都

---

[10] 舍温:《政治纪事》,1817年4月26日,8月9日,9月20日。

[11] 《独立辉格党人报》,1817年8月24日。1817至1819年,赞成欧文计划的激进派报刊似乎仅有发行时间不长的《人民报》和《独立辉格党人报》,后者曾派了一个通信员去了新拉纳克。

作出了政治反应的问题上，欧文的思想却是一片空白。他把《新社会观》的第一部分献给了摄政王，另一部分则献给了威尔伯福斯。15 年之后，他的报纸《危机》载着有关合作联合会以及斯莱思韦特的贸易仓库的报道默默地驶过了 1831 和 1832 年的洪流，他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国家事实上正处于革命的危机状态。这种空白也有其可爱之处，欧文先生认为王权是一种非理性的深渊，而主教则是献给野蛮的愚昧的一份昂贵的不必要的赠品。他毫不犹豫地向牧师们指出这一点并深信他们定会明白他"没有恶意"，而且他们在服从理性的劝告时恰好就清算了他们自己。然而，这对 1817 年的"老激进派"来说，并不是好事。在他们那一方，他们的弱点就在于缺乏任何建设性的社会理论，他们的立场被花言巧语所占据，即所有的不幸起因于税收官、冗员闲职，改革可以纠正这一切问题。

黑兹利特对《新社会观》作出的反应最为复杂，而且还体现着一个在同伯克作斗争时受到创伤的雅各宾党人的态度："为什么欧文先生要在他的改革计划的告示标题中用黑体字来写那个'新'字?""博爱原则、永恒真理以及人类本性完美的信念并不是新的而是'旧的，旧的'，罗伯特·欧文先生"： 784

> 欧文先生不知道同样的计划，同样的原则，关于动机和行为……美德和幸福的同样原理在 1793 年已经流行？那时流传甚广，人们在马背上谈论，在私下耳语，用 4 开和 12 开的书籍，用政论文、戏剧、诗歌、歌曲和传奇故事来宣布这些主张——使之进入酒馆，潜入教堂，登上讲坛，把大学的课程也弄得乏味……这些"新社会观"进入了诗人的心中和哲学家的脑中，占据了男孩和妇女的幻想空间并且转变了王国几乎每一个人的思想：但有一个人的思想从未被它们占据过，他然后又使

整个王国的思想变了过来……

黑兹利特(以嘲弄的口吻)这样驳斥说,哲学似乎被逐出了这个国家,

被迫逃难。然后在那位富裕的有产者的默许下,在新拉纳克纺织厂的落纤和纺梃中,舒舒服服地藏了20年。他想让我们知道这种哲学,在贵族、乡绅、威尔伯福斯先生和摄政王的保护下,像浮在为波旁王朝复辟而流出的血泊上的大潮,在月圆时又涌上了白厅的阶梯;而且所有的人,像这些大人物一样,都只受真理的原则,只受人类幸福的愿望的支配。这种赞美我们可受用不了。我们都是老手,不会轻易上当的……。

黑兹利特的目光异常敏锐。因为欧文确实不是第一个近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霍奇斯金接近于这一称号),而且18世纪最后一批理性主义者之———他此时变成了戈德温,从新拉纳克起步后开始便要求工业革命董事会主席的位子了。作为一个讲求实际和明显获得成功的人,他能够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老哲学家们曾遭到辱骂和抱怨的地方。"一个直接从克莱德河畔来的人获得了一种推动力,使他变得不可抗拒":

我们知道,他接近的是当权人物、议员、贵族和绅士。他站出来……批评、攻击他们的制度,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无论是教会的还是国家的……他揣着印信,平安无事地走进他们的住宅,然后提出他打算建立无数的工业院来取代目前的冗员闲职机构,并以这种办法来调和争端……。

785

黑兹利特接着说:"我们不希望他改变腔调,然而黑兹利特又相当准确地预计到:如果他不改变腔调,便会产生某些后果:

他的计划迄今还是可容忍的,因为它们是遥远的、空中

> 楼阁式的,而且也是不能实现的。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普通人都不关心新拉纳克发生的事,也不去担心那里的工人上床前是否喝过酒,女孩子怀孕是在婚前还是婚后。拉纳克是遥远的,无关紧要的。我们的政治家并不担心他谈论的那种完美的改革制度,而且,他反对议会改革的那些侈谈……实际上还可以起到转移方向的作用。然而,如果让欧文先生说的那种他在一个贫困的村庄做的好事处于普遍化的危险中……那么他所梦想的那种夸张的恩人气度将会消失……。如果让他的《新社会观》像"探讨政治的公正"一样造就无数的信徒,我们就会看到潮流将如何转向……。在本王国的任何地方他都将被视为雅各宾派、平等派和煽动者,他的朋友也会避开他,同时还将成为他的敌人的笑柄……而且他还会发现,要是想叫……人类懂得其自身的利益或叫那些统治人们的人去关心除他们之外的任何人的利益,那都会是不容易的,也会是不保险的。

欧文的赞助人将惊愕地发现(关于这一点黑兹利特已有所洞察),欧文所具有的完全是宣传家的热情。他同卡莱尔一样相信"理性"的传播会产生成倍的效应。他把少数钱财用于向全国各地的要人寄送他的宣言,较多的钱财则用于建立公社的试验。到1819年,他的赞助人对他已经厌倦了,于是他就特别注意向工人阶级说话。他长期以来就认为劳动人民是环境的产物,他曾为他们的"粗野的凶恶性格"感到哀痛,人们认为他和肖伯纳一样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者,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希望这种现象结束。但在这方面,他的思想又是混杂的,其后果是特别巨大的。如果工人是环境的产物,那么在欧文同别人进行了不满意 786 的会晤之后,在公园里散步时很可能就会想到:西德默思勋爵和

大主教同样也是环境的产物。这种思想在他的《致工人阶级书》(1819)中是这样表达的：

> 从幼年起，你们……就变得开始蔑视并仇恨那些在举止、语言和情感方面都不同于你们的人……。在真正从心里关心你们的利益的人授予你们权力之前，你们必须克制住那些愤怒之情……这样你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愤怒是没有理性基础的……你们现在被置于一种你们已经无法控制的复杂无穷的环境之下，你们的其他同胞也是由环境塑造的，他们也不能控制环境，结果变成了你们的敌人和内心痛苦的压迫者……。尽管从外表看他们是辉煌的，但这种物质状况时常有他们造成的痛苦，甚至比你们的痛苦更大……。虽然你们的行动表明你们想以暴力方式剥夺他们的权力以及利益和特权——但他们反过来必然也会怀着妒忌和敌意的情感看待你们，这不是明摆的吗……？

"富人和穷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实际上只有一个利益——建立一个新的合作社会。然而，作为环境的产物，富人也同穷人一样不能看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欧文作品中"突如其来的强烈启示"使他们的动手形成的观察能力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工人(或他们中那些曾受过理性启发的人)应该停止阶级斗争。"这种非理性而又无益的斗争必须停止"，开路先锋(通过建立模范公社和宣传)便可以另辟蹊径。这样，工人阶级就可以直接绕过富人的财产权和政治权问题了。[49]

无论欧文的人格多么令人钦佩，他仍然是个颠三倒四的思想家。虽然他曾提出奇谈怪论，但他却是个坏事的政治领袖。

---

[49] 欧文前引书，第148—155页。

在欧文主义理论家当中，汤普森比较冷静而且较有斗争性，格雷、佩尔、金医生则较有坚定的现实感。关于革命实践和社会变化的辩证过程，欧文在作品中谈得并不少：

>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类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马克思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第三篇文章就是这样说的。如果社会品性是（如欧文主张的那样）"复杂无穷的环境"的自然而然的产物，那又如何改变它呢？一种答案便是教育，这是人们所能看到的欧文主义传统中最有生命力的影响之一。欧文知道，除非"环境"发生了改变，他是不可能达到教育一代人的目标的。因此，答案是心灵的突变，一种千年的跃进。他那环境机械唯物主义的严格定义注定他要么绝望，要么宣布一个世俗的千年王国。

慈善家欧文先生继承了乔安娜·索斯科特的衣钵。不仅是黑兹利特，而且他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曾注意到欧文语调中有这位吵吵闹闹的教徒的色彩。舍温《纪事》的一位撰稿人把欧文和乔安娜相比，她曾——

> 告诉成千上万的人说一位希罗即将来到人间，全世界各民族都将在和平王子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还告诉他们……刀剑将变为犁头。[18]由于这些话她得以暂时

[18] 舍温：《政治纪事》，1817年9月20日。"希罗"是圣经中预言救世主即将来临时用的一个名称。——译注

地欺骗他们。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对此作过探讨，学术界最近宣布的这一发现也并非首创。[12]欧文在1820年宣称，“全国将出现繁荣”，他的公社会像“天堂”一样。到1820年，一个欧文主义团体在伦敦成立，一份为其刊物《经济学家》作广告的传单宣称：

富足将遍及全国！——知识将得到增进！——美德将普及！——幸福将得到承认和保障，并为人们所享有。

欧文经常把工业革命期间生产技术的伟大进步用来作类比：某些人士“没有看到，正是现代发明才使得一个人，靠一点水蒸气的帮助，能够从事一千个人的劳动”。知识和道德的改进就不会以同样速度发展吗？他的追随者也用了同样的比喻：

788

……一部伟大的社会道德机器的建造，将以史无前例的精确和效率创造出财富、知识和幸福……。

《经济学家》的一位通信员写道：“你们作品中洋溢的那种欢乐和狂喜的腔调确实非常感染人。

那个伦敦团体的会员们感到——

相比之下，他们的活动有待改善，因为他们目前的住处仍然彼此相距……遥远。

怀着早期摩拉维亚教友派式的怀旧热情，他们在矿泉地弄到了一些新住所（不再作为集合地点），还开设了教室和餐厅。《经济学家》和其他早期报刊的版面曾充满着关于如何筹集资金的议论——假设（一种奇怪的推论）伦敦有50000户工人家庭，他们的平均收入每年为50英镑，如果合在一起，其收入就达250万

[12] 然而，恩格斯却在《反杜林论》（1878；劳伦斯和威沙特，1936）的第287—292页中对欧文表示了慷慨的称赞：“一个近乎伟大的具有小孩似的单纯性格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天生的领袖。”

英镑，云云。奥比斯顿的公社成员都参加了神圣启示会。1830年，欧文从美国回来后便处于一个群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上，这种救世主的腔调也就具有了宗教的力量。1833 年 5 月 1 日欧文在全国公平劳动交易所发表演说，“谴责全世界的旧制度并宣布了新制度的诞生”。不仅是赢利动机要为合作精神所取代，个人主义恶习要为相互关系中的美德所取代，而且所有现存的社会秩序都要让位于工农业相结合的村庄联合体：

> 我们……不要任何一种局部利益所作出的安排，
> 诸如大城市、市镇、村庄和大学等等……
> 理性社会是不会有法庭，及各种法律工具和愚行的……

迄今为止，世界仍然是“漆黑一团”。对于不可名状的权力的种种顶礼膜拜比“无所事事糟糕得多”。婚姻将“只能是爱情的结合”。超过自然安排的独身，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违背自然的犯罪”。新社会将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娱乐和劳作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就像希腊和罗马那样。所有公民都不再会有野心、猜忌、嫉妒和其他的恶习： 789

> 因此，我要向全世界宣告，建立在理性原则和持久实践基础上的、上帝赐予的千年王国于今日诞生了。

这一宣告也许会使当今的某些妇女合作协会感到吃惊。初看起来，它似乎也不大像劳动阶级所接受的一种意识形态，其形成经历正是我们研究的课题。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得更仔细一些，就会发现，导致欧文主义迅速传播的原因既不是某种心理的狂乱，也不是“集体妄想症”。首先，从 20 年代后期开始，欧文主义已变为一种完全不同于罗伯特·欧文本人的作品和宣言的东西了。它是一种不准确的欧文理论，但仍然提供了一种可替代的社会制度的景象，而且还变得适用于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了。

工匠、织工和技术工人从欧文派的作品中选择出同他们的自身困境最有关联的那部分内容并通过讲座和实践对它们作出修正。如果把科贝特的作品看做是他同读者之间的一种关系，那么欧文的作品就可以看做是一种在劳动人民中传播、后来又被他们加工成不同产品的思想意识原料。

工匠的情况最明显。1821年，《经济学家》的编辑承认说他的读者几乎没有一个来自工人阶级。然而，我们却从伦敦“合作勤俭会”的第一批会员（他们在矿泉地建立了这个团体）向贵族和乡绅散发的一份请求惠顾其产品的传阅信中了解了一些情况。这些人可以从事雕刻、镀金、制靴、制鞋、金属制造（包括制造炉格和火炉）、刃具制造、被服、缝纫和裁缝、家具制造、售书和装订、水彩和绒面画以及透明风景窗屏的生产，这说明他们都是工匠和独立经营的手艺人。这类人在两个最大的合作运动中心——伦敦和伯明翰——是相当多的。有一封寄到《经济学家》的信表达了他们进行这些尝试（还有几次这类尝试，时间几乎都先于欧文）的勇气：

790

> ……工人阶级只要发挥出他们的男子汉气概，就不必向任何其他阶级寻求哪怕是最小帮助。他们自身就蕴藏着……用之不竭的财富。[42]

这不是欧文的腔调，而无疑是我们在追寻工匠的政治激进主义时反复听到的那种论调。个人主义仅仅是他们的部分见解，他们同时也是一种悠久的结社传统——互助会、行业俱乐部、礼拜堂、读书会或俱乐部、通讯会或政治联盟——的继承人。欧文教导说，赢利动机是不正当、不必要的，这正好同手艺人的

---

[42] 《经济学家》，1821年10月13日，1822年3月9日。有关矿泉地试验的简略叙述，见阿米塔奇前引书，第92—94页。

习惯意识和公共买卖意识相吻合。欧文赞成这种观点——那也是科贝特、卡莱尔和霍奇斯金所主张的——资产所有者所起的作用大体具有寄生性质，而“正当经营的手工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种观点正好反映了工匠或小手工业者对承包商和中间商的不满。欧文说“人类劳动的自然标准”应当被认为是“价值的实际标准”，[14] 产品应该按照其中所体现的劳动来进行交换；这也符合鞋匠、家具工匠和毛刷匠的见解，这类人住在同一院子里，不管怎么说，他们有时也确实需要交换劳动。

说实在的，欧文思想的大部分萌芽在他的作品问世之前或同一时期的实践中就已经出现了。[15] 不仅是互助会有时要把他们的活动扩大到修建社交俱乐部或啤酒馆方面的事情上去，而且还有一些事例说明在欧文之前的某些工会曾在罢工时为他们自己的会员提供过别的工作并自己销售产品。[16] 工匠不过是慢慢地丧失作为独立生产者或同时作为为好些雇主干活的人的地位，而且在从事某项合同生产时他还要取得其他有技能的工匠 791 的帮助。包括数百个摊位的棚户市场是一种古老的机构，但在战争快结束时出现了新的市场，并引起了慈善团体和欧文派的注意。这种市场上的柜台是(以英尺)出租的，时间按星期、天甚至小时计算。各种制成品均有上市——甚至连艺术家也可以摆

[14] 《致拉纳克郡的报告》(1820)，载欧文前引书，尤其是第261—262页。

[15] 早在1796年就有人曾试图成立一个全英互助会，它将以通讯会的组织形式把许多互助会的资产合在一起。此事最先在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中发起，有人提出应该提供老年金和失业救济，协会应该雇佣自己的失业成员，丝织工、裁缝、鞋匠等应该相互交换产品。见安德鲁·拉切：《建立普遍和平与幸福的方法》(斯皮特菲尔兹，1795)以及《致全英互助会书》(1796)。

[16] 即烟斗生产者，他们在1818—1819年的冬季进行了11个月的罢工之后，开始在巴勒的梅兹直接生产——因为“一个朋友”“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工厂”。见《女怪》，1819年2月6日和13日。

出他们的作品——可以想象，那些力图争取独立的手艺人和亭阁老板多半是这里的租户。[17] 1827 年，一个新开张的市场变成了产品交换中心，这里交换的产品是由伦敦各行业——木工、裁缝、鞋匠及其他行业——的失业者制造的，原料则由工会提供的基金购买。[18]

可见，1832 至 1833 年在伦敦和伯明翰成立的“公平劳动交易所”（劳动券，安排产品交换）并非是病态的预言家们用咒语呼唤出来的。如果我们把 1832 年 10 月提交给利物浦合作联合会以供交换的产品列举出来，便可知道生产者是些什么人了。来自设菲尔德的产品是餐具和咖啡壶，来自莱斯特的是长筒袜和花边，来自哈德斯菲尔德的是马甲和围巾，来自罗奇代尔的法兰绒衣服，还有巴恩斯利的菱形花麻布、哈里法克斯的毛织品、肯德尔的鞋和木屐、伯克里的印花布等。伯明翰劳动交易所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个地区的人民“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制作的大量铁器、铜器、钢器及漆器制品”，为什么不应该用它们来交换兰开郡的棉制品和莱斯特的长筒袜呢？想向伯明翰交易所提供产品的行业名单有一长串，其中有字母“B”开头的：黑鞋油生产者、装铃匠、桦木扫帚制造者、纽扣及饰物生产者、索带生产者、黄铜匠、制刷匠、面包匠、风箱制造者、床架匠、制筐匠。字母“S”开头的有：草帽和女帽匠、衡器匠、炉格匠、丝织工、铁匠和锡匠以及文具匠。名单中没有（几乎不可能有）蒸汽机制造工、高炉操作工、建筑工、造船工、棉纺工、矿工和工程师。[19]

792

---

[17] J.奈迁格尔：《市集》(1816)。那年开张的梭和广场 5 号的新市场受到了特别的赞扬，此外还提到了霍尔本的市场。

[18] 《合作杂志》(1827)，第 230—231 页，引自 S.波拉德：《19 世纪的合作运动：从合作建筑到办商店》，载于《劳工史论文集》，第 87 页。

[19] 《危机》，1832 年 6 月 30 日，10 月 27 日，12 月 8 日和 15 日。

名单上不仅有小业主和工匠，而且还有外作工。由于他们的境况（手织工和织袜工）是最没有希望的，因此，欧文主义只是他们在30年代能指望解救的办法之一。在哈德斯菲尔德和伯恩的附近地区，劳动交易所的吸引力并不那么直接，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大宗生产纺织品的地区，在数百名生产同一产品的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或以饥饿工资就业的地区，并不存在明显的市场。因此，北方人在刚开始时就不得不寄希望于一项全国合作计划，哈里法克斯的一个合作运动的参加者写道："如果我们的伯明翰朋友们答应穿我们的纺织品做的衣服"，

> 我们就答应用他们的刀叉切我们的牛排和布丁（当我们能够买时），并用他们的调羹喝我们的肉汤和麦片粥。如果我们的伦敦兄弟也愿意这样做，我们就尽可能地在我们的脖子上围他们的丝围巾。[129]

在兰开郡和约克郡，我们发现一个新"制度"的普遍理论发展得最快，凭这一点才可能出现全国规模的公平交易和对公社建筑物[130] 的"乌托邦"式试验的一些最大胆最实际的支持。成立于1830年的曼彻斯特—索尔福德合作知识促进协会立即得到了支持。织工们希望在合作中找到同动力织布机竞争的力量。《联合行业合作杂志》写道，产生社会罪恶的一大原因是——

> 我们国内社会和商业生活中的失误，它造成了机器同人力之间的竞争和对抗，而不是合作。

---

[129] 《兰开—约克郡合作者》，第2期（日期不详）。

[130] 指"新社会的基本单位即劳动公社"，欧文有详细的设想，如住宅、花圃、耕地、工厂、农牧场、医院、托儿所、图书馆、学校食堂等等。

《兰开—约克郡合作者》[132] 写道:“我们可以公平地说,社会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大多是财富分配不公造成的”。由于这些地区长期存在工联主义和互助传统,因此,合作便成了理性主义者和基督徒、激进派和政治中间派共同参加的运动。这一运动还使注重自我提高和教育的传统力量聚集起来了,他们办起了读书室、学校,此外还有巡回教师。到 1832 年,全国大约有 500 个合作会,会员至少有 2 万人。[133]

793

当欧文(尽管他还是乐观的,奥比斯顿和新和谐村[134]的失败已经使他受到了某种伤害)正在等待大笔赠款以进行下一次冒险试验时,从布赖顿到巴克普的数十个中心的合作者已经迫不及待地自己干了起来。在 1832 年的利物浦联合会的会议记录上,长篇大论的福音主义说教同以下这类插话形成了对照:

> 哈里法克斯的代表威尔逊先生发言说,1829 年 5 月,他同另外 8 个人各自拿出一先令,并且……在后街入口处的一间小屋里开始了业务。他们的人数已有增加;资产……现已价值 240 英镑,而且还开始为他们的一些会员找工作(赞成,赞成)。[135]

1829 至 1834 年间,小商店和千年至福计划的同时进行是合作方式不可或缺的因素。(当然也发现有因各种原因而抱怨的情形和一些对于建立全国大工会联合会的结构只是短暂地支持一下的组织。)

---

[132] 1830 年 3 月 6 日;1831 年 11 月 26 日。见 A.E.马森:《兰开郡和切郡的早期合作意识》,载于《兰开郡切郡考古学会公报》(1957),第 67 期。

[133] S.波拉德前引书,第 86 页。

[134] “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是欧文在美国建立的,花了欧文极大部分的财产,但结果失败了。——译注

[135] 《危机》,1832 年 10 月 27 日。

哈德斯菲尔德和哈里法克斯周围地区的合作运动在织工中发展得特别迅速，他们的一个希望就是商店能够为织工购买经纱和纬纱并为他们销售产品，以此避免雇主的中间盘剥。合作者还可以用每人每周交一便士的办法积累资本以便雇佣失业会员。1832年在彭宁山区的里彭登村（织布村）成立的一个协会，其规章也许较好地表达了大多数这类动机：

> 由于这些年劳动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由于竞争和取代手工劳动的机械的增加，再加上许多种劳动阶级无法控制的其他原因——在谈到采取什么计划才能——如果可能的话——改善他们的状况时，有思想的人们就陷入了各种建议的迷宫中……。
>
> 工人阶级通过增加资本就可能改善其状况，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并开始干起来。我们所说的联合并不是指罢工和增加工资，而是像一家人那样，开始竭力为自己工作……。
>
> 我们向公众介绍的合作计划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一项将在全国许多地方产生影响的计划。我们都是吃五谷的，都是以劳动交换劳动，这就是所有的合作社要实现的目标。所有的活都是我们劳动者干的，所有的生活资料都是我们生产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为自己劳动并争取改善我们的境况呢？

794

基本原理

首先，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此，工人阶级创造了所有财富。

其次，工人阶级虽然是财富的生产者，但并没有

成为最富有的阶级，反却成为社会中最贫穷的阶级；

因此，他们没能得到他们劳动的公正报酬。

社会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的社会成员相互保护以免受贫穷之苦并“以共同资本的方式实现各自的独立”。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是每周向一个共同的基金会交一笔钱，把这份资本用于贸易，“在条件允许时”雇佣自己的会员，并且——

最后，按照相互合作、集体占有、同等努力和愉快劳动的原则，共同生活在公社中。[139]

这些并不完全是欧文原则在一个织布村的翻版，这些思想都是织工们在自己的经历中千辛万苦形成的；思想重点已经转移了，救世主式的说教被一个简单的问题所取代：为什么不？合作运动小刊物之一《常识》（这是一个适当的刊名）也强调建立“贸易协会”：

贸易协会的目标简述如下：直接向会员提供大部分食物消费品，并积累基金以便租种土地，以此建立一个合作社会。

795 每周从工资里拿出一笔钱用于批量购买茶叶、糖、面包或麦片之用。布莱顿金博士的《合作者》对此作了更详细的宣传。[140]这种思想与其他的需要有关：要求不变地实行实物工资制，而工厂和投机商能够使工人批量购买便宜食品，以免去买那种经常可见的恶劣的搀假品——搀“巴黎熟石灰、烧过的骨灰和那

---

[139] H. 普里斯特利：《里彭登合作社史》（哈里法克斯，1932），第4章。这些规章究竟是作于1833年还是1839年尚不清楚。

[140] S. 波拉德：《威廉·金博士》（拉夫巴勒合作学院论文集，第6集，1959）。

种叫做德比白的泥土……的面粉”。[139]

但这种思想对于从事较大产业的有技术有组织的工人同样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对待欧文主义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行业报》在1825年登载过一些有关奥比斯顿试验的记录，但认为欧文的公社计划是“不现实的”，因为“那些生而自由、独立的人不喜欢别人告诉他们应该吃什么……应该做什么”。[140] 此外，某些小手艺人和外作工所感兴趣的那种争取经济独立的观念，却反而受到船工或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的欢迎——乡村合作对他们有什么用？

然而，到20年代末，加斯特却发表声明赞成欧文主义。[141] 更重要的事件是，1829年，曼彻斯特棉纺工在经过6个月的罢工之后信奉了欧文主义。1830年，多尔蒂创建了全国劳工保护协会，该会的机关报《联合行业合作报》很快改名为《人民之声》。此后不久，另一个技术工人团体，即建筑工人联合会——他们的产品不可能送到公平劳动交易所——便决定以直接的合作行动向着最伟大的试验推进，为什么发生了这种转变？

简单地说，答案是这样：到20年代末，某种变体形式的合作及“劳动”经济理论已经吸引了工人阶级运动的干部。科贝特没有提出一种首尾连贯的理论，卡莱尔的个人主义又具有排斥性。 796 霍奇斯金含蓄地指出了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但在到达那

---

[139] 《行业报》，1825年7月31日。关于那个在1795年由于饥荒威胁而建立的准合作社性质的面粉厂，见G.J.霍利约克：《一百年前的自助》(1891)，第11章；以及J.A.兰福德：《伯明翰一百年》，第2卷，第157—160页。在手稿《有关合作社的记录及评论》中，洛维特写道，战争期间有许多合作社，尤其是消费者群体，他提到了斯皮特菲尔兹织工。见附加手稿，第27,791号，第245和258帧。

[140] 《行业报》，1825年8月14日。

[141] 可参见《危机》，1832年11月17日。

一点之前，他的分析却刹住了。正如威廉·汤普森指出的，他的理论在任何意义上都同合作理论相一致。前十年的理性主义宣传已经起了作用；由于这种宣传是狭隘和否定性质的，因而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对较为积极的道德学说的渴望。欧文的救世学说满足了这一要求。欧文思想的模糊性使不同思想倾向在运动中共存有可能。我们必须再次指出，就思想而言，欧文主义比欧文本人更清楚，更热烈。对技术工人来说，在 1830 年开始形成的运动似乎终于使他们长期怀有的渴望——全国工会——变成了现实。从 1818 年的“博爱大力神”到 1825 年的反结社法院外集团对联合斗争作出了尝试。在 1825 年的整个夏季和秋季，《行业报》一直在报道布雷德福梳毛工罢工情况，以及全国各地纷纷而来的支持。该报以强调的语气断言：“这是英国所有的工人同布雷德福的一小撮雇主的斗争。”[141] 多尔蒂从 1829 年纺纱工大罢工的失败中看到了又一次教训：“此外，它还表明任何单个的行业都不可能抵抗那个行业的雇主们的联合努力。因此，应该设法联合所有的行业。”[142] 结果出现了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纺纱工联合会，他们的第一次大会于 1829 年 12 月在萌岛举行，在克服三个根本不同的地区建立联合机构时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143] 根据这个基础，全国劳动保护协会曾在短时间内把毛纺工、机工、制陶工、矿工、建筑工和许多行业联合起来了。“然而，当这一组织已经发展到这个城市（曼彻斯特）周围约 100 英里的地方之后，突然受到了一次灾难的袭击，几乎威胁到了它的生存。”[144] “灾难”来自纺纱工内部的分裂和

[141] 《行业报》，1825 年 9 月 11 日。

[142] 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 312 页。

[143] 《有关棉纺工等行业的一次代表会议程序的报告》（曼彻斯特，1830）。

[144] 《工会向导及合作运动通信》，1832 年 3 月 24 日。

嫉妒；过多或过早地向协会要求罢工经费；多尔蒂不明智地企图把《人民之声》的办公室搬到伦敦去。尽管有过许多失败，但全 797 国协会还是为合作思想提供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当运动在曼彻斯特陷入了内部互相责备之时，在陶区和约克郡却继续高涨。[⑱]多尔蒂曾过于急躁地试图推进运动的发展；然而，他从欧文的思想日渐受到欢迎这一情况中正确地看到了如何使全国有组织的工人加入共同运动的途径。从此以后，欧文主义就和全国工联主义的历史合二为一了。[⑲]

公社试验尽管在一两个地方如雷莱恩获得了部分成功，但总的说来还是失败了。虽然某些较小的合作事业仍在苦苦挣扎，但最具雄心的冒险事业，如建筑工人的事业，已经瓦解了。早期建立的大多数协会和商店，过了几年才在罗奇代尔的模式上重新组织。设在格雷法学院路的劳动交易所(即集市)简直是一塌糊涂。欧文派陷入混乱的原因并不是完全无法解释的。我们已知工匠、外作工和工会主义者都在欧文派中占有一席位置。然而，最具有不稳定性质的千年至福因素来自两方面，一是怀有仁慈之心和美好愿望的人，另一方面是穷困潦倒的人。对第一种人来说，欧文主义(由于宣称不主张阶级斗争和阶级剥夺)吸引了一定数量的有博爱之心的绅士和教士——戈德温派，教友派，思想反叛者以及奇思异想者。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如金医生

---

⑱ 见多尔蒂：《穷人卫护士》，1832 年 1 月 21 日："(协会的)管理权已转移至勇敢智慧的约克郡工人手中，我们希望嫉妒和派别争纷的幽灵(曾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协会的极好影响)不要再次出现。"

⑲ 见 G. D. H. 科尔：《建立总工会的尝试》；波斯特盖特：《建筑工会》，第 3—5 章；W. H. 沃伯顿：《陶区工会组织史》，(1931)第 2—4 章。关于全国劳工保护协会所受"灾害"的某些细节，见 D. 卡拉多格·莫里斯：《英国劳工运动史(1825—1851)博士论文》，伦敦，1952。

和非常著名的威廉·汤普森，还大大丰富了运动的内容。汤普森是爱尔兰地主，曾著有《财富分配研究》(1824)、《劳动报酬说》(1827)、以及(同安娜·惠勒合著的)《占人类半数的妇女要求反对另一半即男人在政治上进而在社会生活和家庭中奴役她们的呼吁》(1825)。此外，还有一些人出钱，没有他们的钱，试验就无法进行。在大多数公社里都有一个或几个异想天开的绅士，

798 他们没有集体组织的实践经验，他们的乌托邦试验理想，都使欧文派工匠十分愤怒。宣布人们必须创造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是一回事，而宣布人们可以创造任何一种他们喜欢的新制度却是另一回事。一位主张社会主义的工匠，艾伦·达文波特(先前为斯彭斯主义者)曾用一种带有一点讽刺的语气描述过伦敦劳动交易所的情况：

> 公众被这一新型的非同寻常的运动弄得神魂颠倒……大厅的装饰别出心裁，非常精美……天花板上刻着壮丽的浮雕图案，装饰部分还包上了一层金；而且气势恢宏，足以容纳2000人。但这……还不足以满足欧文先生的美感。他还修了一座华丽的乐坛，并在上面摆了一架华美庄严的钢琴……在庆祝典礼的夜晚……林荫道两旁……昂贵的希腊式路灯把道路照得灿烂辉煌。使用了10种或12种乐器；女士们和先生们和着最甜美的咏叹曲一起歌唱……
>
> 庆祝典礼以一个简短的演讲作为开始，演讲主题是社会之爱、普遍博爱、合作的各种优越性。……演讲之后是音乐会，随后是舞会……。
>
> 在整个一周里，通往交易所的每一条道路都被不断前来聚会的人群给堵死了——有些人是受到了这个新奇机构的吸引，有些人则是为了来看看它的发展情

> 况……;还有一些人则是为了来储蓄和交换……。但是多么不幸啊呀!人们很快发现那些漂亮的劳动券……根本不可能挤入流通领域,在此基础上的食品也没有了。这是最不寻常的运动之一(人们曾期望它在本国或任何国家发生),其结果却是一次彻底的失败。然而,建立这种制度的原则却无可指责,而且应该是公众所珍惜的……。

这段话所描述的欧文正是皮科克在《奇想城》中所嘲笑的那个欧文。欧文派的冒险事绝大多数都干得太过分了。结果均由于滥用资金、滥施仁爱和计划不当而告结束。如果说欧文是欧文主义的最伟大的宣传者,那么他也是最厉害的敌人之一。如果劳动所是由洛维特这样的人掌握着,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41]

理想王国的不稳定性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这也是最直接的原因,那就是来自穷人的千年至福思想。就像在法国革命时 799 期一样,在改革法案骚动及其后的奋激时期,以救世性质的运动重新复活了。索斯科特运动保留了许多支派,这些派别后来都采取了奇特扭曲的方式,[42]也许更能引起精神病学者而不是历史学家的注意。但有三个能进一步证明理想王国的不稳定性的例子也许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叫做"天国"沃德的瘸腿鞋匠,他是乔安

---

[41] 关于汤普森,见R.潘克赫斯特:《威廉·汤普森》(1954)。关于劳动交易所的各种情况,见R.波德莫尔:《罗伯特·欧文》(1906),第2卷;G.D.H.科尔:《罗伯特·欧文传》(1930),第260—266页;以及洛维特前引书,第1卷,第43页以始;达文波特的描述见《全国合作运动领袖》,1851年3月15日。

[42] T.菲尔登:《揭露所谓基督以色列派即"乔安娜帮"的骗人教会的虚假和荒谬……》(1850),其中提到那个虔信的姊妹会执行人会式和纪律时的"神秘"细节:"让女人抓住一个弯着腰的男人的生殖器……她用一只手抓住他,并用另一只手抽打他……。"

娜衣钵的继承者之一，在 1829 至 1836 年间曾有大批追随者。沃德先前是狂热的卫斯理教徒，由于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奇迹，他便相信自己就是那个年迈的乔安娜所宣布诞生的"希罗"。此后不久，他便开始相信自己是基督(以前曾是撒旦)，而且整部圣经都是报道他的到来的含蓄预言书。(新约中关于基督的故事是假的——如果救世主已经到来，"人类为何还没被得救?")沃德狂想的不寻常之处(除了超现实主义的唯我论之外)在于：首先，他是用卡莱尔和自然神论者的主张来支持自己的；其次，他使救世的要求向着激进主义的方向发展。他的追随者在索斯沃思、哈克尼、沃尔沃思以及查塔姆、诺丁汉、伯明翰、德比、切斯特菲尔德、利兹等地不断增多——这些地区以前大多是索斯科特运动的根据地。在巴恩斯利，当他攻击所有的教士，——"从大主教到那些最小的家伙都是伪誓者和圣经中提到的那种假预言者"时，他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欢呼。这些话后来逐渐变成了他的预言的基调："戳穿教士的阴谋！设法废除它！"国王必须"取消主教的巨额薪金，把钱用于公共利益。"他创办了一种周刊《基督评判席》——那也许是惟一的一次让基督在一份大众刊物上周复一周地受人评论。1831 年的整个夏季，听他演讲的人都非常多，卡莱尔圆厅剧场的 2000 个座位经常是座无虚席：

800

海报：在黑僧路圆厅剧场……有救世主的著作出售。

星期四晚上 7:30 和星期日下午 3:00 还有讲道。

1832 年初，他在德比被判犯亵渎罪("主教和教士都是宗教骗子，因此，按英国法律应该处以体罚"——这样说岂不冒险?)，同他的一个合作伙伴一起蹲了两年监狱。尽管他有病而且部分瘫

疾，但仍继续传道直到 1837 年去世。[18]

第二个例子就是那个超凡的“威廉·考特尼先生”(即 J.N.汤姆)。他 1832 年到坎特伯雷时还真有点令人惊讶。他身着东方服装，有谣言传说他发了大财，他在大选中奇怪地得到了 400 张选票，因伪誓罪被判刑之后出版了他的《雄狮》，其见解如下：

> 威廉·考特尼先生……耶路撒冷的国王，阿拉伯的王子，吉卜赛人的国王，国王和国家的保护人……现在坎特伯雷市监狱里。
>
> 汤姆是酒商，原住在乔安娜·索斯科特生活过的西部地区，曾一度是斯彭斯信徒。他的《雄狮》既谴责异教徒也谴责国教牧师：
>
> > 教会是一切罪恶之源。
> >
> > 赚钱！赚钱!! 赚钱!!!
> >
> > 上帝保护寡妇、没有父亲的儿童和不幸之人。

从监狱和疯人院出来之后，他先后住在坎特伯雷附近的一些村庄的农民家里。1838 年 5 月，他骑着马，佩带几把手枪和一柄剑，领着 50 到 100 个手持大头棒的农业工人，开始在周围村庄活动。他们的旗帜是蓝白两色，上有一个张牙舞爪的狮形图案，据说汤姆还向他的追随者读了一段《詹姆士》第五章上的话：

> 走吧，你们这些富人，去为即将降临到你们头上的苦难嚎啕吧……看呀，你们雇的工人正在收割你们用欺骗手段得来的庄稼，大声哭吧：……

妇女尤其相信他有神奇的力量。一个农业工人后来说：“他爱威

---

[18] G.R.巴克兰：《过去的发现》，第 11 章；H.B.霍林斯沃思编：《“天国”著作》(1899)第 1 卷，第 300 页以始；“天国”沃德：《严肃的召唤：救世主致英国人民书》(1831)。

廉先生"——

801　　他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他们讲话，而且总是在读圣经，致

　　使他们不认为他是凡人，于是都情愿为他去死。

像北方的奥斯特勒和斯蒂芬斯一样，他谴责新济贫法违背了天意。最后，一个派来逮捕他的警察被(考特尼或汤姆)杀了。但农业工人们不离开他。50多人同他一起撤到了布利恩森林，并在茂密的树丛中等待军队的到来。汤姆把自己手脚上的铁钉印给众人看并宣布说，如果他被杀了，他还会再复活：

　　这是最后的审判日——这是千年王国的第一日——我要在这一天戴上皇冠。看呀！一个比桑普森[149]更伟大的人物与你们同在！

他答应给他的追随者土地——大概每人是50英亩。当士兵们逼近时，他发出一阵喇叭声，并说如果他在耶路撒冷发出这种声音，就会有10000人听从他的指挥。战斗终于开始了——这也许是自1745年以来在英国土地上进行的一次最猛烈的战斗。面对火枪和刺刀，那群肯特郡农业工人手里只有大头棒。一个目击者说："我一生中都没有见到过这样有决心的人，我一生中从未见到过这样疯狂地袭击我们的人。"考特尼和他的11或12个追随者在战斗中死亡，此外还有一个军官。这次的死亡人数比彭特里奇起义或彼得卢事件的都要多些。[150]

布利恩森林事件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较古老的而非新的文化类型，它是最后一次农民起义。有趣的是，"吵吵闹闹的"布赖恩派即圣经基督教派在肯特郡也有自己的根据地。令人吃惊的

---

[149] 桑普森(Sampson)，旧约传说力大无比的勇士。——译注

[150] P.G.罗杰斯：《博森登森林之战》(1961)，第4页，第96页；《布利恩森林殊死搏斗记》(法弗希姆，1838)；《略论威廉·考特尼爵士其人》(坎特伯雷，1833)；《雄狮》，1833年4月6日和27日；《环球》，1838年6月1日，8月10日。

是，当人们的心灵世界由于地狱之火和上天的启示而充满狂暴的想象，当他们的现实世界到处是贫穷和压迫时，这种爆发事件却并不常见。第三个例子是，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的英国工业地区，摩门教宣传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这个例子能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欧文主义。）几年之内就有数千名的皈依者接受了洗礼，这些“今世圣徒”中有数千人从利物浦乘船去锡安山之城。第一批皈依者“主要是厂主和其他极端贫困的……机工，他们中大多数人受洗礼时都没有衣服可换。”许多领了车马费的人都是直接从布拉夫斯会堂步行并推着手车去盐湖城的。[13] 802

这些例子都着重说明英国劳动人民在19世纪30年代还没有完全接受世俗意识。我们所考察的激进主义文化还只是技术工人、工匠和部分外作工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之下（或说共存的）则是比较朦胧的许多反应层次，像奥斯特勒和奥康诺这类具有神秘能力的领袖人物就是从这些层次中获得某些支持者的。（宪章运动时期，像洛维特这样的人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同那些“留大胡子、穿粗斜纹布短上衣的人”相一致的共同主张和策略。）在新型的理性主义文化同旧式的卫斯理或浸礼教文化互相冲突或在同一个人的头脑里冲撞的地方，不稳定显得特别明显。然而，当非国教思想和理性主义似乎已经铸成并陶冶了南方工匠的性格时，在那些战争期间卫斯理文化占优势的地区，情感的能量似乎却被储存起来或被压抑下去。在30年代的任何时候，只要在北方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土壤中扎上一铲，激情就会从地里冒出来。

因此可以说，欧文主义同时还聚集了某些这类激情。由于

---

[13] 阿米塔奇前引书，第3部，第7章：《利物浦：通往锡安山之路》。

欧文和他的宣传家们预言"繁荣将会出现",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以色列的后代聚集在自己周围。建立公有制社会的渴望复活了,理性的立场变成了兄弟情谊的立场。在这样一个酝酿阶段,唯信仰主义便以世俗的性解放观念的同义词在一些欧文派公产主义者当中神秘地复活了。"如果你们爱一个人","天国"沃德在他的"礼拜堂"告诉年轻人说,"任何时候都可以在一起生活,而不需要任何法律或仪式。"(沃德也有一个殖民乐园计划,主张"凡愿意离开这个社会的人都可以在那里像一家人那样生活在一起"。)此外,对穷人来说,欧文主义还触动了他们心底最深沉的一个东西——梦想有朝一日,靠某种奇迹,再次拥有一块土地的地界桩。

803 人们认为,在19世纪30年代,许多英国人觉得工业资本主义的框架只是部分建成了,没有搭上的欧文主义仅仅是一种曾刺激了群众热情的短暂力量,它认为只要人民团结起来有足够的决心,就能在数年或数月之内建设一种完全不同的框架。布朗台尔·奥布莱恩曾在1833年写道,联合精神已经发展起来了,其目标:

> 比人们所能想象的任何其他目标更崇高,即——建立生产阶级实现对他们自己的生产成果的完全控制……。全面的社会改革——实际上即是全面瓦解现存的"世界秩序"的改革——已为工人阶级所考虑。他们立志要处于社会上层而不是底层——更确切地说,他们希望根本就不存在上层和底层。[15]

回过头看,我们很容易把这种精神看成是天真的或"乌托邦式

[15] 贫民卫报》,1833年10月19日。见M.莫里斯:《从科贝特到宪章派》(1948),第87页。

的"。然而,从学术的高度看问题,我们就没有权利那样说。由于穷人穷到了绝望的地步,而在公社里,他们不仅可以把知识文化同对希腊罗马体育的爱好结合起来,而且还有吃的,这种前景对他们也就有了吸引力。即:对欧文派来说,千年王国不仅会到来,而且会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被创造出来。

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欧文主义的各种形态:工匠的欧文主义是梦想切断中间盘剥的市场经济;技工是要推行总工会;慈善的乡绅希望建立一个理性的有计划的社会;穷人梦想的是土地或天国;织工希望不受雇于别人。所有这些人都想见到一个平等的、人人皆兄弟的、用相互帮助取代相互争斗和竞争的社会。莫里斯在1838年写道:

> 当穷人说:"我们也愿意承认现状就是一切,我们愿意不信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惟一愿意居住的家园"时,那种语言也许会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然而……正是"我们愿意"……为欧文理论的干瘪说教增加以外表的活力。[18]

804

"我们愿意"就证明劳动人民正在成熟,并开始作为一个阶级意识到了自身的利益和渴求。他们对资本主义从制度上进行批评,并提出另外一种更加理性的"乌托邦"式的制度。这样做既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出于对救世主的信仰。问题并不在于欧文"发了疯",而在于(在劳动者看来)有一种社会制度明显用蒸汽机和新型机器取代了劳动者并使他们的状况恶化,市场可以"过分饱和",但那些光着脚在手摇织机旁的织工和在工场里干活的鞋匠却没有上衣可穿。这些人从他们的经历中知道欧文的话是公正的。

---

[18] F.D.莫里斯:《基督王国》,引自阿米塔奇前引书,第85页。

……目前的社会制度是人们所设计的制度中最最反社会、最不聪明、最缺乏理性的制度；在其影响下，人类本性中所有优秀的有价值的品性从幼年开始就被压抑了；那些最不自然的手段只会起到产生最有害的嗜好的作用……[153]

就其主张而言，欧文主义绝非是落后的；相反，它是这一时期抓住了大众的想像力的第一部伟大的社会学说。因为它开始把蒸汽机和工厂作为一种扩大的生产力加以接受。争论的问题甚至已不再是用于赢利的机器的增多，也不是工业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是由谁来控制其社会资本。建筑工匠和小雇主虽然对于控制和把大部分利润分给建筑业大老板和承包商的做法感到愤恨，但他们并不认为解决的办法有赖于众多的小业主。[154]相反，他们希望涉及建筑业的技术合作列入合作的社会管理之中，这是比较好的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有时被认为是从"小资产阶级"中摄取力量的运动，竟然比我们历史上任何一次运动都更真诚地开创了新型的社会生活形态。霍利约克在多年后写道："早期合作社的所有热情和真诚……致力于共产式的生活。'社会主义者'……希望建立自愿、自助和自己管理的工业城市，所创造的财富将由生产财富的所有劳动者公平分享。"[155] 那些把这些试验的失败仅仅看做是人们愚行的证明的人，也许是过于相信"历史"已经证明它们的结局。

欧文主义也有非理性的成分（或者说一般贬义上的"乌托邦"性质），如对宣传缺乏耐心，相信靠演讲和小册子就能宏扬理

[153] 欧文前引书，第 269 页。
[154] 波斯特盖特前引书，第 72—73 页。
[155] S. 波拉德前引书，第 90 页。

论，以及不够注意方法等。成败攸关的尤其是欧文对政治权力的现实抱回避态度，并力图绕开财产权问题。合作的社会主义是简单地去代替资本主义，是用事例，用教育，用合作社在其农村、工场和商店中的发展，没有痛苦，没有冲突地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曾急切地向其读者保证说，合作运动没有"平等倾向"。它的目标是"提升所有人"；它的财富不会取自现存的财富所有者，而是"新生产出来的财富"。[18] 一位沃林顿的牧师宣称："我们……不是作为平等派到这里来的。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剥夺任何人的任何财产。"[19] 1834年，在欧文运动发展到最顶点时还宣布了一项"人道权利宪章"：

> 任何个人的现存财产，无论是通过旧社会的习惯获得的或因自己经营而拥有的，都被视为是神圣的。直到……它不再有用或不再具有交换价值为止……。[20]

这就是欧文主义的弱点。甚至连那个小小的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团体在战争结束时，也看出社会主义需要没收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斯彭斯在他的《使社会恢复自然状态》中写道：

> ……希望看到小农场重新出现，希望不再看到穷人受到极端勒索和压榨的现象等等，这些都是小孩子的见解，除非你把现在的土地财产制度完全推翻。因为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具有压迫的力量和权力……。因此，如果不彻底摧毁这些大力士的权力，任何事都做不成……除非彻底消灭目前的土地占有制度……否则这个世界就不会回到值得居住的状态。

---

[18] 《经济学家》，1821年8月11日。

[19] A.E.马森前引书，第126页。

[20] 奥布莱恩前引书，第437页。

正是这段话使得英国统治者特别愤怒，为此，他们不加审讯便把《基督教的政策》的作者、温和的托马斯·埃文斯关了一年，而当时西德默思勋爵却正在讨论开明的欧文先生提出的建议。就在那一年，最后一批斯彭斯主义者当中的一位有色人种名叫罗伯特·韦德伯恩的黑人裁缝创办了一部印刷质量糟糕的小刊物《无望的希望》：

806

> 欧文先生……将发现，下层阶级完全相信他是土地所有者和政府的工具……。[60]

事实证明，1817 年的斯彭斯派和老激进派都错误地估计了欧文；斯彭斯和埃文斯的农业社会主义信条不适合于工业的英国。不过，斯彭斯派至少还愿意提出所有制和阶级权力问题。

正是因为欧文拒绝正视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才使得他能够在政治激进主义面前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并不时地把运动引向令人迷茫的道路。多年来，合作运动一直同博爱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派保持着并存的关系。然而，到 1832 年，像赫瑟林顿、奥布莱恩和詹姆斯·沃森这类人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想法，并开始拒绝欧文关于取消一切政治手段的建议。欧文主义对他们一直具有巨大的建设性的影响力。从欧文主义中，他们学会了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一种制度而不是一种各不相干的事物的凑合。他们还学会着提出一种新的、强调相互关系的乌托邦制度。他们已经不再像科贝特那样去怀念那个更古老的世界，还获得了设计新世界的信心。他们已经懂得教育的重要，懂得改善环境的意义。他们从汤普森和安娜·惠勒那里学会了提出关于妇女权利的主张。从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没有任何东西似乎是既定的、不可避免的，是从“自然”法则中产生出来的。

---

[60] 《无望的希望》，又名《致苟安者》，1817 年 10 月 4 日和 10 日。

亨特·赫瑟林顿的最后愿望和遗嘱充分表达了这种思想：

> 这是我告别生活之时的想法和感情：我曾生活在一个光怪陆离的制度下，既有竞争、抢夺、自私所带来的祸患，也有其欢愉：这种制度迫使人们不停地苦干并剥夺了他们的天性，使最高尚的人们的道德和社会追求化为泡影；这种制度实际上把所有的人要么训练成奴隶，要么训练成伪君子，再不就是罪犯。因此，我热烈拥护那种伟大而善良的人——罗伯特·欧文的原则。

807

5. 一种机器

弗西斯·普雷斯曾写道："这两人（欧文和霍奇斯金）目前在某些方面造成的危害是无法预计的"。[⑱] "危害"性作品都是在1831至1835年间写出的。在这一点上，本文的研究已告一段落；因为人们有这样一种感觉，认为工人阶级在那时已不再是正在形成，而是已经形成了。跨过从1832至1833年间的门槛，我们便能够在英国各郡的大多数行业中感受到工人阶级的存在。

劳动人民的新的阶级意识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一方面，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水平的工人已经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这种意识体现在他们建立的许多组织机构中，并在1830至1834年间的总工会运动中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表达了出来。而在1780年时的英国，这种意识和这些机构组织还只是处于零零碎碎的状态。

另一方面是意识到工人阶级或"生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同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而且其中还包含着日益成熟的建立新制度的意识。然而，这种阶级意识的最后定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

⑱ 附加手稿，第27,791号，第270帧。

要取决于中等阶级对工人阶级力量所作出的反应。这二者之间的分界线在1832年的选举资格条件中被小心翼翼地划了出来。我们本来希望看到日益发展的中等阶级改革运动,而后面跟着一条工人阶级运动的尾巴。只是到后来,才出现工人阶级的宣传,但实际上,这个过程被倒了过来,这是英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奇怪特点。法国革命的情况是同时引入了三个并举的过程:惊恐万状的土地贵族和商业贵族采取了反对革命的态度;工业资产阶级退缩了,并开始同现状和解(在有利的条件下);大众改革运动迅速激化(那些在战争期间顽强地幸存下来的雅各宾骨干主要是小业主、工匠、织袜工和剪绒工以及其他工人)。1795
808 年之后的25年可被视为"漫长的反革命"时期。因此,以先进的、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为其理论的激进运动,便多半具有了工人阶级性质。然而,这一运动的成功是不会受到工厂主、铁工厂老板和制造商的欢迎的。因此,一种特别主张抑制和反平等主义的意识便在英国的中等阶级中产生了(戈德温向边沁让步,边沁则向马尔萨斯、麦卡洛克和尤尔牧师屈服,这些又导致贝恩斯、马考莱和埃德温·查德威克等人的主张出现)。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旧制度的抵抗和工厂主的怯懦,旨在克服腐败的旧制度的明显非理性弊端的最温和的改革措施同时也被推迟了。

1832年的改革法危机——更准确地说,是从1831年初开始直到1832年"五月的日子"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几乎可以从每一点上说明这些命题。骚乱来自"平民",并迅速表现出最令人惊讶的思想一致性,这正是"改革"所非常需要的。从一方面看,英国在这12个月中无疑正在度过一场有可能导致革命的危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表明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从事符合宪法和准合法斗争的经验:

人民在行进中表现出来的有条不紊和稳健的坚定性、

能动性及技巧使改革的敌人大吃一惊。在城市、市镇和教区，几乎各类人都在举行集会；参加集会的既有属于俱乐部的技术工人，也有不属于任何一种行业俱乐部或协会的普通工人……。

这就是普雷斯在1830年秋季写了之后又在(1831年2月)补充过的话：

……然而，同一地区的不同地方之间却连最微不足道的交流也没有，每个地方的人似乎都懂得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63]

1831年3月，国王的私人秘书向格雷抱怨说，那些参加规模不断壮大的示威游行的人，"绝大多数来自最下层阶级"。1831年秋季和1832年5月参加伯明翰和伦敦两地的大游行的人数已超过1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工匠和工人。[64] 809

"我们没有造成改革的激动情绪"，1831年5月，格雷有点恼怒地向国王写道："我们就职时就发现这事闹得挺凶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解释为什么在那些充满危机的年份里，革命事实上不可能发生。首先，工人阶级激进运动显示了非常的力量；其次，中等阶级的领袖们，如布鲁厄姆和《泰晤士报》、《利兹信使报》的领袖们巧妙地利用了工人阶级所形成的威胁，并通过谈判找到了一条除那些最死硬地维护旧制度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退却路线；再次，辉格党和较容易妥协的托利党人意识到，尽管布鲁厄姆和贝恩斯不过是在讹诈他们，但如果不能达成妥协，中等阶级改革派就再也不能阻止他们背后的骚动了。

---

[63] 附加手稿，第27,789号。关于自发组织中的这类事例，见普伦蒂斯前引书，第408—410页。

[64] 杰夫森：《论坛》，第2卷，第15章。

工业资产阶级一心希望革命不要发生，因为他们知道，当开始那一天，就会出现一个的剧烈的激进化过程；亨特派、工会派和欧文派领袖就会在几乎所有的工业中心赢得日益增多的支持。《贫民卫报》写道："'革命'被中等阶级和小业主们利用了，然而——

> 暴力革命不仅超越了那些要威胁它的人的手段，而且对他们来说还是最使人惊慌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一种革命只能由穷人和受鄙视的大众来完成，只要把他们刺激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在那些人的目标之外，利用革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而……使他们可爱的财产权陷入危险之中；可以肯定地说，暴力革命是他们最恐惧的东西……。[16]

中等阶级改革派在两条战线上巧妙地作战。《泰晤士报》一方面以群众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的面目出现："我们相信，在联合王国，没有一个郡镇或村庄不存在要求改革的集会和请愿活动……。"它甚至极力敦促人民："在全国组织政治社团是他们庄严的责任。"它支持——就像爱德华·贝恩斯在利兹欢呼的人群面前所宣布的那样——采取直接把人民引向革命的强迫性措施：挤兑现金，拒绝纳税，使政治同盟的成员武装起来。在如何看待1831年10月发生在诺丁汉、德比和布里斯托尔的骚乱的问题上，以伯明翰为楷模的各地政治同盟却显示出了自己的双重作用：

810

> 这些联盟赞成促进改革事业，主张保护生命和财产，使之免受暴民的任何侵犯；此外，还主张维护其他的重大

[16] 1831年10月1日。

利益,并抵抗寡头政治的有组织的暴虐行径……。[159]

这些中等阶级又纵火,又要携带警棍。有时候,托利党人自己也想要鼓动独立的工人阶级改革运动,以使之形成咄咄逼人的势态,以此来迫使布鲁厄姆和贝恩斯会向腐败的旧制度寻求保护,从而使他们服服帖帖。当工人阶级全国同盟提出要在伦敦发动一次要求成年男子选举权和抵制辉格党改革法案的示威游行时,国王自己写道(1831 年 11 月 4 日):

> 陛下对于拟议中的集会打算采取的措施没有丝毫的不满意,虽然这些措施相当激烈而且……易遭致异议,但他相信这当中所表达的意图和目标有可能……为抑制政治同盟的发展提供机会……。[160]

全国各地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改革派都在想方设法控制运动。最初阶段,即到 1831 年夏季为止,是中等阶级激进派占上风。7 年前,伍勒曾怀着悲哀的幻灭感最终宣布《黑矮人报》的停刊。原因是(在 1824 年)没有“对议会改革事业热心的公众”。尽管成千上万的人闹着要改革,但在他当时看来,他们不过是“吵着要面包”;1816 至 1820 年间的那些演说家和报刊编辑及撰稿人只不过是从“社会酵缸里冒出来的泡沫”。[161] 19 世纪 20 年代末期的许多工人阶级领袖都有同他一样的幻灭感,而且还接受了他们的大师——欧文——的非政治立场。直到 1830

---

[159] 《泰晤士报》,1830 年 12 月 1 日,1831 年 10 月 27 日;见杰夫森前引书,第 2 卷,第 69 和 107 页。在布里斯托尔的骚乱中,当局不得不请布里斯托尔政治同盟的领导人出来恢复秩序。见《布里斯托尔信使报》,1831 年 11 月 1 日;普伦蒂斯前引书,第 401 页。

[160] 引自杰夫森前引书,第 2 卷,第 111 页。全国同盟打算组织的的示威游行事实上被断定为扰乱治安事件,随后便被禁止了。不然这个风险就冒得太大了。

[161] 停刊辞,《黑矮人报》,第 12 卷(1824),序言。

811 年夏季，随着农业工人"起义"以及法国的七月革命的爆发，大众的兴趣逐渐转移到政治鼓动上来。由于顽固不化的死硬派（威灵顿公爵、上院议员、主教）顽固地殊死反对任何改革措施，势态的发展也就有了走向，（中等阶级激进派充分利用）这一发展，大众骚动的力量集中到格雷和罗素的背后，支持一项对大多数人都没有好处的法案。

于是，1816 至 1820 年（以及 1791 至 1794 年）各种力量的统一战线（大众的改革要求同卡特莱特少校的成年男子选举权纲领其实是一致的）就这样破裂了。1831 年 11 月，格雷在下院宣布说："如果有什么人以为这次改革会导致更深远的措施"，

> 他们就错了。因为还没有一个人像我那样坚决地反对年度议会、普选权和无记名投票。我的目的不是支持，而是要终止这类希望和计划。

老激进派对于这一点是看得够清楚的。他们中大多数能说会道的发言人直到决定性的"五月的日子"到来时为止都在起哄地嘲笑辉格党的法案。"麦克尔斯菲尔德的一位激进主义者宣称，"如果垄断和腐败仍然保持不变，那么，无论由选区贩子或由嫖客或奶油乳品商来统治，其实都无所谓。"[10] 亨特作为普雷斯顿的议员（1830—1832），仍坚持他先前的主张，只是在语言上稍微谦逊了一点。机智勇敢的激进派教师乔治·埃德蒙兹曾主持在伯明翰新会堂山举行的战后第一次群众大会，他宣称：

> 我不是房产持有人，——但在危机时刻，我可以持有滑膛枪。"法案，这惟一的法案"不承认乔治·埃德蒙兹是公民！——乔治·埃德蒙兹蔑视它，除此之外，还要算

[10] 《贫民卫报》，1831 年 12 月 10 日。

一个痛打国家的强盗。[169]

这也是伦敦激进工匠中的精英们的立场，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全国同盟的成员。赫瑟林顿的《贫民卫报》——无疑是英国（到那时为止）最好的工人阶级周报——曾报道他们在 1831 和 1832 年每周在圆厅剧场讨论的情况，参加讨论的有赫瑟林顿本人（没蹲监狱时）、威廉·洛维特、詹姆斯·沃森、约翰·加斯特、才气焕发而又不幸的朱利安·希伯特以及年老的威廉·本波（先前是班福德和米切尔以前的同事，现在则极力主张"全国大休假"，即进行一个月的总罢工，在罢工过程中，生产阶级将能控制政府和财富）。[170] 讨论渐渐涉及到阶级的定义问题。同赫瑟林顿齐名、最早为"无印花税"报刊的发行而斗争的威廉·卡宾特提出了不同的想法，认为应该把辉格党法案看做"楔子"予以支持。他抱怨说，《贫民卫报》把"中间商"和"中等阶级"当作"同义语"来使用；其实，中等阶级"不仅不是一群与你们的利益不同的人，相反，他们与你们是同一个阶级；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劳动者。"[171] 整个危机期间，这种争论都在进行。法案通过之后，《贫民卫报》报道了争论的结果： 812

> 提出改革法案的人，不是想推翻，甚至也不是为了改造贵族制度，而是为了从中等阶级那儿获得一支准贵族增援军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辉格和托利之间的惟一差别是——为了保护财产，辉格党愿意拿出一点

---

[169] G.埃德蒙兹：《英国革命》（1831），第 5 页。埃德蒙兹在宪章运动中也起了积极作用。

[170] 见 A.S.G.鲁特：《本波的全国大休假》，载于《社会史国际评论》（莱登），第 1 期，1936 年，第 217 页及以下。

[171] W.卡特：《就改革法案致工人阶级书》（1831）；可参见《贫民卫报》随后报道的争论。

虚幻的东西，而托利党人则什么也不给。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大众是傻瓜，他们也不会因得到那点虚幻的东西而罢手的，相反，他们还要继续争取现实的好处。⑫

参加圆厅聚会的那些好斗的欧文派究竟能代表多大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意见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他们开始时只代表了工匠当中的知识分子，但他们迅速地聚集了力量；到1831年10月，他们还能组织约有7万多人参加、许多人都扎着象征成年男子普选权的白围巾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1832年3月，又有约10万人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反对全国斋戒日的示威活动。普雷斯把圆厅聚会者（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却被他写成是"凶暴的"）视为对中等阶级策略构成最大威胁的人物。在他的改革法案危机纪事手稿中（历史学家们过于信赖这部手稿了），他用了许多篇幅来探讨限制他们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他自己的对抗性团体——全国政治同盟的影响来取而代之的无耻战略。威灵顿公爵本人把这种论战看做是现存制度同圆厅之间的斗争，并把二者比作两支"交锋"的军队。但他的军事头脑被搅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明白在两军之间划不出一条界河，无法在桥上设置适当的哨兵和哨所。敌军其实就布置在自己阵营中的敏感位置上。⑬

然而，1831年10月的游行队伍主要是（似乎如此）由"店主和高级工匠"组成的。尽管他们的人数颇为壮观，但同人口较少的伯明翰庞大的游行示威队伍相比，他们就显得可怜了。情况似乎是这样，虽然伦敦工匠最终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有凝聚力

⑫ 《贫民卫报》，1832年10月25日；A.布里格斯：《进步时代》，第258页。

⑬ J.R.M.巴特勒：《伟大改革法案的通过》（1914），第292—293、第350页；附加手稿，第27.791号，第51页；有关"采取措施结束圆厅的骚动性集会"的备忘录，见《威灵顿公文》，第2辑（1878），第7卷，第353页。

和高度号召力的领导集团，但他们同伦敦的劳动群众以及“不体面”行业的工人之间存在着宽阔的鸿沟。(伦敦的宪章运动史上不时出现这种问题。)这方面的情况曾被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用漫画形式表现在一部粗鄙下流危言耸听的小册子的插页上。他把圆厅聚会者看做是“无赖”或理想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危险性在于他们有可能把犯罪阶级——“社会奴隶”，即果园街、威斯敏斯特和白教堂附近的人的破坏能量释放出来。此外还有数以千计不关心的(但又是危险的)人，如“叫卖小贩、牲畜贩子、杀牛匠、宰马匠、卖死畜和狗肉的、贱痞子、烧砖匠、扫烟囱的、掏粪工、清道夫等等”。他对圆厅里的欧文派社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他们多半是“以勤劳为立身之本的严肃正经的人”——他们的优秀才能容易把他们同危险阶级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他们许多人都是“到处居住、生活放荡的单身汉，如果他们在伦敦放火，是不会担心家里还有无助的人需要关心的”：

> 在举止方面，他们是温文尔雅并不粗俗，但一旦涉及到敏感的问题——他或是拂袖而去，要么是……眨着眼睛对你说，是政府雇你来胡说的。妥协比坚决的反对更让他们恼怒。

814

他说(具有某种真实成分)他们许多人“拥有武器”：

> 如果伦敦民众的暴动发生了，人们就会发现他们站在最危险的地方，率领着小偷和暴民，向他们传授最有效的方法，临死前，如果命该如此，他们还会喊几声表示蔑视的话。

“这些就将是我们的革命战士，如果我们一定要有一次革命的

话。"[15]

这情形太夸张了，但并非全不真实。[16] 在当局看来(无论辉格党还是托利党)，危险在于工匠社会主义和"犯罪阶层"有可能联手。但伦敦的非技术群众却生活在不同于工匠的另一个世界里——极端困苦、文盲、普遍缺乏的道德而且疾病流行(1831至1832年冬季的霍乱大爆发就是例证)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各种古老的问题，以及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大都市所造成的种种问题。[17]

非技术工人既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也没有组织(除互助会之外)。他们同工匠一样，很容易跟在一位绅士后面行动。然而，1831年10月开始的政治危机的严峻现实，足以使构成他们生活中的宿命观、服从论以及缺衣少食的现象外壳决裂，那个月发生在德比的骚乱、诺丁汉城堡的抢掠、布里斯托尔的广泛骚动——都是社会基础发生深刻动摇的征兆。当时的旁观者们还急于希望伦敦的东区发生暴动。

815

伯明翰政治同盟是一个可以让人接受的组织(《泰晤士报》曾专门就此予以赞扬)，因为当地的产业环境有利于仍处于中等阶级牢固控制下的群众改革运动开展。伯明翰的激进主义运动

---

⑮ F.G.威克菲尔德：《受到下层社会威胁的房产持有人》(无日期，1831年10月?)。

⑯ 尽管洛维特和他那个圈子的人主张使用除暴力之外的最大程度的压力(他们同普雷斯保持着一定联系)，但其他人，包括本波和希伯特，却准备着武装斗争。

⑰ 推测一下普雷斯经常断言的伦敦下层人民的行为和道德的改进和提高表现了多大程度的真实性，倒是有趣的；或者仅仅是扩大了工匠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鸿沟，缩小了普雷斯自己的经验圈子，并将城市中心的贫困现状向东和向南扩展。关于大都会的发展以及道德沦丧(及其"生物学的"基础)等所有问题，见J.薛瓦利埃：《19世纪上半叶巴黎的劳动阶级和危险阶级》(巴黎，1958)，该书为我们研究伦敦的情况提供了许多新思路。

同英格兰中北部和北方相比有着重大差别。它的小型产业中没有卢德运动的根基，而政治同盟之"父"的托马斯·阿特伍德在1812年领导雇主和工匠联合反抗市镇委员会指令时，首先博得公众的重视。1817至1820年在黑乡肯定有激进的"实力派"团体，不过——或是运气好，或是能正确判断——他们从来没有因采取如彭特里奇起义和格兰奇荒地事件那样的流产行动而暴露。[18] 正如布里格斯教授所指出的，托马斯·阿特伍德之所以能在1830年把各种不同的"不满力量""协调并联合起来"，是因为伯明翰的工业革命"成倍增加了生产单位的数量却没有增大现存企业的规模"。那里的技术劳动几乎都没有被机器取代，无数小工场的存在说明社会分化还不太严重，而且工匠还可能上升到小雇主的地位；经济衰退时，雇主和工匠都同样受害。[19] 可见这里的阶级对立情形要比曼彻斯特、纽卡斯尔和利兹微弱些。在改革法案危机期间，阿特伍德一直用心良苦地控制着伯明翰同盟(奥布莱恩后来回忆说)"以致伯明翰的工人似乎真以为'改革过'的议会真的(尽管并不是真的)会代表他们"。而且，奥布莱恩还在一份赞辞(出自这样一个严格的批评家之手，给人的印象便更深刻了)中写道：

众所周知，改革法案的成功更多地应归功于这个团体。 816
在事态发展的关键时刻，它通过秩序井然的行动、广泛

---

[18] 奥利弗关于伯明翰联络点情况的详细报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见内政部档案，第40.9号中的叙述部分)。另见内档案，第40.3号和第40.6号中的证词。

[19] 见科贝特的愤怒批评："你们以为大厂主、商人和银行家高喊改革是因为他们已经转变为人民权利的爱护者！呸！……[经济原因]已经迫使他们提高了工人的工资，而他们是不肯付这些钱的，也不肯交纳什一税和国税……。因此，他们成了改革者；因此，他们伸出了强壮的手臂，揽住了女神的腰肢。"见《政治纪事报》，1831年10月17日。

的组织以及盛大的人民集会，使法案的通过成为不可阻挡之势。[110]

在利兹、曼彻斯特和诺丁汉这类中心，中等阶级改革者的情况就要困难得多。在曼彻斯特（就像在伦敦一样），一些相互竞争的政治同盟同时并存，从 1831 年 10 月起，主张男子普选权的同盟占了上风。同月在博尔顿，由于法案被上院否决，当地的政治同盟便发生了分裂，最大的一派（主张男子普选权）组织了一次有 6000 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他们的旗帜上写着："打倒主教！""贵族滚蛋！"[111] 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这类事件发生了数十次。"走进任何一条胡同或酒店，只要在有几个工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多尔蒂 1832 年 1 月写道：

> 然后再听他们谈上 10 分钟……你就会发现他们讨论的主题至少 7/10 是那种骇人听闻的问题：是袭击富人的性命，还是袭击他们的财产？[112]

《贫民卫报》在 1831 至 1832 年的冬季刊载的都是嘲笑 1831 年法案及其相随的手续程序的文章，确实显得有些书生气。圆厅聚会者将该法案看做是一个圈套（并看做是对激进主义运动的出卖），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腐败的旧制度以新石器时代的石头来顽强抵抗任何改革，使整个国家面临革命的威胁。《贫民卫报》后来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并把梅塞龙中校的《人民自卫法》（关于巷战的一本手册）一书的内容，作为特别增刊加以出版。[113] 在"英国陷入不安和混乱的 11 天"，上院最终通过法

---

[110] 《毁灭》，1833 年 2 月 2 日和 3 月 9 日；A. 布里格斯：《三个英国城市的议会改革运动背景》，载于《剑桥历史杂志》（1952），第 293 页；及《进步时代》，第 247 页。

[111] W. 布赖姆洛：《博尔顿政治史》（1882），第 1 卷，第 111 页。

[112] 《贫民卫报》，1832 年 1 月 21 日。

[113] 附加手稿，第 27,795 号及第 26—27 页。

案之前，弗朗西斯·普雷斯一直在屏息注视。法案通过的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就写道：

> 当时我们处于总暴动的时刻，如果威灵顿公爵有可能组阁的话，那早就同人民相冲突了。

817

“主要市镇”将会出现路障栅栏——阻止纸币流通：如果革命发生，那“在更大程度上将会是一次全民的行动，就不会向以前那样进行了”。

在1831年秋季和“5月的日子”里，英国处于革命的边缘，如果一旦发生革命，就很有可能(如果我们考虑到合作理论和工会理论的同步发展)以其迅速的激进化特点而成为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预兆。J.R.M.巴特勒的《伟大改革法案的通过》为我们提供了危机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但因他对整个局势发展中潜在着的因素认识不足，所以他的研究的说服力就因此而削弱。这种情况表现在象征这一类评价之中(这一段是评价工人阶级全国同盟的)：

> ……它以狂妄的姿态，厌恶有教养的人……贝思内尔草场支部向国王请愿，要求废除上院或芬斯伯里区敦促下院没收199家贵族的产业时的蛮横无知。[159]

作这种评价要谦逊一些。革命的确没有发生，原因部分应归于科贝特(极力主张接受当局的部分让步)所代表的激进主义传统中的那部分强烈的合法主义倾向[160]；另一部分则应归于中等阶

---

[159] 巴特勒前引书，第303页。

[160] 见格拉斯顿的一段评述：“我就改革即革命这一既定题目……同一个工人谈话……我说，那么，看看外国的革命吧，当然指的是法国和比利时的革命。那人严肃地看着我，然后说……去他妈的外国，古老的英国与外国有什么相干；这还不是我惟一的一次从下层阶级得到的重要教训。”见J.莫利：《格拉斯顿传》(1908)，第1卷，第54页。

级改革者的手腕。他们正确地提出的妥协不会削弱反会巩固国家和财产权，以对抗工人阶级的威胁。

辉格党领袖们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找到使许多人依附于财产及良好秩序的方法，格雷说："最重要的是用对国家和对制度的支持和爱心来把社会的中间派和较上等的阶层联合起来。"[136]

818 贝恩斯在1831年的调查表明，当时有一条被极其小心地划出的界线，他发现利兹有10英镑的房产持有人被明白地显示出来。在一封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信中，通报了调查的结果，这应该被视为关于改革法案危机问题的标准文献之一。贝恩斯的那些善于对选举结果的票数作出估价的游说者——

> 一致表示，关于10英的资格不承认不稳当不明不白地授予那些单身汉，于是他们吃惊地发现被允许拥有选举权的人相比之下是多么的少。

为了答复罗素关于房产持有人同其他人口之间的比例问题，检票员们报告说：

> ……在主要由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有选举权的户主不到五1/10。在商店众多的街道，几乎每一户主都有选举权……在有11000居民的霍尔比克镇，其中主要是工人阶级，但也有好几家工厂、染坊、酒吧以及体面的宅第，只有150个选民……。在马歇尔先生的工厂做工的140个户主、家长中，仅有2人有选举权……在霍尔比克的欧·威兰先生父子的工厂中，160或170个户主中没有一人有选举权。机器制造工——最高级别的机工——泰勒和沃兹沃思先生雇佣的约100个户主中，只有1人有选举权。按照该法案，工人阶级中将被

---

[136] A.布里格斯：《19世纪早期英国的"阶级"语言》，前引书，第56页。

授予选举权的人似乎不超过1/50。

即使是这样的估计似乎也有些过分。1832年5月交给政府的统计表表明，在利兹(人口为124000)将有355个“工人”会获得选举权，其中143人是职员、仓库业主、监工等，其余的212人都有特殊身份，其收入每周在30先令和40先令之间。[107]

由于内阁先前曾考虑把10英镑选举资格提高到15英镑，这些调查无疑使内阁放了心。普雷斯写道，“人民当中的大多数都相信，或是议会通过改革法案，或是他们就以暴力手段——如果改革法案被否决的话——获得比法案内容更多的权利……”[108] 正是这个“更多”的东西，在1832年威胁着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并使土地财富和工业财富之间、特权和金钱之间取得了和解，这就形成了英国持续至今的社会结构。在贝恩斯和科布登的旗帜上写的并不是平等和自由(也很少写博爱)，而是“自由贸易”和“节约”。布鲁厄姆鼓吹的是财产、安全、利益。他在改革法案二读时发言说，“如果说有暴民”——

819

那么也有人民，我指的是中等阶级——指的是成千上万品行端正、有身份、有名望的人——他们是社会中人数最多而且是最为富有的阶级。如果你们把你们所有的贵族城堡、庄园、特许饲养权和狩猎权以及你们全部的宽阔的土地拿去拍卖，而且是以50年的价格拍卖，不足以抗衡中等阶级巨大而坚实的财富。中等阶级还具有英国人的稳重、理性、智慧和诚实，他们是这些品质的真诚继承人……。我恳求你们不要惹恼热爱和平但又不屈不挠的人民……。作为你们的朋友，作为我

[107] 贝恩斯：《爱德华·贝恩斯传》，第157—159页。

[108] 附加手稿，第27790号。

> 的等级的朋友，作为我家乡的朋友，作为君主的忠实仆人，我奉劝你们以最大的努力帮助维持和平，维护宪法制度使之永存……[188]

法案通过之后，贝恩斯抛开了华丽的文词，说出了中等阶级激进派的要求：

> 改革的果实即将收获，许许多多的商业、农业垄断权就要废除，教会就要得到改革……封闭的工厂就要开放，节省和节约的规定即将推行，奴役的枷锁将被打碎。[189]

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要求则没有如此清楚地表达出来。他们最低限度的政治纲领也许是在工人阶级全国同盟的机关报《贫民卫报》上提出的：

> 根除贵族制恶魔；建立共和国，即由普选权基础上的代表民主制；取消世袭衔门、头衔和称号；废除……长子继承权；……司法俭省迅速，废除狩猎法，取消凶恶的报税……；解放我们的同胞公民——犹太人。把济贫法引入爱尔兰，废除侵犯财产罪的死刑，"大主教"、主教的收入用于维持穷人生活；废除什一税，教士或牧师的工资由他们的教派支付；"国债"不成为国民之债；遣散专制主义的工具——士兵；建立国民卫队。[190]

这是一份从18世纪90年代以来没有什么发展的雅各宾主义的旧纲领。(1831年11月由洛维特和詹姆斯·沃森起草的全国同盟宣言的第一条原则是："任何财产——通过诚实劳动获得

---

[188] J.R.M.巴特勒前引书，第284—285页。

[189] 贝恩斯前引书，第167页。

[190] 转引自A.L.莫顿和G.塔特：《英国工人运动》(1956)，第59页，它(错误地)说这段话引自《贫民卫报》，1831年3月3日。

的——都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18])然而,围绕着那个"更多的东西",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根据自己最大的不满又提出了其他要求。在兰开郡,多尔蒂同他的支持者们主张"普选权的惟一含义就是给予每个人一种权力,使他能够保护自己的劳动不被他人吞噬。"[19] 欧文派、工厂改革者以及像迫不及待的威廉·本波那样的"实力派"革命者则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不过,争论的条件最后还是被成功地限制在布鲁厄姆和贝恩斯所希望的范围内。这是(正如雪莱在1822年所预见的那样)"血统与黄金"的斗争;结果,为了排除平等的要求,血与金妥协了。从法国革命到改革法案通过的这一时期,中等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了。同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中等阶级意识相比,它具有较保守、较缺乏远大的理想(也许除了其他民族的理想之外)、较狭隘自私的特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中等阶级的激进派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一直不得不在"两种民族"之间摇摆。出于名誉的考虑,有许多知识分子宁愿被别人认为是宪章主义者或共和主义者,也不愿被让人认做是临时警察。但有一些人如韦克利、纽波特的费罗斯特、邓库姆、奥斯特勒、恩斯特·琼斯、约翰·菲尔登、W.P.罗伯茨,以及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等,则一直在发出不满的个人和知识分子不满的"声音"。他们的思想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代表中等阶级的意识形态。

爱德华·贝恩斯在给罗素的信中无非是提出了几乎像算术一般严格的阶级定义。不过,在1832年,阶级的界限是以社会觉悟、根据选举权资格用一支擦不掉的铅笔硬划出来的。此外,在这些年中还出现了一位有才干的、为工人阶级的境况下定义 821

[18] 洛维特前引书,第1卷,第74页。

[19] A.布里格斯前引书,第66页。

的理论家。似乎是命里注定的安排，他竟是一位与英国极端激进主义和欧文社会主义的经历连在一起的憎恨英国辉格党的爱尔兰知识分子。詹姆斯·"布朗台尔"·奥布莱恩(1805—1864)，一位爱尔兰酒商之子，都伯林三一学院的高材生，1829年到伦敦"研究法律和激进改革"：

> 我的朋友让我来研究法律；我本人则喜欢研究激进改革……，虽然我在法律方面完全没有进展；但在激进改革方面却有巨大进步。如果明天国王学院要设立一个激进改革教授职位(顺便说这是极不可能的事)，我想我就会成为候选人的……我似乎感到自己血管中的每一滴血都是激进的……。[194]

改革法案危机期间他曾主编过《英格兰中部代表》，后来，他便到伦敦接管《贫民卫报》。

他在评论改革法案时写道，"我们早已预见到它将会把以前曾倾向于同人民一起行动并受贵族排挤的大量中等阶级同工人阶级合并。"[195] 在他为波那罗蒂的"平等派密谋"写的序言中，他用了一个比喻："吉伦特派为了更有效地镇压工人阶级，愿意把选举权扩大到小经纪人(正像我们英国的辉格党人通过改革法案所做的那样)。"中等阶级的政府是所有政府中最折磨人最冷酷的。"[196]

这是他经常重复的主题。辉格党行政当局的每一项新行

---

[194] 《布朗台尔全国改革者报》，1837年1月7日。奥布莱恩在都柏林公开受审时实际上是熟悉法律的。

[195] 《毁灭》，1833年3月9日。

[196] 奥布莱恩前引书，序第15，20页。关于奥布莱恩，见G. D. H. 科尔著《宪章派人物》(1941)，第9章；T. 罗思坦：《从宪章主义到工党主义》(1929)，第93—123页；比尔前引书，第2卷，第17—22页。

动——爱尔兰高压法案、否决10小时工作日案、压制工会、济贫法修正案等等——都重新加强了他的愤怒。“在改革法案通过之前”，他在1836年写道： 822

> 人们还以为中等阶级同劳动者有一些共通的感情。那种幻想现在已不存在了。爱尔兰高压法案通过后，那种幻想还存留着，随着饥饿法的制定它才完全消失。在唯利是图的法律统治下，工人再也别指望会有正义、道德和宽恕了。[99]

由于奥布莱恩本人是从中等阶级文化圈中逃出来的，因而在论及他本阶级的特别乐于模仿他们在客厅里闲谈的那种话题：(中等阶级的)追求和习惯特别低下。他们的生活必然充满着卑鄙的诡诈和投机……”：

> 这两个阶级从来就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任何共通的利益。工人关心的是干尽可能少的活和得到尽可能多的报酬。中等阶级关心的是让工人尽可能多地干活而给他们尽可能少的钱。他们各自的利益就像两头牛一样直截了当地对立着。

他还相当有天才地企图把极端激进主义的传统同欧文主义传统拧在一起，形成一种自称是进行政治革命、剥夺有产阶级并建立欧文派公社制度的革命的社会主义：

> 我们必须进行一次骚塞所称的“革命之中的革命”，这就是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1794年初在法国所设想的那种革命；即彻底推翻财产分配制度……财产——财产——始终是我们必须对准的目标。没有财产制度的变革，任何进步都不可能发生。

---

[99] 《两便士快报》，1836年9月10日。

这样的革命(他希望)在实现普选权之后,不需要暴力便会发生:"现实的不平等源于少数人的法律;多数人的法律则将消灭不平等。"⑱

当今的历史学家肯定不会赞成奥布莱恩把改革后的辉格党行政当局的统治措施过于生硬地同"中等阶级"利益划等号。⑲(腐败的旧制度比辉格党政府更有活力,如在取消谷物法的持久战中所表现的那样。)而且,选择这样一个理论家(中等阶级出身)作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表述者也是不恰当的。然而,站在运动的风口浪尖上的奥布莱恩根本就不是一个怪人。作为《贫民卫报》和其他报刊的主编,他拥有众多的并且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读者,后来他还赢得了宪章运动的"导师"称号。他的作品贯穿19世纪30年代早期众多运动的一条中心线,并为旧民主主义的要求、社会运动(反对新济贫法及拥护工厂改革)、欧文派的公有制试验和工团主义者的工会斗争提供了相互间的思想联系。同战后年间的科贝特和伍勒一样,奥布莱恩同样是他的时代的真实代言人。

当然,大多数工人对改革法案所感到的失望还较少具有理论色彩。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尝尝。我们可以从利兹这个小范围内发生的几件竞选事件中看到这种尝试。贝恩斯已经利用自己的影响安排布鲁厄姆做了约克郡议员,此后他又为辉格党提供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利兹最大的雇主之一——马歇尔;另一个是马考莱。一位追随辉格党的店主在日记中是这样称呼他

---

⑱ 《毁灭》,1833年3月9日,8月24日;《人民保护者》;及《工会公报》,1833年12月14日。

⑲ 19世纪40年代,当宪章主义者和中等阶级的某些人士之间出现了联盟机会时,奥布莱恩又因自己当初激烈地排斥所有"中等阶级"而开始感到后悔。见比尔前引书,第2卷,第126页。

的。马考莱是对改革法案最为满意的思想家之一，他用新的措词解释了托利党的“实际代表制”原则：

> 较高等和中等的人是人类的天然代表，他们的利益在某些事情中可能同他们的较穷的同胞有冲突，但这种利益是同无数后代的利益一致的。

他悲叹“在财富的分配上不平等，不平等强加在人人的认识上”，同时又“以不可争辩的理由证明这不平等对一切阶级的幸福是必须的，是显而易见的不公正的”。同他相比，马歇尔先生算不上是一位理论家。不过——如果激进派的一份境况材料是可信的话——他认为一周 12 先令对一个有家之人来说是一份不错的工资，工人阶级可以用移民办法改善自己的境况。而且： 824

> 在马歇尔先生的工厂里，曾有一个 9 岁的男孩被扒光衣服，绑在根铁柱上被人用皮带无情抽打，直至昏死过去。[90]

托利党候选人是萨德勒，他是十小时工作制运动在议会中的主要代言人。两年前，奥斯特勒就同缩短工时委员会一起发起了禁止童工的感情强烈的运动。令人震惊的“朝夕约克运动”就发生在上一年的 4 月，十小时工作制运动（同欧文派的运动一样）在数月的改革法案危机期间一直在不停顿地进行。因此在这场竞争中，奥斯特勒打算站在萨德勒一边反对那位曾在《利兹信使报》上拐弯抹角地为工厂主辩护的贝恩斯。科贝特也打算这样做，事实上他提补了贝恩斯的话，使我们想起了那个时代的诽谤法的宽松程度：

> 这位好说谎言的伟大的胡吹家布鲁厄姆……总是想方设法至少让一个议员在下院做出比 50 个议员更多的

[90] J. R. M. 巴特勒前引书，第 262—265 页；《爆竹》，1832 年 12 月 8 日。

有损公众自由的坏事来；这个自高自大的、贪婪的、没有原则的胡吹家过去20年来一直在欺骗约克郡人……[91]

因此，由于有了萨德勒的幕后作用，托利党——激进派联盟已不可避免。同样，大部分非国教徒、"店主"的选票也不可避免地会投向"我们的镇民马歇尔先生和苏格兰人马克霍利先生"（正如我们的一位日记作者所写的那样）：

……至于萨德勒，他从来不会干将来也不会干任何好事……因为他总是想出一些办法来损害利兹城的居民……他是"改进法案"的第一个倡导人，而且花了我们居民许许多多的钱，这个负担主要落到了店主也就是我称之为中等阶级的那些人身上……无疑他是我们地方长官党中的一员，但他并不比其他人更称职……。[92]

825 利兹的工人阶级激进派保住了他们独立的报刊和组织。（他们宣称）那些不管名誉好坏，不管生活是否紧迫的利兹人，现在已被在5月的日子里向群众大会发表演说许诺改革不然就设立街垒的人出卖了：

马歇尔和麦考莱先生也许……很赞同各种类型各种规模、无论是教会的还是国家的改革，他们也许还支持废除除他们自己的，即厂主和官吏的垄断权之外的所有垄断权。但让利兹的工人记住，如果他们支持这些人，这些人就会尽其所能地把立法权交给他们的敌人。

而且，激进派还宣称，贵族的旧式贿选和利用权势的做法现在已

---

[91] 《政治纪事报》，1832年11月24日。科贝特在文中回顾了约克郡的前任议员威尔伯福斯。

[92] 艾里书信手稿（利兹档案馆）。

经被工厂主们以一种新的形式加以利用。尽管工人没有选举权，但有人还是要在选讲台上拼命抵消支持萨德勒的十小时工作制示威游行的影响。

> 我们可以说出十多个工厂的名字，这些厂里所有工人都控制了同样的命令：星期一必须到厂举手表决支持戴橙色带的候选人……违者立即解雇……。他们每个人在厂里都划定了自己的位置，就像一群在圈里的绵羊，四周是前来强制执行命令的监工、职员和其他下人。

结果，讲坛变成了骚乱场所，奥斯特勒和支持十小时工作制的人"对着挥舞橙色带的萨德勒在选举中被击败后，马尔和麦考莱的模拟人像被人焚毁了，地点同样也是在1792年潘恩的人像被保王党人烧毁的地方一样。[88]

1832年的利兹选举，其意义超出了地方范围。由于北部城镇出现了有数千人签名的支持萨德勒的陈情书，因而引起了全国各地工厂改革者的注意。1832年之后无疑出现了新的情况，每个工业地区的上百次经验都证明了新的阶级意识，这一点却被改革法案本身的条款小心地限制住了。正是"改革后的"下院在1834年批准流放了多切斯特的那批工人（"对联合一致的工人整体的一次直接打击"）[89]，并以这个文件和封闭工厂的方式发动了旨在分裂工会的斗争，其激烈的程度和（政治的经济的）意义，仍然不为人们所认识。针对雇主们的告示，约克郡工会发 826

---

[88] 《爆竹》，1832年12月8日，10日，21日。A.布里格斯：《三个英国城市的议会改革运动背景》，前引书，第311—314页；E.贝恩斯：《自传》，第164—167页；C.德莱弗：《托利激进派》，第197—202页。

[89] 威廉·赖德（利兹毛织工，后来成了宪章运动的一名杰出领导人）讲话，《利兹时报》，1834年4月12日。

布了自己的告示：

> 雇主们不仅发出了战争叫嚣，而且还发出了战争大破坏的话语；这是同自由作战；同舆论作战；同正义作战；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战争……

利兹的一位工会人士宣称，“那些曾纵容过政治同盟以便利用他们自己的目标服务的人现在正企图摧毁工会”：

> 仅仅是在几天前，那些人还领着大量工人去西区的威克菲尔德参加集会。当时，就是现在正企图镇压工会的人，为了进行政治改革还把工人组织成庞大的队伍，他们确信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从贵族方面获得政治改革。用这种方式来获得改革，看起来是加强腐败和压迫的最终手段。[*]

从 1832 年的运动到宪章运动的发展并不是在偶然因素下形成的一种从“政治”运动到“经济”运动的摇摆交替，而是一个直接的进步过程，期间同时发生的而又是相联系的运动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选举权。有一种见解认为，宪章运动并不是 1836 年随着“六点要求”的公布而开始的，而是在改革法案得到国王同意之时开始的。许多地方上的政治联盟根本就没有解散，相反，它们立即开始了反对“店主”选举权的运动。1833 年 1 月，《工人之友》宣称，中等阶级激进主义的堡垒已遭到猛烈攻击：“……中部地区勇敢而受蒙蔽的人民尽管受到商人君主政体的欺诈和镇压，但在那时仍成立了工人阶级的同盟。”[*] 伯明翰激进主义运动曾以其特有的意识形态联合起雇主和工匠力量共同反对贵族政治、国家银行、国债以及“纸币制度”，此时也开

---

[*] 《利兹时报》，1834 年 5 月 12 日，17 日，24 日。

[*] 《工人之友及政治杂志》，1833 年 1 月 5 日。

始面临分裂。阿特伍德本人也曾一度为这股新潮流所推动，他之所以这样，部分地也是出于对他以前曾许过大量愿的民众表示忠诚。新会堂山再次（1833 年 5 月）聚集了庞大的示威人群，据称达 18 万人的示威表达了——

……人们对那些掌权的党派的仇恨心情，现在聚会是为了表达对那些人明显的厌恶。

到会者主要是沃尔索尔的煤矿工人、沃尔弗汉普顿的钢铁工人以及达德利的外作工。即将使伯明翰变为宪章运动中心城市的激进化进展从此开始了。[88]

然而，这一更新的运动的要旨却是选举权本身所暗示的那种"更多的"东西，这是必然遭到拒绝的原因。（1833 年的伯明翰已不是 1831 年的伯明翰。它现在已是公平交易所的本部，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建筑工会的大本营，而且，《先锋报》的编辑部也设在这里。）对这个和下一个十年的工人来说，选举权是一种象征；其重要性我们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被一百多年的"两党议会政治"的迷雾遮住了。选举权首先意味着平等——公民权利、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一位小册子作者在作品中哀叹道："人类不是砖头、泥灰和污物，他们应该是命运悲惨的，所谓：'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被剥夺了人类在政治社会中所能够享有的珍贵权利。"[89] 乔治·埃德蒙兹写道：

让我们的劳动群众再也不在天子出生庆典、市长就职游行和俗不可耐的加冕礼上露面——在这些国家蠢行中我们也不会作为帮凶出现，就让有些俗气的演员们自得其乐吧。

---

[88] 《群众大会记录报告》，1833 年 5 月 20 日。

[89] "I.H.B.L."：《每个人都应有选举权吗？》（1832）。

“像以前野蛮的爱尔兰人一样，英国大众长期以来就被人傲慢地置于社会政治之外”：

828 我这里表达的是没有代表权的同胞大众、野蛮的英国人、19世纪“生而自由”的奴隶们的想法。[39]

然而，在欧文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年代，要求选举权也就是要求别的东西；劳动人民已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要求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劳动进行社会控制。首先，排斥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他们以各种形式的政治行动反其道而行之，这是欧文对政治激进主义长期的漫不经心所产生的结果。1832年后出现的总工会趋势并没有使这种非政治倾向变成无为主义，相反却使它具有了战斗性和革命性。考察这些年出现的丰富的政治思想将会把我们进一步引入总工会运动史——乃至早期宪章运动史的研究，但我们并不打算走得太远。在这些年里，本波在工业区到处宣传他的“全国大放假的观点”。印刷工约翰·弗朗西斯·布雷曾向利兹的工匠传播霍奇斯金的思想，后来还出版了《劳动的疾苦及纠正方法》；建筑工会和全国大团结工会由盛到衰。多尔蒂和菲尔登建立了“全国复兴协会”，并提出以大罢工的方法实现8小时工作日。欧文派公产主义者提出了新观念并进行试验，它们将预示着在关心儿童、两性关系、教育、住房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进步。这些思想不仅在有限的知识分子中宣传，建筑工人、制陶工、织工和工匠一度乐于拿正常的生活冒险去投入这个试验。供真正的工人阶级读者阅读的报刊很多而且蜂涌而至，其中许多还对读者有严格要求。在科尔登河谷（约克郡和兰开郡之间的一个孤立地区）的丝厂里也有阅读欧文派报刊的。

我们只能谈到这些年中一再出现的两个主题。首先是国际

[39] G.埃德蒙兹：《英国革命》(1831)，第5、8页。

主义，这固然是老雅各宾主义的部分遗产，而且是激进派从来就没有忘记过的遗产。当奥利弗同利兹剪绒工詹姆斯·曼和另一个革命者步行去桑希尔—利斯的集会地点时(1817)，他从他们的谈话中发现“来自巴西的最新消息似乎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大的希望”。[79] 科贝特总是抓紧时间赶在他的刊物付印之前插进这条消息：

829

> 我刚好可以告诉你们，比利时人民，那普通人已经击败了前来强迫他们交付巨额税金的荷兰军队。这是一个极好的消息。[80]

1830年的法国革命对人民有深远影响，这不仅刺激了伦敦激进派，而且也刺激了遥远的工业村庄的工人阶级改革派。此后便是工人阶级报刊掀起的急切支持波兰独立的斗争，圆厅在朱利安·希伯特的倡议下，通过了向在起义中失败的里昂织工表示同情的决议，并且还把他们同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相比。在欧文运动中，这种政治传统还发展为社会与阶级团结的主张。1833年他们发出了一份致《欧洲及北、南美洲大陆政府和人民》的《大英及爱尔兰生产阶级宣言》，一开头便写道：“人类大家庭的兄弟们……”。同年年底，关于在英、法、德的工会之间建立某种共同联盟的问题已经开始讨论了。[81]

另一个主题便是产业工团主义。当马克思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英国工会内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思想斗争就已经(至少是暂时)有了结果。胜利的一方是霍奇斯金、汤普森、詹姆斯·莫里森和奥布莱恩；失败的一方则

---

[79] 奥利弗的叙述，内政部档案，第40.9号。

[80] 《两便士报》，1803年10月1日。

[81] 《毁灭》，1833年12月7日。

是詹姆斯·穆勒和普雷斯。“什么是资本?”有一个《先锋报》的作者问道。“资本就是省下来的劳动!”麦卡洛克大声说。“……是从何人那里从何处省下来的?”“是从不幸者的衣物和食物中。”[72] 那些“被傲慢地置于社会政治之外”的工人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推绎出工团主义理论或者说经过转化的共济会理论。[73]“建筑工会的一成员”写道,“工会罢工不仅是为了争取缩短工时和较多的工资”,

> 而且也是为了最终废除工资,成为自己的主人并相互为对方劳动。劳动和资本将不再分离,而是在工人手中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工会自己可以解决政治权力问题,可以由各勤劳阶级组成一个“阶级议会”,“议会”代表直接由各工场和工厂委派,共济会支部把代表从地方选送到地区,再由地区送到全国大会。立即实行普选,一年选举一次,财产资格不受限制。[74]《先锋报》提出了行业的设想:

> 它必须代替目前的下院,并按照构成产业协会的各行业的意愿管理全国的商务。这是我们实现普选权的有利阶梯。这一过程将从我们的支部开始,然后发展到总工会,进而包括对行业的管理并最终包括全部政治权力。[75]

1834和1835年的可怕失败,使这种设想立即变成了泡影。工人们稍事喘息之后,他们又回到把选举权作为通向政治权力的更实用的办法上来了。一些东西丧失了,但宪章主义从来就

---

[72] 《先驱报》,1833年10月13日。
[73] 《人报》,1833年10月13日。
[74] 《人报》,1833年12月22日。
[75] 《先驱报》,1834年5月31日。

没有完全放弃对社会控制的追求，并把选举权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些年来，工匠特有的那种视角，即渴望靠辛勤的汗水获得独立的生活，已经开始转向一种较新的见解，并更易于同新的生产方式达成一致。但他们也在寻求以阶级的集体力量使环境人性化的途径——通过社区或合作社，通过遏制市场经济盲目作用，通过立法以及救济穷人的措施。而且，在他们的见解中还暗含着——并不总是明显——一种危险的主张：生产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利润，而应该是为了效用。

这种集体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工业革命的伟大精神成果，它是针对工业革命而产生的一种裂变，而且也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较能为人性所能理解的生活方式。这也许就是1832年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独特之处。由于资本的积累是缓慢和逐步的，因而可以把工业革命的准备过程一直追溯到几百年前。从都铎时代起，随着社会和技术的每一阶段的变化，工匠文化已经变得比较复杂。德莱尼、德克尔和纳什、温斯坦莱和李尔本、班扬和笛福都对此作出过贡献。17世纪的丰富经验，再加上18世纪带来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我们已经述及了)，构成了互助会和行业俱乐部自身的互助传统。但这些人并不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由农民转变为新型的工业市民，作为口齿清晰、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他们尝到了工业革命的滋味。那些被投入监狱的人也许比法官更了解圣经，那些被流放到范戴曼领地的人或许要请求他们的亲属给他们寄去科贝特的《纪事》。 831

这也许是英国所具有的最突出的大众文化。它包含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技艺、金属、木材、纺织和制陶工人，如果没有他们从上辈承传下来的“秘技”以及利用原始工具进行发明创造的高超技能，工业革命的创举几乎不可能超出纸上谈兵的范围。从这种工匠和自修者文化中产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优秀的发明家、

组织家、新闻撰稿人和政治理论家。要说这种文化是后进的或保守的倒也容易。工匠和外作工的伟大运动持续了30多年，它的目标确实是为了避免自己沦为无产阶级。当他们知道这一事业失败之后，他们在30年代和40年代又再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力求实现新的但又是想象中的社会控制形式。在整个这段时期中，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曾受到镇压，而且在自己的群体中也处于被隔离的状态。然而，反革命所力图要镇压的东西反而在准合法的地下组织中变得更坚定了。只要统治者的压迫一放松，人们就会从小工场或织工居住的小村庄里走出来并提出新的要求。他们被告知说他们没有权利，但他们知道他们是生而自由的。义勇骑兵纵马冲击他们的集会，但他们却获得了公众集会的权利。小册子作者被监禁，但他们却在监狱里编辑小册子。工会成员被送进监狱，一路上却有乐队和手持工会旗帜的队伍相陪伴。

由于他们的组织是以这种方式被隔离的，因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韧性和弹性。阶级的存在也因此在英国生活中产生了独特的反响。从学校到商店，从礼拜堂到娱乐场所，一切地方都变成了阶级冲突的战场。迹象一直都存在着，但不总是为外界所理解。如果说社会生活缺乏平等的传统，那么工人的阶级意识也就缺乏服从的传统。詹姆斯·莫里森曾在1831年写道："我们是孤儿，是社会的私生子。"[41] 这种强调不是出于认命而是出于自豪。

832

在这些年中，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们想把我们变成工具"、"用具"或"机器"。在议会委员会调查手织

[41] 《先驱报》，1834年3月22日，见A.布里格斯：《19世纪早期英国的"阶级"语言》，前引书，第68页。

工的状况之前(1835 年),曾有人请一位证人谈谈他的同伴对改革法案的看法:

> 问:自从发生了这一变化之后,工人阶级对国家制度比较满意了吗?
>
> 答:我想他们不满意。他们把改革法案看做是一种安排,目的是要让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同政府携起手来并使他们成为政府手中某种按其意思运行的机器。

这些人曾同功利主义对抗过,并企图阻止其影响,他们这样做并非是盲目的,而是出于理智和道德激情。他们并不是同机器,而是同本质上具有剥削压迫性质的工业资本主义关系作战。在这些年中,浪漫派对功利主义的大批判也在同时进行,但走的却是另一条完全独立的路线。在威廉·布莱克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智者熟悉这两种文化,也没有一个天才能在这两种传统之间作互相解释。自告奋勇地打开"新道德世界"的,是一个好生事的欧文派。而此时华滋华斯和柯勒律治却已在他们自己那不值得着迷的城堡后面退了出来。所以这些年时时出现的似乎不是革命的挑战,而是一种抵抗运动,浪漫主义和激进的工匠在其中都反对贪得无厌的人的说教。这两种传统找不到一个结合点,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损失;损失有多大,我们却无法确定,因为我们也属于失败者。

然而,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工人看做是永恒的失败者,他们的 50 年历程以无比的坚韧性哺育了自由之树。我们可以因这些年英雄的文化而感激他们。

参考书说明

我有选择地运用了手稿资料，特别对那些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审核的人云亦云的说法更是如此。公共档案馆中最有价值的史料是《内政部档案》(H.O.)，尤其是其中第40和42卷；有关伦敦通讯会、抢粮风潮等等的卷宗，散杂在《枢密院档案》(P.C.)和《财政部司法处档案》(T.S.)中，那些档案有时包括一些证据(密探的报告、供词、截获的信件等等)。政府就是从这些证据中摘取简报对国家犯人提出起诉的。我还参阅了大英博物馆(附加手稿)中的《普雷斯收藏品》，发现其中最有用的是普雷斯的"自传"，伦敦通讯会的会议记录和通信集，哈迪、里克特、勒梅特、奥克斯莱德等人对该会历史的某些方面所作的记叙，普雷斯关于斯彭斯生平所搜集的资料以及他关于1816—1820年的一些叙述，还有洛维特关于工人阶级全国同盟的记述等等。我在正文中，已经说明在使用普雷斯的史料时，为什么应该小心谨慎。

《菲茨威廉文件》是大部头的温特沃思收藏品中的一个部分，现在这些收藏品由设菲尔德档案馆保管。文件包括菲茨威廉伯爵任约克西区郡守时，就公务问题来往的一部分信件，还有约克郡治安法官和其他消息来源的报告。我运用了F.44、45和52卷，它们对18世纪90年代初、1801—1803年的事件以及卢德运动非常有意义。还有两种史料对卢德运动很有价值，其中《拉德克利夫文件》包括约瑟夫·拉德克利夫爵士保存的信件，他是哈德斯菲尔德地区特别活跃的地方官，因为把约克郡领头

的卢德派交付审判而得到了爵士的头衔。这些手稿至今仍保留在他的后代J.B.E.拉德克利夫上尉手里（他住在哈罗盖特的拉丁林园），并在国家档案登记册上归档。《针织工文件》是1814年被缴获的，保存在诺丁汉市立档案馆。这些文件涉及1812—1814年的事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收入《诺丁汉选邑文献汇编》（1952年出版）。以上是我使用的主要手稿来源。

书中引用的那些珍贵的书刊小册子，多数可在大英博物馆找到，或者在（曼彻斯特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找到。要把我的记叙中所涉及的50年内报纸通通看一遍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我仍旧是有选择地翻阅报纸期刊，以期发掘某些问题，开发某些时段。我不时引用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泰晤士报》、《利兹信使报》、《诺丁汉评论》等，有时也使用其他一些地方报纸。我参阅的雅各宾派、激进派、工会和欧文派期刊有：

与18世纪90年代有关的：伊顿的《人民政治报》，《爱国者报》（设菲尔德），瑟尔沃尔的《论坛报》，《内阁》（诺里季），佩里的《百眼巨人》，《慈善家》，《道德与政治杂志》，《剑桥消息报》，《设菲尔德彩虹报》（但18世纪90年代最有意思的作品是小册子而不是期刊）。

战争及1816—1820年：弗劳尔的《政治评论》，博恩的《理性人》，《阿尔弗雷德》，《独立辉格党人报》，霍恩的《改革者纪事》，舍温的《共和报》，舍温的《政治纪事》，《黑矮人报》，《敢死队》，《刨根之斧》，《人民报》，《政治观察报》，《立法者》，《不列颠人》，《德克特快报》，《女怪》，《黑皮书》（最初以期刊出版），《观察家》，《斗士》，《自由之帽》，《美杜莎》，《曼彻斯特观察家报》，《白礼帽》，《神学彗星：理性的英国人》，《背毯进军者报》，卡莱尔的《共和报》，《伯明翰监察报》，《亨特致激进改革派》。

1820—1830年代早期：《经济学家》，《机工杂志》，《行业

报》,《伦敦及地方工匠纪年报》,卡莱尔的《鼓动者》,科贝特的《两便士报》,《魔鬼论坛》,《人民之声报》,金医生的《合作者》,《常识》,《联合导航人》,《兰开—约克郡合作者》,《穷人辩护士》,《约克郡西区之声》,《贫民卫报》,《工人之友》,《激进改革者》,《世界主义者》,《爆竹》,《危机》,《毁灭》,《人民保卫者》,《人民》,《先驱报》,《工业权利先驱报》。(后期)还有《布朗台尔全国改革者报》,《社会先锋》,《十小时辩护士》,《劳工报》,《北极星报》,《寄语人民》。

第一部分的标题页上印着伦敦通讯会发行的纪念币的双面图案。发行这些铸币是为了——例如——感谢陪审团释放哈迪、图克和瑟尔沃尔,以及丹尼尔·艾萨克·伊顿等,托马斯·斯彭斯也打造过许多这种铸币。第二部分的标题页上印着一张粗糙的木刻打印卡,据推测是准许参加兰开郡卢德派会议的入场券(1812年)。第三部分的标题页上是克鲁克香克为挖苦彼得卢的胜利者而作的纪念碑,取自威廉·霍恩和乔治·克鲁克香克的《给警察一个耳光》(1822年)。[①]

最后,还要提到一些二手资料,我(像其他所有研究这一时期的人一样)极大地得益于这些资料。A.阿斯皮诺尔的《英国早期工会》(1949)从内政部档案中选择了一批出色的文献。涉及结社法生效的那些年份;G.D.H.科尔和A.W.菲尔森的《英国工人运动:资料选》(1951)广泛地选择了多种史料,M.莫里斯的《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1948)选择史料比较简短。无法看到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的人,可以在G.D.H.科尔和M.科尔出色地合编的《威廉·科贝特的见解》(1944)及W.赖策尔编的《农夫进程》(1933)中看到一些选节(科贝特的《乡村游记》有"人人"

① 三个部分的图案中译本从略。——编注

社版本)。H.L.杰夫森的《腐化坛》(1892)和G.沃拉斯的《弗朗西斯·普雷斯生平》(1898)逐字逐句地大量引用了普雷斯的手稿,但经常是不加任何分析。J.L.和B.哈蒙德夫妇的著作中,《技术工人》(1919)特别重要,《乡村工人》(1911)的重要性也不在其下,1917年的《城市工人》则比较凭印象写作。M.D.乔治的《18世纪的伦敦生活》(1930),J.H.克拉潘的《现代英国经济史》(剑桥,1927),S.和B.韦伯夫妇的《英国工会运动史》(1894,1920年修订),和I.平奇贝克的《女工和工业革命》(1930)都可以作为资料阅读。有关早期民主和激进运动史重头书目前尚没有,也许最好的入门书仍旧是G.S.维奇的《议会改革的起源》(1913),但他笔下的雅各宾派太虔诚,太相信合法斗争了;有关稍后的历史,可见W.D.威克沃的《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928)和J.R.M.巴特勒的《伟大法的通过》(1914)。(S.麦科比那本很有意思的书《1786—1832年的英国激进主义》(1955)总的来说太注重议会中的进程,未能说明这本书所应该探讨的问题。)塞缪尔·班福德的《一个激进派的一生》(海伍德,1841)和威廉·洛维特的《在追求面包、知识和自由过程中的生活与斗争》(1876)后来都不断再版,对每一个英国人来说都是必读之书。学者若想将本书的历史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考察,可以在E.霍布斯鲍姆的《革命时代》(1962)和阿萨·布里格斯的《进步时代》(1959)中找到有关欧洲和英国的参考资料,E.哈勒维的《1815年的英国》(1924)至今仍是考察19世纪早期英国社会的杰出著作。

想为这样一本时跨如此之大、论题如此之多的著作开列所有参考书,显然太自命不凡且必然是不完全的;书中每一节我都尽量在脚注中标出与此有关的二手资料,同时,我希望我将主要的一手史料充分地标注出来了。因此,我寻求读者的原谅,并以

斯皮特菲尔兹一位丝织工诗中最后一节（载塞缪尔·肖尔：《丝织业史纪实》(1811)权充道歉之词：

我的织机歪歪倒倒，
我的纱筒被虫蛀了，
夹板和踏板破破烂烂，
扣孔不肯搭上开关；
织机上已经尘土飞扬，
剪刀上更是锈迹斑斑，
机杼和通丝破损不堪，
机轮堵塞不可动弹，
织梭断了，眼镜碎了，
织丝崩了——杖杆也完了！

鸣　谢

首先要感谢各有关部门与图书馆，它们让我得以引用手稿资料。皇家出版署允许我使用公共图书馆中版权属国家的未出版史料；菲茨威廉伯爵和伯爵的温特沃思领地管理处通过设菲尔德市立图书馆的美意，允许我使用温特沃思的伍德豪斯档案室的史料（菲茨威廉文件）。我还要感谢大英博物馆手稿保管部（普雷斯收藏品）、诺丁汉市政会（针织工文件）、诺丁汉公共图书馆、利兹市立图书馆以及军功十字勋章获得者J.B.E.拉德克利夫上尉（拉德克利夫文件）。我要感谢以上所有这些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的协助，以及下面这些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曼彻斯特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曼彻斯特中心档案馆、诺里季中心档案馆、布拉泽顿图书馆（利兹大学）、布雷德福、哈里法克斯和威克菲尔德三地的公共图书馆，以及哈德斯菲尔德的托尔森纪念博物馆。第187页上的卢德派“入场券”是国家版权所有，由皇家出版署准许复制。[1]

我还要感谢以下这些出版社准许我引用版权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即乔治·艾伦和昂温公司（M.韦伯的《新教伦理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193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约翰·克拉潘爵士的《英国现代经济史》，1929年，第1卷；R.N.萨拉曼的《土豆的历史与社会影响》，1949年），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乔治·鲁德的《威尔克斯和自由》，1962年），朗曼格林有限公司（J.L.和B.哈

---

① “入场券”图案中译本从略。——编注

蒙德夫妇的《城市工人》,1917年;《技术工人》,1919年),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E.霍布斯鲍姆的《绿林好汉》,1959年),和牛津大学出版社(T.S.艾什顿的《工业革命》,1948年)。钦定本《圣经》是国家版权所有,本书经许可而摘用。

E.P.汤普森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钱　乘　旦

1963年,英国史学界出现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一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受到广泛重视。许多报刊杂志发表评论,各种书评纷至沓来。《泰晤士报》评论说,它"帮助人们重新想起工人阶级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苦恼、英雄事迹和理想追求,凡是对英国人民的历史进程感兴趣的人,都不可不读这本书。"《听众信箱》杂志说:"这是一部生气勃勃、有很高价值的历史著作,其中许多鲜明的观点,对当代众多的正统观点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书评》杂志说:"这本书之所以引起争论,其原因也许仅仅是:许多人已经忘记摄政王时期和维多利亚女王早期英国局势有多么危险了,自哈蒙德夫妇的经典著作出现以来,这是研究那一时期最重要的一本专著。"《论坛报》称它是"一部真正的匠心之作"。书的冲击波甚至越过大洋,穿过大海,在大西洋彼岸和大洋洲引起震动,它不仅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再版印刷,而且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纽约书评》称它是一部"有绝对权威性、经久而重要的著作";几年中,它一版再版,风靡各国,成为20世纪西方历史学不多的几部创学派的开山作品之一。

这部书的作者当时只有39岁,是利兹大学院外教育部的讲师。他在利维霍姆基金会的赞助下,花了好几年时间,搜寻了大量原始资料,查阅了各种有关书籍,最后写成一本洋洋几十万字的大书,取名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位作者,就是后来闻

名世界史坛的当代历史学家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P.汤普森)。

汤普森1924年出生在英格兰,父亲是作家兼诗人,在印度殖民地从事过教育工作,同情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颇有私交。父母的思想对幼年汤普森很有影响;中学时期,他在一所卫斯理派私立学校读书,然后考进剑桥大学学习,这时,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先后在北非、意大利和法国作战。他的哥哥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作战很英勇,晋升到上校,后来在战争中牺牲。哥哥对他的影响很大,战后,他曾与母亲共同写了一本追念哥哥的书,题名为《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①] 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剑桥大学继续学业,同时也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并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协助当地的战后重建工作。1956年,由于不满苏联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他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如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等共同退出共产党,这以后,他成了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对政治活动一直很有兴趣,曾参与起草"1968年五一宣言",反对工党政府实行向右转政策。70年代,他又积极投入和平主义运动,是欧洲反核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汤普森的著作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外,还有两本历史学专著,一本是《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写的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威廉·莫里斯的生平;另一本是《辉格党人与猎人》,剖析18世纪英国社会冲突中一个典型的现象:偷猎活动。汤普森还发表过一些重要的历史学论文,它们虽然篇幅不大,但分量很重,并不亚于专著。它们多数涉及18世纪英国

① 这是《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句话,用在这里,是一语双关。

的社会问题，在历史学界很有影响。这些论文中特别重要的有：《时间、劳动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1967)，《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1971)，《贵族的社会、平民的文化》(1974)，《民间文学、人类学和社会史》(1978)，《18世纪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1978)，这些论文后来收归为一本书，题为《乡规民俗》。此外，汤普森还写了许多政论文、时事评论等，撰写过反战、反核武器的书。

相对来说，汤普森在历史学方面并不算"多产"，但他的学术影响远不可用数字来衡量。《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基本学术观点。

一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写的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在英国史学界曾经被长期遗忘。

19世纪，辉格派历史学家在英国史坛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的观点代表着英国历史学的主流。辉格派史学家主要关心为英国的"宪政"寻找历史的合理性，因此他们把光荣革命以来的英国宪政史作为历史学的主要描述对象。在他们看来，以光荣革命为起点的英国近代史，是辉格党宪政理想的胜利史；这是一部伟大政治家的历史，记载着这些政治家的功勋，而正是这些政治家，继承和发扬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古老而光荣的"自由"传统，他们领导国家维护宪政、反抗"暴君"的统治。在辉格派的历史中，人民群众是没有地位的；即使有，也只是在遥远背景上隐约可见的一群暴民，可以受到任何一个政治派别的操纵和利用。辉格派史学家以马考莱为代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

下层人民被引进历史学大门是在19世纪末，引路人是费边社历史学家。费边派为了用历史来印证他们的"社会主义"理

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会运动上。在他们看来，工会是“工业民主”的寄居处，工人用工会的手段，可以逐渐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使社会主义稳步“渗入”资本主义。他们研究英国工会运动史，是为了说明民主的精神如何在工会这个组织里根深蒂固；向来就有“工业民主”传统的英国工人，有能力选出自己的代表，把他们送进议会，让他们代表工人管理国家。[②] 因此，他们的目标实际上是为建立工党、实行“工人参政”寻找历史根据，为“英国社会主义”即工会——费边社传统张扬正名。费边社历史学家是英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其早期代表是韦伯夫妇，在20世纪的代表是G.D.H.科尔。

20世纪初，自由派历史学家也开始注意下层人民的历史，于是就产生了哈蒙德夫妇的“劳工三部曲”（《乡村工人》、《城市工人》和《技术工人》）。在政治上，自由派与辉格党有很深的渊源，在历史著作中，自由派也不能完全脱开辉格派的窠臼。哈蒙德夫妇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经历充满同情，对他们的苦难作了催人泪下的描述。他们认为：技术发明造成剥削，而剥削则引起反抗，因此，“这个时期的英国史读起来像是一部内战史。”[③] 但他们认为：工人群众中一切带有暴力色彩的反抗都不是工人的本意，所有的暴力活动都是由托利党政府所雇佣的奸细“挑唆”的，托利党政府故意制造“暴力革命”的假相，目的是混淆视听，为镇压合法的改革运动寻找借口。由此可见，哈蒙德夫妇实际上是把劳动人民的历史纳入了宪政改革的轨道，把马考莱的党派偏见融入了英国劳工运动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在英国崭露

---

② 参见西德尼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著《工业民主》(1897)。

③ 《技术工人》(伦敦和纽约，1979)，第1页。

头角，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史学流派。1952 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创办《过去和现在》；不久后，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许多学者把马克思的著作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下层人民越来越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角，帝王将相终于不再霸占历史舞台，历史学家也似乎终于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不过，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注重早期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如莫里斯·多布关于资本主义形成问题的研究、罗德尼·希尔顿关于封建主义与农民问题的研究、克里斯托弗·希尔关于英国革命的研究等），而使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成了相对的研究空白。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工业资本主义，但又特别偏爱工厂制及其剥削后果（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关于工人问题的研究），而把哈蒙德夫妇开拓的领域长期留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60 年代初，出现一批更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英国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因而想全面否定英国工人的传统。他们认为这种传统不能在英国产生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不能产生有影响的革命政党，英国的传统是完全失败的，完全不值得留恋。他们主张抛弃英国的传统，转向"国际主义"，他们中一位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说："我们再也不想挖掘自己的过去、去搜集进步的或其他什么历史的传统，来给英国的文化经验主义和政治合法主义脸上贴金了。……失望……把我们赶出英国，去寻找开发更广阔的文化天地，结果就有了国际主义这个理论园地。国际主义信念的基础是：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在 19 世纪中期诞生时至少汇集了三个不同国家的思想体系，即德国的哲学、法国的政治学和英国的经济学的话，那么它在 20 世纪中期自由而有成效的发展，也必须靠同样程度乃至更激烈地

去突破国界。总之，我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国的事。"[④] 出于这种思想，他们对"英国社会主义(及人民斗争)的历史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问题上"。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英国工人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苦难经历主要由费边主义和自由主义来塑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产生了无视英国传统、脱离英国实际的倾向。而汤普森试图要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英国的这段经历。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英国出现还有一个社会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许多劳动人民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上相对左倾，对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抱有同情，他们对自己的父兄——曾用汗水浇灌了工业革命之花的普通劳动者追忆缅怀、又充满崇敬，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好奇感，想在他们的经历中寻找自己的来源。这是一种"寻根热"，《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恰恰就满足了这种愿望。因此它的出现，既扎根在英国历史的传统中，又产生于时代特殊的召唤里。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知识界普遍左倾，苏联的成长和西欧共产党的发展明显对他们产生影响，马克思的著作在学术界广泛流传，出现了像阿尔杜塞和萨特这样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其本身又有很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使西方出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流派，"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各个学术领域进行研究，做出了一些学术性很强、并不为某个党派的特殊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成果。这些人特别重视人类活动中文化的因素，如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意识

---

④ 佩里·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战》(弗索版)，第148—149页。

形态和组织形式等等，这是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人称之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汤普森的书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中产生的。

二

汤普森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英国（乃至欧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代表作。它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不仅是因为作者自己这样说，许多读者这样认为，而且更因为书中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重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下层人民的经历。

不过，汤普森对“阶级”有自己的理解，他在书中说：“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的），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原书第9页，下同）这就是汤普森给“阶级”下的定义。在这个定义里，我们可以看出：阶级的“存在”和阶级“觉悟”是同一的，存在不可能没有“觉悟”，觉悟本身就是“存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只有阶级而没有觉悟，阶级不可能先于觉悟而存在。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或是在出生后的某个时候），他就被置于某种生产关系中，在这个关系中处于某种地位。但是，他对这种地位的认识并不与生俱有，他必须通过许多“经历”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当很多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

并时常对立时，他们就感到了共同的“存在”，也就是产生了集体的“觉悟”，只有在这个时候——在共同的“觉悟”产生之后，阶级才终于“形成”。因此，“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之间的差别是不存在的，有阶级就必须“自为”，没有觉悟的“阶级”是不可想象的。汤普森把“阶级”的概念与阶级觉悟及其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紧密地联系起来，反映了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倾向。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为这样一个阶级的定义找到依据。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里谈到19世纪中叶法国的农民问题时曾说：“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5] 根据这段话，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解释说：这表明马克思认为，仅仅有经济“利益的同一性”还不够，阶级的“形成”，还必须加上“生活方式”、“教育程度”、“全国性的联系”、“政治组织”等等。这就证明“存在”本身还不足以成为阶级，阶级的“形成”必须有观念与思想意识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说过“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6]，这表明，他们不认为无产者的“存在”就是工人阶级的存在，无产者必须“组织成为阶级”。

那么，如何才能“组织成为阶级”呢？答案是：通过工人的各种斗争，无产者逐步联合起来。个别的行动逐步发展成集体的

---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1页。

行动,分散的活动逐步集结为有组织的活动,"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有些地方,斗争转变为起义"。"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⑦] 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的这些说法论证他们的阶级定义,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本书的理论背景。由此我们知道,为什么这本书被作者说成(也被多数评论家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作品。

从这个定义出发,汤普森把工人阶级的"经历"看做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汤普森说:"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第 11 页)。"经历"是"存在"与"觉悟"间的纽带,没有这些经历,意识就不会出现,"觉悟"就不会生成,阶级也就不能"形成"。所以,在这本洋洋数十万言的恢弘大作中,他详尽地考察了工人阶级"经历"中的每一个方面:从劳动到生活水平,从组织到政治活动,从宗教情绪到文化娱乐方式。所有这些,都包括在他的"工人阶级的经历"中,而正是这些经历,最终使"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第 11 页),从而"形成"了阶级。我们在翻阅这部巨著时,将不会奇怪书中如何不厌其烦地叙述那么多看起来似乎是毫不相干的琐事,也不会奇怪那面面俱到、无所不包的细节如何会与工人阶级

---

⑦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60 页。

的“形成”有关。汤普森向我们阐述的，正是他关于阶级与阶级“形成”的一个理论，正如他所说：“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第 11 页，第 12—13 页）。

由此我们就不必奇怪：对工人在工业革命中的一切活动，汤普森几乎都抱一种同情的态度，而很少指责它们“落后”、“无远见”或“背叛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等等。这里的原因就在于：汤普森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英国工人的“经历”，而正是这些经历促进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三

我们已经知道这本书主要是表达汤普森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但由于它叙述的是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其涵盖面又极其广泛，因此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有些问题是英国史学界长期争执不休的。对所有这些问题，汤普森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因此本书甫一问世，即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书的第一部写“18 世纪留传下来的人民传统”（第 12 页），在汤普森看来，这些传统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清教非国教派的思想与组织传统，这从 17 世纪革命时期的“千年王国派”开始，经过班扬的《天路历程》和 18 世纪初的非国教教派组织，

到18世纪中叶出现卫斯理宗。汤普森认为，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新教非国教教派经历了意识形态上的“后撤”，即从“千年王国派”坚强的战斗性后撤到18世纪非国教教派对“内在王国的反身自省”之上。汤普森说：“理解这种后撤——以及在后撤之后还剩下什么，对于理解18世纪的情况以及后来工人阶级政治活动中一个持久的因素非常关键”。到18世纪，在革命的理想破灭之后，非国教教派不再要求建立“圣人的国家”，而是努力适应社会现实，力图与现成的制度达成妥协。在这种妥协中，它们丢弃了原则却保存了组织，使非国教传统得以传留下来。“这些教派在决意耐心地忍受‘现世之苦，’放弃其取得‘政府统治权’的希望时，却也能够把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与一种蛰伏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一旦遇到比较合适的环境，它就会再次燃烧成燎原之火”（第30页）。这样，非国教的思想与组织传统成为19世纪工人反抗斗争的一个深刻的历史根源。

第二种传统是人民群众自发而无组织的反抗行为，主要表现为群众暴动、抢粮风潮、滋事骚乱等等。整个18世纪，这种人民的“直接行动”始终不断，尽管它无组织、混乱、涣散，而且时常表现为漫无目标，但“在每次这种形式的大众直接行动的背后，我们都能发现某些具有合法性的权利概念”。英国人民始终认为他们的权益是受到习惯的保护的，认为自己有权采取直接的行动匡正社会时弊、维护“道德经济学”，这为日后工人的斗争提供了历史依据。

第三种传统是英国人对“生而自由”的强烈认同以及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强烈自豪感。从17世纪革命时的平等派开始，经过18世纪的许多人民运动（戈登暴动、威尔克斯事件等）和许多贫民思想家（戈德温、斯彭斯等）的填补锻造，到潘恩那里终于发展为集大成。汤普森对潘恩的《人权论》给予极高的

评价，认为它在形成工人阶级意识方面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人权论》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奠基之作”(第90页)，它和班扬的《天路历程》一起，是英国工人的启蒙教科书(第五章)。

第四种传统就是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英国“雅各宾传统”。法国革命在英国造成深刻影响，培养了人民的平等共和意识。下层劳动者第一次感到自己有权参加国家的治理，因而引发出工人群众的激进运动。这种激进主义传统从18世纪90年代延续到19世纪中期，是构成工人阶级“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民众激进主义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是潘恩的《人权论》，因此《人权论》在激进主义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以上四种传统就是英国工人阶级在“形成”时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主要遗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汤普森在探讨英国工人运动的成因时，并没有从理论到理论地进行某种教条式的演绎，他从英国历史的实际出发，着手于英国的特殊性，体现了英国历史学求实、实证的传统。

书的第二部分“从主观因素转向客观因素，即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第12页)。这一部分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实在令人咋舌，表现了汤普森广阔的知识领域和深厚的史学功底。如果我们把它从书中抽出单独作为一本书出版，题名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经历》云云，它也会成为一本传世之作的，更何况它还组织在一个如此宏大的体系里，用以说明工人阶级的“形成”理论呢！

这里所说的“经历”包括以下这些方面：工资、物价、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劳动纪律、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妇女与儿童、工会与互助会组织等等。所有这些内容，都最能体现“社会史”的研究范畴，汤普森自称是“社会史学家”，这在书中的这个

部分最能充分地表现出来。文中广征博引，谈古论今，令人不得不对汤普森作为"社会史学家"的崇高地位肃然起敬。

这一部分涉及到英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最重大问题之一——生活水平问题。还在工业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关于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问题就已经引起同时代人的争论。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引用官方各种资料说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亨利·梅休在英国各地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结果写成致《晨报》编辑部的 82 封信，也充分揭示了工人群众遭受的苦难。19 世纪下半叶，许多中等阶级人道主义者继续这种社会调查，证明在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贫困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使费边社会主义者对工业革命中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哈蒙德夫妇也支持这种立场。但"乐观"派也大有人在，尤尔牧师 1835 年写的《工业哲学》是系统地阐述"乐观派"观点的最早一本著作，在以后几十年中，为这种观点辩护的人不断出现。20 世纪初哈蒙德夫妇的"劳工三部曲"出版后，在生活水平问题上受到克拉潘的《现代英国经济史》的猛烈批判，这本书用大量统计数字得出一个"平均"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曲线图，用以表明工人阶级的实际购买力提高了，因此其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乐观派"的观点在 30 年代占上风；到 50 年代，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在这个问题上发起进攻，而"乐观派"则坚守阵地，一直论战到 60 年代初。就在这时，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了，为"悲观派"提供了强大的生力军。

汤普森认为："平均"的生活水平是没有意义的，"平均"只说明抽象的工人，而每一个具体的工人，那些受苦受难、饥寒交迫的手织工、织袜工、剪绒工等等，他们的痛苦就被悄悄地埋没在这个"平均"水平之下，他们的苦难也就被完全掩饰了。他因此

分门别类地逐一叙述各个工人集团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状况，表明受工业革命影响最大的这些人，如何落到了贫困的深渊。除此之外，汤普森还指出：单纯的"量"不足以说明生活水平，"质"的因素必须考虑，而且也许更重要。即便某些工人在实际收入方面确实有所提高，但他们丧失了对自己劳动的控制权，丧失了"独立"，丧失了娱乐和休闲，丧失了与家人团聚在一起的天伦之乐，他们必须服从严格的劳动纪律，成为生产与机器所控制的仆人。这些代价，是补偿不了物质生活的某些改进的。汤普森以他"生活水平的质"的概念投入论战，使生活水平问题向更广阔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汤普森还讨论了卫斯理宗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卫斯理宗是18世纪中叶由国教内部产生的一个新教派，它重视在劳动人民中传播"福音"，引起下层人民狂热的"宗教复兴"。汤普森认为，卫斯理宗一方面改造了劳动人民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们成为有自制能力的新人，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培养了第一代懂得服从和遵守纪律的工人。但另一方面，卫斯理宗为工业革命时在现实中总是遭受挫折(包括反抗斗争中失败)的工人提供了精神上的避难所，因为"强调来世的任何宗教都是失败者和失望者的千年王国"(第381—382页)。卫斯理宗由于不肯抛弃任何一个"被遗弃的人"，坚持在普通劳动人民中传播上帝的声音，因此得到劳动者的拥护，使他们在宗教中寻找到一丝慰藉。劳动者在卫斯理宗的小组讨论会、群众性的露天布道、野营传教活动以及担任地区及班组负责人和俗人传教士的工作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从而为形成某种"觉悟"创造了条件。而且，所有这些形式又都为日后的工人运动提供了现成的借鉴，使他们获得了组织工作的经验。汤普森没有对卫斯理宗这样一剂"宗教鸦片"作简单了事的判决，而是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受苦

人的角度来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卫斯理宗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发挥既作为剥削者的宗教又作为被剥削者的宗教这样双重的作用呢？”（第375页）

书的第三部分题为“工人阶级的存在”，实际上是写19世纪最初30年代工人阶级的政治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后，还对19世纪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论和阶级觉悟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第12页）。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满怀深情地描述了工人阶级有组织反抗的经历，在他的笔下，被统治者长期认定是“叛逆”、“罪犯”的工人运动领袖都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成为在本阶级解放事业中英勇献身的大无畏英雄。作者的同情心跃然落于纸上，他对工人阶级的每一种反抗形式都给予同情的评价，而不管它看起来是如何“原始”、如何鲁莽甚至不合情理。他认为那些就是英国工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主要经历，都导致工人阶级的最终“形成”。他不愿站在后人的高度上来指责前人的“幼稚”，他只愿依照他笔下那些人物的立场去理解他们那个时代。这种历史主义观点使他对“英国传统”充满了感情，读汤普森书的这一部分，就如同读一部英国工人的荷马史诗，其可歌可泣、英勇悲壮，令人泪下！

这一部分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英国工人是否有革命暴力的传统。哈蒙德夫妇否认这种传统，他们把19世纪最初二十年中一再出现的革命密谋乃至真实发生的武装起义都说成是托利党政府派遣的奸细人为造成的结果，其目的是为托利党的高压政策编造合理性，从而巩固托利党一党的统治。汤普森嘲笑这种说法，说政府派出数十万军队，疲于奔命，风声鹤唳，结果只是为捕捉连政府自己都不相信的暴动神话，这在一个有健全头脑的人，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如此，哈蒙德夫妇的说法却在史学界流行了几十年。汤普森详细追述了英国工人运动中每一次

暴力活动的痕迹，他试图要做的，就是彻底纠正哈蒙德夫妇在党派偏见驱使下造成的历史扭曲。

最后应该说明，汤普森决不认为英国工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反抗斗争仅仅是对生活条件恶化作出的反应，而哈蒙德夫妇、费边社知识分子乃至英共党员作家都曾作出过这种解释。汤普森强调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的重要性，强调非经济方面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阶级在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被形成**时又**主观地**形成自己的过程。

以上这些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本书的主要观点。由于它内容广泛，特点鲜明，因此自书出版之后，就一再受到各方关注，赞同和反对的意见层出不穷，形成经久不衰的史学大辩论。直至今天，在书出版三十多年后，凡研究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史，而不去看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仍旧行不通。这本书已成了这一时期英国社会史和劳工史的经典之作，是创学派的开山之举。三十多年中，围绕着汤普森提出的许多问题，英国史学界展开了持久的讨论，引发出一大批专门著作，其中有一些已经产生很大影响，形成一个明显的学术派别。即使是反对汤普森的人，无论是从"左"的还是从右的方面反对，他们也都不得不在汤普森提出的问题范围内发难，以求攻其一点。汤普森的这本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仍然发挥巨大的影响。它的影响甚至已经超越英国历史的范围了，它提出了全世界（至少是欧洲）早期工人运动史上许多带普遍性的问题，还有工业化时期许多国家都会产生的某些问题，因此它的理论框架甚至可适用于英国以外的国家。由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取得了国际声誉，汤普森也跻身于国际最知名的当代历史学家之列。他的书已翻译成许多文字，成了全世界共同的文化瑰宝。

但这样一部杰出的作品，却到80年代初才为我国历史学界

所闻。当时首批来华作学术访问的英美学者,发现中国史学界竟无人知道这本书以及这本书的作者时,显然是大吃一惊。中国的门户关得太紧了,中国与世界隔绝了太久!文化本来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隔绝自己,只会造成自己的落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交往日密,文化与学术沟通也日趋增强。中国逐渐了解世界,世界也逐渐了解中国。本来有许多隔阂是文化上的差异造成的,增进文化交往,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

80年代初,我在美国买到这本书;不久英国友人赠给我们的书中,也包括这本书。知道汤普森的中国人逐渐多起来,国内好多单位也开始购进他的作品。然而能够用英文阅读并且接近这本书的人终究是少数,出一个中文本似乎成了需要。1985年,汤普森教授和他的夫人(多萝茜·汤普森,也是一位历史学家)访问中国,在南京大学作短期讲学。当时,所有在校的外国留学生(十几个国家,一百多人)听说他来了,竟全体出动听他演讲,足见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于是,我们更加认识到应该翻译这部作品,让它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晓。翻译的建议提出来了,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还在我的老师蒋孟引先生在世时,就已经规划翻译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的翻译工作竟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完成,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憾事。

翻译工作最终是由我们几个中青年学子承担的,我们几个人,都学过英国史专业,对英国历史比较了解,而且和汤普森教授有过交往,至少是亲耳聆听过他的课。但翻译这本书还是有很大的困难,除了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外,还加上他的文笔太好,通篇竟如同一部哲学性很强的叙事散文诗一般!〔他年轻时曾想当一名诗人。美国历史学家亨利·阿贝洛夫曾经说:书名中"形成"(Making)这个词暗含着汤普森对文学创作的向往,因为在古英语中,写诗的人可以被称作"创作家"(Maker),这两个词

在英文中都出自“make”。[⑧]]另外，他引用的史料中，有许多是当时下层人民的俚语、口语，甚至文字不通之语，为保留史料的准确性，他对此全都不加处理，这又增加了翻译工作的难度。虽然我们竭尽全力希望译好，但也许还是力不从心，在这里特请读者和作者原谅。

我们希望，中译本出来之后，不仅能受到喜爱英国史的读者们的欢迎，而且能得到学术界其他领域人士的关注，因为，汤普森提出的问题，确实已超出了英国社会史的范畴，而带有普遍的启发意义。

本书的翻译工作分工如下：钱乘旦：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杨豫：第六至十二章；潘兴明：第三至五章；何高藻：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索引。

由于各种原因，商务印书馆现将本书的出版交给译林出版社，尽管如此，我们仍对商务印书馆所做的大量工作表示感谢，并对译林出版社所做的努力表示敬意。

译者，1999年8月　于南京

⑧　参看阿贝洛夫：《评〈理论的贫困〉》，载《历史理论》，第21期，1982年。

索　引